



普列汉诺夫  
哲学著作选集

普列汉诺夫  
哲学著作选集  
(第四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本卷第一部分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著作：  
汝信译，其中 3 至 276 页刘磊校，277 至 440 页  
何匡校；第二部分关于别林斯基著作：刘若水  
译、南致善校；第三部分关于赫尔岑著作：第  
一篇刘若水译、陈山校，后两篇何匡译、汝信  
校；第四部分书评：刘若水译，陈山校。

Г. В. Плеханов  
ИЗБРАННЫЕ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Том IV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8  
根据苏联社会经济书籍出版社 1958 年版译出

###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

(第四卷)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32.625 印张 796,000 字

1974 年 10 月第 1 版 197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32,000

书号 2002·208 定价 3.50 元

(内部发行)

21057/1/1  
(21057/55)

## 出版说明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系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辑，共五卷。前三卷于1956年到1957年由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后两卷于1958年由苏联社会经济书籍出版社出版。前三卷是普列汉诺夫关于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批判唯心史观和哲学修正主义等著作，我们已翻译出版。

第四卷是普列汉诺夫关于俄国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史方面的著作，主要是论述十九世纪俄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等人的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还有与此有关的书评。

普列汉诺夫在早期活动中，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论述俄国民主义者赫尔岑、奥加辽夫、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皮萨列夫等人的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他在这方面的著作，例如载于1890年和1892年文学政治评论杂志《社会民主党人》上的四篇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著，列宁曾经作过肯定的评价。

但本卷所收的文章有不少是普列汉诺夫在孟什维克时期写的。这就不能不反映他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观点。列宁在《普列汉诺夫〈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书批注》（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565—626页）中，特别指出普列汉诺夫在1909年关



于车尔尼雪夫斯基论著重写和修改的部分，观点上就有明显的改变。其实质是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反对用布尔什维克观点去评价俄国民主义者的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

在阅读本卷所收普列汉诺夫的这些文章时，把列宁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赫尔岑等人的分析评价同普列汉诺夫对这些人的分析评价加以比较，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的区分。

十九世纪俄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在反对农奴制的斗争中是起过历史作用的，列宁对此有过很高的评价。但列宁也着重指出，他们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马克思主义者“早就应该懂得和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完全和最后决裂的必然性和绝对的必要性了”（《列宁全集》第1卷第249页）。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国曾经有人把这些俄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冒充为无产阶级思想，以此淆乱视听，毒害人心，这是修正主义的反动手法。对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

为了给研究俄国和欧洲哲学史提供参考材料，现将本卷中译本出版，内部发行。

1973年10月

---

---

## 目 次

### 一、〔关于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

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导言〔为本书1894年德文版而作〕……	3—24
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1890年〕……	25—140
〔《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一书德文版(1894年)增补〕	141—155
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1909年〕……	156—418
导 言 ……	156
第一部 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历史和文学观点 ……	217
第一篇 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观点 ……	217
第一章 車尔尼雪夫斯基和費尔巴哈 ……	217
第二章 《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 ……	223
第三章 与尤尔凱維奇等人的論战 ……	236
第四章 道德学說 ……	248
第五章 車尔尼雪夫斯基和辯証法 ……	260
第六章 認識論 ……	268
第七章 生存竞争的有益性 ……	277
第二篇 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历史观点 ……	289
第一章 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 ……	289
第二章 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历史观点中的唯物主义 ……	294
第三章 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历史观点中的唯心主义 ……	300
第四章 社会发展进程 ……	312
第五章 車尔尼雪夫斯基和馬克思 ……	322

第六章 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后期历史著作·····	335
第三篇 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观点·····	348
第一章 文学和艺术的意义·····	348
第二章 別林斯基、車尔尼雪夫斯基和皮薩列夫·····	374
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西伯利亚〔1913年〕·····	419—440

## 二、〔关于維·格·別林斯基的著作〕

別林斯基与合理的现实〔1897年〕·····	443—504
維·格·別林斯基(1898年春天在日内瓦、苏黎世和伯尔尼的 俄国人举行的別林斯基逝世五十周年紀念会上的演說)·····	505—542
維薩里昂·格里哥里也維奇·別林斯基(1811—1848) 〔1909年〕·····	543—595
論別林斯基〔1910年〕·····	596—660

## 三、〔关于亚·伊·赫尔岑的著作〕

赫尔岑和农奴制〔1911年〕·····	663—758
亚·伊·赫尔岑的哲学观点(诞生一百周年紀念)〔1912年〕·····	759—826
在尼斯城赫尔岑墓前的演說 1912年4月7日·····	827—832

## 四、〔书 評〕

彼·雅·恰达也夫·····	835—858
米·格尔申臧：彼·雅·恰达也夫的生平和思想。圣彼得堡， 1908年。	
評米·格尔申臧的《青年俄罗斯史》·····	859—866
《青年俄罗斯史》。1908年莫斯科版。	
評米·格尔申臧的《历史札記》·····	867—874
《历史札記(关于俄国社会)》。1910年莫斯科版。	

---

評瓦·雅·博古查爾斯基的《亞·伊·赫爾岑》一書 .....	875—883
《亞歷山大·伊萬諾維奇·赫爾岑》。亞歷山大·伊萬諾維奇· 赫爾岑小組出版。1912年聖彼得堡版。	
注釋 .....	885
人名索引 .....	1007

# 一、〔关于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sup>1</sup>



---

---

# 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

47

## 导 言

〔为本书 1894 年德文版而作〕

Seine Zeit<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活动，主要是在亚历山大二世的声名狼藉的改革时期进行的。

俄国的自由派直到现在还感激涕零地忆念这位仁慈的“沙皇-解放者”，直到现在还对他称颂备至。但是这些颂辞引起当今皇帝的书报检查官的不满，因为大家知道，当今皇帝几乎是把他的父亲看作雅各宾党人的。笔者没有隶属俄国自由派的荣幸。从另一方面来说，笔者对亚历山大三世也决不抱偏袒态度。因此他能够客观地观察前一个皇朝所进行的改革。

在三十年内，“令人难忘的”尼古拉的政策使俄国受到沉重的压迫。停滞几乎被提到宗教信条的地位。一切有生气的、有思想的、表示抗议的东西都立刻被消灭，或者被迫改头换面到难以辨认的程度。但是克里米亚战争却根本改变了这种情况。尼古拉体制的软弱无能终于暴露出来了，以致这种体制的创立者本人除了自

---

① 〔他的时代〕

杀之外再找不到其他摆脱困境的出路。一直销声匿迹的不满分子这时都大胆地抬起头来。或者是改革，或者是新的自杀（而且这一次将不再是个别专制君主的自杀，而是专制制度原则本身的自杀）——这就是历史摆在尼古拉继承人面前选择的两条路。他明智地选择了改革，而改革中的一项最重要的改革就是废除俄国的农奴制。

48 自古以来，在这个国家里就一直存在着奴隶制（亦即所谓 холопство）。俄国最古老的立法碑就已谈到过奴隶制。任何一个穷人，只要他甘愿把自己出卖给富有的同胞，就能变为奴隶。战俘也正是这样沦为奴隶的。但是在相当时期以内，实行奴隶制的范围还极其有限。奴隶不过是王公、贵族和富有地主的家庭僕役。当俄国的当权王公把住有居民的领地赐与自己臣属的时候，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把居住在这些领地上的农民降到农奴的从属地位。这不过意味着国家把从领地征收贡税的权利让给“当官的人”罢了。农民以前为王公履行的徭役，现在为地主履行了。但农民本人照旧是“自由人”，他们有权自由地从一个地主转到另一个地主，或是从地主领地转到自由的（即只对国家尽徭役义务的）村社。这种制度有两种重大缺点。

第一，由于财产和在国家中的地位而实力雄厚的大地主，比起有时生活得比自己的农民胜强无儿的穷地主来，能够保证自己的农民得到更为可靠的保护并且过更好的物质生活。因此，农民成群地从穷地主转到富地主那里去。但穷地主的人数是很多的。他们是莫斯科国家的主要“服役”力量。直到十七世纪末，莫斯科国家的军队主要是从他们那里征募得来的。如果国家不愿意破坏这支力量，它就必須禁止农民离开穷地主的领地。国家果然就这样做了，它在十六世纪末限制了农民转移的权利。



第二，农民的自由给国库造成了直接的损失。从南方和东方包围了莫斯科国家的鞑靼人的势力被摧毁以后，为农业殖民开放了大片无人耕种的极其富饶的土地。农民们利用自由转移的权利，成群结队地涌向这个黄金国。不言而喻，向他们征收赋税和摊派徭役的沙皇官僚也跟踪而至。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是需要时间的，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有时甚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过了几十年以后，国家才使移民屈服于自己的压力。在这期间，移民们没有付给国家一分一毫，这当然使国家很不高兴。诚然，连环保使国家有法律上的根据向留住原处而列入纳税人（“服徭役人”）名单的农民征收以前的全部赋税，也就是说，要留下的人为不在的人纳税。但是，沉痛的经验早已向莫斯科国家表明，根据法律征收赋税的可能性远不等于征收赋税的经济上的可能性；*où il n'y a rien, le roi perd ses droits*<sup>①</sup>。无论沙皇官吏怎样卖力地向农民征收赋税，他们毕竟不可能向留住原处的假定说十个村社成员，征收到村社实际上（而不是在名单上）譬如说有四十户时所交付的那同样多的金钱、产品和劳动（当时实物贡赋还占优势）。当同西方的日益发展的往来迫切要求加紧充实国库的时候，“国家事业”却受到了无可置疑的损失。把农民束缚于土地，在当时来说是摆脱这种处境的唯一可能的出路。莫斯科国家并没有放过这一点。在十七世纪期间，农民的自由转移终于被彻底禁止了。农民落到了完全依附于地主和国家的农奴从属地位。

49

但农奴在法律上究竟不等于奴隶。“被束缚于土地的”农民究竟不像自古以来的奴隶那样是会说话的工具。完全把俄国农民变为农奴的荣誉，应当归之于伟大的俄国改革者彼得一世和大名鼎

①（在一无所有的地方，国王也就丧失了自己的权利。）

鼎的北方的梅薩利娜<sup>①</sup>——叶卡特林娜二世。

彼得必須在俄国建立一支按欧洲方式训练的常备軍，改組行政机关，着手发展貿易、商船队、舰队、工业和教育。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要有金錢，金錢，金錢。而彼得为了获得金錢是不择手段的。当然，为他的改革付出最多的是所謂納稅阶层：农民和貧苦的城市小市民。人民的极端的贫困化是这种改革的最直接的經濟后果。不言而喻，彼得是不可能把农奴彻底貶黜为奴隶这样的小事面前停步的。巩固和扩展农奴制，一点也不与他的改革計劃相矛盾。相反地，在他所开办的工厂和手工工場中劳动的正是农奴工人。农奴制是使俄国欧化的必不可缺的条件。彼得的继承人都热心地继承了他的事业。留待“开明的”叶卡特林娜二世去做的，就只能是一些画蛇添足的事情而已。她在1792年10月7日的敕令中宣布：“有領主的农奴和农民要包括、而且务必包括在財產額中；把他們从一个人出售給另一个人时，必須在农奴事务局簽訂买契，向国庫納稅，就像其他不动产一样。”农民成了單純的 *instrumentum vocale*<sup>②</sup>。但农奴按本性來說应属于动产，而不属于不动产。于是就发生了在市場上把农奴当牲畜一样成批出賣的事。

与此同时，一般推行农奴制的范围也扩大了。男女沙皇都喜欢把住有居民的領地賜給自己的男女寵臣。叶卡特林娜二世把农奴制推广到小俄罗斯。貴族取得了胜利，但他們的胜利有时由于农民方面的出乎意料的反抗而变得黯然无光。

① 梅薩利娜 (Messalina) 是羅馬帝国皇帝克勞第烏斯 (Cladius, Tiberius Germanicus, 紀元前 10-54) 的一个皇后，以殘酷淫乱著名，后来这个名詞成为一个俚語。俄国女皇叶卡特林娜二世也以殘酷淫乱著称，故有“北方的梅薩利娜”这个綽号。  
——譯者

② [会說話的工具。]

無論俄国农民怎样能够忍耐，無論他們怎样保守，他們总不是不战而降的。政府在奴役农民的道路上所走的几乎每一步都遭到了規模不等的农民起义的反抗。在十七和十八世紀，我們經歷了真正的农民战争（斯切潘·拉辛和普加乔夫的“暴动”）。誠然，俄罗斯国家越是欧化，人民的反抗力量也就越是相对地变得軟弱。在十九世紀，已經沒有一次农民运动能够和以往几个世紀的“暴动”相比。但是，尽管如此，农民起义还是越来越頻繁了。在尼古拉統治时代发生的农民暴动特別多，尼古拉以野蛮无比的殘酷手段鎮压了这些暴动。我們拥有从三十年代中期到克里米亚战争为止关于农民暴动的官方統計。这个統計表明，农民暴动的次数在这二十年内几乎以数学的准确性逐年增加。有时几乎全部省份都发生了暴动，并且农民和軍隊屡屡发生武装冲突。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間，曾經謠传政府将給予那些报名参加民軍的农民以自由。这个謠言引起了許多“混乱”，特別是在小俄罗斯。簽訂和約又引起了另一个謠言，即傳說拿破侖第三不同意停战，除非俄国接受廢除农奴制的条件。政府清楚地了解农民的心情，担心农民的总爆发。皇帝亚历山大二世說：“从上面来解放农民，要比等待从下面开始的解放来得好些。”

53

在这样的形势下，政府自然担心“有教养的社会”在尼古拉去世后立即暴露出来的不滿情緒。自动地給予，胜似被人强力地夺取。加冕登极的改革家这样想，他的大多数寵臣也这样想。

只有旧日的“尼古拉大兵”才能抱着另一种想法，因为他們除了棍棒之外不承认任何东西，也不知道任何东西。棍棒曾不止一次使俄国政府摆脱困境。但棍棒終于使俄国政府陷入了它在尼古拉皇朝末期所处的那种絕望的处境。受人称頌的尼古拉軍事制度暴露出是一种糟糕透頂的制度；軍官們、特別是將軍們都是一些不

学无术之徒或胆小鬼，装备极其恶劣<sup>①</sup>，在主管军需、炮兵和工程的部門中，盗窃公款的行为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并且已被人认为似乎是合法的了。此外，由于交通不便，俄国甚至不能在紧要的时刻很好地使用它所拥有的军事力量。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从伊兹迈依尔（多瑙河沿岸）运往塞瓦斯托波尔的一发炮弹的运费不下5卢布。最后，在财政方面俄国也处于破产的边缘。1855年的赤字达26,185万卢布（收入为26,411万9,000卢布；支出为52,596万9,000卢布）。下一年度的赤字更大。政府急忙签订了和约。但这还不够。必须寻求新的收入来源，发展新的生产力。但是当存在着农奴制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民间流传的里巷之谈也有它的深刻意义：农民解放实际上是“拿破仑”强迫我们进行的，也就是说是由克里米亚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强迫我们进行的。

54 如果说俄国工业在它于彼得一世治下诞生的时代不能没有农奴工人，那末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情况就已经完全不同了。现在，自由的工人已为俄国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所必需，而且还不仅仅为它的发展所必需。早在四十年代中期，在我国的著作中就已开始发出一种呼声，断言（诚然，由于严厉的书报检查而小心翼翼地断言）农业的成就是与农奴制的继续存在不相容的。官吏扎勃洛茨基—捷夏托夫斯基在他那篇惹起许多热烈争论的札记中最成功地证明了这一点<sup>2</sup>。

<sup>①</sup> “例如，从科尔夫将军指挥的叶夫帕托里亚之战可以看出，只能检阅仪仗队的尼古拉手下的统帅们对于军事艺术的无知已经达到何等程度。他在面对敌军时没有布置前哨，因此损失了许多炮垒和兵员。他们之中还有像基里亚柯夫将军那样躲藏在阿尔玛河附近山沟里的懦夫。”（《从克里米亚战争到签订柏林和约的俄国简史》，作者佚名，莱比锡1879年版，第2卷，第33页）几年以前，历史杂志《俄国往事》发表了克里米亚战争的一个参加者的回忆录。他谈到，当法国人在战场上拾起俄国步枪的时候，曾经惊讶地叫起来说：“你们看，这些野蛮人是用什么武器作战的。”

在尼古拉統治时代，俄国只建筑了两条铁路：从彼得堡到沙皇村（首都南 22 公里处的一个小鎮）和从彼得堡到莫斯科。这里不去談修建这两条铁路时发生了怎样一些被人們引为笑談的盜窃行为。我們只想指出，只有彼得堡—莫斯科铁路才具有經濟意义；通往沙皇村的铁路只是供彼得堡的“社交界”作消愁解悶的旅行之用罢了。現在甚至很难想像，从莫斯科的工厂区沿着土路把商品运往譬如說小俄罗斯的市集，曾經遇到多大的困难。生产越是发展，就越是迫切地需要修建铁路网，这个铁路网至少要把俄国的一些最重要的城市联結起来。

电报事业的状况也并不美妙。直到 1853 年，在俄国只有彼得堡和华沙之間供皇帝专用的一条有綫电报綫。以后几年虽然架設了一些电报綫，但数量极少：在 1857 年，电报网不超过 3,725 俄里。因此，貿易和工业的发展也要求从这方面进行最重大的“改革”。

尼古拉差不多不准創办私营股份公司，特別是不准創办銀行。地主和商人是通过官办的信貸机构通融資金的。我們已經引证过的那部《俄国簡史》的作者写道：“俄美公司、两家火灾保險公司、两三家輪船公司和工业公司，代表了俄国的整个股票界。”新皇朝的开始，掀起了一个兴办股份公司的真正的热潮。公司接二連三地成立，它們向头脑簡單的人允諾給予巨額的收益，它們的业务涉及到社会經濟生活的各个不同方面（如“从水中打撈沉船”的“基德罗斯塔特”公司，“改善工人生活”的“烏萊依”公司等等）。自然，这些公司中有許多公司在它們的創办人裝滿錢袋以后就宣告破产了。但是，这种狂热本身就表明：当时俄国已經把从尼古拉皇朝继承下来的旧的經濟生活形式改变到何等程度。为了新的經濟生活形式的发展，首先必須使它摆脱农奴制的沉重桎梏。

最后，也許对許多沙皇官僚來說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即农奴制

还妨碍政府向农民的錢袋肆意勒索。向农奴征收賦稅是要通过地主的。不消說，每次增加賦稅，每次对农奴追加任何負担，都引起了地主的不滿，因为这会破坏属于他們的“魂灵”<sup>①</sup>的經濟稳定性。使农民摆脱地主的权力，就等于扩大国家对他們的权力。农民和国家直接建立关系，使財政部的想像力得到了更大得多的活动范围，仅仅由于这一点，政府就必须采取“解放”政策。用切合实际的話來說，“解放”問題就是誰应当获得农奴所創造的剩·余·生·产·物（respective<sup>②</sup>——剩·余·价·值）的主要部分的問題：是国·家，还是地·主。

国家力求在有利于自己的情况下解决这个問題。但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連·同·土·地一起解放农民，而不是像地主所希望的那樣，不·連·同·土·地一起解放农民。俄国农民对他們所耕种的土地的历史权利是无可置疑的。但是，政府的解放計劃却不以这种权利作为根据。政府考虑的只是怎样使它能从农民那里榨取到尽可能多的劳动（在服徭役的情况下）和货币。无地的雇农并不符合这个目的，因此政府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地主党的要求。但是，它极力設法把它送給这个党的丸药里鍍上一层金。它連·同·土·地一起解放农民，同时强迫农民支付大大超过地价的土地贖金。它用这个办法，首先緩和了地主情緒，其次由于它在这件买卖上充当中間人，从而有可能把相当大的一笔款項装入自己的腰包，这笔巨款就是交給地主的錢和农民必須付出的錢之間的差額。

56 俄国农民改革的开始、进程和結局就是由这样一些情况决定的。我們現在再来談一下使亚历山大二世实行其他某些改革和決定这些改革的方針的其他一些情况。

第一，我們已經提到，克里米亞战争非常明显地說明了俄国軍

① “魂灵”俄文为“душа”，又作农奴解。——譯者

② [即是說]

事制度已經糟糕到什么程度。俄国軍隊的特点之一，就是缺乏多少受过教育的軍官。尼古拉本人也意識到这个缺陷，但他不可能消灭这个缺陷，因为他的整个統治时期就是反对教育的一場接連不断的战争。按照这个皇朝的精神，軍事学校根本不重視科学，一切全看学生在“前綫部队”里的成就。但比起軍隊的需要来，甚至連这样可怜的学校也太少了。于是就不得不把一些受过“家庭教育”（就是說沒有受过任何教育）并在团队里担任过一个时期下級士官的所謂士官生，提拔起来充当軍官。所謂普通学校、即非軍事学校的情况稍微好一些。在那里主要也是关心培养学生順从和馴服的精神。在尼古拉皇朝末期，进大学讀書的限制很严。大学里禁止讀哲学<sup>①</sup>，但却教学生……操練步法！自不待言，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俄国政府不得不“se recueillir”<sup>②</sup>，它被迫让教育获得稍大一点的活动范围。創辦了一些新的男子中学和中学預科学校，除了从前教育貴族小姐的“閨秀学院”之外，也成立了供一切等級的女儿讀書的一些中学和中学預科学校。限制大学生人数的規章取消了，高等技术学校（它們在尼古拉統治时期就是士官学校）經過了改組，最后，在軍事学校里，特别是自从米留金担任陸軍大臣以后，一个真正的新紀元开始了：步操教练几乎完全废除（每星期步操教练的时间不超过一小时），教学方法合理了，教学大綱大大扩充了；体罰几乎完全不用了（無論在軍事学校，或是一般地在軍

57

① 哲学在俄国的命运总是十分动摇不定和变化无常的；有时政府甚至鼓励讲授哲学，以消除“平等和狂暴的自由的幻想”。有时哲学期完全被逐出大学，被人看作关于“平等”和“狂暴的自由”的幻想的主要来源。尼古拉在 1850 年禁止讲授哲学<sup>3</sup>。关于这点，国民教育大臣希林斯基—希赫馬托夫曾經兴高采烈地欢呼說：“迷惑人心、卖弄聪明的哲学终于完蛋了。”某些哲学教授成了书报檢查官。可見他們是非常有节制地幻想“狂暴的自由”的。

② （好好地考虑一下）

队中，“沙皇—解放者”都不能下决心完全废止体罚。可是这一切措施毕竟都未能补救主要的缺陷：改组后的军事学校只训练出数量很少的军官，所以仍不得不照旧提拔只受过极可怜的普通教育和军事教育的士官生来担任军官。但无论如何，亚历山大二世的这些改革终于使青年大量涌入学校，而青年学生则在当时的社会运动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但是，无论俄国学校作了怎样重大的改革，专制的沙皇政府却不愿意、也不能够彻底进行这种改革：我国没有所谓学院自由，大学委员会的权力在学区督学的权力面前就完全消失了，而那些督学却往往和“国民教育”事业没有任何关系。例如，在亚历山大自由主义的蜜月时期、即1861年，高加索的将军菲力浦逊被任命为彼得堡学区督学（当时海军大将普嘉廷被任命为国民教育大臣）。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一定会发生学生“风潮”，直到目前为止这种风潮还一直以天文现象的规律性重复发生。

俄国的法院早就以贪污受贿闻名于世，而法官则完全不懂他们必须据以作出判决的那些法律。改组司法部门是亚历山大二世政府所实行的改革中最不得罪人的一个改革。除了旧的贪赃枉法的法官以外，所有的人都对这一改革表示同情。但是，只有在一种条件下这个改革才能进行得彻底，那就是必须限制可以任意修改法院判决的警察和一般行政当局的权力。然而专制改革者的政府既不愿意、也不可能愿意这样做。因此改组以后的司法部门在我国仍然是一株异地的奇葩；它和俄国国家机关的一般性质毫不相称，正像一顶丝织的大礼帽对身披兽皮的爱斯基摩人毫不相称一样。

我们再转过头来谈一下“沙皇—解放者”迫于当时的要求而实行的最后一个改革<sup>4</sup>。政府看到它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满足国家的



甚至最迫切的需要。它决定把某几种国家开支轉嫁給地方机构。政府的官吏无力担当搜括資金来弥补地方“必需开支”的沉重負擔，同时这些官吏也貪污得太多了。于是迫不得已只好求助于当地居民，贈給他們“自治权”，但这种“自治权”总是处于行政当局的严厉統制之下。在地方自治机构中，大地主起了主要作用。而为了使这班人的优势不致危害当时像在暖室里生长的資產階級的利益，地方自治局被剝夺了随意向工业企业征稅的权利；政府規定了对大企业主极其有利的特別稅率。归根結柢，在这里也像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一切开銷都落在农民身上；在我国，地方自治局通常向农民土地征收的稅，要比向財主土地征收的稅多出許多倍。

我們并不把书报检查的某些放寬称为改革，因为这种书报检查在尼古拉皇朝的最后几年曾經严厉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荒謬程度，甚至禁止在食譜中使用“文火”<sup>①</sup>这个用語。但无论如何，放寬书报检查終究使我們的报刊有可能討論它在“令人难忘的”先皇生前連提都不敢提的那些問題。在尼古拉治下，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活动仅限于他送給书报检查机关的第一篇长文。

这就是亚历山大二世的一些最重要的改革。俄罗斯帝国的各个不同等級对这些改革有些什么反应呢？

我国过去和現在都有四大等級：僧侶、貴族、商人（大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和农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在小市民这个名称下构成特殊的第五等級，但在尼古拉治下，他們的权利和那些不隶属于地主的农民的权利差不多毫无区别。小市民也像“国家的”农民一样，对国家处于真正的农奴从属地位。

在我国，僧侶階級过去和現在都划分为黑衣僧侶（修道僧）和

① 俄文为“вольный дух”，按字面直解为“自由的精神”。——譯者

白衣僧侶(教區僧)。教會的高級僧侶仅仅从修道僧中任命；属于白衣僧侶阶层的人不能担任神甫以上的圣职。黑衣僧侶手中集中了大量財富；而白衣僧侶却很貧穷。無論黑衣僧侶或白衣僧侶都同农民改革沒有直接的利害關係，因为当时僧侶階級已經无权拥有“农奴”。但一般說來，白衣僧侶是兴高采烈地欢迎那些旧制度垮台的，因为在那些制度下主教們盛气凌人，专横跋扈，并在僧侶界培植真正的士兵紀律。同时，由改革所引起的社会生活的活跃，也为白衣僧侶阶层的子女<sup>①</sup>开辟了嶄新的道路。在青年大学生中間，甚至在当时的文学界，“正教中学出身的人”(僧侶的子女們)曾起了最卓越的和最急进的作用。

农民“解放”实质上触及了貴族階級的利益。其实，反对废除陈腐的农奴制的只有最愚昧无知和最落后的地主。但是，对所有的地主來說，在什么条件下废除农奴制的問題却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問題。前面已經說过，地主党力求不連同土地一起解放农民，而政府却不能同意这一点。由此产生了貴族的反对情緒。地主們說：“沙皇的大王冠是由我們的小王冠組成的，打碎我們的王冠，也就打碎了沙皇自己的王冠。”大多数人在重复这句话时，把它当作一种幸灾乐禍的預言。但是，在貴族中間也有少数自由主义者，他們不反对按政府的計劃来解放农民，希望“俄罗斯国家的其余一切成員都能适应已經實現的变革；而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在无情揭露我国行政机关、法院、財政等方面的一切丑恶之后，召集作为俄国唯一救星的全俄縉紳會議，一句話，就是要向政府证明它应当繼續它所业已开始的事业”<sup>②</sup>。1862年2月，特維尔省貴族會議在致

① 大家知道，在俄国，白衣僧侶不仅不必保持独身，而且相反地，属于这个阶层的人是必須結婚的。

② 引自1862年10月8日屠格涅夫給赫尔岑的信5。

皇帝书中曾主张召集全俄縉紳會議。在其他各省的貴族中間也流传着类似的拟議。甚至有人想写一封由各阶层人士签署的联名信。政府毫不費力地鎮压了貴族对宪政的热望。只要它一声令下，它所解放的奴隶就可以把昨日的奴隶主的全部努力化为烏有。

商人——中等資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兴高采烈地欢迎“解放者”的一切改革。他們感到他們行时的日子就要到了，所以沒有絲毫反对的傾向。

我們在前面已經談过农民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的情緒。只要政府不废除农奴制，农民騷动就必然会不断增多和加剧起来。但是当“解放”事业已經开始了的时候，农民就耐心地等待它的結束。60 全部問題在于：农民怎样对待政府所給予他們的“自由”。如果他們要求另一种更充分的自由，那又怎么办？沙皇、官僚和貴族都担心这一点，当时的革命者也都指望这一点。

当时的革命党主要是由所謂平民知識分子組成的。什么是平民知識分子呢？要了解这个阶层的起源，就必须記得，在俄国，等級权利只有在貴族、小市民和农民中間才是世襲的。大家知道，直到目前为止农民的“权利”簡直等于毫无权利。但事情并不因此而有所改变。农民的儿子不管他从事什么职业，仍然是一个农民，除非他取得了国家的“官职”，或者“注册”为商人——任何一个有足够資金购买同业公会证书的人都可以这样做——，或者在某个城市的小市民团体进行“登記”。同样地，貴族<sup>①</sup>的儿子总是貴族，不管他种地或充当仆役。僧侶等級和商人等級的情况則不然。商人的儿子只有当他能购买同业公会证书的时候才是一个商人。否則他就列入平民知識分子的等級。不願意走父亲老路的僧侶子女也

<sup>①</sup> 誠然，在俄国还有“限于本人的”貴族官員。但是这个名称本身就表明他們的权利不是世襲的。

成为平民知识分子。“小市民”的无权地位是世袭的，正像贵族的权利是世袭的一样。但小市民的多种多样的职业使这个“等级”的人接近于平民知识分子。实际上，那些活动不合于等级框框的人都可以成为平民知识分子。

人数众多始终是平民知识分子阶层的一个特点。如果没有他们，国家机器和所谓公共设施的许多职能就无从发挥。但在改革以前，平民知识分子的地位很低并且受教育极少。他们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为拥有上层等级权利的人让路。在塞瓦斯托波尔失陷后进行的改革建立了新的社会关系，树立了平民知识分子的地位。现在他们作为工程师、律师或医生，能够保障自己的地位，无论如何他们总比例如农村教堂的下级服务人员的地位令人羡慕得多。

61 平民知识分子成批涌入学校，同时和他们一起想进学校的还有拥有小地产的破落贵族的子女。

受过教育的平民知识分子没有贵族所特有的那种上流社会的风度。他们不懂外国语，他们的文学修养也差得很多。但是至少他们比懒散的贵族有着一个无可怀疑的优点，这就是他们从幼年时起就不得不为生活而进行严酷的斗争，因而有着无比坚强的毅力。无论过去和现在，平民知识分子的这种特性有时对俄国人民极为不利。平民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吏反对“自由精神”的斗争，要比贵族出身的官吏更为坚决得多。平民知识分子出身的地主也比旧式的“地主老爷”更善于剥削贫农。但是当这种平民知识分子一旦对政府采取否定态度时，他们反对政府的斗争也是无比地坚决而有成效的。而平民知识分子正是常常对政府采取否定态度的。博马舍笔下的费加罗说，他 rien que pour exister<sup>①</sup> 而需要的智

①（仅仅为了生存）

慧，要比他治理全西班牙(pour gouverner toutes les Espagnes)所需的智慧更多<sup>6</sup>。俄国平民知識分子关于自己也可以这样說，而且和他打交道的政府要比道地的旧时代的法国政府更为专制和更为肆无忌惮得多。作为“自由职业”者，他們首先需要自由，他們随时随地都同猖狂无忌的警察专横发生冲突。“否定傾向”在平民知識分子中間得到了最有利的土壤，而且平民知識分子的“否定”并不限于貴族所慣用的那种俏皮的、肤浅的恶言恶語，这是不足为奇的。难怪溫文尔雅學問淵博的自由主义貴族屠格涅夫要把他們称为“虛无主义者”了，因为他們确是毫无顾忌地否定一切，并且立即从言論轉为行动。受过教育的平民知識分子，是新俄国的报信者，他向旧制度宣战，并在这场无情的生死决战中担当了开路先鋒的角色。

直到七十年代末，俄国革命运动史主要是俄国的这个居民阶层对沙皇制度的斗争史。现在有一些新的力量起来帮助平民知識分子了；现在工人阶级、从事体力劳动的无产者逐渐参加了斗争，他們的人数越来越多，并已开始意識到自己的政治任务<sup>①</sup>。可是在我們所談的那个时代，这一类战士还处于名符其实的 *in statu nascendi*<sup>②</sup>。那时还不能对他們予以重視，还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他們身上。平民知識分子必須尽其所能地用自己的力量来展开斗争。

现在就讓我們来看一下作为俄国解放运动旗帜的那些思想有多大的深度。在尼古拉統治时期，我們的文学还不敢涉及政治問題和社会問題。它必須局限于“文艺”和文艺批評的范围内。無論在文艺方面或是在批評方面，我們的文学在当时都已前进得很远。

① 參閱阿克雪里罗得的卓越的論文《Das politische Erwachen》(《政治覺醒》)等等7。

② (萌芽状态中)

当时我们的荣幸——别林斯基在进行活动，果戈里写下了他的不朽著作，我们的优秀小说家都成长和成熟起来。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小说和批评的一切卓越成就，都是履行四十年代的文学遗嘱的结果。但如果说我们在文学方面的成熟在那时已经不容置疑，那末我们在政治方面的成熟却还是未来的事。当时几乎只有在斯拉夫主义者和西欧主义者关于俄国是否应走全欧洲发展道路的激烈争论中，才涉及到社会政治问题。西欧主义者主张应当走这条路，斯拉夫主义者则证明不应当走这条路，说俄国应该在希腊俄罗斯的上帝和纯粹俄罗斯的沙皇的庇护下创造自己特殊的文化。争论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它引出了不少出色的、内容丰富的文章；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这首先是因为书报检查机关不准论战者超出最含糊的暗示的范围，而其次——这是最重要的——是因为论战双方都没有为了正确阐明争论问题所需的实际材料。

尼古拉时代的俄国先进人士在他们的文学和政治见解方面是以黑格尔哲学作为出发点的。在某个时期内，这位著名的德国思想家曾像彼得堡的皇帝一样是俄国的专制君主。区别仅仅在于：黑格尔的专制权力只在人数不多的少数哲学小组中得到承认，而尼古拉的权力则“从寒冷的芬兰岩壁延伸到炎热的考尔希达”<sup>8</sup>。而且应当承认，对俄罗斯人来说，黑格尔有时比尼古拉更坏。理解得很差的，更确切地说，完全没有被理解的关于一切现实事物的合理性的学说，乃是某种类似尼古拉所建立的宪兵团的东西。但是，  
63 人们可以仇恨尼古拉的宪兵，而且可以欺骗他们。而俄国的黑格尔主义者怎么能下决心欺骗他自以为是自愿选择的导师向他提供的精神宪兵呢？这是以反对一般的“形而上学”、特别是反对黑格尔的起义告终的整整一部悲剧。

俄国的“现实”——农奴制、专制制度、具有无上权力的警察、

书报检查机关等等，等等——在尼古拉时代的先进人上看来是丑恶的、不公正的、难以忍受的。他们不禁以同情的心情回想起不久以前十二月党人企图改善这种现实的尝试。但是他们，至少是其中最富有才华的人，已经既不能满足于十八世纪的抽象的否定，也不能满足于浪漫主义者的傲慢的、自私的、狭隘的否定了。由于黑格尔的缘故，他们的要求已经更加严格了。他们知道，历史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过程，单个的人在他和社会运动规律发生冲突的时候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他们对自己说：证明自己否定的合理性吧！用无意识的社会发展进程来证明这种否定的正确吧！或者就把这种否定当做个人的怪癖和孩童的任性而抛弃吧！但是<sup>9</sup>，（用俄国现实本身的内部发展规律）来从理论上证明否定俄国现实的正确，（就是解决一个黑格尔本人不能胜任的任务。就拿俄国农奴制来说吧。要证明对这个制度的否定是正确的，就是要指出：这个制度自己在否定自己，也就是说，现在它已经不能满足产生它的那些社会需要了。究竟是哪些社会需要促使俄国农奴制产生的呢？这就是国家的经济需要，如果国家不使农民变成农奴，它就会因经济枯竭而灭亡。因而应当指出，在十九世纪，农奴制已经成了满足国家经济需要的最坏的手段，它不仅不能满足这些需要，反而直接妨碍这些需要的满足。后来克里米亚战争就最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切。然而我们再重复一次，从理论上证明这一点，乃是黑格尔本人所不能办到的。按照黑格尔哲学的直接意思来说，其结论就是：任何一个社会的历史运动的原因是在它的内部发展中。这就正确地指出了社会科学的最重要的任务。可是黑格尔本人违背了，而且也不能不违背这一非常正确的观点。“绝对的”唯心主义者黑格尔认为“观念”的逻辑特性是一切发展的基本原因。这样一来，观念的特性就成了历史运动的根本原因了。每当重大历史问题摆在黑

格尔面前的时候，他首先用这些特性来说明它。但这样做就是抛弃历史的基础，并自愿地使自己根本不可能找到历史运动的真正原因。黑格尔作为一个极伟大的、真正天才的人物，也觉得事情并不十分妙，老实说，他的解释完全没有说明任何问题。因此，他在给“观念”以应有的估价以后，就赶快回到具体的历史的基础上，寻找社会现象的真实原因，但已不是在观念的特性中，而在他当时所研究的社会现象本身中去寻找了。同时他时常发表一些最有天才的猜测（因为他看出历史运动的经济原因）<sup>10</sup>。但天才的猜测毕竟是猜测而已。它们缺乏牢固的、恒久的基础，因而在黑格尔和黑格尔主义者的历史观点中，它们也没有起重大的作用。因此当这些猜测发表出来的时候，它们几乎没有受到重视。

黑格尔给十九世纪的社会科学所指出的伟大任务，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人类历史运动的真正的内部原因仍然没有找到。不言而喻，当时在俄国不可能出现一个能够找到这些原因的人，因为俄国的社会关系太不发达，俄国的社会停滞现象太顽固，以致这些所要寻找的原因不可能浮现到俄国社会现象的表面上来。在西方，这些原因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找出来了。然而这件事情也是发生在若干年之后，在我们所谈到的那一时期里，那里的黑格尔主义者-否定派还陷在唯心主义的矛盾中。叙述过这一切之后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俄国年轻的黑格尔信徒一开始就和俄国的“现实”彻底妥协，顺便提一句，俄国的“现实”是非常腐朽的，以致连黑格尔本人都从来没有承认它是“现实的”。他们对现实的这种否定态度，由于在理论上没有得到证明，因而在他们看来就丧失了任何合理的存在权。他们放弃这种态度，自我牺牲地和大公无私地为了哲学的忠诚而牺牲自己的社会愿望。不过另一方面现实本身却又逼使他们不能作出这种牺牲。但腐朽不堪



的现实每日每时都在使他們望而生厌，迫使他們無論如何要采取否定态度，也就是說，即使沒有充足的理論根据，也要采取否定态度。可是，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他們对现实的悬求让了步，他們对现实采取了敌視态度，而不再查問这是否符合黑格尔哲学的精神。俄国的黑格尔主义者起来反对自己的老师，并且对他的那顶不久以前还在他們眼里备受尊敬的“哲学帽子”<sup>11</sup>大加嘲弄。无可爭辯，这种反抗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一件极其值得贊揚的事。但是不應該忘記，我們的先进人物由于反对黑格尔，却降低了自己的理論要求的严格性，放弃了用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来证明自己的否定的正确性的思想，而满足于使这种否定符合他們自己的情緒。因此，俄国“现实”的反对者采取了空想主义的观点，在他們之后有許多多俄国革命家都坚定地采取了这种观点。直到如今，由于熟悉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而發生的影响，在我国才表现出向科学社会主义的某种轉变。在我們所談論的那个时期，即在亚历山大二世統治的初期，甚至最有天才的俄国革命思想的代表者也沒有超越，而且也不可能超越空想社会主义。

大家知道，空想社会主义根本不能向无产階級提出比較明确的政治任务，它把无产階級仅仅看作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被压迫的、受苦受难的群众。这是空想社会主义在政治方面的最突出的弱点，这个弱点是馬克思主义以前的全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最触目的。在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的这个弱点就表现在空想社会主义的拥护者过去和現在一直对沙皇制度抱着搖摆不定的态度上面。有时他們认为，應該“让死人去埋葬自己的尸体”，而自己則只应去設法实现自己那套总算是社会主义的“理想”，撇开一切哪怕多少带点儿“政治”味道的东西<sup>12</sup>。相反地，有时他們又梦想“純政治的”阴谋，用妄想来安慰自己的社会主义的良心，认为俄国“人民”

即使没有任何社会主义宣传过去和将来也始终是“天生的共产主义者”<sup>13</sup>。定期重分土地的农村公社在我国的存在，支持了人们这种惬意的信念；而这种农村公社是德国人哈克斯特豪森<sup>14</sup>发现的，虽然他受到斯拉夫主义者的指点。

68 马克思在1845年春天写道：“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身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例如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sup>15</sup>。俄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拥护者们在他们的纲领中经常把自己置于社会之上，因此遭到了许多次失败和失望。

读者知道，我们所引证的马克思的话，不是指的和同一个马克思的名字密切相联的现代辩证唯物主义，而是指旧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既不能从历史观点去观察自然界，也不能从历史观点去观察社会关系。五十年代末期，这种唯物主义开始在俄国广为流行。卡尔·伏格特、毕希纳、摩莱萧特的名字在当时博得了很大的声誉，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的名字则成为各种反动势力的同义语。现在黑格尔特别引起了俄国“有思想的无产阶级”的痛恨。但这是一种极端，上面所说的“无产阶级”的最有教养的代表们并没有走这种极端。熟悉德国哲学史的人仍然把黑格尔尊为伟大的思想家，虽然现在对他的哲学远不是迷恋了。在这些人看来，费尔巴哈是当时主要的哲学权威。费尔巴哈要比伏格特或摩莱萧特高明得多。他本能地感觉到伏格特和摩莱萧特所宣扬的那种唯物主义的缺陷。但他不能批判地纠正这些缺陷。他没有达到对自然界和社会的辩证观点。“他把人当作出发点；但他只字不提这个人的周围世界，因而他的这个人仍然是宗教哲学中所说的

那个抽象的人。这个人不是由女人生出来的：他像由蛹变成蝴蝶一样，是从一神教的神身上飞出来的。因此，他也就不是生活在现实的、历史上发展了的和历史上确定的世界里面。虽然他跟亲近的人也有来往，但他的亲近的人也和他本人一样是抽象的。”<sup>①</sup>显然，费尔巴哈的哲学不能向五十年代末有教养的俄国平民知识分子揭示空想社会主义的弱点。而当时在俄国却没有一个人比费尔巴哈走得更远。在那里，人们还完全不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观点。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的著作在英文原本出版后立即被译成俄文<sup>17</sup>。但“有思想的无产者”却仅仅利用它〔达尔文的理论〕作为反对宗教迷信的武器。它并没有消除长久以来深深植根于“有思想的无产者”的头脑中的那种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片面性。 69

最后，应该指出，不仅俄国的读者，而且连四十年代最有教养的俄国作家，也都极其缺乏经济知识。别林斯基在自己的文章里从未涉及经济问题，而赫尔岑则至死还深信蒲鲁东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六十年代初期，政治经济学在俄国才真正成为一门时髦的科学。但一时的热衷并不能代替真正的知识，因而这门科学的最初几步必然是朝着空想的方面走的。

恩格斯在某个地方曾经说过，“爱”帮助了空想时期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渡过了种种理论上的难关。爱也同样帮助了俄国的“有思想的无产者”。在“爱”不能充当救星的地方，就由抽象的“理性”出来充当救星；而这种抽象的“理性”则是整个启蒙时期（Aufklärungsperioden）的特征。借助于这种理性，最复杂的社会问题也可以迎刃而解。普希金曾经讲过一段故事，说他认识一位显贵的俄国年老贵妇，在年轻时曾见过著名的法国革命家罗姆。她说：“C'était une forte tête, un grand raisonneur; il vous aurait rendu

<sup>①</sup>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俄译本，第29页16。

clair l'apocalypse.”<sup>①</sup><sup>18</sup> 亚历山大二世统治初期的我国启蒙运动者也就是这样的“fortes têtes”<sup>②</sup> 和“grands raisonneurs”<sup>③</sup>。他们解释启示录并不比罗姆差，并且也正和他一样没有领悟到要用历史观点去看它。

\* \* \*

\*

这就是車尔尼雪夫斯基不得不在其中生活和活动的历史环境。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样生活的，而主要的是——他是怎样活动的。

---

①（这是一个聪明人，一个大哲学家，他能解释一切——甚至包括启示录。）

② “聪明人”。——译者

③ “大哲学家”。——译者

---

---

## 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

70

[1890年]

“我們的生命是属于历史的；几百年后，我們的名字还会使人們感到亲切，虽然到那时候我們的同时代人已經不在世上，但人們还会怀着感激的心情回想起我們的名字。”

(引自1862年10月5日車尔尼雪夫斯基自彼得保罗要塞写給他妻子的信)19

1889年10月17日，尼古拉·加甫利洛維奇·車尔尼雪夫斯基与世长辞了。我們的一些“合法”刊物仅仅用簡短而枯燥无味的訃聞送他入墓<sup>20</sup>。对这位作家的文字追悼也就以这些訃聞草草結束，而这位作家的活动却构成了我国文学史上的整整一个时代。我們的“独立”报刊——我們在这里且不談“保守”报刊——用懦怯而吞吞吐吐的語調关于他說了三言两語之后，看来就把他完全遺忘了，仿佛急于要轉換一个更有趣的題目。在旁观者看来，譬如說，在懂得俄国語言和熟悉俄国文学的外国人看来，这大概是非常奇怪的。的确，感謝上帝，現在我們已經沒有一家杂志可以称得上是完全贊同已故的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傾向和观点的。比起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俄国思想已大大地前进了，我們現在已变得这样冷靜、穩健和慎重，以致《怎么办？》这部小說的著名作者在我們

看来只不过是个人有天才的、可是过于脱离实际的、甚至带有一些危险性的幻想家。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应该做的完全不是車尔尼雪夫斯基所曾经想做的。他谈论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我们却认为，只要听凭地方自治机关自生自灭和从富农血口下救出农村公社的尾巴就够了。我们就这样由于饱经世故而变得心平气和了。但这还不够。主要的是，现在我们做起事来（当我们做的时候）完全不像車尔尼雪夫斯基那样。我们做事主张不慌不忙，而他却仿佛没有听说过这条英明的规则。他有时采取了这样一些不审慎的步骤，  
71 让自己说出一些未经深思熟虑的大胆的话，现在差不多已经过了三十年，但只要一回想起这些话，还能使冷静持重、具有自由主义精神或稳健而又急进的“某君”害热病。这一切就是这样，这一切丝毫不容怀疑。但要知道，为了在杂志上用几个印刷页来评论一位作家的活动，并不需要完全赞同他的观点和倾向。为了做到这一点，只要知道他由于某些原因而在当时文学中起了显著的作用就够了。哪一个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某君”能够同意卡特柯夫的观点呢？但是，在他死后关于他的吵嚷难道还少吗？或者，也许米哈伊尔·尼基佛罗维奇·卡特柯夫的活动比尼古拉·加甫利洛维奇·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活动值得予以更大的注意吧？我们不见得会明智到想出这种念头的地步。

事情的原因极其简单。尼古拉·加甫利洛维奇·車尔尼雪夫斯基是政府方面最毒辣、最残酷的迫害的牺牲者。在谈到牺牲者的时候，我国的“独立”报刊尽管具有饱经沧桑的明智，也不能不向劊子手说出几句沉痛的真理。但因为书报检查的戒尺<sup>21</sup>正是掌握在这些劊子手的手里，所以难怪我们的期刊认为最好还是完全回避这个棘手的问题了。我们民间的贤哲有言：“勿与强者相斗”，在这个场合下，这句名言是同俄国报刊的高见完全一致的。

真的，我們不能不为这两种高見的不謀而合表示惋惜。把現在这个时代和过去那个时代比較一下是有教益的；分析一下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便可以非常明显地向讀者表明，我們現在离开这位社会主义者和革命家的錯誤学說有多么远。只要确信了这一点，讀者便会再一次为了俄国社会思想的迅速发展而感謝蒼天的。

书报检查的戒尺只能間接地通过各种外交“压力”来麻煩我們这些在国外写作的人。同时，我們之所以要在国外写作，是因为我們还不够明智，而直到目前仍然认为，有时也不妨对强者进行斗争，并提醒劊子手想起他們手下的牺牲者。因此，我們认为有义务在我們杂志的第一期<sup>22</sup>上对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活动作一个尽可能全面的、不偏不倚的評价。

不管對我們來說履行这个义务是多么愉快，这工作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且不說我們的能力不足以担任这件重要的工 72  
作。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除此而外，我們还要請求讀者記住，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国外出版的他的論文(由艾尔皮可先生出版，一部分由热馬諾夫先生出版)，远不及他所写的全部著作的一半<sup>23</sup>。因此，我們不得不求助于原始資料，即求助于《同时代人》杂志，因为尼古拉·加甫利洛維奇主要是在这个杂志上写文章的。大家都知道，在国外是否容易弄到俄国的旧杂志。我們只能部分地克服这个困难。我們不能得到車尔尼雪夫斯基撰稿的年代里的某几年的《同时代人》杂志。在閱讀我們所得到的他的那些著作的时候，我們遇到了新的困难。有許多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即发表在“新书”栏、“政治”栏和“文学”(俄国文学和外国文学)栏的全部文章——在发表时都沒有署名。因此，我們不得不把批評家的工作与傳記家的工作結合起来，反复閱

讀那些沒有署名的文章，以便根据文体和叙述手法来确定它們是否出于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手笔。显然，在这里可能有一些疑問、甚至錯誤。不管車尔尼雪夫斯基的风格多么独特，也不管他的文体对任何哪怕只仔細讀过他的少数著作的人來說是多么容易識別，但終究有几篇文章我們总是不能决定它們是否出于他的手笔。一般地說，我們避免引证这种可疑的文章。只是在一种情况下(在那里我們將指出这一点)，我們才决定放弃这个原則，引证一篇可能不是、甚至多半不是我們这位作者写的文章，但这篇文章对于评价《同时代人》集团对社会問題的观点却是极其重要的。我們所引证的其余一切文章都无疑是車尔尼雪夫斯基写的，任何一个用心閱讀这些文章的人都容易相信这一点。

在預先作了这个必要的、但很少令人感到兴趣的說明之后，我們似乎可以言归正传了。可是很遺憾，我們还得預先作一个新的說明。我們希望讀者原諒，我們的評論將以一段相当长的引文开始。誰不知道，这样开头是不美观的和带学究气的呢？但是我們容忍了这一点，因为我們所引的話清楚地表明了我們对事情的态度。当令人惬意的东西同有益的东西相抵触的时候，人們往往不得不为了有益的东西而牺牲令人惬意的东西。可是，我們所摘录的这一段話引自很好的資料，引自我們所談的这位作者本人的著作，即引自他的《果戈里时期俄国文学概观》。

73

他在轉到果戈里时期的批評时在这部概观中說道：“我們每个人都有—种内心感到十分亲切而可貴的事物，他在談到它时，他总努力使自己保持冷淡和平靜，竭力避免其中可以使人听到他的过分强烈的热爱的說法，因为他預先知道，在謹守一切对他說來可能做到的冷靜，他的言語就会变得更加热烈了，——如果我們說，我們每个人都有这种内心引为可貴的事物，那末果戈里时期的批評，



就在他們中間据有一个重要的跟果戈里本人相当的位置……因此我們要尽可能冷靜地談論果戈里时期的批評：在目前这个場合，夸大之言對我們是无用的，而且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尊敬和同情可以发展到这个境界，在那时候，一切贊美，都会被人們当作一种不能表达感情的全部丰美性的东西而加以擯弃”<sup>24</sup>。我們对果戈里时期的天才批評家別林斯基抱着深摯的尊敬和热爱，正像我們所引的《概观》的作者对他所抱的尊敬和热爱一样。在这方面，我們既不能对这段引文增一分，也不能减一分。但是，我們要指出，在目前，对任何一个俄国社会主义者來說，車尔尼雪夫斯基本人就是这种热爱和这种深摯的尊敬的对象。这就是为什么我們要遵循他本人的榜样，在談論他的时候要尽可能更冷靜一些，因为的确“尊敬和同情可以发展到这个境界，在那时候，一切贊美，都会被人們当作一种不能表达感情的全部丰美性的东西而加以擯弃”。

—

我們不打算写一部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傳記。我們还没有为此所需的足够的材料。迄今为止，我們关于他的生平知道得极少。我們在这方面关于他所知的很少的材料，都包含在他的著作的国外版所附的一篇小传略里（請參閱小册子《萊辛》和小說《怎么办？》的第二版<sup>25</sup>）。这篇传略很簡短。但其中有某些年表材料，而更重要的是，其中刊載了有关审判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文件。当然，我們在利用这些材料时，还从我們这位作者本人的著作中借用了某些事实来作为补充。但是所有这一切还是少得可怜的，因此不能不希望那些比我們更熟悉車尔尼雪夫斯基的人，尽快发表他們关于他的回忆录以及他們所拥有的他的书信和文件。这样，他們就将

但在等待他們这样做的时候，我們不得不暫時滿足于我們已有的資料。这些資料可以概述如下。尼古拉·加甫利洛維奇是薩拉托夫大教堂的一位神甫的儿子，生于1829年<sup>26</sup>。他起初在薩拉托夫正教中学讀書，后来在彼得堡大学学习，于1850年从該校語文系毕业。毕业后曾在彼得堡第二士官学校担任一个时期的教員，后来轉任薩拉托夫中学的教員。他在自己故乡城市，如果我們沒有弄錯，很快就和現在非常有名的博学的作家貝平的姊姊結了婚<sup>27</sup>。但是，年輕的車尔尼雪夫斯基显然很难忍受外省的沉悶空气，因此他在1853年又到了彼得堡，在那里重新在第二士官学校任教，同时从事翻譯工作，并为当时由克拉耶夫斯基和杜德希金出版的《祖国紀事》杂志写新书評論。我們大概沒有弄錯，我們这位作者在他一生中的这个过渡时期內曾不得不忍受貧穷和困苦。当时他是一个普通的文学杂工，大家知道，在我国文学界，打杂劳动的报酬是极不令人羨慕的。車尔尼雪夫斯基从来也沒有其他的生活来源。但是，他年輕而且健康，不怕任何劳动，不怕作任何努力。除了維持生活所必需的文学工作以外，他还从事写作《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这篇碩士論文。他为学位論文所挑选的題目足以說明，他为自己未来的活动提出了怎样的任务。以他的教养、才能、无比的勤劳和通俗地闡述最枯燥而艰深的題目的卓越才干來說，他可以指望在学术上取得輝煌的前程。只要他願意，他就保险能够取得教授的职位。但他却希望另一种职业。他向往批評家和政論家的活动。不管俄国的书报检查多么严厉，別林斯基的范例还是留在所有人的記憶里；別林斯基不顾书报检查机关的刁难，不仅能通过文学来传播許多最重要的真理，而且还使我們的批評建立在嶄新的理論基础上。我們已經知道，車尔尼雪夫斯基怎样热爱并深深尊敬这位作家。因此，他希望循着別林斯基的足迹前进，

以便尽自己的力量和可能来继承他的事业,是不足为奇的。同时,尼古拉皇帝的前途看来已接近结束,他的统治的摇摇欲坠在所有的人看来都已是显而易见的了,以致人们可以指望在新皇朝治下 75  
会有某种政治上的解冻,可以指望普希金所戏称的那种

虔诚的老傻瓜,

我们的死板的书报检查<sup>28</sup>

的风气会有所缓和。刚开始写作的作家可以这样并非毫无根据地指望较好的未来。最后,尼古拉·加甫利洛维奇对那些愿意为俄国的幸福而劳动的人的任务,产生了一种非常独特的看法。由于持有这样的看法,他就不可能认为他的同胞们的纯学术活动具有重大的意义。在我们已经引证过的《果戈里时期俄国文学概观》一书中,他很明确地谈到这一点。他说:“有许多极伟大的科学家、诗人和艺术家,曾经一心献身于纯科学或者纯艺术,而不是单单为自己祖国的某种特殊需要效劳。培根、笛卡儿、伽利略、莱布尼茨、牛顿,以及今天的洪堡尔特、李比希、居维叶和法拉第,他们过去和现在都为着科学的一般利益操劳,而并不考虑在特定的时期必须为了某个曾是他们祖国的国家的幸福而操劳……作为智力世界的活动家,他们都是世界主义者”<sup>29</sup>。但是,根据他的意见,俄国的智力世界活动家却并不处于这种地位。他们还不能做世界主义者,也就是说,还不能考虑纯科学或纯艺术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根据他们国家的条件,他们只能做一个“爱国主义者”,即必须首先考虑自己祖国的特殊需要。在这个意义上,彼得大帝这个立志要把欧洲文明的一切成果输入俄国的人,在車尔尼雪夫斯基看来乃是“爱国主义者”的理想。他认为,甚至在他的时代这个目的也远没有完全达到。“到现在为止,俄国人在真理、艺术、科学的这些崇高观念之前唯一可以做到的功绩——就是帮助它们在祖国传播开来。随着

76 时序的推移，在我们这里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也将像在其他民族那里一样，纯粹为了科学与艺术的利益而行动；但是，当我们就本身的教养说来还不能跟最有成就的民族并驾齐驱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另一种内心感到更加切近的事业——尽力促进彼得大帝所创始的事业继续发展。这个事业直到现在还在要求着，而且看来还将长久要求着我们祖国最有才禀的儿子，献出他所赋有的一切智慧和道德的力量”<sup>①</sup>。车尔尼雪夫斯基正是希望致力于在自己的祖国传播真理、艺术和科学的崇高观念<sup>②</sup>。他怎样理解这些观念，——这本来只有分析他的著作才能加以说明。但是在进行这种分析以前，我们希望说明他的一般观点，并指出他和他的文学先驱们的关系。在这样做之后，我们就可以不很费力地来评价他的某些个别的观点了。而且我们现在这样做是更合适的，因为我们现在正是谈论他生活中的这样一个时期，那时他还没有特别积极地参加文学活动，还正在形成自己的观点，吸收和分析“真理、艺术和科学的崇高观念”。

在所有的文学先驱者中间，车尔尼雪夫斯基最尊敬别林斯基及其团体<sup>31</sup>。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设想，他正是从别林斯基及其团体的著作中受到教育的，他从这个泉源汲取了他对真理、科学和艺术的观念的理解。但是事实并不完全如此。虽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自己的著作中根本没有涉及自己的思想发展史，但是，他有一段关于杜勃罗留波夫的简短的议论，对他自己的思想发展史可以透露出某些消息。我们指的是他在杜勃罗留波夫逝世后为了答复某个 З-н 先生的文章而写的一封信，这封信刊载在 1862 年《同时代人》杂志二月号上。顺便提一下，那位 З-н 先生在自己的文章

① 参阅《同时代人》，1856 年第 4 期，批评栏，第 29—31 页 30。

② [参阅后面德文版对这处的补充，本卷第 141 页及以下几页。]

中說，已故的杜勃罗留波夫是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学生，并且受到他极其有力的影响。車尔尼雪夫斯基激烈地、甚至非常憤慨地否认这一点。他說，杜勃罗留波夫完全是独立地达到自己的观点的，并且無論按其智力或文学才能來說都远远胜过他。我們現在不需要做出判断，这个謙虛的声明究竟有几分符合真情。在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整篇信中，我們現在只对下面一点感到兴趣。在提到杜勃罗留波夫懂得德文和法文，因此能够从原著來閱讀法国和德国的一些最卓越的文学作品之后，車尔尼雪夫斯基說道：“如果一个有才华的俄国人在他本身发展的关键年代要閱讀我們共同的西方伟大导师們的书籍，那末，用俄文写成的书籍和文章也可能使他喜爱、使他贊賞……但無論如何，对他來說，用俄文写成的书籍和文章却不能成为他通过閱讀所汲取的那些知識和概念的最重要的来源”<sup>①</sup>。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要知道車尔尼雪夫斯基也懂外国文，77也在他本身发展的关键年代里讀过我們共同的西方伟大导师們的书籍。因此可以設想，用俄文写成的某些文章和书籍也只能使他叹賞，但同时对他來說，它們也不是他的概念和知識的最初来源<sup>33</sup>。現在要問，这个最初的来源究竟是什么？我們究竟应当到什么样的文献和这种文献的哪些部門中去寻找这个来源？

順便提一下，在三十和四十年代，对我国青年人來說，在他們发展的关键年代里德国哲学曾經是最重要的教材之一。在以后几十年內，这种情况起了变化。在五十年代里，我們对德国哲学似乎簡直是漠不关心的。在六十年代里，則开始对它表示仇恨和蔑視。德国哲学被人宣布为“有思想的实在論者”<sup>34</sup>不值得为之浪費時間的“形而上学”。在西欧哲学家中間，只有实证主义者受到他們的寬

① 《致謝》（給 3-й 先生的信），《同时代人》，1862 年 2 月号 32。

容。反对德国哲学的斗争在我们这里进行得这样成功，以致我们的“有思想的实在论者”能够为他们战胜“形而上学”而感到自豪；他们可以带着正当的骄傲感说，他们对德国哲学根本一无所知。但是，无论车尔尼雪夫斯基或是他的最亲密的朋友，都不属于这些洋洋得意的实在论者之列。他们对德国哲学感兴趣，并且用心地研究过德国哲学史。德国哲学的发展和当时的状况无疑对他们发生了非常有力的影响，正像它曾影响过别林斯基的友人一样。但是，德国哲学家中究竟是誰能使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之倾倒呢？

当然，不是费希特，不是谢林，也不是黑格尔。他们在当时曾经使别林斯基为之倾倒，但即使对别林斯基来说，在他的批评活动的后半期，这些哲学家的体系，也已经如德国人所说的，是ein überwundener Standpunkt<sup>①</sup>了。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尤其可以这样说。在他的发展的关键年代里，哲学已经永远抛弃了唯心主义的一切变种。但如果事情就是这样，那末德国哲学家中间究竟有什么人能对他发生最大的影响呢？我们将再一次到他本人的著作中去寻找回答这个问题的暗示。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了答复《俄罗斯通报》和《祖国纪事》这两家杂志对他的整个倾向和他的论文《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的猛烈攻击，曾经写了《论战之花》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断然地说，他赞同一个哲学体系，这个体系“组成一系列哲学体系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并且“发源于黑格尔的体系，正像黑格尔的体系发源于谢林的体系一样”。熟悉哲学史的人从这里就可看出他说的是哪一个体系。对那些还没有把问题弄清楚的人，我们不妨再摘引一段话。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这篇文章里向杜德希金问道：“大概您要知道我所说的这位导师是谁吧？为了使

①（一种陈旧的观点）

您便于寻找起见，我要告诉您，他不是俄国人，不是法国人，不是英国人，不是毕希纳，不是麦克斯·施蒂纳，不是布鲁诺·鲍威尔，不是摩莱肖特，也不是伏格特，——那末他是谁呢？您在开始猜测吗？……”<sup>35</sup>的确，不能不猜到：車尔尼雪夫斯基说的是费尔巴哈。車尔尼雪夫斯基所写的唯一哲学论文的标题本身就指明了费尔巴哈：第一个谈论哲学中的人本主义观点的正是费尔巴哈。我们可以从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论文中援引许多证据，证明他对费尔巴哈抱着最深挚的崇敬。在他看来，费尔巴哈不比黑格尔差，而这一点就说明许多问题，因为車尔尼雪夫斯基认为黑格尔是最有天才的思想家之一。这样，我们这位作者的哲学观点就被我们找到了。作为费尔巴哈的信徒，車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位唯物主义者。他在上面提到的那篇《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一文中写道：“自然科学所制定的关于人类机体统一性的思想，是哲学对于人类生命及其全部现象的观点的原则；生理学家、动物学家和医学家的观察消除了一切关于人的二元论的思想。哲学所看到的人，和医学、生理学、化学所看到的一样；这些科学证明，在人身上看不到任何二元的东西，而哲学则另外还说，如果人除了他的实在的本性外，还有另一种本性的话，那末，这另一种本性就一定显现在什么东西之中，但是它并没有显现在任何东西之中，人体所发生的和表现出来的一切都是按照他的一个实在的本性进行的，所以，人就没有其他的本性”<sup>36</sup>。这是不需要再加解释的。

## 二

但我们不妨指出我们这位作者的导师在哲学史上所占的地位。费尔巴哈的学说发源于黑格尔的学说。但黑格尔是一个唯心主义者，而费尔巴哈却是一个坚决的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的主要

79 功績在于，哲学以他为代表永远推翻了唯心主义。不过在这里应该预先说明一点。在费尔巴哈之前也有过唯物主义者。为了不必老远地去找例子，我们只要指出上世紀末期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就行了。《Système de la Nature》<sup>①</sup>——完全是唯物主义的著作。可是能不能說，费尔巴哈只不过使哲学回到霍尔巴赫男爵及其友人的观点呢？这是不正确的。最新的唯物主义与上世紀末的唯物主义有极大的不同；这种区别主要在于思维方法本身。现代唯物主义——当然是指它的优秀的、成熟的代表——持有一种特殊的思维方法，它被称为辩证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在上世紀的法国唯物主义者那里要比例如在自然神論者卢梭那里更少得多<sup>37</sup>。我们没有必要向讀者說明現代辩证思维方法的特点是什么，因为这早已由一位比我们远为內行的人做过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的著作大大地促进了费尔巴哈观点的进一步的系統发展）关于这一点是这样說的：“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思维的形象即概念乃是个别的、不变的、固定的、永久如斯的东西，应当一个个地、彼此独立地受到研究。他是在完成的、絕對不能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着；他的說法是：‘是——是，否——否，除此以外，即为鬼話’。在他看来，一个事物或是存在，或是不存在；同样，事物不能同时是自己而又是其他事物。正与反是絕對互相排除的；原因与結果相互間也同样处于完全的对立中。”辩证論者不是这样思想的。他观察事物和概念，即事物在头脑中的反映，是从“它們的相互联系，它們的結合，它們的运动，它們的产生和消灭”去观察的。因此，在辩证論者眼中，一切現象和一切概念都与在形而上学者那里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他不像形而上学者那样总是不容反駁地武断說，一

① 《自然体系》



个事物在每一特定时刻或是存在,或是不存在。在日常生活中,形而上学者当然是正确的,但在更仔细地、更科学地进行研究时,他就完全糊涂了,那时辩证论者就开始取胜。“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确信地说某种动物是存在或是不存在,但在进行较精确的研究时,我们却发现这有时是极度复杂的事情,律师们很熟知这一点,他们竭力要发现在母亲子宫内杀死胎儿究竟超出何种合理界限时才算是謀害,结果总是徒劳无益。同样,死的时刻也不可能绝对确定,因为生理学证明,死并不是突然的倏忽间的行为,而是一种非常缓慢地完成的現象。”其次,在辩证论者看来,显而易见,一个事物完全可能既是本身,同时又是其他某物,因为事物在不断变化着,而变化也就是一个过程,由于这个过程,一个事物不再是本身而变成其他某物。“任何一个有机体,在每一瞬间既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在每一瞬间,它消化着自外间摄取来的物质而排泄出他种物质,它的机体中有一部分细胞在死亡,而另一部分细胞则在誕生,因而在一定时期以后,这个机体的物质便完全更新了,由别的原子成分代替了。正因为如此,所以每个有机体永远是它本身,同时又不是它本身。”完全同样地,在辩证论者那里,关于正面和反面、原因和結果的概念具有与形而上学者看来完全不同的意义。“在进行较精确的研究时,我们看到,某种对立的两极——正面与反面——彼此不可分离,也如它们彼此对立一样,而且不管它们之间的对立多大,它们是互相渗透的。我们又看到,原因和結果,作为概念,只有在应用于一定的个别场合时才有因果意义;可是当我们一把这种个别场合放在它和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来考察时,我们就确信,原因和結果就重合在一起,在普遍交互作用的直观之下它们的对立性消失了,原因和結果在这种直观中经常地交替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結果的,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sup>38</sup>。

在說了上面這些話之后，如果我們來看一看上世紀<sup>①</sup>末法國唯物主義者所採用的方法（應當記住，方法是任何哲學體系的靈魂），那末我們馬上就能看出，他們與現代唯物主義者的共同點是多麼少。與現代唯物主義者相反，他們只能被稱為形而上學者。為了確信這一點，請讀者讀一讀譬如說前面提到的那本《Système de la Nature》<sup>②</sup>，並注意一下霍爾巴赫及其友人如何處理那些他們自己在對敵鬥爭中提出的、但為他們或他們當時的科學所不能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涉及到人類知識的一些最主要的對象：宇宙的發展，人及其各種概念的起源，以及人在社會中的相互關係。在現時，科學——自然科學和歷史學——借助於進化學說，即實質上借助於現代唯物主義者所說的那種辯證方法，來解決這一切問題，但是，甚至那些作出了最光輝的發現的最卓越的科學家，也往往對於辯證方法缺乏明確概念。霍爾巴赫及其友人似乎是抱定目的要從自己的所有議論中完全排除進化概念。他們正是撇開事物的相互聯繫，一個一個地、互相獨立地來對它們進行考察的。他們的說法正是：“是——是，否——否，除此以外，即為鬼話。”因此，他們不僅不能解決他們所提出的許多問題，而且實際上甚至並不始終信守自己的唯物主義觀點，而往往為了完全唯心主義的論斷而拋棄這種觀點。在涉及人的相互關係和人類思想史的一切方面，他們都是道地的和科學概念背道而馳的唯心主義者。在他們眼裡，人類的歷史只不過是頭腦簡單的老實人犯錯誤和自私自利的惡棍玩弄陰謀的歷史。人類所以蒙受苦難和陷於貧困，是因為他們愚昧無知；但在十八世紀，理性的太陽終於升起，人類開始受到

① 這裡以及以下多次出現的上世紀，指的是十八世紀，因為普列漢諾夫這篇文章寫於1890年。——譯者

② 《自然體系》

启蒙教育，因而成为幸福的人——他們的全部历史哲学就是如此。但是，这种哲学缺乏科学性的最基本条件，即关于规律性的概念。人类由于愚昧无知而蒙受苦难，并由于受到十八世纪所带来的启蒙教育而不再蒙受苦难……这好极了，但是请问，是什么东西决定了人类在过去许多世纪中的蒙昧，而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又从何而来？要知道它并不是从天而降的。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已不承认天赋观念，并且我们说，人的概念只不过是周围的事物和在他面前发生的那些现象在头脑中的反映。但既然我们抱着这种观点，那末我们就应该坚持它，而且在谈到人类思想史时也不忘记这种观点。在人类思想史方面，我们也很少能谈论偶然性，正像很少能谈论神意一样。这种概念完全是不科学的，是唯物主义者所完全不应该有的。在唯物主义者看来，人类思想史也像太阳系的发展一样是一个合乎规律的、必然的过程。那末请解释一下这个过程的进程和条件吧，因为在思想史上以思想的蒙昧作论据，实无异于医生说“您的女儿所以痛苦是因为她感到痛苦”<sup>39</sup>。但是，如果您把人类思想史看作一个合乎规律的、必然的过程，那末您就不再会把人类思想的成就看成是社会发展的最初的、最主要的原因了。那时您就不由得要想起辩证法的因果学说，那时您就会对自己说：是的，原因和结果的确经常交替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的东西，在彼时或彼地会成为原因，反之亦然。人类思想的成就确定无疑地影响到人们的社会关系，但同时它们本身又依赖于这些关系，它们在一种社会结构中一日千里地前进，而在另一种社会结构中则长期地（如果不是永远地）停滞不前。并且，某一种社会关系之所以产生，完全不是因为该社会的成员觉得它们是最合理和最公正的。相反，人们相信他们的社会关系的公正和合理，往往是他们习惯于这些关系以及在它们的影响下受到教育和成长起来

这一情况的简单结果。特定的社会关系是怎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呢？它们在历史上的产生、发展和消灭，大部分是人们在生存斗争中结成集团的无意识的过程。人们的生存斗争的条件发生变化，他们所结成的社会集团也就发生变化，他们的社会关系也就采取新的形态，虽然人们往往完全没有注意到这种变化，或者只是部分地注意到这种变化，最后，或者为它想出最没有根据的解释……例如，把它归之于神的训诫，归之于事物的自然秩序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黑格尔曾经正确地指出，在社会关系史上，“密纳娃的猫头鹰只在半夜里才开始飞翔”<sup>40</sup>，也就是说，人们只有在一种社会制度已经过时、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为不适当和有害的时候，才开始对它进行深思。那时人们就力求建立新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几乎总是觉得新制度是最自然和最合理的，但实际上新制度却只有这样一种不可缺少的优越性，即在人们的生存斗争的已经变化的新条件下，它对人们来说是最合适的。

83 现在自然要问自己：人类的生存斗争的条件是取决于什么并怎样变化的？首先，这些条件是由自然界给与的，其次，它们是由人们创造的，但大部分是由人们无意识地创造的。地理条件——土壤、气候、动物区系、植物区系、地表特性、河流系统、海岸线等等——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现在多少已经由科学所阐明，因此不需要再举任何例子来加以说明。但是，由人们无意识地创造的那些生存斗争的条件的性质和本性，迄今仍有许多人没有了解清楚。因此，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将不是不适当的。我们且假定有这样一社会，其中自然经济已经消灭，产品都是为了销售，为了在市场上进行交换而生产，换句话说，就是产品已变成为商品。不言而喻，生产者很少考虑到他们产品的商品性质，正像莫里哀笔下的资产阶级很少考虑到自己平时的谈话具有散文的性质一样<sup>41</sup>。他们之

所以生产商品，并不是因为他们以为商品生产是最自然和最合理的：他们听凭那些被称为经济学家的特别的一类人去議論这个问题。他们自己所以使他们的产品成为商品，只是因为特定的条件下不能不使这些产品成为商品。他们把产品运往市场，是因为他们必须用它们去交换他们所必需的其他产品。当这些产品仍然不过是产品的时候，它们是驯服地、一动也不动地躺在作坊里的，但当它们一旦出现在市场上并取得商品的名称，它们就开始变得行动古怪、胡作妄为起来。有时某一种商品“值钱”，于是它的生产者就大发利市。但有时这种商品突然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而成为“冷货”，很少有人问津，于是它就跌价。生产者垂头丧气。有时某种商品还会完全没有买主，如果它的生产者没有为这种不幸的日子积攒几个钱，他就一定会大倒其霉。但是，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事情并不仅限于这种看来是偶然的物价波动。在他们之间开始逐渐产生不平等现象：一个人的事业经营得比另一个人顺利，于是这个人就发了财，而另一个人破了产。这种不平等现象——顺便提一下，这也是由于技术的成就而产生的——逐渐达到在市場上出现了被称为劳动力的新商品的程度。一部分穷途潦倒的商品生产者已经不能再靠自力来进行生产，因而受雇于主人。这样，我们这里就出现了主人和工人，而商品社会就成为资本主义社会。84

是谁造成了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要造成这种社会？是否因为人们认为它是最合理和最“自然的”？人们之所以造成这种社会，是因为他们过去的相互关系是后来发展出资本主义关系的那种商品生产者的关系。但他们是无意识地造成了这种社会的：无论伊凡、彼得或阿历克赛都完全没有考虑到商品生产所造成的后果，他们甚至没有考虑生产的商品性质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们已经承认，无论伊凡、彼得或阿历克赛都没有天赋观念。他们的思想

方式是由周围环境的影响所造成的。当他们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时，他们就开始想，生活在这个社会里也不坏，人们不这样就不能生活，资本主义制度是最“自然的”和最“公正的”。并且他们也只在很少的场合下才这样想，而大部分人则根本不去想自己的社会制度；他们原封不动地接受这种制度，而不去自问这种制度能否改变。但是资本主义制度终究影响到他们的思想方式，影响到他们的感情和习惯。他们并不使自己的概念形成一个体系。但他们的不成体系的、零零散散的概念，却彻底浸透着资本主义精神。一切东西都浸透着资本主义精神：民法和国家法、艺术和文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至于说到社会科学，那末这是显而易见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科学，只不过是把资本主义关系提升为理论。把我们的思想应用于自然科学，骤然看来可能使人感到很奇怪。人们对氧气或感应电流的见解怎么可能浸透着资本主义精神呢？但我们也没有说这是可能的。我们只是想说明，人们并不是一向就知道氧气和感应电流的。有过一个时期，他们对这些东西毫无所知。什么时候他们才开始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呢？很久以前，一个天才的意大利人曾经说过：“观念的进程符合于事物的进程，一切科学都是由人民的社会需要和要求中产生出来的”<sup>42</sup>。人们按照自己在其中生活的那个社会的需要，而注意这些或那些自然现象领域。在任何一种科学中，实践总是先于理论，并且总是对理论发生最重大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着怎样的需要和怎样的实践呢？显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需要和实践，而不是任何其他社会的需要和实践。这种需要和实践不仅导致某些理论的产生，而且还给这些理论打上自己的烙印，并有时妨碍、有时加速这些理论的完成。要知道，不管怎样说，下面这个情况总是极其耐人寻味的，即在资本主义理论家——经济学家——把关于生存斗争具有重大意

义的思想提高到原则之后,这种思想才在动物学家那里出现。

然而资本主义制度也并不是永恒的。在许多原因的影响下(不过也不经过人们有意識的参与),在这种制度中逐渐地出现许多缺点,出现许多阴暗面和不利面。资本主义的害处开始超过它的益处。它的历史时期便趋于终结。“黑夜”来临了,——于是“密納娃的猫头鷹”便出外飞翔;有人开始对资本主义关系进行批判。人们自問:难道不能实行另一种制度嗎?那些因为资本主义日益增长的缺点而特別身受其苦的人,便开始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并且吃惊地发现,建立另一种制度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于是就产生了一些被称为有害的共产主义学說和社会主义学說的理論。所有不幸的、受現存制度压迫的人,都集結在这些理論的旗帜之下。但是,为什么过去从来没有过这种理論呢?难道过去的理論家如配第、斯密和李嘉图这些科学界的巨擘,都只不过是保卫一小撮幸运儿的事业的奸詐之徒嗎?完全不是这样,他們是誠实的思想家,但是您怎么能要求他們发现现实中还没有出現的东西呢?在他們的时代,历史运动还没有暴露出,或者更正确地說,还没有造成現在社会主义者所攻击的那些资本主义的缺点,因此他們也没有料到可能发生这些缺点。“一天的难处一天就够了”<sup>①</sup>——在研究人类思想史的时候永远不应该忘記这一点。

也許,有人会問我們,前面所指出的人类发展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人們在产品生产过程中无意識地創造的那些条件,彼此之間有

<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此处用的原文是教会斯拉夫語: Довлеет днєви злоба его, 語出《新約》《馬太福音》第6章。这句话的原意是:一个人只要关心每天的事就够了,“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普列汉諾夫在这里可能是为了用以說明馬克思的这句名言:“……人类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9頁)。 譯者

无联系？这种联系无疑是存在的。人类的经济发展是在地理条件的影  
响下进行的。正是由于某个社会的地理环境的这种或那种性质，  
经济发展才以或快或慢的速度进行，并采取这种或那种方向。在  
86 中国和阿提喀，在北美洲平原和尼罗河沿岸，发展初期的社会关  
系形式是完全一样的，可以说是相同的。研究原始制度的科学到  
处都发现譬如说氏族生活方式。显然，人类有着同一个出发点。  
但是，由于生存斗争的自然条件不同，因此人类共同生活的形式也  
渐渐地具有不同的性质。到处相同的氏族生活方式让位给各种不  
同的社会关系。雅典社会的制度不同于中国的制度；西方的经济  
发展进程根本不同于东方的经济发展进程。当然，这里有許多东  
西也依赖于该社会的历史环境的影响，但人类发展的“地理背景”  
毕竟无疑地表现出强烈的影响。

但这一切是为了说明什么呢？这一切就是为了要说明車尔尼  
雪夫斯基所信奉的最新的唯物主义的某些特点。我们只是想说明，最  
新的唯物主义者正是或差不多是像我们所阐述的那样去理解历史  
发展进程的，而上世纪末的唯物主义者与这种历史观完全背道而  
驰。在他们的世界观中还有很多唯心主义的残余。我们曾经说过，  
他们在自己的历史观方面许多地方仍然是唯心主义者。他们  
否认个别人头脑中有所谓天赋观念存在，但可以说明，他们却承认  
观念在人类社会中的自发的产生和发展。他们也没有想到，人类  
思想的历史发展是在一些与人的意识和意志根本无关的原因的影  
响下实现的。因此，直到最新的唯物主义出现的时候，人们才可能  
科学地理解人类历史。从最新的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人类的历史  
已经不再是一团混乱的荒谬暴力，这种暴力在已经成熟了的哲学  
理性的法庭面前是一律应加责斥并最好早日加以忘怀的；相反地，  
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本身发展的过程，而现代思想的任务现在就



在于……探索这个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通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证明其内在的规律性”。

这个任务在頗大程度上已經由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伟大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解决了，他們担負了在黑格尔和費尔巴哈之后繼續发展哲学思想的事业。但是應該記住，我們正是应当把唯物主义的、即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归功于馬克思和恩格斯(不过，一部分还应归功于美国作家摩尔根)<sup>43</sup>，而不应把它归功于費尔巴哈。在費尔巴哈的时代，哲学思想的任务有所不同。它首先必須消灭唯心主义的一切形态和变种。費尔巴哈的力量也就用在这个方面。因此，他的哲学观点只能看作是現代唯物主义的第一步。他只是提供了某些前提；而另一些必要的前提以及从这些前提作出的許多最光輝的結論，則应当归功于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費尔巴哈的世界观中，构成現代唯物主义的力量和光荣的那个历史的方面还没有得到发展。这种情况在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87

如果抽象地进行議論，那末也許可以认为，他作为一个生来具有卓越的、出类拔萃的、非常活跃的头脑的人，能够注意到缺点并补救他老师观点中的缺陷，也就是說，他有能力去做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做的那个工作。但是，要在科学史上开辟一个时代，光有才能还是不够的，还必須有使这种才能用于适当方向的有利的外部条件。在这方面，我們这位作者周围的条件是否有利呢？他生活在一个無論在經濟上或政治上都不发达的国家。純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在这个国家里也不很发展。無論哪一个俄国的学者都还没有說过一句对欧洲的思想和科学的前途具有決定影响的話<sup>44</sup>。我們知道，車尔尼雪夫斯基是怎样解释这种現象的，并且曾向自己祖国的最有才干的儿子提出了怎样的任务。这些任务就是，在俄国传

播那些在文明大道上走在我們前面的国家所創立的“真理、科学和艺术的高尚观念”。車尔尼雪夫斯基向他的同胞們提出的正是这些任务，而不是任何其他任务，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所选择的和建議大家去做的那种活动却具有它自己的內在邏輯，甚至最富有才干的人也不能不考虑这种邏輯。一个人传播其他人在其他国家所創立的思想，只要他具有很大才能，也可能作出一些局部的、次要的发现，但他决不能实现科学中的变革，因为他所从事的根本就不是这件事。我們这位作者也正是处于这种地位。他的著作表述了不少重要的意見，这些意見对各种科学問題作了新的說明。这些意見往往与当时西方科学的一些最重要的发现完全一致。但是，这些天才思想的閃光沒有得到彻底的發揮，沒有形成体系；因此，在这些意見之外，我們还在他那里看到一些当时已被认为陈旧、而現時則完全被科学抛弃了的观点。归根到底，他未能补救和糾正对他具有最大影响的那位思想家的哲学的缺陷和缺点。在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唯物主义观点中，他的导师沒有很好地加以发展的那个方面，也仍然沒有得到发展。一般說来，尼古拉·加甫利洛維奇还絕不具有現代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而在他靠了自己的智慧力量接近于現代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地方，則往往赋予这种历史观以十分幼稚的形式。

### 三

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唯物主义，在他的“人本主义”观点中要比在他的历史观点中表現得更为明显得多。車尔尼雪夫斯基把人看做是他周围环境的无意的产物，他甚至以最伟大的人道精神来对待那种墮落的人性的不良表現，而唯心主义者則把那种不良表現仅仅看做是應該加以严厉懲罰的“惡的意志”。他写道：“一切都取

决于社会习惯，取决于环境，也就是说，归根到底一切都仅仅取决于环境，因为社会习惯也是从环境产生的。您谴责一个人有罪，首先必须仔细看一下，究竟是他犯了您所谴责他的那种罪过，还是环境和社会习惯有罪过，好好地看一下吧，也许这完全不是他的罪过，而只是他的不幸。”“卫道者”想把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这些话说成是替道德败坏现象做辩护，当然，这只是证明了他们自己的无知。

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唯物主义观点的不够完善，在他的道德学说的某些特点中也有所表现。正和爱尔維修<sup>45</sup>一样，在他看来，甚至最英勇的自我牺牲行为也只不过是合理的利己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用他的话说，“只须稍加留意那些表现为大公无私的行为和情感，我们便可看到，它们的基础依然是那种关于个人利益、个人快乐、个人福利的思想，即依然是称作利己主义的情感”。有时，車尔尼雪夫斯基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断有点令人奇怪。“卢克莱茨亚在塞克斯特·塔克文尼玷污了她之后，自己刺死了；她同样作得很有打算”。接着他证明卢克莱茨亚所作的打算是正确的。“柯拉金会向妻子说：我认为你是纯洁的，我像从前一样的爱你。但根据当时那种直到现在仍很少改变的看法，他不能用事实来证明自己的话。他有意也好，无意也好，却已经向妻子丧失了先前很大一部分的尊敬和爱情。他会故意对妻子更加温存，来掩饰这种丧失；但这种温存却比冷淡更使人感到难受，却比打骂更痛苦”，等等<sup>46</sup>。但极其令人怀疑的是，卢克莱茨亚在自杀之前，能否作这种有根据的打算。要作这样的打算必须冷静，而她却不可能冷静。如果假定，在她的行为中，理智所起的作用比她在当时的社会习惯和社会关系的影响下形成的情感所起的作用小得多，这是否更为正确呢？人的情感和习惯通常是适应于现存的社会关系的，以致在这些关系

的影响下所做的行为有时看来似乎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打算的结果，然而实际上却完全不是出于利害打算的。一般说来，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合理利己主义的观点，很明显地表现出一切“启蒙时期”（Aufklärungsperiode）所特有的一种倾向，即力求从理智中寻找道德的基础，而从个人的某种经过深思熟虑的打算中去寻找关于他的性格和行为的解释<sup>①</sup>。但是前面所引证的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话，就已包含着对这种偏重理智的极端看法的反驳。个人的行为是社会习惯的结果，社会习惯则不是在理智的打算的影响下形成的，而是由于社会的历史发展而形成的。如果正确地提出问题，那末问题本来是应该在这样的范围内提出的：个别的普通人的道德是什么？是他深思熟虑打算的结果，还是社会关系的无意识的产物？最后，还应该问，由于社会对个人发生怎样的影响，个人对共同福利的兴趣才可能发展起来和正在发展着？这样的问题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去争论，这种对社会福利的兴趣应该叫什么——究竟应该叫做利他主义，还是叫做崇高的利己主义。

90 由于車尔尼雪夫斯基过分夸大了人们的利害打算的意义，他有时还在必须用人们所没有意识到的经济发展的力量来解释历史事件的地方，用有意识的利害打算去解释这些事件。骤然看来，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这种解释可能使人产生这样一种想法，即认为他在自己的历史理论方面完全站在最新的唯物主义立场上。但如果仔细地研究一下，就可以看到事情恰好相反。谁要是在人们的历史活动中只看到有意识的打算的影响，那末他就还远没有理解经济的全部力量和全部意义。实际上，经济的影响甚至扩大到那些根本谈不上什么有意识的打算的、人们的行为和不同社会阶级的

<sup>①</sup> [参阅下面第 144 页德文版对这一处的注释。]

习惯。我們已經看到，最主要的、最有影响的经济发展因素，迄今为止一向不受有意识的打算的任何影响。我們还看到，人們的一切社会关系、一切道德习惯和一切思想倾向，都是在经济发展的这种盲目力量的間接影响或直接影响下形成的。順便提一下，人的各式各样的利害打算，人的利己主义的一切表现，也都是由这种盲目力量决定的。因此，决不能把有意识的利害打算說成是社会发展的首要动力。这样的历史观是与最新的唯物主义学說相矛盾的；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还是非常幼稚的。

不过，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历史观点还没有綜合成为一个体系，并且往往自相矛盾。我們不用費多大力气就能从他的著作中找出一些似乎属于完全不同作家的历史观点，并把它們作一对照。这些矛盾决不能用我們这位作者的思想方式逐渐变化这一假設来解释。他是在自己观点的最主要特征已經最后形成的那个思想发展时期开始著述活动的。因此，我們看到的他的历史观点的矛盾和不彻底性，其原因在于他对人类历史的一般观点的不明晰和不坚定。

为了证实上面所說的話，我們来举几个例子。車尔尼雪夫斯基在《政治经济学綱要》一书中說明了存在于現代先进国家中的“三方面分配产品”的規律后，从自己的說明中作出了簡短的結論，表述了下面这样一个关于現代欧洲史的内部动力的极为卓越的見解：“我們看到，地租的利益是同利潤和工資的利益相对立的。在反对分得地租的那个等級时，中等階級和普通人民永远是同盟者。我們看到，利潤的利益是同工資的利益相对立的。只要資本家等級和劳动者等級結成联盟对获取地租的階級占了上风，中間等級与人民的斗争就成为国家历史的主要内容。”<sup>①</sup> 任何一个現代

91

<sup>①</sup> 着重点是我加的。《政治经济学綱要》(根据穆勒)，載《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4卷，第205頁47。

的唯物主义辩证论者都会完全同意这段话。他们之所以完全同意，尤其是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纲要》的另一处指出，小工业和小农经济都要灭亡，无论在工业或是在农业中大资本主义企业都必然会取得胜利，以此来说明他关于“中等阶级”和“人民”进行斗争的原因的上述见解。任何一个现代唯物主义的辩证论者只要加以稍许的保留，也同样会承认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政治和哲学思想史的下面这个见解是正确的。“政治理论以及各种一般的哲学学说，总是在它们的创立者所属的那个社会地位的极其强烈的影响之下创立起来的<sup>48</sup>，而每一位哲学家往往都是当时为了在这位哲学家所属的那个社会上占优势而进行斗争的某一个政党的代表人。我们且不谈那些专门从事政治活动的思想家。他们之属于各个政党，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十分明显的，例如霍布斯是专制主义者，洛克是辉格党人，密尔顿是共和主义者，孟德斯鸠是英国式的自由主义者，卢梭是革命民主主义者，边沁只不过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看需要而定；关于这些作家是没有什么可说的。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那些从事创立比较一般的理论的思想家，看一下形而上学体系的创立者，也就是看一下真正的所谓哲学家。康德所属的政党想用革命的方法在德国树立自由，但又鄙弃恐怖手段。费希特稍微前进了一些，因为他连恐怖手段也不怕了。谢林所代表的政党，是个被革命吓倒了的政党，它在中世纪的制度中寻找安宁，想在德国重建那个被拿破仑一世和以费希特为其喉舌的普鲁士爱国者所破坏了的封建国家。黑格尔是个中庸的自由派，他所作的结论非常保守，但是他一向采取革命的原则来反对极端的反动派，同时希望用来作为他推翻衰朽时代的工具的那种革命精神得不到发展。我们并不只是说，这些人要像常人那样具有一些信仰，——这还不是很重要的事，然而他们的哲学体系却

浸透着体系的創立者所屬的那些政党的精神”<sup>①</sup>。我們姑且不去討論对于某一个思想家的見解的細节，一般地可以說，上面所引的这些話，表明作者对那些影响哲学和政治思想发展的社会条件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現代的唯物主义辯证論者对这些話只想作一点补充，那就是决定人类思想方向的政治斗争本身也不是为了某种抽象的見解而进行的，而是在斗争着的政党所屬的那些社会階級或階层的需要和願望的直接影响下进行的。車尔尼雪夫斯基恐怕未必会反对这一点。他对經濟科学史的观点，十分明显地說明他意識到人們的概念依賴于他們周围的社会环境。在对于罗雪尔的《国民經济原理》一书的書評中，我們这位作者指出这样一条“心理学定律”，由于这条定律，“几乎每一个人——无论是老百姓，是演說家，还是作家，无论在談話中，在演說中，还是在书本中，反正都一样——都把实际上对他所代表的那個人們集团有利益的一切东西从理論上說成是良好的、无可怀疑的、永恒的东西。因此，也应当用这条心理学的定律来解释下面这件事实：在亚当·斯密学派的政治經济学家看来，在上一世紀末期和这一世紀初期占过統治地位或力求取得統治地位的那些經濟生活的形式，是十分良好的、具有永久占居統治地位的价值。这一学派的作家乃是广义的經紀人等級或商人等級，亦即銀行家、批发商和一般工业家的代表者。对商人等級而言，如今的經濟組織形式比其他一切形式更为有利；因此代表这个等級的学派也就认为这些形式从理論上說來是最好的……有些人不代表如今的經濟形式所恰好适合的那个等級，而是代表了群众；于是当他們着手考虑政治經济学問題时，在这門科学中就出現了另一个学派，这个学派不知根据什么理由被

<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第2、3頁49。

人叫做空想主义者派别”<sup>①</sup>。在这里，他意识到阶级斗争对科学发展的影响，并且说得极其清楚。但是，谁要是从这里得出结论说，車尔尼雪夫斯基从来也没有抛弃过这种认识，那他就大错特错了。简单地理解或承认某一原则与在整个观点体系中彻底贯彻这个原则还相距很远。車尔尼雪夫斯基虽然清楚地理解阶级斗争在人类社会中的意义，但他对“进步”所持有的观点距离布克尔的学说比距离最新的唯物主义者的学说要近得多。为了使大家了解这种观点，我们将从他为基佐的《欧洲文明史》俄译本的出版而写的一篇极有趣味的论文《论罗马灭亡的原因》中，摘引一段相当长的文字。在这篇论文中，車尔尼雪夫斯基坚决有力地反对一种极其流行的意见，根据这种意见，西罗马帝国是由于它内部无力继续发展而灭亡的，同时蛮族却带来了新的进步的种籽。我们姑且不论我们这位作者攻击这种意见是否正确。对我们来说，目前只有他对进步过程的想法才是重要的。下面就是他的这种看法。我们这位作者大声疾呼地说：“只是请你们想一想进步是什么意思和蛮族是什么意思？进步是以智力发展为基础的；它的根本方面也简直就是知识的成就和传播……数学发达，应用力学便因而发达；而一切制造、技艺等等也就因应用力学的发达而得到改进……历史知识被发掘，那些妨碍人们去安排其社会生活的错误概念便因而减少，人们的社会生活也比以前安排得妥当些了。最后，一切精神劳动可以发展人的智力，而国内学会阅读、获得读书的习惯和兴趣的人越多，那么国内能愉快地胜任无论什么样的工作的人就越多，也即是说，国内生活任何方面的进程也就会好转。可见，进步的基本力量是科学；进步的成就是与知识完善的程度及传播的程度相适应的。进步是

<sup>①</sup> 《同时代人》，1861年4月号，新书栏，第431—432页50。



什么？进步是知識的成果。那么蛮族又是什么呢？蛮族是还陷在极端愚昧无知状态中的人；是介乎野兽和智力已有少許发展的人之間的人……如果一种制度，不管它是坏的或好的，但毕竟是人类的，毕竟是本身有某种合理的、至少有一点儿合理的制度，一旦为兽类的习惯所代替时，那对于社会生活有什么益处呢？”<sup>51</sup>

我們可以看到，这里所說的既不是基佐在《Essai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sup>①</sup>的第一篇論文中所指出的那些使羅馬衰弱的羅馬內部的社会关系，也不是使入侵西羅馬帝国时代的日耳曼蛮族强大有力的那些共同生活方式。車尔尼雪夫斯基甚至忘記了下面这句名言：latifundia perdidere Italiam（大地产毁灭了意大利）<sup>②</sup>。在他的关于进步的公式中（正如我們在后面要加以說明的），某个“正在进步的”国家的內部关系是不占独立地位的。全部問題都被归結为知識的数量和传播，在这里，他甚至連想也沒想自問一下，知識的历史是否依赖于文明国家的社会关系史。他繼續发表議論說：“人們說，社会为根深蒂固的形式所限制，这就是說，社会上有进步的力量，进步是需要的”<sup>52</sup>。但要知道，进步的需要是一回事，社会上存在着能够滿足这种需要的“进步力量”却是另一回事。决不能把这两个在性质上和內容上完全不同的概念混淆起来；其中一个概念是純粹消极的（“进步的需要”只表明現存形式的限制性），而另一个概念則是积极的，因为能够对共同生活方式进行必要改造的进步力量在社会中的存在，是以深受現存形式之害

① 《法兰西史論丛》

② 这句话是羅馬博物学家和历史家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 23—79）在他的名著《自然史》（*Historia Naturalis*，共37卷）第18卷第7章中所說，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資本和劳动》（見《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317頁）中曾加以引用。參見注414。——譯者

的某个阶级或某些阶级在智力上、精神上和政治上达到一定发展程度为前提的。如果把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那末人类进步事业就被简单化到极点，而我們也就不会在历史上看到在某些共同生活形式的重压下趋于衰落的那些社会的悲惨景象了。这些共同生活形式虽然无疑是有害的，但却没有能够被消灭，因为在人民中还没有能够完成这个事业的有生力量。不言而喻，我們这里所谈的不是对某个社会的一切阶级都绝对有害的形式。可以说，这样的形式是会自行消灭的。但是，对社会的继续进步特别有害的，往往是不利于大多数人、而非常有利于少数特权分子的另一一些形式。只有在受苦受难的大多数人哪怕只具有一点儿政治上独立自主的能力的情况下，才可能消灭这种形式。然而大多数人却并不经常具有这种能力。这种能力决不是受压迫的大多数人所必备的属性。它本身是由特定社会的经济所创造的。大概，对罗马的无产者来说，再没有比支持格拉古兄弟<sup>53</sup>的法案更有利了。但是，他们却并没有支持、而且也不可能支持这些法案，因为罗马的经济发展为他们所造成的社会环境，不仅没有促进他们的政治上的发展，却相反地不断降低了这种发展水平。至于说到各上层阶级，那末，首先，期待他们采取有害于它们的经济利益的政治行动，简直是可笑的；其次，它们自己也在同一个经济发展进程的另一方面的影响下越来越腐化堕落，这个经济发展进程造成了罗马的无产阶级，同时又使他们变成残忍而愚蠢的群氓。到头来事情弄到这样的地步：罗马人、这些全世界的征服者，不能去服军役，而用蛮族人来补充各个军团，也正是这些蛮族人最后结束了这个活活地腐烂了的帝国的存在。因此，与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解释相反，罗马的灭亡决不是什么偶然的事，因为它的灭亡乃是早已开始的历史经济运动的自然结局。

我們決不願意像許多人、特別是像德國作家那樣斷言，日耳曼人具有某種特殊精神和保證他們在以後人類歷史上占首要地位的特殊傾向。我們只是說，羅馬在對蠻族的鬥爭中的軟弱無力，是由它的經濟發展進程所造成和作了準備的，因為它的經濟發展消滅了曾經構成它的力量的小農階級。小農的土地溶合成為居住着成群奴隸的大地產。但是，奴隸是國家的壞支柱；他們來自世界各地，屬於不同的部落并說着不同的語言，他們并不組成名副其實的人民。他們曾經是、而且始終是一群烏合之眾（只要對那種并非出于自願而聚集在一起的人群可以這樣稱呼的話），當然他們決不會考慮羅馬國家的利益。固然，卓爾尼雪夫斯基也曾指出，奴隸制在羅馬帝國逐漸地趨于松懈，而最後則開始被隸農制<sup>54</sup>所代替。但是，第一，皇帝有關隸農制的命令，只不過表明國家力求保證自己能獲得農民的強制勞動所創造的一部分剩餘生產物。當羅馬社會的一切階層都簡直被國家的苛捐雜稅壓得喘不過氣來的時候，過渡到隸農制絕對不能改進農民的狀況<sup>①</sup>。第二，不言自明，隸農和佃奴<sup>56</sup>都不可能代替自由農。最後，甚至在數量上，奴隸和隸農至少在農村中也少于舊日自由農的意大利的人口。梯特·李維便會感到驚訝，在他當時只遇到趕着畜群的少數牧童的意大利某些地區，怎樣能在獨立時期拿出人數眾多而勇猛的軍隊來對羅馬進行鬥爭。事情的原因很簡單：在獨立時期，這些地區有着完全不同的經濟關係，這些地區之所以有人數眾多而又強悍的居民，也應當歸功于這種經濟關係。當時在這些地區，保證村社全體成員安居樂

96

① 參閱前面已經提到過的基佐的《Essai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法蘭西史論叢》）中的第一篇論文；還可參閱洛貝爾圖斯的《Untersuchungen auf dem Gebiete der National-Oekonomie des klassischen Altertums》（《對古典時代的國民經濟領域的研究》）155。

业和使他們具有独立精神和战斗精神的那种氏族制度还很巩固。这样的制度也存在于日耳曼人那里，这些野蛮部落之所以强大有力，也正应当归功于这种制度。簡言之，可以說，当羅馬帝国接近灭亡的时候，在羅馬帝国中占有統治地位的是把它的抵抗力量降至最低限度的那种經濟关系。相反，当时日耳曼人的制度却使他們的攻击力量达到最大限度。这就是一切，問題在于經濟，而不在于精神，也不在于任何神秘的种族特性。

如果我們在解释各个国家的历史命运时，不得不仅限于对这些国家的“进步”和对这些国家中知識积累的数量作抽象的考察，那末我們就永远不能理解譬如說希腊史，因为在希腊，最文明、最“进步”的国家都相继退出舞台，而让位給越来越不文明和不“进步”的国家。用什么来解释这种現象呢？应该用希腊的經濟关系、主要是土地关系的发展进程来解释。在最“进步”的国家里，这种发展較早地使地产积聚在少数人手里，使奴隶人数惊人增加，使自由民中的下层階級衰弱无力和道德敗坏。“进步”的希腊国家的国家力量的削弱，与这种現象成正比例。在較不“进步”的国家里，这个过程开始得較晚，进行得較慢，因此它們的国家力量也就下降得較慢，甚至在这个过程的某些时期内还增长了（像在較“进步”的国家里也发生过的一样）；因此，当較“进步”的国家在当时无出路的階級斗争（不是在我們的时代，因为現在階級斗争是有出路的）的毁灭性影响下已經彻底遭到削弱的时候，这些較不“进步”的国家就能够起突出的作用。但是，較不“进步”的国家終于也由于上述的过程而削弱下去；他們相继唱完自己的戏，退出了舞台，直到最后羅馬的铁拳結束了希腊的独立存在。当羅馬人来到的时候，除了少数例外，簡直沒有人起来保卫希腊国家。波里比和普卢塔克早就指出过这一点。

在我們这位作者的历史观点中，偶然性一般占有很广泛的地位。他在斯密—李嘉图学派之后十分清楚地闡明了我們当代的經濟制度的性质、規律和趋向，但在他看来，甚至这种經濟制度也是历史偶然性的产物。他在我們已經引证过的那篇关于罗雪尔著作的书評中說道：“根据历史可以看出，如今这些經濟形式是在这样一些关系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些关系与經濟科学的要求相抵触，它們既不符合劳动的成效，也不符合消費的節約性，——一言以蔽之，如今这些經濟形式乃是既有害于劳动，又有損于物质福利的那些原因所造成的結果。举一个例，在西欧，經濟生活是建立在征服、沒收、垄断的基础之上的”<sup>①</sup>。沒有人說，在西欧历史上沒有过征服、沒收和垄断。但是，要知道它們也曾存在于古希腊、印度和中国，然而这些国家的經濟制度無論过去或現在都与現代欧洲的經濟制度有着极大的区别。这种区别是由什么造成的呢？是否由于：所有这些征服、沒收和“垄断”都远不能决定經濟发展的方向，而相反地，它們本身的形式和以后的社会后果都反而由經濟发展方向所决定呢？古希腊、印度或中国的經濟发展方向和进程，不同于中世紀和近代的欧洲的經濟发展方向和进程，——因此，在那里，征服及其一切后果也就导致了不同于西欧的另一种制度。由于車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征服对于建立現代欧洲經濟制度具有决定的意义，我們就不由地想起恩格斯的話：“甚至在我們除去任何掠夺、暴力及欺騙的可能性的情况下，即使我們假定，一切私有财产起初都建立在占有者的个人劳动之上，而且在往后的全部时期都是以等价相互交換，纵然如此，那末我們随着生产及交換的往后发展，也不可避免地要进到現代資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到生产資料及

<sup>①</sup> 《同时代人》，1861年4月号，新书栏，第434頁57。

生活资料为一个人数极少的阶级所独占，而另一个构成人口最大多数的阶级，降到没有任何财产的无产者的地位；进到投机性的生产兴隆和商业危机的周期交替；进到整个现在的生产无政府状态”<sup>①</sup>。现代唯物主义的辩证论者就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但车尔尼雪夫斯基却还是抱着完全不同的看法。

我们这位作者既然把征服看做历史上存在的各种经济生活形式的原因，并认为它们违背“经济科学的要求”，那末他就当然不可能认为研究这些经济生活形式有什么重大价值。他对所谓经济科学中的历史方法的了解，只是根据它的这样一些代表如威廉·罗雪尔和其他 Citaten—Professoren<sup>②</sup> 的著作，他对这种方法非常蔑视，认为它是反动派反对工人阶级的解放意向的产物。“人们……曾以理性的名义反抗过不符合商人等级利益的中世纪制度；可是在这里偏偏不幸又出现了这样一些人，他们开始说：‘的确，按照理性来说，应当有你们所盼望的东西，但除此以外，理性还要求其他许多东西，你们所说的只不过是一个公式的开始，而它的结尾又是怎样的呢’；一言以蔽之，在不彻底的思想家面前出现了彻底的思想家……这该怎么办呢？……如果理性反驳你，你就抓住历史，它会搭救你的”<sup>③</sup>。由于历史方法有着这样的起源，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在他们反对“不彻底的思想家”的斗争中的理论任务，就仅仅在于揭露现代经济制度是从“征服、没收和垄断”产生的。根据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意见，社会主义者也就是这样做的。在他们的手里，“历史正在揭穿它被邀请来辩护的那种现象”<sup>③</sup>。但是，还在车尔尼雪夫斯基踏上文学活动道路之前，还在他的前驱们、即别林斯

① 《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附录，第 58 页 58。

② [喜欢引证的教授们]

③ 《同时代人》，1861 年 4 月号，新书栏，第 432—433—434 页 60。

基及其团体的时代，工人階級的优秀理論代表就不是仅仅为了在論战中援引征服和沒收而利用历史。馬克思和恩格斯說明了經濟史的内在必然性和严格的規律性，从而把人类經濟史的研究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上<sup>①</sup>。但是，从各方面都可以看出，車尔尼雪夫斯基并不知道这个流派，这个流派是从它的老师費尔巴哈的理論中成长起来的，正像費尔巴哈的理論从黑格尔体系中成长起来一样。

99

我們的作者否定历史方法，在自己的經濟学研究中使用了另一种方法，他把它称为假設法。我們現在用車尔尼雪夫斯基本人的話來說明这种方法。他在对穆勒的《政治經濟学》第一部的評注中說道：“这种方法在于：当我们必需确定某种因素的性质时，我們應該把复杂的問題暂时擱置一旁，而去探索我們感兴趣的那种因素在其中最明显地暴露出它的性质来的那些問題，去探索最簡單的問題。当我们认清了我們所研究的那个因素的性质以后，我們

<sup>①</sup> 罗素尔及其同道者在依据历史的同时，却是革命的行動方式的坚决反对者。他們的进化概念是完全排斥革命的。这种观点和某些反对进化的革命家的观点同样錯誤。这两种极端的看法都排斥正确的历史观。用辩证方法武装起来的現代社会主义者对問題的看法与此不同。在他們看来，进化也和革命一样，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环节。进化为革命作准备，革命则促进进化的繼續进行。特别是德国学者們所采用的“历史方法”，完全任意地把科学的視野局限于这些环节中的一个环节，即进化，因此必須认为这种“历史方法”是反科学的。关于它的“博学的”代表者們，現在也还能有充分的权利重复馬克思在 1844 年关于他們所說的話：他們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辯护，把农奴反抗鞭子（只要它是历史性的鞭子）的每个呼声宣布为叛乱；历史对他們，正像以色列上帝对摩西一样，只是表明了自己的“过去”；这些奴僕式的夏洛克<sup>②</sup>要凭历史的期票来索取从人民心上剝下来的每一块肉，等等<sup>61</sup>。这一切真是說得再公正不过了。但是，革命家馬克思虽然用这些有力而一針見血的話去揭露“历史方法”的官方代表人物的奴性，他却不仅不輕視历史的进化，而且还首先指出了历史进化的动力和它的严格規律性。

<sup>②</sup> 夏洛克是莎士比亚喜劇《威尼斯商人》中的犹太高利貸者。他把錢借貸给对方，要求：若过期一天償还，就要罰一磅肉。……譯者

就能很容易地認識它在被我們暂时擱置一旁的复杂問題中所起的作用。例如，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的对法战争对英国是否有益这样一个很复杂的問題，可以用一个极簡單的問題来代替<sup>62</sup>：战争是否可能不是对某一伙人有益，而是对人数众多的民族有益？现在怎样来解决这个問題呢？問題談的是利益，即福利或財富的数量、財富的减少或增加，也就是可以用数字来計算的量。我們从哪里得到这些数字呢？任何历史事实都不能以我們所需要的那种形式，即以最簡單的形式向我們提供这些数字，使这些数字仅仅取决于我們所規定的因素，即仅仅取决于战争……因此，我們應該从历史事件的領域轉移到抽象思維的領域，因为抽象思維所思考的不是历史提供的統計材料，而是抽象的数字，而抽象数字的意义是假定的，而且簡直可以随意規定。例如，它(抽象思維)是这样进行思考的。我們假定，一个社会有五千居民，其中有一千成年男子，整个社会就靠他們的劳动来养活。我們再假定，其中二百人出去参加战争。請問，这次战争在經濟上对社会有什么关系？它增加了还是减少了社会的福利？只有当我们把問題弄得这样极其簡單，答案才成为如此簡單和不容爭辯，以致每一个人都能很容易地找到解答，并且不可能被任何人和任何东西所駁倒……由于使用‘假定’、‘假設’这种術語，这个方法就称为假設法”<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在所有經濟学研究著作中都采用这种方法，因此，这些研究著作就带有一种十分独特的、极端抽象的性质<sup>64</sup>。大家知道，我們这位作者的主要經濟学著作，一部分是穆勒的政治經濟学的譯文，一部分是对它的闡述，附有内容非常丰富的評注和独立的补充。在閱讀这部著作时，仔細观察作者所采用的研究方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3卷，第89—90—91頁63。



法怎样經常把他从现实存在着的經濟关系領域吸引到抽象思維的領域中去,是很有意思的。在涉及現存关系的地方,車尔尼雪夫斯基很少反駁穆勒。他大部分滿足于穆勒的分析,可是大家知道,这种分析由于它的含糊不清和前后矛盾,还有許多不能令人滿意的地方。甚至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如价值、价格、貨幣、工資規律等等問題上,他和穆勒的意見也并无分歧。車尔尼雪夫斯基通常总是說,穆勒在涉及現存事物时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讓我們来看一下,事情是否应当这样,健全的經濟理論是否要求这样?“我們假設”等等——通常接着的是对現存关系的出色的批判,然而这种批判却仅仅根据完全抽象的思考和假設。因此,这种方法的缺点就特別刺目,当然任何一个现代資本主义的科学的反对者都不会贊成它,因为这些反对者現在所依据的不是抽象“理論”的要求,而是現存制度的內在矛盾,这些內在矛盾在其进一步的发展中必然会导致現存制度的消灭。 101

車尔尼雪夫斯基自认是某个哲学学派的信徒,可是知道这个哲学学派的方法的讀者不难看到,我們这位作者在研究中并不始終信守这种方法。实际上,“假設法”与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德国老师們的辯证方法毫无共同之处。为了证实这一点,只要想起車尔尼雪夫斯基本人在产生出費尔巴哈学說的黑格尔体系中所看到的那些特征就够了。指出这些特征將使我們便于闡明和批判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因此我們請求讀者尽可能注意下面这个材料,也許这个材料很枯燥乏味,然而它的确不是无益的。

在最新的唯物主义辯证論者看来,黑格尔体系和整个德国哲学的最伟大功績,正如恩格斯关于它所說的,在于它“第一个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及精神的世界想像成一种过程,亦即从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中来研究它,并且曾企图发现出这种运动和发展

的内在联系”<sup>65</sup>。車尔尼雪夫斯基具有卓越的智慧，在哲学方面具有渊博的知識，他当然不可能忽視事情的这一方面。他理解到黑格尔的发展学說的巨大重要性，甚至用有力的、充滿感情的言辞闡述了这个学說。他在《对反村社所有制的哲学偏見的批判》一文中感叹說：“形态的不断交替，一定內容或傾向所产生的形态，由于該种傾向的加强、該种內容的高度发展，而在永恒不断地被否定，——誰了解了这个(伟大)、永恒而普遍的規律，誰慣于把这个規律应用于任何現象，——啊，他就会是多么平心靜气地迎接那种引起別人惊慌不安的遭遇！当跟着詩人重复下列詩句：

Ich hab' mein' Sach auf Nichts gestellt

Und mir gehört die ganze Welt……<sup>①66</sup>

102 时，他会毫不惋惜已經过去的事物，并且要說：“听便吧，任凭怎样，我們終归会有时来运轉的日子的！”<sup>②</sup>但是，可以看出，他并不认为这条“伟大、永恒而普遍的規律”是黑格尔哲学的主要功績和最突出的特点。至少，他在《果戈里时期俄国文学概观》中由于提到斯坦凱維奇和別林斯基的小組<sup>68</sup>醉心于黑格尔而詳細談到黑格尔时，他所最注意的是黑格尔哲学的另一方面。在这里，他认为黑格尔的主要功績是：把哲学从抽象思維的領域中引导出来，而对现实采取关心的态度。“解释现实，变成哲学思維的根本責任了。对现实十分严肃的注意，就从这里开始，而过去对于现实是并不考虑的，为了滿足自己的片面的偏見，就往往毫不客气地把它歪曲……然而在现实之中，一切都取决于情况，取决于地点和時間的条件，——因此黑格尔承认，过去人們只是用一般文句来判断善

① [我凭空建树起自己的事业，  
于是整个世界都属于我]

②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5卷，第531頁67。

悉,但却并不观察某一个现象所从而产生的情况和原因,——这些一般的、抽象的箴言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也就是说,只有在考察了某一特定的事实所从而产生的一切情况之后,才能对这一事实做出肯定的判断”<sup>①</sup>。在上面所引证的那一頁的注释中,車尔尼雪夫斯基闡明这个思想如下:“例如,‘雨是好呢还是坏?’——这个问题是抽象的;要对它作肯定的回答,是办不到的;有时候雨能够带来好处,有时候即使少,也能带来坏处;应当問得明确一点:‘当谷物播种完毕以后,在接連五小时中,降下一場大雨,——这雨对谷物有好处嗎?’——只有在这等場合,回答才能是明白而且有意义的:‘这种雨是十分有益的。’……‘战争是毁灭呢还是有益的?’一般說来,你不能以肯定方式来回答;必須知道,所談的是怎样的战争,一切都以时间和地点的情况为依归……馬拉松之战<sup>70</sup>是人类史上最高貴的事件”<sup>71</sup>,等等。由此可見,在对现实予以一定注意的情况下,甚至像战争是有益还是有害这种看来很簡單的問題,也不能借助于某种簡單的、完全抽象的“假設”来解决。一切都以地点和时间的条件为轉移。这是完全正确的。但遺憾的是,車尔尼雪夫斯基無論在一般的研究中,或是在关于俄国村社土地占有制这样的具体現象的爭論中,都确实过于經常地忘記以上这种看法。

我們将在下面看到,常常被他遺忘的现实往往以最不客气的方式提醒人注意它。但現在我們應該繼續評述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历史观点,这将帮助我們确定我們这位作者在欧洲哲学思想的一般发展中所占的地位。

<sup>①</sup> 《同时代人》,1856年第9期,批評栏,第12頁69。

值得注意的是，他虽然认为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历史观点并无价值，但却认为历史观点在文学批评的领域内是必要的。在他的一篇早期论文，即关于奥尔丁斯基翻译的亚里士多德的名著《诗学》的论文中，他认为美学的巨大功绩就是：它在我国从来也没有与文学史相敌对。“在我国常常听到人们主张有研究文学史的必要，而且专门从事审美批评的人对文学史的贡献十分巨大，甚至大于我们今日的某作家。我们的美学常常承认应该以精确地研究事实为依据”……“艺术史乃是艺术理论的根据”<sup>①</sup>。看来，写这一段话的人如果能够始终忠于自己的话，他就应该毫无保留地承认，人类的经济发展史应该是经济“理论”的根据。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他并不是这样来看这种“理论”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艺术理论的看法极为正确。这首先是由于他受到了他的先驱者们的有益影响：在出现黑格尔的《美学》和别林斯基的批评作品（哪怕我们只提起他论普希金的文章）以后，人们根本不可能再轻视艺术理论方面的历史观点了。此外，在美学理论方面，只有主张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人，亦即只有那些希望使“永恒的”艺术同现实和迫切的、紧要的现实社会问题不发生任何联系的人，才能反对历史观点。车尔尼雪夫斯基既然与这些人进行斗争，当然就不得不倾向于对艺术的历史观点，因为这种观点使他有可能把艺术的任务同当时最重要的社会倾向联系起来。谢林就已说过：“verschiedenen Zeitaltern wird eine verschiedene Begeisterung zu Theil”<sup>②</sup>。发展这种思想，就不难彻底粉碎“纯”艺术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卷，第3—4页72。

的拥护者。——在政治经济学中却是另一回事。在那里，頑固的罗雪尔和他的一伙是反对車尔尼雪夫斯基最重視的工人階級的意向的。他們是他所知道的政治经济学中的历史观点的唯一代表者。不足为奇，由于反对他們而造成的反作用，他对这种观点采取了这样一种态度，这种态度的錯誤只有在另一种条件下才会使他注意到。 104

但是，决不能說，我們这位作者已經彻底發揮了他对艺术史作为艺术理論的必要基础的意义所抱的观点。我們已經指出，简单地承认某一条原則还远不等于在相应的科学部門中彻底貫徹这条原則。車尔尼雪夫斯基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在《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这篇学位論文中把艺术理論与艺术史联系起来，这篇学位論文是他在1854年初为了获取碩士学位而向彼得堡大学語文系提出的。这一著作在我們这位作者的其他許多作品中占据一个重要的地位；因此，它特別清楚地表现出他的观点和思維方式的一切优点和缺点。忠于自己的唯物主义观点的車尔尼雪夫斯基，在学位論文中决心要消灭美学中的唯心主义。他到唯心主义在美学中的一切藏身之处和避难之所去追击唯心主义：从关于艺术的起源和艺术在生活中的意义的一般理論問題开始，直到象关于悲剧和崇高的学說那样的細节为止。我們要引证一下他所提出的某些論題，因为它们恰好清楚地說明了車尔尼雪夫斯基对艺术的唯物主义观点。

他說：“真正的美的定义是：‘美是生活。’——任何东西，凡是人在那里面看得見如他所理解的那种生活的，在他看来就是美的。美的事物，就是使人想起生活的事物……”

② (“不同的世代有不同的灵感”)。《Ueber das Verhältnis der bildenden Künste zu der Natur》。《論造型艺术和自然界的關係》。

崇高之影响人，决不在于它能唤起绝对观念；它几乎任何时候都不会唤起它。

一件东西，凡是比人拿来和它相比的任何东西都大得多，或是比任何现象都强有力得多，那在人看来就是崇高的。

悲剧与命运或必然性的观念并没有本质的联系。在现实生活中，悲剧多半是偶然的，并不是从先行因素的本质中产生的。艺术使悲剧具有的那种必然性的形式，是通常支配艺术作品的‘结局必须从伏线中产生出来’这一原则的结果，或是诗人对命运观念的不适当的服从的结果。

按照新的欧洲文化的概念，悲剧是‘人生中可怕的事物’……

105 现实比起想像来不但更生动，而且更完美。想像的形象只是现实的一种苍白的、而且几乎总是不成功的改作。

客观现实中的美是彻底地美的。

客观现实中的美是完全令人满意的。

艺术的产生，决不是由于人有弥补现实的缺陷<sup>73</sup>的要求……

产生美学意义上的艺术（美艺术）的要求，是和画人的肖像这件事所明白显露出来的要求相同的……艺术只是用它的再现使我们想起生活中的有兴趣的事物，努力使我们多少认识生活中那些引人兴趣而我们又没有机会在现实中去亲自体验或观察的方面。

再现生活是艺术的一般性格的特点，是它的本质；艺术常常还有另一个意义——说明生活；它们常常还有一个意义：对生活现象下判断……”<sup>74</sup>

我们对这些论题中的某些论题，只有加上某些使它们具有更广泛意义的附带条件后，才能表示同意。而对其中有一个论题，则甚至是绝对不能同意的，即决不能说：“按照新的欧洲文化的概念，悲剧是人生中可怕的事物”。“悲剧与命运观念并没有本质上的联

系”，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它与必然性观念的联系却是毫无疑义的。人生中的一切可怕的事物并不都是悲剧性的。例如，被正在建筑的房子的墙壁倒塌下来压死的人，他的命运是可怕的；但这种命运也许只有对其中某些人来说才是悲剧性的，那些人在生活中具有某些条件（如宏图大志、广泛的政治企图），这些条件才使他们由于砖墙倒塌而遭致的偶然死亡获得悲剧性的意义。但是，在我们所举的例子中，悲剧终究还是与偶然性紧密相联，因此它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悲剧。真正的悲剧以历史必然性的观念作为基础。格拉古兄弟的命运是真正悲剧性的，他们的计划和生命本身都由于罗马无产者不能发挥政治独立精神而毁灭了。罗伯斯比尔和圣茹斯特的命运是真正悲剧性的，他们由于自己在争夺优势地位而斗争的法国各社会阶级之间所处的历史地位具有不可克服的、无法避免的矛盾而遭到了毁灭。一般地说，真正的悲剧，是由于有限的、多少有点片面的必然性，以一种象自然规律一样起作用的历史运动的盲目力量，由个人的自觉意向的冲突所造成的。車尔尼雪夫斯基没有注意到而且也不可能注意到事情的这一方面，因为他为唯物主义而作的斗争<sup>①</sup>还只限于抽象的哲学原理的领域。在这个斗争中，他又一次陷于理性的极端，而简单地把悲剧与可怕的事物等同起来。但是，哪怕他只要想起黑格尔以索福克勒斯的《安蒂戈涅》为例对悲剧所作的解释，那末他就会明白，不是唯心主义者也能谈论必然性。黑格尔指出《安蒂戈涅》中两种权利、即宗族权利和国家权利的冲突。安蒂戈涅是第一种权利的代表者，克里翁是第二种权利的代表者<sup>75</sup>。毫无疑问，这两种权利的斗争曾经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而且人们可以把悲剧同这种斗争联系起来，而

<sup>①</sup> 原文为：“他反对唯物主义的斗争”，疑有誤。——譯者

絲毫也不犯唯心主义的錯誤。車尔尼雪夫斯基看不到这一点，因为他似乎在自己的研究中忘記了历史。更可惜的是，假如車尔尼雪夫斯基及时想起他的下面这个原則，即艺术理論應該以艺术史作为基础，那末也許他就能为美学提供一个嶄新的理論基础。他在证明美是生活这个論題时，提出一个极其中肯的意見，即不同的社会階級以他們的經濟生活条件为轉移而具有不同的美的理想。这段話极为重要，因此我們几乎把它全部引证在这里。

“在普通人民看来，‘美好的生活’、‘应当如此的生活’就是吃得飽，住得好，睡眠充足；但是在农民，‘生活’这个概念同时总是包括劳动的概念在內：生活而不劳动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无聊的。辛勤劳动、却不致令人精疲力竭那样一种富足生活的結果，使青年农民或农家少女都有非常鮮艳紅潤的面色——这照普通人民的理解，就是美的第一个条件。农家少女辛勤劳动，因此体格强壮，在有丰盛的食物的小情况下就长得很結实，——这也是乡下美人的必要条件。‘弱不禁风’的上流社会美人在乡下人看来是断然‘不漂亮的’，甚至給他不愉快的印象，因为他一向认为‘消瘦’不是疾病就是‘苦命’的結果。但是劳动不会让人发胖：假如一个农家少女长得很胖，这就是一种疾病，体格‘虛弱’的标志，人民认为过分肥胖是个缺点；乡下美人因为辛勤劳动，所以不能有纖細的手足，——在我們的民歌里也是不提这种美的属性的。总之，民歌中关于美人的描写，沒有一个美的特征不是表现着旺盛的健康和均衡的体格，而这永远是生活富足而又經常地、认真地，但并不过度地劳动的結果。上流社会的美人就完全不同了：她的历代祖先都是不靠双手劳动而生活过来的；由于无所事事的生活，血液很少流到四肢去；手足的筋肉一代弱似一代，骨酪也愈来愈纖細；而其必然的結果是小手小脚——这是社会的上层階級觉得唯一值得过的生活，



即沒有体力劳动的生活的标志；假如上流社会的妇女大手大脚，这不是她长得不好就是她并非出自名門望族的标志……不錯，健康在人的心目中永远不会失去它的价值，因为如果不健康，就是大富大貴，穷极奢侈，也生活得不好受，——所以紅潤的脸色和飽滿的精神对于上流社会的人也仍旧是有魅力的；但是病态、柔弱、萎頓、慵倦，在他們心目中也有美的价值，只要那是奢侈的无所事事的生活方式的結果。蒼白、慵倦、病态对于上流社会的人还有另外的意义：农民寻求休息和安靜，而有教养的上流社会的人們，他們不知有物质的缺乏，也不知有肉体的疲劳，却反而因为无所事事和沒有物质的忧虑而常常百无聊賴，寻求‘强烈的感觉、激动、热情’，这些东西能赋予他們那本来很单調的、沒有色彩的上流社会生活以色彩、多样性和魅力。但是强烈的感觉和熾烈的热情很快就会使人憔悴；既然慵倦和蒼白是她‘生活了很多’的标志，他怎能不为美人的慵倦和蒼白所迷惑呢？”<sup>①</sup>

人們的美的概念表現在艺术作品中。我們看到，不同社会階級的美的概念很不相同，有时甚至恰好相反。某个时期在社会中占統治地位的那个階級，也在文学和艺术中占統治地位。它把自己的观点和自己的概念带进文学和艺术。但是在不断发展的社会中，不同階級在不同时期內占統治地位。同时，任何一个階級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它发展起来，达到鼎盛时期而占居統治地位，最后則趋于衰亡。它的文学观点和美学概念，也与此相应地发生变化。因此，我們在历史上可以看到人們的不同的文学观点和不同的美学概念：在一个时代中占統治地位的概念和观点，到另一个时代就变为陈旧的了。車尔尼雪夫斯基指出，人們的美学概念与他們

108

<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卷，第44、45、46頁76。

的经济生活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这是一个真正天才的发现。他留下要做的只是通过不同统治阶级的不断更替的全部人类史，去探溯他所发现的这个原理的作用。如果他把艺术理论与最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密切联系起来，他就会在美学中完成最伟大的变革。但是我们知道，他本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这种历史观格格不入的。因此他也就不能完成这样辉煌地开始了的事业；因此在他的《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一书中，我们所看到的关于艺术史的真正唯物主义的见解，也比，例如，在“绝对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美学》中所看到的少得多<sup>①</sup>。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位论文中，特别清楚地反映出他的思维方式的一切缺陷和一切优点。

## 五

车尔尼雪夫斯基像他的文学先驱者们一样，属于黑格尔学派的左翼，而大家知道，黑格尔学派的左翼在其往后的发展中归附了社会主义。俄国的左翼黑格尔主义者也同样归附了社会主义。大家知道，别林斯基曾经怎样地向往社会主义。在他的著作中有一些文章表明，他对西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的理解在当时来说是非常深刻的<sup>②</sup>。在这方面，正像在其他一切方面一样，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别林斯基事业的直接继承者。不言而喻，他走得比别林斯基更远一些。他不仅向往社会主义，而且还很好地研究了他所能得到的社会主义著作和经济学著作。他不是仅仅在谈论其

---

① 例如，可参阅黑格尔关于荷兰绘画史的见解，任何一个现代的唯物主义辩证论者几乎都能无条件地赞同他的见解（《Aesthetik》（《美学》），第1卷，第217、218页；第2卷，第217—223页）。还有许多类似的见解散见于他的《美学》中77。

② 例如，可参阅他的《全集》第7部分中的他的一篇论欧仁·苏的文章78。

他問題的文章中順便提到社会主义。他的文学活动的目的，几乎完全是为了向俄国讀者群众传播社会主义学說。由于这个原因，我們应当尽可能詳細地談一談車尔尼雪夫斯基对西欧社会主义的态度。

106

在目前，誰談論社会主义——他要末就是談論馬克思的学說，要末就是根本不談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在对于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年代里（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情况还不是这样。馬克思的学說还远沒有取得統治地位，它还刚刚在对其他社会主义理論的斗争中形成、发展和巩固起来。馬克思学派的最主要的著作在当时还沒有发表。当时还完全可能有人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而对馬克思却毫无所知。在当时，現在所謂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傅立叶和欧文的影响还很强大。当时有才干的社会主义者全都受到这种影响，他們以自己的力量来补充自己老师的理論，并且从这些理論中排除掉不科学的、幻想的成分。車尔尼雪夫斯基正是处于这样的地位。我們已經說过，他对馬克思学派的著作毫无所知。的确，別林斯基就已經兴奋地讀过巴黎出版的《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sup>①</sup>，这个刊物最初的、也是最后的两期是由阿尔諾德·卢格和馬克思、恩格斯合作出版的。但是，这本杂志对俄国公众的影响，还沒有强烈到足以坚定不移地决定俄国社会主义思想方向的程度。俄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在长时间内，在很长的时间内，在远远超过应有限度的时间内，一直沒有受到馬克思的科学著作的任何影响。因此，車尔尼雪夫斯基在創立他的社会主义观点时沒有考虑到最新的社会主义派别，这是不足为奇的，虽然这个派别早就在德国工人运动史上起了不小的

① 《德法年鉴》

作用，而从六十年代下半期起已在整个欧洲工人阶级中占有统治地位。作为一个受过正规科学教育的人，車尔尼雪夫斯基完全没有傅立叶学说中那种和关于人类历史和现代生活的天才见解掺杂在一起的奇异幻想。对于圣西门的学说，他总是采取严格批判的态度。被《怎么办？》这部小说中的罗普霍夫叫做神圣老人的那个罗伯特·欧文，则始终得到車尔尼雪夫斯基很大的同情。但是，我们这位作者的清醒头脑使他难得被欧文的希望所迷惑，而欧文是希望头戴皇冠的贵人和上层阶级来帮助大多数被压迫者的。車尔尼雪夫斯基在研究西欧的社会关系时，可以说是无意之中得出了后来成为第一国际纲领基础的那个结论，即宣称工人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业。但是，我们的作者对工人阶级历史任务的想法是含糊不清的，这种含糊不清对我们时代的读者来说可能觉得很奇怪。車尔尼雪夫斯基没有把无产阶级从一般受苦受难的被压迫人民群众中区分出来。車尔尼雪夫斯基用了一个俄国作家所通常使用的特别字眼来称呼应该靠本身力量自求解放的工人阶级，这个字眼同时也暴露出他对无产阶级在西欧历史上的作用是认识不清的。車尔尼雪夫斯基把西方工人阶级称为平民，他所想像的西方工人阶级的需要和任务，几乎同俄国有教养的慈善家眼中的当时俄国“平民”的需要和任务完全一样。在关于农民解放问题的激烈论战中所写的一篇文章里，我们的作者甚至得出了这样一种关于西欧民主派观点的奇异的观念。他断定说，政治自由对人民群众没有任何意义，因此，人民利益的保卫者可以对政治漠不关心。他就是这样地一方面确定自由派的政治观点，另一方面确定“民主派”的政治观点<sup>①</sup>。“自由派和民主派的根本愿望和主要动机是

<sup>①</sup> 不应该忘记，在书报检查的条件下很难谈到社会主义者。

有本质差别的。民主派所关心的是尽可能消除国家机构中上层阶级对下层阶级的优势：一方面，减少上层等级的力量和财富；另一方面，增加下层等级的势力和福利。至于用什么方法在这方面改变法律和支持新的社会制度，对他们来说几乎是无所谓的①。与此相反，自由派无论如何不会同意使下层等级在社会中占优势，因为这些等级由于没有教养和物质上的贫困而不关心自由主义政党认为高于一切的那种利益，即言论自由权和立宪制。民主派认为，平民享受物质福利的西伯利亚，比大部分人民忍受极大困苦的英国要好得多。在一切政治制度中，民主派仅仅同一种制度——贵族政治（而不是专制政体？）是不共戴天的；自由派却几乎时刻认为，只有保持一定程度的贵族政治，才能使社会达到自由主义制度。111因此自由派往往对民主派深恶痛绝，说民主主义会导致独裁政治，对自由有致命的危险”②。

我們已經說过，我們从中摘引上面这段話的那篇文章，是在关于农民問題的論战方酣时写成的。很可能，車尔尼雪夫斯基所以用某种 *ad usum delphini*③的方式写这篇文章，是希望向俄国政府指出，它不应当害怕俄国民主派，因为俄国民主派的全部注意力在某个时期内实际上集中于被解放的农民的经济状况方面。后来，特别是在《沒有地址的信》中，車尔尼雪夫斯基对政治自由对于人民福利的意义发表了新的看法。但是，我們所引证的那种意見在俄国政治思想史上毕竟始終是一个极值得注意的事实。它对正在成长中的俄国民主派无疑发生了影响，因为到七十年代末期为

① 着重点是我加的。

② 《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时期法国的党派斗争》。轉載于《俄国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第3集，日内瓦1875年版，第5、6頁79。

③ （为了法国皇太子）80

止，俄国民主派一直对“政治”抱十分轻视的态度。当然，这不仅仅是由于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影响，——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宣传在这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但是，这位俄国青年所热爱的导师的政治观点的动摇性和含糊不清，的确影响到以后俄国革命家在纲领方面的摇摆不定<sup>81</sup>。車尔尼雪夫斯基关于普选制的意义的意见，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他对西欧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的看法从来也不是很明确的。我们可以从他的《七月的君主制》一文中引述这个意见，这篇文章写于1860年，亦即写于他对政府解决农民问题感到彻底失望，因而已经不可能用*ad usum delphini*〔为了法国皇太子〕的方式写文章的时期。顺便提一下，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这篇文章里曾向这样一些“优秀人物”呼吁，这些人看到法国实行的普选制被反动分子和蒙昧主义者利用以后，便认为普选制已经毫无意义。車尔尼雪夫斯基不用这样一种理由来安慰他们，即反动分子和蒙昧主义者只有在摧残了六月的武装起义者<sup>82</sup>以后，才可能享受普选制的成果。他并不对他们说，普选制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教育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他只是指出“乡下人”的愚昧无知……他说：“法令（在法国实行普选制的法令）的直接后果，违反了一切正直的法国人的期望。但是，从这一点能得出什么结论呢？难道这个法令终究没有使法国社会得到某种利益吗？现在可以看到，乡下人的愚昧无知毁灭了法国。当他们没有选举权的时候，谁也没有去关心这种可怕的不幸。谁也没有注意到，乡下人的愚昧无知始终是法国历史上一切事件的基础。疾病是隐藏的并且一直没有得到医治；但它终究引起了整个机体的衰竭。当乡下人参加了选举的时候，人们最后终于看出了事情的本质。人们看到，当正直的人不去教育乡下人的时候，任何真正有益的东西都不可能法国实现。现在正在做这种工作，这种努力毕竟不是完全没有成果的。迟早

乡下人会变得更聪明些，那时法国就会更加容易进步。我們可以这样地安慰自己：尽管在恢复法国的法制时普选制沒有被保留下来，尽管普选制法令所带来的苦果迫使社会輿論暂时反对普选制，但是，普选制法令虽然有很大的直接害处，却仍然間接地带来了无比巨大的益处”<sup>①</sup>。

我們可以看出，这里既沒有談到法国社会中的階級斗争，也沒有談到法国无产階級的革命作用。我們的作者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从事于教育乡下人的某些正直的人身上，认为这样“法国就会更加容易进步”。現在听起来这是非常奇怪的。可是仍然不应当忘記，无产階級在車尔尼雪夫斯基看来只是“平民”，他們按本性、意向和任务來說与其他劳动居民阶层很少区别。如果說車尔尼雪夫斯基从西欧无产階級經濟状况的特点也看到了一点革命的东西，那也仅仅是就經濟貧困引起工人不滿这个意义來說的。由于其他劳动居民阶层也同样遭受严重的貧困，所以，在他看来他們中間的革命情緒是与无产階級中間的革命情緒同样自然的。当車尔尼雪夫斯基为俄国村社土地占有制辯护的时候，他指出它所带来的好处之一就是它会拯救我們避免“无产階級化的潰瘍”。的确，这时他显然曾經不止一次地想起哈克斯特豪森男爵或迁果波尔斯基之类的反动分子的話，这些人断言：“无产階級化的潰瘍”是西欧革命运

113

<sup>①</sup> 《七月的君主制》，載《俄国社会民主主义丛书》，日内瓦 1875 年版，第 58、59 頁 83。

生常談，并把这种无稽之談应用于俄国农民。我們在这里沒有必要去解释西欧农民的性格如何。我們只想提醒大家，哥薩克大部分出身于农民，而从十七世紀初期起，俄国人民历史上的几乎一切戏剧性的情节，都是靠了农民的力量来实现的”<sup>84</sup>。我們看到，他在这里把农民战争的意义与現代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混为一談，——而这对如今的社会主义者來說則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現代社会主义者看来，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乃是建立在大工业基础上的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的結果。現代社会主义者把这种工业的繼續发展看做自己事业取得胜利的保证。卓尔尼雪夫斯基却不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强烈地带有最明显的唯心主义色彩。他在关于布魯諾·希尔德布兰德的《現在和将来的政治经济学》一书的書評中，对这个问题发表了这样的見解：“凡是真正合乎人性的、真正合理的东西，会在一切民族中間得到同情……理性只有一个，它不論何时何地所有黑皮肤和浅黄色头发的人那里总是相同的。当然，在美国草原上生活的人，与俄国农村中生活的人有所不同，而在散得維齿群島上居住的老爺們，也和英国紳士不一样；但是我們认为，俄国庄稼汉和野蛮人也像极可尊敬的羅馬主教一样，都要吃飯，而且为了吃飯就想要有点什么东西。希望改善自己的状况的意願，是整个人类的本质特性。假如新的理論违背人性，那末它們就不能超出需要杜撰这种理論的那个国家和那些人的范围，文明世界的一切民族也就不会追求这种理論”<sup>①</sup>。我們未必需要再重复一遍：文明世界的各民族之所以追求社会主义，并不是因为它符合“人性”（因为这还不能证明任何东西），而仅仅是因为它符合我們現代文明人类的經濟状况的

114

① 《同时代人》，1861年3月号，新书栏，第71頁85。



本性。

車尔尼雪夫斯基既然对社会主义抱着上述的观点，他又怎么能理解社会主义政党的实际任务呢？在书报检查的条件下，他不得不在报刊上很少談論这些任务，但他关于这一点毕竟說得这样明确，使人只可能对一些細节发生怀疑，而他的实际意图的一般性质是十分明显的。

我們首先要指出，車尔尼雪夫斯基由于他具有清醒的头脑和要求从事实际活动的一貫願望，所以不可能属于这样一种社会主义者之列，这些社会主义者要求人类完全接受他們的空想，并认为一切局部性的經濟改革都是毫无效果的，或者甚至是直接有害的。例如，現代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这样的人，如果可以把无政府主义者叫做社会主义者（虽然不是在这个名詞的严格意义上，而只是在普通談話的意义上）的話。車尔尼雪夫斯基辛辣地嘲笑了这些幻想家。“为了崇高的理想而拒绝对现实进行某种哪怕不十分完善的改良——这就等于把毫无成果的理论理想化并用这些理论来作消遣。”按照他的意見，在喜欢这样消遣的人那里，“事情大部分是这样結束的：他們在作了紧张的努力而上升到自己的理想之后，就又降落下来，好像他們面前已經完全沒有任何的理想”<sup>86</sup>。这正好打中了現代无政府主义者的要害。但問題不在这里。我們来看一下，車尔尼雪夫斯基本人对那些从社会主义观点看来是有益的和可能的改革究竟抱着怎样的看法？

大家都知道，現代社会民主主义者同样不仅不否认局部性經濟改革的意义，而且还坚决要求进行这样的改革。他們在不同国家里采用的局部改革綱領或所謂最低要求的綱領，是同他們的最終目的密切相联的。他們希望他們从当前的政府那里爭取得来的改革会使他們更易于达到最終目的，会使这些改革成为劳动經濟

对資本經濟的接連不断的胜利。車尔尼雪夫斯基理解到，社会主义者所要求的改革应当符合于他們的最終目的。但是，他对于社会主义的最終目的的看法并不像現代社会民主主义者那样明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十分遙远的将来的事情，是人类“长期試驗”的結果。因此，他所希望的局部改革的綱領也就不可能明确。但是，一般說来，由于車尔尼雪夫斯基把社会主义制度想像为协社的形式，所以他捍卫了哪怕具有协社原則的最微小迹象的一切东西。从协社很容易实行的观点出发，車尔尼雪夫斯基也保卫了俄国村社土地占有制。他把村社看成是农业协社的现成历史背景。他在《怎么办？》<sup>87</sup>这部小說里也向俄国社会主义者建議举办协社。关于协社的宣传在俄国和德国同时进行，这个历史事实是很有意思的。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說出版于1863年，随着这部小說的出版，在我国就开始有不少人試圖建立生产协社。就在1863年，拉薩尔向德国工人介紹說，协社是改善他們的生活（哪怕只是某些改善）的唯一手段。但是，在我国和德国，这个問題的提法多么不同！在一时成为俄国社会主义者的綱領的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說中，从事于建立协社的是个别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有教养的人：薇拉·巴夫洛芙娜和她的朋友們。甚至开明神甫梅察洛夫也热衷于这个事业，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在薇拉·巴夫洛芙娜的作坊中起着“盾牌”的作用。这部小說絲毫沒有談到与建立这样的协社有利害关系的那个階級的政治独创精神。企图实现車尔尼雪夫斯基所提出的綱領的那些六十年代的人，也都絲毫沒有談到这一点。相反地，拉薩尔进行鼓动时的第一句話，就向工人指出了發揮他們的政治独创精神的必要性。拉薩尔要求工人团結在一个特殊的政党中，并影响国内的事变进程，迫使政府給他們举办协社所必需的金錢。在拉薩尔的計劃中，举办协社的事业带有广泛

的社会性。拉薩尔认为，靠个别开明人士的努力而举办的协社，完全没有任何的意义。与拉薩尔相比，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自己的小說中是一个真正的空想主义者。与車尔尼雪夫斯基相比，拉薩尔在进行鼓动时則是現代社会主义的真正代表者<sup>88</sup>。产生这种区别，并不是由于拉薩尔在智力方面高于車尔尼雪夫斯基。可以有把握地說，在智力方面，車尔尼雪夫斯基比之拉薩尔毫无逊色。但这位俄国社会主义者是自己国家的儿子，这个国家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落后性，使他的一切实际計劃，甚至許多理論观点都具有空想的性质。他在举办协社的实际計劃方面，与其說接近于舒尔采—德里奇，无宁說远为接近于拉薩尔。但是，另一方面，我們要指出，只是与車尔尼雪夫斯基相比之下，拉薩尔才在自己的实际計劃方面是現代社会主义的真正代表者。实际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才是現代社会主义的真正代表者和創始人，他們发现拉薩尔的計劃也只不过是一个空想。他們所以拒絕支持这位有名的鼓动家，正是因为他们們不願意在德国工人階級中助长經濟空想的傾向。

116

对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年代，正是1848年革命后备受压制的西欧无产階級在政治生活方面毫无表现的时期。由于車尔尼雪夫斯基只是从旁观察无产階級，同时沒有机会通过亲身观察来了解前一个时代的无产階級运动，所以自然无从考虑无产階級的历史作用。車尔尼雪夫斯基虽然在原則上承认无产階級应当靠自己的努力来自求解放，有时却傾向于采取一种极其奇怪的改善无产階級命运的实际計劃。在談到这点时，我們指的是刊载于《同时代人》杂志1861年5月号外国文学栏的一篇文章。很可能这篇文章不是車尔尼雪夫斯基本人写的，甚至多半不是他写的<sup>89</sup>。但是，因为这篇文章涉及經濟問題，因为哪怕与这个問題只有一点关系的文章都要通过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手才能在《同时

代人》杂志上发表，所以如果这篇文章违背我们这位作者的观点，它就当然不可能发表。至少，应该承认这篇文章很可以代表《同时代人》集团对社会问题的观点。在这篇文章的开头，作者发表了一些很有道理的意见，说无产阶级不过是近代史所特有的一种现象。“只有在本世纪，它才作为自觉的、独立的整体而出现在于西欧。在十九世纪以前，贫苦的、需要一般援助的人也许比现在更多，但却谈不到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近代史的产物”<sup>90</sup>。接着，作者又发表了一个正确的意见，说妇女参加工业劳动是妇女家庭解放的保证。读到这一点，人们可能认为作者是完全站在现代社会主义观点上的。但是，一谈到改善无产阶级命运的实际手段时，人们马上就会失望。例如，当作者谈到里昂的丝织工人时，认为拯救他们的办法就在于“取消生产的集中”，在城市以外开办作坊，使织工劳动和农业结合起来。按照作者的意见，织布业和农业的结合会大大地增进工人的福利。他认为，降低农村中的原料的价格是增进织工福利的另一个泉源。以上就是他的原话：“对里昂的工人来说，在城市以外建立自己的作坊，就是把他们从老板那里解放出来的开端。但怎样开办作坊呢？用谁的钱来开办呢？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能指望老板和工厂主，因此必须要求政府支持，要求政府给钱。只有靠政府向里昂的无产者发放贷款，他们才能摆脱资本家对他们的劳动的剥削，并有可能自立。”但是，作者担心工人不愿意迁往农村。“对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来说，城市生活具有他们在农村生活中所找不到的那些令人愉快的特点……但这是一种暂时性的害处。当然，决不能期望所有的工人都立刻从里昂迁往里昂郊区；但也没有任何根据认为，这种迁移的益处不会日益深入工人的一般意识。如果有了几个成功的范例，工人就会看到摆脱自己目前的悲惨处境的出路。开始时只要先建立一些由个别家庭组成的小农场和小作

坊，就不难过渡到协作社和由大家出錢建立并拥有机械动力的工厂”<sup>①</sup>。假如我們是在烏斯宾斯基先生或某个俄国“主观社会学家”<sup>91</sup>的著作中看到这样的計劃，我們是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的。但是，在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杂志上，这种計劃却令人产生一种奇特的、沉重的印象。看来，想出这种計劃的人，以及那些把它发表在自己杂志上的人，都还完全沒有弄清楚工人的解放怎样才能成为工人自己的事业。在現代社会民主主义者看来，事情是十分明显的：无产阶级的經濟解放，乃是他們取得政治統治、夺得政权的结果。上述的那个里昂織工經濟解放計劃的草拟者，认为拿破侖三世的政府在这个解放事业中起主要作用。按照这个計劃，政府應該充当发起人，逐步使工人习惯于迁居农村的思想。因此，工人似乎是消极地承受波拿巴政府的善行的对象。这是与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观点根本不同的，更不用說这个計劃中經不起任何批評的經濟方面了。但是，也可以說，在《同时代人》杂志上出現这样的計劃是可以理解的、自然的。我們已經看到，車尔尼雪夫斯基怎样看待普选制。他并不认为普选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必要武器<sup>92</sup>。誰不理解普选制在这个斗争中的意义，誰也就根本不解这个斗争的全部政治任务，誰也就不清楚无产阶级为了在将来夺取政权而团結成一个特殊政党的必要性。而在这样的情况下，甚至工人阶级的最真誠的拥护者，当問題涉及改善工人命运的实际措施的时候，也必然会发生动摇。他会从心里同情工人的革命运动；但在和平时期，他不会拒絕把改善工人命运的全部事业交給現存政府去做；他沒有清楚地理解工人的政治任务，也就不可能清楚地理解他們的政治首創精神的意义。一般地可以說，对无产阶级

118

① 《同时代人》，1861年5月号，外国文学栏，第22及23頁。

的現時任务的理解，最清楚地表现在对这个阶级在和平平静时期的策略的见解上。为了同情工人的革命爆发，只须不去支持资产阶级制度就行了。但是，为了要对工人在没有发生革命和还不能预见到革命的时期所应当采取的策略有一个明确的看法，就必须弄清楚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全部任务、全部条件和全部进程。車尔尼雪夫斯基还没有弄清这一切；因此在《同时代人》杂志上就出现了上述的那种计划。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的作者坚决主张国家干预各个社会阶级的经济关系，却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到对劳动日的立法限制。看来，他认为事情的这个方面没有任何意义，或者不如說，他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个方面。

現在我們已充分闡明了車尔尼雪夫斯基的社会主义观点。对熟悉西方的运动和西欧社会主义著作的那些讀者來說，也許在这里指出下面这点将会使他們感到兴趣，那就是我們的作者把蒲魯东看做“西欧平民所达到的智力状况的道地代表”。車尔尼雪夫斯基决不是蒲魯东的崇拜者。他指出了蒲魯东的弱点、动摇性和不彻底性。“在所有这一切当中，我們又看到了西欧平民現今所处的智力状态的一般特点。西欧的平民，由于具有健全的本性，严酷的生活經驗，在理解事物方面实质上要比那些更幸福的阶级的人們正确、确实、深刻得多。但他还不知道最符合他的地位、习惯、需要和与知識的現狀相适合的那些科学概念”<sup>①</sup>。在这里，車尔尼雪夫斯基談的是什麼“平民”呢？他是否指的是农民、独立小手工业者或名符其实的无产者呢？他一般地談論他們，而沒有在劳动居民的各阶层之間作任何区别，因为正如我們看到的，在他的头脑中他

<sup>①</sup> 《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第 21、24 頁 93。

們全都溶合成为一个关于“平民”的一般概念。現代的社会主义者不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早在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指出了农民和手工业者同无产階級之間的截然不同的区别。在《宣言》的作者看来，当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保卫他們的特殊經濟地位并且沒有轉到无产階級观点上来的时候，他們都是力求使历史車輪倒退的反动分子<sup>94</sup>。馬克思和恩格斯只把无产階級看作現代社会中真正革命的階級。根据这一点，馬克思和恩格斯也許可能把蒲魯东看作西欧平民的代表者，但这是处于特殊的小資产階級生产条件下的平民。在馬克思看来，蒲魯东的社会主义是小資产階級的社会主义，或者也可以說，是农民这些农业小資产者的社会主义。馬克思认为蒲魯东思想之所以不彻底和动摇不定，并不是由于他不知道科学的最新成就，而是由于他从小資产階級中間得到的偏見和成見，使他即便知道了这种成就，也不可能理解这种成就的意义<sup>①</sup>。馬克思和車尔尼雪夫斯基对蒲魯东的不同态度，清楚地表明他們对整个西欧工人运动的不同态度。

## 六

現在我們知道車尔尼雪夫斯基对俄国人目前也應該向之努力学习的“我們共同的伟大西方导师”的态度。我們知道，德国哲学对車尔尼雪夫斯基观点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影响。我們也知道，我們这位作者在德国哲学的哪一个发展时期研究了德国哲学：这个时期就是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过渡的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現代唯物主义观点还远沒有达到后来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

120

① 參閱《哲学的貧困》（《現代社会主义丛书》，第5分册）95。

达到的那样严整、明确和彻底的程度。这种情况很明显地影响了卓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把他的观点与后来从费尔巴哈学说中发展出来的那个学派的学说比较一下，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观点中有许多缺陷、许多含糊和不彻底的地方。从我们现代欧洲科学的观点看来，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卓尔尼雪夫斯基的历史观点和社会主义观点是令人满意的。谁打算在现在保持这种观点，那他就是一个十分落后的人。但是，在谈到这一点时，我们完全不想责备这位伟大的俄国作家。他生活在一个各方面都很落后的国家里，社会科学的最新发现和趋向往往完全达不到这个国家，这种情况大大地妨碍了他的发展。在他周围的环境里，没有任何材料可以使他在这方面作出独立的发现。此外，应该记得，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社会科学中完成的变革，甚至最有才干的西欧人也没有立刻给予应有的评价。拉萨尔所处的条件对他的社会和政治发展非常有利，他熟识现代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看来他只要掌握别人所制定的思想就够了，而按他的生活环境来说他是完全可以理解这些思想的，但我们在他的著作中也能看到许多惊人的矛盾。在他的大部头著作（《Philosophie Heracleitos des Dunkeln》、《System der erworbenen Rechte》<sup>①</sup>）中，他是一个最纯粹的唯心主义者，谈论什么概念的自己发展（Selbstenwicklung der Begriffe）。在他的鼓动性小册子中，他已经远为接近于现代唯物主义，他已经差不多完全承认它的全部原理，然而在他的这些小册子中也仍有许多含糊不清和不彻底的地方。现在他的主要论战著作《巴师夏—舒尔采》<sup>96</sup>需要作多少订正啊！我们应该承认拉萨尔也和卓尔尼雪夫斯基一样是社会主义哲学思想发展上的过渡时期的代表。但是，

① 《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既得权利的体系》



拉薩尔观点中的缺陷和矛盾，並沒有妨碍他对本国的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的未尽严整也沒有妨碍他做到这一点。現在我們站在馬克思的观点上，可以对車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論論断和实际計劃中的許多东西加以指責。但是，对他的时代和他的国家來說，甚至現在我們應該认为是錯誤的他的那些观点，也終究是极其重要和有益的，因为它们激发了俄国的思想，并且把俄国思想推上了它在前个时期尚未能走上的道路，即推上了研究社会問題和經濟問題的道路。在政治經濟学、历史，甚至美学和文学批評方面，車尔尼雪夫斯基毕竟发表了許多重要的思想，这些思想迄今還沒有得到俄国文学界充分的領会和应有的研究。为了用几句话来确定車尔尼雪夫斯基为俄国思想发展所作的一切工作的意义，只要指出下面这个事实就够了，而任何一个了解近三十年来文学状况的人都承认这个事实是不容置辯的。这个事实就是：从車尔尼雪夫斯基停止文学活动以来，無論是属于无数宗派和派別的俄国社会主义者，或是合法的俄国批評和政論，都簡直絲毫沒有前进一步。在他的文章里，你們可以找到下一个时期的先进作家們由于加以传播而成为他們的光荣的那一切思想和观点。这些作家沒有对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作任何修訂，他們也不可能作任何修訂，因为他們的世界观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有着車尔尼雪夫斯基的世界观所具有的一切缺陷<sup>97</sup>。車尔尼雪夫斯基观点的軟弱方面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的：他不了解西欧哲学思想的最新派別，不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說。但下一个时期的文学領袖們是否很好地領会了这种学說呢？他們談論西欧理論对我们不适用，談論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談論俄国經濟生活的特殊性，談論西方的錯誤——一言以蔽之，他們是民粹主义学說的比較自觉的、比較热心的鼓吹者，而这种学說在車尔尼雪夫斯基看来无疑是一种最难了

解的神秘主义<sup>①</sup>。俄国思想的先进代表既然錯誤地走向民粹主义方面，他們就甚至連想都不可能想一下对車尔尼雪夫斯基进行认真的批判。相反地，他們往往以应当得到好报的热心去捍卫的，恰恰就是那些构成他的錯誤并表明他落后于西欧科学的观点。那些对本国的思想发展具有显著影响的天才人物或者甚至只是有才干的人物，他們的命运都是很奇特的！他們的信徒和崇拜者往往正是接受他們的錯誤和謬誤，然后以他們的伟大名字所激起的全部热情去捍卫这些錯誤和謬誤。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确乎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即学生对他們老师的錯誤往往抱着驟然看来非常令人奇怪的偏执态度。黑格尔右派抓住的是什么呢？他們抓住的是这位天才哲学家的錯誤和不彻底的地方。所謂实证主义者特別固执地坚持的是什么呢？是奥古斯特·孔德的学說中的煩瑣的部分（請讀者原諒我們把孔德和黑格尔作这种确实是大不恭敬的比拟）。什么东西妨碍德国的拉薩尔派同李卜克內西—倍倍尔派联合起来呢？就是对拉薩尔的政治錯誤和經濟空想的偏执态度。的确，蒙昧主义者詆毀人的头脑，硬說它永远向前运动，永远对现状不滿！实际上，人的头脑是一切保守分子中最富于惰性的。

但讓我們回到我們的作者那里去。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他的观点的一般性质，知道他对“真理、科学和艺术的崇高观念”的理解所特有的优点和缺点，我們就能容易地对他的文学活动作一个总

<sup>①</sup> 柯利斯托夫在論夏波夫的著作中說道，車尔尼雪夫斯基对夏波夫的著作发生兴趣之后，設法与他結識，而在一个共同的朋友家里遇見他以后，却同他进行了一次长時間的爭論<sup>98</sup>。这次爭論向車尔尼雪夫斯基表明，夏波夫不可能成为《同时代人》的撰稿人，因为他們的观点有着巨大的分歧。可是后来那些自认为是車尔尼雪夫斯基的热烈崇拜者的人，是怎样看待夏波夫的呢？对俄国历史的夏波夫式的看法是民粹主义学說的組成部分，而我們的民粹派虽然繼續“尊敬”車尔尼雪夫斯基，却甚至不肯自問一下，究竟他的观点同夏波夫式的把古代人民生活的美化之間是否存在着矛盾？

結<sup>①</sup>。

我們已經說過，車尔尼雪夫斯基在准备他的學位論文《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时，曾主要为《祖国紀事》杂志从事翻譯和其他文字工作。他的學位論文的发表，引起了《同时代人》杂志編輯部对他的注意，这家杂志从1847年起是由涅克拉索夫和帕納也夫出版的。他們建議車尔尼雪夫斯基經常为这家杂志撰稿，甚至請他負責整个批評栏。后来，当1859年《同时代人》杂志获准談論政治时，車尔尼雪夫斯基还負責政治栏。涅克拉索夫和帕納也夫永远立下了一个巨大的功績，他們沒有迴避那些继承別林斯基事业的人，像其他許多“別林斯基的朋友”所做的那樣。不言而喻，編輯部不必对它結交車尔尼雪夫斯基这一点感到后悔。早在1855年的《同时代人》杂志十二月号上，就发表了前面已經多次提到过的《果戈里时期俄国文学概观》一书中的第一篇論文，該书是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最卓越的著作之一，而且迄今仍然是任何一个希望了解果戈里时期批評的人的最好的参考书。这一系列卓越評論文章中的第二篇刊载于下一年的《同时代人》杂志一月号上，第三篇刊载于二月号上，第四篇刊载于四月号上。在这四篇論文中，对波列伏依、森柯夫斯基、舍維辽夫和納杰日丁的文学活动作了評价。在七月号上，作者轉到了別林斯基，其余的五篇論文都是关于別林斯基的。自从1848年<sup>99</sup>別林斯基被看作违禁的作家以后，在这些文章中他的名字才第一次被提到。随着《概观》的发表，人們能够以愉快的信心毫不夸大地說，別林斯基有了一个无愧于他的继承者。从車尔尼雪夫斯基成为《同时代人》杂志的批評家和政論家的时候起，这家杂志又在俄国期刊中間取得了它在別林斯基生前所享有的那种优越地位。进步讀者都怀着兴趣和敬意注視《同时代人》杂

123

① [參閱后面第145頁德文版对此处的补充。]

志，一切新生的、正在成长的文学力量都自然地趋向于这家杂志。例如，从1856年年中起，年轻的杜勃罗留波夫就开始为这家杂志写稿。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甚至很难想像，当时的报刊在我国具有多么巨大的意义。现在社会舆论已大大超越了报刊；在四十年代里则社会舆论还没有成长到报刊的水平。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是社会舆论和报刊趋于最大一致，报刊对社会舆论发生最大影响的时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当时所有卓越的作家才可能这样热中于文学活动和这样真诚地相信文学宣传的意义。简言之，这是俄国报刊的黄金时代。克里米亚战争的不幸结局使政府不得不对文明社会做出一些让步，至少不得不实行最迫切的早已成为必要的改革。不久，农民解放问题就提到日程上来了，这个问题毫不含糊地涉及到各阶层的利益。是否应该说，尼古拉·加甫利洛维奇热心地研究了这一问题呢？他在1857—1858年就已经写了一些有关农民问题的出色的论文。在国外出版的单行本中，这些论文编成了排印得很密的一厚册，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在这方面写了多少文章<sup>100</sup>。关于废除农奴制时代我国社会力量的对比，目前大家已经了解得够清楚了。所以我们只是顺便谈谈这一点，来说明当时车尔尼雪夫斯基领导的我国进步报刊在这个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大家知道，进步报刊热烈地捍卫了农民的利益。我们的这位作者一篇接着一篇地写文章，主张连同土地一起解放农民，断言赎买分给农民的份地不会给政府造成任何困难。他用一般的理论推断和极详细的示范计算来证明这个论点。他在《赎买土地困难吗？》一文中这样写道：“赎买土地实际上怎么会有困难呢？它怎么能够超过人民的力量呢？这是不可信的。这是违背国民经济的基本概念的。政治经济学直截了当地说，某一代人从前一代那里接受的全部物质财富，比起这一代人的劳动所生产的财

富总量来，数目并不太大。例如，属于法国人民的全部土地、一切建筑物及建筑物内部的一切设备、全部船只和货物、全部牲畜、全部货币以及属于这个国家的其他一切财产，只值一千亿法郎；而法国人民的劳动每年生产一百五十亿法郎或更多的财富，就是说，用不着七年，法国人民生产出的财富的总和就等于从英吉利海峡到比利牛斯山脉整个法国的财富了。那末，假使法国人需要向什么人贖买整个法国，他們在一代之内只用自己的五分之一的收入就可以办到了。而我們的问题在哪里呢？难道我們需要贖买整个俄国和它的全部财富嗎？不，仅仅是土地。而且，难道是俄国全部的土地嗎？不，贖买的只是俄国欧洲部分农奴制根深蒂固的那些省份的土地”，等等<sup>①</sup>。然后他指出，要贖买的土地不超过俄国欧洲部分面积的六分之一，他提出了整整八个贖买计划。他說，只要政府采用这些计划之中的一个，那末贖买份地不仅不会給农民造成负担，而且对国库也十分有利。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全部计划都是根据“在确定贖金时必须保持尽量适中的价格”这一想法的。現在我們知道，我們的政府在废除农奴制时究竟对农民的利益考虑了多少，它对車尔尼雪夫斯基关于确定贖金要适中的那些意見听取了多少。統計表明，农民土地的贖金平均額大大超过了农民的收入。它还表明，贖金主要是由过去属于地主的农民的土地负担的。由此可見，我們的政府在解放农民时一刻也沒有忘記国库的利益，而对于农民的利益却想得很少。在进行贖买时考虑的純粹是国库和地主的利益。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誰都既不需要、也不乐意去考虑那个自己不能坚定不移地保卫自身利益的等級（这里說的是农民等級）的利益。但是，当关于农民解放的傳聞还刚刚开始

125

<sup>①</sup> 参閱《贖买土地困难嗎？》一文，載于国外版《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5卷101。

的时候，俄国最先进人物的想法稍微有点不同。他们以为，政府本身不费多大力气就能理解，它本身的利益是与农民的利益多么一致。顺便提一下，赫尔岑曾相当长期地抱着这种希望。車尔尼雪夫斯基也曾抱过这种希望。因此他在自己的论文中一再谈到农民问题，并且热心地向政府解释它本身的利益。但是，从时间上来说，車尔尼雪夫斯基是第一个理解到俄国政府在农民解放事业中所扮演的不光采的伪善角色的俄国作家。早在1858年，他就发表了《对反对村社占有制的哲学偏见的批判》一文，这篇文章有一个引自浮士德的意味深长的题词：“wie weh’, wie weh’, wie we-heh!”<sup>①</sup>。通常人们把这篇精采的论文看作对村社土地占有制的最坚决、最成功的辩护，但我们却从连同土地一起解放农民这一原则本身出发来看这篇论文。这篇论文表明，早在1858年，車尔尼雪夫斯基就已经对政府令人满意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这一点丧失了任何希望。他在这篇论文开头时说道：“我自己感到羞愧。我很惭愧地回想起我提出关于村社占有制问题时所抱的不合时宜的自信心。这件事我是干得卤莽了，干脆说，在我自己看来简直是愚蠢……很难说明我羞愧的原因，不过我尽可能这样做去。我觉得，关于保存村社占有制问题无论如何重要，但它毕竟只是它所涉及的那个问题的一方面。作为这个原则所涉及的人们的最高幸福保障，这个原则只有具备了它为发挥效力所需要的其他低级的幸福保障，它才具有意义。两个条件应认作是这种保障。第一，地租属于分享村社所有权者本人。但这还不够。还必须指出，只有当获得地租的人不因获得地租而担负沉重的债务时，地租才能真正名符其实……当一个人已经没有福气获得摆脱了任何债务的纯粹地租时，那么，……这些债务方面的支出，同地租比较起来，至少应该

<sup>①</sup> (“可叹！可叹！可叹！”)

为数不很大才行……只有在保持了这第二个条件时，关心自己幸福的人才会希望自己获得地租。”但因待解放的农民不可能保持这个条件，所以車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不仅为村社占有制辩护是无益的，而且为农民分地这件事本身辩护也是无益的。某些人仍然对这一点有某种怀疑，我們的作者引用下面这个例子完全說服了这些人。他使用他所喜欢的那种借助于“比喻”的解释方法，說道：“我們假定，我很关心設法保存您所食用的粮食。不言而喻，假如我这样做是出于自己对您的好感，那么，我的热心便是基于这样一种假定：粮食系属于您，用粮食所做成的飯食是对您健康有益和有好处的。当我知道，粮食完全不属于您，而用这种粮食所做成的每一頓飯，人家都要向您要錢，不仅飯食本身不值您所付的錢，而且如不是极端紧縮您就根本付不起那样多，这时候，請您想像我的心情如何。在这些如此奇怪的发现下，使我发生些什么思想呢？……为了功效尙无保证的事情去奔波忙碌，我是如何的愚蠢呀！除了傻子以外，誰会在还没有证明某些人已获得所有权和取得有利条件以前，就来为保存这些人的所有权而奔忙呢？……最好是把这种粮食全部都抛掉，因为这种粮食只会对我所爱的人有害！最好是把那只会使您破产的一切事情都抛掉！”<sup>①</sup>

127

如果讀者不滿足于上面所摘引的这一段話，而想要更清楚地了解車尔尼雪夫斯基在什么程度上和什么时候就对农民“解放”感到絕望，那末我們將向讀者介紹《序幕的序幕》这部小說，它是在1877年由《前进！》杂志編輯部出版的，車尔尼雪夫斯基写这部小說似乎大大早于小說《怎么办？》<sup>103</sup>。《序幕的序幕》——其实并不是一部小說，而是作者在废除农奴制时代所写的筆記。在这部小說中，这个时代的一些著名的文学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都以杜撰的

① 參閱《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日內瓦版，第5卷，第472—478頁102。

姓名出現，如恰普林伯爵、里雅桑采夫、薩維洛夫、列維茨基、索柯洛夫斯基，等等<sup>104</sup>。此外，車尔尼雪夫斯基用伏尔庚这个名字塑造了他自己，这使他的筆記小說具有很大的傳記意味。我們不打算叙述这部小說的內容，而只是指出伏尔庚同尼維尔津和索柯洛夫斯基关于农民解放的談話。伏尔庚对索柯洛夫斯基說：“让解放农民的事由地主党去办吧。区别反正不大”；相反地，对方却认为区别是很大的，因为地主党反对把土地分給农民；伏尔庚断然地回答对方說：“不，区别不是很大，而是很小的。如果农民不付贖金而获得土地，那末区别就大得很。拿走某人的东西或是把东西留給他，这是有区别的；但是要他花钱来买这个东西，那就是一样了。地主党的計劃不同于进步分子的計劃的地方只在于它更简单些。因此，它甚至更好些。愈少拖延，农民的負担也一定愈輕些<sup>①</sup>。农民中誰有錢，誰就买土地。誰沒有錢，就根本用不着强迫他买土地。这只会使他們破产。贖也就是买。說句老实话，倒不如让农民不要土地而得到解放吧……問題是这样摆着：我甚至找不出原因去为农民是否会得到解放而焦急，尤其是去为誰解放他們，是自由派还是地主解放他們而焦急。在我看来，反正都是一样。地主甚至还要好些”<sup>②</sup>。

128

在同尼維尔津的談話中，伏尔庚显出他对当时农民問題提法的态度的一方面。他感叹道：“人們都在說，解放农民！但是，做这件事情的力量在哪里呢？这样的力量还不存在。在沒有力量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去做这件事情；这是荒謬的。您看結果会怎样吧；有人会来实行解放。結果会怎样，請你們自己来判断一下，做一件不能做成的事情，結果会怎样……会把事情弄糟，結果会鬧出

① 在这段引文中，着重点都是我加的。

② 《序幕的序幕》，第199頁105。



一場丑事。唉，我們的解放者<sup>106</sup>老爺們，我們的所有這些里雅桑采夫之流及其伙伴們！這是一些吹牛家；這是一些空談家；這是一些蠢貨！……”<sup>①</sup>

當然，伏爾庚關於農民解放為時過早的這些論斷是錯誤的。農奴制是這樣巨大的禍害，它這樣地限制了當時俄國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的发展，以致無論是在什麼情況下和在什麼條件下廢除它都不可能是為時過早的。但是，為了正確理解車尔尼雪夫斯基對這件事情的看法，必須記住，當時的事變可能在他看來有着與在我們今天看來完全不同的前景。大概，他對農民起義抱有某種希望，同時他想必還認為完全站在農民這方面的急進黨派可能非常迅速地成長起來<sup>109</sup>。因此，只有就這方面來說他才會認為解放是為時過早的，即因為這種解放會平息農奴的騷動，使農民的斧頭不能快刀斬亂麻地摧毀地主政權，而另一方面，急進的民主黨派又還沒有力量對政府施加強大的壓力。可能在他看來，這個黨派取得這種力量只是幾年以內的事，因而他可能認為，既然暫緩解放會產生重要的結果，那末暫緩解放就是有益的。在他看來，在當時俄國完全可能發生革命運動——在他的文章里很明顯地暗示了這點，我們還要請讀者注意這些暗示，因為它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明他以後的文學活動的方向。

我們的民粹派現在把俄國農民加以極度美化，並且以令人驚異的輕率態度在農民身上發現所有一切他們想要在農民身上發現的品性和意向。因此，我們一刻也不願意把他們同車尔尼雪夫斯

129

<sup>①</sup> 《序幕的序幕》，第110頁107。老實說，根據小說的進程可以看出，伏爾庚的這些議論正是在車尔尼雪夫斯基論贖買的文章發表的時候說的。但這樣一來，這些文章的出現就無法解釋了：誰會去捍衛他本人認為在當前條件下完全不能實現的那種方案呢？我們覺得比較可能的是，當車尔尼雪夫斯基寫他的小說的時候，他不自覺地把他最後對農民解放條件的看法安排到較早的時候去了108。

基相提并论，而必须立刻补充一句，车尔尼雪夫斯基虽然相信农民革命可能爆发，但在本质上毕竟远没有把人民加以虚伪的美化。一般地说，在他看来，当时的俄国并不特别美好诱人。他往往对自己的同胞采取极其明显的否定态度。《序幕的序幕》中的伏尔庚（我们曾经说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用这个名字塑造了他自己）自言自语地感叹道：“可怜的民族，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从上到下全都是奴隶”<sup>①</sup>。甚至在较平静的时刻，他也没有放弃过关于俄国农民极度闭塞落后和愚昧无知的想法。在这方面，他是别林斯基观点的直接继承者，别林斯基在临终前说过，与斯拉夫主义者的论战帮助他“抛弃了对人民的神秘信仰”<sup>②</sup>。为了不致空口无凭，我们要指出车尔尼雪夫斯基发表于1861年《同时代人》杂志十一月号上的一篇卓越的、非常有教益的文章《是不是转变的开始？》。这篇论文是为了乌斯宾斯基的《短篇小说集》单行本的出版而写的。作者在这篇文章里反对的正是“渲染人民的习俗和概念的不可遏制的趋向”。用他的话来说，屠格涅夫和格里果罗维奇取材于人民生活的中篇小说都带有这种趋向的特色。他把这两位作家对人民的态度比作果戈里对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sup>③</sup>的态度。果戈里避而不谈自己主人公的缺点，因为他认为自己主人公的缺点是根本无法补救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是个可笑的白痴。但是说出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全部真象却是无益的、昧着良心的……他什么也不能替自己干，我们将说服别人去同情他……让我们不去谈他的缺点罢。”格里果罗维奇、屠格涅夫和他们所有的摹仿者，都完

① 《序幕的序幕》，第209页110。

② 貝平：《別林斯基，他的生平和通信》，圣彼得堡1876年版，第2卷，第324—325页。

③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是果戈里的短篇小说《外套》中的人物。——译者

全是这样对待人民的。人民的一切缺陷，“都被隐瞒了、抹煞了、掩饰起来了，所依据的仅仅是：他是不幸的，十分不幸的”<sup>①</sup>。在我们的作者眼里，烏斯宾斯基的主要功績是他完全不对人民采取这种态度。車尔尼雪夫斯基指出，烏斯宾斯基“把俄国老百姓看成是糊塗虫”，說他們“很难在头脑中把两个独立的思想联系起来”。但是，用他的話來說，农民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不仅是俄国的农民，而且西欧的农民也极其落后。至于說到“糊塗虫”的品质，他是“准备通过这种人揭露属于一切等級的大多数人”。一切等級和一切国家的大多数人都墨守陈規地生活着，并且显得极其愚鈍，他們几乎从不超出通常观念的范围。文学要向我们如实地描写人民生活，它就不应该閉眼不看人民性格中的消极面。在烏斯宾斯基的短篇小说中，——我們自己要記住，它們往往描写得过火——車尔尼雪夫斯基看到了文学对人民的态度方面的“轉变的开始”。他以欢欣的心情从这些短篇小说的作者看到俄国有教养人士中的一个新阶层的出現，他們能够不是作为善良的和寬厚的老爷，而完全是随随便便地、以平等待人的态度来面向农民并且和农民交談的。他对这个阶层的出現抱着很大期望。

把农民看作“糊塗虫”等級这种观点，似乎排除了对俄国人民中可能爆发革命运动的任何希望。但車尔尼雪夫斯基却絲毫也沒有抛弃这种希望。他曾断然声称，农民是极其落后的，或者干脆說，是愚笨的。“但是，如果你希望改善人民的命运，就不要急忙从这一点作出关于我們的希望有根据或沒有根据的任何結論，——他在这篇論文的結尾这样說道。——就拿一个最平凡的……最不足道的人來說；不管他过的是怎样与世无爭的微末的生活，在他的生

<sup>①</sup> 參閱前面指出的那期杂志，俄国文学栏，第83頁111。

活中总有一些具有完全不同色彩的时刻，即奋发努力和痛下决心的时刻。在每一个民族的历史上也可以遇到同样的情况”<sup>112</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也就是把他的希望寄托在这种痛下决心的时刻。他以为这个时刻已經不远，那时差不多所有的优秀人物都完全是这样想的。六十年代初期产生的秘密革命团体就是建立在这种信念上面的<sup>113</sup>。人們所以保持这种信念，一部分是由于頑强地要求“真正自由”的那些待解放的农民正在发生騷动<sup>114</sup>，一部分是由于西方的形势。意大利事件、北美战争、奥地利和普魯士的强烈的政治动蕩……所有这一切都使人有理由认为，从1849年起占統治地位的反动势力最后将被新的解放运动所战胜。同时人們也有理由希望，欧洲的事变也会把俄国吸引进去。要知道人們总是容易相信他們所願意相信的东西的！車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同志們还没有意識到，西方的政治运动只有在一个必要的条件下才能成为俄国内部发展的有益推动力；那就是俄国的内部关系、首先是經濟关系与西方的关系要有某种程度的类似。現在已經存在有这种类似之处，而且可以說，它还在每时每刻地增加着。但是，在六十年代初期，离开这一点却还很远。因此，与其說西方的解放运动在当时能促进俄国的进步，倒不如說它能助长俄国的停滞。在六十年代初期，俄国还可能再一次試图担当起它在1848—1849年間曾經輝煌地扮演过的欧洲宪兵的角色<sup>115</sup>。

## 七

如果說我們的作者虽然非常热爱人民，却善于用冷靜的目光去看待人民的缺点，那末可以想像得到，他会怎样去对待貴族和当时叫喊得很厉害的自由主义政党了。在这方面他是毫不留情的。我們已經引述过伏尔庚对于自由主义者里雅桑采夫兄弟的批評。在

《序幕的序幕》中有許多这一类的批評。車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文章里从不放过嘲笑俄国自由派的机会,并且在刊物上声明,無論他或急进党派都与自由派毫无共同之处。胆小如鼠、缺乏远見、目光如豆、懦弱无能和自吹自擂——这就是他在当时自由派身上看到的那些突出的特质。在刊载于1858年《雅典尼》杂志上的《俄国人 rendez-vous<sup>①</sup>》一文中<sup>116</sup>,他几乎逐字逐句地作了这样的评述。这篇文章是为了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說《阿霞》而写的,但因为《阿霞》发表在《同时代人》杂志上,所以車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不便在自己的杂志上写关于这篇小說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关于这篇小說談得很少,——更正确地說,几乎一点也沒有談到。作者所注意的只是这篇小說的主人公向阿霞表白爱情的場面,并由于这个場面而进入“沉思”。讀者当然記得,在决定性的时刻,屠格涅夫的主人公胆怯了,并且后退了。正是这种情况把車尔尼雪夫斯基引入“沉思”。他发现,犹豫和胆小怕事不仅是这位主人公的特性,而且也是我們的优秀文学作品的大部分主人公的特性。他想起罗亭、別尔托夫和涅克拉索夫的《薩莎》中的启蒙者<sup>117</sup>,并在所有这些人身上看到同样的特性。他并不因此而責备那些作家,因为他们仅仅是指出了现实生活中到处都可以遇到的現象。俄国人沒有勇气,所以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也沒有勇气。而俄国人沒有勇气是由于他們沒有参加社会事业的习惯。“当我们走进社交界时,我們在自己的周围看到許多穿着軍礼服、常礼服或燕尾服的人;这些人身高五呎半或六呎,而有些人还要高些;他們之間有的人在两頰、上唇和下顎留着鬍鬚,有的人則刮得干干净净;我們于是以为我們眼前看到的是些男子汉。这是十足的誤解、光学的錯觉、迷惘的幻觉,

132

① (去晚会)

不过如此而已。如果一个男性儿童不养成独立参加社会事业的习惯，不具有公民的感觉，那末他先是成长为中年的阳性生物，然后成长为老年的阳性生物，然而他不会成为一个男子汉，或者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具有高尚品质的男子汉”<sup>118</sup>。“沒有高尚气魄这个缺点在智力发达的、有教养的自由主义者那里，比起在愚昧无知的人那里表现得更为触目。因为智力发达的自由主义者喜欢談論大問題。他談得津津有味，娓娓动听，但是一当从言論轉向行动就不行了。”“只要問題还不涉及行动，而需要的只是用空談和幻想去充填閑暇的时间、空虚的头脑或空虚的心灵，这样的人真是机伶透頂；但等事情到了必須直截了当地表示自己的情感的时候——大多数人物就开始动搖，并且感觉到口齿不灵了。很少几个最最勇敢的人还能馬馬虎虎地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用僵直的舌头說出关于他們思想的某种模糊概念。但是，如果有誰想抓住他們的願望，對他們說：你們願意这样，我們非常高兴；你們就开始行动吧，我們支持你們。——在这样的詰問之下，一半最勇敢的人会暈倒，剩下的会很粗暴地責备你，說你使他們陷入了窘境，說他沒想到你会提出这样的建議，說他們的头脑全乱了，什么也想不出来了，因为事情怎么能来得这样快呢，况且他們又都是誠实的人，而且不仅是誠实的人，也是非常溫和的人，他們不願給你找煩惱，而且难道真的可以为那些闲着无事才談談的一切去操心嗎，最好还是什么也不干，因为一切事情都会招来麻煩和不便，而任何好处現在也不会有。因为，已經讲过，他們無論如何沒有想到也沒有料到，等等”<sup>119</sup>。

我們从来也沒有讀到过对于俄国自由主义的如此辛辣同时又如此中肯的評述。現在我們这里有不少人自称为革命者，但却把自己的全部希望都放在自由主义的“团体”上，并且不择手段地力图使我們的革命党变成穩健的、溫和的自由主义者的政党。車尔

尼雪夫斯基会对这些人說些什么呢？要知道，俄国自由主义者自从《同时代人》杂志对他们大加諷嘲以来是很少有所改变的。

但是，为了公平起見，必須补充一句，我們的作者并不仅仅对俄国自由派采取鄙視态度。在生活失去自由以前为《同时代人》杂志所写的卓越的政治評論中，我們的作者經常对所有的欧洲自由主义者表示最不留情的鄙視态度。特别是奥地利的自由主义者（即奥地利籍德国人的自由主义政党）、普魯士和意大利的自由主义者，更受到他的非难。大家知道，在有关法国史的文章里，他也沒有对自由主义政党表示多大敬意。当然，俄国自由主义的代表們不可能喜欢这一切，他們在对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斗争中，使用了各国自由主义者在同政治上比他們走得更远的人发生冲突时所經常采用的那种手段；他們責备他不愛自由，甚至責备他同情专制制度。当然，自由主义者的这种責备只能惹得車尔尼雪夫斯基发笑。他一点也不害怕这种責备，而有时似乎为了要引起他的敌人对他作新的責备，他故意装出承认他們完全正确的样子。他在晚期的一篇政治評論中說道：“对我们來說，沒有比自由主义更好的娱乐品了，这真使我們想在什么地方找到些自由派，拿他們来开开心”<sup>①</sup>。他开始嘲笑普魯士的自由派，按照他的中肯的評語，这些人为了普魯士的政治自由“沒有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而大发雷霆<sup>②</sup>。

但是，这样的“寻开心”并不妨碍一个細心的讀者理解：車尔尼雪夫斯基对自由主义抱鄙視态度，并不是由于他缺乏对自由的爱。只要哪怕讀几篇他的政治評論就可以看到，他怎样热烈地同情一切解放运动，而不論它們在何处发生：在法国还是在意大利，在美国还是在匈牙利。他仅仅认为，自由派在这些运动中所起的

① 《同时代人》，1862年3月号，政治栏，第188頁120。

② 《同时代人》，1862年4月号，政治栏，第357頁121。

作用通常是很不光彩的。自由派自己做得很少，却经常阻挠别人的努力，攻击那些比他们更为勇敢和坚决的人。可是，后来当由于这些坚决的人的努力，斗争将近结束并且胜利看来已毫无疑问的时候，自由派又力求挤上首要地位，坐享“狂信者”从火中取得的栗子。誰不知道，自由派不論何时何地都是这种作风？誰不知道，这些人在政治上也像在经济领域内一样都是剝削者，而他们在经济领域内通常都是属于商人和企业主阶级的？車尔尼雪夫斯基就是为了这些剝削者的癖性而仇恨他们的。而在他的政治评论的字里行间处处都流露出这种对剝削者的仇恨。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感到惋惜的，不是車尔尼雪夫斯基对这一点清楚而明确地发表了意见，而仅仅是在他以后，在我们的政治评论家中間再没有人这样清楚而明确地发表意见。最近二十五年来，我国进步报刊的政治概念一般说来是非常混乱和堕落的。因此，无论在哪一本俄国杂志上，后来都从未有过像車尔尼雪夫斯基为《同时代人》杂志写的那样精采的政治评论。在这些评论中，特别清楚地表现出他的卓越智慧和他对事物的清醒的看法。在这些评论中，他几乎从来没有抛弃这样一个不容争辩的原理，即“历史的进程是由现实的力量对比决定的”<sup>①</sup>，并且从这个原理出发，对他那个时候的各文明国家的政治生活的内部动力作了确切的分析。对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评论文章只能提出一个意见。当然，他在自己的某些政治预言方面犯了错误：例如，他没有想到北美的内战可能拖延很久，还在1862年初他就写道，可以认为这场战争已经以北方的完全胜利而告结束<sup>123</sup>。但是，在发表这类预言时誰能不犯错误呢？一般地说，他终究表现出巨大的政治远见，并且极其正确地评价了各个国

<sup>①</sup> 大概，讀者記得，拉蓬尔在他的演說《論宪法的本質》中，差不多用同样的話說到力量对比是每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重要基础<sup>122</sup>。



家和各个政党的相互关系。他所沒有預見到和沒有預言过的，只是在最近的将来(从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时起)所有先进国家中的工人階級即将担負起的那种卓越的政治作用。这位原則的革命家断定說，在每个国家的內部事务方面，也像在各个国家之間一样，一切重要的爭执归根到底都是以战争来解决的<sup>①</sup>，但是他还没有看到，現代文明社会中的一切革命力量都团結为单是一个工人階級至何种程度。他仍然过分傾向于对其他社会階級中的“优秀人物”寄予过大的希望。在这里，他通常所具有的洞察力由于他把无产階級看作“平民”这种模糊的观点而变得失灵了。

L35

但是，我們要指出，在談論我們的作者对自由主义和自由派的态度时，我們是离題过远了。这个有趣味的題目使我們忘記了叙述的前后一貫性。我們立刻就来糾正我們的錯誤。

首先，还是为了公平起見，我們要說，俄国自由派的胆小怕事之所以更为触目，仅仅是由于他們喜欢作不着边际的高談闊論。实际上，反动的“地主党”也并不更为勇敢。車尔尼雪夫斯基沒有跟我們的“貴族派”直接交往过。“他从来也不属于狭小的上流社会，而不仅是不属于貴族們的上层的、显貴的社会。但是，哪一个城市或小鎮不响彻着他們煥赫的名声呢？他从童年时代起就知道，这是一些粗暴的、厚顏无耻的人”<sup>②</sup>。在农民解放的时代，这些人曾經把他們认为是自己的最重要利益的一切东西孤注一擲。他們憤憤不平并且大声喊叫說：“我們不允許，我們不答应！——我們不願意，他們就不敢！——讓他們胆大妄为吧，看看触怒俄国貴族意味着什么！”但是，政府刚刚對他們怒叱一声，他們馬上夹起了尾巴，——“变得溫順了，仿佛瘫痪了一样”。“作为民主主义者”的

① 《同时代人》，1862年4月号，政治栏，第364頁124。

② 車尔尼雪夫斯基在《序幕的序幕》中关于伏尔庚就是这样說的125。

車尔尼雪夫斯基，看到这种变化是感到可笑而又痛快的。他不喜欢贵族，但也有过一些时刻，他对他们并没有仇恨。难道能仇恨可伶的奴隶嗎？<sup>①</sup>

## 八

車尔尼雪夫斯基就是这样对待他当时的俄国的各个等级和各个党派的。他愈是抱有这种否定的态度，他的文章的语气就愈是辛辣，他的嘲笑就愈是无情，他也就愈是频繁地投入论战。一般说来，他很喜欢论战。用他的话来说，甚至他的朋友们也往往指出，他“对于用热烈的论战来解决争论的问题”，有一种特别的，“在他们看来甚至是多余的爱好”<sup>②</sup>。在他看来，为了在社会中传播一个新的概念，论战永远是一种非常合适的、或许甚至是必要的手段。但是，在他的文学活动初期，他似乎是避免论战的。《果戈里时期俄国文学概观》是用平静而和解的语气写成的。只有对舍维辽夫这个别林斯基时期的莫斯科著名批评家，他才予以辛辣的讽刺。他在谈到森柯夫斯基（布朗貝烏斯男爵）时也表示轻视的惋惜，说他是一个把自己的巨大精力浪费在无聊的舞文弄墨上的人。对果

① 《序幕的序幕》，第208、209页126。

②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5卷，第472页127。在《果戈里时期俄国文学概观》中，他为别林斯基的前辈纳杰日丁辩护，因为有许多人责备纳杰日丁喜爱激烈的论战。“纳多烏姆柯（纳杰日丁的笔名）为什么用这样尖锐的声调说话呢？难道他不能够通过温和的形式说出这同样的东西嗎？真是令人奇怪的问题——我们文学上的以及其他各方面的见解要用尖锐的声调来讲。人们老是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农民要用粗笨的铁犁或是木犁耕田！可是不则又用什么东西来耕种膏腴而又难于翻掘的土壤呢？难道可以不理解，没有战争是解决不了任何重要问题的，而战争总是通过火和剑来进行的，而不是用外交辞令来进行的，外交辞令只有在武力斗争的目的已经达到的时候才有用处。只有攻击手无寸铁，毫无保护的人，只有攻击老弱残废的人，才是不合法的，可是纳杰日丁所反对的诗人和文学家们却并非这样的”（《同时代人》，1856年4月号，批评栏，第41—42页）128。

戈里时代的其他作家，他大部分都表示贊揚。甚至在被別林斯基的团体大加嘲笑、而后来又被謝德林称为考古学家兼腹語术者的波果丁的文学活动中，——他也发现一些有益的、值得贊揚的特点。在談到斯拉夫派时，他是怀着真挚的敬意的。尽管在他看来他們有着一切明显的謬誤，但他认为他們是“启蒙运动”的真誠的朋友，并且热烈地同情他們对待俄国土地村社的态度<sup>①</sup>。

但是，从关于村社土地所有制展开爭論的时候起，他就不得不抛弃了这种心平气和的、善意的語調，而充分地施展出自己的論战才能了。当时自由主义經濟学的道地的代表們，特别是《經濟指南》杂志<sup>131</sup>的編輯維尔納茨基很倒霉。車尔尼雪夫斯基确乎使这位“С. С.”（顧問官）和“Д-р ист. н., пол. эк. и стат.”（即历史学、政治經濟学和統計学博士；以自己的学位证书自傲的維尔納茨基就是这样署名的）遺臭万年。这个被打得落花流水的学者不仅逃离了戰場，而且丑态百出，开始要人相信他一直尊敬他在爭論开始时认为是魯莽的外行而加以藐視的同一个車尔尼雪夫斯基。应该承认，未必有人能够比車尔尼雪夫斯基保卫村社更加巧妙地保卫無論什么事业。凡是对村社有利的一切，能够說的他都已說了，也許，甚至即使他的論敌比他們实际上表現出来的还要强許多倍，他也会成为論战中的胜利者。如果說我們的“知識分子”迄今为止还这样牢固地抓住村社不放，那末这一点正表明車尔尼雪夫斯基的不可磨灭的影响<sup>②</sup>。

① 他在《概观》的第三篇論文中說道：“关于古代罗斯的‘米尔’、村社比个体更要优越的見解——在斯拉夫派是一个弥足珍贵的見解。”按照他的意見，这种关于个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說，“是他們体系中的健全部分，一般說来，在公正方面，是值得每个人尊敬的”（參閱《同时代人》，1856年2月号，批評栏，第80頁）129。为了这种关于村社的学說，他有时也为斯拉夫主义的《俄罗斯談話》辯护，反駁其他期刊对它的攻击（參閱《車尔尼雪夫斯基对杂志的評論》，1857年3月，收入他的《全集》国外版第5卷）130。

② （參閱后面第146頁德文版对这一处的补充。）

我們已經看到，我們的作者很早就认为把土地分給农民是沒有意义的。他已开始把这一点看做是农民将来遭到破产的根源。在《沒有地址的信》<sup>132</sup>中，他已公开地論证說，連同土地一起得到解放的农民的經濟状况，比他們处于对地主的农奴依附地位时的經濟状况更为恶劣。因此，我們可以完全不去分析他替村社辯护的論据。但因为这些論据迄今在我們这里还有重大的实际意义，所以我們认为必須对它們作一个简短的評价。——車尔尼雪夫斯基在他保卫俄国村社土地所有制时，暴露出他的全部經濟研究所特有的那同一个缺点。他沉溺于煩冗的抽象議論。他实质上談論的不是俄国村社及其现实状况和繼續发展的可能条件，而是村社 an sich<sup>①</sup>，这种村社只在理論上存在，并且只滿足有关定期重分土地的一定的要求。但是，我們既不能以这种方式来談論村社，也不能以这种方式来談論其他任何一种人民生活形式。在《对反对村社所有制的哲学偏見的批判》一文中，車尔尼雪夫斯基在駁斥他的論敌时，援引了黑格尔关于任何一个現象的发展中的第三个阶段、即最后阶段在其形式上与第一个阶段相似的著名学說。各民族都从村社土地所有制开始，他們在以后的发展中又会重新回到村社土地所有制。对这一点可以指出，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这里走得比黑格尔更远了。黑格尔談論第三个发展阶段与第一个发展阶段在形式上的相似，但他并没有說这两个阶段的完全同一。車尔尼雪夫斯基則似乎是假定它們完全同一的。按照黑格尔的說法，确实可以假定，各民族从公有制开始，然后又回到公有制，但决不能說，各民族正是回到他們由之开始发展的那种村社所有制形式。而如果可以这样期待，那末为什么要停留在重新分配土地的村社上呢？

①（自身）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假定，各民族会回到原始的氏族制度，因为村社本身乃是原始氏族制度的残余和后来的变形。可是现在未必有誰敢于作这样的假定。在引证黑格尔时，車尔尼雪夫斯基忽略了黑格尔哲学的两个最重要的特点。第一，在黑格尔那里，无论在邏輯、自然界或社会关系中，任何发展都是靠自己内部的、“內在的”辯证法的力量自行实现的。車尔尼雪夫斯基应该指出，在俄国村社中正是有着这样一种关系的内部邏輯，这种邏輯必然会把俄国村社从村社拥有土地导向村社耕作土地和村社享受土地的生产物。要知道正是为了这种公有制形式的利益，他才捍卫村社土地所有制，因为在他看来，村社将促进向这种形式的过渡。但是，車尔尼雪夫斯基沒有做到这一点，因为一般地说他把自己的希望主要寄托在知識的普及上，而很少注意那种影响人类发展的、社会关系的内部邏輯。其次，車尔尼雪夫斯基忘記了要时刻注意现实，而用他自己的話來說，这正是黑格尔的特点。我們想一下，他在《果戈里时期俄国文学概观》中是怎样闡述黑格尔的观点的：“‘抽象的真理是沒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也就是說，只有在考察了某一特定的事实所从而产生的一切情况之后，才能对这一事实做出肯定的判断。战争是有害的还是有益的？一般說来，不能以肯定的方式来回答：必須知道談的是怎样的战争，一切都以时间和地点的条件为轉移”<sup>133</sup>。关于村社也完全应当这样說：土地村社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一般說来，这个问题不能以肯定的方式来回答。必須知道談的是怎样的村社；一切都以时间和地点的条件为轉移。但是，車尔尼雪夫斯基却不是这样推論的。他沉溺于抽象的議論，因此就完全违背了他在自己的主要論战文章中所依据的那种哲学的精神<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正确地认为私有制只不过是經濟关系发展中 139

的一个过渡形式，他頑强地坚持这样一点，即按照黑格尔的意见，在一定的条件下，发展的过渡阶段是可以大大縮短的，或者甚至是可以完全沒有的。后来我們的民粹派特別抓住这点不放，他們的全部綱領都正是以下面这个假設作为基础：資本主义这个人类发展中的过渡阶段不会在俄国发生。抽象地說，过渡阶段的这种縮短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一种現象的可能性离开它的现实性还很远。为了使某种在理論上可能的現象在实际生活中实现，就需要具备某些具体的条件，換句話說，就需要有使它实现的充分理由。当車尔尼雪夫斯基保卫俄国村社土地所有制的时候，他可能认为俄国政府的善良意志是足以消灭“无产階級化的潰瘍”的充分理由，因为对俄国政府來說，似乎不难理解它本身的利益正是依赖于

---

① 看来，車尔尼雪夫斯基是反对連环保的。我們推测一下它的原因。他在对于甘恩的小册子《薩拉托夫省小市民阶层目前的日常生活》的評論中，毫无保留地援引他所評論的这位作者的这样一个意见，即連环保对納稅人的福利发生有害的影响。甘恩說道：“誰认真地付稅，誰也就負担得更多。”看来車尔尼雪夫斯基是完全同意他的（參閱《同时代人》，1861年1月号，俄国文学栏，第64頁）<sup>134</sup>。暫且把小市民擱在一旁不論，我們要問，如果没有連环保，那末政府怎么能够保证村社农民十足繳稅呢？假如农民土地为村社所有，因而在个别农户无力繳稅的情况下不能收归国有，那末整个村社就应该为納稅人无力繳稅負責。在这种情况下，連环保不仅是自然的，而且簡直是必然的。相反，假如土地归各个农户所有，那末連环保就失去了任何的根据，但在那种情况下就必须容許在农户无力納稅时把土地收归国有。的确，理論上还容許有第三条出路：抽象地說，可以废除連环保，而同时又承认土地属于村社和土地完全不能收归国有。然而实际上这又怎么行得通呢？国家对无力繳稅的納稅人怎么办呢？出售他們的动产嗎？但要知道，出售动产可能而且如今已經常常使农民完全不能耕种他的份地。难道还应当承认牲畜和一切生产工具都不能收归国有嗎？但是，假如我們从动产中除去牲畜和生产工具，那末一个普通俄国农民还有多少可以出售的动产呢？經驗表明，在那样的情况下，农民只留下一种动产，即他們自己的身体，而他們的身体也由于欠繳稅款而备受折磨。但要知道，不能认为折磨欠稅人是对問題的圓滿解决，而问题是必須解决的，因为国家当然不能同意使自己失去征收全部稅款的任何保障。但是，我們要提醒讀者，当車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还有必要保卫村社的时候，他希望它們处于十分有利的經濟状况下，在那种經濟状况下，納稅問題不会像它在目前那样地紧迫。

农民的富裕。但是，政府却没有理解到这一点，因此我们也就没有消灭“无产阶级化的溃疡”和与之相联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充分理由。我们知道，車尔尼雪夫斯基本人也很快就懂得了政府方面不140理解这一点是完全自然的。他认为不仅保卫村社土地所有制是无益的，而且保卫被解放的农民分取土地的原则也是无益的。按照他的有力的、尖锐而毫不留情的说法，他“在自己看来简直是愚蠢”，并为了他在保卫村社土地所有制时所抱的“不合时宜的自信心而感到羞愧”。但是，使車尔尼雪夫斯基感到羞愧的东西，却并不使现代民粹派感到羞愧。直到目前为止，他们还在谈论人民生活的永恒基础，还在谈论缩短发展阶段，——他们除了自己的“理想”之外，举不出缩短发展阶段的任何理由。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承认这种理由是充足的。可是我们却能毫不费力地找到我们的民粹派执迷不悟的充分理由。顺便提一下，这个理由就在于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那种小学生对伟大导师的错误所抱的偏执态度。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出，車尔尼雪夫斯基本人对俄国村社的看法，是和现代民粹派的看法完全不同的<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与我国自由派经济学家的争论，从村社土地

<sup>①</sup> 至于说到缩短一定的发展阶段，那末車尔尼雪夫斯基清楚地了解，某个阶段在缩短的情况下并不总是导致它在大大延长的情况下所导致的同样结果。在《论战之花》（《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俄文版，第1卷，第373页）中，他举雪茄为例，指出雪茄在发生缓慢的干燥和与之有关的化学变化的过程时，会获得吸烟者所特别珍视的质地。可是试试看把这种干燥过程的时间缩短而把新鲜的雪茄烟叶一下子用人工烤干罢。用我们作者的话来说，这种雪茄烟的优点就将不多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不同的过程会导致不同的化学结果<sup>135</sup>。在社会生活中不也是一样吗？难道没有理由认为，或长或短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会创造出劳动阶级的这样一些政治的、思想的和道德的品质，这些品质是我们从那种在自己整个历史过程中没有抛弃掉陈腐生活“基础”的民族中所根本看不到的。难道不应担心，这样的民族不仅会拒绝过渡的“发展阶段”，而且也会拒绝任何其他“发展阶段”，并把劝告他们直接过渡到社会进步的最后阶段的那些人交给长官？民粹派怎样想呢？

所有制問題开始以后，很快就采取了更广泛的理論性质，并且轉到了一般經濟政策問題。死守庸俗經濟学教条的我国曼彻斯特学派分子（他們的一切观点都是在庸俗經濟学的影响下形成的），急急忙忙地把他們主要的科学堡垒，即国家不干涉的原則抬上舞台。他們知道，巴师夏及其追随者的全部学說就是以这个原則为基础的，他們天真地认为，世界上再沒有胜过巴师夏的人。当然，事情恰好相反，关于国家不干涉人民經濟生活的爭論，只不过成了車尔尼雪夫斯基取得新胜利的一个机会。他很熟悉經濟学著作和社会主义著作，他不費什么力气地就在嘻笑怒罵中把巴师夏的全部妙論批評得体无完肤。他的《經濟活动和立法》一文<sup>136</sup>，不仅在俄国經濟学著作中（在这方面，車尔尼雪夫斯基迄今仍居首位），而且一般說来在欧洲社会主义著作中，都可以看做是对“laisser faire, laisser passer”<sup>①</sup>理論的一种最巧妙的反駁。在这篇文章里，我們的作者运用了自己的全部辯論才能和論战技巧。他仿佛是以这种論爭作为消遣，在斗争中他轻而易举地就击退了論敌的攻击。他戏弄他們，就像猫戏弄老鼠一样。他对他們作各种各样的让步，表示准备同意他們的任何一个原理，接受关于任何一个原理的任何解释——直到看来似乎已經給予他們以一切胜利的机会以后，直到使他們处于最有利于他們取得胜利的条件下以后，他才轉入进攻，用三、四个三段論式就把他們导向荒謬的地步。然后又开始作新的让步，对同一个原理作新的、更有利的解释，接着又重新证明这个原理的荒謬。在文章的結尾，車尔尼雪夫斯基照例把他的論敌教訓一頓，使他們感觉到他們不仅不懂得严格的科学思維方式，而且也不懂得簡單常識的最起碼要求。值得注意的是，五十年代末

①（自由放任）



和六十年代初在我国曾經有人热烈拥护的国家不干涉的原则，很快就几乎被俄国经济学家完全抛弃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既是由于我們的工业和貿易的一般状况，也是由于以后德国讲坛社会主义学派<sup>137</sup>对我国理論家的影响。但是，毫无疑问，这个原则还在它刚刚开始<sup>137</sup>在俄国著作中传播时就遇到像車尔尼雪夫斯基那样的劲敌，这一点在这里具有很大的意义。俄国的曼彻斯特学派分子既然上了很好的一课，他們便认为緘默是聪明办法，于是就銷声匿迹了。

## 九

車尔尼雪夫斯基不仅仅在經濟問題上进行激烈的論战。而且他的对手也不仅仅是自由派的經濟学家。《同时代人》集团在俄国文坛上的影响越大，这个集团、特别是我們这位作者本人所遭到的来自各个不同角落的攻击也越多。《同时代人》杂志的同人被看成是准备推翻一切人所尽知的“原理”的危险人物。某些“別林斯基的友人”开始时还觉得可以和車尔尼雪夫斯基及其同志们（其中杜勃罗留波夫占首要地位）合作，后来也脱离了《同时代人》杂志，把它看作是“虛无主义者”的刊物，并且大叫大嚷地说什么別林斯基在世决不会贊同車尔尼雪夫斯基所采取的路綫。屠格涅夫的做法就是这样<sup>①</sup>。甚至急进的赫尔岑也在自己的《钟声》杂志上抱怨那些“胆汁质的人”和“吹口哨的人”，认为这些人是为了否定而否定，为了嘲弄人而嘲弄人，并且似乎对任何东西都决不可能滿意<sup>139</sup>。当然，讀者知道，自从《哨声》作为特别的附刊出现在《同时代人》杂志上，专门对刚愎自用、泛泛空談、蒙昧主义和迂腐习气

142

<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讲过，屠格涅夫对他一定程度上还能容忍，但对杜勃罗留波夫就完全不能容忍了。他曾对車尔尼雪夫斯基說道：“您是一条普通的蛇，而杜勃罗留波夫則是一条眼鏡蛇”（參閱前面已經引证过的信《致謝》）<sup>138</sup>。

的一切文学表现和社会表现加以无情的嘲笑以后，人们就把《同时代人》杂志的同人叫做“吹口哨的人”或“大吵大闹的骑士”。可是，《哨声》上发表的大部分文章并不是車尔尼雪夫斯基写的<sup>140</sup>；他只是偶尔在这个附刊上写点文章，因为他为其他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他在文学活动的后期，不仅经常地为每一期《同时代人》写文章，而且差不多在每一期上都发表几篇文章。他为杂志各栏写文章，一般是按这样的次序：首先，他写一篇关于某个一般理论问题的长篇论文，然后写政治评论，对俄国文学、有时也对外国文学作一短评，评论几本新书，最后，似乎是为了休息和娱乐，再对自己的论敌来几下论战的袭击。1861年的《同时代人》杂志发表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论战性文章特别多。在这一年他写了有名的《论战之花》、《民族的不策略》（反对李沃夫的《言语》）、《人民的糊涂》（反对阿克薩柯夫的《日报》），以及发表在俄国文学和外国文学栏的许多论战性的短评。我们必须谈一下这些论战性文章中的某几篇。

143 我们将不去多谈《论战之花》。这些文章是对《俄罗斯通报》和《祖国纪事》杂志的攻击的答复。当然，回想一下《同时代人》的敌人曾经提出了一些什么样的论据，对我国的文学史家来说将是很有趣的；而为了评论車尔尼雪夫斯基，则并不需要详细地叙述卡特柯夫、阿尔勃提尼或杜德希金<sup>141</sup>对他作了什么奇怪的、往往毫无道理的责难。但是，顺便说一下，在一篇针对《俄罗斯通报》的文章里，我们这位作者对他自己的文学活动发表了一个极有趣味的看法。我们现在就把它援引在这里。車尔尼雪夫斯基极清楚地知道，他在俄国文坛占有突出的地位。他的敌人很怕他，有时甚至对他說些奉承话。然而他的蒸蒸日上的名声却丝毫没有使他高兴。他认为俄国文坛水平太低，并不以他在俄国文坛占据的突出地位为荣。他“对于自己的文学声誉完全无动于衷”。他关心的只有一

个问题：他能否把生气勃勃的思想和感情保持到我们的文学真正有益于社会的美好时代。“我知道，文学活动的美好时代将会到来，那时文学将给社会带来真正的益处，那时谁有能力，谁就能真正赢得好名声。所以我考虑的是：我为社会好好服务的能力能否保持到那个时候？这需要朝气蓬勃和意气风发。可是我看到我现在已开始走进‘可敬的’作家的行列，也就是说，开始走进那些落在社会需要运动之后的老朽作家的行列。这是可悲的。但有什么办法呢？年纪大了。青春不再。我只能对那些比我年轻而有朝气的人感到羡慕”<sup>142</sup>。现在我们看到这种高尚的忧虑是会觉得奇怪的，因为我们知道，当車尔尼雪夫斯基说这番话时，他只有一年的自由生活好过了。上面所引的这一段话刊载在1861年的《同时代人》杂志七月号上，而在下一年的七月，他已被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了……但是，可以想见，这个人对他的敌人抱着多么轻蔑的态度，他虽然充分意识到自己比他们优越得多，可是却仍然认为他自己的文学功绩也没有多大的价值。的确，几乎《论战之花》的每一页都流露出对《同时代人》的责难者的冷酷的蔑视。特别是给《祖国纪事》的答复更充满这种蔑视。車尔尼雪夫斯基一点也不对来自《祖国纪事》方面的论敌生气。他几乎是在诚恳地开导他们，就像一位良师开导犯了过失的小学生一样。当然，一位良师在责备他的学生时，有时也向他谈一些非常沉痛的真理，并且丝毫不掩饰自己在智力方面对学生的优越性。但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学生的利益。車尔尼雪夫斯基也正是这样做的。他不忘记《祖国纪事》的任何一个错误和失策，并且像父亲似地责备编辑部不够机敏。他抱怨他们的，首先是他们在和他斗争时所抱的那种轻率的激昂情绪。他在指出他们对他的这种或那种责难都完全没有根据之后，一再向他们说，你们哪里能够同我进行论战。有时他直截了当地说，他

知道得比他們多得多，他对事物的理解比他們深刻得多，他們簡直不能夠評價他在文学方面所貫徹的新思想。杜德希金用其他杂志的話責备他厚顏无耻、不学无术，他向杜德希金說道：“您想知道我的知識多么淵博嗎？对这个問題我只能这样回答您：我要比您的知識淵博得不可比拟。您自己也知道这一点。那您为什么要在刊物上得到这样的答复呢？您把自己引到这上面来是不审慎的，确实是不审慎的。請您不要以为这是驕傲吧：知道得比您多得多，这有什么可以驕傲的！也不要以为我在想說您的知識太少。不，不是这个意思：您多少知道一些东西，并且一般地說您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不过您为什么論辯得这样糟呢？”<sup>143</sup>等等。如果这一切話不是絕對公正的，那末也許它們是过于尖刻的。

現在車尔尼雪夫斯基也不再寬恕他以前所尊敬的那些斯拉夫主义者了。現在这些人在他看来已經不是启蒙运动的真誠的朋友了。斯拉夫主义者的傾向到六十年代初期已經被人看得一清二楚，以致宁可把他們叫做蒙昧主义者。当然，他們仍旧为村社辯护和捍衛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但現在車尔尼雪夫斯基已經认为这没有什么意义了。在当时的斯拉夫主义著作中，除了保卫上述的这些原則以外，就只有反对腐朽而狡猾的西方的一些荒唐的敌对行为和一味地頌揚正教、专制制度以及俄国现实的其他諸如此类的独得之妙。于是車尔尼雪夫斯基决定要教訓他們一番。伊·阿克薩柯夫的《日报》<sup>144</sup>的出版成为这方面的导火綫，因为在《日报》的最初几期上曾經有过某些反对《同时代人》杂志的狂妄行为。車尔尼雪夫斯基在《人民的糊塗》<sup>145</sup>一文中作了回答。他解释他所选择的这个标题之所以粗野，是由于他深知斯拉夫主义者的論据，因此决定避免使用外来語，而外来語虽然不会在本质上改变这篇文章的标题，却会使它具有較斯文的形式。

車尔尼雪夫斯基永远是一个最热情的西欧主义者。即使对村社土地所有制的同情曾暂时在一定程度上使他接近斯拉夫主义者，他却总是清楚地理解他们关于西方的衰朽和关于人类借助于拜占廷的传说而复兴的議論是荒唐无稽的。还在《果戈里时期概观》中，他就談到了这一点，虽然說得很温和，但却說得很坚决。他认为斯拉夫主义作家发表关于西方的腐敗和西方哲学的破产的意見，其根源就在于：甚至他们之中的优秀分子也不了解西欧的真情实况和西欧的先进思潮。在車尔尼雪夫斯基看来，西方并不是虛弱的老人；相反，它是一个青年，而且是精神飽滿而富有朝气的青年，“他（通过它的先进思想家的嘴）說：我多少知道了一些东西，但我仍然需要学习許多东西，我仍然渴望更多的知識，并且学习得很有效……我还要作許多努力，才能保证自己持久地、不虞匱乏地生活；但是，我准备埋头苦干，我有足够的力量，請不要对我的未来感到絕望”<sup>①</sup>。在关于西欧前途的問題上，車尔尼雪夫斯基不仅与斯拉夫主义者有很大的分歧，这是显而易見的，而且甚至也与赫尔岑有很大的分歧。对赫尔岑來說，他和四十年代的莫斯科斯拉夫主义团体<sup>147</sup>的交往依然是有影响的：他往往表示忧虑，认为西方在提出社会主义思想以后，已經沒有力量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綱領了，正像古羅馬沒有力量来实现基督教的要求一样。不言而喻，由于西方的这种并不存在的軟弱无力，俄国就被想像为負有使命使衰頹的人类复兴的社会主义的天国。我們已經引证过的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論羅馬灭亡的原因》一文，很可能就是为了反对赫尔岑的这种观点而写的。作者在这篇文章里直截了当地說，同斯拉夫主义者那样的“怪人”爭論西方命运的問題是不值得的，他所以要

① 《同时代人》，1856年2月号，批評栏，第73—74頁146。

146

执笔为文，是为了其他具有人类理智的人。他向这些具有理智的人证明，西欧无论如何不可能已经耗尽它的力量，因为直到最近以前它的历史命运一直仅仅由一个等级，即贵族的活动所决定。甚至中间等级也只是在最近才在欧洲大陆取得统治地位。而在中间等级后面却还有下层阶级，这个阶级直到如今还没有对欧洲的命运发生过直接影响。卓尔尼雪夫斯基问道，有什么根据可以认为，这个新的等级在轮到它登上历史舞台以后，不能解决那些上层等级所不可能解决的社会任务呢？这样想是绝对没有任何根据的，从而为西方的命运担忧也是没有根据的。由于文明世界力量的巨大优势，害怕野蛮人重新光顾简直是可笑的。最后，在说到俄国及其所谓的复兴人类的使命的时候，卓尔尼雪夫斯基毫不留情地揭穿了这种爱国主义的自欺是毫无根据的。他认为村社土地所有制是我们社会生活的唯一值得肯定的特征。但是，在他的批评面前，连村社土地所有制也没有得到宽恕。根据卓尔尼雪夫斯基的意见，村社可能给俄国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一定的好处；但毕竟不能以它为骄傲，因为它是我们的经济落后的标志。卓尔尼雪夫斯基喜欢举例说明他的任何思想，在这里他也举例来说明他对俄国村社的见解。他说，欧洲的工程师现在利用应用力学来建造吊桥。可是在某一个——他自己也记不大清楚是哪一个——落后的亚洲国家里，当地的工程师早已在适于造吊桥的地方建造过吊桥。这是不是可以说，可以把亚洲的应用力学和欧洲的应用力学放在同一个水平上呢？桥与桥不同，亚洲工程师造的吊桥远比欧洲的吊桥落后。当然，当欧洲技师出现在早已熟悉吊桥的亚洲国家时，他们会比较容易使某个官吏确信最新式的吊桥不是褻瀆神灵的詭計。但也仅仅如此而已。尽管亚洲国家有自己的吊桥，它仍然是落后国家，而欧洲仍然是它的老师。俄国村社也是这样。可能，它对我们祖国的

发展有帮助；但是发展的主要动力还是来自西方，至于要复兴人类，即使我們有村社的帮助，也仍然是談不到的。

但是，斯拉夫主义的“怪人”却不仅叫嚷要用俄罗斯一拜占廷精神复兴欧洲，而且提出了这种复兴的实际綱領。按照伊·阿克薩柯夫的《日报》的意見，俄国应当先贈予斯拉夫人以“在俄罗斯双头鷹羽翼庇护下独立生活的礼品”<sup>148</sup>。車尔尼雪夫斯基证明說，这种思想只不过是“人民的糊塗”的产物。第一，他觉得强大的俄罗斯双头鷹有很多自己的內务，不管为了哪一种复兴，他都不應該忘記这些內务。他說：“如果您希望发动战争，那末請考虑一下，我們的情况是否允許我們想到战争。”第二，他认为我們的武装干涉会使所有的西方强国都武装起来反对斯拉夫人的解放：“要知道欧洲的土耳其人只有二百万，而斯拉夫人却有七百万或八百万。难道他們真的不能战胜土耳其人嗎？……他們所需要的只是确信其他强国不会阻撓他們的解放。”如果斯拉夫主义者确实希望土耳其統治下的斯拉夫人得到幸福，那末他們就应竭力使西方强国相信，欧洲的上耳其政权的崩潰不会使俄国吞并多瑙河諸公国，也不会使君士坦丁堡变成俄国的一个省城。如果斯拉夫主义者做到了这一点，那末即使沒有我們的援助，土耳其統治下的斯拉夫人也会得到解放。对于奥地利統治下的斯拉夫人也可以这样說。“假如德国人不是耽心在奥地利帝国崩潰时它的东半部会落入俄国的統治之下，难道他們真的会好意地支持奥地利嗎？”<sup>149</sup>車尔尼雪夫斯基对《日报》編輯部說，你們是在唆使德国人反对奥地利統治下的斯拉夫人的解放。他接着补充說，《日报》編輯部的战争热情不是由于同情斯拉夫人而引起的，而是由于企图使斯拉夫人各部落受俄国統治而引起的。

車尔尼雪夫斯基还順便駁斥了斯拉夫主义者关于西方对俄国

抱着阴险恶毒态度的高谈阔论。他说，得了吧，难道欧洲所有的重要报刊不是都对俄国的一些最重要的改革表示很大同情吗？难道对俄国社会生活的成就表示同情是希望俄国遭到不幸吗？

在下一年，車尔尼雪夫斯基不得不更激烈地反对斯拉夫主义者。斯拉夫派的首脑人物起了一个奇怪的念头，想对塞尔维亚人作一些极其幼稚的说教。这些说教包含在《致塞尔维亚人。来自莫斯科的书信》这本小册子里，斯拉夫派的全部卓越的代表人物都在这本小册子上签了名。这本小册子所包含的某些思想简直是可笑的，而另一些思想则不仅可笑，而且极其反动。例如，斯拉夫主义者劝告塞尔维亚人不要给予不信正教的人以政治权利。車尔尼雪夫斯基用一篇辛辣的文章《冒充的老前辈》<sup>150</sup>回答了这部《书信》。

关于某些斯拉夫部落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争论，也被牵扯到关于俄国与一般斯拉夫人的关系的争论中去了。大家都知道，斯拉夫主义者对加里西亚的乌克兰人反对波兰人的斗争极为赞赏。車尔尼雪夫斯基一直是同情小俄罗斯人的。他认为别林斯基对于新生的小俄罗斯文学采取否定态度是一个大错误。他在1861年1月号的《同时代人》杂志上为小俄罗斯的刊物《基础》<sup>151</sup>的出版写了一篇充满同情的文章。但是对于加里西亚的乌克兰人反对波兰人的斗争，他却不能抱绝对赞同的态度。首先，他不满意乌克兰人从维也纳政府方面寻求支持。其次，他不满意僧侣在加里西亚的乌克兰人的运动中得势。他写道：“世俗的事要由世俗的人来管。”最后，車尔尼雪夫斯基也不满意那些在他看来首先是经济性质的问题，被当成是纯粹民族性质的问题。在针对李沃夫的《言语》所写的《民族的不策略》一文（《同时代人》，1861年7月号）中，車尔尼雪夫斯基尖锐地抨击了这个刊物的过火的民族主义。他写道：“很



可能,如果更精細地研究一下活生生的关系,李沃夫的《言語》会看到,事情的根源是与部落問題毫不相干的等級問題。很可能,無論站在哪一方面,它会看見烏克蘭人和波兰人都是一些部落不同而社会地位相同的人。我們不能設想波兰农民会反对減輕烏克蘭农民的賦稅以及改善烏克蘭农民的生活。我們不能設想,在这件事情上烏克蘭部落的地主和波兰地主的感覺会有很大的差別。假如我們沒有看錯,那末加里西亞問題的根源是等級关系,而不是部落关系”<sup>152</sup>。

奥地利各部族的相互仇視,在車尔尼雪夫斯基看来尤其是不策略的,因为維也納政府照例要从这里获得許多好处。他在刊載《民族的不策略》一文的那一期《同时代人》的政治評論里写道:“只要好好地想一想,就不会对奥地利帝国的长期存在感到奇怪了;它境內的各民族既然在政治上如此讲究策略,它又怎样会不巩固呢?”<sup>153</sup>車尔尼雪夫斯基觉得奥地利的德意志人、捷克人、克罗地亚人,以及加里西亞的烏克蘭人(像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都是“不机灵的”。他担心在1848—1849年特別經過試驗的斯拉夫人的“不机灵”又要大为发展起来。六十年代初,匈牙利对維也納的反动集权分子进行了頑强的斗争。匈牙利人的不滿情緒竟发展到国内一时可能爆发革命的程度。我們的作者在自己的政治評論中不止一次地表示担心:在匈牙利爆发革命运动时,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又将成爲反动派的馴服工具。奥地利的許多斯拉夫部落当时所采取的策略,只能使人加深这种顾虑,因为奥地利的斯拉夫人是頗以他們在1848—1849年事件中所起的可耻作用自負的。車尔尼雪夫斯基在严厉指責这种策略时指出,如果他們反过来支持維也納政府的敌人,这对他們会更有利,因为这些人会对他們做出极重大的让步。他是針對克罗地亚人和匈牙利人的关系讲到这一点的,

他对加里西亚的乌克兰人又重复了这一点。我们在《民族的不策略》一文中读到：“仇视加里西亚乌克兰人的、等级的党派现在准备让步……关于这一点李沃夫的《言语》倒不妨考虑一下；可能，这些在它看来是仇敌的人所真心诚意准备做出的让步，也许大到完全可以使乌克兰农民满意；至少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即：这些让步比乌克兰农民能够从奥地利人那里获得的一切要多得多、重要得多”<sup>154</sup>。

最后，当车尔尼雪夫斯基同《言语》进行论战的时候，在俄属波兰也发生了强大的政治运动，他对这种政治运动表示很大的同情。仅仅由于这一点，哈布斯堡王室的俄罗斯臣民反对波兰人的乖常行为，在他看来就不可能是合乎策略的和适时的。

在彼得堡也有波兰革命组织的分支，而车尔尼雪夫斯基差不多一直住在彼得堡。他和波兰革命家是否有任何确定的、正式的关系呢？目前还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说明这一点。很可能，那个时代的波兰历史学家能够帮助解释这个问题。由于极易理解的原因，我们决不能对俄国著作界抱任何期望。大概，将来会有某种《俄国往事》出来说话，但这样的刊物还不会很快就出现。我们不愿意猜测，因此我们只能用可以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中得到的材料，来阐明他对波兰事件的一般的同情。但就是这样的材料也不多。

在这里，我们可以完全不涉及小说《序幕的序幕》。这部小说描写了伏尔庚（车尔尼雪夫斯基）和索柯洛夫斯基（谢拉科夫斯基）的友谊关系。伏尔庚喜欢索柯洛夫斯基无限忠于自己的信念，不狭隘自私，既有真正的鼓动家的激情，又善于克制自己。伏尔庚称他为真正的人，认为我们的自由派可以从他那里学到许多东西。这一切都很引人注意，但却丝毫不能说明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波

兰问题的实际态度，因为在这部小说中一句也没有谈到波兰问题<sup>155</sup>。从我们的作者发表在经过书报检查的《同时代人》杂志上的文章中，只能看到他在有机会时总是替波兰讲话。他甚至在俄国官方作家攻击古老的波兰国家制度时维护这种制度，尽管他因持有民主观点而不可能对这种制度表示强烈同情。但是，他赞扬这种制度的社会关系的某些方面，而他在自己较早时期所写的文章里却认为这些方面是没有价值的。我们已经知道，在《法国的党派斗争》一文中，他对政治形式表现出完全漠不关心的态度。当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1858年），他认为民主主义者所不能容忍的仅仅是贵族政治，在他看来，尽管英国有政治自由，但民主主义者却宁肯喜欢西伯利亚，而不喜欢英国，因为在西伯利亚，“平民”似乎生活得比英国更好些。现在，車尔尼雪夫斯基对政治制度问题的看法完全不同了。波兰的古老生活方式以它的政治自由引起他的注意。他在评论当时刚刚出版的《西南俄罗斯档案》第二部时说道：“波兰没有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它力求实现与其他强国（当然，这里指的是莫斯科国家）所建成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另一种社会制度，——这种制度的基础不是个人对体现权力意志的国家这个抽象观念做出牺牲，而是自由的个人为了相互的幸福而达成协议……在这里，社会事业是社会思想的结果；在这里，概念和信念的永恒斗争从思想和言论的领域直接转为生活的表现。”即使波兰社会完全是贵族式的，“但享有特权的人的范围却能够越来越扩大，而把被人忘却的、被遗弃的、丧失任何权利的人民群众都包括进去，假如国家这个概念变得更广泛一些，而发展成为不受暂时限制其完美性的偏见所约束的全人类观念的话”<sup>①</sup>。甚至波兰的民主

<sup>①</sup> 《同时代人》，1861年4月号，新书栏，第443页以下156。

派也没有经常达到这样热中于维护波兰古老生活方式的程度。要知道，全部问题就在于：怎样才能使波兰的显贵们承认“全人类观念”。

在关于立陶宛大公国与波兰合并的历史后果问题上，車尔尼雪夫斯基也同我们的官方历史学家有很大的分歧。“难道罗斯在奥尔格尔德家族、留巴尔特家族、斯基里盖洛家族、斯維德利盖洛家族统治时期的状况，真的比十六和十七世纪西吉兹蒙特王朝统治下更好一些吗？”——他在回答那些把同波兰合并看作俄国西部一切坏现象的唯一原因的历史学家时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151 “现在是我們停止片面地、不公正地对待波兰的时候了，——他继续說，——至少我們要承认它对罗斯的有益影响，哪怕是有关教育方面的影响。我們就拿同波兰合并的俄罗斯世界的那些地区的智力教育程度为例，把它同我們全俄罗斯祖国的始終独立发展的地区（即莫斯科国家）的教育情况比較一下。教育不是从小俄罗斯进入十七世纪的莫斯科的吗？它不是为我們以后的一切教育作了准备吗？它不是在波兰的影响下才在小俄罗斯发展起来的吗？”

按照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意见，俄国西部的波兰化也不应归咎于波兰人。俄国西部的上层阶级既有权利、也有办法来保卫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语言，并把自己的人民从屈辱中拯救出来，而这些人民正是被上层阶级自己所奴役的。如果俄国西部的贵族完全波兰化了，那末这应该归咎于这些贵族，而且只应归咎于他们。我們的作者指出：“自己不能保全自己，——这就不能把自己的罪推给别人”<sup>157</sup>。

### +①

随着俄国急进党派的情绪高涨，波兰社会的革命情绪也高涨

起来。青年学生风潮迭起，秘密团体相继成立，它們印发革命的綱領和宣言，盼望那些不滿于“非真正的自由”<sup>158</sup>的农民举行起义。我們看到，車尔尼雪夫斯基本人是相信这种起义可能爆发的；遺憾的是，我們有关他和俄国当时秘密团体的关系問題知道得很少，正像有关他和波兰的組織的关系問題知道得很少一样。在这里，我們也只能談談車尔尼雪夫斯基在发表于《同时代人》杂志上的文章里用隱語和暗示所表現出来的情緒。毫无疑问，这种情緒变得越来越革命化。車尔尼雪夫斯基曾經认为，向政府說明农民的解放对政府本身有利，是可能而且有益的，而現在却不想再对政府說什么了。他正确地认为，同政府的任何勾結，对政府的任何期望，都是最有害的自欺。車尔尼雪夫斯基在針对科尔夫男爵所著《斯伯兰斯基伯爵的生平》一书的出版而写的《俄国的改革家》一文中詳細地論证說，在我国，任何改革家在重大的社会改革問題上都不能对政府有所期望。革命者則更不能对政府有所期望。敌人把斯伯兰斯基叫做革命者，但是，对他的这种評論使車尔尼雪夫斯基觉得可笑。斯伯兰斯基的确有一个很广泛的改革計劃，但是“根据斯伯兰斯基想用来实现自己計劃的那些手段的范围來說，把他叫做革命者是可笑的”。他唯一的依靠，就是他取得了亚历山大皇帝的信任。他想依靠这种信任来实现自己的改革。正因为这个緣故，車尔尼雪夫斯基才把他看成是有害的幻想家。幻想家往往只是可笑的，而他們的自欺也是不足道的，但是，“当他們在重大問題上自欺的时候，他們就可能危害社会。他們在錯誤的道路上狂热地奔走忙碌时似乎获得了某种成功，从而把許多人引入迷途，因为这些人根据这种臆造的成功也想走同一条錯誤的道路。从这方面來說，可

152

① [參閱后面第 119 頁为德文版所写的这一章的不同的起首。]

以认为斯伯兰斯基的活动是有害的”<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向青年暗示必须采取革命的行动方式，同时他也向青年说明，一个革命者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往往不得不处于追求纯个人目标的正直的人所永远不许自己陷入的那种境地。例如，早在1861年1月，車尔尼雪夫斯基在分析美国经济学家凯里的一本书的时候，出人意料地转而谈到著名的犹太女英雄犹滴，并且热烈地为她的行为辩护<sup>160</sup>。我们的作者指出：“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时而尘土飞扬，时而泥濘难行，时而沼泽遍地，时而丛莽密布的荒野中通过的。谁怕满身尘土，沾污靴子，他就不要从事社会活动。对于那些真正关心人们的福利的人来说，社会活动是高尚的事业，但不是完全一尘不染的事业。的确，对于道德的纯洁可以有种种不同的理解：例如，有的人可能认为犹滴并没有沾污自己……只要扩大你们的思考范围，你们就会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承担起一种义务，这种义务是和孤立地提出同样一些问题时所应承担的义务不同的”<sup>161</sup>。

在对俄国政府的态度上，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口气是越来越带  
153 挑衅性了。六十年代初，政府曾决定稍微放松书报检查的限制。决定制定新的书报检查条例，并允许出版物对出版物的自制问题发表意见。車尔尼雪夫斯基毫不迟疑地对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的看法和一般自由派的观点很不一致。的确，車尔尼雪夫斯基尖刻地嘲笑了一些人，这些人认为印刷机像颠茄、硫酸和雷酸银等等一样具有某种独特的作用。“我个人并不指望那些无力制造灾难的物体和行动会产生出违反本性的有害的结果。我们觉得，对于造成社会灾难来说，印刷机还太软弱无力。因为它既没有

<sup>①</sup> 《同时代人》，1861年10月号，俄国文学栏，第249--250页159。

那么多的油墨可以涌出来淹没全国，也没有那么有力的弹簧可以弹出来，打在铅字上，把铅字像榴霰弹一样发射出去”<sup>162</sup>。但車尔尼雪夫斯基承认，在某些时代出版物对于一国政府的危险性并不比霰弹小。这指的是这样的时代，这时政府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背道而驰，而革命的爆发又正在逼近。处于这种状况下的政府有一切理由压制出版物，因为和其他社会力量一样，出版物也可以促使这个政府垮台。本世纪经常更替的法国政府几乎都是处在这种状况中。車尔尼雪夫斯基非常详尽而冷静地叙述这一切。文章通篇没有片言只语谈到俄国政府。但在文章结束时車尔尼雪夫斯基突然问读者：“可是，假如出版法在我国的确是需要的，那又会怎样呢？那时我们又像以往许多次一样，被指责为蒙昧主义者、进步的敌人、自由的仇敌、专制制度的颂扬者等等。”因此他不想研究专门的出版法在我国是否需要的問題。他说道：“我们担心认真的研究会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答案：是的，它是需要的”<sup>①</sup>。結論很清楚：出版法之所以需要，因为俄国已进入了自己发展中的革命时期。

就在那份刊登我们刚才引证过的文章的三月号《同时代人》杂志上，还发表了一篇针对1861年有名的大学学潮<sup>164</sup>而写的论战性的短评：《学会了嗎？》。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这篇短评中为大学生辩护，驳斥了我们的“卫道者”说大学生不愿意学习的指责，并且顺便说出了许多对政府来说是辛辣的真理。一个匿名作者在《圣彼得堡科学院通报》上以《学习还是不学习？》为题发表的一篇文章，是引起这场论战的近因。車尔尼雪夫斯基回答说，这个问题对大学生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们总是愿意学习的，但是大学里的清规戒律却妨碍他们学习。根据我国的法律，大学生已经到了可以

154

① 《同时代人》，1862年3月号，《法国有关出版事业的法律》一文<sup>163</sup>。

結婚、担任国家机关的职务和“任军队指挥官”的年龄，可是大学的校规却还把他們当幼童看待。他們提出抗議，这是不足为奇的。甚至一些完全没有害处的組織，如在大部分学生缺乏物质保障的情况下无疑是必需的互助会，也被禁止。大学生不能不反抗这种制度，因为这里問題关系到“面包和能否听课。而面包和听课的可能却被剥夺了”。車尔尼雪夫斯基直截了当地說，制定大学校规的人正是想使考进大学的大部分人沒有学习的可能。“如果該文作者或他的同道认为有必要证明，在制定这些校规时絲毫沒有考虑这种目的，那就請他們把制定校规的那些會議的有关文件公布出来吧！”<sup>165</sup>

《学习还是不学习？》一文的匿名作者不仅指責大学生，而且还指責整个俄国社会不願学习。車尔尼雪夫斯基就利用这一点把关于大学里的学潮的爭論引到更广泛的基础上。他的論敌也承认俄国社会有着希望学习的某些征象。他认为我国“几百种”新杂志、“几十所”星期学校就是这一点的证明。車尔尼雪夫斯基不胜感喟地說：“几百种新杂志，作者是从哪里計算出来的呢？的确需要有一百种新杂志。可是这位作者是否願意知道，为什么不能像需要的那样創辦出几百种新杂志呢？这是因为，在我国的书报检查的条件下，除了几个大城市以外，別的地方都不可能存在稍微有生气的期刊。本来每个富裕的商业城市都需要有几种哪怕篇幅不大的报纸；每个省都应该出版几份地方小报。但这样的报刊却沒有，因为它们不能存在……几十所星期学校……这倒不像几百种新杂志那样夸大，在拥有六千多万人口的帝国里的确被认为只有几十所星期学校。可是这种学校本来应该有几万所，应该尽快在不久之后确实建立几万所，在目前就起碼要有几千所。为什么它們只有几十所呢？因为它们受到怀疑、排挤和束縛，因而連其中最热心于



教育事业的人也失去了教学的愿望。”

經卓尔尼雪夫斯基分析过的这篇論文的作者以存在有“几百种”新杂志和“几十所”星期学校为根据，說明社会有希望学习的表面征象，但他接着就赶紧补充說，这种征象是虛假的。他忧郁地說：“听一听大街上的叫喊声吧，人們在議論那里发生了某某事情，这时你就不由得要垂头丧气、非常扫兴了……”。卓尔尼雪夫斯基反駁道：“請問作者先生，您在大街上听到了什么叫喊声？如果是巡警和警官的叫喊声那末我們也听到了。您讲的是不是就是这些叫喊声？人們在議論那里发生了某某事情……——能举个例子來說明发生了什么事嗎？不是那里发生了盗窃就是这里逾越了职权，不是那里压迫弱者，就是这里纵容强者，——关于这一切，人們正在議論紛紛。实际上正是由于这些人人都听得到的喊叫，由于这些日常的議論，才不由得使人垂头丧气、非常扫兴……”<sup>166</sup>。

这个指責大学生的人无中生有地攻击他們不能容忍別人的意見，指責他們在抗議时使用了哨子、烂苹果和其他类似的“街头武器”。卓尔尼雪夫斯基反駁他說：“被用做街头武器的不是哨子和烂苹果，而是刺刀、枪托和軍刀”。他建議对方回想一下，“是大学生使用这些街头武器来对付別人，还是別人使用这些武器来对付大学生……以及有沒有必要使用这些武器来对付大学生”<sup>167</sup>。

卓尔尼雪夫斯基的这种文章对俄国学生界会造成什么样的印象，这是不言而喻的。后来在六十年代末又发生学潮时，《学会了嗎？》这篇短文被看作是对学生的正义要求的最好的辯护而在大学生的集会上被誦讀。同样，我們的最高当局会如何对付这种挑战性的文章，这也是不言而喻的。在最高当局看来，这位伟大作家对青年学生的“危險”影响是越来越无可怀疑了。

除了刊物方面的日常工作以外，卓尔尼雪夫斯基还热心地宣

156 传他的世界观的基本理論原理。同当时俄国庸俗經濟学的代表进行的論战向他表明，俄国有教养社会中的經濟学知識是多么貧乏。他决定补救这个缺陷，着手进行穆勒著作的翻譯和注释工作。他的許多經濟学論文都是在两年時間内（1860—1861年）发表在《同时代人》杂志上的。我們已經談过我們对車尔尼雪夫斯基所特有的經濟学研究方法的想法。在專門討論这个問題的 第二篇論文中，我們將詳細地分析我們这位作者的經濟学說<sup>168</sup>。因此，現在我們仅限于提出下面这个意見。我們决不能认为，选择穆勒的书作为在俄国讀者中間传播正确的政治經濟学观点的教材，是做得成功的。穆勒的經濟学观点是这样地模糊和不彻底，尽管車尔尼雪夫斯基作了許多修正和补充，在讀者头脑中还是絲毫不能留下明晰的經濟学概念。有时車尔尼雪夫斯基本人也显然受到了穆勒所特有的“混合主义”<sup>169</sup>的影响。車尔尼雪夫斯基急于要用健全的“理論”观点去批判現存的社会关系，因而不加分析地<sup>170</sup>接受了穆勒的某些观点，但即使当时的科学也远不能承认这些观点是正确的。有些地方似乎車尔尼雪夫斯基本人也贊同这些錯誤的概念<sup>171</sup>。但現在我們不去詳細地談論。

車尔尼雪夫斯基本来可以在当时西欧經濟学界找到一些更值得注意得多的作家。在关于劳动和資本的关系問題上，洛貝尔图斯比起穆勒来是一个真正的巨人。在其他方面，翻譯李嘉图的著作并对它作一些注释和补充，会更有益些。甚至学識淵博的讀者也能从李嘉图学习到某种东西，可是在穆勒的影响下，甚至学識淵博的讀者也会被弄得糊里糊塗。后来当車尔尼雪夫斯基为穆勒的著作所写的注释和补充被查禁，而只有該书譯文可以发售的时候，这个終身力求脚踩两只船的人对我国讀者的有害影响就特別明显了。俄国讀者既然是从穆勒那里吸取他們的經濟学概念，因此就

可以說，他們完全沒有任何經濟學概念。

差不多在普及穆勒學說的同时，車尔尼雪夫斯基还把施洛塞尔的著作譯成了俄文，这是他很喜爱的并且确实也是很值得尊敬的一位历史学家。

## 十一

那时車尔尼雪夫斯基大約三十五岁。他正处在智力充分发展的时候，他本来可以达到怎样高的成就啊！然而他可以自由生活的時間却剩下不多了。他是急进党派的公认的領袖，是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公开宣传者。人們把他看成是革命青年的“魁首”，革命青年的一切发动和风潮被算做他的罪名。正如在这种情况下常常会发生的那樣，傳說夸大了事实，甚至把一些車尔尼雪夫斯基从未有过的意图和行动也加在他的头上了。車尔尼雪夫斯基自己在《序幕的序幕》中描写了在彼得堡流行的那些好意的自由派的謠传，說伏尔庚（就是他本人）似乎和伦敦的俄国流亡者小組有联系。这些謠传是根据一些与政治完全无关的小事情而产生的。而且事情还不只限于謠言。“卫道的”报刊早就对車尔尼雪夫斯基进行了文字上的告密。1862年《同时代人》被勒令暂时停刊。此后又出現了非文字上的告密。在車尔尼雪夫斯基案件的起訴书中写道：“樞密院第三厅主管人接到匿名信一封，敦促政府警惕車尔尼雪夫斯基‘这个青年的魁首、狡詐的社会主义者’；他自称永不会被揭破；人們称他为害人的煽动分子，并請求替他們除去这个禍害；車尔尼雪夫斯基的一切故友看到他的傾向已逾越于言論之外而見諸行动，于是自由派都对他疏远了。来信人写道，若不除去車尔尼雪夫斯基，必将招来不幸和流血；这是一伙瘋狂的煽动分子——亡命之徒……人們可能会消灭他們，然而为他們却将洒下多少无辜的

鮮血……在沃龙涅什、薩拉托夫、唐波夫——到处都有这类社会主义者的委员会，他们到处蛊惑青年……请将車尔尼雪夫斯基随便打发到什么地方去吧，但要迅速剥夺他活动的可能……。请拯救我们吧，别让車尔尼雪夫斯基扰乱普遍的安宁吧”<sup>172</sup>。

1862年7月7日，車尔尼雪夫斯基被捕。因为，用告密者的话来说，他自称永不会被揭破，所以第三厅的蓝衣騎士們就急忙伪造假的罪证。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案件是怎样审理的，从下面这一点就能看出，即檢察官甚至在起訴书中都恬不知耻地引证匿名告密者的来信，而俄国法律却规定：“不得根据匿名毁谤书和密投信件的公告进行偵訊”（《俄罗斯帝国法典》，1857年版，第15卷，《刑法》第2部，第52頁）。尚在逮捕車尔尼雪夫斯基之前，就先抓了某个叫維托希金的人<sup>173</sup>，据说从他那里搜到了赫尔岑給謝尔諾—索洛維也維奇的一封信，信中据说有这样一句附言：“我們打算在这里或在日内瓦和車尔尼雪夫斯基一起出版《同时代人》杂志。”根据这句附言就逮捕了車尔尼雪夫斯基。但是，赫尔岑在《钟声》杂志第158 193期上却断言，他在信上連一句話也沒有談到过他和車尔尼雪夫斯基一起进行文学活动的計劃。“我从来没有和車尔尼雪夫斯基通过信。我不可能写信說，我們打算和他一起出版《同时代人》杂志，因为沒有一点消息說明他是否想在俄国国外出版《同时代人》杂志……禁止《同时代人》杂志出版是在报上宣布的，我們立刻大声公开地向《同时代人》的出版人建議由我們在国外負責印刷这份杂志。我們的建議从来也沒有得到絲毫的答复。我怎么能够肯定地写到这一点，而且把信寄往俄国呢？我如果做了这种事，那我岂不是在替秘密警察服务？”<sup>174</sup>但是，什么时候俄国政府的卖力的奴僕才会停止撒謊和捏造呢？在搜查車尔尼雪夫斯基的住宅时，找到了几份什么都不能证明的文件和书信，把当时已經人所共知的告

密者如符謝沃洛德·柯斯托馬罗夫之流都拉到这个案件中来，并且甚至抄走了被告的日記。順便提一下，他早在結婚之前就曾在日記中写道：“他每天都可能被捕”，——現在終于制造了这个案件。車尔尼雪夫斯基被交付樞密院法庭审判，他的罪名是：(1) 与赫尔岑有来往；(2) 写作煽动性的传单《告地主农民书》，这份传单据說是交給告密人柯斯托馬罗夫去印刷的<sup>175</sup>；(3) 准备举行暴动。有趣的是，“准备举行暴动”的唯一证据是柯斯托馬罗夫所弄到的給某个阿历克賽·尼古拉也維奇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极其含糊地說，不可失去时机，“要末就是現在，要末永远不搞”，并說那个身分不明的阿历克賽·尼古拉也維奇缺乏毅力。車尔尼雪夫斯基坚决否认这封信是他写的，但即使假定这封信是他写的，那末根据这封信也只能证明他是在参与創辦一个秘密印刷所。“您用自己的印刷机领导我們已經快一年了，現在已經到了这样的时刻，假如要想使我們的事业取得胜利，我們就不能再拖延下去了。”这封信中說的是什么事，——这是完全不知道的。的确，在信中提到印刷某一个宣言，但要知道并不是任何宣言都是“准备暴动的”。甚至第三厅的法律家也似乎應該知道，創辦秘密印刷所和印发宣言离开准备暴动还很远。当然，他們也是知道这一点的。但是，他們却更清楚地知道，車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巨大的、无可代替的革命力量。

认为車尔尼雪夫斯基属于某个革命团体这种推測，并不是不可能的。相反，这种推測甚至是完全可能的<sup>176</sup>。但是，在文明世界159里什么地方能把可能性看作法律上的罪证呢？除了俄国以外，沒有其他地方，而且就是在俄国，也只有在政治案件中才有这种做法。

順便提一下，下面这个事实也說明檢察官对車尔尼雪夫斯基

案件的罪证的审查很潦草。起诉书援引了被告已经被关进要塞后写给妻子的信。他在这封信中说，“我们的生命是属于历史的，几百年后，我们的名字还会使人们感到亲切；虽然到那时候我们的同时代人已经不在世上，但人们还会怀着感激的心情回想起我们的名字。”除了这些明显地表明“准备举行暴动”的话以外，起诉书还从同一封信中援引了下面这几句话。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向妻子谈到他打算编写《知识和生活的百科全书》时写道：“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以来，还没有任何人做过我想做的事，我将在多少世纪内成为人们的好老师，就像亚里士多德一样”<sup>177</sup>。这几句话证明什么呢？起诉书的起草者为什么要援引这些话呢？这是明显的事实！准备出版百科全书的人，完全是在准备举行“暴动”！

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案件的审讯拖了将近二年。他倔强地否认加到他身上的罪名，并且看来他希望很快就能挣脱俄国老鹰的魔爪。他打算出版《百科全书》就说明他抱有这种希望。他已经被监禁后写成的小说《怎么办？》，也充满了最光明的希望。但是，在这部小说里，这种希望并不是寄托在因缺乏罪证而不可能判罪这种法律上的考虑上面，而是寄托在俄国解放运动的迅速胜利上面。在这部小说中常常可以看到这种胜利已经逼近的暗示。在尾声中甚至还有某些关于1866年（小说是在1864年4月写成的<sup>178</sup>）的含糊的暗示，说那一年必然会在俄国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在这部小说的最后一些场面中出现的一位太太，本来为了显然关在监狱中或被流放的亲人穿着丧服，到1866年，却已伴同她的获释的朋友愉快地和欢乐地在彼得堡大街上游逛了。当然，我们只能猜测作者想用这个情节来说些什么。

十二<sup>①</sup>

我們將不去敘述《怎么办？》的內容。誰沒有讀過和反復讀過這部著名的作品呢？誰沒有迷戀過它，在它的良好的影響下變得  
160  
更純潔、更好、更有朝氣和更勇敢呢？誰沒有被主人公們的道德上的純潔所感動呢？在讀了這部小說之後，誰不思考自己的生活、不  
對自己的志趣和傾向加以嚴格的檢查呢？我們全都從這部小說中  
汲取了精神力量 and 對美好未來的信心，

以及對無私的勞動的

偉大信託……179

我們的蒙昧主義者曾不止一次地指出這部小說缺乏藝術價值，指出它帶有明顯的傾向性。從表面上來看，這些指責是公正的：這部小說確實很有傾向性，它的藝術價值很少。但是讓他們向我們舉出哪怕一部最出色的、真正富有藝術性的俄國文學作品，它在對國家的精神和思想發展的影響上能夠與《怎么办？》這部小說相匹敵吧！誰都舉不出這樣的作品來，因為它過去沒有，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有。自從俄國有印刷機以來直到如今，在俄國還沒有一部印刷出來的作品取得像《怎么办？》那樣的成功。既然如此，就讓他們去指出作者的傾向性吧，就讓他們去重復說他不是藝術家吧！讀者有充分理由向你們指出，他們毫不關心這一點，任何小說除了枯燥無味的以外都是好的，——而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說則使讀者感到喜悅，而不是使他們感到無味；這對一部小說來說已經完全足夠了。最後，蒙昧主義者先生們，要知道你們在自己的文學作品中也並不迴避傾向性。你們也並不反對寫帶有傾向性的長篇

① [參閱後面第152頁為德文版所寫的這一章的不同的起首。]

小說或中篇小說。全部不幸是在于：誰也不讀你們的帶有傾向性的作品，誰也不对这种作品感到兴趣。你們认为这种差别是从哪里产生的呢？难道这种差别不是說明，傾向各有不同，而有一些傾向絲毫不会妨碍具有这些傾向的作品获得成功嗎？

《怎么办？》获得空前巨大的成功的秘密在哪里呢？正是在于它的傾向的性质，在于它完全及时地在我国传播了作者所表述过的思想。这些思想本身并不是新的，这些思想完全是車尔尼雪夫斯基取自西欧文学的。法国的乔治·桑在他以前就宣传过男女之間自由的、主要是真摯的、誠实的爱情关系<sup>①</sup>。卢克莱茨亚·弗洛里安妮<sup>180</sup>在爱情方面所提的道德要求和薇拉·巴夫洛芙娜所提的沒有任何区别。乔治·桑的思想早在四十年代就在我們这里得到极其热烈的共鳴。別林斯基就是这位女作家的热情崇拜者。他在自己的文章里曾屡次引证她对爱情关系中的自由和真誠的看法。大家都知道，他曾經怎样責备普希金笔下的塔吉婭娜，她爱奥涅金，同时却又“委身于別人”，违背着自己的心願，繼續和她所不爱的老丈夫生活在一起。“四十年代人”中間的优秀人物，在对妇女的关系上都遵循着罗普霍夫和吉尔沙諾夫<sup>181</sup>所遵循的那些原則。但在小說《怎么办？》出現以前，这些原則只有少数“突出人物”贊同，广大的公众是完全不了解的。甚至赫尔岑在自己的小說《誰的罪过？》里也未敢充分地、明确地說出这些原則。随着《怎么办？》的出版，問題被最清楚而尖銳地提出来了。再沒有任何怀疑的余地了。有头脑的人只能这样选择：要不就是在爱情方面遵循罗普霍夫和吉尔沙諾

---

<sup>①</sup> 順便指出，歌德的《Wahlverwandschaften》（《亲和力》）和他的某些剧本，也是支持自由恋爱的。許多德国文学史家对于这一点都知道得很清楚，他們既不敢非难这样一位有声望的作家，同时又因为他們的庸夫俗子的品行而不敢同意他，一般只是吞吞吐吐地說些含混不清的东西，說这位伟大的德国人似乎有些奇談怪論。



夫的原則；要不就是屈从婚姻的神圣性，当他們心灵中萌发新的感情时，就采用旧的行之有效的秘密偷情办法；要不就是由于自己已属于另一个自己并不愛的人而把自己的任何爱情完全抑制下去。究竟采用什么方法，必須由他們完全自觉地进行选择。車尔尼雪夫斯基把这个問題解释得这样透彻，以致过去在爱情关系方面的那种自然的輕率和天真已变成完全不可能的了。意識的控制扩及爱情方面，男女关系上的自觉观点已为广大公众所接受。这在六十年代对我们特別重要。俄国所經歷的改革不仅使我們的社会关系，而且使家庭关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一片黑暗的角落，现在也射进了亮光。俄国人不得不反躬自省，用清醒的眼光看一看自己对亲近的人，对社会和家庭的关系。在家庭关系方面，在爱情和友誼方面，一个新的因素开始起重大作用，这就是信念，它在过去只为极少数“理想主义者”所具有。信念的不同成了突然决裂的原因。一个“委身于”著名人物的女子往往会惊讶地发现，她的合法的“占有者”原来是个蒙昧主义者、貪污分子、在上司面前阿諛逢迎的小人。一个男人过去曾愉快地“占有”一个漂亮的妻子，但出乎他的意料她接触了新的思潮，于是他就常常失望地看到，他这迷人的玩物所关心的却完全不是“新人物”和“新观点”，而是新的服飾和舞蹈，以及丈夫的官銜和薪俸。一切解释和規劝都是徒劳的，只要丈夫稍微透露一下他“乐于服务”，但却“厌恶奉承”<sup>182</sup>，美人馬上就会变成真正的泼妇。如何是好？怎么办？这部著名的小說指明了应该怎么办。在它的影响下，过去认为自己是别人的合法财产的人，也开始同它的作者一起重复地說：啊，卑鄙！啊，卑鄙！誰敢占有一个人！——在他們心中，人类尊嚴的意識已經觉醒了，他們往往在經過极共激烈的內心的和家庭的波瀾之后变得坚强起来，按照自己的信念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并且自觉地走向合

理的人类的目标。仅仅由于这一点就已经可以说，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名字是属于历史的，他的名字将使人们感到亲切，而当那些亲自认识这位伟大的俄国启蒙运动者的人都已去世的时候，人们还会怀着感激的心情回想起他的名字<sup>183</sup>。

蒙昧主义者责备車尔尼雪夫斯基，说他在自己的小说中宣扬“肉欲的解放”。再没有比这种责难更荒谬和更伪善的了！随便拿出任何一部取材于上流社会生活的小说，随便想一想一切国家和一切民族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爱情猎艳故事，——你们就会看到，車尔尼雪夫斯基根本没有任何必要去宣扬那种早已实现了的肉欲的解放。相反，他的小说所宣扬的是人的精神、人的理性的解放。具有这部小说的思想倾向的人，谁都不会有闺房猎艳的爱好，而对那些伪善地尊重流行道德的“上流社会”人士来说，如果没有这种闺房艳事，那末生活就不成其为生活了。蒙昧主义者先生们清楚地知道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的严肃的道德性质，他们对他生气也正是为了他的道德上的严肃性。他们感觉到，像《怎么办？》的主人公那样的人，一定会把他们看做最大的淫棍，并对他们抱着最大的蔑视。

163 有些人还指出，只有当罗普霍夫和薇拉·巴夫洛芙娜没有孩子的时候，他们才能很好地表现出自己崇高的感情；如果他们有孩子，他们在自己的爱情关系方面就不得不走陈腐的老路了。車尔尼雪夫斯基本人也说，如果薇拉·巴夫洛芙娜有孩子，她也许会按另一方式行事。他清楚地知道，男人对女人的关系问题是同家庭问题密切相联的，而没有家庭，人们就不能在当今的社会中生活。他知道，要使爱情完全自由，就必须改造全部家庭关系，因而也必须改造全部社会关系。但是，他并没有停留在这个思想上，因为人们在以后将会产生的那种爱情关系是一回事，而目前就在先进人

們之間的婚姻中可能具有的那種人道和理性却是另一回事。即使薇拉·巴夫洛芙娜和羅普霍夫的子孫像恒河之沙那樣繁衍，他們也仍然會是有理性的和有人道精神的人，因而也不會為了不由自主的、不取決於他們意志的感情的偏移而造成彼此生活上的不幸。也許，車爾尼雪夫斯基故意在自己的小說里描寫了一個最普通的情節：一個已婚的、沒有孩子的婦女產生了新的感情。他闡明了正派人在這種場合下相互之間的義務，希望理解他的那些讀者自己來決定，有孩子的配偶在這種情況下應當怎樣做；在不同的個人考慮的影響下，他們的做法可能有所不同；但既然他們理解了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觀點，他們就永遠也不會像舊派的人那樣行動了。

### 十三

我們知道：在俄國傳播真理、科學和藝術的崇高觀念，是我們這位作者一生的主要的、可以說唯一的目的。他寫小說《怎麼辦？》也是為了傳播這些觀念。把這部小說僅僅看作宣傳愛情方面的理性態度，那是錯誤的。薇拉·巴夫洛芙娜對羅普霍夫和吉爾沙諾夫的爱情——這不過是借以安排作者的其他更重要的思想的一條主線罷了。我們已經談到過薇拉·巴夫洛芙娜所創辦的協社。作者使她從事這種活動，是為了向他的信徒們指明俄國社會主義者的實際任務。在薇拉·巴夫洛芙娜的夢中，作者的社會主義理想是用鮮明的色彩描繪出來的。他完全按照傅立葉的方式來描繪社會主義公共宿舍的景象。車爾尼雪夫斯基沒有給讀者提供任何新東西。他只是向他們介紹了西歐思想界早已得出的結論。在這裡必須再一次指出，早在四十年代俄國人就知道了傅立葉的觀點。“彼得拉舍夫斯基派”<sup>184</sup>就曾因為信奉傅立葉主義而被判罪。但是，車爾尼雪夫斯基使傅立葉思想在我國得到了空前未有的傳播。他

164 向广大群众介绍了这种思想。后来在我国，甚至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崇拜者在谈到薇拉·巴夫洛芙娜的梦的时候都要耸耸肩膀。在某些人看来，她所梦见的法伦斯泰尔<sup>①</sup>是十分幼稚的幻想。有人说，这位著名的作家本来可以同读者谈些什么对我们更切近、更实际的东西。甚至有些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也是这样议论的。老实说，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完全不同。我们从薇拉·巴夫洛芙娜的几个梦里可以看出車尔尼雪夫斯基的社会主义观点的一个特征，可惜，这个特征直到如今还没有得到俄国社会主义者的足够重视。这些梦引起我们重视的是：車尔尼雪夫斯基已经完全意识到，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只有把资产阶级时期发展起来的技术力量广泛地运用于生产。在薇拉·巴夫洛芙娜的梦里，劳动大军共同地从事生产，从中亚细亚转到俄罗斯，从气候炎热的国家转到寒冷的国家。所有这一切，当然也可以从傅立叶的著作中读到，但是俄国读者却并不了解这一点，这甚至从后来所谓的俄国社会主义的历史中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革命者对社会主义社会竟得出这样的概念，即往往把它想像成使用旧式的木犁（还在失明的瓦西里时代用来翻地的木犁）来耕地的农民村社的联盟<sup>②</sup>。但是，不言而喻，这样的“社会主义”完全不能算做社会主义。只有把人从“土地的权力”<sup>185</sup>和整个自然界的支配下解放出来，劳动的解放才能实现。为了人的这种解放，无疑地要像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薇拉·巴夫洛芙娜的梦里所讲的那样，必须有劳动大军，必须把现代生产力广泛地应用于生产，而我们在追求“实际”时却把这些完全忘记了。

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许多读者都没有理解他的社会主义观点，

<sup>①</sup> 法伦斯泰尔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移民区的名称。——译者

<sup>②</sup> （参阅后面第154页德文版对这处的补充。）

这从皮薩列夫的一篇就文笔方面來說非常出色的論文《有思想的无产階級》<sup>186</sup>中就能看得出来。这篇論文是对《怎么办?》的一个分析。皮薩列夫由于看到薇拉·巴夫洛芙娜、罗普霍夫和吉尔沙諾夫而喜出望外。在他看来,他們是处于最合适的环境下的“巴扎罗夫型”的真正代表者<sup>①</sup>,是名符其实的新人物。但是,他怎样想像新人物的性格和活动呢?他首先抓住的是,他們全都研究自然科学。大家知道,在皮薩列夫看来,自然科学就是知識的全部。研究这些真正的科学中的一种罢,努力罢,合理地安排自己对妻子和朋友的关系罢……这样你就会成为“有思想的无产者”,就会为其他一些暂时还不是有思想的无产者的人而工作,就会同他們完全“团結一致”。在这篇論文中一句話也沒有談到,“有思想的”无产者对其余的无产者还可能有其他更广泛的任务。当然,像薇拉·巴夫洛芙娜那样创办这种或那种协社是好的,但主要的不在于此,而在于合理地安排个人的生活和研究自然科学。皮薩列夫甚至完全不理解拉赫美托夫。也許,他也并不反对贊揚拉赫美托夫(因为不能不贊揚他,車尔尼雪夫斯基本人就是贊揚他的),但是他不理解这个典型人物,因此不自觉地暴露出对这个典型人物的反感。对皮薩列夫來說,薇拉·巴夫洛芙娜、罗普霍夫和吉尔沙諾夫始終是真正的、理想的“新人物”。可是,在車尔尼雪夫斯基看来,拉赫美托夫同罗普霍夫及其最亲密的朋友相比,就像巨大的宮殿与普通的房屋相比一样。他引出拉赫美托夫来,是为了表明像罗普霍夫那样的人的相对的平庸。罗普霍夫是关心个人私事的人。他很同情社会主义,但只是順便地、偶尔地做些社会工作。拉赫美托夫

165

<sup>①</sup> 可是,車尔尼雪夫斯基本人却未必把自己的主人公看做“巴扎罗夫型”的代表者。《同时代人》认为巴扎罗夫是对“青年一代”的諷刺(參閱馮·阿·安东諾維奇的著名論文《当代的阿斯莫捷依》,載于《同时代人》,1862年3月号)187。

則把他全部時間和心思都獻給社會工作。他完全不知道個人的悲傷和歡樂。他甚至下定決心永遠不與婦女親近。因此，他保險不會發生顯露出羅普霍夫和吉爾沙諾夫的性格來的那種故事。這是一個觀念的人物。只有為觀念服務時才能顯露出這種鋼鐵般的性格的豐富力量。在私人關係上，他是難以相處的，而如果願意，簡直可以說是令人難以忍受的，正如薇拉·巴夫洛芙娜不客氣地向他說的那樣。他自己也意識到這一點，但絲毫不為了意識到這一點而感到不痛快。大材自有大用。

車爾尼雪夫斯基生活在新型的“新人”的新典型——革命者在我國誕生的時代。他興高采烈地歡迎這種典型的出現，而且不能不以描繪他那還不清晰的輪廓為樂事。同時他也憂傷地預見到，俄國的革命者要經受多少痛苦和折磨，因為他們的生活必然是嚴峻的鬥爭和沉重的自我犧牲的生活。於是車爾尼雪夫斯基通過拉赫美托夫給我們描繪了一個道地的苦行者。拉赫美托夫完全是在折磨自己。用他的女房東的話來說，他簡直是個“對自己殘忍的人”。他甚至決定試一試能否經得住拷打，為此他整夜睡在插滿鐵釘的毯子上。很多人，包括皮薩列夫在內，都認為這只是一種怪癖。我們同意，拉赫美托夫性格上的某些細節可以用別的方式來描寫。但是他的整個性格還是完全真實的。每一個優秀的俄國革命者身上都有很大一部分拉赫美托夫性格。

現在“知識分子”出身的革命家几乎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們已經沒有獨創精神，而只是人云亦云，變得庸俗渺小。工人出身的革命家、這些真正的“人民之子”應當出來，而且當然會出來代替他們。但是他們有自己的充滿光榮的歷史，因此我們不能不對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敏感感到驚異，因為他能這樣清楚地看到了和這樣忠实地描寫了當時剛剛誕生的典型人物的至少是最主要

的特征<sup>188</sup>。

#### 十四

樞密院決定褫奪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公權，送往礦山服苦役十四年，然後流放西伯利亞終身。在最後的判決中，服苦役的期限縮短為七年。1864年6月13日，在彼斯克區的梅特寧廣場宣讀了對這位偉大俄國社會主義者的判決詞。他面色蒼白、憔悴、疲憊不堪，被人安置在“恥辱”柱旁，背向着宣讀判決詞的官吏默不作聲地站着。舉行了在這位被判罪的人頭上折斷一把劍的儀式，然後他的手被劊子手套進釘在斷頭台柱上的環里。在這一剎那有一束花擲上了斷頭台，而在擠滿梅特寧廣場的人群中響起了對被判罪的人表示同情的呼聲……車尔尼雪夫斯基被送往西伯利亞。

有名的劊子手穆拉維約夫曾經想把他拖進卡拉科佐夫案件，但亞歷山大二世不知為什麼反對這樣做，因此車尔尼雪夫斯基仍然留在西伯利亞。他在那裡度過了二十年，而且由於憲兵長官舒瓦洛夫伯爵的堅持，他一直沒有受到一切減刑法律的處理。在七年苦役滿期後，他被流放到亞庫梯州的維留依斯克，在那裡唯一能同他談話的只有看守他的哥薩克和憲兵。車尔尼雪夫斯基在這個遙遠的、極端有害健康的西伯利亞偏僻地區，在新的監禁狀態下一直生活到1883年<sup>189</sup>，才獲准遷往阿斯特拉罕居住。真是令人驚奇，這個體格軟弱、肺部不健康的人，怎麼能經得住加在他身上的這一切迫害。

這裡我們將不談營救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許多次嘗試，因為它們已經是人所共知的了<sup>190</sup>。 167

從西伯利亞回來以後，車尔尼雪夫斯基立刻重新積極地從事文字工作。他勤奮地翻譯了韋伯的《世界史》，並且為期刊寫了幾

篇文章。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的作者在流放前所写的最后的文章之一，是《杜勃罗留波夫的传记材料》，而他在流放归来后最初写的长篇文章之一，就是这些《材料》的續篇。显然，車尔尼雪夫斯基从来也沒有忘記掉这位过早去世的、有才华的、亲爱的同志。

我們将在第二篇論文中再談他在流放后写的文章。現在我們只想說，虽然在語言和风格方面能够很容易从这些文章认出車尔尼雪夫斯基来，但是这些文章已經沒有过去的光輝和他过去的思想深度了。他的一篇論达尔文的文章确乎是軟弱无力的、极其軟弱无力的，以致給人造成了最沉重的印象<sup>191</sup>。在讀这篇文章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是在面对着一位已經完全筋疲力尽和备受摧殘的作家。在他逝世以前給予他的不大的自由，已經不能使过去的車尔尼雪夫斯基复活了。过去的車尔尼雪夫斯基已經被樞密院的判決所杀害，而俄国政府从来也沒有对俄国的思想发展犯过比这更大的罪行。因此在結束这第一篇論文时，我們抱着最大的同感来重述一下赫尔岑在刚刚得悉車尔尼雪夫斯基案件的判決时所写的几句话：“让人們为了这个无比的罪行来詛咒政府和社会，詛咒那挑起这场迫害、由于私人嫌隙而极力火上加油的卑鄙的、被收买的新聞界吧。它教唆政府在波兰屠杀战俘，而在俄国批准樞密院的野蛮的不学无术之徒和国务會議的老年恶棍的判決……而这里却有一些可怜的人，草木不如的人，軟体动物一样的人，他們还說不應該咒罵这一伙統治我們的强盜和敗类！”<sup>192</sup>



## 〔《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 一书德文版(1894年)增补〕

### 对《社会民主党人》文集 第 93 頁的补充<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正是希望致力于在自己的祖国传播真理、艺术和科学的崇高观念〉<sup>193</sup>。

他成为一个作家，他的学位论文的发表，引起了《同时代人》杂志编辑部对他的注意，这家杂志从 1847 年起是由帕納也夫和詩人涅克拉索夫出版的。他們建議車尔尼雪夫斯基經常为这家杂志撰稿，甚至請他負責整个批評栏。后来，当 1859 年准許《同时代人》杂志談論政治时，車尔尼雪夫斯基还負責政治栏。他真正是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为杂志各栏写文章，一般是按这样的次序：首先，他写一篇关于某个理論問題的长文，然后写一篇政治評論，对俄国文学、有时也对外国文学作一短評，評論几本新书，最后，似乎为了休息和娱乐，再对自己的論敌做一些論战性的攻击。这种頑强的劳作在頗大程度上是由于下面这种情况而繼續下来的，即甚至在《同时代人》杂志的工作人員中，特别是在車尔尼雪夫斯基从事文学活动的最初几年內，只有很少的人达到他对待事物的观点的水平。

①〔參閱本卷第 31--32 頁以及德文版第 31 頁。〕

在小说《序幕的序幕》中，作家伏尔庚（車尔尼雪夫斯基用这个姓名来影射他自己<sup>①</sup>）就公开说，他不得不大量写作，唯恐其他人写出一些蠢话来。但是，自从車尔尼雪夫斯基成为《同时代人》杂志的主要工作人员以后，一切新生的文学力量都自然而然地趋向于这家刊物。例如，很快成名的杜勃罗留波夫早在1856年就已开始为这家刊物写稿，車尔尼雪夫斯基把他看得比自己高得多——虽然这是一种过分的谦虚。报刊当时在我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现在社会舆论已大大超越了（受书报检查约束的）报刊；在四十年代里则社会舆论还没有成长到报刊的水平；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是社会舆论和报刊趋于最大一致、报刊对社会舆论发生最大影响的时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当时所有卓越的作家才可能这样热烈地醉心于文学工作和这样真诚地相信文学宣传的意义。一切旧的、传统的、从祖先继承下来的东西都受到了批判，一切新东西都被人从“理性”的观点来加以讨论，似乎“理性”的使命就是重新改造俄国读者的一切观点，从最一般的哲学问题起，直到是否应该把摇篮的婴儿包以襁褓和是否应该责打学龄儿童的问题为止。俄国生活上的这个时代与法国的一个时代极其相似，那时代伟大的启蒙运动者伏尔泰也对世界上的一切无所不谈，从牛顿的理论起直到年轻姑娘的教育为止。

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杂志领导了当时俄国的文学运动。所有的“新人”<sup>194</sup>都如饥如渴地阅读它，所有由于某种原因想阻止这个运动的人都非常害怕它。恐惧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仇恨。《同时代人》杂志的影响越加增长，各方面对这家杂志、特别是对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攻击也就越加厉害。人们开始把《同时代人》杂志的工作人员看成是推翻一切“社会基础”的危险人物。某些四十年代的“先

<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故乡萨拉托夫位于伏尔加河畔。

进人士”，过去曾經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作家別林斯基的朋友，現在也都离开了《同时代人》杂志，把它看做是“虛无主义者”的机关刊物，并且开始大叫大嚷，說什么別林斯基在世决不会贊同它所采取的方向。屠格涅夫就是这样做的<sup>①</sup>。就連斯拉夫主义的急进分子赫尔岑也差不多是这样做的，他在自己在伦敦創办的《钟声》杂志上攻击“胆汁质的人”，說什么任何东西都不可能使这种人滿意<sup>196</sup>。《同时代人》方面也馬上进行报复。它用尖銳的論战文章来回答这些攻击，此外，还在一个以《哨声》为名的专刊上嘲笑<sup>197</sup>他們。有时 170 車尔尼雪夫斯基也在《哨声》上写文章，但那里的主要工作者是杜勃罗留波夫，他具有写作諷刺“卫道者”的高談闊論的那种詩歌的卓越才能。“卫道者”试图以同样的武器来对《同时代人》进行斗争，但他們很快就相信，“les rieurs”（笑的人）并不站在他們这一边。

車尔尼雪夫斯基埋头于文学斗争，所以写他这个生活时期的历史——就是写他的文学活动史。不言而喻，我們不能避而不談这种活动，但是讓我們先来看一下，他怎样理解他在《同时代人》杂志上所闡述和捍卫的那些“真理、艺术和科学”的观念。

按他的哲学观点來說，他是費尔巴哈的信徒，他对費尔巴哈抱着最大的敬意，他把費尔巴哈和黑格尔相提并論，这一点就說明了許多問題，因为車尔尼雪夫斯基与日益流行的“有思想的无产者”的偏見相反，认为黑格尔是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中最有天才的思想家之一<sup>②</sup>。作为費尔巴哈的信徒，車尔尼雪夫斯基是哲学唯心主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讲过，屠格涅夫对他一定程度上还能容忍，但对杜勃罗留波夫就完全不能忍受了。他曾对車尔尼雪夫斯基說：“您是一条普通的蛇，而杜勃罗留波夫则是一条眼镜蛇”<sup>195</sup>。

② 实际上費尔巴哈要比黑格尔低得多，并且贫乏得多，正如恩格斯清楚地指出的那样，馬克思早在給柏林的《社会民主党人》編者的信（在蒲魯东死后不久发表）中也指出了这点<sup>198</sup>。

义和二元論的敌人。他在《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一文中写道：“自然科学所制定的关于人类机体統一性的思想，是哲学对于人类生命……的观点的原则；生理学家、动物学家和医学家的观察消除了一切关于人的二元論的思想。哲学所看到的人，和医学、生理学、化学所看到的一样；这些科学证明，在人身上看不到任何二元的东西，而哲学則另外还說，如果人除了他的实在的本性外，还有另一种本性的話，那末，这另一种本性就一定显現在什么东西之中，但是它并没有显現在任何东西之中，人体所发生的和表现出来的一切都是按照他的一个实在的本性进行的，所以，人就沒有其他的本性”<sup>①</sup>199。这說得十分清楚。但是还不能从这一点得出結論說，車尔尼雪夫斯基是唯物主义者一詞的最新意义上的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們都知道，費尔巴哈本人离开这种彻底性也还很远，老师的錯誤也在学生的世界观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唯物主义，表現在他的“人本主义”观点中要比表現在他的历史观点中更明显得多。車尔尼雪夫斯基把人看作环境的产物，甚至带着极大的人道精神来对待那种邪恶的人性的不良表现，（而唯心主义者則把这种不良表现仅仅看做应该加以严厉惩罚的“恶的意志”……）

### 〔第 105 頁的注释〕<sup>②</sup>

（一般說来，車尔尼雪夫斯基对合理利己主义的观点，很明显地表现出一切“启蒙时期”所特有的一种倾向，即力求从理智中寻

① 我們要再一次提醒我們的德国讀者，車尔尼雪夫斯基必須說得十分謹慎，因为他在受书报检查的俄国杂志上写作。

② 〔參閱本卷第 48 頁和德文版第 37 頁。〕

找道德的基础，而从个人的某种深思熟虑的利害打算中去寻找他的性格和行为的解释。)

順便說一下，Xenophon 在 *Erinnerungen an Sokrates*<sup>①</sup>(6, 27)中，曾引证这位哲人用来说明同诚实人交朋友比同奸狡者交朋友更好这个思想的如下論据：“Es ist aber vortheilhafter, den Rechtschaffenen gutes zu erweisen, da ihre Zahl geringer ist, als den Schlechteren, deren Zahl grösser ist, denn die Schlechten bedürfen weit mehr Wohltaten, als die Rechtschaffenen”<sup>②</sup>。这已經是理智的完全胜利和最后界限了，超越了这个界限，理智就一定会立刻走向荒謬。

### [第 134 頁的續稿]<sup>③</sup>

(但讓我們回到我們的作者那里去。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他的观点的一般性质，知道他对“真理、科学和艺术的崇高观念”的理解所特有的优点和缺点，我們就能容易地对他的文学活动作一个总结。)

車尔尼雪夫斯基必然会遇到的第一个实际問題，就是废除农奴制的問題。当这个問題刚刚被亚历山大二世政府提上日程的时候，俄国的先进人士以为不难向这个政府指明，它本身的利益与被解放的农民的利益是多么一致。另一些人甚至认为，这对政府說来是不言自明的。赫尔岑向这位年輕的沙皇写道：“你胜利了，加

① (色諾芬……《苏格拉底回忆录》)

② (“……为少数好公民效劳比为多数坏公民效劳更需要得多，因为坏公民要求施惠要比好公民多得多”。)200

③ [參閱本卷第 86 頁和德文版第 72 頁。]

里利亚人！”<sup>①</sup>201。

差不多在这时候，他公开提議为沙皇一解放者干杯<sup>202</sup>。在一段时期內，似乎車尔尼雪夫斯基也陷入了同样的錯觉。至少，他曾极力向政府解释，它的正当的利益究竟何在。在国外出版的特別版本中，他所写的有关农民問題的文章就編成了排印得密密的一厚册，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在农民問題方面写了多少文章<sup>203</sup>。当然，他主张連同土地一起解放农民，并且断定說，贖买分給农民的土地，不会給政府造成任何困难。他用了一般的理論推斷和极詳細的示范計算来证明这个思想。

### 〔第 148 頁的續稿〕<sup>②</sup>

（如果說我們的“知識分子”迄今为止还这样牢固地抓住村社不放，那末这一点正表明車尔尼雪夫斯基的不可磨灭的影响。）

他拥护村社的主要論据之一，就是指出村社会拯救我們避免“无产階級化的潰瘍”。这时显然他曾經不止一次地回想起哈克斯特豪森男爵之类的反动分子的論断，这些人是把“无产階級化的潰瘍”看作西欧革命运动的主要根源的。他也曾經怀疑过消灭上述的潰瘍对俄国进步的事业是否有利。但是他很快就消除了这种怀疑。“农民階級虽然在我们这里总是按村社的慣例来使用土地，但他們在历史上却并不永远……以固定不变的性格出現……我們……沒有必要去解释西欧农民的性格如何。我們只想提醒大

① 傳說中此語出自羅馬皇帝变节者朱理安（Julianus, Flavius Claudius 331—363）。他是坚决反对基督教的，后世史家造謠說他在对波斯战争中临死时高喊：“你胜利了，加里利亚人！”——加里利亚人是指耶穌。整句話的意思是表示对真理屈服、承认自己战败。实际上朱理安至死都是反对基督教的。 譯者

② （參閱本卷第 103 頁以及德文版第 85 頁。）

家，哥薩克大部分出身于农民，而从十七世紀初期起，俄国人民历史上的几乎一切戏剧性的情节，都是由农民来扮演的”<sup>204</sup>。我們看到，他在这里把农民战争的历史意义与現代无产階級革命运动混为一談了，——这对如今的社会主义者來說，是一种完全不可設想的混淆，但对車尔尼雪夫斯基时代的俄国革命者來說，这种混淆却是很不容易觉察的。

173

自由派經濟学家輕視村社，把它看成是只有原始的野蛮民族才有的一种落后的土地占有制形式。車尔尼雪夫斯基在駁斥这种論据的时候引证了黑格尔的学說。他說，任何一种現象的发展中的第三个阶段、即最后的阶段，总是同它的第一个阶段非常相似的。各民族都从村社土地占有制开始，他們必定迟早要回到村社土地占有制。的确，西欧各国人民曾經从原始的村社土地占有制过渡到、并且必然暂时过渡到土地私有制。但是，踏上历史发展道路較晚并有了西欧經驗作借鉴的其他国家，完全可能避免这个过渡时期。俄国就属于这样的国家。它絕對沒有任何必要在本国实行已經由西欧历史清楚表明它的荒謬性的那种土地占有制形式。

車尔尼雪夫斯基提出这个論据的那篇文章<sup>205</sup>，写得这样圓滿周到，在表面上看来是这样令人信服，使得反对村社的自由派竟然找不到任何理由来反駁它。仅仅这个情况就表明，他們自己对社会問題的观点是多么空洞抽象。只有那些把自己置于“社会之上”的人，只有各种派别的空想主义者，才能为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論据所折服。实际上，在黑格尔那里，任何发展——無論在邏輯学、自然界或社会中——都是以自己內在辯证法的力量自行实现的。如果車尔尼雪夫斯基想从黑格尔的观点来捍卫村社土地占有制，他就應該证明，俄国村社的内部关系本身就会导致这样一种社会制度的建立，这种制度既不会犯西方的“錯誤”，又将接近于社会主义

者的理想(西欧各民族以这些社会主义者为代表,認識到了土地私有制是不方便的、站不住脚的)。但是,車尔尼雪夫斯基却連一句話也沒有談到村社土地占有制的这种邏輯。在他那里,了解西欧社会主义(即空想社会主义)并认为俄国必須利用較先进国家的經驗的那些“先进的”俄国人的主观邏輯,代替了这种客观邏輯。黑格尔未必会同意这样地运用他的观点。我們且不談在他那里第三阶段与第一阶段只有形式上的相似,虽然車尔尼雪夫斯基几乎把社会主义社会(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想像的那种社会主义社会)与俄国农村[村社](这种村社同真正原始的土地占有制形式相去极远)混为一談。

同一个車尔尼雪夫斯基在另一篇文章里叙述同一个黑格尔的学說时說道:“抽象的真理是沒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一切都以时间和地点的条件为轉移”<sup>206</sup>。他要引证黑格尔学說来保卫村社土地占有制,就应当首先記住黑格尔观点的这个方面。那时他就会以另一种方式来发表議論。村社土地占有制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根本不可能以肯定的方式来回答这个問題。首先应当知道,它日前的状况怎样,以及可設想的将来为它准备了怎样的状况。“抽象的真理是沒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但是車尔尼雪夫斯基却正是想寻找抽象的真理,于是他就违反了他所引证的那种哲学的精神。

下面这个值得注意的情况表明,車尔尼雪夫斯基是怎样地沒有觉察到他对村社的抽象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在我們刚才叙述过它的論据的那篇文章前面有一个序言,我們的作者在这个序言中对俄国农民土地占有制的前途发表了讀者已經知道的一种黯淡的看法,并且为了他曾經輕率地为村社辯护而“感到羞愧”。驟然看来,这似乎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一方面,这个人說,他成了“鹵莽”的



人，甚至——“在我自己看来简直是愚蠢”，因为他曾經替村社辯护，而另一方面——他却又一次維護村社，并且在他看来是用不可摧毀的武器来維護村社<sup>207</sup>。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說，在一种場合下，車尔尼雪夫斯基所談的是处于一定历史状况下的现实的俄国村社。他以为这种村社的事业已經彻底失败了。但是，作为一个空想主义者，他不仅注意到现实的社会关系，而且也不忘記可能发生的关系，而可能发生的关系在任何一个空想主义者的世界观中都是起重大的作用的。从这些可能发生的关系的观点看来，村社依旧是一个美好的东西，維護它不仅不必感到羞愧，而相反地还是一件很好的事。因此，可能性就成为完全不依赖于现实性的一个領域。后来，所有的俄国民粹主义者，包括烏斯宾斯基在內，都經常重复这种邏輯上的錯誤。但是，車尔尼雪夫斯基对村社土地所有制的看法，毕竟与民粹派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

### 〔第 160 頁的續稿〕<sup>①</sup>

175

随着俄国反对派分子的情緒高涨，波兰社会的革命情緒也高涨起来。大学生风潮迭起，秘密团体相继成立，它們印发传单，盼望那些不滿于“解放”的条件的农民普遍举行起义。这一切“骚动”对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命运有直接的影响。

已故的舍尔古諾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說道：“在当时，一般地說，人們是十分大胆、十分公开地散发传单的。有一次遇到一位衣袋装得滿滿的熟人，我問他：‘您帶的是什么东西？’他十分沉着地回答說：‘传单’，仿佛这是一种合法的、甚至得到許可的印刷品似

<sup>①</sup>〔參閱本卷第 120—121 頁以及德文版第 105 頁。第 10(8)章的起首。〕

的。有时，有人来拉你的门铃。你开门看到一个熟人，他一句话也不说，甚至还装出不认识你的样子，把一束传单塞到你手里，然后急忙地像一个不认识的人那样走开。传单散放在剧院的座位上，像戏报那样张贴在音乐厅的墙壁上，据说，甚至还把传单塞进人家的衣袋，而有人在谈到《告青年一代》<sup>208</sup>这份传单时说，有某一位先生骑了一匹白色的快马沿着涅瓦大街向道路两旁散发这份传单。最后，还通过邮局来散发传单。散发《告军官书》<sup>209</sup>这份传单也是特别大胆的。这份传单在基督的晨禱时<sup>①</sup>散发，据说，甚至还在教堂里散发”<sup>2</sup>。这位舍尔古诺夫还指出，所有这些传单，就其意义来说，“都只不过是一种大胆的举动，给人造成了轰然作响的爆炸筒那样的印象”。这是公正的。彼得堡的劳动人民大概没有从街头散发的传单《告青年一代》和《青年俄罗斯》中懂得任何东西。但是，单是散发传单的人的大胆行为，就迫使政府料到在他们背后有着一支巨大的革命力量。这使俄国政府有一个很好的借口去采取“驯服措施”，俄国政府通常总是籍助于这种措施使它的敌人转上正路的。逮捕开始了。在散发了《告青年一代》（这发生在1861年秋）以后的第二天，《同时代人》杂志最卓越的撰稿人之一米哈伊洛夫遭到了逮捕。这个事件引起了彼得堡文学界的很大波

① 即在基督复活节的晨禱时。《青年俄罗斯》这份传单<sup>210</sup>比当时的其他一切呼吁书都更为出色，它呼吁青年学生（“我们的主要希望”）准备好在“俄罗斯社会民主共和国万岁”的口号下进行“流血的、无情的革命”。这份传单判处了皇族和整个“帝党”的死刑。它对自由主义立宪派表现了非常大的敌意。传单的作者举出上世紀法国伟大的恐怖主义者作为俄国革命者的范例。革命党应当把政权夺取到自己手中，以便“靠了政权的帮助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另一些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原则”。关于《青年俄罗斯》这份传单，赫尔岑在《钟声》上曾正确地指出，“只有在决战的前夕，才能号召人们拿起武器”，而“任何过早的号召都是向敌人提供暗示和消息，并在敌人面前暴露自己的弱点”<sup>211</sup>。然而问题正在于：当时的俄国革命者觉得他们已经处于“决战的前夕”。他们不懂得，当青年学生是革命者的“主要希望”的时候，是谈不到什么革命的。

动。两三天后，差不多所有的彼得堡作家都集合在《俄国言論》杂志<sup>213</sup>的出版人庫雪列夫伯爵家里，討論他們能够做些什么来援救被捕者。他們决定向国民教育大臣(当时的出版物主管人)递交請願书，請求他关心米哈伊洛夫的命运。大臣(就是前面已經提到过的海軍大将普嘉廷)接受了这份請願书，虽然他向递交請願书的代表們指出，俄国并没有作家这个“等級”。自由主义的亚历山大二世則下令把代表們关进禁閉室<sup>①</sup>。同时米哈伊洛夫則被关在要塞里，并且用他的果断而坦率的回答使审問他的預审官惊慌失色<sup>214</sup>。他承认自己写过一份传单，并且宣称他衷心痛恨俄国現存的制度，并焦急盼望着推翻沙皇政府那个时刻的到来。樞密院判他在矿山服苦役(最苦的一种徒刑)十五年。沙皇把刑期减至七年。这是非常 grossmütig<sup>②</sup>，同时又并不妨碍他达到这样的目的：消灭革命运动的主要“首領”之一。現在就該輪到最主要的“首領”車尔尼雪夫斯基了。

使整个彼得堡长久不忘的 1861 年的大学生风潮，是由下面这个原因引起的：正如我們已經說过的，亚历山大二世的政府甚至在自己的自由主义蜜月时期，也不能容忍学院自由的甚至很微小的一点儿迹象。1856年，装扮得宛如自由主义者的謝尔巴托夫公爵，被任命为彼得堡学区的学监。他准許大学生成立互助会、图书馆、閱覽室和出版自己的“文集”。为了举办大学生的所有这些事业，举

177

① 可是后来他“寬恕了”他們。

② 〔寬大的〕

行公开演讲，互助会以及大学生图书馆都被封闭了。大学生的集体生活宣告结束，同时学生进大学也受到种种限制（当时彼得堡大学有学生一千五百人；在尼古拉统治时期的最后几年则一共只有三百人）；大学委员会不再能批准大学生免费听课。这就是“开明的航海家”、国民教育大臣、海軍大將普嘉廷所想出来的新的大学章程。彼得堡大学的优秀教授都立即紛紛請求辞职<sup>215</sup>，而大学生则不顾禁令，开始举行热闹的集会。去跟学监菲力浦逊說理的大学生甚至还举行了示威游行。相信自己的战斗經驗的菲力浦逊求助于軍事力量。大学生和士兵在街头上发生了冲突，大学暂时遭到封闭，大批学生被捕，以致彼得保罗要塞都已经人滿为患，只好把他們用輪船运往喀琅施塔得<sup>216</sup>。

这一切都发生在 1861 年，而到下一年春天，在彼得堡开始发生頻繁的、接連不断的火灾，政府把这些火灾都归罪于“虛无主义者”。反动报刊叫囂必須采取严厉的措施，并且名符其实地对車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同志进行了告发。

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也越来越富于革命性。他以前曾經（认为向政府說明农民解放对政府本身有利，是可能而且有益的，而現在却已不想再对政府說什么了）。

### 〔第 168 頁的續稿〕<sup>①</sup>

《怎么办？》这部小說的情节很简单。彼得堡医学院学生罗普霍夫遇到了一位貧穷的年輕姑娘薇拉·巴夫洛芙娜·罗查利斯卡雅，这位姑娘的父母想强迫她嫁给一个头脑空洞、生活腐化、但却

<sup>①</sup> 〔参閱本卷第 131 頁和德文版第 115 頁。第 12(10) 章的起首。〕

非常富有的軍官。为了使她摆脱这种困难的处境，罗普霍夫建議同她秘密地举行假結婚。薇拉·巴夫洛芙娜同意了，这样就摆脱了令人难受的父母的监护。在一段时期內，她一直只是罗普霍夫的假妻子，但后来就爱上了他，于是他就不仅在法律上是她的丈夫了。罗普霍夫夫妇非常幸福。他們过的是“新人”的合乎理性的生活，在他們周围都是一些有理性的和正直的朋友。但是薇拉·巴夫洛芙娜却并不满足于这种生活。她希望实现她想得很多并且經常与朋友談論的社会主义思想。她和她的朋友都认为成立工人生产协社是实现这种思想的最好途徑。于是她就发起組織彼得堡的女縫工。这个事业——車尔尼雪夫斯基在叙述这个事业时，照例总是极为詳細地列举新原則的优越性——迅速地发展起来。薇拉·巴夫洛芙娜可以把自己称为十分幸福的人了。但是，一幕沉痛的悲剧却在等待着她。在罗普霍夫的朋友中間，有一位名叫吉尔沙諾夫的年輕的、有着光輝前途的生理学教授。薇拉·巴夫洛芙娜很吃惊地觉察到她对吉尔沙諾夫的爱情，吉尔沙諾夫也同样意外地发现他爱上了薇拉·巴夫洛芙娜。他們俩人都頑强地与自己的感情作斗争。但是感情却并不屈服于他們的努力：罗普霍夫也觉察到这一点，他认为，为了朋友和爱妻的幸福，他應該退出舞台。他失踪了；警察和他的几乎所有的朋友都深信，他已經投涅瓦河自尽了。薇拉·巴夫洛芙娜在法律面前得到了自由。現在沒有任何东西妨碍她同吉尔沙諾夫結婚了。她在得悉罗普霍夫还活着并且住在美洲以后，也确实同吉尔沙諾夫結了婚。当罗普霍夫看到他已經克服了自己对薇拉·巴夫洛芙娜的感情的時候，他就回到彼得堡，并且同吉尔沙諾夫夫妇的一个女友結了婚。他的新妻子也組織了裁縫工場。罗普霍夫和吉尔沙諾夫两家都生活在极伟大的友誼中。

讀者可以看到，几乎小說中的每一个主角都是这样行事的，以致使“卫道者”振振有詞地叫嚷說，这是对家庭的神圣的“基础”的动摇，是对道德的凌辱，对法律的破坏等等。卫道者确实一直对这一点叫嚣不止。同时他們还大叫大喊，說什么这部小說沒有任何艺术价值，說什么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这部小說中暴露出他完全缺乏艺术才能。这第二种責难只有一部分正确：小說《怎么办？》中的喜剧性人物（例如薇拉·巴夫洛芙娜的父母）描写得很好，充滿着生活气息，但是这部小說中的真正主角薇拉·巴夫洛芙娜和她的朋友們，从艺术观点看来确实描写得不很成功。但是，从这一点可以得出什么結論呢？让人們向我們举出（哪怕一部最出色的、真正富有艺术性的俄国文学作品，在它对国家的道德和精神发展的影响上，能够与《怎么办？》这部小說相匹敌吧。）

### 〔第 172 頁的續稿〕<sup>①</sup>

（我們的革命者对社会主义社会竟得出了这样的概念，即往往把它想像成使用旧式木犁（还在失明的瓦西里时代用来翻地的木犁）来耕地的农民村社的联盟。）


从另一方面看来，毫無疑問，車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这部著名小說中所表达的那种对实现社会主义思想的实际途徑的看法，甚至在他当时來說也应当算是一种落后的看法。当时俄国和德国都在进行关于协社的宣传，这个历史事实是很值得注意的。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說出版于 1863 年。在同一个 1863 年，拉薩尔向德国工人介紹說，生产协社是改善他們的生活（哪怕只是某些改善）的

<sup>①</sup> 〔參閱本卷第 136 頁。〕

唯一手段。但是，在我国和德国，这个问题的提法有什么不同呢？在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說中，〔从事〕建立协社的是个别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有教养的人：薇拉·巴夫洛芙娜和她的朋友們。甚至“开明”神甫梅察洛夫也热衷于这个事业，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在薇拉·巴夫洛芙娜所建立的作坊中起着盾牌的作用。这部小說絲毫沒有談到工人階級的政治獨創精神。企图實現車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綱領的那些俄国的“六十年代人”，也都絲毫沒有談到这一点。相反地，拉薩尔进行鼓动时的第一句話，就向工人指出了他們进行政治活动的必要性。在拉薩尔的計劃中，举办协社的事业是广泛的、全国性的事业。在車尔尼雪夫斯基那里，則它始終是私人的事业。拉薩尔会把車尔尼雪夫斯基当作舒尔采—德里奇的信徒<sup>217</sup>。拉薩尔的实际計劃和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实际計劃之間的差別，清楚地表明了德国和俄国在內部关系方面有多大的差別。当然，我們并不想說，拉薩尔的計劃像更老的路易·勃朗的計劃一样，不是一个空想。

180

在《怎么办？》这部小說中，一反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慣例，关于拯救人类的愛談得很多。这一点清楚地表現出費尔巴哈的影响。



## 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sup>218</sup>

〔1909年〕

### 导 言

在这里，我們將不去叙述車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和文学活动的黄金时代，即伟大的“六十年代”在我国輿論史上的意义。可以相信，現在每一个人都已知道了这种意义。我們也同样不想写一部关于我們这位作者的传记。的确，目前在出版物上已經可以找到不少写作这样一部传记所需的宝贵材料。但是，整理这些宝贵材料的工作，自然应当由那个有可能获得更宝贵的材料、即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家庭档案的人来做。在說这句话的时候，我們指的是叶·里雅茨基先生，他已經发表过一篇极有趣味的論文：《求学和进入大学时期的車尔尼雪夫斯基》（《現代世界》，1908年5月号 and 6月号）。可以相信，里雅茨基先生將繼續自己的工作，并逐步描述这位六十年代的最伟大代表人物的一生。当《現代世界》杂志发表里雅茨基先生关于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大学时代的有趣味的著作的續篇时，我們这部著作已經付印了。在这里，我們只能限于采用少数极为必需的材料。

尼古拉·加甫利洛維奇出身于一个教士的家庭。他的远祖也是属于僧侶阶层，他們是“平扎省欽巴尔县的大俄罗斯人”的后裔，也就是——順便提一下——別林斯基所出身的那同一个地方。但



是，他自己却生于薩拉托夫(于 1828 年 7 月 12 日)，当时他的父亲在那里担任謝尔盖教堂的执事。叶·里雅茨基先生正确地說，在尼古拉·加甫利洛維奇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历史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注意：“这个卓越而独特的人物所賴以发展的一切条件，是这样自然地形成的，并构成了这样一个特定的智力和道德文化观念的圈子，以致可以毫不夸大地說，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家庭环境，对这个孩子的独立思想和控制健全正常感情的坚强意志的发展，是一种罕見的有利的环境。看来，前个世紀的旧俄生活所能提供的所有最好的东西都在这个家庭中具备了，因而这位未来的作家沒有受到俄国现实的阴暗面的影响，而对这些阴暗面作斗争曾經糟蹋了多少热烈的生命”<sup>①</sup>。这里只須提出一个保留：任何一个家庭，无论它的内部关系多么好，也不能使孩子免受这个家庭周围的社会所固有的阴暗面的影响。不过，叶·里雅茨基本人也承认这一点。他說：“逐渐成长起来的尼古連卡在学习和游戏中，由于环境和父母的关怀，周围现实的阴暗面虽被冲淡了很多，但却依然对他的敏銳的意識发生了影响”<sup>②</sup>。他还从貝平的回忆录中引用了一段話，这段話极其清楚地說明，当时的现实究竟在哪些方面能够对这个天才的儿童产生最强烈的印象。这是一幅“暴力、殘忍、压制个人尊严和人类尊严的阴暗图景”<sup>③</sup>。但是，如果真是这样，那末叶·里雅茨基先生就不能不同意：尼古拉·加甫利洛維奇在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观察，早就应该給予他不少材料来作出这样一些結論，而糟蹋了“多少热烈的生命”的思想通常就是

182

① 参閱前面提到的叶·里雅茨基的文章，載于《新世界》，1908 年 5 月号，第 45—46 頁。

② 同上书，第 57 頁。

③ 同上。

在这些結論的基础上产生的。从这方面來說，車尔尼雪夫斯基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与他的一生中的成熟时期，並沒有任何相反的地方。无可怀疑的只是，幸福的家庭环境使年輕的車尔尼雪夫斯基有可能蓄积起丰富的精神的、甚至純粹肉体的力量，而同丑恶的现实作斗争的那些“年輕的生命”却是很少拥有这样丰富的力量的。

至于說到外部的印象，那末有一个情况就足以使他不断地得到这些印象，那就是尼古拉·加甫利洛維奇受到了相当民主的——如果不說极其民主的——教育。在宗教界，他的家庭被认为是很富裕的，而且我們現在可以看出，他的家庭的这种相对的富裕甚至使薩拉托夫的貧穷的教士感到自慚形秽。但是，他本人的話說明，尼古拉·加甫利洛維奇的父母的生活实际上是并不怎么富裕的，而由于这种并不富裕的生活，他所受的教育也是平民化的。他在1878年2月25日給尤·彼·貝平娜的信中写道：“我們是非常不富有的。您在彼得堡所見到的最貧穷的人，——甚至乞丐，——現在都不会知道，在我們这个不算穷的家庭里‘十戈比銀币’有多大分量。我家并不穷。食物很多。衣服也不少。但是从来沒有錢！因此，我們的長輩連做梦也沒有想到什么家庭女教师之类的东西。我們甚至沒有奶娘。女僕倒有不少。但女僕都忙于料理家务。女僕只能偶尔抽出一点時間来照顾孩子作为工作之余的休息，以致关于这点甚至是不值得一提的。——而我們的長輩呢？两家的父亲<sup>①</sup>从早到晚整天忙着写自己职务方面的文件。他們甚至沒有時間出外作客。我們的母亲也是起早貪黑地工作。她們在精疲力尽之后，就閱讀書籍作为休息。她們願意做并且实际

<sup>①</sup> 尼古拉·加甫利洛維奇在这里所指的除了自己的父亲之外，还有貝平的父亲，貝平的家和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家是住在一起的。

上做了我們的奶娘。但是她們還必須給丈夫和孩子縫衣服，必須照料家務和為各種無錢應付的家務而奔波。

這樣，我們間或有教書的奶娘，而我們有時也就聽她們教課；而更多的是我們自己讀。誰也不‘訓誡’我們。然而我們都喜愛讀書。

除此以外，我們想怎樣生活就怎樣生活。為了使我們不致碰破額頭，有人經常勸告我們。在發生這種極小的事故時，成年人——或是我們的長輩，或是女僕——就來幫助我們。然而重大的不幸事件是不可能發生的。我們沒有危險的玩具；沒有什麼鐵制的玩具，也沒有什麼尖利的玩具。這是因為我們根本沒有花錢買來的玩具。我們沒有錢買玩具。我們沒有什麼東西能把自己弄傷。而且我們的長輩都是和藹的人；甚至女僕也從不吵吵鬧鬧；所有的女僕——您丈夫的農奴老媽媽——都是真正高尚的人。因此我們這些在誠實而質樸的環境里長大的人，在我們的遊戲中也養成了謙遜、謹慎的習慣。總之，我們的遊戲對我們毫無危險。說實在的，我們就像成年人過日子那樣地成長起來了，就是說：我們做了我們所樂意做的一切”<sup>①</sup>。

那末孩子們所“樂意做的”是什麼呢？首先便是鍛煉自己的體力、遊戲和玩耍。杜霍夫尼柯夫在關於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薩拉托夫的生活的文章<sup>220</sup>里說道，尼古拉·加甫利洛維奇在童年時代對遊戲最着迷、最起勁。從他童年時的游伴切斯諾柯夫的回忆錄<sup>221</sup>中也可以看出這點。但是，在切斯諾柯夫關於尼古拉·加甫利洛維奇的童年和少年時代的遊戲的回忆錄中，還有一個特別值得注意之處。

184

<sup>①</sup> 《現代世界》，1908年5月號，第70—71頁219。

他說：“尼古拉·加甫利洛維奇讀了有关希腊人和羅馬人的生活 的書籍之后，早在童年时代(14岁)就已經意識到体育鍛煉对增强体质的重要意义(他曾不止一次地同游伴們談到这一点)，并从事于体育鍛煉，虽然是悄悄地瞞着他的父母做的，因为他的父母大概禁止他从事这种鍛煉。他和其他男孩一起在自己后院里挖了一个坑，并且悬出賞格要大家跳过这个坑。誰跳过了这个坑就可以得奖：苹果、胡桃、錢等等。尼古拉·加甫利洛維奇通常都能跳过这个坑，但是他自己作为我們之中的年长者，是不拿奖的，而把奖品发給别的男孩或者和他們共分。我們所做的体育鍛煉还有：跳越各种障碍物，爬杆，爬树，以投石器擲石子，賽跑和其他等等”<sup>①</sup>。

假如車尔尼雪夫斯基从童年时代起沒有受到这种平民化的朴实的教育和这种模仿“希腊人和羅馬人”的体育鍛煉，他的身体怎样能应付得了他下半生所遭遇的那种有害于健康的环境呢？

从道德方面來說，有自由去做“乐意做的”一切，这是很好的，因为这种自由使孩子有充分的机会去直接观察生活，而不致被各种清規戒律的万里长城把人同生活隔离开来。从各方面可以看出，車尔尼雪夫斯基甚至在他的少年时代初期，就善于用敏銳的眼光去观察他周围的生活。在无疑具有自传意义的小說《序幕》的第一部分中，他这样說明自己的主人公伏尔庚对“貴族”的态度：“他从来也不属于狭小的上流社会，而不仅是从来不属于貴族們的上层的、显貴的社会。但是，哪一个城市或小鎮不响彻着他們煊赫的名声呢？他从童年时代起就知道，这是一些粗暴的、无耻的人”<sup>②</sup>。

185

然而伏尔庚(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自己童年时代不仅观察了

<sup>①</sup> 費多罗夫：《俄国伟人的生平。車尔尼雪夫斯基》，阿斯哈巴德 1904 年版，第 5—6 頁。

<sup>②</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10 卷，第 1 部分，第 2 篇，第 171 頁 222。

“贵族”。他也观察了所謂平民。

“他想起了他故乡城市里的街上，常常走过成群酒醉的絳夫：吵鬧，叫喊，唱豪迈的歌，唱盜賊的歌。异乡人会以为：‘城市瀕临着危險，——商店和住宅要馬上遭劫，一切东西要被打个粉碎。’崗棚的門微微打开，从那里探出一个睡眼朦朧的老头的脸，长着花白的鬚鬚，张开沒牙的嘴，又像吼叫，又像自語似的用干枯苍老的声音說：‘畜生們，嚷什么！看我揍你們！’。这群勇猛的絳夫立刻肃靜起来，前头的人都躲藏到后面的人背后去了；如果再这样大声叫罵一下，那末这些自豪为‘我們不是小偷，也不是强盜，而是斯金卡·拉辛<sup>①</sup>的部下’，吹牛說‘只要他們一搖槳’，連‘莫斯科也会搖幌起来’的勇猛的小伙子們，准会四散奔逃的，而下一次在崗棚門口叫嚷的准会是殘废者了；可是老看守人懂得：过分威吓这些年輕小伙子們，害得他們碰破头、摔断腿、永远成了殘废，那要开罪于上帝的。因此，那看守人就聞了下鼻烟，說：‘小伙子們！上帝保佑，走你們的吧！只是別吵醒我这个老汉，別惹我心煩。’就又钻进崗棚去了。于是，这一群斯金卡·拉辛旧部下的年輕力壯的小伙子們，就一面小声地互相庆幸遇着这个看守是个老好人，一面就乖乖地走掉了”<sup>②</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說，伏尔庚在童年时代对这样的場面感到困惑莫解。

由于《序幕》这部小說(实际上是它的第一部分——《序幕的序幕》)具有自传的性质，因此可以說，童年时代的感受就已使車尔尼雪夫斯基产生了一个念头，这个念头使他后来描繪出了刚才引述

① 斯金卡(Стенька)是斯切潘的卑称。这里所說的是著名的俄国农民起义的領袖斯切潘·拉辛。 譯者

②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1部分，第2篇，第171頁223。

过的那幅不仅仅具有幽默味道的画面。这幅幽默的画面不能不对成年的車尔尼雪夫斯基关于“平民”的观念发生深刻的影响。我们在下面将不止一次地谈到他的这种观念。现在我们只想指出，只有那些不受教育者的妨碍，而能够密切接近现实并对各种现象进行思考的孩子，才能观察这种日常生活的场景，并且对之感到困惑莫解<sup>①</sup>。

186 但是，不管車尔尼雪夫斯基所受的教育多么平民化，其中仍有一种值得我们充分注意的独特的贵族主义的因素。要了解这种因素的意义，就应当注意到例如車尔尼雪夫斯基的下面这个陈述：

“现在，我听说，在许多正教中学里，也许在所有正教中学里，酗酒现象已经减少或者完全消灭了。然而在我那个时候，在薩拉托夫的正教中学里，中学生的任何一次聚会都不能不狂饮一番。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sup>②</sup>比自己的同学们要年轻得多，即使家庭生活没有阻止他养成这种嗜好，他也是不适宜参加狂饮的”<sup>③</sup>。

他接着又说：“当我转到修辞班的时候，在我的一百二十二个同学中，十四岁的只有四人，十三岁的只有一人——我们都把他看做孩子。这个年轻人纵饮作乐闹得非常厉害，并且特别喜欢做出各种恶作剧”<sup>④</sup>。

可以看出，对当时的中学生来说，酗酒是很有诱惑力的：酗酒能使一个人在同学中间被看成是好汉。但是，据我们所知，車尔尼雪夫斯基却从来也没有受这种诱惑。为什么呢？我们在此姑且不

① 叶·里雅茨基先生说：“他在薩拉托夫时——那是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已经深刻地理解到人民的困苦和愿望，后来他的论农民问题的文章就显示出这种深刻的理解”（《现代世界》，1908年5月号，第57页）。我们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

② 这里指的是杜勃罗留波夫。

③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9卷，第10—11页224。

④ 同上书，第11页225。

作其他可能的推測，只提醒讀者注意車尔尼雪夫斯基本人关于杜勃罗留波夫所說的話：“由于杜勃罗留波夫很年輕，即使家庭生活沒有阻止他参加狂飲，他也是不适宜参加中学生的狂飲的。”这一段話說明：在車尔尼雪夫斯基看来，家庭生活阻止了年輕人养成纵酒的嗜好。但是家庭是各式各样的。如果要家庭生活使年輕人不致受到坏榜样的影响，那末家庭生活本身就必須不給他們做出坏榜样。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家庭在这方面也是很好的。尼古拉·加甫利洛維奇的父亲当然是一个旧派的人，然而他始終是个头脑清醒、勤勞而严肃的人。这对一个男孩子来說是很大的幸运。但还不止这一点。在車尔尼雪夫斯基与他的中学同學們的关系日益密切的情况下，假如沒有受到他的地位中的那种我們称之为独特的“贵族主义”因素的阻碍，那末他毕竟可能沾染上同學們酗酒的“恶风”。由于他的家庭比較富裕，所以他与中学同學們的接近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談到杜勃罗留波夫的生活时，他本人也承认这个因素的重大意义。更可注意的是，他正是用自己本身的例子來說明这种意义的。

187

他說：“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維奇是一个城市里的神甫的儿子，他的父亲很受教区当局的尊敬。为了使不熟悉正教中学生生活的人能够理解这一点，我来談一下我自己与同學們的关系。我的父亲也是一个省城里的富裕（1）教区的神甫（我父亲的薪金达1,500紙卢布之多，因而我們生活得不算穷）。所有的同学都是我的朋友；其中有十个人是我的知心朋友。我們在鬧着玩摔跤中究竟摔过多少次，——是不可胜計的；一句話，在課室里和‘神学校宿舍’里（我差不多每天到那里去作友好的聊天），同學們很少同我讲客气，正像对任何別人一样。但是只有两三个同学到我家作客，而且他們也不常来；并且應該說，他們根本不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他

們只不过是一般的朋友而已；然而他們并不羞于到我家里来拜訪我，因為他們有体面的衣服和鞋子。再沒有比大多数正教中学生更穷的了。我記得，当时正教中学的六百个人中間，只有一个人有狼皮大衣，——而且就是这件不平常的皮大衣也甚至被人看成是不大适合正教中学生穿著的东西，就像一个庄稼汉戴上钻石戒指一样。我記得，已故的米夏·列維茨基除了冬天穿的蓝色粗呢制的农民上衣和夏天穿的黄色土布长袍以外，再沒有别的衣服了，——我記得，当我因为发热病而三个星期足不出户的时候，我这个最早的朋友怎样不敢来看望我；可是我和列維茨基却原是不能隔日不見的密友，而当他不来上課的时候，我却是每天都要上他那里去的。简单地說，尽管我家的名望和財富只够得上中等水平，然而差不多我的所有同学到我家来总是觉得腼腆，他們在我家感到自己是穷光蛋和渺小的人，正如我在得文郡公爵<sup>①</sup>的沙龙里感到自己是穷光蛋和渺小的人一样”<sup>②</sup>。

尼古拉·加甫利洛維奇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就是这样，它一方面使他能够毫无阻碍地观察他周围的极其丑恶的現實，同时又使他有不致沾染上它的污秽的幸运机会。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有这样的运气的。

188 他一生中的这个时期的第三个幸运条件是：他的父亲，一个极有教养的人，培养他直接进了正教中学，从而使他避免了讀“神学校”。在“神学校”里，孩子們只要犯了极其微小的过错，按照当时的慣例，就要受到可敬的教师們的“体罰”。他在1844年9月1日进了正教中学的修辞班。在学校里他的功課一般說来是很好的。但是，大概他在《应该抑制情欲》、《遵守教規的人会像賽恩山一样水

① 得文郡公爵(Duke of Devonshire)是英国著名的貴族。——譯者

②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9卷，第10頁226。



远站得住》、《上帝拯救我輩》这样一些作文中成績特別好。这位未来的《同时代人》杂志的批評家和政論家，發揮了这些有教訓意义的題目，使他的語文老师感到十分滿意。这位語文老师认为：“可以期望，作者将来定会成为自己事业的能手”<sup>①</sup>。

随着他升入哲学班，这位年輕的“作者”的作文題目就愈加具有深刻意义了。我們这位年輕的中学生写了一篇論文，在这篇論文中证明，“对上帝的敬畏是大睿大智的开始”；他还写过《論旧約聖經传来的开始和意义》、《論世界的本质》、《論原生本质到現象的逐漸轉化》、《論世界的空間》等文章。但是，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尼古拉·加甫利洛維奇早在这些作文中，就不得不接触到“感官是否会欺騙我們？”这个問題，他在后来成熟时期曾經非常重视这个問題，并且他在从西伯利亚回来后所写的一篇文章（《人类知識的性质》<sup>227</sup>，我們在后面将要談到这篇文章）中也討論了这个問題。关于这一点，我們在叶·里雅茨基的文章里讀到：

“車尔尼雪夫斯基反駁了断言不可能确定我們关于事物的表象是否与事物本身相符合的艾卡茨豪逊。車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艾卡茨豪逊的证明是沒有說服力的。如果我們关于研究对象本身的性质沒有 a posteriori<sup>②</sup>、經驗的证明，那末我們可以利用 a priori<sup>③</sup> 证明。假如感觉只是欺騙我們，因此不是帮助我們，而是損害我們，使我們陷入謬誤，那末为什么要給予我們感觉呢？‘而在这种情况下，誰是使感觉欺騙我們的罪人呢？毫无疑问，就是給予我們感觉的那个人。然而要使上帝成为撒謊的罪人和欺騙的原因，这

---

① 上面所提到的叶·里雅茨基的文章，載于《現代世界》，1908年6月号，第38頁。

② 后天的。——譯者

③ 先天的。——譯者

是绝对不可能的。而假如使上帝成为撒谎的罪人是不可能的，那末我们就应该承认，他并没有给予我们这样的感官，让这些感官来欺骗我们。”教师对这篇作文的批语是：“极好”。显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完全满足了教师的要求，过多的思考是不允许的”<sup>①</sup>。

后来車尔尼雪夫斯基解决了这个问题，当然他是根据另一些理由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他的最后结论归根结底始终是一样的：他总是对那种鼓吹外部世界不可认识的理论采取非常蔑视的态度。

但是他没有让正教中学当局为他在科学方面的成绩高兴多久。1845年12月底，他就提出了退学申请书，而到次年5月他已“长途跋涉”前往彼得堡进大学了。他这样做是得到父母完全同意的，他们同意他这样做，自有其生活上的理由<sup>②</sup>。至于車尔尼雪夫斯基本人，那末我们只有一些间接的材料，可以说明促使他放弃宗教职业的原因。不过，这些材料说得相当明显。他本人关于自己写道：“亚历山大医院附属教堂的神甫，彼得·尼基佛罗维奇·卡拉科佐夫第一个对我做了正中下怀的祝愿。他在谈到我即将前往彼得堡的旅行时说道：‘愿上帝让我们再能见到您，希望您成为一位教授、大人物来见我们，到那时候我们都将白发苍苍了。’他还补充说道：‘我的心忽然因此受到感动！要是见到一个人，他虽然是无心地，也许是并非事先想好地，但终究说出了你自己所想的東西，希望你去做你自己所渴望的事，这件事几乎是任何人都不会对自己或对你提出的，特别是像我这样年龄和这样境遇的人，这是多么愉快呀’<sup>③</sup>。他在前往彼得堡的途中遇到了普罗塔索夫执事，普

① 《现代世界》，1908年6月号，第40—41页228。

② 同上书，第44—45页。

③ 同上书，第46—47页229。

罗塔索夫对他說：“我希望您成为一个有益于教育和俄罗斯的人”，这位未来的大学生又写道：“我現在負有这样的义务，那就是要永远感謝他和彼得·尼基佛罗維奇的祝願，这两个人确实能够懂得对荣誉的追求和为人类服务是什么意思。媽媽說：‘这已經太多了，从爸爸媽媽的眼光看来这也足够了；不，对于他說来这一点还是太少；就是还应该成为一个有益于整个祖国的人。’我必須永远記住他們的話”<sup>①</sup>。对这点还可以补充一句，車尔尼雪夫斯基还在他的一篇中学作文中，就已作为“教育”的一个热烈拥护者而发表意見了。这篇作文的題目是人类的教育取决于青年一代的教育。据引证这篇少年时代作文的叶·里雅茨基先生說：“車尔尼雪夫斯基明确而彻底地确定了青年一代所担負的任务和青年一代从过去所取得的文化知識財富之間的联系”<sup>②</sup>。他在那篇作文里說：“知識是取之不尽的矿山，它的所有者越往深处发掘，他越会得到更加丰富的宝藏。”但这篇作文的結尾特别令人感兴趣，在那里我們这位年輕的作者号召人們在知識領域內进行不倦的活动。他大声疾呼地說：“我們只要想一想！整个人类的教育进程都取决于我們的活动”<sup>③</sup>。然而車尔尼雪夫斯基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大概还没有把世俗教育和所謂宗教教育区别开。而后来他的青年人的思想很快就发觉了这个区别，并且看出了宗教职业是不适合于他对事物的观点和他的願望的。

190

1846年8月，他被录取为彼得堡大学的学生。关于他的大学生时代，我們知道得很少。看来，費多罗夫先生所說的以下这些话是无可怀疑的：“在大学时期，尼古拉·加甫利洛維奇学习了古代

① 《現代世界》，1908年6月号，第47頁230。

② 同上书，第40頁。

③ 同上 231。

語、語文学、斯拉夫方言,听了著名哲学家和考古学家伊·伊·斯列兹涅夫斯基的課,并且在他的指导下为伊巴捷夫<sup>①</sup>編年史編纂了一本辞典。这本辞典发表在1853年的《科学院第二学部通报》增刊》上<sup>②</sup>。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太含糊了。例如,我們不知道車尔尼雪夫斯基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写他的最初的試作。他的全集第一卷是以两篇书评(評吉尔費尔丁格和奈依基尔赫的著作)开始的,这两篇书评发表在1853年的《祖国紀事》杂志第7期上<sup>233</sup>。由此可以断定,他的文学活动开始于这一年的年中。但是在同一卷中,在关于斯塔尔切夫斯基的《日用百科辞典》的书評中,我們讀到:“在这部辞典的第一卷出版的时候,我們就为它写了詳細的評論(見《祖国紀事》,1847年第8期),这篇評論证明:这一类著作要真的有益于公众,必須根据考虑周密的計劃来編写,并要极其准确地来完成,而日用辞典却既沒有滿足前一个条件,也沒有滿足后一个条件。可以看得出来,讀者是完全同意我們的”<sup>③</sup>。这是什么意思呢?

关于这一点可以提出两种假設,現在我們就来分別对它們进行考察。

首先,可以假設——而且这个假設当然首先会被人想到,——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活动早在1847年(如果不是更早的話)就已开始了,因而,只是由于他的全集的出版者的疏忽大意,才沒有把关于上述辞典第一卷的評論收入这部全集。这种假設沒有令人难于置信之点:在1847年,車尔尼雪夫斯基已經十九岁了,也就是

① 这儿費多罗夫先生写错了一个字,把“伊巴捷夫”誤写为“伊格納捷夫”。现在这部辞典收入《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2部分232。

② 費多罗夫:《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阿斯哈巴德1904年版,第11頁。

③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卷,第14頁234。

說已經达到了完全可能写出有条理的书評的年齡。如果接受了这个假設，我們就难免要遇到两个問題。上述的評論是否真的是我們这位作者在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呢？难道他在1847年发表了那篇評論之后，直到1853年7月，如我們所知，在同一杂志上发表他关于吉尔費尔丁格和奈依基尔赫的书的評論以前，就沒有发表过任何作品嗎？这两个問題中的無論哪一个都是我們所不能解决的；大概，只有米·尼·車尔尼雪夫斯基或叶·里雅茨基先生才能解决这些問題<sup>①</sup>。

在这里可以提出的第二个假設是：刊載于《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一卷中的关于《日用百科辞典》的評論，不是他写的，而是《祖国紀事》的另一个撰稿人写的，在这种情况下，1847年发表的关于那部辞典第一卷的书評当然也出于那个撰稿人的手笔。这个假設也同样沒有令人难于置信之点。当时在《祖国紀事》上发表的书評是不署名的。誠然，关于某一篇文章出于哪个作者的手笔的問題，不仅可以根椐它的署名来判定。它的内容和語言通常也有助于識別它出于誰的手笔。但是，我們根据后面提到的这些特征，认为第二種假設比第一種假設更有可能成立。

192

我們知道，要判定像車尔尼雪夫斯基在1847年那样刚开始写作的作家的語言，是很困难的：刚开始写作的作者所用的語言還沒

<sup>①</sup> 在受审訊的时候，車尔尼雪夫斯基供称，他早在1846年7月或8月就翻譯了《Journal des Débats》（《辯論杂志》）上的一篇杂文向《祖国紀事》編輯部投稿，而在1847年末或1848年初曾把一篇小說交給涅克拉索夫，想在《同时代人》杂志上发表（小說的内容是描述一个在貴族女子中学里培养大的孤女后来落在坏人手里的不幸遭遇）235。这篇小说沒有发表（雷姆克：《車尔尼雪夫斯基案件》，載《往事》，1906年第4期，第161頁）。这是目前我們所知道的全部材料。但是这些不多的材料似乎证明，車尔尼雪夫斯基在当时与克拉耶夫斯基（即与《祖国紀事》）及涅克拉索夫（即与《同时代人》）并沒有什么其他文学上的往来，否則他就会提到这种往来，然而他在自己的供詞中只是說，直到1853年他才重新見到上面所說的那些人。

有完全定形，因此不能代表他們的特征。但是，我們觉得 1847 年发表的那篇书評的語言是已經完全定形了的。这一点就其本身而論也并不具有决定的意义，因为讀了杜勃罗留波夫最初发表的作品，也未必有誰会說它們是文学界的新手所写的。然而問題在于，当車尔尼雪夫斯基还在大学四年級的时候，他写文章所用的語言比起我們感兴趣的那篇书評所用的語言是远沒有定形的。讀了他論《馮維辛的〈旅长〉》的文章后，就很容易相信这一点。这篇文章第一次刊載于他的全集第十卷第二部分中，但是，从出版者在这篇文章前面所写的附注中可以看出，它正是車尔尼雪夫斯基在四年級的时候写的<sup>236</sup>。这篇文章的作者，在运用語言方面，无疑地远不如《日用百科辞典》第一卷的評論的作者那样“得心应手”。

关于这篇評論的內容也应当这样說。它显示出作者的完整的世界观和丰富的知識，这些东西是我們在論《旅长》的文章里所看不到的。可是这篇文章是車尔尼雪夫斯基在四年級的时候写的，而 1847 年的那篇书評，如果是出于他的手笔，那末不是在一年級結束时写的，便是在刚刚升入二年級的时候写的。因此我們认为，他的全集的出版者把这篇評論（第 1 卷第 14—25 頁）当作他的作品，是弄錯了。

但可惜的是，这也仍然沒有解决我們这位作者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文学試作的問題。在等待解决这个問題时，我們再来看一下論《旅长》的文章。这篇文章很值得加以詳細研究。

几乎在那篇文章一开头，年輕的作者就提出了一个极有趣味的保留条件：

“我根本不談馮維辛对社会的影响，因为假如馮維辛有这种影响的話，那也是过于微小的。可是，必須讲清什么叫做一部文学作品对社会的影响：假如这指的是一部新作品发表时人們对它的議

論，对它的作者的贊揚或指摘，那末馮維辛是有这种影响的，特别是他的《旅长》这部剧本；他本人在自己的自白中談到，宮廷里怎样紛紛議論他的《旅长》，达官貴人怎样爭先恐后地邀請他朗誦他的喜劇，——但是，似乎这还不能叫做对社会的影响。只有在这样的時候文学作品才可能对社会发生影响，那就是作为一部作品的基础的思想跟社会的现实生活（思想的、道德的或实际的生活，反正都是一样，但一定要跟现实的生活）发生活生生的关系，使人們在讀了这部作品之后，感到自己与过去有所不同，感到他們对事物的看法更清楚了或发生了变化，感到他們的思想生活或道德生活受到了推动”<sup>①</sup>。

这些话簡要地表明了車尔尼雪夫斯基后来加以詳尽發揮的那个对文学任务的观点，这个观点也是杜勃罗留波夫所接受的<sup>②</sup>。在这里已經可以看到未来的《果戈里时期俄国文学》的作者了；但是这位作者还没有形成后来他所特有的那种独创的风格；他只是开始形成这种风格。他的論据也同样缺乏他的晚期著作使讀者感到驚訝的那种丰富的材料。現在可以看出，放在我們面前的毕竟只是一种“試笔”。但是，除了我們所引的这段话以外，还有一段話也表明这篇“試笔”是多么耐人寻味：

“人們提出的要求是：‘作家、特别是戏剧作家所描写的性格，一定要得到发展；假如这些性格始終不变的話，那末作者就有过錯，而作品也就缺乏艺术价值’，——你不断地听到这种要求，不断地听到責备这部或那部作品沒有滿足这种要求。但看来不能把这个要求提出来作为文学作品的艺术美的永远适用的規律。艺术性

<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2部分，第2頁237。

<sup>②</sup> 关于諷刺作品的意义問題，特别可以參閱杜勃罗留波夫的《叶卡特林娜时代的俄国諷刺作品》一文（《同时代人》，1859年第10期），收入他的全集第1卷238。

的规律不能与现实存在的东西相矛盾，不能不按现实界的真实面貌去描写现实界；现实界是个什么样子，它也就应该如实地反映在艺术作品中。而在现实界，我们常常遇见浅薄的天性、不很复杂的性格，一眼就能把这样的人看透，看到他的一切的一切，假如同他一起生活二十年，那末除了他的最初的话和他的最初的意见中所显露出来的东西以外，在他身上再看不到任何别的东西。这样的人既然在现实中没有发展自己的性格，那末在艺术作品中他又怎么能在你们面前发展自己的性格呢？”<sup>①</sup>

194

这里所表述的思想，就是别林斯基在他的文学活动的晚期所形成的思想；他们都同样注意现实，同样深信艺术家应该如实地描写现实，既不夸大，也不缩小。从这方面来说，论《旅长》的文章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传记作者具有重大的意义。它说明，在大学毕业以前，我们的作者曾经是别林斯基的忠实信徒，后来他也始终对别林斯基怀着热烈的尊敬。

但是，能不能说他正是靠别林斯基及其小组的著作培养出来的呢？能不能说他正是从这个源泉汲取了自己的观点呢？——不，这样说并不完全正确。毫无疑问，车尔尼雪夫斯基从别林斯基得到很多教益；但毕竟应该承认，他远不是在一切方面都得到别林斯基的教益。

虽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著作中很少谈到自己的思想发展史，但终究他也偶然顺便地作过某些简短的叙述，对他的思想发展史作了一定的说明。他在杜勃罗留波夫死后为了答复某个З-н先生的文章而写的一封信就属于这类为数甚少的作品；这封信刊载于1862年的《同时代人》杂志二月号。顺便提一下，那位З-н先

<sup>①</sup>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2部分，第7页239。



生在自己的文章中曾經說，已故的杜勃罗留波夫是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学生，并且受到他的极强烈的影响。車尔尼雪夫斯基激烈地、甚至非常愤慨地否认这一点，他說，杜勃罗留波夫完全是独立地达到自己的观点，并且無論按其智力或文学才能來說都远远胜过他。我們現在不需要做出判断，这个謙虛的声明究竟有几分符合真情。老实說，我們非常怀疑它是否符合真情。但在这里，这与我們无关；在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整篇信中，我們現在只对下面一点感到兴趣。車尔尼雪夫斯基提醒 З-н 先生說，杜勃罗留波夫懂得德文和法文，因此能够从原著來閱讀法国和德国的一些最卓越的文学作品。然后他說：“如果一个有才华的俄国人在他本身发展的关键年代要閱讀我們共同的西方伟大导师們的书籍，那末，用俄文写成的书籍和文章虽然可能使他喜爱、使他贊賞（正如杜勃罗留波夫在当时也曾贊賞过某些用俄文写成的作品），但無論如何，对他來說，用俄文写成的书籍和文章却不能成为他通过閱讀所汲取的那些知識和概念的最重要的来源。至于說到我的文章对杜勃罗留波夫的影响，那末这种影响甚至还不如別林斯基的文章所起的那种不太 195 太大的影响。当时我在文学界並沒有重要的影响”<sup>①</sup>。实际上，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这里所說的那个时期——即在 1855—1856 年間，已經发表了他的著名的《果戈里时期俄国文学概观》。他的影响比他自己所說的要大得多。但是，我們再說一遍，在这里这与我們无关。對我們來說，在这里重要的只是，車尔尼雪夫斯基也懂外国文，也在自己发展的关键年代讀过“我們共同的伟大西方导师們”的书籍。因此可以設想，用俄文写成的某些文章和书籍（其中占首要地位的是別林斯基的著作）也只能使他贊賞，但同时对他來說，

① 《致謝》（給 З-н 先生的信），《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9 卷，第 101 頁 240。

它們不是“他的概念和知識的最初来源”。

这个来源究竟是什么呢？論《馮維辛的〈旅长〉》的文章也对这点提供了某些綫索。它的年輕的作者說道：

“不能不怀着愉快之感去讀我們时代的最伟大作家的《小芳黛》、《弃儿法兰索亚》和其他諸如此类的小說：在这种美的、純洁的境界中休息，真是多么美妙啊！你会高兴地把这些农民中的每一个人称为自己的朋友，在他們的社会里无忧无虑地过上几年，并且恐怕根本不会想到你在才智和教养方面高于他們，哪怕你真的是大大地高于他們；然而他們（除了芳黛本人）却全都是眼界狭小的人，而且大部分是眼界非常狭小的人。难道不是这样嗎？”<sup>①</sup>

这段极有趣味的話說明，車尔尼雪夫斯基讀乔治·桑描写农民生活的小說入了迷，当时她的小說还是新发表的作品<sup>②</sup>。他认为乔治·桑在当时的作家中間占有最首要的地位。但是，他当然不只是閱讀和研究法国作家的作品。他在同一篇文章里对十七世紀法国文学的評論，表明他当时已經受到萊辛非常强烈的影响。几年以后他写了一部有关萊辛的专著<sup>③</sup>。可是，应当指出，这些評論是非常偏頗的，假如必須把这一点归之于萊辛的影响，那末就只得加上这样一个附带条件：这位年輕的俄国学生在自己热情奔放时过于夸大了他的德国老师的思想<sup>④</sup>。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2部分，第13頁241。

② 《La Petite Fadette》（《小芳黛》）这部小說出版于1848年，《François le Champi》（《弃儿法兰索亚》）这部小說則出版于1850年。

③ 《萊辛，他的时代、生平和活动》（《同代人》，1856年第10—12期，1857年第1期，第3—6期。參閱《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3卷）242。

④ 例如，可參閱他对于十七世紀法国喜剧和它的“至今有名的代表者”莫里哀的极带輕蔑意味的評語：“在莫里哀的全部作品中，未必能找到連續二頁的正常的對話；为了引人发笑，为了使人物性格变得‘更突出’，一切都被弄得牵强和过火了。”（同上书，第15頁）243。

除去車尔尼雪夫斯基还在正教中学里的时候大概就已熟悉的席勒和歌德以外，看来他在进大学以前的时期内就已开始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家、特别是黑格尔。但是，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当时只知道“俄国人对黑格尔体系的解說，非常之不充分的解說”。从他的話中可以看出，这些不充分的解說“是用黑格尔左派的精神來闡述这位伟大的德国唯心主义者的体系的”<sup>①</sup>（这不是指赫尔岑的《自然研究通信》嗎？）。其次，我們还是根据車尔尼雪夫斯基本人的叙述而知道，在研究了黑格尔之后——他在前往彼得堡以后开始从德文原本來研究黑格尔，而且原著中的黑格尔不如俄国人叙述中的黑格尔使他喜欢——他“偶然地”得到了路德維希·費尔巴哈的一部主要著作。《基督教的本质》的作者对他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車尔尼雪夫斯基自己說，他“变成了这位思想家的信徒”，并且热心地反复閱讀了他的著作。

正如他本人所說，在他由于生活上的需要而写作学术論文之前六年，換句話說，也就是在他坐下来写他有关美学的碩士論文之前六年，他已开始閱讀費尔巴哈的著作。而因为这篇学位論文是他在1853年写成的<sup>②</sup>，所以，他开始閱讀費尔巴哈的著作大概还在大学二年級的时候<sup>245</sup>。無論如何，他一直到自己生命的結束始終是費尔巴哈的信徒。我們可以請費多罗夫先生注意以下这个情况，那就是这位思想家对我们这位伟大作家的哲学观点的影响，要比“著名哲学家伊·伊·斯列茲涅夫斯基”的影响更大得不可比拟（參閱上文）。

---

① 參閱《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第三版序言，載于《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2部分244。关于这篇有趣的序言，可參閱下面的《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观点》那一章。

② 參閱《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2部分，第84頁出版者的附注。

197

费尔巴哈为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整个世界观提供了哲学基础。但是我们已經知道,我們这位作者讀乔治·桑的小說入了迷。这些小說接触到了与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直接有关的許多問題。如果假定,車尔尼雪夫斯基还在大学讀書的时候就已对这些問題作了很多研究,我們大概是不会弄錯的。十分可能,他当时已經知道了一些最重要的社会主义学說并开始研究政治經济学<sup>①</sup>。我們暂时还没有任何直接材料說明他怎样进行这种研究。有一点是我們几乎能有充分把握来說的。尽管当他打算去彼得堡的时候,曾經由于听到希望他成为大科学家的卡拉科佐夫神甫的話而感到非常兴奋,然而到了更成熟的年齡时,他已經不打算成为一个专门学者了。文学批評家和政論家的活动使他向往。还在正教中学里,他就决定献身于为祖国謀福利的工作。也許,他当时就已經发现,这种工作与其說应该具有学术性,不如說应该具有政論性。在《果戈里时期概观》中,他很明确地发表了这样的意見。

他在这部著作中說道:“有許多极伟大的科学家、詩人和艺术家,曾經一心献身于純科学或者純艺术,而不是单单为自己祖国的某种特殊的需要效劳。培根、笛卡儿、伽利略、萊布尼茨、牛頓,今天的洪堡尔特、李比希、居維叶和法拉第,他們过去和現在都为着科学的一般利益操劳,而并不考虑在特定的时期必須为了某个曾是他們祖国的国家的幸福而操劳。我們并不知道,也不問自己,他們是否爱过祖国,因为他們的光荣和爱国主义功勛的关系是离开得那么远。作为智力世界的活动家,他們都是世界主义者。关于西欧的許多伟大的詩人也必須这样說。我們要指出他們中間最伟大的人——莎士比亚作例子……我們要举出阿里欧斯托、高乃依

<sup>①</sup> 还在1854年,《同时代人》(第6期)就发表了他关于列沃夫的《論土地是财富的要素》一书的很好的評論246。

和歌德。人們所以提起他們的名字，是由于他們为艺术所建立的艺术上的功績，而不是由于他們致力于为祖国謀幸福的独特心願”<sup>①</sup>。在我們这里却不是这样。按照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意見，俄国的智力世界活动家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他們还不能成为世界主义者，也就是說，还不能考虑純科学或純艺术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根据他們国家的条件，他們必須是“爱国主义者”，即必須首先考虑自己祖国的特殊需要。在这个意义上，彼得大帝这个立志要把欧洲文明的一切成果輸入俄国的人，在車尔尼雪夫斯基看来乃是“爱国主义者”的理想。他认为，甚至在他那个时代这个目的也远沒有完全达到。“到現在为止，俄国人在真理、艺术、科学的这些崇高观念之前唯一可以做到的功績——就是帮助它們在祖国传播开来。随着时序的推移，在我們这里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也将像在其他民族那里一样，純粹为了科学与艺术的利益而行动；但是，当我們就本身的教养說来还不能跟最有成就的民族并駕齐驅的时候，我們每个人都有另一种内心感到更加切近的事业——尽力促进彼得大帝所創始的事业繼續发展。这个事业直到現在还在要求，而且看来还将长久要求我們祖国最有才禀的人，献出他所赋有的一切智慧和道德的力量”<sup>②</sup>。車尔尼雪夫斯基正是希望献出自己的力量，在自己祖国传播真理、艺术和科学的崇高观念。从各方面看来，远在他登上文学舞台以前，这种心願就已經成熟了。大概，还在大学讀書的时候，他的这种心願就最終地巩固起来了。

198

后来，車尔尼雪夫斯基在他遭到监禁并被控宣传社会主义学說的时候写道：

“我不是一个严肃的、学术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原因非常簡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2卷，第120—121頁247。

② 同上书，第121—122頁248。

单：我不願意維護旧理論而反对新理論。我——不管我是怎样一个人——总是力求理解社会生活的現狀以及由这种社会生活中产生出来的信念。研究政治經濟学的人分裂为社会主义者和非社会主义者两个学派——这是已經成为过去的、科学历史发展中的事实。科学的这种内部分裂在实践上的应用，也已成为过去的事实：在英国这是老早以前的事，在西欧大陆則是 1848 年事变以来的事。我知道，有許多落后的人认为，我的这个意見是值得爭論的；但这种爭論已經是关于我的学术信仰是否有充分根据的問題了，——这个題目並沒有法律的意义，可是却把它当成一个案件来处理”<sup>①</sup>。

199 無論什么道德都不能要求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自己的起訴人面前坦白地叙述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思想。因此，他所做出的所有这一类供詞，只有在传记作者能够对它們作适当批判的情况下，才能作为他的传记的材料。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批判應該闡明，“我不是一个严肃的、学术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这个声明究竟是什么意思。实际上，它的意思是：按照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意見，人所共知的过去社会主义与政治經濟学之間的对立已經完全过时了。而这种意見又意味着，社会主义不仅不應該和政治經濟学进行斗争，而且相反地，还應該借助于政治經濟学的一些最主要的原理来論证自己的要求。本着自己的这种信念，車尔尼雪夫斯基翻譯了約·斯·穆勒的《政治經濟学原理》，并且作了注释。而当他被控传播社会主义学說的时候，他援引了这一点作为替自己辯护的理由。从我們所引证的那个文件的另一处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車尔尼雪夫斯基在那个文件里說道：“在法律意义上，在唯一

<sup>①</sup> 雷姆克，《車尔尼雪夫斯基案件》（《往事》杂志，1906 年第 5 期，第 102 頁）。

具有法律意义的严肃的、学术的意义上，‘社会主义者’这个名词是与我的活动的事实相违背的。我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篇幅最大的作品，是李嘉图的学生穆勒的论著的译本；穆勒是我们今天的亚当·斯密学派的最大代表者；他对亚当·斯密比罗雪尔更忠实得多。在我为译本所写的注释中，篇幅最大的是关于马尔萨斯定律的研究。我进行这种研究，并力求粉碎<sup>①</sup>马尔萨斯的公式。这个原则是考验是否绝对忠实于亚当·斯密精神的试金石”<sup>②</sup>。

鉴于前面已经提到的那种过去社会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的对立，控告一个翻译了穆勒的书并且要求经济科学绝对忠实于亚当·斯密精神的人犯了宣传社会主义的罪，这在法律的意义上当然是荒谬的。然而这绝不使下面这个问题失去它的理论的意义，那就是車尔尼雪夫斯基用什么观点来为穆勒作注释，他是否持有这样的意见，即绝对忠实于亚当·斯密精神的经济科学一定会导向社会主义。下面我们要指出，我们的作者正是用社会主义的观点来为穆勒作注释的。此外，我们还要在下面指出，他怎样从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中作出社会主义的结论。可是，大概无论谁都不会对这一点提出异议。大概谁也不会怀疑車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我们已经在序言<sup>249</sup>中说过，直到如今还有许多人拒不承认車尔尼雪夫斯基是空想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我们希望，我们下面的叙述将足够清楚地向读者表明这种否认态度是没有根据的。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以下这一点：

車尔尼雪夫斯基的确认为过去社会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的对立已经过时。然而在他那里，这主要是意味着，在有了1848年的经

<sup>①</sup> 在雷姆克先生的文章中印作“发展”。但这是一个显然的误排（俄文的“粉碎”是 разбить，“发展”为 развить，“б”与“в”比较容易混淆。——译者）。

<sup>②</sup> 雷姆克：《車尔尼雪夫斯基案件》（《往事》杂志，1906年第5期，第102页）。

驗以后，已經不能把希望寄托于人們的利他主义的感，即对被压迫者的怜悯、对他人的同情等等，而必須訴諸他們的理智，并且从利益、經濟“得失”的观点去保卫社会主义。但是，正如我們將要指出的，这样地訴諸利害得失絕不排斥对于社会生活的空想主义观点。

在車尔尼雪夫斯基写于西伯利亚的长篇小说《序幕》的第二部分中，列維茨基（杜勃罗留波夫）在会见了伏尔庚（車尔尼雪夫斯基）以后，在自己的日記中写道：“他不相信人民。在他看来，人民像社会一样坏，一样庸俗”<sup>①</sup>。假如我們沒有弄錯的話，那末这就是說，根据車尔尼雪夫基本人的回忆，他对人民的看法使杜勃罗留波夫产生了完全“不信任”的印象。下面我們將詳細地叙述这种看法，那时讀者就可以看到，車尔尼雪夫斯基实际上并没有对俄国和西方的人民的首創精神寄托希望。按照他的意見，社会制度方面的进步和任何有利于人民的变革，都是由“优秀人物”，即知識分子搞起来的。在这方面——的确，大概只有在这方面——他的看法非常接近于后来拉甫罗夫在《历史书簡》中所叙述的观点。这里不是批判这种观点的地方。但却不妨提醒讀者，車尔尼雪夫斯基是在什么时代形成这种观点的；这是对1848年的运动所抱的希望遭到破灭后的失望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西欧工人阶级的意气消沉，这种意气消沉虽然是暫时的，却是达于极点的。

这个失望的时代当然不会有助于車尔尼雪夫斯基对最近将来产生任何过高的希望。他在大学毕业后（1850年）立即前往薩拉托夫并在那里謀得中学教师职位这件事，大概也必須用上面这个原因来解释。然而1852—1853年間他在薩拉托夫所写的日記表明，

<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1部分，第2篇，第215—216頁250。



車尔尼雪夫斯基虽然对最近将来沒有抱任何过高的希望，但决沒有对进步事业迟早取得胜利丧失任何信心。举例來說，他在1853年3月5日写道：“最后，为了更慎重起見，我應該結婚了。因为假如我繼續像过去那样干下去，我真的可能会被抓去。我應該想通：我不属于自己，我无权去冒险，否則，怎么知道結果如何呢？难道我不是在冒险嗎？需要有个防御物来抵御民主思潮和革命思潮，而除了关于妻子的念头以外，什么东西也不能作为这种防御物”<sup>①</sup>。他果真在1853年4月29日与奥里珈·索克拉托夫娜·瓦西里也娃結了婚。然而应当指出，他本人并沒有当真地希望，結婚将給予他“抵御民主思潮和革命思潮”的防御物。他警告过自己的未婚妻說，他可能会遭到毁灭。从小說《序幕》的第一部分可以看出，在奥里珈·索克拉托夫娜成为他的妻子后，他也曾經和她談到过这个問題。他怎样想像那个可能使他遭到毁灭的事变进程呢？在《列維茨基的日記》（小說《序幕》的第二部分）中，有一段話解答了这个問題。在讀这段話的时候必須記住，这段話是用列維茨基（杜勃罗留波夫）的口气陈述的，但他記錄的是伏尔庚（車尔尼雪夫斯基）对他說的話：

“重大的时刻将会来临。在什么时候来临呢？——我很年輕，因此它在什么时候来临的問題对我來說反正都是一样，無論如何，假如我好好地保护自己，我总能在精力充沛的时候遭逢这个时刻。它怎样来临呢？克里米亚战争这个小小的波瀾是怎样来临的呢；不用我們操心，不要去奔忙劳碌；無論怎样奔忙劳碌也不能延緩或加速涅瓦河的解冻。怎样来临呢？我們談的是時間的力量，——

<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2部分，第3篇，第39頁251。在另一处，他写道：“我應該用什么来抑制自己，不要再向通往伊斯坎德尔的道路走去”（同上书，第96頁）。

只有自然界的力量才是强大的。

旋风在天空中自由地呼号；

誰知道它来自何方和怎样来到。

未来的可能性有各种各样。哪一种可能性会得到实现？是否反正都是一样呢？我乐意听一下他个人的推测，看哪一种可能性最有可能。社会的失望和由于失望而采取的合乎新风尚的新式自由主义态度，对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不管他具有何种思想方式）来说，仍旧是浅薄的、可鄙的、令人厌恶的；而空洞的、造謠中伤的、怯懦的、卑鄙的和愚蠢的东西，对聪明的急进派来说，也正像对聪明的保守派来说一样是令人厌恶的，但在欧洲的某个地方——最可能是在法国——掀起风暴并且像在1848年那样席卷欧洲其余部分以前，一切卑鄙的和怯懦的东西还将得到不断的发展。

1830年，风暴仅仅发生在德国西部，1848年则席卷了维也纳和柏林。根据这点来判断，应该说，下一次将会席卷彼得堡和莫斯科”<sup>①</sup>。

大概，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大学毕业时关于自己也是这样说的：“目前不可能从事任何有意义的工作，但在国际生活中某些‘麻烦事’的影响下，重大的时刻是一定会来临的。那时就可以从事社会活动，而现在则暂时应该积蓄力量，加强自己，同时对必须与之直接打交道的少数人、主要是青年人进行工作。”当然，他事实上也做了工作。很难怀疑，他在担任萨拉托夫中学教员的时候会放过在青年人的心灵中播下良种的机会。但这是在等待更远大的任务时做的，这是一个准备时期，是他的社会活动的“序幕”。他在萨拉托夫时的心情，可以从他看了《威廉·退尔》这个戏的演出后在1853

<sup>①</sup>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1部分，第2篇，第214—215页252。

年3月7日的日記中所写的这样一句話中看出来：“我完全被威廉·退尔感动了，我甚至哭了”<sup>①</sup>。这句話甚至可能使讀者产生一种夸大的印象，即认为車尔尼雪夫斯基是絕對拥护革命的行动方式的。为了預防这种錯誤，我們再来看一下《列維茨基的日記》，并且从其中引证紧接在刚才所引证的話之后的一段話。我們要提醒讀者，列維茨基是在轉述伏尔庚的思想。

“这一点是否可靠呢？（即未来的欧洲风暴将席卷彼得堡和莫斯科这一点是否可靠呢？——格·普·）在这里根本談不到什么可靠，仅仅是可能罢了。这样的可能性是否值得欣慰呢？按照他的意見，在这里根本就沒有有什么好的东西。改进的过程愈平稳和愈平靜，那就愈好。这是一般的自然規律：一定数量的力，当它平稳而經常地发生作用的时候，就产生最大量的运动；以冲动和飞跃来发生作用，是較不經濟的。政治經濟学表明，这个真理在社会生活中也同样是完全不容置辯的。應該希望，我們这里的一切也能安靜地、和平地过去。愈平靜愈好”<sup>②</sup>。

在《序幕》这部小說中，車尔尼雪夫斯基描写了他在五十年代中期所抱的心情。往下我們要指出，后来他对“冲动”和“飞跃”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們沒有任何根据可以认为，他在大学生时代和大学毕业后最初几年內对“冲动”和“飞跃”的看法，与他最初接近杜勃罗留波夫的时候有所不同。因此，我們也就认为，年輕的車尔尼雪夫斯基还远不是革命信念的坚定拥护者<sup>255</sup>。

为了結束我們这位作者在薩拉托夫的时期，我們要根据他本人的日記指出他的性格的两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特征。

我国“反动派”通常认为他是“虛无主义者的头目”，而在他們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2部分，第3篇，第93頁253。

② 同上书，第10卷，第1部分，第2篇，第215頁254。

眼里,“虚无主义者”不外是

使父母伤心的

做小偷和强盗的败类……256

日記使我們对“虚无主义者的头目”有了稍微不同的了解。車尔尼雪夫斯基在打算同瓦西里也娃結婚的时候,关于他的父母写道:“在这件事情上,他們不是評判人,因为他們关于家庭生活、关于妻子所应具备的品德、关于丈夫与妻子的关系、关于家务和生活方式的概念,和我的概念完全不同。比起他們来,我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无论听取他們譬如說关于政治和宗教的意見也好,或是請教他們关于婚姻的主意也好,都是妄誕的。一般說来就是如此。而具体地說——他們完全不了解我的性格,不了解我需要怎样的妻子。在这件事情上,除了我自己以外,誰也不能充当評判人,因为除了我自己以外,誰也不能了解我的性格和我的概念”<sup>①</sup>。現在很难对这点提出任何異議,看来,二十四岁的車尔尼雪夫斯基似乎能够心安理得地按照自己的意思决定婚姻了。然而他的心境并不是非常平靜的,他一直由于担心而感到苦恼,担心假如父母不同意他的婚事,他該怎么办。他写道:“我生性願意服从、听从父母,但这种听从應該是自由的。而你們对待我,却像对待孩子一样专断。‘你就是到了七十岁,也仍旧是我的儿子,到那时你仍然要听我的話,就像我在五十岁以前听媽媽的話一样。’这是誰的过錯呢,你們的……”<sup>②</sup>是这样大,使我不得不說:在小事情上,在无所谓的事情上,——而在过去这些小事情也是重要的事情,——我是听话的孩子。但在这件事情上,我不能这样做,也无权这样做,因为这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不,在这件事情上我已經不是一个可以这样听从

204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2部分,第3篇,第47頁257。

② 在这里,有一个出版者沒有認清的字258。

你們的管束的儿子：‘亲爱的媽媽，請允許我到尼·伊·那里去一趟’——‘好，去吧！’——‘亲爱的媽媽，請允許我到安娜·尼·那里去一趟’——‘别去，这是一个坏女人’。不，在这件事情上，我不打算請示，假如你們要下命令，那就應該遺憾地告訴你們，你們的命令将是白費的”<sup>①</sup>。

但因为車尔尼雪夫斯基担心仍然会有命令下来，所以他对这种万一的情况下有了这样的决心：“如果你們一味固执己見，——好，我就不爭辯，我就自杀。我們看一看，結果将会怎样。假如有必要的話，我就要實現我的威胁，因为与其作为一个在自己看来是可耻的人而活着，或者与其和自己所爱的人爭吵反目，也就是說，和那些虽然爱你，但又过分古怪地自以为什么都懂、自以为自己关于人們的概念和关于應該这样做而不應該那样做的概念正确无誤的人爭吵反目，倒不如干脆死去”<sup>②</sup>。

的确，在下面一段話里，車尔尼雪夫斯基本人也指出，这种怕父母阻碍婚事的顾虑只不过是一种“离奇的幻想”，大概，事情很容易地就迅速得到解决了。但是，关于可能遇到这种阻碍的念头使他产生的那种煩惱，仍然很可以說明他的性格，而关于他一生中在道德上不可能与父母“爭吵反目”而繼續活下去的那种信念，則更可以說明他的性格。所有这一切与反动派关于“虛无主义者”的流行观念是多么不同啊！

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性格的另一个特征，也并不更符合这种流行观念，这个特征流露在他的日記的下面这段話中：“除此以外，我的身体現在还要归我妻子占有，除了她以外，我不属于任何别的妇女。我要以貞洁的身体去結婚，正像我的未婚妻也将是貞洁的一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2部分，第3篇，第48—49頁259。

② 同上书，第49頁260。

样”<sup>①</sup>。“反动派”断言，“六十年代人”鼓吹淫乱<sup>②</sup>，甚至许多并非“反动派”的人也当真地认为，只有托尔斯泰伯爵的“纯洁的”道德才开始部分地纠正了这种肆无忌惮的放纵所造成的道德上的危害。我们可以看到，这究竟有几分公正。

205 结婚后不久，車尔尼雪夫斯基就迁往彼得堡，在那里头一年他仍继续从事教育工作，正如有一份关于他的公文说的，在第二士官学校担任“第三类教员的职位”。那时他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最初一些我們所知道的作品。他起初在《祖国纪事》杂志上写文章，后来则在《同时代人》杂志上写文章。从1855年起直到他被捕为止，車尔尼雪夫斯基几乎仅仅在《同时代人》杂志工作。可以说，这是一般的常规，我們只知道有两次例外：在1858年的《雅典尼》杂志（第三期）上发表了他的一篇批评文章：《俄国人去rendez-vous》<sup>③</sup>，在同一年，他还担任过一个时期军事文集的编辑。在他住在彼得堡的头一年內，他写作自己的硕士论文：《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大学当局拖延了对这篇学位论文的审查工作，据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出版者说，审查工作一直拖到1855年，并且据我們所知，结果是不利于这位青年学者的；大学当局不喜欢他的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因此他也就没有获得硕士学位。但据说，正是这篇学位论文所遭到的这种厄运，才使它的作者与《同时代人》杂志编辑部的关系密切起来，据車尔尼雪夫斯基本人所说，这家杂志很快就完全由他掌握了。

車尔尼雪夫斯基在1853年9月21日的信中关于学位论文告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2部分，第3篇，第40页261。

② 例如，可参阅齐托维奇教授的一部卑劣的诽谤性的著作《在〈怎么办？〉这部小说中做了些什么》。

③ 《俄国人去幽会》。译者

訴他的父亲說：“我所写的学位論文是有关美学的。假如这篇学位論文能原样在大学里通过，那末順便說一下，它在某一方面将是独创的，即其中将沒有一处引文，而且一共只有一个引证。假如人們认为这是学术性不够的話，那末我可以在三天之內增添几百处引文。可以秘密地告訴您，这里的語文学教授先生們完全沒有研究过我为自己的学位論文所选择的題目，因此他們未必能看出我的思想与目前关于美学問題的理解方式有什么关系。他們甚至以为我是我所駁斥的那些哲学家的信徒，假如我不明显地說出这一点的話。因此，如果我不是被迫坦率地說明这一点，我并不认为我們这里的人会懂得我所分析的那些問題究竟多么重要。一般地說，自从那些懂得哲学并且注意哲学的人逝世或沉默以来，在我們这里关于哲学的概念变得非常模糊暗淡了”<sup>①</sup>。

在1855年5月3日的信中，他告訴父亲說：“为了节省時間和費用，我用大开本和排得很密的字型来印学位論文；此外，为了同样的目的，当手稿已經被同意付印的时候，我又把它大大地縮短了（虽然大学的审查机构連一个字也沒有删）。因此結果是一共只有6<sup>1</sup>/<sub>2</sub>个印张，而如果不縮短和采用通常排得很稀的刊印方法的話，就会排滿20个印张……在表面上，它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其中沒有一处引文——这是违反一般以廉价的博学来招搖撞騙的作风的。还有一个特点是：它是由我自己抄写整齐不用再誊清的——这是無論誰都不見得有过的情形。我做这一切，是想对那些（不能）做这种事的人开一番玩笑，以求得內心的滿足。我暫且不談內容——在另一封信中再談这一点吧。标题是您知道的：《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sup>②</sup>。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2部分，第1篇，第84頁262。

② 同上263。

車尔尼雪夫斯基是《同时代人》杂志的主要政論家，而在 1856 年年中以前还是它的主要文学批評家。涅克拉索夫和帕納也夫永远立下了这样一个重大的功績，他們沒有对車尔尼雪夫斯基及其同志敬而远之，像差不多其余所有的“別林斯基的朋友”所做的那样。的确，从杂志取得的成就来看，他們无須对他們把这家杂志交给《美学关系》的作者去主持这一点感到后悔。早在 1855 年的《同时代人》杂志十二月号上，就发表了前面已經多次提到过的《果戈里时期俄国文学概观》中的第一篇論文，这部书是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最卓越的著作之一，而且迄今仍然是任何一个希望了解果戈里时期的批評的人的最好参考书。这一系列卓越的評論文章中的第二篇論文刊载在下一年的《同时代人》杂志一月号上，第三篇論文刊载在二月号上，第四篇論文刊载在四月号上。在这四篇論文中，对波列伏依、森柯夫斯基、舍維辽夫和納杰日丁的文学活动作了評价。在七月号上，作者轉到了別林斯基，其余的五篇論文都是关于別林斯基的。自从別林斯基在 1848 年开始被看作违禁作家以后，他的名字还是第一次通过这些文章在报刊上被人提到。随着《概观》的发表，我們能够以乐观的信心毫不夸大地說，別林斯基有了一个无愧于他的继承者。从車尔尼雪夫斯基成为《同时代人》杂志的批評家和政論家的时候起，又重新保证这家杂志在俄国期刊中間取得在別林斯基生前属于它的那种优势地位。进步讀者怀着关切和敬意注視《同时代人》杂志，一切新生的文学力量都自然而然地趋向于这家杂志。例如，从 1856 年年中起，年輕的杜勃罗留波夫就开始为这家杂志写稿。我們这个时代的人甚至很难想像，当时的报刊在我国有多么巨大的意义。現在社会輿論已大大超越了报刊；在四十年代里則社会輿論还没有成长到报刊的水平。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是社会輿論和报刊趋于最大一致、报刊对社



会輿論发生最大影响的時代。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当时所有卓越的作家才可能这样热中于文学活动和这样真诚地相信文学宣传的意义。簡言之，这是俄国报刊的黄金时代。克里米亞战争的不幸結局使政府不得不对文明社会做出一些让步，至少不得不实现最迫切的早已成为必要的改革。不久，农民解放問題就提到日程上来了，这个問題毫不含糊地涉及到各阶层的利益。是否應該說，尼占拉·加甫利洛維奇热心地研究了这一問題呢？他在1857—1858年就已經写了一些有关农民問題的出色的論文。关于废除农奴制时代我国社会力量的对比，目前大家已經了解得够清楚了。所以我們只是順便談談这一点，来說明当时車尔尼雪夫斯基领导的我国进步报刊在这个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大家知道，进步报刊热烈地捍卫了农民的利益。我們的这位作者一篇接着一篇地写文章，主张連同土地一起解放农民，断言贖买分給农民的份地不会給政府造成任何困难。他用一般的理論推断和极詳細的示范計算来证明这个論点。他在《贖买土地困难嗎？》一文中这样写道：“贖买土地实际上怎么会有困难呢？它怎么能够超过人民的力量呢？事实并非如此。这是违背国民經济的基本概念的。政治經济学直截了当地告訴我們，某一代人从前代人那里接受的全部物质财富，比起这一代人的劳动所生产的价值量来，数目并不太大。例如，属于法国人民的全部土地、一切建筑物及建筑物内部的一切設備、全部船只和貨物、全部牲畜、全部貨幣以及属于这个国家的其他一切财产，只值一千亿法郎；而法国人民的劳动每年生产一百五十亿或更多的财富，就是說，用不着七年，法国人民生产出的财富的总和就

們需要贖买整个俄国和它的全部財富嗎？不，仅仅是土地。而且，难道是俄国全部的土地？不，贖买的只是俄国欧洲部分农奴制根深蒂固的那些省份的土地”，等等<sup>①</sup>。然后他指出，要贖买的土地不超过俄国欧洲部分面积的六分之一，他提出了整整八个贖买計劃。他說，只要政府采用这些計劃之中的一个，那末贖买份地不仅不会給农民造成負担，而且对国庫也十分有利。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全部計劃都是根据“在确定贖金时必须保持尽量适中的价格”这一想法的。現在我們知道，我們的政府在废除农奴制时究竟对农民的利益考虑了多少，它对車尔尼雪夫斯基关于确定贖金要适中的那些意見听取了多少。我們的政府在解放农民时一刻也沒有忘記国庫的利益，而对于农民的利益却想得很少。在进行贖买时考虑的純粹是国庫和地主的利益。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誰都既不需要、也不乐意去考虑那个自己不能坚定不移地保卫自身利益的等級（这里說的是农民等級）的利益。但是，当关于农民解放的傳聞还刚刚开始的时候，俄国最先进的人物的想法稍微有点不同。他們以为，政府本身不費多大力气就能理解，它本身的利益是与农民的利益多么一致。順便提一下，赫尔岑曾相当长期地抱着这种希望。車尔尼雪夫斯基也曾抱过这种希望。因此他在自己的論文中一再談到农民問題，并且热心地向政府解释它本身的利益。但是，从時間上来說，車尔尼雪夫斯基是第一个这样的俄国作家，他理解到他在被一种无法实现的希望所迷惑，因而不再去劝說那些对他的論据不加絲毫注意的人。这也是一个不小的功績。

209 在这里，我們將不去叙述和分析車尔尼雪夫斯基在有关农民問題的文章中所表述的对俄国村社的观点。后面我們會詳尽地考

<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4卷，第335—336頁264。

察他的这种观点。我們在这里只补充一句，那就是甚至在車尔尼雪夫斯基最热中于村社的时期內，他对村社的观点也始終沒有赫尔岑或者受到赫尔岑的明显影响的米哈伊洛夫在其《告青年一代书》（1861年）<sup>①</sup>中所陷入的那种半斯拉夫主义的极端性。

車尔尼雪夫斯基很快就在我們的进步文学界树立了威信。然而無論他的威信多么大，他的名符其实的同志是很少的。在小說《序幕》的第一部中伏尔庚对尼維尔津所說的下面这些話，使我們有理由这样想。“我們所有的大众教育家先生們都是滿脑子荒唐思想；他們滿紙胡言乱語，把俄国社会弄得昏头昏腦，而俄国社会即使沒有这些东西也已經处于半癡狂状态了。他們中間沒有一个人可以作为同志。迫不得已只能一人来写所有表达杂志意見的文章。我来不及写这末多。可是沒有一个头脑清醒的人，这也是当然的！”<sup>②</sup>只有杜勃罗留波夫是車尔尼雪夫斯基可以完全信賴的头脑清醒的人。因此我們的作者才这样真正热情洋溢地爱他<sup>③</sup>。

后来，安东諾維奇成了車尔尼雪夫斯基很好的助手，看来，我

---

① 參閱《俄国国事犯罪》文集。俄国历史丛书，第5集（巴黎1905年版），第5頁以下。

②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1部分，第2篇，第89頁265。

③ 《列維茨基的日記》中的以下这个場面說明，他从初次与作家杜勃罗留波夫会面起，就怎样信任杜勃罗留波夫。列維茨基写道：“从昨天起，我已不能怀疑他（指伏尔庚，——格·普·）把我当作最好的同事了。但是这样一些話却使我惊异：‘您让我在杂志上全权处理嗎？’——‘假如不是这样，我又何必迫切需要您呢？必須加以帮忙的工作人员，也許可以找到一百个，但是要这些人有什么用呢？要审阅稿子并加修改，真是无聊的事，还不如自己动手写容易。’——‘您不审阅我的文章嗎？’——‘您的文章有什么新奇的东西嗎？老实对您說，不仅付印以前，而且印出以后我都不讀的。即使这样，我还得讀好多无聊的文章呢，——哈！哈！哈！——謝謝您的恭維。’——‘但是我可能犯錯誤。’——‘您只管犯您的錯誤！别再耽誤時間了——哈！哈！哈！好吧，再見。后天再來吧。我們再隨便談一談’”（《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1部分，第2篇，第210—211頁）266。

們这位“冷漠无情的”作者也很快就与他結成莫逆之交。但是杜勃罗留波夫不久就去世了，这对《同时代人》杂志來說始終是难以补償的損失。

車尔尼雪夫斯基非常喜欢論战。他承认，甚至他的朋友們也常常指出，他“对于用热烈的論战来解决爭論的問題”，有一种特別的、“在他們看来甚至是多余的爱好的”<sup>①</sup>。在他看来，为了在社会中传播一个新的概念，論战永远是一种非常合适的，更正确地說，必要的手段<sup>②</sup>。但是，在他的文学活动初期，他似乎是避免論战的。《果戈里时期概观》是用平稳而和解的語气写成的。只有对舍維辽夫这个別林斯基时期的莫斯科著名批評家，他才予以辛辣的諷嘲。他在談到森柯夫斯基（布朗貝烏斯男爵）时也表示輕視的惋惜，說他是一个把自己的巨大精力浪費在无聊的舞文弄墨上的人。对果戈里时代的其他作家，他大部分都表示贊揚。甚至在波果丁——別林斯基的小組极不喜欢他并且对他大加嘲笑——的文学活动中，他也发现一些有益的、值得贊揚的特点。在談到斯拉夫派时，他是怀着真挚的敬意的。尽管在他看来他們有着一切明显的謬誤，但他认为他們是启蒙运动的真誠的朋友，并且热烈地同情他們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4卷，第304頁267。

② 在《果戈里时期概观》中，他为納杰日丁辯护，因为有许多人責备納杰日丁喜爱激烈的論战。“納多烏姆柯（納杰日丁的笔名）为什么用这样尖銳的声調說話呢？难道他不能够通过溫和的形式來說出这同样的东西嗎？真是令人奇怪的問題——我們文学上的以及其他各方面的見解要用尖銳的声調来讲。人們老是提出这样的問題，为什么农民要用粗笨的铁犁或是木犁耕田；可是否則又用什么东西来耕种膏腴而又难于翻掘的土壤呢？难道可以不理解，沒有战争是解决不了一个重要問題的，而战争总是通过火和劍来进行的，而不是用外交辞令来进行的，外交辞令只有当武力斗争的目的已經达到的时候才有用处。只有攻击手无寸铁，毫无保护的人，只有攻击老弱殘废的人，才是不合法的，可是納杰日丁所反对的詩人和文学家，他們却并非这样的”（《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2卷，第130頁）268。

对俄国土地村社的态度。

在这里不去谈他对村社的观点，但是，我们要指出，早在关于这种土地所有制形式的争论中，他就不得不抛弃了自己的心平气和的、善意的语调，而充分地施展出自己的论战才能了。当时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地道的代表们，特别是《经济指南》的编辑维尔纳茨基处境很不妙。車尔尼雪夫斯基确乎使这位“С. С.”(顾问官)和“Д-р ист. н., пол. эк. и стат.”(历史学、政治经济学和统计学博士，以自己的官衔和学位证书自傲的维尔纳茨基就是这样著名的)遗臭万年。这个被打得落花流水的学者不仅逃离了战场，而且还丑态百出，开始要人相信他一直尊敬他在争论开始时认为是鲁莽的外行而加以藐视的同一个車尔尼雪夫斯基。应该承认，未必有人能够比車尔尼雪夫斯基保卫村社更加巧妙地保卫无论什么事了。凡是对村社有利的一切，能够说的他都已说了。而假如他对这个争论问题的解答现在不能令人满意，那末这仅仅是由于他考察这个问题时的观点是极其抽象的。但是，应当指出，正如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的，他保卫俄国土地村社仅仅是有条件的。

車尔尼雪夫斯基与我国自由派经济学家的争论，从村社土地所有制问题开始以后，很快就具有了更广泛的性质，并且转到了一般经济政策问题。自由派经济学家坚持国家不干涉的原则；車尔尼雪夫斯基则驳斥了这个原则。结果又是这样：关于国家不干涉人民经济生活的争论成了我们这位作者取得新胜利的一个机会。他的《经济活动和立法》<sup>①</sup>一文，不仅在俄国经济学著作中，而且在全世界经济学著作中，都可以看做是对“laissez faire, laissez passer”<sup>②</sup>理论的一种最出色的反驳。在这篇文章里，車尔尼雪夫斯

① 收入《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4卷，第422—463页。

② (自由放任)

基运用了自己的全部辯論才能和論战技巧。他仿佛是以这种論爭作为消遣，在論爭中輕而易舉地就击退了論敌們的攻击。他戏弄他們，就像猫戏弄老鼠一样。他对他們作各种各样的让步，表示准备同意他們的任何一个原理，接受关于任何一个原理的任何解释——直到看来似乎已經給予他們以一切胜利的机会以后，直到使他們处于最有利于他們取得胜利的条件下以后，他才轉入进攻，用三、四个三段論式就把他們导向荒謬的地步。然后又开始作新的让步，对同一个原理作新的、更有利的解释，接着又重新证明这个原理的荒謬。在文章的結尾，車尔尼雪夫斯基按照自己的慣例把他的論敌教訓一頓，使他們感觉到，他們不仅不懂得严格的科学思維方式，而且也不懂得簡單常識的最起碼要求。值得注意的是，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在我国曾經有人热烈拥护的国家不干涉的原則，很快就几乎被俄国經濟学家所完全抛弃了。这在頗大程度上既是由于我国的工业和貿易的一般状况，也是由于以后德国讲坛社会主义学派对我国理論家的影响。但是，毫無疑問，这个原則还在它刚刚开始传播时就遇到了像車尔尼雪夫斯基那样的劲敌这一点，在这方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俄国的曼彻斯特学派分子既然上了很好的一課，他們便放得聪明起来，从此銷声匿迹了。

当然，假如我們把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这場論战中所提出的論据，同例如馬克思在《論貿易自由的演說》里所用的論据相比，那末我們就不得不再一次承认，我們这位作者的观点具有抽象性的毛病。然而这已經是他的經濟观点的一般缺陷了，在我們这部著作的第二部分中将談到这种缺陷。

車尔尼雪夫斯基不仅仅在經濟問題上进行激烈的論战。而且他的对手也不仅仅是自由派的經濟学家。《同时代人》小組在俄国

文坛上的影响越大,这个小组、特别是我们这位作者本人所遭到的来自各个不同角落的攻击也越多。《同时代人》杂志的同人被看成是准备推翻一切人所尽知的“原理”的危险人物。某些“别林斯基的友人”开始时还觉得可以和車尔尼雪夫斯基及其同志们合作,后来却脱离了《同时代人》,把它看作是“虚无主义者”的刊物,并且大叫大嚷地说什么别林斯基在世决不会赞同車尔尼雪夫斯基所采取的路綫。屠格涅夫的做法就是这样<sup>①</sup>。甚至赫尔岑也在自己的《钟声》杂志上对“丑角們”抱怨起来。他警告他們說:“我們亲爱的丑角們在极力嘲笑暴露文学时忘記了:沿着这条滑路不仅会‘带着哨声滾到’布尔加林和格列奇的怀抱,还会得到一枚斯坦尼斯拉夫勳章挂在脖子上。”赫尔岑认为,“丑角們”所嘲笑的“暴露文学”中有些出色的东西。“你們以为現在可以把謝德林的全部短篇小說和一些其他作品同寄生的奥勃洛莫夫一古脑儿抛到水里去嗎? 太大方了,先生們!”<sup>②</sup> 举謝德林为例是极不成功的,因为車尔尼雪夫斯基本人很善于评价他的作品。显然赫尔岑被他的那些卡維林之流的自由派朋友們引上了迷途。“丑角們”,或者像在俄国所称呼的“吹口哨的人”,不是嘲笑暴露,而是嘲笑那些天真的人,他們忘記了克雷洛夫寓言《猫和厨子》<sup>③</sup>的寓意,不能也不願超过天真的暴露而更进一步<sup>④</sup>。

213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讲过,屠格涅夫对他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容忍,但对杜勃罗留波夫就完全不能容忍了。他曾对車尔尼雪夫斯基說道:“您是一条普通的蛇,而杜勃罗留波夫則是一条眼镜蛇”(参阅前面已經引证过的信《致謝》。——《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9卷,第103頁)269。

② «Very dangerous!!» («很危险!!»)一文,載于《钟声》第44期。

③ 克雷洛夫在这篇寓言中叙述一个厨子发现了他的猫偷吃了鸡,就滔滔不絕地对它大发議論,猫却只管啃鸡,等厨子把大道理讲完,猫也把鸡吃完了。——譯者

④ 順便提一下,关于《很危险!!》一文和它的多少有些可疑的后果,請参阅維特林斯基先生的《赫尔岑》一书(1908年圣彼得堡版,第354頁)。

赫尔岑自己也很快就看出来，那些对他和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关系评头论足的自由派朋友們在政治上是多么糟糕。当他不得不与卡維林决裂时<sup>270</sup>，大概他会对自己說，“胆汁质的人”，并不是完全不对的<sup>①</sup>。

可是，《哨声》上发表的那些引起有教养的自由派特別不滿的文章，大部分都不是車尔尼雪夫斯基写的。他只是偶尔在这个附刊上面写点文章，因为他为其他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在自己文学活动的后期，他不仅經常地为每一期《同时代人》写文章，而且常常在每一期上都发表几篇文章。他为杂志各栏写文章，一般是按这样的次序：首先写一篇关于某个一般理論問題的論文，然后写政治評論，評論几本新书，最后，似乎是为了休息和娱乐，再对自己的論敌来几下論战的襲击。1861年的《同时代人》杂志发表他的論战性文章特別多。这一年他写了有名的《論战之花》，《民族的不策略》（反对李沃夫的《言語》），《人民的糊塗》（反对阿克薩柯夫的《日报》；关于这篇文章我們还要讲到），以及发表在俄国文学和外国文学栏的許多論战性的短評。

在《論战之花》中現在特別令人感兴趣的，是我們的作者对他自己的文学活动的看法。我們現在就把它援引在这里。車尔尼雪夫斯基极清楚地知道，他在俄国文坛占有突出的地位。他的敌人很怕他，有时甚至对他說些奉承話。然而他的蒸蒸日上的名声絲毫沒有使他高兴。他认为俄国文坛水平太低，并不以他在俄国文坛占据的突出地位为荣。他“对于自己的文学声誉完全无动于衷”。他关心的只有一个問題：他能否把生气勃勃的思想和感情保持到我們的文学真正有益于社会的美好时代。“我知道，文学活动

<sup>①</sup> 可以根据卡維林和屠格涅夫給赫尔岑的信件来追溯这个决裂的經過，这些信件由德拉哥馬諾夫于1892年在日内瓦出版。



的美好时代将会到来,那时文学将給社会带来真正的益处,那时誰 214  
有能力,誰就能真正赢得好名声。所以我考虑的是:我为社会好好  
服务的能力能否保持到那个时候?这需要朝气蓬勃,意气奋发。可  
是我看到我現在已开始走进‘可敬的’作家的行列,也就是說,开始  
走进那些落在社会需要运动之后的老朽作家的行列。这是可悲的。  
但有什么办法呢?年紀老了,不能返老还童。我只能对那些比我年  
輕而有朝气的人感到羡慕……”<sup>①</sup>。現在我們看到这种高尚的忧虑是  
会觉得有点奇怪的,因为我們知道,当車尔尼雪夫斯基說这番話的  
时候,他不过还能过一年的自由生活了。上面所引的这一段話刊載  
在1861年的《同时代人》杂志七月号上,而在下一年的七月,他已  
被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了……但是,可以想見,这个人对他的敌人  
抱着多么輕蔑的态度,他虽然充分意識到自己比他們优越得多,可  
是却仍然认为他自己的文学功績也沒有多大的价值。的确,几乎  
《論战之花》的每一頁都流露出对《同时代人》的責难者的冷酷的  
蔑視。特别是給《祖国紀事》的答复更充滿着这种蔑視。車尔尼雪  
夫斯基一点也不对来自《祖国紀事》方面的論敌生气。他几乎是在  
誠懇地开导他們,就像一个良师开导犯了过失的小学生一样。当然,  
一位良师在責备他的学生时,有时也向他談一些非常沉痛的真理,  
并且絲毫不掩飾自己在智力方面对学生的优越性。但他这样做只  
是为了学生的利益。車尔尼雪夫斯基也正是这样做的。他不忘記  
《祖国紀事》的任何一个錯誤和失策,并且像父亲似地責备編輯部  
不够机敏。他抱怨他們的,首先是他們在和他斗爭时所抱的那种  
輕率的激昂情緒。他在指出他們对他的这种或那种責难都完全沒  
有根据之后一再向他們說,你們哪里能够同我进行

<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8卷,第231頁271。

論战。有时他直截了当地說，他知道得比他們多得多，他对事物的理解比他們深刻得多，他們簡直不能够評价他在文学方面所貫徹的新思想。杜德希金用其他杂志的話責备他厚顏无耻、不学无术，他向杜德希金說道：“您想知道我的知識多么淵博嗎？对这个問題我只能这样回答您：要比您的知識淵博得不可比拟。您自己也知道这一点。那您为什么要刊在刊物上得到这样的答复呢？您把自己引到这上面来是不聰明的，确实是不聰明的。請您不要以为这是驕傲吧：知道得比您多得多，这有什么可以驕傲的！也不要以为我在想說您的知識太少。不，不是这个意思：您多少知道一些东西，并且一般地說您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不过像您这样拙劣地进行論战是徒然无益的”<sup>①</sup>，等等。——如果說这一切話不是絕對公正的，那末也許它們是过于尖刻和过于自負的。

这时候俄国“社会”上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情緒高涨起来。青年学生風潮迭起，秘密革命組織相繼出現，它們印发自己的宣言和綱領，盼望迫在眉睫的农民起义。我們已經知道，車尔尼雪夫斯基完全承认在俄国可能出現“重大的时期”，我們还可以看得出来，社会情緒的高涨多么强烈地反映在他的政論中。但他和秘密团体有沒有某些联系呢？对于这个问题暂时还不能有把握地回答，而且有誰知道，我們会不会有朝一日获得解答这个问题的材料呢？精心研究过車尔尼雪夫斯基案件的雷姆克先生认为，“可以推測（着重点是他加的），那个《向地主老爷治下的农民致敬书》是他写的，而法庭就是以他撰写該文为理由宣判他有罪的”。雷姆克先生引证这份宣言的語言和内容来证实他的推測。我們认为这样的引证并不是沒有根据的<sup>273</sup>。但是，我們要赶紧跟着雷姆克先生重复一句：

<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8卷，第270頁272。

“这一切都不过是有点可能的推想，只此而已”<sup>①</sup>。雷姆克先生还认为，有名的小报《大俄罗斯人》也有一部分出于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手笔。我們觉得这个意見也相当有根据。雷姆克先生用斯塔赫維奇先生的話来证实自己的推測。斯塔赫維奇先生曾在西伯利亚和車尔尼雪夫斯基一起生活了几年，他曾写道：“我发现，車尔尼雪夫斯基对于那个以《大俄罗斯人》为名的不定期印发的小报显然很表同情；記得，它共出了三期。听了尼古拉·加甫利洛維奇的談話，有时我发现，無論是思想內容或思想表达方式都强烈地使我想到了《大俄罗斯人》这个小报。于是我暗自断定，或者他就是这些宣传必須进行立宪改革的小报的作者，或者至少参加了編写工作”<sup>②</sup>。我們完全同意斯塔赫維奇先生的看法：《大俄罗斯人》小报 216 的語言和內容的确很像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政論文章。如果車尔尼雪夫斯基的确是它的作者，那末，这也就自然可以說明，为什么《大俄罗斯人》小报远比当时类似的其他“小报”更明智、更有策略性<sup>274</sup>。

与俄国的急进党派觉醒的同时，波兰的革命运动也发展起来了。車尔尼雪夫斯基和当时在彼得堡为数不少的波兰革命者有沒有某种正式的关系？关于这点也沒有任何证明。我們不想揣測，只能举出那些可以从他的作品中挖掘出来的材料，來說明他对波兰情况的同情，然而这样的材料也不多。

大家都知道，斯拉夫主义者对于加里西亚的乌克兰人反对波兰人的斗争极为贊賞。車尔尼雪夫斯基一直是同情小俄罗斯人的。他认为別林斯基对于新生的小俄罗斯文学采取否定态度是一

① 雷姆克：《車尔尼雪夫斯基案件》，《往事》杂志，1906年第4期，第179頁。

② 雷姆克：《大俄罗斯人分子审判案》，《往事》杂志，1906年第7期，第92頁。斯塔赫維奇先生的文章載于《里海东岸評論》，1905年第143期。

个大错误。他在1861年1月号的《同时代人》杂志上为小俄罗斯的刊物《基础》的出版写了一篇充满同情的文章。但是对于加里西亚的乌克兰人反对波兰人的斗争，他却不能抱绝对赞同的态度。首先，他不满意加里西亚的乌克兰人从维也纳政府方面寻求支持。其次，他不满意僧侣在加里西亚乌克兰人的运动中发生影响。他写道：“世俗的事要由世俗的人来管。”最后，车尔尼雪夫斯基也不满意那些在他看来首先是经济性质的问题，被当成是纯粹民族性质的问题。在针对李沃夫的《言语》所写的《民族的不策略》（《同时代人》，1861年7月号）一文中，车尔尼雪夫斯基尖锐地抨击了这个刊物的过火的民族主义。他写道：“很可能，如果更精细地研究一下活生生的关系，李沃夫的《言语》会看到，事情的根源是与民族问题毫不相干的等级问题。很可能，无论站在哪一方面，它会看见乌克兰人和波兰人都是一些民族不同而社会地位相同的人。我们不能设想波兰农民会反对减轻乌克兰农民的赋税以及改善乌克兰农民的生活。我们不能设想，在这件事情上乌克兰族的地主和波兰地主的感觉会有很大的差别。假如我们没有看错，那末加里西亚问题的根源是等级关系，而不是民族关系”<sup>275</sup>。

217 奥地利各民族间的相互仇视，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尤其是不策略的，因为维也纳政府照例要从这里获得许多好处。他在刊载《民族的不策略》一文的那一期《同时代人》的政治评论里写道：“只要好好地想一想，就不会再对奥地利帝国的国运绵长感到奇怪了；它境内的各民族既然在政治上如此讲究策略，它又怎么会不巩固呢？”<sup>276</sup> 车尔尼雪夫斯基觉得奥地利的德意志人、捷克人、克罗地亚人，以及加里西亚的乌克兰人（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都是“不策略的”。他担心在1848—1849年特别明显地暴露出来的斯拉夫人的“不策略”又要大为发展起来。六十年代初，匈牙利对维

也納的反动集权分子进行了頑强的斗争。匈牙利人的不滿竟发展到国内一时可能爆发革命的程度。我們的作者在自己的政治評論里不止一次地表示担心：在匈牙利爆发革命运动时，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又将成为反动派的馴服工具。奥地利的許多斯拉夫族当时所采取的策略，只能使人加深这种顾虑，因为奥地利的斯拉夫人是頗以他們在1848—1849年事件中所起的可耻作用自負的。車尔尼雪夫斯基在严厉指責这种策略时指出，如果他們反过来支持維也納政府的敌人，这对他們会更有利，因为这些人会对他們做出极重大的让步。他是針對克罗地亚人和匈牙利人的关系讲到这一点的，他对加里西亚的乌克兰人又重复了这一点。我們在《民族的不策略》一文中讀到：“仇視加里西亚乌克兰人的、等級的党派現在准备让步……关于这一点李沃夫的《言語》倒不妨考虑一下；可能，这些在它看来是仇敌的人所真心誠意准备做出的让步，也許大到可以完全使乌克兰人农民滿意，至少有一点是沒有疑問的，即：这些让步比乌克兰人农民能够从奥地利人那里获得的一切都要多得多、重要得多”<sup>277</sup>。

当然，这篇文章里所說的那些原則在車尔尼雪夫斯基看来不仅仅具有地方性的、局限于加里西亚的意义。显然，他还想把那些原則当作小俄罗斯人与波兰人之間的一切关系的基础，因此，他的《民族的不策略》一文似乎是对加入俄罗斯帝国的小俄罗斯人的一个警告。

在同年的《同时代人》杂志四月号上，发表了对当时刚刚出版的《西南俄档案》第二部的評論。順便提一下，这篇評論的作者談到波兰的古老生活方式問題。他說道：“波兰沒有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它力求实现与其他强国（当然，这里指的是莫斯科国家）所建成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另一种社会制度，——这种制度的基础不是

个人对体现权力意志的国家这个抽象观念做出牺牲，而是自由的个人为了相互的幸福而达成协议……在这里，社会事业是社会思想的结果；在这里，概念和信念的永恒斗争从思想和言论的领域直接转为生活的表现。”即使波兰社会完全是贵族式的，“但享有特权的人的范围却能够越来越扩大，而把被人忘却的、被遗弃的、丧失任何权利的人民群众都包括进去，假如关于文明的概念变得更广泛一些，而发展成为不受暂时的、限制其完美性的偏见所约束的全人类观念的话”<sup>①</sup>。甚至波兰的民主派也没有经常达到这样热中于维护波兰古老生活方式的程度。要知道，全部问题就在于：怎样才能使波兰的显贵们承认“全人类观念”。

在关于立陶宛大公国与波兰合并的历史后果的问题上，这篇评论的作者也同我们的官方历史学家有很大的分歧。“难道罗斯在奥尔格尔德家族、留巴尔特家族、斯基里盖洛家族、斯维德利盖洛家族统治时期的状况，真的比十六和十七世纪西吉兹蒙特王朝统治下更好一些吗？”——他在回答那些把同波兰合并看作俄国西部一切坏现象的唯一原因的历史学家时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现在是我們停止片面地、不公正地对待波兰的时候了，——他继续说，——至少我们要承认它对罗斯的有益影响，哪怕是有关教育方面的影响。我们就拿同波兰合并的俄罗斯世界的那些地区的智力教育程度为例，把它同我们全俄罗斯祖国的始终独立发展的地区（即莫斯科国家）的教育情况比较一下。教育不是从小俄罗斯进入十七世纪的莫斯科的吗？它不是为我们以后的一切教育作了准备吗？它不是在波兰的影响下才在小俄罗斯发展起来的吗？”

在这篇评论的作者看来，俄国西部的波兰化也不应归咎于波

<sup>①</sup> 《同时代人》，1861年4月号，新书栏，第443页和以下几页278。

的人。俄国西部的上层阶级既有权利、也有办法来保卫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语言,并把自己的人民从屈辱中拯救出来,而这些人民原来是被他们自己所奴役的。如果俄国西部的贵族完全波兰化了,那末这应该归咎于这些贵族,而且只应归咎于他们。作者指出:“自己不能保全自己,——这就不能把自己的罪推给别人。”

在卓尔尼雪夫斯基全集出版以前,我们曾深信这篇评论是他写的。但是它并未收入全集。因此应该认为我们是弄错了。然而我们认为这篇评论的作者的观念非常接近于卓尔尼雪夫斯基当时的观点,否则这些观点就未必能出现在《同时代人》杂志上。

最后,小说《序幕》的第一部分描写了伏尔庚和索科洛夫斯基(谢拉科夫斯基?)的友谊关系。伏尔庚喜欢索科洛夫斯基无限忠于自己的信念,不狭隘自私,既有真正的鼓动家的激情,又善于克制自己。伏尔庚称他为真正的人,认为我们的自由派可以从他那里学到许多东西。这一切都很引人注意<sup>①</sup>,但却丝毫不能说明卓尔尼雪夫斯基对波兰问题的实际态度。

卓尔尼雪夫斯基当时三十四岁左右。他正处在智力的全盛时期,谁知道他的发展可能达到怎样的高度!然而他可以自由生活的時間却剩下不多了。他是急进党派的公认的领袖,是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极有影响的传播者。他被认为是革命青年的“魁首”,他们的一切发动和风潮都算做他的罪名。正如在这种情况下常常会发生的情况那样,传说夸大了事实,把一些甚至卓尔尼雪夫斯基从未有过的意图和行动也加在他的头上了。卓尔尼雪夫斯基自己在《序幕的序幕》中描写了在彼得堡流行的那些好意的自由派的謠

<sup>①</sup> 伏尔庚特别重视索科洛夫斯基的“审慎”,这表现在:1848年在沃伦,在他的全部同志中,只有他一人没有冲昏头脑,而是极冷静地考虑了武装起义的可能性,当时这种可能性几乎是近乎零的。

220 传，說伏尔庚（就是他本人）似乎和伦敦的俄国流亡者小组有联系。这些謠传是根据一些微不足道的、和政治毫无共同之处的事情而产生的。而且照例事情还不限于謠言。“卫道的”报刊早就对車尔尼雪夫斯基进行文字告密了。1862年《同时代人》被勒令暂时停刊。此后又出现了非文字告密。在車尔尼雪夫斯基案件的起诉书  
中写道：“皇帝陛下私人办公厅第三厅主管人接到匿名信一封，敦促政府警惕車尔尼雪夫斯基‘这青年的魁首、狡詐的社会主义者’；‘他自称永不会被揭破’；人們称他为害人的煽动分子，并請求拯救，以免受此人之害；車尔尼雪夫斯基的一切故友、自由派人士，看到他的倾向已逾越言論之外，并見諸行动，……都避而远之。来信人写道，若不驅逐車尔尼雪夫斯基，則将招来不幸和流血；这是一伙疯狂的蠱惑分子——亡命之徒……可能人們将会消灭他們，然而为他們却将洒下多少无辜的鮮血……在沃龙涅什、薩拉托夫、唐波夫——到处都有这类社会主义者的委员会，他們到处蠱惑青年……請將車尔尼雪夫斯基打发走吧，随便到什么地方都可以，但要迅速剝夺他活动的可能……請拯救我們吧，以免遭受車尔尼雪夫斯基之害，以維持普遍的安宁。”

1862年7月7日，車尔尼雪夫斯基被捕。我們將不去叙述他的案件的經過：雷姆克先生已經对它作了很詳細的、极为出色的叙述<sup>①</sup>。樞密院决定褫夺車尔尼雪夫斯基的一切公权，送往矿山服苦役十四年，然后流放西伯利亚終身。樞密院的裁决曾交由国务會議討論，并得到了国务會議的完全同意。皇帝亚历山大二世把服苦役的期限縮減了一半。

1864年底，車尔尼雪夫斯基已經到达了外貝加尔的卡达依，他

<sup>①</sup> 参阅已經引证过的《車尔尼雪夫斯基案件》一文，載于《往事》杂志，1906年3月、4月、5月号。



的夫人奥里伽·索克拉托夫娜得到允許随带幼子米海依尔前往該处同他作三天的会面。在卡达依住了三年之后，車尔尼雪夫斯基被轉送涅尔欽斯克州的亚历山大工厂，而在苦役期滿后，他又被迁往离雅庫茨克四百五十俄里的維留依斯克。直到1883年尼古拉·加甫利洛維奇才回到俄罗斯，获准住在阿斯特拉罕。在那里他住了大約六年，最后于1889年6月得到当局准許移居故乡薩拉托夫城。

柯罗連柯在关于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回忆录中說道：“我在雅庫茨克省遇到的那些波兰人，曾作过有趣的观察。其中有一个人告訴我，差不多所有奉諭直接回到故乡的人，經過在严寒的雅庫茨克气候下生活多年之后，都突然迅速地死去了。因此，凡能办得到的，都极力使这种轉变緩和些，先在西伯利亚南部地区和欧俄东北部住上一年、两年或三年。

也許这种观察是正确的，也許这种死亡只不过是偶然的事情，221然而单就車尔尼雪夫斯基而言，这种观察却证明是正确的。从寒冷的雅庫茨克来到炎热的阿斯特拉罕的时候，車尔尼雪夫斯基是健康的。我的兄弟見到他的时候，他还和肖像上的样子一样。他从阿斯特拉罕移居薩拉托夫的时候，正像我們見到的那样，已經駝着背，面如土色，害着厉害的血份病，这种病已經把他引向了坟墓”<sup>①</sup>。

他在1889年10月16日深夜十二点三十七分与世长辞了。据他的晚年的秘书費多罗夫先生說：“他的葬礼在他逝世后第四天举行，参加的有无数群众，在謝尔盖教堂举行安魂祈禱后，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复活公墓，死于1861年秋的他父亲也是安葬在那里

<sup>①</sup> 柯罗連柯，《离去的人》，圣彼得堡“俄国财富”出版社1908年版，第75頁279。

的。在安葬的那一天以及安葬以后，在死者的墓前摆了許多花圈，其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华沙大学和兽医学院的俄国和波兰学生所献的一个花圈，或者說得更正确些，两个联結在一起的花圈”<sup>①</sup>。

孜孜不倦的劳动者車尔尼雪夫斯基，無論囚禁在要塞里的時候，或是在西伯利亚的時候，都勤奋地进行工作。順便提一下，他在要塞时写了著名的小說《怎么办？》，而在他写于西伯利亚的著作中保全下来的就有为数达七百五十七頁的一大卷<sup>②</sup>。順便說說，从費多罗夫先生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他从西伯利亚回来后是怎样勤奋地工作。他說：“車尔尼雪夫斯基做了很多工作，特別是在他逝世前的最后三年內。一天通常是这样开始的：早晨七点他已經起床，喝茶，在这同时或者閱讀校样，或者浏览要翻譯的原著，然后从八点到午后一点从事翻譯，向自己的‘写字机’（因为我在他口授时书写迅速，他便戏称我为“写字机”）口授。午后一点，我們，即車尔尼雪夫斯基夫妇和我进午餐。他有胃粘膜炎这种老毛病，飯吃得很少，只喝牛奶和稀粥。在至多不超过三、四十分钟的午餐時間以后，車尔尼雪夫斯基閱讀报纸和杂志，而从三点到晚上六点、即到晚茶時間为止，一直繼續工作。而且假如‘写字机’（也就是我），和‘口授机’（也就是車尔尼雪夫斯基）不感到疲乏的話，那末工作有时一直拖到深夜。特別是在譯完韦伯的通史的每一卷之前，几乎經常是这样工作的”<sup>③</sup>。

从1885年到1889年，車尔尼雪夫斯基譯成了韦伯的《通史》十一卷，并且为某几卷写了令人感兴趣的附录。我們将在适当的地方考察一下这些附录以及他在同一时期写作和发表的两篇文

① 費多罗夫：《車尔尼雪夫斯基》，第67—68頁。

② 見《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1部。

③ 費多罗夫：《車尔尼雪夫斯基》，第58—59頁。

章——一篇发表于《俄罗斯通报》(1885年),另一篇发表于《俄罗斯思想》(1888年)<sup>280</sup>。現在我們只想談一下他的小說。

車尔尼雪夫斯基在受审讯的时候,力求駁斥原告根据从他那里搜去的文件所提出的論据,他写道:

“順便提一下,我好久以来就准备做一个小說家。但我深信,具有我这种性格的人,只应该在年紀大一些的时候写小說——太早是不会得到成功的。假如不是由于被捕后中断政論活动而产生的金錢上的需要,我是不会在三十五岁的年紀开始发表小說的。卢梭直到老年才发表小說。葛德文也是这样<sup>281</sup>。小說是为广大群众写的东西,是文学工作中最适合老年人做的最严肃的事业。轻松的形式应该以有益于群众的严肃的思想来弥补。因此,我为我的老年时期准备了材料”<sup>①</sup>。

我們已經指出,处于車尔尼雪夫斯基当时的地位的人,有充分权利不必开誠布公,由于这个原因,我們在把他的供詞用作他的传记材料时必须十分慎重。但是,他很久以来就准备做一个小說家这一点是可以相信的,尤其因为在他面前有着莱辛的榜样,而莱辛的活动在他看来乃是文学活动的理想。实际上也是如此,我們这位作者只是在很晚的时候才动手写小說。但是一旦动手写小說以后,看来他就非常勤奋地写作。前面提到过的他的全集第10卷第1部分,所收的主要是小說;在那一部分里甚至还有詩歌,例如最初发表在1885年《俄罗斯思想》第七期上的《对天女的頌歌》。在給貝平的信中(这封信未注明日期,貝平在信上注明:“1870年7月收到”),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談到自己的小說时写道,他“写成了許許多多东西”,并且补充說:“才能是肯定有的。大概,才能还是很

① 雷姆克,《車尔尼雪夫斯基案件》,《往事》杂志,1906年5月号,第105頁。

223 强的”<sup>①</sup>。最后这句话当然应当看作是出于車尔尼雪夫斯基喜欢开自己玩笑的习惯。然而，如果他认为自己完全没有这种才能，那末他就甚至不会在流放中花时间来写小说。大概，他认为自己的这些作品有某些价值，而主要是——他希望通过这些作品对读者发生有益的影响。应该承认，除了小说《序幕》（这部小说所以使人感到兴趣，是因为它是一部小说体的回忆录作品），他在西伯利亚写的小说都是不成功的。这些小说未必能找到许多读者。偏重理性——我们的作者早从童年时代起就极其强烈地具有的“启蒙运动者”的这个特征——在这里达到了极点，它不仅使人物失去“活生生的生活”的气息，甚至还影响到他们的语言，因为这些人物的特别喜欢作详细的分析，喜欢向交谈者详细地解释自己的每一举动和每一个心灵活动，所以他们的语言都千篇一律，非常沉闷；他们不是在生活，而总是在解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生活，而不要那样生活。假如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西伯利亚写的小说抱的是宣传的目的，那末这个目的肯定没有达到<sup>②</sup>。

在要塞里写的小说《怎么办？》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它得到了巨大成功，并且对七十和八十年代的青年读者具有真正巨大的、极其有益的影响。我国的蒙昧主义者和颓废派惯于对这部著名的作品轻蔑地耸耸肩膀，仿佛这部作品完全没有艺术价值。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甚至从这方面来说，他们的评判也并不完全公正：薇拉·巴夫洛芙娜的母亲瑪莉亚·阿列克塞芙娜·罗查利斯卡雅的性格就刻划得十分成功。此外，在这部小说中一般说来有许多精细的观察、幽默的描写和真挚的热情，这种热情抓住了读者，迫使读者自始至终全神贯注地关心主人公的命运，尽管作者的艺术才能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1部分，第28页282。

② 再说一遍，这个意见并不适用于《序幕》这部小说。

有着无疑的弱点。不言而喻，假如把《怎么办？》这部小说和《安娜·卡列尼娜》相比，那末就会很容易地对它作出毁灭性的判决。然而一个批评家如果把两部性质完全不同的文学作品拿来比较，那他就是蹩脚的批评家。《怎么办？》这部小说更适合于同譬如说伏尔泰的某一部哲学小说<sup>283</sup>相比。假如我们用这样的标准去衡量这部小说，那末我们立刻就能看出，那些严格的评判员、蒙昧主义者和颓废派对它的评判是多么不妥当。

224

《怎么办？》获得空前成功的秘密在哪里呢？这是艺术作品获得成功的一般秘密，因为这本小说对广大读者非常关心的问题作了生动的、大家都能理解的回答。小说表现的思想本身并不是新的；这些思想完全是車尔尼雪夫斯基从西欧文学中搬过来的。法国的乔治·桑早在他以前就宣传过男女之间自由的、主要是真挚的、诚实的爱情关系<sup>①</sup>。卢克莱茨亚·弗洛里安妮在爱情方面所提的道德要求和薇拉·巴夫洛芙娜·罗普霍娃——吉尔沙诺娃所提的没有任何区别。至于小说《雅克》，那末不难从其中摘录出相当多的段落，可以说明乔治·桑的热爱自由而又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主人公的思想和论断有时几乎完整地再现在《怎么办？》这本小说里<sup>②</sup>。

① 順便指出，歌德的《Wahlverwandschaften》（《亲和力》）也表示支持这种关系。对于这一点有些德国文学史家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既不敢非难这样一位有声望的作家，同时又因为他们的庸夫俗子的品行而不敢同意他，一般只是吞吞吐吐地说些含糊不清的东西，说这位伟大的德国人似乎有些奇谈怪论。

② 1853年3月26日車尔尼雪夫斯基在日记中记下了他和未婚妻的如下对话：“难道您认为我会对您不忠实吗？”——“我不认为这样，我不希望这样，但这种情况我也考虑过”——“那您会怎么办呢？”——我对她讲了乔治·桑的《雅克》。“那您也会自杀吗？”——“我不想自杀。”——我说，我设法给她找到乔治·桑的小说（她没有读这本书，或至少是没有记住它的思想）（《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2部分，第3篇，第78页）。我不妨再指出車尔尼雪夫斯基和未婚妻的另一次谈话：“这种关系应该将是怎样的呢？”——前天她说道：“我们要各有各的单独房屋，您非经允许不要到我这里来。”我自己也打算这样安排，可能我想的比她更严肃；——她大概只是想不让我去麻烦她，

而且不仅乔治·桑一个人宣传过这类关系上的自由。大家知道，对車尔尼雪夫斯基的世界观起过决定影响的罗伯特·欧文和傅立叶也宣传过这些东西<sup>③</sup>。这一切思想早在四十年代就在我国受到热烈的贊同。别林斯基在自己的論文中不止一次地热情地主张在爱情关系方面要有自由与真挚。讀者自然記得，“狂暴的維薩里昂”是多么伤心地責备过普希金作品中的塔吉姬娜，她爱奥涅金，同时却委身于“別人”后，她并没有遵从自己的心願，却继续和她不爱的老丈夫生活在一起。“四十年代”的优秀人物，在和妇女的关系中遵循了罗普霍夫和吉尔沙諾夫所遵循的原則。但在小說《怎么办？》出現以前，这些原則只有少数“特等人物”贊同，广大的讀者是完全不了解的。甚至赫尔岑在自己的小說《誰的罪过？》里也沒敢最完整而清楚地說出这些原則。德魯任宁在自己的小說《波蓮卡·薩克斯》<sup>④</sup>中比較明确地解决了这个問題。但这篇小說太不生动，而且它的人物都属于上层（官吏和公爵）社会，在尼古拉制度衰落以后构成讀者的左翼的“平民知識分子”对这些人物絲毫不感兴趣。《怎么办？》出版以后，一切都变了，一切都明确了，再沒有任何怀疑了。有头脑的人要不就是在爱情方面遵循罗普霍夫和吉尔沙諾夫的原則；要不就是屈从婚姻的神圣性，在出現新的感情时采用旧的行之有效的秘密偷情办法；要不就是由于自己已属于另一个并不

---

而我对这点的理解是：任何男人在夫妻关系上都要非常尊重妻子”（同上书，第82頁）<sup>234</sup>。这和小說《怎么办？》中的薇拉·巴夫洛芙娜与罗普霍夫的談話几乎一模一样。

③ 几乎不用追述，罗伯特·欧文在这方面进行过多么热情的宣传。至于傅立叶，那让我们在这里引用一下他下面的意味深长的話吧：“les coutumes en amour……ne sont que formes temporaires et variables, et non pas fond immuable”（*Oeuvres complètes de Ch. Fourier*, t. IV, p. 84.）（“爱的习性……仅仅是暂时的、易变的形式，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内容”（《傅立叶全集》，第4卷，第84頁））。

④ 《同时代人》，1847年第12期。

爱的人而把自己任何爱的感情完全抑制下去。至于采用什么方法，必须完全有意识地进行选择。車尔尼雪夫斯基把这个问题解释得这样透彻，以致过去在爱情关系方面的那种自然的轻率和天真变成完全不可能的了。意识的控制扩及爱情方面，男人对待女人的自觉观点已为广大公众所接受。这在六十年代对我们特别重要。俄国所经历的改革不仅使我们的社会关系，而且使家庭关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完全黑暗的角落，现在射进了光芒。俄国人不得不看一看自己，用清醒的眼光看一看自己对亲近的人，对社会、家庭的关系。在家庭关系方面，在爱情和友谊方面，一个新的因素开始起重大作用，这就是信念，它在过去只为少数“理想家”所具有。信念的不同成了突然决裂的原因。一个“被嫁给”某人的女子有时会惊讶地发现，她的合法的“占有者”是个蒙昧主义者、贪污分子、在上司面前阿谀逢迎的小人。一个男人过去曾愉快地“占有”美丽的妻子，而出乎他的意料她接触了新的思潮，他就常常痛苦地看到，他这迷人的玩物所关心的却完全不是“新人物”和“新观点”，而是新的服饰和舞蹈，以及丈夫的官衔和薪俸。一切解释和规劝都是徒劳的，只要丈夫稍微透露一下他“乐于服务”，但却“厌恶奉承”，美人马上就会变成真正的泼妇。如何是好？怎么办？这部著名的小说指明了应该怎样和怎么办。在它的影响下，过去认为自己是别人的合法财产的人，也开始同它的作者一起重复地说：啊，卑鄙！啊，卑鄙！谁敢占有一个人！——在他们心中，人类尊严的意识已经觉醒了，他们往往在经过了极其激烈的内心的和家庭的波澜之后变得坚强起来，按照自己的信念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并且自觉地走向合理的人类的目标。仅仅由于这一点就已经可以说，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名字是属于历史的，他的名字将使人们感到亲切，而当那些亲自认识这位伟大的俄国启蒙运动者的人都已去

世的时候，人們仍会怀着感激的心情回想起他的名字。

蒙昧主义者責备車尔尼雪夫斯基，說他在自己的小說中宣揚“肉欲的解放”。再沒有比这种責难更荒謬和更伪善的了！随便举出任何一部取材于上流社会生活的小說，随便想一想一切国家和一切民族的貴族和資產階級的爱情猎艳故事，——你們就会看到，車尔尼雪夫斯基根本沒有任何必要去宣揚那种早已實現了的肉欲的解放。相反，他的小說所宣揚的是人的精神、人的理性的解放。在具有这部小說的思想傾向的人，誰都不会有閨房猎艳的爱好，而对那些伪善地尊重流行道德的“上流社会”人士來說，如果沒有这种閨房艳事，那末生活就不成其为生活了。蒙昧主义者先生們清楚地知道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的严肃的道德性质，他們对他生气也正是为了他的道德上的严肃性。他們感觉到，像《怎么办？》的主人公那样的人，一定会把他們看做最大的淫棍，并对他們抱着最大的蔑視。

我們知道：在俄国传播真理、科学和艺术的崇高观念，是我們这位作者一生的主要的、可以說唯一的目的。他写小說《怎么办？》也是为了传播这些观念。把这部小說仅仅看作宣传爱情方面的理性态度，那是錯誤的。薇拉·巴夫洛芙娜对罗普霍夫和吉尔沙諾夫的爱情——这不过是借以安排作者的其他更重要的思想的一条主綫罢了。在薇拉·巴夫洛芙娜的梦中，作者的社会主义理想是用鮮明的色彩描繪出来的。他完全按照傅立叶的方式来描繪社会主义公共宿舍的景象。車尔尼雪夫斯基沒有給讀者提供任何新东西。他只是向他們介紹了西欧思想界所早已得出的結論。在这里必須再一次指出，早在四十年代俄国人就知道了傅立叶的观点。“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就曾因为信奉傅立叶主义而被判罪。但是，車尔尼雪夫斯基使傅立叶思想在我国得到了空前未有的传播。他向广大



群众介绍了这种思想。后来在我国，甚至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崇拜者在谈到薇拉·巴夫洛芙娜的梦的时候都要耸耸肩膀。在某些人看来，她所梦见的法伦斯泰尔是十分幼稚的幻想。有人说，这位著名的作家本来可以同讀者談些什么对我们更切近更实际的东西。甚至有些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也是这样議論的。老实說，我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完全不同。我們从薇拉·巴夫洛芙娜的几个梦里可以看出車尔尼雪夫斯基的社会主义观点的特征，可惜，这个特征直到如今还没有得到俄国社会主义者的足够重视。这些梦里引起我們重视的是：車尔尼雪夫斯基已經完全意識到，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只有把资产阶级时期发展起来的技术力量广泛地应用于生产。在薇拉·巴夫洛芙娜的梦里，劳动大軍共同地从事生产，从中亚轉到俄国，从气候炎热的国家轉到寒冷的国家。所有这一切，当然借助于傅立叶的著作是可以想像的，但是俄国讀者不了解这一点，这甚至从后来所谓的俄国社会主义的历史中也可以看得出来。我們的革命者对社会主义社会竟得出这样的概念，他們把它想像成使用落后的木犁（还在失明的瓦西里时代用来翻地的木犁）来耕地的农民村社的联盟。但是，不言而喻，这样的“社会主义”完全不能算做社会主义。只有把人从“土地的权力”和自然界的支配下解放出来，无产阶级才能解放。为了人的这种解放，无疑地要像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薇拉·巴夫洛芙娜的梦里所讲的那样，必須有劳动大軍，必須把現代生产力广泛地应用于生产，而我們在追求“实际”时却把这些完全忘記了。

228

車尔尼雪夫斯基生活在“新人”的新典型在我国誕生的时候。他通过拉赫美托夫塑造了这种典型。我們的作者愉快地欢迎这种典型的出現，而且不能不去乐于描繪出他那即使还不清晰的輪廓。同时他忧伤地預見到，这个俄国革命者要經受多少痛苦和折磨，他

的生活一定是严峻的斗争和沉重的自我牺牲。于是車尔尼雪夫斯基通过拉赫美托夫给我们描绘了一个道地的苦行人。拉赫美托夫完全在折磨自己。用他的女房东的话说，他简直是“对自己残忍的人”。他甚至决定试一试能否经得住拷打，为此整夜躺在扎满铁钉的毯子上。很多人，包括皮薩列夫在内，都认为这只是一种怪癖。我们同意，拉赫美托夫性格上的某些细节可以用别的方式来描写。但是整个性格还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几乎每一个优秀的六十和七十年代我国的社会主义者都有不少的拉赫美托夫作风<sup>285</sup>。

在结束我们的导言时，我们要指出，車尔尼雪夫斯基在俄国文学上的作用，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甚至我们许多对車尔尼雪夫斯基非常友善的人都很不了解他。柯罗連柯对于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回忆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位天才的聪明的作者竟把他描绘成某种“唯理论的经济学家”，而且还说他信仰“孔德所谓的组织理性的力量”<sup>①</sup>。如果关于“组织理性”这样的话还有些意思，那就是说，車尔尼雪夫斯基是用孔德本人在观察社会现象时所用的唯心主义观点来考察社会现象的。但是，一个以唯心主义观点观察社会现象的人，是不能称为经济学家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名称只适用于（尽管也不完全正确）那些不相信组织理性的力量而相信经济的组织力量的人。相信组织理性的“经济学家”就好像是接受摩西的宇宙起源说的达尔文主义者。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这里最重要的是，柯罗連柯先生摆出我们的“主观主义者”的社会学观点，来和車尔尼雪夫斯基的“经济主义”相对立。“我们不再是‘唯理论的经济学家’，我们也并没有原地不动。以米海洛夫斯基为主要代表的学派，给我们揭示了一幅由生物学性质的规律和对

① 柯罗連柯：《离去的人》，第78页286。

比所构成的完整图景，以代替純經濟的图式，而經濟利益的把戏则被抛到从属的地位”<sup>①</sup>。

的确，“沒有原地不动”！米海洛夫斯基所揭示的那幅“由生物学性质的規律和对比所构成的图景”，和車尔尼雪夫斯基的社会观点比較起来，是个大大的倒退<sup>②</sup>。米海洛夫斯基是拉甫罗夫的門生。而拉甫罗夫按其对社会发展进程的观点來說，是布魯諾·鮑威尔的追随者，这一点我在《論一元論历史观之发展》一书中已經指出。因此，誰想弄清楚車尔尼雪夫斯基的世界观怎样对待我們的“主观主义者”的世界观，他首先就要設法弄清楚，車尔尼雪夫斯基所遵循的費尔巴哈哲学是怎样对待布魯諾·鮑威尔的观点的，而这里問題非常簡單明确：費尔巴哈远远超过了布魯諾·鮑威尔。

我的第一篇論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是在車尔尼雪夫斯基逝世的消息給予的最初印象之下写的，在这一版完全改写了一遍；我曾摘录了我們这位作家給他妻子的信中的几句话作为这第一篇文章的題詞：“我們的生命是属于历史的，几百年后，我們的名字还会使人們感到亲切；虽然到那时候我們的同时代人已經不在世上，但人們还会怀着感激的心情回想起我們的名字。”这封信写于1862年10月5日，当时这封信的作者已經被監禁起来了。后来他的起訴人引用这些话作为他极度自負的证明。他反駁他們說，虽然他們认真地摘引了他信中的这些话，可是他写这封信时却是完全出于无意的<sup>③</sup>。

我們也完全不談这样一个問題，即自負是否会干犯任何一种

---

① 柯罗迪利，《离去的人》，第79—80页287。

② 根据同一位柯罗迪利先生的证明，車尔尼雪夫斯基对于这些“規律和对比”抱着完全否定的态度，这是不奇怪的。

③ 雷姆克，《往事》，1906年，第103页。

刑法的任何一个条文的问题。我们也完全相信，我们所引证的卓尔尼雪夫斯基信中的这些话，对这些话的作者来说只是开玩笑罢了。然而我们认为，这些话现在具有另一种十分严肃的意义。卓尔尼雪夫斯基的生命实际上是属于历史的，而所有那些关心俄国文学的命运的人，所有那些珍视智慧、才能、知识、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将永远怀着感激的心情回想起他的名字。

---

## 第一 部

230

### 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的 哲学、历史和文学观点

#### 第一 篇

#### 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观点

##### 第一章 車尔尼雪夫斯基和費尔巴哈

在这部著作(順便指出,这部著作的第一篇文章<sup>288</sup>,是讲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观点的,写于1889年底<sup>289</sup>)的第一版中,我們提出了这样一种見解:从我們这位作家的哲学观点来看,他是費尔巴哈的信徒。我們的这种見解,当然首先是在把車尔尼雪夫斯基的那些比較接近于哲学的思想同費尔巴哈的观点加以比較之后提出的。我們还有可能以我們的作者本人的言詞<sup>290</sup>作根据。的确,車尔尼雪夫斯基为了适应当时书报检查的情况,在談到这个问题时总是用暗示;但对明白事理的人來說,他的暗示是再明显不过了。例如,車尔尼雪夫斯基在同杜德希金进行論战时(在《論战之花》一文中)說道,他贊同一个哲学体系,这个体系“組成一系列哲学体系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它“发源于黑格尔的体系,正像黑格尔的体系发源于謝林的体系一样”<sup>291</sup>。不难猜测,这些話所暗示的是費尔巴哈。但是,車尔尼雪夫斯基并不信賴他的論敌的聪明,因此想把

自己的暗示說得更清楚些。他問道：“但也許您还是沒有把事情弄清楚吧？大概，您要想知道我所說的这位导师是誰吧？或許，为了使您便于寻找起見，我要告訴您，他不是俄国人，不是法国人，不是英国人，不是毕希納，不是麦克斯·施蒂納，不是布魯諾·鮑威尔，不是摩萊蕭特，也不是伏格特，——那末他是誰呢？您在开始猜测：‘想必是叔本华！’——您在讀了拉甫罗夫先生的文章后这样大声地叫道。——果真就是他，您猜中了”<sup>292</sup>。这一段話使人毫不怀疑；車尔尼雪夫斯基正是把費尔巴哈认作自己的哲学导师。

在一篇論述《我国批評的命运》的文章里我們曾經证明，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著名学位論文《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是在費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建立美学的一次有意思的、独特的尝试<sup>①</sup>。一个了解費尔巴哈哲学的人，也很难不同意这一点。但是，首先，了解这种哲学的人，在我們这里是极少的；其次，無論我們关于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观点和《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作者的哲学观点的血緣关系的意見多么有根据，但这种意見在当时毕竟完全沒有車尔尼雪夫斯基本人的毫无掩飾的直接陈述作为依据。現在我們有了这样的材料，因此我們急忙請讀者注意它。

在前面已經提到过的《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第三版序言<sup>②</sup>中，車尔尼雪夫斯基說道：

“1846年，为本书第三版写序言的作者（即車尔尼雪夫斯基本人。——格·普·）得到了一个机会，可以利用良好的图书馆和花一

① 这篇文章是預定为《新語》写的，然而“由于不取决于編輯部的情况”，只发表了它的一半。它的全文在1905年发表于我的《二十年来》文集，并且在以后的再版中重印了<sup>293</sup>。

② 为自己的父亲出版全集的米·尼·車尔尼雪夫斯基說：“这篇序言沒有得到书报檢查机关的批准，因为不許写到費尔巴哈。因此《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第三版就决定不出版了。”这篇序言注明写于1888年。

点錢来购置書籍。在那时以前，他仅只讀过外省城市里可能得到的書籍，在那些城市里沒有一个像样的图书馆。他讀习了俄国人对黑格尔体系的解說，非常之不充分的解說。当他最后获得了讀黑格尔著作原文的机会的时候，他就开始对这些論著加以研究。黑格尔的原作，远不及他根据俄国人的解說所期待的那样使他喜欢。原因是，俄国的黑格尔信徒是用黑格尔左派的精神来闡述他的体系的。原作中的黑格尔，比黑格尔体系的俄国解說中的黑格尔更像十七世紀的哲学家、甚至像經院哲学家。讀他的著作是令人厌烦的，因为要形成一种科学的思想方法，讀他的著作显然是徒劳无益的。正在这时，費尔巴哈的主要著作之一偶然落到了这个渴望形成这样一种思想方法的青年的手里<sup>294</sup>。他成了这位思想家的追随者；他勤奋地再三閱讀費尔巴哈的著作，一直到生活上的需要使他不能潜心于科学研究工作的时候”<sup>295</sup>。

232

这一段話仿佛是車尔尼雪夫斯基的一篇哲学的 curriculum vitae<sup>①</sup>，它向我们說明，一般的德国哲学，特别是費尔巴哈哲学，在他的世界观的发展史上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而紧接着的一段話则向我们显示出費尔巴哈对我们这位作者的美学观点的影响。

車尔尼雪夫斯基仍然用第三人称談論自己：

“約莫在开始認識費尔巴哈之后六年，作者由于生活上的需要写了一篇学术論文。他感到，他可以应用費尔巴哈的基本思想来解决知識領域內某些未經他的宗师探討的問題。

作者需要写的这篇論文的主題是关涉文学的。他想用他觉得是从費尔巴哈的思想中得出的結論来解释那些关于艺术、特别是詩歌的概念，以滿足这个要求。因此，我正在給它写序的这本小

① (言行录)

书，就是一个应用费尔巴哈的思想来解决美学的基本问题的尝试。

作者决不自以为说出了什么属于他个人的新的意见。他只希望做一个应用在美学上的费尔巴哈思想的解说者”<sup>①</sup>。

读者可以看到，我们正确地理解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费尔巴哈的关系。但费尔巴哈本人的观点是怎样的呢？在前面我们曾把他称为唯物主义者。在我国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宣传费尔巴哈的哲学观点而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那些人，也认为费尔巴哈是唯物主义者。但在目前的哲学著作中有一种意见颇为流行，即认为费尔巴哈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顺便提一下，在朗格的著名的《唯物主义史》<sup>297</sup>一书中也曾发表过这种意见<sup>②</sup>，而费尔巴哈本人的某些“名言”和术语则被用作论证这种意见的表面理由。但是，这种意见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我们马上就会看清这一点。

费尔巴哈在自己的《Grundsätze》<sup>③</sup>中写道：“新哲学（即他的哲学。——格·普·）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因而也将人类学连同生理学当作普遍的科学”<sup>298</sup>。

朗格把费尔巴哈的这一段话，看作是起源于黑格尔哲学而又使费尔巴哈和本来意义下的唯物主义者分开的一种特征。他指出：“对唯物主义者来说，人的本性只不过是生命的一连串物理过程中的局部情况。”此外，按照朗格的意见，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不会像费尔巴哈那样赋予人的本性以神的属性<sup>④</sup>。但在费尔巴哈那里，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2部分，第192页296。

② 见《朗格唯物论史》，中华书局1936年中译本，下卷，第78页及以下。——译者

③ 《原理》（即指《未来哲学原理》一书。——译者）

④ 《唯物主义史》，斯特拉霍夫译，第2卷，第82页。



这些神的属性意味着什么呢？他自己說，他的“人本学”仅在于指出，人把自己的本质当作上帝<sup>①</sup>。由于这个原因，人性的属性的“神性”就失去任何唯灵論的意义：余留下来的只是术语的某种濫用，而对于正确发展哲学概念說来，这种术语的濫用是非常不好的，但这也絲毫沒有改变費尔巴哈学說的真实內容。費尔巴哈从来也沒有否认，人的本性“只不过是一连串物理过程中的局部情况”。这个原理是他的全部哲学的基础。但是，如果他认为必須把人的本性作为自己的出发点，那末这可以从他本人的話得到清楚的解释：“在唯物主义和唯灵主义的論战中涉及到人的头脑問題……只要我們知道了构成大脑的那种物质是什么，我們就会迅速地弄清楚任何其他物质和一般物质”<sup>②</sup>。这段話表明有些人如何不理解費尔巴哈，这些人拒不承认費尔巴哈的学說是唯物主义，而替它硬取一个什么都說明不了的名字：人道主义。的确，有时費尔巴哈本人拒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說：“唯物主义是一个完全不适当的名称，它会导致不正确的观念，并且只能在希望把思想的非物质性和思想的物质性对立起来的时候才能证明它；但对我们來說，却只存在有机的生命，只存在有机的活动，只存在有机的思維。因此，說有机体就更正确些。彻底的唯灵主义者否认思維需要有器官，而如果对事物采取自然观点，那就可以发现，沒有器官也就沒有活动”<sup>③</sup>。在我們援引这段話的那部名言录中，費尔巴哈声明，他只是在一定限度內才与唯物主义者并肩前进，唯物主义仅仅构成

234

① 《Feuerbach's Werke》（《費尔巴哈全集》），第6卷，第249頁。

② 《Ueber Spiritualismus und Materialismus》，Werke（《論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費尔巴哈全集》，第10卷，第129頁299。

③ 《Nachgelassene Aphorismen》（《死后发表的名言录》），发表在格律恩的《Ludwig Feuerbach in seinem Briefwechsel und Nachlass》，Zweiter Band, S. S. 307—308。（《費尔巴哈的书信和遺著》，第2卷，第307—308頁。）

人的本质和人的知識的基础，但还不是这种知識本身，像某些自然科学家例如摩萊蕭特所认为的那样。但在这里必須指出，实际上費尔巴哈所提出的“有机体”这个术语所表达的哲学观点，和“唯物主义”一詞所表达的哲学观点是完全一样的。“狭义的”自然科学家之所以不能使費尔巴哈滿意，是因为在他看来自然科学家把一切归之于脑，而“脑却不过是一个生理学的抽象；它只有与头和身体联在一起，才是思維的器官”<sup>①</sup>。但是，哪一个自然科学家曾經否认过脑一旦同头和身体分开就会停止思想呢？这是从来也没有人否认过的。在这种場合，費尔巴哈对自然科学家簡直是不公平的<sup>②</sup>。不容爭辯，以摩萊蕭特、毕希納和伏格特那样的自然科学家为代表的唯物主义，有时具有很大的狹隘性，并且犯了严重的理論錯誤。但是，把唯物主义的一个学派所特有的缺陷算在一般唯物主义的眼上，是不公平的。看来，費尔巴哈本人也理解这一点，他在自己的著作《Ueber Spiritualismus und Materialismus, besonders in Beziehung auf die Willensfreiheit》<sup>③</sup>中，把他认为是唯物主义的薄弱面的那种缺陷算在法国唯物主义学派的眼上，而把他所完全同情的德国唯物主义同这个学派对立起来。实际上，他在那里对法国唯物主义学派所提出的責备，完全是这个学派所不应受的，对毕希納或伏格特之流的德国唯物主义者提出这种責备，或許会有根据得多。但这只是一个細节，是由于受德国哲学教育的費尔巴哈很不熟悉法国唯物主义的緣故。这个細节并不妨碍費

① Werke〔《費尔巴哈全集》〕，第2卷，第362頁300。

② 要了解在现代自然科学中怎样提出这个问题，可參閱費利克斯·列·丹捷克的一部篇幅不大、但很有趣的著作《Le déterminisme biologique et la personnalité consciente. Esquisse d'une théorie chimique des épiphénomènes》〔《生物学的决定論和有意識的个性。副現象的化学理論概要》〕。

③ 〔《論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特别是从意志自由方面着眼》〕

尔巴哈在自己的“人本学”中站在純粹唯物主义的立場上。在我們 235  
刚才引证过的那部著作《Ueber Spiritualismus und Materialismus》<sup>①</sup>中，他是以法国唯物主义的精神发表意見的，正像拉美特利和狄德罗的著作所表現的一样，虽然他本人并没有意識到这一点<sup>②</sup>。

## 第二章 《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

無論如何，車尔尼雪夫斯基是以唯物主义精神去理解费尔巴哈的。关于这一点，他发表在1860年《同时代人》杂志第4—5期上的一篇著名的哲学論文，使人不能有任何的怀疑。他是这样解释他的論文标题《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的意义的。“这个原理是要把人看作只具有一种本性的生物，而不应该把人的生命切成属于各种不同本性的几半，应该把人的活动的每个方面看作是从头到脚都包括在内的、人的整个机体的活动，而如果这个活动是人的机体的某个特殊器官的特殊机能，那末，就应该从这个器官和整个机体的天然联系来考察这个器官”<sup>302</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在可以說是用费尔巴哈本人的話来解释人本主义原理时指出：迄今为止研究道德科学的大多数思想家，一直“按照以前的方法，即把人分成来自不同本性的几半的荒謬方法”进行工作。但正因为大多数学者还没有意識到人本主义原理的重要意义，所以他們的著作就没有任何重大意义。他說：“由于輕視人本主义原理，使得这些理論丧失了一切优点；但是遵循人本主义

① 《論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

② 关于这一点，詳見《二十年間》文集（參看《車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理論》）和小冊子《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問題》，第1—25頁<sup>301</sup>。

原理的、虽然还没有使用这一术语来说明他们对人的看法的、从前的为数不多的思想家的著作却是例外，例如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就是这样的思想家”<sup>303</sup>。

236 那些对唯物主义学说的本质抱有庸俗看法的人，一定会觉得我们的作者关于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的这个意见是完全出乎意外的，甚至是可笑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伏伦斯基先生在《俄国批评家》一书中关于这个意见下了这样一个庄严的判决：“在过去的所有思想家中，車尔尼雪夫斯基由于某种奇异的联想和无疑是错误的回忆的结合，只愿意承认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他关于人类思想领域内这两位真正伟大的创造者的体系有着虚幻的概念，认为他在遵循上述人本主义原理时，在具有新的实证知识材料的情况下，乃是他们的继承者”（第 271 页）。

这种对于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所谓虚幻的概念所作的煞有介事的评论，仅仅证明伏伦斯基简直完全没有理解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观点。

我們已經知道，車尔尼雪夫斯基是站在费尔巴哈观点上的。费尔巴哈怎样对待斯宾诺莎呢？他在自己的近代哲学史中怀着极大的同情阐述了斯宾诺莎学说，而在他写于 1843 年的《Grundsätze》<sup>①</sup>中，则陈述了这样一个完全正确的思想，那就是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是神学的唯物主义，即继续站在神学观点上的对神学的否定。按照费尔巴哈的意见，斯宾诺莎的不彻底性就在于把唯物主义和神学混淆在一起；但是，他的这种不彻底性却并没有妨碍他去找到“正确的、至少在当时说来是正确的说法，来表达现代的唯物主义概念”。因此，费尔巴哈把斯宾诺莎称为现代自由思想家和唯

① 《原理》

物主义者的摩西<sup>①</sup>。

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車尔尼雪夫斯基把斯宾諾莎归入以往贊同人本主义原理（虽然还没有使用这一术语来说明自己的哲学观点）的少数思想家之列。他这样做，是仿效他的老师的先例，因为他的老师曾正确地认为斯宾諾莎是现代唯物主义的摩西。至于說到亚里士多德，車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他的哲学与费尔巴哈的学说有着血緣关系，这实际上是犯了錯誤。亚里士多德接近唯心主义者，远甚于接近唯物主义者<sup>305</sup>，但在这里也不应该忘記，在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中間有一些人用极其接近于唯物主义的精神来解释他的体系<sup>②</sup>。亚里士托克逊、狄开亚赫、特别是斯特拉敦就是这样做的。大概，車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他們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解释是正确的，因此把他們的老师宣布为人本主义原理的拥护者。再說一遍，决不能认为这个意見是正确的；但只是由于伏伦斯基先生在哲学方面一窍不通，他才能把这个意見看做是車尔尼雪夫斯基完全不懂哲学的证据<sup>③</sup>。

237

总之，人类机体的統一性的观念乃是車尔尼雪夫斯基哲学的

① Werke (《费尔巴哈全集》)，第2卷，第291頁。关于这一点，詳見《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問題》，第9—13頁304。

② 关于这一点，可參閱 Ed. Zeller, «Die Philosophie der Griechen in ihr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 II Th., II Abtheilung, II Auflage, Tübingen 1862, S. S. 717, 719—720, 732, 742. [爱·泽勒尔，《希腊哲学的历史发展》，第2部分，第2篇，图平根1862年第2版，第717, 719—720, 732, 742頁。] 还可以对照一下 Ueberweg, Grundriss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 Theil, Berlin 1876, S. S. 218—219. [宇伯威格，《哲学簡史》，柏林1876年版，第1部分，第218—219頁。]

③ 上世紀六十年代，不仅仅車尔尼雪夫斯基一人具有縮小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因素的意义倾向。列布萊的頗有趣味的《Matérialisme et Spiritualisme》〔《唯物主义和唯灵主义》〕一书就說明了这一点；該书收入“Bibliothèque de philosophie contemporaine”〔《現代哲学丛书》〕，并附有李特雷的序言（見第48—54頁）。該书出版于1865年。

基础。車尔尼雪夫斯基是任何一种二元論的坚决反对者。用他的話來說，哲学——即他所闡述和捍卫的費尔巴哈哲学——所看到的人类机体，和自然科学所看到的一样。他說：“这些科学证明，在人身上看不到任何二元的東西，而哲学則另外还說，如果人除了他的实在的本性外还有另一种本性，那末，这另一种本性就一定显現在什么东西之中，而因为它并没有显現在任何东西之中，因为人身上所发生的和表現出来的一切都仅仅起源于他的实在的本性，所以，人就沒有其他的本性”<sup>①</sup>。但是，人的本性的統一并不妨碍人的机体中存在两种不同的現象：所謂物质方面的現象和所謂精神方面的現象。这就向車尔尼雪夫斯基提出了这样一个問題：这两种現象相互間的关系是怎样的？它們的存在是否会推翻人的本性統一的原理？車尔尼雪夫斯基断然地作了否定的回答：“我們沒有根据作这样的假設，因为沒有一个物体只具有一种性质；相反地，每个物体都显示出各种无限多的現象，为了便于判断它，我們把这些現象归入不同的种类，給每一种类冠以性质名称，因此每个物体都具有很多不同的性质”<sup>②</sup>。在这里又一次显示出他的哲学观点和費尔巴哈的观点的完全一致。大家知道，根据費尔巴哈的学說，有机体是主体，而思維則是这个主体的属性（“宾詞”），因为进行思維的，并不是从前唯心主义哲学所援引的那种抽象的存在物，而是现实的存在物、身体。但人的机体是什么呢？車尔尼雪夫斯基回答說，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化学組合，这种組合处于非常复杂的化学过程中，这种过程就叫作生命”<sup>③</sup>。这种过程的某些部分迄今仍然沒有得到很好的說明。但是，按照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意見，从这一

① 參閱《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233頁。——譯者

② 參閱同上书，第235頁。——譯者

③ 參閱同上书，第266頁。——譯者

点却决不能得出結論說，“我們对那些现在研究得很不完全的部分一无所知”<sup>①</sup>。生命过程的某些方面的知識，至少可以使我們在目前还研究得很差的那些方面做出否定的結論。用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話來說，这种否定的結論在一切科学中都是很重要的；但它們在道德科学和形而上学中特別重要，因为在那里它們能消灭許多有害的錯誤。为了闡明这个重要的思想，我們让車尔尼雪夫斯基本人来发表意見。他写道：“有人說，自然科学还没有发展到能令人滿意地解释一切重要的自然現象的程度。这是真实情况；但哲学中的科学学派的敌人却从这个真情实理中作出了一个完全不合邏輯的結論。他們說，在科学地解释自然現象中所留下来的空白处还保留着虛幻世界观的某些殘余。問題在于，对于在科学上已解释清楚的部分和現象进行分析，这种分析結果的性质，就足以证明在其他还没有完全解释清楚的部分和現象中发生作用的因素、力量和規律的性质；如果在这些沒有被解释清楚的部分和現象中，除了在已被解释清楚的部分中所发现的东西外还有別种东西的話，那末，已被解释清楚的部分就不会有它們现在所具有的那种性质了”<sup>②</sup>。

这段議論又是針對二元論而发的。不管对所謂心理現象研究得怎样少，但我們現在已經能够有把握地說，把心理現象归結为一种特殊实体的思想家是錯了。这样的特殊实体是不存在的。心理現象只不过是人类机体活动的結果。这个原理像一条紅綫一样貫穿着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整篇論文。

但在这里提出以下这个保留条件将是有益的。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論文中有一段話可能給人，而且实际上已經給人以誤解的原

239

① 參閱《車尔尼雪夫斯基選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268頁。——譯者

② 參閱同上书，第233—234頁。——譯者

因。这段话是这样说的：“我們知道譬如說什么是营养；由此我們也大致知道譬如說什么是感觉；营养和感觉这样密切地互相联系在一起，以致一者的性质可以决定他者的性质”<sup>①</sup>。在讀了这段话之后，人們也許会以为車尔尼雪夫斯基持有那些仿佛是唯物主义者的人的观点，即认为思想以及感觉都只不过是物质运动<sup>306</sup>。但是，实际上他和費尔巴哈一样，离开这种唯物主义是很远的。用費尔巴哈的話可以再好不过地表达他的唯物主义观点：“对我來說，或主观地說，是純粹精神的、非物质的、非感性的活动，就其本身來說，客观地說，是物质的、感性的活动”<sup>②</sup>。为了使讀者不致怀疑我們企图把車尔尼雪夫斯基所沒有的观点硬加在他身上，我們要引证車尔尼雪夫斯基本人的一段話：“感觉按其本性來說一定要以存在着联系为一个思想的两个思想因素为前提：第一是引起感觉的外部物体，第二是感觉到本身发生感觉的生物”<sup>③</sup>。我們仔細想一想这些话。感觉到本身发生感觉的生物，是物质的生物，是能感受到外部物体的作用的有机体。这种作用表现在有机体的某些部分这样或那样地进行活动。有机体的某些部分的这种活动引起一定的感觉，但这种活动并不等于感觉；它只是这样一个現象的客观方面，这个現象从主观方面來說，即对实现这个活动过程的那个生物來說，才是感觉。在車尔尼雪夫斯基那里，也像在費尔巴哈那里一样，現象的这两方面——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极其密切地互相联系在一起；但却不能把它們互相同一化。相反，車尔尼雪夫斯基也像費尔巴哈一样反对这种同一化，因为他正确地把这种同一化看做是无意識地重犯唯心主义的一个根本錯誤——即用取消主

① 參閱《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268頁。——譯者

② Werke [《費尔巴哈全集》]，第2卷，第350頁307。

③ 參閱《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279頁。——譯者



体和客体之间的二律背反的一个因素的办法，来虚伪地解决这种二律背反<sup>①</sup>。

下面我們可以看到，为了《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一文而攻击車尔尼雪夫斯基的他的敌人，完全沒有弄清楚他对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的看法。但现在我們不得不仅限于指出，車尔尼雪夫斯基并不贊同实证主义者拒絕考察物质和精神之间的相互关系問題的做法。例如，他拒絕承认約·斯·穆勒是“現代哲学的代表”，因为穆勒从来沒有研究过上面这个問題。車尔尼雪夫斯基关于穆勒写道：“他有意地避免发表任何有关对这类問題的意見，似乎认为这类問題是不能加以精密研究的”<sup>②</sup>。最后这句话表明，在車尔尼雪夫斯基看来，这类問題是完全可以进行研究的。

我們再进一步来談。我們知道，車尔尼雪夫斯基把人类机体看成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化学組合，这种組合处于非常复杂的化学过程中，这种过程就叫作生命”<sup>③</sup>。这种过程是这样复杂，以致研究这种过程的化学部門分离出来成为一門特殊的科学，这門科学被人称为生理学。但是，这个情况一点也沒有损害人不过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种思想。車尔尼雪夫斯基說道：“生理学和化学的关系，可以比做本国史和世界史的关系。当然俄国史只是世界史的一部分；但这部分的对象对于我們特別亲切，因而它仿佛成了一門特殊的科学。在学校中，俄国史的課程是和世界史的課程分开讲授的，学生在考試时可以从俄国史另外得到分数。但是不應該忘記，这种表面的分別只是为了教学实践上的方便，而不是由于这一学科的性质同这一学科的其他部分在理論上有差別。俄国史只有

① 參照《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問題》，第9頁308。

② 參閱《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232頁脚注。譯者

③ 參閱同上书，第266頁。譯者

同世界史联系起来才可以理解，俄国史要用世界史来解释，俄国史只是世界史中所讲述的那些力量和现象的一种变态。生理学也是这样，它只是化学的一种变态，而它的对象只是化学中所研究的那些对象的变态”<sup>①</sup>。对这一点还应该补充一句，即生理学也并不局限于研究人类机体中实现的生命过程。人类机体的生理学只不过是生理学的一个部门、即动物生理学的一部分。无论从有机体的物质过程方面来说，或是甚至从所谓精神过程方面来说，人和动物之间都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車尔尼雪夫斯基解释道：“的确，科学分析揭穿了下面这种空话的不公道：似乎动物根本没有值得尊敬<sup>241</sup>的品质，例如，某种进步的能力。通常人们都这样说：动物一辈子就是和生下来一样，它们学不会什么东西，它们的智力不发展。这种意见被下面这种大家所熟知的事实驳倒了：熊可以学会舞蹈和耍把戏；狗可以学会跳舞和拣东西；象甚至可以学会走绳索，就连鱼也可以学会听声音而集中到规定的地方。这些动物不经过学习是做不到这点的；学习给予它们不学习就不能有的品质。不仅人训练动物，就是动物本身也在相互训练；大家知道，猛禽教自己的孩子飞翔”<sup>②</sup>。在这里没有必要过于冗长地谈论这个问题，我们只补充一点<sup>309</sup>，就是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自己的论文中关于这个问题所发表的许多见解，也可以在很久以后出版的达尔文的《人类由来》<sup>③</sup>一书中看到<sup>310</sup>。

如果说人类机体在本质上和动物机体毫无区别，那末动物机体也和植物机体毫无本质的区别。車尔尼雪夫斯基说道：“动物机

① 参阅《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266页。——译者

② 参阅同上书，第273页。——译者

③ 达尔文的《人类由来》一书初版于1869年，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中的人类主义原理》一书出版于1860年。——译者

体在其最发达的形态上是和植物迥乎不同的。但讀者知道，哺乳动物和鳥类在許多过渡形态上是和植物界联系着的，根据这許多过渡形态可以追溯由植物的生命变为所謂动物的生命的一切发展阶段。有些植物和动物彼此几乎沒有区别，因此很难說，應該把它归入哪一界”<sup>①</sup>。不但如此。一切动物在其生存的初期都几乎和初生期的植物相同。車尔尼雪夫斯基指出，动物的胚胎和植物的胚胎都一样是“細胞”。他在指出动物的胚胎很难和植物的胚胎区别开之后接着写道：“总之，我們看到，一切动物的机体都和植物一样起源于相同的东西，只是后来某些动物的机体才具有和植物很不同的形态，并在很高的程度上表现出那些在植物中表現得很微弱、而只能用科学的方法才能发现的性质。例如，树木中有着运动的胚芽；它的液汁和动物身上的一样在运动着；树根和树枝在向四外伸展着。誠然，这种移动只发生在个别部分，而植物的整个机体却并不改变位置。但是珊瑚虫也不会改变位置；小珊瑚虫的移动能力并不超过树木。甚至也有改变位置的植物；属于这种植物的有 *Mimosa*<sup>②</sup> 科的某些植物”<sup>③</sup>。

我們并不是說，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这里所发表的思想在当时說来完全是新的；無論在黑格尔那里，或特别是在謝林学派的某些自然哲学家那里，都能看到这些思想。車尔尼雪夫斯基熟悉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因此，他知道这些思想也是不足为奇的。但在他的笔下，这些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一切形而上学的气息，而富有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色彩，以致自然而然地会产生这样一个問題：車尔尼雪夫斯基是否在当时已經知道了拉馬克和乔弗洛埃·

242

① 參閱《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272—273頁。——譯者

② (含羞草属)

③ 參閱《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273頁。——譯者

圣希黎的动物学理论？我们在他的著作中没有发现直接说明这一点的材料，但他从西伯利亚回来后发表文章反对“生存竞争有益论”时用“老种变论者”<sup>311</sup>署名，并不是没有缘故的；当时他把拉马克称作天才的生物学家，也不是没有缘故的。很可能，早在六十年代，他就在达尔文的某些先驱者的著作中清楚地知道了种变说的生物学理论。

在结束关于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这方面的观点的阐述时，我们要提醒大家：在他眼里，有机生命一般说来只不过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化学过程。这一点决定了他对活力论的态度。任何特殊的生命力都是不存在的。有机体中的化学过程只是在复杂性上和所谓无机界中的化学过程有所不同。車尔尼雪夫斯基指出：“不久之前我们还认为所谓有机物（如醋酸）仅仅存在于有机体之中；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也产生于有机体之外；因而元素的有机组合和无机组合之间的差别是非本质的差别，而所谓有机组合是根据同样的规律产生和存在着的，它们都一样是由无机物产生的。例如，树木不同于无机酸的地方，就在于无机酸是非复杂的组合，而树木却是许多复杂组合的化合物。这就像二与二百之间的差别，只是一个数量上的差别而已”<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很少谈到哲学问题本身，虽然他比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我国绝大多数进步作家，例如米海洛夫斯基，更精通哲学得多。哲学主要是作为某些实际要求的理论基础才使他感兴趣。因此他在自己的《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一文中也没有忘掉这些要求，而不止一次地谈到它们。这也就是他在这篇论文中很注意那些与实际生活课题直接有关的哲学理论问题

<sup>①</sup> 参阅《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238页。……译者

的原因。例如，关于道德的哲学基础問題，而首先是关于意志的問題，就是这样的哲学理論問題。

車尔尼雪夫斯基证明，把“道德科学”納入精密科学領域的第一个結果，就是消除了对人們的行为所抱的某些旧观点。他說，“例如，已經完全明白，道德世界的一切現象都是按因果律由彼及此地在外外部条件影响下发生的；根据这一点，关于現象的发生并不取决于先前的現象和外部的条件的一切假設都被认为是錯誤的。因此，現今的心理学不会再作这样的假設，如：‘一个人在这种場合下所以作得不好，是因为他想作得不好；而在另一种場合下他所以作得好，是因为他想作得好。’心理学說，坏的行为或好的行为都一定是由某种道德的或物质的事实，或者是由两种事实的結合所产生的，而‘意願’只是在我們的意識中伴随着先前的思想、行为或外部事实所产生的思想或行为而来的主观印象”<sup>①</sup>。換句話說，車尔尼雪夫斯基把人看成是周围环境的不由自主的产物，因此他甚至以极大的人道精神来对待人的性格的那些不良方面，而唯心主义者則把这些不良方面只看作是應該加以严厉懲罰的恶的意志。在車尔尼雪夫斯基看来，一切都取决于社会习惯和环境，而因为社会习惯也是在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的，所以归根到底人們的一切行动都取决于环境。他写道：“您譴責一个人有罪，首先必須仔細看一下，究竟是他犯了您所譴責他的那种罪过，还是环境和社会习惯有罪过，好好地看一下吧，也許这完全不是他的罪过，而只是他的不幸。”“卫道者”想把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这些話說成是替道德敗坏現象辯护，当然，这只是证明了他們自己不明事理。实际上，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这里也只是叙述了和发展了他的老师費尔巴哈的观

① 參閱《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256頁。 譯者

244

点，这种观点与道德败坏毫无共同之处。费尔巴哈的下面这些名言是人所共知的：“一个人在皇宫里所想的和在茅屋里所想的的不同，茅屋的低矮的顶棚仿佛会压迫人的头脑。我们在自由的空气中和关在房间里也是不一样的；狭窄的场所使人的心胸和头脑局促，宽广的场所则使人的心胸和头脑开阔。在没有机会表现天才的地方，也就没有天才；在没有宽广的活动场所的地方，也就没有想活动的意愿，至少是没有想活动的真正意愿”；又如：“如果您想使人们变好，那末就先使他们幸福吧。”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这种名言和理论在十九世纪只不过是十八世纪唯物主义学说的重复，是适应于业已变化了的环境的具体运用。马克思早在四十年代就已指出了唯物主义学说同社会主义学说之间的密切联系。他写道：“既然从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说，既然人不是由于有逃避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得到自由，那就不应当惩罚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根源，使每个人都有在社会中进行活动的自由场所。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sup>①</sup>。

例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把人的性格看成是环境的产物这种观点，不仅是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他当时的西欧社会主义者、特别是罗伯特·欧文的影响。大家知道，欧文曾经写过一部论人的性格形成的研究著作（《A New View of Society or Essays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Human Character》）<sup>②</sup>，他在自己的全部实际活动中总是以这样的信念作为出发点，即人们的罪恶行为并不是他们的罪过，而是他们的不幸。

<sup>①</sup>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67页。——译者

<sup>②</sup> 《新社会观或试论人的性格形成的原理》312

但是，既然人的性格是环境的产物，那末应该怎样回答人的本性是善的还是恶的这个問題也就显而易見了。人的本性既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只是視环境的不同而变成善的或恶的。車尔尼雪夫斯基說道：“可以认定，伊凡是善的，而彼得是恶的；但这些判断只适用于个别的人，而不适用于一般的人，就像关于砍木板和会打铁等习惯的概念只适用于个别的人，而不适用于一般的人一样。伊凡是木匠，但不能說，这种人一般地就是木匠或者非木匠；彼得会打铁，但关于一般的人却不能說，他就是铁匠或者非铁匠。伊凡成为木匠，而彼得成为铁匠的这个事实只是表明，在伊凡生活中曾經存在过的那些条件下，使伊凡成为木匠，而在彼得生活中曾經存在过的那些条件下，使彼得成为铁匠。同样的，在一种条件下，人可以成为善的，而在另一种条件下，人可以成为恶的”<sup>①</sup>。

245

当然，这是很接近于馬克思所代表的那个学派的实际結論的。車尔尼雪夫斯基为了举例而向自己提出一个这样的問題：人怎样才能成为善良的人，因而使不善良的人在世界上成为极罕見的現象。他这样回答这个問題：“心理学說道，缺乏滿足需要的手段，是暴露恶的品质的最丰富的源泉；人差不多只是在不得不靠剝夺別人的东西，来使自己不再缺少必需的东西的时候，才做坏事，才損害別人的利益”<sup>②</sup>。如果社会这样地組織起来，使人对食物的需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到滿足，那末单凭这一点就至少能消灭目前社会中所存在的全部恶行的十分之九。有人說，在技术不完善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如果說这个論据过去曾經是有根据的，那末在目前的力学和化学的状况下，它就失去了任何意义：“在溫带的每个国家，土地的出产，能充分滿足比这个国家現今的

① 參閱《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261--262頁。 譯者

② 參閱同上书，第263頁。 譯者

居民多十倍到二十倍的居民所需要的粮食，而且还要多得多”<sup>①</sup>。車尔尼雪夫斯基不可能去分析，为什么迄今为止任何一个人人类社会都不关心于适当满足像食物需要那样的迫切需要。但他觉得，他的叙述已足以说明“目前的道德科学正处于怎样的状况之下”。的确，为了使读者了解我们这位作者的观点，这已经完全够了<sup>②</sup>。

246

《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一文是以伊索寓言式的语言写成的（这是由于俄国作家所极其清楚地了解的那种必要性），但按其内容来说，它仍然是大胆而鲜明有力的，因此它不仅必然在同情車尔尼雪夫斯基派的读者中间产生了极强烈的印象，而且可能在反对車尔尼雪夫斯基的人中间产生了更强烈的印象。它引起了热烈的论战是毫不奇怪的。

### 第三章 与尤尔凯维奇等人的论战

在反对車尔尼雪夫斯基观点的那些比较闻名的论敌中间，首

① 参阅《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264页。——译者

② 在这里，也像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車尔尼雪夫斯基是完全忠实于费尔巴哈的。对于不熟悉这位德国思想家的著作的那些读者来说，从费尔巴哈为自己的全集（第1卷出版于1846年）所写的序言中摘引下面这段话将会是有益的：《Das Uebel sitzt nicht im Kopf oder Herzen, sondern im Magen der Menschheit... Ich fühlte es, sagte eine Verbrecherin, wie mir die bösen Gedanken aus dem Magen aufstiegen. Diese Verbrecherin ist das Bild der heutigen menschlichen Gesellschaft. Die einen haben Alles, was nur immer ihr lüsternder Gaumen begehrt, die Andern haben Nichts, selbst nicht das Nothwendige in ihrem Magen. Daher kommen alle Uebel und Leiden, selbst die Kopf- und Herzenskrankheiten der Menschheit》（Vorwort, XV, 1846年版）。[“恶不是潜藏在人的头脑里或心里，而是潜藏在人的胃里……有一个女犯人說，我感觉到恶的念头怎样从我的胃里产生出来。这个女犯人是现代人类社会的一幅写照。某些人拥有他们贪馋的嘴所想吃的一切东西，另一些人则一无所有，甚至连他们的胃所必需的食物也没有。人类的一切罪恶和痛苦，甚至头脑和心的疾病，都是由此产生的。”（序言，第15页，1846年版）



先应当提到基輔神学院教授巴·尤尔凱維奇，他在刊载于1860年的《基輔神学院著作汇集》第4集的一篇长文《略論人类精神的科学》中攻击了車尔尼雪夫斯基。这篇文章当时得到了卡特柯夫在《俄罗斯通报》上的热烈的贊許，甚至对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彻底的思想方式一窍不通的彼·拉·拉甫罗夫，看来也认为尤尔凱維奇的論据是十分令人信服的。后来，这位可敬的神学院教授对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进军，被伏伦斯基先生在前面已經提到过的《俄国批評家》一书中大加贊揚。伏伦斯基先生坚信，車尔尼雪夫斯基已經被尤尔凱維奇彻底击败。而因为伏伦斯基先生似乎是現在我們文学界中打着各色各样唯心主义旗帜对唯物主义进行攻击的所有那些不計其数的哲学上的浅学之徒——如司徒卢威、特魯別茨基、伊凡諾夫、卢那察尔斯基、巴扎罗夫、尤什凱維奇、別尔曼、瓦連廷諾夫、菲洛索佛夫等等先生們——的前驅，所以我們要相当詳細地考察一下，伏伦斯基先生到底认为这个基輔神学家的論据中有什么东西是令人信服的。

第一，伏伦斯基先生非常喜爱尤尔凱維奇的这样一个思想：在外部經驗和內部經驗的事实之間横着一条鴻沟，想从另一个对象的观点来判断某一个对象的任何企图，都应该从科学中鏟除。車尔尼雪夫斯基忽略了这一点，所以就造成了一系列的錯誤。用他的話來說，哲学所看到的人的机体，和自然科学所看到的一样。尤尔凱維奇关于这一点問道：在这种情况下，“把其他科学已經先看到的東西再看一遍”的哲学，究竟有什么必要呢？伏伦斯基先生也十分得意地补充說：“按照尤尔凱維奇的簡單而明白的解釋，这就是《人本主义原理》的作者的第一个錯誤”<sup>①</sup>。

<sup>①</sup> 《俄国批評家》，圣彼得堡1896年版，第282頁。

尤尔凯维奇的解释是简单的——这的确如此。但是，现在只有不了解这个问题的人才能觉得这个解释是明白的。

車尔尼雪夫斯基是站在费尔巴哈的观点上的。而费尔巴哈则把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想像成下面这样。他认为哲学应该让位给自然科学，他说：“没有任何哲学便是我的哲学”<sup>313</sup>。但是，要使哲学能够对事情有利地让位给自然科学，就必须使自然科学家本人掌握那些导致哲学自我否定的哲学结论。换句话说，必须使自然科学家不再是狭隘的专家。但是，离开这一点还很远。绝大多数自然科学家在自己的思维方面都没有超越自己的专门科学的范围，仍继续保持着过时的哲学概念和社会概念。在他们的这个缺陷没有消除以前，哲学是不能与自然科学溶合起来的。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说，他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与自然科学家一起前进。如果说他当时的自然科学家不能跟随他超出一定的范围，那他就更正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但是，无论如何，他是有这个思想的，而对尤尔凯维奇的问题的答复也正包含在这个思想中。自然，車尔尼雪夫斯基清楚地知道这个思想。他有一段话可以作为证明：“那些自以为是无所不包的理论的创造者的自然科学家们，事实上仍然是创造了形而上学体系的古代思想家的门徒，而且往往是其体系被谢林部分地破坏而又被黑格尔彻底地破坏了……的思想家的门徒，不仅这样，而且大都是些拙劣的门徒……当自然科学家不再说诸如此类的形而上学的胡言乱语的时候，他们就能够而且一定会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创立起比费尔巴哈提出的概念体系更加精确完备的概念体系。然而目前对有关所谓人类认识的基本问题的科学概念的论述，仍然是费尔巴哈做得最好”<sup>①</sup>。这段话是我们从前面已经引证过的原来预定出版、但未获

248

① 参阅《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三联书店版，第140页。——译者

准的《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一书第三版序言中摘引的。这篇序言写于1888年。但在我們所引证的这段话中，談的是費尔巴哈早在1845年所发表的观点，当然，当車尔尼雪夫斯基写《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一文时已經清楚地知道費尔巴哈的这个观点。我們再重說一遍，这个观点中包含着对“把自然科学已經看到的東西再看一遍的哲学有什么必要”这个问题的答复。这个答复可能是尤尔凱維奇始終弄不明白的。可以說，他 *ex professo*<sup>①</sup> 是一个落后的人。但是，想扮演最时髦的思想家角色的伏伦斯基先生，怎样能始終不明白这个答复呢？倒霉的是，我們的那些最时髦的思想家完全不理解他們所“批判”的那些真正进步的作家。他們号召讀者前进，而他們自己却向后退，大炒其哲学的冷飯。在費尔巴哈的时代，德国也有不少这样的人。費尔巴哈把这些人称为 *Wiederkäuer*（反刍动物）。但遺憾的是，現在我們的这种“反刍动物”却更多得多；我們的文学界簡直不能摆脱他們。大概，这使他們的前驅者——伏伦斯基先生大为高兴；但是，不作哲学反刍的人却應該为此作嘔。

第二，伏伦斯基先生跟随在尤尔凱維奇之后，发现“車尔尼雪夫斯基把关于人的本性的統一問題叙述得很糟”。原来問題就在这里。尤尔凱維奇硬說車尔尼雪夫斯基认为物质現象和心理現象之間沒有任何差別，并且他以胜利者的姿态质問道：那末感觉怎样通过神經的活动产生呢？这是陈詞濫調，他們早就用这些东西来同唯物主义者糾纏，其实从这些陈詞濫調中只能作出一个結論：这些想“批判”唯物主义的人，对唯物主义連最起码的知識也沒有。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自己的文章里从来沒有讲过，在所謂物理現象和心理現象之間沒有任何差別。相反，他坚决主张这种差別的存在；

① 即被引者所說。

但是他认为，决不能因为这种差别而把心理现象归结为一种特殊的非物质的因素。我們都已知道他的意見，即每一物体都有很多不同的质。我們現在把它比較詳細地叙述一下。車尔尼雪夫斯基說：“例如，树可以生长，也可以燃燒；我們說，它具有两种质：生长  
249 力和可燃性。这两种质之間的相同之点何在呢？它們是完全不同的；除了质这个普遍的概念以外，沒有任何一个概念可以把这两种质概括起来；除了現象这个概念以外沒有任何一个概念可以把符合于这两种质的这两类現象概括起来。或者，例如，冰既坚硬又发光；坚硬和发光之間有什么共同之点呢？这两种质之間的邏輯距离大得无可衡量，或者更确切地說，在它們之間沒有任何远的或者近的邏輯距离，因为在它們之間沒有邏輯关系。由此我們看到，完全不同的质結合在一个物体之中，是事物的一般規律”<sup>①</sup>。至于我們称之为感觉和思維能力的那种质，情况也是这样。它和生物有机体的所謂物理的质之間的距离是无限大的<sup>314</sup>。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这个同时具有广延性和运动能力的有机体的质。誰要是认为，因为感觉和思維完全同运动和广延不相似，所以它們就應該被当做完全不同于具有广延和运动的那种实体（物质）的另一种实体（精神），那末他就犯了违反邏輯的严重罪过。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就是这样，而如果伏伦斯基先生具有理解这种思想所必需的那种“质”的話，那末他就会立刻看到，尤尔凱維奇的論据是多么站不住脚，而且多么可怜了，因为这种論据的全部臆造的力量就在于有意或无意地歪曲这位俄国人本主义原理拥护者的观点。但問題也正在于伏伦斯基先生沒有理解車尔尼雪夫斯基所必需的那种“质”，正像我們現在的一些“反動的”哲学家無論过去和現在都沒有那种

① 參閱《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235頁。——譯者

“质”一样,因为这些“反乌的”哲学家天真地、但却坚决地相信,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观点早就已經“陈旧”了。

約·普利斯特列早在他的《Disquisitions》里就讲过,那种以为脑的振动等同于知觉的想法,是对唯物主义学說的大肆濫用。他說:“想像一种沒有知觉伴随的振动是容易的。然而我們設想 (it is supposed), 脑除了具有振动的能力以外,还有知觉或感觉的能力;我們完全不理解,为什么它不能具有这种能力”<sup>①</sup>。这就是近代一切优秀的唯物主义者的观点,自然也包括費尔巴哈和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唯物主义的敌人,不論彻底的或不彻底的、自觉的和不自觉的唯心主义者,在他們批判这个学說时,首先应该向我們证明他們在这方面比普利斯特列知道得要有些,并且告訴我們,是什么理由使他們不能同普利斯特列一起认为,脑除了振动能力以外,还可以具有知觉能力。他們无疑是有理由的。但理由归根到底就是那种唯灵論的偏見,即认为物质本身(就是說,在精神沒有給予它生命的时候),是僵死的,它不仅不能知觉,甚至还不能运动。他們在和唯物主义者爭論时根据这样的理由,这就是明显的 *petitio principii*<sup>②</sup>,即依据本身正需证明的命題。唯物主义的敌人們自己也多少模糊地感觉到这一点。因此他們常常尽量避免提出他們为什么不承认知觉能力是物质的一种属性的理由,而喜欢反駁任何一个有名的唯物主义者都沒有讲过、至少在近代沒有讲过的意見: 知觉就是运动<sup>③</sup>。我們把这种批判交給讀者去判断,可是这种批判

250

① 《Disquisitions relating to Matter and Spirit》. By Joseph Priestley, Vol. I. The second edition, Birmingham MDCCLXXXII, p. 121. (約瑟夫·普利斯特列,《关于物质和精神的研究》,伯明翰 1782 年第 2 版,第 1 卷,第 121 頁。)

② 《缺证論法》315

③ 我們假定,古代唯物主义者,例如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可能在这方面有某些不明確的地方 316,可是这也还远未被证实,因为,不要忘記,这些思想家的观点并不是以完整的形式传到我們手里的。

目前在我們这里比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更为流行。

总之，我們要再說一遍，——車尔尼雪夫斯基决沒有把知觉和运动混为一談，他并不认为知觉能力是和运动能力一样的物质的属性。現在要問，使具有知觉能力的物质成为实际上能知觉的东西的那些条件，具有什么样的性质。車尔尼雪夫斯基回答說，对这些条件直到目前为止还研究得很差，但是，无论如何，我們現在已經可以充分有把握地认为它們是帶有物质性的。只有有机体才显示出知觉的能力，而我們已經知道，根据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意見，有机体的生命首先是某种化学过程。在車尔尼雪夫斯基看来，这也就說明了下面这一点，即有机体显示出我們在无机物质中所看不到那种能力。

251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們請讀者充分注意這個問題。車尔尼雪夫斯基写道：“物体在化学过程中所显露出来的性质，是当它們处于不动的化合物的状态下完全看不到的性质。例如，树木本身不会燃烧，紙捻、打火石和打火铁也不会燃烧；如果有一小块鋼，由于摩擦（由于敲击打火石）变成灼热的、脱离打火铁而碰到紙捻，在它大大地增高了这个紙捻的某一部分的溫度后，它便提供了在紙捻的这一部分开始所謂燃烧的化学过程所必需的条件，那末，整个紙捻便逐渐被引入这一化学过程，并开始燃烧起来，而当它里面沒有化学过程的时候，它是燃烧不起来的；如果在这个过程进行时，把紙捻移近树木，它同样会把树木引进它的燃烧的化学过程，树木在这个过程中同样会燃烧起来，发出光亮，表现出在过程开始之前它里面所看不到的其他性质。無論我們举出任何别的化学过程，我們都会看到同样的情况：处在化学过程的物体能显露出在过程开始之前沒有表现出来的性质。例如，以发酵的过程來說。酒液平靜地盛在大桶里；酒麴也一动不动地放在杯子里。只要把酒

麵·放入酒液，便开始所謂醱酵的化学过程，酒液便沸騰起来，泛起泡沫，在桶里动蕩起来”<sup>317</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这些論据很像十八世紀法国和英国的唯物主义者的意見，那些唯物主义者认为，感觉和思維的能力是有机体的某种状态的結果<sup>①</sup>。但是，在車尔尼雪夫斯基那里，这种意見本身是沒有任何例外的。車尔尼雪夫斯基清楚地理解到，在“化学过程”和“靜止的化合状态”之間並沒有什么截然的區別。由于这个問題极为重要，我們不得不再一次从《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一文中摘引一大段。

“显然，——車尔尼雪夫斯基承认說，——当我们讲到物体在化学过程中和不在化学过程中的状态的差別时，我們所讲的只是过程的强烈的、迅速的进程和它的緩慢的、微弱的进程之間的量的差別。质言之，每个物体都經常是处在化学过程的状态中；例如，若木头不被燃烧，不在炉中烧成灰烬，而是靜靜地、似乎沒有任何变化地放在房屋的墙壁內，也終有一天会导致和燃烧一样所导致的结果：它会逐渐腐烂，最后也只留下灰烬（即腐木最后在原先的  
252

① 例如，霍尔巴赫就倾向于这种思想，約·普利斯特列也明确地表述了这种思想。普利斯特列說道：《my idea now is that sensation and thought do necessarily result from the organisation of the brain, when the powers of mere life are given to the system》, Loc. cit. p. 150. (“我現在的想法是：当一个身体得到简单的生命力的时候，感觉和思維必然是腦組織的結果。”引自第150頁。）請參閱 *Disquisitions: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ensation and Organization*（《关于感觉和組織的联系的联系的研究》）第13章全章。

出温度；但是在燃烧时集中于几小时内的热量却在几十年内散发出来（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因而在日常生活中根本感觉不到；这种温度的存在对于实际的判断是微不足道的。这正像一滴酒洒入一个池塘时所发出的酒味一样：从科学的观点看来，这个池塘含着水和酒的混合物，但在实践上却必须认为池塘里似乎一点酒也没有”<sup>①</sup>。

这段精采的话使我们觉得：就从这方面来说，車尔尼雪夫斯基也认为有机物质和无机物质之间并没有任何鸿沟。当然，动物机体，特别是象人这样的最高级的动物机体，在我们所关心的这一方面表现出同无机物质完全异样的特性。不过，在树木的燃烧过程中同时也产生许多在缓慢的腐烂过程中所没有的现象。可是，这两种过程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相反，实质上这是同样的过程；只不过在第一种情况下这种过程进行得很快，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却进行得很慢。因此，处于这个过程中的物体的质，在前一种情况下具有巨大的力量，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不同，它“十分微弱，微弱得在日常生活中完全感觉不到”。用这一点来说明有关心理现象的问题时，这意思就是说：无机状态的物质也没有丧失“感觉”这种带给高级动物丰富“精神”果实的基本能力。但是无机物质的这种能力处在极其微弱的状态中。因此，考察者完全觉察不到它的存在，而我们也就可以把它看成等于零，完全用不着担心这样做会犯什么明显的错误。但是，无论如何不要忘记，这个能力是一切物质都具有的，所以当它特别有力地表现出来的时候（例如，像我们在一般高级动物，主要是在人的身上所看到的那样），把它看成某种奇妙的东西，这是没有根据的。車尔尼雪夫斯基谨慎地（这种谨慎在

<sup>①</sup> 参阅《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239页。——译者



当时我国的出版条件下是必要的)表达了这种思想,于是他接近了拉·美特利和狄德罗这样的唯物主义者,而他們又是拥护已經摆脱了不必要的神学虛飾的斯宾諾莎主义的观点的。

伏伦斯基先生认为,尤尔凱維奇真是发表了一个天曉得多么高明的思想,因为他說,空气的运动轉化为声音和以太的振动轉化为光,必須以有感觉的生物即能够把量的运动轉变为声和光的质的生物为前提。但是車尔尼雪夫斯基本人也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只是认为,这种有感觉的生物乃是以某种方式組織起来的物质,而無論伏伦斯基先生或是被他捧上天的尤尔凱維奇,却都沒有提出任何合理的論据来反对这个假設。

尤尔凱維奇还說,量的差別不是在物体本身中,而是在它和有感觉的主体的关系中轉变为质的差別的。但这是极大的邏輯錯誤<sup>318</sup>。客体要在自己和有感觉的主体的关系中发生变化,必須預先在自己本身中发生变化。如果在我們看来冰的特性和水蒸气的特性不同,这是因为水分子的相互关系在冰的状态下和在蒸气状态下完全不同。但這個問題讲得够了。

第三,伏伦斯基先生认为,尤尔凱維奇責备車尔尼雪夫斯基忘記了使人有別于其他动物的那个主要特征是正确的;那个特征就在于人是“作为个人的精神”而表現自己的。关于这一点,我們认为毫无必要去同伏伦斯基先生爭論,而只介紹讀者去讀一下达尔文的《人类由来》那样的著作,或者去讀一下罗門尼斯研究人和动物的智力发展的著作<sup>319</sup>。只要把达尔文和罗門尼斯的結論同車尔尼雪夫斯基的結論比較一下,就能看到我們这位“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的捍卫者多么堅定地站在自然科学的立場上了。

大家知道,車尔尼雪夫斯基是多么輕視尤尔凱維奇的論据。他沒有去分析这些論据(在当时书报检查的条件下也不可能这样

做),而干脆宣布这些论据已经过时,丝毫没有说服力。

254 他在《论战之花》中写道:“我自己也当过神学校的学生。根据经验,我了解像尤尔凯维奇那样受教育的人们的情况。我见过处境和他相同的人。因此,对他谏笑,我感到沉重,因为这就等于谏笑人家手头没有足够的书籍,谏笑人家在发展过程中完全无依无靠,谏笑人家在一切方面的难于想像的窘迫处境。

我不知道尤尔凯维奇先生多大年纪;如果他已经不是年轻人,那末对他关心已经晚了。如果他还年轻,那我很乐于把我所收藏的为数不多的藏书供他使用”<sup>320</sup>。

伏伦斯基先生直到如今还认为这个回答是极端不能令人满意的。他觉得,車尔尼雪夫斯基所以这样回答,只是由于他不能详细地驳倒尤尔凯维奇。我们知道,还有一些六十年代初期的杂志编辑也这样评论。例如,杜德希金在《祖国纪事》上逐条列举了尤尔凯维奇的似乎是驳不倒的论据,然后对車尔尼雪夫斯基说:

“看来,很清楚,现在问题已经不在于什么别人,而在于您,不在于一般哲学和生理学,而在于您对这些科学无知。神学校哲学这个避雷针在这里有什么用呢?您为什么把完全不同的事物混淆起来,然后说,这一切您在神学校上学时就知道了,甚至现在还背得出来呢?”

車尔尼雪夫斯基回答这一点时说道,杜德希金没有读过神学校的笔记本,他就不能了解问题在哪里。他接着写道:“假使您花点力气读读这些本子,您就会看到,尤尔凯维奇先生所发现的我的缺点,就是这些本子所发现的亚里士多德、培根、伽桑狄、洛克等以及一切不曾是唯心主义者的那些哲学家的缺点。所以,这些指责完全不是针对我这个个别作家的;这些指责其实是针对着我认为需要普及的那种理论的,而普及这种理论我认为是一件有益的事。

如果您不信，請讀一讀和尤尔凱維奇先生属于同一派別的人写的《哲学辞典》（西·果·先生<sup>321</sup>所出版），您就会看到，那里关于每一个不是唯心主义者的人所讲的也是这些东西，如說他們不知道心理学，不了解自然科学，否定内部經驗，說他們在事实面前完全破产，混淆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把人貶低，如此等等。請您說說，当我看到这篇名文的作者以及頌揚他的那些人在攻击我个人时只是重复自古以来关于我所贊成的那个学派的每一个思想家所曾經一再說过的陈詞濫調，我有什么必要去認真地看待他們呢？我應該下这样的判断：他們或是不知道，或是假装不知道，这些指責不是針對我个人，而是針對整个学派的；因而，他們或者是很不熟悉哲学史的人，或者只是按照他們自己也知道是虛伪的那种策略而行动。無論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都不值得同这样的对手进行認真的論战”<sup>322</sup>。这些话是完全正确的。

255

車尔尼雪夫斯基在同一篇文章里同样正确地写道，他认为正确的那种理論，构成一系列哲学体系中的最后的一个环节，它发源于黑格尔的理論，正如黑格尔的理論发源于謝林的理論一样。他自豪地說道，他认为自己的哲学理論不仅是最新的，而且还是最完整和最正确的。

必須是伏伦斯基先生或是他的当今的无数“反动的”追随者之一，才会认为尤尔凱維奇的論据是駁不倒的。实际上，这些論据甚至沒有动摇——更不用說駁倒——車尔尼雪夫斯基和費尔巴哈的任何一个基本原理。但是應該承认，車尔尼雪夫斯基从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中作出的某些結論，是不够完善的，片面的、并且——由于它們的片面性——也是不完全正确的。有关道德学說的結論就是这样。

## 第四章 道德学說

“如果仔細地研究一下左右人們行动的动机时，就可以知道，原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的所有好的和坏的、崇高的和卑賤的、英勇的和胆怯的事情都来自一个源泉：怎样做更愉快，人就怎样做，他的出发点是放弃較小的利益或較小的滿足以获得較大的利益或較大的滿足”<sup>①</sup>。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证明他的这个思想时举了好几个例子。当妻子为了親愛的丈夫的死而哭泣的时候，关于自己的想法构成了她的悲哀的基础：“沒有你，我怎么办？沒有你，我活在世上无味”等等。我們在失去爱子的母亲的悲痛中也看到同样的情况：“你的死使我的希望破灭了！我的一切快乐全都幻灭了！”等等<sup>②</sup>。用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話來說，感情的利己主义的基础在这儿是非常明显的。在所謂自我牺牲的情况下，要找到这种基础要稍微困难一些。薩古特城的居民为了不向汉尼拔投降，都互相砍杀而死了<sup>323</sup>。这是英雄的行为；但是，这种英雄的行为却并不与利己主义的打算相矛盾：“反正都是一样，即使他們不死于自己之手，也要死于迦太基人之手，但迦太基人将用最殘酷的拷打来长期地折磨他們，因此他們宁願輕快而迅速地死，而不去緩慢而沉痛地死，这种想法是有道理的”<sup>③</sup>。我們或者可以举卢克萊茨亚为例，她在遭到塞克斯特·塔克文尼玷污后就自尽了<sup>324</sup>。車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她也是慎重考虑后才这样做的：“丈夫会向她說尽許多慰藉和亲暱的話，但須知所有这一类話純粹是瞎話，只证明說話人的高

① 參閱《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283頁。——譯者

② 同上。——譯者

③ 參閱同上书，第284頁。——譯者

尚，但絲毫不能改变事情的后果。柯拉金会向妻子說：我认为你是純洁的，我像从前一样地爱你。但根据当时那种直到現在仍很少改变的看法，他不能用事实来证明自己的話。他有意也好，无意也好，却已經对妻子丧失了先前很大一部分的尊敬和爱情。他会故意对妻子更加溫存，来掩飾这种丧失；但这种溫存却比冷淡更使人感到难受，却比打罵更痛苦。卢克萊茨亚认为丢掉生命要比生活在和她一向习惯了的地位比較起来的屈辱地位中，痛苦要少得多，这是有道理的。爱清洁的人宁願挨餓，也不願去吃骯髒的食物；对于自尊心很强的人說来，与其受辱，不如一死”<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在引证这些論据时，作了一些附帶說明。他决不想减少薩古特城居民和卢克萊茨亚所应受的伟大的贊揚。他只是证明，他們的英雄行为也是聰明的行为。而证明这一点，在他看来，决不等于取消英雄行为和高尚行为的价值。这是完全正确的，当尤尔凱維奇之流指責他不重視这些感情的时候，他們只是暴露出自己不能理解我們这位作者的观点。車尔尼雪夫斯基的道德学說完全沒有取消英雄行为和高尚行为的价值；相反，它想指出英雄所选择的道路正就是正确的打算所指示的道路，借以提高这种价值。但是，这並沒有从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想法中消除掉他所固有的邏輯錯誤。实际上，車尔尼雪夫斯基是想用薩古特城居民和卢克萊茨亚的例子来使我們相信，高尚的行为决不是沒有理智的。我們毫不怀疑这一点。但是，我們却断定，基于利害打算的行为是一回事，而其后果对实行的人有利（正像完全基于利害打算的行为的后果对实行的人有利一样）的行为，則是另一回事。我們姑且承认，对卢克萊茨亚來說，自杀真的更为有利些，但是，我們非常怀

257

<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6卷，第230—231頁325。

疑，她在自杀之前，能否作多少切实的利害打算。要作这样的打算必须冷静，而卢克莱茨亚却不可能冷静。如果假定，在她的行为中，利害打算，即理智所起的作用比她在当时的关系、习惯和观点的影响下形成的情感所起的作用要小得多，这是否较为正确呢？人的情感和习惯通常是适应于现存的社会关系（当然，也适应于家庭关系）的，以致在这些关系的影响下所做的行为有时看来似乎是经过切实的利害打算的结果，但实际上它们却完全不是出于利害打算的。这是非常正确的，以致車尔尼雪夫斯基本人也用自己的想法证实了这一点：他说，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对于自尊心很强的人来说，与其受辱，不如一死。这也是正确的。但是，决不能把习惯与利害打算混为一谈，决不能说一个由于某种值得赞扬的习惯而行动的人，“他的出发点是放弃较小的利益或较小的满足以获得较大的利益或较大的满足”。一般说来，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合理的利己主义观点，很明显地表现出一切“启蒙时期”（Aufklärungsperiode）所特有的一种倾向，即力求从理智中寻找道德的基础，而从个人的多少比较切实的利害打算中去寻找关于他的性格和行为的解释。車尔尼雪夫斯基有关这个问题的见解有时同爱尔维修及其共同道的见解很相似，简直像两滴水珠一样。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见解几乎同样很像古希腊启蒙时代的典型代表苏格拉底的见解。苏格拉底在为友说辩护时证明交朋友有好处，因为在发生不幸时他们可能有用。这种极端偏重理智的现象，是由于启蒙运动者通常不善于采取发展观点而产生的<sup>①</sup>。

我们知道，根据車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论，人按其本性来说既不

<sup>①</sup> 关于这一点，详见我的著作：《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 — Holbach, Helvetius und Karl Marx》, Stuttgart 1896.（《唯物主义史论丛——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和卡尔·马克思》，斯图加特 1896 年版）326

是善的,也不是恶的,只是因环境的不同而变成善的或恶的<sup>①</sup>。如果我们承认,人的行为总是受得失的支配,那末我们就要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車尔尼雪夫斯基关于人性的观点;我们就应该说,人按其本性来说,既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只是计较得失,并且他的这种特性也因环境不同而可强可弱。但是,我们这位作家未必会喜欢这样的表达方式。

258

根据他的理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呢?回答这一问题的仍是那篇《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正像读者看到的,这是一篇内容极为丰富的文章。車尔尼雪夫斯基在那里说道:“个别的人都把别人所做的对他有利的事称作善行;社会舆论把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或者有利于社会上大部分成员的事称作善行。最后,人们不分民族和等级总把有利于一般人的东西称作善行”<sup>②</sup>。不同民族和等级的利益往往互相矛盾或与全人类的利益矛盾;同样地,一个等级的利益也往往和整个民族的利益相对立。这里怎样决定善恶呢?在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是很容易的:“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个别民族的利益,全民族的利益高于个别等级的利益,多数等级的利益高于少数等级的利益”<sup>③</sup>。但在实践中是怎样的呢?在实践中,人们都把对他们有利的行为称作善行,把对他们有害的行为称作恶行,却很少查问它和更广泛的整体利益有什么关系。但是,車尔尼雪夫斯基

① 但是不妨提一下,我们这位作者以前提出过另一种关于人性的观点。按照这个观点,人是“天生倾向于敬爱真理和善良而憎厌一切邪恶的生物,他只有因为无知、迷误或受了比他的性格和理性更强有力的环境的影响才会破坏善良和真理的规律,但从来不会自觉自愿地宁愿作恶而不行善”(见论謝德林的《外省散记》的文章,《同时代人》,1857年第6期,《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2卷,引文在该卷第221—222页)327。这种观点与其说接近于现代的发展学说328,不如说更接近于苏格拉底。

② 参看《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286页。——译者

③ 参看同上书,第287页。——译者

深信，把自己的私利看得高于公共利益的人、等级或民族，归根到底自己总会由于这种“理论上的错误”而吃亏。他说：“个别的民族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侵犯全人类的利益，个别的等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侵犯全民族的利益，这种情况到头来总是不仅有害于利益受到侵犯的一方，而且也有害于想损害他人利益以求得自己利益的一方；到头来总是蹂躏人类的民族自取灭亡，为自己而牺牲全民族的个别等级也总是把自己引向悲惨的结局”<sup>①</sup>。我们打算在这里分析他用来证实自己的这个论点的那些历史的和经济的实例，当我们在下文中谈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历史观点时，我们会涉及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只限于指出：不管他的这个论点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无疑地，他关于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的论点，总使我们有可能比他的论文更正确地提出关于利己主义的问题。确实，就假定我们所谈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分成等级或阶级的社会吧。在这样的社会里，符合整体利益的个人行为，将被人认为是善行，而违背这种利益的行为，将被人认为是恶行。因此，一种可以称之为整体的利己主义、社会的利己主义的东西，将成为判断善恶的基础。但是，整体的利己主义决不排斥个人的利他主义、个体的利他主义。相反，前者乃是后者的泉源：社会力求这样来教育它的各个成员，使他们把社会利益置于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某人的行为越是能够满足社会的这种要求，这个人也就越是有自我牺牲精神，越是有道德，越是有利他主义精神。而他的行为越是破坏这种要求，那末他就越是自私自利，越是没有道德和抱有利己主义。这就是人们过去和现在评判一个人的某种行为是利他主义的行为还是利己主义的行为时，常常或多或少自觉地采用的标准；在这里，全部

<sup>①</sup> 参阅《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287页。——译者



可能发生的区别都归结于这样一个问题，即人们在一定情况下把它的利益看得高于个人利益的那个整体，究竟是什么东西。

但是，当社会应用自己的基于整体利益的标准来评价个人的行为时，总是希望有利于它的行动出于实现这个行动的人的内心要求，而不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当一个为整体利益服务的人受自己的个人利益支配的时候，他就显示出或多或少的机灵性、或多或少的预见性，但却不是显示出或多或少的利他主义。用道德精神来教育人，就是使有利于社会的行为变成他的本能的要求（康德的“绝对命令”）。这种要求越强烈，那末这个人也就越有道德。所谓英雄就是这样的人：他们不能不服从自己的这种要求，即使为了满足它必须完全违反本身的最重大的利益，比方说，必须冒生命的危险。包括車尔尼雪夫斯基在内的“启蒙运动者”，通常却忽视了这一点。但是，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即康德在断言道德动机同利益没有任何关系时，他所犯的錯誤也不下于“启蒙运动者”。他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采取发展的观点，没有从社会的利己主义中引出个人的利他主义来。

260

值得注意的是，車尔尼雪夫斯基虽然断言人永远受利害考虑所支配，但归根到底他的想法却和我们所说的完全相同，然而由于我们所指出的他的逻辑前提的錯誤，所以他把自己的思想表述得很糟<sup>329</sup>。请看，在《怎么办？》这部小说里<sup>330</sup>罗普霍夫和吉尔沙諾夫是怎样表白自己的。薇拉·巴夫洛芙娜在結識了吉尔沙諾夫之后，問他是不是非常爱罗普霍夫。关于这一点，他們之間进行了如下的談話：

- 我？我除了自己誰也不爱，薇拉·巴夫洛芙娜。  
——您連他也不爱？  
——我們住在一起从沒吵过嘴，这就足够了。

——他也沒有爱过您？

——这我倒沒有注意。不过让我们問問他吧：你爱过我嗎，德米特里？

——我对你并不特別厌恶<sup>①</sup>。

吉尔沙諾夫“除了自己誰也不愛”，而罗普霍夫則仅限于对自己最好的朋友并不感到“特別厌恶”。可以看出，他們是彻底的利己主义者。而且他們在自己所有的談話和声明中……都始終是这样的“利己主义者”。罗普霍夫为了和薇拉·巴夫洛芙娜結婚，使她摆脱父母的控制，而决定放弃摆在他面前的学者的前程。他要使自己相信，他并没有作任何牺牲：“我可连想也沒有想到过要牺牲。我一向不是那种情願牺牲的傻瓜，——但願永远不是。怎样对我好我就怎样做。我不是一个肯牺牲的人。其实这种人是沒有的。誰也不肯牺牲。‘牺牲’是一个虛伪的观念，是胡說。人总是怎样觉得愉快才怎样做。那末你来解释一下看看吧。在理論上那倒很明白；但人一看到眼前的事实，他便感动了，他說：您真是我的恩人啊。”<sup>②</sup>

261 怎样觉得愉快就怎样做。誰遵循这个規則呢？所有的人。但是每一个人都是“自我”，每个人关于自己的某一个行为的每个想法，都和这个人“自我”的意識分不开。車尔尼雪夫斯基对这种无可辯駁的情况作了有利于自己的合理利己主义理論的解释，正象各国的“启蒙运动者”一样。罗普霍夫在确信放弃学者前程并和薇拉·巴夫洛芙娜結婚甚至还将对自己有利之后，就以下面这个十分得意的想法结束了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考虑：“这是完全正确的；我永远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从自己开始，以自己結束。我从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9卷，第2部分，第92頁331。

② 同上书，第85頁332。

这一点想起，‘牺牲’是一句十足的谎话；说我抛弃了学者的名誉和教授的地位，——这完全是胡说！其实我反正将照样工作，照样获得教授的地位，照样为医学服务。一个做理论家的人看到他的利己主义如何从思想变成实践，那是很愉快的。”<sup>①</sup>

这里极其明显地暴露出車尔尼雪夫斯基的逻辑错误。从人关于自己的行动的想法永远离不开“自我”的意识这一点，还决不能作出结论说，人的一切行动都是利己主义的。假如某一个“自我”把他人的幸福看成自己的幸福；假如他具有对这种幸福的“爱好”，那末这样的“自我”就叫做利他主义者，而不是利己主义者。仅仅根据人们的利他主义行动必然伴随着“自我”的意识这一点，就企图抹煞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之间的深刻区别——这就意味着想把逻辑的含糊带到绝对必须十分明晰的地方去。而車尔尼雪夫斯基本人的例子说明，这种逻辑的明晰性是多么必要。把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等同起来以后，他就不得不去寻找另一种标准，来把通常称之为利己主义的行为同一般叫做利他主义的行为区别开来。而他找到的是什么呢？

在《杂志评论》(1857年1月)中，他在确定皮却林和罗亭<sup>②</sup>之间的差别时说道：“一个是除了自己个人的享乐以外什么都不考虑的利己主义者，另一个则是完全忘掉了自己、一心一意关注公共利

<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9卷，第2部分，第86页333。同样地，薇拉·巴夫洛芙娜向女裁缝们解释她开办合作工厂的目的时说道：“这是因为我不大爱钱的原故；你们知道，各人有各人的爱好，并不是人人都光爱钱的，有的爱跳舞，有的爱穿戴或者打牌，这些人甚至准备为自己的爱好倾家荡产，并且确实有许多人倾家荡产了；他们把他们的爱好看得比金钱还珍贵，但谁也不感觉这有什么稀奇。我的爱好就在我和你们试办的这件事上面”（同上书，第117页）334。她也同样把事情描述成似乎她总是把“自我”放在第一位。

<sup>②</sup> 皮却林是萊蒙托夫的小说《当代英雄》中的主人公；罗亭是屠格涅夫的小说《罗亭》中的主人公。——译者

262 益的热心家；一个为了自己的情欲而活着，而另一个则为自己的思想而活着。这两个人……正好完全相反”<sup>①</sup>。说得完全正确！但是正是由于可能有这种相反的情况，所以，说一切人都是利己主义者，说他们彼此的区别仅在于计较得失的程度不同，那就是错误的了。罗亭并不是根据利害打算而为自己的思想活着的，同样地，皮却林也不是根据利害打算而为自己的情欲活着的。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薇拉·巴夫洛芙娜和罗普霍夫结婚以后，整整六个月没有同自己的父母见面；后来她去看望他们，我们的作者这样描述这次探望给她造成的印象：“半年来薇拉·巴夫洛芙娜一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她的心胸已经完全不惯于忍受那种由狡诈的谈话（其中的每一句都出于自私的打算）造成的污浊的气氛，也不惯于听那些骗人的意见和卑鄙的计谋了，她的地下室在她心里引起了一个可怕的印象。龌龊，鄙俗，各色各样的无耻行径，——现在这一切都带着强烈的新奇性，格外使她触目惊心了。

‘先前我怎么会有一力量在这样污秽闷人的气息中生活呢？我怎么能在这一间地下室里呼吸呢？而我不仅生活过来了，甚至还很健壮。这是惊人的，费解的。我怎么能在这儿长大，并且培养起对“善”的爱呢？真叫人没法理解，不敢相信’——薇拉·巴夫洛芙娜回家的时候这样想，她感觉自己是一个窒息以后获得了休憩的人”<sup>②</sup>。

过去薇拉·巴夫洛芙娜生活在“由狡诈的谈话（其中的每一句都出于自私的打算）造成的气氛中”。现在她在这种气氛中感到呼吸困难了。假如人们一般地说仅仅受利害打算的支配，那末为什么会感到呼吸困难呢？她所以感到呼吸困难，是因为像她的父母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3卷，第65页335。

② 同上书，第108页336。

那种人所作的利害打算，是不好的、“自私的”打算，这种打算是和“对善的爱”完全背道而驰的。由此可见，車尔尼雪夫斯基虽然把一切归结为利害打算，却不得不把那种“和对善的爱背道而驰的”、自私的打算同充满这种爱的无私的打算区别开来<sup>①</sup>。换句话说，他又回到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之间的陈旧的区别上去了。他所发生的情况，正如老早以前霍尔巴赫和十八世纪其他启蒙运动者所发生的情况一样，这些人也同样把一切归结为利害打算，而且也同样以逻辑的必然性把自私的打算同无私的打算对立起来。

在前面已经引证过的車尔尼雪夫斯基论《外省散记》的文章 263 里，我们可以找到下面这样一个再正确不过的思想：“支配着社会的那些习惯和规则，是由于某些不依赖于奉行它们的人的意志的事实而产生和保存下来的；因此我们必须用历史观点去观察它们”<sup>②</sup>。但是，假如支配着社会的那些习惯和规则是不依赖于社会成员的意志而产生的，假如我们必须用历史观点、而不是用理性主义观点去观察它们，那末也就完全应当用同样的观点去观察制约着个人行为的那些习惯和规则；它们也是不依赖于意志、因而也不依赖于利害打算而形成的，而且人也往往服从它们，尽管这会破坏他的个人利益。

但是，当車尔尼雪夫斯基叫他的小說中的主人公要我们相信，他们除了自己以外从来不爱任何别人的时候，实际上他也正是要想说明这一点。他的主人公的这种劝人相信的话仿佛是和下面这

<sup>①</sup> 在这部小说的另一个地方，他对那些“惯于把‘利益’两字理解成极端狭义的、庸俗的打算”的人表示很大不满（《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9卷，第169页）337。由此可见，除了庸俗的打算之外，还有某种不庸俗的打算。它和庸俗的打算有什么区别呢？随便说一下，区别是在于：受不庸俗的打算支配的那些人，考虑到自己“良心”的利益（同上）。

<sup>②</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3卷，第214页338。

点相矛盾的，即罗普霍夫想像中的未婚妻——他在薇拉·巴夫洛芙娜生日那一天同她跳舞时谈到他想像中的未婚妻——自称为“人类爱”<sup>①</sup>。然而实际上这里却毫无矛盾：卓尔尼雪夫斯基仅仅想说，他的主人公的整个道德本质都完全充满着人类爱，因此，为这种爱所提示的行为乃是他们的“自我”的迫切要求。罗普霍夫和吉尔沙诺夫都渴望无私的行动，以致当他们按照这种愿望行事的时候，他们并不发生任何内心斗争，而只是简单地遵循自己的善良的本能。由于这个缘故，他们也就自以为是只考虑自己本身的人<sup>②</sup>。

造成他们的逻辑错误的原因正在于，指导他们的行为的不是逻辑，而是感情。可以说，他们的这种错误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评价他们的性格时，我们决不应该重复他们的逻辑错误。我们应该知道，实际上这些人决不是利己主义者，相信他们的话并且认为他们是利己主义者的人，是把某些概念混淆起来了，而不把这些概念加以区别是不可能正确的道德学说的。

264

个人的利他主义赖以在社会的利己主义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过程，是一个辩证的过程，这个过程通常是为“启蒙运动者”所忽略的。作为首先追求实践目的的人，“启蒙运动者”一般说来很少关心现象和概念的辩证法。我们现在从我们这位作者的例子就可以看出这一点。现在我们要抛弃他的道德学说，但我们还是要说，不论这种学说有着怎样的逻辑错误，它同实践的利己主义的教条毕

① [《卓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9卷，第2部分]，第70页。“薇罗奇卡的第一个梦”339。

② 吉尔沙诺夫在考虑自己和薇拉·巴夫洛芙娜的关系时自言自语地说：“要是我的行为有一次违背了自己的整个本性，我就会永远失掉平静的可能和满意自己的可能，我将毒害我的终生”（同上书，第151页）340。吉尔沙诺夫只是忘记补充说，要具备这种“本性”，并不需要求助于利害打算；这样的“本性”在决心去做善良的行为时是不需要利害打算的。

竟有着天淵之別。当《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一文发表的时候，尤尔凱維奇之流却不懂得这一点。現在，我国“反动的”哲学家的前驅如伏伦斯基先生之流，也不懂得这一点。这一流人暴露出自己的这种无知，从而也就自己提供了智力貧乏的证据。車尔尼雪夫斯基有充分的权利鄙視他們。而且他确实广泛地使用了这种权利。在他的小說《怎么办？》中，有許多篇頁是用来嘲笑这些人的，我們可以毫不夸大地把这些篇頁称为輝煌之作。我們想部分地轉述其中的一段話<sup>341</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在描述罗普霍夫在和薇拉·巴夫洛芙娜結婚以前同她的关系时，假装对他的冷漠无情感到激憤的样子，并且說，不仅不能替他辯白，而且甚至企图替他辯白都是不好的。有些人可能要寬恕他，說他是医科学生，他研究的是自然科学，而大家都知道，自然科学是使人倾向于唯物主义的。車尔尼雪夫斯基用諷刺的口吻反駁这种見解說，一切科学都导向唯物主义，但幸亏远不是所有的学者都是唯物主义者。他作出結論說：“所以罗普霍夫沒法洗清自己的过失了。不替他辯白的好心腸的人們也可能用另一个理由来寬恕他，說他並沒有完全失去某些值得贊美的优点：他曾經为了于别人有利的工作而自觉地、坚决地抛弃一切世俗的名利，认为从这工作中得到的滿足便是他的最好的利益；他看他所愛慕的漂亮姑娘时，他的眼光是那么純洁，有些做兄弟的都未必能用同样的眼光来看自己的姊妹呢；但对于用这种理由来寬恕他的唯物主义的人，我們应当說：完全沒有任何优点的人是根本沒有的；無論是怎样的唯物主义者，他們到底总是唯物主义者，这就决定和证明了他們是些下流的和不道德的人，是不能寬恕的，因为寬恕他們便表示你默认唯物主义。所以，不替罗普霍夫辯白而想寬恕他是不行的。不过替他辯白倒也不必要，因为冠冕堂皇思想的崇尚者

和崇高倾向的维护者们，那些宣称唯物主义者下流和不道德的人，最近已经在一切正派人（无论是不是唯物主义者）眼前清楚地露出了他们的才智与品格的低劣，以致维护某个被他们嘲骂的人竟成了一件多余的事，而理睬他们的话也成了一件丢脸的事了”<sup>①</sup>。

## 第五章 車尔尼雪夫斯基和辩证法

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論萊辛的著作<sup>343</sup>中說道：

“如果有过一个人按其头脑的构造来说天生赋有哲学的才能，那末这个人就是萊辛。但是，关于哲学本身他却几乎没有写过一个字，在他的著作中没有一页是讨论哲学的，在他的书信中也几乎只同門德尔森谈论过哲学，而且仅限于門德尔森所需要的范围。莫非他本人真的违反着自己的天性对哲学这样不感兴趣吗？恰恰相反：当他在格列姆的别墅里勾划古典的‘hen kai pân’（一与全），同时与格列姆讨论他的《格列納德之歌》和《哈拉达特》一诗的时候，他向我们泄露了他个人究竟在想些什么。问题在于：当时还不到纯粹的哲学成为德国思想生活的中心的时候，——因此萊辛絕口不谈哲学；当时的才智之士已经准备好借诗歌来进行活动，但还没有准备去研究哲学，——因此萊辛也就写作剧本和谈论诗歌”<sup>②</sup>。

这些话几乎完全适用于車尔尼雪夫斯基本人。的确，按其探索哲学问题的奥秘的能力来说，他比天才的別林斯基稍逊一筹<sup>③</sup>。但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9卷，第63頁342。

② 同上书，第3卷，第755頁344。

③ 車尔尼雪夫斯基本人也写道，別林斯基“不能不被承认是个天才”（《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2卷，第122頁）345。



“按头脑的构造来说”，他毕竟有很多条件来极有成效地从事哲学研究，而且当然他会在这方面做出比譬如说拉甫罗夫更大得多的成绩。他显然喜爱哲学，无怪乎他曾经说过，一个具有哲学精神的人，一旦对哲学发生了兴趣，那你就很难为了那些与伟大的哲学问题相比而显得渺小的具体科学问题而放下哲学问题。但是，在拟定自己的研究计划时，这位经常谈论“利害打算”的“利己主义者”，却像莱辛一样，不是考虑自己个人的兴趣，而是考虑社会发展的需要。他当时的社会很少关心哲学，而对文学则比较关心得多。因此他最初的著作主要是讨论文学问题的，他利用自己的哲学结论来阐明的正是这类问题。他的《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一书就是这样产生的。后来，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特别是有关外交的部分，——也登上了舞台。車尔尼雪夫斯基转向了这些问题，它们所占去他的时间，甚至比文学问题更多得多。因此，他实际上没有可能在哲学方面花费很多时间。只有《人本主义原理》一文可以算作他当时对哲学的兴趣的纪念碑。但是，在他的其他文章里也可以遇到一些篇章，说明他对哲学的兴趣从来也没有泯灭，说明他精通这门学科。在这方面，我国的后一个时期的“先进”作家——例如米海洛夫斯基及其“主观主义的”同道们，甚至也远远不能同他相比<sup>①</sup>。

米海洛夫斯基及其“主观主义的”同道们，只会对黑格尔的“形

---

<sup>①</sup> 在我国，对哲学的兴趣在三十和四十年代极其强烈，而在往后的四十年间却完全消失了。車尔尼雪夫斯基有一段话说明他本人怎样看待这种衰落：“现在，我们的文学和批评几乎忘记了这种哲学追求。我们不想断言，文学和批评由于这个遗忘占了多少便宜，——似乎什么便宜都没有占到，损失的却是很多”（《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2卷，第183页）346。现在我们对哲学问题的兴趣又重新恢复了。但是我们以前对哲学的长期漠不关心造成了这样的结果：每一种哲学破烂在我们这里都被当作重要的哲学新发现。

而上学”輕蔑地聳聳肩膀。順便說一下，他們对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簡直是一窍不通。但車尔尼雪夫斯基却懂得黑格尔，并对他的哲学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自己是这样来说明他和他的导师費尔巴哈同黑格尔的关系的：

“我們常常看見：学术研究的继承者起来反对他們的前輩，而这些前輩的研究却是继承者自己的研究的出发点。譬如，亚里士多德敌視柏拉图，苏格拉底极其輕視他所继承的詭辯派。在近代，这样的例子也是不少的。但是有时也有使人慰藉的場合：新体系的創立者清楚地認識他的見解与其前輩的思想之間的联系，而且謙虛地自称为他們的弟子；他們指出他們的前輩的概念的缺点，但同时清楚地声明这些概念对于他們自己的思想的发展大有影响。斯宾諾莎对笛卡儿的态度就是如此。應該对現代科学的創立者們致敬：他們是很尊重而且差不多以子女之爱来待其前輩，完全承认前輩的天才的伟大、学說的崇高性质，而他們自己的观点也就是在这里萌芽的。車尔尼雪夫斯基先生明白这点，他学习这些人的榜样，把他們的思想应用到美学問題上去”<sup>①</sup>。

在我們說过前面这些話以后，未必还需要再重复一遍，我們这位作者所說的現代科学的創立者<sup>348</sup>指的正是費尔巴哈，他不仅在对黑格尔表示最深摯的敬意方面，而且也在对黑格尔体系采取批判态度方面，追随費尔巴哈的榜样。

他在《果戈里时期俄国文学概观》中关于黑格尔所說的話，并不总是正确的，但却总是聰明的和令人感兴趣的<sup>349</sup>。例如，我們可以在那里找到下面一段話，这段話与恩格斯关于黑格尔哲学的两

<sup>①</sup> 这段話我們引自車尔尼雪夫斯基在 1855 年的《同时代人》第 5 期上为自己的学位論文《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所写的評論文章（《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10 卷，第 2 部分，第 175 頁）347。

重性的評論非常相似：“黑格爾的原則是非常有力量、非常寬廣的，可是結論却狹窄而渺小；儘管他有巨大的天才，這位偉大的思想家却只有力量說出一般的觀念，但是要不屈不撓堅持這些原理，從這些原理合乎邏輯地發展出一切必然的結論來的力量，却還不夠……而且，他不僅不能從他的原則做出結論，——就是原則本身，他也沒有完全了然於胸，在他還是模糊不清的。下一代的思想家却更前進了一步，連黑格爾說得頗為模糊、片面並且抽象的原則，也得到十分完整而明確的表現了；於是再沒有動搖的余地了，兩重性也銷聲匿跡了，黑格爾在發展基本原理方面的不徹底性所帶給科學的虛假結論被消除了，而內容也得以和基本真理保持了和諧”<sup>①</sup>。

在這裡，我們不能不對作者所表現的觀點的明確性鼓掌喝采。但是，當他開始評述黑格爾的辯證方法時，那就遺憾地仍然不能使我們滿意。關於這種方法他是這樣說的：

268

“這個方法的實質就是：一個思想家不應當自安於隨便哪個肯定的結論，而應當去探索，在他所思索的對象之中，有沒有和這種對象初初表現出來的東西相對立的質和力；因此思想家就不得不從各方面來觀察對象，而真理，在他看來無非是各種各樣對立的意見的鬥爭的結果。這種方法代替以前關於對象的片面的概念，漸漸變成完整而全面的研究，同時關於對象的所有真正的性質，都有一個生動的概念。解釋現實，變成哲學思維的根本責任了。對現實十分嚴肅的注意，就從這裡開始，而過去對於現實是並不考慮的，為了投合自己的片面的偏見，往往毫不客氣地把它歪曲。這樣一來，真誠地、不知疲倦地尋覓真理，就取代了以前的任意的解釋。然而在現實之中，一切都取決於情況，取決於地點和時間的條

<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2卷，第184—185頁350。參閱我們譯成俄文并由李沃維奇先生出版的恩格斯的小冊子《費爾巴哈論》351。

件，——因此黑格尔承认，过去人们只是用一般文句来判断善恶，却并不考察某一个现象所从而产生的情况和原因，——这些一般的、抽象的箴言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每一种事物，每一种现象都有它本身的意义，因此就应当按照它所存在其中的环境来对它下判断；这个规则可以用这个公式表现出来：‘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也就是说，只有在考察了某一特定的事实所从而产生的一切情况之后，才能对这一事实做出肯定的判断”<sup>①</sup>。

269 这儿有很多正确的东西。辩证方法实际上是和“一般的、抽象的箴言”完全不相容的，但过去人们却依据这些箴言来对现象下判断，——遗憾的是，直到如今还经常这样下判断，——而不去观察这些现象所从而产生的情势和原因。车尔尼雪夫斯基把这一点看作是辩证方法的巨大优点，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正因为他在这个场合下是正确的，所以应当承认，他把迫使思想家全面地

---

<sup>①</sup>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2卷，第187页352。在我们所引证的那一頁的附注中，车尔尼雪夫斯基用下面这个例子来说明自己的思想：“例如：‘雨是好呢还是坏？’——这个问题是抽象的；要对它作肯定的回答，是办不到的；有时候雨能够带来好处，有时候即使少，也能带来坏处；应当问得明确一点：‘当谷物播种完毕以后，在接连五小时中，降下一场大雨，——这雨对谷物有好处吗？’——只有在这等场合，回答才能是明白而且有意义的：‘这种雨是十分有益的。’——‘可是在同一个夏天，在开始收获的时候，整星期都下倾盆大雨，——这对于庄稼好不好呢？’回答也是同样明白而且同样正确的：‘不，这雨是有害的。’在黑格尔哲学中，一切问题也都是这样解决的。‘战争是毁灭呢还是有益呢？’一般说来，你不能以肯定方式来回答，必须知道，问题在于是怎样的战争，一切都以时间和地点的条件为依归。对于野蛮民族来说，对于战争的害处，他们是较少感到的，好处却感到较多；对于有教养的民族来说，战争带给他们的总是害处多，好处少。然而，例如说，1812年的战争，对俄罗斯民族来说，却是有益的；馬拉松之战是人类史上最高贵的事件。这样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只有到了这个对象带着一切性质和特点，并且通过它就在其中生存的环境而显现出来，而不是和这种环境以及对象本身的生动特点脱离开来的时候，到这时候，关于它的概念才会具体化（假如以抽象的思维来思索它，这种思维的判断对于现实生活就不会有意义）。”

观察对象的那种对现实的关注态度看作辩证方法的主要特征，是不正确的。当然，对现实的关注态度是正确思维的必要条件。但是，辩证方法的特征首先和主要在于：它是从现象本身中，而不是从研究者的这种或那种同情和反感中，去寻找决定这种现象发展的力量的。辩证方法的一切主要的优点都可以归结为这一点，而它的优点之一就在于：它不给那种“以研究者的主观偏爱为依据的一般的、抽象的箴言”留下余地。辩证方法按其本性来说就是唯物主义的，在它的影响下，甚至持有唯心主义观点的研究者在自己的论断中有时也成为不容置疑的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本人就可以作为一个最好的例子，他在自己的历史哲学中就常常离开唯心主义的基地，而成为一个像现今滥用马克思术语的人所说的经济唯物主义者<sup>①</sup>。但是，要充分理解辩证方法的唯物主义本性，就必须弄清楚它的力量是在于认识到观念的进程决定于事物的进程，因此思想家的主观逻辑必须遵循他所研究的现象的客观逻辑。当别林斯基写作关于鲍罗金诺战役周年纪念的文章的时候，当他虽然不善于“发挥否定的观念”，即不善于到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中为这个观念寻找理论根据，但却尖锐地谴责脱离现实的主观意向的时候，他已经感到了这一点。可是，正因为别林斯基不善于“发挥否定的观念”，所以他在批判社会关系的时候更多地以自己的主观好恶为依据——当然，这种好恶完全是合理的和值得尊敬的，然而终究只是主观的。同时，我们已经指出的那个辩证方法的主要特点，即对观念的进程决定于事物的进程的認識，就不能不从他的视野中消失了。这个特点也从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视野中消失了（我们在下面将说明，这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评述这

270

<sup>①</sup> 关于这一点，詳見我論述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文章，該文刊載于《對我們的批判者的批判》一書353。

种方法时，把它归结为迫使思想家全面地观察事物的规范（规范是康德的用语）。但是，认识到必须全面地观察事物，还远不等于认识到这种观察的进程应该完全决定于事物本身发展的逻辑。而一个研究者如果没有完全认识到这第二个真理，那末甚至在他对事物采取最关注的态度和对它进行全面研究的时候，他也仍然很容易成为一个唯心主义者。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車尔尼雪夫斯基在哲学方面虽是一个坚决的唯物主义者，但他在历史观点和社会观点方面却仍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在哲学方面，他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上。他以唯物主义的精神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对于以唯物主义观点对待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的研究者应该遵循什么方法的问题，他却较少关心。因此，他虽然认识到辩证法的重要意义，但毕竟远没有理解它的主要优点<sup>354</sup>，所以不能像马克思和恩格斯<sup>355</sup>那样对它加以改造。車尔尼雪夫斯基是唯物主义者；但在他的哲学观点中只表现出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萌芽——诚然，这是充分具有生命力的萌芽。只要我们想起他的老师费尔巴哈的世界观也具有同样的缺点，我们就不会对这一点感到惊讶。只有同样受过费尔巴哈影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才能消灭了这个缺点，使最新的唯物主义成为主要是辩证的学说。

但是，我们再說一遍：在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观点中，已经有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富有生命力的萌芽了。例如，在《对反对村社土地占有制的哲学偏见的批判》一文中，就有一段話很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形态的不断交替，一定内容或倾向所产生的形态，由于该种倾向的加强、该种内容的高度发展，而在永恒不断地被否定，——誰了解了这个伟大、永恒而普遍的规律，誰惯于把这个规律应用于任何现象，——啊，他就会是多么平心静气地迎接那种引起别人惊慌不安的遭遇！当跟着詩人重复下列詩句：

Ich hab' mein' Sach'——auf Nichts gestellt,  
Und mir gehört die ganze Welt……<sup>①</sup>。

时，他会毫不惋惜已经过去的事物，并且要说：听便吧，任凭怎样，我们终归会有时来运转的日子的！”<sup>②</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論亚里士多德的《詩学》的文章里<sup>358</sup>，为亚里士多德的敏銳的智慧和淵博的知識做了公正的評價之后，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保留：“可是，因为他經常不但要給主要現象而且要給一切細节努力找出深刻的哲学解释，所以他虽有这种天才也难免陷于瑣碎。在亚里士多德的一位敌手、一个現代哲学家的这样一个原理中：‘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也表現出了这种傾向，这种傾向使得这两位思想家都极重視瑣碎的事实，只因为这些事实十分适合他們的理論体系”<sup>③</sup>。这位現代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敌手不是別人，正是黑格尔。由此可见，黑格尔关于一切现实的东西的合理性和一切合理的东西的现实性的著名原理，在車尔尼雪夫斯基看来不过是这位伟大的德国思想家“拘泥細节”的結果，它使黑格尔甚至去为不重要的細节寻找深刻的解释。这最清楚地說明，車尔尼雪夫斯基对黑格尔的理解远不如別林斯基，因为別林斯基本能地感觉到黑格尔关于一切现实的东西的合理性的学說是社会科学唯一可能的基礎。

在《哲学偏見的批判》一文中，車尔尼雪夫斯基表現出是一个卓越的辯证論者。但就是在这里，他的辯证法也不是彻底唯物主义的。只是因为它不是彻底唯物主义的，只是因为車尔尼雪夫斯

① [我凭空建树起自己的事业，  
而整个世界都属于我]356

②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4卷，第332—333頁357。

③ 同上书，第1卷，第38頁359。

基认为，在这里有可能从某种不取决于时间和地点的条件的某种一般发展的观点去考察村社土地占有制问题，——所以他的这篇辉煌的论文曾被读者们理解为替俄国的村社土地占有制辩护，而其实我们这位作者在那时（1858年底）显然已经对它不再抱什么希望了。但是，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再谈吧。

## 第六章 认识论<sup>360</sup>

我们已经说过，各种实际问题使车尔尼雪夫斯基不能从事哲学研究。流放中，他已没有可能把自己的时间花费在所谓当前的问题上。在那里，他看来曾埋头于研究理论（只要在他的处境下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的阻碍没有妨害他研究理论<sup>361</sup>，只要小说还没有占用掉他的全部精力）。他附在他所翻译的韦伯著《世界通史》许多卷之后的概要表明，他在西伯利亚化了许多时间研究历史和所谓人类的史前生活。但是，我们还有一些材料直接说明，他也没有停止研究哲学，并且一直注意着现代学者中间的哲学观点的传播情况。这样的材料有：第一，1885年发表于《俄罗斯通报》第63、64期的《人类知识的性质》一文；第二，我们已经知道的他为预定出版、但却终于未能成功的《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一书第三版而写的序言<sup>362</sup>。

在上述的第一篇论文中，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开始就指出“批判的”观点的荒谬，因为根据这种观点，我们所知道的只是我们关于对象的表象，而不是对象本身，因此我们始终不知道我们关于对象的表象是否与这些对象相似。他证明，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否认人类机体的实在性。我们有某种关于手的表象；因此，应当认为存在着在我们身上引起这种表象的某物。但这种未知的某物是否



与我們关于它的表象相似呢？对这个問題却不可能給予确实的答复。也許是相似的，也許是不相似的。如果是相似的，那末以手的形式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某物就确实是手，而在这种情况下我們就真的有手。如果是不相似的，那末我們实际上手就是不存在的：“代替手的是我們有某种不知是什么东西的集合体，某种与手不相似的、我們所不知道的东西的集合体，但手是我們所沒有的；并且我們关于这种不知是什么东西的集合体所确实知道的只是：它們是两个。它們之所以确实是两个，是因为我們的两个表象之中的每一个表象（每一个表象都是关于特殊的手的特殊表象），都必然有特殊的根据；因此，对存在着两个某种东西的集合体这一点是不应当怀疑的。总之，我們是否有手，——这是一个尚未解決的問題；我們只知道，如果我們有手，那末我們确实是有两只手，而如果我們沒有手，那末代替手而在我們身上存在的某种东西的集合体的数目，也不会是任何别的数目，而只能是两个。”

273

車尔尼雪夫斯基把这种認識論叫做幻想主义，认为它在邏輯的发展中必然会导致否认人类机体的实在性。他把它叫做中世紀經院哲学的新形式，并且断言它讲的是过去經院哲学所讲过的那同一种无稽之談。他完全站在費尔巴哈的立場上，从邏輯方面解释了这种理論的起源，說它是用抽象的实体、“自我”代替了人，即代替了物质的有机体；而我們关于“自我”除了知道它具有构成我們思維内容的表象之外却一无所知。既然我們关于这个抽象的实体只知道它具有表象，那末很明显，我們就完全不知道它是否具有現实的机体及其所固有的现实的生命。但是，拥护这种認識論的人却不敢肯定地說：我們沒有机体。因此，他們只限于提出模棱两可的定义，这种定义只是透过經院哲学的迷雾透露出怀疑人类机体存在的邏輯可能性。而这一点就是这整个認識論的特征。我們

可以把它完全归结为玩弄经院哲学三段论法的诡计，归结为诡辩论，归结为用同一个术语来标示不同的概念。在車尔尼雪夫斯基的简短叙述中，幻想主义学说被描述成这样：

“在分析我们关于我们觉得似乎存在于我们思想之外的对象的表象时，我们发现，这些表象之中的每一个都是由关于空间、时间和物质的表象所组成的。在分析关于空间的表象时，我们发现，关于空间的概念是自相矛盾的。对关于时间和物质的表象所作的分析也同样向我们表明：它们也都是自相矛盾的。事实上任何自相矛盾的东西都不可能存在。因此任何类似我们关于外部对象的表象的东西都不可能存在。被我们当作外部世界的那种东西，只是我们思想的幻觉；在我们思想之外，任何类似这种幻影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而且也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觉得我们有一个机体，——现在看来，我们是错了。我们关于我们机体存在的表象只是幻觉，其实任何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是没有的，而且也是不可能有的。”

假如真是这样，假如这种认识论仅仅是关于同现实不相符的虚幻实体的精神生活的无稽之谈，那末就自然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许多自然科学家会恰恰倾向于这种理论呢？这是由于专门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对他们的影响。車尔尼雪夫斯基说道：“许多有教养的人一般都倾向于认为，某些问题的答案，只有为研究这些问题的那门科学中的大多数专家作为真理加以接受，就是最符合于科学真理的。自然科学家也像其他一切有教养的人一样，很难不受哲学专家中间居于统治地位的那些哲学体系的影响。”

大多数哲学专家都持有幻想主义。車尔尼雪夫斯基不想为了这一点而责备他们。每个特定时期内居于统治地位的那种哲学的性质，是由先进民族的思想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性质决定的。

換句話說：哲学专家也同样受到他們周围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在这里就可以自問一下，为什么現在先进民族的思想生活会变成这样，以致幻想主义的无稽之談竟会以哲学的形式在这些民族中日益流行起来呢？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自己的文章里沒有回答这个問題。但因为这个问题极有趣味，因为哪怕只要找到我們的作者对这个問題可能作的回答就会有助于确定他的世界观，所以我們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一文。

在这篇論文开头，車尔尼雪夫斯基分析了茹尔·西蒙关于目前政治理論是在社会斗争的影响下形成的这一思想。他說道，这一点毫不令人惊奇，因为不仅政治理論、甚至哲学体系也总是在社会关系的压倒一切的影响下形成的，并且每个哲学家都是为了在他当时的社会上占优势而进行斗争的某一个政党的代表。我們的作者认为沒有必要去指出那些主要研究政治哲学的思想家，因为即使不指出，他們属于各个政党这一点也是十分明显的。霍布斯是专制主义者，洛克是惠格党人，密尔頓是共和主义者，孟德斯鳩是英国式的自由主义者，等等。他轉而談到那些真正的所謂哲学家，断定他們也为同样的影响所支配。他說：“康德所属的政党想用革命的方法在德国树立自由，但又鄙弃恐怖手段。費希特稍微前进了一些，因为他連恐怖手段也不害怕了。謝林所代表的政党，是个被革命吓倒了的政党，它在中世紀的制度中寻找安宁，想在德国重建那个被拿破侖一世和以費希特为其喉舌的普魯士爱国者所破坏了的封建国家。黑格尔是个中庸的自由派，他所作的結論非常保守，但是他一向采取革命的原則来反对极端的反动派，同时希望用来作为他推翻衰朽旧时代的工具的那种革命精神得不到发展。我們并不只是說，这些人要像常人那样具有一些信仰，——这还不是很重要的事，然而他們的哲学体系却浸透着体系的創立者所

属的那些政党的精神。如果说，似乎过去往往和现在不相同，如果说似乎只是现在哲学家才在政治信仰的影响下开始创立自己的体系，这是非常天真的……”<sup>①</sup>。

姑且不论这里对个别哲学家所作的评述，我们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这里所说的话只能补充下面这一点：决定哲学思想方向的政治斗争本身，不是为了某些抽象的原则而进行的，而是在互相斗争的政党所属的那些社会阶层的需要和意向的直接影响下进行的。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也并不反对这一点。在后面叙述他的历史观点时，我们将证实，他善于——至少是有时善于——非常清楚地了解思想家的阶级地位对他们的思想进程的影响。而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就有权推测，他也把当前的哲学状况同专门的哲学研究者的阶级地位联系起来。换句话说，很可能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目前哲学“幻想主义”的广泛流行，同如今绝大多数哲学家作为思想家为之服务的那个社会阶级的衰落有着因果关系。假如真是这样，那末我们的作者对哲学思想取决于社会生活的理解，就比我们目前的那些“马克思的批判者”更清楚得多，因为那些“马克思的批判者”不能够理解，无产阶级思想体系无论如何也不能和那些从没落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中因袭得来的哲学学说融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的确，这些“批判者”自己就属于“幻想主义者”的行列。

<sup>①</sup>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6卷，第180页363。在我们后面将要谈到的《生存竞争有益论的来源》一文中，车尔尼雪夫斯基甚至把自然科学理论的发展同社会关系和社会趋向的发展联系起来。在十八世纪的最后几年和十九世纪的最初几十年内，大多数自然科学家都厌恶物种可变的学说，而“服从于力图恢复传说的那种时代精神”。当时种变说理论的主要反对者居维叶，“是拿破仑希望它在精神生活方面获得统治地位，而在复辟时代它也确实获得了对精神生活的这种统治地位的那一思想派别在自然科学界中的代表”（《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2部分，第23、21页）364。

从車尔尼雪夫斯基为《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一书第三版而写的序言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多么清楚地了解目前哲学思想的悲惨状况。在那篇序言里，他对目前大多数自然科学家都在重复“康德关于我們知識的主观性的形而上学理論”表示惋惜后，补充說道：

“当自然科学家不再說諸如此类的形而上学的胡言乱語的时候，他們就能够而且一定会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創立出比費尔巴哈提出的概念体系更加精确完备的概念体系。然而目前对有关所謂人的求知欲的基本問題的科學概念的叙述，仍然是費尔巴哈作得最好”<sup>①</sup>。

但是，到什么时候自然科学家才不再說形而上学的胡言乱語呢？显然，只有到社会关系发生变化的时候，因为在目前这种社会关系的影响下，“有教养的階級”是害怕唯物主义这种同它們的社会利益势不两立的哲学真理的。車尔尼雪夫斯基本人也意識到，这种情况还不会很快到来。因此他在“目前”宁願仍然拥护費尔巴哈的观点。他这样看是完全有他的道理的，因为同各式各样的馬赫派、阿芬那留斯派、克利福德派和柏格森派相比，費尔巴哈直到目前仍然是最深刻的和最現代的哲学理論、即最符合于目前自然科学状况的哲学理論的代表者。誠然，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极其富有成效地改造了費尔巴哈哲学。从这方面來說，費尔巴哈哲学的某些部分已經是哲学发展上“被超越的階段”了。但是，事情的这一方面显然是我們这位作者所不知道的。这当然不應該归咎于他，而应归咎于他下半生的生活条件。

可是，我們回到《人类知識的性质》这篇文章上来吧。車尔尼雪

<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2部分，第1篇，第196頁365。

夫斯基在这篇文章里问道：“但是，这种借助于经院哲学的虚幻的三段论法使我们关于自然界的知识变为幻影的体系，究竟是什么东西呢？难道幻想主义的信徒们真的认为它是一种认真的思想体系吗？”他对这个问题回答说，当然，在幻想主义者中间有一些怪人是认真地看待自己的所谓哲学体系的。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自己也并不拿它当真看待。他们对自己的哲学体系的态度大致可以用下面这些话来说明：“哲学真理就是哲学本身的真理，而不是任何其他真理。从日常生活的观点看来，它不是真理，而从科学观点看来也不是真理。也就是说，他们喜欢幻想。但他们知道他们是在幻想”<sup>①</sup>。

这些话说得再中肯不过了。“幻想主义”的真正的代表者事实上正是这样对待他们自己的哲学观点的。但是，拿这些观点当真看待的“怪人”在世界上比车尔尼雪夫斯基所想的要多得多。谁说我们的波格丹诺夫、瓦连廷诺夫、尤什凯维奇、别尔曼以及 tutti frutti<sup>②</sup>，不是当真地看待他们认为是我们时代最先进的哲学真理的那个东西呢？我们认为，他们是由衷地相信他们所说的一切的。在现在的俄国，而且不仅在俄国一个国家，他们的人数有多少啊！不，世界上的怪人甚至比车尔尼雪夫斯基所想的要多得多，而我们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夸大利害打算在人们行为中的作用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和“幻想主义者”分道扬镳的同时，表述了自己对人类知识性质的看法：“我们的知识，是人的知识。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正像他的一切能力是有限的一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知识的性质是受我们认识能力的性质所制约的。如果我们们的感官更敏锐些，我们的理性更强有力些，那末我们就会比现在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2部分，第4篇，第10页366。

② [各式各样的东西]

知道得更多，并且当然，如果我們的知識比現在更廣博些，那末我們目前的某些知識也就会发生改变。一般地說，随着知識的扩展，过去积累的某些知識也要改变。科学史說明，由于我們現在比过去知道得更多，过去知識中有許多知識都已經改变”①。

但是，虽然我們过去的許多知識都改变了，它們的本质却始終不变，因为它們本身是一种实际的知識。車尔尼雪夫斯基举出关于水的知識的扩展作为例子。

現在我們由于有了溫度表而知道，在什么溫度下水会沸騰，在什么溫度下水会凝結成冰。过去人們是不知道这一点的。关于水的知識扩大了。但是，它在哪一方面发生了变化呢？仅仅是在以下这方面，即它获得了它过去所沒有的那种准确性，因为过去人們只知道水在加热到某种程度时会沸騰，而在冷却时会凝結成冰。后来化学向我們說明，水是氧和氫的化合物，而过去人們却不知道这一点。然而水并不由于我們知道了它的化学成分而不再是水。人們在发现水的化学成分以前所有的关于水的全部知識，在有了这个发现以后也仍然是正确的。車尔尼雪夫斯基說：“它們的改变仅在于增加了水的成分的測定。”

278

我們是能够犯錯誤的生物。因此，我們每一个人——無論在生活瑣事中，或是在科学中——都应当对現象加以仔細的观察和思考，以免造成錯誤。慎重是必要的。但是，車尔尼雪夫斯基坚决主张慎重也应当有个限度。他說：“理性要对一切东西进行检查。但是，每一个有教养的人都有許多知識已經由他的理性检查过，并且根据检查的結果，只要他还是一个具有健全理智的人，就不能对这些知識表示絲毫的怀疑。”②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2部分，第4篇，第10—11頁367。

② 同上书，第15頁。

我們在結束对这篇文章的叙述时，要指出我們的作者在这篇文章里順便提出的下面这个意見：“經院哲学——这主要就是辯证法”<sup>①</sup>。这个意見很可以說明这位思想家的特点。我們已經說过，在他的哲学观点中辯证法因素是闡发得不够的。可以认为，車尔尼雪夫斯基违反他在《果戈里时期俄国文学概观》中关于辯证方法所說的話，把辯证法归結为單純的邏輯概念游戏。但是，如果說經院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即在概念分析的意义上——也就是辯证法，那末不应当忘記，这种辯证法乃是“神学的婢女”，而正因为如此，这种辯证法也就不能而且不願对它借以完成自己的邏輯运算的那些基本原理进行审判。它的依賴地位往往使它变成詭辯論；但是按其本质來說——正如早由黑格尔所正确地指出和車尔尼雪夫斯基本人在写《果戈里时期概观》时所正确地认为的那样——它同詭辯論毫无共同之点，因为它指出抽象的知性規定是有缺陷的，而任何詭辯論却都以这种抽象的知性規定的不可避免的片面性为依据<sup>②</sup>。我們馬上就会看到，車尔尼雪夫斯基对辯证法本质的这种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2部分，第4篇，第9頁。

② 參閱黑格尔的話：“Die Dialektik ist nun ferner nicht mit der blossen Sophistik zu verwechseln, deren Wesen gerade darin besteht, einseitige und abstrakte Bestimmungen in ihrer Isolierung für sich geltend zu machen, je nachdem solches das jedesmalige Interesse des Individuums und seiner besondern Lage mit sich bringt... Die Dialektik ist von solchem Thun wesentlich verschieden, denn diese geht gerade darauf aus, die Dinge an und für sich zu betrachten, wobei sich sodann die Endlichkeit der einseitigen Verstandesbestimmungen ergibt” (G. Hegel, «Enc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1-er Theil, Berlin 1843, S. 153)。(“又辯证法切不可与詭辯相混淆。詭辯的本质乃在于承认孤立的片面的抽象原則本身即是对的，只要这原則能够适合个人当时特殊情形下的利益……辯证法与这类强詞夺理的詭辯，完全不同。因为辯证法的出发点，是就事物本身的存在和过程加以客观的考察，借以揭示出片面的知性規定的有限性。”(黑格尔，《哲学全书》，第1部，柏林1843年版，第153頁)。) 368



缺乏深思熟虑的态度，怎样地对他本人的某些见解发生了不利的影响。

## 第七章 生存竞争的有益性

前面已经说过，卓尔尼雪夫斯基自流放归来后也顺便写过关于种变说问题的文章。他的文章的标题是《生存竞争有益论的来源（略论关于植物学、动物学和几门人类生活科学的几篇论著）》<sup>369</sup>，作者署名为“旧种变说者”。这篇文章与他所谓哲学本身，即“解决通常称作形而上学的最一般的科学问题的理论，例如解决精神和物质的关系、人类意志自由和灵魂不灭等问题的理论”<sup>①</sup>，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作者写这篇文章来批判达尔文的理论，我们可以让生物学专家来评判这种批判究竟取得多少成功。但在一篇讨论什么可以称作生物哲学的文章里，不能不遇到某些不单使生物学家很感兴趣的一般哲学概念。我们在卓尔尼雪夫斯基的上述文章里也可以找到这样的概念，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在这一章里对这篇文章作一考察。

卓尔尼雪夫斯基把达尔文的理论称为生存竞争有益论，并对它采取极其激烈的否定态度<sup>371</sup>。这篇文章一开始就表现出这种激烈否定的态度。卓尔尼雪夫斯基在那里断言，这种理论以“一种在逻辑方面非常出色的想法”、即有害的东西是有益的那种想法作为自己的根据。因为这种想法在卓尔尼雪夫斯基看来是完全荒谬的，所以从这种想法中得出的结论也是荒谬的。我们的作者说道：“生存竞争有益论与它所涉及的每一门科学的全部事实相矛盾，特别

280

① 《卓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6卷，第193页，附注370。

是与植物学和动物学的全部事实异常鲜明地相矛盾；可是这种理论还是为了植物学和动物学而发明出来的，并且还是从这两门科学开始而推广到有关人类生活的各种科学方面去的。

这种理论与人类一切合理的日常劳动的意义相矛盾，特别是与农业全部事实的意义异常鲜明地相矛盾；而农业却是从原始人因苦于饥饿及其他种种灾难而对其驯服的动物表示初步关怀以及他们为播种而用尖形木棒松土来作初步努力的时候就开始了的”<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根据达尔文的某些话而断定说，生存竞争理论是这位有名的英国自然科学家从馬尔薩斯那里剽窃来的，而馬尔薩斯则为了迎合英国社会上层阶级而写成了他的臭名昭彰的《人口论》一书。但是达尔文也不大理解馬尔薩斯。馬尔薩斯在自己的书中力求证明：人们的灾难是他们过度繁殖的后果。然而馬尔薩斯也从未想把由于过度繁殖而造成的灾难称作有益的现象。他认为这种现象是灾难，而且仅仅是灾难。达尔文则把馬尔薩斯的思想应用于生物学，他设想：由于生物相互间的生存竞争而在生物界发生的灾难，对生物来说乃是幸福的泉源，也就是改善它们的机体组织的那种进步的泉源。一般地说，达尔文抱有这样一种思想方法，按照这种思想方法，可以把灾难认作幸福，或者至少可以认作幸福的泉源。車尔尼雪夫斯基说道：“这种了解事物的方法叫做乐观主义方法。达尔文抱着这种思想方法并且不认为其他想法是可能的。因此他确信，馬尔薩斯关于灾难的想法和他的想法一样，即认为灾难或者是幸福，或者是幸福的泉源。馬尔薩斯所说的灾难——饥饿、疾病、因饥饿而发生的争夺食物的斗殴、为疗饥而

<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2部分，〔第4篇，第16页〕372。

犯的杀人罪、餓死，——其本身显然不是幸福；由于它們显然不是幸福，所以照达尔文的概念，應該把它們认作幸福的来源。因此，达尔文所得到的結論就是：馬尔薩斯所說的种种灾难，都应该产生种种良好結果，而这些灾难的根本原因，即繁殖过度，應該认作是生物历史上产生一切良好結果的根本原因，是改善生物机体組織的源泉，是那种使薔薇、菩提树、橡树一类植物，以及燕子、天鵝和鷹、獅子、象和猩猩一类动物由单細胞产生出来的力量。生存竞争有益論就是根据从馬尔薩斯那里剽窃来的思想的意义的中肯推測，在达尔文的幻想中形成的”<sup>①</sup>。达尔文犯了一个科学上的重大錯誤，他設想自然界象一个保留那些具有所需要的特点的动物，而消灭那些不具有这种特点的畜类的主人那样地行动。实际上，主人完全不象自然界那样行动：“例如他用斧背去打击他要消灭的那些乳牛的前額，但他决不会对他所要保留的那些乳牛前額給以同样的打击”。而我們在自然界看到什么呢？“自然选择的最普遍形式，就是过剩生物因缺乏食物而死亡；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是即将死亡的生物遭到飢餓嗎？不，它們全都会遭到飢餓。主人对待自己的畜群是这样的嗎？假使他遏止家畜繁殖时是使全部家畜受飢餓，这能改良他的畜群嗎？存留下来的家畜就会因而削弱、受到損害，畜群就会变坏”<sup>②</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把达尔文的生存竞争理論叫做只有屠克瑪达才吐得出口的理論，并且說，当粗野的、魯莽的、凶恶的小孩們折磨小鼠的时候，他們不会想到这种行为是于小鼠有益的，而达尔文却教导他們这样想：“請看：小鼠躲避这些小孩們；于是小鼠的运动速度和灵巧性增强了，肌肉发达了，呼吸能力增进了，整个机体得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2部分，第43頁373。

② 同上书，第35頁374。

到了改善。不错，凶恶的小孩子们，以及猫、鸱鸺和猫头鹰，都是小鼠的恩人。真是这样的吗？”<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說，事情完全不是这样：过度的奔跑会使小鼠的机体衰弱，正象小鼠力求逃避自己敌人的追踪而藏在閉塞的洞里，会使它們的机体衰弱一样。这种代代有增无已的机体的損害，就引起退化。退化是不容置疑的灾禍，所以自然选择也是灾禍，而决不是幸福。机体由于自然选择的作用而发生多大的变形，它們也就发生多大的退化。如果說这种选择在生物史上具有压倒一切的影响，那末机体就不可能得到任何增强，但机体毕竟得到了增强，所以很明显，必定有着与自然选择的作用相对抗并且胜过它的某种力量或某些力量的联合。达尔文以前的一些种变說者曾經发现了这些力量中的某几种。将来还会发现另一些力量。但是不管这方面已經完成的或将要完成的发现如何，車尔尼雪夫斯基对以下这一点是毫不怀疑的，即：增强生物結構的力量，只可能是这样的力量，它們促进“生物机体功能的正常运轉，如果这种生物有感觉能力时，它們还以自己的影响引起它的身心安乐、生活滿足和愉快的感觉”<sup>②</sup>。这就是我們这位作者的最后結論。在他看来，达尔文是杰出的，但只是作为“专题論文作者”，而不是作为种变說的理論家。在种变說理論家之中，車尔尼雪夫斯基看来是把拉馬克置于首位，他把拉馬克的著作《Philosophie zoologique》<sup>③</sup>称为天才的著作<sup>④</sup>。在車尔尼雪夫斯基对达尔文提出的指責中，有一种指責起了不小的作用，那就是指責达尔文不了解他以前的种变說者的学說，順便提一下，这也就是说他了解那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10 卷，第 2 部分，第 43—44 頁 375。

② 同上书，第 46 頁 376。

③ 《动物哲学》

④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10 卷，第 2 部分，第 22 頁 377。

位拉馬克的学說<sup>①</sup>。

在這兒我們首先不得不作一個事實的更正。達爾文在他關於物種起源一書導言前面的歷史備考中，非常贊賞地談到了拉馬克的著作。在那裏他還談到自己的其他前輩。我們手頭沒有該書第一版，所以不能查對一下這一版本中是否已經有上述那篇備考。很可能沒有那篇備考，而因為沒有那篇備考<sup>379</sup>，所以車爾尼雪夫斯基就指責達爾文忽視以前種變說者的著作。但是，在我們看來，第一版沒有這篇備考還不能證明，在這一版出版以前、即在1859年11月以前，達爾文就沒有讀過拉馬克和哪怕以前某些其他種變說者的著作。的確，達爾文在自己的備考中引證了“伊西多爾·喬弗洛埃·聖希黎的卓越的歷史著作”（«Histoire naturelle générale»）<sup>②</sup>，該書出版於1859年。但是他並沒有說，他只是從這本書中才開始知道拉馬克的思想，他只是說，他從這本書中借用了關於拉馬克第一部著作出版時間的資料。這當然不是一回事：我們可能清楚地知道某個作家的思想，而不知道他的第一部著作是在什麼時候出版的。我們姑且假定達爾文在寫自己的著作時完全不知道他的前輩們的著作。當然這不是什麼好事；但要說公道話，因為很遺憾，有許多作家都犯了這種過失。例如，車爾尼雪夫斯基所極其推崇的費爾巴哈本人就很不了解唯物主義史，也就是很不了解他與黑格爾的絕對唯心主義決裂後所改信的那種學說本身的历史；他在一部著作中嘲笑過“拉美特利的麥草肉餡餅”<sup>380</sup>，可是在那部著作中他的唯物主義觀點卻採取了最接近於法國唯物主義的形式。但車爾尼雪夫斯基未必會根據這一點而敢於責備自己親愛的老師輕率。他這樣也是對的，因為不管研究廣泛理論問題的人在

283

① 《車爾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2部分，第41頁378。

② 《自然通史》

知識方面具有这种缺陷，是多么值得惋惜，然而这种缺陷的存在毕竟还不会使人不可能对事情采取严肃的态度。费尔巴哈持有这种严肃的态度，达尔文也同样持有这种态度，但車尔尼雪夫斯基却对达尔文这样不公平。

車尔尼雪夫斯基关于自然选择在动植物物种发展史上的意义问题的說法，絕不是达尔文本人的說法。达尔文連想都沒有想过要問自己，是否应当承认不容置疑的自然史上的生物之間生存竞争的事实是一种“灾禍”。大概，他也同样沒有問过自己，是否应该承认这种竞争的后果是一种“幸福”。在他看来，問題在于自然选择究竟是促进还是妨碍动物去适应它們的生存条件。而对这样提出的問題只能給予肯定的回答：是的，自然选择必然会促进上述的那种适应。車尔尼雪夫斯基所举的小鼠的例子，是很沒有說服力的。当然，某种自然条件一般地說完全不利于某一物种的生存，这样的情况是完全有可能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在那时就开始发生車尔尼雪夫斯基称之为退化的那种情况，也許更确切地說，可以把那种情况称之为这一物种的消灭。达尔文决不否认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但是，当自然条件还没有不利到使整个物种消灭的程度，而同时却又为較不适应于这种条件的个体所不能忍受的时候，那就显然只有較能适应的个体才会留存下来。这种适应过程是否会是某一物种的改进过程，即属于这个物种的个体的机体复杂化过程呢？达尔文既不說“是”，也不說“否”，在他看来这儿一切取决于情况。寄生物适应于它們的特殊生存条件的过程，往往是机体“衰退”、即机体簡單化的过程。迄今为止地球上的生活条件一直有利于具有日益“完善”的机体組織的那些物种的出現。但是，这个不容置辯的情况并不改变达尔文理論的根本內容。即使生活条件——例如說，由于地球日益冷却——不利于复杂的有

机体,达尔文理論在本质上也仍然如前。那时,适应于环境的过程就会是生物机体組織简单化的过程。如此而已。在达尔文那里,“最能适应于环境的有机体”和“最复杂的有机体”这两个概念决不是一致的。

达尔文过于夸大了自然选择在物种发展中的作用,对这一点現在未必再能有所怀疑了。但是,我們的作者在反駁这位英国生物学家时,毕竟把这种作用設想得比达尔文本人所設想的还要简单得多。車尔尼雪夫斯基說,自然选择的最通常的形式就是过剩的生物因缺乏食物而死亡。但是达尔文沒有这样想过。他說:“每一种生物所能繁殖的极端限度,当然依照食物的数量而定;但一种生物的平均数往往不是由获取食料的困难性决定的,而是它成为其他动物猎获物的輕易性决定的”<sup>①</sup>。假如車尔尼雪夫斯基注意到达尔文的这些話,他大概就会把自然选择的意义看成另一个样子了。真的,我們可以設想,在遭到猛兽經常攻击的某一物种的个体中間,开始出現按其色泽來說較不易于被敌人发觉的个体。这些个体将有更多的机会逃避猛兽的利爪。它們将生存下来,而那些色泽較触目的个体則将死亡。遗传性会把有利的特征遗传給那些保存下来的个体的后裔,这样,終于有一个时候某一物种的全部个体都获得了有利于保存自身的色泽。这种情况与車尔尼雪夫斯基所举的小鼠的例子并不相似:在这里,选择并不“用斧背去打击”某一物种的全部个体的头,而类似我們所指出的这种情况在达尔文的理論中占有极其广泛的地位。我們再举一个例子。华萊士說,在馬得拉島上有許多昆虫已經完全或几乎完全丧失了翅膀,但是居住在欧洲大陆的同一种昆虫迄今都有十分发达的翅膀。华萊士

285

<sup>①</sup> «L'origine des espèces». Trad. par E. Barbier, p. 74. (《物种起源》, 巴尔比譯, 第 74 頁。)

这样解释这个现象：馬得拉島象温带的許多海島一样，經常受到突然的台风的侵襲，因此，有翅膀的并当然用翅膀飞翔的那些昆虫便有被刮入大海的危險。华萊士說道：“因此，一年年下来，翅膀短的、或較少用翅膀飞翔的那些个体就保存下来，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沒有翅膀或只有不完善的翅膀的物种”<sup>①</sup>。在这里自然选择也不是“用斧背去打击”某一物种的全部个体的头，而且在这里自然选择也是促进这些个体适应于它們的自然生存条件。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許許多多。假如車尔尼雪夫斯基注意这些事例的話，他就未必会下决心坚持他的这一想法，即认为达尔文的生存竞争理論“与植物学和动物学的全部事实……相矛盾，可是这种理論还是为了植物学和动物学而发明出来的，并且还是从这两門科学开始而推广到有关人类生活的各种科学方面去的”<sup>②</sup>。

“把生存竞争理論推广到有关人类生活的各种科学方面去”，对这些科学毫无益处，这是完全正确的。可以认为，車尔尼雪夫斯基所以对达尔文抱着明显的反感（順便說一下，这种反感表现在他认为达尔文理論只有屠克瑪达才吐得出口），主要是由于所謂达尔文主义对社会发展的有害影响<sup>382</sup>。但是，决不能要达尔文为达尔文主义者的失敗負責。他的生存竞争理論，决不能被用来作为論证某些达尔文主义社会学家所鼓吹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理由。达尔文发现，社会本能的发展“极其有利于”某一物种在生存竞争中保存自己。如果你们把他的这个思想应用于社会关系，那末就会得出与极端个人主义直接相反的結論，而极端个人

① «Le Darwinisme», par Alfred Russel Wallace, Paris 1891, p. 138—139. (《达尔文主义》，阿弗里德·罗素·华萊士著，巴黎 1891 年版，第 138—139 頁。) (見英文原著第 3 版，1923 年伦敦版，第 105 頁。——譯者)

② 參閱《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 585 頁。——譯者



主义則是从达尔文主义社会学家的学說中得出的必然的邏輯結論。当然，达尔文本人对社会問題的認識很不清楚。恩格斯早在同杜林进行論战时就已指出<sup>①</sup>，这是由于达尔文不加任何批判就接受了馬尔薩斯的人口学說。但是他的大智大慧防止他陷于他的許多学生所陷入的那种极端性。的确，也許可以把达尔文当作一个普通的曼彻斯特学派分子，因为他在談論人类社会生活时說道：“对人來說應該存在公开的竞争，無論法律和习俗都不應該妨碍最有才干的人在生活中取得完全的成功和留下最大数量的后裔”<sup>②</sup>。显然，他也真的傾向于曼彻斯特学派<sup>385</sup>，大概他把这个学派当作最先进的社会理論。这是一个謬誤；但这种謬誤一点也不能推翻达尔文在研究有机生命現象时所使用的方法。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社会战争的拥护者引证他关于竞争所說的話也是徒劳的。有各色各样的竞争。圣西門主义者也贊成竞争，但正是为了竞争，他們才要求对财产关系进行根本的改造。

我們认为沒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分析車尔尼雪夫斯基对达尔文理論的看法。在我們已經談过这种看法以后，我們只要請讀者注意車尔尼雪夫斯基对达尔文的乐观主义的諷刺态度就够了。他硬說达尔文深信一切灾禍都必定会导致幸福。他把自己的这一思想，即“有害的东西总是有害的，永远不会是有益的”，同这种乐观主义对立起来。我們在考察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历史观点时还会遇到这种思想。那时我們將更詳細地討論这种思想，并力求順便解决这样的問題：这种思想在何等程度上可以同黑格尔的下面这个原理——我們在前面看到，車尔尼雪夫斯基非常贊同这个原理——

① 《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所实行的改革》），第5版，第60頁383。

② 《达尔文逸事》，第2卷，謝切諾夫譯，圣彼得堡1899年版，第420頁384。

相适应，即：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一切都以时间和地点的条件为轉移。在这里我們姑且說，車尔尼雪夫斯基并不总是按照“有害的东西总是有害的；只有有益的东西才是有益的”这一公式发表議論的。在薇拉·巴夫洛夫娜的第二个梦中，他通过她的母亲瑪莉亚·阿列克塞芙娜說：“听我說，薇尔卡。你是有学問的人，但你是靠我偷来的錢求得学問的。你想着‘善’，可是我要不恶毒，你連什么叫‘善’也不知道呢。懂吧？”<sup>①</sup>从这些話可以得出結論說，恶事有时也会产生良好的后果。要知道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这个場合下是完全贊同瑪莉亚·阿列克塞芙娜的。瑪莉亚·阿列克塞芙娜在繼續向自己的女儿解释时重复說：“你知道，她（瑪莉亚·阿列克塞芙娜在这里談到自己是以第三人称的。——格·普·）的存心固然坏，結果却于人有利。你不是受过益么？还有一种恶人可不同了”<sup>②</sup>。在这里，車尔尼雪夫斯基本人又一次借瑪莉亚·阿列克塞芙娜的嘴說話。如果他所說的話是正确的——而他的话实际上也是正确的——在这里就可以看出，恶事并不总是得到恶果。而这是与車尔尼雪夫斯基为之批判达尔文的那个抽象原理相矛盾的。但是，我們认为有必要再說一遍，达尔文本人从来也沒有把自然选择的問題轉移到考虑善恶的基础上去。当然，这并不是达尔文的錯誤。

但是，不管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这个别的場合有某些失策，也不管他的方法具有某些一般性的缺陷，他終究是出現在我国文学界的最卓越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哲学观点的軟弱方面，就是其中的辩证法因素不够完善，这也是他的老师費尔巴哈的体系的軟弱方面。車尔尼雪夫斯基沒有机会認識从費尔巴哈哲学中成长起来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9卷，第113頁386。

② 同上书，第114頁。

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无疑比費尔巴哈体系前进了一大步,所以可以說,哲学思想的最新成就可惜始終是我們这位作者所不知道的。但在当时,西方也只有很少人知道这种最新成就。假如不是把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相比較的話,假如只把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同例如拉甫罗夫和其他比較进步的同时代人的观点相比較的話,那就必須承认,他远远地胜过他們,并且当他退出舞台的时候,我国文坛就在哲学方面——而且可惜不仅是在哲学方面——开始了衰落时期。这种衰落的表现之一,就是后来声名狼藉的尼古拉·米海洛夫斯基的主观主义,但至今仍有許多人认真地把他与車尔尼雪夫斯基相提并論。实际上,特别是在哲学方面,米海洛夫斯基与《人本主义原理》一文作者相比之下只是一个真正的侏儒而已。

288

我們这里都知道車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政論家,有几分是一个文学史家,即他是《果戈里时期概观》和論萊辛的論文的作者,但人們完全不知道他是一个哲学家。首先,这是由于他关于哲学写得很少,其次,是由于他叙述自己思想的那种方式。他写得这样簡單明了,以至他的某些讀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幼稚地拒不承认他在《人本主义原理》一文中所叙述的是哲学。这不是推測,而是事实,虽然也是可笑的事实,因为当时确实有这样的讀者。下面就有一个证据。当1861年的《同时代人》杂志第4期发表了安东諾維奇所写的对拉甫罗夫的哲学的評論<sup>387</sup>时,《祖国紀事》杂志輕蔑地指出:“要理解安东諾維奇先生所說的一切,一点也不需要动脑筋。这篇文章的明白易解使所有人都感到惊讶。”車尔尼雪夫斯基摘引了同他进行論战的这家杂志的这个評論,他从自己这方面写道:“你們听够了哲学是伤脑筋的东西这一套。你們試去閱讀类似拉甫罗夫先生的著作那样的哲学論文,你們簡直一点也不懂。而

按照你们的意见，拉甫罗夫先生却是一位很好的哲学家。这就在你们头脑中形成了这样一种三段论法：‘我不懂哲学，因此，凡是我不懂的就不是哲学’”<sup>①</sup>。由于这种三段论法，甚至車尔尼雪夫斯基所写的与哲学直接有关的那些篇章，也不被人认为是哲学，因为这些篇章叙述得过于明白易解了。用不着补充，直到今天，根据車尔尼雪夫斯基所指出的三段论法来评判哲学文章的“明达的读者”<sup>389</sup>，在我们这里也仍然没有灭绝。这使我们想起一个人的笑话，他患牙痛，首都的医生轻而易举地、迅速地拔掉了他的病牙。“我该付多少钱？——病人问道。——一个卢布，——牙医生这样回答。——要一个卢布！——病人大声叫道。——我们县里的牙医生在手术室里替我拔牙整整拔了一小时，他也只收二十五戈比，而您在一刹那之间就拔掉了，倒要收一个卢布！”車尔尼雪夫斯基徒劳无益地劝说幼稚的读者相信：“一个思想方式含糊不清的人（这里指的是拉甫罗夫。——格·普·），不管他谈论什么题目，他的语言总是含糊不清的、叫人伤脑筋的。而哲学本身也许倒不是天晓得怎样难懂的科学”<sup>②</sup>。幼稚的读者过去不相信这一点，而且直到如今还不相信。直到今天，如果你问一位普通的俄国“知识分子”，拉甫罗夫和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是不是哲学家，你就会立刻听到他们回答：当然是的。而如果你跟这样的“知识分子”说，車尔尼雪夫斯基也是一位哲学家，而且要比拉甫罗夫和索洛维约夫深刻得多，那你就使他大为惊讶。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还不够含糊……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8卷，第266—267页388。

② 同上书，第267页390。

---

## 第二篇

### 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历史观点

#### 第一章 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

在考察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历史观点时，先弄清楚他对当代的历史科学状况的看法，将是有益的。从他論格蘭諾夫斯基的文章的下面这段話里，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一点：

“我們越是深入地研究以往的历史著作，也就越相信，我們目前只有关于这門科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观念，而且只刚刚看到实现这个观念的最初的片面的尝试。我們不去考察实践在这方面如此落后于理論的原因，因为这会使我們离題太远；我們只是要說，一方面，困难在于迄今一直被人忽視的生活因素的历史材料的贫乏和零乱，另一方面，大概更其重要的障碍应当认为是对人类生活通常采取狹隘和抽象的观点。人本学只刚刚开始确立起对抽象的道德和片面的心理学的統治”<sup>①</sup>。

要注意，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这里也力求采取“人本学”的观点。我們已經知道，宣布“人本主义”原理的費尔巴哈—車尔尼雪夫斯基哲学所看到的人，与自然科学所看到的一样。車尔尼雪夫斯基想使历史学也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去观察人。他說，“在人类生活的自然方面在生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并且应当在历史上获得

---

<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2卷，第410頁391。

291 极其重要的意义的情况下，显然自然科学对历史学的影响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无比地巨大。目前预感到这一点的历史学家还不很多。格兰诺夫斯基是其中的一个。”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了说明自己对历史现象的研究方法的观点，指出了基佐，用他的话说，基佐高过我们时代的其他历史学家。基佐关于文明史的讲演<sup>392</sup>的缺陷，在于它们的对象除政治史以外，只有人民的智力生活，而且还不是全部。至于生活的物质方面，讲演纲要甚至完全没有提到。基佐想阐述人的内心生活和他对其他人的关系的历史。他忘记了人对自然界的联系。车尔尼雪夫斯基说道：“但是，人类生活的泉源就在自然界之中，而且全部生活根本取决于对自然界的联系”<sup>①</sup>。

在这里，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基佐的批评似乎<sup>393</sup>是不正确的。他所指的基佐关于文明史的讲演，实际上对各民族生活的物质方面注意得太少了；但是，如果车尔尼雪夫斯基看一下同一位历史学家的其他著作，譬如，哪怕看一下他的《Essai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sup>②</sup>，那末他就会看到，基佐完全没有忽视各民族生活的物质方面，相反地，他认为这方面起着压倒一切的影响。基佐说道：“要理解政治制度，就应当研究社会中存在的不同阶层和它们的相互关系。要理解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就应当了解土地关系的本质”<sup>③</sup>。

研究土地关系的本质并不意味着忽视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但是，在这里必须要作一个术语方面的附带说明。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的物质方面”一语在这里所指的意义，并不是我们谈到基佐的历史观点时所用的那种意义。某个国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2卷，第410页附注。

② 《法国史论文集》

③ 《Essais》，2-e édition, Paris 1860, pp. 75—76。《法国史论文集》，巴黎1860年第2版，第75—76页。关于这一点，详见我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书第二章394。

家中存在的土地制度并不是說明人們对自然界的關係，而是說明他們自己在社會中的相互關係。卓尔尼雪夫斯基却把生活的物質方面理解為存在於人和自然界之間的關係。這是很大的、極其重要的區別。但我們立刻就會看到，我們這位作者關於這個題目的進一步推論，却差不多完全取消了這種區別。 292

為什麼卓尔尼雪夫斯基會認為人和自然界之間的關係問題是這樣重要呢？他從格蘭諾夫斯基 1852 年 1 月 12 日在莫斯科大学紀念大會上所作的講演《論通史的目前狀況和意義》中，引用了很長的一段話來說明這一點。這段引文對於說明我們在這裡感興趣的卓尔尼雪夫斯基的觀點極為重要，所以我們至少要轉引它的一部分。

格蘭諾夫斯基說道：“我們所提到的地理概況，很少同進一步的闡述有機地結合起來。歷史學家在自己的著作前面加上一段關於他所敘述的國家及其產品的粗略的概述作為開場白以後，就問心無愧地轉到他更熟悉的其他主題上去，並認為他已經完全滿足了現代科學要求。仿佛自然界對人不是經常起作用的？仿佛這種作用不是隨着人在形成的道路上每前進一大步而發生變化的？我們還遠沒有弄清楚把人民繫在土地上的一切隱秘的線索，人民在土地上成長，他們不僅從土地取得物質生活資料，而且還從土地取得自己的相當一部分道德品質。地球表面上的自然產品分布，與市民社會的命運有着極其密切的聯繫。單是植物，有時就決定人民的整個生活。如果馬鈴薯不是愛爾蘭居民的主要食物，愛爾蘭的歷史就無疑會是另一個樣子了。某些動物對於其他國家，也同樣可以這麼說”<sup>①</sup>。

<sup>①</sup> 這段話引自《格蘭諾夫斯基全集》，1866 年版，第 1 卷，第 34 頁。

往后格兰诺夫斯基还引证了貝尔院士关于外部自然界对个别民族社会关系和人类历史影响的那篇论文中的一段很重要的話<sup>395</sup>。这篇论文的标题本身就说明，貝尔主要想从自然条件对社会关系的影响这方面去考察人和自然界之间的联系。格兰诺夫斯基指出，某些国家的全部历史取决于它们的植物区系或动物区系，那时他本人所指的也完全是这种影响。誠然，他还谈到“把人民系在土地上的”、甚至决定人民的道德倾向的某些隐秘的线索。

293 在这里可以认为，格兰诺夫斯基承认自然界对人們在社会中的相互关系的直接影响。尤其是，在前面有一頁上他并不否认“不能建立最高尚的国民生活方式的許多种族在历史上的軟弱”<sup>①</sup>是自然科学的結論。但是，正如我們将在下面所看到的那样，車尔尼雪夫斯基曾經是种族理論的最坚决的反对者，所以当他写这篇論格兰诺夫斯基的文章的时候，即在1856年，也未必会哪怕部分地同意这种理論<sup>②</sup>。莫如說，他所以喜欢格兰诺夫斯基的演讲，完全不是由于他准备承认某些人种在历史上軟弱无能，而是由于他一直坚决指出各民族的社会关系依赖于他們的自然生存条件。假如是这样的話，那末車尔尼雪夫斯基关于自然界对人的影响的思想，就十分接近于我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自然条件对人們起着影响，决定他們在社会中的相互关系。还在格兰诺夫斯基在莫斯科大学发表他关于通史的状况和意义的讲演之前好几年，馬克思就已精采地表述了这种看法。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資本》这本小册子里写道：“人們在生产产品中所发生的各种各样关系，不限于他們

① 《格兰诺夫斯基全集》，1866年版，第1卷，第33頁。

② 还在一年之前，他在关于卡拉切夫的《历史学法学資料档案》的书評中，就指出“各式各样的396条頓狂、法国狂、英国狂、捷克狂、保加利亚狂”的虛伪性（《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卷，第428頁）<sup>397</sup>。正如常言所說，这离一般地对一切种族理論采取否定态度是很近很近的。



对自然界的關係。生产只有在生产者的某种协同动作和共同活动时才可能。为了进行生产，人們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并通过这些联系关系的媒介，才会发生人們对生产所必需的自然界的作用”<sup>①</sup>。人們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决定于他們的生产力状况，而生产力又极其密切地依赖于該一民族的自然生存条件，即依赖于該一民族在其中生活的地理环境。这就是科学在研究关于自然界对“社会人”的影响問題时所得到的結論。这个結論对格蘭諾夫斯基來說大概不十分清楚。无可爭辯<sup>399</sup>，当車尔尼雪夫斯基开始把“人本主义”原理应用于历史时，他对这个結論也是相当模糊的。但是，无论如何，格蘭諾夫斯基和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的邏輯发展，必然只会导向馬克思的上述結論。而基佐从自己这方面來說也接近于这个結論 294（虽然还远沒有充分地作出这个結論），所以車尔尼雪夫斯基責备他忽視生活的物质方面，是不正确的。但是，对我们來說，这里重要的并不是車尔尼雪夫斯基对基佐的看法是否正确，而是他对基佐的公正的看法或不公正的看法可以說明他自己的历史观点的性质。因此我們还要回过来对这种看法作一考察。現在我們还要再一次強調指出下面这一点，即我們的作者还在刚刚开始进行文学活动时，就为了自己的“人本主义”原理而要求历史学家注意各民族“生活的物质方面”。关于他的历史观点以后的发展的全部問題，都可以归結为他本人关于这个物质方面的概念采取了什么形式的問題。

---

<sup>①</sup> 参閱《雇佣劳动与資本》，“无产階級”出版社，第20頁398。

## 第二章 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历史 观点中的唯物主义

1855年，車尔尼雪夫斯基在关于当时聞名一时的列昂节夫的《文选》第三卷和第四卷的一篇很长的批評文章里，反駁了认为农业生活是人类原始生活的庫托尔迦的意見，他写道：

“一切民族的传说都证明，在他們懂得农业和定居以前，他們是飄泊不定，靠狩猎和畜牧为生的。就拿希腊的传说和属于阿提喀一地的传说来说，我們可以指出关于賽丽斯神和被教会耕作的特里普托列姆的神話<sup>①</sup>——显然，根据希腊民族的回忆，起初是以狩猎为生的野蛮人的貧困而粗野的状态，人們只是到后来才知道定居的农业生活的幸福。格列姆的研究著作完全证实一切民族共同的这些传说对印欧各部落的整个欧洲分支来说都是正确的，这些著作的主要結論是被人們公正地认为絕對可靠的。在历史性的石碑上記載的那些肯定的事实，也直接证明了同样的情况；我們还不知道有哪个民族在已經达到农业阶段以后，还倒退到不知道农业的野蛮状态；相反，在許多欧洲民族那里，确实可信的历史几乎从开始就記載了整个农业生活的扩展过程”<sup>②</sup>。到非洲去的欧洲旅行家曾不止一次地遇見这样一些黑种人部落，它們被逐出自己原来的居住地并进入了不大有利于农业的新的地理环境以后，就放弃了农业生活，而变成了牧民或猎人。因此，車尔尼雪夫斯基

① 賽丽斯(Ceres)是希腊神話中的农业之神，特里普托列姆(Triptolemus)也是希腊神話中的半神半人的人物。据传说賽丽斯把农业耕作的全部秘密都教給了特里普托列姆，并給了他一輛馬車到各地去旅行，教民耕作、播种和收获等等。——譯者

②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卷，第389頁400。

认为无论哪个民族一旦达到了农业阶段以后就不可能倒退到低级阶段,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但是,当他说不可能认为农业是生产力发展史上的第一步时,他是完全正确的。当他宣称社会经济发展是引起社会法权制度发展的原因时,他同样也是正确的。他说:“在不断地从一处迁移到另一处的游牧民族那里,个人的土地所有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使人受拘束的,因而是不需要的。在它们那里,只有公社(部落、氏族、汗国、村落、天幕)才保持着自己地区的境界,而这地区是归它的全体成员共同使用的,个人并没有各自的财产。在农业生活中情况完全不同,农业生活使个人的土地所有制成为必要。因此,土地与部落法权、而后来与国家法权的联系始于游牧状态”<sup>①</sup>。这里再正确不过地指出了各民族生活的物质方面对这种生活的其他方面的决定性影响。但是,也许可以指出,在这里車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其实只是“经济”和“政治”之间的联系。这当然是这样的。然而,阐明了这种联系,也就理解了所谓社会制度的主要特征。而当我们把社会制度理解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时,也就能容易地理解“经济”对人们的思想和感情的影响;要知道早从19世纪初期起,人们就承认他们的思想和感情同社会环境、即社会关系有着因果依赖关系。我们已经看到,車尔尼雪夫斯基善于用政治斗争的进程,也就是说,还是用社会环境的发展来解释哲学思想的发展。我们也已经从《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一文知道,任何一个社会,正像社会的任何一个有机部分一样,认为对这个社会或社会的这一部分有益的东西,是有益的和正义的。車尔尼雪夫斯基只要把自己的这种观点彻底地应用于人类的思想发展史,他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发展是怎样由社会中人们的利益冲突、即是由这个社会的“经济”所制约的。实际上車尔尼雪夫斯基

296

<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卷,第389页。参阅同书第428页401。

也已經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至少是在某些場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例如他在刊載于 1861 年《同时代人》杂志第四期的关于罗雪尔的《国民經济原理》的长篇书评里这样写道：

“請您随便举一个人类集团來說，它的思想方式总是受到关于它的利益的概念（正如我們指出过的，無論正确的概念还是錯誤的概念，反正都是一样）的启示。讓我們从人們按民族的分类开始吧。大多数法国人认为：英国是由于憎恨法国的幸福而毀灭拿破侖第一的‘狡猾的阿尔比温’<sup>①</sup>。大多数法国人觉得：莱茵河边界是法国的天然的和必要的边界。他們也认为，薩瓦和尼斯的合并是件好事情。大多数英国人认为：拿破侖第一想毀灭毫无过错的英国，英国只是为了自卫才与拿破侖打仗。大多数德国人认为：法国人对莱茵河边界的貪求是不公正的。大多数意大利人觉得：把薩瓦从意大利那里夺走，而并入尼斯，是一件非正义的事情。为什么会有这种观点上的分歧呢？这只不过是出于民族利益（当然，都是些虛假的、但被那个民族认为是真实的利益）对立的緣故。或者，讓我們按經济状况把人們分一下类。每一个国家的粮食生产者都认为：如果其他国家容許这个国家的粮食不納关税而輸入，那是公正的事情，如果禁止粮食輸入他們本国，那也是同样公正的事情。每一个国家的工业品生产者都认为：如果容許外国粮食不納关税而輸入他們本国，那是公正的。这种矛盾的根源依然是同一回事：利益。粮价較高对粮食生产者有利。粮价低廉对工业品生产者有利。用不着多举这样的例子了，——每个人自己能够收集几千几万个例子”<sup>②</sup>。

① 阿尔比温为不列颠群島的古称：“狡猾的阿尔比温”（Коварный Альбион）一詞在革命前的俄国常用来称呼英国。——譯者

②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8 卷，第 137 頁 402。

如果說每个人对他所代表的人們集团实际上有利的一切，总认为是好的、无可怀疑的和永恒的，那末，根据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意見，政治經濟学方面的学派的更替也必須用这种“心理学定律”来解释。造成中等階級的統治的那些經濟生活方式，在亚当·斯密学派的作家看来是非常美好的和应当永久居于統治地位的。“这一学派的作家乃是經紀人等級或广义的商人等級——銀行家、批发商、工厂主和一般的工业家——的意图的代表者。对商人等級而言，如今的經濟組織形式是有利的，比其他形式更为有利，因此代表这个等級的学派就认为这些形式本身从理論上說是最好的；在这种流派占統治地位的情形下，自然而然地出現許多作家，更鮮明地表达共同思想，把这些形式称为永恒的、絕對的形式”<sup>①</sup>。

297

当充当群众代表的人开始考虑政治經濟学問題的时候，在科学中就出現了另一个經濟学派，人們把它称为——正如車尔尼雪夫斯基指出，不知道是根据什么——空想主义者学派。随着这个学派的出現，代表中等階級利益的經濟学家就看到自己是处于保守主义者的地位。当他們起来反对违背中等階級<sup>②</sup>利益的中世紀制度时，他們曾向理性呼吁。而現在群众代表也同样向理性呼吁，他們不是沒有根据地責备中等階級代表們的不彻底性的。車尔尼雪夫斯基說道：“对亚当·斯密学派說来，理性是反对中世紀制度的絕妙武器，但这个武器并不宜于对付新的敌人，因为它落到了他們的手中，并且打垮了斯密学派的信徒們，虽然它以前对这批信徒們曾是那样有利”<sup>③</sup>。由于这个緣故，中等階級的有学問的代表們就不再援引理性，而开始援引历史了。这样就产生了政治經濟学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8卷，第138頁403。

② 指的是社会階級，但車尔尼雪夫斯基总是使用“等級”这个术语。

③ 同上书，第139頁404。

中的历史学派，威廉·罗雪尔就是这个学派的创始人之一。

車尔尼雪夫斯基断定說，这样解释經濟科学史，比通常根据这个或那个学派的知識的多少去解释經濟科学史要正确得多。他嘲笑地指出，后一种解释方法就像在考試时用来評判小学生的方式一样，說某个小学生对这門科学学得好，对这門科学学得不好。車尔尼雪夫斯基問道：“如果历史知識不足，难道会使政治經濟学者一点不知道从前有过另外一些与如今不同的經濟生活形式嗎？这样一来，难道这些人就不可能再有最完善的新形式的要求嗎？就不可能承认如今的形式并非绝对形式嗎？”<sup>①</sup> 問題不在于資料，而在于这个思想家或他所代表的那些人的集团的感情如何。傅立叶的历史知識并不比薩伊多，但却得出了与薩伊完全不同的結論。車尔尼雪夫斯基作出結論說：“不，如果某人滿意于现实，他就沒有变革的想法；如果某人对现实不滿，那就不管他具有历史知識，或者甚至毫无历史知識，他总是具有变革的想法”<sup>②</sup>。

話不能說得再清楚了。不是意識決定存在，而是存在決定意識。車尔尼雪夫斯基把这个构成費尔巴哈哲学基础的原理，应用于解释經濟科学史、政治学說史、甚至哲学史。車尔尼雪夫斯基看到，在社会存在中有一些互相对立的因素；他还看到，这些互相对立的社会因素的斗争怎样引起和决定理論观念的相互斗争。但还不止这一点。他不仅看到，任何一种科学的发展是由相应的社会現象的范疇的发展所决定。他还理解到，相互的階級斗争一定会在社会的全部內在历史上打下自己深刻的烙印。下面有一个关于这一点的有趣的证明。

他在《政治經濟学綱要》中說明了存在于現代先进国家中的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8卷，第138頁405。

② 同上 406。

“三方面分配生产品”的規律后，从自己的說明中作出了簡短的結論，他发表了以下这个对現代欧洲史的內部动力的极其卓越的見解：“我們看到，地租的利益是同利潤以及工資的利益相对立的。在反对分得地租的等級时，中等階級和普通人民永远是同盟者。我們看到，利潤的利益是同工資的利益相对立的。只要資本家等級和劳动者（等級）結成的联盟，对获得地租的階級占得了上风，中层等級与人民的斗争就成为国家历史的主要内容”<sup>①</sup>。

在这儿，我們这位作者的观点和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异常一致。这也沒有什么奇怪。車尔尼雪夫斯基具有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具有的同样的閱历；他是从黑格尔过渡到費尔巴哈的。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对費尔巴哈哲学进行了根本的改造，而車尔尼雪夫斯基則毕生是这种哲学的信徒，而且接受这种哲学在費尔巴哈本人那里所具有的形式。費尔巴哈有一句名言（当时曾引起許多叫嚣和不满）：Der Mensch ist, was er isst（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sup>②</sup>。前面我們引证过費尔巴哈关于人們的生活方式对他們的思想方式的影响的其他某些原理。所有这一切都完全是唯物主义的原理。但是，这些原理在費尔巴哈那里，甚至在他关于宗教的学說中，始終完全沒有得到发展。車尔尼雪夫斯基把費尔巴哈的观点应用于美学，在这方面，我們往后会看到，他得到了在某种意义上說是极为卓越的成果。但是，他在这里的結論也不是完全令人滿意的，因为关于人类的美学发展的完全正确的概念，要求首先制定一个总的历史观。至于說到这种总的历史观，那末車尔尼雪夫斯基只是朝着制定这种历史观的方向走了几步，誠然，这是很正确的几步。

299

① 着重点是我們加的。《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7卷，第415頁407。

② 見費尔巴哈著《自然科学与革命》一文，《費尔巴哈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2頁。——譯者

我們剛才從他的作品中摘錄的大段引語就可以作為這方面的例證。這些引語清楚地說明，車爾尼雪夫斯基善於對他的老師的唯物主義思想加上光輝的附錄。但是，他的老師的唯物主義思想在涉及人們社會關係的地方具有抽象性的缺點。而費爾巴哈思想的這個軟弱方面，就使他的俄國門生的歷史觀點顯得不夠嚴整和徹底。這種歷史觀點的主要缺陷在於，在這些歷史觀點中唯物主義幾乎在每一步上都讓位給唯心主義，並且唯心主義反而還是取得了最後勝利。

我們清楚地知道，在車爾尼雪夫斯基忠實於自己的唯物主義哲學的那些場合，他是怎樣解釋歷史的。現在讓我們來看一下，當他轉到唯心主義觀點的時候，他是怎樣解釋歷史的。

### 第三章 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歷史 觀點中的唯心主義

我們在他對波特金的名著《關於西班牙的通信》（《同時代人》，1857年第2期）的評論文章中，可以讀到下面這些話：

“民族分裂為敵對的等級，常常是改善他們的前途的最大的障礙之一。在西班牙沒有這種有害的分裂，等級之間沒有不可調和的敵對，沒有一個等級僅僅為了損害另一個等級就不惜犧牲一切最寶貴的历史遺產；——在西班牙，整個民族都覺得自己是一個整體。這個特點在西歐各民族中是極不平凡的，值得特別重視；這個特點，就其本身來講，可以認為是這個國家的幸福前途的保證”<sup>①</sup>。

這不是筆誤，因為車爾尼雪夫斯基在這篇文章中過了幾頁又

---

<sup>①</sup> 《車爾尼雪夫斯基全集》，第3卷，第38頁408。



說道：“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西班牙人比大部分文明民族有着无可爭辯的优越性：西班牙各等級既沒有因根深蒂固的仇恨，也沒有因利益的根本对立而分裂；它們不象我們在其他許多西歐国家中所看到的那樣构成互相敌視的等級；相反地，在西班牙，一切等級可以和陸地奔向同一个目标”<sup>①</sup>。

在同一篇文章里，車尔尼雪夫斯基坚决地断言：“愚昧无知——这就是西班牙的致命伤”<sup>②</sup>，并且与此相应，他把对西班牙将来可能的发展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国家中的启蒙运动的成就上。

每个 18 世紀的“启蒙运动者”和每个 19 世紀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都会願意贊同他的这些意見，正如我們这个时代的每个馬克思主义者都会願意贊同前面所引的車尔尼雪夫斯基关于社会思想对社会生活的因果依賴关系的見解一样。

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一部分 18 世紀启蒙运动者，并非閉眼不看文明社会中階級斗争的事实。車尔尼雪夫斯基也不是閉眼不看这种事实。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确认階級斗争的事实，但是并不认为可能依靠它来实现自己的綱領。相反，他們觉得階級斗争是实现他們綱領的道路上的障碍，而在一切社会階級的友好协助下，他們的綱領的实现会快得多和容易得多。因此，他們号召一切階級在即将到来的社会改革的旗帜下联合起来<sup>③</sup>。我們看到，車尔尼

501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3 卷，第 44 頁 409。

② 同上书，第 45 頁 410。

③ 布尔仁在很有趣味的《Fourier.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u socialisme français》，Paris 1905（《傅立叶。对研究法国社会主义的一个貢獻》，巴黎 1905 年版）一书中說道，傅立叶的体系包含着階級斗争理論（第 596 頁）。但是布尔仁把承认階級斗争的事实和对这个事实的态度混为一談。空想社会主义者看到了階級斗争的事实，然而沒有看到“Der Widerspruch ist das Fortleitende”（矛盾引导前进），如黑格尔所

雪夫斯基关于西班牙各阶级的相互关系的意见，非常接近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观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宣言》中，非常中肯地评述了这种观点。“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体系，如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是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尚未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关于这个时期，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了……这些体系的创造者们虽然曾经看出阶级的对抗，看出统治着的社会本身内部的破坏因素的影响，但是他们没有看出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首创作用，没有看出无产阶级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sup>411</sup>。

正因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看不到无阶级的任何历史首创作用，所以他们就一视同仁地向现代社会的一切阶级呼吁。正因为他们向一切社会阶级呼吁，所以他们在宣传自己的实际计划时所指示的，不是要把这些阶级分开，而是要尽可能把它们联合起来。因为现代社会是建立在阶级对抗之上的，所以空想主义宣传家的主要力量当然是用于描写未来社会制度的优越性的，在未来社会制度下，阶级对抗将会消灭，而让位给普遍的团结。要理解这种未来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只需要深入地思考一下某个社会改革家所发现的社会规律。正如我们曾经引证过的那个《宣言》所说，空想社会主义者以为，“人们只要理解他们的体系，就会立刻承认这种体系是建设最美好社会的最优良的计划”<sup>412</sup>。但是，既然空想社会主义者把以后社会的全部历史都归结为宣传和实行他们的改革计划，那末他们就必然用唯心主义的观点去看历史。18世纪法国启

说的那样。他们不理解，阶级斗争正是分裂为阶级的社会的内部关系方面的一切进步所赖以实现的那个因素。只有布朗基理解了阶级斗争的历史意义；但布朗基的社会主义在这方面只是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过渡。

蒙运动者說，C'est l'opinion qui gouverne le monde (意見統治世界)。空想社会主义者情願重复他們的这个原理。例如，甚至被已故的米海洛夫斯基认作“經濟唯物主义者”的路易·勃朗，也在自己的《十年史》中写道：“我們这个世紀的真正历史，包含在它的思想史中。外交的騙局、宮廷的陰謀、嘈雜的爭吵、街头的斗争——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社会的波动 (l'agitation des sociétés) 而已。它們的生命力不在那里。这种生命力是在一般意願的秘奧的发展中，是在于不声不响地制定为革命作准备的学說。因为这一切事件总有一个深刻的原因，可是一旦发生这些事件以后，我們却以为它們是偶然产生的”<sup>①</sup>。在另一处，他又肯定說，历史是由书本造成的 (L'histoire est faite par des livres)。由于这个緣故，空想社会主义者用唯心主义观点来考察他們当代社会的未来命运，是不足为奇的。他們确信这个社会的命运决定于社会成員对某个改革家提出的社会改組計劃的“意見”，即决定于他們的看法。他們沒有反問自己，为什么在这个社会里占統治地位的是这种观点而不是那种观点。因此他們沒有想进一步研究那些在解释历史时的唯物主义因素，这些因素在他們的学說中无疑是很多的。相反，他們却抱着用唯心主义观点去考察以往的人类历史的意向。所以我們在他們关于以往人类历史的論断中經常会看到一些无可怀疑的、看起来是极明显的矛盾：一些显然完全是在唯物主义意义上解释的事实，忽然却得到了完全是唯心主义的說明；反过來說，在唯心主义的解釋中經常夹杂着完全是唯物主义的說法。这种不稳定的現象，这种現代讀者看得清楚而作者却觉察不到的从唯物主义到唯心主义、又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經常的轉变，在車尔

<sup>①</sup> 《Histoire de dix ans》，第3卷，Paris 1844，第89頁。〔《十年史》，第3卷，巴黎版，第89頁。〕

尼雪夫斯基的历史論断中也表现出来，在这方面他很像西方的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再重复一遍，他最后也和他們一样，倾向于唯心主义。

这一点从他那篇有意思的文章《論羅馬灭亡的原因(仿孟德斯鳩)》中看得很清楚，这篇文章刊载在1861年《同时代人》(第5期)。在文章中他热烈地反对那种很流行的意見：即西羅馬帝国的灭亡是由于它内部沒有进一步发展的能力，而消灭它的那些蛮族人却带来了新的进步的种子。“只要想一想进步是什么意思和蛮族是什么意思！——車尔尼雪夫斯基这样地感叹說——进步是以智力发展为基础的；它的根本方面也簡直就是知識的成就和发展……例如数学发达，实用力学便因而发达；而一切制造、技艺等等也就因实用力学的发达而得到改进……历史知識被掘发，那些妨碍人們安排其社会生活的錯誤概念便因而减少，人們的社会生活也比以前安排得妥当些了。最后，一切精神劳动发展着人的智力，而国内学会閱讀、获得讀書的习惯和兴趣的人越多，那么国内能愉快地胜任無論什么样的工作的人就越多，也即是說，国内生活任何方面的进程也就会好轉。可見进步的基本力量是科学；进步的成績是与知識完善的程度及传播的程度相适合的。所以要問进步是什么，那就可以說：进步是知識的成果。那么蛮族又是什么呢？蛮族是还陷在极端愚昧无知状态中的人；是介乎野兽和智力已有少許发展的人們之間的人……如果一种制度，不管它是坏的或好的，但毕竟是人类的，毕竟本身有某种合理的、至少有一点儿合理的制度，一旦为兽类的习惯所代替时，那对于社会生活有什么益处呢？”<sup>①</sup>

<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8卷，第158頁413。

在这里既沒有談到那位基佐在他的第一篇文章《Essai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sup>①</sup>里早就指出过的那些使羅馬衰弱的羅馬內部社会关系，也沒有談到那些使日耳曼的蛮族人在西羅馬帝国瓦解时代强大起来的社会生活方式。車尔尼雪夫斯基甚至忘記了他自己在另一个地方引用过的普林尼的名言：latifundia perdidere Italiam（大地产毀灭了意大利）<sup>414</sup>。在他的“进步公式”（后来我們开始采用这种表达形式<sup>415</sup>）中，沒有談到这个国家的內部关系。一切問題都被归結为智力的发展。車尔尼雪夫斯基坚决地认为，进步是以智力的发展为基础的，“它的根本方面也簡直就是知識的成就和发展”。他甚至沒有想到，“知識的成就和发展”可以由社会关系来决定，在某些情况下社会关系促进这种成就和这种发展，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則阻碍这种成就和这种发展。他把社会关系描写成純粹是某些意見流行的結果。我們刚刚讀到这一点：“历史知識被掘发；那些妨碍人們安排其社会生活的錯誤概念便因而减少，人們的社会生活也比以前安排得妥当些了。”这同我們这位作者在評論罗雪尔的书的文章里所說的很不一样。在那里，他还认为：象对待小学生那样去評價学者，說什么他們不懂得某一种科学，因而构成了錯誤观点；这是不可能的，甚至是可笑的。在那里，他还认为：問題不在于某位学者的知識的多少，而在于他所代表的那个集团的利益如何。一句話，那里的結論是：社会利益决定社会观点，社会生活决定社会思想。現在的結論却相反。現在的結論是：社会思想决定社会生活；如果社会制度有某些缺陷，那是因为社会象个小学生，它学得不好或学得很少，因而給自己构成了錯誤的概念。再不能想出比这更惊人的矛盾了。

304

① 《法国史論文集》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論羅馬灭亡的原因》一文发表于1861年《同时代人》杂志第5期,而評論罗雪尔的书的那篇文章则发表在同年的《同时代人》杂志第4期。因此在这里决不能說,車尔尼雪夫斯基在不同时期内对我們在这儿感兴趣的問題持有不同的观点。不!他在同一个时期内持有不同的观点,而这一点对他來說是有代表性的,因为他是这样一个人:他还没有成功地<sup>416</sup>把自己的历史观点归結为一个原則,因而在他关于历史进程的論断中可以說同时既有唯物主义,又有唯心主义。

車尔尼雪夫斯基繼續議論道:“有人說,社会为根深蒂固的形式所限制,这就是說,社会上有进步的力量,进步是需要的”<sup>①</sup>。在这个場合下不贊成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唯心主义观点的人,可能会反对,而且当然也反对这一点,因为进步的需要是一回事,而社会上存在着能够滿足这种需要的力量,則是另一回事。决不能把这两个內容完全不同的概念混淆起来:其中一个概念是純粹消极的(“进步的需要”只表明現存形式的限制性),而另一个概念則是积极的,因为社会上存在着能够对共同生活方式进行必要改造的进步力量,其前提是深受这种方式的无益方面之害的某个階級或某些階級必須在智力上、精神上和政治上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如果把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談,人类进步事业就被簡單化到极点,而我們也就不会在历史上看到在某些共同生活方式的重压下趋于衰落的那些民族的悲惨景象了。这些共同生活方式虽然无疑是有害的,但是沒有能够被消灭,因为在人民中还没有能够完成这个事业的有生力量。不言而喻,我們这里所談的不是对某个社会的一切階級都絕對有害的形式。可以說,这样的形式是会自行消灭的。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8卷,第160頁417。

但是,对社会的繼續进步特別有害的,往往是另一些不利于大多数人、而非常有利于少数特权分子的形式。只有在受苦受难的大多数人具有某种在政治上独立自主的能力的情况下,才可能消灭这种方式。然而大多数人并不經常具有这种能力。这种能力决不是被压迫的大多数人所必备的本性。它本身是由特定社会的經濟所創造的。大概,对羅馬的无产者來說,再沒有比支持格拉古兄弟的法案更有利了。但是,他們並沒有支持、而且也不可能支持这些法案,因为羅馬的經濟发展为他們所造成的社会环境,不仅沒有促进他們政治上的发展,却相反地还不断降低了这种发展水平。至于說到上层階級,那末,首先,期待他們采取有害于他們的經濟利益的政治行动,簡直是可笑的;其次,他們自己也在同一个經濟发展进程的影响下越来越腐化墮落,这个經濟发展进程造成了羅馬的无产階級,又使他們变成了殘忍而愚蠢的群氓。到头来,事情弄到这样的地步:羅馬人,这些全世界的征服者,开始不大能够服軍役,而用蛮族人来补充各个軍团,也正是这些蛮族人最后結束了这个活活地瓦解着的帝国的存在<sup>①</sup>。因此,与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解释

① 爱德华·迈耶尔十分正确地說道:“Erst als das Reich innerlich bereits völlig zersetzt war, haben die Barbaren, die es selbst hereingerufen, denen es das Schwert in die Hand gegeben hatte, ihm die westlichen Provinzen entrissen”(《Die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des Altertums》, Jena 1895, S. 50). (“只有当帝国内部已經完全瓦解的时候,它自己召来的并由它用劍武装起来的蛮族人,才夺去了它的西部諸省份”(《古代世界的經濟发展》,耶拿 1895 年版,第 50 頁。)) 还可以參閱第 52-63 頁。关于这个問題,可以參閱賽克萊塔恩的篇幅不大,但很有趣味的著作:《La Dépopulation de l'empire romain et les invasions germaniques》, Lausanne(《羅馬帝国的人口縮減和日耳曼人的入侵》洛桑) 1908 年版。还可以參閱罗貝尔图斯所著《Zur Geschichte der agrarischen Entwicklung Roms》(《Hildebrandts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羅馬土地发展史》(《希尔德布兰德国民經濟年鉴》)), 第 2 卷;在俄文书籍中,考察羅馬帝国灭亡問題的有彼得魯雪夫斯基教授的《中世紀社会和国家史綱要》,莫斯科 1908 年第 2 版,第 1-189 頁 418

306 相反，羅馬的灭亡决不是什么偶然的事，因为它的灭亡乃是早已开始的历史經濟运动的自然結局。

但是，車尔尼雪夫斯基对于能够有助于滿足社会进步需要的那些力量的問題，却抱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这样的力量在需要它們的地方总是存在的。

首先，生理学規律就保证任何一个社会都具备这种力量。“个别人的机体是可以使其生命衰弱下去的；但具有新生力量的新机体又会随着每个新生的人而出現，民族的力量也会借助于每一代的交替而恢复起来……請你們不要违反生理学，不要断言有些民族往往是由无头的人們組成的，或由沒有胃的人們組成的，或单单由一些老人組成的，或单单由一些青年人組成的，——要知道，这四句話每一句都是同样荒謬的。何苦要装成蠢人或撒謊的人呢！”<sup>①</sup>

其次，車尔尼雪夫斯基还借助于以下这个邏輯上的理由来证明自己的思想。他自問，是誰的力量創造出走上进步道路的那些共同生活形式的。他有把握地回答这个問題說：是社会的力量。由此他就作出結論說，因为社会中的力量在数量上并未減少，所以它不可能无力控制以前它有力控制的东西：“难道破坏比創造更难嗎？請想一想你們所說的是什么，你們說：建造房屋的泥水匠不能拆毀房屋；作桌子的木匠、鍛錘的铁匠都不能毀坏他們所制造的东西”<sup>②</sup>。

并不是某个社会中存在的一切力量都朝着一个方向行动。历史表明，从事于改造“房屋”、“桌子”等等工作的“泥水匠”、“木匠”等等，必須克服那些想使“房屋”和“桌子”保持原样的社会集团的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8卷，第159頁419。

② 同上书，第160頁420。



反抗。在另一些場合，即当車尔尼雪夫斯基忠实于唯物主义观点的时候，他本人曾清楚地意識到并且成功地強調了这种情况。但是，“摹仿孟德斯鳩”把他引向了18世紀的观点，于是他就像最純粹的唯心主义者那样发表議論。

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最后結論是：古代世界完全是由于从萊茵河到黑龙江的一切游牧民族的洪流而毀灭的。“在这里完全像国家由于泛濫而遭到灭亡一样。灭亡时决沒有任何內在的必然性。恰恰相反，生活是有生气的，进步是不停頓的。羅馬帝国的灭亡，就象赫古萊尼姆城和龐培城的毀灭那样，象現在在須德海<sup>①</sup>的波濤澎湃下的那个国家的毀灭那样，是一种地质灾变”<sup>②</sup>。

人們通常认为，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論羅馬灭亡的原因》一文是針對赫尔岑而写的，赫尔岑在1848—1849年革命遭到失敗以后，对西欧感到失望，而主要期待拥有农民村社的俄国来实现社会主义。維特林斯基先生在他不久以前出版的論赫尔岑的著作中很有把握地說，在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里，决沒有把赫尔岑看作想像中的論敌，因为作者很难把赫尔岑称为蠢人或撒謊的人<sup>③</sup>。維特林斯基先生并沒有完全确切地說明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論战方式的性质。車尔尼雪夫斯基并沒有說，他想像中的論敌不是傻瓜便是撒謊的人。他只是劝告他的論敌不要承认某些只有蠢人或撒謊的人才能承认的原理……当然，这也是极其尖銳的；但是，这种极其尖銳的話句却并沒有維特林斯基先生所解释的那种个人侮辱的性

① 赫古萊尼姆城 (Herculaneum) 和龐培城 (Pompeii) 都是意大利那不勒斯灣上的古城，公元79年因維苏威火山爆发而埋于地下。須德海 (Zuider-Zee) 在荷兰境内，现为北海的海灣，以西弗里西亚群岛与北海分开；这个地区本为陆地，公元1282年因陆沉而遭海水淹沒。——譯者

②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8卷，第167—168頁 421。

③ 維特林斯基：《赫尔岑》，圣彼得堡1908年版，第355頁。

质。不过，我們觉得，认为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自己的文章里所反駁的正是赫尔岑的这个推测，就其本身而論是比較可能成立的<sup>①</sup>。誠然，由于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自己的文章里反对人們吹噓俄国的独特性，反对人們为这种独特性而欢天喜地，因此人們可能认为他瞄准的目标是斯拉夫主义者。然而，关于这一点，他还有一个附带說明，使我們不得不坚决反对这种想法。这个附带說明如下：“我們在这里所說的，当然不是指斯拉夫主义者，因为斯拉夫主义者有对我們所有的无用的东西一点也看不見的那种特殊結構的視觉。他們认为我国所有的无用的东西，对于复兴死亡着的欧洲都是絕妙的和极端适用的……我們現在不談論这样的人們，因为他們的人数很少，而且也不值得同他們爭辯，我們談論的不是那些怪人，而是能根据普通人类智能来討論問題的人們”<sup>②</sup>。由此可見，車尔尼雪夫斯基对他想像中的論敌，並沒有維特林斯基先生硬加在他头上的那种卑下的看法。但这只是順便提一下而已。这里重要的是，用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話來說，他“想像中的論敌”除了村社土地占有制以外，在俄国看不到有任何东西可以从我們这里推广到先进国家，可以促进它們的复兴。这就使我們差不多有充分把握說，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这篇文章是針對赫尔岑关于俄国与“旧世界”的关系的著名观点而写的。車尔尼雪夫斯基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欧洲不能从我們这里学到什么东西，“因为它本身对于它所

① 赫尔岑认为《論羅馬的灭亡》一文是涉及到他自己的，奥格辽夫的看法也同样如此，奥格辽夫在自己的一封信里关于这篇文章說道：“这是可耻地出卖基督，也就是出卖真理和事业，这是不可容忍的。基督徒把这称之为瀆神的罪行”（参閱雷姆克，《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案件》，《往事》，1906年第3期）。当然，这种看法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的，反对赫尔岑和奥格辽夫的半斯拉夫主义，还完全不是意味着“瀆神的罪行”<sup>422</sup>。

②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8卷，第173頁<sup>423</sup>。

需要的是什麼新制度、這些新制度如何建立和用什麼方法實行等類問題比我們的了解要好得多。即是說，我們簡直沒有什麼可以使歐洲復興的東西”<sup>①</sup>。

這是完全正確的，正如說我們沒有任何理由來吹噓我們的獨特性是正確的一樣，因為這種獨特性只能歸結為可怕的落後狀態。對這種自我吹噓（不論它出自哪一個人之口）進行鬥爭，永遠是車爾尼雪夫斯基的一個功績。赫爾岑對於俄國和“舊世界”的關係的觀點是在斯拉夫主義者的強烈影響下形成的，並且是錯誤的。但是，使用比較正確的方法，也可能得出錯誤的觀點，正像使用比較錯誤的方法，可能得到正確的觀點一樣。請問，使赫爾岑形成錯誤觀點的那個方法，和使車爾尼雪夫斯基能夠對這種觀點進行完全正當的否定和嘲笑的那種方法，有怎樣的關係呢。

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在我們這裡有一半是現成的：我們看到，車爾尼雪夫斯基在論斷羅馬滅亡的原因時所遵循的是純粹唯心主義的方法。我們認為這種方法在本質上是錯誤的，所以我們說，雖然車爾尼雪夫斯基對赫爾岑關於西歐前途的半斯拉夫主義的看法採取尖銳的否定態度，是做得正確的，但這個正確的結果畢竟是他借助於錯誤的方法而得到的。在這種情況下，關於赫爾岑可以說些什麼呢？

他的思想過程是這樣的：西方各民族生活在一种經濟条件下；俄罗斯民族則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經濟条件下。在西方占統治地位的是小資產階級所有制；俄罗斯民族則同意村社所有制。因此，西方各民族浸透着小市民精神，对社会主义采取不調和的敵視態度，而俄罗斯民族則几乎是最反对小市民的民族，由于

<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8卷，第173頁。

309 这个緣故，俄罗斯民族几乎比其他一切民族都更能实现社会主义理想。

在赫尔岑的这些論断中，实际的錯誤很多，而邏輯上的失誤却很少。因此，它們也就把他导向了錯誤的結果。但是，無論它們使赫尔岑得到的結果是多么錯誤，我們仍然不能不承认，它們有一部分是依据这样一个正确的、虽然也是沒有經過彻底周密考虑的思想，即意識是由存在决定的<sup>424</sup>。因为赫尔岑抱有这个完全正确的思想——我們再重复一遍，这个思想在他那里还远沒有达到十分明白的地步，也远沒有經過彻底的周密考虑<sup>425</sup>——所以他比車尔尼雪夫斯基較接近于唯物主义历史观，而只有这种历史观才能够向我们揭示出社会发展的真正原动力<sup>①</sup>。

#### 第四章 社会发展进程

我們业已看到，《論羅馬灭亡的原因》一文的目的在于反对关于俄国独特性的半斯拉夫主义的吹嘘。現在应当补充一句，它的目的还不仅在于反对这种吹嘘。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这篇文章里还反对基佐学派西欧历史学家的理論中他认为是沒有根据的和有害的乐观主义。不妨提醒讀者，斯塔修列維奇先生所譯的基佐的《西羅馬帝国灭亡以来的法国文明史》第一卷俄譯本的出版，是促使他发表上述文章的表面原因。車尔尼雪夫斯基在反駁赫尔岑的观点的

① 赫尔岑写道，西方的前途取决于人民在对上层階級的斗争中将取得胜利还是被战败。“假如人民遭到挫折，新的中国（指英国。——格·普·）和新的波斯（指法国。——格·普·）就必然会产生。但是，假如人民摧毁敌人，那末就必然会发生社会变革。”（《钟声》第40和41期，1859年4月15日，見《約·斯·穆勒及其〈論自由〉一书》）。决不能靠援引“生理学”来反駁这样的論点，这里必須訴諸社会經濟，而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这里恰恰沒有这样做。

同时，也坚决反对历史的乐观主义。他表示坚信罗马帝国的灭亡是类似使赫古莱尼姆城和龐培城毁灭的一种“地质灾变”以后說道：

“物体无论怎样充满生机，往往因外来的破坏力而毁灭，事业无论怎样健全，往往因外来的破坏力而败坏，这种类似的情形，每天都可以在个别日常生活中遇到，在历史上也可以无数次地看到，不过我們所知道的在历史上象整个古代文明世界毁灭时那样大规模的毁灭，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請不要高談这些灾变的合理、这些灾变的有益罢。馬川蹄子踢中了人的太阳穴，人被踢死了，——这儿有什么合理的呢？这儿有什么致死的内在原因呢？里斯本毁于地震<sup>①</sup>，——这能归咎于葡萄牙文明的优点或缺点嗎？沙漠刮热风，飞砂把撒哈拉草原上的商队埋葬了，——請不要来证明駱駝和馬的不良、人的愚蠢、貨物的不好罢”<sup>②</sup>。

在基佐的历史乐观主义中，有一种倾向使車尔尼雪夫斯基感到憤慨，那就是认为战胜者总是正义的，而战败者总是有罪的。車尔尼雪夫斯基把这种倾向称为庸俗之見，并且說世界上任何事都可能发生：有时正义的人取得胜利，有时則有罪的人取得胜利。他把席勒在《胜利者的凱旋》中的这几句話应用于历史：

生活使多少善良的人雕謝！

命运饒恕过多少卑劣的人！

活着的不是伟大的帕特洛克拉，

而是可鄙的迭尔西特<sup>③</sup>！<sup>427</sup>

① 里斯本曾毁于 1755 年地震，后重建。 譯者

②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8 卷，第 168 頁 426。

③ 帕特洛克拉和迭尔西特 (Patroclus, Thersites) 都是希腊史詩《伊里亚特》中的人物。帕特洛克拉是阿溪甲斯的朋友，曾披阿溪里斯的甲冑代其出战，被黑陶所杀。迭尔西特为一安事誹謗的无耻小人。 譯者

根据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描写,毁灭西罗马帝国的日耳曼蛮族,至少在他們沒有抛弃他們的野蛮制度以前,仍然是<sup>428</sup>某种类似“可鄙的迭尔西特”的人。他这样描述罗马国家崩溃以后建立的那种社会制度:“在征服罗马各行省时侵略部落中的每一个人可以行劫,可以掠夺,可以杀他忽然想杀的人,不管这个人是被征服的居民还是自己的伙伴,当他还没有被某一个人杀掉的时候他就这么干,同时,首领可以杀掉一切被他控制的人们”<sup>①</sup>。最后,封建主义终于从这种延续了几个世纪之久的掠夺行为中产生了。但是,与罗马帝国中曾经存在过的社会生活方式相比,封建制度也决不是一种进步。在罗马毕竟还有过某种法制,而封建主义则只是使掠夺成为一种制度,使内訌遵守一定的规则。当然,同六世纪和七世纪比较起来,甚至封建主义也算是前进了一步。但是,根据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意见,所谓前进了一步的意义仅仅在于,古时接受赎金的意大利盗匪要比以前不受赎金专事杀戮的盗匪好一些罢了。当封建主义让位给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的时候,即在十七世纪以后,在新的欧洲建立了早在三世纪就已经在罗马占有统治地位的那种形式。

車尔尼雪夫斯基作出结论说:“现在就请你们判断一下蛮族征服罗马各行省的良好影响罢。这个事件的全部有益性是人类的先进部分被打入深不可测的地狱,经过十四个世纪的多方努力,才好不容易从地狱爬到从前的位置”<sup>②</sup>。这一段话表明,在我们这位作者的历史观点中,偶然性占有极其广泛的地位。可以说,按照他的意见,在罗马帝国灭亡以后长达十四个世纪的西欧历史的整个方向,是由一个巨大的偶然事件决定的,或者象他在另一个地方所说的那样,是由一种地质灾害、即蛮族的入侵决定的。“地质灾害”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8卷,第169页429。

② 同上书,第171页430。

这个用語使我們想起居維叶，居維叶就是用地质灾变去解释地球上动物群和植物群的命运的。我們已經知道，車尔尼雪夫斯基反对居維叶的理論，贊成种变說的观点<sup>431</sup>。那末就要請問，在他的历史观点中，种变說怎样同关于在許多世紀內决定各民族历史命运的偶然事件和灾变学說和睦相处呢？

在提出这个問題时，我們决不想暗示种变說和灾变的概念是不相協調的。如果把灾变理解为发展的漸进过程的中断——即所謂自然界或历史中的飞跃——，那末决不能忘記，黑格尔早就在他的《邏輯学》一书中非常清楚地指出，在任何一种严整的发展理論中，“灾变”都是完全不能避免的。我們在其他著作中曾多次談到这一点，因此我們认为現在沒有必要再回到这个問題上来。但是，如果說在任何一种严整的发展理論中，“灾变”在邏輯上是不可避免的，那末这一不容置辯的情况完全不能决定，承认“灾变”的地位的某种理論究竟在什么程度上可以被认作严整的理論。當我們問車尔尼雪夫斯基的种变說怎样同他的“灾变”論和睦相处的時候，我們是想弄清楚他是否善于把“灾变”看做发展的环节之一。这是在评价任何一种社会理論或历史理論时提出的最重要問題之一。

我們應該到車尔尼雪夫斯基关于基佐的另一部著作的书評中去寻找这个問題的答案，基佐的那部著作也是討論文明史的，但它不是專門討論法国文明史，而是討論全欧文明史。这部著作的俄譯本出版于1861年，而在同年的《同时代人》杂志第9期上，車尔尼雪夫斯基就发表了关于这部著作的評論<sup>432</sup>。

在这篇評論中，基佐被評为深刻地研究过他所談論的問題的一个严肃的学者。如果說他有許多不正确的思想，那末車尔尼雪夫斯基也毕竟认为其中每一个思想都值得加以仔細的分析<sup>433</sup>。基佐的历史著作的主要特点和主要优点在于，它們的作者从自己的

計劃中排除了关于个别事件的叙述，而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說明每个特定时代的事件、制度和概念的总的精神。在車尔尼雪夫斯基看来，这些著作的主要缺点，正如我們已經知道，是对历史事件的判断方面的过分的乐观主义<sup>①</sup>。在基佐那里，片面的进步概念是这种过分的乐观主义的学术根据。无论西欧在十三世紀时的情形怎样，它的状况毕竟要比十世紀的时候好一些。关于十七世紀也同样可以說：当时欧洲的状况要比四百年前好一些。最后，目前时期不管它本身如何，毕竟要比十七世紀好一些。欧洲人类的命运是在不断地改善，虽然改善得很緩慢。这是不容置辯的。但是，类似基佐那样的乐观主义者却从这个不容置辯的事实作出了不正确的結論。

欧洲人类生活得到不断的、虽然是緩慢的改善，用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話來說，其原因在于“欧洲各民族本身的天性，欧洲各民族像其他所有民族一样，沒有丧失对教育、真理和其他一切美好事物的渴望”<sup>②</sup>。天生的劳动能力和劳动願望，也被列为人类本性的优良属性。人类命运的逐漸改善，也要用所有这些人类本性的优良品质来解释。“群众进行劳动，于是生产技术慢慢地得到改进。群众有天赋的求知欲，或至少是有天赋的好奇心，于是教育就逐漸发展起来；由于农业、工业和抽象知識的发展，性情就变得溫和，习俗就得到改进，后来制度也得到改进；所有这一切只有一个原因——即群众渴望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內在意图。”<sup>③</sup>

313 但是，群众渴望改善自己生活的这种內在意图，是在并不总是对它有利的条件下实现的，据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說法，是在并不总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6卷，第347頁434。

② 同上书，第348頁435。

③ 同上。



是对它有利的形式的影响下实现的。用我们这位作者的话来说，这些条件“起源于完全不同的原则，并且是由完全不同的手段维持的”。車尔尼雪夫斯基举封建主义为例：“它与热爱劳动或求知欲有什么共同点呢？它起源于侵略，它的目的是占有他人的劳动果实，它是靠暴力维持的，封建主没有学术上的志向；他们愿意在懒惰中消磨他们除了战争、比武和诸如此类的事情而剩下的全部时间”<sup>①</sup>。因此，决不能断言，封建主义在任何方面曾有益于劳动。如果劳动获得了某些成果，那是违反封建主义、而不是有赖于封建主义而获得的。关于知识的成就也应当这样说。如果已经获得了这些成就，那也不是有赖于封建主义、而是违反封建主义而获得的。这说明了进步为什么缓慢；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直到目前为止文明仍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車尔尼雪夫斯基说道：“除了人的天性以外，文明再也得不到任何的支持，而靠劳动和求知欲创造文明的人们，则处于极其受限制的状况，所以他们的活动是非常软弱无力的，并且不断地受到阻碍，这些阻碍甚至消灭了文明所创造的为数不多的成果中的一大部分。文明刚刚在上意大利城市中获得了某些成就，日耳曼族大军就来到这里，而帝王同教皇进行斗争的结果就是伦巴第和托斯坎纳的城市屈服于佣兵队长的压迫；热爱劳动的风气和科学刚刚在法国南部兴盛起来，英诺森三世就指令法国北部的大军开往这些兴旺的地区，宣布消灭亚尔毕派。在西欧，到处都经常这样或那样地重复同样的历史”<sup>②</sup>。

虽然进步的实现有赖于人类天性，并且是违背人类天性不得不在其统治下实现自己意图的那些形式的，但是倾向于乐观主义的历史学家正是把进步归之于这些形式，而重复了表现于以下公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6卷，第348页。

② 同上436。

式的邏輯錯誤：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sup>①</sup>。他們說：“进步在这个形式下实现——就是說进步是由这个形式引起的”。車尔尼雪夫斯基指出，如果遵循这样的邏輯，那就应当认为冬天是违反外界寒冷的影响而在住宅中保持的溫暖的原因了。而且他认为，基佐比所有其他历史学家更严重地犯了这种违反邏輯的罪过，因为基佐把每一件重大的事实都必定当作有助于进步的东西<sup>②</sup>。

我們不去涉及車尔尼雪夫斯基用来解释基佐的乐观主义的那些理由，而只求分析他自己的論断。

首先我們要指出，作为他关于这个問題的所有論断的基础的那种思想，是与我們从《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一文中所知道的思想相矛盾的。他在那篇文章里說，人按其本性來說，既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要看环境怎样而成为善的或恶的。現在却认为，人的本性渴望“教育、真理和一切美好的事物”，并且人的本性頑强地实现这个願望，而不顾对它不利的环境。然而这种不利的环境是什么呢？是这样一些人的行为，这些人杀害自己的同胞，掠夺他們，并用各式各样的暴力来打断他們的有益劳动。但是，如果这种行为也可以用人的本性来解释，那末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这里对人的本性所作的說明就是不充分的，因为那时就应当說，在人的本性中不仅有着对于一切美好事物的渴望，而且也有对于一切丑恶事物的渴望。而如果我們对人的本性作这样的补充說明，在我們面前就必然会产生这样的問題：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本性所固有的良好的願望占了上风，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則邪惡的願望占了上风？如果我們說——正如我們的作者在《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一文中所說——在这儿一切都取决于环境，那末这将是正确

① (在这以后，就是由于这个原因。)

②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6卷，第349頁437。

的。但那时在我們面前就立即产生这样的問題：使人的本性中导致封建主义产生的那些邪恶原則得以出現的环境是怎样的呢？在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論断中完全沒有回答这个問題；可是在这些論断中也有一些意見使我們有理由认为，他未必会同意把类似残杀、征服和剝削他人劳动等等的恶行归之于人类本性。正如我們看到，他断定說，在其不利影响下“造成进步”的那些生活方式，“起源于完全不同的原則”。这些原則从何而来，仍然沒有說明。但是，不管在这里我們的作者从哪里引伸出这些原則，显然只有抛弃了他在《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一文中所捍卫的观点以后，他才能拒絕从人的本性中引伸出这些原則来。

我們再繼續談下去。进步借以實現的那些形式，并不总是有利于进步的。好吧。这是什么样的形式呢？車尔尼雪夫斯基指出封建主义为例。但封建主义是完整的、十分复杂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車尔尼雪夫斯基所指的是这些关系的哪一方面呢？他首先說的是战争、掠夺和征服等等。我們也就来細看看封建关系的这个方面。 315

当然，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制度，但是，在它决定社会制度之前，它本身却是由社会制度决定的。因为这个緣故——而且仅仅因为这个緣故——，战争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便具有不同的性质：蒙昧人互相交战的方式不同于野蛮部落，而野蛮部落互相交战的方式又不同于文明民族。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征服的后果也有所不同。当諾尔曼人征服英国的时候，得到的是一种后果，而当德国人征服阿尔薩斯—洛林的时候，得到的却完全是另一种后果。征服的社会后果总是一方面依赖于在征服者中間占統治地位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依赖于在被征服者中間占統治地位的社会关系。至于說到在这里从我們感兴趣的方面来加以

考察的封建主义本身，那末必須記得，負有軍事义务的那个特殊等級的出現，是以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为前提的，这个过程在于財產关系，而主要是上地关系的变化和由这种变化所制約的社会分工<sup>①</sup>。这个过程是在一定的經濟基础上实现的，我們的作者却令人奇怪地完全忽略了这种經濟基础。他說，中世紀的人們本着自己的良好願望而进行劳动，像封建主义那样的“形式”却阻碍了他們的劳动。我們且假定沒有封建主义和其他諸如此类的不利于劳动的“形式”。請問，那时的社会集团会采取怎样的形态呢？在不遇到阻碍的劳动願望的影响下，会形成怎样的“形式”呢？大概，車尔尼雪夫斯基会回答說，在那时某些村社生活方式的变种会兴盛起来。但是，在这样有利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村社的界限在哪里呢？难道沒有根据假定村社之間会发生摩擦嗎？如果有这样的根据的話，难道我們沒有权利认为这些摩擦会导致战争，会导致强者压迫弱者，会导致車尔尼雪夫斯基用来解释文明发展緩慢的所有那些現象嗎？

316 車尔尼雪夫斯基过分夸大了暴力在中世紀西欧社会史上的作用，他这样做是仿效他的老师們——空想主义时期的社会主义者——的榜样，而他的老师們則仿效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的榜样。

这些历史学家很善于评价階級斗争在欧洲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基佐說过，全部法国史是由階級斗争造成的<sup>②</sup>。上述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还把法国大革命看作“第三等級”同世俗的和教会的貴族进行斗争的結果。因为他們是資產階級思想家，他們当然完

① 参閱前面提到过的彼得魯雪夫斯基的著作《中世紀社会和國家史綱要》，第234—256頁和290—309頁。

② 很有意思，車尔尼雪夫斯基沒有注意基佐的观点的这个方面。

全同情“第三等級”。例如無論基佐怎样傾向于乐观主义，但他的乐观主义在本质上也可以歸結为这样的信念：西羅馬帝国灭亡以来的全部欧洲史，都这样或那样地为“第三等級”或——象基佐更确切地表达的那样——中等階級的胜利作了准备。这些学者把这部历史看做一个合乎規律的过程，所以他們正是把它看作为资产階級的胜利作准备的过程。只要提起奥古斯丹·梯叶里和他那本当时說来非常卓越的《第三等級史》就够了。奥古斯丹·梯叶里和他同时的其他伟大法国历史学家都持有中等階級的观点，对封建主义沒有絲毫的同情。虽然他們完全准备承认封建主义在历史上出現是合乎規律的，但是他們对封建主义的出現研究得很差，并且主要用征服来解释它。其中有一些人，例如基佐，很輕易地容忍了征服的事实，并且非常乐意散布关于它的良好后果的說法，不过，已經說过，这种良好后果主要在于它們为比較遙远的中等階級的胜利作了准备。另一些人，例如奥古斯丹·梯叶里，則对征服的事实抱有很大的、甚至几乎是热烈的反感。但是，無論如何，他們恰恰全都用征服来解释封建主义的产生，而对资产階級制度的解释則相反，他們主要是用經濟原因来解释资产階級制度的发展。从发现了产生封建主义的經濟原因的現代經濟科学的观点看来，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的观点所固有的这种特点，当然应当被认作这种观点的缺点。但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这个問題却有另一种看法。相反的，他們把法国历史学家的观点的缺点当作这种观点的优点，因为它使他們有新的論据来反对現存社会制度的基础：财产原来是征服的后果，那它就失去了保守派力图賦予它的那种神圣的外貌。因此空想社会主义者完全不打算弥补这些历史学家的观点的上述缺陷。正如我們剛才看到的那样，車尔尼雪夫斯基也不打算这样做。象所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他也过分夸大

了征服的意义。他没有注意到，他对封建主义之类的仿佛违反人类本性的“形式”的看法，和他非常赞同的格兰诺夫斯基关于历史的意义的演讲中所说的话，是多么不协调。读者记得，在这篇演讲中说，各民族的历史命运、甚至他们的社会生活对地理环境的特性有着因果的依赖关系。我们也已经指出，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是在促进或妨碍作为社会制度的最主要基础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上，承认这种环境的影响的。

## 第五章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马克思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过，车尔尼雪夫斯基象马克思一样，曾受过费尔巴哈的影响。我们还说过，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直保持费尔巴哈的观点，并把它们应用于某些个别的知识部门，例如应用于美学，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却对这些观点进行了根本的改造，特别是从这些观点与历史有关的方面对它们进行了根本的改造。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解释历史时所得到的结果同我们的作者在这方面所得到的结论作一比较，是很有意思的。马克思对于基佐的著作《Pourquoi la révolution d'Angleterre a-t-elle réussi? Discours sur l'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Angleterre》(Paris, 1850)<sup>①</sup>所写的内容极其丰富的长篇书评，给我们提供了进行明显的比较所需的材料。这篇书评最初发表在马克思所编的《Neue Rheinische Zeitung》<sup>②</sup>杂志上，并且被梅林收入了《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第3卷<sup>438</sup>。

318

马克思在这篇书评中对基佐提出的主要指责是：这位法国学

① 《英国革命为什么成功？论英国革命史》，巴黎1850年版）

② 《新莱茵报》

者把法国議會辯論中所使用的普通詞句用来解释英国历史，而忽視了这个国家的經濟发展和由經濟发展进程所制約的英国社会内部階級斗争。基佐談到了宗教学說对英国革命进程的影响，但是忘記了这些学說与市民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因果联系。在叙述斯图亚特王朝被逐出英国时，他甚至絲毫沒有联系到这个事件的最近經濟原因，例如沒有联系到土地貴族害怕失去由于收回教会領地而获得的土地，如果受到斯图亚特王朝支持的天主教会获得胜利，那当然会从他們手里夺走这些土地；以及其他等等<sup>①</sup>。在这篇书评中，馬克思連一句話也沒有談到人的本性，以及某些社会生活形式与人的本性有什么关系。显然，在写这篇书评的时候，他已經坚定地持有他后来在《資本論》中所表述的原則，这个原則认为，由于人在生产过程中作用于外部自然界，他自己的本性也就发生变化<sup>440</sup>。簡言之，馬克思早在1850年写这篇书评的时候，他就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来評判基佐了，可是車尔尼雪夫斯基在十年以后写的評論中，仅仅用純粹唯心主义的見解来对抗这位法国历史学家的論断。

我們要順便指出，馬克思对基佐的态度并不完全正确。基佐远不是这样地同唯物主义解释历史事件的方式格格不入，像人們根据馬克思的书評所可能想的那样。后来恩格斯談到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时要公正得多。但是，在上述的那篇书评中，甚至馬克思对基佐的过于严厉的态度对于馬克思也是有代表性的，这种过于严厉的态度并不是由于其他原因，而是由于看到唯心主义因素而

---

<sup>①</sup> «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ss von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und Ferdinand Lassalle», Dritter Band, Stuttgart 1902, S.412—413. (《卡尔·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斐迪南·拉薩尔遺著选輯》，第3卷，斯图加特1902年版，第412—413頁。)439

感到愤怒所引起的，这种唯心主义因素在这位法国历史学家的历史观点中无疑占有重大的地位。卓尔尼雪夫斯基也对基佐感到愤怒，但他之所以愤怒，并不是由于基佐归根到底毕竟是一个唯心主义者，而是由于这位学者的见解并不经常充分地渗透着空想主义时期社会主义者所遵奉的那种唯心主义变种的精神，正因为他們遵奉那种唯心主义的变种，他們并不去解释历史，而只是譴責或贊同这些或那些历史现象。

卓尔尼雪夫斯基在說明辩证方法的性质时說过，在现实中一切都依赖于地点和时间的条件，因此过去（在黑格尔以前）人們用来評判善恶的那些一般的抽象原理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在批判基佐的观点时，他自己却开始从这些抽象原理的观点去評判历史事件。但問題也正在于他很少用辩证的观点去观察历史。

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也沒有否认一般的观念、其中包括科学概念的发展的历史意义。但是，他們牢牢地記住，不是意識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識，因此，不能用思想史来解释社会史，相反地，要用社会史来解释思想史。卓尔尼雪夫斯基在个别場合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我們已經知道这方面的光輝事例。但是当他把自己个别的历史观点归結为一个整体的时候，他似乎完全忘記了自己的唯物主义思想，而认为存在的发展对意識的发展有着因果依賴关系。他对于諾維茨基的《与多神教的发展相联系的古代哲学学說的逐步发展》一书所写的书评（《同时代人》，1860年第6期，該文收入了全集）<sup>441</sup>，在这方面显得最为突出。

在这篇书评里，卓尔尼雪夫斯基把人类史比作行軍。在行軍时通常会出现一些掉队的人，随着軍隊和它的总司令部越来越向前推进，掉队的人数也就越来越多。在迅速进攻的时候有时也发生这样的情况：大多数士兵都落在后面。这些落后者已不再参加



战斗,而只是加重他們队伍中的同伴們的負担,因为全部战斗重担都落在这些同伴的肩上了。但是,当他們的战斗胜利結束的时候,当敌人降服而战胜者有机会休息的时候,那些落后者就逐渐赶上先进者,最后整个军队又像开始行軍时那样重新在自己的旗帜下集合起来。在人类的智力运动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开始时所有民族都并肩前进:从前古希腊人也有过現在霍屯督人所具有的那些概念。后来某几个民族开始向前迈进,而其他民族落在他們后面。荷馬所描写的希腊人比起任何一种穴居人或列斯特里干納人<sup>442</sup>来,已經是先进的民族了。然后在希腊人中間也开始出現了落后者和先进者。例如,还在梭伦时代,斯巴达人就已远远落后于雅典人。后来在雅典人中間也发生了分化。車尔尼雪夫斯基說道:“梭伦的英明是每个雅典公民所懂得和容易理解的,而苏格拉底却被他的大多数同胞看做不信宗教的人”<sup>①</sup>。我們在近代史上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居住在前西罗马帝国各行省的一切人,起初对事物具有同样的观点:“在七世紀或八世紀,教皇与最沒有知識的法国或爱尔兰农民的区别,只在于教皇比后者記得更多的經文和祈禱文,而不在于对它們的意义有不同的理解”。过了一些时候,事情发生了变化:“各个等級在物质状况方面的差别,也就造成了他們在智力生活方面的差别”<sup>②</sup>。教会的财富有可能使神学家們受到教育,其中最具有才干的人已經着手改造旧概念。与此同时,科学也在前进,在科学中也发展起只有专家才能理解、而为群众所不易理解的内容。这些知識成就“是以僧侶和中层等級所拥有的物质手段作为基础的;市民也参与創作新的詩篇,这种詩篇已經是仍然停留在过去的童話和歌謠的水平上的全体人民所不易理解的

320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6卷,第265頁443。

②) 同上书,第266頁444。

了，一群詩歌能手和职业歌唱家兼詩人組成了城市行会；但封建貴族們的財富更加促进了这种变化，在他們那里出現了宮廷的抒情詩人”<sup>①</sup>。但是，在中世紀，先进人物和群众之間的距离毕竟要比近代小一些，近代科学开始极其迅速地发展起来，可是大多数居民繼續处于愚昧无知状态，非常接近于他們在九世紀或十世紀所处的境地。有教养阶层的詩歌也同样迅速地发展起来，但群众仍然墨守着一些被曲解了的中世紀全民詩歌。甚至在有教养的人中間也存在着类似的态度。車尔尼雪夫斯基举莎士比亚为例。他說：“我們看到，上世紀只有很少的英国詩人懂得莎士比亚，而且在有教养的公众中只有很少人能够重視这位詩人。其余的人在很长时期內繼續讲究夸张的修辞或者是平淡无奇，而这种东西是属于比莎士比亚的自然朴实作风要低得多的詩歌发展阶段的。在智力生活的一切方面到处都曾經发生过、并且还在繼續发生同样的情况”<sup>②</sup>。

迄今为止，落后永远是大多数人的命运。現在也仍然如此。但是，由此还不能作出結論說，将来也永远如此。已經获得的真理是这样簡單，这样容易被每一个人所理解，因此接受这种真理要比发现真理容易得多。当真理为群众知道的时候，它就会被群众接受。

車尔尼雪夫斯基把自己对人类智力发展进程的看法簡述如下：“开头是从人群中逐漸分泌出一些智力高度发展的人，人群就越来越远地落后于他們的迅速运动。但是，当达到很高的发展阶段时，先进人物的智力生活就取得了越来越容易被普通人理解、越来越适合于群众的簡單要求的性质，而历史上的智力生活的較高的后半期，按其与普通人的智力生活的关系來說，是在于逐漸地依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6卷，第266頁。

② 同上书，第267頁。

复人民生活的統一；最初曾經有过这种統一，但在前半期的运动中这种統一却遭到了破坏”<sup>①</sup>。

用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話來說，已經獲得的真理是符合群众需要的。这是什么样的真理呢？显然，这不是数学的真理，也不是自然科学的真理。数学的真理和自然科学的真理与群众利益沒有直接的关系。假如它們与群众利益有这样的关系，那末为了理解它們，毕竟是需要受过一定的、比較專門的訓練的。車尔尼雪夫斯基所暗示的是有关人們在社会中的相互关系的真理。他认为，他的西欧老师們——費尔巴哈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伟大代表者罗伯特·欧文、傅立叶和其他等人，已經发现了这个真理。因此他认为，人类历史上的智力生活的后半期、即它的較高的半期已經开始了或者即将开始，在这个期間将最后发现真理，并在群众中传播真理，由于这样做，群众就将在自己的理解力方面接近于最先进的人。使群众可能掌握那最后发现的真理的保证是：第一，真理的单纯性；第二，真理符合群众的利益。人們通常在自己的行动中所遵循的利害打算，迫使群众不仅要掌握真理，而且要在自己的社会生活中体现真理。車尔尼雪夫斯基就是这样想像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进程的。意識決定存在，因此沒有必要去研究，在什么程度上和什么样的社会存在能够促使群众接受社会真理。这种真理是这样简单，因此任何一个能够做最起碼的打算的人都能理解这种真理。这种关于社会进一步的发展进程的概念，是和我們在科学社会主义創始人那里看到的概念直接对立的。当馬克思和恩格斯作出他們著名的“預測”的时候，他們是訴諸資本主义社会的內部矛盾的，并且证明，資本主义的这些矛盾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发展，会使<sup>446</sup>

322

<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6卷，第268頁445。

絕大多数生产者接受新的社会理想。在这里，意識的发展进程被看作存在的一定发展进程的必然后果。車尔尼雪夫斯基不去分析社会存在所特有的内部矛盾。他满足于确认这样的事实，即这种存在的“形式”現在到处都不利于絕大多数居民。在他看来，要使群众接受社会真理，这个事实就足够了。这种真理极其简单，使它容易被生活在各种极其不同的生产关系下的“平民”所理解。車尔尼雪夫斯基把存在的进一步发展进程想像为知識的某种成就的简单結果。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問題。而車尔尼雪夫斯基則从唯心主义观点来看这个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观点忠实于費尔巴哈哲学的唯物主义精神。而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历史观点則与这种精神相矛盾。当然，在这儿絕对必須記住<sup>447</sup>，正如恩格斯在《費尔巴哈論》这本小册子里指出的，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老师本人在自己的历史观点方面也并不忠实于自己哲学的基本原理。

車尔尼雪夫斯基关于莎士比亚所說的話，清楚地暴露出他的进步概念的过于率直的性质。的确，只有很少的 18 世紀有教养的英国人善于重視这位天才戏剧家的作品的伟大价值，当时大多数英国观众都对他十分輕視。但是，这决不能用这大多数人缺乏知識来解释。事实是这样的：当所謂有教养的观众中絕大部分人瞧不起莎士比亚的时候，文学知識当然少于当时“有教养”人士的那些城市“平民”，却对莎士比亚表示了很大的、往往十分热烈地表达出来的同情。这个事实可以用 18 世紀以及 17 世紀英国社会的阶级心理的某些特点来解释。从复辟时期起，英国貴族力图把赫赫一时的法国貴族的趣味搬进本国，而莎士比亚的有点粗野的、有时簡直是“平民化的”现实主义，則很不符合这种趣味。但是，“平民”却正是由于这种现实主义而喜爱莎士比亚。我們看到，英国人关

于莎士比亚的观点的历史，实际上要比車尔尼雪夫斯基所想的复杂得多，車尔尼雪夫斯基这一次又忘記了他自己的这句精采的話，那就是决不能用考試的观点（說人們知道这一点，而不知道那一点等等）去观察意見的历史。

刚才所叙述的那篇书評又一次向我們表明，我們这位作者在自己的历史論断方面往往从唯心主义观点轉到唯物主义观点，又从唯物主义观点轉到唯心主义观点。这篇书評中包含的历史观渗透着唯心主义的精神。但是，当車尔尼雪夫斯基考察制約着人类智力生活成就的个别历史現象时，他往往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而下論断。他說，“各个等級在物质状况方面的差別，也就造成了他們的智力生活方面的差別”。用他的話來說，中世紀教育的成就是以僧侶、中层等級和封建貴族們所拥有的物质手段作为基础的。由此可見，思想的发展决不是历史运动的最深刻的原因。相反，它本身是由社会經济发展所决定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到，这种唯物主义观点与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历史唯心主义发生了尖銳的矛盾。

我們已經知道，車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封建主义是这样一种“形式”，它的产生和存在妨碍了各民族的前进运动。对封建主义的这种唯心主义的評价是与我們刚才指出的他的唯物主义的評价相矛盾的，因为根据他的唯物主义的評价，封建主义是促进知識积累，从而促进人类进步运动的“形式”。为了消灭这个矛盾，車尔尼雪夫斯基就必须彻底地要末遵循唯物主义，要末遵循唯心主义。但是，作为科学历史观发展中的过渡时代的代表者，他是不可能达到这样的彻底性的，因为在这个过渡时代，唯物主义已經在这个領域內对唯心主义展开斗争，但唯物主义距离胜利还很远，因此最后一言依然还是属于唯心主义的。

可能有人会提醒我們，根据我們的意見，我們所分析的車尔尼 324

雪夫斯基的书評已經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观点形成严密整体以后出現的。这一点我們并没有忘記。但是我們觉得，問題在这里不取决于简单的年代的根据。拉薩尔的主要著作也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观点已經具有严整形式以后出現的，然而按照思想內容來說，这些作品仍属于从历史唯心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过渡的时代。問題不在于某个作品是在什么时候出現的，而在于它的内容如何。

既然在以往各个历史时代，知識的进步决定于經濟关系的性质，那末到我們这个时代，車尔尼雪夫斯基就應該問問自己，这个时代使人們能发现社会真理并保证这种真理在将来实现的那些經濟特点是怎样的呢？但是要給自己提出这个問題，就必须坚决地抛弃唯心主义，两条腿站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我們不想再重复說車尔尼雪夫斯基远沒有抛弃唯心主义，說他对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进程的看法完全是唯心主义的。我們只請讀者注意，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历史唯心主义使他在关于未来的思考中把“进步”人物（按照我們現在的說法就是知識分子）放在首要地位，他們應該在群众中传播那終于发现的社会真理。他认为群众的作用就是充当正在前进的軍隊中的落后士兵。自然，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唯物主义者都不会断言：似乎一个中等的“平民”，仅仅因为他是“平民”，即“群众的一分子”，所以知識就不少于一个中等“知識分子”。他的知識当然比后者少。但是問題不在于一个“平民”的知識，而在于他的行为。人們的行为并不是常常取决于他們的知識，也不是仅仅取决于他們的知識，而且还要——并且是最主要地——取决于他們的地位，他們所具有的知識只是用来闡明和理解这种地位的。这里我們又要想起一般唯物主义特别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个基本原理：不是意識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識。

“知識分子”出身的人的“意識”比出身于“群众”的人的意識要发达些。但是出身于群众的人的“存在”使他的行动方式比知識分子在社会地位的支配下所采取的行动方式要明确得多。因此，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只容許在某种意义上、而且是极有限的意义上談論“群众”出身的人比知識分子出身的人落后的問題，在某种意义上“平民”无疑地落后于“知識分子”，然而在另一个意义上他无疑地胜过“知識分子”。正因为如此，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拥护者决不重复黑帮和工团主义集团对知識分子的荒謬的攻击，同时也决不同意把知識分子看成是历史的創造主，而唯心主义者通常总是这样看的。贵族习气是各式各样的。历史唯心主义的罪过，就在于它有“知識的贵族习气”。

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历史观点中的缺点是因为費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不够完善而产生的，这种缺点后来成了我們的主观主义的基础，这种主观主义和唯物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它不仅在历史范围内，而且也在哲学方面坚决反对唯物主义。主观主义者大吹大擂，自称是 60 年代优秀傳統的继承人。实际上他們继承的仅仅是这个时代的世界观的缺点。这个时代的世界观的优点，则成为“主观主义”的唯物主义敌手們的观点的基础。根据这一点就不难解决到底是誰更忠实于 60 年代优秀傳統的問題了。

一談到“主观主义者”，我們就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他們从前經常发表的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滔滔不絕的議論。“主观主义者”断言这些議論重复了和发展了我們伟大的“启蒙运动者”的观点，他們这样說对不对呢？也对，也不对。我們已經看到，唯心主义历史观必然会极端夸大“先进的个人”的作用。例如，因为車尔尼雪夫斯基持有这种唯心主义，所以他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观点就接近于“主观主义者”的观点。但是，我們已經知道，在

他的世界观中也存在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萌芽。正因为存在着这种萌芽，所以車尔尼雪夫斯基对我们在这里感兴趣的问题的观点，是不会更接近于“主观主义的”观点了。

326 顺便提一下，在車尔尼雪夫斯基加以无条件赞赏的格兰諾夫斯基的演說《論通史的目前状况和意义》中，引证了貝尔院士的这样一些話：“世界史的进程决定于外部自然条件。个人的影响比起这种条件来是微不足道的。他們几乎永远只是去实现那种已經这样或那样地准备好的、而且必定要实现的东西。企图建立任何嶄新的和沒有准备好的东西，始終是不会成功的，或者只会招致毁灭”<sup>①</sup>。格兰諾夫斯基一点也不反对这个观点。車尔尼雪夫斯基在关于格兰諾夫斯基的文章里也并不反对这个观点。但是，这个观点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拥护者的观点有什么关系呢？这个观点是对后面这种观点的暗示，是科学思想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后来馬克思和恩格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就得到了如此巨大的成功。实际上，“个人”总是仅仅实现那已經准备好的东西。在这里貝尔是对的。但当他把个人的影响与外部自然条件的影响相比較的时候，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錯誤。后一种影响很少是直接的。自然条件往往只是間接地、只是通过它們所引起的那些社会关系来对历史发生影响的。因此，不應該把个人的影响与外部自然条件的影响相比較，而應該把它与社会关系的影响相比較。但这种比較在方法論上也可能是非常不正确的，因为社会关系是人們的关系，而不是某种虽然与人有关、但毕竟似乎与人相对立的形而上学的本质。实际上，人們在創造历史，但人們之所以这样地、而不是那样地創造历史，并不是因为他們自觉地要这样地、而不是那样地

<sup>①</sup> 《格兰諾夫斯基全集》，第34—35頁。



創造历史，而是因为他們的行动决定于不以他們意志为轉移的那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中，当然也应当提到外部自然条件；但生产关系应当占有主要地位，生产关系是在特定的生产力的基础上产生的，而生产力又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地理环境。貝尔曾經清楚地暗示过这一切，无怪乎他談到外部自然界对个别民族社会关系的影响。但是，这些清楚的暗示中的正确的东西，却只有在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中才得到了应有的发展。

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論萊辛的著作中这样表述了他对个人在历史上可能起的作用的看法：

“伟大的世界性事件的进程，像大河一样，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任何峭壁、任何深淵都擋不住它，更不用說随意設立的堰堤了。無論誰的力量都不能靠堰堤来使萊茵河或伏尔加河改道，具有无限力量的河流一冲就把狂人的凶莽的手想用来擋住它的潮流的一切木桩和垃圾抛上了岸；輕率的政策唯一后果将只是：靜靜地浸潤着河水并且披覆着碧綠的繁盛的草地的河岸，将暫時被受到凌辱的怒浪所撕裂和摧毀，——而河流还是走自己的路，淹沒一切深淵，冲开山脊，直达它要流向的海洋。伟大的世界性事件的实现，既不取决于誰的意志，也不取决于任何个人。它們是按照如引力定律或有机体成长規律一样确定不移的規律实现的。但是，世界性事件实现得快些或慢些，它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实现——这却取决于无法預見的和无法事先决定的情况。这些情况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强有力的个人的出現，他們以自己活动的性质給予事件的固定方向以这种或那种性质，加速或延迟它的进程，并且以自己压倒一切的力量使那种把群众发动起来的混乱的力的波动具有規律性”<sup>①</sup>。

<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3卷，第614—645頁448。

我們对这些思想只能补充两点意見。

首先,强有力的个人的出現也不是偶然的。我們早已指出,强有力的个人往往正是在极其需要他們的时候出現在历史上。怎么解释这一点呢?这不过是由于,某一种强有力的个人并不是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能找到运用自己能力的机会。例如,誰也不会爭論,拿破侖的强有力的个性在某个历史时代上打下了极其深刻的烙印。但必須要有特殊的历史条件,拿破侖的力量才能充分地施展出来。如果旧制度再繼續維持三十年的話,那我們就不知道拿破侖的一生将成为什么样了。据說,在革命前几年他曾經想到俄国去,在俄国軍隊里服务。不用說,在那里等待着他的前途,無論在什么情况下都决不会使他走向統治世界。而拿破侖手下的那些元帅呢?在1789年,奈、弥拉特和苏尔特都还是軍曹。如果不发生革命的話,他們也許一輩子也得不到軍官肩章。在同一年,也就是在革命开始的那年,奥什洛还是个普通的劍术教师,朗恩还是个染色工人,顾維翁·圣一西尔还是个演員,馬尔蒙还是个排字工人,茹諾还是个法科学生,等等。所有这些人都有很大的軍事才能。但是旧制度不会容許他們施展这种才能;大家都知道,在路易十五治下只有一个不屬於貴族等級的人获得中將的軍銜,而在路易十六治下不是貴族出身的人的軍事前程就更加困难了<sup>①</sup>。因此,某一时期在某个民族那里存在的社会关系,决定着是否将在某个方面为某一类强有力的个人开辟道路。任何一种社会关系方式都是某种完全合乎規律的东西,所以很明显,强有力的个人之出現于历史舞台也有其規律性。

其次,强有力的个人一旦出現于历史舞台,他就以自己的活动

<sup>①</sup> 关于这一点,詳見我的《論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一文,載于《二十年來》文集449。

加速事件的进程。这一点是正确的。但在这里也显而易见，加速的程度则取决于强有力的个人不得不在其中进行活动的那个社会环境的特性。

如果加上这些附带条件的話，現代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拥护者就完全可以接受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要看出这种观点与我們主观主义社会学家的观点相差多么远，并不需要什么了不起的洞察力。这些先生有一种可爱的习惯，喜欢責备馬克思的“学生們”，說他們仿佛抛弃了六十年代的遺產。但如果把他們的哭訴同車尔尼雪夫斯基在我們刚才的引文中关于个人的作用所說的話作一对照，那末很明显，这些以此为根据的——更正确地說，是完全沒有邏輯根据的——哭訴，可以針对車尔尼雪夫斯基而发，正如它們針对馬克思主义者而发一样。在这里，也象在其他所有方面一样，只有馬克思主义者才始終忠实于我們六十年代的伟大“启蒙运动者”的优秀遺訓。

## 第六章 車尔尼雪夫斯基 的后期历史著作

順便提一下，前面已經說过，車尔尼雪夫斯基从西伯利亚回来后曾从事于韦伯的《通史》的翻譯工作，并且为他的某几卷譯本写了附录，这些附录对評述他的历史观点來說是极其重要的。在这里我們来对某些附录作一考察。

所有这些附录都是为了叙述“关于通史的某些問題的科學概念”而写的。由于极其明显的原因，最使我們感兴趣的是这样一篇附录，它考察了車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足以造成进步的那些因素。 329

在車尔尼雪夫斯基看来，进步就在于人类概念和习俗的改进。

因此，关于造成进步的原因的问题，在他看来可以归结为是什么东西引起上述这种改进的问题。

車尔尼雪夫斯基說，人类生活对动物生活所有的全部优越性，都是人的智力上的优越性的结果。因此，車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人们的智力发展是提高人类生活的基本力量。当然，智力可能产生而且实际上往往产生了有害的结果；但是，根据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意见，智力只是在歪曲智力本性的力量和环境的影响下才产生有害的结果。他說：“就本身而論，智力发展具有这样的趋势，即改进人关于自己对别人的义务的概念，使人变得更善良，在他身上发展起关于正义和诚实的概念”<sup>①</sup>。

我們看到，这也就是車尔尼雪夫斯基以前在对基佐的著作的评论中所叙述过的同一个观点。没有必要再去說明，把智力发展当作进步的主要动力的观点乃是唯心主义的观点。

車尔尼雪夫斯基在确立了自己的唯心主义观点后，非常合乎逻辑地按自己的方式发表議論，他說，人民生活中的任何变化都是組成民族的个人生活中的变化的总和，所以在考察有利于或不利于改进民族智力生活和道德生活的那些条件时，必須弄清楚由于什么原因个人在智力方面或道德方面得到改进或趋于堕落。

政治经济学比其他社会科学更早地制定了关于进步条件的精确概念，它确立了这样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只有人的自願的活动才产生良好的结果，而人由于外来的强制所做的一切則产生很坏的结果。如果把这个真理运用于人类物质劳动的成效问题，那我們可以得到这样的結論：“一切形式的非自願劳动都是生产效能极低的，只有这样的社会才能享受物质福利，在这个社会里，人們耕

<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2部分，第4篇，第170頁450。

种土地，縫制衣服，建筑房屋，每个人都按自己有益于社会的信念，从事于他所致力的工作”<sup>①</sup>。

把那个原則运用于如何获得和保持智力財富和道德財富的問題，我們就可以达到这样的結論：“当一个人自己不願意保持高度的智力水平和道德水平的时候，任何外来的强制都既不能使人維持高度的智力水平，也不能使人維持高度的道德水平”<sup>②</sup>。

这些結論在車尔尼雪夫斯基那里是由許多教育方面的看法充实起来的，它們在他眼里不仅有着理論的重要性，而且有实际的重要性。有教养的民族通常把野蛮部落看作儿童，以为对他們进行教育便可能而且應該强迫他們朝着一定的良好目标前进。文明民族的有教养的等級也是这样看待自己本国愚昧无知的群众。車尔尼雪夫斯基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他說，甚至野蛮人中間最粗野的人也决不是儿童，而是象我們一样的成人。但是，即使我們承认把野蛮人和沒有受过教育的人比作儿童的那种不正确的比拟是正确的，我們也仍然沒有絲毫权利应用暴力去教育野蛮人或“平民”，因为我們已經知道，暴力从来不会造成什么好結果。我們的作者說道：“如果我們这些任何民族的受过教育的人，希望为我們那些有着对自身有害的坏习惯的同胞群众做点好事，那末我們的責任就在于向他介紹美好的东西，并且关心他們有可能接受这种美好的东西。采用暴力是完全不适当的做法……希望任何文明国家的政府采取强迫措施来改造本民族生活的那些学者，——是比土耳其国家的統治者更不开明的人”<sup>③</sup>。

在这里我們要来作一比較，可以說，这种比較是自然而然地来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2部分，第4篇，第171頁451。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175—176頁452。

到心头的。馬克思所写的第一国际規章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原理：“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业”<sup>453</sup>。这也可以說就是車尔尼雪夫斯基所捍卫的同一个思想。但是，馬克思在表述这个思想时直接面向无产階級，而車尔尼雪夫斯基所注意的却是那些願意为改善工人階級命运而工作的多少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这个根本的区别完全符合于前面指出的車尔尼雪夫斯基历史观点的特点，由于这个特点，他把知識分子本身当做历史上的真正作战部队，而在他看来“平民”群众則象軍隊中的落后分子。我們已經說过，这个特点与我們这位作者的历史观点的唯心主义性质有着密切的因果联系。

暴力問題合乎邏輯地把他引向这样的問題：“在什么情况下理性和良心才能认为征服是正当的”<sup>①</sup>。車尔尼雪夫斯基說，所有这样的情况一定要符合自卫的概念。較强的民族总是有可能安排好它同較弱的民族的关系，以便和平相处。征服一个民族总是破坏正义的。但是，这其实是对定居的民族而言的。車尔尼雪夫斯基对游牧民族有不同的看法。某些游牧民族是爱好和平的；征服他們是不正义的。但有許多游牧民族从事于劫掠自己的邻族；理性和良心认为征服他們是正当的。于是在这儿就产生一个問題：文明的征服者有沒有权利迫使被征服的游牧民族改变他們的风俗习惯。車尔尼雪夫斯基回答說，在防止掠夺所必需的范围内，他們是有这种权利的。不幸的事仅仅在于，文明的征服者通常只想到自己本身的利益，而不去考虑被征服者的利益。因此他們就訴諸暴力；假如他們考虑到被征服者的利益的話，他們就会記得，一切良好的結果都不是用暴力获得的，而是用温和手段和减少暴力的办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2部分，第4篇，第176頁454。

法获得的。

但是,存在着許多似乎确实可靠的历史证据,說明暴力曾經使野蛮人的风俗得到改进。怎样看待这些似乎确实可靠的证据呢?車尔尼雪夫斯基回答說:“了解人类本性規律的历史学家,不会怀疑任何諸如此类的故事都是荒謬的臆造;对于这些故事,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解释它們是怎样产生的,发现制造这些故事的蓄意撒謊的錯誤根源或动机”<sup>①</sup>。

18世紀的启蒙运动者,以及19世紀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他們的历史論断中都乐意訴諸人类的本性。訴諸人类本性有时也許在鼓动的意义上是有益的,然而对历史学这門科学來說却从来没有什么益处。如果人类本性是固定不变的,那它就不能解释历史上的任何东西,因为历史的过程归结为不断的变化。如果人类本性自身在历史变化的影响下发生变化,那末就显然不能用它来解释历史变化。这些一般的看法也完全适用于刚才所叙述的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論断。他說,任何暴力都会导致有害的后果。但是,有哪一个民族不負有使用暴力的罪責呢?斯拉夫主义者曾經說过,俄罗斯国家与西欧国家不同,它是以契約为基础,而不是以征服为基础。想必車尔尼雪夫斯基本人也认为这种理論只不过是虛构的神話而已。在暴力会对自己有利的許多場合下,任何一个民族都决不拒絕使用暴力。然而各个民族的历史命运远不是一样的。怎样解释它們的不同呢?对于每个社会的內部发展,也可以提出同样的問題。沒有一个民族,暴力在它的內部发展中沒有起过作用。然而各个不同民族的內部发展也是不同的。单用暴力显然不足以解释这一点。最后,濫用实力的可能性本身,是由那些决不能用暴

332

<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2部分,第4篇,第178頁455。

力来解释的条件所创造的。我們已經說过，所謂軍事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具有不同的性质，它的性质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經濟关系制約的。車尔尼雪夫斯基本人有时也发表了类似的見解。例如，在为韦伯著作第九卷而写的一篇题为《論各民族在民族性方面的区别》的附录中，他指出了这样一些情况，在他看来，这些情况改变了羅馬军队的成分，从而削弱了它的力量，因此为羅馬帝国的灭亡作了准备。用他的話來說，随着羅馬国家的疆域的扩展，民族就越来越分裂为两个階級：大多数公民抛弃了軍职，因为軍事远征妨碍他們料理經濟业务，而少数公民則完全抛弃了任何經濟业务，把軍事当作职业。这就引起了羅馬政治制度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削弱了它的抵抗力，等等。在这里軍事力量与一定的經濟条件有着密切的因果依賴关系。車尔尼雪夫斯基也強調指出这种依賴关系。他說：“自从历史学家认为必須研究政治經濟学和討論分工以来，他們就在关于羅馬共和国后期和关于羅馬帝国的著作中說明，  
333 由担任家主的公民組成的军队被职业軍人的军队所代替，以及后来担任軍职的意大利人被較不开化的地区的当地人和异族野蛮人所代替，是由什么經濟力量造成的。因此，早就應該抛弃关于羅馬人蜕化的鬼話了，只應該說，大多数意大利居民不再組成在遙远边疆不断作战并駐扎在那里的設防营壘中的军队的主力了。因此，单是羅馬人的大規模征战給军队成分造成的变化，就足以解释羅馬帝国的灭亡和野蛮人之征服意大利了”<sup>①</sup>。

假若車尔尼雪夫斯基彻底地發揮了他在这里所发表的思想，那末他就得完全抛弃他在我們已經熟悉的那篇論羅馬灭亡原因的文章中所表現的唯心主义观点。但是問題正在于，他只是順便发

<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2部分，第4篇，第143頁456。



表了这种思想，沒有进一步加以发挥。他在发表这种思想的时候，完全不觉得有必要抛弃历史唯心主义，但这不是由于他对唯心主义这种哲学理論的偏爱。一般說来，車尔尼雪夫斯基对这种理論是极端反对的。他在发表对于历史发展进程的唯心主义观点时，仍然认为自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是錯了。但是，他的錯誤的根源在于費尔巴哈唯物主义体系的一个主要缺陷。馬克思很清楚地指出：“費尔巴哈想要研究跟存在于我們思想中的对象确实不同的具体对象，但是他沒有理解到人的活动本身是物质性的活动。所以，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只是把理論的活动才看作真正人的活动……”<sup>①</sup>車尔尼雪夫斯基也象自己的老师一样，几乎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人类的“理論”活动上，因此智力发展在他的眼里就成了历史运动的最深刻的原因<sup>458</sup>。在讀到他关于暴力的危害性的論断时，有时可能以为，他不过是想向人类提出一些善良的忠告。他当然并不反对提出善良的忠告。但是他关于暴力所說的話，在他看来还有重大的理論意义。他把暴力看做一种歪曲人类本性的因素。而我們已經知道，对他來說，人类本性乃是他在解释历史  
334  
时向之申訴的主要法庭。

对人类本性，也象对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观点来看。車尔尼雪夫斯基是用唯物主义者的眼光来看人类本性的。但是当他企图把他对人类本性的唯物主义观点应用于解释历史的时候，他在絕大多数場合都不知不觉地得出了唯心主义的結論。不过在他之前，信奉那种我們称之为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的人們，也往往发生这种情况。18世紀唯物主义者历史方面也是唯心主义者。

① 見馬克思早在1845年春写的《費尔巴哈論綱》<sup>457</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自己的历史见解方面，是从这样一个无疑是唯物主义的思想出发的，即认为人是动物，他的机体服从于一定的生理学规律。生理学说道，要使动物的生命正常运行，就必须正常地满足它的机体的需要：“生理学把有机体机能运行的好和坏严格地区分开；它把食欲及其结果、即及时地吃适合机体需要数量的食物，列入有益于机体的这一类生活事实；把饥饿及其结果列入有害于机体的另一类事实”<sup>①</sup>。車尔尼雪夫斯基就是把这种有机体机能运行的好和坏的区别应用于历史。他把暴力斥责为妨碍人类机体机能良好运行的因素之一。但是人类机体机能的运行的好或坏怎样能向我们解释人类进步的事实呢？他是这样解释的：

“生理学证明，假如人的体质比他原先的状况不是降低了，而是增强了，那末人类生活过程中有利于改善他的体质的因素，就多于具有降低体质倾向的因素。生理学只用有利于机体的生活条件对有害于机体的生活条件占优势这一点，来解释人从原始状态进步到他会破开石头来获得劳动工具的那种比较起来很高的智力发展水平。毫无疑问，在实现这种进步的时期内，人们不得不由于饥饿，由于有害的外部自然现象，由于毒虫和毒蛇，由于猛兽，由于自己不审慎的行为，由于相互之间的关系不好，而大受其苦。但无论这些灾祸的总和有多么大，它总是少于有益于人类机体的事实的总和。假如不是这样的话，人的体质就不会增强而会变弱，他就会发生动物学中称之为衰退、体质下降的情况”<sup>②</sup>。

这一段话已经向我们清楚地说明，車尔尼雪夫斯基怎样把生理学的看法应用于解释人类进步的事实。但在这一段话中，这些看法仅仅被应用于所谓史前时期，或者更正确地說，最狭义的前文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2部分，第4篇，第217页459。

② 同上书，第224页460。

化时期，也就是在人会制造石器工具以前的那个时期。在这里車尔尼雪夫斯基也仍然坚持唯物主义观点，虽然这里他的唯物主义也暴露出形而上学的性质。說实在的，車尔尼雪夫斯基以生理学規律为依据，只是重复我們在前面——在分析他論达尔文理論的文章时——已經見到过的論断，即断言有害的东西永远有害，决不可能有益<sup>①</sup>。我們在前面已經揭露了这些見解的理論弱点，这些見解与历史唯心主义有着密切的血緣关系；但在这些見解中，这种唯心主义所特有的性质只是間接地、并且主要是从方法論方面表現出来。要了解車尔尼雪夫斯基怎样从自己的生理学观点轉到历史唯心主义观点<sup>②</sup>，就必须考虑到他的这样一个思想，即：人类机体“机能的良好运行”导致大脑的发达，而大脑則增进人的智力，从而加速他的知識的进步。达尔文說道：“人如果不使用手这种如此惊人地听从他的意志的工具，他就永远不会取得世界上的統治地位”<sup>③</sup>。爱尔維修早就发表过同样的思想。在車尔尼雪夫斯基那里也可以看到这种思想。但是在他那里，这种思想立刻获得了特殊的性质。他指出：“据說(而且大概是正确的)，在手中拿起石块或粗棒并用这种武器来打击敌人的那种本領，增加了人們的安全，使他們有可能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并由于物质生活的改善而获得智力的巨大发展”<sup>④</sup>。在手中拿起某种武器的本領增加了人的安全，使他有可能更好地滿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并从而保证思想器官——大脑的发展。全部問題是在于，由于人的祖先的历史的某些特点，人的头脑获得了無論哪一类型人动物的头脑所达不到的那种发

336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2部分，第4篇，第217頁及以下461。

② 《La descendance de l'homme》 etc., Paris 1881, p. 5. (《人类原始》及其他，巴黎1881年版，第5頁。)463

③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2部分，第4篇，第183頁464。

展。这些特点究竟是什么，则仍然还没有弄清楚。但是很可能，根据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意见，人的祖先由于某种幸运的条件，在敌人的攻击下比其他类似他們的或和他們同样的生物获得了更大的安全。“但是不管靠的是什么方法，人們的祖先由于自己生活的某些有利条件的影响，终于获得了这样高度的智力发展，使他們成为人。他們的生活史仅仅从这个时候方才开始，有关他們的生活史所产生的問題不是具有一般生理学內容的問題，而是专门有关人类生活的問題”<sup>①</sup>。至于說到专门有关人类生活的問題，那末它們在人类史上是由智力和知識的发展所解决的。車尔尼雪夫斯基說道：“人类生活的今后一切进步，其实都可以用智力的优越性来解释”<sup>②</sup>。这里我們极其清楚地看到，車尔尼雪夫斯基在关于人类机体的論断方面这样或那样地坚持唯物主义观点，但只要話題一轉到人类历史，他就怎样立刻变成一个唯心主义者。

他的推論过程就是这样。他从费尔巴哈的这样一个原理开始，即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当人类机体按应有方式获得食物的时候——当外部条件保证他的机能运行良好的时候，——脑力就增强，而随着脑力的增强，人的智力发展能力和形成正确概念的能力也就增长起来。这种能力也就是历史运动的主要原动力。因此，当車尔尼雪夫斯基沒有越出具有“一般生理学內容”的問題范围时，他始終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而只要在他面前出現“专门有关人类生活”的問題，他的生理学唯物主义就为历史唯心主义敞开了大門。車尔尼雪夫斯基的例子几乎比任何其他例子都更好地說明，费尔巴哈的那种唯物主义还多么不适用于解释历史的发展。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2部分，第4篇，第132頁465。

② 同上书，第182—183頁466。

我們已經不止一次地說过，車尔尼雪夫斯基历史观点的唯心主义性质，决沒有妨碍他对某些个别历史現象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假如我們不感到必須提出某种在我們看来是极其自然的保留的話，我們就不会在这里再去重复这一点了。誰打算到我們这位作者的著作中去寻找对个别历史事件的唯物主义解释，他就應該提防犯錯誤，由于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唯心主义的方式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方式在外表上有某种相似之处，有时是非常容易使人犯錯誤的。 337

問題在于，由于車尔尼雪夫斯基过分夸大了人类利害打算的意义，他有时在必須用不受人控制的經濟发展力量去解释历史事件的地方，也用有意識的打算去解释这些事件。驟然看来，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这种解释可能有时会使人产生这样的想法，认为他在自己的历史理論方面完全站在最新的唯物主义观点上。但是，一細心研究这个問題，事情原来完全相反。誰要是在人們的历史活动中只看到有意識的打算的影响，他就仍然还是一个純粹的唯心主义者，他就还远沒有理解“經濟”的全部力量和全部意义。实际上，經濟的影响甚至扩大到那些絕对談不上什么有意識打算的人們的行为和不同社会階級的习惯。最主要的和最有影响的經濟发展因素，迄今为止一向不受有意識的打算的任何控制。人們的一切社会关系、一切道德习惯和一切思想傾向，都是在这些盲目的經濟发展力量的間接或直接的影响下形成的。順便提一下，人的各式各样的利害打算，人类利己主义的一切表現，也都是由它們決定的。因此，决不能把有意識的利害打算說成是社会发展的首要动力。这种历史观是与最新的唯物主义学說相矛盾的。在这种历史观中表现出历史唯心主义的基本特征，即坚信“意見統治世界”<sup>①</sup>。

① 誰要是了解歐文观点，他就知道欧文也过于夸大了利害打算的意义 467。

338

总之，車尔尼雪夫斯基毕生都保持这种信念。因此，我們也就认为他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代表者。誰要是熟悉他的著作，他未必会拒絕承认，在世界文学史上像車尔尼雪夫斯基那样用鮮明的色彩表现出历史唯心主义的作家，还是不多的。但有趣的是，恰恰是在反对基佐的乐观主义的车尔尼雪夫斯基那里，历史唯心主义也带有独特的乐观主义色彩。在他关于暴力的历史作用的論断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我們知道，暴力对于那些蒙受暴力侵犯的部落和民族造成严重的損害。但是暴力不仅对他們造成損害，它对使用暴力的人本身也造成同样严重的損害。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話來說，历史表明，想損害人类而求得自己利益的那些民族的打算是完全錯誤的。“肆行侵略的民族一向是以自己被消灭和被奴役而告終的”<sup>①</sup>。

我們可能要問，能否希望譬如說那些在几乎完全消灭了黑种土人之后迁居澳洲大陆的英国人会“自己被消灭和被奴役”呢？我們觉得，这些英国人目前还既沒有被消灭也沒有被奴役的危險。假如他們总有一天会嚐到被消灭和被奴役的民族命运，那末他們的不幸也未必会同他們对澳洲土人所采取的不正义行动有任何的联系。这是如此显而易见，沒有必要再去多說。車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在历史上罪恶总会得到应得的懲罰。实际上，我們所知道的历史事实，沒有提供任何根据可以证明这个可能是令人快慰的然而无论如何是天真的看法。使我們感兴趣的只是这样一个問題：我們的作者怎么会产生这种看法呢？对这个問題，只要說明車尔尼雪夫斯基生活的那个时代就可以回答。那是社会运动高涨的时代，可以說，那个时代在道义上需要这种看法，去巩固关于邪恶

<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6卷，第233頁468。

必遭失敗的信念。

在車尔尼雪夫斯基从西伯利亚归来后所写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浸透着唯物主义历史观精神的、极其中肯的意見。例如，讀者在韦伯著作第七卷的附录（《論种族》）和第八卷的附录（《論人們按語言的分类》）中，特别是在我們已經引証过的第九卷的附录（《論各民族在民族性方面的区别》）中，就可以找到不少这样的意見。

### 第三篇

## 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 的文学观点

### 第一章 文学和艺术的意义

在車尔尼雪夫斯基看来，人类的智力进步是历史运动的最深刻的推动力。文学是各民族智力生活的表现。因此，也许有人可能预料車尔尼雪夫斯基会认为文学在文明史上起着主要的作用。实际上却不如此。車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在文明史上起主要作用的不是文学，而是科学。他关于科学说道：“它静悄悄地、缓慢地创造着，它创造一切；它所创造出来的知识是一切概念的基础，然后也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它为人类的一切意图提供方向，为人类的一切才能提供力量”<sup>①</sup>。文学则不然。它在历史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决不会是完全不重要的，但它的作用几乎总是次要的。

車尔尼雪夫斯基说：“举例来讲，在古代世界，我们看不到有一个时代，其历史运动是在文学的压倒一切的影响下完成的。希腊人虽然偏爱诗歌，可是他们的生活进程并不是由文学的影响所决定，而是由宗教的、部落的和军事的企求所决定，此外在后来则由政治和经济问题所决定。像艺术一样，文学是最好的装饰品，但仅仅是装饰品而已，而不是基本的推动力，不是他们生活的主要动

<sup>①</sup> 参阅他的著作：《莱辛，他的时代、生平和活动》，《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3卷，第585页469。



力。羅馬的生活是由于軍事和政治斗争、由于法律关系的确定而发展起来的；对羅馬人来说，文学仅仅是政治活动之余的高雅的休息。在意大利的輝煌的时代，当它拥有但丁、阿里欧斯托和塔索的时候，生活的主要因素也不是文学，而是政党斗争和經濟关系；在但丁生前和死后决定他的祖国命运的正是这些利害关系，而不是但丁的影响。英国以拥有基督教世界的最伟大詩人和也許在其余整个欧洲文学界都找不到的这許多第一流作家而自傲，但在英国，民族的命运也从来不是取决于文学，而是由宗教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关系，議會辯論和报纸上的論战所决定的；所謂文学本身总是只对这个国家的历史发展发生次要的影响。几乎在所有历史上的民族那里，文学的地位几乎永远都是这样的”<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只知道很少的几件事可以作为他所指出的一般通例的例外情况。在这很少的几件事中，18世紀下半期和19世紀初期的德国文学占了最重要的位置之一：“从萊辛开始活动起到席勒逝世为止，……在这五十年期間，最伟大的一个欧洲民族的发展，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从萊茵河到奧得河的那些国家的前途，是由文学运动所决定的。应当說，其余一切社会力量和事件对民族发展所出的力，比起文学的影响来，是微不足道的。当时沒有任何东西帮助文学对德意志民族前途发生有益的作用；相反，决定生活的几乎其他一切关系和条件都不利于民族的发展。只有文学领导民族前进，对无数障碍进行斗争”<sup>②</sup>。

显然，車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从果戈里时期开始的俄国文学的作用也同样是特別重要的。在果戈里以前，俄国文学还处于可以

<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萊辛，他的时代、生平和活动》，《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3卷，第586頁470。

<sup>②</sup> 同上书，第586--587頁471。

341

称之为预备时期的那些发展时期；以前的每个时期之所以在俄国文学中具有意义，与其说是由于表明这个时期的文学现象的绝对价值，倒不如说是由于它为下一个时期作了准备。为了说明他的这个思想，只要指出他怎样理解我国文学的普希金时期与果戈里时期的关系就够了。他对普希金的看法，同别林斯基在自己活动的后期对普希金的看法完全一样。他对普希金的诗评价很高，但认为它主要是形式的诗。创造完善的形式，这就是我国文学普希金时期所担负的历史任务。当这个任务得到解决的时候，在我国文学中就开始了新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标志是：内容，而不像以前那样的形式成为主要的东西。这个时期是与果戈里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果戈里时期内，我们的文学开始成为它应当成为的那样，即成为人民自觉的表现。当后来在果戈里的影响下在我国产生了所谓自然学派的时候，我们的文学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我们文学中的这个新方向作了很高的评价。但是这个新方向远没有完全使他满意。他在《果戈里时期俄国文学概观》中做了一个附带说明：

“为了不给人以误会的口实，以为我们是贬低旧的而过分颂扬新的，这里得说明一下：现在这个时期的俄国文学，尽管有一切不可剥夺的价值，它之所以有根本的意义，那多半只因为它是我国文学未来继续发展的准备。我们多么相信将来更好，甚至对果戈里我们都要毫不怀疑地说：我们这儿将会有这样的作家，他们也会像果戈里高于他的先驱者一样，同样也高于他。问题只在于这个时期是不是很快就来到。假如我们这一代的人命定能够盼望到这个更好的将来，这该多么好”<sup>①</sup>。

<sup>①</sup>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2卷，第172页，附注472。

車尔尼雪夫斯基断定文学应该是社会自觉的表现，他发挥了这样一个思想，这个思想从德国传入我国，早从納杰日丁和別林斯基的时代起就在我們的文学批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車尔尼雪夫斯基那里，这个思想立即取得了一切“启蒙运动”时期所特有的理智的性质。老实說，沒有一种文学不是产生它的社会或某个社会阶层的自觉的表现。甚至在所謂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論居于独占統治的时代，在看来艺术家对与社会利益有关的一切都置之不理的时代，文学也仍然表现社会中的統治階級的趣味、观点和意图。上述理論在文学中取得优势的这一事实，仅仅证明在統治階級中間，至少是在艺术家所面向的那部分統治階級分子中間，对重大的社会問題漠不关心的态度占着統治地位。但是，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也只不过是社会的（或階級的，或集团的）情緒、即意識的一种变形。在这个意义上，无疑地，普希金时期的、或者甚至卡拉姆津时期的我国文学都表现了我們的社會意識。但是，在車尔尼雪夫斯基看来，我国文学只是从果戈里时期起才开始表现社会意識。用他的話來說，仅仅从这个时候起，我們的艺术家才不再专门关心自己作品的形式，而开始赋予它們的内容以意义。这好像是不公正的，因为我們决不能认为，普希金对譬如說《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内容漠不关心。但是，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与《欽差大臣》或《死魂灵》之間，在艺术家对被描写的現象的态度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别。普希金并不反对把自己的主人公稍加申斥，責备他們的上流社会生活的空虚、眼界狭小、利己主义等等；但是，在他的《奥涅金》里，甚至連根本否定他所描写的社会生活的暗示也沒有，而在果戈里的上述作品中却可以看到这种根本的否定，虽然这也是作者所不自觉的。車尔尼雪夫斯基也就是把这种否定旧社会制度的因素称为社会自觉的开始。如果說他預料在将来会出现这样

的作家，他們会像果戈里高于他的先驅者一样，同样也高于他，正如我們刚才所看到的那样，那末这在他就等于深信：将来我們的伟大艺术家，由于他們对陈旧的社会制度和家庭制度自觉地采取否定态度，定会远远超过《死魂灵》的作者。在他看来，文学批評的最主要的义务，就是在艺术家中間普及这种自觉性。这种自觉性在俄国艺术家中間越是普及，那末我們的文学也就越是成熟到能够起車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它在当时过渡期間所应该起的伟大作用。

后来皮薩列夫硬說車尔尼雪夫斯基企图毀灭美学。他是錯了。从車尔尼雪夫斯基关于 1854 年出版的奥尔丁斯基的亚里士多德《詩学》俄譯本的文章（《祖国紀事》，1854 年第 9 期）中摘引的一段話，便可以說明車尔尼雪夫斯基离开这样的意图有多么远。“美学是僵死的科学！我們不說再沒有比它更生动的科学，但是如果我們把这些科学細想一下，未始无益。不，我們所称頌的其他科学就远远赶不上它生动有趣。美学是沒有成績的科学！为了答复这点，試問我們还記得萊辛、歌德或席勒嗎，还是自从我們認識了薩克萊，他們便丧失了受我們怀想的权利呢？我們是否承认前世紀后半期德国詩歌的价值呢？”<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向責难美学的人提出了一个帶有諷刺性的問題，即我們是否承认 18 世紀后半期德国詩歌的价值。他好像是在提醒他們說，有一些时代文学起着伟大的社会作用。但是，上述时期的德国文学决不是对美学問題漠不关心的。相反，它在当时非常注重研究美学問題，而只是因为它很注重研究美学問題，它才能成功地起了它所应当担負的作用。不應該忘記，根据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意見，萊辛是这个时期德国文学界最杰出的活动家：“后来

<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1 卷，第 28—29 頁 473。

德国作家中間的所有最卓越的作家，甚至席勒，甚至歌德本人在他最好的活动时代，也都是萊辛的学生”<sup>①</sup>。而萊辛則主要是一位文学和艺术理論家；他作出最大貢獻的領域，就是美学的領域。

車尔尼雪夫斯基說道，如果人們承认詩歌、文学和艺术是极其重要的科目，那末一般文学理論問題也應該具有重大意义。他补充說道：“一句話，我們觉得：反对美学的全部爭論是由于誤会，由于曲解甚么是美学和甚么是一般理論科学”<sup>②</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向讀者問道：“按照您的意見，誰更高一些呢：普希金还是果戈里？”用他的話來說，這個問題的解答取决于关于艺术的本质和意义的概念。而这些概念早在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著作里就已取得正确的形式。因此車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必須向讀者介紹这些思想家的美学理論。作为哲学唯心主义的坚决反对者，我們这位作者当然不能对柏拉图的整个哲学表示贊同。但这并不妨碍他热烈地贊同这位伟大的希腊唯心主义者对艺术所持的观点。

車尔尼雪夫斯基說：“他并不是从学者或演員的观点，而是从社会和道德的观点来看科学和艺术，他看一切也莫不如此。人不是为了要做演員或学者而生活的（像許多伟大哲学家連亚里士多德在內所想的那樣），而科学与艺术應該为人的幸福服务”<sup>③</sup>。

用我們这位作者的話來說，这种观点必然会使柏拉图对艺术采取否定的观点，在柏拉图的时代里，艺术几乎仅仅是美妙而高尚的娱乐，但終究是这样一种人的娱乐：他們无所事事，只是欣賞多少带点色情的图画或塑像，陶醉于多少带点色情的詩篇。对柏拉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3卷，第589頁474。

② 同上书，第1卷，第28頁475。

③ 同上书，第31頁476。

图来说，艺术只不过是娱乐，正是这个事实解答了关于艺术的问题。但当柏拉图把艺术看做娱乐的时候，他却并不诽谤艺术。为了证明这一点，車尔尼雪夫斯基引证了“一位极严肃的诗人”席勒的话，席勒当然不是敌视艺术的。根据席勒的意见，康德把艺术称为游戏(das Spiel)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只有在游戏的时候，人才是完全的人<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柏拉图反对艺术的论争是极其严酷的；但是他看到其中有許多正确的东西。他指出：“不难表明，柏拉图許多严厉的指摘甚至对现代艺术来说还是正确的”<sup>②</sup>。我们恐怕不需要再补充一句，他所以对柏拉图的严厉指摘表示热烈赞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种情况所引起的。

柏拉图反对艺术，是因为艺术于人无益。我们的作者准备指责于人无益的艺术，并不亚于柏拉图。根据他的意见，认为艺术不应该是有益的、认为艺术只是为自己本身而存在的那种思想，是一种怪诞的思想，正如说“为财富而财富”、“为科学而科学”等等一样。“人类的一切事业，如果不想成为无聊懒散的职业，都应该为人类的利益服务；财富是为了人使用它而存在，科学是为了指导人而存在，那末艺术也应该用于主要的用途，而不是用于无益的娱乐”<sup>③</sup>。

艺术给人带来的利益是什么呢？

通常说，审美快感使人的心情舒畅，使人的灵魂崇高起来。車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这个思想是正确的，但他并不想从此引伸出艺术的重大意义。当然，他同意：从画廊或剧院出来，人总觉得自己

① 席勒关于美感起源于游戏的论点，见他所著《论人的美感教育书》第十五信及以后。——译者

②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卷，第32页477。

③ 同上书，第33页478。

更善良、更美好，至少是在他所获得的审美印象还没有消失的那个短暂的时间内有这样的感觉；但是他提醒说，要知道吃饱饭的人也总比挨饿的人更善良。因此，从这方面来说，艺术的影响和满足人的肉体需要对人所起的影响并无区别。車尔尼雪夫斯基说道：“就艺术而论艺术（不论其作品内容如何），它的德性影响差不多全在于艺术是使人愉快的东西；但是‘愉快心情’所依赖的其他一切使人愉快的职业、关系、事物，都有这种促进德性的性质。健康的人远比病人更不自私、更加善良，病人往往比较容易发怒，事事不满，良好的寓所也比潮湿、阴暗、寒冷的寓所更能使人向善；宁静的人（也就是并非处于不愉快境况的人）总比苦闷的人更加善良，如是等等”<sup>①</sup>。如果对事情用心想一下，就不难相信，作为满足的泉源之一的艺术所带来的益处，虽然是无可置疑的，但是比起其他有利的关系和生活条件所带来的益处，毕竟是微不足道的。而且艺术的伟大意义也不在于此。这种伟大意义在于：艺术在这样那样地对它感兴趣的人群中间传播大量知识；它使人们认识科学所制定的概念。但是，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谈到这一点时，本来指的是诗歌，他把诗歌称为艺术中最严肃的一种，因为据他的意见，其他艺术在上述意义上做得很少。无可怀疑，只有很少小说家抱定目的要在自己的读者中间传播知识。但是，他们按自己所受的教育来说毕竟高于他们的大多数读者，所以大多数读者毕竟能从他们的作品中知道许多东西。車尔尼雪夫斯基深信，甚至最庸俗的小说作品也大大地扩大它们的读者的知识范围。诗歌在“使读者群众‘得到消遣’的同时”，对他们的智力发展是有裨益的。这就是为什么诗歌在思想家眼里获得重大的意义。这也就是为什么与柏拉图的看法

<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卷，第33页。

相反，甚至当诗歌并不关心这一点的时候，它也具有这种意义。

346

总之，車尔尼雪夫斯基决没有毁灭美学。相反，他依据美学来向艺术家阐明艺术的伟大意义，这种意义正在于传播科学所制定的概念。换句话说：我们的作者没有毁灭美学，而只是对美学理论作了一番根本的重新审查。我们从他那儿听到柏拉图对艺术的观点以后，我们就不难了解，为什么在解决普希金或果戈里孰高的问题时，他认为援引自己“在审美判断问题上的伟大导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意见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了。因此下面这些话已经毫不使我们感到惊讶：“假如艺术的本质确实是在于今日之所谓理想化，假如艺术的目的在于‘提供愉快的和崇高的美感’，那末在俄国文学上就没有一个诗人比得上《波尔塔瓦》、《鲍利斯·戈都诺夫》、《青铜骑士》、《石客》及无数香艳诗章的作者了；但是假如对艺术还有别的要求，那末……”——車尔尼雪夫斯基用对旧的美学概念怀有偏爱的读者的名义，提出下面这个困惑莫解的问题打断了自己的话：“但是，此外，艺术的本质和意义还在于甚么呢？”<sup>①</sup> 我们知道，根据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意见，艺术的本质和意义何在，因此我们自己可以补足这句被打断的话：如果艺术的目的不仅在于提供愉快的和崇高的美感，那末《钦差大臣》和《死魂灵》就高于《石客》和《波尔塔瓦》，果戈里就高于普希金，而在对待生活的自觉态度方面超过果戈里的那些作家，还将高于果戈里。后来，斯卡比切夫斯基先生在《现代俄国文学史》中关于这里所叙述的观点写道：

“这种把艺术与科学混为一谈并认为艺术起着替科学、哲学和政论的考察提供例证的辅助作用的想法，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个

<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卷，第29页479。



錯誤引起了极其重大的后果。首先，他使批評失去了它所特有的那种充当艺术作品鉴赏者的作用，而在別林斯基时代，批評在發揮这种作用时却得到了这样辉煌的成就……但后来这种把科学和艺术等同起来并认为艺术对科学起輔助作用的理論，被年輕的不成熟的思想家所接受，于是就必然会急轉直下地达到完全否定艺术的地步，我們在以皮薩列夫为首的《俄罗斯言論》的政論家身上就看到了这一点”<sup>①</sup>。

斯卡比切夫斯基先生把“科学和艺术等同論”硬加在車尔尼雪夫斯基头上以后，驚訝地問道：“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謂創作想像力應該起什么作用呢？”<sup>②</sup>人們不能不同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創作想像力真的是沒有地位的。但是“这样的情况”是由斯卡比切夫斯基先生自己臆造出來的。車尔尼雪夫斯基决不把艺术和科学“混为一談”。他这个熟悉黑格尔美学的人，象別林斯基一样清楚地懂得，科学家借助于邏輯論证来叙述自己的思想，而艺术家則以形象来体现自己的思想，也就是求助于“創作想像力”。假如斯卡比切夫斯基先生更好地知道別林斯基和車尔尼雪夫斯基从中汲取自己美学观点的那些哲学泉源，那他就不会犯这个錯誤了。

我們且举一个例子。《怎么办？》这部小說整整一半以上的篇幅都是鼓吹《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一文所叙述的那些同样的思想的。但是在小說里这些思想以形象体现出来，而在論文中它們借助于邏輯論证而加以证明。因此很明显，当車尔尼雪夫斯基写小說的时候，他必須訴諸自己的創作想像力。我們知道，根据許多人的意見，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自己这部小說里很少表现出創造力，但这是另一个問題，在这里与我們无关，順便說一下，大多数讀者

① 該书，第65-66頁。

② 同上书，第65頁。

都是极其轻率地解决这个问题的：車尔尼雪夫斯基本人就曾經声明，他完全<sup>480</sup>沒有任何艺术才能，而人們也就一向情願地相信这一点了。其实他的小说不是沒有某些艺术上的优点（誠然这些优点是不大的）；小说里有許多幽默和观察精辟入微的地方；最后，它还充滿着对真理的这样熾烈的热情，使人們直到今天还怀着很大的兴趣来讀它。只有怀有許多成見（它們基于現在我們这里頗为流行的、根本上錯誤的美学理論）的人，才会对这部小说輕蔑地聳聳肩膀，正如目前許多讀者、甚至是“进步的”讀者所做的那样。但是，我們再重复一遍，这是另一个問題。毫無疑問，在小说里，車尔尼雪夫斯基求助于自己的創造力，而在論文里則求助于自己的邏輯。这已足以向我們显示出斯卡比切夫斯基先生犯了多么大的錯誤。

但是，我們还要举一个例子。托尔斯泰在《伊凡·伊里奇之死》或《主人和工人》那样的作品里，毫無疑問是想要闡述他在思考“生活的意义”时所得到的那些同样的观点。但是在闡述这些观点时，他——象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自己的小说里所做的那样——求助于自己的創作想像力，而不是求助于这种或那种理論的論证。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誰說托尔斯泰在自己这些作品中沒有让他的創造力施展出来呢？誰不把它們列入最卓越的艺术作品之林呢？斯卡比切夫斯基先生在根本沒有把科学和艺术混同起来的地方看到了这种混同。

斯卡比切夫斯基先生认为，这种臆造出来的車尔尼雪夫斯基的錯誤，使批評失去了它在別林斯基时代所起的作用，他的这种想法由于极其曖昧含糊而令人完全不能滿意。別林斯基果真是“艺术作品鉴赏家”。然而車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理論——就本身而論——也決不排斥对艺术作品的評價。贊成这种美学理論的批評

家倾向于忘却关于他們所分析的作品艺术优点問題，而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于这些作品的思想，这样說是公正的。再例如在皮薩列夫那里，車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理論取得了漫画的形式，这样說也是公正的。但这是由于当时的社会条件所造成的，車尔尼雪夫斯基对此当然完全不負任何責任。就其本身而論，他的美学理論并不排斥对艺术作品的美学价值的兴趣。这就足以向我們表明，斯卡比切夫斯基先生对于这种美学理論的批評是多么不恰当了。

車尔尼雪夫斯基美学理論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认为“美”不能完全包括艺术的内容这一思想。他在《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这篇学位论文里詳尽地發揮了这个思想，并且在他的《果戈里时期俄国文学概观》中不止一次地回到这个思想上来。他在該书中說道：

“在人的每一种行动中都貫穿着人的本性的一切追求，虽然其中之一，在这方面也許特別使人感到兴味。因此連艺术也不是因为对美（美的观念）的抽象的追求而产生的，而是活生生的人的一切力量和才能的共同行动。正因为是在人的生活中，例如，对于像真理、爱情和改善生活的要求，总是大大比对于美的追求更强烈，因此艺术不但一直是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这些要求（而不是一种美的观念），而且艺术作品（人的生活的作品，这点是不能忘記的）也几乎总是在真理（理論的或者实践的）、爱情和改善生活的要求的大力影响下产生的，因此对美的追求，照人的行动的自然規律說来，总是人的本性中某种要求的表达者。一切价值很卓越的艺术創作，一直都是这样产生的。脱离现实生活的抽象的追求，是没有力量的；因此，当对于美的追求通过抽象方式（使它和人的本性的其他要求分裂开来）变本加厉时，那么，甚至在艺术方面也不可能

产生什么卓越的作品。历史上还没有过专门以美的观念创造出来的艺术作品；假如现在有、或者过去有过这样的作品，那么同时代人是不会给它什么注意的，而且它也要被历史所忘却，因为这太脆弱了——甚至在艺术方面也是太脆弱的”<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这个思想也是正确的，虽然它也带有某种抽象性。历史上确实还没有过仅仅表现美的观念的艺术作品。顺便说一下，这也就驳倒了这样一个思想，即认为我国文学的普希金时期的特点是诗歌追求唯一完善的形式。但问题却不在于此。科学的美学的任务并不限于确认以下这个事实，即艺术总是不仅表现美的“观念”，而且还表现人的其他追求（对真理、爱情等等的追求）。它的任务主要是说明：人的这些其他的追求怎样表现在他的美的概念中，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自身发生改变的这些追求怎样使美的“观念”也发生改变。例如，体现在譬如说圣玛利亚形象中的中世纪所特有的美的观念，它本身是在僧侣中间占统治地位的那些理想的影响下形成的，而大家都知道，僧侣则在当时社会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在文艺复兴时代，以同一个形象体现出来的美的“观念”却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性质，因为它那时表现出具有完全不同理想的那些新社会阶层的愿望。这一点现在是人所共知的。当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自己的学位论文中下定义说美就是“生活”的时候，他也无疑地注意到这个事实。他写道：“任何事物，凡是我們在那里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sup>②</sup>。但假如这是正确的——而且这的确是完全正确的——那末事情会成为怎样呢？是否艺术一方面体现我们的美的观念，而另一方面——甚至象車尔尼雪夫斯基所断言的那样，是主要的——则表

350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2卷，第213—214页481。

② 同上书，第10卷，第2部分，第88页482。

現出我們对于真理、美德和改善自己生活等等的願望呢？不，事情往往恰好相反。我們的美的概念本身就滲透着这些願望，并且本身表現出这些願望。因此，不应当把实际上是某个有机整体的东西分解为各个部分。而車尔尼雪夫斯基由于所有“启蒙运动者”所特有的偏重理性，有时把这个有机的整体分解成它的各个組成部分<sup>①</sup>。他这样做就犯了一个理論錯誤。而他的这个理論錯誤确实可能使、而且有时已經使他的批判具有片面的形式。假如說艺术作品除了美的观念以外——因而，也不依赖于美的观念——还表現某些道德的和实际的願望，那末批評家就有权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正是集中于这些願望，而把这些願望在他所分析的作品中以何等程度获得自己的艺术表現的問題弃置一旁。当批評是这样进行的时候，它就必然具有道德說教的性质。在我国，以皮薩列夫为代表的批評犯了許多这样的过失，而且犯錯誤的也不止他一人。由于命运的嘲弄，斯卡比切夫斯基先生本人也不止一次严重地犯了同样的过失。不过，以偏重理性为特征的“启蒙运动”时期的批評，通常都是这样的。为批評辯护，就应当說，在这样的时期內，不仅批評家偏重理性，甚至艺术家也偏重理性<sup>②</sup>。

① 他的《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一书的第十七个論題說道：“再現生活是艺术的一般性格的特点，是它的本质；艺术作品常常还有另一个作用——說明生活，它們常常还有一个作用：对生活現象下判断”（《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2部分，第1篇，第164頁）483。但全部問題在于，这种判断怎样表現出来，以什么形式来做这种說明：以艺术形象的形式，还是以抽象原理的形式？无论某些抽象原理多么正确，它們总不属于艺术的領域。在我們的文学中，別林斯基清楚地闡明了这一点。

② 大卫关于自己說道：“je n'aime ni je ne sens le merveilleux: je ne puis marcher à l'aise qu'avec le secours d'un fait réel”（Delecluze, L. David, son école et son temps. Paris 1895, p. 338）[“我不喜爱也感觉不到神妙的东西，只有靠了实际事实的帮助，我才能順利地前进”（德勒克吕茲：《大卫。他的学派和时代》，巴黎1895年版，第338頁）]（参見《二十年来》文集，第145頁及以下）484。这一点对于像大卫那样的18世紀法国“启蒙运动者”是极有代表性的。

351 車尔尼雪夫斯基对艺术作品的批評,有时过份偏重理性,这一点是无可辯駁的。当我们讀到他贊揚柏拉图对艺术的揭发时,在我们面前就出現这样一个时代的“启蒙运动者”,他自然地倾向于贊同其他一切“启蒙运动”时代的代表人物所采取的对艺术的态度<sup>①</sup>。实际上,車尔尼雪夫斯基对柏拉图当时的希腊艺术的批評并不完全公正。虽然四世紀的希腊艺术已經不再表现出那种鼓舞了波力克利特和費忌的刚勇的公民理想,但是車尔尼雪夫斯基說,当时的艺术家除了多少带点色情的图画、詩歌和雕像以外,沒有任何貢獻,这样說毕竟是过份夸大了。

当車尔尼雪夫斯基駁斥席勒所接受的艺术就是游戏的康德思想时,我們也不能同意他。在車尔尼雪夫斯基看来,“游戏”的概念就等于“无意思的消遣”的概念。但完全不是这样。实际上,游戏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成为无意思的消遣。不仅人做“游戏”,而且动物也做“游戏”。例如,斯宾塞早已正确地說过,猛兽的游戏就包括假装狩猎和假装搏斗。这就是說,动物游戏的内容是由借以維持其生活的那种活动所决定的。我們在儿童那里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根据同一个斯宾塞的正确意見,儿童的游戏只不过是成人的各种不同活动的戏剧表演而已。在幼小的野蛮人的游戏中,可以特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总之,游戏是劳动的产儿,正如馮特在他的《伦理学》中所清楚地說明的那样<sup>②</sup>。而正因为游戏是劳动的产儿,所以它往往远不是无意思的消遣。只有在不从事任何劳动、因而甚至在其“活动”中也显得游手好閑的那些社会階級

<sup>①</sup> 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在关于艺术的見解方面,表明自己是一个典型的“启蒙运动者”——这恐怕是不需要证明的。

<sup>②</sup> 參閱我的《再論原始民族的艺术》一文,載于《对我們的批判者的批判》文集,第380—399頁485。

或阶层那里,游戏才成为无意思的消遣。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游戏也是某种附带的“劳动的产儿”,因为只有存在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情况下,社会中才可能存在游手好闲的阶级或阶层。

如果正象車尔尼雪夫斯基所说,艺术的本质特征是再现生活,那末就绝对应该承认艺术与游戏相近,因为游戏也再现生活,不仅人的游戏而且动物的游戏也再现生活。在游戏中或艺术中再现生活,具有巨大的社会学意义。人们在艺术创作中再现自己的生活,借此为了自己的社会生活而教育自己,使自己适应于社会生活。不同的社会阶级有不同的需求,他们过着不同的生活;因此他们的审美趣味也有所不同。游手好闲的阶级也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中表现出自己生活的空虚。他们的艺术真的只是无意思的消遣;但它之所以是无意思的消遣,并非因为它是完全类似游戏那样再现生活,而仅仅是因为它再现空虚的生活。问题不在于“游戏”,而在于游戏的内容是什么。 352

把艺术看做游戏的观点,再加上把游戏看做“劳动的产儿”的观点,极其鲜明地说明了艺术的实质及其历史。这个观点第一次使我们能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考察它们。我们知道,車尔尼雪夫斯基在刚刚开始文学活动时就作了一次对他来说是很成功的尝试,即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应用于美学。我们有专著阐述他的这个尝试<sup>①</sup>。因此在这里我们所要说的只是:虽然这个尝试对他来说是很成功的,但是在这个尝试中,正如在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历史观点中一样,反映了费尔巴哈哲学的一个根本的弱点:它的历史的方面,或更确切地说,辩证的方面没有得到研究。正因为車尔尼雪夫斯基所掌握的哲学的这一方面没有得到研究,所以他不注

① 参阅《二十年来》文集的《車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理论》一文486。

意游戏这个概念对于艺术的唯物主义的解释是多么重要。

但同时，在車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中——又象在他的历史观点中一样——，我们也发现许多对事物的完全正确的理解的萌芽。例如，请看他怎样成功地阐明美的概念对不同社会阶级的生活条件的依赖关系。我们且从他的学位论文摘引一段完全与这点有关而且真正是精采已极的话：

“在普通人看来，‘美好的生活’、‘应当如此的生活’就是吃得饱，住得好，睡眠充足；但是在农民，‘生活’这个概念同时总是包括劳动的概念在内；生活而不劳动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叫人烦闷的。辛勤劳动而不致精疲力竭的富足生活的结果，使青年农民或农家少女都有非常红润的面庞——这照普通人的理解，就是美的第一个条件。丰衣足食而又辛勤劳动，因此农家少女体格强壮，长得很结实，——这也是乡下美人的必要条件。‘弱不禁风’的上流社会美人在乡下人看来是断然‘不漂亮的’，甚至给他不愉快的印象，因为他一向认为‘消瘦’不是疾病就是‘苦命’的结果。但是劳动不会让人发胖；假如一个农家少女长得很胖，这是一种病态，是体格‘虚弱’的标志，人民认为过分肥胖是个缺点；乡下美人因为辛勤劳动，所以不能有纤细的手足，——在我们的民歌里是不歌咏这种美的属性的。总之，民歌中关于美人的描写，没有一个美的特征不是表现着旺盛的健康和匀称的体格，而这永远是生活富足而又经常地、认真地、但并不过度地劳动的结果。上流社会的美人就完全不同了；她的历代祖先都是不靠双手劳动而生活过来的；由于无所事事的生活，血液很少流到四肢去；手足的筋肉一代弱似一代，骨骼也愈来愈小；其必然的结果是手足纤细——社会的上层阶级觉得唯一值得过的生活，即没有体力劳动的生活的标志；假如上流社会的妇女大手大脚，这不是她长得不好就是她并非出自名门望



族的标志。因为同样的理由，上流社会美人的耳朵必须是小的。偏头痛，如所周知，是一种有趣的病，——而且不是沒有原因的；由于无所事事，血液停留在中樞器官里，流到脑里去；神經系統由于整个身体的衰弱，本来就很容易受刺激；这一切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經常的头痛和各种神經的疾病；有什么办法！連疾病也成了一件有趣的、几乎是可羨慕的事情，既然它是我們所喜欢的那种生活方式的结果。不错，健康在人的心目中永远不会失去它的价值，因为如果不健康，就是大富大貴，穷极奢侈，也生活得不好受，——所以紅潤的脸色和飽滿的精神对于上流社会的人也仍旧是有魅力的；但是病态、柔弱、萎頓、慵倦，在他們心目中也有美的价值，只要那是奢侈的无所事事的生活的结果。蒼白、慵倦、病态对于上流社会的人还有另外的意义：农民寻求休息和安静，而有教养的上流社会的人們，他們不知有物质的缺乏，也不知有肉体的疲劳，反而因为无所事事和沒有物质的忧虑而常常百无聊賴，寻求‘强烈的感觉和激情’，这些东西赋与他們那本来很单調的、沒有色彩的上流社会生活以色彩、多样性和魅力。但是强烈的感觉和熾烈的热情很快就会使人憔悴：他怎能不为美人的慵倦和蒼白所迷惑呢，既然慵倦和蒼白是她‘生活了很多’的标志？”<sup>①</sup>

354

人們的美的概念表現在艺术作品中。我們看到，不同社会階級的美的概念很不相同，有时甚至恰好相反。某个时期在社会中占統治地位的那个階級，也在文学和艺术中占有統治地位。它把自己的观点和概念带进文学和艺术。但是在不断发展的社会中，不同階級在不同时期內占有統治地位。同时，任何一个階級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它发展起来，达到鼎盛时期和統治地位，最后則趋

<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2部分，第1篇，第89—90頁487。

于衰亡。它的文学观点和它的美学概念，也与此相应地发生变化。因此，我们在历史上见到各种不同的美学概念<sup>488</sup>。在一个时代中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和观点，到另一个时代就变为陈旧的了。車尔尼雪夫斯基看出，人们的美学概念归根到底是由他们的经济生活方式决定的。这证明他的看法极有远见。但要把自己的美学理论建立在巩固的唯物主义基础上，他需要更详细地研究他所看出的美学和经济的因果联系，并且至少要通过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些最主要阶段来探索这种联系。如果这样做，他就会完成美学理论方面最伟大的变革。但是，首先，他在自己的研究中所遵循的方法，还没有完善到足以完成这样的理论事业。其次，他作为一个“启蒙运动者”，与其说是对理论本身感兴趣，倒不如说是对同生活实践直接有关的某些理论结论感兴趣。因此，他对美学领域内的意识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了极其富有远见的一瞥以后，立刻避开这个理论问题，而急忙向自己的读者提出合理的实际劝告。他说：

“可爱的是鲜艳的面容，  
青春时期的标志；  
但是苍白的面色，忧郁的征状，  
却更为可爱”<sup>489</sup>。

355 “如果说对苍白的、病态的美人的倾慕是虚矫的、颓废的趣味的标志，那末每个真正有教养的人就都感觉到真正的生活是思想和心灵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在面部表情、特别是眼睛上擦下了烙印，所以在民歌里歌咏得很少的面部表情，在流行于有教养的人们中间的美的概念里却有重大的意义；往往一个人只因为有一双美丽的、富于表情的眼睛而在我们看来就是美的！”<sup>①</sup>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2部分，第1篇，第90页490。

这也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个正确的意見中，与其說指的是依賴于不同階級經濟狀況而可能有的美学，倒不如說指的是“有教养的人們”所應該有的那种美学。在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学位論文中，对于應有的东西的关心，胜过对于为什么有时可能有完全不同的东西这个問題的理論兴趣。这就可以說明下面这个看来十分奇怪的事实：在这位唯物主义者的学位論文中，我們所看到的关于艺术史的真正唯物主义的見解，竟少于例如在絕對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美学》中所看到的这种見解<sup>①</sup>。

但是讓我們回到論亞里士多德的《詩学》的文章上来，那篇文章似乎是对《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这一研究作品的补充。据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意見，亞里士多德对艺术提出的要求不如柏拉图那么高；他对音乐和詩歌的意义的了解，不如柏拉图的那样富有教育意味，甚至——正如我們在談到車尔尼雪夫斯基对黑格尔辯证法的态度时在前面順便說明的那样——有时还未免瑣碎。当亞里士多德用人的摹仿欲来解释艺术的起源时，我們这位作者是不同意他的意見的。但是他很喜欢亞里士多德对哲学和詩歌的关系的看法。他說：“亞里士多德认为：詩是从总的观点来描写人生的，它所表現的不是人生的偶然的和渺小的瑣事，而是人生中最本质的最有特征的东西，所以詩具有甚多的哲学价值。照他看来，詩在这方面甚至比历史高明得多，历史須不加选择地去記載重要的和不重要的、本质而特征的和偶然而沒有內在意义的事实；詩所以比历史高明得多，是因为詩是从內在联系來表現一切，而历史則不顾

356

<sup>①</sup> 參閱黑格尔关于荷兰繪画史的意見，任何一个現代唯物主义者——辯证論者几乎都可以无条件地同意这些意見（《Aesthetik》，1-er Band, S. 217, 218, B. II, S. 217—223〔《美学》，第1卷，第217、218頁，第2卷，第217—223頁〕）491。在他的《美学》中还散布着許多类似的意見。

任何内在联系，只按年代次序来叙述彼此毫无共同之点的各种事实”<sup>①</sup>。

大家知道，由于同样的原因，莱辛也喜欢亚里士多德的这种观点，因为这种观点使人在理论上有可能向诗歌提出这两位“启蒙运动者”所如此珍视的“说明生活”的要求，或完全确切地说，对生活下“判断”的要求。当然，实际上人们可以在如黑格尔在自己的《美学》中所赋予的以及我们在别林斯基有关这个问题的论断中经常看到的那种纯理论的意义上去解释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的。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象莱辛一样，是以“启蒙运动者”所珍视的实践倾向来解释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的<sup>②</sup>。

作为一个主要关心实际结论、因而不很打算全面考察这些结论的理论基础的“启蒙运动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往往并不为他所反对的美学理论说句历史公道话。

车尔尼雪夫斯基象莱辛一样，由于完全不言而喻的原因——至于说到莱辛，那末梅林在著名的《Lessings-Legende》<sup>③</sup>一书中已经很好地作了解释，——而不喜欢“拟古典主义派理论家”，但如果要考察这些原因，会使我们在这里离题过远。他有时把这些理论家老实说完全没有犯过的一些过失归咎于他们，如果他稍微对他所研究的美学问题的历史方面多加注意的话，那他自己也会容易地确信这一点。下面有一个明显的例子。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美术叫做摹仿的艺术。关于这一点，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有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卷，第36—37页492。

② 也许，在这里提醒大家注意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历史的下面这个附带说明将不是多余的：“然而，亚里士多德关于历史的意见，这里须得说明一下：这意见只适用于他那时代的人所知道的这种历史——当时的历史著作根本就不是历史而是编年史”（《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卷，第37页）493。

③ 《莱辛传奇》

必要着重指出，这两位哲学家所說的“摹仿”和被拟古典主义派看作艺术本质的“摹仿自然”只有很少共同之点。他說：“是不是柏拉图，尤其是亚里士多德——所有巴蒂、波瓦洛、賀雷西等人的老师——认为艺术的本质不在于摹仿自然，像我們讲到摹仿說时总慣于补充这句话那样呢？是的，无论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都认为艺术的尤其是詩的真正内容完全不是自然，而是人生。认为艺术的主要内容是人生——这伟大的光荣应该归于他們，在后世只有萊辛一人曾說过这种見解，而他們所有的弟子都不能了解。亚里士多德的《詩学》沒有一字提及自然；他說人、人的行为、人的遭遇就是詩所摹仿的对象。只有当萎靡虛伪的写景詩……以及跟它分不开的教誨詩这两种曾被亚里士多德排斥于詩歌之外的詩体鼎盛之时，‘自然’这个补足語才有可能被采納于詩学之中。真正的詩人絕不会摹仿自然，他的主要对象是人。‘自然’只有在风景画中占主要地位，而‘摹仿自然’这句话最早也是出于画家之口”<sup>①</sup>。

接着車尔尼雪夫斯基还說明，据普林尼所說，这句话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說的：当时李西普問画家欧龐帕斯說，应该摹仿哪一位伟大画家，欧龐帕斯却回答說，应该摹仿的不是画家，而是自然本身。我們的作者从这几句话正确地作出結論說，画家的范本应该是一般的生动的现实，而不是狭义的自然。但是問題正在于，“拟古典主义派理論家”也是在同样的意义上去理解“摹仿自然”的。我們將援引波瓦洛的話作为证明，而車尔尼雪夫斯基是把他列入似乎把人遺忘了的作家之林的。波瓦洛在《Art poétique》<sup>②</sup>的第三首詩中，向作家提出以下的忠告：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卷，第38—39頁494。

② 《詩的艺术》

Que la nature donc soit votre étude unique,  
 Auteurs, qui prétendez aux honneurs du comique.  
 Quiconque voit bien l'homme, et, d'un esprit profond,  
 De tant de coeurs cachés a pénétré le fond;  
 Qui sait bien ce que c'est qu'un prodigue, un avare,  
 Un honnête homme, un fat, un jaloux, un bizarre,  
 Sur une scène heureuse il peut les étaler,  
 Et les faire à nos yeux vive, agir et parler.  
 Présentez en partout les images naïves;  
 Que chacun y soit peint des couleurs les plus vives.  
 La nature, féconde en bizarres portraits,  
 Dans chaque âme est marquée à de différents traits,  
 Un geste la découvre, un rien la fait paraître.  
 Mais tout esprit n'a pas des yeux pour la connaître.①

① (因此,你們,作家啊,若想以喜劇成名,  
 你們唯一钻研的就該是自然人性,  
 誰能善于观察人,并且能鑒識精审,  
 对种种人情衷曲能一眼洞察幽深,  
 誰能知道什么是风流浪子、守財奴,  
 什么是老实、荒唐,什么是糊塗吃醋,  
 那他就能成功地把他們搬上劇場,  
 使他們言、动、周旋,給我們妙呈色相。  
 搬上台的各种人处处要天然形态,  
 每个人像画出时都要用鮮明色采。  
 人性本怪离光怪,表现为各种容顏,  
 它在每个灵魂里都有不同的特点;  
 一个輕微的动作就泄露个中消息,  
 虽然人人都有眼,却少能識破玄机。)

(參閱波瓦洛:《詩的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54—55 頁。… 譯者)

在这里再明显不过的是，波瓦洛正是把“自然”理解为人。在 358  
下面这段话里，这一点也是同样明显的：

Aux dépens du bon sens gardez de plaisanter.  
Jamais de la nature il ne faut s'écarter.  
Contemplez de quel air un père dans Térence  
Vient d'un fils amoureux gourmander l'imprudence;  
De quel air cet amant écoute ses leçons,  
Et court chez sa maîtresse oublier ses chansons.  
Ce n'est pas un portrait, une image semblable,  
C'est un amant, un fils, un père véritable.<sup>①</sup>

当波瓦洛說无论如何也不应该离开自然的时候，他的话显然有着这样的意思：应当尽可能忠实地描写人的本性。波瓦洛举特伦修斯为例；但是，在他看来，特伦修斯正是作为一个巧妙地再现人（父、子、情郎等等）的本性的艺术家，才值得人们摹仿。而且在17世纪，人们也不可能把描写自然放在描写人生之上。人们对人生太感兴趣了。他们的全部注意力几乎都集中于人生，甚至该世纪的风景画也把自然挪到次要地位。直到19世纪20年代末，法国风景画家才把注意力从人转向自然；而且这个转变其实也并不意味着画家开始对自然比对人更感兴趣，而是意味着现在他们开

① [切不可乱开玩笑，损害着常情常理；  
我们永远也不能和自然寸步相离。  
你看特伦修斯写的是怎样一个严父  
看见儿子讲恋爱痛骂着小子糊涂；  
小情郎听着严训又怎样恭敬有加，  
一跑到情妹身边就忘了那些废话。  
这不仅是一幅图，一个近似的小影，  
却是真正的情郎，真正的父子真形。]

（参阅上述中译本第57页。——译者）

始对他们过去不大感兴趣的人的精神生活的其他方面感兴趣了<sup>①</sup>。但是，我們再說一遍，在車尔尼雪夫斯基看来，正如在“启蒙运动者”看来一样，这些历史细节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他认为重要的是以下这个在他看来具有重大实际意义的結論：“称艺术为现实底再现（用现代术语是不能恰当地表达希腊文 *mimêsis* ‘摹仿’这字的涵义的），总比說艺术在作品中体现了仿佛在现实中沒有的我們的完善的美的观念，更正确些”<sup>②</sup>。車尔尼雪夫斯基發揮了自己的这个思想，他断定說，不应当认为，似乎艺术既然承认再现人生是自己的最高原則，它就不得不制造现实的庸俗的照相，而拒絕任何的理想化。車尔尼雪夫斯基承认理想化，但他对这个概念提出了自己的定义。如果理想化在于使被描写的对象和性格变得所謂高尚化，那末理想化就等于古板、夸张和矯揉造作：“唯一必要的理想化應該是从詩歌作品中消除完美的画景所不需要的那些細节，哪怕这些細节是多么美”。这当然也是絕對正确的。

我們不去涉及——我們在另一个地方已經分析过——車尔尼雪夫斯基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詩学》所发表的和他在自己的学位論文中所重复的其他美学观点，仅仅再談一点。車尔尼雪夫斯基指出，亚里士多德以为悲剧作家高于荷馬，并认为荷馬的史詩在艺术形式方面远逊于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的悲剧。我們的作者完全同意这位希腊哲学家的这个观点，并且从自己这方面认为只需要对他的观点补充一个意見：他认为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的悲剧

① 参閱《Histoire du paysage en France》, Paris〔《法国风景画史》, 巴黎〕1908年版論文集中有关法国风景画的文章，其中有罗森塔尔的讲演稿：《Le paysage au temps du romantisme》〔《浪漫主义时期的风景画》〕和沙尔·索尼埃的論文：《Jean-François Millet》〔《让-弗朗斯瓦·米勒》〕。还可以参閱弗罗曼滕的《Les maîtres d'autrefois. Belgique—Hollande》, 8-e édit., Paris〔《过去的大师們。比利时—荷兰》, 巴黎第八版〕1896年, 第271頁及以下。

②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 第1卷, 第39頁495。



比起荷馬的史詩來，不僅在形式上、而且在內容上也是不可比擬地更富有藝術性。他問道，現在是否已經到了這樣的時候，我們應當學亞里士多德的榜樣，而不以虛偽的恭維態度來看待莎士比亞。他說，萊辛當然把這位偉大的英國劇作家置於曾經存在於世的一切詩人之上；但是，現在當我們已經沒有必要反對人們過於熱心地摹仿法國擬古典主義派作家，當我們有了萊辛、歌德、席勒、拜倫的時候，就完全可以容許對莎士比亞採取批判態度了。“歌德可不是也承認《哈姆雷特》有改寫之必要嗎<sup>496</sup>？席勒也許不見得不善於鑑賞吧，他卻要改動拉辛的《菲德洛》，也要改動莎士比亞的《麥克伯斯》呢。我們對於早已過去的时代是不偏不倚的：為甚么獨迟迟不敢承認不久以前是詩歌更高度发展的时代呢？難道詩的发展不是跟着教育和生活的发展并肩前进嗎？”<sup>①</sup>

306

不用說，人們可以而且應該批判地對待莎士比亞，正象他們可以而且應該批判地對待譬如說歌德和托爾斯泰或黑格爾和斯賓諾莎一樣。但能否把萊辛、席勒或拜倫置於莎士比亞之上，——這却是另一個問題。我們不可能在這裡分析這個問題，然而我們畢竟可以說，莎士比亞作為一個劇作家是遠勝於車尔尼雪夫斯基所說的那些作家的。當然，在作出一切文學判斷時都必須不偏不倚；但是不偏不倚的態度並不是要我們必須承認詩歌的成就總是與生活和教育的成就并肩前進的這種想法。不，遠不是永遠這樣。高乃依和拉辛作為藝術家是不可比擬地高於伏爾泰，但18世紀法国的教育和法国的生活却遠遠地勝過前一個世紀法国的教育和生活。或者再舉一個使車尔尼雪夫斯基這個法國擬古典主義派的堅決反對者更為信服的例子：莎士比亞时代的英國戲劇要不可比擬地高於

<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卷，第43頁497。

18 世紀的英国戏剧，这难道还不明显嗎？但要知道英国的教育和生活在这两个时代之間的时期内却已經远远地向前推进了。所有国家的“启蒙运动者”都很容易认为，教育（“学問”）的成就，总是与民族的智力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其他一切方面的成就成正比例。情况并非如此。实际上，人类历史运动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方面的成就不仅不以这个过程的其他一切方面的按比例发展的成就作为前提，而且有时还直接造成其他某些方面的落后或甚至衰落。例如，西欧經濟生活的巨大发展，决定了生产者阶级和社会财富占有者阶级之間的相互关系，它在 19 世紀下半期导致了资产阶级以及表现这个阶级的道德概念和社会意图的一切艺术和科学的精神堕落。在 18 世紀末期的法国，资产阶级还是一个充滿着智力和道德力量的阶级；但这种情况却并未阻止资产阶级在这个时期所創作的詩歌，比过去社会生活較不发展时期的詩歌后退一步。一般說来，詩歌很难与抽象理性和睦共处，而抽象理性則往往是教育的成就<sup>498</sup>的必然結果和可靠指标。但是車尔尼雪夫斯基作为一个典型的“启蒙运动者”，是完全沒有这一类想法的。

## 第二章 別林斯基、車尔尼雪夫斯基 和皮薩列夫

我們在別处說过，如果說別林斯基是我們“启蒙运动者”的鼻祖，那末車尔尼雪夫斯基便是他們最伟大的代表<sup>①</sup>。为了使人易于理解这一点，必須先提一下在什么意义上我們认为別林斯基是我們“启蒙运动者”的鼻祖。

① 《二十年来》文集，第 3 版，第 263 頁 499。

別林斯基在自己有名的“与现实妥协”的时代里，立意要把现实理解为一定的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他当时认为，未被“现实”发展进程本身所证实的理想，即脱离“现实”的理想，乃是某种类似主观任性的东西，既不值得注意它，也不值得对它感兴趣。他的“与现实妥协”只是意味着对这种理想的蔑视。后来，当他已经咒骂自己那篇论鲍罗金诺战役的文章有损于一个诚实作家的令誉的时候，他仍然忠实于黑格尔哲学的精神，这篇文章中使他感到激怒的其实是它的结论，而不是它的基本原理。他说：“我在关于格林卡的《鲍罗金诺战役概论》一书所写的文章里竭力发挥的观念，在原理上是正确的”<sup>500</sup>。但是他现在认为，他没有好好地利用这些正确的原理。“还应该发挥否定的观念，否定作为历史的权利，同样是首要的、神圣的，如果没有它，人类就会陷入发臭的死水潭”<sup>501</sup>。黑格尔既然仍然忠实于自己的辩证法，也就完全承认“否定的历史权利”。从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在这部讲演录中，他在谈到象苏格拉底那样的否定者时，他是这样坚决地表示赞成<sup>①</sup>。但是，在黑格尔那里——还是在他没有背叛自己的辩证方法的情况下——对于某个“现实”的否定，乃是“现实”自身的辩证发展、即它所固有的内部矛盾的发展的合乎规律的产物。要在俄国论证“否定的观念”，就必须揭示和说明：构成这个俄国“现实”的那些社会关系的历史发展，按其本身的内在逻辑，将来怎样必然会导致对于这同一个“现实”的否定，即导致比较符合先进人物理想的新“现实”来代替它。我国当时的社会生活非常落后，因而使別林斯基不可能解决这个极其重要的理论任务。而他按自己的

362

<sup>①</sup> 可能是指黑格尔谈到苏格拉底的方法，即他的辩证法，亦即苏格拉底的讽刺时的赞许态度，并说道：“这种讽刺认为否定的态度是神圣的……”（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7及52页以下。——译者

道德品质来说毕竟不能与“现实”和平共处，他与“现实”保持和平状态只不过是一种停战，所以他就不得不用另一种完全不是辩证的方法来论证他的“否定观念”：他开始从关于人的个性的抽象概念中引伸出这种观念；他认为人的个性必须摆脱“不合理的现实、庸众的舆论和野蛮时期传说的丑恶的锁链”。既然他到这种抽象的概念中去寻找立脚点，他也就从一个辩证论者变为“启蒙运动者”。

我们在我们所知道的每一个“启蒙运动”时期中都可以看到，启蒙运动者在批判他们当时的关系时，通常都是从这些或那些抽象的原则出发的。

从社会政治方面来说，别林斯基思想的这个新方向——他到抽象的个性概念中去寻找立脚点——使他走向了空想社会主义，而从文学方面来说，则使他为席勒恢复名誉，他现在宣布席勒是崇高的人类代言人了。但是他毕竟不是白白地经过了黑格尔的学校：他始终厌恶“挥舞纸剑、活像涂脂抹粉的演员那样的牵强而矫揉造作的唯心主义”。如果说别林斯基在青年时代，在他倾慕席勒的初期，曾经倾慕过席勒的《强盗》，那末他现在已经带着轻蔑态度来看待那些由于马尔林斯基幸运地开其端而顺利地“忽而描写身穿切尔卡斯毡外套的卡尔·摩尔们，忽而描写身穿公务员制服的李尔王们和蔡尔德·哈罗尔德们”的作家了。还在1844年初，他就在《一八四三年的俄国文学》一文中满意地指出，现在“无论人们的才能大小，也无论是庸碌之辈和平庸之徒——全都力求描写现实的人而不是想像的人，但因为现实的人居住在地上和社会中，而不是居住在空中，不是居住在只有幽灵在那里生活的云端，所以很自然，我们时代的作家在描写人的时候也一起描写了社会。社会也是某种现实的东西，而不是想像的东西，所以它的本质不是单由服装

和发式构成的，而且也是由风俗、习惯、概念、关系等等构成的”<sup>①</sup>。在别林斯基一生的最后几年内，他的智力发展朝着西欧哲学思想发展的同一个方向进行，即从黑格尔过渡到费尔巴哈。在他的《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一文中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在那里他叙述了费尔巴哈哲学的某些基本原理<sup>503</sup>。就在那篇文章里，他表示完全赞同自己新的哲学信仰而说道：“如果有人问我们，什么是现代俄国文学的特性，我们就会回答说：它的特性就是越来越密切地接近生活，接近现实，越来越接近于成熟和壮大”<sup>②</sup>。在他逝世以前不久写成的下一年度的文学评述中，他用这样的话来确定我国文学的状况和任务：

“我们的文学是自觉思想的结果，它作为革新而出现，从模仿开始。可是，它并不止步于此，不断地力求走向独创性和人民性，力求从修辞的变成天然的、自然的。这种标志着显著的不断的成功的追求，也就构成了我们文学史的意义和灵魂。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在这种追求上，没有一个俄国作家获得过像果戈里一样大的成功。只有使艺术完全面向现实，排除任何理想的因素，才能够做到这一步。为了这，就必须把全部注意集中于群众，大众，描写普通的人，而不只是那些常常引导诗人趋于理想化、自身带有异国烙印的、一般规则的愉快的例外。这是果戈里的伟大的功绩……这样，他把对于艺术本身的看法完全改变过来了。‘被装饰的自然’这种古老而陈旧的诗的定义，纵然有些勉强地，可以适用于每一个俄国诗人的作品；可是，对于果戈里的作品，却不能这么办。适用于他的作品的是另外一个艺术定义——艺术是现实在其全部真实性上的再现。在这儿，关键是在典型，而理想也不被理解作装饰

① 《别林斯基全集》，莫斯科1880年版，第8卷，第33页502。

② 同上书，第9-10页504。

（从而是谎话），却是作者适应其作品所想发挥的思想而把他所创造的各色典型安排在里面的一种关系”<sup>①</sup>。

364 車尔尼雪夫斯基无条件地赞同別林斯基在这段話中所說的一切，別林斯基的这些思想成为他对俄国文学的一般任务及其在不同发展时代的状况的看法的基础。《果戈里时期俄国文学概观》一书的作者有充分权利认为自己是別林斯基的事业的继承者。当屠格涅夫和其他有教养的“四十年代人士”断定說，車尔尼雪夫斯基及其同道們的說教背叛了別林斯基的批評的遺教时，他們却忽略了“狂暴的維薩里昂”<sup>②</sup>本人在他的晚年也往往以这种說教的精神来发表議論。但是，他們的这个意見也不是完全錯誤的。他們在以下这个意义上是正确的：車尔尼雪夫斯基及其同道們有时从別林斯基的“启蒙”思想作出这样一些結論，这些結論虽然在邏輯上是正确的，却未必会合別林斯基的意，因为別林斯基直到逝世为止仍然在自己的观点中保留許多后来被皮薩列夫戏称为“黑格尔主义外壳”的东西。

別林斯基在我們从他的每年度俄国文学評述中摘引的那些話里所談的“现实”是什么呢？这个现实的概念是否同他过去与之“妥协”的那个“现实”的概念相一致呢？

別林斯基滿意地指出，我們的杂志現在談論得最多的便是现实，他說：“现实这个概念完全是新的”<sup>③</sup>。車尔尼雪夫斯基在《果戈里时期概观》第七篇中引证了別林斯基的这个意見，并认为它完全正确。他說，现实的概念“得到明确以及进入科学中去，还是不久以前的事，就是从只在具体实现中才承认真理的先驗論哲学的模

① 《別林斯基全集》，莫斯科 1880 年版，第 8 卷，第 344—345 頁 505。

② 指別林斯基。——譯者

③ 《別林斯基全集》，莫斯科 1880 年版，第 8 卷，第 33 頁 506。

糊暗示得到我們同时代思想家解释时候起开始的”<sup>①</sup>。他还认为，必須詳尽地叙述这个对现实的新的、简单的、但却是非常有成效的观点。

他說：“有过一陣时候，当时人們把幻想的梦放得比生活中所表現的还要高出很多，当时幻想的力量是被认为漫无边际的。但是現代的思想家却比以前的人更注意观察这个問題，达到了和以前的絕對經不起批評的意見完全对立的結論。我們的幻想的力量是极其有限的，幻想的創造比起现实中所表現的，也是极为貧乏和脆弱的。最热烈的想像也要被关于地球和太阳是橫隔着千千万万里的概念，关于光和电流是极其迅速的概念所压倒；拉斐尔的最充滿理想的人物，其实就是从活人那里描摹来的肖像；神話和民間迷信中最畸形的創造，也远非为自然科学家所发现的怪物那样不像我們周围的动物；从历史，从注意地观察現代生活风习可以证明，活的人們，即使他們并非是臭名昭著的恶棍，或者有德行的英雄，他們所表現的罪恶，也要大大比詩人們所想像的一切来得更可怕，所完成的功績，也要大大崇高得多。幻想应当服从现实；而且，它必須承认，它的最虛幻的創造也只有从现实現象所表現的东西上去抄襲”<sup>②</sup>。

365

这同他的学位論文中所說的完全一样。接着他还說明，现实的現象是多种多样的。在现实中有許多符合人的要求的東西，也有許多违反人的要求的東西。

以前当人們輕視现实的时候，他們以为按照幻想来改造现实是十分容易的。后来他們才看到，事情并不如此。人是十分軟弱的。他的全部力量都依賴于对现实生活的知識，依賴于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利用自然規律的能力。人按照这些規律和自己本性的

① 《卓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2卷，第205頁507。

② 同上508。

特质而行动，就能逐步改变现实并使它适应于自己的意图。否则他就什么也做不到。然而并不是人的一切意图都符合于自然规律，其中某些意图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人其实也没有任何必要去实现这样的意图，因为实现这种意图除了不满和痛苦以外不会导致什么别的结果。所有违反一般自然规律、其中包括违反人类本性的东西，对人来说都是有害的和痛苦的。因此，一个精神健全的人并没有违反上述规律的意图。只有屈服于无益的幻想的那些人，才重视这种意图。“只有现实才给人持久的享乐；只有那些以现实为基础的愿望才有重大的意义；只有现实所唤起的希望和只有依靠现实的力量和条件进行的事业，才可以得到成功”<sup>①</sup>。

366 这是关于“现实”的新概念。在讲到这个概念是现代思想家从先验哲学的模糊暗示中得出的时候，車尔尼雪夫斯基指的是费尔巴哈。他也完全正确地叙述了费尔巴哈关于现实的概念。费尔巴哈说过，感性或现实和真理是同一的，就是说，真实意义上的事物只有通过感觉才能得到。思辨哲学认为，仅仅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事物的观念不符合事物的真实本性，它们应该由纯粹的思维，即不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思维来检验。费尔巴哈坚决反对这种唯心主义观点。他说，以我们的感性经验为基础的事物的观念，完全符合事物的本性。不幸的只是，我们的幻想往往歪曲这些观念，因而它们和我们的感性经验发生矛盾。哲学应该从我们的观念中把歪曲这些观念的幻想成分清除出去；它应该使这些观念和我们的感性经验一致起来。它应该使人类回到未被幻想歪曲的在古希腊占统治地位的对现实事物的直观。如果人类转向这种直观，它就返回自身，因为受臆想支配的人本身只能是幻想的存在物，而不是现

<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2卷，第206页509。



实的存在物。用費尔巴哈的話來說，人的本质是感性，也就是现实，而不是臆想，也不是抽象。哲学和一般科学的任务是恢复现实的地位。如果是这样，那末由此自然得出这样的結論：作为科学的一个部門的美学的任务，也是恢复现实的地位并和人类观念中的幻想成分作斗争。車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观点就是建立在費尔巴哈哲学的这个結論上面的；这个結論就是他的学位论文的基本思想。別林斯基在他逝世前二年写的全年文学評論中称“现实”的概念为新的概念，无疑就是指这个結論。

我們必須为別林斯基以及車尔尼雪夫斯基說句完全公道話：他們从費尔巴哈哲学中作出的結論是完全正确的。但他怎样看待“先驗哲学的模糊暗示”呢？

在黑格尔那里，只有“合理的”东西才被承认是“现实的”。而在費尔巴哈那里，只有“现实的”东西才是“合理的”。驟然看来，似乎这两位思想家說的是同一回事，那末就令人觉得奇怪：为什么車尔尼雪夫斯基在黑格尔的这个思想中只看到模糊的暗示，而在費尔巴哈那里看到这个思想后，却认为它是十分明晰的。但問題也正在于此。

黑格尔的“理性”不是别的，而只是客观发展規律性。黑格尔 367  
是透过唯心主义的三棱鏡来观察这种規律性的。这个三棱鏡有时非常严重地歪曲了現象的真正相互关系——按馬克思的說法，是把这种相互关系头脚倒置起来了；但是，尽管如此，在黑格尔看来，主观意图与合乎規律的客观社会发展进程相符合乃是这种主观意图是否合理的标准。他的哲学的巨大力量也正在于此，別林斯基为了“合理的现实”而厌弃“抽象的理想”的时候，就本能地感到了这种巨大力量。当費尔巴哈要求研究者密切注意摆脱了虛幻臆想的感性时，他只是把黑格尔的这个本质上是正确的、极其深刻的思

想翻譯成唯物主义的語言罢了。而后来由費尔巴哈翻譯成唯物主义語言的黑格尔的这个深刻思想，被馬克思加以适当的加工的时候，它就成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但是，在費尔巴哈本人和他的直接继承者那里，包括別林斯基和車尔尼雪夫斯基在內，翻譯成唯物主义語言的黑格尔的这个思想是非常簡略的；这个思想在他們那里始終沒有得到加工。在沒有得到加工的形式下，这个思想尽管具有唯物主义的本质，却成为对現象的唯心主义态度的泉源。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費尔巴哈向研究者提出的要求具有两重性：首先，他要求研究者对现实采取十分关心的态度，而其次，为了要采取这种关心的态度，他执拗地建議研究者向虛幻的臆想进行坚决的斗争。如果你们假定說，研究者由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的条件，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向虛幻的臆想作斗争，那末出现在你们面前的就不是力求寻找現象的唯物主义基础的理論家，而是为了自己的主观理性而向陈旧的偏見作战的“启蒙运动者”。無論是在別林斯基由于不能論证否定的观念而不得不满足于为了抽象的个性权利向现实作斗争的时候，或是——尤其是——在形成車尔尼雪夫斯基的世界观的时候，这必需的时间和地点的条件在俄国都是具备的。因此，在別林斯基的文学活动的晚期——而在車尔尼雪夫斯基則是从文学活动开始起——，他的政論观点，以及在頗大程度上他的文学观点，都渗透着“启蒙运动者”所特有的唯心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別林斯基在前面所引证的文学評論中称他的“现实的概念”为新的概念，是完全正确的。这个概念比起同一个別林斯基在写論鮑罗金諾战役的文章时对于现实的理解，真是新的概念。那时现实这个詞，在他那里是意味着在俄国存在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由于他不善于揭露它所固有的内部矛盾这一簡單的原因，所以他就认为自己有责任对它表示崇敬。如今在別

林斯基那里,而在他之后则在車尔尼雪夫斯基那里,现实的概念已不再与現存事物的总和的概念相一致了:要知道我們早已从車尔尼雪夫斯基那儿听到說,現存事物往往是方向錯誤的、与现实不符的幻想的产物。因而在他們那里——由于他們是“启蒙运动者”——注意现实首先是意味着注意那种东西,即当人們摆脱虛幻的臆想而开始服从自己本性的規律时可能而且應該存在的那种东西。但假如無論別林斯基或車尔尼雪夫斯基都坚决地建議文学艺术去如实地描写現有的东西,那末他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們坚信:文学艺术愈是如实地描写人們之間的相互关系,人們就会愈加迅速地看出这些关系的不正常,他們也就能够愈加迅速地按照自己本性的要求,即更正确地說,按照“启蒙运动者”的主观理性的指示,去改造这些关系。因此不足为奇,無論在車尔尼雪夫斯基眼里,或是在別林斯基眼里,文学批評的首要任务就是向人們說明文学艺术所描写的人們的相互关系中的不正常的东西。我們在別处說明別林斯基在他的文学活动晚期的观点时曾着重地指出,只有当他抛弃辯证法观点的时候,他才在本质上成为一个“启蒙运动者”,但辯证法直到他臨終时仍然吸引着他。在那里我們还指出,別林斯基有时怎样成功地对文学現象作了辯证的解释<sup>①</sup>。我們現在所以要提醒这一点,是因为我們不願使我們关于別林斯基所說的話得到片面的解释。我們再重复一遍:在別林斯基那儿,辯证法的酵母是非常强烈的——比在費尔巴哈本人那儿还要强烈,——而且他甚至在自己活动的晚期也往往远不是象“启蒙运动者”那样发表議論的。但当他轉到了“启蒙运动者”的观点时,他就以自己通常所有的才能发表了后来由我国六十年代批評界、即主要由車

<sup>①</sup> 參閱我們在《二十年来》文集的《別林斯基的文学观点》一文的結尾510。

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所彻底发挥的那些观点。因此我們也就把他称为我国“启蒙运动者”的鼻祖。

別林斯基說明了和发挥了自己关于现实的“新”概念，他是作为“启蒙运动者”而发表意見的；車尔尼雪夫斯基只須朝着这个方向繼續前进就行了。为了說明車尔尼雪夫斯基怎样彻底地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以及他怎样忠实于他的伟大前辈的“启蒙运动”遺教，我們要援引他对席勒的看法。我們是从他对于俄国詩人所譯的席勒著作的书評（載《同时代人》杂志，1857年第1期）中采用这个看法的。

他在那篇书評中写道：“他的詩永远不会死亡，——这不是某一个舒蒂或格尔貝尔。某些人以自己的虛伪的善良性格自豪，而其实却只有一颗冷酷的心，他們以自己的生活知識自豪，而其实却只有瑣碎細节的知識，他們有时以瞧不起的态度說席勒是一个理想家兼幻想家，有时則甚至敢于暗示說，他的感伤多于他的才能。所有这些话对于我們认为与席勒同一派別的其他詩人來說，可能是公正的，但对席勒却不适用。他本人在《論人类美感教育的通信》里向我們說明了他的詩的性质，闡述了他对于一般詩歌的重大意义的理解。这部著作写于1795年，即写于法国战争的时代，那时不仅德国的政治独立或受人管轄取决于法国战争的結果，而且德国各部族的内部生活問題的解决也取决于法国战争的結果。席勒要想在这部著作中证明，解决社会問題的途徑是审美活动。在他看来，要使現存关系变得更好，就必须先使人在道德上复苏：只有在人心变得高尚的时候，現存关系的結構才可能得到改进。审美活动應該是这种复苏的手段。审美活动應該为智力生活提供高尚而坚定的情操。当以严格的科学来闡述的时候，严峻的灵魂高尚的原則使人們感到吃惊。艺术則使人不知不觉地接受某些概念，

如果这些概念不披上詩的外衣而显示在他面前，那他是不願意认清它們的价值的。詩歌用自己的理想来造成最美好的现实：它使青年迸发高尚的热情，培养青年去从事高尚的实际活动。

席勒的詩确实就是这样。这决不是感伤主义，也不是虛妄幻想的游戏：这种詩的感染力就在于热烈地同情一切使人高尚和有 370 力的东西”<sup>①</sup>。

詩歌應該是使人在道德上复苏的一种手段。某些概念假如不披上詩的外衣，人們就不能认清它們的价值，因此为了使人接受这些概念，詩的外衣是必需的。这就是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基本思想。他用这种思想的观点来評价席勒。席勒作为一个力求借助于艺术作品来对人們进行道德教育的人，受到他的尊重。在前面所引证的那段話里，最精采的是这样一句話：“詩歌用自己的理想来造成最美好的现实”。这里特別明显地表现出启蒙运动者所特有的新的现实概念。最美好的现实是由理想創造的。这种观点与另一种观点正好相反，根据后一种观点，只有在理想表现出现实的客观发展趋势的情况下，理想才对现实发生影响。詩歌使青年迸发高尚的热情，从而培养青年去从事高尚的活动。批評从自己这方面來說，在这一点上帮助了詩歌，因此便成为有时我們所謂的政論的批評。

60年代的批評，例如杜勃罗留波夫的批評，不止一次地变成政論，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因此，在讲到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时候，我們所要援引的与其說是对这种思想的证明，不如說是对这种思想的說明。1858年第3期《雅典尼》杂志的批評栏中发表了車尔尼雪夫斯基的一篇文章：《俄国人去幽会。讀屠格涅夫中篇小說

<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3卷，第5頁511。

〈阿霞〉后的沉思》。这篇文章是政論批評的最鮮明的范例之一。在这篇文章中关于屠格涅夫这篇小說本身，車尔尼雪夫斯基讲得很少，几乎一点也沒談，只說它“几乎是唯一的优秀的新小說”。文章作者所注意的只是小說的主人公向阿霞表白愛情的場面，并由于这个場面而使他“沉思”。讀者当然記得，屠格涅夫这篇作品的主人公在决定性的时刻胆怯了，后退了。正就是这种情况把車尔尼雪夫斯基引入“沉思”。他发现，犹豫不决和胆小怕事不仅是这一位主人公的特性，而且也是我們的优秀文学作品的大部分主人公的特性。他想起罗亭、別尔托夫以及涅克拉索夫的薩莎的启蒙人，并在所有这些人身上看到同样的特性。他并不因此而責备那些作家，因为他们仅仅是指出了现实生活中到处都可以遇到的現象。俄国人沒有勇气，所以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也沒有勇气。而俄国人沒有勇气是由于他們沒有参加社会事业的习惯。“当我们走进社交場合时，我們在自己的周围看到許多穿着軍礼服、大礼服或燕尾服的人。这些人身高五呎半或六呎，而有些人还要高些；他們之間有的人在两頰、上唇和下顎留着鬍鬚，有的人則刮得干干净净。我們于是以为，我們眼前看到的是些男子汉。这是十足的誤解、光学的錯觉、迷惘的幻觉，仅仅如此而已。如果一个男性儿童不养成独立参加社会事业的习惯，不具有公民的感觉，那末他先是成长为中年的男性生物、然后成长为老年的男性生物，然而他不会成为一个男子汉，或者至少不会成为一个高尚的男子汉”<sup>①</sup>。沒有高尚勇气这个缺点在通情达理的有教养的人身上，比起在愚昧的人身上更为触目，因为这样的人喜欢談論重要的題材。他讲得津津有味、娓娓动听，但是一当从言論轉向行动，就不行了。“只要还

<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卷，第97—98頁512。

談不到行动，只要还是仅仅用空談和幻想去充塞閑暇的时间、空虛的头脑或无聊的心灵，这样的人物真是伶牙俐齿；但等事情到了必須直截了当地表示自己的情感的时候，——大多数人物就开始动摇，就感觉到口舌僵硬。极少几个最最勇敢的人还能馬馬虎虎地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用僵直的舌头說出关于他們思想的某种模糊概念。但是，如果有誰想抓住他們的願望，對他們說：你們願意这样，我們非常高兴，你們就开始行动吧，我們支持你們。——在这样的答話下，一半最勇敢的人就会暈倒，剩下的就会很粗暴地責备你，說你使他們陷入了窘境，說沒想到你会提出这样的建議，說他們的头脑全乱了，什么也想不出来，因为怎么能这样快呢，而且他們都是誠实的人，不仅是誠实的人，也是溫和的人，他們不願給你找煩惱，而且难道真的可以为那些闲着无事才談談的一切去操心嗎，最好还是什么也不干，因为一切都同麻煩与不便联系在一起，現在任何好处也不会有，因为，已經讲过，他們無論如何沒有想到也沒有料到，等等”<sup>①</sup>。

这幅画像可以說是出自名家之手。但是，描繪这幅画像的名家，不是批評家，而是政論家。而我們的作者关于屠格涅夫中篇小說的进一步“沉思”，也是完全属于政論家的。屠格涅夫描写的情况，迫使他想起，一切都只取决于条件，而我們所认为的人們的罪过，实际上只是他們的不幸，这种不幸需要通过消灭造成不幸的条件才能得到补救。“需要的不是对个別人的懲罰，而是改变整个等級的生活条件。”《阿霞》这部中篇小說的主人公不仅不是傻瓜，而且簡直是一个在生活中有丰富經歷和观察到許多东西的聪明人。如果說虽然如此但他的举止仍然非常愚蠢，那末这应归咎于

372

<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卷，第90—91頁513。

两个情况，其中一个情况是由另一个情况所制约的：“他不习惯于理解任何伟大而有生命力的东西，因为他的生活过于琐碎而无生气，他所习惯的一切关系和事情也都是琐碎而无生气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胆小，他束手无策地在一切需要下很大决心并作高尚冒险的事情面前退却，这仍然是因为生活使他只习惯于各方面平淡无味的琐碎小事”<sup>①</sup>。要改变人的性格，就必须改变影响性格的形成的那些条件。这个正确的思想，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者的说教中，而后来则在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说教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它合乎逻辑地导向了这样的问题：使决定人的性格的条件变得更好的原因是什么？那些原因是从哪里产生的？马克思由于指明社会经济发展而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而在社会科学中造成了整个的变革。车尔尼雪夫斯基象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通常并不研究这个问题，但他在《俄国人去幽会》一文中却非常接近于这个问题。真的，如果说我们大多数“仁慈的”、“有教养的”人，和屠格涅夫中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就象两滴水那样完全相似；如果说他们全都举止笨拙和犹疑不决，因为他们不能从事聪明而坚决的行动，那末似乎就能得出结论说，号召他们去从事这样的行动，既是无益的也是不合算的。如果要使他们对这样的行动感兴趣，那就应当使他们的性格所依赖的条件变得更好些。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也感到事情是这样的；但他不愿意坚决地承认，事情非如此不可。他说：“我们仍然不愿意对自己说：他们在目前不能够理解自己的处境，他们不能够做出合乎理智的、同时又是慷慨的行为，——而只有以另一些概念和习惯教育出来的他们的子孙，才会象正直的、明理的公民那样行动……不，我们仍然要认为他们能

<sup>①</sup>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卷，第97页514。



够理解在他們周圍和在他們上面所發生的事……”<sup>①</sup>。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車尔尼雪夫斯基不願意承認在他看來理論上無疑是正確的那個結論呢？这也取決于“條件”，即取決于可以說明我國農奴制廢除以前年代的特征的某些“條件”的結合。

車尔尼雪夫斯基把《阿霞》的主人公看做是我國貴族中有教養部分的典型代表者。他沒有任何偏袒貴族的成見，而且也不可能會有這種成見。他在談到《阿霞》的主人公時，暗示自己並非貴族出身，他說：“我們沒有和他攀親戚的那份榮幸，在我們的家庭之間甚至還存在着嫌惡，因為他的家庭蔑視所有與我們相近的人”<sup>②</sup>。但是他承認，他有着某些有利於貴族的文化偏見；他指出，“空洞的幻想，但對我們來說，却仍然是令人神往的幻想”，他覺得，似乎屠格涅夫小說中所描寫的貴族為我們的社會出過某些力，似乎貴族是我們啟蒙運動的代表者。因此，車尔尼雪夫斯基仍然祝“我們的主人公及其伙伴們”幸福，並想向他們提出善良的忠告。他們所處的历史地位即將發生徹底的轉變，他們未來的命運如何，取決於他們自己的意志。車尔尼雪夫斯基向“這些可尊敬的人”說道：“現在對你們來說，幸福還是永遠不幸的問題，就在於你們是否了解時代的要求，是否善於利用你們現在所處的地位”<sup>③</sup>。他認為，時代的要求就是對農民作讓步。車尔尼雪夫斯基用福音書的話勸告那些“可尊敬的”先生：“你應當設法在你的對頭還沒有控告你之前就與他和解。否則他就要把你送給審判官，審判官將你交付執行吏，你就下在監里了，並且在你把最後一文錢還清之前，就斷不能從那里出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卷，第100—101頁515。

② 同上書，第100頁516。

③ 同上書，第101頁517。

来”(《馬太福音》,第5章,第25、26行)①。

374 不必解释就很清楚,人們关于一个社会阶级或阶层采取一定实际行动的能力所做的任何理論結論,总是在一定程度上需要靠經驗来檢驗的,因此只有在一定的、或大或小的範圍內才可以认为它有 a priori<sup>②</sup> 可靠性。例如,可以完全可靠地預言,甚至貴族中那些比較有教养的人也不会同意为农民而牺牲自己的利益。这种預言完全不需要实践的檢驗。然而当需要确定在什么限度內<sup>519</sup> 有教养的貴族为了自己本身的利益能够对农民作出让步时,就沒有人能够完全可靠地預言;他們在这方面不会超过某种限度。这里总是可以推断:在一定条件下,当他們对于自己本身的利益有了更正确的了解以后,他們就会稍微超过这个限度。車尔尼雪夫斯基在我們所关心的那个問題上是一位讲实际的人,这样的人不仅可以,而且應該想办法說服貴族,使他們相信他們本身的利益要求对被解放的农民做某些让步。这样,在他的文章中可能被认为是矛盾的地方实际上不存在有矛盾了。这矛盾的地方在于:一方面要求人們采取明智的坚决的步驟,但同时又承认他們不能坚决、不能明智,并解释說这是条件的必然产物。諸如此类假想的矛盾也可以在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牢固基础的人的政治实践中找到。但是,这里必須附带做一个极重要的說明。当唯物主义者相当慎重地把自己的理論結論运用于实践的时候,他毕竟能够保证,在他的这些結論中有着某些絲毫不容置疑的可靠成分。这是因为在他說“一切决定于条件”的时候,他知道要从哪一方面期待那些在他所預期的方面改变人們意志的新条件;他清楚地了解,归根到底,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卷,第102頁(按普列汉诺夫所引的这段文字,与《新旧約全书》原文有出入。譯者)518。

② [先驗的]

要从“經濟”方面去期待，他对社会的社会經濟生活的分析越正确，他对社会未來发展的預言也就越可靠。信仰“意見支配世界”的唯心主义者却不同。如果說“意見”是社会运动的最深刻的原因，那末决定社会繼續发展的条件就主要是人們的意識活动，而能否实际地影响这种活动，則决定于人們进行邏輯思維和掌握哲学或科学所发现的新真理的能力的大小。可是，这种能力本身是由条件决定的。因此，承认唯物主义的一个真理即人的性格（自然也包括人的观点）决定于条件的唯心主义者，就会陷入迷宫；条件决定观点；观点又决定条件。理論中的“启蒙运动者”的思想从来没有从这个迷宫里掙脫出来。在实践中，通常是通过加强对一切有思想的人的号召来解决矛盾，而不管他們在什么条件下生活和活动。这里我們所讲的，看来好像是些不必要的、因而是无聊的題外話。但是事实上，对我們說来，这些題外話是必要的。它們帮助我們了解 60 年代政論批評的性质。

如果說，“启蒙运动者”的实际期望决定于有思想的人（实质上也就是那些“启蒙运动者”）的智慧和善良願望，那末显然，希望給予这些人以支持的那种批評，首先就会要求文艺作品正确地表現社会生活以及它的一切优点和缺点、“肯定的”和“否定的”現象。只有正确地表現生活的一切方面，才能給“启蒙运动者”提供必要的事实材料，以便对这种生活做出判決。但这不是一切。大家知道，60 年代的批評要求文学艺术对生活的“否定”方面比对生活的“肯定”方面更多注意。它提出这个要求的理由是：在我們社会生活中“否定”現象多于“肯定”現象。这个理由本身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它还是什么也說明不了。在 70 年代里，也象在 60 年代里一样，在我們这里“否定”現象也多于“肯定”現象；然而我們的民粹主义者已經不满足于描写我們社会生活的否定方面，而认为艺术家

也应该描写它的肯定方面。这种看法至少与那些立志描写人民生活的艺术家有关，与所谓民粹派小说家有关。70年代的许多读者认为兹拉托弗拉茨基比乌斯宾斯基高明，只是因为他們觉得兹拉托弗拉茨基在自己的著作中让民粹派所喜欢的农民生活现象（描写农民参加村社的本能）占有很多位置，而乌斯宾斯基则較多地談到可悲的现象（描写在农民中間日益发展起来的个人主义）。因此，  
376 无论70年代的读者或“先进的”批评家——如我們馬上就会在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上看到的那样——对待我們过去十年內描写人民生活的小說都是不公正的。他們认为，这种小說不仅不尊重人民，而且甚至蔑視人民。事情并不如此，这是明显的誤会。但是这种誤会是极其具有代表性的，因此我們应该揭示出它的心理原因。

如果說70年代的民粹派要求小說描写农民生活的可喜现象，那末，部分地用圣书的語言來說，就可以把这称为唯物主义的睿智的起点。民粹派已經意識到——非常模糊地意識到，但毕竟已經意識到，至少是开始意識到——只有表現这个世界的客观发展进程的那些意見，才統治着世界。这也就說明了民粹派对农民生活的“可喜”现象的日益关心，因为他們希望到这些现象中去寻找使他們的理想在未来取得胜利的客观保证。乌斯宾斯基所以使他們感到不快，是因为他向他們指明，这种客观保证远不象他們所希望的那样可靠。但60年代的“启蒙运动者”却不去寻找使理想取得胜利的任何客观保证，因为在他看来，真理的力量、“意見”的抽象的正确性就是这种胜利的完全充分的保证。他当时的小說愈是无情地揭露了人民生活 and 国民性格的缺陷，他就越是願意对它表示欢迎，因为他愈是在小說里看出应该由他“启蒙运动者”来糾正的东西。这种“启蒙运动”心理的特征，也表現在批評中。

1861年出版了烏斯賓斯基短篇小說集的单行本,車尔尼雪夫斯基写了《是不是轉变的开始?》一文來評論这些短篇小說,这篇文章发表在那一年的《同时代人》杂志十一月号。他贊揚烏斯賓斯基的短篇小說絲毫沒有“渲染人民的习俗和概念”。用他的話來說,屠格涅夫和格里果羅維奇在他們描写人民生活的中篇小說里,都犯了这种渲染的毛病。他把这两位作家对人民的态度比作果戈里对阿卡基·阿卡基耶維奇的态度。果戈里避而不談自己主人公的缺点,因为他认为自己主人公的缺点是根本无法补救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維奇是个可笑的白痴……但是說出阿卡基·阿卡基耶維奇的全部真象却是无益的、昧着良心的……他什么也不能替自己干,我們將說服別人去同情他。但假如我們告訴別人关于他可以說的一切,那末他們对他的怜悯就将由于知道他的缺点而减少。讓我們不去談他的缺点吧”<sup>①</sup>。格里果羅維奇、屠格涅夫和他們所有的摹仿者,都完全是这样对待人民的。在他們那里,人民以阿卡基·阿卡基耶維奇的面貌出現,只能对他表示怜悯,責备他就会是殘酷的。他們只談他的不幸:“請看,他是多么溫順和馴服,他是多么順从地忍受欺凌和苦难!他怎样不得不放弃一个人有权要求的一切!他只有多么菲薄的願望!这个备受压制的人多么恭敬地望着我們,我們只要給他一点极小的帮助,对他表示极小的注意,說一句溫存的話,他就会對我們满怀无限的感激,只要給他多么微不足道的補助,就足以使他滿足和感到幸福!請讀一下格里果羅維奇先生和屠格涅夫先生描写人民生活的中篇小說以及他們所有摹仿者的作品——所有这一切都彻头彻尾充滿着阿卡基·阿卡基耶維奇的“外套”的气味<sup>②</sup>。所有这一切都极其优雅。但是这对人民

377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8卷,第342頁520。

② 同上书,第342頁521。

却毫无益处。只有对我们这些由于意识到自己的仁慈而感到快乐的人，才有益处。车尔尼雪夫斯基通过乌斯宾斯基对有教养的俄国人中间的新阶层的出现表示欢迎，这些人对待人民的态度，已经不像多情善感、宽宏大量的贵族老爷对待人民的态度了。车尔尼雪夫斯基一般说来对这个阶层，包括对这个阶层可能创造的文学，寄予很大的期望。这种文学将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农民，就象它看其他身分和社会地位的人一样。车尔尼雪夫斯基力求使他的读者相信，事情也应当这样。他说，“请你们忘掉谁是上等人，谁是商人或小市民，谁是庄稼汉吧，请你们把所有人都只看做人，并且只根据人的心理来评判每一个人，而不要允许自己为了农民的身分而向自己隐瞒真理吧”<sup>①</sup>。

车尔尼雪夫斯基承认，乌斯宾斯基“把俄国老百姓看成糊涂虫”，说他们很难在头脑中把两个独立的思想联系起来。“但是哪个国家的庄稼汉在理解事物的速度方面胜过我们的庄稼汉呢？——他这样问道。——关于德国农民是人人意见一致的，关于法国农民也可以这么说，英国农民大概还不如他们。法国农民由于头脑非常迟钝而博得了全世界的名声。意大利农民则由于对意大利的事业完全漠不关心而闻名于世”<sup>②</sup>。但是谈论农民就是多余的：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来说，他们“在历史上当然只起粗野的作用”，因为他们还“没有脱离留下荷马的史诗、艾达<sup>③</sup>和我们歌颂勇士的诗歌的那个历史时期”<sup>④</sup>。一切等级和一切国家的大多数人都墨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8卷，第345页522。

② 同上书，第356页523。

③ 艾达——13世纪冰洲的文学集之一。——译者

④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8卷，第356页524。我们提请伊万诺夫—拉佐姆尼克先生注意这些话，因为他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俄国民粹主义的鼻祖之一。

守成規地生活着，并且显得极其迟鈍，他們几乎从不超出自己通常的观念范围：“在每一次爭論之后，你們随便問哪一个参加爭論的人，他的論敌們是否說了什么聰明的話，他們對他的思想是否很快理解，是否容易領會。只有在千分之一的場合下，那个人才会告訴你們說，人們聰明地、有条有理地反对他的意見。这就是說，在其余的場合只可能有以下这两种情况：不是跟被問的人爭論的那些人实在头脑糊塗，便是被問的那个人自己头脑糊塗。要知道这种二者择一的抉择适用于一切場合，只有千分之一的例外”<sup>①</sup>。

我們在这儿看到的是把群众看做作战部队中的落伍分子的同一种观点，我們在前面的一节中已經詳細地了解了这种观点。只有进行思維的少数人——按最近的術語來說，就是知識分子——才真正参加运动，他們必須知道群众所固有的一切缺点，以便在将来消灭这些缺点。車尔尼雪夫斯基犯了一个錯誤，他竟认为这种对群众的态度并无任何傲慢之处。但这种态度无疑带有甚至非常强烈的傲慢的因素，可是对一切持有历史唯心主义观点的人來說，这却是完全无法避免的。

但是，不管怎样，极其令人感兴趣的是，过去十年內最著名的批評家之一、我們前面已經引过他的話的斯卡比切夫斯基先生，对于烏斯宾斯基短篇小說的評價，却和車尔尼雪夫斯基有着根本的分歧。斯卡比切夫斯基先生发现，在这些短篇小說中，人民是以难以想像的丑恶面貌出現的。他說：“當你們讀烏斯宾斯基的特写的时候，他的主人公身上的奴性、迟鈍和缺乏任何人的形象和模样，会使你們头昏眼花。你們所看到的是这样的人，他們在自己生活中只遵循粗野的、兽性的肉欲，他們的欲望只是賺錢，或是把錢花

<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8卷，第356頁525。

在小酒馆里，而且在满足这种欲望时，只要一迈步就会做出任何难以想像的蠢事来”<sup>①</sup>。

斯卡比切夫斯基先生的这个评论——象他的其他许许多多评论一样——是完全错误的。烏斯宾斯基的作品有某些夸张之处。这是事实。但是这离开斯卡比切夫斯基先生强加于他的那种对农民的观点还很远。譬如说，我们要问他，难道烏斯宾斯基在短篇小说《老太婆》<sup>②</sup>中所描写的那位农民母亲，真的是非常愚蠢、粗野和象牲畜那样的吗？我们要问他，难道在短篇小说《卡特琳娜》<sup>③</sup>中出现的那位农妇，真的是“难以想像的丑恶”吗？奇怪的是，斯卡比切夫斯基先生没有注意到《薩莎》<sup>④</sup>这篇较长的短篇小说中某些深深感动人的、确实是卓绝的情节。当然，烏斯宾斯基在我们文学中并未占有象泰涅尔和奥斯塔德在荷兰绘画史上所占的那种地位（如安年柯夫所想的那样）。首先，他在才能方面不如他们，其次，他对他描写的现实所采取的态度和他们完全不同。这是一个从事描写人民生活的60年代时期的典型代表者。他并不打算在自己的作品中嘲弄俄国农民。任何一个花过一番功夫仔细读过他的作品的人，都很容易相信，他以自己的方式对俄国农民表示了强烈的同情。但他正是以自己的方式，即作为一个“启蒙运动者”，即作为一个感到毫无必要把落后群众加以美化的人，而对人民表示同情的。假如他在农民的性格中看到了一些丑恶的特征，那末他一点也不会感到惶惑不安，而在自己的描写中表现出这些特征，并把它們归咎于車尔尼雪夫斯基经常谈到的那些“条件”。他在《一个农业經理

① 所引的斯卡比切夫斯基的著作，第227頁。

② 《烏斯宾斯基全集》，莫斯科1881年版，第1卷。

③ 同上书，第2卷。

④ 同上书，第1卷，第417、512頁。



人的札記》中說道：“顯然，受奴隸教育的農民，不可能突然變成名符其實的自由人；農奴制的迷霧和烏煙瘴氣剛剛消散的時候，我們所看到的我國農民是畸形的……農民依然貧窮——而且在粉碎農奴制以後還需要很長的時間來使他們復元……但怎樣復元呢？從一無所有開始，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sup>①</sup>。發表這樣的意見，決不是意味着嘲弄人民；但是，民粹主義者——或是傳染到民粹派的一切偏見的“主觀主義者”——却不可能對這種意見發生好感，因為民粹主義者堅信，農民不是“從一無所有”開始，而是從村社開始的，而村社只要得到熱愛人民的知識分子的有益推動，便會開始朝着社會主義理想的方向迅速發展起來。然而烏斯賓斯基有時講得更堅決。例如，他寫道：“對於現在的農民，即不久前農奴制的犧牲者，沒有什麼可期望的：他們不會覺醒！……醫學將來也未必能醫治好萎糜症，因為這種病的病根是機體的損毀……”<sup>②</sup>。對於這一點，“70年代的人”已經很難同意。這個時期的批評界對烏斯賓斯基的敵視態度主要是由此產生的。

380

讀者或許要問，既然車尔尼雪夫斯基看来当时已认为在不滿廢除農奴制的條件的人民中可能發生廣泛的運動，他是否易于同意烏斯賓斯基對於“現在的農民”完全絕望的觀點呢？我們對於這一點的答复是：當然，如果他認為自己必須無條件地同意烏斯賓斯基，那末這對他來說是不容易的。可是問題在於，他不是無條件地同意<sup>526</sup>。他認為烏斯賓斯基的特寫是十分真實的，但並沒有從此得出絕望的結論。他說：“在普通人民中間象在其他一切等級中間一樣，因循守舊的習慣統治着一般人的日常生活進程；在普通人民中間象在其他一切等級中間一樣，因循守舊的習慣是同樣愚蠢的、

① 《烏斯賓斯基全集》，第2卷，第201頁。

② 同上書，第202頁。

可卑的。烏斯宾斯基先生的功績就在于，他敢于毫无掩飾、毫不夸张地向我們描繪出普通人的守旧的思想、行为和习惯、感情和习惯。描繪出的图景是毫不动人的；到处是荒唐和腐敗、无聊和愚蠢。

但是，您不要急于由此做出結論說，您的希望可靠或不可靠，如果您希望人民的命运得到改善的話；或者說您的担忧有根据或沒有根据，如果您一直从人民的愚昧和萎靡中得到利益的話。您找一个最普通、最平庸、最軟弱、最庸俗的人来看一下，不管他的生活过得多么平淡无味、庸庸碌碌，但在他的生活里总还有另一种色彩完全不同的时刻，精神奋发、刚强果敢的时刻。每一个民族的历史上都可以遇到同样的情况”<sup>①</sup>。

最終决定一切的条件可能是这样安排的：甚至冷漠的群众也能精神奋发和刚强果敢。但在期待这些条件开始有好轉的时刻到来的过程中，需要仔細地研究落后的群众。大胆的决定总不会是平民群众倡議的；但是必須了解組成群众的人們的特性，“以便知道倡議以什么激动人心的方法才能对他們起作用”<sup>②</sup>。文学作品对人民群眾的特性再現得越正确，那末它就越能促进那些在順利条件下倡議重大决定的人們的事业。

現在我們請讀者回想一下，車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學位論文提綱的一条里曾指出，再現生活是艺术的主要标志，而后补充說：“艺术作品常常还有另一个作用——說明生活；它們常常还有一个作用，对生活現象下判断。”我們所引证的話，虽然只是从《是不是轉变的开始？》这篇文章中引来的，但也清楚地表明，以車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文学批評多么珍視生活的再現，主要把这当作解释生活和評判生活(对生活現象下判断)的材料。車尔尼雪夫斯基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8卷，第357頁527。

② 同上书，第346頁528。

的这种倾向也完全表现在他的其他一切文学论文中。例如，他在对普列谢也夫诗集的评论中所说的就是这样（《同时代人》，1861年第3期）<sup>529</sup>。

他不满地回忆起我们轻蔑地、甚至怀有敌意地批评普列谢也夫的那个时期。他说：“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荒唐。在普列谢也夫先生这本小集子的每一页上所浮现着的高尚的感情、高尚的思想，真是当时俄国诗歌方面的极常见的现象，难道可以把它轻蔑地抛弃吗？而且什么时候可以允许这样做呢？”用普列谢也夫的话来说，他写诗的才能不强，他的意向和希望相当不确定。他有很多真诚的心意，但由于他受那些不以他为转移的条件的影响，不能很确切地表达自己的希望。最后，我们所有人都决没有发展到这样高度完善无瑕的程度，以至可以把真诚的呼声叫做无益的东西，虽然这种真诚的呼声只是大体上为人的本性中的美好方面辩护。我们的作者作出结论说：“有许多最平常的概念、人生来就有的感情，是必须不断提醒，才能使它们不被人忘记的。这是在任何地方都需要这样做的，更不用说我们这个没有成熟的社会了。具有象普列谢也夫先生的趋向那样高尚而真诚的趋向的诗人，将永远有益于社会教育，并将找到通往年轻人心灵的途径。很难比他更好地利用他所拥有的那种写诗的才能了”<sup>①</sup>。

诗歌应该为了美好的未来而对人们进行教育，它应该唤起人们的朝气和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卓尔尼雪夫斯基就是这样看的。因此，不足为奇，用他的话来说，他在普列谢也夫的书中特别满意地再三阅读了一首优美的颂诗，这首诗是以下面这几句有名的话开头的：

<sup>①</sup> 《卓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3卷，第121页530。

前进，朋友们，莫畏惧，莫犹疑，  
去建立英勇的功勋！  
我已经在天上看到了  
神圣的苦尽甘来的曙光！<sup>531</sup>

“启蒙运动者”不能不喜爱这样的诗。大家知道，他们偏爱这样的诗，引起了自以为是敏锐的艺术作品鉴赏家的那些人的嘲笑。顺便提一下，看来目前在我們这里，对普列谢也夫的颂诗中所表达的感情采取鄙视态度的时代又一次来到了。

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关于纯艺术的拥护者对我们文学批评中的“启蒙运动”倾向所提出的责难说几句话。纯艺术的拥护者先生们断言——他们现在似乎也并不反对重复这一点——我们的“启蒙运动者”轻视人类的精神需要，而把肠胃的需要置于一切之上。我们已经在别处说过，这简直是荒谬绝伦的谎话。“启蒙运动者”认为，艺术促进正确概念在社会中的传布，因而首先使人得到智力方面的益处。他们最珍视这种益处。在他们看来，物质利益是人民的智力发展的简单结果；大家知道，当鲫鱼不在“瞌睡”的时候，梭鱼并不这么容易吞食它。为了使鲫鱼提前醒来，“启蒙运动者”准备作任何的自我牺牲，而人们却指责他们说，他们只珍视“煮东西的沙锅”。这种荒谬绝伦的谎话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说得出口，他们多少有点不安地担心，当醒来的鲫鱼开始采取措施来反对梭鱼的行为的时候，他们自己沙锅里所盛的东西就不会再这样可口和丰盛了。在卓尔尼雪夫斯基时代，情况是如此；直到目前为止，情况也仍然如此。目前嘲笑诗歌的民间主题的那些人，往往——我们不說“总是”，因为有着由于单纯的考虑不周而造成的例外情况——在“超人”的外衣下掩盖着最粗俗的剥削者的欲望。

然而，在这样說的时候，我們决不想否认，作为 60 年代文学批

評的基础的、主要由車尔尼雪夫斯基所制定的那些原則，在极度的发展中可能导致极为片面的結論。以皮薩列夫为代表，60年代的批評曾不止一次地达到了这样的結論。但是，首先，决不能要車尔尼雪夫斯基为皮薩列夫負責；其次，甚至皮薩列夫也同他的“美学的”論敌經常强加于他的胡言謔語相距很远。 383

皮薩列夫的两篇以《普希金和別林斯基》为标题的文章引起了人們許多議論，他在其中第一篇文章的結尾时說道：“我們在对个别事实的評價方面与別林斯基有所分歧，指出他过分輕信和有着过于强烈的感受性，但同时我們却比我們的論敌們更远为接近于他的基本信念”<sup>①</sup>。

他在这两篇文章中的第二篇文章开头时重复說道：“別林斯基的批評、杜勃罗留波夫的批評和《俄罗斯語言》的批評，原来是同一个思想的发展，这个思想逐年地越来越清除掉一切不相干的杂质”<sup>②</sup>。

什么是別林斯基的“基本信念”呢？什么是皮薩列夫所說的与这些信念“不相干的杂质”呢？要回答这个問題，就必须作一个小小的历史調查。

別林斯基在論捷尔沙文的文章里說道：“真正美学的任务不在于解决艺术应该是怎样的問題，而在于确定什么是艺术的問題。換句話說，美学不應該把艺术說成是某种假想的东西，說成是某种只有按照它的理論才能實現的理想，不，它應該把艺术看做在它以前早就存在的事物，而且它本身的存在也有賴于艺术的存在。”这是完全不愧为以黑格尔辯证法教育出来的人所发表的真正天才的思想。但是，思想是一回事，而实现这个思想則是另一回事。要解

① 《皮薩列夫全集》，第5卷，第63頁532。

② 同上书，第66頁533。

384 决别林斯基向美学提出的这个任务，就必须从各方面去揭露艺术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必须善于用科学的、即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社会生活。但连黑格尔本人也不能做到这一点。别林斯基讽刺地和黑格尔的帽子永别以后，在他自己的文学见解方面有时开始离开了他在论捷尔沙文的文章里所说的黄金律；他有时已经与其说是谈论什么是艺术的问题，倒毋宁说是谈论艺术应该是什么样的问题。简言之：他有时开始作为“启蒙运动者”而发表意见。从这方面来说，卓尔尼雪夫斯基是他的事业的最卓越的继承者。作为一个“启蒙运动者”，卓尔尼雪夫斯基对艺术理论的兴趣，远不及他对从艺术理论中可能作出的那些实际结论的兴趣。但是，据他看来，费尔巴哈哲学提供了调和实践与理论的可能性；有可能把关于艺术应该是什么样的问题的实际思考，放在阐明艺术的真正本质的那种理论的坚实基础之上。美学的实际任务就在于恢复现实界的权利。卓尔尼雪夫斯基在所有的批评意见中，都遵循了他借助于费尔巴哈哲学来论证的这个原理。这个原理本身——即假如抛开别林斯基过去曾向美学提出的那个纯理论的任务不谈的话——完全没有任何的错误。但是，既然承认了这个原理，那就可以毫不违反逻辑地自问一下：为了恢复现实界的权利，就恰恰需要美学、即关于美的科学吗？难道不能借助于其他科学、譬如说自然科学来达到那个目的吗？而且是否可能有美学这门科学呢？

皮萨列夫也提出了这些问题。而且大家都知道，他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是完全不利于美学的。他宣称，美学这门科学是不可能存在的，假如卓尔尼雪夫斯基的学位论文正是讨论美学的話，那末他之所以这样做，“只是为了要彻底消灭美学，并使那些被研究哲学的、不劳而食的庸人所愚弄的人永远清醒过来”<sup>①</sup>。

<sup>①</sup> 《皮萨列夫全集》，圣彼得堡 1894 年版，第 4 卷，第 499 页 534。

皮薩列夫提出下面这个理由来否认美学这门科学的可能性；他觉得这个理由是不可动摇的。“美学或关于美的科学，只有在美具有不以无限多样化的个人趣味为转移的某种独立意义的情况下，才有合理的存在权利。假如美只是我们所喜爱的东西，假如由于这个缘故，所有关于美的形形色色的概念都是同样合理的，那末美学就化为灰烬了。每一个人都建立他自己的美学，因此，把各种个人趣味强制地统一起来的那种普遍的美学，是不可能存在的。《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一书的作者正是要把自己的读者引向这个结论，虽然他并没有十分坦白地说出这个结论”<sup>①</sup>。在唯心主义者看来，这个理由真的好像应该是不可动摇的。假如艺术作品仅仅使我们想起生活中使我们感兴趣的那种东西，假如美的东西就是人在其中看到他所理解的那种生活的东西，那末，在唯心主义者看来，下面这个结论就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美的概念归根到底仅仅以个人趣味为转移，而个人趣味的无限多样性，就使人不可能用科学的观点、即用个人趣味发展的规律性的观点去看待个人趣味。皮薩列夫在这个场合是作为纯粹的唯心主义者而下论断的，他只是忽视了下面这一点，即卓尔尼雪夫斯基抱定决心要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运用于美学。而对唯物主义者来说（只要他始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并在自己的观点中不向唯心主义让步），“意见”并不是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那些变化的最深刻的原因。“意见”的变化和多样性本身是由社会生活中的某些变化所决定的。这就使人也可能用规律性的观点去看待意见的发展。无论一般地说人的意见怎么多种多样，但断言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世界观和自己对所有社会现象的不同的观点，那就是错误的。不，在每个特定的时期，属于某个阶级的人都有着在一定的范围内同样的世界观，并

385

① 《皮薩列夫全集》，圣彼得堡 1894 年版，第 4 卷，第 499 页。

且也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对社会现象采取同样的看法。如果在某个时代的某个阶级内部也出现不同的意见,如果在某个阶级的人们中间可以看到世界观方面的各种细微差别,或是发生新旧世界观的斗争,那末这种在历史上并不少见的情况,也决不妨碍我们用科学的观点,即规律性、必然性的观点,去看待意见的发展。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他们的存在,他们的意见决定于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唯物主义哲学的信徒,车尔尼雪夫斯基承认意识对存在的因果依赖关系,他在自己的学位论文中就证明:作为美的概念的基础的“美好生活”的概念、应当如此生活的概念,在人们那里是依他们在社会中的阶级地位而变化的。他这样做不仅不破坏美学这门科学,而相反,倒是把美学放在坚实的唯物主义基础上,至少是大体上指出了应当到哪里去寻找解决早由别林斯基向关心美学理论的人提出的那个任务的关键。诚然,车尔尼雪夫斯基只是十分概略地指出了解决这个任务的关键,他在自己的文学批评中并没有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因为他正致力于为了“现实”而对“虚幻的梦想”进行斗争<sup>535</sup>。他在自己的文学批评中,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启蒙运动者”,或者像皮萨列夫谈到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者”时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否定学说的普及者。他在这里也象在他的历史论断中一样,抛弃了唯物主义而转到唯心主义观点上去了。希望保卫和进一步发展他的观点的皮萨列夫,仅仅把他看做一个“启蒙运动者”,即仅仅把他看做一个唯心主义者。因此,皮萨列夫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位论文中,除了看到美学的毁灭以外,真的不能看到任何其他东西。他没有怀疑而且也不可能怀疑,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艺术和现实的美学关系的观点,还有其唯物主义的一面,而这一面则有利于认为美学这门科学是可能存在的。假如不论哪一个向他指出这一点,那末他大概会鄙薄地耸耸肩膀说道,在这个场合车尔



尼雪夫斯基还没有能够抛弃掉黑格尔主义的糟粕，正如别林斯基在当时未能抛弃掉黑格尔主义的糟粕一样<sup>①</sup>。

毫无疑问，皮薩列夫进一步发展了車尔尼雪夫斯基以及别林斯基的观点；但他只是从他们犯唯心主义错误最多的那个方面去发展了他们的观点。下面就有一个例子。

我們已經知道，車尔尼雪夫斯基在关于社会生活的见解中，非常乐意采用人性的观点。但因为人性还解释不了社会现象中的任何东西，所以車尔尼雪夫斯基虽然对人性采取唯物主义的观点，却通常不得不轉上唯心主义的基地，遵循“意見支配世界”这个原則来下論断。而当他遵循这个唯心主义原則而下論断的时候，他就再也不願記起社会人的意識决定于他的存在，并且他不得不坚持說，所有的人按其本性來說都是完全一样的。在他論烏斯賓斯基的著作的一篇文章里，他援引了这样一个場面，在这个場面中，烏斯賓斯基笔下的农家姑娘阿連娜·格拉西莫夫娜同办事員謝明·彼得羅維奇作了如下的談話：

“——喂，謝明·彼得羅維奇，人的身体里有些什么东西呢？”

——人的身体里面是不同的。这要看他吃什么东西：有一个人吃的是谷糠，那在他身体里就有谷糠。据說，有一个鞋匠被解剖时还在他身体里发现帶有木片的鞋掌呢。

——多么可怕！……請您向我解释一下，普通人和軍人的身体里是不是一样的？”

——嗯，关于这一点，阿連娜·格拉西莫夫娜，可以再告訴您一件事。首先，应当說，沒有任何一样的东西。

办事員挨着姑娘身旁坐下，开始向她作解释”<sup>②</sup>。

① 參閱《普希金和別林斯基》一文，《皮薩列夫全集》，第5卷，第78—79頁536。

②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8卷，第346頁537。

387

車尔尼雪夫斯基自己則在這篇文章里证明，“人的身体里面是一样的”，并且正象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請求他的讀者忘記，誰是上等人，誰是商人，誰是庄稼汉，而根据人类心理去評判每一个人。

皮薩列夫願意响应这个請求，但由此作出了这样的結論：

“我們的批評如果不以曠野里的呼声去作关于人民性和国民生活問題的說教（它們是很有分寸的美文学所避而不談的），而去更多地注意全人类的問題、个人道德和日常生活关系問題，也許倒会做出很好的成績。任何人都需要弄清楚這些問題；各种陈旧的废物把這些問題弄得模糊而且混乱，不妨把这种废物推往一旁，以便使所有人和每个人都可以用沒有成見的眼光去看神的世界和善良的人們”<sup>①</sup>。

這已經是純粹的“皮薩列夫主义”了，它的特征是：“个人道德”問題比“国民生活”問題更使它感兴趣得多。人們有时认为，“皮薩列夫主义”是一个与車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派別完全沒有任何共同之处的思想流派。这是一个很大的錯誤<sup>②</sup>。实际

① 《皮薩列夫全集》，第1卷，第347頁538。

② 我們的現代俄国文学史家斯卡比切夫斯基先生，在对我們的思想史发表錯誤观点的事情上照例打破記錄。他把“皮薩列夫主义”描写成同18世紀感觉主义非常相像的感觉主义。“正像在摄政时代的法国那样，凡尔赛的花花公子、侯爵和子爵們爭先恐后地以自己思想的新穎互相炫耀，他們讀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的著作入了迷，并且在这些著作中找到了为自己的輕率行为辯解的充分理由，而他們的輕率行为却把他們引向完全破产，后来还把他們引向了断头台，——我們在六十年代的我国也可以看到某种类似的情况，区别仅在于，費尔巴哈和辛希納代替了伏尔泰，而布克尔、路易斯、伏格特、摩萊蕭特等人則代替了百科全书派。同样地，許多贵族子弟宣称自己是新人物，他們在从心爱的作家那儿摘来的引文中，在有声有色地否定所謂‘权威’方面，在蔑視上流社会的习惯和礼节方面，在完全放纵無論什么样的淫欲和怪脾气方面，表現了自己的全部新創造”（所引书，第88頁）。不言而喻，这位前《祖国紀事》杂志的公认的批評家，根本一点也不了解車尔尼雪夫斯基本人的唯物主义哲学距离“18世紀的感觉主义”到底有多远。但与他爭論是毫無益处的。我們所以要充分地着重指出他的錯誤，仅仅是为了說明不应当怎样写我国文学史。

上，“皮薩列夫主义”不是别的，只是从某些不正确的前提中作出的一系列正确的、虽然也是非常走极端的結論，这些前提是卓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不够完善的唯物主义背叛了他（或者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说他背叛了这种唯物主义），并且他自己不知不觉地轉到了唯心主义观点的場合下提出的。皮薩列夫有巨大的文学天才。但是，不管他的論文的文学光輝給沒有偏見的讀者带来多么大的愉快，毕竟还必须承认：“皮薩列夫主义”是某种使我們的“启蒙运动者”产生唯心主义謬論的东西。

388

他对詩人与思想家的区别何在的問題的态度，使人可以最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別林斯基曾說：“每一篇詩作都是掌握了詩人的强有力思想的成果。如果我們假定，这种思想仅仅是他的理智活动的結果，那末我們这样就不仅会消灭艺术，而且也会消灭艺术本身的可能性。真的，要成为一个詩人是很不容易的，假如要当一个詩人只須想出任何一个思想，并把它装进一个臆想出来的形式，那末根据需要、利益或癖好，誰不能成为一个詩人呢？不，按稟性和天賦說来，一个詩人不是这样造成的！一个人要是沒有詩人的稟性，那末不管他想出来的思想多么深刻、真实、甚至神圣，他的作品却仍然是浅薄的、不真实的、虛伪的、畸形的、死板的，它不能說服任何人，而毋宁說会使每个人对他所表达的思想感到失望，尽管这个思想十分真实！可是，一般人却正是这样理解艺术的，他們也正是这样要求詩人的！在閑暇的时候想出一个較好的思想，然后把它加工成为某种虛构，如同钻石鑲金似的。就这样了事！”

他的这段議論只不过是他的基本主題的新的变調而已，根据这个主題的完全正确的涵义，艺术家是用形象而不是用三段論法来进行思想的。皮薩列夫肯定說他只是进一步发展了別林斯基的

基本信念，但他却把诗人和思想家之间的这种区别仅仅看作“对美学神秘主义的非常丰盛的贡献，这种美学神秘主义在诗人和普通的死人之间划下明显的分界线”<sup>①</sup>。他认为别林斯基深深地沾染了美学神秘主义，照他说来，甚至杜勃罗留波夫也没有完全摆脱美学神秘主义。但是他以为，为了驱散这种“神秘主义的迷雾”，只要接触一下冷静的批评就够了。他得到的结论是：任何一个聪明人，只要他愿意费点力去取得一定的技巧，就能成为一个诗人，正如他能成为一个批评家或“一般的语文能手”一样。他坦率地说出这一点：“如果一个人在头脑里有聪明的思想，在自己头脑里善于抓住和研究这些思想并经过锻炼而成为语文能手，——我说，这样的人，只要他愿意的话，便能成为一个诗人，也就是能够创造出一些这样的作品来，它们对读者的影响与真正的、地道的诗人所创造的作品对读者的影响完全一样”<sup>②</sup>。事情并不如此，并非任何一个聪明人都能成为诗人，这点是用不着证明的，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为什么皮萨列夫在发表这个错误思想时认为他只是进一步发展别林斯基的“基本信念”呢？这是因为别林斯基本人有时用“启蒙运动者”的抽象观点去看艺术。例如，他曾说，“莎士比亚通过诗来表达一切，但他所表达的却远非仅仅属于诗”<sup>③</sup>。这使人有理由认为，存在着某一个特殊的领域，这个领域只属于诗，并且可能与另一些不属于诗、但可能“通过诗来表达的”领域相对立。皮萨列夫在使他的读者们相信每个聪明人都能成为诗人的时候，他其实也就是这样想的。显然，他想说，假如不是每个聪明人都能成为诗

① 《皮萨列夫全集》，第5卷，第75页539。

② 同上书，第78页540。

③ 见别林斯基的《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第一篇，译文参见《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1952年版，第426页。 —译者

的領域本身中的能手，那末这并不是什么不幸，因为聪明人把自己鍛炼成語文能手之后，能够“通过詩来表达”許多东西。如果說这时他毕竟沒有在詩的領域本身中显示出巨大的力量来，那末也只有以陈旧的美学概念教育出来的那些庸夫俗子，或者象別林斯基那样还没有彻底抛弃掉“黑格尔主义糟粕”的“半美学家”，才能拿这一点来責备他。皮薩列夫以他所特有的热情和才能来发展和证明这个思想，他有表面上的理由认为自己始終完全忠实于別林斯基的批評。但在实际上，我們再說一遍，他只是忠实于这种批評的軟弱的方面，只是忠实于由于它的某些原理不够完善而引起的缺陷。例如，別林斯基在分析純艺术論时犯的邏輯錯誤所产生的結果，竟被皮薩列夫当做否定学說的最新成就。

假如別林斯基在热烈的論战中沒有修改他自己的理論：假如他懂得，詩的内容和哲学的内容是一样的，而且詩人和思想家之間的區別仅在于一个是以形象来思索、而另一个則以三段論法来进行思索，那末他就会用完全不同的观点来看整个“純艺术”論問題了。在那时他就会說，沒有任何專門的詩的領域；詩永远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希望保持“純洁”的那种詩，只是反映着創作这种詩的社会阶层对社会漠不关心的态度。假如他再前进一步，力求弄清楚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那末他就会看到，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里，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是由极不相同的、甚至是直接相反的原因所引起的，但是所有这些原因全都根源于社会关系，無論与艺术的本质，艺术的“規律”或艺术的技巧都完全沒有直接的关系。要闡明所有这一切，別林斯基就必須彻底地运用唯物主义辯证法去研究人类的美学发展。但在当时俄国的条件下，他却不能做到这一点，尽管他有了不起的天才。因此，我們在他那里只发现唯物主义艺术观的因素。他不能使这些唯物主义的因

应有的发展，所以他在同纯艺术的捍卫者进行争论时，就不得不拿起通常存放在“启蒙运动者”武库里的武器。而在他们的武库里通常只有纯粹唯心主义的论据。这些首先带有抽象性毛病的唯心主义论据，也就是皮萨列夫的论断的基础，这些论断如果在逻辑上贯彻到底，就会使美学遭到“毁灭”。我们在前面说过，决不能要车尔尼雪夫斯基为皮萨列夫负责。我们现在要重复说，这一点也适用于别林斯基：皮萨列夫对他的文学观点所做的修正也同样不能归咎于他。但是，我们还要更进一步，并且说，假如皮萨列夫有时达到荒谬的结论（我们说：“有时”，因为他也并不总是“毁灭”美学的），那末他本人也并没有什么罪过：在这方面有罪过的是唯心主义艺术观站不住脚，这种艺术观事实上或是导致“纯艺术”论者的“神秘主义的迷雾”，或是导致多少会“毁灭”美学的“启蒙运动者”的结论。我们还要说一句话。正因为皮萨列夫把我们六十年代“启蒙运动者”的某些唯心主义的前提引向了荒谬的结论，所以他才成为我们声名狼藉的“主观”方法的创始人。他在为卡尔·伏格特的《Physiologische Briefe》<sup>①</sup>一书而写的《生命的过程》一文中说道：

391 “自然科学不是历史学，完全不是历史学，虽然布克尔也企图把它们归纳为一类。在历史学中，全部问题在于观点，在于作家本人的人道的个性；在自然科学中，则全部问题在于事实……历史学是用作者个人的观点去理解事件的意义；每一个政党都可能有自己的世界史，并且确实有自己的世界史（虽说当然不是所有这些历史都被记录下来），正如任何一个哲学学派都有自己的哲学辞典一样。历史学现在是并将永远是对于通过生活而形成的、在目前

<sup>①</sup> 《生理学书信集》

有其积极意义的某些实际信念的理論证明。关于自然科学当然就决不能这样说；自然界与您对它的想法毫无任何关系；假如您弄错了的話，它就会压伤您或是完全把您压死，正像您在巨大的机器充分运转时离它太近，它的輪子就会把您压伤或压死一样”<sup>①</sup>。

如果在这段話中用“社会学”这个詞来代替“历史学”这个詞——那末你們就会得到声名狼藉的“主观”方法的理論证明。皮薩列夫在把历史学同自然科学对立起来时，重犯了把他引向“美学的毁灭”的那个理論錯誤。他沒有注意到，意識是由存在所决定的，并且假如历史学現在是并将永远是某些实际信念的理論证明，那末实际信念也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由一定的社会关系所制約的，这些社会关系的发展也象动物和植物的种的发展一样，是合乎規律的。以米海洛夫斯基为首的我国主观主义者的全部臆造出来的社会学的深奥道理，就建立在这个理論錯誤的基础之上。斯卡比切夫斯基先生照例沒有看到这一点，所以他一面对皮薩列夫在美学領域內的“破坏性的”功績采取否定态度，一面却非常兴奋地評論米海洛夫斯基的“主观的”发现。他說：“他关于斯宾塞、达尔文和一般社会学方面的文章，不仅具有政論的意义，而且对科学作了重大的貢獻，假如这些文章被翻譯成一种外国文的話，它們就会迅速地使它們的作者获得全欧洲的名誉”<sup>②</sup>。

米海洛夫斯基的某些社会学論文現在已譯成法文，如果我們沒有弄錯的話，还譯成了德文。应当认为，这些文章永远不会給他带来全欧洲的名誉。然而很可能，在那些由于仇視馬克思主义而“回到康德那里去！”的欧洲思想家中間，这些文章会得到其中某个人

① 《皮薩列夫全集》，第1卷，第311頁。

② 所引书，第120頁。

没有什么可夸奖的地方。但是，最值得注意的，倒是这种对于把比较进步的空想主义中的无辜的理論錯誤变为反动派的理論工具的历史的諷刺。

最后，我們认为必須作以下这个在我們看来是极其重要的附帶說明。

假如“六十年代人”是用“启蒙运动者”的眼光去看文学艺术，即首先要求它“对生活現象下判断”，那末这还不是意味着他們沒有艺术鉴别力。至少关于他們的最杰出和最光輝的代表人物如車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皮薩列夫，是决不能这样說的。在他們每个人的著作中——有时恰恰在他們比誰都偏重理性的地方——可以看到一些最无疑义的证据，說明他們有敏銳的文学鉴赏力。即使我們以皮薩列夫來說吧。在他偏重理性可以說达到极頂的同一篇文章里，他順便发表了下面这个評語：“《暗礁》这部在文学价值方面毫无可取的长篇小说，得到了巨大的成功，而列·托尔斯泰伯爵的《幼年、少年、青年》这部在心理分析的精辟和忠实方面非常卓越的作品，却受到人們的冷遇，几乎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sup>①</sup>。托尔斯泰是对所有那些使“六十年代人”强烈地激动的社会問題和个人問題完全漠不关心的人，对托尔斯泰的艺术作品的这个評論表明，皮薩列夫能够做一个很好的“审美”批評家。甚至在他力求使普希金声誉扫地的那些文章里，我們也可以发现类似的評論。甚至在這些文章里也可以看出，皮薩列夫虽然坚决反对“我們的小巧可爱的普希金”的“庸人”观点，却也意識到他的作品的形式的美妙。

如果我們沒有弄錯的話，現在甚至那些對我們的“六十年代

<sup>①</sup> 《皮薩列夫全集》，第3卷，第270頁541。



人”很少好感的人也都承认，杜勃罗留波夫的“政論的批評”对他所分析的作品艺术上的优点是极其敏感的。但是，这些人中間有某些人虽然为杜勃罗留波夫說了这种公道話，然而在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批評文章里却连艺术敏感的迹象都看不到。可是这說的是那些对我們的“六十年代人”很少好感的人。甚至斯卡比切夫斯基先生作为《祖国紀事》杂志的公认的批評家，有意把自己看做全心全意忠实于我們所謂六十年代优秀遺訓的作家，也对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批評作了这样的評論：

“至于說到車尔尼雪夫斯基，那末是他首先提供了根据自己的理論来进行政論批評的例子。老实說，他的批評文章远不如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首先你們可以看到，他的批評文章缺乏那种他的学位論文也同样缺少的东西，即缺乏审美的敏感，因而也就缺乏批評的敏感，而这个缺陷就造成了一系列惊人的失策。例如，車尔尼雪夫斯基由于純粹的党派仇恨，对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剧本《貧非罪》采取非常輕蔑和敌視的态度，同时却非常兴奋地欢迎尼古拉·烏斯宾斯基的短篇小說的发表，把这些短篇小說看作对人民的溫情的理想化的終結和对人民采取现实的清醒态度的开始，而沒有看到尼古拉·烏斯宾斯基的夸张的描写是十分肤浅和粗糙的”<sup>①</sup>。

我們已經說过，尼古拉·烏斯宾斯基的“夸张的描写”远不象斯卡比切夫斯基先生所想的那样坏。現在我們說，車尔尼雪夫斯基对《貧非罪》这部剧本的輕蔑的批評，并沒有妨碍他对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卓越的才能”（他的原話）作应有的評价，而且对《自己人——好算賬》这部喜剧备加贊揚。假如对《貧非罪》这部剧本的評論含有“党派仇恨”的話，那末应当記住，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这个

<sup>①</sup> 所引书，第 66 頁。

場合所仇視的是決不值得同情的東西。他對那些把《貧非罪》置於《哈姆雷特》和《奧賽羅》之上的批評家，採取嘲笑的态度。難道這種荒謬的鍾情不應該受到嘲笑嗎？他諷刺抱有斯拉夫主義情緒的一部分觀眾，他們把留比姆·托爾卓夫看做“俄羅斯精神”的美的表現，並且以為奧斯特羅夫斯基在創造出這個典型之後就達到了一個新階段。的確，車爾尼雪夫斯基說應該把《貧非罪》歸入與阿勃列西莫夫的《磨坊主》同類的作品之列，說它是單純的民歌和習俗的匯集<sup>①</sup>，這些話他是說得過份了。然而他說在上述劇本里奧斯特羅夫斯基過份渲染了那種不能渲染而且也不應該渲染的東西<sup>②</sup>，他這樣說終究是完全正確的。現在批評也應該承認這一點。

394 正像現在批評也同樣應該承認，車爾尼雪夫斯基一下子就對列·托爾斯泰作品的偉大藝術意義作了非常正確的評價。但是不僅他一下子就對這種意義作了正確的評價。可以毫不夸大地說，車爾尼雪夫斯基一下子就確定了列·托爾斯泰的藝術才能的主要特徵。在他關於列·托爾斯泰的《幼年、少年》和《戰爭短篇小說集》所寫的书評里，我們可以找到下面這段話：

“托爾斯泰伯爵最注意某些感情和思想怎樣從另一些感情和思想中發展出來；使他感興趣的是去觀察：直接從某種狀況或印象中產生出的感情，服從於回憶的影響和由想像力所提供的綜合能力，怎樣轉化為另一些感情，怎樣重新回到原來的出發點，怎樣一次又一次地飄忽無常，由於一連串的回憶而發生變化；由最初的感覺所產生的思想怎樣導致另一些思想，怎樣越來越入神，怎樣把幻想同真實的感覺、把關於未來的夢想同關於現在的反思聯在一起。心理分析可能採取不同的方向；某一個詩人最感興趣的是對性格

<sup>①</sup> 《車爾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卷，第129頁542。

<sup>②</sup> 同上書，第130頁543。

的刻划；另一个詩人最感兴趣的是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的冲突对性格的影响；第三个詩人最感兴趣的是感情与行动的联系；第四个詩人最感兴趣的是对激情的分析；而托尔斯泰伯爵最感兴趣的，則是心理过程本身，它的形态，它的規律，如果要用明确的術語来表达的話，便是心灵的辯证法”<sup>①</sup>。

这是一个极其精辟的評論。这个評論也不是我們这位作者順便发表的，而是在他那里得到了十分詳尽的發揮的。車尔尼雪夫斯基說，在我們其他杰出的詩人中間，萊蒙托夫对他所指出的心理分析方面作了最大的发展，但即使在萊蒙托夫那里，这个方面也仍然只起十分次要的作用，并且很少显示出来。在一些伟大的外国艺术家那里也很少看到这个方面，他們大部分人向我們介紹的不是思想和感情的辯证法，不是从一种感情到另一种感情、从一种思想到另一种思想的轉化，而只是这个心理过程的两个終极的环节，即只是它的起点和終点。車尔尼雪夫斯基又一次极其精辟地說：“这是由于在才能中具有戏剧性因素的大多数詩人，主要关心的是内心生活表現的結果、内心生活的冲突、人們之間的冲突、行动，而不是思想或感情所借以形成的奥秘的过程；甚至在看来多半應該表現这个过程的独白中，也几乎总是只表现出各种感情的斗争，而这种熱鬧的斗争就使我們的注意力离开了把各种表象联結起来的規律和轉化过程，——我們注意的是它們的对比，而不是它們产生的形式，——即使独白所包含的并不是对死板的感情的簡單解剖，那末独白与对白也差不多总是只有表面上的区别：在哈姆雷特的著名的反省中，他似乎是人格分裂为二，自己同自己进行爭論；他的独白在本质上是同浮士德和靡非斯特<sup>②</sup>的对白或波薩侯爵和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2卷，第539頁544。

② 浮士德和靡非斯特是歌德的詩剧《浮士德》中的人物。——譯者

堂·卡洛尔斯<sup>①</sup>的爭論属于同一类舞台場面”<sup>②</sup>。托尔斯泰并不局限于描写現成的一些情感的心理过程的结果；前面已經說过，他感兴趣的是这种过程本身；他是描写这种过程的无疑的能手。据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意見，托尔斯泰的才能的独创的特征正在于此。車尔尼雪夫斯基說，大概托尔斯泰还将写許多这样的作品，还将以其他更动人的品质，如思想的深刻性、日常生活的鮮明描写等等来感染每一个讀者；但是，对一个真正的內行來說，总会看出，正是上面所指出的那种品质才使他的才能真正有力和扎实可靠。

这是再公正不过的了。并且有一点极其值得注意：当托尔斯泰——从比留科夫在不久以前发表的托尔斯泰的传记<sup>③</sup>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对車尔尼雪夫斯基及其同道們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并且完全不理解他們的时候，車尔尼雪夫斯基本人却不仅能够评价托尔斯泰的才能，而且还能够敏銳地看出他的最卓越的特征。这真正是一个巨大的文学功績。我們以为，“启蒙运动”时代一般所特有的那种偏重理性的傾向本身，帮助了車尔尼雪夫斯基去完成这个文学功績，虽然由于偏重理性的緣故，六十年代的批評有时对它所分析的作品的美学方面注意得不够。不管托尔斯泰与“六十年代人”的一切观点和意图怎样格格不入，但連他也沒有逃避得了自己时代的影响。在他身上偏重理性的傾向也得到了极其强烈的发展，只不过这种傾向在他那里采取了另一个方向：托尔斯泰不去分析人們的相互关系，他在实质上是对这种关系完全漠不关心的，他只对自身感兴趣，只分析自己本人的心理生活，从而发展了

① 波薩侯爵和堂·卡洛尔斯是席勒的詩剧《堂·卡洛尔斯》中的人物。——譯者

②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2卷，第642頁545。

③ 指巴·伊·比留科夫所著的四大卷的《托尔斯泰传》（1906—1923；1922—1923年曾重印）。这部传记有不少材料，但作者是托尔斯泰主义的信徒，观点应加批判。——譯者

事实上构成他的艺术才能的主要特征的那种能力。

396

其次，車尔尼雪夫斯基还替托尔斯泰辯护，使他免受这样的責难，即在《幼年和少年》里沒有描写社会生活。他譏諷地說，这些作品里还没有其他許多东西，例如沒有战争場面、历史的回忆和意大利自然风景的描写等等。他公正地指出：“作者想把我們带进孩子的生活中去，难道一个孩子会懂得社会問題嗎？难道他会了解社会生活嗎？这整个因素，像軍营生活一样，与儿童生活是多么格格不入，假如在《幼年》中描写了社会生活的話，那末艺术性的条件就会遭到破坏，正像假如在这部中篇小說里描写軍事生活或历史生活，艺术性的条件就会遭到破坏一样。我們喜欢在小說里描写社会生活决不在他人之下；但是，我們应该懂得，并不是任何詩的观念都容許把社会問題带进作品；不应该忘記，艺术性的首要規律就是作品的統一性，因此，在描写‘幼年’时描写的正应该是幼年，而不是任何其他东西，不是社会問題，不是战争場面，不是彼得大帝和浮士德，不是印地安那，不是罗亭，而是有他自己的感情和概念的孩子”<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重复地說，托尔斯泰有真正的才能，并且在这点上向我們暗示，他认为怎样的作品才真正富有艺术性。托尔斯泰的著作富有艺术性，——这意思就是說，“在每一部作品里，都非常充分地体现了他想在这部作品里体现的观念。他从来不说什么多余的話，因为这违反艺术性的条件，他也从来不把与作品的观念格格不入的場面和人物混杂进去，使自己的作品变丑。艺术性的主要要求之一也正在于此”<sup>②</sup>。

所有这一切都說明，以車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六十年代的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2卷，第645—646頁546。

② 同上书，第647頁547。

397

批評,虽然一般地说也具有偏重理性的特点,但毕竟与它的敌人所揭发它的、甚至它的古怪而愚钝的半心半意的朋友斯卡比切夫斯基先生也不反对强加于它的那种荒谬的片面性,相距极远<sup>①</sup>。我们深信不疑地说,期望托尔斯泰在将来写出许多伟大作品的車尔尼雪夫斯基,决不会就《战争与和平》写出像斯卡比切夫斯基先生所写的那种不可饶恕的真正片面的——片面到极其滑稽可笑的——文章来。也许,有的读者会对我们说,由于車尔尼雪夫斯基和斯卡比切夫斯基先生之间所隔的“距离”,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我们准备来争论和反驳。他们之间事实上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距离”。但是,要知道斯卡比切夫斯基先生还以为他能批判車尔尼雪夫斯基呢!

---

<sup>①</sup> 应当指出,車尔尼雪夫斯基同时非常坚决地、甚至苛刻地驳斥了列·托尔斯泰伯爵的社会观点。参阅他关于《雅斯纳雅·波良纳》的书评,《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9卷,第117页及以下几页548。

## 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西伯利亚<sup>649</sup>

[1913年]

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西伯利亚。与友人通信集。

第1卷(1865—1875年)。第2卷

(1876—1877年)。里雅茨基为文。

米·尼·車尔尼雪夫斯基注释。

圣彼得堡1912年“火焰”出版社出版。

放在我面前的是車尔尼雪夫斯基从西伯利亚写给自己亲属——主要是写给妻子和孩子们——的两卷书信。这两卷收入了到1877年为止所写的书信，它们确实是名符其实的珍贵的“人类文献”。对車尔尼雪夫斯基由于被捕和流放而过早地中断的文学活动表示同情的人们，总把他看做一个不仅在智力方面、而且在道德方面也是非常杰出的人。他们很喜欢把他理想化。在这种情况下，把他理想化是极其自然的事。然而这种理想化远不是没有危险的：对理想化了的人物的进一步了解，有时会使人对他感到失望。但是在目前这个场合，却谈不上有这样的危险性。車尔尼雪夫斯基寄自西伯利亚的信表明，人们很难把他加以适当的理想化。俄国读者愈是了解这些书信，他们就会愈加尊敬这位无比高尚的、不屈不挠的坚强的人。俄国读者所应当做的，只是多花些时间去阅读这些书信。但在“目前时期”，是不这么容易保证做到这一点的。

根据法律，被判处苦役的人的妻子有权随他前往。車尔尼雪

399

夫斯基很爱自己的妻子；和她离别无疑对他造成了很大的痛苦。但是，他怕有害健康的遥远边区的生活，对她来说将是非常艰苦的。于是，在他到了西伯利亚之后，就开始考虑怎样安排得使他的妻子不仅不跟随他到那里去，而且尽快地根本把他忘掉。在1875年3月8日从维留依斯克写给贝平的信中，他关于这一点作了极有教育意义的自白：

“几年以前，在贝加尔见面的时候<sup>550</sup>，我曾力劝奥里珈·索克拉托夫娜另嫁任何哪一位高尚的人，这种高尚的人很多，当然，他们连想也不敢想这一类事情，但是，不论哪一位高尚的人假如听到她说，是我请求她向任何哪一位高尚的人这样说的，那他就会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sup>551</sup>……

我不能说服她。——过了几个月，我就停止给她写信。我整年没有写信。她不能忍受这个。怎么办？——我认为我必须重新开始和她通信”（第1卷，第140页）。

但是，和妻子恢复通信以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计划，而只是延期实行这个计划。他对自己的妻子所抱的宗旨仍然像以前一样。他写信给那同一个贝平说：“问题仅仅在于使她对我没有好感。那时就能像健康所要求的那样好好地生活了”（第141页），这里所说的健康是指她的健康。1875年，他企图用假装同贝平吵架的办法来解决这个任务。事情是性格有点暴躁的奥里珈·索克拉托夫娜·车尔尼雪夫斯卡娅有时同贝平家发生不和，而贝平在车尔尼雪夫斯基流放以后一直照顾着她和她的两个儿子。她把自己同贝平家发生不和的事告诉了丈夫。他也对他们吹毛求疵，想使奥里珈·索克拉托夫娜对他丧失任何好感。他装出完全站在自己妻子这方面的样子，并且要求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与同住的贝平家人断绝一切关系。后事如何……让车尔尼雪夫斯基



自己來說吧。

“应当这样地繼續下去：

当我計算到時間合适的时候，也就是再过两个月以后，我将用这样的口气对我的儿子薩沙說：

‘你不同他們斷絕关系嗎？’——但我知道，这不仅在道义上是不可能的，而且甚至在物质上也是不可能的；且不說薩沙本人的感情和理智，就是奧里珈·索克拉托夫娜也不能容許这样做；……我知道，不仅薩沙不能实行我向他提出的要求，而且奧里珈·索克拉托夫娜也不容許这样做。——那末在四月或五月，我考虑时机成熟，就有理由对薩沙这样說：

‘你不听話嗎？这样你就不是我的儿子！’——这些話的詞句比对你們說的要更粗暴些。

这是第二部分。而第三部分，也就是对我來說最为重要的部分，就是奧里珈·索克拉托夫娜将写信給我說：

‘你既然变成这样可恶的人，那末对于我和我的孩子來說你就 400  
不再存在了’，——她会这样写信給我；这是无疑的，正像  $2 \times 2 = 4$  一样。

然而对我來說，使我的良心感到最大輕松的就在于此。我是有良心的。我希望使我亲近的人不再受害”（第1卷，第139—140頁）。

正如應該預期的那样，这种独出心裁的阴謀詭計完全沒有达到車尔尼雪夫斯基想要达到的目的。貝平写給他一封信，信中竭力为自己受奧里珈·索克拉托夫娜指責而辯白。这封信的内容和高尚的語气为他大大增光<sup>552</sup>。車尔尼雪夫斯基这样回答他說：

“亲爱的薩兴卡，

我請你、姊妹們和賽列查原諒我徒然地使你們不快。

我完全同意你信中的每一句话。你所有的意见都是纯粹的真理。但是，当我写那些粗暴地委屈你的话时，我知道这一切是这样的。我知道我写的是什麼。现在你明白了么？我不过是企图从你们的感情中根除掉对我的任何好感。

可惜，并没有成功”（第1卷，第139页）<sup>553</sup>。

奥里珈·索克拉托夫娜和貝平家人的不和并未使他发生什麼误解，这点从下面这段话中可以看出：

“亲爱的朋友，她的性格是急躁的。但她本人也会判断这些冒火的行为。——在她给我的信中经常谈到和你们“不睦”，抱怨你们。——她谈到自己信中的这些地方说：‘这是在烦恼的时刻写的，当时我觉得是这样的；但你知道我的性格；我发脾气是没有理由的。’——我亲爱的，当然我无限地矢忠于她。然而这当然并不妨碍我认为，她对你们的恶感和她严厉批评你们待她的态度，是完全不公正的。她对你们的恶感是不强烈的；她严厉批评你们待她的态度，完全像你的批评一样”（第1卷，第154—155页）<sup>554</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深信他和貝平吵架的企图不能实现以后，不知道怎样去减轻他使貝平受到的烦恼。他给貝平的信中的下面这段话，具有深刻的、真正感人的印象：

“你的信充满着心灵的光明正大。为了这封信，值得吻你的手；这是失礼的；但是我和一些人在年轻的时候没有拘泥于此”（第1卷，第147页）<sup>555</sup>。

在同年3月28日给貝平的信中几乎全部重复了这些温柔的话：

“我亲爱的，你的信是极其高尚的信。我在第一封回信里对你说，值得为了它而吻你的手。当然，这是不必要的礼貌。请不要放在心上，我不拘泥于礼节，在自己的思想里表示了这个礼貌”（第1

卷,第 159 頁)556。

这不多的几段話已經使我們完全可能來評判一下,車尔尼雪夫斯基在和自己亲人的关系上是怎样的一個人。

不管人們怎样評判他企图使他們不愛他这一点的合理性,而有一点是沒有疑問的,即車尔尼雪夫斯基这位六十年代的先进人物(順便提一下,他們被人指責为宣揚利己主义)的最光輝的代表者,在自己的信里却在我們面前表现为充滿最光明正大和最純粹的利他主义感情的人。这又一次說明,由于某种原因而不贊成六十年代人的观点的那些人,是极不了解他們的。

車尔尼雪夫斯基寄自西伯利亚的信件不单是充滿着利他主义。其中还可以强烈地听到坚貞不屈的語調。例如,他这样描述自己在流放中的处境:

“按自己很好的习惯,我十分健康。生活得很好。我的錢和任何必需品都很多,我不需要任何东西。我請求你和孩子們不要寄給我任何东西”(第 2 卷,第 71 頁)557。

几乎在他給妻子的全部书信中都重复这一点。讀到他关于自己处境的評論,人們可能认为,他在服滿苦役以前真的是住在一个即使不是极美好的、至少也是可以过得去的地方。只有当他开始劝說自己的妻子不要到他那里去的时候,他关于住地的評論才有所改变。

他在 1872 年 5 月 17 日給她的信中写道:“是的,我亲爱的,到这里来的路途是遙远而非常艰苦的;是的,連郵車也差不多在整年內不能不冒着可怕的危險和經過長時間的延誤而到达这里。从四月中旬到年底,一共要八个半月;从伊尔庫茨克到雅庫茨克是一件艰巨而非常危險的事;比到非洲內陆的任何一次旅行还要艰苦些。在这些月份里从伊尔庫茨克到这里的旅行,对不习惯于雅庫茨克

生活方式的人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一片荒漠；找不到食物；在遇到任何普通的途中意外时，得不到任何帮助；要走很长的距离才有一个驛站……并且，这不是驛站，而是可怕的雅庫茨克的帳篷。这些帳篷比好的馬廐还要坏得多”（第1卷，第38—39頁）。

去維留依斯克的道路就是这样。而現在車尔尼雪夫斯基关于維留依斯克的生活說些什么呢？他描述了維留依斯克居民的悲慘的物质状况之后接着写道：

402 “我看慣了貧困；已經看得很慣了。但我看到这些人的外貌时不能无动于衷；他們的貧困使我这样的硬心腸也感到不安。我不再到城里去，免得看到这些不幸的人；他們在林边游蕩的小路，我都避而不走”（第1卷，第39頁）。

車尔尼雪夫斯基想使奥里珈·索克拉托夫娜了解維留依斯克的气候，他在自己信里写了这样一段对话：

“这里有杀害人的事情嗎？”——“沒有，人民是溫順的；但是經常发生自杀”。——“为什么呢？”——“因为條虫，这里差不多所有人都有條虫，因而引起忧郁病，使人自己上吊”（第1卷，第41頁）。

現在我們的作者得出結論說：“彼得堡的气候，比起这里的气候来是有益健康的理想气候”。而在这封信的末尾，就明显地說出了他的主要思想、他的主旨：

“我写这一切，是为了使你，我亲爱的，了解我对你的郑重的哀求：不要到这里来，千万别到这里来。等一下吧，等把我轉移到对你更适于生活的不論什么地方再說吧”<sup>558</sup>。在讀到这封信的时候，令人自然而然地想起涅克拉索夫的《俄罗斯女人》中省长对图魯別茨卡雅公爵夫人所說的那些話：

那兒的气候，就会把您杀死！  
我应当向您劝說，

您还是不要再向前奔馳！  
 呀！您是否要在那样的国度里生活？  
 那儿的空气，  
 从人們的鼻孔里流出  
 不是水气——而是冰粒？  
 那儿終年是阴暗和寒冷，  
 而在短短的暑天  
 却有泥濘的池沼的  
 有毒的蒸气？  
 呀……那真是一个可怕的地区！  
 当一百个没有白天的长夜  
 降临到那个国度，  
 連森林中的野兽，也得从那儿离去……559<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由于怀着这样一个希望而感到自慰，那就是 403  
 希望他将会很快被轉移到这样的地方，在那里奥里珈·索克拉托夫娜可以生活下去，不致遭受过大的困苦，而且在那里他自己将有可能从事文字劳动。这个希望是注定不能实现的。他留在維留依斯克直到1883年，那时才准許他回到欧俄并居住在阿斯特拉罕。然而这是在他逝世前几年的事。大概，他用不到花很多时间就能

① 这个被流放的坚忍不拔的人在給妻子的信中老是重复說，其实，維留依斯克的可怕的气候对他毫无危害。但在一封給貝平的信中，他有一次說出了自己真实的健康状况。原来他周身患风湿病，貧血，坏血病还未痊愈，此外还加上甲状腺肿大(參閱第1卷，第156—157頁)560。还应当补充一点，在維留依斯克完全不可能指望得到任何认真的医药治疗。而且在維留依斯克的可怕的气候下，认真的医药治疗也沒有多大意义。車尔尼雪夫斯基也理解到这一点。他在1877年8月14日給自己的儿子亚历山大的信中說：“任何药品都治不好气候所造成的风湿病”(第2卷，第192頁)。在同一封信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附言：“但是，不要认为我极度衰弱；不，我确实是衰弱的，然而并不非常衰弱”(第2卷，第193頁)561。

知道自己的希望是不能实现的，因为他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敌人。假如他在给奥里珈·索克拉托夫娜的信中继续表示希望很快转移到较舒适的地方去的话，那末他所以这样做，大概仅仅是为了安慰她。

他在维留依斯克也没有抛弃劳动的习惯。他在那里写了和读了许多东西，但是由于不可能出版自己的著作，他把所写的东西都毁掉了。一般地说，俄国作家的命运从来也不是令人羡慕的。在我们的文学史上，很少看到没有受过监督官迫害的光荣的名字<sup>562</sup>。然而在我們全部文学史上，还没有任何事件比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命运更悲惨。甚至很难想像，这位文学界的普罗米修斯在警察的兀鹰这样有步骤地折磨他的漫长岁月里，究竟高傲地忍受了多少沉重的苦难。

顺便提一下，在車尔尼雪夫斯基寄自西伯利亚的信中，还有丰富的材料可以用来判断他的世界观。在仔细地、不止一次地反复阅读这些书信后，我可以說，它們给了我新的证据，說明我在《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一书<sup>563</sup>中对这种世界观所作的評述是正确的。下面就有一个明显的例子。

在上述著作中，我把他描述成费尔巴哈的忠实信徒。虽然我认为很难怀疑这种描述的正确性，但我现在还是願意从車尔尼雪夫斯基在1877年4月11日給他儿子們的信中摘引下面这段话：

“……如果你们想了解在我看来什么是人的本性的话，那你们可以从本世纪唯一的思想家那里知道这一点，因为据我的看法，他具有对事物完全正确的概念。这位思想家就是路德維希·费尔巴哈。我已经有十五年没有重讀他的著作了。并且在这以前許多年我就已无暇去多讀他的著作。而现在，我从他那里知道的当然已經全部忘記了。但我在青年时代是能对他的著作整頁整頁地背誦的。根

据我对他的逐渐衰退了的记忆，可以断定我始终是他的忠实信徒。

他过时了吗？——当另一位这样有力的思想家出现时，他是会过时的。当他出现的时候，斯宾诺莎就过时了。但斯宾诺莎去世一百五十多年以后，他的这位可敬的继承者才出现。 404

无论是洛克、休谟(Hume)、康德、霍尔巴赫、费希特或黑格尔，都没有像斯宾诺莎这样的思维能力，至于现代著名的小人物，象达尔文、穆勒、赫伯特·斯宾塞等等已不在话下，而如奥古斯特·孔德之流就更不用说了。在费尔巴哈出现以前，必须向斯宾诺莎学习对事物的了解，例如在本世纪初，不管他是否已经过时，他总是唯一可信赖的老师。现在费尔巴哈所处的情况也是如此，说他很好或很不好，都可以悉听尊便，但他是无可比拟的最好的一个”（第2卷，第126页）<sup>564</sup>。

这段话在许多方面值得多加注意。首先，对于思想史来说，把费尔巴哈和斯宾诺莎相提并论是很有意思的和重要的。車尔尼雪夫斯基把斯宾诺莎看做费尔巴哈的哲学先驱。这是再正确不过的观点。但现在这个再正确不过的观点却往往使那些对哲学史感兴趣的人非常惊讶。在目前居于统治地位唯心主义反动势力的影响下，人们对斯宾诺莎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正像对费尔巴哈的看法不正确一样。不足为奇，人们也不理解这两位思想家的相互关系。

車尔尼雪夫斯基对奥古斯特·孔德的态度也同样可以说明他的特点。目前在德国哲学著作中，有人力图把费尔巴哈的哲学观点描绘成实证主义的变种之一<sup>①</sup>。可是在孔德的实证主义和费尔

① 例如，可参阅弗里德里希·约德尔的《Geschichte der Ethik, als philosophischer Wissenschaft》第2版，II B., erstes Buch, VIII Kapitel, II Abschnitt; 《Deutscher Positivismus》（《伦理学这门哲学科学的历史》……第2卷，第1册，第8章，第2节：《德国的实证主义》）。

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之间却有很大的区别。费尔巴哈决不否认世界的可知性。而孔德则假如不是完全否认世界的可知性，那末也是过份缩小了关于这种可知性的概念。因此，直到自己临终时始终是费尔巴哈的忠实门生的車尔尼雪夫斯基，对于孔德的臭名远扬的《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sup>①</sup>的评价很低。

他在1876年4月27日给他的儿子们的信中说道：“实质上这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某种落后的变了质的东西。康德的创作是可以由当时德国科学所处的状况来说明的。这是科学思想和不科学的生活条件的一种必然的妥协。怎么办！不能归咎康德，说他想出了谬论（即甚至也不是想出来的，而是在休谟的著作上读到的，休谟是他在解释休谟著作时想要将其驳倒的——这是一个笑话！），因为他必须想种种方法教授一点无论如何是不完全讨厌的东西。于是他就决定说：‘什么是假和什么是真，这点我们不知道，也不能知道。我们所知道的，只有我们对某种未知事物的态度。我们将不谈到未知事物，因为它是未知的。’但在本世纪中叶的法国，这种荒谬的让步，就是太过分的荒谬了。可是奥古斯特·孔德总是孜孜不倦地反复说：‘未知的’、‘未知的’。在一些不愿寻求真理或说出真理的思想家看来，这种解答是很方便的。而奥古斯特·孔德的体系的成功之谜，便在于此”（第2卷，第27—28页）<sup>565</sup>。

指出下面这一点将是有益的，即車尔尼雪夫斯基把穆勒（他曾经翻译过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并且作了注释）列为“现代著名的小人物”。他把达尔文和赫伯特·斯宾塞都算作同样的小人物。但是，他在自己其他的书信里也承认达尔文的渊博的科学知识和卓越的

① 《实证哲学教程》



才智<sup>566</sup>。如果說在这里达尔文被叫作“小人物”的話，那末这就是在車尔尼雪夫斯基信中經常看到的某些过分厉害的措辞之一，而他本人却也警告自己的儿子不要使用过分厉害的措辞。然而有一点是完全不容辯駁的，那就是我們这位伟大作家总是对达尔文抱有頗大的成見。我在自己的《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一书中已經不得不談到这一点。現在簡略地說一下。車尔尼雪夫斯基对达尔文的态度是不正确的。但是，要了解他对达尔文理論的不正确看法的起源，就必須回想一下，許多自然科学家在自己关于社会生活的論断中多么荒謬地利用了达尔文的生存竞争学說。对于学生們的荒謬錯誤的正当的不滿，使車尔尼雪夫斯基对老师采取了不公正的态度<sup>567</sup>。

我希望讀者注意到車尔尼雪夫斯基把霍尔巴赫的名字同洛克、休謨、康德、費希特和黑格尔的名字并列在一起。这一点对他这个唯物主义者來說也是具有代表性的。作为費尔巴哈的热烈信徒，他不能輕視他认为自己老师的前驅者的那些人。假定說，霍尔巴赫本人不是一个天才的哲学家。当然，我們不可能把他和黑格尔相提并論。但是，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談到霍尔巴赫时，大概是指《Système de la nature》<sup>①</sup>这部名著的作者。而这部著作是由

406

当时整整一批最卓越的唯物主义者所写成的，其中包括像狄德罗那样光輝的明灯。当然，只有用如今哲学史家的唯心主义偏見才能解释，为什么这些先生們只是順便地談到《Système de la nature》，并在对它发表簡短的意見时輕蔑地聳聳肩膀。大概，車尔尼雪夫斯基很清楚地理解了这种如此不公道的輕視态度的“实际动机”。

① 《自然体系》

在自然观方面，車尔尼雪夫斯基是、而且始終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說：“我从青年时代的初期起就是一个严格科学派别的坚定的信徒，这个派别最初的代表人物是留基伯、德謨克利特等等”（第2卷，第26頁）<sup>568</sup>。他把費尔巴哈看作人类思想史上严格科学派别、即唯物主义派别的最高代表人物。在1876年7月21日給儿子們的信中，車尔尼雪夫斯基这样地用“几句话”叙述他对自然界的一般概念：

“凡是存在的东西都叫做物质。物质各部分的相互作用叫做物质这些不同部分的质的表现。而这些质存在的事实本身，我們是以‘物质具有活动能力’，或更确切点說，‘物质能发生影响’一类詞句来表达它的。当我们确定质的活动方式时，我們就說我們发现了‘自然的规律’。在这里，对于每一个术语都是有爭論的。但是这些爭論的实际意义，同对包括这些术语的組合所表达的事实抱严重怀疑态度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或者是无謂的煩瑣哲学，卖弄文法和詞汇学的知識和才能，卖弄三段論法的把戏；不然的話，那就是：在反駁这些术语和这些术语組合（这对他們說来或者是同义的）的人們中間，詞句是由某种非科学的、日常的願望，即普通自私自利的願望支配着；而在为这些术语和术语組合辯护的人們那里——喜对这些术语进行爭論，不外是沒有領悟到为什么而爭論的那种稚气——或者是空話連篇，或者必然由这些术语和术语組合轉而分析他們的論敌攻击这些术语和术语組合的实际动机”（第2卷，第45—46頁）<sup>569</sup>。

这个关于引起人們攻击唯物主义术语和“术语組合”（即用它們所表明的概念）的实际动机的意見，不仅是公正的，而且是經過深入思考的，叙述得也很清楚。統治階級的思想家現在反对唯物主义，实际上是完全服从于“实际动机”的：他們觉得唯心主义是对

現代无产阶级的“破坏性”意图作斗争的唯一可靠的精神武器。不容置疑，一个有思想的人，如果他想了解现在哲学中唯心主义反动势力的起源，他开始就应该分析使现在各国资产阶级（以及服从资产阶级势力的）哲学家认为轻蔑地避开唯物主义是光荣职责的那些“实际动机”。車尔尼雪夫斯基指出必须进行这样的分析，他采取的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观点。但是，一般地说，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自己的自然观方面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而在自己的历史观方面却始终是个唯心主义者。大概，他寄自西伯利亚的信甚至使斯切克洛夫都相信了这一点<sup>570</sup>。费尔巴哈的忠实門生持有唯心主义历史观，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费尔巴哈本人就持有唯心主义历史观，费尔巴哈的所有德国信徒們也都持有唯心主义历史观。这种观点对于唯物主义史上整个馬克思主义以前时代是极有代表性的。

有一张于1872年寄給西伯利亚的車尔尼雪夫斯基的书籍清单被保存下来了。在这些书籍中，我們可以看到有馬克思的《資本論》（參閱第1卷，第182頁）<sup>571</sup>。但是在迄今发表的車尔尼雪夫斯基寄自西伯利亚的信中，沒有絲毫材料說明馬克思的这部名著給他造成了怎样的印象。他关于历史发展进程的論断方式說明，不管这种印象如何，它一点也沒有动搖他的历史唯心主义。因此，我根据車尔尼雪夫斯基的书信，現在可以深信不疑地重复我在論他的书中根据他的著作而得出的結論：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是沿着把西欧思想引向馬克思主义的同一条道路前进的；但是俄国社会生活的不利条件使我們这位伟大作家的思想未能走完这条道路，而停留在倒数第二个阶段上，即停留在费尔巴哈哲学上。

在很长時間內，左翼陣营的俄国讀者一直认为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政治經济学著作具有最重大的意义，而很少考虑，更正确地說

408

是完全不去考虑他的哲学观点。我在論他的著作中指出，迄今为止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观点保持了比他的政治經济学学說更大得多的意义。車尔尼雪夫斯基寄自西伯利亚的信，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地和一般說来极其特殊地证实了我所提出的这个意見的正确性。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出，車尔尼雪夫斯基本人对自己哲学观点的正确性一直保持不可动搖的确信，可是在他居留在西伯利亚的时期內，却开始对自己主要的政治經济学著作，即为穆勒的著作所写的注释，采取相当的批判态度。他在1877年4月21日給他的儿子們的信中說道，“那里有令人惊异的东西”。他指出，这些令人惊异的东西之一，就是自己的这样一个想法，即认为按发音的根本規律來說，新波斯語位于上德語和下德語之間。用他的話來說，他被萊布尼茨引向了这个錯誤，他过于匆忙地接受了萊布尼茨的证明（第2卷，第140頁）。但是，我对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这个失策，远不如对他另一个与政治經济学直接有关的疏忽感兴趣。他本人关于后面这个疏忽是这样說的。

“从这些对穆勒的評論，我記起了另一个大笑話。在那里有关于农业改良对谷物收成的影响的計算。有整列的数字。全部都是用对数計算出来的。然而这是什么一回事！——作为結果的一系列数字是根据我所抛弃的、勾銷不用的比例計算出来的，而基本的一系列数字則是根据另一种比例計算出来的。于是就得出了这样的結果：

$$2 \times 2 = 5$$

$$3 \times 2 = 7 \frac{1}{2}$$

$$4 \times 2 = 9 \frac{2}{9}$$

我的学术著作中的这个大笑話不是我自己发现的，而是我的一个熟人发现的，他有耐心去审查我根据对数表而作出的所有論

断。我这样疏忽大意，使他非常伤心”（第2卷，第140—141頁）<sup>572</sup>。

我在論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中也指出了他的这个錯誤（參閱第508頁及以下）。如果我把讀者的注意力轉向了这一点，那就讓讀者原諒我吧。我自己的思想发展是在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极大影响下完成的，分析他的观点成为我的文学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不能对这一分析取得多少成功这个问题漠不关心。由于我的分析被各方面称为不成功的、甚至是偏頗的，所以我就更不能漠不关心了。我能证实真理并不在我的严厉的批評者那方面，是再愉快不过的了<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在1877年6月15日給自己的儿子亚历山大的信中，通知說他已經收到貝平的《別林斯基生平》、柯斯托馬罗夫的《傳記中的俄国历史》和瓦西里契柯夫的《土地占有制和农业》等书，接着說道：

“为了其中的第三本书，我特別要感謝你，因为寄这本书說明你正是根据我的兴趣来用心地挑选书的。是的。但是——原諒我不客气地加一句話——这是我很早以前的兴趣，而我老早就沒有这种兴趣了。我已不再研究这些題目。我看出，它們是沒有多大意义的。重要的不是这些專門知識，而是风俗的一般性质。野蛮人不管怎样安排生活的任何方面，他們的生活終究是不好的。願意象人那样生活，而不是象野兽那样生活的民族，不用費多大力气去糾正生活安排方面的个别缺陷，就能把这方面的任何个别的缺陷

<sup>①</sup> 有一个严厉的批評者——如果我没有弄錯的話，是已故的安东諾夫——特别由于我指出了車尔尼雪夫斯基对馬尔薩斯理論的批評意見中的算术錯誤而感到憤慨。他断言，我指出这一点是由于我对算术的最可耻的完全无知的結果<sup>573</sup>。我希望，如果我的无情批評者能有机会讀一下車尔尼雪夫斯基寄自西伯利亚的书信第二卷的上述几頁，那他就会大大地变得溫和些，并且降低声調了。

糾正过来。因而，一切不是归結为物质的問題，而是归結为道德的問題。不要以为我不贊揚瓦西里契柯夫公爵的著作。它写得很好。而且它的作者是具有真正崇高心灵的人。但是我对这本书的主题不感兴趣”（第2卷，第181—182頁）<sup>574</sup>。

我們恐怕不能找到比“一切不是归結为物质的問題，而是归結为道德的問題”这句话更明显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說法了。实际上，人类的道德发展与人类的物质发展、即經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因果依賴关系。而这是更符合于費尔巴哈哲学的，因为根据費尔巴哈哲学的一般的、真实的涵义，不是意識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識<sup>①</sup>。但是，这里問題不在于此，我們还要一再重复說：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自己对人类发展进程的看法上并没有忠实于費尔巴哈哲学，正象費尔巴哈本人也没有忠实于自己的哲学一样。刚才引证的那段話，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这样强烈地表現出来的苦恼。“野蛮人不管怎样安排生活的任何方面，他們的生活終究是不好的。”显然，这个意見是針對俄国而发的，它說明他对我們当时的社会生活抱相当悲观的看法。但我觉得毫无疑問，它只是一时的心情的表現。一般地說，即使在那时，健康的乐观主义也仍然在他的历史观点中占优势。在1877年4月11日的信中，他承认恶在人們的社会生活中有很大的势力。“由我們的世界观看来，这应当得出什么結論呢？——他問道。人們的理性逐漸从他們的弱点和缺陷的枷鎖中掙脫出来，甚至还处于半猿状态时就用理性的力量使人們逐漸改进；而当現在的人們比大猩猩和猩猩毕竟有理性和善良得多的时候，我們更沒有权利去悲观地看待他們。我們慢慢地学习。

<sup>①</sup> 費尔巴哈还不滿足于这个一般的原理，他在自己晚年經常回到这样的想法，即人們的道德极其密切地依賴于他們的物质状况。而且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本人也經常在自己的著作中重复这个思想。

逐渐地学会成为善良的人和有理性地生活。这种事情是慢慢地进行的嗎？是的。但是我們是很軟弱的生物。由于我們的祖先达到了并使我們也达到了我們現時所利用的劳动成果，所以我們對他們表示敬意。而我們的后代也将同样給我們一个公道，在說到我們时，将这样說：‘他們是軟弱的生物，但对自己和我們利益的劳动，究竟不是根本沒有成就的’”(第2卷，第131頁)<sup>575</sup>。

警察的兀鷹未能从俄国文学界的普罗米修斯的心中消灭掉对于人类美好未來的愉快信心。当然，車尔尼雪夫斯基是至死抱有这种信心的。

車尔尼雪夫斯基在1877年4月11日对于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評价，也非常令人感兴趣。他給自己的儿子写道：

“你們知道，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风格作家——我是个极不高明的作家。在几百个不高明的作家中，只有像我这样的一个不高明的作家。我的文字生活的价值完全是另一种；这种价值在于我是一个有力的思想家”(第2卷，第123頁)<sup>576</sup>。

不言而喻，我們絲毫沒有必要去证明，車尔尼雪夫斯基决不是不高明的风格家，像他在这里把自己說成的那样。他的叙述的风格还有点特殊的魅力；他的风格并不华丽，但非常明晰和少有的朴实。然而完全不容置辯的是，他作为思想家比作为风格家要强得多。至于說到他作为思想家所进行的活动，那末它在許多方面很像18世紀最卓越的百科全书派的活动。他的活动的最主要目的是教育讀者。但是，要有可能教育讀者，首先就必須把自己的观点归納成一个比較严整的体系。車尔尼雪夫斯基所获得的每个个别的資料，只有在它有助于他形成严整的世界观的限度內，才为他所重視。像卓越的法国百科全书派一样，他也有很丰富的知識。可是他从来不想成为一个专家。在同一封信中他說道：“我只学过拉丁

411 文，像少年人或孩童那样学习，只是注意这门知识的一切细节，而不问这些细节中何者重要何者无益。其余各门知识，我是像成年人那样，以独立的智能去学习的，即去分析哪些事实是值得注意的，哪些事实是不值得注意的。因此在我所研究的各门知识中，我不愿把专门家所卖弄的那许多事实都塞入自己的脑中，因为这些事实都是无内容无意义的”（第2卷，第124页）<sup>577</sup>。也许，读者记得，小说《怎么办？》中的拉赫美托夫就是按这种办法工作的。这种办法有其薄弱的方面。然而它的强有力的方面则在于它消除了绝大多数专门家所特有的概念的局限性。车尔尼雪夫斯基有充分的根据很不赞成地指出，无论在社会科学中，或是在自然科学中，这样的局限性都占有统治的地位。他写道：“一般说来，自然科学是值得尊重、同情、赞许的。但它也有可能易于成为无益的和愚蠢的废话的工具。这种情形时常以很大的规模发生；因为绝大多数的自然科学家，也像所有其他的学者一样，都是没有相当好的一般学术修养的专家，因此当他们想空谈哲理时，他们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胡谈哲理；而且他们几乎都喜欢空谈哲理”（引自1876年9月15日的信，第2卷，第57页）<sup>578</sup>。为了举例，车尔尼雪夫斯基经常指出，唯物主义者多么不成功地把生存竞争的概念应用于社会发展学说。他所举的另一个例子是所谓贝尔定律，这个定律说，有机体完善的程度是与它的分化成正比例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是这样表述这个定律的）<sup>579</sup>。根据我们这位作者的意見，这样的想法就是无批判地把政治经济学概念应用于生物学。他断定说，分化不应当作为有机体完善的标准：

“当有机体中有神经系统的时候，确定这个有机体完善程度的主要标准，是神经系统发展的程度。而神经系统发展的程度，是否用解剖学或形态学的方法就容易确定呢？不，在很多的情况下，这



种工作还超出我們的能力。但是神經系統的一些机能是容易观察的；这种动物的神經系統可貴的实质，就在于这些机能之中。象或馬的有机体分化作用的程度是否高于公羊或母牛的有机体分化作用的程度呢？据我的推测：不是的。可是馬比公羊要聪明些；馬的有机体更要完善些。这是一个主要的标准。附加的标准是：所有其余有机体能适合神經系統需要的程度。在聪明相等的两种馬 412 中，具有更强壮的和不知疲倦的肌肉的那一种是較完善的……次要的标准很多，不单是肌肉；如胃消化食物的能力、运动器官移动有机体的能力（这一点在馬身上是四蹄結实的程度）、整个有机体健全的程度（我想这一般是血液在其正常成分中所具的抗性的程度），以及其他等等，也都是次要标准。但所有这些标准都是生理学上的标准，而不是貝尔定律所抓住的那种形态学上的标准。誠然形态学上的标准与生理学上的标准是有联系的，可是对于任何人，除了对于画家及各种其他爱好鉴赏艺术的人們以外，决沒有絲毫的直接意义”（第2卷，第58頁）<sup>580</sup>。

同时，車尔尼雪夫斯基也附帶說明，他所指出的确定有机体完善程度的标准不适用于植物学。显然，这是因为植物沒有神經系統。但是要知道动物界也有很大一部分动物沒有神經系統。因此，在动物学中，这个标准也只有附帶相当重要的保留条件后才能适用。可是考察这个問題会使我們离題过远。我只想指出一点，即車尔尼雪夫斯基用来确定有机体完善程度的标准，在他看来不仅具有生物学的意义。它与他的历史观点有密切的联系。进步是在于人类的概念和习惯的改进。这种改进依赖于智力的增进。而智力的增进則取决于思想器官、即脑的发展（參閱《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2部分，第4篇，第182—183頁）<sup>581</sup>。因此，他所指出的标准把人类的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的动物学的发展結合在

一起。我們有充分的根据认为，如果我們的作者对动物学家不注意这个标准表示不滿，那末这正是由于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特別重視这个标准。

車尔尼雪夫斯基对于自然科学家中間占統治地位的概念的局限性表示不滿，他还强烈地反对据他說在历史书籍中可以大量見到的那些“陈旧的、庸俗的概念”。他在 1876 年 3 月 17 日的信中写道：“它們是那么多，要把它們列举出来，真是多如銀河中的星星，海滩上的沙数。但是它們全体，不論新的或旧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它們都是违反荣誉的規則和善的感情的。善和合理性——这是在本质上意义相同的两个名詞。这是仅仅从不同的观点加以考察的同样一些事实的同一品质；从理論观点看来的合理性，就是从实践观点看来的善，反之亦然：善的东西，也必定是合理的。这是有关人类生活的所有知識部門的基本真理；因此这也是通史的基本真理。这是所有理性生物本性的根本規律。假如在其他任何星球上有理性生物生活的話，那末这也就是他們生活的确定不移的規律，正象我們地球上的力学或化学的定律对于那个星球上的物体运动和元素化合也是确定不移的一样。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的历史事实的标准，就是荣誉和良心”（第 2 卷，第 19 頁）<sup>582</sup>。

假如我們掌握了这个“有关人类生活的所有知識部門的基本真理”之后，要想在它上面树立研究社会現象的方法，那末我們就会感到很大的失望。科学研究的任务在于发现引起某种进步发展的某个过程的原因。从这个观点来看，我們在人們社会生活中所观察到的善和合理性，本身是由一些原因所造成的結果，而这些原因是不应当用善和合理性的概念去評定的。然而車尔尼雪夫斯基主要是从实践的观点去看待社会現象。他感兴趣的与其說是已

經發生的東西，——雖然他作為一個極其聰明的人，對這點也很感興趣，——倒不如說是應該發生的東西。他本人在《政治經濟學綱要》的最後一段話中談到這一點。我們在那裡讀到：“在我們看來科學中最重要的那部分理論，沒有來得及納入我們的綱要。”這是實際改革家的觀點、直接行動的觀點。而從直接行動的觀點看來，車爾尼雪夫斯基關於社會生活中的善和合理性的話具有巨大的意義。作為先進社會活動家應當遵循的實踐規則，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思想幾乎逐字逐句地符合有名的第一國際向全世界無產階級發表的第一個宣言中所說的話。這個宣言在指出國際政策的時候斷言，“簡單的道德和正義的法則”不僅是規定個人之間相互關係的準則，而且也是規定各個民族之間相互關係的準則，現在已經是宣布這些法則的時候了<sup>583</sup>。

車爾尼雪夫斯基對涅克拉索夫的態度極可說明他的性格。他在1877年8月14日給貝平的信中說道：

“當然，我在《祖國紀事》上讀到了涅克拉索夫的诗，這些詩說他虛弱而身患重病，正在等待着死亡。我看得出，這不是為了使思想具有詩意而作的誇張，而是實際的真情。但是我願意保留着希望，並在某種程度上使自己相信，他還會恢復健康。我想這只是老年人的虛弱；這種虛弱對他來說還嫌過早；也許，醫生能把它治好。當你寫你的第二封信的時候，我讀到信上說死亡已經不可避免和臨近之後，感到深深的悲痛；假如你收到我這封信的時候，涅克拉索夫還沒有停止呼吸，那就請你告訴他：我熱愛他這個人，我感謝他對我的厚誼，我吻他；我深信他的光榮將永垂不朽，俄羅斯對他這個俄國所有詩人中最有天才和最高尚的人的熱愛是永恆的。

414

我為他而哭。他確實是靈魂非常高尚的人，具有偉大才智的人。作為詩人，他當然高於所有的俄國詩人”（第2卷，第200

頁)584。

貝平把車尔尼雪夫斯基的這些話轉達給將死的涅克拉索夫，這些話當然使這個招致許多不公正責難的人得到很大的愉快。至于說到把涅克拉索夫當作最偉大的俄國詩人的看法，那末當時我們所有的急進知識分子都贊同這種看法。當陀思妥也夫斯基在涅克拉索夫墓前的演說中說道，涅克拉索夫“應當直接排在普希金和萊蒙托夫後面”的時候，墓地上有幾群革命青年就高呼：“他高於他們，是的，他高於他們”。筆者本人也是高呼者之一<sup>585</sup>。

在結束本文時還要說兩句話。最近我們這裡刺刺不休地稱道已故的列·尼·托爾斯泰，把他描寫成無與倫比的“生活的教師”。但是，只要把車尔尼雪夫斯基寄自西伯利亞的信同讀者看到的托爾斯泰的信比較一下，就足以了解，在這兩位作家中究竟應該向誰學習生活。

## 二、〔关于維·格·别林斯基的著作〕



---

---

## 別林斯基与合理的现实<sup>586</sup>

417

[1897年]

*Lucifer.* Was not thy quest for knowledge?

*Cain.* Yes, as being the road to happiness.

*Byron.* "Cain"<sup>①</sup>

我們那時候在哲學中除了純粹思維以外已  
找遍了世界上的一切。

伊·謝·屠格涅夫<sup>588</sup>

伏倫斯基先生說：“關於黑格爾對別林斯基世界觀的影響這一根本問題，是大多數俄國批評家提出的，但是誰也沒有拿別林斯基的某些見解同它們的直接來源對比的方法詳細研究過這個問題，誰也沒有以應有的注意來考察他的美學思想本身的獨特內容，而且誰也沒有根據一定的理論標準給這些思想以公正的判斷”<sup>②</sup>。

這一切是絲毫不足為奇的，因為在伏倫斯基先生出現以前，我國既沒有“真正的”哲學，也沒有“真正的”批評。假使我們知道一

① [羅錫福：不是你追求過知識嗎？

該隱：是的，因為在知識里有走向幸福的道路。

拜倫：《該隱》1587

② 阿·伏倫斯基，《俄國的批評家》589，第38頁。

些什么，那也是糊里糊涂和毫无条理的。然而现在，由于伏伦斯基先生，我们很快就能把我们所积累的贫乏的知识加以整理并使它充实起来。伏伦斯基先生是一个非常靠得住的领导者。请来看看，比如，他是怎样顺利地解答“黑格尔对别林斯基世界观的影响这一根本问题”的。

“别林斯基的思想，一方面由于受到斯坦凯维奇小组的影响，另一方面因为独立地吸收了从纳杰日丁的论文中所得的印象而成长和发展，所以很快就达到了高峰。对于别林斯基说来，谢林时期在1837年就已经完结了，而黑格尔的哲学——这是别林斯基在和朋友们的谈话中及借助于杂志的论文和一些译文了解到的——在他的写作和思想活动中占有中心地位。也正是在这里最明显不过地可以看出，别林斯基不善于从复杂的哲学定理中作出独立的逻辑结论以应用在政治问题和民政问题上。系统的思想是别林斯基所不擅长的。黑格尔的学说使他感到惊奇，但是他没有足够力量对这一学说的各部分和所有结论都深思熟虑地研究一番。黑格尔虽然迷惑了他的想像，但是，并没有推动他的智力创造。应当耐心地去全面分析唯心主义的基本原理。应当暂时停止幻想和感情的奔放，以便将来使它们有新的发展。但是别林斯基不会安静地探索真理——所以他的全部黑格尔哲学，正如他醉心于纳杰日丁所叙述的谢林学说一样，最终会退化为混乱的思想，充满逻辑的错误和朝着调和、保守方向走的奇怪梦想”<sup>①</sup>。

这样看来，别林斯基暂时与现实调和使伏伦斯基先生感到很惊讶。他可能用别林斯基没有十分理解黑格尔这一点来说明这种调和。老实说，这样的说明已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在赫尔岑的《往

<sup>①</sup> 阿·伏伦斯基，《俄国的批评家》，第90页。



事和回忆》中，在伊·謝·屠格涅夫的回忆录中，甚至在斯坦凱維奇論鮑羅金諾和論門采尔的著名論文出現以后馬上寫給涅維羅夫的一封信中都可以找到这种說明。其实，只有挖苦別林斯基的无知和巧妙地暗示他伏伦斯基先生亦即“我們时代的普罗米修斯”，在智慧上占有无可爭辯的和无法比拟的优势的这些话，是伏伦斯基先生說的。

乍一看来，伏伦斯基先生所轉述的說明（它有几种說法）好像是完全能令人滿意的。黑格尔說过：“Was wirklich ist, das ist vernünftig<sup>①</sup>”，而別林斯基曾以此为根据，忙着把当时所有不美妙的俄国现实宣布为合理的，因此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于是对于一切不滿意这种现实的人开始了激烈的攻击。他叙述这些調和見解的論文，正如当时的溫和而穩健的自由主义的格蘭諾夫斯基所說的那樣，是“卑鄙醜陋的”。但是黑格尔在此并无过失，因为他的认为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个学說有为別林斯基所不理解的特殊意义。別林斯基不懂德文又沒有“純粹思維”的能力。后来，特别是在移居彼得堡以后，由于受到周围的影响，才明白自己犯了多么严重的錯誤；認識了我国的现实的真正性质，并且詛咒了自己的致命錯誤。还有什么比这更为簡單的呢？可惜的只是，这一簡單的說明几乎是什么也沒有說明。

我們不想深入研究这一說明的各种不同說法，仅仅指出我們現在的“先进的”*patriae patres*<sup>②</sup>（也是可尊敬的社会学家）用聖經里的父亲饒恕浪子“青年时代的錯誤”<sup>③</sup>的那种眼光来看論述鮑羅金諾和門采尔的文章，他們寬宏大量地饒恕了天才批評家的“形而

①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

② 〔祖國的創始者〕

③ 參見《新約》《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譯者

上学的”錯誤以后，按照俗語“誰提起旧惡，就該挖掉誰的眼睛”<sup>①</sup>这一原則，不乐意地重又提起这些錯誤了。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們适当地或不适当地暗示說：他們这些“先进的人們”，几乎还在襁褓中就認識了整个哲学和社会学的真理的人們，十分清楚地理解这些錯誤的全部深度，而且也理解由于別林斯基不适当和不明智的——幸而只是暫时的——对“形而上学”的热情而使他“墮落”的整个可怕情况。有时对文学界的那些青年作家，即文学界中不恭順的“桂冠們”（Коронаты），也提起这种墮落来，因為他們敢于怀疑我們“先进的”教条的正确性并求助于外国文献，想去认清那些激动現代文明人类的問題。他們对这些青年作家說，“看，这就是对你們的教訓……”

也有这样的情况：青年作家被这个教訓吓坏了，不恭順的“桂冠們”变得恭順了，并且怀着譏笑的心情和外国的“老哲学家”訣別，按照我們土生土长的“进步公式”謹慎地前进。这样，別林斯基的榜样就被用来巩固我們“可敬的社会学家”的权威了。

这些社会学家之一——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說，別林斯基这一生只是一个真理的伟大殉教者。他有艺术批評家的卓越才能。“过許多年以后，虽然很多批評家甚至批評的手法也将要更換，但是，別林斯基的某些美学判断将会一直有效。但是，也只在这一領域里，別林斯基为自己找到了几乎是无穷的快乐。只要美学現象由于哲学上和道德、政治上的原則而复杂化时，那末他对真理的辨别就比較不敏銳了，虽然他渴求真理的心情还和以前一样，这一点也就使他成为他在通信中所說的真理的伟大殉教者了”<sup>②</sup>。

① 喻不应念旧惡。 譯者

② 尼巴甫達柯夫先生用来点綴他出版的別林斯基全集的一篇論文《蒲魯东和別林斯基》590。

如果說，在美学現象由于哲学上和精神-政治上的原則而复杂化时，每次都会使別林斯基失去辨别真理的能力，那末，不言而喻，这条总的規則也完全适用于他傾倒于黑格尔哲学的时期。显然可以看出，在整个这一时期，只能激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于“真理的伟大殉教者”的怜悯和同情，可能还有反对“形而上学”的憤怒心情，除此之外，不会有別的东西了。他的怜悯和同情是同深深尊敬的心情互相伴随着的。但是，他所尊敬的只是別林斯基的真实，至于別林斯基当时发表的哲学的和“精神-政治的”观念，那末，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认为除了“胡說”以外，再沒有任何別的东西了。 420

对于別林斯基暂时与现实調和的看法，实质上，和我們以上所援引的伏伦斯基先生的看法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只是按照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意見，“調和”是“由黑格尔带来”的，在伏伦斯基先生看来，黑格尔和这一調和完全无关（这是伏伦斯基沿用斯坦凱維奇、赫尔岑、格蘭諾夫斯基、屠格涅夫等人的意見）。但是，他們两人——伏伦斯基先生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都深信別林斯基的調和的观点完全是錯誤的。

不論这两位大师——其中一位大师在社会学方面造詣之深，也同另一位大师在哲学方面的造詣相同——的意見如何有权威，我們却不同意他們的看法。我們认为，別林斯基在自己发展的調和阶段，正是在“精神-政治的”方面发表了許多思想，它們不仅完全和有思想的生物（如像拜伦在某处曾經用过的說法）相称，而且直到現在还值得那些想找出正确观点来估价我們周围现实的人們注意。为了論证这一理論見解，我們需要从稍微遙远的时代說起。

## 二

1764年，伏尔泰在給索微兰侯爵的信中預言了法国旧社会制

度即将崩溃。他补充说：«Ce sera un beau tapage, les jeunes gens sont heureux: ils verront de belles choses»<sup>①</sup>。伏尔泰的预言在下面的意义上是实现了，那就是，«tapage»<sup>②</sup>确实是非常美好的；但是，可以有把握地说，许多同费尔内的长老<sup>③</sup>属于一个流派、活到它那时代的人，是不喜欢它的。长者不赏识“群氓”。而群氓也正是发动上一世纪末的tapage<sup>②</sup>的主要力量。不错，在某一个时期，群氓的行为是完全符合于“正派人”，亦即文明的、自由资产阶级的外表的。但是，逐渐地，群氓如此大发雷霆，变得这样无礼貌、莽撞、好斗，于是“正派人”感到自己被那些可怜而又不文明的群氓所战败，走到了绝望的地步，真诚的怀疑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为之行动的理性的力量，这一理性好像应当把自己的体现者和代表人，亦即那些文明的有产者，放在事变的主导者的地位。从1793年开始，那些感觉到自己为“群氓”意外的和可怕的胜利所征服和从阵地上败退的人，对于理性的力量的信仰大大减弱了。在以后的事件及其无休无止的战争和变革中，军事力量不止一次地取得了胜利，结果是剥夺了所有文明的有产者认为属于自己不可争辩的权利，这只能增加已开始的失望；这些战争和变革恰好嘲弄了理性的要求。于是我们看见，到十八世纪末，对理性的信仰完全衰落，虽然在督政时期和执政府时期的所谓理论家照老例还在歌颂理性和真理(*la raison et la vérité*)，但是他们已完全没有从前那样的鼓舞人的力量，而且他们的影响是不大的；公众也不听信他们；公众像朋齐·彼拉多一样，现在带着怀疑的微笑问：“真理又是什么呢？”熟悉当时法国知识分子情况的斯塔尔夫人说：为可怕的事变

① (这将是一个很厉害的骚乱，青年是幸运的：他们将看见非常美好的东西。)

② 即“骚乱”。——译者

③ 费尔内的长老——系指伏尔泰，因伏尔泰在最后二十年隐居于日内瓦附近的一个小镇费尔内而来。——译者

所吓倒了的“多数”(la plupart des hommes)丧失了任何自我完善的意願，而且“为偶然的力量之强大所震惊，已不再相信人类才能的力量了”<sup>①</sup>。

对理性力量的这种失望，远远超出法国国境，順便指出，在拜伦的作品中也表现了这种失望。曼弗雷德称哲学为，

……Of all our vanities the motliest,  
The merest word that ever fool'd the ear  
From out the schoolman's jargon<sup>②</sup> .

在拜伦看来，他当时的社会-政治事变是敌視人民的“涅米赛兹”<sup>③</sup>，也就是同一个“偶然性”在毫无意义地和殘酷地开玩笑。同时他的自豪感激起了对于这种盲目力量統治的反抗。曼弗雷德的高尚的激情——如别林斯基会說的——正是驕傲的人类精神对盲

① De la littérature considéré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es institutions sociales. Introduction, p. XVIII. 她在这同一导言的第IV頁上說得更加有力，她說：“Les contemporains d'une révolution, perdent souvent tout intérêt à la recherche de la vérité. Tant d'événements décidés par la force, tant de crimes absous par le succès, tant de vertus flétries par le blâme, tant d'infortunes insultées par le pouvoir, tant de sentiments généreux devenus l'objet de la moquerie, tant de vils calculs philosophiquement commentés—tout lasse de l'espérance les hommes les plus fidèles au culte de la raison”. (《从文学和社会制度的关系来考察文学。》导言，第XVIII頁……“革命的司时代人……对于真理的探求常常失去任何兴趣。这样多的事变是用实力来发动的，这样多的罪恶是靠成功来辯解的，这样多的德行被詆毀为丑行；这样多的灾难是当局所造成的，这样多的崇高感情成为嘲笑的对象，这样多的愚蠢打算被人給予哲学的論证——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最崇拜理性的人失去希望”。)

② (……我們幻想中

所有无聊事物里的最混雜的东西，  
从学者的諛語里面說出来的  
最最騙人耳朵的空話……) 591

③ 涅米赛兹(Nemesis)是希腊神話中司天罰的女神。——譯者

目的“命运”的反抗，正是他（人类）征服自然界和历史的黑暗势力的意向。曼弗雷德借助于魔术部分地解决了这一任务。但是，不言而喻，只能在幻想的领域里这样来解决。

第三等级的理性，更确切地说，企图使自己摆脱旧制度压迫的资产阶级的理智是经不起落在它身上的严格的历史考验的，它证明是站不住脚的，连资产阶级自身也对它绝望了。但是，假如个别的，哪怕是很多的个人可以满足于这样的失望和甚至以此来夸耀，那末，对于整个的阶级，对于全部*ci-devant*<sup>①</sup>第三等级，这在它当时的历史情况中是完全不可能的。政治事变发生之迅速，变化无常的巨大转变使得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的社会活动家们对于理性的力量产生了怀疑。这些事变在其向前进的过程中应当给社会思想的发展以新的推动力，唤起有思想的人重新尝试寻找社会现象的潜在推动力。

在法国，在复辟时代，资产阶级同（世俗和教会的）贵族许多世纪以来的争执，又在新的社会-政治条件下以新的力量复燃了。在这斗争中，每一方面都必须具有某种略微预见事变的能力。虽然绝大多数战士，在这方面只是照例依赖自己的“常识”和“生活经验”，但是在当时还充满着新鲜力量的资产阶级中间，不少有才能的人已经在二十年代之初出现了，他们企图通过科学的预见战胜盲目偶然性的力量。这种企图引起了一些人的议论，认为有建立社会科学的必要；在历史科学领域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活动家。但是，对现象的科学研究正是理性的事情。因此，社会发展的进程恢复了对理性的信仰，虽然在理性的面前提出了为十八世纪的“哲学家”所不了解，或者，至少是很少了解的一些任务。

那个世纪的理性是“启蒙者”的理性。启蒙者的历史任务就是

<sup>①</sup>（从前的）

用出新的社会需要和新的社会关系所产生的新思想的观点来评价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社会关系、制度和概念的資料。当时曾需要尽可能迅速而毫无錯誤地辨别母羊和公羊<sup>①</sup>，即辨别“真理”和“錯誤”。而对于某一“錯誤”是从哪里出現，怎样产生和在历史上怎样发展的这一問題，我們完全不必过問；重要的是必須证明，它不过是“錯誤”。

而凡是与新思想相矛盾的一切东西都被认为是錯誤，正如与其相符合的一切东西都被认为是真理——永恒不变的真理一样。

文明的人类不仅是經歷了一个启蒙运动的時代。每一个启蒙运动时代当然有它自己的特性，但是它們有这样一种共同属性：为了被认为是永恒的、不依任何“偶然的”历史条件为轉移的真理而同旧的概念进行激烈的斗争。启蒙者的理性不过是革新者的理智，他閉着眼睛不去看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宣布自己的本性是一般人类的本性，把自己的哲学宣布是适合于所有时代和所有民族的唯一真正的哲学。

正是这个抽象的理智由于十八世紀末的 tapage<sup>②</sup> 而破灭了。Tapage<sup>②</sup> 表明了人类在自己的历史运动中都服从于他自己所不懂的、但是无法抵抗的某些隱蔽力量的作用；每当“理性”（即是抽象的理智）的力量同这些力量发生矛盾时，这些力量就无情地把它摧毁。

对于这些隱蔽力量（最初以盲目的“偶然性”力量的形式表現出来）的研究，現在成了一切研究所謂精神和政治科学<sup>③</sup> 的学者和

① 原語出《新約》《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好像牧羊的分別綿羊山羊一般”，原意为分別有用的和有害的，善的和惡的。——譯者

② 騷亂。——譯者

③ 在圣西門的著作中，这一点表現得最为清楚，他說：“La science de l'homme n'a été jusqu'à présent qu'une science conjecturale. L'objet que je me suis proposé dans ce mémoire a été de lui imprimer le cachet de science

424 思想家的比較自觉的目标。十八世紀忽視了历史。現在大家都埋头研究历史。但是,从历史上研究某种現象,那就是从发展上研究某种現象。发展的观点逐漸变成了在十九世紀哲学和社会科学中占統治地位的观点。

我們知道,发展的观点特別在德国哲学中得到了丰硕的果实,也就是說,在这样一个国家的哲学中得到了丰硕的果实;这个国家只在理論上(以自己的思想家为代表)是先进欧洲国家的同时代人,因而能够不必在实际斗争方面去分心,而专心致志地掌握科学思想的一切成果并仔細研究“在西方”(即当时德国人所常說的 in den westlichen Ländern)所完成的社会运动的原因与后果。十八世紀末在法国所发生的事变一直到九十三年<sup>④</sup>都得到德国先进人士的强烈同情,这一年把这些人中的絕大多数吓得胆战心惊,使他們不得不怀疑理性的力量,这一点正同在文明的法国資產階級中所发生的情况一样。但是,当时处于全盛时代的德国哲学界很快就看到了走哪条道路才可以战胜盲目的偶然性的力量。謝林在他的刚刚在十九世紀初(在1800年)出版的《System des transcendentalen Idealismus》<sup>⑤</sup>中写道:“在自由中應該有必然性”。这是說,自由只能作为某种必然的,亦即合乎規律的历史发展的結果而出現。而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对于这一合乎規律的发展进程进行研究应当成为自由的所有真正友人的首要义务。十九世紀是各种伟大发现极为丰富的世紀。其中最伟大的一个发现就是把自由当作必然性的产物的这样一种看法。

d'observation" (Mémoire sur la science de l'homme) ["关于人类的科学到现在为止不过是推测的学問……我在这本概論中为自己树立的目标是要把它提升到以观察为根据的科学中的地位"(关于人的科学的概論)]"592。

④ 即1893年,这是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譯者

⑤ 《先驗唯心主义体系》593



謝林所創始的事业由黑格尔来完成了,在他的体系中,唯心主义的德国哲学达到了光輝的顶点。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史是对自由認識的进步,但它是我們应当在其必然性中去理解的一种进步。在抱有这一观点的人看来,“人类的历史已經不再是无意义的暴力的紛乱糾纏了,这些暴力在現時已經成熟了的哲学理性的法庭之前是一样应受申斥的,并且最好尽快地把它們忘却。人們的历史是人类的发展的过程,而科学思想的任务即在于从一切似乎虛假的迷乱中探溯出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在一切表面的偶然性中证明出过程的內在規律性”(恩格斯)<sup>594</sup>。

425

要发现影响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某些規律,这就意味着保证人类自己能够自觉地作用于这一发展过程,并使人类由“偶然性”的玩物变为它的主人。这样一来,德国唯心主义給有思想的人們开辟了异常广闊和极其令人快慰的前景;偶然性的威力应当被理性的胜利所代替;必然性应当成为自由的最巩固的基础。不难設想,所有那些由于毫无結果的絕望而苦恼,而在痛苦的灵魂深处还仍然有着对社会生活的兴趣和“自我完成的意願”的人們,是如何欢迎这些令人快慰的前景的。黑格尔的哲学使他們恢复了对于人类才能的力量的信心,复活了从事新的智力活动,而在新的嗜好冲动中,他們觉得黑格尔哲学对于知識和生活中所有巨大問題都将迅速予以回答,解决一切矛盾并开闊人类自觉生活的一个新时代。当时,德国所有的新鮮东西和有思想的东西毫无例外地被它所吸引了,而且我們知道,不仅仅在德国是这样的。

### 三

黑格尔在結束自己的哲学史讲演时說:“最后的哲学是所有以前的哲学的結果:沒有东西被丢掉,所有的原則都被保存,——要

經過許多時間，才能誕生我們現代的哲學……。凡我們在回憶中迅速考察到的，在現實中却完成得很慢。然而世界精神決不停留在一個地方。它不斷的在前進，因為這一向前運動就是它的本性。有時看起來，它是在停頓，它喪失自己的永恆的自我認識的意願。但只是表面看來這是如此。實際上那時候在它裡面是在進行着深刻的內部工作，只是在它所達到的結果被暴露以前，在陳舊觀點的外殼化為灰燼以前，在他自己返老還童一日千里地向前進以前，是覺察不出的。哈孟雷特對自己父親的靈魂喊叫說：‘老田鼠，你掘得好啊！’<sup>①</sup> 關於世界精神也可以同樣說：‘他掘得好啊！’”<sup>595</sup>

426

《往事與回憶》的作者稱黑格爾的哲學為進步的代數學<sup>596</sup>。這一評論的正確性是為我剛才引用過的偉大思想家的見解所充分證實的。唯心主義的哲學，當它得意地宣稱，世界精神的本質在於它的永恆的前進運動時，它不可能是停滯的哲學。但是，有時候黑格爾表示得還更堅決些。我們且舉出他在哲學史講演錄中所說的對蘇格拉底裁判的一段為例。

據黑格爾的意見，蘇格拉底思想的傳播可能使舊的雅典生活制度完全復滅。因此，如果雅典人感覺到交由他們的法庭審判的這個思想家是他們所珍視的社會制度的死敵而把他判處死刑的話，我們是不能責怪他們的。這還不夠；應當坦白地說，他們有責任保衛這一社會制度。但是，也應當承認，蘇格拉底也是對的，他是高級的新原則的自覺的代表人；他是一個具有精神的絕對權利的英雄。“在世界歷史中，英雄的地位就是這樣，他們在以自己的活動創造新世界的時候，跟舊社會發生矛盾從而摧毀它；因為他們是現存法律的破壞者。所以他們死亡，但作為個別人物而死亡；加于他們身上的懲罰並沒有摧毀他們所代表的原則……後來原則勝利

<sup>①</sup> 見莎士比亞：《哈孟雷特》，第一幕第五場。——譯者

了，虽然是在另一形式中胜利的”<sup>597</sup>。

历史的运动在我们看来，常常是两种法律原则之间敌对冲突的场面。一种法是现存社会制度、已经形成的道德关系的神圣的法；另一种法自我意识、科学、主观自由的同样神圣的法。它们的冲突是名符其实的悲剧，在这悲剧里面有人死亡，但是，没有犯了错误的人，因为每一方面，都以为自己是正确的。

黑格尔是这样说的。读者看到，他的哲学从本质上说，确实是进步的真正代数学，虽然与他同时代的进步人士并不总是意识到这一点的。他所用的为门外汉所不懂的名词使某些人惶惑不安。他的有名的论点：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被某些人认为是最顽固的保守主义的哲学表现。一般说来，这是一个错误。按照黑格尔的逻辑，远远不是所有存在的都是合理的。现实的高于简单存在的（«die Wirklichkeit steht höher als die Existenz»）。偶然的存在不是<sup>598</sup>真实的存在。现实的是必然的，因为“现实性是作为必然性而展开的”。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按照黑格尔的看法，不仅已经存在的东西是必然的，因为世界精神以其片刻也不间断的老田鼠一般的工作破坏着存在的，把它变成简单的、失去真实内容的形式，使得注定要与旧东西发生冲突的新东西的产生成为必然的。

427

世界精神的本质在于它的永恒前进的意愿。所以，即使在社会生活中，必然的和合理的东西终究只是不间断的前进运动，只是所有旧的、过时的东西在经常不断的、比较迅速地消亡。这一结论是作为辩证体系的黑格尔哲学的全部性质和意义所必然提示的。

但是，黑格尔哲学不仅是辩证的体系，它宣称自己也是绝对真理的体系。但是，假如绝对真理已被找到，那末，世界精神的目标——自我认识——就已经达到，它的前进运动也就失去任何意

义。这样，要掌握绝对真理的野心会使黑格尔和他自己的辩证体系发生矛盾，并使他处于与哲学的进一步成就相敌对的地位。但这还不是一切。这种野心会使他在社会生活方面也成为一个保守者。按照他的学说，一切哲学都是他的时代的观念表现(ihre Zeit in Gedanken erfasst)。假使他找到了绝对真理，那末，这就是说，他已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有了与这个时代相符合的“绝对的”社会制度；也就是说，它是这样一种制度：这个制度是在理论中所找到的绝对真理的客观表现。但是，因为绝对真理不可能陈旧，所以不可能变成错误，那末，可以清楚地知道，一切要改变表现绝对真理的制度的意愿都是对圣物的粗暴的凌辱，是对世界精神的大胆反抗。当然，即使在这种“绝对”制度中也能做出某些局部的改进，消除过去遗留下来的局部的缺点。但是，一般说来，这一制度也应当是永恒和不可动摇的，正如被这个制度所客观表现的绝对<sup>599</sup>真理是永恒和不可动摇的一样。

黑格尔这位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深邃的思想家和天才的头脑，毕竟是自己时代和自己国家的儿子。德国的社会状况对于安静地从理论上研究世界事变进程这一工作倒很合适，不过对于实际应用从理论中得到的结果这一点来说，却很不合适。勇敢的德国理论家在实际方面却常常是最和平的庸俗人物。就是在黑格尔和歌德那样伟大人物的身上也有不少庸俗习气。黑格尔在青年时代很同情法国大革命，但是年岁大了，对自由的热爱也逐渐减弱，同现存制度和平相处的意愿便加强了，因而1830年的七月革命使他产生痛苦的印象。“左派”黑格尔分子之一——著名的阿尔诺德·卢格后来责备自己老师的哲学，说它始终局限于对现象作消极的直观，丝毫不想去行动，而且，宣布自由为历史发展的伟大目标，在实际上却同已经十分显然的奴隶制度和平相处。应当承认，说黑格尔

哲学中确实有上述缺点<sup>600</sup>的指責，是完全正确的。并且这些缺点的表现是：有掌握绝对真理的企求，这在哲学史讲演录中也可以看出，这些讲演录含有充满勇敢和振奋前进的上述思想。例如，黑格尔力求证明，在近代社会里——和古代社会相反——哲学活动可以而且应当局限于“内在世界”，即思想的世界，因为“外在世界”（社会关系）现在已达到某种合理制度，而且“平静下来”“同自己和解”（ist so mit sich versöhnt worden）。但是，黑格尔观点保守的一面在他的“Philosophie de Rechts”（法哲学）中表现得最尖锐。凡是细心阅读这一著作的人将为其中许多思想的天才深度而惊异。同时，人人都能看出，黑格尔在这里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在努力使自己的哲学和普鲁士的保守主义调和起来。在这方面，特别有教益的是一篇著名的序言，在这篇序言里，关于合理的现实这一学说完全不像在《逻辑学》里所具有的那种意思。

存在的东西是由于必然性而存在的。理解某一现象的必然性，就是发现它的合理性。科学认识的过程就在于：在力求自我认识的精神，将在现存的事物中认识出自己，认识出自己的理性。哲学必须理解现实的存在。特别是法的哲学应当理解国家的合理性。黑格尔还远远没有“建成一种应当存在的国家”的任何意愿。像这样的体系是愚蠢的：世界“如其应当存在的那样”是不存在的，或者，正确些说，只存在于某一个人的意见中，而个人的意见是“软弱的因素”，容易对个人的专断让步，并且常常在反复无常和虚荣的影响下改变自己。谁了解了现实性，谁发现了隐藏在它里面的理性，他就不会反对它，而是同它调和起来<sup>①</sup>，并为它高兴。他不放弃自己的主观自由；但是，自由并不表现在同现存事物的争执中，

429

<sup>①</sup> 我们请读者注意，“与现实调和”（die Versöhnung mit der Wirklichkeit）的说法是黑格尔本人所用的。

而表现在同它的协调中。一般说来,同现存事物的争执,在认识的理性和体现为现实的理性之间的分歧,只是由于对这一现实不完全理解,由于抽象思想的失算引起的。人是有思想的生物;他的自由,他的权利,他的道德的全部基础都包含在思想中。但是,在某些人的心目中,只有和一切公认的东西相违反的思想才是自由的。在这些人那里,思想的崇高和神圣的权利本身,变成了无权。这些人准备为他们个人考虑的专断牺牲一切。他们把使人服从于一定义务的法律,只看作是僵死的、冰冷的词句,只是强加于主观信念的锁链。他们所引为骄傲的是自己对现实的否定的态度,然而这一态度只证明思想的软弱和他们完全没有能力为了一般利益而放弃反复无常性的个人考虑。很早已经有人说过,一知半解减弱对于上帝的信仰,而真正的知识,相反地巩固这一信仰。关于人对他们周围的现实的态度也可以这样说,一知半解激起他们反对现实;真正的知识使他们与现实调和。黑格尔在这里正是这样说的<sup>601</sup>①

说法学完全不应当研究“国家应当是怎样”;它的任务是理解现在的和过去的国家,说明国家的<sup>603</sup>诸机关的历史发展,这是完全正确的。黑格尔攻击那些浅薄的自由派(我们现在要说,主观主义者)不能把自己的“理想”同周围现实的发展联系起来,而永久留在无力而空洞的主观梦想领域里,这完全是正确的。但是,黑格尔不仅攻击这种自由主义。他也反对不是出于官方的一切进步意

① 把德国最伟大的一个唯心主义者的这一观点和他的同时代人、天才的法国人圣西门的观点加以对比那是有意思的。“Le philosophe… n'est pas seulement observateur, il est acteur, il est acteur du premier genre dans le monde moral, car ce sont ses opinions sur ce que le monde doit devenir qui règlent la société humaine”(Travail sur la gravitation universelle) (“哲学家……不仅是观察家,他是演员,他是在道德世界中具有头等意义的演员,因为他的关于世界应当怎样的意见,支配着人类的社会”(关于万有引力的论著):602。

图。而且他在这里把“凡是存在的”，单纯因为它存在，就认为是必然的，因而是“合理的”。反对存在的东西就被宣布为反对理性。430  
所有这一切都用下面的理由巩固起来：这些道理同以上所举的关于苏格拉底的命运以及关于自我意识和主观自由的神圣的法的议论真可以说是天壤之别。黑格尔从一个细心思考人类历史发展并且得出了前进运动是世界精神的本质这一结论的思想家，变成了一个容易激怒和可疑的保守者，他在坚定不移地挖掘着旧概念和旧制度大厦的有力而永恒的“老田鼠”每作一次新的努力时，便准备大喊“救命”。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假使黑格尔关于一切现实的合理性的学说被许多人理解得完全不正确的話，那末，这首先是他自己的过错，因为他给了这一学说以很奇怪的而且是完全非辩证的解释，而且宣称当时的普鲁士社会制度是理性的化身。因此，人们可能认为黑格尔哲学对于当时有思想的人并未丧失影响这一点是很奇怪的。但是不管怎样奇怪，事实却是：对黑格尔从他的——实质上是完全进步的——哲学得出的保守结论的反抗，只是在很久以后才开始的；在他的《Philosophie des Rechts》问世的时期，反对黑格尔的只是几个浅薄的自由主义者，而一切严肃的、青年的和坚强的人都热心地追随他，虽然他有一些矛盾，可是他们甚至没有觉察到。当然，这个原因是：当时的德国社会生活还不够发达。但是，在上一世纪<sup>①</sup>，在莱辛的时代，这种社会生活更不发达，然而那时候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概念完全不像黑格尔的；假使黑格尔在当时出世的话，那末，大概谁也不会追随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sup>②</sup>，而且因为只有十九世纪才在有思想的人类前

① 指十八世纪。普列汉诺夫这篇文章写于1897年。——译者

② 语见《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译者

面提出了那个伟大任务，就是黑格尔哲学允诺予以回答的任务：科学地研究现实，科学地说明人类在社会、政治和精神方面的历史发展乃是必然的、因此是合乎规律的过程。我們已經說过，只有这样地理解历史才可以消除把它当作是盲目偶然性王国的悲观看法。所以，青年們，在凡是“世界精神”的地下工作哪怕以不大的規模完成的地方，在凡是“老田鼠”为新的社会运动准备了土壤的地方，都应该如饥似渴地埋头研究黑格尔哲学。而且在青年头脑中对于理論思想的要求越严格，在青年的內心里对于为了共同利益而牺牲个人的意願越强烈，那末，他們就更应当醉心于黑格尔主义，而且确实这样醉心过。后来开始的对于黑格尔所作的保守結論的反抗是完全有根据的。但是，不应当忘記，这一反抗在理論意义上之所以有根据，只是因为它本身是以黑格尔的辩证法为依据的，也就是說，主要是以說明历史为合乎規律的过程和把自由看作必然性的結果为依据的。

#### 四

現在我們可以回过来談別林斯基。

在开始研究他的思想发展的历史时，我們首先指出，他在青年时代很早就强烈反对我国当时的现实。人人都知道，他在大学时所写的悲剧給他带来了許多不愉快，这个悲剧是对农奴制度的强烈抗議，虽然它的艺术水平并不高。別林斯基完全站到农奴一边。

他的作品中的一个主人公大声疾呼地說：“难道这些人出生于世只是为了那些和他們一样的人的奇想怪癖服务嗎？誰把这一极有害的权利給了一部分人，让他們以自己的权力来奴役类似于他們的其他人們的意志，夺去他們神圣的宝物——自由呢？誰允許他們粗暴地侮辱自然和人类的权利呢？……仁慈的上帝，人父，請



回答我，是不是你的絕頂聰明的手产生了这些蛇，这些鱷魚，这些老虎，它們以自己的近邻的骨头和肉滋养自己而且像喝水一样地喝他們的血和泪呢？”<sup>604</sup>

这一議論就其热情來說，是会给卡尔·摩尔本人带来荣誉的。别林斯基确实是受过席勒的早年作品《强盜》、《阴谋与爱情》、《菲爱斯科》<sup>605</sup>的最强烈影响的。用他自己的話說，这些戏剧在那时使他“为了脱离发展的地理和历史条件而悬在空中的抽象的社会理想对社会制度狂暴地仇恨”<sup>606</sup>。不过，使他受到如此强大影响的不只是席勒的上述一些作品。他說：“唐·卡洛尔斯<sup>①</sup>把我投进抽象的英雄主义中，除了英雄主义我輕視一切……而在英雄主义之中，尽管自己有不自然的和紧张的狂喜，却很好地意識到自己等于零……《奥尔良少女》<sup>②</sup>把我推入那个同样抽象的英雄主义，推入那同样空虛的、无个性的、实体的、沒有任何个人規定的——一般”<sup>607</sup>。我們恳切請求讀者注意这位著名的批評家关于自己的这一有意思的证言。他在青年时对于“抽象的社会理想”的向往构成他的思想发展史中极为重要的一頁，对于这一点，一直到現在，人們还很少給予应有的注意。比如，据我們所知，誰也沒有強調指出这一情况，那就是：有才能和热情的青年，虽然充滿着“抽象的英雄主义”，但同时却“意識到自己等于零”。这种意識是极端痛苦的。它一方面应当喚起同样痛苦的、对于抽象理想是否合适的怀疑，而另一方面則引起要为社会意图找寻具体的土壤的尝试。那时不只是一个别林斯基痛苦地意識到自己等于“零”。二十年代先进知識分

432

① 唐·卡洛尔斯是席勒的剧作《唐·卡洛尔斯》中的主角。——譯者

② “奥尔良少女”(La Pucelle d'Orléans)是法国民族女英雄貞德(Jeanne d'Arc 1412—1431)的称号，这里是指席勒的同名剧作：“Die Jungfrau von Orleans”。——譯者

子的意图在这以前不久遭受了严重的幻灭，而且在有思想的人们中间弥漫着忧伤和绝望<sup>①</sup>。我国常常有人反复地说，纳杰日丁对于别林斯基的思想发展有过很大的影响，至少在发展的初期有过很大的影响。但是，在纳杰日丁本人的思想中，难道就有很多可以欣喜的东西吗？在他看来，古代的俄国生活仿佛是“在毫无生气的空虚和混乱中挤来挤去的没有个性的黑压压的人群”；他甚至怀疑，我们是生存在“继续存在千年之久的俄国。我们的精神生活只是从彼得开始的，而直到现在为止”一切欧洲的东西都是弹跳式地经过几千个跳跃和骤变抛向（我们）的；因此，是以十分微弱无力的回声传来的”。

“假使可以这样说，我们的文学直到现在是为欧洲服劳役的；它是用俄国人的双手、但是并不按照俄国的样式耕种的；这种劳役用尽了新鲜而无穷的年轻的俄国精神的汁液来滋养外来的而不是我们的植物”<sup>②</sup>。

在这里，几乎可以听到恰达也夫的调子。别林斯基在他著名的第一篇论文《文学的幻想》中提出了看来是对我们的未来（假使不是对过去和现在）的十分令人快慰的想法。他指出了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不是文学（它本身在将来是会出现的）而是教育，他感叹地说：

433 “而这种教育，由于英明的政府专心一意的关怀，是不会停滞不前的。当皇帝——慈父的手向俄罗斯人民指出目标时，当他的

<sup>①</sup> 关于这点见 Herzen, du développement etc., Paris 1851, 第 97—98 页（赫尔岑，《论发展等等》，巴黎 1851 年版，第 97—98 页。）608

<sup>②</sup> 因为手边没有纳杰日丁的论文，我们不得不援引贝平先生写的书《别林斯基，他的生活和通信》，见第 1 卷，第 95 页 609。从这一著作里，我们引用了有关别林斯基精神发展历史的大部分材料。不过我们把这些材料重新加以分类 610。这一点本来是可以不必补充说明的。

有威力的声音号召他们向这目标前进时，他们是敏慧而颖悟的，对于一切的善和美是会全力以赴而且是热心的！……”<sup>611</sup>

按照他的话来说，一个家庭教师等级的建立应当在教育方面出现真正的奇迹。此外，我们的贵族终于确信必须给他们的孩子们以可靠的教育，而我们的商人等级“在迅速地形成并在这方面和上层等级接近”。总之，我们的教育事业进行得很顺利：“在现今，未来的种子正在成熟着”。

当然这一切写得很诚恳：当别林斯基写自己的论文时，他想相信，而且他以作家的热情相信，教育会迅速地传到全俄国。但是，在比较安静的时刻，当向往的热情冷却时，他不能不看到，他对于教育能在俄国很快发展的信心，至少是不稳定的。而且教育的成就——不管它是怎样“迅速”——未必能够满足一个为了理想而“敌视社会制度”和浸透“抽象的英雄主义”的人吧……这种人所需要的并不是这样的前景。一句话，《文学的幻想》的得意洋洋的声调是一时兴奋的结果，而且完全不排除它的作者的沉重情绪，这也就是他伤心地意识到自己等于零的结果，一面是抽象的理想和另一面是具体的俄国现实之间不能解决的矛盾的结果。

1836年7月，别林斯基来到特维尔省的B—x，在那里，在一个好客的主人，著名的“哲学的门外汉”，或者“哲学之友”M. B. <sup>612</sup>帮助之下，——假使我们没有错的话，那是初次——接触了费希特的哲学。他说：“我用力地，疯狂地抓住费希特的思想”<sup>613</sup>。而这是可理解的。按照他的说法，在他看来，生活总是有两个，一个是理想的生活，一个是现实的生活；费希特说服了他，使他相信“理想的生活正是现实的、肯定的、具体的生活，而所谓现实的生活，是否定，幻想，渺小，空虚”<sup>614</sup>。这样，在抽象的理想和具体的现实之间的痛苦的矛盾得到了所寻求的哲学的解决：即把对立的一方化

为零。

434 别林斯基在宣布现实是幻影以后，就能为了理想更加强烈地仇视现实，而理想现在则成为值得这样称呼的唯一的现实。别林斯基在这一“费希特的”时期是很同情法国人的。貝平先生說，“有人对我们說过别林斯基当时生活中的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在还不十分熟悉的上級社会中談到了上一世紀末法国事变时，說出了使主人很难堪的极端尖銳的意見”<sup>①</sup>。后来，别林斯基在他写給友人的一封信中，回忆了这件事，并且补充說：

“我一点也不因为說了这句话而感到后悔，并且在回忆这句话时絲毫也不觉得难为情，因为我是用了这句话十分誠摯而且完全出于我激烈的性格表达了我当时的精神状态。不錯，我那时是这样想的……我用这句话真誠而恳切地表达了我当时必須經歷的紧张的精神状态”<sup>615</sup>。

看来，别林斯基现在可以放下折磨他的疑慮而休息了。实际上他现在的痛苦未必比以前減輕多少。

第一，他怀疑自己的哲学思維能力。“而我認識了这一具体生活的存在只是为了認識自己无力吸收它；我認識了天堂，仅仅是为了确信：只接近它的大門而不是喜悅，但只是預感它的和諧和芳香，这是我的唯一可能的生活”<sup>616</sup>。第二，否认现实，看来并没有使他从旧的理論的怀疑中摆脱出来。现实的生活被宣布为幻想的，渺小的和空虛的。但是，幻想和幻想有所不同。从别林斯基的新观点看来，法国的现实也和任何别的现实，比如說俄国的现实一样地都是幻想的。但是，如我們已經知道的，在法国的社会生活中有过一些他所热烈同情的現象，而在俄国就絲毫沒有类似的东西。为

<sup>①</sup> 《别林斯基》，第1卷，第175頁。

什么法国的“幻影”不像我們祖国的呢？

“費希特主义”对于这一問題沒有作出回答，然而它只是简单地改变了一下旧的令人痛苦的問題的形态，即：为什么具体的现实和抽象的理想互相矛盾，怎样消除这一矛盾。这样看来，宣称现实为幻影实质上絲毫都沒有帮助，因此，新的哲学观点本身原来是可疑的，要不是完全“幻影的”的話，須知別林斯基只是在它大概答应了对于糾纏着他的問題給予簡單而令人信服的回答的限度內才珍視它。

后来（1838年6月20日），別林斯基在他的一封信里吐露了他“仇恨思想”的信念。他写道：“是的，我仇恨〔它〕，因为是一种抽象。但是，假如它不是抽象的，难道能为我們得到嗎？难道始終只是在发现的那一刻才思索嗎？而在别的时刻就什么也不思索嗎？我理解这种假定的整个荒謬性，但是，我的天性是仇視思維的”<sup>617</sup>。这些朴直而令人感动的几行語句最好不过地說明了別林斯基对哲学的态度。他不能滿意于“抽象”。能使他滿足的只有这样的体系：这个体系的本身是从社会生活中产生而且它本身也由这个生活來說明，反过来它也說明生活，并且能够广泛而有成效地影响生活。这也就是他对思想的假想仇恨；不消說，他所恨的不是一般的哲学思想，而只是滿足于哲学的“直观”，却背向着生活的这样的思想。屠格涅夫說：“我們那时候在哲学中除了純粹的思維以外已寻遍了世界上的一切”<sup>618</sup>。这完全是正确的；这一点对別林斯基說来特別合适。他在哲学中寻找了如拜伦的該隱所說的走向幸福的道路（the road to happiness），——当然不是个人的幸福，而是他人的幸福，自己祖国的福利。許多人根据这一点都在想，他实际上並沒有“哲学的才能”，而且甚至有这样一些人，从他們的哲学思維能力說，远远比不上他，却开始瞧不起他，对他只勉强地加以贊許。

这些自滿的先生們忘記了或者不知道，在別林斯基的时代几乎整个欧洲的思想界都寻找过走向社会幸福的道路。正是因为这样，哲学在当时有过如此巨大的社会意义。現在，指出走向幸福的道路的已經不是哲学，它的进步的意义是等于零，現在“抽象思維”的爱好者可以安心地研究它。我們衷心希望他們成功，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們对于別林斯基的“哲学才能”持有特殊的意見。我們认为，他有对理論真理的巨大的鉴别力，可惜这种鉴别力不是經過系統的哲学教育而发展起来的，但是，它完全正确地給他指出了当时社会科学的最重要的任务。一个最有教育的俄国人奥多也夫斯基公爵当时曾經說过：“別林斯基是我一生里所曾經遇到过的一个有最高的哲学組織的人”<sup>619</sup>。我們认为別林斯基是我国过去活跃于文学領域中的最高級的哲学組織之一。

436 不管怎样，討厭的問題並沒有使別林斯基在整个“費希特时期”得到安靜。这正好是一个德国詩人在他写的一首絢丽的詩中所要求回答的一些問題：

为什么在十字架的重担之下  
正直的人永远是苦恼不堪？  
为什么富人到处得到尊敬和荣誉？  
誰的罪过？是在世界上  
真理的力量不是全都能了解？  
还是它在同我們开玩笑？  
这是卑鄙和有罪的！<sup>620</sup>

現代的社会科学彻底地解决了这些問題。現代的社会科学承认“真理的力量”現在还远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了解的，于是它說明了，为什么“真理”在我們的社会的（特别是階級間的）关系中現在还是不那么起作用。从現代社会科学的观点看来，使別林斯基苦

恼和不安的問題好像是十分幼稚的。

然而，這些問題在他那個時代決不是幼稚的；當時最有才智的人都曾經埋頭研究這些問題。這些問題是從下面的一個根本問題中邏輯地產生的，這個問題就是：為什麼偶然性往往竟然如此強於理性？而且不難理解，別林斯基所能滿足的那種哲學必須是對這些問題給以“簡單”<sup>621</sup>和堅定回答的。

為什麼粗暴的物質力量可以嘲弄人們最美好、最高貴的意圖而不受到懲罰呢？為什麼一些民族昌盛，而另一些民族受到殘酷的征服者的統治而趨於滅亡呢？難道是因為征服者永遠優於和高於被征服者嗎？未必是這樣吧。所以發生這種情況的唯一原因往往是征服者的軍隊多於被征服者的軍隊。但是，在這種場合要拿什麼來說明實力的這種勝利是正當的呢？而“理想”如果永不放棄自己的天上領域和放任我們可憐的實際的生活，使其成為各種可怕現象的犧牲品，又能有什麼意義呢？只要你們不具有華格納<sup>622</sup>的“哲學的才能”，也就是說，如果不沉浸於“純粹的思維”，也不屬於那些能夠拿可憐的、絲毫不解決問題而且不妨礙任何人的“進步的公式”來開玩笑的頹廢派的話，不論你們把這些理想稱為抽象的，而把現實稱為具體的也好，或者反過來把現實叫作抽象，而把理想叫作現實也好，你們都不能不考慮這些問題。大家都知道，別林斯基既不是華格納，也不是頹廢派。而這當然使他大大為人賞識；但是，他為了這個榮譽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後來他把自己的這個“費希特時期”稱為瓦解的時期。他應當力圖擺脫這痛苦的状态，這是可以理解的。而同樣可以理解的是：這一意圖會使他同費希特哲學決裂。

437

不幸，這一決裂的歷史，由於缺乏資料，一直到现在還沒有了解得怎麼清楚。其實，大家知道，在1837年上半年，雖然別林斯基

刚刚认识黑格尔的体系的某些部分，但是，已经受到很大影响。大家也知道，这时他已经和他以前所坚决仇视的现实妥协了。他在1837年8月7日从皮亚提哥尔斯克写给一个年轻朋友的信对于他当时的心情已经阐释得十分明白。别林斯基热烈地劝他研究哲学。“只有哲学才能回答你的灵魂提出的一些问题，只有哲学给你的灵魂以和平与和谐，并且赠给你这样的幸福：这种幸福不是普通人所能料想，也不是外部的生活所能给你而且也不能从你手里夺走的。你将不是活在世界里，而是整个世界将活在你的心里……最好是丢掉政治，小心不让政治丝毫影响自己的思想方式”<sup>623</sup>。在俄国政治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对俄国“注定的命运和对法国注定的命运完全不同，在法国连科学、艺术、居民性格的政治方向都有自己的意义，都有自己的合理性和自己的好的一面”<sup>624</sup>。俄国的全部希望就在于普及教育并使它的公民在道德上作到自我完善。“假使构成俄国的每一个人通过热爱达到完善，那时俄国不用任何政治也会使自己变成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sup>625</sup>。当然，这完全不是黑格尔的观点，但是，我们已经说过，那时别林斯基还不充分了解黑格尔。我们认为重要的是：别林斯基是对俄国历史发展加以了解之后才与俄国现实妥协的，虽然这种了解是不正确的，并且一般说来是极端肤浅的。为什么我们的社会生活不像法国的社会生活呢？因为俄国的历史命运不像法国的历史命运。这样的回答使得人们不能在俄国和法国之间作任何比较。而这种比较还在不久以前曾使别林斯基作出痛苦的和几乎是毫无希望的结论。同时这种回答不仅能使我们同俄国的社会生活妥协，而且也能同法国的社会生活妥协——比如，也能同别林斯基不久以前热烈同情的十八世纪末的事变妥协；因为一切都要看它的环境是否合适。我们也看到，他在为法国人的“政治方向”辩解。不过，他在醉心于德国哲



学的“绝对”真理时已经不尊敬这一方向。法国人“没有永恒的真理，而是日常的真理，亦即在每天都有新的真理。他们不愿从人类理性的永恒规律里而是从经验，从历史里得出一切”<sup>626</sup>。这使别林斯基如此愤恨，以致咒骂法国人“给我滚开”，据他说，法国人的影响，除了害处以外从来没有带给我们别的东西，他并且把德国叫作现代人类的耶路撒冷，号召有思想的俄国青年应当怀着希望和信心把目光转向它。

438

然而，如果有人把同俄国现实“妥协了的”别林斯基看作是守旧分子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即使是在那时也离保守主义很远。别林斯基所以喜欢彼得大帝正是因为他同当时存在的制度断然决裂。“所有民族的皇帝都是依靠过去，依靠传说来教育自己的民族的；彼得使俄国摆脱了过去，破坏了它的传统”<sup>627</sup>。请承认这样的话出之于守旧分子之口是很奇怪的吧。同样，他完全不愿意把他那时的俄国生活理想化；他发觉，在俄国生活里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但是，他说明这些不完善之处是由于俄国的年青幼稚而产生的：“俄国还是一个小孩子，他还需要一个保姆，这个保姆的胸怀里要跳动着充满对她所抚养的孩子的热爱的心，而在她的手中应当有一根柳条，准备对这孩子的顽皮行为加以惩罚”<sup>628</sup>。他现在甚至还容忍农奴制度，但是，只是暂时容忍，只是因为他认为俄国民族还没有达到可以享受自由的成熟程度。用他的话来说，“政府在逐渐地解放”，而这种情况也使他非常喜悦，正如由于我国没有长子继承制，我们的贵族“自然而然地死去，没有任何革命和内部震动”<sup>629</sup>使他感到高兴一样。真正的守旧分子对于事物的看法完全不同，而假使其中不论是谁读过我们所引证的别林斯基的信，那末他会发现，它充满着最“荒谬的思想”，虽然他对于政治怀有否定的态度。而从“守旧分子”的观点看来，这会是完全正当的。别

林斯基不是同现实妥协，而是同他的抽象理想的可悲的命运妥协。

还在不久以前，他因为意识到这一理想丝毫不能应用于生活而感到痛苦。现在他相信，这一理想除了“抽象的英雄主义”和毫无结果的仇视现实以外，不能带来任何东西，所以放弃了这个理想。但这并不是说，别林斯基同进步背道而驰了。完全不是的。这只是说，他现在准备用不同于以前所想的方法来为进步而服务。他感叹地说，“让我们模仿基督的使徒，象他们在传播他们的宗教导师的学说的时候那样，既不干什么阴谋活动，也不成立公开的或秘密的政治团体，但不论是在君王和法官的面前决不放弃宗教学说，既不怕火，又不怕剑。不要去管与你无关的事情，但是要忠于你的事业，而你的事业就是热爱真理……政治去它的吧，科学万岁！”<sup>630</sup>

## 五

然而，对“政治”的消极态度远远没有解决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恶这样常常胜于善，武力胜于法律，虚伪胜于真理。在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以前，从“妥协”中所得到的道义上的胜利还是不大的，因为别林斯基仍然被疑团包围着。但是，现在他确信，黑格尔的体系会帮助他永久摆脱疑团。向他叙述了费希特学说的那个“哲学的门外汉”<sup>631</sup>帮助他进一步了解这一体系。黑格尔主义给了别林斯基多大影响，它回答了他的哪些问题？这从他写给斯坦凯维奇下列的信中可以看出：

“我从高加索来到莫斯科，B.（“哲学的门外汉”）也来了，我们住在一起。夏天，他翻阅了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和法哲学。一个新的世界在我们前面展开了。力量就是权利，权利也就是力量，——不，

我无法向你描述我听到这些话时，心情是怎样的——这是一个解放。我懂得了王国垮台观念，征服者的合法性。我懂得了，没有野蛮的物质力量，没有刺刀和宝剑的统治，没有专横，没有偶然性，——于是我保护人类的思想也消失了，而我的祖国的意义以新的形态呈现在我的面前。……在此以前，还有K（卡特柯夫）就尽可能地向我转达了，而我也尽可能地接受了《美学》的某些结果。——我的天哪，一个多么新的、光明的、无穷尽的世界！……‘现实’这一词对于我来说，具有和‘上帝’一词相同的意义。而你劝我常看蔚蓝色的天空——无穷尽的形象——而不致陷入家务的现实中；朋友，谁能在天空的形象中看到无穷尽的象征，他是快乐的，但是，须知天空常常被乌云遮住，因而谁能以无穷尽的思想照亮家务，他将更为幸福”<sup>632</sup>。

别林斯基现在真正在同现实进行妥协。一个甚至企图以无穷尽的思想照亮家务的人，不用说，在他周围生活中是丝毫不想进行任何改造的。他将因为意识到和观察到生活的合理性而快乐，他越崇拜理性，对现实的一切批评就越使他愤慨。在这一方面，别林斯基充满热情的性格会使他走得很远很远，这是不难理解的。现在甚至很难相信，他以直观他周围的现实而感到快乐，如同艺术家以看到伟大的艺术作品而感到快乐一样。他说，“这就是我的性情；我的灵魂紧张、痛苦和困难地接受爱、憎、知识、各种思想、各种情感；但是，接受这些以后，我整个为它们所浸透，它们一直浸透到我的内心深处。‘现实’这一伟大的词的意义就是这样在我的精神的洪炉中独立地<sup>633</sup>培育出来的……我现在看着我以前那么轻视的现实，当我意识到现实的合理性，看到不能从现实中抛弃任何东西，并且在现实中对任何东西也不能加以非难和驳斥时，真叫我高兴得心花怒放……现实！——我反复地说，在起床和就寝时，在

白天和夜里，现实都在包围着我，我在到处在一切方面都感觉到现实，甚至在我自身，在这新的变化里也感觉到现实，它一天天地变得更加明显了”<sup>634</sup>。

对合理的现实的“内心”喜悦，使我想起那些在同自然界接触时会欣赏它的美，同时又意识到自己和他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人们所体验到的喜悦心情。一个人同时以哲学家和诗人的心情来这样热爱自然，他也就会以同样满意的心情来注视自然的生命的一切表现。现在别林斯基也用同样热爱的心情注视着他周围的一切。他说，“不错，现实导入现实。当我不是按照事先准备好的理论来看每件事物，而是按照每件事物本身所提供的材料来看它的时候，我开始善于在真正的相互关系中看待它，所以大家对我满意，我对大家也满意。我对那些丝毫不想和他们来往的人们谈话时已经可以找到共同感到兴趣的话题”<sup>635</sup>。在他被派到测量学校工作时，他对于教师的平凡而有益的工作感到非常满意。“我怀着无限的好奇心注视这些手段<sup>636</sup>，所有这些手段从表面上看都是这样粗陋、卑俗和平凡的，却能创造一种有益的事情，虽然它不是那么灿烂夺目，容易觉察的，假使不注意它在时间上的发展，而肤浅地去看是不可捉摸的，但它的结果对于社会有极大的利益。只要我还有力量，我就有决心去做一切事情，为了大家的幸福献出自己这一份力量<sup>637</sup>”。

“抽象的英雄主义”现在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别林斯基由于受到以前的思想工作的折磨，甚至仿佛丧失了对伟大的社会问题的理论上的兴趣。他本能地意识到他周围生活的合理性，决心  
441 以此为满足。他说，“认识现实就是要有某种本能、分寸，因此，人的每一步骤是正确的，每一论点是真实的，一切待人的态度是无错误的，不勉强的……不消说，除了这种本能的热忱以外，谁在思想

上还有自觉心，那末，他就能加倍地掌握现实，但是，最主要的是要認識它，不管是怎样去認識”<sup>638</sup>。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別林斯基在他发展的前一个时期，曾努力去解决使他感到苦恼的抽象理想和具体现实之間的矛盾，他的解决方法是：把这一自相矛盾的两方之中的一方作为零，他把任何同理想相矛盾的现实宣称为幻影。他現在的作法恰恰相反：現在他把自相矛盾的另一方认为是等于零，就是說，把任何同现实相矛盾的理想宣称为幻影。在理論上說，这是一新的决定，不消說，这也和第一項解决方法同样是不正确的；不論是在这种或那种場合，把自相矛盾的一方认为等于零是沒有充分根据的。然而，別林斯基哲学发展的新阶段与前一阶段比較是前进了一大步。

为了充分了解这一阶段的意义，我們应当談談他关于鮑罗金諾战役写的文章<sup>639</sup>。

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在于同社会生活的唯理主义观进行斗争和闡明个人对整个社会的关系。看来，別林斯基在他的費希特时期同唯理主义观相处得很好，而現在他觉得这只是法国爱說話的人和自由主义的牧师才能有的荒謬絕伦的东西。“从我們只能从历史中才知道的时期起，直到我們的时代，从来沒有也不能有一个民族是根据一定数目的人按照相互和自觉的条件或者根据某一个有天才的人的主张而表示加入这个民族的”<sup>640</sup>。我們拿君主政权的起源來說罢。自由主义好說話的人可能說，君主政权是人們墮落的結果，因为他們确信沒有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所以认为必須使自己服从他們自己所选出和被賦予无限权力的一个人。“从那些具有抽象的头脑的人的浅薄的眼光看来，思想和現象本身并不含有原因和必然性，而是像雨后春笋一样生长出来的，不仅沒有土壤和根莖，而且是在空中成长的，——对于具有这样头脑的人來說，

442 沒有比像这种說明更簡單和更令人滿意的了；但是，在另一些有遠見、能洞察事物的深处及其內在實質的人看來，再沒有比這樣的說明更加荒謬、更加可笑和更加無理性的了。一切事物，如果在自身內部並不含有原因，而是來自對它頗為生疏的某種外部地方，不是來自自身‘內部’，那末，這一切是這樣缺乏合理性，因此是缺乏神聖性。國家的基本法令之所以神聖並非是因為這些法令是某一個有名民族的基本觀念，而是因為是每一個民族的基本觀念，並且還因為這些法令轉變為現象成為事實之後，是在歷史運動中辯證地發展着的，因而這些法令的一些變化只是它們自己觀念的一些階段。因此，基本法令不是一個人所說的法律，而是可以說，事先地並且只是被人們所約定和承認的”<sup>641</sup>。

在這裡，運用哲學術語似乎是不夠恰當的。例如，從我們的引文中可以看出，按照別林斯基的意見，哲學家可能發現了事物的內在本質。但是，什麼是內在本質呢？我們覺得歌德說得完全正確：

Nichts ist innen, nichts ist aussen,

Was ist drinnen, das ist draussen<sup>642</sup>.

但是，我們將不去研究一些細節。我們需要把別林斯基當時的觀點的一般性質告訴讀者。

從他的新觀點看來，在社會發展的辯證過程中，個人的作用是怎樣的呢？

別林斯基說，“一個人從他自己個人來說，是個別和偶然的，但是，從精神方面來說，是一般的和必要的——精神的表現就是個人。從此就產生了他的地位和他的意圖的兩重性：他在自己的我和處於自己的我之外東西的鬥爭構成他的非我……。為了成為真正的人，而不是幻影，他應當是一般的局部表現或者是無限的有止境表現。因此，他應當放棄自己的主觀的個性，承認它是虛偽和幻

影，应当在世界的、一般的之前屈服，只承认它是真理和现实。但是，因为这一世界的或一般的不是在他自身里，而在客观世界中，他必须和它亲近起来，和它熔合起来，以便在以后，即把客观世界吸收为自己的主观财产以后，重新成为主观的个性，但已经是真正的、已经表现为非偶然的个别性，而是一般的、世界的东西——一句话，成为肉体中的精神”<sup>643</sup>。

一个人为了不致成为幻影，应当成为一般的个别表现。最进步的世界观是可以同对个人的这种看法相容的。当苏格拉底反对雅典人的陈旧概念时，他正是为了“一般的、世界的”东西而服务，他的哲学说教是雅典人在其历史发展中所迈出的新的步骤的理想的表现。正是因为如此，苏格拉底便成了黑格尔所称呼的英雄。因此，当作为一般的个别表现的个人以其否定为新的现实，即为明天的现实准备历史基础时，个人跟它周围的现实的不协调是完全正当的。但是，别林斯基却不是这样论断的。他宣扬对存在的事物的“顺从”。正如在论鲍罗金诺的论文中，特别是在论闍采尔的论文中那样，他愤怒地痛斥“小大人物”，在他们看来，历史是没有联系的故事，充满着许多情况之间的偶然和矛盾的冲突。按照他的说法，这种历史观是悟性的可悲产物。悟性始终是只抓住事物的一个方面，而理性则从各方面考察问题，虽然这些方面仿佛是互相矛盾的。“因此，理性不是在创造现实而是在认识它，事先把握着一个公理，那就是：凡是存在的，也就是必然的，也是合乎规律的，也是合理的”<sup>644</sup>。

443

别林斯基在另一论文中说，“现实是生活中积极的东西，幻影则是生活的否定”<sup>645</sup>。假使是这样，那末他对否定现实的“小大人物”的攻击将变成完全可以理解的；凡是否定现实的人都是简单的幻影。别林斯基陷入了最极端的乐观主义，这也同样是可以理解

的。假使对现实的一切否认是虚幻的，那末现实是无可非难的。值得注意的是：让我们来看看别林斯基是怎样努力用历史的例子证明“生活在大地上的人们的命运”并非听盲目的偶然性摆布。“奥玛尔烧毁了亚历山大的图书馆：奥玛尔是该诅咒的——因为他永久毁灭了古代世界的教育！请等一等咒骂奥玛尔罢，先生们！教育是美好的东西；假使它是一个海洋，不论哪一个奥玛尔能把这一个海洋晒干，总还有在地下的看不见的潜伏的活水泉源，它很快就会喷到外面来变成海洋”……<sup>646</sup>。不用说，这是一个奇怪的结论：由于说“奥玛尔”们不能把所有教育的泉源弄干，根本不能得出结论说他们的活动是无害的，因此，我们完全应该“等一等咒骂他们”。别林斯基的乐观主义达到了非常天真的地步。但是，我们看到，从他对现实的新的观点中产生这种乐观主义，完全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一新观点的产生并不是由于别林斯基似乎没有很好地理解黑格尔，恰恰相反，他完全领会了表现于《Philosophie des Rechts》<sup>①</sup>序言中的黑格尔哲学的那种精神。

我们详细地叙述了黑格尔在这一序言中所表达的观点。让读者把这些观点和别林斯基的“妥协”观点比较一下，那末他就会惊奇地感到它们是完全相同的。差别只在于：“愤怒的维萨里昂”比冷静的德国思想家要急躁得多，因此，也就达到了黑格尔从来没有谈到过的那种极端程度。别林斯基说，“伏尔泰像撒但。撒但被最高意志从金钢石的锁链里解放了出来（他是被金钢石的锁链钉在永久黑暗的火的住所里的），他就利用短短时期的自由来危害人类”<sup>647</sup>。黑格尔没有说过而且是不会说这样的话的。这样的例子可以引证很多，但这一切都不会变更事情实质的一些细节，这一实质

① 《法哲学》



是，別林斯基在发表自己这些观点时<sup>648</sup>是完全忠实于黑格尔“绝对”哲学的精神的。如果伏伦斯基先生以为这些妥协的见解是“奇怪的”，那末，这说明他不熟悉“思考永恒性的人”——即黑格尔的著作的。诚然，伏伦斯基先生在这种情况下只是重复斯坦凱維奇、赫尔岑、屠格涅夫等在他以前说过的那些话。但是，他答应要“详细地”通过“用別林斯基的某些见解和它们的最初来源加以对比”的方法来研究黑格尔给予別林斯基世界观的影响的问题。为什么他只要重复别人的错误呢？难道不是因为他本人很不了解“最初的来源”吗？<sup>①</sup>

別林斯基从黑格尔的那种表明了想成为绝对真理的野心的哲学中所吸收的保守精神，比他的朋友中的任何一个人——例如，M. Б. 和斯坦凱維奇——都更为充分。大概他自己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友谊的劝说对他不起什么作用，这些劝说的目的是减弱他的“妥协调和的”急躁性，要知道朋友们也是站在別林斯基继黑格尔之后现在所宣扬的似乎是绝对真理的观点之上的，而从这个观点来看，对“自由主义的爱说大话的人”的任何让步，只不过是一种可怜的不彻底性<sup>②</sup>。

当然，我们可以说，假使黑格尔在《Philosophie des Rechts》<sup>③</sup> 445  
问世时已经和普鲁士现实妥协了，那末，从这里不会得出结论说，

① 阿·斯坦凱維奇先生在他的著作《季·尼·格兰諾夫斯基及其通信》（莫斯科，1897）中像伏伦斯基先生那样发表一种意见，说別林斯基的妥协的思想是从黑格尔思想得出的不正确的结论（第1卷，第107—108页）。阿·斯坦凱維奇先生是否知道“不正确的结论”也是黑格尔本人所作的呢？

② 格兰諾夫斯基在他写给亚·米·涅維罗夫的一封信中说，巴枯宁是首先反对別林斯基的论文《论鲍罗金諾战役》的等等<sup>649</sup>。可惜，从信里看不出这种反对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无论如何，这种反对的基础不可能是对黑格尔哲学的进步的一面的理解，M. Б. 是在以后才理解到这一点的。

③ 《法哲学》

他也会和俄国现实妥协的。这是不错的。但是，有各种不同的否定。黑格尔会宣布俄国的现实是半亚洲式的；他曾一般地认为斯拉夫的世界是处于欧洲和亚洲之间的某种中间的东西。但是，亚洲式的现实也是“理性的化身”，因而黑格尔，不是辩证家的黑格尔，而是“绝对真理”的提倡者的黑格尔，恐怕未必会赞许个别人物的有限理性起来反对现实的。

## 六

现在让我们从另一方面来观察别林斯基妥协的见解。

“自由主义的爱说大话者”的社会理论之肤浅的反科学的性质使他感到愤慨。“爱说大话者”以为社会关系能够按照人们的奇想来加以改变，然而生活和社会发展在实际上是“受社会实质中所含有的确定不移的规律所制约的”。“爱说大话者”在实际上正在进行发展的必然过程的地方所看到的是任性和偶然性。社会现象是从其本身按照内在的必然性辩证地发展起来的。凡是自身并不含有原因而产生于某种与它不相干的“外部”的一切东西，都没有合理的性质，凡是不合理的东西，只不过是幻影。这就是别林斯基用来与过去一个世纪所传来的对社会生活的理性主义观点相对立的那些见解。这些见解比理性主义观点无比地深刻和严肃，因为理性主义社会观没有为科学地解释社会现象留下任何余地。必须是很可尊敬的俄国“社会学家”才能在别林斯基的妥协的见解中除了“哲学的胡说”以外看不出别的东西。同样，也只有很可尊敬的俄国“社会学家”，鉴于以上所述的别林斯基对生活 and 人类社会发展的看法，才能做出那个卓越的发现：说我们的天才的批评家每当“美学的现象被哲学的和政治-精神的原则复杂化的时候，多少会失去‘真理感’的”。要是所谓真理感是指理论的真理感，——而在

这类問題中也只能談理論的真理感，——那末，必須承認，当別林斯基非常高兴地忙着掌握并且热心宣揚把历史看作是必然的，因而是符合規律的过程的时候，他显示了巨大的真理感。在这一場合俄国的社会思想以別林斯基为代表第一次以天才的勇敢精神着手去解决那个如我們所已看到的吸引了十九世紀最优秀的思想家的任务。 446

为什么工人階級的情况很坏呢？这是因为“欧洲的現代經濟制度是在研究这些現象領域的科学还没有存在的时候开始形成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这样說的。別林斯基会看出这种說法是他所痛恨的对社会生活的理性主义观点，并且把这个观点，就其內在的价值來說，同自由主义的僧侶的輕率判断等量齐观。他写道：“现实，作为理性的化身，永远是先于意識的，因为在意識之前，必須有作为意識目标的对象。正是因为这个緣故，自然科学，或者关于自然的學問，是远在自然界本身之后出現的，語法是在有了語言之后出現的，历史是在各国人民經歷了生活之后出現的”<sup>650</sup>。根据同样的理由，他可以說，“研究”某种經濟制度的科学只能在这个制度形成之后才能出現，但是如果用科学出現的較迟来解释这种制度的这些或那些积极的或消极的性质，那么，这种解释就跟把传染病的存在归之于創造世界时自然界沒有医生可以向他們借用有关卫生的正确概念一样合理。不用說，从我們現代的客观科学的观点来看，別林斯基是完全正确的。因此，別林斯基在三十年代末的理論真理感，已經比米海洛夫斯基以及和他相似的現时的可敬的社会学家的理論真理感要强得多。不能說，这一結論能使拥护我們祖国进步的朋友們得到十分安慰，但是当然我們首先不能隱瞞这种結論。

讓我們举另一个例子。在我国，民粹派关于我国的土地村社

写了很多东西。他们在说到它的历史和它现在的情况的时候是常常犯错误的，虽然说多多少少是诚实的。但是，我们假定，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犯过一个错误，我们只要问：当他们叫喊应当用一切力量来“巩固”村社的时候是否错了呢？他们在这点上是以什么为根据的呢？他们的根据是，关于现代村社能过渡到高级经济形式的信念。但是，村社内部又存在着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呢？这些关系的发展能使我们现代的分土地的村社过渡到高级的生活形式吗？不，恰恰相反，这些关系的发展，将导致经济的个人主义的胜利。民粹派自己——至少其中最明道理分子——对于这一点不只一次地表示过同意。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期望的是什么呢？他们的期望，是在知识分子和政府对村社的外部影响之下，将能战胜它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别林斯基以很轻视的态度看待这些希望。他在这种希望中也正确地看出了对社会生活的理性主义观点的残余思想。他也许会宣布这些希望是虚幻的和抽象的，因为凡是自身并不含有原因，产生于与它不相干的“外部”而不是“内部”的一切东西都是虚幻的。而这又是完全正确的。于是我们又必须做出为祖国进步所不赞许的结论，即别林斯基在三十年代末已经比我们现在的旧制度的拥护者们较为接近于对社会现象之科学的理解<sup>①</sup>。

国家的根本法令“不会是一个人所宣布的法律，而可以说是事先地而且只是为人所约定的”。是不是这样呢？别林斯基关于这一问题的议论由于受到他当时的保护性的激昂心情的影响而大大模

---

<sup>①</sup> 然而应当指出，现在已经只是少数的民粹派在幻想着山村社到高级社会生活形式的过渡。这些可尊敬的人的大多数，在放弃了各种“传染的”思想之后，所“忙碌地张罗着的”只是经济的富农的繁荣，村社现在已成为他们手中剥削农村无产阶级的可怕工具。不能不承认，这类的忙碌不是“虚幻的”而且和“抽象的理想”毫无共同之处。

糊起来了，因而他的言論常有含蓄而夸张之处。然而即使在這些議論里面也不难找出十分健全的核心。从現在的社会科学观点看来，毫无疑問，不仅国家的根本法令，而且一般的法制，都是实际关系的表現，人們不是任意的而是由于必然性才形成这些关系的。在这一意义上，所有一般的法制都“只是为人所約定的”。既然別林斯基的話有这种意义，那末应当承认这些說法是絕對正确的。即使在現在，也不妨常常拿出別林斯基的話来提醒我們那些“抽象理想”的体现者，他們认为法律规范是由于人們的奇思怪想所創造的，所以他們可以随心所欲地从自己的法制中做出任何折衷主义的稀粥<sup>①</sup>。

我們再重复一遍，俄国社会思想界人士通过我們天才的批評家，第一次而且是勇敢地着手去解决十九世紀給欧洲一切有思想的人士所提出的伟大任务。別林斯基在理解到这一任务的巨大重要性以后，突然感觉到自己有了可靠的基础，他因为面前所展开的辽阔无垠的地平綫而欢欣鼓舞，正如我們已看到的，他在某一个时期是以伊壁鳩魯派的目光来看他周围的现实的，并且預先体会到对它的哲学認識的快乐。而在这里又怎能不对“小大人物”恼怒呢？他們不是以自己的一——該是承认这点的时候了——在理論上毫无根据的高談闊論来妨碍安静和快乐地欣賞突然发现的真理宝库嗎？当別林斯基根据自身經驗已經知道“抽象理想”实际上完全不中用，而且还如此清楚地記憶着把自己看作“零”的痛苦的认识（这一认识經常使他感到被这一理想所引起的喜悦）的时候，怎能不攻击“抽象理想”的体现者，怎能不用嘲笑来責备他們呢？对于

<sup>①</sup> 例如，我国有许多人以为，俄国可以一方面“巩固村社”，而另一方面，要往这个“已巩固的”基础上，也就是說，往亞細亞土地占有制的基础上移植西歐社会法律的某些制度。

那些虽然也愿意别人幸福,但是,由于自己的近视而把别林斯基认为是唯一能使人类得到幸福的哲学看作有害的人们,怎能不蔑视呢?

但是,这样的心情不会长久的;与现实妥协毕竟不是持久的。别林斯基早在1839年10月携带当时尚未出版的《鲍罗金诺战役论》一文去彼得堡时,还远远没有形成对周围一切事物的光明和快乐的看法,这种看法只是在他醉心于黑格尔哲学的初期才出现的。他说,“我的内心痛苦变成了某种枯燥无味、残酷无情,在我看来,谁也不存在,因为我自己是死人”<sup>651</sup>。诚然,这种新的沉痛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个人幸福而产生的,但是,如果知道别林斯基的性格就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黑格尔哲学给了他哪怕是所允诺的一部分的话,那么,他甚至不会觉察这一不足。他在1839年12月16日至1840年2月初旬之间写给波特金的一封长信中感叹地说,“可笑和令人不快的是,罗米欧和朱理叶的恋爱是一般的,而读者对于爱的要求或读者的爱是特别的和虚幻的。生活在书中,而在生活中什么也没有!”<sup>652</sup>请注意这些话。这些话表明,他在449 在那时和黑格尔的“绝对”结论已经相处得不怎么好了。实际上,假使有思想的人的任务只以认识他周围的现实为限;假使他对现实的“创造性的”态度的任何尝试是“虚幻的”,而且早就注定要失败的,那末,实际上除了“生活在书中”以外,就什么也没有了。再则,有思想的人必须和存在的事物妥协。但是,活着的不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事物”已经僵化了,它已失去生活的气息。活着的是正在生成(wird)的东西,是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东西。生活如果不是发展,那么它是什么呢?而在发展过程中必须有否定的要素。谁要是在自己的见解中对于这一必要的要素不给予足够的认识,那末,对于他来说,在实际上生活会变为“乌有”,因为他在他和“存

在的事物”妥协中所遇到的不是生命，而是某个时候曾經存在过，但是現在已經不再是生活的东西。黑格尔的“绝对”哲学在宣布与它同时的现实是不应当被否认的，从而宣布只能在书籍中有生活，而在书籍之外不应当有生活。这一哲学正确地教导說，个别的人不应当把自己个人的奇思怪想以及重要的利益看得高于“全体的”利益。但是，这一哲学所珍視的一般的利益是停滞的利益。别林斯基本能地感到了这点，要比理性地認識它早得多。他曾期待哲学指出通往人类幸福的道路。关于偶然性之战胜人类的理性的一般問題，对他常常是作为局部的問題而提出的，这就是：为什么暴力能战胜权利呢？黑格尔是怎样对他回答这一問題的呢？我們已經看到是怎样回答的：“沒有野蛮的物质暴力的統治；沒有刺刀和劍的統治；权利就是力量，力量也是权利”<sup>653</sup>。当我们把这个回答有些費解的形式（不是属于黑格尔而是属于别林斯基的形式）撇在一边时，应当承认，在这回答的里面隐藏着深刻的真理，前进运动的拥护者的希望只能建立在这个真理上面。这真奇怪，但是这确是如此。让我们举一个显明的例子。法国旧制度的保护者们对西叶斯喊道：“我們封建的权利是建立在征服之上的。”于是西叶斯反駁說：“正因为这样！我們將成为征服者”。这一驕傲的回答表现了第三等級意識到自己統治的时代已經成熟。而当第三等級真正成为“征服者”时，它的統治就不单是一个物质力量的統治；它的力量也就是它的权利，而它这权利是建立在法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需要之上的。凡是与社会需要不相符合的东西，就沒有任何权利，但是，凡是有类似权利的东西，不論迟早也将会有力量。对于一切拥护真正进步的朋友來說，还有什么能比这一信念更为愉快的呢？而这样的信念是必然为黑格尔对于权利和力量的关系的看法所提示的，只要这种看法被正确了解的話。但是，为了正确的理解这种

450 看法，应当从辩证的发展的观点而不是从标志着任何发展的停止的“绝对真理”的观点来看历史和现代的现实。从绝对真理的观点来看，历史运动的权利变成了普鲁士的容克<sup>①</sup>剥削隶属于他们的农民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而且所有被压迫者之所以注定忍受永恒的压迫，唯一的原因是“绝对真理”在它出现在意识世界时，这些被压迫者是软弱的，因此也是没有权利的。这正象法国人所说的那样*C'était un peu fort*<sup>②</sup>；而别林斯基当他刚开始分析自己新世界观的细节时，应当觉察这一点。从他的通信集里可以看出，在我们文献中所说的他和黑格尔决裂是由于“绝对的”黑格尔哲学不能回答使他感到痛苦的社会和历史问题。“人们对我说：发挥你的精神的所有宝藏吧，以便获得精神上自由的自我快乐；哭泣吧，以便自我安慰；忧伤吧，以便获得喜悦；力求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吧，往发展的梯子的最高一段爬吧，如果碰着什么东西，那末，好吧，就跌下来吧，情况就是那样……。我恭敬地感谢您，耶哥尔·费多罗维奇<sup>③</sup>，我向您的哲学帽子鞠躬；但是，我怀着适合于您的哲学的庸俗观点的尊敬心情荣幸地向您报告：如果我能爬上发展的梯子的最高一级，我在那里也将请求您告诉我生活条件和历史的一切牺牲者，告诉我偶然性、迷信、宗教裁判、菲利浦二世等等的牺牲者；否则我将从最高一级倒栽葱地跌下来。如果我对我的每个同胞的命运不能安心，那我也不愿意白白幸福……。有人说，不谐和是谐和的条件：也许这对于音乐迷们是很有利的和使他们感到快乐的，这当然不是指那些注定以自己的命运来表示不谐和思想的人说的”……654

① 即大地主。——译者

② 〔这有点太过份〕

③ 指黑格尔。——译者



解释偶然性、迷信、宗教裁判所等等牺牲者是什么意思呢？照伏伦斯基先生的意见，这根本什么意义也没有。他说：“对于别林斯基的误会（这是为了说俏皮话而以公文报告体裁叙述的并且附有如此丢人的狡猾的审问），黑格尔在带着宽容的微笑停止了好斗的敌人以后，就会说：‘发展要求人们作出牺牲，要求作出自我牺牲的艰难的英勇行为，为了人类幸福而沉痛地忧伤，没有人类幸福就没有个人的幸福，但是，唯心主义哲学并不能使偶然的牺牲者成为被人尊敬的，也不和迷信、不和宗教裁判调和。在发展的辩证过程中有强大的武器——否定，它把人们从宗教裁判所的监狱里引到新鲜的空气里，引到自由。偶然性是反常现象，只有盖着神圣的正义和英明的烙印那种东西才是合理的！’”<sup>①</sup>

在娓娓动听的这几行话里，照例是充满着没有好好消化的概念的使人吃惊的混乱，这种混乱是伏伦斯基先生哲学才能所特有的。第一，黑格尔大概不会对别林斯基谈个人自身的智慧发展和精神发展所要求个人作出的牺牲和奋不顾身。他会明白，别林斯基所说的完全不是这些牺牲。这样看来，德国唯心主义者诚然会失去按照伏伦斯基先生的修辞学写一句娓娓动听的话的宝贵机会，但是，他会更快地说到本题。而在这里，本题就是下面这一问题：黑格尔所得出的那些“绝对的”结论和他在《Philosophie des Rechts》（《法哲学》）序言中所宣扬的与现实妥协，是否和否定的要素互相矛盾，是否把这一真正“有力的武器”化为乌有呢？我们已经看到，是这样的，这样的矛盾确实是存在着，而且这是从黑格尔哲学所特有的根本矛盾产生的，也就是说，从这一哲学辩证的性质和它要获得绝对真理的称号的奢望之间的矛盾所产生的。伏伦斯基先生

<sup>①</sup> 《俄国的批评家》，第102页。

看来甚至没有怀疑这一矛盾。这并没有使得人们欣赏他的“哲学才能”。他所瞧不起的别林斯基,在三十年代末就已经感觉到这一矛盾的存在。他在同一封信里说:“我早就怀疑,黑格尔哲学只是一个契机,虽然是伟大的,但是,它的结果的绝对性是完全无用的<sup>①</sup>,而且宁可死,也不同这些结果妥协”<sup>655</sup>。“怀疑”这样东西的俄国人,而且还是在三十年代之末,实际上是应当具有高度的“哲学组织”的。而直到现在还不了解他的那些“哲学组织”是很糟糕的。不值得以“宽容”的微笑,而是以最蔑视的微笑对待这些组织。

不消说,别林斯基并没有把黑格尔看作是应当为宗教裁判的功绩,为菲力浦二世的残忍等等负责的人。当别林斯基要求黑格尔对于人类历史运动中的所有牺牲加以解释时,曾指责他背叛了自己的哲学。并且这项指责有着非常充分的根据。在黑格尔看来,自由是历史发展的目的,而必然性是导致这个目的的手段。当然不可因为发生完全不以黑格尔的意志和影响为转移的事情而指责这位从如此崇高的观点来看历史的哲学家。但是,可以要求他指出理性能赖以战胜盲目偶然性的手段。只有发展的过程才能给予这些手段。黑格尔宣布自己是绝对真理的拥护者并与现实妥协之后,就背弃了任何发展,而且承认了使他的同时代人类感到痛苦的那个必然性是理性。这等于宣布自己在哲学上破产。也正是这种破产使别林斯基感到忿恨。使他感到不愉快的是:他继黑格尔之后,会把当时的普鲁士看作是“最完善的国家”。

这个最完善的国家是依靠(用极旧式的方法)剥削多数人为少数特权阶级服务而存在的。别林斯基反对黑格尔的“绝对”哲学时非常清楚地了解到这一点。他已经完全站到被压迫者的方面。但

<sup>①</sup> 貝平先生在附注里說:“我們改換了信里比較激烈的詞句”。

是,在他看来,被压迫者不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的生产者,而是普通人,被压迫的个性。所以他也就为了人格而抗議<sup>656</sup>。他感叹地說:“現在該是本来就不幸的人类个性从不合理的现实,无知的人們的意見和野蛮时代傳說的丑惡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了”<sup>657</sup>。因为这个緣故,有些人并不反对把他描繪成某种自由的个人主义者。但是,这完全沒有根据。別林斯基本人会很好地說明他当时的情緒的。他說,“在我的內心里对于自由和个性独立燃起了某种瘋狂的<sup>658</sup>热爱,这种热爱只有在以真理和英勇精神为基础的社会里才可能有……。人的个性已經成了我害怕会使我发瘋的地方。我开始像馬拉<sup>①</sup>那样地热爱人类,为了使人类的极小一部分得到幸福,我仿佛会用火和劍来歼灭其余的部分似的”<sup>659</sup>。这無論如何已經不是自由的个人主义了。下列的別林斯基的坚决的声明同它也是毫无共同点的:“我現在处于一个新的极端之中——这就是社会主义思想,它对于我來說成了思想的思想……信仰和知識的起点和終点……它(在我看来)吞沒了历史、宗教、哲学。因此,我現在是依靠它來說明我的、你的以及我在生活道路上所遇到的一切人的生命(見 1841 年 9 月 8 日給波特金的信)<sup>660</sup>。

貝平先生急忙地使我們相信,別林斯基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 453  
完全无害的。可敬的学者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是白費力的,誰不知道那时的社会主义对那时的社会制度一般并不含有任何实际危險? 然而別林斯基醉心于社会主义并沒有絲毫可怕之处,这对他的精神生活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所以不应当把这件事放在阴暗里,而应当尽可能大力加以宣揚。

① 馬拉(Marat, Jean Paul 1743—1793)法国資产階級革命时期的著名活动家,生于瑞士,出版《人民之友》进行革命的鼓动工作,加入丹东和罗伯士比尔领导的小資产階級的雅各宾党,后被刺。——譯者

## 七

为什么别林斯基由“绝对”唯心主义的哲学这样迅速而坚决地转到空想社会主义呢？为了说明这一转变，应当再看一看我们的批评家和黑格尔的关系。

当别林斯基责骂他关于鲍罗金诺战役所写的论文是愚蠢的和不是一个正派作家所应有的论文时，他仍旧认为他的精神生活是他从高加索回来以后开始的，那时他完全醉心于黑格尔哲学。这个时期在他看来是他的生活中“最好的，至少是最值得注意的时期”。他所以认为他关于鲍罗金诺战役所写的论文是愚蠢的，只是因为它的结论，而完全不是因为它的基本论点。他说：“我在关于格林卡的《鲍罗金诺战役》一书所写的论文中努力发挥的思想，在原理上是正确的”<sup>661</sup>。他只是没有能够很好地运用这些正确原理。“还应当发挥作为历史权利的否定的观念，它的神圣性并不亚于前者，而且没有它，人类的历史会陷入发臭的死水潭”<sup>662</sup>。读者大概还没有忘掉我们在上面从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所作出的摘录。这些摘录表明，黑格尔既然忠实于自己的辩证法，就完全承认了否定的历史权利。别林斯基在驳斥黑格尔的“绝对的”结论时，认为他完全抛弃了他的哲学。实际上，他只是由“绝对真理”的宣传者的黑格尔转到辩证论者的黑格尔。尽管他嘲笑黑格尔的哲学帽子，仍然是最纯粹的黑格尔主义者。他关于彼得大帝所写的第一篇论文全都充满着黑格尔哲学的精神。在第二篇论文<sup>663</sup>中同样的精神占有优势，虽然别林斯基在这里关于地理环境对各个民族精神生活特点的影响所作的论断企图站到另一个观点上去，但是，这些十分不成功的论断丝毫也没有改变他当时世界观的一般性质，他那时的世界观仍然完全是唯心主义的<sup>①</sup>。所有他当时的信徒

們也仍然是唯心主义的。似乎他的傳記的作者並沒有完全把这点弄清楚。貝平先生說，在赫尔岑《自然研究通信》（刊登在1843年的《祖國紀事》）中，“关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任务的提法和現在具有最优秀的头脑的人們的提法是一样的”<sup>②</sup>。这是一个大錯。看来，把貝平先生导向錯誤的是《通信》作者的坚决評論：“黑格尔把思維提到这样的高度，使得在他以后如不完全把唯心主义抛在后面就不可能前进一步”<sup>③</sup>。但是，这项評論絲毫不妨碍赫尔岑在他对自然的看法上（在这方面，他是純粹的黑格尔主义者）和在历史哲学上都繼續是一个純粹的唯心主义者。他以为“在唯物主义中，不能比霍布斯走得更远”。他把那些以为“全部世界史是个人捏造的事情和偶然性奇怪的凑合”的人們叫作历史中的唯物主义者（！）<sup>④</sup>到1844年上半年为止，赫尔岑在自己的《日記》里到处都表现出他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只是在这一年的七月，他在維干德季刊<sup>⑤</sup>里贊許地說到約尔丹的唯物主义的論文。但是，就連这一意見还并不完全标志着他的观点中有什么坚决的轉变<sup>665</sup>。

貝平先生也看到，別林斯基“最后的哲学兴趣”是“作为形而上学坚决的否定”的孔德和李特雷的实证主义。很可惜，貝平先生沒有把那封据他說是別林斯基長談实证主义的信全部刊登出来。假使就貝平先生从这封信所引证的摘录来判断，那么我們的批評家

① 在这方面，关于尼基田科教授《論找評》的演說所写的文章是很值得注意的（圣彼得堡1842年）664。

② 《別林斯基》等等，第1卷，第228頁。

③ 見赫尔岑：《自然研究通信》，第一信，《經驗主义和唯心主义》。——譯者

④ 如果把这一点和現在从各方面对“經濟”唯物主义者提出的責难加以比較，那倒很有意思。

⑤ 《維干德季刊》（《Wigand's Vierteljahrsschrift》）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杂志。——譯者

关于奥·孔德的意见是不利的，貝平先生本人也承认这点：別林斯基說：“孔德是一个出色的人，但是，說他是新哲学的創始人，那还差得很远！要成为新哲学的創始人，要有天才，而在孔德身上却連天才的一点影子也沒有”<sup>666</sup>。正是因为这样，我們并不认为，如果別林斯基不早死，他会倾向于实证主义。如果我們要做假設的話，那么，我們敢于假設，将来他会成为在十九世紀后半叶代替了过时的唯心主义哲学的辯证唯物主义的热心信徒：吸引了他的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正是轉到这方面来，而且他愉快地閱讀了由辯证唯物主义未来的創始人撰稿的《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sup>①</sup>，是不为无故的。假使他在1845年一点儿也不反对他們的思想，那么，为什么要后来，当它們已經发展起来并且得到了牢固的基础时，去反对呢？

不过，这里应当看到这一点：哲学思想的邏輯发展关系有利于我們的假設。可以說反对这一假設的是：由于別林斯基离开西欧知識中心非常遙远而且总是有紧急的工作，所以很难不落后于欧洲最优秀的思想家。最有天才的人，为了自己的发展，需要有环境的良好影响；在我国，这一环境，从各方面來說都是非常不发达的。正是因为如此，很可能別林斯基直到他逝世以前也沒有能够达到他所热烈而經常企求的一定的完整的世界观。五十年代后半期开始的社会动蕩很可能使他成为当时的我国启蒙者的首領。正如我們在以下一文中所要看到的，在他的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有不少因素会使他比較不困难地轉变到在俄国当时是完全合理的那种启蒙主义观点去的。

但是，我們所做的假設已經足够了。讓我們回到事实上来吧。

---

① 《德法年鉴》

别林斯基需要发展否定的思想。貝平先生继《俄国文学果戈里时期概論》的作者之后认为,在这一发展中赫尔岑给了他很大帮助。当然,他在这个意义上是对的,那就是:同赫尔岑那样富有生命力、聪明、受过多方面教育的人談話和爭論,对于别林斯基的观点是不会沒有影响的。但是,我們认为,和赫尔岑会晤,虽然有力地推动了别林斯基的智力活动,但是,对于他对社会現象的辩证观点的发展是很少有幫助的。赫尔岑的辩证法学的不好<sup>667</sup>。大家知道,直到他逝世时为止,他都认为蒲魯东的«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sup>①</sup>是以辩证法研究社会經濟的极其成功的应用。他认为被正确理解的黑格尔哲学不可能(不管黑格尔本人怎样說)是停滞的哲学。但是,如果我国有人把黑格尔关于所有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一說法了解得不对的話,那么,这个人就是卓越而肤浅的赫尔岑。他在《往事与回忆》中說:“哲学語句带来的害处最多,德国守旧派力图利用哲学語句使哲学与德国的政治生活調和:‘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种哲学語句是用另一种話說出的充足理由律和邏輯与事实相符合的原則”<sup>668</sup>。但是,黑格尔从来不会满足于“充足理由的原則”一类的老生常談。十八世紀的哲学家也承认过这一原則,然而他們无意接受黑格尔把历史当作合乎規律的过程的看法。問題在于,某一社会理論是在哪里和怎样寻找說明社会現象的充足理由。为什么法国的旧制度垮台了呢?是不是因为米拉波的雄辯呢?还是因为当时的法国秩序的保卫者軟弱无能呢?或者是因为国王家族沒有脫逃成功呢?赫尔岑指出的“原則”只保证旧制度垮台是有过某种理由的,但是,对于研究这一理由的方法并未給予任何指示。于是黑格尔哲学也就出来想要帮助解决这一

456

① 《經濟矛盾》。此书全名为《經濟矛盾的体系,或貧困的哲学》(2卷,1846年)。馬克思的《哲学的貧困》(1847年)就是批判这本书的。——譯者

缺陷。黑格尔哲学把人类的历史发展看作是合乎规律的过程，从而消除了偶然性的观点<sup>①</sup>。而且黑格尔完全没有按照必然性这个词的普通意义来理解它。例如，假使我们说，法国旧制度之所以垮台是由于国王没有脱逃成功，那么，我们承认，既然脱逃没有成功，旧制度的崩溃就成为必然的了。这样庸俗而肤浅地理解的必然性，只是偶然性的反面。在黑格尔那里，偶然性有另一个意义。当他說某一社会现象是必然的，这就是說，这一社会现象是由它所发生的那个国家的内部发展所准备的……。但是，这还不是一切。按照他的哲学的說法，任何一个现象在它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从它本身中就会产生在后来否定它的那些力量。应用于社会生活时，这就是說，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本身都会产生破坏它自己和用新制度代替自己的那些否定因素。假使你们明白产生这些因素的过程，那么也就会明白旧制度灭亡的过程。当别林斯基說，他“应当发展否定的观念”时，是想說，他应当指出<sup>669</sup>在每一种社会制度中产生上述因素的历史的不可避免性。当他忽略了任务的这一重要方面时，他大大錯誤了。但是，赫尔岑所指出的“充足理由律原则”  
457 对于改正他的邏輯上的失算來說，完全是不“充足”的。在这一意义上說，别林斯基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处理的。

順便說說，发展否定的观念，就等于承认“理想”的权利，而“理想”，在迷恋于黑格尔哲学的狂热时为现实牺牲了。但是，从别林斯基的观点来看是正当的那种理想，不可能是“抽象的理想”。因为对于现实从历史上加以否认是现实自己发展的結果，那末，只有

<sup>①</sup> 固然，黑格尔說过，在一切有限事物中都有偶然性的因素 (in allem Endlichen ist ein Element des zufälligen)，但是，按照他的哲学的意思，偶然性只是在几个必然过程的交叉点上才会遇到的。所以被他(完全正确接受的)关于偶然性的概念完全不妨碍对于现象的科学說明；为了理解某种偶然性，应当会找出至少是两个必然过程的令人满意的說明。



依靠这一发展的那种理想才能被认为是正当的。这样的理想将不会“脱离发展的地理和历史条件”，对于这种理想不能说是“空中楼阁”。这个理想只是在思想和形象中表达已在现实中完成的发展过程的结果。这种理想的具体程度也和这个发展着的现实的具体程度相同。

从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如果别林斯基在他发展的第一阶段为了理想而牺牲现实，在第二阶段是为了现实而牺牲理想，那末，在第三和最后阶段他企图利用发展的观念来使理想同现实调和，这一观念会给予理想一个牢固基础，并将使理想从“抽象的”东西变为具体的东西。

这就是别林斯基现在的任务。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当人们还不能解决这些任务时，他们就不能自觉地影响自己的和社会的发展，因此，他们仍旧是偶然性的玩具。但是，要在自己面前提出这一任务，必须和抽象的理想决裂，理解到和感觉到这种理想完全是无能为力的。换句话说，他应当经受同现实妥协的时机。所以这一时机给了他最大的光荣。也就是因为这样，他后来自己认为这个时机是自己精神生活的开始。

但是，给自己提出一定的任务是一回事，解决这个任务又是一回事。当参加斯坦凯维奇——别林斯基的小组的青年关于某一困难问题发生争论时，他们在费力地解决问题之后，往往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说：“只有黑格尔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正是现在，当别林斯基必须应用辩证法来说明俄国历史发展时，他才会对自己这样说。但是，黑格尔也会辜负他的信任。辩证唯心主义正确地提出了十九世纪社会科学的伟大课题：把社会发展看作是合乎规律的过程来加以研究，——但是，辩证唯心主义没有解决这个课题，虽然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为解决这一任务作了准备。

研究一个对象——这就是首先用它自身发生的那些力量去说明它的发展。黑格尔就是这样说的。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中，在个别场合很正确地指出了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是，整个说来，他的唯心主义使他离开了正确的研究道路。如果“观念”的逻辑发展是一切其他事物的基础(其中也包括历史发展的基础)，那么，历史归根到底是要以“观念”的一些逻辑特性而不是由社会关系辩证的发展来说明的。而黑格尔确实每当遇到某种历史问题时，都是求助于这些特性的。而这也就是说，借助于抽象概念来说明完全具体的现象。唯心主义的错误也正在于它使抽象概念具有创造力和动力。正是因为这样，唯心主义者常常用任性的逻辑结构来代替对事变因果联系的研究。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正确的、真正科学的理论，只能在辩证唯物主义代替辩证唯心主义以后才能出现。别林斯基没有活到这个新时代。诚然，在他的时代曾经收集了不少形成正确的历史观的各种材料。在1897年4月份的《新语》杂志里引证了瓦·彼·波特金关于经济利益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一些意见<sup>670</sup>。波特金有这样的意见是不足为奇的。波特金在醉心于黑格尔以前，是一个圣西门主义者，而在圣西门看来，欧洲的全部现代史是要以经济利益的斗争来说明的<sup>①</sup>。后来，波特金在这一方面可以从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从维克多·孔西得朗<sup>②</sup>以及路易·勃朗(其实是从他的《Histoire des dix ans》<sup>③</sup>)那

① 请特别参阅《Catéchisme politique des industriels》(《实业家的政治问答》)<sup>671</sup>，在此书中，这一观点应用于法国历史方面时，叙述得特别清楚。也请参阅他在1818年5月12日给《Journal Général de France》(《法国总汇报》)的编辑的一封信，圣西门在这封信中说：《La loi qui constitue la propriété est la plus importante de toutes; c'est elle qui sert de base à l'édifice sociale》。(“确定财产的法律在所有东西中是最重要的，社会的大厦正是建立在它上面的。”)

② 请特别参阅《Destinée sociales》(《社会的命运》)。

③ 《十年史》

里借用来不少东西。最后,法国的历史家們:基佐、米涅、托克維尔也能給他很多东西。很难設想波特金不知道《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sup>①</sup>这一著名著作,此书第一卷还在1836年就已出版了<sup>672</sup>。这本书把經濟关系(更确切地說,所有制关系)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当作是不可爭辯的真理。托克維尔认为,所有制关系一旦确定,“就可以把这种关系看作是規定各民族活动的法律、习俗和观念的首要原因”。甚至不是由这些关系所創造的东西,至少,也要适应着这些关系而改变的。所以,为了理解一个民族的立法和习俗,应当研究在这个民族那里占統治地位的所有制关系<sup>②</sup>。托克維尔这第一部著作的最后两卷完全是用来研究美国存在的所有制关系是怎样影响着美国人的精神习惯和美学习惯以及需要的。由于这一切,波特金毫不費力地就能达到那一信念:人們的精神发展是由社会发展的进程来决定的。他的这一信念,大概也是別林斯基所知道的。比如說,这种信念已經影响了別林斯基对普希金的詩的历史意义的看法<sup>③</sup>。但是,在別林斯基形成他的具体理想

① 《論美国的民主主义》

② 第1卷,第74頁,1836年版。

③ 而且当然,不仅影响这一看法。別林斯基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一文中,比較这两个城市时,力求确定其中每一个城市所代表的观念:“彼得堡代表一个观念,莫斯科代表另一个”。当然,这完全是在当时我国有思想人士的世界观中占統治地位的唯一主义观点。但是,在別林斯基的唯一主义議論中突然有了这样的思想而使人感到吃惊:“但是,从以前的朝代起,莫斯科就逐渐开始成为商业、工业和手工制造业的城市。它以自己的棉紡織品(原来如此!)使全体俄国人穿上衣服;它的較远的地区,它的四郊和它的县——那里布滿了大大小小的工厂。然而在这方面,彼得堡是不能和它竞争的,因为它的位置几乎在俄国的中心,这就使它成为国内工业的中心。在铁路把彼得堡和它联结起来之后,在通往雅罗斯拉夫里、喀山、沃龙涅什、基輔和敖德薩<sup>673</sup>的公路像心臟的动脉一般从它那里伸展出去的时候,它能否还是这样呢?”……在这里說出了这样一种傾感:随着莫斯科經濟作用的变化,它所代表的“观念”也应变化。这是表明唯物主义侵入了基本上还完全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里去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小例子。

时，这种信念并没有能够成为他的可靠的领导性的线索。

460 问题在于：不论是圣西门、孔西得朗和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还是那些把所有制关系认为是社会建筑的最重要基础和把这些关系的发展认为是社会运动的主要原因的历史家们，毕竟都是唯心主义者。他们懂得经济的社会意义，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决定任何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原因。他们认为，有利的或者不利的情况（例如，有利的地理地位、征服等等）是一部分原因，而人的本性是另一部分原因。所以他们在为他们所珍视的社会设施或这些设施的计划辩护时，主要诉诸于这一本性。但是，诉诸于人的本性，意味着站到抽象理想的观点上，而不是站在社会关系的辩证发展的观点上。这就是对于社会发展的空想的看法的实质所在。在《资本论》作者的历史理论出现以前，所有的——对于理论并非完全漠不关心的——社会活动家，从极左到极右的，或多或少都是空想主义者。因此，可以理解，甚至别林斯基在他和现实讲和以后，必然站到空想的观点上，尽管这是和他自觉地趋向于具体的理想相反的。这一意图只是给他某些个别的看法、想法和评论留下了痕迹。

## 八

卡维林在他的回忆录<sup>674</sup>中说：“别林斯基有一次在莫斯科当着我的面和格兰诺夫斯基谈话时……表示了斯拉夫主义的思想，他说，在解决社会问题，结束资本家和大财主与劳动人民敌对关系这一方面，大概俄国会比欧洲各国做得更好”<sup>①</sup>。

这确实是后来被我们的民粹派和主观主义者所接受的纯粹斯拉夫主义的观点。别林斯基是斯拉夫主义者不调和的敌人，他竟

<sup>①</sup> 同上，op. cit. [前引著作]，第2卷，第209页。据卡维林说，这一段话是在他所叙述的时期（指1843年）几年以后才发生的。

然能够有这样的思想,这只是他醉心于空想社会主义的结果。

我們已經看到,他同情被压迫者,不把他們看做是生活和劳动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們,而把他們看做是被不公平地剝夺了当然属于人类的那些权利的“个人”的总和。

从这个抽象的观点来看,社会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应当与其說是取决于这些关系自身的内在邏輯,不如說是取决于受这些关系这样或那样压迫的个人的特性。辯证法应当让位于空想。 461

別林斯基有时也从俄国“个人”的特性观点出发来看俄国的未来命运。在《1846年俄国文学一瞥》一文中,別林斯基說:“不錯,在我們当中有民族生命,我們負有使命对全世界說自己的話,說出自己的思想”<sup>675</sup>。这是什么样的話呢?他不願意在这点上陷于幻想和猜測,“最害怕的是只有主观意义的任性的結論”<sup>676</sup>。(正如我們所看見的,他对主观主义的态度仍然和他写鮑罗金諾紀念論文时的态度一样)。

但是,他仍然以为俄国人在了解他所不熟悉的民族时运用的那种多方面性的方法,可以使他对于他未来的文化使命作出某些假定。他說:“我們也不主张这些是确定不移的!所謂俄国民族有使命在他的民族性中表現最丰富而多样的內容,所謂在这一点上就包括着为什么他能把一切和他不同的东西接受过来并吸收进去的原因;然而,我們敢于这样想:这种思想作为毫不自夸和毫不幻想地說出的假定,推測并不是沒有根据的”<sup>677</sup>。他在1847年3月8日給波特金的信里率直地說出同样的思想:

“俄国的个性現在还是一个胚胎;但是这个胚胎的天性的广闊和有利的程度,正如它的任何局限性和狹隘性一样地使人喘不过气和可怕。它害怕和最不能容忍局限性和狹隘性,——而照我的意見,如果現在不滿足于任何东西,不做某种坏透了的片面性的奴

求，那是不错的。然而说我们是无所不包的，那是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可做的，关于这点我想得越多，我就越发认识和深信这是谎言……不要以为我在这一问题上是一个热心者。不，我是经过怀疑和否定的艰苦道路才(为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的”<sup>678</sup>。

这种“解决”对于俄国社会问题的斯拉夫主义观点敞开了大门。大家知道，这种观点的基础是什么，这个基础就是对俄国村社历史发展的错误理解<sup>679</sup>。从赫尔岑《日记》的下列记载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当时先进的人们是怎样理解的：“斯拉夫村社最高发展的榜样是门的内哥罗人”。但是，门的内哥罗的公社是氏族公社，和为了更好保障国库利益由国家建立的村社完全不同，这比我国氏族生活的分化要迟得多。我们的村社无论如何不能朝着门的内哥罗公社的方向“发展”<sup>①</sup>。但是，我们当时的西方派是和斯拉夫主义者一样抽象地看待“公社”的。如果他们有时候也相信，“公社”是有光明的未来的，那末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信仰问题，是一种要忘怀一切——哪怕是在虚构中忘怀从周围现实中获得痛苦印象——的迫切精神需要的结果。赫尔岑在他的《日记》中坦白地说：“恰达也夫有一次非常好地指出，基督教观点的一个最伟大的性格<sup>②</sup>就是把希望提高到成为道德并把道德同信仰和恋爱并列。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在似乎毫无出路的境遇中，主要是应当由我们来实现对痛苦的信赖、坚定的希望的”<sup>680</sup>。为什么像赫尔岑这类的人觉得自己毫无出路呢？因为他们没有能够建立一些“具体的理想”，亦即由那个使他们感到不愉快的现实的历史发展所指出的理想；

① 关于门的内哥罗公社请参阅波波维奇先生的很有意思的著作《Recht und Gericht in Montenegro》，Agram 1877年〔《门的内哥罗的法律和法院》，阿格兰姆，1877年〕。

② 性格这一词在这里好像不妥当。这是不是印错了呢？不过引文的意思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如果没有这种理想，他们也就体验到像別林斯基还在醉心于抽象理想的青年时期所经历的沉痛意识：他们感觉自己的完全无能为力。赫尔岑抱怨说：“我们不是人民所需要的”<sup>681</sup>。他如果看到了他所固有的“否定的观念”构成人民生活内在发展的结果，他是不会这样说的。那时候，他也许不会感觉自己是人民所不需要的。別林斯基和赫尔岑一样，他叹息地说：“我们是新的西徐亚的不幸的隐士；我们是沒有祖国的人，——不，比沒有祖国还要糟，我们是这样的人，即祖国对他们是幻影，因此我们自己也是幻影，我们的友谊、我们的爱情、我们的志向、我们的活动是幻影，难道是奇怪的嗎？”<sup>682</sup> 鉴于这种情绪，即使象別林斯基这样具有强有力的逻辑思维的人暂时倾向于斯拉夫主义者的幻想，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说过：暂时的倾向。根据一切情况可以看出，別林斯基与赫尔岑相反，他这个倾向不仅是暂时的，而且也是非常短的。无怪乎赫尔岑关于別林斯基说过：他“不善于期望下一世纪的生活”。德国人叫做 jenseits<sup>①</sup> 的东西，并不能支配他<sup>683</sup>。他需要的是坚固的现实的基础。在前面，我们已经从《1846年俄国文学一瞥》一文中，摘录了他对未来的俄国文明提出的几点可疑的假设，他在这篇文章里驳斥了斯拉夫主义者对彼得改革攻击时，说道：“人民生活中的这类事件是非常重大的，因此不会是偶然的，而且人民的生活不是一个可以由任何人用橇轻轻一推就会任意转变方向的破船，不要想不可能的事，也不要自尊地干预历史的命运而使大家嘲笑，最好是在承认现存事物的不可抗拒和不可改变的现实性以后，以它为根据而行动，要以理性和合理的看法为指导，而不要以馬尼洛夫式<sup>②</sup> 的幻想为指导”<sup>684</sup>。在另一个地方，他一面承认上述改

① [彼岸]

② 馬尼洛夫是果戈里的小說《死魂灵》中一个地主的典型。——譯者

革对于俄国民族性有某种不利的影响，却又做出如下的重要保留：“但是，不能在承认某一事实的正确性以后不再前进，而要研究它的原因，希望在恶的自身中找出摆脱恶的出路的手段”<sup>685</sup>。要在彼得改革的改革中，要在改革带给俄国生活的新因素中寻找同彼得改革的不良后果进行斗争的手段。这是对问题的完全辩证的看法，既然别林斯基在和斯拉夫主义者争论时坚持这一看法，所以他的思想完全没有任何空想的因素，所以他的思想是具体的。他自己也感觉到这点，同时给予令人讨厌的宿敌——抽象理想好几下打击。他说，“无条件或者绝对的判断方式是最容易的，但也是最可靠的；现在它被称为抽象的或者远离现实的”<sup>686</sup>。他认为，斯拉夫主义者的一切错误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任性地赶在时间前面，把发展的过程当作发展的结果，想在开花以前看到果实，而且，在发觉叶子没有味道的时候，就宣布果实是腐败的，而且建议把密布在辽阔无垠的大地上的大森林移植到另一个地方，对它使用另一种保护方法。按照他们的意见，这是不容易的，但是可能的”<sup>687</sup>。这几行话包含着对社会生活这样深刻而严肃的看法，因此，我们热烈地请求我们现在的斯拉夫主义者，也就是民粹派、主观主义者、尼-逊<sup>688</sup>先生等“资本主义的敌人”注意这几行话。谁要是明了这一观点，谁就不会像尼-逊先生那样用臭名远扬的任务来麻烦“社会”，个人不仅不能解决这个任务，甚至连懂也不懂；他也不会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那样认为“步彼得的后尘”就是培养空想；一句话，他无论如何不会和“抽象的理想”调和。

464 别林斯基在他去世以前三个月，即在1848年2月15日已经身染重病，口授了寄给在巴黎的安年柯夫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有很多有意思的见解，但只在不久以前才开始吸引有思想的俄国人注意。

他说：“当我和您关于资产阶级问题进行争论时把您称为保守



分子，我真是愚蠢，而您却是个聪明人<sup>①</sup>。法国的整个未来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一切进步都取决于它一个阶级，人民在这里有时只能起消极的辅助作用。当我在我那有信仰的朋友<sup>②</sup>面前说俄国现在需要彼得大帝时，他对我的思想当作邪说一样加以攻击，他说，人民应当为自己作出一切。这是多么天真愉快的思想啊！……我那有信仰的朋友还向我证明说，让上帝使俄国摆脱资产阶级吧。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出，俄国国内发展过程不会在俄国贵族变成资产阶级以前开始的。……我真是个怪人！当我的脑子里装满了某种神秘的荒唐思想时，思想健全的人很难用下面这样的证明把它从我的脑子里清除出去说：要做到这点，我一定要和酷好同一思想的那些神秘主义者、虔信主义者和幻想家们亲近——在这种场合我就要后退了。我那有信仰的朋友和我们的斯拉夫主义者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请不要对这种接近情况感到惊讶：因为最好的斯拉夫主义者是和我那有信仰的朋友完全一样地看待人民的；他们是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吸取这些概念的”……690

这是别林斯基出国旅行成果之一。当时，巴黎社会生活的脉搏跳动得很有力，各种学派的社会主义者对于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给了很大的、虽说是牢固的影响。正如从安年柯夫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当时在那里也住着不少热切关心社会问题的俄国人。我们的同胞深深被他们周围的社会环境所感动，他们大概会对俄国在解决社会问题这一方面的未来作用，比在自己家乡更加乐意、更加热烈地做出种种幻想的。别林斯基遇到这类极端的意见时，由于他所固有的、对理论真理的强烈敏感，马上看出了这些意见的弱点：十足的抽象性，同俄国发展历史过程完全缺乏任

465

① 貝平先生說，“在原文里是更厉害的说法”。

② 根据貝平先生的話，“別林斯基就是这样称呼他在巴黎的一个朋友的”689。

何合理和自觉的联系。这个老黑格尔主义者早已熟悉的和很久以来就使他感到痛苦的那种把理想和生活联系起来，让辩证法来说明我们的现实的需要又在他身上出现了。于是他把俄国的未来命运看作是依赖于它的经济发展的；因为俄国国民内部发展过程不会在俄国贵族成为资产阶级那时以前开始的。而且他还不明白这样的转变的历史条件。按照他的说法，俄国需要新的彼得。他没有看到彼得大帝改革的经济后果是完全足够在我国发展资本主义的。他也不明了西欧资产阶级对“人民”的历史关系。他以为人民是注定起“消极、辅助作用”的。这当然是一个错误。但是，要知道连空想社会主义者实质上给予人民完全消极的作用；不同的只是按照他们的看法，人民不是在已经存在的经济制度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而是在社会改良的事业中起“消极、辅助的作用”，在这种改良中创举和领导作用应当属于有善意且高贵的知识分子，亦即实质上属于同一个资产阶级的子弟。别林斯基对于社会主义者的态度是十分蔑视的；看来，他也准备把他们当作虔信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那样看待。而他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在他们的观点中实际上有很多十分荒谬和不科学的东西，他们的主要错误，也像斯拉夫主义者的错误一样（按上面引证过的别林斯基的话来看），就是他们把恶只看作恶，没有看出它彻底改变社会基础的另一面<sup>①</sup>。别林斯基不能令人满意地纠正这个错误，使“人民”注定永恒地起消极的作用，但是，他很清楚地看到它，从他歌颂资产阶级——亦即资本主义的重要性就能证明这一点。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现在是在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中没有找到适当地位的发展

<sup>①</sup> 不过，别林斯基对待社会主义者的这种消极态度还是在他出国以前就有了的。他所以喜欢李特雷，正是因为李特雷不属于社会主义者之列。（1847年1月29日给波特金的信）691。

观念。

对待空想主义者的这种态度不禁令人想起別林斯基輕視“小大人”的态度，他在自己采取妥协态度的时代很厉害地抨击了他們。“小大人”所以使他憤慨，是因为他們在从合理主义的观点看社会生活时，甚至沒有想到为这个生活所独有的內部的辯证法。別林斯基对待空想主义者要温和得多，虽然他也把他們称为神秘主义者。他理解到在他們的迷恋中不是怪想或虛荣心指导着他們，而是力求达到社会幸福的意图，然而他认为“小大人”正是一些有虛荣心的空談家。但是，他对空想主义者的不滿也是由那个在某个时候决定着他对“小大人”的仇恨的原因，即他們的理想的抽象性所引起的。

466

屠格涅夫把別林斯基称为中心人物。我們也会这样称呼他，虽然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这样称呼他。依照我們的意見，別林斯基在俄国社会思想发展的全部过程中是个中心人物。他对自己，同样也对別人提出一个伟大的任务，不解决它，我們也許永久不会知道文明的人类将沿着哪条道路走向自己的幸福和走向理性对盲目的、自发的必然力量的胜利；我們也許会永久停留在“馬尼洛夫式”的幻想的領域中，停留在“脱离了地理和历史条件的空中樓閣”的理想領域。对于这一任务比較正确的解决应当成为衡量我們的社會观念进一步发展的标准。他关于自己的信徒們說：“我們的一代是在曠野中徘徊的以色列人，他們是注定看不到天国的。所有我們的領袖是摩西，而不是約书亚”<sup>①692</sup>。

① 据《旧約》《約书亚記》，約书亚是摩西助手嫩的儿子，摩西死后，約书亚繼續率領以色列人渡約但河，与敌人战杀四王五王，禱告耶和华說：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地名），月亮啊！你要停在亚雅侖谷。于是日月停止，让約书亚率領以色列人大歼敌人。——譯者

他正是我們的摩西，他即使沒有擺脫，那末也會用一切力量使自己和自己的精神上的親人們擺脫抽象理想的埃及式的壓迫<sup>①</sup>。這是一個巨大的、不可估價的功勞。也正是因为如此，早就應當從我們今天的具體的觀點來看他的智慧發展和文字活動的歷史。我們越是注意地研究這個歷史，也就越會深信別林斯基是我們文學中出現的一個最卓越的哲學組織。

可能有人會責備我們，說我們直到現在還沒有談到別林斯基的文學思想。但是，這些思想始終是和他的哲學世界觀密切聯系着的，所以我們要事先了解哪怕是這個世界觀的最重要的幾方面。現在，當我們已經熟悉了這些方面以後，就可以轉而研究別林斯基批評活動的領導原則。我們將在下一篇文章里談這一點<sup>693</sup>，我們在那里將把這些原則跟在我國啟蒙時期占統治地位的藝術理論加以比較。在我們弄明白我們的啟蒙主義者的觀點以後，就會很容易地理解我們那些催眠者——亦即：在由於各種原因幾乎一切啟蒙主義者的文字活動已經停止的時期，帶着自己的各種抽象的“進步公式”出現的那些“社會學家”——的作用和意義。在這篇論文里我們希望徹底解決一個舊的、但又是很有意思的問題，亦即：為什麼在偉大人物退出舞台時小人物就像是大人物了呢？

---

① 即《舊約》中上述以色列人受埃及人奴役。這里是比喻的說法。——譯者

## 維·格·別林斯基<sup>694</sup>

(1898年春天在日內瓦、蘇黎世和伯爾尼的俄國人舉行的別林斯基逝世五十周年紀念會上的演說)

在談到維薩里昂·格里哥里也維奇·別林斯基在我國思想發展史上的意義之前，我認為可以略微回憶一下這個卓越人物的形象。

他在說明自己的特點時說，高度的熱情在他的精神中占優勢的成分。

他補充說：“這個高度的熱情是我的痛苦和快樂的源泉，而因為命運使我放棄了太多的東西，所以我也不能把我所沒有放棄的不多的那一半分給誰。對於我說來，連對男人的友誼也是強烈的感情，而我对這種感情一向是堅守不渝的”<sup>695</sup>。

別林斯基性格的這一基本特點，自然也表現在他對社會的一切同情和憎惡之中。它表現在他的論文中，儘管辛勤的书報檢查官一貫毫不留情地從這些論文中擦去了一些色彩；它在他寫給果戈里的著名的、憤怒的信中卻像急流一樣地奔放出來；總之，它給他的全部通信增添了使人傾倒的優美色彩；最後，它也決定着他對自己的敵人的態度。他始終是熱烈的辯論家。

他在自己的著名的第一篇論文《文學的幻想》中說：“在我們這

儿，人们有时候攻击论战，特别是杂志上的论战。这是十分自然的。难道对思想生活处之淡然的人，能够懂得，一个人可以把真理看得比礼貌更重要，为了爱真理情愿受到仇视和迫害吗？呵，他们永远不会懂得，这是多么愉快，多么痛快的事：告诉一个不穿制服的退伍天才，他幼稚地以伟大自命，是可笑而又可怜的，让他认识到，他享到文名，不是由于他自己而是大声叫嚣的评论家所造成的；告诉一位宿将说，他是由于旧时的记忆和旧时的习惯才维持威望于不隳；给一个文学教师证明，他目光近视，落在时代后面，他必须再从字母学起；告诉一个天知道打哪儿钻出来的怪物，老狐狸和维多克（暗指布尔加林。——格·普·），一个文学贩子，告诉他，他侮辱了自己和他所从事的文学和信赖他的善良的人们，告诉他，他侮辱了真理的神圣性和知识的神圣性，辱骂他的名字，剥掉他的假面具，纵然是男爵的（暗指森柯夫斯基。——“布朗贝乌斯男爵”。——格·普·）也罢，叫他赤条条地站在世人面前！……我跟你们说，在这一切里面是有着不可描摹的愉快，无边的痛快的”<sup>696</sup>。

在1842年，也就是在别林斯基已远不是青年的时候，他在写给波特金的一封信里这样感谢他提供的关于斯拉夫主义者的消息：

“谢谢你提供的关于斯拉夫主义者的消息。……假使我对于自己和自己的感情没有弄错的话，这些先生们的仇恨使我感到快乐，我津津有味地嗜着它，如同神仙嗜到芳香的食品，如同波特金（我的朋友）嗜到任何甜美的小东西一样；他们的复仇会使我高兴。……我将不断地使他们生气，使他们无法忍耐下去，嘲弄他们。战斗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但仍然是战斗；和青蛙战争，但终归不是和牡羊讲和”<sup>697</sup>。

他在大約是同一个时期写的另一封信里，坦白地說：

“現在我感覺圓滿和有生氣，感覺我是生來就是為了在出版物上進行戰鬥的，感覺我的使命、生命、幸福、空氣、食物——都是論戰”<sup>698</sup>。

他的相當多的朋友們以及無數的敵人也有同樣的感覺，而且也許是更加強烈地感覺到的。讓我們看看帕納也夫在他的回憶錄中關於別林斯基談了什麼：

“為了對於 B. 有充分的理解，看到他的全部光輝，應當把談話引到他痛切感到的和由於矛盾而使他憤怒的那些社會題材和問題；當他被提到以後，突然顯得長大了，他的話像洪流一樣地傾瀉出來，他的整個面容呈現着內在的精力和力量，有時候喘不出氣來；他臉上的全部肌肉緊張起來了……他像一個有權力的人那樣地攻擊自己的敵人，順便地玩弄他，像玩弄稻草人一樣，挖苦他，使他處於可笑的位置，同時，以驚人的毅力發揮自己的思想。在這樣的時刻，這個通常是羞怯的，怯懦的和笨拙的人變成不可辨認了”<sup>699</sup>。

在赫爾岑的《往事與回憶》里我們也讀到幾乎完全相同的話：

“這個羞怯的人，這個瘦弱的身体有着雄偉的、角斗士般的性格！……是的，這是一個強有力的戰士！他不會說教，不會教訓，他需要的是爭論。沒有反駁，沒有氣憤，他是說不好的，但是，每當他感到自己受到侮辱時，每當事情涉及他的珍貴的信仰時，每當他面頰的肌肉開始抖顫和他的話中斷時，就可看到他像雪豹一樣撲向敵人，他把敵人撕得粉碎，使敵人變得可笑，又使敵人變得可憐，而且一直是以異常的力量，以異常的詩才發揮自己的思想。爭論常常是以流血來結束的，從病人的喉嚨里流出血來；他面色蒼白，氣喘吁吁地瞪着眼睛看那個同他談話的人，他用顫抖着的手把手

帕送到唇边就不动了，他由于身体虚弱而感到伤心而不知所措。我在这时是多么爱他和怜惜他啊！”<sup>700</sup>

不用说，在别林斯基的敌人——即被他所嘲弄，被他置于可笑地位，被他当作稻草人一样来玩弄的人——看来，他的性格的那种极度热情是令人很不愉快的。人们把他叫作文学界的猛犬<sup>701</sup>，责备他不爱一切俄国的东西；请回忆一下几句有名的诗句，诗句的作者在其中向别林斯基说道：

不，你的英勇行为不值得夸奖，  
它不是对俄国致敬；  
你齧伤了卡拉姆津，  
罗蒙诺索夫不是诗人……等等<sup>702</sup>。

但是，先生们，要是我说，这个“猛犬”，这个热情而可怕的论战家却是一个心地非常好的人，我希望你们不要惊异。他在青年时代写的戏曲中的主人公德米特里·加里宁关于自己说道：

“你不能设想，我平时是怀着怎样的感情来看待不幸的人。假使有当着我讲一些不公正的事，迫害，强者对弱者的残酷行为，谈到滥用职权，那末这些事情就使我义愤填胸！”<sup>703</sup>

加里宁在这里所表达的正是别林基本人在一切类似情况下的心情。在谈到这一题目时，我禁不住要向你们宣读他（在1841年9月8日）写给那同一位波特金的信中的一段话：

“如果特别人物有幸福，而一大部分的人甚至连这种可能也想像不到，这对我又算什么呢？如果幸福只是给予千万人中的一个的我，那末就让它滚开罢！如果幸福不是我和我的小弟弟们共有的，那我就不要它！当我看到群氓和它的代表人物时，我就感到非常痛心和战栗……在我把一文钱给了女乞丐以后，我就从她那里跑开，好像我作了一件坏事，好像不愿意听到我自己的脚步声。而



这就是生活：穿着破衣烂衫在街头坐着，面孔上带着痴呆的表情，白天討得几文錢，晚上就在小酒店里喝掉……而人們却看着这样的事，誰也不管它！……而这就是在合理的原則上生存的社会，是现实的現象！……一个人看到这以后，他还能够埋头于艺术和知識嗎？”<sup>704</sup>

471

这正是六十年代在我們先进人物那里得到特殊发展的一个特点，这也就构成了他們对待艺术的消极态度的基础，这种态度被当时俄国保守分子和我們今天的頹废派理解得很糟而且解释得很愚蠢。对于六十年代的先进人物說来，艺术問題首先是道德問題；他們先問自己：當我們的多数同胞不仅被剝夺了对艺术的享受，而且甚至被剝夺了滿足最基本的、同时又是最迫切的、最刻不容緩的需要的可能性时，我們有沒有权利享受艺术？而人們指責他們沒有道德，感情粗暴，理解狹隘，甚至几乎是对穷人的利害漠不关心，而他們正是为这些穷人才拒絕享受艺术，以及享受其余的生活幸福的。

我刚才引证过的別林斯基給波特金的信里的一段話以惊人的明确性暴露这些指責是完全沒有根据的。

不过，对我說来，在这里最重要的并不是这些指責的毫无根据，而恰好是別林斯基在其生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对艺术的态度和后来車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六十年代的其他先进人物的态度是完全一样的。这些年来我們的社會运动，正如以后十年的运动一样，就其极端的表現說，就是我們后来所准确地称之为平民知識分子的那个社会阶层的运动。就別林斯基的出身說，他正是属于这一阶层的。他差不多是第一个，而且毫无疑义地也是有思想的平民知識分子中进步意图的最鮮明的文字表达者。他所寻求解决的正是他們后来寻求解决的那些同样的問題；使他感到

苦恼的正是后来苦恼着他们的那些同样的痛苦，而他这个天才的平民知识分子在大体上已经指出了那条将带着我们的平民知识分子有发展能力的那一部分走上有成果的社会活动的道路。这就是别林斯基的文字活动的伟大的社会意义<sup>①</sup>。

472 《俄国财富》<sup>706</sup>三月号刊登了《伟大的心》头几章——关于这篇论文今天我还要谈到——，文格洛夫先生在这篇论文里把已故的瓦西里·波特金称为别林斯基的精神鼓舞的泉源。在某些方面说来，这个称呼是正确的。我们刚才已经说过别林斯基对待艺术的态度特点，如果我弄清楚波特金对待艺术的态度有没有这种

① 这就足以解释六十和七十年代的先进的平民知识分子对待他的那种热烈的尊敬的态度。为了说明这一态度，我引用两个例子。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俄国文学的果戈里时期概观》中在转到评价别林斯基的活动时，这样地说：“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内心感到十分亲切而可贵的事物，他在谈到它时，他总努力使自己保持冷淡和平静，竭力避免其中可以使人听到他的过分强烈的热爱的说法，因为他预先知道，在谨守一切对他说来可能做到的冷静时，他的言语就会变得更加热烈了，——如果我们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内心引为可贵的事情，那末果戈里时期的批评（即是别林斯基的批评。——格·普·）就在他们中间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因此，我们要尽可能冷静地谈果戈里时期的批评；因为尊敬和同情可以发展到这个境界，在那时候一切赞美都会被人们当作一种不能表达感情的全部丰美性的东西而排斥了”<sup>705</sup>。

另一个例子还更值得注意。在1856年，亚·伊·列维托夫，那时候还是外科医学院的一个青年学生，由于行政处分先被驱逐到沃洛格达，后来又回到申库尔斯克。他在那里的情况，不论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当然都是艰苦的。同他通信的朋友们都尽可能地维持他的乐观心情。在1859年4月，一个姓菲杰林的朋友，劝告他继续已开始了的文字工作时写道：“请你想想别林斯基，打起精神来……念书，念书，找书罢……现在出了不少书，都是好书，我再提醒你想想别林斯基。我甚至想寄给你一点什么，不过说实在的话，……实在也没有什么，——只要我弄到一个银卢布，那末，我一定答应给你寄去别林斯基文集第一部。”（见第LXVI—LXVII页，涅费多夫的文章《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列维托夫》，《亚·伊·列维托夫文集》第1卷附录，索尔达钦科夫版）。别林斯基对于这一代的平民知识分子的意义是这样重要。

特点,或在多大程度上有这种特点,那将是很有意思的<sup>①</sup>。我十分怀疑会有人能指出这种特点;不論怎么說,四十年代西方派中任何一个人对待艺术的态度特点都沒有达到別林斯基所达到那种程度,这一点是毫無疑問的。在这方面,他比他的同时代的任何人都要更接近于我們六十年代的启蒙思想家。

而且不仅在这方面如此。同一位文格洛夫先生在我所引过的那同一篇文章《伟大的心》里說,

“要知道,那些不单是一个存在着的人,而且是反映着时代的人才是真正伟大的人物。如果別林斯基仅仅反映一个斯坦凱維奇,一个波特金,一个巴枯宁,一个格蘭諾夫斯基,一个赫尔岑,那末他的意义就是次要的了。但是,如果他同时,而且对他們之中大多数人以无限大的力量和光輝来反映了斯坦凱維奇、波特金、巴枯宁、格蘭諾夫斯基和赫尔岑,那末,这已經說明他是最著名时代的核心人物,是俄国文化最卓越时期的表达者,这一文化培育了一大群伟大的作家,他們把俄国提到了人类伟大的文学强国的水平上”<sup>707</sup>。

可以說,这是这样的,也完全不是这样的。毫無疑問,別林斯基“反映了”斯坦凱維奇、波特金、巴枯宁和赫尔岑,也反映了他的时代的很多其他先进人物,換句話說,他无疑地反映了他和他的同时代人一起所共有的东西以及他和其中每个人所共有的东西。但是,这不妨碍他首先而且最鮮明地“反映”作为一定的个性的自身和他自己所具有的一切个人特点。在說到別林斯基在我国思想发展史中的意义时,我以为可以而且应当問一問自己:他的个人的特点,他的私人的特性有沒有一般的历史意义呢?只有这样提出

<sup>①</sup> 当然,我說的是四十年代,而不是波特金和費特交朋友并唆使检查官迫害《現代人》杂志投稿人的那个时代。

問題，我們才十分全面地了解一个伟大人物的历史作用。

讓我們看看这些特点。

就別林斯基的思想方法說，他在我們的四十年代的西方派的小組中代表了极左的一派。赫尔岑在自己的《日記》里把他称为有狂热信仰的人，极端的人<sup>708</sup>是不为无故的。例如，作为一个热情的战士，仇恨“非利士人”的“犹太人”<sup>①</sup>，他無論如何也不能寬恕赫尔岑同莫斯科斯拉夫派人<sup>709</sup>的半友誼的联系。当赫尔岑关于这点向他解释时，別林斯基认为他的解释“稍微带有溫和性和世俗的明达的气味，也就是說：墮落和腐化的开端”<sup>②</sup>。他对于自己的另一个朋友格兰諾夫斯基倍加贊揚，但是，他补充說，格兰諾夫斯基有一个缺点——中庸！<sup>710</sup>而在格兰諾夫斯基方面，他对于別林斯基的“极端行为”比赫尔岑更感到震惊。

卡維林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說：“在別林斯基和格兰諾夫斯基之間有过伟大的友誼，但是，我以为在他們之間沒有过直接的同情，而且也不可能有。这是两种完全相反的性格……。格兰諾夫斯基說到別林斯基时，总是怀着尊敬的心情和热爱，但是，又补充說，他总是非常醉心于极端，而且陷进极端去。如果不是外在的情况，共同志向的崇高性，个人方面无瑕可指的作风和上层对于思想、科学和文学的瘋狂压迫把这两种性格密切結合起来，——那末，別林斯基和格兰諾夫斯基大概会分手的，正如格兰諾夫斯基在后来和赫尔岑分手一样”<sup>③711</sup>。

从貝平先生編的《別林斯基，他的生平和通信》一书中，我們知道，在格兰諾夫斯基和別林斯基之間，关于法国革命問題常常发生爭論，而且格兰諾夫斯基不同意別林斯基“关于P.”即关于罗伯斯

① 据《旧約》，非利士人是过去巴勒斯坦的居民，他們仇恨犹太人。——譯者

② 見貝平：《別林斯基，他的生平和通信》，第2卷，第180頁。

③ 同上书，第230頁。

比爾的意見<sup>712</sup>。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並且這又一次證明了卡維林的那種思想，這就是：如果在另一種社會條件下，這些人早就分道揚鑣了。

文格洛夫先生，——而且不止是一個文格洛夫先生——想把別林斯基性格中的許多“極端”，特別是他的見解中的極端，變得溫和些，把他變成正像德國人所說的 *salonfähig*<sup>①</sup>。例如，大家知道，別林斯基在某種程度上和他從前極為醉心的黑格爾哲學決裂以後，就轉到社會主義方面去了。

他在寫給波特金的信中說，“你知道我的性格，它是永恆地處在極端之中……我現在處於一個新的極端之中——這就是社會主義思想，它對於我說來是思想的思想……信仰和知識的起點和終點……它（在我看來）吞沒了歷史、宗教、哲學。因此，我現在是依靠它來說明我的，你的以及我在生活道路上所遇到的一切人的生命”<sup>713</sup>。

文格洛夫先生在他的論文中提到下列的話時，顯然是指這一情況而說的<sup>714</sup>。他說：

“對於別林斯基和赫爾岑小組的世界觀的最好評語會是：把他們稱為‘社會主義者’。但是，我害怕這個名稱，因為這個名稱在後來獲得了另一種富有戰鬥性的意味。至於我，則恰恰相反，正在準備證明最近已具有侵略意義的‘社會主義’，對於四十年代的人是陌生的。別林斯基在一封信里把自己稱為‘社會主義者’，這主要只是為了說明他是一個關心‘社會’問題的人。因此，要是容許我可以不必把我們四十年代的西方派稱為‘社會主義者’，而把他們稱為‘社會活動家’的話，那末這一稱呼也適用於赫爾岑和別林斯基，對於和平作家們格里果羅維奇、屠格涅夫、陀思妥也夫斯基、薩

① [彬彬有禮。]

尔梯柯夫、涅克拉索夫等人，这个称呼就更加合适了”<sup>715</sup>。

显然可以看出，文格洛夫先生并没有很好地了解别林斯基的性格，因为他在自己的热情活动中始终是富有“侵略性”的。

475 他关于自己说：“我开始像马拉那样热爱人类，为了使人类的极小一部分得到幸福，我仿佛会用火和剑来歼灭其余的部分似的”<sup>716</sup>……

如果把我刚才提到的对罗伯斯比尔的偏好，同马拉式地对人类的热爱加以对比，那末先生们，你们会同意：别林斯基的社会主义远非没有侵略的成分的。

但是，《俄国财富》不愿同意这一点，于是它通过文格洛夫用尽一切力量来从我们的伟大作家的形象上擦掉鲜明的颜色。为了这一点，文格洛夫先生还从谢德林那里来寻找证明。

谢德林曾经写道：

“从圣西门、卡贝、傅利叶、路易·勃朗——特别是乔治·桑——的法国，给我们灌输了对人类的信仰，从那里射出了一种信念的光芒：就是黄金时代并没有过去，它就在我们前面”<sup>717</sup>。

关于这一点，文格洛夫先生说：

“在这一重要的历史见证里，可宝贵的不仅是事实，而且还有一般的声调。所谈的仿佛是一些政治经济的理论，而实际上回忆在严肃的老人身上触动了只是心里的记忆，这里说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类，不是政治经济学而是信念，而这一信念不是被干燥地逻辑地接收的，因为事实和数字是无法反驳的，——它发出了光辉……”等等<sup>718</sup>。

所以这里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类，这里不是政治经济学，而是信仰。我们姑且把谢德林本人怎样对待“政治经济学”的态度问题作为在这里不合适的问题撇在一边。但是，要阐明“阶级斗争”

在別林斯基的社会主义中是否真沒有起过任何作用这一点，那将是有益的。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只要讀一讀他关于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所写的文章就足够了。在这一篇文章里，別林斯基对于下列一事表示遺憾：巴黎劳动人民在1830年7月拿起了武器，然而沒有把资产階級和王权的斗争当作自己的事情，沒有把它当作人民的事情。

“在盲目和瘋狂的忘我牺牲里，人民不惜自己的一切力量，为了受到侵犯的权利而战斗，然而这些权利絲毫沒有使得人民幸福一些，因此，对他們沒有有什么关系，就像中国皇帝的健康問題对他們絲毫沒有关系一样。”

后来別林斯基对于资产階級关于平等的概念加以辯駁：

“法国的无产者在法律之前同最富的所有主和資本家是平等的，他們都在同一个法庭受审判，而且在犯罪时要受到同样的惩罚；但不幸的是，无产者由于这种平等絲毫也不好过。无产者是所有主和資本家的永久的雇工，他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資本家的手中，完全是資本家的奴隶，因为資本家給无产者工作，而且随便給他們規定工資。这项工資对于貧穷的工人并不总是够买每天的面包和給自己以及家人买些破衣烂衫用的，然而有錢的所有主从这项工資中拿走百分之九十九……这是多么好的平等！”

最后，別林斯基严厉抨击资产階級的殘忍和貪婪，并且指出巴黎人民的痛苦。

他感叹地說：“巴黎人民的貧困超过了一切最大胆的想像。但是像善良这样的火花在法国还没有熄灭，它只是被灰烬盖着并且在等待着順风把它变成明亮而純淨的火焰。人民是一个幼儿，但是这个幼儿在成长并将成为一个充滿力量和理性的男子汉……他

现在还很弱小，但是只有他在自己身上保存着民族生活的火焰和对于信念的新鲜的热情，然而这种热情在有教养的社会阶层中已经熄灭了”……等等<sup>719</sup>。

我问你们，先生们，在这里“对人类的信仰”有着什么意义呢？它完全而丝毫不差地同对人民的信仰相符合，关于人民的概念又完全同关于工人阶级的概念相符合。工人的利益和道德是同资产阶级的利益和道德相对立的。难道这不是阶级斗争的观点吗？难道这不是有些人斥责现在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那种“狭隘性”吗？然而这些人没有能够想出确定的概念，把一些实际简直是不清楚而且只是不清楚的社会思想认为是具有广泛性的。

然而我要忙着作一个保留。今天的社会主义者中没有人会同意别林斯基的这个意见：认为政治权利的问题正和中国皇帝的健康问题一样，都是和人民的真正利益无关的。这是一个错误。没有政治的权利就不可能有工人运动的广泛发展，所以在没有政治权利的地方，工人就应当竭尽全力去争取到这种政治权利。正是因为这样，在我们这里，在俄国，工人运动的一个巨大步骤应当是争取政治自由。别林斯基那时所不清楚的是：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和它的政治权利的联系。这就是他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弱点之所在，这和当时所有的，即现在所称为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的弱点是一样的。但是这不妨碍他站在阶级斗争的观点上，或者站在像文格洛夫先生所说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上，并且认为自己对人类的信仰完全是对工人阶级的信仰。因此，所有把他变得 salonfähig<sup>①</sup>的企图应当认为是毫无根据的。

既然已经涉及阶级斗争的问题，我就不能丢掉它而不努力去

① 彬彬有礼。——译者



破坏某种联想，这种联想直到现在不仅在法国和德国庸俗人的头脑中，而且不幸，也在许多自认为是“先进的”俄国人的头脑中都是根深蒂固的。我所指的是反对阶级斗争的成见。人们说，为什么只捍卫一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呢？这是狭隘的。应当捍卫全人类的利益。但是在这样说的时候便是玩弄词句。我问一问把这种玩弄当作一种严肃的事的人，你们说的是哪种“人类”呢？如果这指的是劳苦的人类，如果这指的是那些自己劳动、不骑在别人脖子上的人，那末他们的利益，一般说来，是和工人阶级的利益符合的。可是如果你们指的是不剥削别人的劳动<sup>720</sup>就不能生存的人，就像寄生虫不榨取别人的血汗就不能生存一样，那末我敢于怀疑，力求<sup>721</sup>行善和追求真理的人未必会把这一仿佛是人类利益放在心里。上一个世纪的法国革命对于全体文明的人类说来是一个有巨大重要性的事件，虽然它在那时候是等级斗争的事实，也就是第三等级反对贵族和僧侣的斗争的事实。第三等级又是什么呢？《Toute la nation moins les privilégiés》<sup>①</sup>，当时的法国革命家这样地回答。这是一个正确的定义，先生们，你们也会同意的，在捍卫减去“特权的人”的整个民族的利益的时候，这些革命家完全没有犯“狭隘性”的错误。但是要知道，连现在的社会主义者也会作出完全一样的回答。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什么呢？这是那些不靠剥削别人劳动而生活的人的利益。这又是整个民族，或者更确切地说，整个民族 moins les privilégiés（减去剥削者们）。剥削者的利益是一个负数；从全体人民的总的利益中减去剥削者的利益，就等于把一种正数加在全体人民的利益之中。对战争宣战的人是企求和平的；对经济的剥削宣战的人会站到工人阶级的利益的观点

① 《《减去特权的人们的全民族》》

上，从而捍卫全体人类的利益。我感到遗憾的是：文格洛夫先生不了解这个由于我们世纪的社会运动而如此尖锐和如此明了地暴露出来的最不可争辩的真理。

但是让我们回到别林斯基那里去吧。

478 赫尔岑在《往事与回忆》中说：彼得巴甫洛堡大狱的司令斯柯别列夫在涅瓦大街上遇到著名的批评家时，开玩笑地说：“什么时候到我们那里来？我完全给您准备好了暖和的囚室；我将好好地照顾您”<sup>722</sup>。典狱官的这种善意的玩笑很好地描绘了我们当时的“统治阶层”对于别林斯基的看法。人们认为他是最危险的人物。当然你们都知道被瑛莫夫在图画《临终前的别林斯基》上所永久保存下来的有名的插曲。这件事是这样发生的。1848年2月，当时很著名的第三厅厅长杜别里特请别林斯基到他那里去谈话。别林斯基已经病得很沉重，不能出门。暂时没有惊动他；但是3月27日有一个宪兵带着新的邀请来到他的寓所。瑛莫夫所画的正是这个宪兵来到他的寓所的场面。别林斯基的一位朋友就是这样地叙述他对这次访问所留下的印象。

“别林斯基已经不能从安乐椅上站起来，他由于激动和虚弱而喘着气向我请求……去寻找他以前的一位老师波波夫……（当时在第三厅工作。——格·普·）打听打听为什么要找他去谈话。我来到波波夫那里以后，对他說：别林斯基重病，已经不能从安乐椅上站起来，我问找他来有什么事。波波夫温柔地回忆起别林斯基的童年，对他的病深表同情，叫我安慰病人并向他解释，传唤他去不是为了什么私人的事情或者因为他被控诉，而是因为他是俄国文坛上的一个著名活动家，只是为了把他介绍给波波夫所供职的一个厅的首长，使他得以认识俄国文学界的主人”<sup>723</sup>。

在安葬别林斯基的那一天，送他的遗体到沃尔科沃墓地去的

除了少数几个朋友以外还有一——如帕納也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說的——“三四个不知突然从哪里钻出来的不認識的人。他們在墓地一直呆到安葬終了以后,并且以最大的兴趣注視着一切,虽然完全没有什么可以監視的”<sup>724</sup>。而当別林斯基的朋友們想用抽签的方法出卖他的存书,以所得收入交給无法維持生活的遺族,当他的一个朋友就这件事同上面已提过的波波夫交涉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波波夫听到別林斯基逝世的消息以后,对于卓越的批評家的如此过早的逝世表示惋惜,但是对他一提到抽签时,他的面色頓時大变,并且以憤怒的口气加以拒絕。他的話有这样一种涵义:在他看来,別林斯基的名字等于一个国事犯的名字……”<sup>725</sup>。

別林斯基从来沒有犯过什么罪,甚至从我国的法律观点看来也是如此,而我国法律是把西方到处认为不仅是許可的而且是极其普通的一些行为也宣布为有罪的。然而第三厅在把別林斯基看作国事犯时,又一次暴露了它那暗探的敏感。在它看来,別林斯基确实是罪犯。先生們,你們还記得維薩里昂·格里哥里也維奇对人类的“馬拉式”的热爱吧;你們也記得他对罗伯斯比尔的偏愛吧。現在我补充說,他是非常容易激动和誠实的,他不能也不願意隱藏自己的信念。我从赫尔岑的回忆中举出在这方面的非常值得注意的两件事。

479

“有一次他在四旬齋第五周来到一位文学家那里午餐,人們端給他一盘素菜。他問道,‘您这样虔誠地祈禱已經好久了嗎?’文学家回答說:‘我們吃素仅仅是为了給人們看。’‘給人們看嗎?’別林斯基問道,面色蒼白了。‘为了給人們看?’他重复地問了一句,离开了自己的座位。‘你們的人們在哪里?我要告訴他們,他們被欺騙了,任何一种公开的恶德,都比这种对于弱者和沒有學問的

人的蔑视，这种支持着愚昧的伪善，要好一些和人道一些。你们以为你们是自由的人吗？你们同一切的帝王、牧师、种植园主都是一丘之貉。再见吧，我不是为了教训人而吃素的，我没有什么人们！’”726

这是第二件事情：

有一次在那个为了给自己的“人们”看而吃素的文学家举行的晚会上，彼得堡大学的一位照赫尔岑的说法由于研究哲学和语言学而使自己的能力减弱了的硕士，长时间地谈论有节制性和准确性的问题，而在谈到恰达也夫的有名的《哲学书信》时宣称：这一书信的作者是不值得尊敬的。参加这一晚会的赫尔岑是认识恰达也夫的，他对硕士加以反驳，并对他解释：你对这个勇敢地说出自己的意见而且愿为这意见受苦难的人所作的评论是不公正的。硕士回答时指出了尊敬各种“原理”的必要性。这场争论进行了很久。

赫尔岑叙说：“我的发言突然被别林斯基打断了。他走近我时，脸色变得非常苍白，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看，他们已说话了，宗教裁判官，书报检查官在主宰着你们的思想’……发作了，发作了。他以厉害的声势，插入了一些可怕的讽刺话。‘这是多么令人可气的事：用棍棒打，我们不见怪，遣送到西伯利亚，我们不见怪，可是你们看，在这里恰达也夫触犯了民族的荣誉，不敢说话；说话就是无礼貌，奴才是永远不应该说话的！在那些更加文明的國家，即在敏感性似乎也应当比在卡斯特罗马和卡路加更加强烈的那些國家，为什么不因说话而见怪呢？’

480 硕士以一种无法模仿的自满神情说：‘在文明的國家里有監獄，那里面关着侮辱了全民族所尊敬的事物的瘋人……而人們这样做是非常好的。’

这时候，別林斯基的身材显得变大了，他非常可怕，他显得是巨大的；他把双手交叉在患着肺病的胸脯上，两眼瞪着碩士，用低沉的声音回答說：

‘而在更加文明的国家里，有断头台，来处决那些认为这样做是非常好的人。’

說完这以后他疲憊不堪地倒在安乐椅上默不做声了。在他說到‘断头台’时，主人面色惨白，客人們惊惶不安，大家都不說話了。碩士窘得不知所措……”<sup>727</sup>。

这就是“狂暴的維薩里昂”。先生們，你們处在杜別里特的地位，你們也会說，难道他“由于自己的职务和所作过的誓言”不应当把別林斯基看作是国事犯嗎？

但是我們不在第三厅工作，我們沒有宣过誓要当国王陛下忠誠可靠的宪兵，所以人們允許我們从另一方面来看問題。在我們看来，“非常激烈的維薩里昂”“有罪的”思想方法是他那值得我們热爱和尊敬的許多东西之一。我們所以热爱別林斯基，也正是因为他在杜別里特的眼里曾經是而且也不能不是犯人<sup>728</sup>。只有死亡才使別林斯基避免了对第三厅十分彻底的認識<sup>729</sup>。在設想到这种認識是否会使他感到滿意时，我們以更大的情感来跟着涅克拉索夫朗誦：

在你的多灾多难的亡魂之前祈禱时，  
导师，在你的名字之前，  
請允許恭順地跪下。

让我來談我朗誦的另一部分。在我提醒你們別林斯基是怎样感觉以后，現在还想提醒你們：他是怎样思想的，在他的意識生活过程中，他的思想的主要对象是什么。

同一个涅克拉索夫对他說：

在那露斯一切都停滯，  
在沉睡和可耻地奴顏婢膝的日子里，  
你的智慧在沸騰，而且在为开辟  
新的道路頑強地工作<sup>730</sup>。

詩人关于別林斯基开辟“新的道路”的話正确到什么程度呢？

說我們的文艺批評正是由于別林斯基而走上“新的道路”，这甚至那些主要是珍重他的“伟大的心”的人也是知道的。根据他为了文学批評所作的一切，可以有充分权利說，在涅克拉索夫的話中沒有任何的夸大。但是別林斯基的生气勃勃和宏伟有力的智慧不仅在文艺批評中力求开辟新的“道路”。他那頑强的工作也指向社会政治的領域。他想在这一領域里寻找新道路的嘗試甚至比他在文学中所作的貢獻还更值得注意。

这一嘗試是和他醉心于黑格尔哲学有密切联系的，对于这一哲学的意义我們現在也应当加以闡明。

为了理解这一意义，首先必須看一看別林斯基青年时期所处的那一时代。在有名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发生的时候，他大約只有十五岁。这次起义在全俄国引起了許多議論，当然它給了热情的、异常有才能的和很早就成熟了的少年以强烈的印象。在十二月十四日以后，亚历山大一世統治末期已經很强大的反动势力更加壮大了。

赫尔岑說：“社会的道德水准已經衰落了，发展已經中斷了，所有先进的，有精力的东西都被損弃了。其余的人，惊惶失措的，衰弱的人，垂头丧气的人都是卑鄙而空虛的，亚历山大一代的渣滓却占据着首要地位”<sup>731</sup>。

那些还保存着前一时代优良传统，突然看到自己在为理想而进行斗争中絲毫无能为力的人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这是很容易想像的。

赫尔岑在他的另一部著作里說，“1825年以后的几年，是可怕的，需要有大約十年的功夫才能从这一被奴役和受迫害的状况中苏醒过来”<sup>①</sup>。

少年別林斯基在这艰难的十年里感受到了什么呢？尽管我們为了詳細回答这一問題所掌握的材料非常少，但是我們有他自己的見证，它和这一絕對誠实的人关于自己所說的一切有同样巨大的价值。据他說，他在少年时代胸怀大志，热烈地仇恨当时存在的社会制度，同时也痛苦地意識到自己等于零<sup>733</sup>。要摆脱这样的心情只能有两条出路：第一，对于一切完全漠不关心，完全忘却一切理想；第二，在政治书籍中，在科学或哲学中热烈地寻找对艰难的現狀的說明，并寻求通往美好的未来的道路。別林斯基和他的同志們着手研究哲学了。

在我們邻国的德国，那时候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占据着独  
482  
占統治的地位。当別林斯基認識了它以后，它完全吸引住了他，而且給他以后整个智力发展的过程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为什么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给了他这样强烈的影响呢？

这也和它征服了当时的德国以及整个西欧的最新鮮和最坚决而有才智的人的原因是一样的。因为它是集中了以前的哲学思想工作一切成果的焦点，并且从它那里发出了照耀着文明世界的智力和道德发展道路的光綫。也許你們觉得我的話是夸大的，所以我現在赶忙举出斯特劳斯、布魯諾、鮑威尔、費尔巴哈、拉薩尔、恩格斯和馬克思的名字。所有这些人都具有卓越的头脑，而且其中有些人甚至是天才的头脑；这些人对于我們世紀的智力发展都作出非常多的貢獻，而在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拒絕承认：他們在研究

<sup>①</sup> «Du développement des idées révolutionnaires en Russie», Paris 1851, p. 97. (《論俄國革命思想的发展》，巴黎，1851，第97頁。)732

方面所以有着有效的方法,许多思想所以著有成果,都应归功于黑格尔。为了使你们能够判断,学过黑格尔哲学,但是后来又抛弃了他的观点的那些天才人物是怎样对待这个伟大思想家的,我向你们推荐恩格斯在八十年代出版和后来在日内瓦用俄文出版的他的论费尔巴哈的小册子。

当然,我今天不能给你们指出黑格尔世界观的各个方面,甚至仅仅指出最出色的方面也不可能。要这样做,我的时间是不够用的。然而我希望能够清楚地指出其中最重要的方面。至少,我是在尝试着这样做。

在人类智力发展的历史中,正如在一切发展的历史中一样,后一阶段总是和前一阶段紧密联系着的,同时每一个以后发展的阶段不仅与以前的一个阶段不同,而且在很多方面和它完全相反。这是我们在研究每一发展过程时所应当记住的一般规律。而在研究十九世纪上半期占优势的哲学思想并把它与上一世纪下半期最主要的思潮加以比较时,这个一般的规律得到了光辉的证明。

483 十八世纪的哲学,除了少数不很重要的例外以外,都没有发展的观点。无论当时的哲学家对自然的看法还是他们对人类历史的看法,都有着这个根本的缺点。历史的过程是发展的过程,因此,仿佛对于历史除了用进化的观点去看它以外,不可能有别的看法。然而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们对它却不是这样看的,而且就是现在也远非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已摆脱了十八世纪的观点。

在十八世纪的哲学家看来,历史运动的主要动力,是知识、教育,或者如他们所说的 *des lumières*<sup>①</sup>的发展和普及。当然,谁也不

① 法文,即教育。——译者



想反駁这一观点的相对合理性。甚至現在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在馬賽曲中还在歌唱：

Der Feind, den wir am tiefsten hassen,  
Der uns umlagert, schwarz und dicht,  
Das ist der Unverstand der Massen,  
Der von des Geistes Schwert durchbricht①.

任何一个进步的社会活动家在实践中都必須始終考虑到群众发展的不足。但是在理論上研究这一問題时，可以而且应当問問自己：知識积累和教育普及本身是不是由某些更深刻的原因所决定的呢？換言之，在理論上研究这一問題时，可以而且应当对自己提出这样的問題，可否把知識的积累和教育的普及本身看作是服从于一定規律的发展过程，而对于这些規律是否也可以像人們研究和确定自然界規律那样去发现和确定呢？假如是可以的，那末人类的智力发展就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假如不可以，那末根本就談不上对这一发展进行科学研究，因为在現象沒有規律性的地方，就沒有科学。

如果形式地加以討論，那末十八世紀的每一位哲学家当然会同意：各民族的智力生活的現象，也和一切其他的現象一样，有自己的原因，因此可以从它們的規律性的观点来加以研究。他們中間的某些人，例如愛爾維修，甚至对这种研究做了异常有意思的嘗試。但是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他們繼續把人类的智力发展看作是历史运动的最后原因，因此可以說，在研究这一运动时，他們的

① (我們最憎恨的敌人，  
从四方八面威胁我們，  
它——就是群众的愚昧，  
但是精神的宝剑会把它吓死。)

科学分析却停止在他应当开始的那个地方。所以在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那里，没有科学的历史哲学。

484

暂时，——例如，在著名的百科全书出版的时候——对于这一情况可以不予注意。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的主要历史使命就在于同陈旧的思想进行斗争，这些陈旧思想是从专制政体的繁荣时期以及贵族和教士的绝对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在这一思想斗争中，把思想的进程看作是人类社会事物进程最后和最深刻的原因，是很自然而且甚至是很有益的。但是大革命的风暴突然爆发了；事变以令人头晕的速度并且带着自然界伟大现象的确定不移的力量一个接着一个地发生了。社会的情绪常常在变化着，很坚决而且很突然地变化着；社会生活和思想的进程，显然不仅不符合哲学家们光明的希望和令人快慰的预言，而且简直是在嘲笑他们。于是许多人开始明白，思想的进程并不决定事物的进程，而恰恰相反，是被后者所决定的。复辟时代的哲学家们<sup>734</sup>便尽力在人类思想发展的进程中发现规律性<sup>①</sup>；历史家们把人的思想看作是他们的社会关系的产物；社会生活的所有研究者越来越多地站到发展的观点方面来了。

这一转变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获得了主要的表现。黑格尔的观点是发展的观点；这构成了他的哲学的最重要方面；正是由于这一方面，他的哲学给予十九世纪思想发展的全部过程以这样伟大和这样有成效的影响。

发展学说是从暂时性这一方面来考察现象的。这一学说指出

① 正是在这时候，圣西门企图确立他的三个阶段（神学，形而上学和实证主义）的规律，这一规律一般是一一而且是没有根据地——被人同奥古斯特·孔德的名字联系起来。现在可以把这“规律”看作是当时关于历史发展规律性概念不成熟的一个最好例证。

了引起現象發生的一些原因，它也發現那些決定或者應當決定現象消失的原因。老的革命家，在從這一觀點來考察比方說波旁王朝（他們的統治似乎由路易十六的被推翻和死亡而受到了最後打擊的）返回法國這一事實時，一想到在法國代替了雄偉的革命熱潮的反動勢力本身只是一個暫時的現象，這種現象只有在引起它發生的那些暫時原因存在才能鞏固時，會感到極為輕鬆。這樣的革命家發現這些原因之後就可能來協助消滅這些原因，也就是說，協助進步事業取得新的勝利。除此以外，對於科學作了這樣重要幫助的發展觀點，好象是為了給予一切進步的革新家以精神的支持和鼓勵而有意地想出來似的，雖然這些革新家的力量在一開始的時候總是很不大的。赫爾岑說，黑格爾的哲學是真正革命的代數學<sup>735</sup>，他是完全正確的。

485

可是革命的代數學，這一革命思想的有力武器，要比在前一世紀所使用過的普通的否定的武器複雜得多，因此它對當時青年人的頭腦的影響也應當無可比擬地複雜。十八世紀的思維的特點可以用下列公式很好地說明，這個公式是：是——是，非——非；除此以外，都是鬼話。十八世紀的思維只知道對某一現象的一種態度：只能一勞永逸地斥責某一現象或者一勞永逸地承認它的合理性。例如，對於僧侶的統治是不是好這一問題，十八世紀的哲學家只能作出一個答復：它是很有害的。他們完全沒看到這一統治的起源的歷史原因。比如，聖西門就不是這樣看問題的，他已經用僧侶這一等級的歷史發展的觀點來看。聖西門雖然否定僧侶的統治在現時的合理性，卻指出了他們的歷史功績，因而在這個問題上與十八世紀的哲學家們互相矛盾，他不由自主地夸大了這些功績，這一情況不論在他自己的觀點上還是在他的學生們的觀點上都留下顯著的痕迹。

我再說一遍，我們世紀<sup>①</sup>的否定學說要比上一個世紀的否定學說複雜得多。十九世紀的人在他們的否定中比狄德羅和伏爾泰的同時代人顯示了更大的思想上的嚴格要求。有名的德國作家和革命家阿爾諾德·盧格說，他在大學讀書時代的初期，他不得不去聽一位教授就宗教問題所作的講演，我不記得這是哪一位教授了。教授表現了他對宗教的很自由的态度；盧格說：“但是正是這點使我感到十分不愉快，這並不是因為我在那時是一個信教的人，而是因為十八世紀所特有的那種否定的肤淺的方式不能使我滿足”<sup>②</sup>。盧格後來成了革命家，同時也是黑格爾哲學的熱烈信徒。

486 此外，我補充說，黑格爾本人往往對自己的革命的代數學解釋成保守的東西，並且依據自己的有名的原理 «Was wirklich ist, das ist vernünftig»<sup>③</sup> 來斥責他當時的對立派的思潮的。至於黑格爾所以要這樣做究竟是什麼原因，如果對此問題進行研究就會使我們離題太遠了。

我所指出的黑格爾哲學最重要的方面究竟是怎樣影響了而且怎樣必然影響了別林斯基呢？

我們已經知道，他儘管很年輕，却已本能地感覺到了自己的否定的肤淺性和缺乏充分的根據；我們知道，他自己說過，儘管他對自己的“抽象的”英雄主義<sup>736</sup>非常熱心，但是覺得自己等於“零”。一個人的否定如果有堅實而具體的基礎，那末他不會覺得自己等於零的，雖然他也知道，要實現他的理想是遙遠的未來的事情。研究黑格爾哲學及其對一切現象<sup>737</sup>的歷史觀點，想必使別林斯基清楚地意識到他以前只是內心裡懷着痛苦感覺到的東西：他徹底地

① 指十九世紀。普列漢諾夫這篇演說發表於1898年。——譯者

② 我是憑自己的記憶來引證的，但是我對於它的大概意思是可以保證的。

③ (“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

相信他的否定絲毫沒有根據。他有熱烈而好沖動的性格，在他否定以前的否定时，必然達到一個極端並且一般地痛斥一切否定。換句話說，他必然要從一個熱烈的否定者變成同樣熱烈的保守分子。這種新的情緒想必是由他對於精神痛苦的回憶支持的，這些痛苦正像他現在開始說的，是在他那抽象的英雄主義時期所體驗過的，因為在精神上自衛的本能告訴他，回到否定的觀點必定也是意味着要回到從前的精神痛苦去。於是別林斯基成了形勢的熱心的評論家：凡是現實的就是合理的，這是在把現實這一概念和存在這一概念等同起來。

赫爾岑在反駁別林斯基這一新的觀點時，有一次想用自己的哀的美教書來使他感到驚訝，於是對他說，“您知道您可以用您的新觀點來證明我們生活在其下的極可怕的專制制度是合理的和應當存在的嗎？”

“毫無疑問”，別林斯基勇敢地回答說<sup>738</sup>。

如果赫爾岑那時候理解了在他的對話人的頭腦中有一種什麼樣的心理過程在進行，那末他也許會確切地預料到別林斯基的肯定的回答。別林斯基在醉心於黑格爾哲學時，想必正是從為專制制度、農奴制度和與之相似的卑鄙行為進行辯護開始的，因為這些卑鄙行為在他的思想發展的以前一階段當然是使他感到特別強烈的痛苦的。

先生們，應不應當告訴你們：這種醉心保守主義是繼續不長久的。你們都清楚地知道這點；你們還記得別林斯基寫給波特金的一封信的很著名的一段話，他在那封信里預告自己回到否定时，以沉痛的開玩笑的語氣寫道：

“我恭敬地感謝您，耶哥爾·費多里奇（別林斯基小組對黑格爾的滑稽稱呼。——格·普·），我向您的哲學帽子鞠躬；但是我

怀着适合于您的哲学的庸俗观点的尊敬心情荣幸地向您报告：如果我能爬上发展的阶梯的最高一级，我在那里也将请求您告诉我生活条件和历史的一切牺牲者，告诉我偶然性、迷信、宗教裁判所、菲力浦二世等等的所有牺牲者，否则我将从最高一级倒栽葱地跌下来……”等等<sup>①</sup>。

自从同黑格尔所谓决裂以后，就开始了别林斯基发展的最后阶段，在这阶段上，别林斯基是这样一个坚决的革命家。我已经指出了说明他的发展的这一时期的某些特点。我现在将指出某些别的特点。

我们一向习惯于认为别林斯基“在向黑格尔的哲学帽子告别时”完全抛弃了他的哲学。这是一个大错。实际上，他放弃的只是它的保守的一面，现在他已经完全领会了它的更深刻的意义，也就是领会了作为“革命的代数学”。当他现在严厉地斥责他关于鲍罗金诺纪念日所写的论文时，他说（这正是我们比较“先进的”合法作家们常常忘记的）：

“当然，我在关于格林卡的《鲍罗金诺战役》一书所写的论文中努力发挥的思想，在原理上是正确的，但是还应当发挥作为历史权利的否定的观念，它的神圣性并不亚于前者，而且没有它，人类历史会陷入发臭的死水潭——假使不能这样写，那末荣誉的义务要求：任何东西也不要写了”<sup>740</sup>。

这就是说，构成这一论文基础的思想是正确的。这一思想是什么呢？这仍然是整个黑格尔哲学的那一基本思想：合乎规律的发展的思想。但是应当怎样适应着俄国的社会关系从这个观点来发展否定的观念呢？应当指出使得别林斯基和他的同道者们感到苦恼的那个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不可能是永恒的。它只有暂时的

<sup>①</sup> 貝平：《別林斯基，他的生平和通信》，第2卷，第106頁739。

和过渡的意义，以后的历史运动必然会把这种制度从俄国的土地上扫除掉，正如这一历史运动曾經扫除过，比方說，封邑-謂彻<sup>①</sup>时期的制度一样。要做到这点，就意味着制定俄国历史完整而有系統的哲学。沒有西欧思想的帮助这是不可能作到的，因为俄国的思想还太落后。但是西欧的思想在当时——即在本世紀的四十年代——还处于过渡的阶段。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本身竟不能发现历史运动中最远的、比别的原因更为深刻的原因；他对于这些原因只是做了个别的、固然是极为卓越的指示和暗示<sup>②</sup>。如果沒有充分闡明这些原因，就不能使自己明白历史运动的意义，也就是說，因而也就不能把自己对将来的希望建立在牢固而现实的基础上。不錯，在我們現在所說的那个时代，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已經让位于費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但是这一唯物主义在說明社会——历史的过程方面是完全不中用的<sup>742</sup>。在这方面，費尔巴哈的唯心主义有时比黑格尔本人更加严重得多。所以別林斯基不能依靠費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来發揮自己的否定的思想。他从灵魂的深处痛恨当时的俄国的“现实”，但是他不知道也不能知道消灭这种现实的力量将从何而来，并且他因为这种无知深感痛苦；他对美好未来的信心有时也大大动摇了。

他在写給波特金的信里說道：“唉，我的朋友，沒有社会就沒有友誼，就沒有爱情，就沒有精神的兴趣，而只有向往这一切的冲动，一些不正常的、无力的、病态的和无成效的冲动。我們的全部生活和我們的关系是这一痛苦真理的最好证明……人类是个性精神发

① 謂彻(вече)是古罗斯的人民會議，是由斯拉夫人的部落會議发展而来的。謂彻曾是一些城市的最高政权机关，决定战争和和平，批准各种法律、分配土地等等。实际上在謂彻中握实权的是封建貴族和上层的商人。——譯者

② 請关心这一問題的人參閱我在《Neue Zeit》(《新时代》)1891年11月号发表的文章：《Zu Hegel's sechzigstem Todestag》(《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741。

展的抽象的基础,我們都是从这个抽象的基础生长出来的,我們是新西徐亚的不幸的阿那克西斯<sup>743</sup>。所以我們打呵欠,走来走去,閑蕩着,对一切都感兴趣而对任何东西都不依恋,我們吞嚙一切而一点不知滿足”<sup>①</sup>。

在另一封信里他說:

489 “沒有目的就沒有活动,沒有兴趣就沒有目的,而沒有活动就沒有生命。兴趣、目的和活动的源泉是社会生活的实体。这难道不明了、不合乎邏輯、不正确嗎? 我們是沒有祖国的人,——不,比沒有祖国还要糟,我們是这样的人,即祖国对他們是幻影的那一些人。因此我們自己也是幻影,我們的友誼、我們的爱情,我們的志向,我們的活动都是幻影,这难道是奇怪的嗎?”<sup>②</sup>

先生們,我恳切地請求你們对別林斯基的这一心理特点加以注意,它是很有教益的,因为它提供宝贵的材料来解决类似不过一年半或两年以前在俄国爭論得如此之多和如此之激烈的问题<sup>746</sup>。別林斯基在向黑格尔的“帽子”告別以后,回到了对俄国“现实”的否定。但是他沒有能够从理論上来論证自己的否定,“發揮它的思想”,也就是說,要在我們的社会生活自身中找出在共进一步发展中必然会消灭現在社会生活中一些不成体統的事情的力量。所以別林斯基痛苦地意識到自己是毫無根据的。他在俄国沒有看到能够促进进一步健康发展的一些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开始觉得俄国是“幻影”。因为他的思想十分清楚和有过很好的訓練,不能用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問題的荒誕无稽的議論来欺騙自己和自慰,所以他用自己所习惯的那种彻底性宣称:連“我們自己”,即否定的人,也是“幻影”。所以他只得惋惜他已經不能放弃否定的那种思

① 貝平,《別林斯基,他的生平和通信》,第2卷,第114—115頁744。

② 同上,第122—123頁745。



想的发展。

“现实唤醒了我們并且使我們睜开眼睛，但是为了什么呢？……最好是让它把我們的眼睛永远闔起来，以使用渺小的沉睡来熄灭渴望生活的心灵里的不知安息的志向……”

但是第三道泉呵，——是忘却的寒泉——，  
它熄灭心灵之火最甘美……”<sup>①②</sup>747

別林斯基这种情緒完全不是例外的：所有和他志同道合的人們，甚至他的最好的反对者，亦即最有學問和敏感的斯拉夫派人都是體驗过这样情緒的。这种情緒在赫尔岑的《日記》中异常突出地表現出来：

“后代的人們能懂得，能认清我們存在的整个悲慘的方面和可怕的情景嗎？……”——他在那里絕望地叹息着。——“他們能懂得我們为什么是懶汉，为什么我們寻求各种快乐，飲酒……等等呢？……为什么在高兴的时候我們沒有忘記悲伤呢？……啊，讓他們怀着思念的心情悲伤地站在我們的墓碑之前吧，我們是值得他們為我們而悲伤的！哪一个国家有过这样的时代？羅馬在它存在的最后几个世紀里也沒有过……。那里有过神圣的回忆，有它的过去，最后，由于祖国情况而受到侮辱的人可以在完全純洁而有詩意的年輕的宗教的怀抱中感觉安心。在过去，空虛和紊乱使我們感到难过，正如現在缺少任何共同的兴趣使我們感到难过一样……”<sup>③</sup>748。

① 貝平：《別林斯基，他的生平和通信》，第2卷，第124頁。

② 別林斯基所引的普希金的詩，參見《普希金文集》时代出版社1949年版，第91頁。——譯者

③ 关于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直到現在还在高談闊論，然而忘却了这种作用最后是要由“社会生活的实体”來决定的这一点的人們，應該特別注意我国知識分子发展史的这个可悲的方面。

稍后同一位赫尔岑又写道：

“今天我在《祖国纪事》中读到了某篇关于《死灵魂》的文章；那篇文章的附录里有一些片断……顺便说说，在那里看到了俄国的风景（冬季和夏季的道路）；我反复读了这篇文章时，有一种无穷的忧郁窒息了我，俄罗斯的这片平原活生生地呈现在我的眼前，我如此沉痛地想起当代的问题，几乎要放声大哭。沉睡的时间太久了。我们为什么要醒过来，还是睡下去吧。大家都紧紧挨着睡下去吧！……”<sup>749</sup>

别林斯基在周围的现实中沒有看到能够促进发展（因而也能促进否定）的任何一种健康的因素，所以他甚至开始残酷无情地反对他一向如此热烈地同情他们的处境，并且当然也要为之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那些人们；我所说的是农民和一般俄国人民。在柯里佐夫逝世以后，别林斯基在给波特金的信中写道：

“柯里佐夫的死使你震惊。有什么办法呢？这种事情对我所起的影响却不同；我像一个处于熾烈战斗中的士兵，朋友和弟兄倒下去了，——这没有关系，上帝保佑，这是寻常的事情。所以伤亡给予我的影响，大概在我对它已经感到习惯时要比最初一刹那来得强烈。关于柯里佐夫的父亲，什么都沒有想；因为这种事件在别的什么地方，而不是在我国，会使作家们的笔触带上有力的、雷鳴般的愤怒。而且这位父亲究竟有什么过错，就因为他是农民吗？他又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情呢？随你的便罢，而我不能怀恨狼、熊或者瘋狗，哪怕它们之中有哪一个撕碎了奇特的天才或者美人，同样我也不能怀恨在途程中压死了人的火车头。大概耶稣正因为这个缘故为自己的劊子手祈禱，并且說，他们不知道他们干的是什么。我不能为狼，为熊，为瘋狗，为俄国的商人和农民们，也不能为俄国的法官和警察分局长们祈禱；但是我对这些人不能抱着个人

的仇恨”<sup>①</sup>。

对于一个民族因为具有亚洲式的落后性而不可能尊敬它，以及热爱这同一个民族，由于它所受的灾难而不可能在精神上感到安静——这种心理无疑是我们那时候的西方派所处境况的最可悲的特点。这一特点对于可以称之为实际政策的東西留下了自己的印記，而且对于以后一代的思想发展起了很大影响。它是值得特別研究的，但是在这里我只就它决定別林斯基思想发展往后进程的范围內来談談它。

491

我們已經知道，他在回到对现实的否定以后，以他特有的热情埋头研究社会主义。但是这种热心研究只持續了几年。在四十年代的后半，他怀疑了社会主义甚至完全和它“訣別”。他在1847年2月6日給波特金的信中一面很称贊李特雷，他所以喜欢李特雷“正是因为李特雷既不屬於《Journal des Débats》和《Revue des deux Mondes》<sup>②</sup>里面的聰明的小偷，也不屬於社会主义者”，他現在說他們是从天才的卢梭的幻想里蛻化出来的。在这同一封信中，关于路易·勃朗有精彩的意見：

“湊巧在《Gazette de France》<sup>③</sup>中我讀到了路易·勃朗著《革命史》第一卷的片断。这是他关于伏尔泰的意見！天哪，这是舍維辽夫！路易·勃朗在責备伏尔泰时所說的一切，是正确的，然而愚蠢的是，他不是批評他，而是在斥責他，而且还是把他当作我們的同时代人，当作《Journal des Débats》的編者一样。路易·勃朗是現代事件的历史家；但是对于历史所造成的过去的事情在他看

① 貝平：《別林斯基，他的生平和通信》，第2卷，第157頁750。

② 也就是說，屬於現有的資產階級制度的有限的袒護者和保衛者。〔《辯論報》和《兩個世界評論》〕

③ 〔《法國公報》〕

来似乎是不应动手的”<sup>751</sup>。

在給安年柯夫的一封信（1848年2月15日）里他对于路易·勃朗說得更加厉害了：

“現在我正閱讀伏尔泰的小說，而且每时每刻都在內心里对着路易·勃朗这个蠢材，驴子，畜牲的嘴脸吐唾沫……”<sup>752</sup>。

先生們，請注意，当別林斯基写了我在上面所引过的关于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的論文时，他是站在路易·勃朗的观点上的，当时他对路易·勃朗抱着最大的敬意。現在路易·勃朗关于伏尔泰的意見在他看来像舍維辽夫。为什么这样呢？不是別林斯基承认这一評語“就其本身說来”是正确的嗎？不錯，是正确的，但是其中缺少历史前景。当时的社会主义的唯一弱点，就是沒有坚定地站在历史的观点上的那种本領，这种社会主义正是由于这一缺点，現在被人称为空想的。直到临死时仍然是黑格尔主义者的別林斯基想必看到而且确已看到了当时的社会主义的这一缺点，这也就說明了在他的生命的最后几年的信中对于社会主义者所以怀有忿怒心情的緣故。他愈是沉痛地意識到必須寻找自己否定现实的具体而确实的基础，要不然就得承认甚至我国否定流派的那些少数代表人物也是“幻影”，他对站在抽象地否定現存事物制度的基础上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愈是生气。因为空想社会主义沒有給他提供材料来这样論证否定的思想，所以他在与社会主义“訣別”时，就开始更加注意地研究資产階級的历史作用。在我已引用过的1848年2月15日給安年柯夫的信中，我們看到了以下一段极为重要的話：

---

① 又是因为路易·勃朗在他的《法国革命史》中所表示的对伏尔泰的否定的态度。

“我的有信仰的朋友<sup>①</sup>和我們的斯拉夫派大大幫助了我拋棄對人民的神秘的信仰。人民在什麼地方和什麼時候解放了自己呢？任何時候和一切事情都是通過個人來做的。在我和您為了資產階級問題進行爭論時，我把您稱為保守分子，我是雙料的蠢貨，而您是聰明的人。法國的整個未來掌握在資產階級手中，一切進步都取決於它一個階級，人民在這裡有時只能起一種消極的輔助作用。當我在我那有信仰的朋友面前說俄國現在需要一個新的彼得大帝時，他把我的思想當作邪說一樣加以攻擊，他說，人民應當為自己作出一切。這是何等天真愉快的思想啊！在這以後，為什麼不假設棲息在俄國密林中的狼群會聯合起來組成一個設備完善的國家，先用君主專制治理自己，以後改為立憲國家，最後改為共和國呢？庇護九世用兩年時間證明了，一個偉大人物對於自己的國土意味著什麼。我那有信仰的朋友還向我證明說，讓上帝保佑俄國擺脫資產階級罷。現在可以清楚地看出，俄國國內發展過程不會在俄國貴族變成資產階級以前開始的。波蘭最好不過地證明了，剝奪了資產階級權利的國家是如何堅固。我真是一個怪人！當我的腦子裡裝滿了某種神秘的荒唐思想時，思想健全的人很難用下面這樣的證明把它從我的腦子裡清除出去，說：要做到這點，我一定要和酷好這同一思想的那些神秘主義者、虔信主義者和幻想家們親近，——在這裡我就要後退了。我的有信仰的朋友和我們的斯拉夫主義者給了我很大的幫助。請不要對這種接近情況感到驚訝：因為最好的斯拉夫主義者是和我那有信仰的朋友完全一樣地看待人民的；他們是從社會主義者那裡吸取這些概念的，並且在自己的論文中引證喬治·桑和路易·勃朗。但是關於這一點說得夠了！……”<sup>②</sup>。

493

① 我們不知道別林斯基在這裡指的是誰，但可能是指巴枯寧。

② 《安年柯夫和他的朋友們》，第610—612頁<sup>753</sup>。

这段摘录在你们看来很可能觉得太长了；但是我不能不把它全部引用出来，因为对于任何一个想要彻底了解别林斯基社会政治思想的人，想要知道这些思想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如何形成的人说来是很必要的。我们的出版物已经注意到这段摘录，但是这段摘录在那里引起了极可笑的误解。米雅柯金先生认为，假使根据别林斯基的意见，一切都是通过个人来做的，那末他的观点就是我们现代的主观主义者们的观点<sup>754</sup>。这是很天真的说法。实际上，别林斯基希望俄国有哪些“个人”呢？他说，“俄国现在需要新的彼得大帝”。换句话说，俄国需要有一个非常憎恨我们的“现实”的沙皇。就当时的别林斯基思想来说，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别林斯基在人民中间未发现任何进步的因素，对于人民会出来向我国可悲的现实提出抗议这一点不抱任何希望，他无可奈何地把自己的视线转移到沙皇的宝座上去。和他同时的沙皇制度的代表人物尼古拉一世为人迟钝、凶狠，仇视人民的一切前进运动。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是不行的。但是彼得一世既不迟钝也不仇视进步现象；是他把莫斯科的露斯从很多世纪以来的沉睡中唤醒的。所以我们应当希望在俄国再出现一个新的彼得大帝。别林斯基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年不只一次地发表这样的思想：俄国的发展应当是自上而下的，而不是自下而上的，也就是说，我国一切进步的东西都是由于政府的倡议而不是由于人民的倡议而出现的<sup>①</sup>。他在写给安年柯夫的信里也吐露了同样的想法。这种观点对于先进的俄国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发生了很大影响。那些为了反对政府而参加革命斗争的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革命平民知识分子，已经不可能设想他们的理想的实现会是“从上面”来的，他们所以能够成为

① 比如，可以参阅载于1846年出版的《彼得堡的生理学》论文集中的他写的论文《彼得堡和莫斯科》<sup>755</sup>。

革命者并將繼續是革命者，只是因為堅定地相信現存制度將“從下面”被摧毀，也就是說，將被人民革命摧毀。所以革命平民知識分子是這樣樂意地從斯拉夫派那里採用他們對俄國人民的一般理想化，特別是對人民法制生活和經濟生活某些方面的理想化<sup>①</sup>。但是別林斯基這一觀點和“主觀社會學”沒有任何共同之處，這從它的起源就足以證明的。請設想：我們的批評家是從哪里形成這種觀點的呢？他的這種觀點是作為他企圖在現實的（具體的）基礎上論證自己的否定觀念的結果而產生的，因為他在人民中間沒有找到獨立進步運動的保證，所以被迫勉強地承認我們的发展不是由下而上的，而是由上而下的，於是以這樣的希望來安慰自己：也許尼古拉·巴維洛維奇<sup>②</sup>最後會作出一些事來消除當時俄國的主要禍害：農奴制度。當1847年末流傳着一種謠言說尼古拉確實準備廢除它的時候，別林斯基高興地抓住這種謠言，高興地把它告訴了當時在國外的朋友們。同時他擔心我們的進步派會以它敵視政府的尖銳表現把政府吓壞了。在別林斯基看來，這樣一些人是有害的，因為他們“使政府激怒，使它成為多疑的，使它在根本什麼事也沒有的地方認為要發生暴動，並且引起一些對於文學和教育的急劇和有害的措施”<sup>756</sup>。因此他對於當時被送到高加索去充軍的舍夫琴柯是不同情的<sup>757</sup>。從當時的別林斯基——寫給果戈里的有名的信的作者這方面看來，這種觀點當然看來是很奇怪的。然而凡是

494

① 例如，村社。有名的斯拉夫派薩馬林1847年在《莫斯科人》（筆名：M...3...K...）上寫道：“村社的原則構成全部俄國——過去的，現在的和未來的——歷史的基礎、土壤；一切上升到地面上來的東西的種子和根都是埋沒在這土壤的肥沃的深處。”這是我們民粹派的主要思想。以後薩馬林說，西方世界現在表示着村社的要求（他是指社會主義運動），而這一要求是“和我們的實體”相符合的（着重號是我加的），而且“我們拿生活來證實公式”，最後，我國歷史和西方歷史的接觸點就在這裡。一直到現在，這還是構成民粹派反對某些“資本主義的擁護者”的論爭的全部內容。

② 即尼古拉一世。——譯者

懂得产生这一观点起源的人，都一定会承认，别林斯基这种观点是企图把自己的否定和当时存在于俄国的社会力量的对比联系起来的結果，而不是对历史的“主观”看法的結果。而且据别林斯基当时的看法，甚至彼得大帝本人的活动应当首先服从整个经济现实的要求和法则：“俄国发展的内部过程在俄国的贵族没有成为资产 495 阶级以前是不会开始的”<sup>758</sup>。假使这是主观主义，那末我们不明白现在的俄国的主观主义者为什么那样害怕资本主义。米雅柯金先生应当自己弄清，并对我们说明这一有意思的情况。

让我们继续往下谈。别林斯基说，斯拉夫派人和社会主义者对人民的看法是完全一样的。这完全是对的；只是应当记住，他说的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在斯拉夫派对人民的看法中，是没有发展的要素的。还有更甚者：伊·谢·阿克萨柯夫使人感动地大谈特谈俄国人民拯救性的静止状态。同一个拯救性的静止状态也感动了属于更早时期的他的信徒们。在当时的社会主义者的观点中，发展的要素差不多也是不起任何作用的。他们在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中只看到了害处，没有察觉到它的革命的方面。在把人民理想化时，他们所理想化的不是那由于人民的社会经济状况而在它内部所包含的发展的能力，而是人民现时所具有，在其中不能不有从过去遗传下来的令人同情的特点的整个那种性格。别林斯基既已发现空想社会主义的唯一的弱点而同它发生矛盾，就以自己通常所有的那种尖锐性指出人民性格的软弱方面。他在资产阶级身上看到了历史运动的代表人。把他这种观点译成我们现在的语言，那我们就会说，别林斯基比那时候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更好地懂得西欧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而且预料到了它对消除我们旧时代的“宗法制的生活方式”的巨大重要性。不错，在意识到了这一作用和重要性以后，他马上又陷入另一个极端；不仅不承认俄国农



奴，而且也不肯承認法國無產者有歷史自動性的能力<sup>759</sup>。這是一個大錯誤。但是這個錯誤和他的新觀點中所含有的那個真理相比完全是微不足道的。

在反對空想社會主義的時候，別林斯基的思想也朝着當時的西方革命思想已開始走的同一個方向走去。

黑格爾的哲學為費爾巴哈的哲學所代替。費爾巴哈的哲學又讓位給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的科學社會主義。這個社會主義是對於別林斯基一切理論要求的回答。它根據現代文明社會的社會生活的歷史發展過程論證了否定的觀念，並且把這個首次被不可動搖地論證了的思想帶給國際無產階級的隊伍。這個無產階級的運動，照恩格斯的說法，成了德國古典哲學的繼承人<sup>760</sup>。因此連“人民”也不再是可憐的、迷信的和惰性的群眾。為社會主義思想所鼓舞的無產階級是現代文明社會中最活躍的、最有思想的部分。而且不僅在西歐進行着人民的這一根本改變。在我們的眼前也在發生俄國工人階級的階級自覺的覺醒和發展。對其重要性很難加以夸大的這個現象，給所有那些真誠地痛恨現存制度並決心與其鬥爭的人們創造了新的成功機會。現在，否定的觀念在我國已得到社會發展過程本身的論證。現在我們的祖國已經不是幻影，正如那些致力於給它爭取美好的未來的人們也不是幻影一樣。現在只有可憐的頹廢分子可以自問：“為什麼我們覺醒了呢？”<sup>761</sup>但是頹廢分子們也不對自己提這類的問題。

假使別林斯基活到我們今天，那末他的精神終於會得到安慰。他已經不再把自己稱為新希臘的阿那克雪斯<sup>762</sup>。不，他會以自己特有的熱情、自己的有鼓舞力的語言來歡迎俄國無產階級正在開始的覺醒，而且，他在臨死時會由衷羨慕那些將看到無產階級取得勝利的幸福的人們。

497

应该结束这篇文章了，可是我还没有谈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活动。不过，我有权利不去说它，因为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的思想和意义已经部分地在我們合法的书刊中加以阐明了<sup>①</sup>。在这里我想指出一点，这点构成了他全部智力劳动最可宝贵的、最主要的东西，这是从他第一次摆脱掉“抽象的英雄主义”的压迫以后的时候开始并在他那多灾多难的生活的最后日子才完结的。他的脑力劳动的这个最主要的东西是对于抽象的、空想的理想的否定，是发展否定的观念的意图，而以社会生活本身合规律的发展为根据。还没有任何一人从这一方面来看别林斯基，这个方面现在对于我們比其余一切人更为重要。要知道在我国，那些力图在具体的基础上论证自己的否定的人，同那些抽象理想的代表人物和捍卫者——这些我們今天的唐·吉珂德們——之间的斗争，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sup>①</sup> 不过，我在这里想尽力用几句话来说明它。我們的六十年代的启蒙思想家——車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把别林斯基看作是自己在文艺批评方面的导师。他們是完全正确的，我已經說过，别林斯基在許多方面是他們的先驅。但是从他們的視野中完全消失了别林斯基文学批评活动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他努力于使批评的评判和判断摆脱批评家个人的趣味和同情，并把它們放在客观的、科学的基础上。在論鮑罗金諾战役周年紀念的論文中已將这一意图突出地表现出来。他在这篇論文里說：“我們认为并且坚信，在我們的文学中用‘哎呀’、感叹符号和刪节号来表达沒有任何深刻思想的无謂空喊的时代已經过去；以独裁者的妄自尊大的态度說出除了所謂思想家的个人意見和专断的概念以外沒有一点根据和一点也不能被证实的伟大真理的时代也在过去。公众开始要求的不是意見，而是思想……意見所凭借的是偶然人物的偶然信念，这种人物和誰也沒有关系而且本身是很不重要的东西；思想所凭借的是自己，是凭借根据邏輯的規律从其自身内部发展出来的东西”<sup>763</sup>。在这里，别林斯基还是双脚站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基础上的。但是后来，例如，在他論述普希金的論文中，至少在某些地方放弃了唯心主义的基础并把我們伟大的詩人看成我們貴族最好的、最有學問的代表人物来判断的。这样的批评不像六十年代的批评，而且和我們今天的“主观的”批评根本沒有任何共同之点。这是根据唯物史观的科学批评的萌芽。不消說，别林斯基文学观点的历史是和他的哲学見解的历史非常密切地联系着的。然而这里并不是闡明这种联系的地方<sup>764</sup>。

## 維薩里昂·格里哥里也

### 維奇·別林斯基<sup>765</sup>

(1811—1848)<sup>766</sup>

[1909年]

維薩里昂·格里哥里也維奇·別林斯基的生活从表面上看仿佛沒有經歷什么重大事件似的。就他的出身來說，是一个真正的“平民知識分子”。他的父亲最初在波罗的海舰队，后来在自己的故乡謙姆巴尔城当医生。維薩里昂·格里哥里也維奇在1811年（直到現在尚未查明是在二月还是在五月）誕生于斯維阿波尔格，那时候他的父亲所服务的海軍陆战队兵团也都在那里。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謙姆巴尔和平茲度过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在他的心灵里所留下的快乐的印象是很少的。他的父亲是个爱喝酒的人，他的母亲大約是一个眼光十分狹小和爱爭吵的妇人。家庭的經濟状况始終是很拮据的。但是別林斯基的父亲无疑地也有他的优点。別林斯基的父亲按他所受的教育來說，是超然于周围官吏的，他同他們經常发生一些不愉快事件。他的亲戚德·彼·伊万諾夫认为，他父亲关于官僚們的一些詐騙勾当所讲的故事給了小維薩里昂很大影响。除了官吏生活的吸引力以外，別林斯基很早就观察到了貴族階級的一些阴暗面。我們可以把握地說，农奴制度的

惨状在他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他最初在谦姆巴尔县立小学读书，后来在平兹文科中学读书，他是在1825年夏被送到那里去的；最后，他在1829年秋季入莫斯科大学。但是学校教育，不论是初级、中级和高级的教育，在那时候都是很不能令人满意的，要是别林斯基还是获得了不少知识，至少是文学方面的知识，那末这首先要归功于他自己和某些幸运的重要的集会。平兹文科中学的从前的老师波波夫关于别林斯基写道：“他在文科中学里与其说是在教室里不如说是从书籍和谈话中学到很多东西。在大学里情况也是这样。他的所有知识都是从二十年代以后的俄国杂志和俄国书籍中得来的。知识中不足的地方是用同朋友们的谈话中所听到的东西来补充的。不错，在莫斯科的聪明的斯坦凯维奇给了他的同志们很大的影响。我认为，对于别林斯基说来，斯坦凯维奇比大学更要有益得多。别林斯基成为文学家以后，经常和一个人数不多的小组来往，参加这个小组的不是学识渊博的学者，就是在小组内流传当代的生动而有趣的知识的人们。这些人大部分都是青年，他们充满着求知识、作好事和求荣誉的热情。他们几乎都懂外国文，他们阅读的外国文的书籍和杂志同俄文的书籍和杂志一样多……在这个学校里，别林斯基获得了巨大的成就”<sup>767</sup>。

弗·费·奥多也夫斯基公爵的证言和这一点是完全符合的，他说：“在我们这里，别林斯基无从学习。我们大学的墨守成规不能满足他的高度有逻辑的头脑；我们的大部分教授的庸俗行为只有引起他的蔑视；没有道理的——不知道为了什么——迫害只能增加他的愤怒，这种愤怒掺杂在他那独特的哲学发展中，把他的无畏的三段论法引导到了最极端的限度”<sup>768</sup>。

把“愤怒的”三段论法撇在一边，我们补充说，1832年9月他因为“无能力”而被开除出大学，这就使别林斯基免除了彻底满足“我

們大学的墨守成規”。实际上，他被开除的原因是他写了一本悲剧《德米特里·卡里宁》，它的主角之一拿关于“靠了自己的亲近人的骨头和肉来喂养的蛇、鱷魚和老虎”<sup>769</sup>（指的是农奴制）来大胆地质問“人們的父亲”。当时出席审查委员会會議的大学教授立即責备了这个青年作家。这个悲剧是1831年审查的，而在1832年的上半年別林斯基就被开除了。別林斯基本人这样断定开除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自己的錯誤和疏忽，而最大的原因是一位大腹便便的閣下長時間的患病和卑鄙行为。現在是非常微妙和艰苦的时代：类似的事件并不罕見……”<sup>770</sup>。

別林斯基一生都在受着貧困的压迫。貧困把他的始終是軟弱的身體彻底地折磨坏了，使他过早地死亡。貧困和他开了一个更加恶毒的玩笑，注定他为了生活而艰苦奋斗，从而剝夺了他不断充实自己学識的缺陷的可能。这一情况使他对小組的成員采取不完全正确的态度，这个小組是波波夫在上面的引文里說过的，它对于別林斯基的思想发展过程有过极大的影响<sup>771</sup>。这一小組——即著名的斯坦凱維奇小組，在后者于1837年秋季到国外去以后，米·亚·巴枯宁即起过异常显著的作用——主要是由在物质方面有保证而且从童年起就会几外国國語的人所組成的。別林斯基能讀法文书，但是他既不懂英文，又不懂德文，所以必然会使朋友們感到不方便，因为他必須通过他們来熟悉外国文学和哲学的資料。我們觉得，我国文学史家直到現在对于这一情况的不利地方还没有予以应得的注意。我們对这个情况的簡短說明是：这个情况有时使別林斯基不得不作在智力上远远不如他的人的学生。

总之，这一意見是适合于米·亚·巴枯宁的——他在斯坦凱維奇以后給別林斯基叙述了黑格尔的哲学——而且更适合于卡特柯夫——我們的批評家借助于他認識了黑格尔的美学。至于說到

尼·弗·斯坦凯维奇，那末我们还不es敢断定，别林斯基在智力上超过他。看来，别林斯基自己似乎是倾向于尊敬他的。然而这一点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别林斯基知道自己的价值，但他不是极端自私自利的人；他把自己的朋友理想化了并且夸大了他们的优点<sup>①</sup>。尼·弗·斯坦凯维奇无疑地是一个有很卓越的头脑的人，但是他没有丝毫理由对别林斯基照伊·谢·屠格涅夫的说法怀着若干嘲笑的心情。其实，被屠格涅夫本人称之为友谊的嘲笑的这种嘲笑，只能被理解为隐藏在友好的玩笑之下的对别林斯基的“极端行为”不赞许，别林斯基这些“极端行为”使得他的所有朋友，连亚·伊·赫尔岑也不例外，都很惊异。正是斯坦凯维奇给他取了绰号“狂暴的维萨里昂”。但是在这里回忆一下黑格尔的话是合适的：没有热情就做不出任何伟大的事情。别林斯基的“狂暴的”性格使得我们的批评家对于当时经常存在而无法解决的问题看得十分的深刻，而这却是斯坦凯维奇永远做不到的。

501 值得注意的是，别林斯基在自己的小组中几乎是唯一的平民知识分子。大家知道，在后来，即在六十和七十年代，平民知识分子对待“一些经常存在而无法解决的问题”远不像贵族等级开明代表那样克制的。别林斯基的“狂暴”仿佛成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他们的追随者将来在文学上的“狂暴”典型。“六十”年代的人们这样热烈地尊敬别林斯基不是没有原因的……

别林斯基被开除出大学以后，过着很贫苦的生活，在纳杰日丁那里找到了一个固定的文字工作。他先担任翻译工作，但在1834年9月他已经写了一篇题为《文学的幻想》（散文体哀歌）的文章，

---

<sup>①</sup> 他在写给波特金的一封信中一半开玩笑地谈到卡特柯夫：“请不要忘记，我和卡·是同行的竞争者，然而就我的性格来说，我总能看到我的竞争者的天大的优点，而把自己看得比零还小”772。在这里，在玩笑下面掩盖着不可争辩的真理。

作为一个文学批評家初次出現在《雜談》上。从这时起他就不停地写作,最初在納杰日丁那里,即是在《雜談》和《望遠鏡》上(1834—1836年),后来在《莫斯科觀察家》(1838—1839年),在《祖國紀事》(1839—1846年)上,最后在《同时代人》(1846—1848年)上发表文章。在有一个时期,他的文学活动中断了(1836—1838年),这只是“由于不得已的情况”,即由于《望遠鏡》在1836年秋季的被查封停刊<sup>①</sup>。

1843年夏季,別林斯基在莫斯科同莫斯科一个学院的学监接近了,同年她成了他的妻子。他和妻子的关系的性质直到現在我們还是不太清楚的。貝平簡短地談到这些关系:“他(別林斯基——格·普·)把构成他的性格特点的全部热情帶到这些关系里;他充滿了希望,——应当結束在困难的外面活动中压迫着他的孤独;他期待着在自己生活中来一个变革……”

自从有了家庭以后,他就开始了新生活,同时他也有了家庭的特殊兴趣和忧虑,这只能是他个人操心的事……別林斯基繼續做很多的工作,甚至工作得比以前更多了”<sup>773</sup>。

屠格涅夫这样描写別林斯基的外貌:“这是一个中等身材的人,乍一看来,很不漂亮,甚至笨手笨脚的,瘦削的臉,胸部凹陷,低垂着头。显然看得出,他的一个肩胛骨比另一个大些。任何人,甚至不是医生,馬上就会因他身上的肺結核的一切主要特征而感到

---

<sup>①</sup> 我們补充如下:別林斯基在1831年的《小报》上刊登了一首詩,在1839年写成五幕劇《五十岁的伯伯或奇怪的病》;同年在《俄国殘废軍人报》的《文学副刊》上登載了几篇論文,并在1845年的《文学报》上刊登了一篇(論康健米尔的)論文(第6、7、8期)。其次,他在同年为論文集《彼得堡的生理学》第一部分写了論文《莫斯科和彼得堡》,而1846年的《彼得堡汇编》刊登了他的論文《关于俄国文学的想法和意見》。那时候,他也写成关于阿·瓦·柯里佐夫的論文,是在后者的詩集中刊登的,并且出了一个小册子:《尼古拉·阿列克謝也維奇·波列伏依》。

502 吃惊……而且(在最后几年)他几乎经常咳嗽。他的脸色苍白而略带粉红色,鼻子不正,好像是扁平的,微微歪撇着嘴,特别是在张开嘴露出小白牙时更显得歪了;浓浓的一束淡黄头发落在洁白而漂亮的虽然是低低的前额上。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比别林斯基更有魔力的眼睛。蔚蓝色的眼睛在瞳人深处闪烁着金黄的火星,这双在平时被睫毛遮住一半的眼睛,在非常兴奋的时候睁得很大并且炯炯放光;在快乐的时刻这双眼睛带有和蔼善良和无忧无虑的幸福、迷人的表情。别林斯基的声音低弱,嗓音有些嘶哑,但是听起来很悦耳;他说话时带有特别的重音和气音,‘顽强,激动和急促’(涅克拉索夫先生的诗)。他像婴孩一样天真地笑着。他喜爱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用美丽而纤细的手指敲着装有俄国烟丝的烟盒。谁要是只在街上看到他戴着冬季便帽,穿着旧貉绒皮大衣和磨破了的套鞋,以匆忙而不稳的步伐顺着墙走过,带着神经质人所特有的容易受惊而严肃的神情环顾四周,那末这个人对于他是不能形成正确的概念的……在陌生人中间,在街上,别林斯基是胆怯而慌张的。他在家通常穿着灰棉大衣,一般是很整洁的……”<sup>774</sup>。

此外还要补充的是:据屠格涅夫说,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别林斯基的石印版肖像对他的外貌的描绘是不正确的。

## 二

从表面看来仿佛没有经历重大事件的别林斯基的一生,在思想领域却经历了真正的风暴。这些风暴的意义迄今对于他的许多景仰者是不明了的。景仰者对于别林斯基思想发展的那一个他认为自己应当顺从当时的俄国现实的时期曾经而且现在也感到困惑。人们照例把这一时期归咎于黑格尔,并且常常用这样一些字眼来说明它的特点:“错误”、“失策”、“误会”等等。实际上,这一时



期最鮮明地證明是有利於別林斯基巨大的智力的，並且最好不過地證明奧多也夫斯基公爵的話：“別林斯基是我一生中不論何時所遇到的最高的哲學組織之一”<sup>775</sup>。

為了確信這一點，應當首先弄清黑格爾哲學的歷史意義，認識這一哲學成了別林斯基的思想生活中如此重要的一個時期。

503

十八世紀法國啟蒙運動者堅定信仰理性的力量而且同樣堅信“意見支配世界”，也就是說，思想發展的過程決定社會發展的過程。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的非常驚人的事變破壞了對於“理性”力量的信仰，而一些最善於深思的人開始相信：思想發展的進程不決定社會發展的過程，相反地，本身是為它所決定的。於是，在社會科學史中開始了一個新階段；更確切地說，那時便初次有了牢固地論證這一科學的可能。復辟時代的特点是：一般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其中也包括在人類思想發展的歷史過程中發現規律性（我們回憶一下聖西門—奧古斯特·孔德的有名的“三個時期的規律”）的頑強努力。這一時代最傑出的歷史學家把人們的見解看成是他們的社會關係的產物，而且社會生活和文學的所有研究家都一個跟着一個地轉到發展的观点上來。而這一轉變的過程我們不僅在法國可以觀察到（在那裡它是由於上述歷史事變的過程所引起的），而且在德國（它注意地觀察了這些事變並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參加了這些事變）也可以觀察到。以謝林和黑格爾為代表的德國的唯心主義哲學，主要是進化的哲學。

然而必須指出，在德國的唯心主義哲學，特別是在黑格爾哲學中，關於發展的學說採取了辯證的性質。辯證法也是關於發展的學說；但是它永遠也沒有庸俗的進化學說所特有的那種片面性，這種學說在居維叶的災變說傾覆以後，在十九世紀的自然科學家中間占有統治地位，而且這種統治地位又從自然科學家那裡轉

移到研究社会问题的人们那里去了。黑格尔坚决反对了有名的论点：“自然界没有飞跃。”他说过，支持这一论点的人们只是看到发展过程的环节之一。实际上，量的变化，在逐渐积累起来的时候，最后将转化为质的变化，而这些转化是通过飞跃来进行的。大家知道，现在生物学中盛行着一种所谓飞跃式发展的理论。黑格尔会说，它证实着他的辩证法的一个基本命题。而他是正确的。

504 我们不可能在这里来详细论述这一命题。我们只要指出，关于发展的黑格尔的、即辩证的学说，不仅给予“飞跃”（质的变化），而且也给予准备它们的逐渐变化（量的变化）的过程以适当的地位。因此不能不承认赫尔岑把黑格尔哲学称为革命的代数学是正确的。黑格尔说过，“世界精神”永远不能停留在一个地方。“它经常在前进着，因为向前运动是它的本性”。我们由此看见，黑格尔的信徒们没有任何逻辑的理由屈从于上述的对理性力量的失望。相反地，黑格尔的哲学好像是有意地被想出来使有思想的人去掉这一失望的重负似的。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它对于当时的德国青年，而且不仅对于德国青年，产生了这样巨大的影响。

但是那些在前进的意图中凭借了黑格尔哲学的人，在自己同陈旧的观点斗争中已经不能满足于诉之某种抽象的原则，例如，诉之于永恒正义等等的原则。不，这样的申诉是只配“形而上学者们”的。已经领会了黑格尔辩证哲学精神的先进人物，首先应当坚信他的“主观的”意图只是表现着在社会中进行的“世界精神”运动的“深刻的内部工作”。没有为这一工作所加强的主观意图，被认为是任意的、“虚幻的”和早就注定要失败的。

有些人认为黑格尔的名言：“合理的都是现实的，现实的都是合理的”<sup>776</sup>是保守主义的表现，这些人错了。这里是由于不熟悉黑格尔的术语所引起的误会。按照黑格尔的看法，远不是一切存

在的都是現實的。他說：«Die Wirklichkeit steht höher als die Existenz»（現實高于存在）<sup>777</sup>。偶然的存在不是現實的存在。現實的只是那種必然的東西。歸根到底只有“世界精神”的永恆前進運動才是必然的。“世界精神”以自己的“老田鼠式的”工作破壞現存的制度；把它變成失去任何“現實的”內容的形式，使得注定要和舊秩序衝突的新秩序的出現成為必然。

并非一切黑格爾的學生都很好地理解他的哲學的這種辯證性質。而且連他本人在將近垂老時，對待社會政治問題的態度也常常違反這一性質。他的哲學不僅是辯證的體系。它也想成為一個絕對真理的體系。而這一野心却是黑格爾哲學中保守主義的成 505 分。根據他的學說，任何一個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的理想的表現。假使思想家找到了絕對真理，那末這就是說，他已生活在“絕對的”、也就是說，完全的社會制度與之相符合的時代。然而因為“絕對的”真理不能衰老，因為完善的社會制度不能變成不完善的，所以由此可以得出結論，改變這一制度的意圖是反對“世界精神”的叛變。當然，即使在“絕對的”制度下也可能做出某些局部的改良；但是整個說來，這種制度必須仍然像它所表現的“絕對的”真理那樣不可動搖的。

黑格爾在青年時代同情過法國大革命；但是隨着年歲的增長，他對自由的熱愛漸漸減弱了，而同現存事物制度和和平相處的傾向越來越加強了。這在他的«Philosophie des Rechts»<sup>①</sup>中特別強烈地表現出來。這一著作有很多非常天才的思想。同時這部著作使人們對於作者想使自己的哲學同普魯士的保守主義相調和的明顯的努力感到震驚。在這方面特別有教益的是那篇序言，這篇序言

① 《法哲學》

里有名的命题：“合理的都是现实的；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得到完全不是他在《逻辑学》中所给予它的那种解释。从序言中看来，一个理解了现实和发现了隐藏在它里面的理性的人，是不会起来反对现实的，而是同现实调和并为它而欢欣。这样的人不放弃自己的主观自由；但是主观的自由不是在他同现存事物的不协调而是在他同它的一致之中表现出来的。一般说来，同现存事物的不协调，在认识的理性同体现于现实中的理性之间的分歧只是由于未充分理解这一现实而引起的，只是由于抽象思想的一些错误而引起的。一知半解激起人们反对周围现实，真正的知识却同周围现实调和。黑格尔在上述的序言中是这样议论的。我们请读者注意，“与现实调和”（Die Versöhnung mit der Wirklichkeit）这个说法在这里是黑格尔自己使用的<sup>778</sup>。

### 三

506 由此可见，别林斯基的那些朋友，如格兰诺夫斯基和斯坦凯维奇，硬说推动他和现实调和的是他对黑格尔不正确的理解，这是不对的。在这里，当然是理解得不正确了；但是别林斯基所犯的错误并不比黑格尔本人所犯的错误更大——黑格尔宣布了自己哲学的“绝对的”意义，却忘记了自己的辩证法的基本思想：一切皆流，一切皆变。很可能的是：假使别林斯基掌握了德文并有足够的时间来系统地研究黑格尔哲学，那末他会更快更容易地理解它的真正的、也就是辩证的性质——这是很可能的。没有掌握辩证的思想的巴枯宁，以自己的影响妨碍了别林斯基去理解黑格尔既宣布他的体系是绝对真理，就违反了自己的哲学，——这是很可能的，对于我们来说甚至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虽然如此，我们应当记住，别林斯基和现实的“调和”，至少是同我们在 «Philosophie des

Rechts》<sup>①</sup>中所遇到的那个黑格尔不相矛盾的。那些就別林斯基的“錯誤”而輕視地聳聳肩的人們是太傾向于忘記：这个錯誤是继黑格尔之后作出的。

但是青年的別林斯基根据自己儿童时代和青年时代关于我們俄国的“现实”完全不愉快的印象，为什么仍然会犯这个錯誤，虽然是继黑格尔之后而犯这种錯誤的呢？为了給自己回答这一問題，应当認識別林斯基在紧接于他醉心黑格尔以前的时期的情緒是怎样的。他自己后来也說过，席勒的早期著作《强盜》、《費也斯柯》、《陰謀与爱情》教导他“为了脫离发展的地理和历史条件而悬在空中的抽象的社会理想对社会制度狂暴地仇恨”<sup>779</sup>。《唐·卡尔洛斯》也在同一方向影响了他。他說道：“唐·卡尔洛斯把我投进抽象的英雄主义之中，除了英雄主义，我輕視一切……而在英雄主义之中，尽管自己有不自然的和紧张的狂喜，却很好地意識到自己等于零”<sup>780</sup>。別林斯基这一自白对于他的思想发展史是极为重要的。在他的自白里更重要的是：他所說明的伴随着对自己的无力認識的情緒，不可能是年輕的別林斯基的个人特点；当然不是他一个人在那时意識自己是个“零”。那些不想贊美現有事物制度的一切有思想的俄国人，想必都認識自己完全沒有力量。少年的別林斯基所处的时代是很艰苦的时代。赫尔岑关于这个时代說道：“社会的道德水准降落了，发展停滯了，所有前进的、有毅力的东西都被从生活中勾掉了。剩下的只是：受惊吓的、軟弱的、意气消沉的人們，他們都是卑鄙的、空虛的；亚历山大一世时代的殘渣占据了首位”<sup>781</sup>。可見，那时候的社会情緒正是这样的：凡是对于解放的思想不陌生的人想必都意識到自己无力并“觉得自己等于零”。用不着

507

① 《法哲学》

說，这样的感情是多么的痛苦。別林斯基仿佛有时也能克服这种情緒而使自己抱乐观情緒。別林斯基在他写的《文学幻想》中，表示了俄国現在所需要的不是文学而是教育以后，断定了我們的政府在这方面是被最良好的願望鼓舞着的。我們是知道別林斯基的，我們可以怀着充分的信心說，当他这样断定时，他并没有昧着良心說話。但是也很容易理解，他对当时政府的教育願望的信心并不是长久不变的，有时却十分怀疑这些願望：要知道他想必看到了，每天都带来一些新的事实，說明他的信心是完全沒有根据的。而且教育的成就也是不能滿足浸透了“抽象的英雄主义”的青年人的。这样的青年所需要的是更加无比“英勇的”前景，而俄国的社会生活是沒有开辟出这些前景的。所以別林斯基的极其短暫的乐观主义在他的心灵中一次又一次地被以上所指出的“痛苦地感觉自己为零”的情緒所代替。应当摆脱这样的情緒，应当从这一状况中找一个出路。而別林斯基是不倦地寻找了它。

他得到巴枯宁的帮助在費希特的哲学中暂时找到了它。后来他說：“我有力地，狂热地抓住了費希特的思想”<sup>782</sup>。这是很可以注意的而且同时也是很自然的。据別林斯基自己的話，在他的心目中理想的生活和现实的生活总是被看成两个的。在抓住費希特哲学以后，他感觉自己的这个两重性已被治好了。他使自己相信“理想的生活正是现实的生活……而所謂现实的生活則是否定、幻影、渺小、空虛”<sup>783</sup>。

确立在这一观点上以后，別林斯基为了理想开始对于“所謂现实生活”更加仇恨了。在我們称之为他的哲学发展的第一个时期，即他的思想戏剧的第一幕的时期，他对于法国革命是完全而且不加掩飾地同情的。但是試問：他以忽視现实的代价而获得的精神上的宁静能够稳固嗎？很明白，是不可能的。

他宣布了現實的生活是“幻影”。但是，想必“幻影”和“幻影”彼此是不相像的。甚至與別林斯基同時的法國現實和俄國現實之間也大不相同，至於說到過去，那末要知道，他現在所強烈同情的革命，在當時也是法國“現實生活”中的事實。而別林斯基只要問一問自己：“為什麼俄國的历史中沒有這樣的事實呢？”——於是他就碰到一個更為一般和更為深刻的問題：為什麼一個國家的或者一個時代的“現實生活”和另一個國家的或者另一個時代的現實生活不相像呢？而這一問題完全沒有為“費希特式的”對“現實生活”的忽視所解決。能回答這一問題的只有那理解了“現實生活”的發展規律的人，也就是能解決我們已經知道十九世紀的社會科學所熱心地力求解決的那一任務的人。

別林斯基在他發展的下一時期所寫的一封信中說：“我仇恨作為抽象觀念的思想。但是如果思想不是抽象的，難道能夠得到它嗎？……我懂得這種假設的全部荒謬性，但是我的本性是仇視思維的”<sup>784</sup>。不消說，當他說自己的性格是仇視思維時，他是在誹謗自己。這是由他的許多書信和他在上面闡述了文學理論的那些光輝的篇章所證明的。但是無疑的是，別林斯基不容忍任意利用抽象概念；他始終力求用事物的客觀行程來論證自己的思想進程。然而他的精神面貌的這一特點——順便說說，別林斯基有賴於這種精神面貌才能對文學批評作出這麼多的貢獻，——想必很快和很猛烈地掃掉他在為了“理想”而背棄“現實”之後所經歷過的那種喜悅。後來他把他的費希特時期稱為分解的時期。他用這個詞來表明他在脫離了“現實”的“理想”的曖昧領域里所體驗的那種不滿意的狀態。而這種不滿意使他同費希特的哲學決裂了。

由於缺乏材料，我們對這一決裂的經過至今還有點不大清楚。然而我們不能懷疑，早在1837年的下半年，別林斯基就已經處於

509 黑格尔的影响之下，并且和他从前如此强烈“仇恨”的那一“现实”讲和了。在这一年的8月7日的一封信里，他劝告自己的一个朋友研究哲学时，补充说：“只有在哲学里面你将找到对你的灵魂的一些问题的回答，只有它将给你的灵魂以平静和谐并赠给你这样的幸福：这种幸福是群众所没有想到而且也是外部生活既不能给你，也不能从你那里夺走的”<sup>785</sup>。但是要知道，费希特的体系也是哲学的体系。为什么它没有给别林斯基的灵魂以“平静和谐”呢？而为什么他在黑格尔的哲学中找到了这些呢？别林斯基在他这封信的另外几行里“特别强烈地”警告自己的朋友不要迷恋政治，因为它在俄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几句话给我们解释了这一点。他说：“给俄国指定了与法国完全不同的命运，在法国，政治方向，科学，艺术，居民的性格有自己的意义，有自己的规律性和自己的优点”<sup>786</sup>。这一片断在我们的面前部分地开辟了别林斯基从为了“理想”而轻视“现实”走向同这一“现实”“调和”的道路。问题在于如我们已经知道的，“理想”激起了别林斯基更热烈地醉心于法国现实历史的某些篇章，而这一醉心大概迫使他在一方面是法国史和另一方面是俄国史之间作了一个对照。这一对照向有思想的俄国人提示了一个异常不愉快的结论，要想摆脱它，只有用完全否定仿佛在俄国丝毫没有意义的政治。而因为这类否定受到第二种样子的黑格尔——就是写成《Philosophie des Rechts》<sup>①</sup>序言的黑格尔——异常强烈的支持，所以别林斯基就用自己的热情的全部力量抓住了黑格尔<sup>②</sup>。

① 《法哲学》

② 不久以前在我们的文学界发表过这种看法，说别林斯基与“现实”的“调和”，是因为“他个人历史的特点”。但是别林斯基的“个人历史”的主要特点就在于他有这样的一些理论的要求，那时只有黑格尔的哲学最能满足这些要求。他一生的其他一切特点只有加强这些深刻的要求<sup>787</sup>。



我們已看見，別林斯基在他的“費希特主義”的時代是感到痛苦的，因為意識到他的抽象理想在生活中找不到任何的應用。在醉心於黑格爾的時候，他放棄了除無結果的“仇恨”“現實”以外不能獲得任何東西的“理想”。他現在感嘆地說：“不要去管與你無關的事情，但是要忠於你的事業，而你的事業就是熱愛真理……政治，去它的吧！科學萬歲！”<sup>788</sup>

“狂暴的維薩里昂”為了科學而拋棄了政治，然而科學應當回答他的哪些問題呢？這從他寫給斯坦凱維奇的信的以下幾行里可以看出：

“我從高加索來到莫斯科，巴枯寧也來了……夏天，他翻閱了黑格爾的宗教哲學和法哲學。一個新的世界在我們面前展開了。力量就是權利，權利也就是力量，——不，我無法向你描述我聽到這些話時，心情是怎樣的——這是一個解放。我懂得了王國垮台的觀念，征服者的合法性。我懂得了，沒有野蠻的物質力量，沒有刺刀和寶劍的統治，沒有專橫，沒有偶然性，——于是我保護人類的思想也消失了，而我的祖國的意義以新的形態呈現在我的面前……”<sup>789</sup>。 510

科學應當回答別林斯基的那些問題正是他從前訴之於“政治”以求解決的問題。在這些問題里面沒有任何“抽象觀念”；這是社會發展的一些具體問題：怎樣說明“王國的垮台”？征服是合法的嗎？刺刀和寶劍的統治是以什麼為基礎的？最後——這是最重要和最深刻的問題，——難道人類的歷史是單純的偶然性的王國嗎？那時的急進的政治活動和那時的社會主義對這些具體的問題只能給以抽象的回答：他們譴責了某些有名的、為他們所不同情的歷史事件——例如，一個民族征服另一個民族，——但是並未予以說明。那時候社會主義還沒有走出空想主義的階段。相反的，黑格

尔哲学只重视对具体的历史问题的具体回答。它已经凭借历史部分地作出了这样一些回答。而在历史中力量远远不是永远和权利相矛盾的。大家知道，西叶斯对于断定法国贵族的权利是以征服为根据的那些旧制度的辩护者所作的回答是：“只是这样吗？我们自己也将同样成为征服者！”而实际上第三等级也为自己争取到了在社会中的新地位。凡是那些不为贵族的成见所迷惑的人都将同意这一等级的“力量”是巩固了“权利”，而不是否定了它。这样看来，把权利和力量庸俗地对立起来，是经不起批评的，因为这种对立只是在特殊的社会情况之下才能保持其意义，而这种情况又是由历史发展的进程说明的。别林斯基用“力量就是权利，权利就是力量”这句话表达的这一思想在他看来是一个重大的发现。这个思想实际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除此以外，在他看来，它具有巨大的道德价值<sup>790</sup>；它安慰了他，答应使他了解最丑恶不过的俄国现实。所以他也醉心于它，把它作为自己的有名论文《论鲍罗金诺战役》（《祖国纪事》1839年，第12册）的基础。

511 这一论文令人感奋的地方就是它和认为历史的运动是由人们的概念决定的这种抽象的历史观点的斗争。别林斯基说道：“自我们只能从历史上知道的那些时代起，直到我们的时代，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一个民族是由一定人数依据相互自觉的条件表现希望加入这个民族而组成和形成的，或者是根据某个人的意思，哪怕他是一个天才的意思而组成和形成的”<sup>791</sup>。很有趣的是：别林斯基正是拿君主政体的产生作为例证。据他说，自由主义的饒舌者以人们的堕落来说明这一起源，这些人由于深信自己没有自治的能力，把自己的意志隶属于一个人，权力也是由他们授予的。但是这样的说明在他看来是荒谬的。他说：“凡是在自身内部没有原因，而是从它所陌生的某种‘外部’的东西，而不是从自身‘内部’产生的，

——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合理性，因此也没有神圣性。基本的国家法令之所以神圣是因为这些法令不是某一有名民族的，而是每个民族的基本观念，而且还因为它们它们在成为现象，亦即成为事实以后，辩证地发展成为历史的运动，因此它们的变迁是它们自己的观念的契机。而且也因为基本的法令不会是由人說出的法律，而可以說‘事先的’和只是为人所約定和意識到的”<sup>792</sup>。

尽管在应用哲学术語方面有点笨拙，这几行值得我們特別注意。別林斯基寻找了社会现象合理性的标准。他在哪里找到了它呢？在內在的必然性方面：合理的只是“在自身內部有原因”的现象。相反的，所有那些由于它所陌生的某种“外部”的东西而发生的现象，也就是說，不是由于以前的社会发展的內在邏輯所引起的现象，就都是不合理的。“合理的”，因此也是“神圣的”只是这样的社会制度，它們是“在历史运动中辩证地发展的”。对于这一点可以反駁說，某一现象所陌生的“外部”其自身也有充分的原因，因此应当被承认为另一个必然过程的环节之一。显然，別林斯基在这里所暗示的所謂偶然性，只能在两个或几个必然过程的交叉点上发生。例如，西班牙人出现在秘魯，从因加入国家的內在发展的邏輯观点看来，应当被认为是偶然性；但它是由于欧洲人开辟新国度的意图所引起的，而这一意图从欧洲社会內在发展的观点看来，却完全不是偶然的。但是像这样的反駁只是补充別林斯基的思想，而一点也没有損害它。他在表达这一思想时，表明他能达到社会学最重要的和最困难的任务的高处。自从別林斯基发表这一思想的时候起，社会科学绝对没有获得过一个成就不是证实它的正确性的。

512

其次。說根本的社会“法令”是“事先的”，这当然是不对的。只有绝对唯心主义的拥护者才能作这种論断，按照绝对唯心主义的学說，生活的邏輯形式是先于生活本身的。但这是不属于我們

在这里所考察之列的另一问题。至于别林斯基，那末他在这里也是发表在社会学方面完全正确的一个原理。把它译成我们现在的语言，它就是说，社会制度之所以发生不是由于某某人想过要建立的正是这些而不是另一些社会制度<sup>793</sup>，而是由于它们符合于一定的社会要求，这些要求发生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而且决定了推动着“社会的人”去创造一定制度的那一意志的运动。领会了这一真理——这就是永久地抛弃空想主义。

人们通常说，别林斯基在自己“和现实相调和”的时期中是为“普遍性”而牺牲了个性。我们很快将看到，他对本人也准备作这样的责难。但是这一责难是由于误会而发生的。

别林斯基在同一篇文章里说道：“人就自己的个性来说，是局部的和偶然的，而就精神说，却是必然的，他的个人就是这一精神的表现。由此产生了他的情况和意图的两重性；他的在自己的‘我’和处在他的‘我’之外的斗争，构成他的非‘我’……为了作现实的人而不是幻影，他必须是普遍之局部的表现，或者是无限之有限的表现。因此他应当摆脱自己的主观的个性，承认它为虚伪和虚幻，应当顺从世界性、一般性，只承认它为真理和现实。但是这一世界性、或者一般性，不是在他内部，而是在客观世界中，他应当与它亲近，与它融合，以便以后在把客观世界消化为自己所有以后，重新成为主观的个性，但已经是真正的、已经不是表现偶然的局部性，而是一般性，世界性，总之，成为精神的化身”<sup>794</sup>。

别林斯基所“牺牲”的只是其“局部的”和“偶然的”意图同“世界性或一般性”相矛盾的那种个性。但是，照他的意见，如果以为这种矛盾是必然的，那就错了。个性可以成为一般性的局部表现，也就是说，以自己的意图来表现自己时代的伟大任务。别林斯基把这样的个性称为“现实的人”和“精神的化身”。而他永远没有丝毫

的願望“犧牲”這樣的個性。相反地，他最熱烈地同情這樣的個性。

但是，“現實的人”或者“精神的化身”，據別林斯基當時的意見，應當“順從”他周圍的現實，承認它是“世界性或者一般性”的必然表現——這一點是正確的。他在論文《門采爾，歌德的批評者》中寫道：“理性並不創造現實，而只是意識到它，事先把以下的話當作公理，即：凡是存在的，也都是必然的、合乎規律的、合理的。它沒有說，某一民族是好的，而一切其餘不像它的民族是壞的，也沒有說，民族或人類歷史中某個時代是好的，某個時代是壞的，但是在他看來，所有的民族和所有的時代，作為在其中辯證地發展着的絕對精神的表現，都是同樣偉大和重要的。在它看來，帝國和民族的發生和滅亡都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於內在的必然性，羅馬腐化的那一時代本身不是譴責的對象，而是研究的對象”<sup>795</sup>。在這裡立即引人注意的是違反黑格爾辯證法的兩個大錯誤。第一，遠非凡是存在的都是必然，即現實。我們已經知道，按照黑格爾的意見，“現實的”高於簡單的存在。第二，在把“羅馬的腐化”作為自己研究對象時，黑格爾的忠實學生完全不應當“順從”它。相反地，他應當譴責它，正因為它是舊的、衰頹的現實解體的產物。這兩個錯誤對於別林斯基當時的心情和思想方式說來，是非常具有特征的。但是在我們上面已說過黑格爾哲學的兩面性以後，恐怕不需要重復地說：別林斯基犯了這兩個錯誤，不是由於不了解黑格爾，而是由於他太徹底地接受了《Philosophie des Rechts》<sup>①</sup>序言中所表達的黑格爾哲學的那個方面。

別林斯基既對現實“順從”，在某一個時期覺得自己腳下有堅實的基础並且體驗到他好久沒有體驗過的那種精神上的平靜。他說，現實把他導入了現實，而且現在他滿意一切人，而且也為一切

① 《法哲學》

人所滿意。大家知道,他甚至被派到測量学院去服务,而且因为他前面展开的实际活动而感到快乐。但是这种快乐心情并不长久。在1839年10月,也就是說,还在論鮑羅金諾战役的那篇文章出版以前,据別林斯基自己說,他感觉到了沉重的精神痛苦。他說:“对我來說誰也沒有存在,因为我自己是死人”<sup>796</sup>。这一新的“分解”大概是部分地由于他不容易放弃旧的、虽然是“抽象的”、但仍然是热爱自由的理想。帕納也夫和赫尔岑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說,別林斯基在“同现实調和”以后同自己的朋友們进行了多么激动人心的和充滿令人震惊的戏剧性的談話。在这个沉重的情緒中也暴露出来了<sup>797</sup>个人幸福的不够。然而,如果別林斯基当时所接受的那种样子的黑格尔哲学能够在实际上解决使他感到痛苦的一些問題的話,他会比較容易地忍受所有这一切。主要的不幸在于,这种哲学沒有能够解决这些問題。別林斯基在1840年2月初写完的給波特金的信中感叹地說:“可笑而又煩惱的;罗密欧和朱丽叶的爱是一般的,而爱情需要和讀者的爱是局部的和虛幻的。生活在书中,而在生活中什么也沒有……”<sup>798</sup>。为什么“在生活中什么也沒有”?黑格尔什么时候这样說过?从来沒有說过!但是如果把有思想的人的任务归結为認識和直观“现实”,那末他除了“生活在书中”以外就什么也沒有了。黑格尔的“绝对”結論不能滿足別林斯基,而他不能滿意于这些結論使他重新回到他在“順从”现实之后希望要摆脱的那种“分解”。

別林斯基曾希望哲学将給他指出走向人类幸福的道路。而黑格尔哲学(我們重复說一遍,并且請注意是照別林斯基当时所接受的那种样子)断定說,历史运动的“绝对”目的已經达到,因此繼續談論人类幸福是无聊的廢話。別林斯基由于一时气憤,也可能順从这一論断;然而如果他长期地能不加抗議地保留这种論断,那和

他的本性太矛盾了。从他的通信中看出，他正是从这一方面同“耶哥尔·费多罗維奇的哲学帽子”决裂的。他在1840年6月13日給波特金的信中說，他“完全容忍了法国人”。我們知道，他在自己的费希特主义时期曾經称贊过他們，而在他醉心于黑格尔的蜜月时期却憤怒地攻击过他們。他說：“他們的全世界历史的意义，是伟大的。他們不理解絕對的和具体的东西，但是却在他們的范围内生活和行动”<sup>799</sup>。在和法国人讲和的同时，是极端厌恶不久以前还为別林斯基所喜爱的俄国现实。在这同一封信中我們讀到：“我对祖国的，对俄国的热爱更加抑郁了：这已經不是兴高彩烈的热情，而是痛苦的感觉。在我們民族中一切实体的东西是伟大的，漫无边际的，但定义却是可厌的、齷齪的、卑鄙的”<sup>800</sup>。怎能“順从”这种现实呢？于是別林斯基已經不順从它了。在1840年10月4日的信<sup>①</sup>中，他感叹地說：“我咒詛我和可恶的现实調和的卑鄙意图！伟大的席勒这位人类高贵的辯护人、明亮的救星、帮助社会摆脱传說的血腥成見的解放者万岁！理性万岁，让黑暗消失吧！——像伟大的普希金那样感叹地說。現在在我看来，人类的个性高于历史，高于社会，高于人类。这是时代的思想 and 思維！我的天，如果想一想我遭遇了什么——我患了热病还是瘋病，——我簡直像是大病初愈的人”<sup>801</sup>。

#### 四

別林斯基在同现实这一新的和最后的决裂时期所写的信，以它那热烈和同情的声調給了人們这样强烈的印象，以至使讀者們在他的影响之下往往忽視問題的理論方面。例如，一直到現在还

① 給同一个波特金的信。我們預先告訴讀者，我們將引证的所有的信，在沒有說出收信人时，都是別林斯基写給他的这位莫斯科的朋友的。

有许多人都深信，别林斯基在远远抛弃“耶哥尔·费多罗维奇的哲学帽子以后”，完全同黑格尔哲学分手了。但这完全不是这样。

别林斯基在他起来反抗“哲学帽子”以后，在诅咒自己所写的论鲍罗金诺战役和论门采尔的论文时，继续认为他醉心于黑格尔的时期是自己精神生活的开始。他把这一时期称为自己生活中“最好的，至少是最值得注意的时期”。而且他对于论鲍罗金诺战役的论文也不是绝对谴责的。他说：“我在就格林卡所著《鲍罗金诺战役概论》一书所写的论文中所努力发挥的思想，在原理上是正确的”。但是他现在承认，他没有能够好好地利用这一基本上正确的思想：“也应当发挥这一作为历史权利的否定思想，其神圣性并不亚于前者，而没有否定，人类会变成发臭的死水潭”<sup>802</sup>。发展否定的观念，也就是要发现某一现实是怎样由于自己的发展过程导向自己的否定。无论别林斯基如何地有天才，他不能发现这一点，其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他完全没有掌握为此所必需的材料：这样的材料在当时不太发达的俄国生活中是不具备的。就是西方最优秀的先进的思想家——以黑格尔学派的所谓左翼为代表，以及后来，在更晚一些时期，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还只是刚刚选定了必然导致理解现在社会内部发展过程的道路。所以别林斯基起来反对“哲学帽子”以后，便开始“发展否定的观念”，但他不是通过对现实的辩证分析的道路，而是通过诉诸人的个性的抽象概念的道路。因为书报检查官不允许他在论文中说这个，于是他现在当然是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现在该是本来就不幸的人类个性从不合理的现实、无知的人们的意见和野蛮时代传说的丑恶的镣铐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了”<sup>803</sup>。按照自己的习惯，别林斯基完全献身于支配着他的那个新思想。他写道：“人的个性已经成了我害怕会使我发疯的地方。我开始像马拉那样地热爱人类；为了使人类的极小一部分



得到幸福，我仿佛用火和劍來歼灭其余的部分”<sup>804</sup>。在这种热爱人类的影响下（这种热爱当然永远沒有离开他，只是現在采取了新的形式），“狂暴的維薩里昂”很快地走到了社会主义。在1841年9月8日的一封信里我們讀到：“我現在处于一个新的极端之中——这是社会主义思想，它对于我來說成了思想中的思想……信仰和知識的起点和終点……它（在我看来）吞沒了历史、宗教、哲学。我現在是依靠它來說明我的、你的以及我在生活道路上所遇到的一切人的生命”……<sup>805</sup>

可以設想，虽然这一新的思想給別林斯基带来了他想望已久的精神上的平靜，可惜！在同一封信里我們听到以下的忧郁的調子：“沒有目标就沒有活动，沒有兴趣就沒有目标，而沒有活动就沒有生命。兴趣、目标和活动的泉源是社会生活的实体……我們是沒有祖国的人——不，比沒有祖国还要糟；我們是这样的人，即祖国对他們是幻影，因此我們自己也是幻影，难道是奇怪的嗎？”<sup>806</sup>

那末現在这些忧郁的調子是从哪里来的呢？社会主义的抽象思想是不能滿足別林斯基的。无怪乎他不喜歡抽象观念，也无怪乎他学完卓越的黑格尔邏輯学。他不能忘記“社会生活的实体”是兴趣、目标和活动的源泉。他所理解的“社会生活的实体”又是什么呢？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在他說这一“实体”引起人的意图和活动时，他的意思是說：他认为只有依据社会发展客观进程的这样一些意图和只有这样的活动才是重要而有成果的。俄国生活的“实体”是敌視进步的意图和进步的活动的。所以进步的俄国的拥护者竟然成了“幻影”。 517

幻影这个詞我們已經很熟悉了。我們在別林斯基还醉心于費希特的时代就已經听說过了。那时候他用这个詞来表示活动。在他发展的第二时期，即是在“順从”现实的时期，他宣布了和现实发

生矛盾的理想是幻影。他在他的思想发展戏剧的第三幕又起来反对现实，但是为了理想来否定现实的人们，在他看来仍然是幻影。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以前当他处在著名的“哲学帽子”的影响下时，他曾经仇恨过这些幻影，可是现在，当他抛弃“哲学帽子”以后，他衷心地同情它们，而且认他是它们中间的一个。所以，他起来反对现实并没有使他完全同理想“调和”。这是怎么回事呢？

别林斯基承认理想的合理性，但是不会把它同俄国现实的“实体”联系起来。所以他的理想又变成了抽象的，并且因此是无力的。别林斯基在同一封信里说道：“现实唤醒了我们并且使我们睁开了眼睛。但是为了什么呢？……最好是让它把我们的眼睛永远阖起来，以使用渺小的沉睡来熄灭渴望生活的心灵里的不知安息的志向……”<sup>807</sup>。

别林斯基在当时的俄国没有遇到能导致自己发展到否定“丑恶的现实”的任何一个客观因素，他甚至开始对于他当然衷心同情的人民也变得残酷起来了。柯里佐夫由于他父亲的专横而受了不少的痛苦，别林斯基关于柯里佐夫的死在给波特金的信里问道：“而且这位父亲又有什么过错，就因为他是农民吗？……他又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情呢？……我不能为狼、为熊、为疯狗、为俄国的商人和农民们、也不能为俄国的法官和警察分局长们祈祷；但是我对这些人也不能抱着个人的仇恨”<sup>808①</sup>。

---

① 他反对“农民”的这种狂妄行为变成了在我们的文坛上出现下列这个意见的理由，按照这种意见，在四十年代，别林斯基在西方派的小组中几乎是反民主的——或者说，至少对于人民的艰苦情况无动于衷的——思潮的代表人物，然而格兰诺夫斯基和赫尔岑却代表了这个小集团热爱人民的倾向（见维特林斯基先生的论文，《季·尼·格兰诺夫斯基——1844—1845年的西方派和斯拉夫派》）<sup>809</sup>。相反地，我们倾向于认为在自己的一切感情中都是非常极端的别林斯基在深刻同情被压迫的人民这一方面也超过了西方派小组的其他成员。

我們又看到別林斯基处于“分解”的状态中，这种分解几乎是 518  
从他的自觉生活的开始时就不停地使他受痛苦。他在努力医治这个病症，他以将来的“俄国个性”能广泛发展起来的这一希望来安慰自己。他在1847年3月写给波特金的信里说：“俄国的个性现在还是一个胚胎，但是这个胚胎的天性的广阔和有利的程度，正如它的任何局限性和狭隘性一样地使人喘不过气和可怕……不要以为我在这问题上是一个热心者。不，我是经过怀疑和否定的艰苦道路才（为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的”<sup>810</sup>。这项解决对他来说也是整个俄国民族的将来的某种保证。他在论文《1846年俄国文学一瞥》里说：“我们也不主张这些是确定不移的；所谓俄国民族有使命在他的民族性中表现最丰富而多样的内容，所谓在这一点上，就包括着为什么他能把一切和他不同的东西接受过来并且吸收进去的能力的原因；然而我们敢于这样想：这种思想作为毫不自夸和毫不幻想地说出的推测，并不是没有根据的……”<sup>811</sup>

## 五

斯拉夫派和民粹派遵循着走了很远的，就是这同一条愉快的猜测和预言的道路。卡维林说，有一次他不得不参加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别林斯基表示了斯拉夫派的那种思想：认为俄国将比西方更好地解决劳动与资本的历史性争端。别林斯基在抛弃黑格尔的“哲学帽子”以后所倾向的空想社会主义给了他的这种幻想以丰富的养料。但是别林斯基的辩证的头脑的性质本身保证使他不至于长久地完全迷恋于这些幻想。在我们以上所引证过的论文《1846年俄国文学一瞥》中，他在为彼得的改革辩护以抵制斯拉夫派人的攻击时说：“这一类事件在民族生活中，是太伟大了，不可能是偶然的，而且民族生活不是一艘脆弱的小艇，每一个人用桨轻

輕一动就可以随意变换方向的。与其去思索对历史的命运作不可能的、给人以笑柄的、妄自尊大的干涉，还是承认这个不可抗拒和不可改变的既存的现实，以理智和常识为指导，在它的基础上行动，而不是以瑪尼罗夫式的幻想为指导来得好些<sup>812</sup>。他在另一个地方，并没有忽视彼得改革的一些消极方面，却预先声明说：“可是不能只停留在承认任何事实的正确性上面，而应当在从丑恶本身中找寻出摆脱丑恶的手段的希望中，研究事实的原因”<sup>813</sup>。他断定说，应当在彼得改革的本身中去寻找同改革的不良后果进行斗争的手段，也就是说要在改革带进俄国生活中的那些新因素中寻找斗争的手段。这是对问题的完全正确的看法，别林斯基在发表这种看法时，又一次上升到那个理论的高度，即他在关于鲍罗金诺战役所写的论文中给自己提出任务——要用造成现实的历史运动的进程来说明现实——一时所达到的那个高度。而当他站立在这一高度上的时候，他很清楚地看见“抽象理想”的站不住脚和抽象思维方法的缺点。他说：“判断的无条件的或者绝对的方法，是最容易的，但因而也是不可靠的；现在它被称为空洞或者抽象的了”<sup>814</sup>。他那时与之进行如此残酷的斗争的斯拉夫派的错误，在他看来，首先是方法论上的错误：“他们随心所欲地超越时间，把发展的过程当作发展的结果，他们要在开花之前看到果实，一发现树叶没有味道，就宣告果实是腐烂的，他们提议把繁殖在无边无际的天地中的大森林移植到另一个地方去，对它用另一种护理。照他们的意见，这是不容易的，但是办得到的！”<sup>815</sup>这一可惊地中肯的批判意见使我们能够理解别林斯基会怎样对待完全重复了斯拉夫派错误的方法论的民粹派。

他在晚年完全消极地对待空想社会主义者，这一点无论如何是毫无疑问的。关于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当时说过：他们是从天才的

卢梭的幻想中蜕化出来的。有一个时期别林斯基对于路易·勃朗給予很高的評价，現在又把他和舍維辽夫相比<sup>①</sup>816。应当說，依照別林斯基的意見，路易·勃朗对伏尔泰的看法本身是正确的，但是它終于因为沒有历史的前景而被歪曲了。別林斯基的思想現在以特別的毅力集中于制定那能帮助他巩固地論证自己对将来的希望的历史的前景。从他在1848年2月15日写給安年柯夫的信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点。这一封信对于他的思想发展史的重要性达到这种程度，以致使我們认为有必要从这封信里引证很长一段：

別林斯基說：“在卢梭的著作中我只讀了他的《懺悔录》，根据 520 这本书来判断，而且由于驴子們崇拜宗教的关系，引起了我对这位先生强烈的厌恶……但是伏尔泰的人格是多么高貴啊！他对于人类、理性的东西，对于普通人民的灾难是多么热烈地同情！他为人类做了多少事啊！不錯，他有时也把人民称为 vile populace<sup>②</sup>，但这是因为人民无知、迷信、狂信、殘忍、喜爱笞刑和死刑。附帶地說，我的有信仰的朋友和我們的斯拉夫派大大地帮助了我抛弃对人民的神秘的信仰。人民在什么地方和在什么时候解放了自己呢？任何时候和一切事情都是通过个人来做的。在我和您为了資產階級問題进行爭論时，我把您称为保守派，我是双料的蠢貨，而您是聰明的人。法国的整个未来掌握在資產階級手中，一切进步都取决于它一个階級，人民在这里有时只能起消极的輔助作用。当我在我那有信仰的朋友面前說，俄国現在需要一个新的彼得大帝时，他把

---

① 由于他对伏尔泰的不公正的否定态度，別林斯基在1848年2月15日給安年柯夫的信中关于同一个态度說得极为堅決：“我現在在讀伏尔泰的小說，而且每分钟都在对普路易·勃朗这蠢才、驴和畜生的嘴脸吐唾沫”817。

② 〔无知的人們〕

我的思想当作邪說一样攻击，說人民应当为自己作出一切。这是何等天真愉快的思想啊！……在这以后，为什么不假設栖息在俄国密林中的狼群会联合起来組織一个設備完善的国家，先用君主专制治理自己，以后改为立宪国家，最后改为共和国呢？庇护九世用了两年時間证明了，一个伟大人物对于自己的国土意味着什么。我那有信仰的朋友还向我证明說，让上帝保佑俄国摆脱資产階級罢。現在可以清楚地看出，俄国国内发展过程不会在俄国貴族变成資产階級以前开始的。波兰最好不过证明了，剝夺了資产階級权利的国家是如何堅固”<sup>818</sup>。

看来，別林斯基似乎繼續站在人类个性的抽象观点上。別林斯基的“任何时候和一切事情都是通过个人来做的”这句话，以及他的确信俄国需要一个新的彼得大帝显然证实了这一点。但是，实在說，为什么需要他呢？只是因为要給俄国的經济发展以新的推动力。而別林斯基的新理論的最主要特点也就在这里。他現在认为俄国的将来发展取决于它的經济发展：为了俄国的国民发展，必須使貴族变为資产階級。我們現在看到，为了使俄国向資本主义方向发展，只要有历史上的彼得所做的那种改革的經济后果就足够了。但是在我們的眼中这并不减少別林斯基的洞察力；然而我們必須承认，他完全正确地断定：应当在哪里寻找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俄国将来命运的謎底<sup>①</sup>。

說人民，其实是說无产階級，永远注定成为資产階級的消极工具，是不正确的<sup>820</sup>。別林斯基这种看法对于西欧來說是不正确的；对于俄国來說也是不正确的<sup>821</sup>。資本主义在我国发展的必然性不

① 赫尔岑在他 1844 年 5 月 17 日的《日記》里写道：別林斯基絕望地看着斯拉夫人的世界，不了解它<sup>819</sup>。現在我們必須說，別林斯基对于俄国以及一般斯拉夫人进一步发展所必須的社会条件的确定要比赫尔岑的确定正确得多。

仅沒有使工人階級<sup>822</sup>处于消极地位，而且初次給它地位——异常广泛的地位——使它發揮历史自动性。然而就是在这里，別林斯基的錯誤也并不像乍一看来那样的严重。我們也应当把它放在历史的前景中加以研究。要知道別林斯基現在用来和斯拉夫派相比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也在自己的体系中給“人民”以完全消极的作用；他們也把希望仅仅寄托于上层階級。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正确地确定了“人民”在現代社会的进步发展中所参与的那种作用。別林斯基沒有活到科学社会主义最后形成为完整的体系的时候。但是他的天才的思想，已經很快在他进入文学舞台以后，在他的前面提出了这样一些理論的任务，如果对这些任务正确地加以解决，那就会直达科学社会主义。正因为如此，他不能长久地和“抽象的理想”和平相处。他說过：“所有我們的領袖都是摩西，而不是約书亚”<sup>823</sup>。而我們可以将他本人称为力图把自己和自己的同志从“抽象理想”的不毛的沙漠中帶領出来的摩西。

## 六

在我們轉而談到別林斯基的文学观点时，我們首先注意到，德国哲学对这些观点，正如对他的社会观点那样，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我国的那些发现別林斯基醉心于黑格尔对他的美学概念的发展起了有害影响的文学史家，是非常之錯誤的。实际上所有这些概念的一些优点正是完全植根于德国哲学，特别是植根于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 522

德国哲学对我国文学批評发展的影响还在別林斯基出現以前已經开始表現出来了。例如，他在批評領域中的直接的先驅者納杰日丁，正确地被认为是把謝林的美学思想引到我国文学中来的传导者。就是在納杰日丁以前我国就有一些作家，他們意識到对

于俄国文学的状况和任务制定正确看法的一些指示，正应当在德国哲学中去寻找。1827年3月去世的維涅維齊諾夫在自己的札記《杂志計劃中的几点思想》說过：“于是，哲学以及它对于一切时代的科学和艺术的应用——这就是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对象，这些对象对于俄国來說是更为必要，因为哲学还需要有美学的坚定的基础，并将在文学中和一种哲学中找出这一基础，找出自己独立发展的这一保证，从而找出自己的精神上的自由，这种哲学将迫使它發揮自己的力量并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sup>824</sup>。同一个札記向我們說明，为什么当时有思想的人为德国哲学所吸引。在維涅維齊諾夫的前面摆着两个問題：“它（俄国。——格·普·）被哪些力量推到启蒙的目的去，在这共同的舞台上俄国和其他民族比較，它的发展达到何等程度呢？”<sup>825</sup>俄国文学并没有回答这些問題，而且据維涅維齊諾夫的意見，“我們的文学家們无忧无虑的一群”甚至沒有想到这些問題的重要性。当然，德国哲学也沒有研究过这些問題，如果它們是特別涉及俄国的話。但是它提供了一个会使它們得到解决的方法。哲学坚持发展的观点，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看成它的“精神”的表現，而“精神”又是絕對体发展的一个阶段。所以定出对一定民族的文学的正确看法，意思是理解这一民族的“精神”，就是說它的历史作用。由此可見，接受了德国哲学的人們的文学观点，必然是和他們的哲学-历史观点，从而也是政治評論的观点密切地联系着的。我們看到具有天才的社会学家的敏感的別林斯基，同时也是我們的批評家当中一个最有深刻思想的人，这是毫不奇怪的。

德国哲学的影响在他的第一篇論文《文学的幻想》中已經可以看出，这是在他醉心于黑格尔以前好久就已写成的。他在这篇文章里說：“每一个民族，由于神意的不可变易的法則，应该通过自己



的生活把整个人类生活的某一面表现出来；否则，这民族就不是真正活着，而只是苟延残喘，他的存在对人类毫无用处”<sup>826</sup>。根据这一点，连每一民族的文学——只要它真正值得称为文学的话——照别林斯基看来，是“这样一些文学作品的集合，这些艺术作品是人们自由灵感和协力（虽然不是约定的）努力的结果，这些人是生而为艺术的，离开艺术就无法存在的，他们在自己的优美的创作中充分地表现并复制着他们在其中生活、受教育、同生活、共呼吸的那个民族的精神，在自己的创作中表现出那个民族的内部生活至于最隐蔽的深处和脉搏”<sup>827</sup>。俄国文学还不是俄国民族的内在生活的表现。在它里面有了一定数量的人才和一定数量的艺术作品。但是例外，不论它们是多么美好，只是证实一般的规则。我们的文学是西方文学的模仿。所以别林斯基说，而且“欣喜而满足地反复着说”我们没有文学。他认为坚持要证明这点是他道义上的责任。他感叹地说，“高贵的贫穷比幻想中的富有好些！这一天总会来到，文明将以波涛汹涌之势泛滥俄国，民族的智能面貌将鲜明地凸现出来，到了那时候，我们的艺术家和作家们将在自己的作品上镌刻俄国精神的烙印。可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学习！学习！学习！”<sup>828</sup>

我国什么时候会有文学呢？它将在我们组织成社会的时候产生，在它里面将显现出“强大的俄国民族”的面貌。这不仅是文学的纲领，而且还是我们所愿望的社会发展的纲领。所以，别林斯基把我国文学问题的解决同彼得大帝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的进程问题有意识地联系起来，是可以理解的。这样一来，别林斯基在他第一篇论文中就已经力图给自己的文学判断找出哲学-历史的根据，或者像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学的根据。

假使文学是人民生活的表现，那末批评对它可以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真实性。由此可以看出，德国哲学对我国批评发展的

影响多么良好。德国哲学給我国的批評作了准备工作，使它能够正确地评价果戈里出現以来在我国的文学中光輝灿烂地繁荣的现实主义。大家知道，別林斯基是怎样欣喜地欢迎果戈里的。他在发表于1835年的《望遠鏡》上的卓越論文《論俄国的中篇小說和果戈里的中篇小說》中，这样說明这些中篇小說的优点：“（果戈里中篇小說中的）十足的生活的真实，是和构思的朴素密切地联系着的。他对生活既不阿諛，也不誹謗；他願意把里面所包含的一切美的、人性的东西展露出来，但同时絲毫也不隱蔽它的丑恶。不論在哪个場合，他都极度忠实于生活。在他看来，生活是一幅真正的肖像画，以惊人的逼真抓住一切，从人物的表情直到他臉上的雀斑”<sup>829</sup>。但是生活在自己的表現中是异常多样化的，我們不能要求所有的艺术家对它采取完全一样的态度：一个人从一方面来看待它，另一个人从另一方面来看待它。別林斯基說：“如果汉·伊斯兰在大自然中有他一席之地，那末我真的不懂他为什么就不如卡尔·莫尔，或者甚至不如波薩侯爵？我爱卡尔·莫尔这个人，我崇拜波薩这个英雄，我憎恨汉·伊斯兰这个殘酷无人性的怪物；可是作为想像的創造物，作为一般生活的个别現象，在我看来，他們都是同样美好的”<sup>830</sup>。在我們还是从《文学的幻想》中引证的这几行中，如果指出別林斯基对席勒的态度是很有益的；他“热爱”他的卡尔·莫尔和崇拜波薩侯爵。那时他是否认为《强盜》和《唐·卡尔洛斯》是生活的真实写照呢？并不完全认为如此。但是他把它們也像“席勒的几乎所有一切戏剧”一样，都列入这样的一些作品中：“这些作品以现实的生活为对象，可是或者由于某种心爱的悬摯的思想，或者由于片面的、纵然是强大的天才，最后，或者由于过分热情，使作者不能更深刻而彻底地渗入生活，充分地了解它的真实面目的緣故，生活好像是被改造了或者改变了似的”<sup>831</sup>。別林斯基在以下的几

行里指出，虽然卡尔·莫尔說了許多話，可是在他的話里面一点玩弄詞藻的影子也沒有：“問題在于：在这儿說話的，不是人物，而是作者；在这整部作品里，沒有生活的真實，但却有感情的真實；沒有現實，沒有戲劇，但却有无穷的詩；狀態是虛偽的，情勢是不自然的，但感情是真實的，思想是深刻的”<sup>832</sup>。這一段話很重要。別林斯基在這一段話里所發表的對席勒戲劇的美學優點的看法，一直到我們這位批評家逝世為止都沒有改變。即使他根本地改變了對席勒本人的態度，那這只能用別林斯基在政論觀點的改變來說明，而不能用他的美學觀點的改變來說明。我們馬上會看出，這一改變怎樣影響了他的批評活動，而現在我們提醒讀者，在我們現在所引證的論文中，我們還會遇到別林斯基不僅不和周圍現實調和，而且輕視它，並且這種否定的情緒接近於自己生活的那一時期：即醉心於費希特哲學，宣稱理想是現實，而現實是幻影的時期。在這方面異常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論文《瑣事瑣談或向〈望遠鏡〉出版者所作的最近半年（1835年）俄國文學報告》的結尾部分。我們在那里讀到：“文學是民族的自覺，凡是沒有這種自覺的地方，文學如果不是早熟的果實，就是博取生活資料的手段，某一階級的人的手藝。如果在這樣的文學中也有一些優美的、典雅的作品，那末，它們是例外的現象，却不是正面的現象，而例外是沒有法則可以講的……”<sup>833</sup>

525

從一個認為理想具有巨大意義的人的觀點看來，在發展中還不能促使人民自覺的這樣的一種現實，是不值得人們尊敬的。而這樣的人——在某種思想習慣之下——宣稱這樣的現實是幻影，是很自然的。但是宣稱不愉快的現實為幻影還不是和它斷絕關係。引導人民達到自覺的道路在哪裡呢？我們已經知道，在這個時代，別林斯基認為這樣的道路就是教育。我們也知道，在論文《文學的

幻想》中，他表示相信俄国政府很认真地关心教育的利益。但是他自然不能认为理想的服务者有权利因为自己相信政府的教育意愿而放心。不，这些人从自己一方面也应当为教育而工作。特别是文学批评家在这方面将能作出很多工作。按照别林斯基当时的意见，在我国批评应当给自己提出主要是教育的任务。他在《论〈莫斯科观察家〉的批评及其文学意见》一文（1836年）里说：“在我们这里崇高的、先验的批评会带来好处；它是必要的；可是它在我们这里应当多言善辩、絮絮叨叨不厌重复、条分缕析的。应当成为它的目的与其说是科学的成就，不如说是教育的成就。我们的批评应当是社会的教师，用最简单的语言讲述崇高的真理。它在原理方面应该是德国式的，在叙述方法方面应该是法国式的。德国的理论和法国的叙述方法——这便是使它变得深刻而易于为大众理解的唯一方法”<sup>834</sup>。

526 正和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者一样，别林斯基那时候抱着这样的信念：“意见支配着世界”。醉心于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对于主观主义的历史观的鲜明的文学表现，是特别有利的。但是外在的情况是这样形成的：别林斯基正是在这种醉心于费希特的时代被迫中断自己的文学活动的。1836年10月，在这年和《杂谈》一起出版的《望远镜》，由于刊登了恰达也夫有名的《哲学书简》第一信而被查禁，这给了别林斯基最好的机会去检验自己对于政府的教育意愿的希望是否有根据。那时候他大概以特殊的力量感觉到了自己和像他一样为理想而服务的人都是“零”。他的艰苦情况又由于《望远镜》被查封而剥夺了他的生活的任何资料而加甚。但是他在那时所经历的贫困并没有停止他思想的坚毅工作。如上面说过的，他在1837年开始醉心于黑格尔，而在1838年春季他重新作为文学批评家出现于《莫斯科观察家》杂志（这个杂志在极为短暂的

期間落到他的朋友的手中)時,他已經作為輕蔑地背棄抽象的理想并同現實妥協的人來說話了。

在為《馮維辛全集》第二版和《扎戈斯金全集》第五版出版而寫的批判論文中,別林斯基繼勒特歇爾之後確定對藝術作品進行哲學批評的任務。他說:“藝術作品是具體思想在具體形式中的有機表現。具體的觀念是完全的,包括自己的一切方面的,同自己完全相等的和完全表達自己的真正和絕對的觀念,——而只有具體的觀念才能體現在具體的藝術形式中。藝術作品中的思想應當具體地同形式融合一起,也就是說,和它構成一物,在它裡面消失和消滅,浸入它的全部”<sup>835</sup>。與此相適應,對藝術作品的哲學批評應當首先確定體現在它裡面的觀念。然後它應當使自己確信鼓舞着藝術家的觀念浸透到所分析的作品的各個部分。在真正的藝術作品中沒有多余的東西;它的一切部分構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甚至其中那些看起來和它的基本思想不相干的部分也是為觀念的更完全的表現而服務的。別林斯基舉出《奧賽羅》作為例子,在它裡面“只有主角表現嫉妒的思想,而其餘的人都是被別的利益和感情所占据;但是,儘管這樣,悲劇的基本思想是嫉妒的思想,悲劇的所有人物,雖然每人都有自己的特殊意義,却是為了表達基本思想而服務的”<sup>836</sup>。

527

要完全理解藝術作品只有通過哲學批評的工具才有可能,哲學批評的責任就在於在局部的和有限的東西里找出一般的和無限的東西的表現。但是歷史的批評也應當善于確定某一藝術作品的歷史意義。有不少這樣的作品,它們在藝術的意義上沒有多大價值,但是作為藝術史的材料來說却是很重要的。別林斯基從歷史的觀點考察俄國文學的許多現象。康捷米爾、蘇瑪羅柯夫、赫拉斯科夫、波格丹諾維奇、馮維辛、卡普尼斯特等人作為俄國“社會發展的

一些契机”在别林斯基的眼中都是重要的。

从这一观点看来，连法国的批评也取得了自己的相对优点。别林斯基责备它，说它不承认美学的规律，对作品的艺术优点没有予以注意，只限于在其中寻找“国民的和政治的要素”。别林斯基不满意法国的批评太多地注意作家的个性和他的生活的外部情况。据他说，为了理解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悲剧，我们完全不需要知道在这些作家的时代，在希腊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在艺术作品中，法国的批评什么也没有说明；但是它只在谈到所具有的不是艺术的而是历史的意义的那些作品，例如，伏尔泰的作品时，才有其价值。

## 七

528 别林斯基关于法国的批评所提的这些意见有不少是正确的东西，但是错误的东西还要更多些。他针对法国的批评所提出的责难也适用于比如圣博甫。圣博甫在自己的文学评述中实际上是过分醉心于作家生活的局部细节，对于他们在其中生活和行动的社会环境没有予以应有的注意。但是，别林斯基说为了理解希腊悲剧不需要知道希腊的历史，而只需要弄清希腊民族在人类的绝对生活中的作用就足够了；——这是完全不正确的。他的这一错误表现出了德国唯心主义的缺点，这个唯心主义用“观念”发展的规律来说明人类历史的运动，并且把历史看成是应用逻辑学。不过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绝对唯心主义并不始终忽视人类社会内在发展的具体原因的。别林斯基在自己一生的这一时期比黑格尔更多地滥用了先验的逻辑体系并且忽视了事实。然而这也是可理解的。我们已经知道，那时候他所以醉心于黑格尔并不因为他是辩证论者，而是因为他是绝对真理的预言者。他那时候正是从这种真理的观点

来看文学的。他在他对于波列伏依的《俄国文学綱要》的分析中說：“真正批評的任务是在詩人的創作中寻找一般的东西，而不是局部的、人类的東西，不是人間的東西，要寻找永恒的东西而不是暫时的东西；要寻找必要的东西而不是偶然的東西，并且根据一般的东西，亦即观念来确定詩人的价值、优点、地位和重要性”<sup>837</sup>。但是如果暫时的东西与批評无关，那末这就是說它一般地是可以忽視历史的。在这里別林斯基又比他的老师黑格尔走得远得多。他关于伏尔泰写道：“伏尔泰以自己的魔力，在有限的理智的旗帜下，反抗永恒的理性，对于自己无力以理智达到只能以理性才能达到的东西感到恼怒，而理性同时也是爱情，也是恩賜和启示”<sup>838</sup>。我們不妨把黑格尔关于法国十八世紀解放运动的意見拿来和这个对比一下，大家知道，伏尔泰在这一运动中起了极卓越的作用。黑格尔說，“这是太阳的庄严的上升。一切有思想的生物都快乐地欢呼这一新时代的到来。胜利的心情支配了这个时期；而全世界都滿怀着热情，好像第一次完成了它和神的調和”<sup>839</sup>。这完全不像別林斯基所說的那些話。但这是辯证論者黑格尔所写的，而不是絕對真理的預言者黑格尔所写的。黑格尔——絕對真理的預言者完全不想“快乐地欢呼”革命事变的临近。要知道我們的批評家在他“与現實相調和”的时期正是跟着这个黑格尔走的。

我們已經說过，別林斯基在扔掉黑格尔的“哲学帽子”以后，繼續站在黑格尔哲学观点之上，这同关于他生活中这件事的几乎公认的意見完全相反。差別只在于，从前他醉心于黑格尔的“絕對真理”，而現在开始应用黑格尔的辯证方法。这在他的文学观点的发展上是特別明显的，因为他的文学观点主要是在这方面改变了，即在其中浸透了辯证法的成分。

这里是一个例子。在和現實調和以后，別林斯基断言，批評应 529

当找出在艺术作品中所包含的“一般的”和“必然的”东西。在論文《1847年俄国文学一瞥》中，也就是說，已經在自己的活动<sup>840</sup>快完結的时候，別林斯基写道：“詩人所應該表現的不是特殊的和偶然的東西，而是一般的和必然的東西”<sup>841</sup>。不能不看到，这在实质上是同一个观点。但是在这一观点里浸透着辯证法的成分并且在它里面产生了异常重要的变化。現在別林斯基已經不是拿“一般的”同“暫时的”对立起来，而且也不把“暫时的”同“偶然的”等同起来。現在在他看来，“一般”是在時間中发展的，賦予暫时的現象以它們历史的意义和它們本质的內容。“暫时的”所以“必然”，正是由于“一般”的发展是必然的。“偶然的”只是那种对于这一发展的进程沒有任何意义的東西。現在別林斯基的看法就是这样。而在我們仔細閱讀他在反抗“哲学帽子”以后的时期所写的著作时不难看見，正是为我們所指出的他的基本的哲学观点的改变，也就是說，他的思想中浸透着辯证法的成分，决定着他的文学观点中所完成的最重要的改变。

別林斯基抛弃了“絕对的观点”以后，对于艺术的历史发展，就有了比以前不同的看法。在1843年所写的論捷尔沙文的卓越的論文中，他說：“沒有始終是观念的观念；但是每一个观念往往是作为事实，——作为事物或行动而實現的。观念的實現为事实有其确定不移的規律，其中最主要的是——彻底性和漸进性。任何东西都不是突然出現的，任何东西都不是現成地誕生的，而是凡有观念作为自己的出发点的一切东西都按照着时机发展，辯证地运动着的，是从低級阶段过渡到高級阶段的。这一确定不移的規律，我們在自然界，在人的身上和在人类中都可以看到。自然界不是作为一个現成的东西突然出現的，而是有它自己的时日或者創造的时刻……同一个規律对于艺术也是存在的”<sup>842</sup>。因为艺术的內容



是以前辯證的發展決定着人類的整個歷史運動的那同一個永恆的觀念，所以藝術的發展和社會生活的全部發展密切地聯系着，這是可以理解的。偉大的詩人之所以偉大，就是因為他是自己的時代和自己的社會的工具和表達者。別林斯基說：“為了猜破像拜倫那樣無限偉大詩人的憂郁的詩篇之謎，首先應當猜透他所表現的時代的秘密，而為了這點就應當用哲學的火炬來照明人類為了實現自己的偉大使命——體現永恆的理性——在各種事變中所走過的历史的曲徑，並且應當用哲學的方法來確定這位詩人在人類的歷史運動中遇到人類的那個地方的經度和緯度。如果不這樣作，那末對於事變的所有引證，關於社會風尚和社會對詩人的態度以及詩人對社會和對自己的態度所作的種種分析將什麼也不能說明”<sup>843</sup>。

530

除此以外，別林斯基現在已經準備也要考慮地理環境（不是指這個詞的轉義，而是本義<sup>844</sup>）的影響，雖然問題的這方面在他的著作中是很少詳細研究過的。

我們知道，別林斯基在他醉心於抽象理想時，曾經“熱愛”席勒著作中的主人公。別林斯基在“順從”現實以後寫道：席勒的初期著作，也就是別林斯基先前曾經這樣“熱愛”它們的主人公的那些著作，在對待絕對真理和最高的道德方面是絕對不道德的。席勒在這些著作裏面“想實現永恆真理，結果卻實現了他後來宣布放棄的那些自己個人的和有限的信念。因為他在這些信念裏面為自己規定了任務和確定了藝術以外的目標，所以從這些信念裏也就出現了詩的早產兒和畸形的東西，在藝術領域中完全微不足道的現象”<sup>845</sup>。別林斯基在起來反對黑格爾以後，把席勒稱為人類的高貴的辯護人，是一顆明亮的救星等等。在他對待作家的態度方面好像不能比這變化得更为劇烈了。但這只是表面上如此。

为什么别林斯基现在又过分地称赞席勒呢？因为他现在醉心于“个性”的观念，在他看来“个性”“高于历史，高于社会，高于人类”。他现在不禁止有思想的个人反抗现实；相反地，他赞美有思想的个人对“杀人的传说成见”的抗议。同时连他对于那些诗意地表达了同社会成见斗争的个人意图的作家们的判断也在改变。这就是他对席勒的态度改变的全部秘密。别林斯基现在不再把戏曲称为是不道德的，他甚至很称赞它们，但是他是从特殊的观点加以称赞的。他把席勒的戏曲称为伟大的永世长存的创作，然而接着补充说，不能把它们和新世界的真正戏剧混淆起来。这就是说，作为戏剧它们是坏的，但是作为抒情作品它们却是好的。所以别林斯基也说：“要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抒情诗人，才能在席勒的戏曲中穿着舞台的厚底鞋<sup>①</sup>自由地走路；普通的有才能的人穿起它的厚底鞋以后，一定会要直挺挺地跌到泥坑里。正是因为这样，所有的模仿席勒的人都是这样的腻烦、庸俗和令人讨厌的”<sup>846</sup>。

换句话说，对席勒的戏剧本身别林斯基始终是以同样的目光来看的。只有他对于这些戏剧所独有的主观成分的态度有了改变。别林斯基在他和现实“调和”的时期把主体的作用归结为对这一现实的客观理性的直观；凡是超出这一主观作用的一切，被他当作不成熟的主观“意见”的缺陷而加以谴责。而在他反抗现实的时代，他不能不同情那些和他一样的同墨守成规现象进行斗争的人们。在他的生活的第三时期，他曾同情他在生活的第二时期所尖锐地谴责过而且在生活的第一时期常常鼓舞他的东西。但是这些变化对于他的一些文学判断的影响是很小的，即使有过影响，那也只是在这些判断的深度方面。我们所说的这点特别指的是他的发

① 古希腊、罗马演剧时，演员都穿厚底鞋。——译者

展的第二时期。例如，他关于《鲍罗金諾战役概論》所写的文章里有下列一段是极为重要的：“我們认为并且深信，在我們的文学中用‘哎呀’、感叹符号和刪节号来表达沒有任何深刻思想的无謂空喊的时代已經过去；以独裁者的妄自尊大的态度說出除了所謂思想家的个人意見和专断的概念以外沒有一点根据和一点也不能证实的伟大真理的时代也在过去了……問題不在于看来是怎样，而在于实际上是怎样，而这个問題不是由意見而是由思想来解决的。意見所凭借的是偶然人物的偶然的信念，偶然的人物对誰都不相干，而且就它本身說也是很很重要的东西；思想所凭借的是自身，是从自身內部根据邏輯的規律发展出来的东西”<sup>847</sup>。

把实际存在的东西同只是好像存在的东西对立起来，这等于推翻为了抽象概念而提出来的判決，并且力求借助于对客观现实所作的分析来論证自己的判断。不用說，作为文学批評家的別林斯基由于这种意图不会有任何損失，而只会贏得很多东西。

我們的一个文学史家表示了这样的思想：別林斯基在自己同现实“調和”的时期，抛弃了全部的“主观抒情詩”。可是一切抒情詩都是主观的。然而別林斯基从来沒有抛弃歌德的或者柯里佐夫的抒情詩。

## 八

我們尽力用不多几句话来表述我們的批評家的美学規約。

532

这一規約的第一条法規是，詩人应当表明而不是证明，应当用形象来思考而不是用三段論法来思考。这一法規是从下列的关于詩的定义中得出的，按照这条定义，詩是真理的直接直观或者是形象中的思維。

假使詩的对象是真理，那末真实就是艺术創作的第一个条件，

而美就在于真实和淳朴。诗人应当如实地描写生活，不粉饰它也不歪曲它。这是别林斯基的艺术規約的第二条法規。

他的第三条法規的意思是，作为艺术作品的基础的思想应当是具体的思想，抓住整个的对象，而不是它的某一个方面。

由于第四条法規，艺术作品的形式应当符合它的思想，而思想应当符合形式。

最后，思想的統一应当符合形式的統一。这就是說，艺术作品的各部分应当构成一个諧和的整体。假使我們沒有弄錯的話，这是别林斯基美学規約的第五条法規，也是最后的基本法規。

我們很难提出什么实质上的东西来反对这一規約。我們怎么能够不承认艺术作品的形式应当符合它的思想，或者诗人应当是用形象思考而不是用三段論法来思考呢？但是这一規約沒有妨碍别林斯基譴責法国的“古典”悲剧，而这一譴責无疑是錯誤的。别林斯基早在他关于捷尔沙文作品的論文(1843年)中写道：“真正的美学的任务不在于解决艺术应当是什么，而在于解决艺术是什么。換句話說，美学不应当把艺术当作某种預想好的东西来議論，当作是只能按照它的理論来實現的某种理想来議論；不，它应当把艺术当作是在美学出現以前早已存在的对象，而且美学本身的存在应当归功于艺术的存在”<sup>848</sup>。这最正确不过了。但是别林斯基在熟思自己的美学規約时，并沒时刻記住我們刚才所引证的一段話里所叙述的清規戒律。在他的文学判断中有时使人感觉某种先驗性，这先驗性正显示在艺术观上，即把艺术当作只能依照某一理論来實現的某一种理想。为了理解这一缺点的起源，应当記住，  
533 别林斯基在制定自己的規約时，是站在德国唯心主义的美学观点上的，而唯心主义的美学正如一般整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一样，虽然有它一切巨大的优点，但是它的毛病就在于先驗性。假使思

思想家把一般历史，因而也包括艺术史，看作是应用邏輯，那末很自然的，他是常常受到 a priori<sup>①</sup> 建立一些只有作为从事实得出的結論才对的原理的誘惑。別林斯基和黑格尔一样，有时抵抗不住这种誘惑。

此外，应当补充，由于我們不能在这里加以考察的一些原因，德国的美学还在从萊辛的时候起，就对法国的古典主义进行了比較坚决的斗争，而这一斗争就决定了他們对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的看法的某些片面性。这一片面性部分地也感染了別林斯基，他的文学观点是在德国哲学的美学占优势的影响下形成的。

但这是細节。一般說来，必須承认別林斯基由于抛弃了照貝平的說法的旧的浪漫主义的垃圾并且为建立果戈里派的现实主义鋪平道路，所以才能依靠自己的規約給俄国文学作出巨大的貢獻。除此以外，应当补充的是：連別林斯基自己也并非始終如一地解释自己的美学規約的。

举一个例子。艺术作品的思想应当抓住对象的各方面。这意味着什么呢？在“調和的”时代，在別林斯基看来，它的意思就是：詩的作品必須描画詩人周围现实的“理性”。假使詩的作品把我們引导到现实并不完全是合理的这一思想，那末这就表明，在作品里面描画的只是对象的一个方面。对于上述美学法規的这种解释是狹隘而不正确的。嫉妒的思想并没有包括文明社会中男女之間所存在的一切关系。能够从各方面包括人与人之間的这种或那种关系的这样一种具体思想是不可能有的，因为生活是太复杂了，以致于我們无法这样做。別林斯基懂得这点，抛弃了自己的絕對观点，因而他开始贊美比如乔治·桑，而他从前是觉得她的作品片面的<sup>849</sup>。

①（不依賴于經驗，先于經驗）

534 当然，别林斯基社会思想的改变必然最强烈地反映在他关于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理解上。别林斯基在第二个时期断定了艺术本身就是目的。在最后一个时期——在这方面，他的最后一个时期接近于第一个时期，不同于第一个时期的是更加鲜明地强调同一个思想，——他驳斥所谓纯艺术的理论，证明脱离生活的艺术的思想，是抽象而幻想的思想，这种思想只能在没有生动的社会活动的民族那里才能产生。然而他现在也不停地断定，艺术首先是艺术，也就是“现实的复制，是被重复了的，仿佛重新被创造了的世界”<sup>850</sup>。差别只在于，在以前——在第二个时期——他从绝对的观点来看艺术家的职责，而现在他从辩证的观点来看它，因此他明白，复制现实的艺术本身就处在现实的影响之下。他说：“莎士比亚的人格照彻在他的作品中，虽然看起来他好像对他所描写的世界漠不关心，正像拯救或加害他的主人公们的那命运之神一样。在瓦尔特·司各脱的长篇小说中，我们不可能不看到，作者是一个与其说在那自觉地广泛地对生活的了解上，勿宁说在才能上非常杰出的人，一个信念上和习惯上的托利党员、保守派和贵族。诗人的人格不是什么无条件的、孤立的、超脱任何外在影响的东西……民族和时代的精神影响他，不能比对别人影响得少些”<sup>851</sup>。别林斯基从前很喜欢普希金的一首有名的诗《无知的人们》的思想，现在他对它很愤恨。他在论普希金的第五篇文章里说：“谁做一个为自己和写自己的诗人，轻视群氓，谁就有成为自己作品的唯一读者的危险”<sup>852</sup>。现在别林斯基也不喜欢普希金的《诗人》的思想。诗人应该是纯洁的，这不仅在爱波罗<sup>①</sup>要求作出神圣的牺牲时是这样，而且在一生中任何时候也是这样。对于

① 爱波罗 (Аполлон) —— 是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和司音乐、诗歌之神。—— 译者

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論的否定态度是把別林斯基的批評跟六十和七十年代的批評連結起来的最強固的环节之一。我們要对它詳細談談。

別林斯基对于普希金的态度并不总是正确的。他认为普希金所說的《无知的人們》意味着人民群众，可是是这样的嗎？在別林斯基本人的論文和书信中常常遇到对无知的人們和群氓的攻击。难道可以根据这点来責备他輕視人民嗎？普希金在《答匿名作者》中感叹道：

“誰如果想求上流社会的同情，是可笑的，  
冷淡的群氓看看詩人，  
就像外路的人一样……”

“上流社会”不是“人民”，不是“靠自己的双手劳动而生活的” 535  
貧民的总和。

恐怕別林斯基未必能够正确地理解《詩人》一詩的思想。普希金在这首詩里不允許詩人們在爱波罗要求他們作出牺牲以前就成为庸俗的人們。他只是說，甚至染有庸俗性的人也能在灵感的影响之下重生。这一思想表現在《埃及之夜》中；这是正确和深刻的思想。

一般說来，別林斯基对純粹艺术的拥护者們所作的反駁是說服力不強的<sup>853</sup>。他常常把自己的論据也搞乱了。如何解释这位天才的这些缺陷呢？

別林斯基在反对黑格尔以后，便轉到人的个性的观点上了。但是个性的概念，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我們已經知道，別林斯基在抽象性的气氛中是呼吸困难的，并且他直到逝世一直力求完成具体的世界观。这一意图無論对于他的政治观点以及文学观点都有异常良好的影响。但是他并不是始終忠于这个意图的；对于“丑恶

的俄国现实”的不满有时使他得出一些只是以某些抽象的概念为基础的判断。这样的判断从道义方面看，始终是高贵的，但是从理论方面看，常常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别林斯基关于普希金所作的上述判断就属于这一类；普希金是这样的一位诗人；要了解他，必须放弃抽象的观点。

但这终于只是个别的缺陷。整个说来，他关于普希金所写的论文——而且甚至特别是这些卓越的论文——表明了他在自己生活的最后时期，如何成功地解决了他还关于鲍罗金诺战役周年纪念所写的论文里就已经给文学批评提出的那个任务：不是根据表面现象，而是根据实际情况，不是靠意见，而是靠思想。

但是当他开始接近于这一任务的解决时，就发现了它已经没有他最初所看到的那个样子。从前他以为，思想是依靠自己的，依靠根据“逻辑”的规律从自己本身而来的自己内在的发展。在他反抗现实以后他还长久地保持着从黑格尔那里借用来的这一信念。但是在晚年，他完全放弃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开始倾向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sup>①</sup>。而根据唯物主义学说，意识不是从自身发展出来的；它的发展是为存在所制约的。固然，这一真理没有为费尔巴哈应用来说明一般历史，其中也包括思想史。但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这一缺点，在谈到艺术时部分地为黑格尔本人所填补；黑格尔

536 ① 这在他的论文《1846年俄国文学一瞥》中特别可以看出，他在那篇论文里叙述费尔巴哈哲学的某些基本原理。例如，他写道：“您，当然十分珍重一个人的智慧吧？——很好！——这样当您看到这种密集的髓质以后，您就会带着虔敬的惊讶而注意起来，一切心理的机能都从这里发生，那个作为感觉器官的本质并且充满着某种非常之细致的流体（细致到逃过了物质的观察，并且不能进行思辨）的神经网络，就从这里，通过脊梁，散布到整个机体中去。否则，你就会忽略原因，对人的身上的结果表示惊奇，或者，——更坏——去虚构您自己的，自然中所从来没有的原因，以此为满足。不以生理学为根据的心理学，也像不知道有解剖学存在的生理学一样，是靠不住的。现代科学也不能以此为满足；它想用化学分析深入到大自然神秘的实验室去，并且通过对 em-



在自己的《美学》中尽管有其对于先驗体系的唯心主义的傾向，然而还是常常借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来对艺术的发展作純粹唯物主义的說明。并且別林斯基自己会从一旦找到了的前提中作出适当的結論。如在上面已指出过的，他在自己的最后一个时期曾把艺术的发展同“时代的一般性质”发生因果联系，也就是說，同这一个时代所固有的社会运动的性质发生因果联系。当然，他在这里所說的并不十分明确，而这种不明确性說明他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的不明确。但是观点的不明确是因为对它們研究得不透彻而引起的，而在当时要使这些观点成为經過透彻研究，也是不可能的。但是重要的是，別林斯基的思想就是在这里也能确定适当的方向，而且他甚至有时能把自己沒有經過透彻研究的观点非常出色地应用到自己的批評論文中去。

## 九

537

順便說說，他論普希金的論文也表明了这一点，这些文章的缺点我們在上面已經指出了。据別林斯基說，普希金所属的那个艺术学派不仅在欧洲，而且甚至在俄国也已經过时了。历史已經超过了普希金，使他的大部分作品失去了由現時令人不安的問題所引起的活生生的兴趣。別林斯基把普希金看作是貴族等級的詩

---

bryon(胚胎)的观察,去探測精神发展的生理过程”。他繼續写道:“沒有肉体,沒有面貌的头脑,不能对血液起作用、同时自己也不能接受血液的作用的头脑,这是邏輯的幻想,僵死的拍象。头脑——这是有肉体的人,或者,說得更妥当一些,通过肉体而显现的人,也就是說,个人”<sup>854</sup>。不能不在这里认出費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原理,虽然,明显地是新的——唯物主义的——概念体系还没有完全为別林斯基所消化,因此他有时表达得很不精确。在下一年的文学一瞥中——可以說这是在他去世前夕写成的——別林斯基在說到我国文学的任务时,又表示了这样的一种证明費尔巴哈給予他的影响的观点。但是死亡沒有让这一新的影响能完全巩固起来。在我国文学界,費尔巴哈观点的完全和彻底的代表是別林斯基的热烈的崇拜者——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sup>855</sup>。

人。他说：“您到处都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灵魂和肉体都属于构成他所描绘的那个阶级实质的基本原则的人；简单一些说，您到处都可以看到一个俄国地主……他在这一阶级里攻击一切违背人道的东西，但是阶级原则在他看来是永恒的真理。……所以他的讽刺含有那么多的爱，而他的否定却是这样像称赞和欣赏……这就是为什么在《奥涅金》里有很多东西现在已经显得陈旧的缘故。但是如果不是这样，那末从《奥涅金》中也不会产生俄国生活完全而详细的诗篇和这样一种否定在同一个社会中如此迅速发展的思想的事实”<sup>856</sup>。

别林斯基是拿我们的伟大诗人所属的那一等级的社会地位和历史情况来说明普希金的诗的，别林斯基这样做，已经远远超过了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我国先进的批评界，它的主要缺点就在于：它纯粹从政论的观点，而不是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文学现象的。别林斯基在其活动的最后年代所写的一些论文里含有完整的纲领，这一纲领直到现在还没有为我们的文学批评界所实现，只有我们的文学批评界完全站在社会学观点之上的时候，才能实现这一纲领。这一点又证明了他的思想的天才的力量。

我们不妨在这里指出就我们所知至今被我们的文学史家所忽视的又一情况。别林斯基在他生活的最后几年曾坚持不懈地宣扬“只有完全使艺术面向现实，排除任何理想的因素”<sup>857</sup>（《1847年的文学一瞥》）。然而人们清楚地知道，他在那时候是坚决地和“俄国的”现实斗争的（只要指出他写给果戈里的著名的信件就足够了）。这一外表的矛盾用下列事实——而且只能用它——来说明：这就是现在在他所写的批评论文中所持的已经不是黑格尔的而是费尔巴哈的关于现实的概念。这一概念和黑格尔关于同一题目的概念是不同的；在费尔巴哈看来，现实是构成事物的没有被幻想

所歪曲的真正本質的東西。而假使別林斯基歡迎“自然派”的出現，那末這正是因為照他的說法，它不是修辭學的，而是天然的。在別林斯基以後，已經是由車爾尼雪夫斯基來捍衛這一概念了<sup>858</sup>。

我們不再詳細敘述別林斯基的戏曲《五十歲的大伯》。關於這部戏曲可以說一點：它表明，具有“以三段論法來思想”的天才能力的別林斯基在“用形象的思維”上面却是不行的。刊登在1831年5月27日的《小報》上面的我們的作者的青年時代的詩《俄國的往事》，更不值得注意。別林斯基關於他寫詩的嘗試，後來自己曾經很幽默地評論過。

讓我們總結一下。別林斯基是在德國哲學的強烈影響之下開始進行文學批評工作的。在那同一個哲學的影響之下，和現實“調和”的時代，曾經提出要以找出客觀的基礎來進行藝術批評作為目的，並且把這些基礎同絕對觀念的邏輯發展互相聯繫起來。他在某些美學的規律中找到了這些所探索的客觀基礎，這些基礎業經我們在上面以美學規約的名稱加以闡述。在這些規律中有許多正確的東西，而不正確的東西——或者，最好說是片面的——那可以用他仿效他的哲學老師黑格爾所堅持的唯心主義觀點來說明。他在晚年放棄了唯心主義，同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接近，並且認為批評的最終一級不是絕對觀念的發展，而是社會階級和社會關係的發展。只是在如下的場合，就是當他拋棄了辯證哲學的觀點並且站到抽象的“啟蒙”思想（如德國人所說的 Standpunkt des Aufklärers）的時候，別林斯基的批評才離開了這一新的和極為有成效的方向。這個方向是和別林斯基同時代的先進的德國哲學思想的發展方向相同的。在當時的條件下不可避免的這些偏向使他成為俄國的“啟蒙者”（我們的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先進批評家就是“啟蒙者”）的鼻祖。

应当补充的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不仅没有妨碍这些偏向，而且异常助长了它们：唯物主义者的费尔巴哈在自己的历史观和社会观中同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一样，仍然是唯心主义者。所以我们六十年代最杰出的“启蒙者”尼·加·卓尔尼雪夫斯基坚持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同时仍不停地从唯心主义的观点来考察社会的生活<sup>859</sup>。

别林斯基的思想悲剧的头三幕可以加上这样的标题：（1）抽象的理想和费希特主义；（2）在黑格尔哲学的“绝对”的结论的影响之下，同“现实”调和；（3）反抗“现实”，并且部分地过渡到抽象的“个性”观点，部分地过渡到具体的黑格尔的辩证观点。

这一悲剧的第四幕是从同唯心主义完全决裂和转变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观点开始的<sup>860</sup>。但是在这一幕的头儿场以后死神之手就落下了幕布。

别林斯基说自己不是生来就是文艺批评家，而是政论小册子的作家。实际上他是天生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而且具有成为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和光辉的政论家所必需具备的一切条件。他的政论小册子作家的才能有多大，由他写给果戈里的有名的信就可以证明。我们可以假定，读者是知道这封信的，所以我们不打算从信里面作出摘录；我们却从他的刊登在1847年的《同时代人》上面的论文中引出几行，这一论文是评论一本书的，正是它的出版成为别林斯基写给果戈里的一封信的理由。别林斯基在结束这封信时说：“我们从这本书里得出这样的结论：生而为艺术家的人，如果不满足于自己的道路，走上了他感觉陌生的道路，那就不幸得很！在这条新的道路上等待着他的的是不可避免的蹉跎，这之后，就不大可能回到原来的道路上去”<sup>861</sup>。

这几行使我们想起构成他的美学规定的那种论点，即艺术家

不是用三段論法而是用形象來思考的，從這一論點可以得出結論：天才的藝術家有時是很拙劣的思想家。

別林斯基的健康情況一直是很壞的，而且在他生活的最後幾年還患肺病，他在1848年5月26日上午6時在彼得堡去世。

只有很少幾個朋友送他到墓地去，現在誰都知道他被安葬於沃爾科夫墓地。但是除了這些朋友之外，據帕納也夫說，還加入了三四個突然不知打哪兒來的人。他們在墓地上一直呆到安葬完畢，而且非常注意地觀察了所發生的一切事情。 540

如果我們回憶一下，只有死亡才使別林斯基免於認識當時的“第三廳”廳長杜別里特，那末這些“不認識的人”的出現就可以理解了。璣莫夫的畫《臨終前的別林斯基》是人所共知的。這幅畫描繪了3月27日所發生的真實事件：當時有一個憲兵帶着杜別里特的請帖來到了快要死的批評家的寓所來。

當別林斯基的朋友們想要把他的藏書拿出來用抽彩方法賣出去，幫助他那無法謀生的妻子和女兒時，却被該“廳”禁止了。

別林斯基是極其容易激動和誠實的人，他不論在和“俄國的現實”講和時，或者在起來反抗它的時候，都不隱藏自己的信念。我們指出兩件可以很好地說明他的性格的事情。第一件是“調和”時代的事情，如帕納也夫所說。當別林斯基給他讀自己關於鮑羅金諾戰役周年紀念所寫的手稿時，帕納也夫夸奖了論文，但是想要告誡他，論文會在讀者中產生什麼印象。別林斯基打斷了他的話：“我知道，我知道——你不要說完；人們把我叫做猷媚的人，卑鄙的人，他們說，我在當局的面前翻筋斗……讓他們去說罷。我不害怕公開和直率地說出自己的信念，不管別人對我是怎樣想的”……“我向您宣誓，任何東西都收買不了我！……我寧可餓死，……我本來就冒着每天都會這樣死去的危險（這時他怀着痛苦的諷刺心情在

微笑)也不让别人践踏我的人格,不让任何人凌辱我,或把自己出卖给任何人,……”<sup>862</sup>

另一件事是赫尔岑讲的,这是别林斯基生活最后一个时期的事情。

事情发生在一位文学家所举行的晚会上。大家谈到了恰达也夫的《哲学书简》,有一位硕士认为恰达也夫是罪有应得。参加晚会的赫尔岑反驳了硕士的意见。但是争论相当软弱无力地延展下去,直到别林斯基出来干涉。他明显而坚决地站在恰达也夫方面。争论的结尾是很精彩的。

541 硕士以一种无法模仿的自满神情说:“在文明的国家里有监狱,那里面关着侮辱了全民族所尊敬的事物的疯人……而人们这样做是非常好的。”——这时候,别林斯基的身材显得变大了,他非常可怕,他显得是巨大的;他把双手交叉在患着肺病的胸脯上,两眼瞪着硕士,用低沉的声音回答说:“在更加文明的国家里,有断头台,来处决那些认为这样做是非常好的人。——说完以后他便疲惫不堪地倒在安乐椅上默不做声了。在他说到‘断头台’时,主人面色惨白,客人们惊惶不安,大家都不说话了。硕士窘得不知所措……”<sup>863</sup>

“狂暴的维萨里昂”就是这样的。

尼·亚·杜勃罗留波夫在《同时代人》1859年第四期里写道:“不管俄国文学中发生了什么,不管它发展得多么茂盛,别林斯基将永久是它的骄傲,是它的荣誉,它的光荣。直到现在,在我国刚出现的一切美的、高贵的东西上面都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的影响;直到现在,我们最优秀的文学活动家每个人都意识到,他自己发展的绝大部分,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都要归功于别林斯基……在文学小组中……很难找出五、六个卑鄙齷齪的人敢于毫无敬意地捉他

的名字。在俄国到处都有对于这位天才充滿热情的人，当然，这些都是俄国最优秀的人！……”<sup>864</sup>

这几段話向我們說明，我国六十年代最先进的文学活动家是怎样对待別林斯基的。但是我們不敢說，这几段話包括了对別林斯基的意义的正确評价。它里面还缺少一些东西。車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和他們志同道合的人們虽然对別林斯基是十分热情的，但是对于別林斯基在我国社会思想史中的作用不能作出全面的估价。这是因为他們当时的俄国社会关系的落后妨碍了他們这样作。只有当这些关系大大向前发展了，只有当生活本身把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間关于我們的祖国注定要走哪条历史道路的爭論提到具体的、亦即經濟的土壤之上时，——只有在那时，才终于有可能对別林斯基的文学活动給予全面的評价。只有在那时才明了別林斯基不仅是一个非常高貴的人，文艺作品的伟大批評家和非常敏感的政論家，并且在提出——如果不是解决的話——有关我国社会发展的最深刻和最重要的問題时，显示了非常惊人的远見。在明白这一情况后，自然也就明了关于別林斯基只說：“直到現在，在我国剛出現的一切美的、高貴的东西上面都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的文学活动的影响”那是不够的；那时可以明显地看出，对于这点还应当补充說，直到現在我們社会思想每前进一步都是对于解决社会发展的那些根本問題的新貢獻，这些根本問題的存在是由別林斯基以天才的社会学家的敏感所发现的，但是由于他当时的俄国“现实”的极端落后性而不能得到解决。只有經過这样一个必要的修正才能使杜勃罗留波夫对別林斯基的文学活动的評价成为較完整和較全面的。

## 論別林斯基<sup>①865</sup>

〔1910年〕

“誰生性不是思想家，他就不關心思想。”

別林斯基

—

一直到现在，我們还很不熟悉我国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卓越活动家的思想发展的历史。我們最不熟悉的“四十年代的人們”，亦即我們为之写了很多文章并且进行很多爭論的人們的思想发展的进程。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下列事实来说明。

“四十年代的人們”对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进行了很多研究。这一哲学在所有他們的世界观中留下了极深的烙印，所以凡是願意理解“四十年代的人們”的哲学、文学甚至社会观点是怎样形成的人，一定要好好熟悉它。但是在上一世紀的最后三十年里，俄国的大部分研究家恰好不能符合这一条件；大家知道，自从七十年代开始，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在我国就一点也不走运了。假使沒有一

① 这篇論文是我在等待別林斯基百年紀念到来时写成的，但是謝·阿·文格洛夫用文件证明了，別林斯基不是出生于1810年，而是出生于1811年<sup>866</sup>。因此应当把百年紀念推迟到下一年去，我不知道那时会不会举行紀念。无论怎样，我认为这一論文中所談的問題，不管是否举行百年紀念也都有意义。



个研究家能够忽视“四十年代的人们”热烈醉心于费希特，谢林，尤其是醉心于黑格尔这样的事实，那末他们这样醉心于“形而上学”主要被认为和被描画成为一种弱点，对于这种弱点，当然是应当予以宽恕，而绝对不能予以赞许的。结果就很像从前魔鬼诱惑了神圣的隐士一样。人是软弱的，敌人是强有力的。隐士有时抵抗不住诱惑，但是如果他的高贵的德性未能拯救他脱离危险，他就不会是圣者。魔鬼终于丢了脸，而隐士却坚决回到了德行的道路上。“四十年代的人们”遭遇了同样的情况。德国哲学的魔鬼偶尔有力地抓住了他们，但是他们全体或者几乎全体值得称赞的地方是：终于勇敢地起来背叛唯心主义的恶魔并且胜利地转到“现实主义的”土壤上。说实在的，从这时起，便开始了他们的值得严肃注意和热烈同情的思想生活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以前的时代——受魔鬼诱惑的时代——主要是教训青年人，即不要醉心于形而上学。我们试举别林斯基作为例子。谁不知道黑格尔怎样推动他同现实调和这个有益的故事呢？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先进人物当中有谁不为可悲故事的可喜结尾——“狂暴的维萨里昂”对着“耶哥尔·费多罗维奇的哲学帽子”嘲讽地告别而欢欣鼓舞呢？黑格尔的不可调和的、虽然可惜太不了解情况的反对者们深信：别林斯基在和“帽子”告别以后摆脱了伟大的德国唯心主义者的影响。有些人断定，嘲笑“帽子”并不完全标志着这一影响的停止，而只是证明别林斯基开始以另一种方式来理解黑格尔哲学，更好地吸收它的辩证法的方面，这些人却被大家看做是只会作可笑而有害的离奇议论的怪人。

544

情况现在有些改变：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人轻视，或者，至少是敢于公开轻视德国哲学。但是就在现在，对于和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名字有联系的德国哲学思想发展的那些时代也研究得太

少了。所以即使在今天，我们还缺少一些为了正确理解别林斯基、赫尔岑以及“四十年代”其他有名的西方派的思想发展怎样进行所完全必需的先决条件。而且不仅是对于西方派是如此。为了很好地理解俄国的斯拉夫派，也不妨更好地了解现在几乎被我们完全遗忘了的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所教导的是些什么。

545 亚·尼·貝平的名著作《别林斯基，他的一生和通信》直到现在，当然仍旧是一部极可尊敬的研究著作。这部著作是根据别林斯基的通信编写成的，它包含着为撰写这位伟大的俄国批评家的传记所需要的非常宝贵的，而且是唯一的一种材料。但是未必能够说：亚·尼·貝平在谈到别林斯基的哲学发展时，是成功地解决了自己的课题的。

他说：“一个人的内心发展很难分成几个明确的时期；即使在真正的传记里也很难指出这些时期，因为虽然传记也是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表明异常不相同的心情，但是这些心情是逐渐由一个更替另一个的，这种更替是摇摆不定的，瞬间的返回以前的地方，只能指出某种心情所达到的最显著的各点。在这个一般的意义上说，可以认为别林斯基的个人性格和活动的完全发展是在1842年末和1843年初开始的，那时候他完全摆脱了唯心主义的浪漫主义，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历史的和社会的观点，在他的观点里开始占统治地位。这是非常短暂但富有成效的英勇的时期……”（第VIII章）<sup>867</sup>。

说别林斯基所经历的情绪是逐渐由一个更替另一个的，这种更替是摇摆不定的，瞬间的返回从前的地方；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这以后的一切，就不太明确了。第一，“对现实的批判态度”还不足以说明一个人的世界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同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直接对立的，然而无论是从唯心主义者方面还是从唯物

主义者方面都能以批判的态度来对待一定的现实的。第二,“历史的和社会的观点”也不能决定世界观,因为不论是唯心主义者还是唯物主义者都可能同样地持有这种观点。第三,从1842年末到别林斯基去世时(1848年5月26日)的这一短暂时期,在哲学的“情緒”的意义上說,不能认为是一样的。在这一时期的开始时,别林斯基繼續倾向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在这一时期结束时他的两只脚都站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观点之上。他由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这种转变直到现在我們还不很清楚;但是,我們馬上就会看到,如果不理解这一转变,甚至就不能理解别林斯基的文学思想。我們仅就与这一問題有关的少数材料来力图闡明这种转变。

## 二

材料实际上是不多的,无论如何比起以前那个时期——即同现实“調和”和反抗它的时期——要少得多。問題在于,关于别林斯基思想发展史的最宝贵的材料当然包含在他写给朋友们的书信中,因为在他的論文头上老是悬挂着检查官的达摩克里斯之劍<sup>①</sup>。 546

但是,正如亚·尼·只平所指出的,从1843年5月24日到1846年初,可以供給我們研究材料的别林斯基写的那样的信件非常之少。我們不得不主要地求助于他的一些論文,虽然我們事先也知道,我們在这些論文里面远远不能找到我們的作者在当时所願意說和所能說的一切。

約在1842年,他写了一篇关于叶·巴拉丁斯基全集的論文,

<sup>①</sup> 他在1843年2月6日写給波特金的信中说:“不写什么东西,也沒有什么可以写,情况一天天地使我感到难堪。关于艺术,你可以胡說一通,而关于正經事,也就是說,关于風尚和道德是不值得花費時間和力量去讲的。我从載于《祖·紀·》第1期的我的論文中剪下了整整一个印刷頁——这是最好的地方,我很珍視这篇論文,因为它在思想和敘述方面都是朴实的”868。这里所說的是論文《1842年俄国文学一瞥》。

这篇文章在我们看来是很有意思的。这篇论文是别林斯基在和“耶哥尔·费多里奇的哲学帽子”告别以后过了很久写成的。然而我们在其中可以看到他把哲学看作是“自古以来不成形的观念在思维中发展的科学”<sup>①</sup>。这是无可怀疑的纯粹的黑格尔主义。别林斯基表示了这一观点之后，立即说到历史，说它是“这些自古以来的观念——一切存在之物，一切新生之物，一切死亡然而却是永生之物的神秘的太始之母——的发展在事实和现实中实现的科学！……”这又是无可怀疑的最纯粹的黑格尔主义。这意味着什么呢？结果好像是别林斯基在和黑格尔的“哲学帽子”告别以后，又抓住了它，把它看成了各种哲学智慧的贮藏所。大概可以说，——亚·尼·贝平也许会这样说——我们这里碰到的是暂时的“摇摆”，是“瞬间的返回以前的地方去”。但这会是沒有根据的。“摇摆”和“返回”比乍一看来所感觉的要长久得多。例如，在1843年关于捷尔沙文全集所写的一篇论文中，我们发现他对于观念和一切发展的“起点”的纯粹黑格尔式的看法，而且在同一篇论文里我们的批评家同意——虽然不是沒有保留的——那些“美术的思辨的法官们”，他们认为“艺术的对象不是暂时的和相对的，而是永久的和绝对的”<sup>②</sup>。这又是黑格尔主义，此外，这种黑格尔主义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在别林斯基关于艺术在古代东方各国和古代希腊的发展进程的议论中。怎样来解释他总是返回到那顶“帽子”去呢？不是人们要我们相信，他早在1840年就已经完全把它抛在一边了吗？<sup>③</sup>

① 《别林斯基全集》，第4版，第6册，第302页869。

② 同上书，第7册，第60—63页870。

③ “我诅咒我和可恶的现实调和的卑鄙意图！伟大的席勒这位人类高贵的捍卫人、明亮的救星……万岁！”等等（见1840年10月4日给波特金的信）871。

回答应当在1841年3月1日写给波特金的那同一封信里去找寻，在这封信中宣布了和“哲学帽子”的有名的决裂。别林斯基在那封信里说：“我很早就已怀疑黑格尔的哲学只是一个契机，虽说是伟大的，但是它的结果的绝对性是毫不中用的”<sup>①</sup>。这一段话是别林斯基就波特金寄给他的阿尔诺德·卢格和爱赫特尔迈尔合办的黑格尔左派机关刊物《Hallische Jahrbucher》<sup>②</sup>杂志中的片断而写的。别林斯基说，这个片断使他感到很高兴，“甚至好像复活了和坚强了一会儿”。“谢谢你寄来的片断，谢谢一百次”<sup>872</sup>，——他补充说。这表明，正在别林斯基抛弃黑格尔的哲学帽子的那个时期，他是同情黑格尔学派的左翼的。而这所以更其必须指出，是因为别的一些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别林斯基对他被人们非常注意和如此调和的论文《论鲍罗金诺战役周年纪念》中的理论基础的态度当然比其他一切资料更为重要：“当然，我在为格林卡所著《鲍罗金诺战役概论》一书写的论文中所努力发挥的思想在原理上是正确的，但是也应当发挥否定的观念”<sup>873</sup>……从他的这些话里可以看出，为什么正是黑格尔哲学结论的绝对性现在使他生气，因为这种绝对性使他不能发挥“否定的观念”。黑格尔左派之所以引起别林斯基的热烈同情，是因为他们抛弃了黑格尔哲学的绝对结论，并且着手发挥“否定的观念”。而这一观念对黑格尔哲学不仅不是生疏的，而且相反地，它构成黑格尔著名辩证方法的灵魂。黑格尔本人善于以惊人的雄辩阐明辩证法这个“否定”的有力武器的意义（比如，请参见他所写的《哲学全书》叙述逻辑的第一篇）<sup>874</sup>。

因此，别林斯基在他为了“否定的观念”而反对“帽子”的时候，

① 亚·尼·贝平：《别林斯基，他的生平和通信》，第7章。作者在脚注中说，别林斯基关于黑格尔哲学的结果的绝对性的“较为尖锐的”说法被他改得温和了一些。

② 《哈雷年鉴》

548 根本不是不再为黑格尔主义者：他只是把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方面和它的另一个方面对立起来。因为这个哲学的辩证的方面比它的以结论的绝对性为特征的那一方面要无可比拟地重要，所以结果是别林斯基正是在他和“耶哥尔·费多里奇的哲学帽子”发生争吵的时候，也只有在那时候，才成为真正的黑格尔主义者。您可以看到，这一必然的结论，是同关于我们作者的思想发展进程最为普遍的看法大相矛盾的。

### 三

为了证实刚才所说的，我还引证下列事实。别林斯基很喜欢波特金的论文《1843年的德国文学》。但是波特金在这一论文一开始就这样说明黑格尔哲学的特点：

“他的体系还在1810年以前就已经大致完成；黑格尔对当代现实的看法是在1820年最后形成的。他的政治见解，他关于国家的概念，是拿英国作为模范的，这些见解带着很清楚的复辟时代的烙印。由此可以说明，为什么他把欧洲后来发生的事变说成是紊乱的。但是黑格尔思想的异乎寻常的正确和坚强正在于他的体系的形成不依靠他个人的意见，所以对于为他所引证的结果的最好批评，就是用他的方法对它们加以检验。而在这些结果中常常看出他个人意见的影响。如果他是从纯粹的思想发展出宗教哲学和法哲学，其中不包含在他那时代的文明之中的积极因素，那末他的宗教哲学和法哲学会变成另一种样子；因为正是从这里可以得出包含在他的宗教哲学和法哲学中的一些矛盾和不正确的结论。宗教哲学和法哲学中的原则永远是独立的、自由的和真实的，——推论和结论常常是近视的。学派分为左右两派的原因就在于这种情况。一部分学生求助于原则而驳斥结论，假使这些结论不是从原

則里得出來的話；他們把當時所有的迫切問題加進辯證法中。這個學派被稱為左派。右派只接受了一些結論，一點也不去想它們的原則”<sup>①</sup>。

波特金所以同情“左派”正因為它把“當時所有的迫切問題”都“加進”黑格爾的辯證法里去了。這種說法，當然是不正確的。應當說，左派黑格爾分子利用了黑格爾的辯證方法解決了上述問題。但是問題不在說法而在思想；這裡的思想和我們在別林斯基那里遇到的是一樣的；“左派”的功績就在於他們反對黑格爾的一些絕對的結論（和“哲學帽子”決裂），而且把他的體系的辯證的方面提到第一位，也就是說，着手發展“否定的觀念”。 549

我還要補充說，自從別林斯基一聽說巴枯寧加入左派黑格爾分子隊伍，就同巴枯寧和解了，他曾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同巴枯寧爭吵。他認為當時巴枯寧所接受的方向必然“引導他走向各種復興……”（1842年11月7日的信）<sup>875</sup>

#### 四

總之，再說一次：反抗“帽子”完全不等於反抗黑格爾。它只意味著我們的批評家由“右的”學派轉變為左的學派，學會了黑格爾體系的辯證性質並拋棄了它的絕對的結論。這從上面我為了證實別林斯基甚至在把“帽子”扔到一邊以後還在堅持黑格爾的唯心主義而引證的那些文章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來。

別林斯基在他關於巴拉丁斯基的著作所寫的論文里證明，沒有思想的艺术“就像沒有靈魂的人一樣，——是一具屍體”，現在，所有的詩人，甚至偉大的詩人，也必須同時是思想家。他下結論

<sup>①</sup> 瓦·彼·波特金這篇有意思的論文載入他的全集第2卷（聖彼得堡1891年版）；我所引的一段在第257—258頁。

說：“科学，活生生的現代科学，現在已成为艺术的撫育者，沒有它，灵感是虛弱的，才能是无力的！……”<sup>①</sup>

我們的批評家在醉心于黑格尔哲学的絕對結論的时代所发表的議論是不同的。那时候，他攻击了席勒并推崇了歌德，而現在，共实就是稍为早些，即在1841年的1月，他写信給波特金說：“我是否要向你承认我所犯的錯誤……；关于席勒我根本不能不激动地想他，而对于歌德，我开始感到一种憎恨，說实在的，我是不能举起手来反对門采尔的，虽說这位先生在我的心目中仍然是个白痴”<sup>877</sup>。

別林斯基現在非常珍視席勒，因为他的著作表达了否定的观念。

550 別林斯基在他关于捷尔沙文的著作所写的論文中，下列几段話鮮明地表达了辯证的观点：

“任何东西都不是突然出現的，任何东西都不是現成地誕生的，而是凡有观念作为自己的出发点的一切东西都按照着时机发展，辯证地运动着的，是从低級阶段过渡到高級阶段的。这一确定不移的規律，我們在自然界，在人的身上和在人类中都可以看到。自然界不是作为一个現成的东西突然出現的，而是有它自己的时日或者創造的时刻。在自然界中，矿物界是在植物界以前就存在的，而植物界又是在动物界以前就存在的。每一根草都經過几个发展阶段，——莖，叶，花，种子不过是植物生活中确定不移的連續的契机。人要經過嬰兒期，少年时代，青年时代，成年和老年时代的生理上的契机，这都有与之相应的精神的契机，而这些契机表現于他的意識的深度、范围和性格。社会和人类都有相同的規律”<sup>②</sup>。

① 《別林斯基全集》，第6册，第304和324頁876。

② 同上书，第7册，第60頁878。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藝術也服從於辯證發展的規律。別林斯基堅決承認這一點：“藝術也有相同的規律”。但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末可以清楚地看出，別林斯基現在不能同意於那些“藝術的思辨的鑑定人”，他們想把藝術看作是一個完全單獨的世界，不依賴於意識的其他領域和不依賴歷史而存在的。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固然，他到現在也承認，藝術的對象不是暫時的和相對的，而是永恆的和絕對的。但是他現在認為，藝術如果服從於暫時的歷史影響，絕不是貶低自己。他證明，永恆的東西表現於時間中，絕對的東西是被表現的形式所限制的，無限的東西是在有限的東西里面才能被直觀到的。他既然達到了這個完全和黑格爾哲學真實的——也就是說，辯證的——性質相符合的結論，馬上也就看出了：絕對的觀點是和把藝術看作與一切存在的東西一樣服從於發展規律的現象的看法不調和的。

他說，“假使美學只拿觀念和它們的辯證發展作為基礎，把信仰和歷史拋在一邊，那末根據這種美學可能得出結論：希臘藝術的作品是美的，而印度和埃及的藝術作品與創作沒有共同之點，是愚昧和野蠻的產物；哥特式建築是不美觀的體現；法國文學是好的，而德國的是胡說，或者相反，這要看美學是從哪一原則出發的”<sup>①</sup>。

在這裡加以某些說明將是適宜的。從別林斯基所敘述的話中，可以得出結論：甚至抱著絕對的觀點的美學也應當和觀念的辯證發展打交道。所以讀者可能發生一個問題：絕對的觀點和辯證的觀點的不可調和究竟在哪裡呢？但是問題在於：別林斯基在這裡所假設的美學是與在時間和空間之外的觀念的發展，也就是說，在完全抽象的思維領域中的發展打交道的。而這樣的發展既然同

①：《別林斯基全集》，第7冊，第64頁879。

观念的现实发展没有任何共同之点，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导致绝对的结论，也就是说，在这种场合会导致绝对的美学的标准。连别林斯基本人在他醉心于绝对的“帽子”的时代也曾宣布过类似的标准。不仅如此：甚至可以說，他一直到自己生命终结时，都遭受到这些标准的某些影响。但是假如他在自己的个别的文学判断中并不始终是彻底地应用他现在所领会的辩证的方法的话，那末他是完全无误地表述了在丢掉绝对的观点和过渡到辩证的观点的美学面前所产生的那一任务的。

他写道：“真正的美学的任务不在于解决艺术应当是什么的问题，而在于解决艺术是什么。换句话说，美学不应当把艺术当作某种预想好的东西来议论，当作是只能按照它的理论来实现的某种理想来议论；不，它应当把艺术当作是在美学出现以前早已存在的对象，而且美学本身的存在应当归功于艺术的存在”<sup>①</sup>。

这是绝对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后来被伊波利特·泰纳在他的《艺术讲座》中几乎用同样的话表达出来。这就是他说的话：

“我所努力遵循的和一切精神科学开始采用的新方法，就是把人类的作品，其中也包括艺术的作品，看作是应当突出特点并寻求原因的一些事实和现象——不过如此而已。被这样理解的科学不斥责而且也不宽恕什么，它只是指出并加以说明。它不会对你们说：‘轻视荷兰的艺术吧，因为它太粗糙了；只欣赏意大利的艺术吧。’同样，它也不会对你们说：‘轻视哥特式的艺术吧，因为它是病态的；只欣赏希腊的艺术吧。’它让每个人都有充分的自由按照自己的爱好，去选择适合于他的脾气的东西，并且以比较深刻的注意来研究比较符合于他的精神发展的东西。至于说到它自身，那末

<sup>①</sup> 《别林斯基全集》，第7册，第64页。

它是同情地对待艺术的一切形式和一切学派的，甚至同情于表面看来最矛盾的一些学派，因为它认为它們是人类精神的不同表现”<sup>①</sup>。

在我們停留在純粹科学的領域之前，我們就必須这样看待問題：美学，科学沒有給予我們这样一些理論的基础，我們凭借它們就能說，希腊的艺术值得我們贊賞，而哥特式的艺术却值得我們譴責，或者相反。当然，只要我們走出美学的領域，事情馬上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子。艺术作品是由人們的社会关系所产生的一些現象和事实。随着社会关系的改变，人們的美学趣味也改变了，也就是說，艺术家的作品也随着改变了。一定社会时代的人总是喜欢表达这一时代趣味的艺术作品的。在划分为階級的社会里，某个时代所特有的趣味，依构成社会的各个階級的地位为轉移而常常很不一样。因为每一个艺术批評家本身就是他周围的社会环境的产物，所以連他的美学判断也始終是由这一环境的性质决定的。因此他永远不能避免在文学中或艺术中的一个学派和与之相对立的另一学派中偏爱一个。一切就都是这样，但这一切既沒有推翻別林斯基也沒有推翻泰納。相反地，这一切表明，他們在駁斥艺术标准的絕對主义时，是完全正确的。科学的美学在凡是承认这些标准的地方都将成为不可能的。

## 五

如果想在这里考察別林斯基的文学观点的話，我就不得不重复<sup>②</sup>。我只來談我在以前的論文中所沒有涉及的問題：別林斯基 553

① 《艺术讲座》，丘金諾夫譯，圣彼得堡1904年版，第11頁<sup>②</sup>。

② 參見丹納：《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1頁。——譯者

③ 別林斯基的文学观点我已在論文《維·格·別林斯基》（收于德·尼·奧夫夏

对民歌的态度。

甚至那些对我们的伟大批评家极为同情的人，也把这种态度描写得不完全确切。例如，亚·尼·貝平說，在別林斯基逝世后不久就从各方面开始发现他的观点不完整。这位可敬的研究者首先断定，別林斯基沒有注意彼得大帝以前的全部旧时代的文学和民歌，他只是有时偶然提一提民歌。据亚·尼·貝平說，“彼得大帝以前的古代民謠只是原始的无意識的时代，这个时代从真正的启蒙时代开始和正规的文学产生起，对我们來說就失去意义了；民間詩歌与正规的人为的文学的艺术意識比較起来，是儿童的呀呀学語”<sup>④</sup>。

可以說是这样，也可以說不是这样。正确的是，在別林斯基看来，彼得大帝以前的古代民謠是无意識的时代，或者更精确地說，在这个时代內，据他的意見，只是有时突然閃爍出意識的微光。这一点也是正确的，即別林斯基认为民間詩歌与“人为的”文学的艺术意識比較起来，是儿童的呀呀学語。但是說我們的批評家只是偶然才提及民間詩歌，那未必是正确的。我們能不能說他在1841年的《祖国紀事》上刊登的就是研究民間詩歌的一系列文章是偶然的呢？这一系列論文在《別林斯基全集》第5卷里占了247頁<sup>881</sup>。

可見，这种仿佛是“偶然的”一系列論文，却显得很长。并且別林斯基后来补充了他原来的文章，以便把它重新印在他預定編写的俄国文学批判史中。由此可見，他对于民間詩歌的兴趣在以后也并没有消失。

对于我們的批評家在反对浪漫主义地醉心于民間詩歌方面走

---

尼柯一庫利柯夫斯基主編的《十九世紀俄国文学史》)和刊載于我的論文集《二十年來》的論文《別林斯基的文学观点》里加以考察。請讀者參閱这些文章<sup>880</sup>。

④ 《俄国文学史》，第1卷，第20頁。

得太远这一点，我們自然不能提出異議。但是我們也应当記住，他並沒有把一切民間詩歌看得太低；他對於希臘的民間詩歌就給予很高的評價。要是他幾乎是以輕蔑的態度對待俄國民間詩歌，那末這也是值得人們非常注意的原因，這種原因證明別林斯基思想的卓越力量和他精神上要求的驚人深度。

這一點是很值得我們詳談的。亞·尼·貝平繼續寫道：“第二，別林斯基由於文學的藝術意義，而沒有看出它的最大的歷史-文化的意義”<sup>①</sup>。

這又是並非如此。別林斯基在援引俄國民間詩歌時，堅決地說民間詩歌“比歷史本身更好地表明民族的內在生活，可以作為衡量它的文明的尺度……反映它的精神的一面鏡子”<sup>②</sup>。

這和亞·尼·貝平所說的完全相反。這是怎麼回事呢？

問題在於，別林斯基的目光不以民間文學的“藝術意義”為限，相反的是為了盡力深入到它的內容里去。在他看來，這一內容不僅在俄國人民方面，而且在所有斯拉夫部落方面，都是很貧乏的。據他說，所有這些部落的自然詩歌是富於情感和表達能力的，但是“在內容方面是貧乏而缺少一般成分的”<sup>③</sup>。因此，他實際上是很不甚至太不重視自然詩歌了。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他怎樣說明斯拉夫民間詩歌內容的貧乏呢？在提這一問題的時候，我們就涉及了別林斯基世界觀的一個最有意思的方面。

他認為民間詩歌的內容是由人民生活的內容所決定的。在民間詩歌內容貧乏的地方，它的人民生活也是貧乏的。假使我們的

① 《俄國文學史》，第1卷，第20頁。

② 《別林斯基全集》，第5冊，第64頁882。

③ 同上書，第65頁883。

《伊戈尔王子远征记》不仅不能与《伊里亚特》相比，甚至也不能与西方中世纪的诗篇相比，那末这是因为十二世纪俄国人民生活的內容比古希腊和西欧与民间创作发展相应时代的生活的内容还要貧乏得多。別林斯基为了证实自己这个思想，拿中世纪西欧生活同十二世纪俄国社会生活作了一个比較。

他感叹地说：“这是多么不同！思想被禁于封建制度中；看来，封邑制度是偶然的事情，是关于继承权的自然、宗法制概念的产物。封建制度是从征服制度产生的；整个民族出动去征服另一民族；在征服这个民族以后，就定居下来，成了被征服的土地上的定居民族。因为征服者的个人力量不是他的出身所给予的，而是他的勇敢和功勋所给予的，于是军队被选出的首长拿去一部分被征服的土地，而其余的土地则分配给自己的老战友。由此产生了无数的后果，如果不认识这些后果，甚至不能说明我们同时代的欧洲历史”<sup>①</sup>。

这种比較在理論方面不是无可指摘的。我们不能把整个政治体系看成是偶然性的結果；而且連別林斯基本人也认为我們的封邑制度是“关于继承权的自然、宗法制概念的产物”。由一个民族的“自然”概念所产生的制度，显然不是偶然的。但这只是順便提出的。在这里最主要的东西是：我們的作者认为，如果不考虑到作为西欧封建主义基础的征服这一事实，要去說明“我們同时代的欧洲历史”甚至也是不可能的。

征服的結果，在西欧社会里一方面形成了“保护人”阶级，而另一方面产生了“諸侯”、自由战士阶级。这两个阶级骑在成了征服者的真正奴隶的人民头上。这样就产生了不断的阶级斗争，它在

<sup>①</sup> 《別林斯基全集》，第5册，第83—84頁884。

整个西欧社会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 六

別林斯基說，“貴族的權利最初不過是等級的權利，它以自己的情感高超和思想崇高而感到驕傲是理所當然的，而且不無理由地認為自己有權利輕視下層的愚民，好像他們生來就應當滿足於貧困的生活似的。城市和中間等級的產生是改變這些關係的第一步。還在早些時候就在國君和封建主之間發生了鬥爭，這種鬥爭不是偶然的，而是事態發展的必然結果，而且是把國家組成一個統一政治體所必需的。君主政體在一些城市中找到了天然的同盟者，城市也在君主政體中找到了自己的同盟者，兩者都挺身而出反對騎士階層，一直到轉變為貴族或達官貴人的騎士階層，重新成為君主政體的天然同盟者（只是另一種形態的）為止，但仍然是中間等級和人民的從前的敵人”<sup>①</sup>。

就是這個“觀念”，更正確地說，西歐社會中征服和階級鬥爭的這個事實就產生了西歐社會生活的豐富內容。別林斯基說：“這種情況產生了鬥爭（我們已看見，這是一種階級鬥爭，或者，如果你們願意的話，也可以說是等級鬥爭。——格·普·），其結果就是合理的發展”<sup>②</sup>。

社會生活的合理發展使民間創作特別是民間詩歌有了豐富的內容。

我們在古代的羅斯看到了什麼呢？照別林斯基的說法，在它那裡我們遇不到在西歐所發生過的事情的“一點影子”。

“封邑制度和地主制度完全一樣：地主父親臨死時，把自己的

<sup>①</sup> 《別林斯基全集》，第5冊，第85頁885。

<sup>②</sup> 同上書，第84頁886。

农民平分给自己的儿子们。在俄国未曾有过征服，因此人民生活的孤零零的因素，在斗争中如果和别的成分不冲突，就失去了发展的可能……在大公们的内訌中没有任何思想，因为这些内訌的原因不是部落的差别，不是不同种类的成分的斗争，而只是个人的不和。人民在这里不起任何作用，完全没有参加内訌。門的内哥罗人和基輔人不是为了部落的仇恨，而是由于大公的命令而互相厮杀的。在普希金的小說《杜布罗夫斯基》中非常出色地表达了农民特罗伊古洛夫和杜布罗夫斯基的爭吵中的領地的糾紛：老爷們爭吵了，僕人們也开始打架了——践踏了土地，屠杀了牲畜并放火烧农舍”<sup>887</sup>。

在考虑这些想法时，我們不能不作出极重要的保留。第一，在封邑时代，各地区的居民对于自己的大公完全不像他們的“受过洗礼的财产”<sup>①</sup>后来对待地主那样。門的内哥罗人、基輔人等等很少有仅仅由于大公们的命令而互相厮杀的愿望。俄国各地互相竞争是有深刻原因的。在这里，往往必須承认“各种不同成分的斗争”。但无疑的是，引起俄国不同地区相互斗争的种种成分的不同性并没有决定西欧社会阶级斗争的不同性所具有的那种进步意义。阶级的相互斗争总是，或者差不多总是——就是说，除了由于互相斗争的社会力量之间势均力敌而仍然没有情况以外——比国家之间或地区之间的相互斗争，更能促进社会关系的进步。因而別林斯基就是在这里也不完全是不对的。第二，征服本身还不决定由它所产生的那些社会后果。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征服产生完全不同的后果。在这里，全部問題在于：征服者处在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上，被征服者处在哪个阶段上。而且封建制度在西欧的建

<sup>①</sup> “受过洗礼的财产”——是指俄国的农奴，来源于赫尔岑的一篇論俄国农奴制文章(1853年)的标题。——譯者



立，要远在日耳曼人完成对高卢—羅馬世界的征服之后，所以把它完全归之于征服，那是不正确的。但是当別林斯基的观点形成时，甚至在史学专家的头脑中也很少出現这种想法的；因为大家知道，奥古斯丹·梯叶里，米涅，基佐和法国其他杰出历史家认为征服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的。最后，现在俄国的历史和社会学书籍中开始越来越广泛地传播俄国也还没有走完封建化过程的观点。用这种观点来看，好像別林斯基拿西欧和俄国对比是沒有任何理由的。但是不应忘記，上述过程虽然在实质上是一样的，在不同国家是以不同的强度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之下进行的，因此而导致极其不同的經濟和政治的結果。我們举出古代埃及为例。在那里也曾有封建制度。但是埃及封建制度的經濟和政治的后果，完全不像西欧封建制度的經濟和政治的后果。既然这样，那末我們完全可以問問自己，究竟在哪里，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我們遇到封建化过程的这样一些最有利于社会进步发展的社会結果，或者，照別林斯基的說法，最有利于“合理发展”的社会結果。关于这一点，不可能有任何怀疑：东方，包括俄国在內，在这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欧。可見，別林斯基在这里所犯的錯誤并不像乍看起来那样厉害。他的意見在实质上完全是正确的：因为在西欧对于“合理发展”所具有的有利条件要比我們祖国多得多；因而在民間詩歌的內容中就有了差別：因为西欧人民的“合理发展”是比較丰富的，而俄国人民的“合理发展”是比較貧乏的。

## 七

黑格尔說过：Der Widerspruch ist das Fortleitende(矛盾推动前进)；別林斯基把黑格尔的这一深刻思想应用于各民族的社会政治和文学发展問題，并給它以某种稍微不同的表述；他宣称，合

558 理的发展是由于社会成分的不同所引起的斗争的结果。在肯定这点时，——我提醒：在和“帽子”决裂以后，——他仍然是黑格尔的忠实而异常彻底的学生。但他是哪一个黑格尔的学生呢？不是那个把自己的哲学冒充为绝对体系的人的学生，而是在自己的讲演中雄辩地传播辩证法不可战胜的力量的人的学生，这种辩证法要对世界上存在的一切加以判断，并使所有过时的和失去自己的历史作用的东西不可改易地注定消失。所以，在我们已经熟悉的关于巴拉丁斯基著作所写的论文里，亦即别林斯基还是作为相信有“自古以来不成形的观念”的存在的纯粹的唯心主义者来发表意见的那篇论文里，他对待现实的态度完全不同于他写《论鲍罗金诺战役周年紀念》和关于《門采尔》的论文时的那种态度<sup>①</sup>。

他問道：“现实嗎？但现实是什么，难道不是理性的永恒规律的实现嗎？任何别的现实是理性之光的一时模糊，病态的生活过程，——难道可能有永恒的日蝕，难道在日蝕以后太阳不是比以前更加光辉灿烂嗎？……应当善于把合理的现实(是唯一现实的)同不合理的现实(是幻影和暂时的)区别开来”<sup>②</sup>。

他以前說过：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現在他說：只是合理的东西才是现实的；其余一切都是幻影。以前他忠于绝对体系的創造者的黑格尔；現在他忠于辩证論者的黑格尔。在別林斯基和“帽子”决裂以后所表现出来的他的最重要的理論上的成就，就在于認識到不是一切存在的東西都是现实的。現在他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是現在他的唯心主义浸透了辩证法的精神。他在当时最主要的理論上的錯誤的原因就在于他仍然是一

<sup>①</sup> 关于他的发展的这个时期，請參閱我在前面已指出的論文《維·格·別林斯基》，以及載于論文集《二十年来》里的論文：《別林斯基和合理的现实》888。

<sup>②</sup> 《別林斯基全集》，第6冊，第310頁889。

个唯心主义者；而他的唯心主义浸透了辩证的精神，这一点使他可能阐明决定人类的精神和社会发展的那些条件——简单些说：别林斯基当时世界观的缺点或者优点都根源于辩证唯心主义。

首先让我们详细谈谈优点。

尤·米·斯切克洛夫在卓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中发现了他把阶级斗争看作是西欧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力这样一种观点，并且断定，《穆勒的注释》的著名作者是非常接近于马克思的观点的。我指出过这是一个大错，因为离科学社会主义非常之远的米·彼·波果丁对于阶级斗争的历史意义也持有这种观点<sup>①</sup>。现在我又应当转到我在反驳尤·米·斯切克洛夫时所引证过的莫斯科历史学家的那篇论文。

559

读者或者还会记得，这篇论文叫作《俄国历史和西欧国家历史关于起源问题的比较》，刊登于1845年第一期《莫斯科人》。米·彼·波果丁在谈到西欧时发表的意見，和几年以前别林斯基在他关于俄国民间诗歌所写的论文中表示的意見极为接近。他写道：

“征服，分治，封建制度，中间等级的城市，仇恨，斗争，城市的解放——这是欧洲三部曲的第一部悲剧。”

“专制政治，贵族政治，中间等级的斗争，革命——这是第二部悲剧。”

“法典，下层等级的斗争……未来在神的手中。”

米·彼·波果丁对于俄国历史的看法，也和别林斯基所说的几乎完全一样。

乍一看来，我们会注意到，在我国，在它（指俄国历史。——格·普·）的开始时，根本沒有一种（现象。——格·普·），至少是

<sup>①</sup> 請參閱我写的論文《再論卓尔尼雪夫斯基》，刊登于1910年4月的《現代世界》890。

这种样子；既沒有分治，又沒有封建制度；既沒有避難的城市，也沒有中間等級；既沒有奴隶制度，也沒有仇恨，既沒有自豪感，也沒有斗争……”<sup>①</sup>。

“官方人民性”的代表人物的論文在純粹的斯拉夫派人的陣營中引起了不滿；刊登在《莫斯科人》同年第三冊上的彼·瓦·基列也夫斯基所寫的題為《論古代俄国历史》的論文回答了這篇文章。但是基列也夫斯基對波果丁所進行的反駁並沒有觸及到後者的基本思想。彼·基列也夫斯基完全接受了它。他說：“古代俄国和西歐的主要區別您以為是在於：在西歐國家建立在征服之上，而這在我國是沒有的。——這是無疑的真理”<sup>②</sup>。他只是責備波果丁對於這一主要思想的不完全徹底的态度，而且還說他關於最初幾個大公時代的教育狀況和俄國民族精神的特点提出了一些極不值得尊敬的意見。關於次要問題的意見分歧，在這裡對於我們沒有絲毫的意義。對我們重要的是：基列也夫斯基和別林斯基、波果丁一樣——當然也和所有其他斯拉夫派人一樣<sup>③</sup>——把我們沒有征服以及因此而沒有階級斗争這一點看作是俄國历史和西歐历史的主要差別。於是我們得出某種極其自相矛盾的事情：在我國历史的進程的根本問題上，同西方历史比較，別林斯基同他的不可調和的對手絲毫也沒有分歧，而他不僅在自己的論文中而且也在书信

① 當我反駁尤·米·斯切克洛夫時，我手頭還沒有米·彼·波果丁的論文，我是從尼·普·巴爾蘇柯夫所作的這篇論文的摘錄中引證的。現在我手頭有了這篇文章。我這里引證的幾段載於1845年《莫斯科人》第1冊科學欄的第3—4頁。

② 《莫斯科人》，1845年，第3期，第12頁，《科學》欄。

③ 阿·斯·霍米亞科夫在1845年寫道：“有些原則是西歐的，有些是我們的。在那裡一切都是日耳曼軍隊入侵所淹沒的羅馬基地上發生的；在那裡一切都是從征服以及勝利者同被征服者之間的不斷的，雖然是不易覺察的長期斗争中發生的……俄國則是另一回事。”（《寄彼得堡的信》，《莫斯科人》，1845年，第2期，《創作》欄，第77頁。）

中<sup>①</sup>不遺余力地攻击了他們。他們的分歧是从哪里开始的呢？

在回答这一問題之前，我认为提醒讀者注意另一个基列也夫斯基(即伊万)拿《祖国紀事》(当时別林斯基的机关刊物)和《灯塔》(矇昧主义者布拉切克的机关刊物)所作的如下比較，那是有益的。

在《創作現狀的評論》中这位最安静的斯拉夫派人挖苦地写道：

“《祖国紀事》力图猜破和剽窃对事物之如下看法，据它的意見，这一看法是欧洲教育最新的表现，因此它常常变换自己的思想方式，始終不渝地关心：表达西欧文学中的最时髦的思想和最新的感觉。

与此相反，《灯塔》仅仅看到西方教育中它认为有害或不道德的那个方面，而为了更可靠地避免对它的同情，就完全駁斥所有的欧洲教育，而不去进行怀疑的分析。因而就会有一个人称赞，而另一个人却加以責罵；一个人在称赞引起另一个人憤怒的东西；甚至在一个杂志的詞汇中表示极大的优点的同样一些詞句，例如欧洲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人类的最大智慧等等，在另一个杂志的語言中，却有极端斥責的意思。所以，人們沒有看某一个杂志，可以从另一个杂志知道它的意見，只是把它的所有的話理解为相反

<sup>①</sup> 別林斯基在南俄旅行的时候，从彼得堡写信給他的莫斯科的朋友說：“在卡路加我碰到了И. А. (显然是伊万·阿克薩柯夫、——格·普·)。可爱的青年！斯拉夫派——是这样的美好，好像从来不曾做过斯拉夫派似的。一般說来，我正在墮入一种可怕的邪道，开始以为，在斯拉夫派人中間的确能有些好人。我这样想，是可忧的，但是真理是摆在一切东西的前面的！”<sup>891</sup>然而显然可以看出，邪道并没有在他的心里扎下很深的根。別林斯基在他从辛非罗波尔寄出的信里說得很尖銳：“……我們进入克里米亚草原后，看見了对我們說来是三个新的民族：克里米亚的牡綿羊，克里米亚的駱驼和克里米亚的韃靼人。我以为，这是同一类东西的不同变种，一个部落的不同支系；在他們的面貌中有这么多的共同点、虽然他們讲的不是同一种語言，然而他們都彼此了解。看起来，他們一定都是斯拉夫派”<sup>892</sup>。

的意思就行了”（《莫斯科人》，1845年第3期，《批評》栏，第21頁）。

这里的挖苦就在于：据伊·基列也夫斯基的話說，《祖国紀事》，也就是說又是別林斯基，仅仅力求抓住和說出在西方最时髦的思想。凡是知道別林斯基思想的正直和深度的人，就会理解对这是不值得反駁的。而且連把这个刊物和《灯塔》加以比較也不可能有任何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我們不是把別林斯基的意見和《灯塔》的意見对立起来，而是和甚至在一个短短时代里落在正統的斯拉夫派手中的《莫斯科人》的意見对立起来，那末我們除了某些个别例外以外，必須重复恰好是我从伊·基列也夫斯基的論文中所做的那些摘录里說的話。

別林斯基称贊的是斯拉夫派人所責罵的；他欽佩的是在他們那里引起憤怒的；甚至在別林斯基的詞汇中意味着极大的优点的同样一些詞句，例如，欧洲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二元性，元素的非一类性，它們的斗争等等，在斯拉夫派人的語言中却有极端斥責的意义。所以不閱讀《莫斯科人》就可以从《祖国紀事》中知道它的意見，只把它們的所有的話理解为相反的意思就行了。誠然，为了这点，应当很好地掌握黑格尔哲学。

正如我在上面所指出的，还在1841年就宣称階級斗争是合理发展的基础的別林斯基，是完全忠实于乐意地重复說“矛盾推动前进！”的辯证論者的黑格尔的精神的。所以“非一类元素等等的相互斗争”的說法实际上在我們的批評家的詞汇中占有极其令人可尊敬地位，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些說法在斯拉夫派人那里却获得了应当极端斥責的含义。

而这一点是不管两方面完全一致同意西欧有征服的事实在俄国却没有征服这一事实的。別林斯基同意斯拉夫派人的意見，这个意見就是征服已經成了西欧整个社会和精神发展的起点。但是

当斯拉夫派人认为这一发展的进程类似于可悲的錯誤或者无法挽救的不幸时，別林斯基却承认它是合理的，并认为它是精神财富的源泉。他也完全同意斯拉夫派人所說俄国不曾有征服的这种意見。但是当斯拉夫派人把不曾有征服这一点看作是命运的某种可貴的礼物时，別林斯基发现它正是我們精神貧乏的原因。当人們說他以輕視的态度来看待俄国人民时，是对他进行誹謗。他断定，“用俄国民間詩歌的文献可以证明民族的伟大和有力的精神”，而且“所有我們的民間詩歌是无穷的精神力量的生动证明”<sup>①</sup>。但是他在俄国历史中沒有看到据他的說法在西欧未曾停止过一分钟的斗争<sup>②</sup>，并以此來說明俄国民族无穷的有力的精神不够发展的状态。由于缺乏发展的內在原因，就只能求助于外在的。因此我們的作者就热烈同情彼得大帝的改革：俄国民族的精神应当受到“来自外部的刺激”<sup>③</sup>。因而根据他自己的話來說，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最伟大和主要是俄罗斯民族的詩人的普希金不是在民間詩歌的物质怀抱中而是在欧洲的土壤上培养了自己的詩才，不是由《伊戈尔王子远征記》，不是由基尔沙·丹尼洛夫的神話詩、不是由老百姓的詩歌所調制的，而是由罗蒙諾索夫、捷尔沙文、馮維辛、波格丹諾維奇、克雷洛夫、奧捷罗夫、卡拉姆津、德米特利也夫、茹柯夫斯基和巴丘什訶夫所养成的，也就是由一些模仿者、絲毫也不是民族作家和詩人們所养成的，其中只有一个克雷洛夫是例外，他的寓言虽然說是民族的，然而毕竟不是完全独創的現象，因为寓言的形象不是由克雷洛夫从民間詩歌中找到的，而是从法国人拉方登那里找到的”<sup>④</sup>。

① 《別林斯基全集》，第5冊，第64頁893。

② 同上書，第84頁894。

③ 同上書，第64頁895。

④ 同上書，第65頁896。

矛盾推动前进。而当内部生活没有矛盾时，人们就不得不从外面寻找社会进步的动力。

## 八

别林斯基在他同斯拉夫派人进行最激烈的搏斗的时代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辩证论者，然而在斯拉夫派人的世界观中却完全缺乏辩证的成分。黑格尔会把他们称为地道的形而上学者。

563 让我们拿阿·斯·霍米亚科夫来说吧。他在上面我们所引证的《寄彼得堡的信》中，当说明征服在西欧所引起的后果时说：“继续不断的战争经常被暂时的条约所缓和，从这个永恒的动荡不定之中产生了完全有条件的生活，——契约或合同的生活，这种生活服从于逻辑的规律或者比方说，服从于物质利益的规律。正确的代数公式实际上就是欧洲民族的全部生活所不自觉地追求的理想。”据斯拉夫派人的看法，西欧的宪法也就是表达引起西欧社会中不断互相斗争的各种不同成分的力量对比的公式。使全部生活服从于“逻辑的规律，或者比方说，服从于物质利益的规律”的斗争，也在西方人的精神面貌上烙下自己的印记。西方精神生活的特点是理智占优势。我们却不是这样。在俄国“没有过斗争，没有过征服，没有连绵不断的战争，没有接连不断的条约；它不是条件的创造物，而是有机的、活的发展的产物；它不是建造成的，而是生长起来的”<sup>①</sup>。所以它需要的不是宪法——这是人民和君主之间的契约——而是沙皇和“土地”的可爱的统一。根据同一个原因，真正的俄国人不犯理智的毛病，因为他们的思想的特点是令人羡慕的和有益的完整性，由于这种完整性而知识和信仰共处得很好，而

<sup>①</sup> 《莫斯科人》，1845年，第2卷，《创作》栏，第77页。



且还保障我們免于遭受任何社会动蕩。伊·基列也夫斯基也說同样的話：“几乎在任何一个欧洲民族内国家制度都不是从民族生活和民族自觉意識的平靜发展中产生的，在那里支配人們的宗教和社会的概念，体现在人的生活关系中，自然地成长起来和巩固起来，联結成为一个共同的意志，这种共同意志正确地反映在社会机体的完善的整体中。相反地，欧洲的社会生活，由于某种奇怪的历史偶然性，几乎到处都是通过暴力而产生的，是从两个敌对的部落的殊死斗争中、从征服者的压迫中、从被征服者的反抗中，最后，从那些使得敌对双方不相称的力量的爭論得以在表面上結束的条件中产生的”<sup>①</sup>。

相反，俄国既完全不知道經過暴力而产生出国家制度，也不知道充滿着理智的文明。构成俄国生活基础的俄国智慧是在正教教会的神父們领导下形成和培养起来的。广大的俄国土地上很久以来就布滿了許多寺院，它們是教育的泉源。基列也夫斯基說：“从寺院向所有各个部落和公国射出了意識和科学的光芒。因为不仅人民的精神概念是从寺院那里来的，而且連人民的所有道德的、共同生活的和律的概念也是通过寺院的教育影响后，又从它們回到社会意識中，采取一个共同的方向。僧侶是从人民的各个階級中、从社会的低級和高級的人們中毫无区别地組成的，它又轉而向一切階級和等級传布自己的高度文明，直接从最初的来源中、从当代的教育中心（那时候是在沙里格拉得、叙里亚和圣山）汲取文明”<sup>②</sup>。

564

霍米亞科夫、基列也夫斯基兄弟、康·阿克薩柯夫等人的斯拉

<sup>①</sup> 在論文《論歐洲教育的性質及其對俄國教育的關係》中，《全集》，莫斯科 1861 年版，第 2 卷，第 240 頁。

<sup>②</sup> 同上書，第 259—260 頁。

夫主义同亚历山大·一世时代的“斯拉夫主义”大不相同，它是由地主等级的思想家在两欧阶级斗争的事实最有力的影响之下创造的俄国历史的哲学<sup>①</sup>。别林斯基的思想发展的历史是天才的俄国平民知识分子的历史。当时平民知识分子本能地——至少是在精神上，力求投入那个表现了当时西欧社会特有的不断的阶级斗争的伟大的社会运动中去。吸引别林斯基的，正是吓坏了斯拉夫派人的东西。伊·基列也夫斯基写道：“以暴力开始的欧洲国家，必然依靠政变取得发展”<sup>②</sup>。“狂暴的維薩里昂”在这一点上是会同意基列也夫斯基的。但是，在和叶果尔·费多罗维奇的“哲学帽子”决裂以后，他已能珍视欧洲屡次政变的伟大的全世界意义。他由于一篇论文而同巴枯宁和解，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巴枯宁在这篇论文中证明了“破坏的热情是创造的热情”。我们的反动派甚至在他谈论纯粹文学问题时，也嗅到了他是“基础的破坏者”，这并不是偶然的。反动派常常是有极好的嗅觉的。

## 九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别林斯基在这一被考察的时期所特有的世界观的缺点。

565 如果这种世界观的优点可以用它渗透了辩证的精神来说明，那末它的缺点却植根于这样的情况：别林斯基的辩证法，也类似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

有些文学的批评家和历史家认为别林斯基在逝世前宁愿从艺术观点而不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文学，我和他们相反，再向读者提醒

<sup>①</sup> 我现在所撰写的论文《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即将详细叙述这一点。这篇论文将载于《现代世界》897。

<sup>②</sup> 《基列也夫斯基全集》，第249页。

一次，实际上，从他轉到辯証的观点时起，对詩歌的历史的看法在他那里已經占了优势。他还在1841年就坦白地說过：“任何一个民族的詩歌都是和它的历史密切联系着的；在詩歌和历史中都含有民族的秘密心理状态，因此他的历史可以用詩歌來說明，而詩歌又可以用历史來說明”<sup>①</sup>。好像是絲毫不让人們怀疑他心目中的历史指的是什么，他补充說：“我們这里指的是一个民族的内部历史，用它來說明这个民族生活中的外在和偶然的事变”<sup>②</sup>。但是內在历史本身应当用什么來說明呢？用人民的世界观來說明。別林斯基說：“一个民族的內在的历史源泉在于他的‘世界观’，或者他对世界和生存秘密的直接看法”<sup>③</sup>。这当然已經是最純粹的唯心主义。在另一个地方，虽然說也在那时先后，別林斯基說得更清楚：

“文学是民族的意識，在文学里面，正如在鏡子里一样，反映着人民的精神和生活；在文学里面，也和事实里面一样，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使命，一个民族在人类的大家庭中所占有的地位，人类精神的全世界历史发展的契机，一个民族是以自己的存在来表現这种契机的。一个民族的文学的源泉可能不是任何外界的刺激或者外界的推动，但只是民族的世界观。任何一个民族的世界观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本质(实体)，是他与之一起出生就好像真理的直接的天启一样的对世界的本能的、內在的看法，而这一看法也是他的力量、生活和使命——是那有着一个或几个虹的原色的三棱鏡，这个民族透过这个三棱鏡可以观察一切存在物的生活秘密。世界观是文学的泉源和基础……确定一个民族的世界观是一个伟大的任务，是值得一些最伟大的天才、現代哲学知識的代表們去努

566

① 《別林斯基全集》，第5册，第62頁898。

② 同上899。

③ 同上书，第63頁900。

力从事的巨大劳动；这就是說，要彻底研究我們所談的那个民族的整个生活……”<sup>①</sup>

說任何一个民族的世界观都是它的文学的泉源和基础，这当然是无可爭辯的。但是問題在于：一个民族的生活是决定于它的世界观，还是相反地，民族的世界观是由它的生活条件造成的。別林斯基用唯心主义的方法解决了这一根本問題。他把民族的世界观叫作“真理的直接的天启”。如果考虑到早在1842年，在我們的作者看来整个自然界——“整个世界，整个生命”——是沒有血肉和沒有形体的概念的体现，那末这完全是不足惊异的<sup>②</sup>。但是別林斯基对“民族精神的实体”的唯心主义看法，同他关于西欧社会內在历史的見解——它們明白地向我們指出了西欧各民族的精神的丰富决定于他們的社会生活的丰富內容（为征服的事实所决定的“理性的斗争”）——一致的程度怎样呢？当然，这二者是根本不一致的。指出西欧社会特色的階級斗争这一点就是唯物史观的萌芽之一，这种萌芽我們在別林斯基本人的論文以及他的老师黑格尔的許多著作中都可以看到。这一萌芽是——即使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也不能不是——沒有发展的。因此別林斯基对西欧社会內部历史的清楚而彻底的看法，补之以他对俄国内部发展的模糊而不彻底的看法。

社会各階級的相互斗争，是西欧丰富的精神发展的源泉。在俄国就沒有这种源泉。所以俄国必須求助于西欧。別林斯基是这样想的。但是，不用說，以援引同俄国民族一齐“出生”的另一“真理的直接的天启”，不像落在西欧各民族头上的“直接的天启”来說明缺少这一可貴的源泉，是极端奇怪的，此外，还应当注意下列一点。

① 《別林斯基全集》，第4册，第210頁901。

② 对于尼基田科《論批判的眞說》的評論，《全集》，第6册，第203頁902。

俄国为了用从西方吸取的精神财富来丰富自己，显然应当把这一财富的产生和成长的原因移植到自己的土壤上来。因为社会各阶级的相互斗争就构成了这个原因，所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彼得的改革只是在下列场合——如果这种改革会导致在我国出现有益的“理性的斗争”的那些社会条件时，——才会丰富“我们民族精神的实体”。现在，马克思的信徒们认为彼得大帝改革的意義就在于此。他们认为，这种改革大大加速了我们旧经济关系的解体，因而逐步地把我们的经济发展引向西方经济发展早已走去的那个方向。别林斯基是不是这样来看彼得的改革呢？不是。别林斯基在他去世以前，当他已经完全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决裂，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时，他诚然表示了这样一种思想：如果在我国发展了资产阶级，也就是说，假使我们的经济制度和西欧的经济制度相似，那就好了。但是他的这种思想完全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正是这个人（而且还是一个真正的天才），在1841年就已经如此清楚地理解到阶级斗争在西欧社会内部历史中的作用，能在1847年（在3月8日给波特金的信中说的）把自己关于俄国民族未来的一切想法适应于“俄国个性”的特点。别林斯基写道：“俄国的个性现在还是一个胚胎，但是这个胚胎的天性的广阔和有力，正如它的任何局限性和狭隘性一样地使人喘不过气和可怕。它害怕和最不能容忍局限性和狭隘性，而照我的意见，现在不满足于任何东西，不做某种坏透了的片面性的奴隶，那是不错的”<sup>①</sup>。亚·尼·貝平說，別林斯基的某些朋友根据他的这类意见，仅仅看到他有“几乎接近于斯拉夫派唯心主义”的倾向。这里几乎是不适当的，因为依赖俄国个性的特点，这完全等于訴之

507

<sup>①</sup> 亚·尼·貝平：《別林斯基，他的生平 and 通信》，第九章903。

于俄国民族精神的特点，斯拉夫派也是如此经常和如此乐意地诉之于这些特点的<sup>904</sup>。要知道斯拉夫派也主张历史唯心主义，在他们看来，人民的世界观也是所有他的历史的……我可以說，是历史的运动的基本推动力，如果在斯拉夫派的历史观里运动不像是两滴水一样地与不动性那样相像。

## 十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别林斯基不仅和斯拉夫派接近；比如，他也和馮維辛接近，虽然他在任何一篇论文中也没有指出过我在这里所說的《纨绔子弟》的作者观点的那一方面。

馮維辛在1778年1月25日(2月5日)从蒙别里叶写给雅·伊·布尔加柯夫的信里說：

“我不想描写我們的旅行而使您觉得无聊，我只說，这次旅行向我证明了一句諺語的真理：山那边的鈴鼓最好听。不錯，聪明人在任何地方都是少有的。假使在这里有人在我們之前开始生存过，那末，我們現在开始生活的时候，至少可以給自己提出我們所喜欢的形式，以避免在这里已經根深蒂固的那些不便和坏事。Nous commençons et ils finissent<sup>①</sup>。我以为，将要出生的人要比快死的人幸福一些”<sup>②</sup>。

就我所知道的，这是我們的“进步公式”中的最早的一个，它以历史唯心主义为基础并且归结为这样一个可以欣慰的信念：那就是“我們”可以給自己提出任何“形式”。后来在我們这里那样叫嚣的主观的“进步公式”正是那同一个公式，只不过是确定的算术上的量来代替代数上的字母：村社，人民的生产形式，等

① [我們將开始，而他們將結束。]

② 《著作，书信及其他》，叶弗列莫夫主編，第272—273頁905。

等<sup>①</sup>。而我們 *mutatis mutandis*<sup>②</sup>在恰达也夫那里遇到了那同一个“公式”，因为他实际上从事了赫尔岑和卓尔尼雪夫斯基那样的計算。在这一基本公式的每一变相中，“我們”并不是指人民群众，而是指打算作人民的領導者的那一部分居民。例如，請看別林斯基关于彼得大帝历史作用所說的話：“俄国的詩歌和俄国生活一样……在彼得大帝以前只是肉体，然而充满着有机生命的肉体，是强壮、健康、有力、伟大、有充分能力、完全应当成为无限伟大的灵魂的容器，——但是缺少这个灵魂，只是在期待、寻找灵魂的肉体……彼得給肉体貫注了活的灵魂，然而精神在一想到等待着彼得的人民的无限伟大的命运时，便停滯不动了……”<sup>③</sup>。在赫尔岑的“公式”中，人民和他的村社生活，起着肉体的作用，起着彼得的作用的却是有教养的貴族，主要是中小貴族，渗透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就被推荐給了中小貴族。在主观主义者那里，平民知識分子等等代替了貴族。問題并不在于这些变化，而在于每一次变化中，历史发展的动力并不是人民，而是对人民有好感和替他們选择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某人。为了把話題轉回到別林斯基那里，我补充說，他对俄国社会发展的可能的进程的唯心主义观点使他和自己对立起来。請看，比如，他是怎样譏諷那些創造小俄罗斯民族文学的嘗試的。“至于說到小俄罗斯人，那末，如果以为他們美丽的民間詩歌現在能有什么发展的話，却是可笑的：因为这个民間詩歌不仅絲毫不能发展，而且从彼得大帝时代起就已停滯不前了；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推动它前进，即小俄罗斯人中最优秀、最高貴的部分

569

① 按普列汉諾夫这里的意思是：民粹派用村社和人民生产这个具体的东西和具体的主张代入了馮維辛的进步公式中去了。——譯者

② 在改变了應該改变的东西以后。

③ 《別林斯基全集》，第5冊，第159頁906。

丢掉法国的卡德里尔舞，重新跳俄国农民的特列帕克舞和乌克兰民间的果拍克舞，把燕尾服和大礼服脱掉换上古代乌克兰人的短上衣和长袍，剃光头并在头顶留下一小绺头发——一句话，从文明、有教养和人道的状态（小俄罗斯只是在同俄国统一以后才获得这些东西的）重新回到从前的野蛮和愚昧状态”<sup>①</sup>。

别林斯基在任何时候都绝对没有想要戴上贵族成见的眼镜来看人民的倾向。但是，这里在他看来小俄罗斯人中最高贵和最优秀的一部分却正是穿着燕尾服和大礼服跳着法国卡德里尔舞的贵族。

六年以后，别林斯基在反驳那些责备我们有教养的少数人背叛了民族传说的斯拉夫派时写道：“民族被划分为对立的、互相仇视的多数和少数，从逻辑方面说可能是对的，但是从常识方面说却绝对是错误的。少数总是好的意义或是坏的意义的大多数表现。更奇怪的是，只把坏的品质强加于人民的多数，而只将一些好的品质说成是少数人的。如果就路易十五世时代荒淫的贵族来判断法国民族，那末它就会是好的！这一例子指出，少数很可能是一个民族民族性的较恶劣的方面，而不是好的一些方面的表现，因为这个少数过的是矫揉造作的生活，使自己 and 多数对立起来，并把多数看作是同它分离的和陌生的某种东西。我们在我们现代的法国，在 bourgeoisie<sup>②</sup> 身上也看到了这一点——它是现在法国占统治地位的等级”<sup>③</sup>。

把民族划分为对立而互相敌视的多数和少数，从常识方面来说，绝对不是错误的：它是阶级斗争过程的必要的先决条件，别林

① 《别林斯基全集》，第5册，第65--66页907。

② 〔资产阶级〕

③ 《别林斯基全集》，第11册，第44—45页908。



斯基借助于这个过程如此成功地对我们说明了西欧精神的发展。570  
为什么少数总是多数的“表现”呢？难道征服者是被征服者的“表现”吗？难道贵族是第三等级的“表现”吗？别林斯基自己也承认不是这样的，他指出：“如果就路易十五世时代荒淫的贵族来判断法国民族，那末它就会是好的。”并且他也断定，与他同时的法国资产阶级应当被看作是法国民族性格的恶劣方面的表现。但是要知道这就是说，上述的民族划分是完全正确的。在我们这位天才作家的判断中，这种不寻常的动摇性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别林斯基不能把他对西欧发展的看法和对俄国发展的看法一致起来。他所以不能使两种看法一致起来是因为如我已经说过的，这些观点它们是互不协调的：第一种看法是唯物史观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第二种看法却浸透了唯心主义<sup>①</sup>。

## 十一

我請讀者注意下面的摘录。

别林斯基在1844年分析斯特罗也夫翻译的欧仁·苏著《巴黎的秘密》一书时，这样地说明了当时法国的内部情况：

贵族是彻底垮台了，小市民阶层已经坚定地代替了贵族，继承了它的特权，而在同贵族阶级斗争中帮助了小市民阶层的无产者却仍然一无所有。“无产者作为有产者和资本家的终生的工人，完全被掌握在他们的手中，完全是他们的奴隶，因为他们给予这些奴

<sup>①</sup> 别林斯基在继续反驳斯拉夫派时说：“因此，任何进步，任何前进运动的源泉不在于各民族的两面性，而在于人的本性，脱离真理、因循保守和停滞不动的源泉同样也在于人的本性”（《全集》，第11册，第46页）909。在这里好像发生了立场的完全改变。在别林斯基的叙述中竟然发现斯拉夫派是诉之于“两面性”的，也就是说，诉之于不同类成分的相互斗争，认为它是一切进步的源泉，而他却避开这一源泉，诉之于人的本性。根源于唯心史观的这种自相矛盾不能走得更远了。

571

隶工作,并任意规定工资”<sup>①</sup>。饱食终日的资产阶级越来越腐化了。但是善良的火花在法国还没有熄灭;法国的情况完全不是不可救药的。人民在拯救法国。“在人民当中教育已在迅速发展,而且人民已经有了自己的诗人,他们给人民指出了未来,同人民分享痛苦,而且无论在服装和生活方式方面都和人民没有区别。他还较弱,但是只有他保持着民族生活的火焰和信念的生气勃勃的热情,这种热情在‘上流’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却已熄灭了。而且即使在现在,人民也有真实的朋友,他们是一些以自己的誓言和希望同人民的命运融合起来的人,而且他们自愿地放弃了争夺权力和金钱的市场。在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学者和文学家,在欧洲都享有声望,有一切办法可以在立宪的市场中站在最前列,但是他们却在自愿而诚恳的贫穷之中生活和劳动。他们有良心和有力量 的声音,在当局的那些买卖人和股东们听起来是可怕的,而为了贫穷和被欺骗的人民发出来的呼声在剧院班主的耳朵里就像是末日审判的号角”<sup>②</sup>。在这里正确地指出了“贫苦人民”对他的朋友们——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态度。社会主义者为了人民而振臂高呼,然而人民本身却还是“软弱的”。但是别林斯基看到人民的软弱只是暂时的:“人民是儿童,但是这个儿童却在成长,大有长成充满力量和理性的男子汉的希望”<sup>③</sup>。换句话说,人民会拯救法国的,他们的意识在法国的社会政治关系令人头脑清醒的影响下迅速地发展着。

而在我国呢?在刊登于1846年《彼得堡论丛》的《关于俄国文学的思想和意见》这一论文里,我们的作者十分详细地考察了俄

① 《别林斯基合集》,第9册,第14页910。

② 同上书,第16页911。

③ 同上书,第15页912。

国的情况。据他的意見，我們用不着訴說命苦，因为科学正在我国生根，虽然还没有根深蒂固，而教育已經生了很深的根：“它的叶子是小而稀少的，莖不高也不粗，但是根子已經是这样地深，任何风暴，任何洪流，任何力量也不能把它拔去”<sup>①</sup>。我国教育所以取得成就主要应当归功于我国文学。文学在俄国的作用是巨大而且甚至——让我再补充一句——是有些意外的。文学不仅創造了我們社会的风尚，而且也“为等級間的內部接近开辟了道路，形成一种輿論，并在社会中产生了某种近似特殊階級的东西，这种階級和普通的中間等級的差別在于它并不是由商人和小市民組成的，而是由一切等級的人組成的，他們通过教育而互相接近，而我們的教育是完全集中于对文学的热爱上的”<sup>②</sup>。

在法国，进步的推动力是階級斗争，而在我国，则是导致各个等級互相接近的文学。法国的階級斗争导致了人民觉悟的提高；在我国，由于文学的影响产生了一个由一切等級出身的人組成的特殊階級。稍下面一些，別林斯基說：文学教育的差別在我国也轉到生活中，“并且把人們分为有不同行动、不同思想和不同信念的一代人，他們的生动的爭論和論战的关系是由原則而产生的，并非由于物质利益而产生的，这是在社会中发生和发展的精神生活的征兆”<sup>③</sup>。

在西欧是階級斗争；在我国是原則的斗争。在西欧是社会主义；在我国是各代人的更替。讀者看出，这两种看法实际上是互不協調的。

天才的別林斯基感觉到，在这里事情不大对头，这个矛盾应当

① 《別林斯基全集》，第12册，第242頁913。

② 同上书，第243頁914。

③ 同上书，第245頁915。

解决。他感叹地说：“现在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俄国贵族还没有变成资产阶级之前，俄国国内的发展是不会开始的。波兰最好地证明了，剥夺了资产阶级各种权利的国家是多么巩固”<sup>916</sup>。但是天才的别林斯基所感觉到的东西，还是俄国的民主主义者长期所不能理解的。他们（民粹派和主观主义者）还是长期地反复说：“上帝保佑我们摆脱资本主义吧”。然而生活却已决定别林斯基是正确的。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生活所作的这个判决的解释者。

再说两句话。别林斯基相信，不论教育和文学在俄国的作用有多么大和多么有益，但是要知道它们并没有支配俄国的命运。而像彼得大帝这样的人是少有的。尼古拉政体很不欢迎文学和教育。从哪里找出路呢？咳，还是要从那个政府的善良意愿中寻找。

在1848年初，也就是在别林斯基给果戈里写了那封有名的、热情洋溢的革命抗议的信以后，他在写给一个住在巴黎的朋友的信中，严峻地指责了一些人，他们由于自己不耐心的狂妄行为“激怒了政府，使它多疑，在没有任何事情的地方以为要发生暴动，以致引起对文学和教育采取严厉而危险的措施”<sup>917</sup>。这里所说的是有名的舍夫琴柯事件。亚·尼·别平指出，别林斯基对于这个事件是不够了解的。毫无疑问，果然是这样的。但是别林斯基的一般思想仍然是一样的：不应当激怒政府，否则它就会对教育和文学采取危险的措施。但是尼古拉政府是这样容易激怒，于是他这种思想仍然是不能实现的，因而文学和教育没有一分钟不在受到危险措施的威胁。别林斯基不能不意识到这点，因而也不能不看见，他对美好未来的希望是建筑在极不巩固的基础上的。但是他不能给这些希望找到别的基础。在这方面，他很像十八世纪伟大的法国启蒙者，他们从自己的历史观点来看，也是把希望主要寄托于教育的进步之上，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当时专制君主的阻力经常在威

胁着教育。因此他們也力求不触犯这些君主，至少是不触犯那些离他們較远（普魯士和俄国）而作出同情他們学說的样子国王。对这些离得較远的君主的善良意願的信心实质上是很小的；但是他們仍然向这些国王討好，觉得这总比沒有任何东西要好些。正如我在我的《論一元論历史观之发展》一书中已經指出的，历史唯心主义在它最流行的变种——就是主观的历史唯心主义——中，給自己的信徒們开辟了远远不是如它的捍卫者所想的这样令人可慰的，——而最主要的是——远远不是这样稳定的前景。可以完全不夸张地断定，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才能成为完全而有觉悟的彻底的政治家<sup>①</sup>。

启蒙思想家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于教育的成就上，然而有权力的贖味主义者却經常以“严厉而危险的”措施来威胁它。无足惊异的是：启蒙思想家中最沒有耐心的人暂时抛弃了主观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而訴之于事物的客观邏輯，力求在人民生活中找出一些其存在本身就保证理性将来胜利的因素。在我們的社会思想史中，起着这些因素的影响的是我們人民生活的某些陈旧的形式，首先是乡村村社。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对村社的同情已經是很明显的。汉內科夫感叹地說：“我的祖国，你的村社制度在哪里，你，人民的自由民，伟大的君主——諾夫戈罗德在哪里？”<sup>②</sup>我已經向讀者提醒，后来村社在民粹派和米海洛夫斯基式的主观主义者的思想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但是，也許不是所有的人现在还記

574

① 沒有領悟这点的教授亚·伊·涅杰連諾夫完全妄費心机而很不聰明地把伟大的法国启蒙思想家根源于他們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政治不彻底性，当作是他們在道德上的不正直行为。（見他写的《叶卡特林娜时代的一些文学潮流》和《尼·伊·諾維柯夫》。）

② 《尼古拉时代的政治案件。——十二月党人。——秘密会社。——柯列斯尼柯夫、克里茨基和拉也夫斯基兄弟案件》。沙布林出版社，莫斯科1907年版，第22頁。

得米海洛夫斯基自己不止一次地向政府证明，在西欧具有革命意义的“社会问题”，在我国却是保守的问题。我们已经熟悉的和以历史唯心主义为凭借的政治思想完全不可避免的不彻底性，在这里已经表现出来了。

## 十二

别林斯基在《1846年的俄国文学一瞥》一文中，在同斯拉夫派争论时，说道：“可是不能只停留在承认任何事实的正确性上面，而应当在从丑恶本身中找寻出摆脱丑恶的手段的希望中，研究事实的原因”<sup>①</sup>。这纯粹是辩证的观点，完全无愧于伟大黑格尔的天才学生。稍下面一些，他用另一些话表达了同一个观点。

他指出了：俄国现在有许多人在出国时是“坚决的欧洲人”，而回国时，连自己也不知道是谁，正因为这样而愿意成为一个俄国人；接着他就问道：“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斯拉夫派是对的，彼得大帝的改革只是剥夺了我们的民族性，并使我们变成平庸的人了吗？当他们说，我们应当回到不知是神话般的戈斯脱麦斯里的时代，还是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sup>②</sup>的时代（关于这点，斯拉夫派先生们还没有彼此商量好）的这些话时，难道他们是对的嗎？”<sup>③</sup>不言而喻，他并没有这样想。“不，这完全意味着另一件事，那就是：俄国是完全完成了，度过了改革的时代，改革在俄国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它为俄国做了它能做和应当做的一切，俄国现在已经到了独立发展，依靠自己力量发展的时候”<sup>④</sup>。

<sup>①</sup> 《别林斯基全集》，第11册，第25页918。

<sup>②</sup> 戈斯脱麦斯里是俄国古代历史中的神话式的人物。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则为俄国罗曼诺夫朝的第二代沙皇，大彼得之父。——译者

<sup>③</sup> 《别林斯基全集》，第11册，第26和27页919。

<sup>④</sup> 同上书，第27页920。

在这里，“独立地”这一詞是以辯证法的意思使用的，按照这个意义，正如別林斯基在另一个地方所說的那樣<sup>①</sup>，“任何一个現象的結果，应当在这一現象本身中去寻找”。对于这一点，也是絕對没有什么可以反駁的。但是別林斯基所說的是哪种現象呢？說的是俄国的发展。这种发展应当自己来进行，也就是說，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进行。这又是正确的。但是这里有一个問題：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如何呢？我們已經知道，根据別林斯基的意見，在西欧，这些力量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階級斗争。它决定了西欧各民族的精神发展。存在决定意識。而在俄国呢？別林斯基在这里重复着說：“俄国用不着和欧洲古老的国家去比較，这些国家的历史走了与我們完全相反的道路”<sup>②</sup>。我們假定是这样。但是要知道，不是有某种力量在推动着我們的社会生活前进嗎？在別林斯基看来，这种力量是俄国的民族性，也就是說，是俄国的民族精神<sup>③</sup>。这确实是和西欧所发生的事情完全相反；在那里，存在决定意識；在这里，意識决定存在，或者至少应当在将来决定存在。但是我們已經知道，按照別林斯基的意見，俄国的民族精神需要外部的推动力来促进自己的发展，而它为此所需要的外部推动力应当来自西欧。西欧借以推动俄国的那一传动机械又在哪里呢？在过去，政府起了这种机械的作用（首先和主要是彼得大帝），而現在和将来起这种作用的，据別林斯基的想法，是被他們称为“中等階級”而被我們称为知識分子的那个社会阶层。

把知識分子看作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的看法，是純粹启蒙思想家的看法，它是以意見支配世界这一历史唯心主义的基本論

① 《別林斯基全集》，第9册，第253頁921。

② 同上书，第11册，第29頁922。

③ 同上书，第30--31頁923。

点为依据的。我丝毫不打算在这里批评这一看法，但是我认为应当考察一下在这种看法的影响下，别林斯基的思想方法是朝着哪个方向改变的<sup>924</sup>。

576 把阶级斗争看作是西欧精神发展的丰富泉源的这一辩证的看法要求以这样的辩证的想法作为自然补充，即知道阶级斗争进一步的潮流是以怎样的方法决定西欧思想发展的以后的方向的。这一要求即使在西欧也远不是一下子实现的。只有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才能满足这个要求。但是完全不可争辩的是：这个要求是从上述纯粹唯物主义的把阶级斗争看作西欧社会整个历史运动的最深刻的原因的看法中自然而然地来的。而从别林斯基对俄国发展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看法合乎逻辑地得出来的那个主要要求又是怎样表述的呢？

假使知识分子（“中等阶级”）是俄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那末可以明显地看出，首先应当关心的是这一教育任务的体现者自身应当更好地受到教育。如果知识分子对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概念越正确，那末它的教育水平就越高。这就是说，文学的首要任务应当被认为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建立正确的概念。别林斯基在他的文学活动的最后几年里正是竭力向这方面努力的。在我从前所写的一篇论文中，把他称为在六十年代里一直起着这种卓越作用的我们的启蒙思想家的鼻祖。他实际上也确实是这样的人。

### 十三

别林斯基早在1841年就已经写道：“对俄国说来，觉悟的时代来临了。尽管我们俄国人，不是没有原因地责备自己的冷淡和漠不关心，我们已不能满足于空洞的议论和陈旧的概念，但是宁肯虚



假地和錯誤地加以判斷，也比重復由于輕信或是懶惰和冷淡而採取的現成的判斷要好些”<sup>①</sup>。值得指出的是：為了說明自己的思想，別林斯基舉出了對於普希金的态度問題作為例子。對於普希金早已提出的一些判斷的正確性表示懷疑的許多人，開始懷疑他的詩的偉大。據別林斯基的意見，“這個現象是可以令人欣慰的：它表現了對獨立思考的要求，對真理的要求，真理占有首要地位，並且高於一切，甚至高於普希金本人。Amicus Plato, sed magis amica veritas<sup>②</sup>，這是句聰明的格言！”<sup>③</sup>人們不禁回憶起德·伊·皮薩列夫和他那有名的論文《普希金和別林斯基》。大家知道，許多自認為是別林斯基的崇拜者的人，對於皮薩列夫是非常憤恨的。應

577

當認為，別林斯基會盡力沖淡他們的憤怒的。

他決不會同意那些否認普希金是偉大詩人的人，但是他也不會對他們生氣。

“我們的想法和這些人的想法完全相反；但是假使他們的意見不是從某種外部和不體面的原因產生的話，那末我們準備為了真理而和他們爭論一番，並且確信，只有通過這樣的爭辯真理才能出現，才能共同認識真理，並能成為共同的信念。然而我們遠遠沒有這樣想：即把這樣一些人看作是分裂分子，污辱偉大詩人和民族自豪感的真理的歪曲者。我們還要說，我們懂得，可能也有這樣一些否認普希金的天才的人，他們比許多人云亦云、無條件地崇拜偉大詩人的光榮的人要值得尊敬千百倍。這樣一些否定者的出現所暴露的不是社會對真理的冷淡，勿寧說是对真理的正在增長的熱愛，因為毫無意見地、無條件地承認某種東西，不用理智加以檢驗，比

① 《別林斯基全集》，第4冊，第373—374頁925。

② 《柏拉圖是朋友，但是真理是更大的朋友》926

③ 同上書，第374頁927。

起怀疑和否定来，勿宁說是社会对真理事业无动于衷的冷淡的特征。不，在年輕的社会中这样的否定者的出現是新生的思想生活的特征”<sup>①</sup>。

可以想到，別林斯基在当时就已預見到皮薩列夫和他的反对普希金的論文的出現，而且預先替我們的启蒙运动中的这个 enfant terrible<sup>②</sup> 努力寻找加以原諒的理由。

但是还有一件更有兴趣的事。我們的作者在 1841 年 9 月 8 日給波特金的一封信中，对于庫德里亚夫策夫的一篇小說<sup>③</sup> 的很大的——据他的意見——艺术优点給予应有的评价时，补充說，虽然如此，他不喜欢这部小說。“我开始为自己担心——因为我对于艺术的客观創作产生某种仇視心理”<sup>929</sup>。亚·尼·貝平把这叫作“四十年代巴札罗夫式的特点”。如果指出这个“巴札罗夫式的”——也就是說，純粹启蒙式的——特点是在別林斯基的思想主要受到黑格尔辯证法的影响时出現的話，那将是很有益的。当他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同“丑恶的俄国现实”在文学方面进行斗争时，这个斗争就显得更加深刻和更加明显。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随着別林斯基的注意力由理論轉到实践，西欧生活的一些問題就越來越被“俄国现实”的問題排挤出了他的視野。可是我們已經看到，在分析俄国的现实时，（由于我們社会关系的异常不发达）辯证法已經不听他使喚了，于是他轉向主观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即轉向启蒙运动者的观点。

誰不記得杜勃罗留波夫关于俄国十八世紀后半期的文学所写

① 《別林斯基全集》，第 4 冊，第 374—375 頁<sup>928</sup>。

② 〔直譯是：可怕的小孩子〕

③ 亚·尼·貝平认为这里所說的是刊登在 1841 年第 9 期《祖国紀事》上的庫德里亚夫策夫的小說《花》。

的論文，特別是關於這一時代的諷刺作品所寫的論文呢？誰不記得他為什麼攻擊當時的諷刺文作者和攻擊他們的什麼地方呢？不難理解，這些論文是在別林斯基最有力的影響下寫成的，而且其中有些地方好像進一步發展了我們的啟蒙運動者的鼻祖順便說出的思想。下面就是一個例子。

在《1843年的俄國文學》這一論文中，別林斯基說：“從前，諷刺文在光天化日之下勇敢地出現在人民中間，甚至也不想用化名，而直接和公開地使用本名，即使用諷刺文的稱名，並且誰也不因為它而生氣，甚至誰也沒有覺察出它所作的鬼臉和撇嘴。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在諷刺文里誰也沒有認出自己來；由於諷刺攻擊的是一般的惡習，這是任何人都有充分權利不把它記在自己賬上的惡習；是由於它是一本書，印刷的紙張，是無辜的學校修辭課的練習……”<sup>①</sup>

杜勃羅留波夫在《俄國葉卡特林娜時代的諷刺文》這一篇論文中證明，諷刺這是“揭發，為爭辯而爭辯，為俏皮話而說俏皮話”，而且“要談到真正的事情那還距離很遠，不僅在語言上而且在諷刺文作者的思想上都這樣”<sup>②</sup>。

兩位作者發揮了同一個思想，但是——位作者只是以一般的形式敘述的，而另一位作者是應用於一定的時期的，難道不是這樣嗎？

別林斯基繼續說，生活在社會中的人無論在自己的思想方法上或在行為上都取決於這個社會。從前的諷刺文作者不懂得這一點，“為什麼這些善良的諷刺文作者對於一個人，不注意他所受的教育，也不注意他對社會的態度，而在空閒的時候就把他當作他

① 《別林斯基全集》，第8冊，第62頁930。

② 《杜勃羅留波夫全集》，第2版，第1卷，第121頁931。

們的想像所創造的草人隨便拉出來呢？”<sup>①</sup>而杜勃羅留波夫又怎樣呢？他寫道：

“大部分的社会現象不能單純由個人的意志來改變；需要改變環境，為一般的活動提出一些別的原則，在那時候就可以揭發那些不能利用新制度利益的人。我們的諷刺文作者一部分不願意理解這一點，而一部分雖然懂得了，却不能加以表達。他們攻擊了愚昧、賄賂和假仁假義，沒有法制，對待下層人民的傲慢和殘忍，對待上等人的卑躬屈膝等等。但是在這些揭發里很少透露這種思想；所有這些個別的现象不是別的，只是整個社會制度的不正常現象的必然後果。絕大部分是這樣攻擊賄賂行為：仿佛所有賄賂的惡劣行為完全由於某些人要榨取請求者的個人傾向而發生的”<sup>②</sup>。

在這裡，杜勃羅留波夫又只是把別林斯基關於在善良的舊時代的“善良的諷刺家”所講的一般思想應用於葉卡特林娜時代。

車爾尼雪夫斯基本人有時好像只是把別林斯基的思想加以發揮或者應用於別林斯基思想的新的情況。這裡有一個驚人的例子，就我所知道的，它還沒有被我們的文學史家所注意。別林斯基在反駁那些攻擊彼得大帝，說他剝奪了俄國通過自己發展的道路逐漸獲得文明的可能性的“衛道者先生”們時問道：

“在俄國面前已經擺着終點的時候，它還能從頭開始作起嗎？比如，難道它的軍事藝術應當從歐洲軍事藝術在封建時代所開始的地方來開始建立起來嗎？那時候在歐洲人們是用鐵炮和臼炮射擊的，用刺刀武裝起來的、在一個人的指揮之下轉動的整齊的隊伍能夠戰勝它的混亂的烏合之眾。真是可笑的想法！假使俄國應當學

① 《別林斯基全集》，第8冊，第64頁932。

② 《杜勃羅留波夫全集》，第1冊，第119—120頁933。

习欧洲十七世紀那种状态的軍事艺术,那末它就应当学习数学,筑城学,重炮兵学,工兵艺术和航海学;所以,它能在算术和代数在俄国已經生根,并且对它們的研究在人民的各个阶层中获得完全和相同的成就之前去学习几何学嗎?”<sup>①</sup>

車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論文《对反对村社土地占有制的哲学偏見的批判》中为证明落后民族能够而且应当不經過經濟发展的某些阶段的思想,所用的是同样的一些論据。

#### 十四

可是,我并不断定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这种場合是有意識地重复了別林斯基的論据的。問題是:在上述的論文中,車尔尼雪夫斯基应用了(虽然并非无可指責的)別林斯基經常使用的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他們两人都学过黑格尔哲学,虽然黑格尔哲学对別林斯基的观点所留下的痕迹要比对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所留下的痕迹深刻。他們两人都是从黑格尔轉向费尔巴哈的,但是在这里应当指出一个反比: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费尔巴哈学派中呆的时间要比別林斯基长得多。在別林斯基的作品中我們不只一次地遇到后来为車尔尼雪夫斯基所詳細發揮的思想,无论如何这是不足为奇的。这些思想可能是从一个共同来源产生的。但是这些思想是非常相似的,所以甚至亚·尼·貝平也沒有看出它全部可惊的极端相似的情形是奇怪的。

再举一个例子。別林斯基把“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詩歌”<sup>②</sup>定为“一般的規律”。車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学位論文《艺术对现实之美学的关系》中的一个基本論点就是“美的就是生活”。但是

① 《別林斯基全集》,第4册,第392頁934。

② 同上書,第5册,第83頁935。

大家知道，車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是以费尔巴哈哲学为依据的，然而別林斯基在表述自己的一般规律时，未必知道费尔巴哈。大概这个规律是他从黑格尔美学中引伸出来的，一般说来，在这个规律里有許多对艺术的唯物主义看法的萌芽。而且毫无疑义的是：車尔尼雪夫斯基在发挥自己以上的论点时，有权利认为自己在精神上接近于“果戈里时期的批評家”。这位批評家，实际上在凡是抛弃辩证法观点，自己轉向启蒙运动者的观点的地方，确实是接近于他，而且同样也接近于六十年代的所有启蒙运动者們的。

再举最后一个例子。別林斯基在他关于普希金所写的一篇非常出色的論文里分析了塔琪雅娜給奥涅金的有名的复信。下列一段話使他很感动：

我爱你，为什么說假話呢？

但是我已許給別人，

而且我将一辈子忠实于他。

他感叹地說：“最后几句詩美妙极了，——真正可以說是‘圓滿的結尾’！这封复信可以和美狄亚的回答：Moi! ①以及老賀雷西的回答：Qu'il mourât! ②相等的古典作品中的‘崇高东西’(sublime)相媲美。这真正是妇女美德的驕傲！‘但是我已許給別人，——正是許給了，而不是順从了！是对誰永远忠实和为了什么忠实呢？这是对于构成那些衰瀆女性的柔情和純洁性的关系的忠实，因为不被爱情神圣化的某些关系是极端不道德的……。但是在我們这里好像一切都是粘連在一起似的：詩歌——也就是生活，爱情——也就是为了发财而結的婚姻，有爱情的生活——也就是严格遵守表面上的义务，其实随时随刻在破坏这种义务……不錯，一个女人

① [我！]

② [让他死去吧！]

同时属于两个男人，爱一个，欺騙另一个，这样做是不道德的；对这个真理，絲毫不必爭論……”等等<sup>①</sup>。

六十年代的启蒙运动者是乐意发挥这些思想的。小說《怎么办？》，可以說是这些思想的某种艺术上的证明。当然，上述时代的启蒙运动者不仅可以从別林斯基那里吸取这些思想：在西欧特别是四十年代法国的文学作品中也大声疾呼地表达出来了这些思想。但是即使在这里，对于这些相同思想的同情就更应加强六十年代启蒙运动家对伟大的“俄国文学果戈里时期的批評家”的同情。

## 十五

我在前面的一章里已經表明，別林斯基是同时持辯证的观点和启蒙运动者的观点的：在凡是涉及西欧社会发展的地方——持辯证观点，当他談到俄国发展的時候——則持启蒙运动者的观点。并且我补充过，他的互相矛盾的两种观点的同时存在，可以用西欧社会关系要比俄国社会关系发达得多來說明。現在应当对这一点补充加以說明。

別林斯基愈接近自己的文学生涯的末期，在他的世界观里上述这两种观点的相互关系变化就越大。假使以前——在紧接着同“耶哥尔·費多里奇的哲学帽子”决裂以后的那些年代，別林斯基与其說是启蒙运动者，远不如說是辯证論者，那末，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年，与其說是辯证論者，远不如說是启蒙运动者<sup>937</sup>。只是由于这个情况，他就能成为我們的启蒙运动者的鼻祖。

但是怎样說明这个乍一看來是极为奇怪的情况呢？

---

<sup>①</sup> 《別林斯基全集》，第8册，第601頁936。

对这一情况的说明是：别林斯基彻底地抛弃了唯心主义，成了唯物主义者。

582

听到这个，又使人觉得很奇怪：难道唯物主义排斥辩证法吗？

是，也不是，因为一切取决于我们说的是哪种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是浸透了辩证法的，而在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者的唯物主义中，辩证法的成分是完全不足道的。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中，辩证法的成分虽然不像在法国启蒙运动者那里那样，但也是微弱的，然而别林斯基在同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绝裂以后，所醉心的正是这一哲学。

我在论文《维·格·别林斯基》<sup>938</sup>中引用了一些摘录，它们表明我们的批评家的某些观点，而且还是某些基本的观点，和费尔巴哈的观点一致到何种程度。现在让我从另一个方面来观察这同一个问题。

巴·瓦·安年柯夫证明：“可以说，在任何地方费尔巴哈的著作（显而易见，指的是他的《基督教的本质》——格·普·）也没有像在我们的‘西欧’小组里产生的这种激动人心的印象；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这样迅速地扫清所有存在于这本书以前的直观的残余。”在他那里，我们也找到了另一个证明：“别林斯基的一个在彼得堡的朋友给他翻译了费尔巴哈一书中的几章和最重要的几段，于是可以说，他就能充分认识推翻了他的旧日的神秘主义和哲学的偶像的批评过程。是否还需要补充说：别林斯基看到这种批评以后便惘然若失，目瞪口呆，失去了他一向所具有的那种提出自己问题的能力呢？”<sup>①</sup>这是极其值得注意的。但是，第一，怎么可以完全忘记年代并且甚至也没有暗示，正是在什么时候给别林斯基翻译了

① 《文学回忆录》，圣彼得堡 1909 年，第 284 页 939。



費爾巴哈的片斷？其次，怎樣理解別林斯基在費爾巴哈的哲學面前目瞪口呆並且“失去了自己提出問題的能力”？這有點奇怪。可以假定，以前堅持唯心主義的別林斯基，看了費爾巴哈對唯心主義學說的唯物主義批評大為吃驚。但是這大概沒有繼續多久：大概，別林斯基很快就掌握了費爾巴哈哲學，而當他掌握了它以後，他的沉默不言就消失了，如果真是沉默不言的話；他那“提出自己的問題的能力”也恢復了，如果他確實失去這種能力的話。正如在以前別林斯基歸根到底是依黑格爾的哲學唯心主義來研究文學問題的，同樣他現在開始依靠費爾巴哈的哲學唯物主義來研究這些問題。只不過如此而已。但這足以排斥“沉默不言”和“沒有能力”。讓我們試試依靠自己的力量，稍微考察一下年代。

583

波特金在1842年3月10—23日寫給別林斯基的信中說：“中世紀的結束和近代的開始，實際是十八世紀。在法國，在社會的範圍內實現了對中世紀的否定；這個否定曾出現於拜倫的詩歌中，現在出現於以施特勞斯、費爾巴哈和布魯諾·鮑威爾為代表的宗教範圍內”<sup>940</sup>。在同一封信中，波特金非常詳細地敘述了費爾巴哈對宗教的看法：“在宗教中，人覺得自己是從屬的：他在自己的內心世界以外是不自由的，要服從權威，受一種力量的支配，這種力量肯定地認為自己不是他自己的力量，而是超自然的、超人的力量”<sup>941</sup>。由此可以明顯地看出，在1842年年初，別林斯基不僅已經知道費爾巴哈，而且也知道布魯諾·鮑威爾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後來如此不喜愛啟蒙運動者的波特金在同一封信里卻像一個熱情的啟蒙運動者那樣講了自己的意見。他寫道：“對於婚姻、宗教、國家——人類社會的根本基礎——具有新觀念的新人在與日俱增；新精神像田鼠一樣在地下令人無法發覺地奔來奔去，挖掘土地——它是一個出色的礦工。Das Alte stürzt—es ändert sich die

Zeit, — und neues Leben steigt aus den Ruinen”<sup>①</sup>。同时，在别林斯基 1843 年的著作中有一些说法和篇幅可以使我們假定他在当时就已受到费尔巴哈的某种影响。

例如，他在論述捷尔沙文的一篇文章里承认观念是現象的出发点，也就是說，他像一个純粹的黑格尔分子那样在說話，在同一篇文章里我們看到他对于那些在自己的片面性中，“在精神之外看不见机体”的唯心主义者，以及对于同样具有片面性，“在肉体的质量之外不能預見精神”<sup>②</sup>的唯物主义者，都表示了不贊成的意見。我們的作者坚决地断定說：“显然可以看出，無論是經驗主义还是(抽象的)唯心主义都是片面性，同样是背离真理的；真理在于使这两个极端的自由調和”<sup>③</sup>。我們大概可以承认这一段話是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写成的，费尔巴哈虽然是一个最地道的唯物主义者，那时候他却喜欢把自己的哲学說成是消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各自所特有的片面性的这两者的一种綜合<sup>④</sup>。我不想保证这点能实现，因为在上引的几段話里关于“抽象的”唯心主义有可疑的保留。如果别林斯基只是不贊許“抽象的”唯心主义，那末他在那时候能

① [旧的被破坏，——时间在变化，——于是从废墟中产生新生活。]942

② 《别林斯基全集》，第 7 册，第 67 頁943。

③ 同上书，第 68 頁944。

④ 請特別注意他的《Nachgelassene Aphorismen》(《死后刊行的格言》)，載于卡尔·格律恩著名的书：Ludwig Feuerbachs Briefwechsel und Nachlass. Leipzig 1874. [路德維希·费尔巴哈的书信和遺著，米比錫 1874 年版] 的第 2 卷。也請參閱《Wider den Dualismus von Leib und Seele, Fleisch und Geist》……《Wahrheit ist weder der Materialismus noch der Idealismus, weder die Physiologie noch die Psychologie; Wahrheit ist nur die Anthropologie…u. s. w.》。(Ludwig Feuerbachs Sämtliche Werke. Zweites Band. Leipzig 1846, S. 362.) [《反对身体和灵魂，肉体和精神的二元論》……“真理既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唯心主义，不是生理学，也不是心理学，真理只是人本学……等等……”。(《路德維希·费尔巴哈全集》，第 2 卷，米比錫 1846 年版，第 362 頁。)]945

够繼續坚持黑格爾的观点，因为黑格爾对于“抽象的”唯心主义也是不欢迎的。但是他在1844年关于弗·費·奧多也夫斯基公爵的著作所写的論文中，已經完全有信心地說，“現在甚至黑格爾的哲学在德国已被看作是完成了自己的循环的学說”<sup>①</sup>。他在下一年，关于塔塔林諾夫的《認識理論物质哲学入門》（圣彼得堡，1844年）一书所写的一篇短評中重复了同一个思想。但是遺憾的是，这个思想在这里对于我們的目的說来，还是表达得不够清楚。他所說的是“离开了黑格爾”的“黑格爾主义的左的方面”。由于別林斯基怕把讀者引入歧途，他說：“假使我們說过，黑格爾主义的左的方面离开了自己的导师，这并不是說，这是否定了他在哲学方面的伟大功績，并承认他的学說是空虛和无結果的現象。不是的，这只是說，这个左的方面想要走得更远，而且，虽然說它十分尊敬伟大的哲学家，却把人类精神的权威置于黑格爾权威的精神之上”<sup>②</sup>。別林斯基是否把費尔巴哈也看作是左派黑格爾分子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問題就解决了；这一段話表明，在那时候別林斯基已經不遵循黑格爾主义了。但是費尔巴哈自己却不承认自己是黑格爾主义者，而正确地认为他的哲学的基础是和黑格爾体系的基础完全对立的。在那时候，黑格爾学派左翼有許多唯心主义者，如果說別林斯基对他們給予同情的評价，那并不是牵强附会的。我們的作者在以《“文学”一詞的一般意义》为題的論文中表示了更为明确的意見。在这里，他在重复了我們熟知的論点——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表达它的世界观，它的世界观决定于它的本性，它的气质，它的性格，总之，决定于它的本质——以后指出了：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个民族有一种本质，而另一民族有另一种本质。他說，“誠然，地理

585

① 《別林斯基全集》，第9冊，第63頁946。

② 同上书，第10冊，第11頁947。

的、气候的和历史的条件对于一个民族的本质的形成，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但是显然可以看出，产生任何一个民族和任何一个人的本质的首要原因，也像产生任何一个人的本质的首要原因一样，是构成直接创造自然界不可探测的秘密的生理的原因”<sup>①</sup>。如果说产生个别人和整个民族的“本质”的主要原因都是生理的原因，这就是肯定某种完全唯物主义的并且同认定自然界不过是观念的体现的说法完全相反的东西。而我们已经知道，别林斯基发表这一纯粹唯心主义的思想，不过是在1842年分析亚·尼基田科的《谈谈批评》时。我感到遗憾的是：在我所有的那部别林斯基文集里没有指出，哪怕是假定地指出，“没有出版过的”《“文学”一词的一般意义》一篇文章是哪一年写的。我想，如果把它作为是1842年写的作品那是不会错的<sup>949</sup>。但是，看来它在后来被补充和重新写过；假使它是在对尼基田科的《谈谈批评》所作的分析以前由别林斯基加以最后修饰的话，那末这一个分析就说明别林斯基曾经暂时从费尔巴哈回到黑格尔。但是更正确的是假定：这篇文章是在那篇分析以后写成的，而且正是在把这两个作品截然隔离开的那一段期间里，别林斯基完成了他的由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转化。无论如何，在论文《1846年俄国文学一瞥》中，别林斯基是作为一个坚定的费尔巴哈的信徒发表意见的。

## 十六

由于篇幅不足，不可能在这里全面地考察费尔巴哈对别林斯基的影响，我只能谈谈直到现在还很少有人研究过的问题：即在这种影响下，别林斯基最初沿用黑格尔的对现实的看法是朝哪个方

<sup>①</sup> 《别林斯基全集》，第12册，第427页<sup>948</sup>。

向改变的。

流行的傳說是：有過一個時期不懷好意的黑格爾曾推動善良的別林斯基去同現實調和，後來，又推動他去找上帝的協助，“狂暴的維薩里昂”仇恨了黑格爾的“帽子”，起來反抗現實。一部分也確實是這樣：別林斯基確實起來反抗了現實。但是有各種各樣的反抗。別林斯基反抗了現實，但是完全不像是比如浪漫主義者那樣的反抗現實；他正是在和現實戰鬥時特別厲害地責罵過這些浪漫主義者的。 586

浪漫主義者為了理想而背棄了現實。別林斯基在他的“費希特主義”時期，也是這樣作的；但是自從他接受了黑格爾哲學時期起——他後來也認為他的精神生活正是從這時候開始的——才開始認為背棄現實，也就是說要變成空虛而可憐的幻影。他開始要求思想家和藝術家以極其關注的態度對待現實。我們在這裡不去研究以關切的态度對待現實在他看來也就等於同現實調和的那個時期，我要指出已經談不上調和的那個時代。

在《1840年的俄國文學》那篇論文里，他說明喜劇《欽差大臣》——我們沒有必要提醒他對於這部作品給予非常高的評價——是“以現實的逼真感使人毛骨悚然的”作品<sup>①</sup>。他在同一篇論文里宣布：“一切東西都有自己的時期；我們已經歷了自我陶醉，幼年 and 少年喜悅的時期；我們已經不需要幻想而需要現實；對於我們說來，一個銅板要比用空氣鑄成的一百萬盧布更為寶貴，一句話，我們覺悟的時期已經到來了”<sup>②</sup>。一年以後他寫道：“現·實——這是現代世界的口號和最新的東西！現·實在事實、知識、感覺的堅信以及智慧的結論中，在一切方面和在任何地方現實都是我們世紀的

<sup>①</sup> 見《別林斯基選集》，第2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63年版，第413頁。譯者

<sup>②</sup> 《別林斯基全集》，第4冊，第197頁950。

587

首要和最新的東西”<sup>①</sup>。又過了一年，他這樣說明我們文學最後時期的特點：“俄國文學的最後時期即散文時期，與浪漫主義時期顯著不同的地方，是某種雄偉的成熟性。也可以說，在這一時期作品的數量不算多，然而在這時期里出現的一切平庸和普通的东西不是沒有獲得任何成就，就是只有片刻的成就；然而那些少數的出類拔萃的作品，是以成熟和雄偉的力量為標記的，——會永久存在下去，而且在自己的凱旋的、勝利的行進中，逐漸獲得影響，在文學和社會的土壤上印下了深刻的痕跡。接近生活和現實，是我們文學最後一時期的雄偉的成熟性的直接原因”<sup>②</sup>。于是他馬上發揮自己對理想的看法。在從前，理想這個詞的意義彷彿是說：不喜歡，可以不聽，但是不要妨礙造謠撒謊。現在並不把它理解為說謊話，也不把它理解為誇張，“而是現實的事實，就是它的本來面貌”。但是藝術家在如實地描繪事實的時候，不限於簡單地摹寫它，而是用有一般意義的光輝來照亮它。所以在真正藝術家的描寫中，事實比在照片中更忠實於自己。“因此，在偉大的寫生畫家所畫的肖像中，一個人甚至比在銀版照像上的映象更像自己，因為偉大的寫生畫家以鮮明的綫條把隱藏在一個人內心裡的一切，甚至可能把構成這個人自己的秘密的東西也都描繪出來了”<sup>③</sup>。

誰願意和現實進行鬥爭，他就不應當像浪漫主義者那樣離開現實而轉入理想的領域，而要仔細地研究現實，根據現實來同現實鬥爭。當人類為了生存而同自然鬥爭時，他並不是背棄現實，而是利用自己對自然規律的知識來使自然服從自己。人類這種知識的範圍愈廣博，他控制自然的力量也就越大。別林斯基是這樣想的。

① 《別林斯基全集》，第6冊，第195頁951。

② 同上書，第7冊，第30頁952。

③ 同上書，第31頁953。

这純粹是黑格尔的对现实的看法。而且我們可以假定，別林斯基在他对待现实的态度中始終忠实于黑格尔，——当然是忠实于辯证論者的黑格尔，而不是忠实于哲学中絕對意图的最伟大代表人之——的黑格尔。但这并不如此。

別林斯基在他写的《1846年俄国文学一瞥》中說：“請仔細看看，請仔細諦听，我們的杂志談論得最多的是什么？在談人民性和现实性。它們攻击得最多的是什么？是浪漫主义，幻想性，抽象性。关于其中的某些題目，过去也談論过很多了，但是它們並沒有这种意思，並沒有这种意义。关于‘现实’的概念完全是新的东西”<sup>①</sup>。

如果我們想一想，別林斯基是在三十年代末就已經开始醉心于黑格尔，那末对于他怎么能够把现实的概念称为完全新的东西这一点，看来好像是无法解释的，因为对他來說，这个概念显然早已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因为他在自己的論文中不断地發揮过这个概念，那末未必就可以說它在1847年在讀者看来也完全是新的东西。我认为对于問題可以这样来加以說明，就是別林斯基在說关于现实的完全新的概念时，并不是指站在黑格尔的观点上所坚持的那个关于现实的概念。关于现实的“完全新的概念”，在他的笔下現在就是費尔巴哈关于现实的概念。

1842年，費尔巴哈在他的《Vorläufige Thesen zur Reform der Philosophie》<sup>②</sup>中写道：“哲学是对于存在物的研究。思考事物和本质，認識它們的本·来·面·目，这就是哲学的最伟大的規律，最伟大的任务”<sup>③</sup>。

① 《別林斯基全集》，第11冊，第33頁954。

② 《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綱要》

③ Werke, II, 254 955。

請用这种观点来看哲学对文学所提出的任务，那末你們就会得出結論：艺术創作最伟大的任务就在于描繪現象的本来面目，也就是說要尽可能接近现实。

費尔巴哈繼續說：“把存在物的本来面目描繪出来，即真实地把存在物描繪出来，看来这仿佛是肤浅似的；不把存在物的本来面目描繪出来，即不真实地、錯誤地把存在物描繪出来，看来仿佛这是很深奥似的”<sup>①</sup>。

在讀这段話时，可以想到仿佛是在讀別林斯基为自然派辯护时所写的很出色的文章中的一頁。

但是还不只如此。同那些以不信任的态度对待我們外部感觉的見证的唯心主义者相反，費尔巴哈断定，如果我們关于物体的表象依靠这一見证，那末它們就会完全是真实的。但是它們被我們的幻想歪曲了。按照費尔巴哈的意見，人們最初並沒有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而是“像他們通过臆想的棱鏡所感觉到的那样”。費尔巴哈說，只在現代，人类才开始回到对感性事物，亦即现实的事物进行感性的、亦即不歪曲的、客观的直观<sup>②</sup>。哲学和一般科学的任务并不是背弃感性的、亦即现实的事物，而是接近这些事物，从我們的表象中驅逐幻想的成分。为了证明別林斯基对文学任务的看法同費尔巴哈对哲学的任务的这一看法如何接近，我提醒讀者讀一讀我們的批評家对乔治·桑的几本小說：《Isidore》、《Le Meunier d'Angibault》和《Le Péché de Monsieur Antoine》<sup>③</sup>的意見。這項意見在別林斯基所写的俄国文学每年概述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可以找到。別林斯基在这时候毫无保留地承认上述小說的作者是

① Werke, II, 254 956。

② 同上书，第 331—332 頁 957。

③ 《伊西多尔》、《安治波的磨坊主》……《安托瓦納先生的罪过》。



天才的詩人。但是，實在說來，他對這些小說並不滿意：它們只是在細節上是好的，而整個說來寫得並不好；它們的所以不成功，其原因是“作者想用空想來代替存在着的現實，因而迫使藝術去描繪僅僅存在于他的想像中的世界。這樣一來，在描寫一些可能的性格，大家都熟悉的一些人物的同時，他提出了一些幻想的性格，一些不會存在的人物，於是他的小說和神話混合起來，自然的東西被不自然的東西掩蓋了，詩歌和修辭學混合起來了”<sup>①</sup>。

於是我們看見：別林斯基關於現實的完全新的概念，就是費爾巴哈關於現實的概念。

## 十七

這裡可能有人對我提出從表面上看來極為重要的下面的反駁。大概有人會對我說，在黑格爾的美學中沒有修辭學和幻想，因為在黑格爾看來，詩歌的對象同哲學的對象一樣，都是現實。於是別林斯基沒有必要從黑格爾轉向費爾巴哈，以便把忠实地描繪現實看作適合於藝術的唯一任務。

我自己在上面已經表明，別林斯基在他的“精神生活”中自始至終不斷地堅決要求一個藝術家忠实地描繪現實，所以這一反駁看來更加有根據了。然而這一點還是什麼也不能證明的。我們馬上就會看到為什麼會這樣。

可是，別林斯基在文學活動的最後幾年里，這樣嚴厲地斥責過任何幻想的他，却並不滿足於忠实地描繪現實，至少在詩歌中是這樣的。他認為“這種忠實就是詩歌的首要要求和任務”，作者的詩才首先應當根據這一點來判斷；他對這種要求滿足到了什麼程度，

<sup>①</sup> 《別林斯基全集》，第11冊，第357—358頁958。

把这一任务解决了多少。但是然后又提出了另一个要求：“在诗人的图画中应当有思想，这些图画所产生的印象应当对读者的头脑起作用，应当给他对生活的某些方面的看法指出某种方向”<sup>①</sup>。这个第二项要求符合于费尔巴哈对哲学提出的要求：为了现实，为了“一切存在”要同幻想的表象作斗争。这个要求有完全“启蒙运动者的”性质。车尔尼雪夫斯基也就是这样理解它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写的《果戈里时期俄国文学概观》一文中说，关于现实的新概念的确定和被科学采用还是不久的事情，只是从“和我们同时的思想家对于先验哲学的隐晦暗示作了说明的时候”才开始的<sup>②</sup>。

590 这就是说，这个概念正是由费尔巴哈确定的。

费尔巴哈的现实概念是从黑格尔的现实概念中成长起来的。但在费尔巴哈那里黑格尔的概念在两方面发生了变化。

当黑格尔说现象的“合理性”时，他实际是指这些现象的发展的规律性。黑格尔哲学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是在现象发展的过程中来考察一切现象的，也就是说，是用辩证法的观点来看这些现象的。但黑格尔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通过唯心主义的三棱镜来看现象，把它们看作是某种类似应用逻辑的东西；在他看来，现实的运动归根到底是受绝对观念的运动制约的。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三棱镜；他用唯物主义者的清醒眼光来看现象。这是前进了很大一步。但是，同黑格尔唯心主义进行斗争的费尔巴哈，对于它的辩证性质太不注意了。因此，他自己的哲学获得了很明显的启蒙运动者的色调。这是缺点。但是这一缺点特别使倾向于启蒙运动观点的人事先具有接受他的哲学的心情。在这样的人

① 《别林斯基全集》，第11册，第372页959。

②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米·尼·车尔尼雪夫斯基版），第2卷，第205页960。

当中就有別林斯基(一部分)和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部)。

辯證論者把人們的意图和趣味看作是社會發展的辯證過程的產物。如果他承認某些意图不是“虛幻的”而是“真實的”，那末這是說，他認為，在這些意图里正確地表達着賦予它們某種不可破壞的力量的發展的進程。啟蒙運動者完全從另一方面來觀察這個問題。他認為不是存在決定意識，而且也不是客觀關係成為主觀意图的標準，而是相反：主體從自己的理智的觀點宣讀自己對客觀現象的判決。辯證的美學就是把一般藝術，其中也包括詩歌在內，看作是社會發展的多方面過程的一個方面的美學；啟蒙運動的美學要求藝術對生活現象宣布判決。別林斯基在他說“真正的美學的任務並不在於決定藝術應當是什麼，而在於決定藝術是什麼”<sup>①</sup>的時候是個辯證論者。他在要求藝術正確描繪現實，並且補充說，除此以外，藝術應當給予讀者對生活某些方面的看法指出一定方向的時候，他却是一個啟蒙運動者。

在一個徹底的啟蒙運動者看來，正確地描繪現實具有輔助的意義，正如正確診斷對實踐的醫生一樣：因為實踐的醫生所以需要準確診斷，為的是要知道怎樣醫治病人；啟蒙教育家所以需要正確描繪現實，正是因為它給他指出為了理性而應當消除的現實的缺點究竟在哪裡。 591

別林斯基自己說：“社會的最高和最神聖的利益是它自身的繁榮昌盛，並且把這繁榮昌盛同樣地普及到社會的每一個成員。要達到這繁榮昌盛的道路就是覺悟，而藝術可以促進這一覺悟的力量並不低於科學。在這裡，科學和藝術都是同樣必要的，科學不能代替藝術，藝術也不能代替科學”<sup>②</sup>。

① 見前面(見本卷第606頁。譯者)。

② 《別林斯基全集》，第11冊，第364頁961。

毫无疑问，这是正确的，实际上艺术对于社会觉悟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十分清楚的是：别林斯基叙述这一正确思想的前景赋予了思想以鲜明的启蒙运动的色彩。别林斯基这里采用了应当这个范畴，只要再进一步，就会把文学看作是在社会中传播一定的启蒙概念的体系的工具。大家都知道，六十年代的人们已经走了这一步。

相反的，在说“美学不应当把艺术当作是某种预想好的东西，当作是某种只能按照它的理论来实现的理想来议论”，在说“美学应当把艺术看作是一个对象，这一对象在它以前早就存在了，而且它的存在应当归功于这个对象的存在”<sup>①</sup>，也就是在命令美学：“你应当完全消除应当这个范畴”，在这样说时，——别林斯基是站在辩证法的立场上，并且他离开对于艺术和艺术理论的启蒙运动者的观点是再远不过了。在这里他是用科学的语言说的，而不是用政论作品的语言说的。

我完全弄不清楚，哪一方面比较好，我在这里也驳斥应当这个范畴。一切东西在合宜的时候和地点是好的。但是我发觉，前者完全不像后者，而且只能在不明了概念时才使两者混淆起来。所以我补充说：如果别林斯基对艺术的任务的启蒙运动者的观点在六十年代得到了广泛传播，那末他给美学提出的伟大的科学任务，现在还远远没有充分得到解决，而且只能在比较遥远的将来才能得到解决。

我们在上面引证的巴·瓦·安年柯夫说：“别林斯基一切思想

---

<sup>①</sup> 见前面（见本卷第606页。——译者）。

和著作的道德背景正是賴以把热情的朋友和崇拜者團結在他周围的那种力量”。他也认为別林斯基“延續了一生的道德教誨的綱要，也許是他真正的傳記”<sup>①</sup>。

說別林斯基的青年朋友和崇拜者們主要重視他的教誨的道德背景，這不僅可能，而且是十分可能的。只是在這個場合既相信了安年柯夫，我們就會明白為什麼寫過關於別林斯基的回憶錄的大多數人，包括安年柯夫自己在內，暴露了對於別林斯基頭腦中進行的巨大的思想工作是多麼缺少真正的理解。但是如果別林斯基的青年朋友和崇拜者主要是容易接受他的道德教誨的話，那末還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他的真正的傳記可以歸結為他的道德教誨的綱要。不，只是當我們努力想一想經常引起別林斯基這位天才人物的注意的那些最重要的理論問題時，我們才會理解別林斯基的生活。我們直到現在還不想這樣去做。

但是最令人驚奇的就是連別林斯基的道德教誨，如我們看到的，也不能為他的朋友和崇拜者所完全滿意地理解。這同一個巴·瓦·安年柯夫又可以作為一個例子。

在他的特寫《出色的十年》中，描寫了1845年夏季在西歐派小組中發生的關於對人民的態度這一主題的爭論。小組的某些成員責備別林斯基，說他竟敢對人民有輕視的狂妄行為，而格蘭諾夫斯基宣稱：“關於俄國民族性和許多其他文學和道德問題的看法，與其說我同情於別林斯基、《祖國紀事》和‘西歐派’，不如說更同情於斯拉夫派”<sup>②</sup>。

巴·瓦·安年柯夫沒有找出一句話來為別林斯基辯護。這個場合他是同情格蘭諾夫斯基方面的。他關於上述爭論的故事常常

① 《文學回憶錄》，第216頁962。

② 同上書，第275頁963。

使那些想要弄清楚别林斯基的和其他西欧派的观点的人很难堪。契·維特林斯基几乎一字不遗地重复叙述这一故事<sup>①</sup>。許多其他人也这样做。

593 让我再多說些。甚至亚·尼·貝平关于别林斯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点也构成了——固然不是根据巴·瓦·安年柯夫的叙述构成的——不正确的观念。

别林斯基在 1842 年 12 月 9 日給波特金的信中以自己通常的激烈語气写道：“我既不能为豺狼，为熊，为瘋狗，为俄国的商人和农民祈禱，也不能为俄国的法官和稅吏們祈禱；但是我对他們其中任何一方都不抱有个人仇恨”<sup>965</sup>。

亚·尼·貝平力求寻找可以減輕别林斯基过錯的一些情况，他說：“他的話的意思从它的应用方面来看是很明了的，但是应当指出，作为时代的特点，‘人民’这个詞和概念在那时候还没有它現在已經成为整个潮流（甚至蒙昧主义的伪善也常常願意把自己隱藏在这个潮流后面）的表現的那种用法。在别林斯基和他的朋友的圈子之内……还没有形成这个抽象的观念”<sup>966</sup>。

亚·尼·貝平好像沒有看到，别林斯基朝着“俄国的农民”說的尖銳的話，实际上只是反对民族性的那些特点，“甚至蒙昧主义的伪善也常常願意把自己隱藏在这些特点后面”，而且别林斯基所責怪的不是人民而是他們的压迫者。我們記起同一个别林斯基写的另一封信，1842 年 9 月 8 日的信，它刊登在同一个貝平的著作中。别林斯基在这封信里說：“我現在处于一个新的极端之中，——这就是社会主义思想，它对于我說来是思想的思想，信仰和知識的起点和終点……”<sup>967</sup>。

<sup>①</sup> 《格兰諾夫斯基和他的时代》，第 272—273 頁 964。

不論对現代的科学社会主义，还是对四十年代的空想社会主义，似乎都不能斥責它們对于人民有輕視的看法。

“狂暴的維薩里昂”在这同一封信里感叹地說：“社会性……这是我的口号……一般的東西在生活着，而个人在受痛苦，这对我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在大地上的天才生活在天边，而群氓却在污泥中滾来滾去，这对我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了解观念，如果我在艺术中，在宗教中，在历史中发现了观念的世界，而我不能和所有的人，和应当成为我的人类的弟兄們、我的近邻，——但他們就自己的无知來說却是不認識的人和我的敌人，——来分享这个观念的世界，这对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在我給了士兵一个銅板以后，我几乎要哭出来，在我給了女乞丐一个銅板以后，我从她那里跑开，好像作了一件坏事，好像不願意听到自己的脚步声。而这就是生活……”<sup>968</sup>等等。

而人們认为需要开导这样的人去爱人民！这是徒然的劳动：这等于是往大海里灌水一样。

讀者，也許你們以为別林斯基是一个农奴主嗎？我不能认为是这样的。而格蘭諾夫斯基却有“受过洗礼的财产”。1846年2月4日，也就是在安年柯夫所描写的爭論以后的几个月，他在給他从姊妹的信中說，他想卖掉自己的庄园，但还没有拿定主意：“它对我可能还有用。我現在的情况很好，但只是不太稳固。我碰到許多敌人……等等”。問題是从所有主的观点而完全不是从“财产”<sup>①</sup>的观点来看的。

斯拉夫派也不放过机会来对別林斯基进行要爱人民的說教。但是他們也心安理得地拥有自己的农奴。其中某些人——例如，

<sup>①</sup> 我手边没有格蘭諾夫斯基的书信集，我是据契·維特林斯基的《格蘭諾夫斯基等》一书轉引的。所引证的信在第277—278頁。

包稅者亚·伊·柯舍列夫回忆說，固然，“奴隶制度是罪恶”，但是看来，連这一看法，在斯拉夫派的小組中也不是普遍公认的。同一个亚·伊·柯舍列夫在1852年10月27日写給伊·瓦·基列也夫斯基的信里說：“亲爱的朋友基列也夫斯基，我不明白你作为一个基督徒，怎么能够因为你有农奴而不感到痛苦。当我最后一次到莫斯科时，你甚至嘲笑我，认为我的这种思想几乎是偏执狂”<sup>①</sup>。

阿·斯·霍米亚科夫也觉得，奴隶制是罪恶，然而在柯舍列夫的日記中却有下列一段有趣的記載：“1851年3月17日。在15日（星期四）和16日（星期五），我們举行了晚会，第一次晚会在霍米亚科夫那里，第二次晚会是在切尔卡斯基公爵那里举行的，而唯一的話題是消灭农奴制度。主要的爭論問題是：我要求在我們之間绝对禁止买卖人口。霍米亚科夫坚持收买人口，以便把他們从土地少的省份送到土地多的省份去。切尔卡斯基公爵主张把农民送去当兵就不交劳役稅，也就是說，不是他收买和从中得到利益，而是把农民記在他的名义之下。而且切尔卡斯基还說，他的意見是，目的要使手段神圣化”<sup>②</sup>。

这当然是罪恶；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斋戒将要来到，讓我們在那时懺悔吧。

我根本沒有想責备四十年代的人，更不想責备当时的两欧派，但是我仍然想要像我开始写这篇論文那样來結束它：我們直到現在对于我們的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卓越活动家的思想和——現在我还补充——道德的发展知道得很差……。

① 《亚·伊·柯舍列夫传》，第2卷，第83頁969。

② 同上书，第85頁。



### 三、〔关于亚·伊·赫尔岑的著作〕



---

---

## 赫尔岑和农奴制<sup>970</sup>

〔1911年〕

---

亚·伊·赫尔岑在《钟声》第94期（1861年3月15日）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期待废除农奴制宣言的公布，同时希望“有誰在伟大的民族复活的日子会提起”<sup>971</sup>他。而他，当然是完全值得这样提起的。他是准备俄国輿論来迎接“伟大改革”的我們作家中最先进者之一。所以，現在当我们紀念农奴制废除50周年的时候来回忆他将是适宜的。

亚·伊·赫尔岑的一生鮮明地划分为两部分。1812年3月25日他生于莫斯科，1847年以前他一直生活在俄国，一部分时间是作为“自由”居民，另一部分时间是作为被流放和被管制的犯人。但是1847年1月31日他在陶乐根越过俄国的边界，从此以后就沒有再回到祖国。依据他的一生的这一划分，我也将自己的叙述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我将說明他在祖国的时候对农奴制的态度，第二部分，我将考察他在国外期間，如何用自己有力的文字才能武装起来，利用英国的出版自由来和它进行斗争。

在赫尔岑居留俄国的那个时代，由于书报检查极端严格，进步的俄国作家同农奴制的斗争是非常困难的。为了从这方面說明那个时代，只須提起众所周知的情景就够了，事情发生在1842年末，

598 在莫斯科检查委员会中当书报检查官斯涅基辽夫作关于果戈里的《死魂灵》的报告的时候。委员会主席，莫斯科学区督学的助手，赫尔岑的表兄德·巴·果洛赫瓦斯托夫（《往事与回忆》一书常常提到他），一听到这本书名的时候，就声称：“我什么时候也不允许这样：灵魂是不朽的，死的灵魂是不可能有的；作者是在反对不朽！”

当报告人说明所谓死魂灵是指那些已经死了而继续列入纳税人名册的农民时，主席更加激动了，受到可敬的会议一致支持的他喊叫起来了：“不，这在好久以来就是不能允许的，那怕手稿中什么也没有，而只放一个辞：纳税人口；就连这也是不能允许的，因为这等于反对农奴制！”<sup>972</sup>

关于农奴制的谈论比关于灵魂的不朽问题的谈论，是禁止得更加严厉的。这也不足为奇。那时候农奴制被认为是社会制度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在这样的情势之下，进步的作家只能用艺术作品反抗农奴制，因为他们描绘了当时农民生活的黑暗面。但这里也正是书报检查机关所注意的。所以，在说到赫尔岑在俄国生活的那个时期，与其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他同农奴制的斗争上，不如把它放在使他倾向于这一斗争的那些影响上。

亚·伊·赫尔岑是俄国的一个有钱的世袭贵族地主伊万·阿列克谢也维奇·雅柯夫列夫的私生子。他的不合法的出身给他生活上造成了某些甚至不少不便的地方。年长的人关于他的“不自然的地位”的谈话很可能对孩子头脑中的批判思想有不少的启发。据赫尔岑自己说，这些谈话使他产生一种信念，那就是他不能像嫡生子女依靠其父亲那样依靠自己的双亲。他承认，“我对我为自己设想的这种独特性是高兴的”<sup>973</sup>。然而伊·阿·雅柯夫列夫对于自己的私生子的命运是很关心的，而且，无疑地，凭他自己的广交，他是能够保证他在那些享有农奴制的一切利益的人中间享有一个

令人羡慕的地位的。是什么把亚·伊·赫尔岑变成了这一制度的敌人呢？是什么巩固了这个善感的儿童的心灵中对自由的热爱呢？

他属于这样一代的俄国人，在他们身上，俄国内部发展史上一般说来有过巨大意义的事件对他们的影响是很深的。我说的是1825年12月14日的不成功的起义。在赫尔岑《往事与回忆》中有一段话很有意思，这一段话很鲜明地表明关于彼得堡的起义的消息和关于最近的后果是如何影响他的。 599

“关于愤慨、审问的谈论，莫斯科的惨祸，使我惊异万分；在我面前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它越来越成为我的整个精神生存的集中点；我不知道这是怎样造成的，我不大理解，或者很模糊，究竟是怎样一回事，但是我感觉到，我不是站在霰弹和胜利、牢狱和锁链那一方面。彼斯节里和他的同志们的处死，彻底唤醒了我的幼稚的心灵”<sup>①</sup>。

觉醒了的孩子究竟能够期待有谁来支持自己热爱自由的意向呢？谁能回答“霰弹和胜利、牢狱和锁链”在他心中所引起的那些问题呢？他的“俄国的”和“法国的”老师回答了他。

首先，这孩子求教“俄国的”老师伊·叶·普罗托波波夫。老师的自白深深地感动了孩子，并且，在下课回家时他抱着孩子说：“请上帝保佑，这些情感会在你心中成熟和巩固起来”。以后他开始带给孩子被禁的诗集：雷列也夫的《沉思》，普希金的《短剑》和《自由颂》。赫尔岑在《往事与回忆》中说：“我秘密地把它抄写了下来……（而现在我公开地印刷！”<sup>②</sup>975。

后来轮到“法国的”老师，想必“俄国的”老师没有说明一切。

① 《赫尔岑全集》（日内瓦版），第6卷，第66页974。

② 即在伦敦的自由的俄国印刷所印刷。

赫尔岑在自己父亲的地下室的图书馆中偶然地发现了一本讲法国革命史的书，这本保皇党人写的极端偏袒的书，引起了这位少年读者的怀疑，但同时却使他产生一种愿望，想同一个内行的人谈谈伟大时代的著名的事变。这次在他看来最内行的是“法国的”老师。赫尔岑这样转述自己和他的谈话。

“我在上课时间问他：为什么人们把路易十六处死？老头子看了看我，垂下一边灰色眉毛，抬起另一边灰色眉毛把眼镜像脸甲一样地抬起到前额上，拿出了一块大的蓝色手帕，用它擦了一下鼻子，威严地说道：—*Parce qu'il a été traître à la patrie*”<sup>①</sup>。

根据赫尔岑的公正意见，这样的果断回答可以作各种推测<sup>977</sup>。他彻底地说服了少年自由热爱者，使他相信，人们处死法国国王不是没有原因的。

600 一个幽默的细节。老恐怖党人最初不喜欢赫尔岑，认为他是一个浅薄的顽童，因为他功课准备得很不好。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你不会有出息”。然而关于路易十六处死的谈话以后，动怒为仁慈所代替了。他以同样的矜持，不带着微笑地结束了功课，但已经是很客气地说：“真的认为，你不会有出息，但是你的崇高的感情将拯救你”<sup>②978</sup>。

① 意思是：因为他背叛了自己的祖国<sup>976</sup>。

② 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的俄国有许多法国侨民。他们中间有旧制度的拥护者也有革命者；他们无论是那一种人，都在自己的俄国学生的发展过程中留下了痕迹。例如，亚·伊·柯舍列夫的传记作者说，我们有名的斯拉夫派基列也夫斯基兄弟的母亲是法国侨民多列尔伯爵夫人的学生，多列尔伯爵夫人的特点是，据他说，具有完全贵族的习惯和性格。他指出，这一情况对她的思想的和精神的构成有很大的影响（《亚·伊·柯舍列夫传》，第1卷，第2册，莫斯科，1889年版，第3页）。我们有权认为，这一情况通过阿夫多吉雅·彼得罗夫娜，对她的两个具有特别保守性的儿子伊万和彼得·基列也夫斯基的思想和精神的气质不是没有影响的。参照瓦·里亚斯科夫斯基：《基列也夫斯基兄弟，他们的生活和著作》。圣彼得堡1899年版。

## 二

为什么有可能利用一定特权的人有时也起来反对这种特权的存在呢？怎样来说明这一无可置疑的现象呢？它难道不是驳斥那一唯物主义的理論嗎？按照这种理論，任何一个社会阶级（或等級）的意向终究是由它的利益决定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有名的《宣言》中說，在当阶级斗争以一定的形式接近决定的那一历史时刻，瓦解过程便遍及整个統治阶级，因之其中有一小部分人分离出去，轉到争取自己解放的被压迫阶级的一边。为了证明这一点，《宣言》的作者指出，先前一部分貴族會轉到了资产阶级方面，而現在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正在轉到无产阶级方面<sup>①</sup>。他們是正确的。假使我們注意为他們所指出的无可爭辯的历史事实，那末我們就会看到这种情况。

各社会阶级的意向是由他們的地位即他們的利益决定的。但是因为阶级地位即阶级利益是不同的，所以受它們所制約的意向也是不同的。当一个属于統治阶级的人轉到被压迫阶级方面的時候，他以此证明的，不是他摆脱了一般的任何阶级的影响，而只是他脱离了一个阶级的影响而落到另一个阶级的影响之下。可見，他的例子不是驳斥历史唯物主义，而只是对他的狭隘的片面的理解提出警告。

603

一个社会活动家，就其出身說是属于压迫者，但却轉到了被压迫者方面，要給这样的活动家写出任何一部严肃的传记，它的任务究竟在哪里？任务在于找出那种迫使他脱离压迫者的影响并唤起他对被压迫者同情的情况。我坦白地說，假使有这样一本传记，例

<sup>①</sup> 見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5頁。 —譯者

如，写贵族修道院院长西叶斯的传记，它能对我阐明，第三等级的影响正是通过哪些道路感染到他，使得他后来写了如下名言：“第三等级是什么？——什么也不是！它应当是什么？——是一切！”那么，我将给予很高的评价。很遗憾，直到现在，传记作者们是非常不注意研究这些情况的。

至于说到亚·伊·赫尔岑，那末我们多少已经知道，他对自由的热爱是在怎样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我们已经知道，这种影响的那一部分应当归功于他的老师们。现在我们考察一下如他所说的来自前室的即来自农奴女僕那里的影响。

说俄国的“受洗礼的财产”（也是他的说法）对于“高贵的等级”不是没有留下这一种或那一种或多或少有益的多方面的影响，那是不难 a priori<sup>①</sup> 承认的，而且那也是为许多公认的事实所证实了的。例如，谁不知道普希金是从他的农奴嫫姆，现在闻名的阿林娜·罗吉奥诺夫娜那里学会俄语的。

另一个例子。《为沙皇而生活》<sup>②</sup> 和《路斯兰》的作者米·伊·格林卡说过，他童年时代，时常在自己的父母家中听俄国民歌。他说，“这些忧郁温柔但完全为我所懂得的声音，我是异常喜欢的，也许，我童年所听到的这些歌是我后来主要从事研究俄国民间音乐的第一个原因”<sup>③</sup>。

为了不使例证堆堆叠叠，我限于举出彼·德·博博雷金的一个含有深意而令人信服的见证。在献给“农奴教养者”并刊登在纪念文集《伟大的改革》第4卷的一篇短文中，他说：

① 先验地、不要证明地。

② 即《伊万·苏蕤宁》——译者

③ 引自米·\*·伊万诺夫《俄国音乐发展史》，第1卷，圣彼得堡，1910年版，第270—271页。



“现在，在我的写作生活过了五十周年以后，我回忆起我的教养者们，对他们怀着一种真诚的感激。我对生活知道得这么多，不论是旧的或是那一种的，于是我开始更自觉地对待周围的一切，这不是从他们那里，又是从谁那里得来的呢？而我在他们身上看到的，他们在几十年内对我所讲的，以及他们的语言，他们的生活经验，他们的细致的观察，他们对自然和对动物的热爱，他们的人民的世界观，他们的概念的构造，信仰、规则，现实的真理和人民的幻想是这样融合着的整个生活的诗篇，——这一切就是他们的礼物，他们的遗产！”<sup>①</sup>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农奴对自己的未来主人极为多方面的影响的鲜明的例子。固然，这里还完全没有说到，博博雷金的“农奴教养者”是怎样影响他对贵族特权的态度。但是往下博博雷金也说到这一点：“他们，我的农奴教养者们，以他们是什么，以他们所从事的，他们所能干的，他们所叙说的这种种来吸引儿童，阻止他避免等级的冷酷无情和傲慢感”。<sup>②</sup>

对于赫尔岑，农奴教养者在破坏他的等级偏见中也起过影响。一般说来，在回忆这些“教养者”时，赫尔岑坚决地驳斥了认为农奴女僕只能败坏地主们的孩子的这种贵族偏见。他说，“相反地，她，这一前室的人，从早年起就培养了我对任何奴役和对任何专横的憎恨。当我还是儿童的时候，由于我做什么顽皮的事，维拉·阿尔唐莫诺夫娜就想使我大大难受，她往往对我说：‘等一个时期，长大了，你就会像别人一样地是老爷’。这对我是极大的侮辱。老嫗可能很满意——至少，我没有变成像别人一样的”<sup>③</sup>。

① 所引文集，第84-85页。

② 同上，第85页。

③ 《赫尔岑全集》，第6卷，第49页979。

赫尔岑在这里援引的他的媒姆的预言是极其有意思的。农奴女僕根据痛苦的經驗知道，“老爷的小孩”的心理是一回事，而成年的老爷的心理又是一回事。人不是生来就是老爷，而是变成老爷的。要让他学会把自己的眼界局限在剝削者的利益上，需要不少的时间。儿童不是这么容易学会这門学問的。“老爷的孩子”最初是简单的社会动物——Zoon politicon<sup>①</sup>，一如亚里士多德所說的。605 作为这样的人，他能同情他的一切邻人，不管他們的社会地位怎样。只是逐渐地，在不再是“小孩”的时候，他学习以各种观点来看待僕人和老爷；而当他学会这点时，当等級的偏見在他的心中巩固起来时，他，如維拉·阿尔唐莫諾夫娜所說的，就变成像别人一样的老爷了。但是在非常的时代——在某一制度离开崩潰不远的时刻——对于担任剝削者角色的青年候补人的某一部分，是不服从这个一般規則的。这一部分不消說，是由最富同情心的个人組成的<sup>②</sup>。赫尔岑是他們其中的一个，就是由于这一原因，他的媒姆維拉·阿尔唐莫諾夫娜根据痛苦的經驗对他說的阴暗的预言才沒有实现。

### 三

看来，伊·阿·雅柯夫列夫对待自己的农奴不是很殘忍的。这是亚·伊·赫尔岑在《往事与回忆》中所肯定地承认的，而且这也为瑪·卡·萊赫里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所证实的。我們从这本回忆

① Zoon politicon——意即社会动物。見亚里士多德《政治論》，第1卷，第1章。 譯者

② 我在这里用的“富同情心的”这个形容詞，是指同情周围人的苦难的那种能力。这一能力甚至在很有天赋的人物那里也不总是相当发达的。例如，伊·亚·岡查罗夫很难說具有很大的同情心。至少，从他的《僕人》这本随笔中完全看不出他什么时候对“前室”浸透热烈的高情心，像在赫尔岑的回忆录中所看到的那样。

录知道，伊·阿·“不虐待”自己的农民，假使他的僕人有誰偶然犯錯誤，他就給他念最冗长的訓誡，但并不責罵，而主要是不作体罰<sup>①</sup>。

虽然如此，易感受的儿童可能早就看出老爷的家僕在不自由的境况中的很多异常痛苦的事情。例如，那些被送去当兵的青年人的絕望情緒是使他很惊駭的。

“这些可怕的情景对我发生很大的影响。……地主叫来两个警察；他們悄悄地，出其不意地捉住一个被指定的人；这时候村长通常宣告，主人晚上就要命令把他送到衙門，于是这个人噙着泪鬧叫起来，妇女們啼啼哭哭，所有的人都給送礼，而我也送了我所能送的一切，就是說，送了一块二十个戈比的頸巾”<sup>②</sup>。

赫尔岑还回忆起他的父亲如何命令剃掉他的一个村长的鬍子。这一独特的“体罰”使不幸的村长感到可怕的痛苦：“他大声号哭，跪在地上請求除劳役以外，再課他一百个銀卢布的罰金，但別使他受这一耻辱”<sup>③</sup>。

对他产生更为强烈的印象的莫过于《往事与回忆》中所叙述的作为他的伯父（“参政員”）的一个“受洗礼的财产”的厨子的故事和农奴医生托洛昌諾夫的死。

“参政員”把自己的厨子送到沙皇的一个有名的法国厨子那里学艺。学会这門学問以后，他在英国俱乐部服务，发了财而且想贖身得到自由。“参政員”不同意給他自由，說在他死后就无代价地

① 《瑪·卡·萊赫里的回忆断片和亚·伊·赫尔岑給她的信》，莫斯科，1909年版，第15頁980。參照《赫尔岑全集》，第6卷，第41頁。和瑪·卡·萊赫里說的相反，赫尔岑說，他的父亲也实行过体罰，但是这种体罰“是极其不平常的，以至关于它們，全体僕人要談几个月，并且，它們也是由于巨大的过失所引起的”981。

② 《赫尔岑全集》，第6卷，第41頁982。

③ 同上书，第41-42頁983。

让他走。这对不幸的烹饪师起了这样的作用，以至他变成了痛苦的醉汉。有机会亲自看到这一死了的人的赫尔岑写道：

“这里我看得很清楚，这个农奴对主人怀着多么集中的仇恨和恶意；他咬牙切齿地和带着表情地说话，这种表情在一个厨子身上出现可能是特别危险的。他对我什么话都敢说；他爱我，而且常常亲昵地拍我的肩膀，说：‘腐树上的好树枝’。‘参政员’死了以后，我的父亲立刻发给他农奴解放证；这迟了，这等于和他没有关系了，他也就这样不知下落了”<sup>①</sup>。

农奴医生的命运，假使可以这样说的话，是更加悲惨的。他也是属于那一个“参政员”的。主人设法使他得到去外科医学院听课的许可。赫尔岑说，学校结业以后，农奴医生“勉强可以治病”；然而人们承认他有才能，他学会拉丁语和德语。后来托洛昌诺夫和某军官的女儿结了婚，他对她隐瞒着自己的不自由的地位。当可悲的真相被发现时，妻子大受惊吓便离开他和别人逃跑了。可怜的人服毒自杀了。这是1821年12月31日。十一岁的赫尔岑听到托洛昌诺夫的呻吟和他的喊叫声：“烧！烧！火呀！”当有人劝临死的人打发人去找神父的时候，他拒绝了，宣布他不相信来世的生活。他死在夜间十二点钟，临终说：“这是新年，祝贺你！”

607 这一些可怕的细节，显然，青年赫尔岑当时就已经知道了。让他自己说，这一可怕的故事对他起了什么影响。

“早晨我跑到一个作为浴室的不大的厢房里，托洛昌诺夫的尸体已移到了那里；身子如像他死时的那样，躺在桌上，穿着燕尾服，没有领带，敞开着胸；他的面容变得极端难看，已经发黑了。这是我所见到的第一个死人的躯体；我快晕倒了，走出来。新年人家送

<sup>①</sup> 《赫尔岑全集》，第6卷，第47页984。

給我的玩具和圖畫都安慰不了我；發黑了的托洛昌諾夫在我的眼前飄蕩，而且我聽見了他的‘燒——火呀！’”<sup>①</sup>。

讲了托洛昌諾夫的死以後，赫爾岑就說（“在結論中”），僱人對他並沒有任何壞影響，恰恰相反，從他童年就培養了他對任何奴役和任何專橫的不可克服的仇恨。我覺得，我剛才所舉的例子鮮明地證明這一仇恨究竟來自何處。是那些親身悲慘地受到專橫和奴役的痛苦的人，把這種仇恨帶進了富於同情心的孩子的心灵中，是他們在他的心灵中引起了這一崇高的感情，給他的精神的進一步發展以任何東西所不能代替的推動力。

這裡要注意，赫爾岑完全沒有把僱人理想化的傾向。他說，使農奴的兒童習慣於“伺候”，等於使他們習慣於閑散和懶惰，撒謊和酗酒<sup>②</sup>。然而，如我們已看見的，他承認，他所以仇恨任何人的壓迫，正應當歸功於農奴僱人。這怎麼會是這樣的呢？道理很簡單。

在使人習慣於酗酒，習慣於閑散和撒謊的時候，前室並沒有使他——至少，在赫爾岑童年和少年時——同自己的被壓迫的地位調和<sup>③</sup>。而這就是說，前室對人和人之間相互關係的問題的回答，在精神方面無比地高於在地主的書房或者客廳所能得到的回答。只有那些沒有忘記農奴前室所給予的回答的腐樹上的年青樹枝——只有他們才能在那時的俄國成為進步的工作者。

直到現在我國文學史還很少從社會心理學的觀點來加以研 608

① 《赫爾岑全集》，第6卷，第48—49頁985。

② 同上書，第42頁986。

③ 有時候情形不是這樣。旅行家們報道，在非洲某些地方奴隸瞧不起僱仆，認為自己的地位體面些。這在奴隸制那樣的社會發展階段，情形總是如此，在這個階段上，奴隸制，作為“勞動的組織”，完全適合社會生產力的狀況。在赫爾岑的時代，這樣的適合在我國已經不存在了。

究。反过来说，后者也很少从社会阶级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的观点来加以研究。但是，我们关于这课题所知道的一点不多的东西，完全证实，我所说的农奴前室在出身于贵族的我国“否定的”社会思潮的代表人物思想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我要举出莱蒙托夫。涅斯托尔·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先生说：“莱蒙托夫在乡村度过了十三年——不仅是童年时代，而且是少年时代。农民的生活对于他是历历在目的，所以正如人们所说的，他和普通人有着相当密切的来往”<sup>①</sup>。

是不是这一密切的来往把那种后来如此特殊地发展的（或者正确些说，如此特殊地发展不足的）“否定的”潮流的最初种子投入了他的灵魂中呢？

我认为这是极其极可能的。

但是不管就莱蒙托夫说是怎样的，说到赫尔岑——那任何怀疑都是不可能的<sup>②</sup>。如我们所知道的，他自己说，对奴役和对专横的仇恨是农奴女仆暗示给他的。假使是如此，那就很明白，和这个女仆的来往最先使他能够理解自由的宣教，这一来往最先使他接受了这样一些影响，如十二月十四日，如雷列也夫的和普希金的被禁的诗集，如“法国的”老师的恐怖主义的宣教；当然，他比如说和自己的媒姆维拉·阿尔唐莫诺夫娜的“来往”，当然是比听到十二月十四日，或者说，比就学于麦茨来的法国恐怖主义者蒲晓先生更早的。而这就是说，农奴女仆在他的思想中唤起了对任何奴役和专横的仇恨，农奴女仆（她自己丝毫也不怀疑）大力地促使了他以

<sup>①</sup> 涅·科特利亚列夫斯基：《莱蒙托夫》，圣彼得堡 1909 年版，第 18 页。

<sup>②</sup> 契·维特林斯基说，由于赫尔岑的私生子的出身，女仆看待他像半个主人一样（《赫尔岑》，圣彼得堡 1908 年版，第 7 页）。实际上，他的出身促进了他和农奴女仆的接近是完全可能的。

后的政治发展。

#### 四

赫尔岑在1842年6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在野兽圈子里的孤独生活是有害的”<sup>987</sup>。这样的孤独生活对任何人都是有害的。如果命运注定他要怀着爱自由的意向，过孤独生活，那就不知道农奴女仆第一次在他心灵中播种的对奴役和专横的仇恨种子将以何种形式出现。会像在自己少年时期也怀着爱自由的意向而显然陷于不幸的艰苦的精神孤独生活中的莱蒙托夫一样，——可能，他不外乎会骄傲而毫无结果地轻视“庸俗的人群”。

为了阐明我的思想，我引证一个也是从赫尔岑那里摘来的例子。用他的话说，他，因为充满了“蒲晓式的恐怖主义”，有一次想着对自己的一个同年证明处决路易十六是正确的。“全部情况是这样，但是须知他是上帝赐与的皇帝”，听他的话的人这样反对他。“我遗憾地望了他一下，不再爱他，以后一次也没有找他了”<sup>①</sup>。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试想一下，青年的赫尔岑每次想要叙述自己的极端见解时，所有的同年都和这一听话者一样，那么这会发生什么呢？他会遗憾地看待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他会不再爱他们所有的人，虽然，他可能不会不再遇着他们，但是，大概他不会再尝试着在他们前面公开自己的灵魂了。换句话说，他会变成孤僻的，也就是说，变成像莱蒙托夫到自己生命最后时那个样子。但这还不是一切。他既然以轻蔑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同年，也就会习惯于把自己看成一个特别人物，是“人群”所不赏识的人物，也就是莱蒙托夫把自己看成的那样人物。但是这也还不是一切。善感的青年的爱

① 《赫尔岑全集》，第6卷，第90页988。

自由的意向既然在周围找不到回响，对未来也就会产生阴暗的看法。誰不記得萊蒙托夫著名的詩：《有所思》？

我忧愁地看着我們一代！  
他們的将来——不是空虛，就是黑暗；  
而且，在知識和怀疑的重荷之下，  
他們将无所作为地衰老下去。  
刚刚离开搖籃，我們就充滿着：  
祖上的錯誤和他們的事后聰明，  
生活已使我們疲倦，像沒有目的的坦途，  
像別人的節日的宴会<sup>989</sup>。

假使对于赫尔岑，別林斯基以及 40 年代其他的人，生活沒有变成沒有目的的坦途；假使他們避免了萊蒙托夫的絕望，那末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之于那些幸运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使得他們  
610 摆脱了“在野兽中間的孤独生活”<sup>①</sup>。拯救了他們的是他們在同道者的小团体中所遇到的同情。我不想多讲赫尔岑在少年时代和

① 說萊蒙托夫在自己的青年早期有很多热爱自由的意向，在这方面现在有所怀疑是不可能的。涅·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先生說：“在他的青年时代的筆記本中，有不少的短評和詩歌，其中涉及当代的政治事件。他关于这些事件的判断是最自由主义的，在那个年代說来甚至是很勇敢的。对阿拉克切也夫“暴君”的尖銳攻击（《諾夫哥罗德》，1830 年）<sup>②</sup>，对国王最不客气的諷刺（《阿赫莫杰伊的宴会》，1830 年），关于俄国某一黑暗年代普加乔夫主义看来要卷土重来的不大为人理解的预言（《預言》，1830 年）<sup>③</sup>，

虽然这一切是不成熟的和沒有經過深思的，但是显然，萊蒙托夫的思想很早就沿着这个方向工作，而且他后来的被人疑为自由主义的一些詩歌，如我們所知，已不是即兴而是經過很久考虑的結果。在詩人的青年时代的筆記本中同样有两首献给七月革命的詩，都热情洋溢和充滿激進主义的精神，虽然实行方面是軟弱的。有一首詩，很聰明美丽，它是对某一个被逐出祖國的歌者的祝賀，而显然不是由于对詩神的热爱”（上引全集，第 47—48 頁）。所有这一切都是十分值得注意的，但是萊蒙托夫的政治意图，仍然沒有开展，后来看来是完全衰退了。在他的詩中充滿着驕傲而独立的个性反对庸俗社会环境的、个人抗議的調子。

② 参見《萊蒙托夫詩选》，时代出版社 1951 年版，第 105 頁。——譯者

③ 参見同上书，第 98 頁。——譯者



尼·普·奥格辽夫的友谊的那种意义。我只提起这两个青年朋友在麻雀山上散步时所作过的有名的宣誓。

“太阳落山了，圆屋顶在閃耀光輝，城市伸展在山脚下的一望无际的地带中，新鮮的风吹着我們，我們站立着，站立着，互相依靠，于是突然地，互相拥抱，宣了誓：为了整个莫斯科，願把我們的生命献給我們所选择的斗争”<sup>①</sup>。

这一情景能够以其浪漫蒂克的外表引起某些讀者的微笑。但是假如注意到，从那天起麻雀山好像成了它的两个参加者的朝圣地，他們一年要到那里去几次，“而且总是一块儿”，那就一清二楚，它在他們的灵魂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赫尔岑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像强烈激发起来的对全人类关心那样，使得少年时代純洁起来、高尚起来，并把它保持下来”<sup>②</sup>。这无可爭辯地是这样的。但是可以补充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像分享对全人类的关心的可能性那样，把少年时期激发起来的对全人类的关心保持下来。

在大学，在赫尔岑和奥格辽夫的周围，很快組成了一个同志小組——我們的思想发展史中有名的赫尔岑和奥格辽夫小組。属于这一小組的有尼·伊·薩宗諾夫，尼·米·沙秦，瓦·巴塞克，尼·赫·克特契尔，馬斯洛夫，拉赫秦，諾斯科夫和后来知名的天文学家阿·尼·薩維奇。 611

赫尔岑周围的青年学生，如他所說的，是出色的。他們对于科学問題有极大的兴趣同时对于他們周围的社会生活也并不忽視。赫尔岑指出，这一“对社会生活的同情”异乎寻常地提高了大学生們的公民道德。“我和我們的同學們在教室内公开說出我們脑中

① 《赫尔岑全集》，第6卷，第93頁990。

② 同上书，第91頁991。

所想的一切；被禁詩的抄本在人們手中流传，人們讀着禁书并加以議論，虽然如此，我却不記得大学教室里出現过那一件告密或者叛变的事。有一些怯懦的青年人，規避，躲开，但是他們也不作声”<sup>①</sup>。

为了理解赫尔岑后来形成的、但是不消說是和青年的回忆紧密地联系起来的对俄国的看法，在这里指出如下的情况将是有益的。

据他說，社会的差別在当时的大学生中間的相互关系上沒有任何的影响，打算夸耀自己的出身显貴或富裕的大学生，如我們的作者說的，会“像‘水和火’一样地被隔离，会受同学折磨。”不管如何，这主要是貴族青年。德国人和教会学生占多数的医学系，脱离所有其余的大学生，站在另一边。赫尔岑說：“德国人是多少也站在旁边，浸透着西方的市民精神。不幸的教会学生的整个教育，所有他們的概念，都和我們完全不同；我們說的是不同的語言，他們是在修道士的专制主义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受着自己的修辞术和神学的压制，羨慕我們的放肆；我們——討厭了他們的基督教的順从”<sup>②</sup>。

放下德国人不談，我們来回忆一下，六十年代从教会学校出来的大学生不仅沒有暴露过“基督教的順从”，反而，可以說，构成了青年学生的先进队伍。非貴族出身的大学生部分地胜过那时的貴族大学生，部分地使貴族大学生处在自己的影响之下。非貴族知識分子社会成分的比重的这一变化，在我們的社会思想史中获得了表現。当我們的七十年代的民粹派断定，知識分子組織农民中最易受影响的分子并且和他們在一起担任实现“土地和自由”的理

① 《赫尔岑全集》，第6卷，第138頁992。

② 同上书，第127頁993。

想時，他們指的是非貴族出身的知識分子。而當赫爾岑在五十年代之初說，我們的知識分子把西歐思想的最后的（社會主義的）結論帶給人民時，他說的是貴族知識分子。例如，他在自己的著作（《Du développement des idées révolutionnaires en Russie》Paris 1851, p. 84）<sup>①</sup>中就坦白地說，“我國革命思想的工作不是在政府中，也不是在人民中，而是在中小貴族中進行的”。他在某些其它場合，也重複同樣的話。

以下我要較詳細考察他的觀點的這個方面，現在我只想指出，他的思想發展的歷史，證實唯物主義的原理不是思維決定存在，而是存在決定思維。

## 五

赫爾岑—奧格辽夫小組是一個“政治”小組，和它對立的有同樣知名的斯坦凱維奇小組，這個小組以其哲學傾向著稱<sup>995</sup>。“哲學家們”十分高傲地看待“政治家們”，疑心他們缺乏理論根據<sup>②</sup>。然而，不論是對於“哲學家們”或是對於“政治家們”，赫爾岑的這一意見都是可適用的，即那時候的青年學生，既對理論問題有興趣，也不逃避生活問題。我們從斯坦凱維奇小組的一個成員康·謝·阿

① 〔《論俄國革命思想的發展》，巴黎 1851 年版，第 84 頁。〕994

② 赫爾岑說：“被放逐以前，我們小組和斯坦凱維奇小組之間互相不很同情。他們不喜歡我們的幾乎很特殊的政治傾向，我們不喜歡他們的幾乎很特殊的理論傾向。他們認為我們是投石黨人<sup>③</sup>和法國人，我們認為他們是感傷主義者和德國人。第一個為我們和他們所認識的人，友誼地向雙方伸出手來，用自己的對雙方都溫暖的愛，用自己的調解的天性，消除了相互不理解的最后痕迹，這個人是格蘭諾夫斯基”（《全集》，第 7 卷，國外版，第 120 頁）996。

③ 投石黨人——是法王路易十四（1648—1653）年紡紅衣主教馬薩林為相時一個反對在朝黨的政黨，以同在街上投擲石塊的小孩有聯系而得名，他們主要反對封建專政制度。——譯者

克薩柯夫那里知道，在这一小组中“已经形成了对俄国，对生活，对文学，对世界的一般观点”，而且——請注意这点——“大部分的观点是否定的”<sup>①</sup>。假使在“哲学家們”之間是这样，那末在“政治家們”中間否定观点应该更是占支配的地位。

613 “政治家們”是不知疲倦的宣传家。赫尔岑說：“在有可能讲话宣传的地方，我們就把全部心思都拿出来，坚持到底，毫不放松，既不惜时间，不惜劳动，甚至也不惜献媚”……

他們所宣揚的究竟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一問題，我只好再直接求之于赫尔岑。

“我們究竟宣揚什么，很难說。思想是混乱的：我們宣揚过法国革命，后来宣揚圣西門主义和同一的革命；我們宣传立宪和共和，宣传讀政治书籍和集中力量于一个社会。但最多地是宣传对任何暴力，对任何专橫的仇恨”。

我們的先进青年在接触圣西門学說以后，第一次認識了西欧的社会主义。赫尔岑說，圣西門主义是他的信仰的基础，他甚至使用更为广泛的說法：“是我們的信仰的基础”，“而且实质上是永远不变的”<sup>②</sup>。这里他又是完全正确的。他实际上直到一生的最后仍是社会主义者。誰忘記这点，他也就不理解赫尔岑在废除农奴制时代的政論家的活动。而一直到生命結束时，赫尔岑在自己的社会主义中重复了不仅为圣西門的学說所独有，而且是一般空想社会主义所共有的那种錯誤。我所指的是这一社会主义在其理解存在和意識、經濟和政治之間的关系时不能自圓其說。如果我补充說，《钟声》在自己存在的头几年发生过广泛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是

① 康·謝·阿克薩柯夫：《1832—1835年大学生时代的回忆》，圣彼得堡1911年版，第17頁。

② 《赫尔岑全集》，第7卷，第197頁997。

由于社会主义者赫尔岑的观点的这一弱点，讀者大概就会以为我想发表怪論。但是实际情况是如此。下面我将解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sup>①</sup>。現在我只說一点。

在圣西門的体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和最有益的思想就是这一思想：“dans tout pays la loi fondamentale est celle qui établit la propriété et les dispositions pour la faire respecter”<sup>②</sup>。如果被正确地理解，这个异常重要的思想提示出这样的結論，即任何一个国家的法的关系和政治制度，都是由它的經濟决定的。这是純粹的唯物主义思想。圣西門不仅达到了这一思想，而且把它作为自己的关于欧洲文明在近代和現代的发展进程中的許多极为深刻的想法的基础。他证明了，生产是社会联合的目的，因此，领导这样的联合的永远将是领导生产的人。直到十五世紀，生产活动的最重要部門是由貴族领导的农业劳动。所以政治权力集中在貴族的手中。但是逐漸地，随着工业的发展，一个扮演着很大历史力量的角色的新的社会階級即本义上的工业家发生和走上了舞台。这个階級对貴族进行了斗争，并逐渐从貴族手中夺去几乎所有的經濟陣地。在这一斗争中他找到同盟者，和王权联合一起，这一情况說明了路易十四以前法国帝制整个发展的进程。以路易十四为代表的王权摆脱了工业階級而成了貴族的同盟者，圣西門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錯誤，并且不倦地劝說波旁王朝，要他們無論为他們自己或为全法国，都应当尽快地改正自己的缺点，即是說，打破

614

① 关于这点請參看我的論文《流亡者赫尔岑》（刊印在《十九世紀俄国文学史》第13册第150頁，奥夫夏尼柯-庫利柯夫斯基編輯，“世界”公司出版）998。

② 由于手头沒有圣西門的书，我是据 P. Louis 的“Histoire du socialisme français. Paris 1901, p. 66（保·路易《法国社会主义史》，巴黎1901年版，第66頁）轉引的。这段話的意思是：“在每一个国家，基本法是确定所有制和采取保护这一制度所必須的手段”。

和貴族的有害的同盟而轉到“工业階級”方面。

不用說，波旁王朝对他的忠告是置若罔聞的。但是不妨指出圣西門以及所有其它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这一突出的理論錯誤。这一錯誤在于，当說到过去的时候，圣西門把政治权力——因而也把每一个一定历史时期它的代表們的活动，看作是从自己的原因中即从一定时期的經濟关系中所必然得出的后果。而当談到現在和談到将来时，这同一作家把同一的权力看作独立的社会力量，它可以按照自己的裁夺而成为任何一个社会階級的利益的代表。就对待过去說，圣西門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就对待現在和将来說，他是一个純粹的唯心主义者。他的深刻的哲学—历史議論应归功于唯物主义，而奥古斯丹·梯叶里和奥古斯特·孔德襲用这些議論是很多的；他的政治綱領則依靠唯心主义，这一政治綱領在細節上不止一次作了修改，但是始終保持了素朴的空想的性质。

从这一切看来，我上面引用的赫尔岑关于圣西門主义是他的信仰的基础和“实质上是永远不变的”这句话，具有特别有益的意义。我們很快就会看到，作为政論家，赫尔岑重复了圣西門和其它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錯誤：他对政权的代表的裁夺同样寄予了过多的希望；作为政論家他同样忘記了，任何一个政府的可能的限度是由它所产生出来的那种經濟关系的性质决定的。

在某种意义上說，他比起西欧空想社会主义者来甚至更好犯这种錯誤。至少在他的理論观点中阻止犯这种錯誤的东西較少一些。

問題正就在这里。

在西欧的文献中，圣西門和他的学生們远不是如下一种观点的唯一代表者：欧洲社会内部发展的进程决定于“工业階級”和貴族的斗争。早在复辟时代这一观点已为所有的法国卓越的历史家

所掌握，而又從他們轉到俄國作家那里。但是這些俄國作家極為特殊地改變了它，或者，也可以說補充了它。他們承認，西歐社會確實是由階級鬥爭創造出來的，但是同時認為，這樣的鬥爭在俄國內部的发展中幾乎不起任何作用。歷史的這一兩重的、矛盾的哲學是米·彼·波果丁和所謂的真正的斯拉夫派最熱心地製造出來的，然而它也完全沒有被西歐派所駁倒，別林斯基支持它；赫爾岑也支持它。這兩個光輝的作家不管誰都是這樣熱烈地同斯拉夫派進行爭論，都是這樣尖刻地嘲笑他們，但他們都準備和波果丁一起重復說，俄國不是西歐，俄國社會不是階級間相互鬥爭創造出來的，而是——至少，從彼得的時候開始——是由政府的文明化的影響創造出來的<sup>①</sup>。任何人都懂得，俄國歷史的這樣的哲學必然使赫爾岑大大地誇大最高權力那時在消滅農奴制事業中以及在其它改革事業中的可能性。

616

如果我們不注意理論家赫爾岑的這些弱點，我們就會對某些與此有關、現在幾乎是不可信的政論家赫爾岑的一些指望，完全困惑不解。

從實踐的方面說，對於赫爾岑和他的小組有很大重要性的還有聖西門的這一思想：所有的“社會制度應當抱有把人口最多最貧窮的等級在道德方面、智力方面和體力方面都加以改善的目的”。

後來，在說到聖西門的體系時，尼·普·奧格辽夫把這一思想描繪為從有名的法國社會主義者的學說中得出的最主要的實際

<sup>①</sup> 關於這一點，詳見我的論文《米·彼·波果丁和階級鬥爭》（《現代世界》，1911年，三月和四月）999。我們的西歐派在俄國的歷史運動的過程中看出有點和西歐社會發展進程相對立的東西。最常見的是他們引用我們沒有階級鬥爭這一點來論證對立；後來他們很同情地接受卡維林的關於俄國歷史之氏族的性質（和西歐歷史之個人的性質相對立）的思想。別林斯基稱這種思想是天才的思想（《別林斯基，他的生平和通信》，1876年，第2卷，第248頁）。

結論<sup>①</sup>。而凡是熟知赫尔岑和奥格辽夫的文字活动的人，都会同意，这一思想任何时候都绝对地没有离开他们的注意。

## 六

然而我们将不往前面跑。1834年7月19日深夜<sup>1001</sup>赫尔岑被捕了，次年4月他被流放。赫尔岑生活中的第一次流放时期从这时候开始，继续到1840年的3月。他的第二次流放时期开始于1841年7月，那时候他到诺夫哥罗德报到，并定居在沃尔霍夫岸边“面对着那同一的岡丘，十二世纪的伏尔泰主义者曾从那里把雷神象投入河中去”<sup>②</sup>。请看看，外省的生活在他对农奴制的态度方面是怎样影响他的。

赫尔岑在貝尔姆，維亚特加和克里亚基馬河畔的弗拉基米尔

① 参見《钟声》(223)上奥格辽夫的論文：《关于共同問題的私人信件》。第四信。——在这一非常有意思的論文中奥格辽夫把未来是过去的函数这一論点称为圣西門体系的主要思想，并且断定說，这一“简单的思想……不能不导致(重点是我加的。——格·普·)社会改革的必要性，在这一改革中各个有财产的不劳而食者的等級……和无财产的劳动者应当融合成为一个总的的人的生产力……”。应当承认，这一“不能不导致”，是没有足够邏輯根据的。未来是过去的函数这一論点适用一切社会发展时代，然而只是在十九世紀才发生把劳动者組織成为如奥格辽夫在这里所說的“一个总的生产力”的意向<sup>1000</sup>。

② 《赫尔岑全集》，第7卷，第195頁。赫尔岑在第二次流放以前和当时的宪兵队长談話时說：“1835年我因我根本没有参加过的节日事件被流放！现在我因全城都在談的那一謠言而受刑罰。奇怪的命运！”(同上书，第179頁)<sup>1002</sup>。确实是奇怪的！第一次，赫尔岑和奥格辽夫被牽連到节日事件中，囚人們在这个节日歌唱了被禁唱的歌曲。这个节日正好是雅科夫列夫老人命名的日子，所以那一天不論赫尔岑或是奥格辽夫都是在他家中度过的。第二次，赫尔岑的被流放，是因为他在給父亲的信中，告訴了他在彼得堡一个崗警杀害了一个居民的消息。信，不用說，是被拆开了。对于赫尔岑和奥格辽夫怎样会被牽連到他們沒有参加的案件中去这一問題，巴·瓦·安年柯夫回答道：“这是由于政治案子的延伸性以及为求全面而涉及到邻近的範圍和思想的特性”(《文学回忆录》，圣彼得堡，1909年版，第73頁)。这是深刻的然而痛苦的真理！



度过自己的第一次流放时期。在弗拉基米尔期间他的精力主要用于重大的私事：他和娜塔莉亚·亚历山大罗夫娜·札哈林娜的关系。他是1838年5月10日和她结婚的。就在这一年的开头（1月5日）他写信给在莫斯科的她說：“现在我整个是你的，没有别人，而这些人是不需要的。我对所有的朋友說：再見罢。正像我对荣誉事业和活动的想望所說的一样——再見罢！我的整个生命在你身上。当然。我寻找伟大的东西，而在你身上找到了；我寻找神圣的，思想的东西，而在你身上找到了。因此，再見罢，全世界”<sup>①</sup>。后来，结婚以后，这样心情的特殊性减弱了。在《往事与回忆》中赫尔岑写道：“我們的心胸没有因为幸福而与外界隔绝，而是相反，比什么时候都更向所有的兴趣敞开；我們那时候生活得很丰富，而且是各方面的，我們思考，我們讀書，献身于一切，又重新集中在我們的爱情上；我們核对过我們的思索和想望，惊异地看到，我們的同情是多么无限的，在感情和思想、趣味和嫌恶的一切最細微的、业已消失的誤会和分歧中，一切都是多么亲密，和諧”<sup>②</sup>。但单是这几行已表明，他的主要的注意力那时总是集中在他的个人的情感和关系上面。毫不奇怪，这种关系和感情的描写几乎占据《往事与回忆》那几章叙述赫尔岑在克里亚基馬河畔的弗拉基米尔生活的整个部分。至于貝尔姆（順带地說，他在那里呆得并不长久）和維亚特加，在那里缺少地主分子，所以他們对农奴制知道得很少。赫尔岑在边疆一带的流放生活中碰到的現象主要是官僚的专横。在《往事与回忆》中我們看到了他对这种专横的无可比拟的描繪，当然描繪最多的是那个在地主权下呻吟的等級即农民。关于这点，只要向讀者提起赫尔岑关于农民的“馬鈴薯暴动”的故

618

① 維特林斯基，《赫尔岑》，第74頁。

② 《赫尔岑全集》，第7卷，第89-90頁1003。

事就足够了。故事的内容是农民拒绝(按照上级指示)在自己田地上播种冻坏的马铃薯。事情竟闹到了使用霰弹;农民散开在森林里;哥萨克从那里像赶野兽一样地驱赶他们,而且把他们带到柯兹莫杰米扬斯克去审讯……

“噢,审讯是照俄国的老套来进行的:在盘问时对农民施用鞭打,在惩罚时施用鞭打,为了示范而施用鞭打,由于金钱而施用鞭打,把整群的人流放到西伯利亚去……”<sup>①</sup>

同样值得多加注意的是一个充满幽默的故事,这个故事谈到一个“正统的伊斯兰教徒”县警察局长杰夫列特—吉尔杰也夫如何强迫异教徒彻列米斯人改信东正教。据赫尔岑说,这个相当于使徒的鞑靼人由于劳动而得到了弗拉吉米尔十字架奖赏,这使得鞑靼人的同教者面子很不好看。

“我后来在内务部的刊物中读到了关于彻列米斯人所受的这种光辉改教。文章中提到了杰夫列特—吉尔杰也夫的热情帮助。不幸的是,忘记了补充,他由于对伊斯兰教信仰愈坚定,对于教会的热心也就更大公无私”<sup>②</sup>。

因为被流放的赫尔岑根据最高的敕令派定在国家机关服务,他就不管愿意不愿意不得不密切地熟悉对人民福利的官僚主义关心的一些表现。他说,在他的维亚特加的生活快结束以前,国家财产局的盗窃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任命了一个审查委员会来对它进行审查,这个委员会派遣了监察员到各省。维亚特加省长科尔尼洛夫应当派出两个官吏代表他参加这一委员会,其中之一是赫尔岑。“我在这里什么都读到了,有可悲的,有可笑的,有令人讨厌的!案件标题本身就使我很惊异。——《关于乡公所房屋不知

<sup>①</sup> 《赫尔岑全集》,第6卷,第331页1004。

<sup>②</sup> 同上书,第325页1005。

丢失于何处和关于老鼠咬坏一张计划的案件》。——《关于丢失二十三个官家地租条目即十五俄里土地的案件》。——《关于把农民的孩子瓦西里列入阴性的案件》”<sup>①</sup>。最后这个案件的发生，是由于神父吃醉了酒，在行洗礼时把一个女孩当成男孩，錯誤地把瓦西里莎称为瓦西里。她的父亲向有关的上司申訴，請求解答他的疑惑：女孩将来应不应当納人头稅和服兵役。赫尔岑不知道，这一拖延了几年的怪事是怎样完結的，但是他怀疑，“女孩恐怕仍有阳性的嫌疑”。关于这点他回忆起在保罗皇帝的时候一个上校錯誤地把一个患病的軍官登記为死人的事。这个患病的軍官根据最高的敕令被除了名，但是不幸他恢复了健康而提出申請将他仍列入活人的名单中。保罗决定說：“既然关于軍官先生已有最高的敕令，那就要拒絕他的請求”。赫尔岑不无理山地认为，这比瓦西里莎—瓦西里还要好些。

619

赫尔岑在各省对生活的观察所达到的結論并不是极其愉快的，这难道还用說。为了精确，我們順带举出他在《往事与回忆》中就伊斯兰教徒使异教徒改信基督教所表示的意見。他认为，这一改教是我們的官僚所从事的一切改良的典型：“表面，裝飾，blaque<sup>②</sup>，撒謊，堂皇的报告，有人在盜窃和有人遭鞭打”<sup>③</sup>。

換句話說，結果是，“农奴制”的概念比“农民对地主的农奴依属”的概念要广泛得多。这，赫尔岑当然也是早知道的。但是从前所依据的或多或少是抽象的思考，現在則拥有直接观察的全部确凿性。

赫尔岑在自己的第二次流放的时候当上省政府顧問，并領導

① 《赫尔岑全集》，第6卷，第325頁1006。

② [胡搗]

③ 《赫尔岑全集》，第6卷，第323頁1007。

它的第二厅。他在这一工作中管理的是：受警察监视的人，分离派教徒和濫用地主权力的人。因为他自己受监视，所以他也就必须管理关于自己的案件。“想像不到有比这更蠢和更胡鬧的事；我相信，讀过这书的人定有四分之三不相信，然而这是真正的实话”<sup>①</sup>。这是很容易理解的，被监视的赫尔岑是不会給官吏赫尔岑找很大麻烦的。至于說到分离派教徒，那末我們的顧問，查看了他們以后就放心了，因为，据他的想法，最好是为了被迫受害者的利益不把他們提出来。但是为此他要更加努力地处理濫用地主权力的案件。

620 “在前室和女仆中，在农村中和在警察的拷問室中，有着許許多多暴行的受难者；关于它們的回忆，在灵魂中游蕩着，一代一代地成熟着流血的、无情的仇恨，預防它容易，但是停止它未必能够办到”<sup>②</sup>。

赫尔岑尽力之所能来保护不幸的农奴。例如，他很滿意地叙述他如何把退伍海軍軍官斯特魯戈夫希柯夫送交了法庭。这个退伍軍官在自己的庄园中长时间不受懲罰地作尽了“各式各样的坏事”。打輸了官司之后，这个海軍軍官大怒，賭誓要打死他。但是，如赫尔岑所猜到的，由于不习惯陆上作战，这一威胁沒有实现。

不过，像这样的喜悅不是常見的而且不是长久的。工作对于这一諾夫哥罗德省政府的流放顧問越来越不能忍受了。这与其說是因为自己的不自由，勿宁說是因为工作把他变成官僚机器的鏈环之一，在他的良心上加了一重道德責任，要他为这一机器对人民所做的坏事負責。溢出酒杯的最后一滴是如下的一件事。

諾夫哥罗德的地主慕辛-普希金把自己的一个农民和他的妻

<sup>①</sup> 《赫尔岑全集》，第7卷，第199頁1008。

<sup>②</sup> 同上书，第208頁1009。

子放逐到西伯利亚居住。他们这两口子有一个十岁的儿子，地主却把他留在自己身边。有一次，赫尔岑到省政府去，在那里遇到被放逐的农妇，她是为了儿子的事而来的。她跑到他面前跪下，淌着眼泪请他替她说情。当她正对他说是怎样回事时，省长进来了，于是赫尔岑向他转告了她的请求。省长宣布，根据法律，过十岁的儿童，在父母被流放时要留在地主那里。可怜的母亲，不懂得无情的法律，继续哭泣，拉住铁石心肠的省长的脚不放。这使他讨厌，于是他粗暴地把她推开，喊道：“你怎么这样愚蠢，我要用俄国话告诉你，我一点没有办法，你为什么这样纠缠呢！”说完以后，他以坚定的步伐走去作自己的事了。

“我也走开了……我已经够了……难道这个妇女不是把我当作他们中的一个吗？是结束喜剧的时候了。”

‘你有病吗？’因为犯了某些过错从西伯利亚调迁来的顾问赫洛平问我。我回答说：‘有病’。我站了起来，同他告别，走开了。同一天我写了一张关于我害病的报告，从那时候起我的脚就不踏进省政府了”<sup>①</sup>。

## 七

621

1842年4月3日赫尔岑“因病”呈请辞职。他连七等文官的职位也辞掉；但是同时卡肯多尔夫告诉省长说要禁止赫尔岑离开诺夫哥罗德。只是在同年的7月他才被允许迁移到莫斯科，但没有进彼得堡的权利。

流放的旅行结束了，赫尔岑又“自由”了。他力求行动起来。在当时的俄国，对于他唯一可能的活动是写作。1843年就在《祖国纪

<sup>①</sup> 《赫尔岑全集》，第7卷，第213页1010。

事》上出现了他的著名的论文：《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后来（不谈一些较短的论文和同《莫斯科人》的机智的论战）接着出现的《自然研究通信》，长篇小说《谁的罪过？》，中篇小说《克鲁博夫医生》，《Avenue Marigny来信》<sup>①</sup>和中篇小说《偷东西的喜鹊》。这些著作有一些是他已经在外国时才出版的，有些（《Avenue Marigny来信》）是在外国写的；但是所有这些著作都是他在决定不回俄国之前的时期写的。这些著作对于俄国社会思想发展史几乎都是很重要的<sup>②</sup>。遗憾得很，我在这里所能涉及的只是其中有关农奴制的部分，而且用的话也不多。

如上面已经讲过的，这一问题在当时检查制度的条件下，只能部分地为小说家所懂得。所以我也只谈赫尔岑的一些文学作品<sup>③</sup>。

622

作为小说家赫尔岑，是受到果戈里的最强烈的影响的，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阿·魏谢洛夫斯基先生说得很正确，他的小说《谁的罪过？》，在描写手法上以及在对人物和对生活的幽默的评价上，正如后来谢德林的《外省素描》一样，是和《死魂灵》联系着的<sup>④</sup>。但

① 《《马利尼大街来信》》

② 对于这一历史有特别重要性的是他的《自然研究通信》第二信，赫尔岑在这封信中，继黑格尔之后，发挥这一卓越的思想：“证明”客体——就是揭露它的必然性，客体的思想不是思想家唯一的个人财产；他没有在现实中深思它，它只是被他所认识；它是作为潜在的理性预先存在于客体的直接存在中。关于这一思想在赫尔岑自己的思想史中起过什么作用，见上述我的关于赫尔岑的论文。《俄国文学史》，同册第141页”1011。

③ 人们责备赫尔岑的论文暧昧不明。他对这一责备开玩笑地解释说：“维萨里昂·格里哥里也维奇对我们的童话要比对我们的论文喜爱得多，他是对的，在论文中我们不倦地改装以逃避检查，而且还要客气地向每一个岗警点头行礼，而在童话中我们是骄傲地走路，而且也不想要谁知道，因为我们的荷包里有通行证；它可以通行，找到住宿地和给养”（巴·瓦·安年柯夫，《文学回忆录》，第288—289页）1012。然而改装也不总是能帮助他的论文逃掉检查的。他在给基列也夫斯基的信中说，由于害怕检查，他不敢叙述斯宾诺莎的这个哲学观点：“犹太人就是这样的，真不行”。

④ 阿·魏谢洛夫斯基《作家赫尔岑特写》，莫斯科，1909年版，第47页。

是正当果戈里把农奴制看成像自然界某种不可变的甚至是有益的规律的时候（见他的《与友人书简选》），赫尔岑却从心坎里恨透这一制度。对于成为当时地主生活基础的制度的这一根本不同的态度，鲜明地在这两个作家的创作中表现出来。果戈里在天才地嘲笑自己的梭巴开维支们，科罗潘契克们，诺兹得列夫们和玛尼罗夫们<sup>①</sup>时，是描绘——至少是想描绘——他们所独有的和农奴生活没有关系的缺点和败行。我们在赫尔岑那里所看见的完全不是这样。他在艺术的创造力方面大大逊色于果戈里，但显露出思想上大得无比的洞察力。只要注意地读完《谁的罪过？》，你就会清楚地看到，正是在农奴制的基地上生长出了为作者所辛辣嘲笑的涅格罗维将军一家的概念和习惯；你将同样清楚地看到，也是这个制度毒害了将军的“受养育者”留波恩卡生活的青年时代。赫尔岑知道，留神的机警的敌人——检察官盯视着他的笔尖的每一运动。他表达得谨慎。但是被谨慎所抑制住的他的愤怒使得他的嘲笑更为巧妙，因而也更加尖刻。哪怕只提醒一下涅格洛夫将军的乡村消遣就够了。在移居到自己的乡村中以后，他闕下“每天都骂管事和村长，骑马逐兔，带枪走路。既然完全不习惯做任何事情，他也就不能设想应当做什么，只要做一点小事他就满意了。管事和村长这方面对主人是满意的；关于农民我不知道，他们不吭声。过了两个月，在地主家的窗子里出现了一个美丽的女人面孔，开始是带着哭容，可是以后简直是带着迷人的浅蓝色的眼睛”<sup>②</sup>。

迷人的浅蓝色的眼睛是属于一个农奴农民的女儿耶蔑儿卡·巴巴莎的。为使图画完整，只有补充，我们的农村主人醉心于这一令人疲倦的消遣是不久的：“他使自己相信，已改正了经营上的

① 都是果戈里《死魂灵》中的人物。——译者

② 《赫尔岑全集》，第3卷，第18—19页1013。

一切缺点，而更重要的是，给了它以这样牢靠的方向，即使没有他也能行，于是又打算到莫斯科去”<sup>①</sup>。但是在这里幽默还是占着愤怒的上风。加之像这样的调子在果戈里那里也常常遇到。而在农奴家庭女教师索菲亚·涅姆秦诺娃（她后来成为地主别里托夫的妻子和长篇小说《谁的罪过？》的主角之一弗拉吉米尔·别里托夫的母亲）的历史中，幽默让位于剧烈的愤怒，这种愤怒也在索菲亚给自己的迫害者的信中表现出来。一般地说，赫尔岑对属于农奴知识分子的人的可悲的命运显然是非常关心的。这种人的女代表之一，是中篇小说《偷东西的喜鹊》中的女主人公，有才能的女演员，伯爵斯卡林斯基追求之下的牺牲者<sup>②</sup>。别林斯基认为，这一中篇小说含有笑话的味道，虽说写得很有技巧和引起深刻的印象。但是在它里面讲的是真实的事件，而且本身产生一个问题：像赫尔岑所报道的奇闻可能在它下面发生的这样一个制度，应当给予怎样的判决呢？

中篇小说《天职第一》描画了更加黑暗的农奴生活的图景，它的第一部分是赫尔岑1848年之初由国外寄到彼得堡的。他说，他想通过小说的主角阿那托利·斯托雷根表现这样一个人物：充满力量，毅力和才能，但是由于他的意向和他的义务之间经常的矛盾而过着空虚、荒唐和悲痛的生活。小说的名称《天职第一》也指出作者的这一意愿（小说没有写完）。赫尔岑提出的小说的纲要表明，天职（它的要求毒害了主角的生命）无非是广义的农奴的制度对自己的特权的保护者们所提的要求的总和。这样看来，这一小说把农奴制的问题扩大到政治问题的范围。检查机关不允许它出

<sup>①</sup> 《赫尔岑全集》，第3卷，第19页1014。

<sup>②</sup> 这一中篇小说刊登在1848年（即赫尔岑已在外国居住的时候）2月号的《同时代人》上面。



版，于是它在国外被刊载在《中断了的故事》集中（1858年）。赫尔岑以那时候检查病的最大发作来说明对他的小说的检查的严格：

“除普通的民事检查机关外那时还建立了另一种军事检查机关，其成员是侍从武官长们，陆军中将们，军需长们，军事工程师们，炮兵长官们，参谋长们，军官陛下的随员们，校场和卫戍将校们，一个鞑靼大公和两个正教僧人，由海軍部长任主席”<sup>①</sup>。

对有名的高级检查机关的这番俏皮评述，用以说明中篇小说《天职第一》不能出版的原因，怕很难说是公正的。要禁止它的出版，普通的检查机关就完全够了。别林斯基在评定作为小说家的赫尔岑时，异常尖刻地指出，“他描绘不属于法律部门的、而是被多数人理解为理性的和道德的行为的罪行”<sup>②</sup>。但是把从当时的制度的观点看来完全是合法的和正当的行为作为罪行来描写的这部中篇小说，本身必然是这一制度的有罪的仆人，那是非常自然的。中篇小说《天职第一》特别犯了这一罪过，所以它在俄国就不能出版。

## 八

1843年10月9日赫尔岑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以下几行：“……我们斯拉夫人面临的要么是缄默，要么是到国外去说话，如像密茨开维奇所说的”<sup>③</sup>。

在次年1月24—25日的《日记》中写道：“恐怖。一种多么可怕的乌云笼罩在群众中来的人们的头上。想起来真可怕；完全没有过失的人，既没有实际的直接目的，也不属于任何团体，可能因

① 《赫尔岑全集》，第4卷，第69页1015。

② 《别林斯基全集》，第11册，莫斯科1884年版，第390页1016。

③ 《赫尔岑全集》，第1卷，第140页1017。

某种思想方式而被消灭,被压死,处死……。反对亡命国外这种思想的人提出平平安安地走的劝告”<sup>1018</sup>。

由此可见,至少在1843年底赫尔岑就产生了亡命国外的思想,也即移居国外的思想。连续几年,他把“亡命国外”只看作一种不愉快的可能。甚至在1847年1月出国的时候,他还没有意思把这一可能变成现实。然而过了两年之后,他的留在国外的决定就成熟了。他的脍炙人口的书《来自彼岸》的第一章用了这样意义深远的标题:《别了!》<sup>①</sup>。

625 他在这本书中告诉他的在俄国的朋友们说:“我们的分离还要继续很久——可能是永远的。现在我不想回来,以后,我不知道将来这是否可能”<sup>1019</sup>。后来——而且是极其快的——这便成为不可能了。1850年秋,俄国政府通过自己在尼斯的领事要求他立刻回到祖国,预先警告他,绝不同意他延期。由于这样的迫不及待,从他这方面说,他深信回国无论如何是不必要的。这样他就成了侨民了。后来他说,宁肯流放西伯利亚也不要做侨民。但是在西伯利亚同一的全俄检查机关要压在他的头上,而国外的生活却保证他的言论自由。这就使情况发生根本变化。

在我刚才引过的《来自彼岸》一书的一章中他写道:“我留在这里不仅是因为我讨厌再越境时就得重新戴上足枷,而且是为了工作。到处都可以闲坐生活;在这里我除了我们的事业以外没有别的事情……我在这里比较有利,我在这里可以代你们作不受检查的发言,是你们的自由机关报,你们的临时代表”<sup>1020</sup>。

由此可见,当他不得不在缄默和在国外发言之间进行选择时,他选择自由发言。

① 这一章标明的日期是1849年3月1日。

假使注意到别林斯基那时已经去世，那么应当承认，再没有人比赫尔岑更适于担任先进俄国人的“自由机关报”的角色了。大家知道，赫尔岑光辉地扮演了这个角色。

我们现在需要认识一下，他生活在外国时是怎样和农奴制进行斗争的。但是为了完全理解他的这一活动，不妨把他对俄国人民的看法作一最后的总结。有了上面所说的一切以后，未必需要证明，他的整个同情正是在人民方面的。不过，这里还可以看看他的日记（1844年7月9日）中一段极其令人信服的摘录。

“他们（即人民。——格·普·）为了脱离可怜的消沉还缺乏什么呢？智慧在眼中闪烁着；一般说来，十个农夫中，大概有八个不愚蠢，有五个是真正聪明、机灵而懂得事理的；人们从道德方面诽谤他们很厉害，他们狡猾，有意欺骗，但这是当同我们站在对立地位的时候。否则是不可能的，我们公开地合法地掠夺他们，力量不是一样的……”<sup>①</sup>。

如果这段摘录找不出我们的作者对农民的看法的新的另一方面，那么它就成了读者已经知道的事情的不需要的重复。他衷心同情农民，他相信他们的思想品质和道德品质，但是他认为他们是处在可怜的消沉的状态中。赫尔岑的观点的这一方面对他后来在国外的著述工作起了很大的影响。这里对它应当予以注意。如果有人以为刚才引用的摘录中有关的话只是反映赫尔岑观点中无关紧要的偶然的语气，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在这一语气中一点也不

626

是偶然的无关紧要的。同年4月，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叙述坦波夫省一个乡的农民骚动时补充说：“这一乡的所有农民都属摩洛坎教派<sup>②</sup>走在他们前面的是一个唱着圣歌的姑娘。总之，在农民的一

① 《赫尔岑全集》，第1卷，第211页1021。

② 基督教的一个教派。——译者

般緘默中，从分离教派的修道院中，迸发出了这样的声音”<sup>①</sup>。

赫尔岑这里所说的声音，即农民的骚动，不限于当时的教派的圈子。但是在我們报刊的不容争辩的緘默的情况下，甚至那一时代的先进人物也不知道这种声音。不用说，类似赫尔岑在日記中所说的骚动，还絕不能证明农民有自动进行社会政治活动的 ability。后来我們的民粹派，七十年代的“暴动派”犯了很大的錯誤，他們把希望寄托在这种骚动上。实际生活很快从这方面使他們“大失所望”。但是不管怎样，为了說明赫尔岑及其当时的同道者的观点，有一种情况是相当重要的，即他們以为农民比他們在实际中表现的还要沉默和冷淡。換句話說，赫尔岑和他的同道者虽然完全同情人民，却承认并且不得不承认他們暂时还完全不能积极地保卫自己的利益。只有把希望寄托于将来。于是赫尔岑对他們期望很多。

有意思的是，赫尔岑所以喜欢果戈里的《死魂灵》，据他的意見，是因为《死魂灵》虽痛苦地但并非无望地責备了俄罗斯。据他說，果戈里用他的視綫透过臭气的云雾，看見了大胆的充滿力量的民族性。

“乞乞可夫的世界是忧郁的，因为我們实际上是忧郁的；这里也好，那里也好，都把信仰将来和期望将来看做一种安慰。但是不能否认这一信仰它不单是浪漫主义的 ins Blaue<sup>②</sup> 的期望，而是有现实主义的基础的，血液好像在俄国人的胸中很好地循环似的。我常常望着窗外的絳夫，特别是在节日，他們喝醉之后，敲起鈴鼓唱起歌儿，泛舟而行；喊声，哨声，諠嘩。德国人作梦也梦不見这样的游乐；然后，到风暴中去——多么大胆，勇敢：让自己飞去，要怎样就怎样。我能瞧一下你，孩子，——少年，那多好呵，但是我

① 《赫尔岑全集》，第1卷，第193頁1022。

② （往高处）

等不到了；哪怕是在坟墓中我也要为你祝福”<sup>①</sup>。

这种对俄国人民的将来的信仰，远不是永久能使他避免沉重的有时是离绝望不远的心情的。在他的1843年4月21日的日记中，我们读到：

“我们的处境是无出路的，因为错误，因为历史的逻辑指出，我们是在人民的需要之外，而我们的事业是绝望的痛苦”<sup>②</sup>。

然而整个说来占主要地位的是他对俄国的将来的明晰的观点<sup>③</sup>。这一观点被对西欧世界的将来的信仰所支持着。他写道：“你想想看，刚被新世界创立者的钟声唤醒的欧洲就又卑躬屈膝地沉睡，这过去才不过七十五年，而你一看见它现在的状况，虽然离开成就还远，但由于需要，却颇形发达，心灵不由地充满对人类的虔诚的敬仰。法国革命是伟大的；它第一个向世界，向受惊动的人民，向沙皇，宣告了新世界的诞生和旧世界的退位”<sup>④</sup>。

我们马上会看见，他很快地就形成一种对西欧几乎是无希望的看法。于是他就越需要对俄国的信仰了。但就是在那时候，他也没有在任何地方显露过他对农民的主动性抱着希望。至于谈到特别惹起我们注意的他在出国以前的时期，那末他对人民的主动性的不信任，在他的日记中的如下一段里表达得非常清楚：

“不论是谁，政府也好，人民也好，都应当觉醒过来。前者也如

---

① 《赫尔岑全集》，第1卷，第18页1023。

② 同上书，第98页1024。

③ 这一对将来的信仰甚至成了他的某种绝对命令。他这样断言：“恰达也夫有一次很出色地说，基督教观点最大的特点之一是理解 понятие（这里大概是“提高подняtie”的误排。格·普·）1025对德行的希望以及用信仰和仁爱来规定它。我是完全同意他的。不幸的指望，显然无出路的处境的坚定希望，这一方面应当主要由我们来实现。对自己人民的将来的信仰是未来的成功的条件之一”（第1卷，第179页）1026。

④ 《日记》，1843年7月23日，《赫尔岑全集》，第1卷，第130—134页1027。

后者一样,都是难以相信的……”

这几行是1843年12月24日写的。而1844年3月24日赫尔岑断定说:“直到现在只有通过圣经才能向人民说话”。我们要记住这一点。

## 九

628 赫尔岑在国外经历了1848—1849年的革命运动,如像通常所断言的,他由于这一运动的失败的结局而感到失望。这种断言有点不准确,应当加以纠正。

赫尔岑在1867年7月1日的《钟声》上,问巴枯宁道:“你记得我们在二月革命之前的长时间的谈话,在这些谈话里,我,作为解剖专家,指出了西方老人的死亡的增长,而你怀着希望和期待的心情,指出了斯拉夫幼儿刚显露出的生命的增长。我对它是不很相信的,可是我相信一个俄罗斯和它的社会的萌芽”。

可见,赫尔岑对俄罗斯的信仰受到对全人类的进步力量的信仰的支持,这同一个赫尔岑在对待西欧的态度上很像“在二月革命之前”感到失望的赫尔岑。因此不能说,赫尔岑的感到失望只是受到这一革命的失败的结局的影响。相反地,完全可以假定,如果不是他还在二月革命之前就已相当失望,那么它的失败的结局是不会使他感到失望的①。

不管怎样,无疑地,当赫尔岑决定长期留在西欧的时候,他是深深地对它失望了。因为他的这一失望决定了以后他的观点的发展,所以关于它需要谈一谈。

当赫尔岑还“在二月革命之前”在和巴枯宁的谈话中“指出了

① 关于这点,见“世界”出版社出版的德·尼·奥夫夏尼柯-库利柯夫斯基主编的《俄国十九世纪文学史》第十三册中《流亡者赫尔岑》一节1028。

西方老人死亡的增长”的时候，他无疑地是带着或多或少重大的保留重复了斯拉夫派的这一思想：“西方”已经活够了。当后来这一思想由于二月革命的失败经验而在他身上确立起来的时候，它在他那里便采取如下的形式。

现在欧洲的作用完全完结了。从1848年起它的腐化一步一步地增长。只有劳工能拯救欧洲免于腐化。但是“劳工可能被战胜，假使他们被战胜，那么欧洲的腐化将是不可避免的”。有时赫尔岑开始想，“劳工”已经最后地被战胜，因此，西欧的腐化已经不可避免了；有时则相反，在他心中复活了或多或少强烈的希望：西欧的“劳工”的事业还没有完全失败，于是他又开始相信这一事业的不断发展的可能性。这种希望随着国际工人协会的产生就复燃起来。假使赫尔岑注定能看得到西欧工人运动的进一步成就，那么他完全有可能抛弃他对欧洲内部情况的悲观看法。不幸，过早的死亡（大家知道，他死于1870年1月21日）消除了这一可能性。所以我们那些甚至在今天的欧洲除了“小市民习气”以外看不见别的东西（“象我倒没有留心”！）<sup>①</sup>的同时代人有某些表面权利来援引赫尔岑。实际上，这些……怀疑派的情绪和赫尔岑的情绪是毫无共同之处的。他认为，只有工人运动的胜利才能拯救西欧摆脱支配着它的小市民习气。而我们今天的怀疑派却认为小市民习气最鲜明的表现之一就是现代的工人运动。很明显，他们远非赫尔岑的亲族；很明显，他们用他的有名的名字是徒然的。

629

但是我们不谈他们。我们看到，在谈论西方的可能的命运时，赫尔岑是站在阶级斗争的观点上的：要是工人阶级胜利——西欧

<sup>①</sup> 语见俄国寓言家克雷洛夫寓言《好奇的人》。寓言是说一个好奇的人上博物馆去参观，连昆虫都看到了，可就没有看见大象。这句话的意思相当于我国的“明察秋毫而不見輿薪”。——译者

将恢复新的生活；要是不胜利——西欧将彻底腐化。从社会中发生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规定它的内部发展的进一步过程，这种企图使赫尔岑在这里和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信徒接近起来。但是不应当夸大这一接近。赫尔岑只是勉强地使自己对西欧社会主义未来胜利的希望适合于阶级斗争。通过阶级斗争来解决“社会问题”在他看来是最坏的一种解决办法。一般地说，我们伟大的政论家所具有的那种社会主义的空想的性质，几乎是最好地说明他的对阶级斗争的厌恶<sup>①</sup>。1848—1849年的事变使他失望，主要是因为事变是西欧社会的阶级斗争的表现。这一斗争既然是解决劳资关系大问题的比较可靠的手段，也就在他身上产生了一种对理性本身的力量辛辣的嘲笑印象，而他认为西欧社会主义就是理性的最新成果。按照他的意见，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由统治阶级有教养的、公正的代表人物来担负发起社会改造的重任，只有这样才符合理性的要求。西欧生活所给他的种种教训之中，他感到最痛苦的是那种说西欧统治阶级有教养的公正的代表人物完全不想——甚至不可能想——担负起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事业。这就是他对西欧社会的命运取决于工人阶级的胜利(或失败)这一信念完全能够在他身上同他对西欧生活的极其忧郁的看法和睦共处的原因。有了这一信念的时候，他仍然感到失望，第一，因为如上面说过的，他一般地认为阶级斗争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不能令人满意的方法，而第二，还因为无产阶级胜利的机会在他看来是极端渺小的<sup>②</sup>。

大概可以说，他在这方面仍然是一个圣西门主义者。的确，

---

① 下面将指出，赫尔岑虽已感觉到空想社会主义的某些缺点，而且这对于他关于西欧“老人”的意见不是没有影响的。

② 这是他自己的话：“当事情只是关系政治权利的时候，所有有教养的人都站在



1831年11月29日圣西门的(当时)机关报“Globe”<sup>③</sup>写道:“Les classes inférieures ne peuvent s'élever qu'autant que les classes supérieures leur tendent la main. C'est de ces dernières que doit venir l'initiative”(下层阶级只能提高到上层阶级帮助他们提高的那样限度,发端应当起自上层阶级)。显然,赫尔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所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也都是这样想的。所以不能說,在这一场合他特别接近于圣西门主义者。但是这絕不能削弱下一論点的正确性,即赫尔岑所以对西欧失望,是由于西欧社会的上层阶级不願发起社会改革。

赫尔岑很喜欢拿西欧对社会主义的态度来和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态度相比。罗马制定了基督教的理想,但是不能实现它;其它的民族实现了它。赫尔岑认为可信的是,西欧制订了社会主义的理想而不能予以实现,负有实现它的使命的正是俄国。不妨指出,当时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一般地说,认为他们那时代的欧洲社会的情况和基督教出现时代罗马的情况有很多相似之处<sup>④</sup>。赫尔岑只是以俄国人才想得出的这种假设来补充这个比较。有意思的是,赫尔岑的术语本身常常只是他同时代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变相的

631

运动的方面,一谈到社会问题,新的分裂就发生了。有一些人照旧忠于逻辑和运动,但是多数有教养的人由于有反对派的癖性而后退,不知不觉地站在保守的方面。早先有革命者出头替他们说话的人民现在重新落入僧侣的手中,或者仍然处于低微生活的黑暗中孤立无助,以群众的幼稚的发育不全来作掩饰的群众的辩护人,让开了道路,于是我们看到山上几个先知,而下面却是酣睡的人民群众。向前走是害怕的,向后退不可能,对过去的信仰是破灭了;应当等待、调整,保持住需要的和不需要的,保卫既得的,推开新的。帝国也即专制警察的一般暴政,就是如此,它比立宪帝制自然些”(《给旅行者的信》,第6封,《钟声》第203期)1029。

③ 《地球报》。 譯者

④ 見,例如,维克多·孔西得朗的“Le socialisme devant le vieux monde ou le vivant devant les morts, Paris 1848, p. 25”〔《旧世界之前的社会主义或死人之前的活人》,1848年巴黎版,第25页。〕

术语。例如，他的对米什勒的有名的回答即以《旧世界和俄国》为标题。这就使人记起几年以前出版的我刚才指出的孔西得朗的一本书：《旧世界之前的社会主义或死人之前的活人》。差别只在于，孔西得朗所称的旧世界是旧社会制度的拥护者的世界，赫尔岑的这一名称指的却是整个西欧。

## 十

赫尔岑对西欧愈失望，他对俄国的信仰就更具有精神上的意义。如我们所知，这一信仰从前是由对西方革命力量的信仰所支持的。现在对西方的信仰落空了，因此对俄国的信仰更加强了。这好像是怪论：对俄国的信仰，怎样可以在它某个时候所依据的基础被摧毁以后巩固起来呢？我刚才指出过的赫尔岑的社会主义观点的特点解决了这个疑惑。

我说过，按照这种观点的主要实际意义，符合于理性的要求的，只是社会问题的这样的解决进程，在这种进程中，负责发起社会改革的是统治阶级有教养的代表人物。西方这一阶级的代表人物在1848—1849年革命时已表现出完全不能胜任。而在俄国他们好像准备担负起这个重任。我已经从赫尔岑的小册子“*Du développement des idées révolutionnaires en Russie*”<sup>①</sup>引用过一段话，那里说，革命思想的工作在我国，不是在政府中也不是在人民中，而是在中小贵族中完成的。赫尔岑在其它场合也重复了这点。例如，他在1854年2月27日伦敦纪念二月革命<sup>1030</sup>的国际集会上的一篇演说中，这样指出他那时代俄国的特点：“在那里你们会遇见运动的两个胚胎：一个来自上面，另一个来自下面。一个主要是

① 《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

否定的、腐化的、分解的——现在分散成小圈子，但是准备組織大的、积极的阴谋。另一个是较为肯定的，其内部保存着未来組織的幼芽——现在处于睡眠的无作为的状态。我说的是青年貴族和村社，后者是整个社会組織的基本細胞，是斯拉夫国家的生气勃勃的基础”<sup>1031</sup>。

“积极的”青年貴族似乎准备承担解决西欧国家統治阶级所躲避的任务，与此同时，这里还指出另一个社会因素，这个因素虽然非常消极，但据赫尔岑的意见，却是俄国的异常幸运的特点，即土地村社所有制。村社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积极的青年貴族的改良工作容易进行。这样一来，俄国将实现西方在自己的发展中有过的，但是不能体现在生活中的那一社会主义理想。

这一論断的进程向我们表明，《来自彼岸》的作者如何巩固自己对俄国的信仰，尽管他对西欧的信仰破灭了。并且它使人明了他以后的政論活动的所有重要特点。

在定居伦敦以后，他办了一个印刷所，第一个真正自由的，即不受检查的俄国的印刷所，于是立即从事农民解放的宣传。反对农奴制的斗争成了他的最重要的目标。但是向誰进行宣传呢？首先是向貴族。在《尤利节！尤利节！》一书中，他向这个等級写道：

“我们是奴隶，因为我们是老爷，我们是仆人，因为我们是地主……我们是农奴，因为我们使同我们出生一样、血液一样，語言一样的弟兄們不自由。当可咒詛的农奴状态压在我们上面时，我们是沒有自由的……从尤利节起将开始俄国的新生活了。从尤利节起将开始我們的解放”<sup>1032</sup>。

現時人們可能奇怪，在开始为消灭农奴制而斗争的时候，赫尔岑首先却是向那个最关心保存农奴制的等級呼吁。照道理应当是向那个受农奴制之害比誰都大的等級即农民呼吁。但是从赫尔岑 633

本人說来却是完全合乎邏輯的。向农民呼吁的只能是那些指望农民有政治活动能力的人。而赫尔岑完全没有这种指望。在关于俄国可能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看法中，他认为农民是消极的角色，而“青年贵族”才是开创者的积极角色。至于說到赫尔岑所提出的解放农民的綱領是否和贵族的等級利益发生矛盾的問題，那末他的解决办法是希望这一等級的先进部分能够超越这些利益之上。抱这种看法的不只是赫尔岑一人。他的朋友尼·普·奥格辽夫无条件地同意他的看法。

在《北极星》(1856年)第二期上，刊登了奥格辽夫(他那时的署名是P. Ч.)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题目是《俄罗斯問題》。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順便問道：政府在着手解放农奴时能把誰找来作为助手呢？他的回答是这样：

“人民不大能表达那种还多半处于本能感觉阶段而不是处于清楚思想阶段的概念。

大老爷們嗎？这些人有五千个，两万个，三万个，十五万个农奴，但是这是一些从来不接触人民，不关心他們的需要，从来不想，只习惯于花費从天上掉下来的大量金錢，一点也不因放肆无羈而觉得害羞的人。不，这是些不可靠的顧問！……

小地产的貴族嗎？但这是些缺乏教育的，压榨农民身上所有膏脂的人……一些坏顧問！……

商人嗎？但这是一撮喜欢自己的孤癖的人，认为自己是蜘蛛，別人都是蒼蝇，因此，他們用通过各种非法取得的利潤来衡量国家的安宁幸福。一些不可靠的顧問！

官吏嗎？……但这是一个到处搶劫的龐大組織的成員，这个組織的爪牙享用戈比，卢布則逐漸集积到中央。这是些不可靠的顧問！……假如試試触动他們的循环系統，你就会看出官僚主义

的自尊心是什么。一些不可靠的顾问！

剩下的是中等贵族部分，一方面他们受过高等学校的教育，习惯于思想，另一方面，生活在乡村了解人民和他们的需要，同时不因职位而出卖自己的良心。是的，年轻的政府<sup>①</sup>应当面向有教养的俄国人，别看他们服务时间的长短，而要看他们对服务的独立性，别看他们的重要性而要看他们的官职的不重要性”<sup>②</sup>。

再没有比这全部论据更能说明奥格辽夫和赫尔岑当时的观点的了。但是，按照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的意见，农民的解放应当只是俄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第一个重要的步骤。所以，在号召政府和贵族去消灭农奴制的时候，奥格辽夫和赫尔岑极力强调俄国经济的特殊性。

赫尔岑写道：“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从市民的欧洲那里采用的。我们不是市民，我们是农夫”<sup>③</sup>。并且这一思想——整个俄国民粹主义的基本思想——在同一论文中为赫尔岑所详细地论证。

“我们的城市不多，而乡村则到处都是。我国建立西方意义的城市市民社会的一切努力，直到现在只得到空虚的和荒谬的后果。我们的真正市民是一些官吏；商人近似农民，甚于近似官吏。地主自然更是乡村的居民。总之，我国的一个城市几乎是一个政府，即国家的俄国，而一个乡村则是整个的俄国，人民的俄国。

构成我们的特点、独特性的乃是农村有自己的村社自治，有村会，有选举，不存在个人土地所有制，实行按照赋税的土地划分。我们的村社经历过那一艰苦的国家的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通常

① 即皇帝亚历山大二世政府。

② 第274—275页。我引证的是第2版1033。

③ 《北极星》，1856年第2期，第2版。论文的署名是“И—р”，标题是：《前进！前进！》，第VII和VIII页1034。

村社要消灭，但它却在两重的目的（显然是鎖鏈。——格·普·）下保存下来，在領主的棒子和官吏的掠夺下保存下来。”<sup>①</sup>

关于俄国的經濟独特性（它使俄国能够避免西欧发展的“市民”道路）的思想占据了赫尔岑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他认为有必要甚至在他写給亚历山大二世的許多封信中的一封中把它表达出来。我指的是針对科尔夫男爵关于尼古拉一世登极写的一本有名的书而写的信。他在信中說我們是徒劳地要得到西方各民族通过  
635 內乱和严重的損失所达到的真理和結果，之后他补充說：

“欧洲躺在自己病床上，好像是在吐露或者是在遺囑他們悲哀地迟迟地得来的最后秘密，同时指出唯一挽救的道路正是那些强烈地深刻地潜伏在不止一个彼得俄国的、而是整个俄罗斯俄国的民族性格中的要素。所以我們认为，我国的发展要走另一条道路”<sup>②</sup>。

## 十一

赫尔岑和奥格辽夫认为，俄国走上經濟发展的另一条道路所必需的第一个条件，是把农民連同土地解放出来。这样的手段将預告无产階級在俄国的出現和使它摆脱随着无产階級在西方的出現而发生的一切痛苦和混乱。

奥格辽夫在我已經引证过的論文《俄罗斯問題》中感叹地說：“……呵，我的俄国，我願給予昂貴的代价，使你能摆脱西方发展中的一切痛苦——无結果的流血，財產的分散，貧穷，无产階級，形式的法律，不公道的人类法庭、压迫，可耻的市民专制，伪善——你将会和平地发展，通过永恒年輕的改良道路”<sup>1037</sup>。

① 《北极星》，1865年第2期，第2版，第VIII頁1035。

② 《钟声》，第4期1036。

奥格辽夫以为，假使农民脱离了土地，那末贵族“将不在国家中起有教养的阶级的作用，而是起西方的市民的作用”，那时候我国将开始一片混乱，“其残酷性将是可怕的”<sup>①</sup>。对于这种混乱的担忧，显然在奥格辽夫和赫尔岑关于俄罗斯问题的思想中占有重大的地位。在《钟声》第三期（1857年9月1日）刊载的《政府的指示》这一文章中，奥格辽夫写道：

“现在的政府，好像懂得欧洲的革命的因素在俄国是没有的，它在这一方面是用不着害怕什么的；但是，被国家的政府弄得疲倦不堪的和受到警察暴力支持的俄国要求复兴；假使政府不出来领导着这一复兴，那末它可能碰到另一种完全不是欧洲的而是野蛮的仇视文化的革命；俄国的农民革命是更加可能的，因为军队将拥护它；没有一个国家像我国军队尽管服役时间很长，却和人民如此友好”。

不应当认为，以奥格辽夫为代表的《钟声》，只是为了恐吓政府而把俄国可能的农民革命描画成野蛮的仇视文化的革命。固然，他大概不至于完全没有恐吓的愿望。但是，就当时奥格辽夫和赫尔岑的思想方式来判断，必须假定，在上述的文章中这一愿望只是表达了很小程度上夸大农民革命的机会（“农民革命是更其可能的，……”等等）；而把这一革命描绘成野蛮的自发的现象，应当认为是完全符合于《钟声》的出版者的信念的。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见，赫尔岑绝不是阶级斗争的原则上的拥护者。如果说，他断言西方市民社会只能为工人的革命所战胜，那

<sup>①</sup> 假使说，赫尔岑和奥格辽夫害怕俄罗斯贵族“在国家中不起有教养的阶级的作用”而是担负西方的市民的角色，那么，别林斯基则在自己逝世以前不久却达到了完全相反的信念。他在1848年2月15日给安年柯夫的信中说：“现在明显地看得见，俄国国内发展的内部过程不会在俄罗斯贵族变成资产阶级的那一分钟以前开始……”1038。

末，他的这一断言所表现的正是他对西欧的失望。此外，他以为西方工人革命所以不可避免只是由于人民群众的不成熟。在这一点上，赫尔岑的《旧题目新说法》一文中的以下一段话是无庸置疑的：

“关于欧洲的前途问题，我不认为已经最后解决了；但是我忠实地，怀着服从真理的态度，不是反对地，而是偏袒地，对西方研究进行了第十年了，我不是从理论上和书本中，而是从俱乐部和广场中，从它的全部政治和社会的中心点来研究它，我应当说，我看不出有近的和好的出路。不妨看一看，一方面是：工业狂热的片面发展；所有的精神的和物质的财富都集中于少数中等阶层的手中；这个阶层把教会和政府，机器和学校攫取在手中；军队服从它，法官的裁判有利于它；另一方面，看一看群众的不觉悟，革命党的不成熟和摇摆不定，我不会不预见到一场最可怕的流血的斗争就要发生，市民社会很快要垮台，旧的国家制度将革新”<sup>①</sup>。

637 赫尔岑虽然对西欧十分失望，但他不能不看见，俄国的人民群众比起比如法国或者德国的人民群众来，是较不发展的。因此，俄国人民的爆发，在他看来，比这一或那一西方国家的人民起义应当是更少有“好的出路”的。我国七十年代的民粹派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完全不同。西方的阶级斗争一点也不使它们悲伤，而它们全力准备的农民革命，在它们的幻想中完全不认为是“野蛮的仇视文化”的人民运动。在这方面它们同赫尔岑和奥格辽夫是很有分歧的。但是这不过是细节，虽然从策略的观点看是很重要的。至于说到基本的理论观点——例如，对于俄国经济的独特性以及关于它应当走的发展道路的看法——那末七十年代的民粹派整个是从赫尔岑和奥格辽夫那里剽窃来的，那怕不是完全自觉的。所以，我们

<sup>①</sup> 《赫尔岑全集》，第10卷，第285页1039。



有完全的权利說，早在“自由的伦敦印刷所”刊載的初期論文中，赫尔岑和奥格辽夫就已經作为俄国民粹派的奠基人出現了。他們以这种俄国民粹派的奠基人的資格，对农奴制举行了政論家的討伐。

七十和八十年代的“俄国社会主义”的全部文献只是赫尔岑、奥格辽夫和他們的同道者們还在农奴解放的前夕所已开始宣传的那些理論观点的重复<sup>①</sup>。例如，从下面可以看出这一点已經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大家知道，我們七十年代的独特的“社会学家”費了許多力气来制訂“进步的公式”。但是就在这里，他們的一切結論都被赫尔岑和奥格辽夫小組所預料到了。在《俄国在世界展覽会中的地位》一文中，尼·薩宗諾夫回答“真正人类的教育是什么”这一問題时写道：

“个性是通过对待别人和对待整个世界日益多样化和日益复杂的关系，并且是为了这种关系而发展起来的。这种关系愈是广泛同时愈是自觉，愈是正确，个性就会感觉自己愈崇高，愈坚定，就会更加达到真正的自由，即达到自觉的和热烈的执行自然界的确定不移的規律”<sup>②</sup>。

① 关于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文献，这只有在不属于許多方面同赫尔岑有分歧的卓尔尼雪夫斯基1040的影响的范围内，才能談。大家知道，他甚至在俄国对西方的态度問題上同《钟声》的出版者发生过論争。見他的論文《論羅馬崩潰的原因》。赫尔岑这方面則认为卓尔尼雪夫斯基是“純粹西方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他认为它是“俄国社会主义的补充”。他說，卓尔尼雪夫斯基周圍的人“是城市人和大学生，是一群充滿悲傷，有意不滿和憤怒的人，这群人只是由思想运动工作者，无产階級和知識分子构成的”。和反地，在赫尔岑的眼中俄国的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它是从土地和农民的生活，从事实上的份地和現時存在的土地重分，从村社的土地占有制和村社的管理而来的，——而且同工人混合一起去迎接一般社会主义所企求和科学所論证的經濟上的公平”（《钟声》，第233—234期）1041。用不着补充說，赫尔岑认为自己 and 奥格辽夫是这一社会主义的代表人。

② 《北极星》，第2期，第2版，第228頁。

請回忆已故的尼古·米海洛夫斯基的“进步的公式”<sup>1042</sup>，并把它和薩宗諾夫在这里所說的話比較一下，你們就会看到，差別只在于名称，因为一个人所称的进步，正是別一个人所称的教育。而就其內容說，尼古·米海洛夫斯基的“进步”只不过是尼·薩宗諾夫的“教育”的新版。我請多思善慮的伊万諾夫-拉佐姆尼克先生注意这点。尼·薩宗諾夫认为，“西欧人类发展的現时”是和真正的教育的道路完全背道而馳的。依照他的意見，俄国离这条道路要近得多。假如它在工业方面落后于西方，那末“只是因为工业是处在資產阶级的时代，而在俄国沒有資產阶级”。这也是純粹民粹派的議論<sup>①</sup>。

西欧派——他們中間有伊·謝·屠格涅夫——責备赫尔岑，說他对俄国的看法使他和斯拉夫派人接近。他反对他們說：“这些責备本身证明，你們和莫斯科的旧教徒的內訌并沒有平息；这是可憐的”。同斯拉夫派的斗争在尼古拉皇帝去世以后已失去兴趣和意义。赫尔岑憤怒地駁斥斯拉夫派的某些实际的企图：“他們那里有的是拷問室，撕破鼻孔，斋戒，懺悔，梭洛維茨基的寺院”。然而他承认：“我从来不否认，——他說，——斯拉夫人对人民中的活灵魂有正确的認識”。同时他认为，西欧派反对斯拉夫派的通常論据是完全乏味的。不能用西欧的例子来把斯拉夫派人从他們的陣地上击退，“任何一期报纸就足以看出使欧洲受到折磨的可怕的病症”。西欧派喜爱欧洲的思想。赫尔岑也喜爱它們，因为“这是全部历史的思想”，因为“沒有它們，我們會陷入亚細亚的无为主义，陷入非洲的迟鈍性”。只有这种思想将帮助俄国去占有应当属于它的历史遗产。赫尔岑对西欧派說：“但是你們不願意知道，欧洲現代的生

① 尼·薩宗諾夫在某点上和赫尔岑有分歧。但是他們，如我們看見的，在俄国对西欧的态度上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

活是和它的思想不相符合的。你們感覺這些思想是可怕的；這些沒有在本國實現的思想，在你們看來是任何地方都不能實現的”。赫爾岑是不感覺這一恐懼的。他分析了俄國的人民生活，在村社中找到實現在西歐制訂的社會思想的保證<sup>①</sup>。他和斯拉夫派一致的只是在對西歐的看法和對俄國村社的意義的看法。因此在這方面他和他們是十分接近的。對於這種接近的認識他用自已的話表達出來了，這番話是他在这里所敘述的與西歐派進行爭論以後過了幾年向自已的一個斯拉夫派方面的反對者說的。

“一年以前<sup>②</sup>我在那不勒斯和利伏諾之間航行的一个輪船上遇見了一個俄國人，他在讀新版的霍米亞科夫的著作。當他要睡時，我向他借了那本書，並且讀了相當多。把它從啟示錄的語言翻譯成我們的通常的語言，用白天的光來照亮霍米亞科夫用教堂里大吊燈的燈光所照亮的東西時，我清楚地看見了，在許多方面我們同樣地理解了西歐的問題，儘管說明和結論有所不同”<sup>③</sup>。

奧格辽夫在《北極星》，特別是在《鐘聲》從事“俄國社會主義”細節問題的研究時，他在對待斯拉夫派方面，比赫爾岑走得還遠些。他說過：

“任何宗教都是完全不能同意的，因而他們的（即斯拉夫派的。——格·普·）改頭換面的正教也是完全不能同意的，然而我，或者最好說我們，却真誠地，公然地任他們稱為俄國國內發展的先知”<sup>④</sup>。

① 見論文：《舊題日新說法》。這篇論文寫於1857年2月3日，刊登在《赫爾岑全集》，日內瓦版，第10卷，第281—297頁1043。

② 這是赫爾岑1864年10月寫的。

③ 《鐘聲》，第191期，《給反對者的信》1044。

④ 見他的有意思的論文：《高加索的泉水》，《北極星》1861年第6期，第353頁1045。

奥格辽夫已经在十二月党人那里发现斯拉夫主义的萌芽。并且他指出了亚·奥多也夫斯基的诗：《斯拉夫人的事业》。在这首诗里，大概有某种汎斯拉夫主义的气味。然而对本来所谓的斯拉夫主义，它里面却一点暗示也没有<sup>①</sup>。

640 过了许多年以后，伊·阿克萨柯夫称我们的民粹主义是不彻底的斯拉夫主义。既然赫尔岑和奥格辽夫是民粹派的鼻祖，那末伊·阿克萨柯夫大概不会拒绝把自己的估计扩大到他们的学说上面去。应当承认，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也許是完全对的。

## 十二

赫尔岑的国外的出版事业最初在俄国没有博得任何的同情<sup>②</sup>。我们假定一部分地主已经理解到，在十九世纪中叶所形成的经济关系中，农奴制已不再成为贵族的物质繁荣的必要条件。这，已顺便为内务部长彼洛夫斯基的有意思的见证所证实。

彼洛夫斯基还在1845年呈给尼古拉皇帝的有关消灭农奴制的备忘录中就说过，农民问题成了有教养的阶层公开谈话中的十分寻常的题目……”<sup>③</sup>。据同一部长的见证，这些“阶层”在想到

① 诗里面说：

一个斯拉夫家庭的老处女  
身材比所有的人都粗大

她和小妹妹们在地板上忙着，带她们跳环舞，和谱地手牵着手。这个老处女当然是俄国。但是由此到斯拉夫主义还很远。我还得补充，在赫尔岑那里我们遇到有类似如下的自白：“斯拉夫派的劳作准备了可供理解的材料——创举的荣誉和光荣属于他们”（论文：《Repetitio est mater studiorum》（《温故而知新》）（《钟声》，第107期）1046。

② 他在《给我们的人》一文中说：“我们在1854年之初应当缄默”。——《北极星》，第1期，第2版，第230页1047。

③ 瓦·伊·谢美夫斯基：《俄国的农民问题及其他等等》，第2卷，第135--136页。

农奴制的废除时，沒有暴露出恐惧来。

他說“时代和新的关系完全改变了有教养的地主对农奴制的看法：他們，当然害怕自由的后果，他們知道有朝一日在某个方面脱离通常状态和超出服从范围的人民的放蕩无羈；但是，业主們目前完全不害怕由于賜予人們以自由而使自己的财产蒙受損失。地主們本身开始懂得，农民們累了他們，最好是改变这种对两方都不利的关系”<sup>①</sup>。彼洛夫斯基很中肯地指出，由于薩拉托夫，坦波夫，平茲，沃龙涅什和其他几省土地价格的提高以及应用雇佣农业劳动的成功經驗，使地主有了这样的看法。但是他說，虽然我們的貴族的大多数不耽心由于农奴制的废除而失去自己的财产，然而他們却“惧怕变革的后果，这是任何一个知道人民以及他們的概念和傾向的明智的人所应当害怕的”<sup>②</sup>。

641

在貴族的这样的情緒之下，很难期待，他們会响应旅外侨民的号召。旅外侨民的著作是被当作禁品运入俄国的一一如果运入的話。但是彼洛夫斯基的見证是属于1845年的，而当赫尔岑出版其国外刊物的头几期时，貴族的情緒还更加保守了。慑于1848—1849年革命所表現的西欧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我們“社会”，要求一件事：安静和秩序。甚至伊·基列也夫斯基在1848年4月写信給米·波果丁說：“我們向政府只能提出两个要求：第一，它不要把我們卷入无益的战争；第二，它不应当用虛誑的关于自由的謠言来激怒人民，而且当事情在西方沒有平靜的时候不要实行任何新的法律”<sup>③</sup>。

如检查官尼基田科所說的，这正是社会迅速地沉浸在野蛮行

① 瓦·伊·謝美天斯基：《俄国的农民問題及其他等等》，第2卷，第138頁。

② 同上。

③ 《基列也夫斯基全集》，莫斯科1911年版，第2卷，第249頁。

为的时代。而社会情绪的这一低落连赫尔岑最亲密的朋友也不会不受影响。他们对他国外的出版计划采取不同情的态度。1853年秋季,他的一个老友,艺术家米·谢·舍普金来到了伦敦。他劝流亡者停止自己的如现在所说的地下活动。他对他说,“从你的出版能得到什么益处呢?你毁坏无数的人民,毁坏你的朋友們。我願用我的老膝跪在你的面前,請你在時間还来得及的时候停止它”<sup>1048</sup>。赫尔岑不願抛弃地下工作,但是如果沒有克里米亚战争的話,他大概不得不長時間地等待从祖国来的同情的反应。尼古拉一世的死和塞瓦斯托波里的陷落激动了俄国的社会輿論,并給了赫尔岑以新的希望。于是他着手出版《北极星》,后来出版《钟声》。

在《北极星》第一期上赫尔岑寄給新沙皇一封公开信,在它里面包含着 一个完整的改良綱領。他写道:

“国王,給俄国的言論以自由罢。我們的智能憋得慌,我們的思想由于沒有足够广闊的地方而毒害我們的心胸,它在检查員的足枷中呻吟。給我們以言論自由罢……我們有話要向世界和对自己的人讲。

642 請把土地給农民罢。它也正是属于他們的。把农奴状况的可耻污点从俄国刷洗掉,把我們的弟兄們的背上的創疤——这些对人的輕視的可怕的痕迹——医治好。

赶快罢!把农民从未来的殘暴行为中拯救出来,把他們从将要流的血中拯救出来……

……我感到害羞,作为青年人我們要滿足,我們要东西,对于它們的正当性,您是同一切人一样不会有所怀疑的。

第一回我們有这些东西也就滿足了……”<sup>1049</sup>。

我希望,我在上面說了这一切以后,大家会充分理解为什么连同土地解放农民是赫尔岑的綱領的集中点。但是假使这一要求在

我們的伟大的政論家的社会观点方面是可注意的，那末他向新皇帝的呼吁在他的政治思想方式方面也同样是可注意的。

在談到赫尔岑的大学时代和他的醉心于圣西門时，我说过，他后来在自己的政論活动中重复了圣西門的錯誤，即不清楚地理解“經濟”和“政治”之間的因果联系。我那时补充說，这一錯誤不止是一个圣西門所独有的，而是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有的。現在是补充如下一点的时候，即这一錯誤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蒲魯东所有的，赫尔岑<sup>1050</sup>在侨居国外的头几年曾受到蒲魯东的强有力的影响。

伟大的俄国政論家很夸奖地談到蒲魯东：“旧的自由主义和立宪共和主义意义下的政治，他把它放在次要的地位，看作是半过去的走开了的东西。他对于政治問題漠不关心，准备作出让步，因为他认为非本质的东西他就不給予特别重要的形式”<sup>1051</sup>。

赫尔岑在自己的政論活动的极盛时期，也把政治看成是某种半过去的半走开了的东西。这就是他对政府的呼吁的說明。他所以作了“巨大的”让步，正因为政治的形式在他的眼中沒有本质的意义。

只有用这一点才可以說明，例如，这样的事实，即在刊登赫尔岑給亚历山大二世皇帝的信的同一年《北极星》刊登了塔兰杰的一篇論文：《沒有共和国就沒有社会主义》。正当地认为自己是不可救药的社会主义者的赫尔岑，很可能在理論上同意塔兰杰的这一观点，当俄国已开辟了（在他看来）沿着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进的头几大步的可能时，他却不认为需要在实践中以此为指南。这看起来可能是奇怪的，如果我們不知道，他，像蒲魯东那样，对政治問題是“漠不关心”的，而且准备作出让步，“因为他认为非本质的东西他就不給予特别重要的政治形式。”

## 十三

再说一遍：这是一个错误。“政治”——完全不是次要的事情。任何一个一定的政权是在一定的阶级关系的土壤上产生的，而阶级关系归根到底就是所有制的关系。某一国家某一时期存在的阶级关系的性质决定那个国家那个时期的政权的性质。而这一政权的性质反过来又决定它在社会改革方面所能做的事。不能期待，作为贵族等级利益的表达者而历史地形成和巩固起来的政权，会从事和这一等级的根本利益不相容的改革。可是《钟声》的出版人正是期待和要求那时的俄国政权做这样的改革。从而他们决定忍受一系列重大的失望。失望很快地到来了。但是赫尔岑的错误暂时——而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实！——却帮助他扩大他的影响范围。

1857年8月，还不知道同年6月1日出版了《钟声》第一期的康·德·卡维林写信给赫尔岑，劝他着手创办一个战斗的机关刊物。他补充说：“但是机关刊一定是要温和的，通过这一点它就能够受到各方面的关心，成为各种意见的机关刊。我们的社会不大关心政治问题，尽管你觉得有点奇怪。但是行政的、社会的、宗教的问题是很多的。管理机关中的混乱、愚蠢和荒谬达到了极点，可是没有地方可以用例子来痛斥它们”<sup>1052</sup>。俄国的社会由于自己的政治上的不成熟很少研究“政治问题”，而赫尔岑给予它以次要的意义，因为他是从蒲鲁东的观点来看待它的。

不同的原因导致了一样的后果：《钟声》把当时俄国读者最关心的“行政的和社会的”问题放在第一位。后来判明不可救药的社会主义者赫尔岑并不能照着他的暂时的崇拜者大多数所希望的那样去解决这些问题。于是这些暂时的崇拜者就离开《钟声》了。但是一开始他们是被赫尔岑的纲领的温和性所吸引的。阿·米·翁



科夫斯基在自己的回憶錄<sup>1053</sup>中說，在兩三年內特維爾多數的貴族在《鐘聲》的影響下完全改變了整個思想方式。可以設想，在《鐘聲》的影響下特維爾的貴族不再成為貴族了。實際上這當然不是這樣。我們知道，甚至知名的特維爾的自由派對於自己的貴族利益也是維護得並不壞的<sup>①</sup>。但是在一定時期，他們沒有發現，赫爾岑的綱領雖然溫和，卻完全不是用他們的眼睛來看“行政的和社會的”問題。赫爾岑也沒有發現這一點。

當亞歷山大二世在自己的莫斯科演說<sup>1054</sup>中聲明最好是从上面解放農民而不是等待他們开始从下面解放自己時，赫爾岑就用《俄國的革命》的社論（《鐘聲》第2期1857年8月1日）來響應他的這番話。他寫道：“我們不僅是處在變革的前夕，而且已經進入了變革。必要性和社會公論把政府引進一個發展、變化和進步的新階段。社會和政府突然取得了公認的和不可延緩的問題上碰頭了。思想的這一興奮，思想的這一不安和重新解決國家生活的主要任務的熱望，研究思想在其中運動着的历史形式的熱望——這一切構成任何一個根本變革的必要的基礎”<sup>1055</sup>。

赫爾岑預見到了這樣的反對：根本的社會變革是各社會力量相互鬥爭的結果，即這樣一種社會狀態，其尖銳的徵兆在當時的俄國是覺察不出的。對於這一點他回答說，在俄國一切事情的進行，向來不像在西方那樣，不是从下面，而是自上面進行的：它經歷過

---

① 比如，這同一個阿·米·翁科夫斯基1857年12月就農民問題給亞歷山大二世的備忘錄中這樣斷言：“在農奴制情況下，任何一個居住人口的莊園，其價值不在於土地，並且還在於地主必須像土地一樣給報酬的人丁，尤其在某些地方，沒有人的土地是沒有任何價值的”。翁科夫斯基發現的只是：贖買農奴的付款，不應當只由這些農奴來負擔，而要“國家的所有等級”來負擔。阿·米·翁科夫斯基是當時的最自由主義的貴族之一（他的備忘錄照例被轉載在公民讓斯也夫的热情洋溢的書中《阿·米·翁科夫斯基和農奴解放》，莫斯科1894年版，第58—71頁）。

645 的唯一变革是由沙皇彼得一世完成的。他继续说道：“从1789年起，我们是这样习惯，所有的变革都是用爆炸、起义来做，每一个让步都是受暴力所迫，每一步的前进都是由战斗取得，当读到变革时不由地寻找：广场、街垒、流血、刽子手的斧头。无疑地，起义，公开的斗争，是革命的最有威力的手段之一，但绝不是唯一的手段”<sup>1056</sup>。赫尔岑代表《钟声》编辑部声明说，它竭诚地欢迎“人类和平发展道路，而不是流血发展道路……”<sup>①</sup>。

《钟声》（第7期）以《农民的解放》这一论文回答了1857年11月20日给纳兹莫夫的有名诏书<sup>1057</sup>，其中说：

“我们愿意注视去年政府的指示的一切细节，但是细节在祖国所完成着的大事变之前消失了，我们从1858年起就不追溯一些小的细节，而是祝贺亚历山大二世开始解放农民脱离农奴状态。我们深信，他不是冷淡地对待人们的这一热烈的祝贺的，这些人不需要害怕他，而且也不为自己个人从他期待着什么和请求什么，这是俄国的自由的人对于废除奴隶制的沙皇的祝贺。我们感到幸福的是可以从此开始新年：它将真正是俄国的一个新时代”。

写这篇论文的不是赫尔岑，而是奥格辽夫，但是在这里这都是一样，因为，我重复说，赫尔岑所抱的也完全是这样的观点，这一点从1858年2月15日《钟声》第9期刊载的有名论文《三年以后》可以最好地看出来。在这篇论文里赫尔岑对亚历山大二世说：“你胜利了，加里利亚人<sup>②</sup>！我们说这句话是容易的，因为我们在我们的

① 他说的起义是革命的最有威力的手段之一，好像是和我在上面所说的他对阶级斗争的态度相矛盾的。但是第一，“最有威力的之一”还不是“最好的之一”。第二，在1848—1849年的革命中使赫尔岑不安的不是这次革命是暴力的这一情况，而是这一暴力的革命乃是导致“有教养的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分歧的阶级斗争的表现。在1789年的革命中他没有看到这样的分歧。

② 参见本卷第146页译者注。——译者

鬥爭中沒有摻雜着任何自尊和個人的成分。我們是為事業而奮鬥的；誰這樣做，榮譽就屬於誰”<sup>1058</sup>。論文接着說，亞歷山大二世自從他當着大眾表明自己是農民解放的擁護者的時候起，他的名字是屬於歷史的，他的這一步是未來的一代所不能忘記的。按照赫爾岑的意見，亞歷山大二世也如尼古拉一樣，是十二月十四日的繼承者。論文的結束語也就是開頭那句話：“你勝利了，加里利亞人！”。

這里不妨提起關於奧格遼夫的署名的如下一段插話。直到《鐘聲》第9期，他寫的論文總是署名 P. Ч. <sup>1059</sup>，但是在第9期他聲明，對亞歷山大二世用假名來隱匿自己是痛苦的，所以他以後將用自己的真正的全名來署名<sup>①</sup>。再不能有比這更使人感動的話。

646

#### 十四

就在當時，看來也不是所有的人都為這樣的話所感動的。但是無可爭論的，受他感動的有很多很多人，其中包括受人嘲笑的尼·加·車爾尼雪夫斯基。他就新政府的那些步驟寫道：

“大彼得時代的輝煌的業績以及彼得本人巨大的人格征服我們的想像力，他所完成的丰功偉績是無可爭論的。我們不知道未來將把我們安排作哪些外表事件的見證人。但是單是廢除農奴制一件事就已經使亞歷山大二世時代博得世界最高的榮譽。對和平維護者和溫順的人所應允的許願使亞歷山大二世得到幸福的桂冠，……他是開始和完成自己的臣民解放的一個人”<sup>②</sup>。

① 這是1858年二月寫的而在1859年四月奧格遼夫在回答政府邀他回俄國時致皇帝的信中說：“當在俄國統治着的是您的解放意志，而不是那些向您隱瞞真理和人民活生生的生活的自私的、不公平的和無才能的大臣的恣橫時，我就回去。”

② 《車爾尼雪夫斯基全集》，聖彼得堡1906年版，第4卷，第54頁。論文《論鄉村生活的新條件》<sup>1060</sup>。

赫尔岑在向亚历山大二世呼吁时借用了尤利安·奥斯都普尼克的话，而车尔尼雪夫斯基则把《圣经》诗篇中“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为此你的上帝油膏你”<sup>①</sup>这段话作为自己论文的题词。

车尔尼雪夫斯基很快以完全另一种方式响应农民改革的进程。赫尔岑的《钟声》在1858年末就已开始发出了和我刚才描绘的愉快的心情完全不相称的声音。在第25期(1858年10月1日)给编者的信中我们读到：“对于亚历山大还保持信任是枉然的。尽管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但完全是幼稚的行为，现在不至于如此了”。编辑部给这封信作了一个注，感谢写这封信的人，然而还在1860年1月1日的第60期里面，赫尔岑承认，他进入新的十年并不像他迎接俄国的“复兴时代”那样抱有坚定的希望，他对皇帝提出坚定的呼吁：

647

“国王，——他感叹地说——醒醒罢！新年的钟声鸣报了新的十年，这十年可能沿用您的名字；但是须知不能用一只手辉煌地把自己的名字作为农民的解放者写在历史上，而用另一只手签署一些糊涂的反对言论自由和反对青年的敕令。人们欺骗您，您欺骗自己——这是圣诞节，一切都是紧张的。请命令摘掉假面具和好好地看看，谁是俄国的朋友，谁只爱自己的个人利益。对您这是加倍的重要，因为俄国的朋友还可能是您的朋友。请命令快点摘掉假面具罢……”如此等等<sup>1061</sup>。

在第二年4月1日的第95期上，作者在《宣言》这篇文章中，以新的更加同情的态度对待亚历山大，以“解放者”的名字来祝贺他：“农民解放才开始公布宣言。等待着国王的不是休息，不是庆祝会，而是顽强的劳动；等待着人民的不是休息，不是自由，而是新

<sup>①</sup> 语见《旧约》《诗篇》第45篇，后半句略作了改动，原文为：“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译者

的可怕的考驗。快些，快些第二步罢！”<sup>1062</sup>

1862年8月，当人們責备赫尔岑，說他对暴力变革失去任何信仰时，他进行了辯解，证明說，我們可以从国家的政权期待到一切。

“我国的皇帝的政权——只是政权、也即力量、体制、設備；在它里面是沒有內容的，責任不在它的身上，它可以成为鞑靼人的汗和法国的社会保安委员会，——难道蒲加乔夫不是彼得三世嗎？”<sup>①</sup>由于这样的无限的可能，俄国的先进的社会活动家有責任尽一切的努力，把政府引导到适当的道路上。“但是为了使沙皇政权成为人民的政权，这个政权必須了解，那一推动它和想举起它的浪潮，——实际上是海的浪潮，是既不能阻止住也不能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去的，涨潮已开始了，或者早些，或者迟些，而它必将在人民国家的政权和海底的淤泥之間作一选择。你要以所有的見证证明这一点，你要日日夜夜对它喊叫这一点。……让它表示意見——而且只是在它的回答以后你将会知道，它对人民說什么，它号召人民做什么”<sup>1063</sup>。

正因为赫尔岑深信在俄国最高政权的前面有着无限的实际的可能，他才經常連一些和社会政治問題沒有任何关系的問題也向它呼吁<sup>②</sup>。1865年5月（《钟声》第197期）他就皇太子尼古拉的死也

648

① 赫尔岑在自己的一封《給旅行者的信》（《钟声》，第203期）中說，我国的皇帝的政权是某种純粹表面的东西。这是完全和我指出的他的对政治的看法不清楚相符合的。

② 順便說說，現代的社会科学完全不承认刚才指出的无限的可能。但不过在八十年代之初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就重复了赫尔岑的錯誤。这从尼·雅·尼古拉澤的論文，《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解放》（刊登在1906年9月号的《往事》）中可以看出。当尼·雅·尼古拉澤由于米海洛夫斯基所代表的人們沒有提出（指論文中所写的那种場合）政治要求即“宪法”，而对他表示惊异时，他就回答他說，“現在党的情緒不大振奋，而且它（党）相信，政治的形式并不导致爱人民者的政权的巩固，而是导致資产者政权的巩固，这不是进步而是退步”（第255—256頁）。假使“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在八十年代可以这样地議論，那末能够对赫尔岑在五十年代之末所写的表示惊异嗎。他运

写了一封公开信給亚历山大二世。他在信中说：

“人們的生活中有一个极其庄严的片刻；在这个片刻中人从日常的瑣事中觉醒起来，变得巨大，抖掉灰尘，而使自己更新了。信教的人是祈禱，不信教的人是思想。这个片刻是罕見而且是一去不返的。誰要是把它們不在意的和无踪影地放过，他就倒霉！您，国王，在这样的片刻要抓住它。在打击的全部重压之下，带着您的胸上的新鮮的伤痕停一停，想一想，只是不要参议院和宗务院，不要部长們和参謀們，想一想已經过去的事，想想您在哪里和往哪里去”<sup>1064</sup>。然而像这样的呼吁逐步变得越来越稀少了。农民的改革进行得远不像《钟声》的出版者所希望的那样。还在1861年6月他們就声明，事情的这样古怪的行程是他們沒有料到的。于是奥格辽夫开始证明，2月19日的改革并没有解放农民，而是創立了新的农奴制。大約在那个时候，《钟声》編輯部把自己的要求作了新的和激进得多的表現。他們把它們表述为后来常常重复的話“土地与自由”。它用这一新的口号已不是对政府而是对那一后来被我們称为革命的知識分子，正确点說，即有教养的平民呼吁。

一般說来，赫尔岑和奥格辽夫对受过教育的平民知識分子的希望，以同他們对政府和貴族希望的降落同一个程度增长起来。

---

不是向最高政权呼吁的第一个社会主义者。自上而下看政治和在政治上不择手段的空想主义时期的社会主义者，很喜欢作这样的呼吁。我已經举出圣西門为例。我不举其它例子，只指出一个最主要的。蒲魯东的书《La révolution sociale démontrée par le coup d'état du 2 Décembre》（《十二月二日国家政变所表現的社会革命》）是在十二月政变以后立即写成的。这是要把拿破侖三世政府轉变到社会革命道路上的有教益的尝试。为了尊敬赫尔岑，应当說，他对这个政府从来没有抱任何幻想。但是仍然可以认为，尝试对于我們的伟大政論家的策略不是沒有影响的。蒲魯东說过，不論誰干了社会革命，是路易·拿破侖，是查理十世的后代，是路易·菲力浦的后代，或者，最后，还有别的誰，这在社会主义者看来都是一样的（見該书第五版，第12—13頁）。赫尔岑同意問題的这一提法，哪怕是不完全的。

但是在說这一点以前，应当更詳細些地考察《钟声》編輯部对农民連同土地的解放是怎样看的，以及这种观点在事变的影响下是怎样变化的。

### 十五

讀者記得，赫尔岑在自己的第一封給亚历山大二世的信中說到农民連同土地的解放的必要性时，馬上补充說：“土地也是属于他們的”。但这不是說，他要求确立他們对土地的所有权，而不給地主以报偿。相反地，奥格辽夫早在1856年的《北极星》上我在上面引过的論文《俄罗斯問題》中就說到了农民土地的贖买。他說：“通过銀行或其它手續給地主付偿，可以认为，这是受过新教育的人需要花力气去研究的問題”<sup>1065</sup>。按照他当时的意見，应当在中等貴族中去找这样的人。他在《钟声》第14期上登出了一篇論文《再論农民的解放》，文章坚决声称，“要解放农民連同土地而不使地主的利益受損失，只有通过贖买才有可能”<sup>1066</sup>。

奥格辽夫根据科本和迁果波尔斯基的著作做了一个統計，根据这个統計，我国从前的情况是这样：

全部地主的土地	106,228,520 俄亩
其中不好的地	25,190,270 俄亩
	好地总共 81,038,250 俄亩

被抵押在信用机关中的农奴納稅人人数	5,945,533
免除被抵押的	5,124,528
总 共	11,070,061

农民使用的地主的好地和村庄附近的

土地总共	33,000,000 俄亩
其次，地主自己使用的好地	48,038,250 俄亩
不好的地	25,190,270 俄亩 <sup>1067</sup>

6.50 根据这一统计奥格辽夫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应当贖买三千三百万俄亩土地(原文如此!)和它们的居民”。监护会议院应当担任这个工作。根据规定的实际做法，这个会议院拿地主的庄园为抵押，按每个人丁70 銀卢布发给地主一笔款，并且庄园的全部土地都要交作抵押。按照奥格辽夫的草案，监护会议院应当“根据农民此时 *de facto*<sup>①</sup> 所占耕的土地，即他们依其为生并为自己而耕种的土地<sup>1068</sup>的数量，按每个人丁70 銀卢布发给一笔款。在沒有錢的时候，监护会议院则以自己的名义出给地主票据，而自己则从农民那里按人丁在37年内征收完70 銀卢布，同时征收贷款年息5%，资本年息1%。这样整个贖买的手续将在37年内完结。按11,000,000个人丁每人70 銀卢布计算，会议院应当以自己的名义发给地主770,000,000 銀卢布的票据。

这个当然获得赫尔岑赞成的奥格辽夫的草案在《钟声》的篇幅中引起了有意思的论战。第18期登出了一篇《驳〈钟声〉的论文》。一个不知名的作者<sup>1069</sup>写道：“*Et tu quoque, Brute!*<sup>②</sup> 怎样! 〈钟声〉要求俄国农民贖买自己的人权连同一小块他们和他们的祖辈用血和汗所灌溉的土地。*Et tu quoque, Brute!* 但是请说说，看在上帝的面上，怎样，为什么，为什么目的农民应当负着贖买的重担，不管他们是多么无足轻重?”

不知名的作者针对着贖买的思想提出这样的想法：我們沒有过征服，因而也沒有过封建制度。假使米·彼·波果丁有机会讀到《钟声》的这一期，那末应当认为，他在遇到了对他的俄国历史的

① (实际上)

② (“是你，布鲁图斯”) (这句话据说是凯撒(Julius Caesar, 公元前100—44)被刺时，发现他的朋友布鲁图斯(Brutus, Marcus, 公元前85—42)也是刺客之一而说的。——譯者)



哲学的这样别出心裁的应用是会很惊奇的<sup>1070</sup>。

不知名的作者完全公正地指出，在行将到来的农民解放中应当竭尽全力促进他们过渡到自由的状态。

但是为了他们的解放而向他们征人头税，这妨碍了他们过渡到这一状态，单是为了这一点，就应当把它否决。但是他不以这一想法为限。他指出这样一点，就是，按照奥格辽夫的草案，全部赎金应当在37年内付清。他问道，“在整个这个期间内农民应当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他们将附着土地一直到全部赎买完成吗？一句话，在这37年内他们将自由人吗？”

作者针对着奥格辽夫的草案提出了自己的草案。

651

草案的内容如此：每一村的所有土地，除森林以外，划出三分之一无代价地把它交给村社。这一部分土地无论如何每户不应当超过三俄亩。作者清楚地懂得，这样的份地是很不大的，但却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和读者，那就是，份地本身的局限性有其相对的益处。“第一，它使地主失去尽可能少的土地，第二，同时，起码多少地保证农民糊口，保证他们不可或缺的面包，……它对他们指出必须找寻进一步的生活手段，即向地主租地”。这一个稍为有点意外的论据表明，写反驳论文的不知名的作者在捍卫农民的利益的同时，也记起了地主的利益。

奥格辽夫在回答这里叙述的反驳时，首先声明，他从内心完全同意无报偿地分给农民土地。这样的草案是高贵的，很难不同意它。不幸的只在于它是不能实现的。

“大多数地主不仅不同意无报偿地给予农民份地，而且也难以同意赎买，因为他们太醉心的不单是土地所有权，而且是奴隶占有。极少数一部分马上同意赎买；但是对无报偿地给予份地的恐怕只有个别几个人”<sup>1071</sup>。

不过,奥格辽夫也不愿意为自己的草案辩护,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它的缺点。他在草案中所坚持的唯一的東西,“这就是——通过財政手段贖买农民連同土地的思想。这一思想在我国发展着,而且在它的基础上我們的农民村社的未来将生长出来”<sup>①</sup>。

奥格辽夫的这些理由并没有說服不知名的作者。《钟声》第40—41期刊登了他对奥格辽夫的新的反駁文章。这里他同意給地主以300,000,000銀卢布作为土地报酬,但是这也“不是沒有动搖的”,因为在俄国,据他說,有許多其它的需要,完全沒有得到滿足<sup>②</sup>。但是《钟声》編輯部坚持贖买的思想。在第44期的附录中它刊登了解放地主的农民的新草案。

这个草案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說的是应当做什么;第二部分說的是这要怎样做。

652 第一部分的主张是这样出色,这里应当完全轉載出来:

“(1)在解放地主的农民的条件下,保存土地的村社占有制和整个村社机构。

(2)获得解放的是整个村社的地主的农民連同土地,而不是个別人或个别家庭。

(3)一次地进行完全的解放,不要有任何过渡的状态。

(4)把村社現在使用的那些土地归村社占有。

(5)全俄国同时在一天实行解放。

(6)实行完全的解放,即用解放来打斷农民对地主的任何义务关系,并使被解放的农民处在国家农民所处的同样的条件下。

(7)在解放时严格保护地主和农民的利益。

① 《钟声》,第33期,1859年3月15日1072。

② 順带应当指出,他从前也同意給予三千万或四千万銀卢布来补助小地产的地主。

(8)要滿足上述一切条件,解放只能靠贖买来进行。

(9)土地也好,农奴制也好,都应当贖买”。

草案的这一部分的第2—6节,无疑地,含有一些比地主等級的代表們和政府的机关所作的大多数的建議要广泛些的要求。例如,第4节的实现会防止后来出名的“割地”的出現;在实现第6节时被解放的农民可以避免“临时义务状态”的痛苦命运,等等。但是这个草案的以下几条表明,連它的草拟者也很会关心地主的利益。在第7节提醒必須在解放时严格保护农民和地主的利益以后,下一节就声明,双方的利益只能在贖买的条件下才能被遵守。而第9节补充說,属于贖买的不仅是土地而且是“农奴制”。即如赫尔岑會說的受洗礼的财产。最后这个极值得注意的要求在草案中用如下的理由作說明:

“否則地主的利益会大大地受損害。农奴制的被贖买的必要性,在小地主、工业主和有很多仆婢的人的庄园中是显而易見的”。

草案的第二部分开头重复了如下的要求,即归被解放的农民处理的应当是所有事实上他們所使用的土地(反对“割地”)。以下所有各节都指出贖买的思想应当实现。草案的草拟者向政府建議在各县各州成立估价委员会(首都是中央估价委员会)。所有这些委员会应当从当时存在的最高委员会“取得方針”。作者所盼望的各州和各县委员会的組成是有意思的:它們一半应由政府任命,另一半由貴族选举产生。关于农民沒有一句話。这些委员会的名称本身(“估价”)表明,它們的任务是对归属农民的土地进行估价。这一任务一經解决,最高委员会就应当发給地主們以債券,其总数是估价确定的,不过要除掉被抵押的庄园所欠的債務。为了抵銷这些債券,被解放的农民应当每年繳納特別稅。更詳細地考察草案的这一部分現在是完全多余的。我只指出——請讀者記住——

还有一节(第10节),它說,为了抵銷債券而課以被解放的农民的每年特別稅这个負担,“可以立即靠增加国家农民稅、行会捐稅<sup>1073</sup>和仍属于地主所有的土地稅来減輕”。

## 十六

在刊登这个草案时,《钟声》編輯部加了如下的按語:

“我們认为可能而且极端必要把文献中关于这一問題所說的正确、无可爭論的和实际的东西以摘要形式介紹出来”。

然而在它里面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和无可爭論的。就在《钟声》的下一期,奥格辽夫一般地表示拥护草案,认为对这个草案应当提出极为重要的保留。

他断定,一半由地主一半由官吏組成的委员会一定会使地主的手伸长出来。固然,奥格辽夫本人认为,如我們所知,“人民不大能表达那种还多半处于本能、感觉阶段而不是处于清楚思想阶段的概念”(見上面)。但是他毕竟看到如下一点思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即估价委员会所掌管的問題是超过农民的理解水平的。“农民們很容易懂得是怎样回事”,——他完全公正地反駁道。为了糾正草案中与这里有关的一段,奥格辽夫要求:

(1)估价委员会的會議应当是公开的;

(2)参加委员会的政府成員要受过大学教育;

(3)“村社方面的反对要具有法律效力,要在报刊上公布,委员会的成員如对村社的反对和意見不予注意,应受严格的法律制裁”。

解放条例批准以后,为了最后地审查爭論的問題,他建議成立特別仲裁法庭,由双方派出数目相同的代表参加。同时他要求对被揭发恐吓“非貴族等級的法官”的人課以刑事責任。

这样看来，《钟声》编辑部坚持国家赎买的思想。政府对这一思想的怯懦的态度使它很惊异。它说，“我们不理解政府在强制赎买之前的恐惧。它怕的是谁呢？”<sup>①</sup>

《钟声》的某些通信员证明，为了被解放的农民的利益而实行土地强制赎买将只对地主有利。以奥格辽夫为代表的编辑部回答说，假使这是这样，那末“更好的是：农民不妒忌，他们安静地把这些利益让给地主，不过要摆脱他”<sup>②</sup>。

那个反对强制赎买的作者，也反对土地的村社占有制。奥格辽夫在《钟声》上述那一期反驳他时，就中也说，他在村社中看见的不是理想，而是事实，而“这一事实能够独特地发展，如果它不受妨碍的话，可能好得多（比西欧的“事实”——格·普·），因为它对于和平的社会结构提供更多的根据，承认每一个人有使用土地的权利”，如此等等<sup>1075</sup>。

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是顺便地说出来的这个意见，对于阐明当时奥格辽夫的政治观点，因而也是对于阐明我们这里特别感到兴趣的赫尔岑的政治观点提供了一种新的和很有价值的材料。我已经说过，赫尔岑把阶级斗争看成解决社会问题的最坏的手段，除此以外，他完全真诚地宁肯选择和平的而不是革命的发展道路。看来也是完全为奥格辽夫所同意的他的这一见解，每一次当我们谈到赫尔岑对当时的政府和当时的革命者的态度时必须加以注意。我们知道，赫尔岑经常对皇帝呼吁，不是解放运动的所有拥护者都赞许的。以后，他们在先进的圈子里引起越来越强烈的埋怨。《钟声》第64期（1860年3月1日）刊登了一封从外省寄来的署名“俄罗斯人”<sup>1076</sup>的信，尖锐地责备赫尔岑，据来信人的意见，赫尔岑“为

655

① 《钟声》，第51期。社论结尾。

② 见《钟声》的第57、58期<sup>1074</sup>。

自由主义老爷們的話所迷惑”，很賞識地談論那些只能怀着仇恨的心情來談的現象。來信人就赫尔岑的某些夸大的希望提醒他說，“來得容易，去得也容易”。他在結論中堅決地宣稱：“不，我們的情況是可怕的，是不能忍受的，只有斧頭可以拯救我們，除了斧頭以外，沒有東西能幫助我們！”

《鐘聲》編輯部不能同意這個意見。赫尔岑回答“俄羅斯人”說，只要對和平結局還存在哪怕一點希望，編輯部是不會號召訴諸斧頭的。

他解釋自己的思想說，“我們愈深地、愈遠地審察西方世界，我們愈詳細地研究我們周圍的現象……我們對流血的變革的厭惡就會愈強烈”。按照他的意見，這樣的變革作為致命的錯誤的致命的後果，有時是必要的。有時這種革命也是復仇的事件，或者是部落的仇恨的事件。但是在我國這樣的自發情緒是缺乏的，而且“在這方面我們的情況是無前例的”。

把赫尔岑的諸如此類的聲明和他的土地綱領的無可疑義的溫和性對比以後，必須承認，從他的觀點看來，需要有一個真正“怪誕的”“事情進程”才能減弱他對和平解決當時所有俄國社會問題中最大的一個問題的希望。同樣不能不承認，我們的保守者們做了他們所能做的一切來減弱這一希望。例如，當主持農民解放事業的羅斯托夫策夫去世以後，知名的農奴制的擁護者帕寧被任命來繼他的位置。赫尔岑對於他的任命能怎樣回答呢？他以1860年3月15日刊在《鐘聲》上的如下充滿憤怒的短評來作回答<sup>①</sup>：

“關於任命帕寧來繼任羅斯托夫策夫的難以置信的消息證實了。最野蠻最愚鈍的反動派的頭子成了農民解放的頭子。我們得

<sup>①</sup> 它加以類似訃聞一樣的代表哀悼的框邊：這一框邊好像是宣布赫尔岑的某些希望的復滅。

知这一消息后，心情深切悲伤。但是悲伤是不够的，我们的时代是太活跃了。这是挑战，这是蛮横，这是对公论的有意的侮辱和对种植场主党的让步。朝代的腔调改变了，随着它，一切关系也应当改变。编纂委员会的成员们如果重视他们的事业，如果珍视他们将在历史中留下的记忆，如果他们愿意使他们的官僚习气和鞭撻的幼稚留恋得到宽恕，他们应当马上辞职。少数的贵族应当团结起来，并且把解放农民的事业拿在自己的手里。没有什么做错的，帕宁的长身材可以当作戴着帽子的杆子来做恐吓，但是它太狭窄，不能把尼古拉二世的轮廓遮住”<sup>1077</sup>。

读这激烈的几行时，完全可以允许想一想，在我国也不完全缺乏这样能够大大促使对立的社会倾向尖锐化的“自发情绪”。读了《钟声》第76期“国家抢劫合法化”<sup>①</sup>的论文时，也会得到这样的结论。这篇论文是针对那时出现的国家农民赎买自己土地草案的。的确，《钟声》的读者得到了这一结论。但是它的出版人不愿意抛弃自己以前的希望，却热烈地祝贺政府的每一个这样的步骤。据他们的意见，这样的步骤哪怕能部分地符合于他们的希望也是好的。从这方面看，《钟声》第95期（1861年4月1日）的社论《宣言》是非常有意思和值得注意的。

赫尔岑在社论中感叹地说，“第一步已完成了！有人說它比其余的都困难；我们将怀着希望等待第二步，我们愿意满怀信心地等待它；但是一切都做得这样不穩，这样不彻底和费劲！

……亚历山大二世做得多，做得很多；他的名字现在已经超过

<sup>①</sup> 我们知道，按照刊登在《钟声》第44期的草案的Ⅱ部分第10节，已解放的农民支付土地贖金的“负担”，可以靠增加对国家农民征收税款来“减轻”。《钟声》编辑部对此一点也不反对。因此，可以假定，关于赎买国家农民上地的思想所以使它不安，主要是由于这一思想的实现会消除把加在地主农民身上的“负担”轉嫁到国家农民身上的可能。

他的所有的先人。他为人类的权利而斗争，为怜悯而反对那些顽固保守的凶恶的一群坏蛋，——并且把他们粉碎了！这一点不论是俄国的人民，或世界的历史都是不会忘记的。我们从我们的被流放的远方向专制政府中很少见的他的名字致敬，而不引起痛苦的微笑，——我们向他这个解放者的名字致敬！

“但如果他停止，如果他的疲倦的手垂下来，那是不幸的”<sup>1078</sup>。

在《钟声》的下一期奥格辽夫也写道：“今天我们从心坎里对亚历山大二世说：为了自由祝福你！而以后——以后我们要看看将来如何”。

## 十七

这一“将来如何”，我们的伦敦的政论家们很快就看清楚了。在《钟声》第101期（1861年6月15日——即大约在我前一节末尾引证过的奥格辽夫的论文发表后两个月），出现了同一作者的论文《剖解1861年2月19日公布的关于摆脱农奴隶属关系的农民条例这一新农奴制》<sup>1079</sup>。论文证明：（1）旧农奴制为新农奴制所代替；（2）一般说来农奴制没有被废除；（3）人民……受了骗。

奥格辽夫写道，“农民解放是历史的必然性。但是政府是不胜任的，它没有出来领导；然而绳索的发展并不通过它而是违反它。它从手中放过了活流，它除了抱怨自己外不能抱怨别人”。

既然如此，完全可以理解，《钟声》的下一期（1861年7月1日）对于人民需要什么<sup>1080</sup>的问题给予了响彻着革命号召的回答：很简单——人民需要土地和自由。同时证明，土地正是属于人民，因为他们“自古以来实际上占有了土地，实际上把汗和血流在土地上，可是衙门在纸上用墨水把这土地登记到了地主的份上和……国库的账中”<sup>1081</sup>。



但是就在这里也还没有驳斥贖买的思想。論文的作者說，虽然地主有三百年不公平地拥有了土地，“但是人民不愿意得罪他們”<sup>1082</sup>。再往下我們见到贖买农民土地的新草案，这个草案建議37年內向地主支付整整十亿銀卢布<sup>①</sup>。作者认为可以容忍这样的贖买的思想，“只要人民現在自己耕种并居住在它上面的土地全部归于人民就行”，如此等等。

这一論文像是《钟声》的某种新嘗試，使貴族相信，对于农民問題，照赫尔岑和奥格辽夫看来正确的那种解决方法是必要的。第115期上以《地主需要什么？》为标题的論文也应当认为是类似的嘗試。假使对于农民需要什么的問題編輯部的回答是“土地和自由”，那末在自問他們的从前的占有者需要什么时，它說，他們需要理智和金錢。 658

“理智是为了不同人民爭論和发生意見分歧，否則人民将要打死他們，而政府要压迫他們。金錢是为了在理智之下生活和雇人做工。現在还有時間考虑，再晚就迟了。”

我从其中引出了这几行的論文沒有署名；但是我絕對沒有任何理由假定，赫尔岑不論在什么地方都不同意它的內容。所以我把它当成他对当时情况的看法的順便的表示。既然把它看作是这样的表示，我就可以說，1861年12月，我們的伟大作家的政論家的思想又回到他在国外从事宣传的最初时期的那一个出发点。

在他的自由的印刷机上印刷的第一本小册子中，赫尔岑向貴族呼吁时感叹地說：“尤利节！尤利节！”这还是在尼古拉一世当政的时代，那时候赫尔岑对于政府的善意并不抱任何希望。后来，亚历山大二世当政开始的时候，赫尔岑已不是向貴族呼吁，而是向政

① 以前的草案只說7亿7千万。

府呼吁，他对它证明，它没有什么好怕贵族的。然后来到了他对政府失去了或几乎失去了信仰的时候。于是他又向贵族呼吁，劝说他们，说他们除理智和金钱以外不需要任何东西。关于金钱，不消说，高贵等级是容易同意他的。在这方面，这个等级是永远容易同意大家的。但是关于理智的要求部分，要谈妥是无比困难的。而当赫尔岑深信贵族的理智不像《钟声》的理智的时候，他就越来越离开“老爷”，越来越频繁地向平民知识分子呼吁。

在小册子《尤利节！尤利节！》里赫尔岑向贵族们指出了政治自由是历史付给他们以换取他们放弃农奴制的代价（“我们是奴隶，因为我们是主人……从尤利节起我们的解放开始”）。在六十年代初重新向贵族呼吁时，赫尔岑又提出政治自由的问题。但——这是极端重要的——他已经不是从贵族的而是从全体人民的（“全体等级的”）观点来看它了。第102期的社论宣布人民需要土地和自由，人民可以通过向贵族支付十亿卢布以获得土地，社论还提出这样的要求：

659 “应当使赋税和义务由人民本身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在自己中间进行分摊……人民的代理不会欺骗人民，不会从他们那里多拿分文”<sup>1083</sup>。

然而从《钟声》诸如此类的声明中清楚地看出，在它的出版人看来，“政治”照旧是“次要的”。赫尔岑和奥格辽夫并不忙于研究政治问题。1861年7月提出了我刚才所指出的通过人民选出的代表来“分摊赋税和义务”的要求以后，《钟声》只是过了二年才考察这个问题：俄国能不能实行代议制，什么样的人来当它的代表？<sup>①</sup>第166期（1863年6月20日）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① 见1863年第164期奥格辽夫的论文《宪法和经社会议》（《某些问题的清理》）。

那一期說，俄国能实行代議制：“专制政体不可能再維持下去，除代議制外，其他出路是沒有的。在俄国，正如在整个人类中一样，其他出路是想不出来的”<sup>1084</sup>。但是等級的利益，据作者（也即奥格辽夫）的意見，在我国是沒有被代表的：“在俄国，乡的、城市的、部落的和地方的或州的利益，是不分等級被代表的”<sup>1085</sup>。从这一信念出发，作者在第 164 期认为应当以宪法来和縉紳会議对立。

他在那里解释說：“宪法可以作为等級的宪法产生出来。它可以作为現成的規章而产生，命令人服从它”。

相反地，“縉紳会議，作为从所有自治机关选出的人的代表大会，必須以非等級的选举为基础，其集会目的不是执行特定的、命令下来的章程，而是为了按照自治机关的需要处理俄国的土地，为了使所有者的权利、使选举产生的行政机关和法庭合法化，为了划分区域和建立政府的形式”。

可見，《钟声》出版人观念中的縉紳会議是立宪会議，其召开不仅是为了制定俄国的宪法，而且是为了“使所有权合法化”。能否期待理智和金錢需要会迫使我們的貴族支持这样的要求呢？未必。貴族等級的理智必定給“所有权合法化”这类不确定的話以更精确的意义：已成立的縉紳会議的农民代表要爭取貴族的土地权。而諸如此类的爭論無論如何連自由主义的阿·米·翁科夫斯基的口 660  
味也是不可能合适的。这就是为什么《钟声》的声望在貴族界（以及有貴族情緒的人們中开始迅速地下降了。伊·謝·屠格涅夫在給赫尔岑的一封信里說明“《钟声》声望的下降是由于奥格辽夫在主持<sup>1086</sup>。但是这个奥格辽夫又有什么不好呢？不用說，就自己的文学才能說，他比赫尔岑要差得多。但是他的論文从文学方面說完全不是这么坏，不致用自己的难懂的詞句吓退讀者。所以应当寻找别的說明。而为了找它也不需要走得多么远。

赫尔岑鲜明的抒情的才能使他成了一个无可比拟的揭发者。所以每次当有机会揭发官僚（我希望读者相信，那时候这样的机会是很多的）或那部分顽强地保卫自己的旧特权的贵族时，赫尔岑就拿起笔来了。假使你愿意在这里（由于可尊敬的文学传统）用“皮鞭”这个辞来代替“笔”这个词，那末我要说，就自己的才能的特点说，赫尔岑在《钟声》主要地是从事鞭打。他自己也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才能的鞭打的特点。无怪乎他开始自己的国外宣传时，高兴地向俄国社会的落后分子挑战。他预先清楚地知道，他们由于他的鞭打而感觉不舒服。但是忙于鞭打工作的他，时间仅够他概括地表述自己的纲领的基本论点。详细发挥这些论点的工作必须别人来做，不用说，首先是他最密切的同志奥格辽夫来做。我有时候听到这样的意见，说奥格辽夫对当时的社会政治问题，看得比赫尔岑深刻。并不是如此。赫尔岑各方面都比奥格辽夫有才干。当他把注意力放到某一个理论的或实际的问题时，他阐述得不仅清楚些而且深刻得多。《钟声》出版人留下给民粹派的社会政治理论中，所有多少比较深刻的和新的东西都不是属于奥格辽夫而是属于赫尔岑的。但是发挥这一理论的若干个个别论点的，往往是奥格辽夫，而不是赫尔岑，因为赫尔岑如前面说过的，忙于揭发和鞭打。这引起了两重的错觉。第一，某些人认为奥格辽夫是比赫尔岑更深刻的作家；第二，那些不喜欢把他们所不同情的《钟声》编辑部的社会观点归之于赫尔岑的人，把它们完全归之于对这些观点作详细阐述的奥格辽夫。伊·谢·屠格涅夫就是这样做的，这就说明了我引证过的他的关于奥格辽夫的意见即关于《钟声》声望降低原因的意見。难怪法国人说：Ce sont les enfants des autres qui gâtent les nôtres<sup>①</sup>。

①（别人的孩子毁坏我们的孩子）

实际上赫尔岑和奥格辽夫之間在那时候只进行了分工，而不是观点上不同。因此我要而且以后还要常常在涉及赫尔岑本人的著作中引证奥格辽夫。这样的引证对于說明赫尔岑的观点是必要的。

## 十八

在《钟声》第134期(1864年5月22日)《往哪里去和从哪里来》这篇文章中，我們讀到：“你消灭县、州警察局局长，废除国家的法院，但是把巨量的土地财产仍留給貴族，你們那里就会出现地主的行政机关，地主的法院，虽然农民也占有了一部分土地和免除了劳役”<sup>1087</sup>。

把未来的縉紳會議的基本任务归結为减少地主土地占有面积这样的提出問題，只能得到那些完全抛弃了自己的等級的——在这个場合确切些說应当是階級的即地主的——观点而轉变到农民的观点的貴族的同情。《钟声》編輯部感觉到了这一点，現在它也已经无条件地贊成土地問題的急进的解决。第131期刊登了一篇异常有意思的論文《拥护人民的声音(地主的信)。第一信》。这一論文的作者，无疑地，属于彻底地过渡到先进的平民知識分子陣营中的地主之一。他主张把他所已拥有的全部土地交給人民，而且主张留在地主那里的土地由农业劳动組合耕种。論文以这样的話来作結尾：“我个人将使用我的全部劳动以使用事实来证明，农业劳动組合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我的最后的話是：拥护人民和到人民中去”。

以奥格辽夫为代表的《钟声》編輯部异常同情地对待民粹派地主的这一論文，并且暗示現在它要放弃它某个时候为了事情的和平进行而对貴族所作的让步。奥格辽夫現在是这样議論：

“既然规定从一般地方税中抽出一部分给地主以补偿他们把土地让给农民，既然在那些本来就没有地主耕种的免役庄田里所有的土地都让给农民，——那就不应当在徭役庄田里留给地主土地。他们得到补偿，还要什么呢？他们要在村社的土地上有一份，和农民一样耕作，让他们作为农民留在村社，像所有的人一样地都归村社，地主和其它人一样也是村社的成员。只有在那时候，前地主农民和前国家农民的土地才会相平，才会有统一的地方自治会和统一的地方自治的土地”。

可以没有任何夸大地断定，这里奥格辽夫说出那一后来在八十年代之初的革命文献中获得表现，而且，在一定的意义上，确实是人民的思想的“平分土地”的思想。但是不言自明，这一人民的或者精确些说农民的思想是不能和比较大的地主的理智和和睦共处的，尽管他们当中的一部分有自由主义的情绪。伊·谢·屠格涅夫绝不是反动分子。然而《钟声》的新纲领使他产生了毫不掩饰的愤怒。

他在自己的一封信中解释道：“我们和奥·及赫……的主要不一致正在于：他们轻视俄国有教养的阶级，并且几乎把他们践踏在污泥中，认定在人民中有革命的或改良的原则；实际上这是完全相反的。革命这个词的真正的生动的意义——我可以补充说，就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说——只存在于有教养的阶级的少数人中，而这就足够使它胜利了，只要我们不摧毁自己”<sup>①</sup>。

这里以异常有教益的调子把谬误和真理掺杂在一起。现在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赫尔岑和奥格辽夫绝对无意轻视有教养的贵族，更无意把他们践踏在污泥里。我要提起赫尔岑在1854年2月27

<sup>①</sup> 《康·德米·卡维林和伊·谢·屠格涅夫给亚·伊·赫尔岑的一些信》（并给某些其他人——格·普·）国外版，第153页。

日<sup>1088</sup>为纪念二月革命而举行的国际会议上所作的演说。在这篇演说里他称青年贵族是两个未来俄国运动的“萌芽”中的一个。我也要提起奥格辽夫如何劝告政府，要它号召一方面在高级教育机关受过教育并习惯于思考，另一方面又在乡村中生活并熟悉人民和他们的要求的那部分中等贵族来帮助当时才开始的农民解放事业。伊·谢·屠格涅夫认为赫尔岑和奥格辽夫轻视有教养的阶级是非常错误的。

663

但是同时从自己的观点看来，他又是完全正确的。“有教养的阶级”不能不在赫尔岑和奥格辽夫的新纲领中发现对它的轻视的态度。这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一回事。

读者可能记得一幕法国喜剧，剧中说到父亲在读完为他的女儿准备的，而且是在她的口述下写成的婚姻契约草案以后，惊叹道：“但是这里说的只是关于我的死！”(mais dans tout cela il ne s'agit que de ma mort!)。“有教养的阶级”知道了《钟声》的新纲领以后也完全可以惊叹道：在它里面实际上谈的只是关于它的死。但是，谁希望某一阶级死亡，谁当然不会对它这样的阶级怀着一点尊敬的态度。伊·谢·屠格涅夫很好地抓住这一点。能够接受赫尔岑和奥格辽夫的这一新纲领的，只有那些准备放弃自己的一切阶级特权的有教养阶级的代表。而伊·谢·屠格涅夫是属于它的那一无比众多的有势力的部分，这部分人是完全不願放弃特权的。像他这样的人，在赫尔岑和奥格辽夫只限于攻击贵族的等级特权(包括当时的农奴制在内)时，他们是同情的。但是一当他们看见赫尔岑和奥格辽夫开始攻击贵族的阶级特权即他们的土地所有权时，他们就仓皇失措了。这里意见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它的发生完全不是由于奥格辽夫似乎是支配了《钟声》，而是由于他和赫尔岑一样，的确是不可救药的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一词，作空

想社会主义解），虽然在《钟声》存在的头几年对之加以称赞的多半是自由主义者。

对于这点必须补充的是，赫尔岑和奥格辽夫同情那时候非常强大的波兰运动<sup>1089</sup>。自由主义者即在这问题上不可能不和“不可救药的社会主义者”发生意见分歧。《钟声》的声望的低落不能不使赫尔岑痛心。然而他个人还不明了引起这种低落的原因。

在《钟声》第135期（1862年6月1日）上他登出一篇短评：《莫斯科不同情我们》，带着讽刺的题词“再见罢，莫斯科，亲爱的避难所”<sup>1090</sup>。在这篇短评中他确实和莫斯科告别了；但是他的和它告别表明，某个时候在他的关于俄国社会主义的贵族“萌芽”的观念中，空想的成分是多么的强。

664 短评是从《钟声》编辑部接到的莫斯科通信员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开始的：“莫斯科不同情你们，相反的，——通信员写道，——我们这里都是历史的人，不属于任何一个政党，我们也不能容忍激进主义。不要以为我说的是某一个小组。不是的，我说的是一切的人，不消说，小部分的青年除外。我们这里的人尊敬你们的信念的真诚，从你们所报道的大部分消息中获得益处，关于你们的谈论不外出于爱，但是同情也仅限于此”。

赫尔岑以许许多多辛辣的讽刺的言词来回答莫斯科的这一报道。但是辛辣的讽刺只是掩盖他自己的绝望，这种绝望马上在痛苦的冗长议论中暴露出来：

“从三十年代、四十年代起，从别林斯基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和格兰诺夫斯基开设自己的课程的时候起，莫斯科是怎样地变化了！……

一切，后来发展起来和暴露出来的，一切，意见和人们现在集合在其周围的，——一切都是在这个黑暗的莫斯科的夜里，在可怜



的大學生的燭光之下，在第四層樓上的同志的談話中，在青年和少年的友好的爭論中誕生出來的。在那里從曖昧的意向的朦朧之中，從痛苦和希望中，逐漸分離出兩個光點，兩盞火車頭燈，飛速地長着，像兩隻狼眼一樣，投出兩道長光：一道投向已走過的道路，另一道投向即將面臨的道路。在莫斯科，有過當代的智慧的創議，這個創議的里面提出了所有的切身的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花費了心血和智力，花費了所有的余暇時間，花費了全部的生活。別林斯基和霍米亞科夫在莫斯科發展起來。格蘭諾夫斯基的講座在莫斯科長成為社會抗議的讲坛”。

到六十年代初，莫斯科比起過去赫爾岑在它的大學中學習的時候或者比起他流放回來時同霍米亞科夫在葉拉金娜家裏<sup>1091</sup>的晚會上爭論的時候來，無疑地是大大改變了。然而在莫斯科的生活中從來沒有過這樣一個時期，在這段期間，它的所謂社會，用大學生小組的眼光看待俄國生活的問題。假使在六十年代初這個社會和當時最先進的作家們在對農民改革和波蘭運動的評價上有分歧的話，那末這再自然也沒有了。用社會情緒現在已經起了變化這點來說明這一分歧，等於說對三十年代或四十年代期間的社會情緒有不正確的看法。在我剛才引證的赫爾岑的几行中顯然正有這樣不正確的看法。從这几行所說的話看來，似乎古老時代的貴族<sup>665</sup>的莫斯科蔑視自己的重大的經濟利益，大概準備甚至跟着別林斯基後面走；可是到六十年代初卻變化這麼大，以至把這些利益都記起了，因之也就放棄了對《鐘聲》的新的土地要求的支持了。實際上“莫斯科”——當然不止一個“莫斯科”——不願意支持這些要求，是有其充分原因的，那就是這個要求如若實現，整個大土地所有制就要化為烏有。

赫爾岑和奧格辽夫希望有教養的少數的貴族，會擔負發起往

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农民村社所必需的改革的责任。他们以为，由于教育，他们会把自己提高到自己的阶级利益之上。实际上能够提高到这些利益之上的只是个别人。其余的大群贵族或者是顽强地维持自己的等级的特权，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以自己的比较先进的部分为代表，放弃这些特权，但无论如何是不肯抛弃自己阶级地位中的经济优越性，即牺牲自己的土地所有权的。这点当然也是应当预料到的。我要多谈一些。在从理论过渡到实践，即从制定他们的俄国未来社会发展图式转到宣传农民土地解放时，赫尔岑和奥格辽夫自己马上感觉到，在向贵族呼吁时，至少应当爱惜他们的土地占有的利益。正因为如此他们也就赞成赎买——如我们所知，远不是对贵族无利的赎买——农民占用的土地。但是同时可以说，在认识界线上，他们照旧保持着对有教养的少数贵族的信仰。贵族越显得不能把自己的利益拿出来为解放运动牺牲，《钟声》的出版人越不理睬贵族，他们就越发倾向于责备贵族，因为贵族的行爲不符合于他们在以俄国与西欧对立而梦想俄国社会主义的未来繁荣时对贵族所寄予的希望。这似乎是很奇怪的。但是在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中我们常常碰到这样的奇怪现象。空想社会主义者一般期待和要求于有产阶级的比这个阶级所能给的要多得多，从而感到大失所望。其所以如此，当然不是由于对有产阶级的轻视，而是由于过分地把他们理想化。

## 十九

666

1862年5月奥格辽夫写道：“和人民一致的那一部分贵族，应当加强自己之间以及同农民之间的团结”<sup>①</sup>。

<sup>①</sup> 《钟声》，第134期。

这里作者照旧向贵族呼吁。但是他作这一点，好像是对他的旧的植根已深的习惯让步。假如贵族愿意在村社的土地中有自己的一份，那末他们就应当和其它的农民平等<sup>①</sup>，在宣布了这一点以后，奥格辽夫，不消说，不认为在贵族中间能找到这样土地纲领的许多拥护者。不过，《钟声》编辑部那时候已经清楚地看到，读者公众的绝大多数是不拥护这一纲领的。在1864年1月1日那一期，赫尔岑对于他在俄国的拥护者多不多的问题回答说：

“不，不多，至少就我们所知，特别是从软弱的、动摇的、细小的、怯懦的离开了（一些由于害怕，另一些由于愚蠢）的时候起；由于在三重——公开的、秘密的和文字的警察——监视之下必须缄默，剩下的就显得更少了”<sup>1092</sup>。

然而他并不因为自己的同志少而觉得不安——他相信思想的力量。他写道：

“需要的是很多的信仰，很多的忠诚，很多的真理，而人数的数目是会达到的。这不是征募，也不是凑人数。在山洞中人数微弱；基督教徒增长了力量，在地下道中他们团结成不可摧毁的神圣的疯人团体，不论一个世界的未开化的野蛮，或是另一个世界的神圣的文明都不能支配他们”<sup>1093</sup>。

换一句话，可以这样表示：“虽然在现在的时候我们的同志很少，但是以后他们将很多”。因此自然会发生一个问题：据《钟声》编辑部的意见，它的为数众多的未来的同志应当从哪一个社会阶层中出来？

靠“青年贵族”只有极小的希望。赫尔岑和奥格辽夫的图式照旧把消极的角色分配给农民，认为他们是有教养的少数的教育对

<sup>①</sup> 他的论文的这一段我在上面引用过。

象。那就只好指望平民知識分子了。

1864年10月,奥格辽夫在《給許多人中的一个》的信中极詳細地說到平民知識分子。

667 “他們不是代表那一部分放弃了自己的等級的少数貴族,就是代表那些完全沒有走进官界或抱着厌恶心情当官的平民知識分子。他們除了不是靠理論而是靠生活結成协会,并且不是依靠城市,而是依靠人民(人民給他們提供( ? ——格·普·)到处生气勃勃的扑灭不了的地方自治机关的成員的基础),不可能用別的方法来向前推进<sup>1094</sup>。

我們在这里看見,实际上《钟声》編輯部現在指望的只是那一能够放弃階級利益观点的貴族中的微小部分。不言而喻,今天的有觉悟的无产階級也乐意在自己的行列中为这样的貴族部分划出地位。但是,假使今天的有觉悟的无产階級的理論代表有时候必須編入那些其个别成員能够轉到工人方面的社会階級、等級或阶层的話,那末他們在自己的清单中把貴族几乎是放在最后一个地位。而当奥格辽夫談到非貴族平民知識分子的成分时,他首先指的是貴族的少数。这在极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在当时的俄国放弃自己的階級观点的貴族,毕竟是我们在今日資本主义国家中所能遇到的要多些。除此以外,这里又应当注意到根源于旧的宝貴的回忆中的旧习惯。

在說到赫尔岑的大学时代时,我已經指出,参加那时的进步小組的主要是貴族青年。而且我引用了他自己的证言,按照这个证言看来,教会学校的学生是大学生中的落后成分。不錯,那个时代培养出了像維·格·別林斯基这样的平民知識分子。但是維·格·別林斯基只是一般規則中的有特別重大意义的例外。他的出現指出了以后将是什么,而不是指出那时候是什么。极其值得注

意的是，别林斯基在其文学活动的初期本身极其不信任平民知识分子。且看他在自己的有名的《文学的幻想》一文中怎样评论他们：

“这个等级最辜负彼得大帝的期望：他们总是靠几个铜子来取得文凭，把俄国的明智和机灵应用来干可耻的职业——解释敕令，学了一套鞠躬行礼和亲太太的手的本领，熟谙用自己高贵的手去干下流的毒打勾当”<sup>①</sup>。

对平民知识分子所以抱有这样的成见，是因为他们在俄国的“文明”发展史中起了以前的官吏的作用。这种成见只是在六十年代才消除，当时这个社会阶层的进步代表出来领导解放运动。但是就在那时候它也不是马上消散的，因此《钟声》编辑部甚至在向平民知识分子呼吁时，也首先把他们看作是彻底和自己的“高贵的”等级决裂的青年贵族。

668

奥格辽夫把“国家的智力的、因而也是动力的角色”<sup>②</sup>分配给平民知识分子。大家知道，这就是以前他和赫尔岑分配给“青年贵族”的同样的角色。因此，依照他们当时的意见，学生青年和以前一样应当扮演重要的角色。不但如此。从前，当赫尔岑相信政府的时候，他把青年和有教养的理论家看作是将从上面开始改革的最好的执行人。《钟声》编辑部以奥格辽夫为代表坦白地说出这点。现在，当对政府的信任消失的时候，赫尔岑和奥格辽夫正是期待有教养的理论家来发起改革。这样，学生青年在他们眼中拥有更大的意义。无怪乎在大学生“闹事”时赫尔岑在《钟声》第110期写了一篇论文：《巨人在觉醒！》<sup>1097</sup>。同样可以理解，对于因“闹事”而被开除出高等学校的大学生，他劝告他们到人民中去。

① 《赫尔岑全集》，第二卷，巴甫利柯夫版，圣彼得堡1896年，第23页1095。

② 《钟声》，第190期1096。

“到人民中去！面向人民！——这里是你们的位置，科学界的被放逐者；看看……从你们出来的将不是书吏而是俄国人民的……战士”<sup>1098</sup>。

与此同时，《钟声》（第105期）劝告举办秘密印刷所。一句话，在当时的《钟声》里我们看到的几乎都是七十年代民粹派的（革命者）刊物给学生青年所作的那些实际指示。

1863年3月，《钟声》编辑部报道了俄国产生“土地和自由”<sup>1099</sup>社以后补充说：

“土地和自由！对于我们来说是亲切的词，我们曾经用这个词来发表意见，在冬天的尼古拉也夫的夜里，我们用它宣告今天的黎明。‘土地和自由’曾经是我们的每一篇论文的基础；‘土地和自由’出现在我们国外的旗帜上和伦敦印刷机印出的每一张传单上”<sup>1100</sup>。《钟声》编辑部有充分权利写这段话。‘土地和自由’的口号，的确是它的每一篇论文的基础。既然它是它的每一篇论文的基础，赫尔岑和奥格辽夫就应当被认为是俄国民粹主义的鼻祖。另一方面，由于同一个原因，他们必然同那些最初对《北极星》和《钟声》敲过掌的俄国社会的自由主义分子断绝往来。我已经说过，与伊·谢·屠格涅夫的意见相反，赫尔岑也和奥格辽夫一样是民粹派。现在只有对赫尔岑的看法极其肤浅的人，才会比如写这样的几行：“在《钟声》里最后取得了优势的奥格辽夫的领导意义（他的具有村社社会主义精神的宣言当然没有达到人民那里），使得《钟声》的一部分拥护者和它疏远起来”<sup>①</sup>。使得这些拥护者疏远的是一个极简单的现在未必为人们所知的情况，即他们这些拥护者，只要达到消灭农奴制以及某些“行政上的”和“宗教上的”改良（请回忆卡维

① 契·维特林斯基：《赫尔岑》，圣彼得堡，1908年版，第363页。

林的信)；然而赫爾岑却把農民解放本身只看成到社會主義之路的第一步。

同樣有人說1862年初到倫敦的米·亞·巴枯寧似乎大大有助於《鐘聲》編輯部的轉變，但是早在1861年，《鐘聲》的論文里就越來越常聽到尖銳的民粹派的調子。不錯，赫爾岑說過巴枯寧在到倫敦以後，立即着手使《鐘聲》革命化<sup>①</sup>。但是他要求這一出版物的是什麼呢？

“宣傳是不夠的；需要不可或缺的附刊，需要建立中心、委員會；有近處的人和遠處的人是不夠的，需要有‘全獻身的和半獻身的兄弟’、邊疆的組織、斯拉夫人的組織、波蘭人的組織。B. 認為我們溫和，不會利用當時的形勢，不大愛用斷然的手段”<sup>②</sup>。

從赫爾岑的這個陳述首先看得出，巴枯寧和《鐘聲》編輯部之間的意見分歧，我們現在可以說，是策略性質的而不是原則性質的。從這段話也看得出，巴枯寧對《鐘聲》的兩個編輯是同樣攻擊的。完全可能，在實踐上，奧格遼夫比赫爾岑對巴枯寧作了更多的讓步。他的讓步可能也使赫爾岑的行為中的某種東西變了樣。我完全樂於同意：不必對巴枯寧讓步。但是不管不適當的讓步引起的錯誤如何，它們只限於在實際的領域，對於赫爾岑的理論觀點不能有半點影響。誰都知道，從1862年6月15日起《鐘聲》開始出版副頁《總謂徹》(Общее Вече)<sup>1102</sup>，這是辦給分離派教徒看的。某些人認為這個“計謀”是巴枯寧對《鐘聲》的有害影響的表現之一。維特林斯基先生說：

“這裡不僅是錯誤的思想，說什麼舊教本身可以是革命的力 670  
量，並且編輯部所持的立場也是錯誤的。編輯部正像早些時候恩

① 着電號是他加的。

② 《遺作選集》第200頁1101。

格尔逊在《康德拉其雅的幻象》中一样，閉口不談自己不信宗教的真实情况，而站在信仰聖經和傳說的人們的观点上，并从它們里面寻找自己政治信念和社会信念的立脚点”<sup>①</sup>。

它当然是这样：不信教的編輯部既然用信教的人的語言來說話，也就使自己处于錯誤的立場。旧教徒不可能是革命的力量，这一点也是正确的。但是須知恩格尔逊的《圣康德拉其雅的幻象》是在赫尔岑的出版活动刚开始的时候出現的，并且那时候巴枯宁也好，甚至奥格辽夫也好，都还没有来伦敦。这就是說，出版这种“幻象”的錯誤应当算在赫尔岑本人的賬上。而这一錯誤的原因非常简单：第一，他討厌检查官的作用，而第二，这可能更重要些，——他不相信人民有能力理解严肃的政治語言。我写完第八章时，曾請求讀者記住赫尔岑 1864 年 3 月 24 日所写的日記中的一句話：“直到現在同人民只能通过聖經說話”<sup>1103</sup>。讀者現在看到，這句話的確不妨記一記，因而維特林斯基先生把它忘了是沒有道理的。

## 二十

維特林斯基先生順便从赫尔岑 1863 年 4 月 29 日給奥格辽夫的信中引用下面几行：

“我們代表着俄国运动的积极因素，我深信这一点，并且在所有的国内問題上我們所賦予的运动的性质都是一样的。我相信我們的力量，同时我不相信，怀孕六个月就能分娩。而我以为俄国就在第六个月中。我很快使你迷惑，也很快使你清醒。不要把現成的力量給我，而让我撫摸撫摸活的胚胎。当然，活的胚胎活动在一般的情况中，活动在人民的天才中，文学潮流中，在改良中等等。

<sup>①</sup> 契·維特林斯基：《赫尔岑》，第 364 頁。



但是在哪里它是这样的成熟和突出，像……你在‘土地和自由’中找到的呢？我看不出这一点，……你不以为克里米亚战争发生以后，实际上俄国最需要的是清醒过来嗎？而为此它需要的是安静的、深刻的、真正的宣传嗎？你是有能力办到这一点的。宣传可以变成鼓动，但不是鼓动。这就是为什么我有时反对你的鼓动的論文”<sup>①</sup>。

671

維特林斯基先生沒有觉察出，这几行是駁斥他的观点的。其中沒有一句話說到赫爾岑和奧格辽夫之間原則上的分歧。赫爾岑承认，他有时不得不反对奧格辽夫的論文。但是从他那里我們得知，爭論的对象是这样的問題：在現在的时候比較需要的是宣传还是鼓动？关于什么能成为宣传的内容並沒有談到，其原因很簡單，就是在这里，在一般社会政治观点的領域中，赫爾岑和奧格辽夫之間不存在着任何意見分歧。而这些一般的社会政治观点的宣传，即主要的是农民土地解放的观点的宣传，应当是俄国的正确发展所必需的社会主义措施的鏈条中的第一个环节，——关于这一点是完全足以吓坏赫爾岑的自由主义的崇拜者的。

赫爾岑說：“在一切國內問題上我們所賦予的运动的性质都是一样的”<sup>1105</sup>。单是这句话就很清楚地表明他和奧格辽夫之間是沒有原則上的意見分歧的。但是假使两人要对某一問題賦予“一样的运动”的性质，那末由此还不能得出結論說，关于他們所賦予的运动速度将如何的問題，他們之間是完全一致的。这里他們之間的意見分歧是完全可能的，其引起的原因通常称为气质。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更易于陷入迷恋；一个人信仰是全心全意的，而另一个人的信仰时而为怀疑所削弱。所有这一切都是常有的，所有这一切

<sup>①</sup> 契·維特林斯基：《赫爾岑》，第362—363頁1104。

我们在我们所关心的场合都看到。赫尔岑说：俄国现在处在第六个月的怀孕期，而奥格辽夫有时却认为，怀孕已接近其天然的结尾，很快就要开始生育了。他在自己的《对大俄罗斯人的回答的回答》中甚至预言什么时候会发生人民爆发，按照他的意见，“必然在第六年来到”<sup>①</sup>。可以有充分信心地断定，在赫尔岑看来，类似的“必然”什么时候都不会有多大的。然而这里也不应当有半点夸张。奥格辽夫虽然易于陷入迷恋，但从没有达到宣扬“突然爆发”的地步。大家知道，这种“突然爆发”后来成为巴枯宁的策略基础，并且始终强烈地倾向于这种“突然爆发”。为了说明奥格辽夫的策略观点，我要引证第17期（1863年7月1日）上他的一篇论文：《罪过和荒谬》。

他在那里说：“我们不要无秩序的爆发，也不需要流血；我们要的是，人民集合起来，集合起来和集成坚强的合理的队伍，使它的严密的队伍的起义能达到如下目的：召开縉紳会议来巩固人民的土地权，来在俄国建立民选的法庭和管理机关，来宣布信仰自由和巩固尊重人类的良心和意志的社会秩序”。

在有这样保留条件的时候，赫尔岑是不难和奥格辽夫一致的，尽管他们之间有关于“怀孕时期”的分歧。

重要得多的是维特林斯基先生所完全忽视的问题的另一方面。

赫尔岑和奥格辽夫某个时候曾经醉心于黑格尔的哲学，他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世界观的发展中都大大归功于它。但是如果我说赫尔岑在受伟大的德国唯心主义者的教育方面比奥格辽夫取得了更大的成就，那不见得是错误的。固然，他从德国唯心主义者的

<sup>①</sup> 在农民解放以后。所引用的奥格辽夫的论文发表于1861年11月1日《钟声》第108期1106。

教育里面吸收的远不及这样一些人如像费尔巴哈、馬克思或恩格斯所吸收的。他对黑格尔哲学的辯证法方面评价不足<sup>①</sup>。但是从一切可以看出，他对它比奧格辽夫注意得多。这也表现在他对那时候的社会主义的态度上。为了坚定地相信社会主义未来的胜利，单是相信社会主义是好人的美妙理想，对他来說是不够的。他应当弄清楚导致这一美妙理想的发生和保证其实现的那一社会发展的进程。他的这一理論需要沒有完全为他自己意識到<sup>②</sup>。然而这一需要的存在，在他的关于一般社会主义和局部地关于西欧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所有議論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假使他还在二月革命以前同巴枯宁談过关于西方的“老人”必然死亡的話，那末他的怀疑主义在这一場合是为以下情况所引起的，就是他认为西欧社会主义理想只是吸引人的一种理論，在社会生活的邏輯中沒有真正的依据<sup>③</sup>。另一方面，假使他开始把俄国看作負有实现西欧社会主义理想的国家的話，那末其原因是他认为俄国的村社能够起社会主义客观基础的历史作用，而这一基础，据他的意見，在西欧是沒有的。

673

但是不言自明，俄国的村社要起这一社会主义基础的作用——或者，如赫爾岑所說，“萌芽”的作用，只是在它的进一步发展（如我們的作者所理解的）所需要的一定的社会政治条件之下才有可能。这样的条件的缺乏会使“萌芽”遭到死亡的威胁。赫爾岑感觉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以特別的毅力坚持了农民連同土地解放

① 是他把黑格尔的哲学评价为“革命的代数学”。这是极好的评价。但是他也认为蒲魯东是一个极好的辯证論者。这表明，他不明了黑格尔的辯证方法最深刻的本质1107。

② 假使他完全意識到它，那末他是会在自己前面提出那一后来为馬克思所解决了的理論任务的。

③ 关于这一点的較詳細些的意見，請參見我的論文《流亡者赫爾岑》1108。

的思想。但是当农民的改革获得了为《钟声》称之为怪誕的那一方向时，就不能不看到，萌芽的进一步发展的条件是极其不利的。由此就完全有足够的邏輯上的理由发生这样的問題：“萌芽”一般地說能不能活下去。大家都知道，俄国的文献，从馬克思主义在其中出現的时候起，就对这問題进行了很多的研究。但是，认为赫尔岑本人也发生了这一問題是有根据的。

1863年秋，我們的作者在《寄自那不勒斯的信》中說：“看到这里，在强有力的资产階級不存在的条件下，首都的群氓仍然是拉薩隆尼<sup>1109</sup>，便不由得要想，由于 Selection<sup>①</sup>这个严重的法則，人民也只有通过资产階級才能提高到較为发达的生活”。

还在1848年初，別林斯基也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但是，深深鄙視西方“小市民”的赫尔岑不可能像別林斯基那样愉快地解决它。使他得到現代的文明民族必須通过资产階級这一結論的是他的如下的悲观的論調：

“可能，资产階級一般是历史发展的境界；逃跑了的人将回到它那里，落后的人在它里面将提高起来，各民族在它里面将安于到处奔波，安于民族的发展，安于英雄的業績和青年人的理想，在它的舒适的閣楼里人們将自由自在地生活”。

这里资产階級的发展阶段被描繪成不是向新的更高阶段的过渡（別林斯基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它的）<sup>1110</sup>，而是运动的停留站，是文明人类不会走得超过于它的一种界限。

674

无怪乎赫尔岑不容易相信这样的界限的存在。但是他从黑格尔学了邏輯不是徒劳的，因为他懂得，社会生活的邏輯并不查問理論家們高兴什么和不高兴什么。他說：“我們的这样的悲痛还少

① [淘汰]

嗎？难道炼丹术士不因工艺学的平凡而悲伤嗎？难道我們因某种理想而发愁的事还少嗎？”<sup>①</sup>

这一想法几乎完全重复那一构成《来自彼岸》一书基础的思想。整个这本书不过是下面这个論点的一长系列的鮮明的和富有情感的证明：我們为理想发愁是一回事，而它的实现的客观必要性又是一回事。

## 二十一

請注意，赫尔岑在这里运用的理論原理具有一般性质。这里談的不是某个个别国家，甚至不是世界的某个部分。不是的，那不勒斯的拉薩隆尼的外形“不由得”使赫尔岑认为，有一种淘汰（Selection）的“严重的法則”，由于它各族人民“只有通过資產階級”才能提高到更高的发展阶段。他在表述这个法則时沒有提到这一可悲的一般規則中的任何例外。

但假如是这样，假如这样的一般法則实际上是存在的，那末显然俄国也应当服从它。而在这样的情况下，赫尔岑所作的并不使他感到多大寬慰的关于俄国和西欧的对立就丧失了任何的意义。我們的作者沒有足够的力量来接受这一結論。他借助于簡短然而具有极重大意义的保留条件来規避它。他給自己的法則以新的表述，认为历史的一切河流很可能丧失在小市民的泥沼中。但是在这里他出乎意外地补充道：至少是西欧的历史河流。这一保留条件在以前他的一切議論中沒有任何的基础。不但如此，它和他以前的議論是矛盾的。但是它使赫尔岑在別的地方不止一次地表露过的关于俄国永远不会成为小市民社会的这一希望免于破灭，因

<sup>①</sup> 《来自大陆》，寄自那不勒斯的信，——《钟声》，第173期1111。

此在他看来它是有说服力的。

同上述的希望一起，这一不大的保留条件同样也拯救了《钟声》的整个纲领。如果没有它，赫尔岑就必须制定出完全另一种纲领或者彻底地变成一个悲观主义者。然而即使他只是借助于诸如此类的保留条件而避免了悲观主义这一情况，也已足够使人有理由认为，他的关于俄国是一般历史规则的幸福例外的看法，不是始终没有一定的怀疑主义气味的。奥格辽夫在这方面要比较幸运些！他未必怀疑过。在赫尔岑刊登了自己的寄自那不勒斯的信的前一期《钟声》上，载有奥格辽夫的一首值得注意的诗：《以此来胜利！》诗中表现着作者对俄国社会主义的幸福未来的不可动摇的信心：

……我相信，相信結局  
和我們的光明的得救，  
我相信拥有土地的人民  
和年輕的一代。  
我相信——不久  
另外一种命运将要来临，将要来临，  
現在手中牢牢地擎起  
一面軍旗——土地和自由！<sup>①</sup>

假使作者的历史意义决定于他们对这些或那些思想的信仰的力量，那末就应当說，奥格辽夫比赫尔岑更有权利被称为俄国民粹派的創始人。但是民粹派有自己的理論，而为了制訂出这一理論，赫尔岑比奥格辽夫做的多得多<sup>1113</sup>。

重复說一遍，奥格辽夫研究的主要是局部的問題。但是在研

① 《钟声》，1863年11月1日<sup>1112</sup>。

究这样的問題的时候，他往往出奇地預料到七十年代的民粹派所作的决定。且看許多鮮明的例子之一。奥格辽夫通过《总謂彻》所实现的关于在分裂教派中間进行宣传的必要性这一思想，約15年以后成了俄国革命者公认的思想。援引先知但以里<sup>①</sup>的話来证明废止土地所有制的必要性的奥格辽夫，預言亚历山大·朱哈伊洛夫和其他民粹主义分子的出現，这些人企图通过引证《旧約》的方法給分离派教徒斯巴索夫或費多塞也夫暗示自己同意的观点<sup>②</sup>。

誰不知道在赫尔岑和六十年代到国外去的青年革命者之間发生过許多不愉快的冲突呢？<sup>1115</sup>他們对他的主要指責是說他落后。这种指責无根据到什么程度，从一个简单的想法可以看出，即反对赫尔岑的青年往往是依靠他的思想而生活，而且——妙事！——他們随着“俄国社会主义”旗帜下的运动的扩大，越来越多地吸收了他的思想。 676

在策略方面，存在过真正的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主要也是在“怀孕月数”的确定問題上。虽然赫尔岑自觉地宁願选择和平的发展道路，而不願革命的发展道路，但是他也并不反对产科医生的活动，假使实际上生育的时间到来了的話。

青年革命者不喜欢的还有赫尔岑很不贊成像后来人們所說的

---

① 見《給統治教会的所有旧教徒主义和其他流派的信徒們以及后代們的信》，刊載在1862年6月15日的《总謂彻》。

② 奥格辽夫在自己的《关于共同問題的私人信件》中發揮了这一思想：中世紀的西歐完全沒有“人民掌握物权的概念”。他說，只有在意大利，城市居民在某些地方才达到了“民意的概念”（《钟声》，第216期，第二封）<sup>1114</sup>。这一說法使人想起后来知名的俄国的政党“民意党”。我很清楚地知道，这个政党所以采用这一名称完全不是受了奥格辽夫的論文的影响。但是有意思的是，它用同奥格辽夫同样的詞来表明民主的政治概念。“民意党”，如讀者知道的，是俄国民粹主义的变种。

暗杀、恐怖的策略。但这是细节，没有详细谈的必要。比较合适的是指出，在反对赫尔岑的时候，革命青年只是加深了潜入到他原来的俄国历史哲学中的错误。

按照这种哲学，我们向社会主义方向的发展将是两种“萌芽”，农民村社和有教养的（贵族的，以后是平民知识分子的）青年小组——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且有教养的青年小组要完全担任积极的角色。他们应当把另一个“萌芽”从它的沉睡中引出和给它一种推动，使它开始进一步的发展。但是，既然承认把另一个“萌芽”（村社）引导到历史发展的道路上有赖于有教养的青年小组，那就很自然地要承认赋予这一发展进程以或快或慢速度的也取决于他们。赫尔岑说：“村社的存在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所以要到人民中去进行社会主义宣传”。而同他争论并称他为落后的革命青年却说：“农民——村社社员的艰苦境况引起他们的不满，  
677 这种不满保证我们的革命意图的迅速实现。所以要到人民中去进行革命的鼓动”。青年是错误的，因为农民——村社社员的不满他们的艰苦境况还不能把他们变成革命者。但须知连赫尔岑也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的村社实际上完全不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在逻辑方面，青年的错误和赫尔岑在制定他的俄国历史的哲学中所犯的错误是完全相像的。前者是后者的补充，而且，可以说，是它所引起的。

我说过，随着发生在“俄国社会主义”的旗帜下的运动的扩大和加强，赫尔岑的思想在俄国的革命分子中也越来越巩固了。这种社会主义的繁荣时代正是七十年代。而在出版《钟声》的时代，赫尔岑和奥格辽夫对革命青年的影响，被车尔尼雪夫斯基对革命青年的影响所削弱了。我们已经知道，上述刊物的出版人把后者看作西欧派，他的社会主义所注意的仅是城市而已。车尔尼雪夫



斯基的宣传的轰动一时的成功不能不在他们中间引起某种耽心。且看奥格辽夫是如何表述这点的：

“我耽心我们的社会主义者单单把城市有文化的无产阶级摆在前面，把它带到所有的社会意图的中心，使它成为特种的等级，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达到没有物质依据的联合，达到同其它强烈崛起的城市等级的所有思潮进行不可能的斗争。而这个时代正是露斯存在着乡村制度的历史基础的时代。这种制度实行土地公共占有，——受过教育的城市无产阶级、有教养的少数，都应当归附这种制度”<sup>①</sup>。

请注意，奥格辽夫在这里说的仅仅是“城市受过教育的无产阶级”。那时候（以后还很长时间）人们是这样称呼知识分子的。奥格辽夫断定“有教养的少数”应当从自己的狭窄的小圈子里走出来同人民融合一起，那是完全对的。但是在他看来，人民——这仅仅是农民。他甚至没有想过，“有教养的少数”能够而且应当在城市中同工业无产阶级会合。在他的议论中工业无产阶级简直是沒有位置的。七十年代的民粹派已经不能忘记，在城市里存在着真正的工人。但是在他们看来，城市的工人不过是为“市井文明”所败坏了的农民。在这里他们又犯了《钟声》出版人在同一个方面所犯的錯誤。

然而是在结束的时候了。说了所有这一切以后，我希望读者不会反对如下的结论：678

1) 赫尔岑同情人民的疾苦，是由于他受到苦难重重的农奴“前室”的影响。

2) 赫尔岑希望农民的解放是俄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第

<sup>①</sup> 《关于一般问题的信》第三信，《钟声》，第220期1116。

一步。

3) 他在确定这一发展的适当道路时，是作为民粹主义的鼻祖出现的。

4) 这一点完全足以使他渐渐不再同情那些开头热烈欢迎过《北极星》和《钟声》的出现的俄国社会的自由主义分子。

5) 赫尔岑和奥格辽夫之间在对于农民改革和对于俄国社会主义的看法上绝不存在重大的意见分歧。

6) 同赫尔岑意见分歧的革命青年在很大的程度上并且很长久地靠他的思想而生活，当他们的运动所涂的民粹主义的色彩愈浓时，他们受他的思想的影响也就愈深。

7) 革命青年在那一导致他们和赫尔岑决裂的策略见解中犯了和赫尔岑所犯的完全相像的邏輯錯誤。由于这个錯誤，赫尔岑把俄国看作是能够通过特殊的和西欧社会发展不相像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一个国家。

---

---

## 亚·伊·赫尔岑的哲学观点<sup>1117</sup>

679

(誕生一百周年紀念)

[1912年]

現在誰都知道，亚·伊·赫尔岑是一个很博学的人，而且对哲学也感兴趣。但是一直都不清楚，他的哲学观点究竟是怎样发展的，是朝哪个方向发展的。我认为弄清这一点很有益处。我就来試試。

### 一

在青年时代，赫尔岑沒有研究哲学，更吸引他的是政治<sup>1118</sup>。但是，从第一次流放回到莫斯科以后，他深信自己必須具有充实的哲学知識。那是在理論方面非常出色的时期，別林斯基及其最亲近的同志，根据“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宣揚同当时的“俄国现实”調和<sup>①</sup>。作为一个“政治家”，赫尔岑不能不起来反对这种結論，他在《往事与回忆》<sup>1120</sup>中說，“于是一场激烈的战斗在我們之間展开了”。但是，他的政治論据，对于立足于黑格尔哲学的手，并没有造成任何印象。因此，他也就发觉自己需要儲备哲学武器。

他繼續說：“在这场內哄中，我认为必須 *ex ipso fonte bibere*<sup>②</sup>，并且认真地研究黑格尔。我甚至想，沒有体驗过黑格尔的

680

① 关于这个时代在別林斯基的观点发展史上的意义，請参看我的一篇文章：《二十年来》文集的《別林斯基与合理的现实》<sup>1119</sup>。

② [追本穷源]

《现象学》和蒲鲁东的《社会经济的矛盾》的人，没有经过这一熔炉并受过这种锻炼的人，就不是完全的人，就不是现代的人”<sup>1121</sup>。

请注意，在这里，他把蒲鲁东同黑格尔等量齐观。这最足以说明他的哲学观点。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种对比的提法，表明了我們这位极有才能的、非常杰出的作者对黑格尔的理解所没有超过的界限<sup>1122</sup>。不仅如此。我們有权利补充说，假使赫尔岑当时超过了这个界限，也许他就不会遭到沉重的精神上的悲剧，这种悲剧在他的名著《来自彼岸》的每一页中都可以感觉出来。但是，为了使讀者觉得这些論断不是沒有根据，应当认真地总结一下，究竟赫尔岑从黑格尔那里发现了什么，他从黑格尔那里承襲了什么。

我們看看他的日記。在这里我們可以看到例如这样的话：“讀了黑格尔的自然哲学。（《Encyclopädie》，II Th.）<sup>①</sup>到处是宏伟建筑，很多只是勾画出了輪廓，但是闊度和容积是巨大的（这就是说，想必两者都是巨大的？——格·普·）<sup>②</sup>。在从抽象力量解放出来这方面，在把压倒一切尘世事物的量的范疇引进自己的范围这方面，是前进了多么一大步，而且对于质、有形体的东西具有多么大的优势。他以人的形式与概念的符合（人越不发展，就越依赖于自然），使人在充分发展中从人的物质规定，从人的大地的<sup>③</sup>生活中解放出来。精神是永恒的，物质是精神异在的永久形式。只有形式是有能力的，只有它能够表现精神，而且它也的确表现着精神”<sup>④</sup>。

还有这样的话：“最可笑的是，直到现在，德国人，以及跟在德国人后面的各式各样的人，都认为黑格尔是一位枯燥的邏輯学家，

① [《哲学全书》，第2部。]

② 按赫尔岑的原文“巨大的”（Колоссален）一詞用的是单数，似仅指“容积”，普列汉诺夫认为可能是指两者都是“巨大的”，所以用了复数設問。——譯者

③ [尘世的]

④ 《赫尔岑全集》，日内瓦版，第1卷，第193頁<sup>1123</sup>。

是沃尔弗<sup>①</sup>一类的僵化的辩证论者，可是他的每一部著作都浸透着强烈的诗意，他放纵自己的天才（常常是违反意志的），把极富思辨的思想用惊人明快准确的形式表达出来。这真是一种用思想揭开任何外壳的力量，真是一种锐利的眼光，不管视线朝向哪里，它都穿过一切，看到一切”<sup>②</sup>。

这些话表明，第一，赫尔岑根本没有像后来许许多多有点自由思想的人们所责备的那样，对黑格尔抱轻视的态度。但是，根据从《往事与回忆》引来的前面一段话来看，事情的这一方面对于我们大概是够清楚的了。更有益处的是详细谈谈事情的另一面，即赫尔岑对黑格尔哲学的基本定理“精神是永恒的，物质是精神异在的永久形式”所作的阐述。赫尔岑对这一定理丝毫没有表现出批判的态度，而当他不同意黑格尔的时候，他是毫不客气地甚至批评黑格尔的“宏伟建筑”的。这表明什么呢？这表明，还在1844年4月<sup>③</sup>，赫尔岑本人就持有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观点，或者至少他自身还没有形成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怀疑<sup>1125</sup>。紧接着我们现在感兴趣的这些话后面有下面这段话，也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

“当然，黑格尔在自然科学方面提供了他所实现的更大的范围，但是对当时状态下的自然科学彻底地给了 coup de grâce<sup>④</sup>。不管学者们是否承认这一点，反正愚蠢的 Vornehmthuerei des Ignorierens<sup>⑤</sup> 是毫无意义的。黑格尔清楚地发展了自然科学的要

① 老实说，沃尔弗从来不是辩证论者，而倒是逻辑学家。通常意义的逻辑学之于辩证法，正如初等数学之于高等数学。

② 《赫尔岑全集》，第1卷，第234—235页1124。

③ 在赫尔岑的《日记》中，在1844年4月14日阐述了黑格尔把自然看作精神异在的观点。

④ 〔致命的打击〕

⑤ 〔高傲的忽视〕

求，并且清楚地指出了物理学和化学的全部的可怜混乱状态，当然他也并不否认局部的功績。他第一次试图了解自然的生活，了解其从行星系中自我规定的物质，辩证地发展到一定身体上的个性，发展到主观性，而他除了概念的逻辑运动而外，没有引进任何动因<sup>①</sup>。谢林赶在他前面，但是谢林没有满足科学形态”<sup>②</sup>。

682 黑格尔试图说明自然生活的辩证发展，除了概念的逻辑运动而外，没有求助于别的“动因”，这一点正是黑格尔自然哲学的最薄弱的方面，它充分说明了黑格尔在这一领域内所犯的其余的大多数的错误。现在，这是用不着什么解释的，因为甚至具有唯心主义倾向的自然科学家——可惜这样的自然科学家现在还不少——也决不认为可能用概念的逻辑运动来说明世界过程，也看不出这种说明具有什么“科学形态”。赫尔岑不仅没有指出黑格尔的这一根本缺陷，相反地，倒似乎把它看作巨大的科学功績。这种情形之所以发生，唯一的原因在于他本人仍然是唯心主义者，就是说，在他本人看来，指靠概念的逻辑运动这种“动因”，就能满意地说明自然的历史过程。的确，还在同年的6月20日<sup>1127</sup>，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就已写下一段内容似乎是同我刚才所说的截然相反的话。那段话涉及的是约尔丹关于一般科学同哲学的关系的文章<sup>1128</sup>。这篇文章载于《维干德季刊》，显然给了赫尔岑以深刻的印象。他称它是极其出色的文章，并且转述了它的主要思想：

“站在哲学的基础上扬弃宗教的那种批判，应当走得更远些，并且去反对哲学本身。哲学的观点是最后的神学的观点，它整个地使自然从属于精神，把思维当做 prius<sup>③</sup>，它实质上沒有以自己的

①（起作用的原因）

② 《赫尔岑全集》，第1卷，第194页。1844年4月19日札记<sup>1126</sup>。

③〔第一性的〕

同一消灭思维和存在的对立。精神、思想，是物质和历史的結果。哲学把純思维当做本原，就陷入无法坚持的抽象；具体的表象不断产生；在抽象的领域内我們感到苦恼和忧愁，于是不断地落入另一个抽象的领域去。哲学想成为单独的科学，成为思维的科学”<sup>①</sup>。接着在日記中是一段德文，这段德文实在值得极大的注意，因此我把它全部譯出来：“所以（就是說，因为哲学想成为思维的科学）它想同时成为世界的科学，因为思维的規律也就是世界的規律。这首先需要反过来：思维无非是世界，既然它自己認識自己，思维就是世界。通过人，世界对于自己就愈加清楚。”以后，赫尔岑繼續用俄文写道：“因此决不能从思维的科学开始，决不能从中引出自然界。哲学不是单独的科学，而应该代之以现在所有分开的科学的結合”<sup>②</sup>。

如果我們假定赫尔岑完全同意約尔丹<sup>③</sup>，那就不可避免地也 685  
应该承认，他已經同唯心主义分手了，因为約尔丹的观点同黑格尔的观点截然相反<sup>④</sup>；那也就不能既承认精神和思想是物质和历史的結果，而同时又认为邏輯概念是世界过程的主要“动因”。但是，如果接受了上述假定，我們就应当設想，赫尔岑从这两个观点中的一个轉变到另一个，正是在1844年4月14日到6月20日这一期

① 《赫尔岑全集》，第1卷，第208—209頁1129。

② 威廉·約尔丹的文章載于《維干德季刊》(«Wigand's Vierteljahrsschrift»)。这一卷出版于1844年5月，而在同年6月为赫尔岑閱讀。由此可見，我們的作者当时如何密切地注意德国的哲学著作。

③ 《赫尔岑全集》，第1卷，第209頁1130。

④ 威廉·約尔丹站在费尔巴哈的观点上。某些人甚至称他在哲学上是费尔巴哈的最忠实的学生。(見弗·施米特的文章，«Die deutsche Philosophie in ihrer Entwicklung zum Sozialismus», «Deutsches Bürgerbuch für 1846» Zweiter Jahrgang, S. 71. («向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德国哲学》，載《一八四六年德意志文献》，双年刊，第71頁。))

間；如果这一轉变在以前发生，那末就完全无法了解我們所熟知的、赫尔岑对黑格尔自然哲学的基本論点所采取的同情的和不加任何批評的态度。当然，这种設想就其本身而論，也不排除別的可能性；为什么赫尔岑正是在1844年春天沒有同絕對唯心主义分手呢？但是有着与这一設想不相一致的材料。

## 二

第一，在同一日記中，在上述時間之后，繼續有一些話证明赫尔岑对唯心主义怀着巨大的同情。同年8月9日，他叙述（請注意，是按照費尔巴哈的方式叙述的<sup>①</sup>）莱布尼茨的学說时，把莱布尼茨接近于“单子在某种意义就已經是一种概念”这种“概念”<sup>②</sup>当做莱布尼茨的巨大功績。究竟是什么样的概念呢？那就是黑格尔的邏輯学所說的概念。显然，这种贊揚只能出自一个还没有摆脱黑格尔主义的影响的人的手笔。这里还有一个也許更有說服力的例子。就在这个月的月底，赫尔岑在讀到罗森克兰茨的黑格尔传<sup>1132</sup>时，标出了黑格尔自然哲学初稿中的一个地方，并就此发議論道：“在当时的自然哲学試作中，有一个談到地球构成的出色的地方；他（即黑格尔。——格·普·）把地球的分解……，看做无条件的过去的結果，它們（即那些地球分解的产物。——格·普·）始終是默不作声的代表，它們現在漠不关心地并排地立着，丧失了自己的关系，好像患了麻痺症似的。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从这里就不能期待有朝一日揭出謎底，行星物质为什么和怎样呈現为简单的物体，是什么引起結合为一定的矿石层，这难道不是以整个行星像植物一样地生活着的嘗試，即以整个表层生活的嘗試嗎？”<sup>③</sup>不

① 《赫尔岑全集》，第1卷，第223頁1131。

② 同上书，第229頁1133。



用說，这类問題（“謎底”）只能在具有唯心主义傾向的头脑中才能产生。

第二，有名的《自然研究通信》，被我国某些历史学家天真地认为是赫尔岑的什么“实在論的”宣言，这些通信不可辯駁地证明，它們的作者受到了唯心主义而且正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強烈影响。当然，信里也有整段甚至整頁充滿“实在論的”（我們暫且保留这个术语）內容。例如：“黑格尔想使自然和历史成为应用邏輯，而不是作为自然和历史的抽象合理性的邏輯。这就是为什么經驗科学仍然冷漠地对待黑格尔的哲学全书，如像对待謝林的学位論文一样”<sup>①</sup>。我們在这里所看到的这种指責，也就是唯物主义者恩格斯后来对黑格尔的指責。还有一个例子：“毫無疑問，黑格尔把思維抬到了这样高，以致不完全放弃唯心主义，再也不能在他之后前进一步”<sup>②</sup>。这也完全是实在論的。以下这些话也同样是“实在論”的：“唯心主义总是本身具有某种粗鹵得不能令人忍受的东西；相信自然是胡說、一切暂时的东西都值不得注意的人是高傲自負的，无情地坚持自己的片面性，而且是完全不能接近真理的。唯心主义高傲地认为，它只要对經驗說些卑視的話，經驗就会像肥皂泡一样破灭；形而上学者的高高在上的稟性是錯誤的”等等<sup>③</sup>。讀了这一段話，任何人都会說：“《自然研究通信》的作者是坚决反对唯心主义的；他的观点是同唯心主义对立的。”但这是錯誤的，或者像我們这位作者所喜欢說的那样，不是全部真理。而且远不是全部真理！上述引文中最后談到唯心主义的話，其实是針對主观唯心主义的。我們从哲学史知道，可以反对主观唯心主义，而又决不放弃唯心主义

① 《赫尔岑全集》，第2卷，第72頁。着重号是原著就有的1134。

② 同上书，第72頁1135。

③ 同上书，第41頁1136。

的基础，否弃費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的黑格尔和謝林的例子就足以证实这一点。說在黑格尔之后不放弃唯心主义的基础就不能在自然哲学上更进一步，这种意見看起来似乎已不仅反对主观唯心主义，而且也反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哲学。然而在《自然研究通信》中，在提出这种意見时有一值得注意的保留：“但是并没有走这一步，而經驗主义正在冷静地期待着这一步；如果期待到了，請看，在人类行为的一切抽象領域里会洋溢着什么样的新生活！”<sup>①</sup>你們看到，按照赫尔岑的意見，应当把自然科学家的思想从經驗主义的局限性中引出的那一步并没有作出。这个意見是不对的，因为以費尔巴哈为代表的西方哲学那时已經抛弃了唯心主义基础。但是，不管对与不对，在任何情况下，这个意見不能不規定着《通信》的作者的本身的理論任务：如果对于科学所必要的一步还没有作出，那末赫尔岑自己就应该試图作出这一步。于是就发生了一个問題：他能否做到这一点呢？任何一个熟悉当时哲学状况的人，只要高兴去仔細讀讀《自然研究通信》，都会回答說不能。

赫尔岑是摸索着走的。有时他立足于坚固的“实在論的”基础上；但更多的是站在他认为需要离开的那种唯心主义的基础上。而且归根到底，甚至他的反对唯心主义者的正确意見，也具有我在前面已經指出的仅仅批判地攻击主观唯心主义者的狭窄得多的意义。当赫尔岑針对着黑格尔完全公正地責备那种把自然和历史看做应用邏輯的观点的时候，毫无疑問，我們这位作者是清楚地看到绝对唯心主义的原罪在哪里的。但是看到下面的議論，这种看法又站不住脚了：“有机过程在动物中必然要按照种的、也許是預先存在的和正在实现的概念，发展为血液循环系統、神經系統等

① 《赫尔岑全集》，第2卷，第72-73頁 1137。

等”<sup>①</sup>。这一使我们回到“概念”的思想，并不是越出黑格尔唯心主义范围的一步，而可以说是在黑格尔唯心主义心臟的一步。《自然研究通信》是充满着这种思想的。每当赫尔岑着手批判唯物主义的时候，他都是作为坚定的唯心主义者而下論断的。試举几个例子。

688

在批判伊壁鳩魯的唯物主义时，赫尔岑談到了“統治着自然界众多事物的最高原則”<sup>②</sup>；用他的話說，唯物主义的局限性也就在于它不承认有这种原則。但是承认有这种原則，就等于两只脚牢牢地站在唯心主义基础上。这样，按照赫尔岑的意見，唯物主义者們的罪过，就在于他們摒弃了对“自然界众多事物”即对物质世界的唯心主义观点。在这里，他根本沒有想到，承认有“統治自然界众多事物的原則”，絲毫不背叛自己就可以把自然界看做应用邏輯。其次，赫尔岑責备十八世紀法国唯物主义者不了解思維和存在的統一。他說：“在他們那里，存在和思維或者是分离的，或者是在表面上互相作用着。离开思維的自然只是部分，而不是全体；思維同广延一样是自然的，同机械、化学、有机化学一样是发展的一个等級，只不过是最高等級而已。唯物主义者不能理解这种简单的思想；他們以为，沒有人的自然是完全的，自足自在的，而人則是某种不相干的东西”<sup>③</sup>。这种指責使人感到更加奇怪的是，显然，赫尔岑讀过霍尔巴赫的《Système de la nature》<sup>④</sup>，他应当了解，在那本书里是怎样坚持存在和思維的統一的思想的。不論是霍尔巴赫本人，不論是在《自然的体系》中表現了自己观点的唯物主义

① 《赫尔岑全集》，第2卷，第275頁1138。

② 同上书，第171頁1139。

③ 同上1140。

④ 《自然的体系》

小组其余成员，从来都没有把人看做与自然不相干的东西，从来都没有否认“离开思维（更确切地说，一般地离开所谓心理现象）的自然不是全体，而只是部分”。法国唯物主义者反驳唯灵论者的主要论据之一正是：绝不能把“精神”看做同自然对立并统治自然的一种特殊的原理。在唯物主义者的心目中，物质决不像笛卡儿所宣称的那样是一种僵死的物体。为什么赫尔岑把他们从来没有犯过的错误加在他们身上呢？那是一个很明显的误解。但是这种误解怎么发生的呢？

689

## 三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应当深入研究赫尔岑的下面这些话：“谢林遇到了以最高的和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各种对理性和自然的观点的斗争，那时，一方面，‘非我’在费希特的打击下倒下了，理性的权力被宣布为某种冷酷和空洞的无限领域；另一方面，法国人否定了一切非感性的东西，像骨相学家<sup>①</sup>一样，力图用头颅上的凹凸来解释思想，而不是用思想来解释凹凸，谢林第一个说出了，虽然是不完全地说出了我们所谈的高度统一（即存在和思维的统一。——格·普·）”<sup>②</sup>。

把这同赫尔岑的以下一种想法比较一下是有益处的：“百科全书派表现了实在论的极端性；他们像唯心主义者一样确实实地、充分地代表着人类精神的一个方面，他们同唯心主义一样为时代所制约，往后两者都要抛掉自己的特殊的自负，并结合为一种严整的对真理的理解。再重复一遍，谢林和他的所有追随者都力图造

① 系指法郎士·高尔 (Franz Gall 1758—1828) 所创的骨相学，在十九世纪初欧洲甚风行。 译者

② 《赫尔岑全集》，第2卷，第284—285页1141。

成這種調和；黑格爾為這種調和奠定了廣闊的基礎，而時間是會作到其餘一切的”<sup>1142</sup>。

這對於說明赫爾岑當時的哲學觀點是最有意思不過了。他正確地認為哲學的最重要的問題，是思維同存在、主體同客體的關係問題。對於任何一種哲學體系，他首先是根據這個問題進行評價。一個受過黑格爾這樣一個徹底的一元論者、這樣一個任何二元論的不可妥協的敵人的教誨的人，自然也不可能有另外的作法。在黑格爾的學說中，也像在謝林的學說中一樣，思維和存在的統一同時是一切其他哲學體系的基礎和中心。應當承認，同例如康德的二元論哲學相比，他們的哲學的巨大優越性就在於此。可是，偉大的一元論者謝林和黑格爾究竟是怎樣理解存在和思維的統一呢？不難猜出，他們是從唯心主義的意義去理解的，否則他們就不會是唯心主義者了。但是問題也正在於他們的理解是不正確的，這一點費爾巴哈就已指出了。

用費爾巴哈的話說，在謝林和黑格爾那里得到極端表現的唯心主義哲學，消除了存在和思維的矛盾，而又繼續處在矛盾之中，也就是說，實質上根本沒有消除矛盾。這就意味着，在黑格爾那里，思維就是存在，因為在他那里，歸根到底，除了思維以外什麼都沒有；自然本身無非是精神的異在，為了創造自然，絕對觀念才把自己和自己對立起來。在黑格爾看來，“思維是主語，存在是謂語”，費爾巴哈用當時的哲學語言表達了這一點<sup>1143</sup>。但是，如果這是真理，如果在黑格爾那里思維就是存在，那末也就用不着去尋找思維和存在之間的統一，因為統一是預先就有的。可見，黑格爾並沒有解決存在和思維之間的二律背反，而只是消除了它的兩個組成要素中的一個，即把存在、物質、自然消除了。費爾巴哈又是完全正確地補充說，如果按照黑格爾的學說，自然是由於理念把自己和

自己对立起来而創造出来的,那末,这只是把自然的精神本质即上帝創造物质的神学学說翻譯成思辨哲学的語言而已。

費尔巴哈就是这样看的。而赫尔岑是怎样看的呢?我們已經知道,他以为,謝林“第一个說出了,虽然是不完全地說出了”存在和思維的“高度統一”,而黑格尔給这种統一奠立了“广闊的基础”。誠然,謝林、黑格尔对問題的某些解答,在他看来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但是这些地方在他心目中是不很重要的,因为他曾断言,这两位伟大的德国唯心主义者所未完成的,将由时间来完成<sup>①</sup>。这也正是《自然研究通信》的作者的根本哲学錯誤。赫尔岑在信中說,在黑格尔之后前进,就是意味着越出唯心主义范围,这种說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当他自己試图这样前进一步时,他是把黑格尔所提供的对思維和存在的二律背反的唯心主义解决当做出发点的。因此,他对唯心主义的批判,无非是对当时意义很小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他关于謝林的作用所讲的話就清楚地证明这一点:謝林出现在費希特和法国人(即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斗争最激烈的时候,用赫尔岑的話來說,他第一个說出了,虽然是不十分清楚地說出了思維和存在的統一的思想。这样也就毫不奇怪,赫尔岑是繼續用伟大的德国唯心主义者的眼光去看唯物主义的。他讀了《自然的体系》,但他讀它以前,就預先有了对唯物主义的錯誤看法,因

<sup>①</sup> 稍后赫尔岑說道:“黑格尔理解存在同思維的現實关系,但是理解并不意味着完全摆脱了旧的东西……任何一个生下来就当埃及俘虏的人,是逃不了乐土的……黑格尔以自己的天才,以自己思想的威力,压倒了埃及因素,但这种因素在他那里依然是很坏的习惯;而謝林則为这种因素所压倒”(《赫尔岑全集》,第2卷,第73頁)1144。总之,实际上黑格尔是对的,不过是愚蠢地照旧的唯心主义习惯來說話罢了。看来,时间将会消除这和坏习惯。換句話說,这意味着絕對唯心主义正确地規定了思維同存在的关系。在这里,赫尔岑对謝林則不那样贊同,但是不應該忘記,謝林当时已經拿出他的反动的“启示哲学”了。

此，他在这部书里发现了书里所没有的东西，而完全没有对书中所有的东西予以应有的重视。

很有意思的是，赫尔岑在他写《自然研究通信》的时候已经知道了费尔巴哈，使他知道这位思想家的是奥格辽夫，后者在诺夫哥罗德流放地拜访了他，并带去了名著《Das Wesen des Christenthums》<sup>①</sup>。这部书使这位诺夫哥洛德的流放者欣喜若狂。赫尔岑说，“读了头几页后，我高兴得跳起来。打倒伪装，抛弃含混和隐语，我们是自由人，而不是萨伏的奴隶，我们不需要把真理包裹在神话里！”<sup>②</sup>可是，为费尔巴哈所吸引的赫尔岑，如我们看到的，还远没有了解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关于思维和存在统一的学说所持的否定观点。因此，他离唯心主义仍然比离费尔巴哈无可比拟地更近得多；只是有些时候，只是在《日记》和《自然研究通信》的某些地方，只是在他同情地引证那些宣布思维和物质是精神和历史的结果的文章的场合，在他那里才透露出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观点相接近的观点。但是，这仅仅是证实着一般常规的例外。而一般常规是，赫尔岑继续坚持唯心主义。

但是在这里，应当作一个相当大的保留。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观点的实质，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一切马克思主义者所熟知的思想，即：不是思维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思维。存在自己决定自己，它的基础在自身之中。因此，与黑格尔相反，费尔巴哈断言，存在是对象，而思维是对象的属性<sup>③</sup>。进行思维的不是抽象的本质，不是唯心主义哲学所研究的那个“自我”。进行思想的是我的身体；而我的身体也就是我的“自我”。但是，这个“自我”只有对于

① 《基督教的本质》

② 《赫尔岑全集》，第7卷，第133页1145。

③ 在当时的哲学语言中，这就是说，“存在是主词，思维是谓词”。

我自己才是“自我”，对于别人它就不是“自我”，而是“你”。因此，唯心主义者把“自我”当做出发点就犯了错误。出发点应当同时既是“自我”也是“你”。这看来是奇谈怪论；似乎费尔巴哈要求把两点作为出发点。但这只似乎是这样，实际上费尔巴哈做为出发点的是一个原理，这个原理就是：“自我”不仅是主体，而同时也是客体（对于自己是主体，对于别人是客体）。这也就是关于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精神和物质的统一的唯物主义学说。费尔巴哈说：“对于我来说，在主观上是纯精神的、非物质的、非感性的行为，不言自明，在客观上就是物质的、感性的行为”<sup>1146</sup>。

只要好好想一想，你就一定会同意费尔巴哈的意见。既然同意他，你就会看到，赫尔岑在《自然研究通信》中所作的唯心主义的反驳，是何等的软弱无力。他断言唯物主义否定一切“非感性的东西”。但是你自己立即从费尔巴哈那里听到：“非感性的东西”只是“感性的东西”的另一面，而消除存在和思维的相互矛盾的因素之一，这意味着没有解决这个矛盾，而是离开对它的解决。赫尔岑把有病的头脑当做健康的头脑，把健康的头脑当做有病的头脑。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他对唯物主义的批评很大部分是建立在这种误解上面的。他这样议论说：“显然，经验唤起意识，但是同样明显的是，所唤起的意识完全不是由它造成的，经验是一个条件，一个推动，是一个决不能对后果负责的推动，因为后果不受它支配，因为意识不是 *tabula rasa*，而是 *actus purus*<sup>①</sup>，不是外在于对象的活动，而完全相反，是对象的最内在的中心，因为一般地说，思维和对象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而是某种统一的东西的两个因素”<sup>②</sup>。

① [白板……纯粹的活动]

② 《赫尔岑全集》，第2卷，第277页1147。



在最后这句不是反对唯物主义而是反对哲学二元論的話里，可以看到一元論。但是說，經驗对于意識是一种不对其后果負責的推动，因为意識是純粹的活动，而不是白板，这样一种思想再一次暴露了赫尔岑在写《自然研究通信》时所持的那种一元論的唯心主义本质。

如果經驗不对自己的后果負責，那末这就是說，像康德曾經說过的那樣，人的知性把它的規律加于自然。但是，这种观点已經被同一个費尔巴哈推翻了。

費尔巴哈說得很好：“自然这部书，根本不是一个一个字母杂乱无章地胡湊在一起，而知性第一次把相互联系和秩序带进这个混乱里，主观地和随意地把字母联成有意思的句子。不是的，知性是根据外部感觉給它提供的标帜来区别和联系事物；我們把自然中有区别的东西加以区别，把自然中有联系的东西加以联系；我們使一个事物从属于另一个事物，把它們作为根据和結果、原因和作用，因为它们們的实际的、感性的、真实的、实在的相互关系就是这样的”<sup>①</sup>。

只有这样来看存在和思維的关系問題，赫尔岑从約尔丹文章中所贊許地引证的那些話才有意义：“精神、思想是物质和历史的結果”；思維一般地說无非是“世界，就它自己認識自己而論”（請參看前面）<sup>②</sup>。赫尔岑把思維当做决定着經驗的后果的 *actus purus*<sup>③</sup>，那他就应当宣称這些話是荒謬的。

赫尔岑关于不是經驗“产生”意識的意見，是与以下这种想法

① 《赫尔岑全集》，第2卷，第322—323頁1148。恩格斯后来很机智地指出，即使我們的知性随意地把鞋刷归到哺乳类，鞋刷还是不能因此而长出乳腺来。

② 如上所見，約尔丹是像費尔巴哈那样解决这个問題的。他說，哲学把思維当做 *prius*（第一性的），并没有消灭思維和存在的对立。

③（純粹的活动）

等同的(如果我沒有弄錯):运动(一切經驗最終归結为运动)不会轉化为思想,或者相反地,思想不是物质的运动。作了上述一切分析后,这一点是用不着多談的。当然,思想不是物质的行动,如果說它是这种行动的另一面的話。只有不領会唯物主义学說的人,才会把唯物主义理解为把运动和思想等同起来。在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心目中,这就会等于他們指責唯心主义所犯的把思維和存在等同起来的錯誤。唯物主义所說的存在和思維的統一决不是等同<sup>①</sup>。

赫尔岑还提出了另一些反对唯物主义的論据,那些論据同刚才考察的問題並沒有直接的关系。我以后再来分析。我想,那时讀者就会同意,那些論据(有时是非常出乎意外的)也是建立在誤解的基础上的。

694

## 四

也許人們会对我說,我們的作者在批評唯物主义时,所指的完全不是費尔巴哈的学說,而是包括十八世紀的法国唯物主义在內的以前的唯物主义;現在的哲学史家甚至不承认費尔巴哈是唯物主义者。对此我要回答說:赫尔岑认为自己对以前的唯物主义的反駁,对于任何一般的唯物主义都是不可駁倒的;同时在我们所考察的領域里,以前的唯物主义(至少从霍布斯开始)的理論立場,同費尔巴哈的立場並沒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由此可以看出,应当怎样对待那种认为費尔巴哈完全不是唯物主义者之說。这些說法不是以实际情况作根据,而是以某些在晚年变得非常保守、反动、膜拜

<sup>①</sup> 因此,赫尔岑从黑格尔那里承襲来的一个意見,即思維“同机械、化学、有机化学一样是发展的一个等級”(見上面),是站不住脚的。思維完全不是超有机的現象,因为它是处于一定发展高度的机体的机能。

上帝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所认为的应当怎样做根据。这些思想家坚持对他们方便的而又可笑可怜的原则，不承认任何一个严肃的思想家是唯物主义者，而不管他的学说是怎样的。有个时候，康拉德·施米特同我在《Neue Zeit》<sup>①</sup>上争论时，甚至拒绝承认拉美特利、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是唯物主义者<sup>1149</sup>。对于这些反驳，只能够说，一个人即使因某种原因要把自己置于可笑境地，也应该“知道分寸”。

我认为在这里再没有必要去重复我在别处关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所说过的话，我只提醒读者注意下面的事实。

当摩莱肖特的《Lehre der Nahrungsmittel》<sup>②</sup>这本书出版时，费尔巴哈不仅高兴地欢迎它，而且宣称这本书解决极困难的哲学问题，说它包含着真正的“未来哲学的原理”<sup>③</sup>。也许，人们是徒然地把摩莱肖特列入唯物主义者的吧？

不，为什么说空话！恩格斯完全正确，他指出：“费尔巴哈的发展过程是由黑格尔主义者转化为唯物主义者”<sup>④</sup>。但是任何发展都有自己的阶段。费尔巴哈自己后来也承认，他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观点，不是他的最后的观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犯有唯心主义的错误<sup>⑤</sup>。赫尔岑也是从黑格尔主义向唯物主义发展的。但是

① 《新时代》。……译者

② 译成俄文叫做《Учение о пище》（即《关于食物的学说》），它在我国思想发展史中也起过某种作用<sup>1150</sup>。

③ 费尔巴哈的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就是以此为名的。参看《Ludwig Feuerbach in seinem Briefwechsel und Nachlass, dargestellt von Karl Grün》（《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信札和遗著，卡尔·格律恩编》），第2卷，第81页<sup>1151</sup>。

④ 我们的斯拉夫派，例如霍米亚科夫，也认为他是唯物主义者（恩格斯的这段话，见《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6页。……译者）。

⑤ 大概，他的这个缺点可以说明以下这一点：卢那察尔斯基发现现在可以把这本书中所表达的宗教观点同“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宗教观点对立起来。卢那察尔斯基和波格丹诺夫先生，准备欢迎任何一个思想家的每一个缺陷，如果这个缺陷使他同唯心主义接近的话。

他的《自然研究通信》，比起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离开彻底的唯物主义学说要远得多。如果有人问我，赫尔岑在《自然研究通信》中所表现的哲学观点，究竟相当于费尔巴哈发展的哪一个阶段，那我就受到强烈的诱惑而回答说：相当于费尔巴哈的《Kritik des Idealismus》<sup>①</sup>一文，那篇文章写于1838年，专门分析了杜佛古特的《Kritik des Idealismus und Materialien zur Grundlegung eines apodiktischen Real-Rationalismus》<sup>②</sup>。顺便提一下，在那篇文章中，费尔巴哈反对思维只是存在的谓语的思想，就是说，反对以后成为他自己的哲学基础的思想。我以为，《自然研究通信》的作者会发现费尔巴哈在上述文章中反对这一思想时所发表的见解是完全正确的<sup>③</sup>。

现在也可以明白，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赫尔岑虽然受到费尔巴哈的著作之一的影响，竟能够赞同莱布尼茨的毋庸任何怀疑的极端的唯心主义，问题在于费尔巴哈的哲学史著作是属于他的理论发展的前唯物主义时期的<sup>④</sup>。

但是指出这点也就够了。如我们已经知道的，照费尔巴哈的意见，黑格尔对思维和存在的二律背反的解决，只是把上帝创造自然的神学学说翻译成哲学的语言<sup>⑤</sup>。《自然研究通信》的作者坚决起来反对这种学说。大家知道，他同格兰诺夫斯基的友谊的破裂，  
696 正是因为后者怎样也不愿意抛弃许多世纪以来的神学原理<sup>1153</sup>。

① 《唯心主义批判》

② 《唯心主义批判和为实在的唯理主义奠基的材料》

③ 反对杜佛古特的文章载于《费尔巴哈全集》（1904年版），第2卷，第131--145页。请记住，我根本不是说，费尔巴哈后来完全同意杜佛古特。没有这回事。我只是断言，他在同杜佛古特争论中所摒弃的上述那种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了他的完全承认。如此而已。

④ 见他的《全集》（第2卷，第406页），他自己承认这一点<sup>1152</sup>。

⑤ 参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版，第114页。——译者

但是赫尔岑反对它的一种形式(即神学装束),同时又维护[它](在他的《通信》里)因为它穿着哲学的服装<sup>①</sup>。这是毫无疑问的不彻底性,像車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sup>②</sup>这些六十年代的人是沒有这种不彻底性的。看来,赫尔岑自己后来也抛弃了它。但是,既然它在《自然研究通信》这样的著作中显露了出来,它是不会不受到在哲学上最有修养的“六十年代人”的注意的。車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也曾經是費尔巴哈的忠实信徒。但是他們所追随的那个費尔巴哈是发展的最后阶段上的費尔巴哈,是写下了《Vorläufige Thesen zur Reform der Philosophie》,《Grundsätze d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Wider den Dualismus von Leib und Seele》<sup>③</sup>,以及其全集第一版的非常出色的序言的費尔巴哈。因此,“六十年代人”可以有根据地认为他們更熟悉費尔巴哈,他們比四十年代的先进人物更忠实于他<sup>④</sup>。可以推测,这种信心显露于杜勃罗留波夫說到伯尔辛涅夫时所用的諷刺語調:“听他談論費尔巴哈是很有趣的!”<sup>1155</sup>如果这种推测(也許只能是一种推测)是正确的,那末,“极好的俄国貴族”伯尔辛涅夫不仅要自己难过,而且几乎要为整整一代人难过的。

下面我要指出赫尔岑的晚期著作,在那些著作里,他似乎完全

① 許多德國的費尔巴哈的讀者和景仰者,虽然欽佩他的《基督教的本质》,但对于他的基本哲学观点也沒有明确的理解。这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就已被指出了。參看施米特的上述文章, *Deutsches Bürgerbuch*(德意志文献)第2卷,第65頁。然而不妨指出,施米特本人也沒有摆脱这个缺点。

② 关于車尔尼雪夫斯基及其和費尔巴哈的关系見我的《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一书和載于我的《二十年来》文集的《車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理論》一文1154。

③ [《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綱要》,《未来哲学原理》,《反对身体和灵魂的二元論》]

④ 如果按照《果戈里时期俄国文学概觀》来判断,那末應該以为,在这种情况下,至少有一个值得称道的例外,即別林斯基。

和唯心主义决裂了。现在，我暂且只能重复说，这种决裂开始于1844年春天是根本谈不上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对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坚持唯心主义的解决方法的。

697 在我国都习惯于认为赫尔岑是“实在论者”，可是并没有给“实在论”这个术语注入任何确定的理论内容，我所讲的关于他的唯心主义的话，对许多人可能是很奇怪的。但这种唯心主义是不能回避的事实，是为了说明俄国社会思想史而必须指出的事实。也许，有的读者听到《自然研究通信》的作者的唯心主义时会感到难过；对于这种读者，我要讲这样一件事来安慰他们。

同恩格斯第一次会见时，我同他顺便谈起了拉萨尔，当然，他对拉萨尔是很熟悉的。恩格斯在说明拉萨尔的哲学观点时告诉我：“你想想，他直到临终时还相信黑格尔范畴的预先存在 (Präexistenz der Hegelschen Kategorien)!”任何一个熟悉像拉萨尔的《System der erworbenen Rechte》<sup>①</sup>这样一部著作的人，都是不难相信这一点的。在拉萨尔的世界观中有它的弱点。但问题在于赫尔岑在《自然研究通信》中，正是作为相信（至少有时是这样）Präexistenz der Hegelschen Kategorien（黑格尔范畴的预先存在）的人来批评唯物主义的。我请读者记起，我们的作者关于在有机过程中实现的“预先存在的观念”说了些什么。在这方面还更突出的是，他赞扬黑格尔试图说明自然的辩证过程，“除了概念的逻辑运动以外，没有引进任何别的动因”。

## 五

直到不久以前都流行着这样一个观点：如果说别林斯基曾经

<sup>①</sup> 《既得权利的体系》

热中于黑格尔的“哲学帽子”，那末赫尔岑则幸运地避免了青年时代的这一错误，他站在“实在论的”观点上，从来没有对“帽子”持任何肯定的态度。现在我们看到这是多么错误。赫尔岑也是注定长久地戴上黑格尔的“哲学帽子”的。惋惜这一点是大错特错的，因为这对于他不是不幸，而是很大的幸运。如果没有经过黑格尔逻辑学的“熔炉”的锻炼，我们这位卓越的作者就会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不是完全的人，不是现代的人”。在关于他的思想发展进程的通常说法中，只有一点是公正的，那就是黑格尔哲学从来没有使他（与别林斯基相反）去同俄国现实调和。这种差别的产生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时间的关系，第二是赫尔岑的才智的性质和别林斯基的才智的性质并不相似。 698

在青年时代就侧身于“政治家”之列的赫尔岑，比别林斯基晚几年才开始研究黑格尔哲学<sup>1156</sup>。这在当时非常重要，那时每一个新的年份都给黑格尔派左翼带来许多新的胜利，给其右翼带来许多新的失败。这些胜利和这些失败，在俄国不是不知道的。赫尔岑就很生动地证明，在莫斯科人们是怎样密切地注意德国的哲学著作。“在柏林以及其他省城和县城出版的一切毫无价值的德国哲学的小册子，只要是提到黑格尔的，就都订购来，在几天内读得破破烂烂的”<sup>①</sup>。他开玩笑地补充说，所有的威德尔、马尔海奈凯、米希勒、奥托、瓦特克、沙列尔、罗森克兰茨们，甚至阿尔诺德·卢格，听说“他们在莫斯科，在马罗舍卡和莫霍瓦之间引起了怎样激烈的争斗，人们是怎样读它们，怎样买它们”<sup>②</sup>，都无不感动得落泪。但是人们阅读和购买的不仅有奥托、马尔海奈凯和米希勒们

① 《赫尔岑全集》，第7卷，第121页1157。我们看到，《维干德季刊》是怎样迅速地到他那里的。

② 同上书，第122页1158。着重号是原著就有的。

的著作，而且有左翼的代表人物的著作。其中之一就是赫尔岑自己所提到的阿尔诺德·卢格；除卢格之外，还有布鲁诺·鲍威尔、施蒂纳，以及上面提到的约尔丹和其他许多人。从赫尔岑的日记可以看到，例如他很熟悉布鲁诺·鲍威尔遭到的处罚在德国先进人士中所引起的激动，鲍威尔由于他的大胆的神学研究而被当局撤消了 *licentia docendi*①。黑格尔左派的机关刊物《Deutsche Jahrbücher》②，他也不是不知道的。关于这些人，我们在《日记》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意见：“由于这些人，德国哲学由讲堂进入生活，成为社会的、革命的，有血有肉，从而给事变以直接影响。由此可见，在政治教育方面显然大步前进了，而且德国人几乎摆脱了他们通常所受到的责备……文章之一的结尾坦率地说，应当一劳永逸地加以解决，‘究竟是基督教和君主制，还是哲学和共和国！’于是德国就 *lancée*（投身。——格·普·）于政治的解放”等等③。

599 当你从这个哲学体系的解释者那里得到这类印象时，是不可能从与现实调和这一角度去理解它的，——情况只能是完全相反④。

黑格尔的学说是详尽而彻底地制定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绝对唯心主义把自己装成是绝对真理的哲学启示。照黑格尔看来，

① [副教授资格]

② [《德意志年鉴》]

③ 《赫尔岑全集》，第1卷，第30—31页1159。奥托·维干德的《季刊》也曾是黑格尔学派左翼的机关刊物。

④ 当时先进的德国知识分子——至少以所谓真正的（哲学的）社会主义者为代表——是十分独特地处理“现实的合理性”的。在黑格尔那里，“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为“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所补充。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者说：既然我们的意愿是合理的，那它们就必将是现实的，也就是要实现的。因此，在他们那里，黑格尔学说所导致的，不是同现实调和，而是同空想主义调和。可是还不清楚：赫尔岑在出国之前是否已经知道这种社会主义。



既然真理只是它實現以後才被人們所認識（“密納娃的貓頭鷹只是在黃昏才飛翔”<sup>①</sup>），那末，認為自己是絕對真理的完整體系的擁有者的思想家，必然認為他當時的社會政治制度是極其接近於完善的。黑格爾的“絕對的”野心使他作出了保守的結論。而且誰要是容忍這一野心，誰也就會接受這些結論。某個時候別林斯基就是這樣做的。但是在黑格爾哲學中還有另一面，即辯證法的一面。在赫拉克利特的“一切在流動，一切在變化”這句話里表達得很出色的對世界的辯證看法，排除了任何的保守主義，當然，只要不背叛自己，它就預先容許了社會的前進運動。黑格爾左派同右派的鬥爭，意味着在黑格爾學說中主要重視其辯證法一面的人們，起來反對那些傾向於哲學絕對主義的人們。赫爾岑清楚地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寫道：“黑格爾的功績，正在於他把科學體現於方法之中，只要理解他的方法，就會幾乎完全忘記他的個性”<sup>②</sup>。在《科學中的佛教》一文中，他辛辣地譏笑了形式主義者，他們“感到驚奇：人們還營求什麼，既然一切都說明了、意識到了，人類已經達到存在的絕對<sup>③</sup>形式了，——清楚地證明這一點的是，現代哲學是絕對哲學，而科學永遠是與時代同一的，但是是作為它的結果，就是說，是在存在中完成以後。對於他們，這種證明是不可駁倒的”<sup>④</sup>。他擔心讀者懷疑這類“形式主義者”的存在，而引證了現在被忘記了的黑格爾主義者拜爾霍費爾，後者曾寫過一本“絕對的”書《Die Idee und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sup>⑤</sup>。他絲毫沒有隱瞞自己對辯證

700

① 語見黑格爾《法哲學原理》序言（參見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4頁）。密納娃（Minerva）是羅馬傳說中的智慧女神，貓頭鷹是她的象徵。——譯者

② 《赫爾岑全集》，第2卷，第159頁1160。

③ 着重號是原著就有的。

④ 《赫爾岑全集》，第1卷，第373頁1161。

⑤ 《《哲學的觀念和歷史》》

世界观的拥护者的深刻同情。

照他的話說，他們比黑格尔本人更忠于黑格尔；他們“从他的原則出发，大胆地反对他的不彻底性，坚信是跟着他走，而不是反对他”<sup>①</sup>。黑格尔自己在他的論述中，表现为一个理解其辯证唯心主义的深刻的革命性而又害怕它的哲学家。甚至黑格尔写得极其晦涩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就已說明黑格尔对他自己的哲学的革命性的恐惧。

“尽管黑格尔的天才伟大有力，他也是一个人；他唯恐在說話要隱晦曲折的时代直言不諱，因为他害怕走到他的原則的最后結果；他缺乏貫徹到底的英雄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去接受全部真理，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最伟大的人物在自己的原則的明显結果面前停止了；另一些人吓坏了，向后倒退，不是去寻找明确性，而是把自己掩藏起来。黑格尔看到，需要把許多众所公认的东西牺牲掉，他舍不得加以打击，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說出非說不可的东西”<sup>②</sup>。于是黑格尔的語言就变得难以置信的晦涩。

我們在《往事与回忆》中可以看到这种对黑格尔的同样的看法。那里說：“黑格尔在柏林任教授时，一部分由于上了年紀，更多地是由于满足于地位和名誉，有意地把自己的哲学抬到尘世水平之上，置身于这样的境界，即一切現代的利益和热情都变得没有什么区别，好像从气球上看建筑物和村庄一样；他不喜欢执着于这些难以处理的、需要正面回答的、可恶的实际問題”<sup>③</sup>。

这种认为黑格尔“有意”把自己的哲学抬到尘世水平之上的意見，是經不起批評的。西欧先进思想以后的整个发展，证明了它的

① 《赫尔岑全集》，第2卷，第159頁1162。

② 同上书，第1卷，第349—350頁1163。

③ 同上书，第7卷，第124—125頁1164。

錯誤。实际上，不仅黑格尔本人，而且連黑格尔左派也沒有充分地完全了解黑格尔哲学的革命内容及其一切可能作出的結論。有这种理解的只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受过黑格尔的熏陶后，又受过 701 費尔巴哈的熏陶，他們使辩证法“用脚站立起来”，就是說，使它由唯心主义的（在黑格尔和包括布魯諾·鮑威尔在內的黑格尔左派那里就是这样的）轉变为唯物主义的。但是不管怎样，值得注意的是，赫尔岑在这种情况下是十分接近德国的黑格尔左派的。在布魯諾·鮑威尔的《Die Posaune des jüngsten Gerichts über Hegel, den Atheisten und Antichristen》<sup>①</sup> 这一名著中，伟大的德国唯心主义者也被描写成一个清楚地意識到从他的“原則”中产生的革命“后果”的人。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布魯諾·鮑威尔在把黑格尔描写为思想領域的极端的革命者的时候，他本人仍然是唯心主义者。唯物主义者費尔巴哈因此在其《Vorläufige Thesen zur Reform der Philosophie》<sup>②</sup> 中，甚至同他进行論战。

## 六

上面我已指出，戴上黑格尔的“哲学帽子”，对于赫尔岑說来，不是不幸，而是巨大的幸运，因为它鍛炼了他的头脑。如果現在对这一点还有什么怀疑，那我可以再指出那些《自然研究通信》。我发现了《通信》的作者的基本理論錯誤。看来，这个錯誤完全可以算在黑格尔的賬上，因为这个錯誤在于，赫尔岑对于思維和存在統一的唯物主义学說理解很差。但是在这里，問題其实在于唯心主义，而不在于黑格尔賦予唯心主义的那种特殊形式。当我說黑格尔的影响鍛炼了赫尔岑的头脑的时候，我指的不是他的哲学的唯心

① 《对无神論者和反基督者黑格尔的最后审判的号声》

② 《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綱要》

主义方面，而是他的哲学的辩证法方面。誰只要好好讀·讀《自然研究通信》，誰就不難懂得，这一方面对赫尔岑的影响是多么有益。这些通信尽管有上面指出的那种弱点，但却應該承认它們是赫尔岑很大的理論上和文学上的貢獻。只要想一想就行了！在这些通信里，我們的作者力图为哲学接近自然科学而开辟道路，而那时候，尤·費·薩馬林正是千方百計（正如現在比如說巴札罗夫先生那样千方百計）使哲学和宗教結合起来<sup>1165</sup>①。很清楚，为了使黑格尔哲学同宗教接近，需要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黑格尔主义的“絕對”方面；同样清楚的是，为了使哲学同自然科学接近，就需要主要依靠辩证法。在《自然研究通信》中，确有光輝的篇頁闡述了对世界过程的辩证的看法。我根本沒有可能在这里来重述这些篇頁，因为它們实在太多了；但是我禁不住要从它們中間摘录一些最有代表性的段落。

赫尔岑在贊許地叙述赫拉克利特时說：“存在是活生生的运动，一方面，生命无非是不断的、不停頓的运动，是积极的斗争，也可以說是存在和非存在的积极調和，这一斗争越頑强、愈厉害，則存在和非存在就越加互相接近，它們所发展的生命就越高；这一斗争是永恆的，貫徹始終的，——是它們不能逃避的不断的相互作用”②。

不要以为赫尔岑只是重复和稍为扩张这位“晦涩的”爱非斯哲学家的“一切在流动，一切在变化”的一般思想。不是的，他善于利用这一般思想，把它应用于个别自然現象。下面就是他关于有机

① 赫尔岑在宣传自然科学接近哲学时，有时几乎是一字一句地重复费尔巴哈的話（费尔巴哈关于这个問題所講的話，見他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綱要》。《全集》，第2卷，第244頁）<sup>1166</sup>。但是赫尔岑一般說也賦予这一思想以唯心主义的色彩，而这一思想在费尔巴哈那里則是唯物主义的。

② 《赫尔岑全集》，第2卷，第114頁<sup>1167</sup>。

体的意見。

“动物的机体是同死亡的不斷斗争，而每一次都取得胜利；但这种胜利又有利于一定的存在，而不是有利于非存在。活体由以构成的多元組織，不断分解为二元組織（即无机的、矿物的），并不断重新組成；饥饿重复着自己的要求，因为材料不断被消耗；呼吸維持着生命和燃烧着机体，机体不断地排出废气。如不喂养动物——它的血和脑就会烧尽……生命越发达，它越进入更高阶段，存在和非存在的斗争就越剧烈，它們就越互相接近”<sup>①</sup>。

还有这样的話：“我們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人（我指的是意識到自己的讀書人）这样不习惯于思想的規定性，以至只在无意識地使用它們时才不发生困惑。例如，这是不会使我們惊异的；在生理方面人是不可分的整体，是一个原子，而在解剖学方面人是各种不同部分的大量堆积；我們的身体同时既是我們的自我，又是我們的他物；誰也不会对在我們周围不断进行的发生过程、这种存在同非存在的默默的斗争（如果没有这种斗争，那就只有无差別的东西了）感到惊异；誰也不会对在我們周围的短暫的事物的这种永恆性感到惊异。你把善良的人每天看到和感觉到的东西叫出来，——他們不会懂得你，永远不会在你的話里认出他們熟悉的东西”<sup>②</sup>。

703

最后一段：“实际上我們正是按赫拉克利特的方式（即辩证地。——格·普·）去看待事物；只是在普遍的思維范围里，我們不能理解我們所做的事情。人們不是老早就意識到，現存之物的完全的真理，不是它的僵死的惰性，不是它与自身的同一？例如，在一切生物中，除了永恆改变的过程和看来只是在变动中活着的東西以外，难道我們还看見什么別的东西嗎？骨头是机体的最坚

① 《赫尔岑全集》，第2卷，第114—115頁1168。

② 同上书，第11卷，第137頁1169。

固的存在，而我們甚至不认为它們是活的东西”<sup>①</sup>。

根据这些段落所給予的印象，会不难认为，它們不是写于四十年代初，而是写于七十年代下半期，而且不是赫尔岑写的，而是恩格斯写的<sup>②</sup>。前者的思想多么像后者的思想。这种惊人的相似表明，赫尔岑的智慧同恩格斯的智慧，从而同馬克思的智慧，是朝一个方向工作的。赫尔岑不是白白地經過黑格尔的熏陶，科学社会主义的創始人几乎与他同时經過了这种熏陶。区别（当然，这是极其重大的区别）仅在于，赫尔岑的辯证法仍然是唯心主义的，而恩格斯—馬克思的辯证法已經是唯物主义的了。在讲了上述一切之后，看来，我对赫尔岑并不是不公正的。可是，为了万一，我們再举一个极有說服力的证据。

在以极大的同情闡述了赫拉克利特对宇宙的辯证观点后，我們的作者认为自己有责任指出这一观点的弱点。“不仅如此，他（指  
704 赫拉克利特。——格·普·）把自然理解为过程；他把它理解为自动的过程。可是从这一运动中沒有引出什么，缺乏那种会成为暫时的迴轉、会显露为运动的结果和运动的开始的統一。在赫拉克利特那里，运动的开始是注定的、困苦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在多样性中保持住自己，不知为什么使自己作为不可抵抗的力量、作为事件而出現，而不是作为自由、自觉的目的而出現。赫拉克利特一般地沒有給运动以目的；他的运动比埃利亚学派所說的存在具体些，但它是抽象的；它大声地要求目的，要求經常性”<sup>③</sup>。

① 《赫尔岑全集》，第2卷，第117頁1170。1845年1月，赫尔岑热心地讀杜馬的化学史，并就此提出了以下有趣的意見：“沒有化学就沒有生理学，从而也就沒有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基础一直就非常不巩固，因为它們只研究一种形态学，而沒有研究其中有什么在变化”（《赫尔岑全集》，第1卷，第264頁）1171。

② 參閱恩格斯的《反杜林論》，第15頁及以下1172。

③ 《赫尔岑全集》，第2卷，第118—119頁1173。

讀了黑格尔的《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sup>①</sup>中批評赫拉克利特的地方，就会深信，上面这种批評意見是在黑格尔的影响下写成的。但是赫尔岑在这种場合同意黑格尔这一事实，暴露了他的辯证法观点的唯心主义性质，因为只有唯心主义者才会說到永恆的世界运动的“目的”。

违反着自己的唯心主义性质，黑格尔的辯证哲学也在这一方面給了赫尔岑良好的影响，那就是他认为必須使自然科学从“抽象力量”中“解放出来”。后来，当能量轉化学說产生和传播的时候，自然科学确实从抽象力量中解放出来了<sup>②</sup>。

恩格斯的《反杜林論》还在下述一点上与《自然研究通信》相似，那就是坚持要自然科学家深信，辯证地观察自然对他們是多么有益。恩格斯指出：“可惜直到現在，用辯证法去思維的自然科学家，还是屈指可数，因此发生实验的数据同通常的思維方法之間的經常的矛盾，这些矛盾也就說明着現在統治于理論自然科学、并且使教員和学生、著作者和讀者都同样陷于絕望的地步的那种无限的紊乱”<sup>③</sup>。

705

恩格斯在这里重复了——显然，絲毫也不用怀疑这一点——，我們几乎在《自然研究通信》的每一頁上都会遇到的那种抱怨。

① 《哲学史讲演录》

② 赫尔岑說：“毫無疑問，数学在思維中走得比物理学远得多，单是无限小的理論就证明了这一点”（《赫尔岑全集》，第2卷，第56頁1174）。在另一个地方，他詳細地發揮了这个观点。他称赞数学，說它抛弃了知性的非此即彼的观点。“什么是微分？那就是无限小的数；所以，或者它有数，这时它就是有限的数，或者它没有任何的数，这时它就是零。但是莱布尼茨和牛頓理解得更广些，採納了有和无的并存、初生运动，从无过渡到有。无限小的数的理論的結果是众所周知的。其次，数学既不怕負数，也不怕非公約数，既不怕无限大，也不怕虛根。显然，这一切在狹隘的知性的‘非此即彼’的观点面前都会化为烏有的”（《赫尔岑全集》，第1卷，第294—295頁附注1175）。这是从黑格尔那里承襲得来的对数学的純粹辯证的观点。

③ 《哲学、政治經济学、社会主义》，雅科温科先生出版社版，第16頁1176。

自然科学家先生們直到現在都沒有表現出很大的興趣去掌握辯证的自然观,虽然近年来的化学发现再一次证明,如恩格斯所說的,自然界的一切都是辯证的。在这方面应当归罪于現在的唯心主义,它也使自然科学家受到影响,它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相反,完全不会运用辯证法的武器。

赫尔岑还責备自然科学家,說他們“怎么也不願意分析知識和对象、思維和存在的关系”。用他的話說,自然科学家“这样害怕学說的系統性,甚至他不願意把唯物主义看做学說;他們乐意完全經驗地、被动地对待自己的对象,观察它;不言而喻,这对于有思維的人之不可能,正如机体不可能取用食物而不消化食物一样”<sup>①</sup>。如俗話所說,这真是一針見血。自然科学家直到現在都不願意用功夫去分析存在同思維的关系。因此,好談哲学的自然科学家,每当談到这一重要的問題时,通常都暴露出自己的幼稚无能。可以举奧斯特瓦尔德为例,他的唯能学說是以純粹唯心主义的認識論为依据的;也可以举出馬赫,他复活了貝克莱;甚至可以举出海克尔,他有时突然无缘无故地攻击那构成他的一元論学說的唯一真实內容的唯物主义<sup>1178</sup>。所有这些不自觉地犯唯心主义毛病的自然科学家,都天真地相信他們的观点远离唯物主义,有如天壤之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当一个学者忽視某个重要的理論問題时,他就会不由自主地、不知不觉地用陈旧的、站不住脚的方法来解决這個問題。至于赫尔岑,那他自己也是跟随着黑格尔,去錯誤地解决思維和存在的二律背反。因此,他对自然科学家所提出的、在实质上完全正确的責备,在他那里就具有这样的含义,即責备他們宁願要极端經驗主义而不要絕對唯心主义。这样来表达他的責备,看来并

<sup>①</sup> 《赫尔岑全集》,第2卷,第40頁1177。



不是很駭人听闻的。

## 七

1843年10月26日，赫尔岑在同伊·瓦·基列也夫斯基<sup>1179</sup>的一次谈话的影响下，在他的日记里顺便地写下了这样一些话：“历史，作为人类趋向解放和自我认识、趋向自觉的事业的运动，对于他们是不存在的，他们的历史观从相反的方面接近于怀疑论和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的全部生活是病态的、反常的现象。其中有着疯狂的一贯性”<sup>①</sup>。

在《自然研究通信》中，他批驳那种认为哲学史不值得研究，因为它是互相矛盾的哲学体系的汇集的意见时说：“不对。谁的眼力这样弱，不能在现象的表面形式后面看清透露出的内在的内容，不能在看得见的多样性后面看出那看不见的统一性，不管怎样说，在他看来，科学的历史都好似各种智者的意见的汇集，这些智者每一位都随着自己的心意谈论各种训诲和有教训意义的东西，而且有一种一定要反驳读者并同前辈争吵的恶习：这是原子论，历史上的唯物主义；从这种观点看来，不单科学的发展，而且整个世界史，都似乎是个人杜撰和偶然性奇怪的交织的事业——这是属于某些怀疑论者和考虑不周的群氓的反宗教的观点”<sup>②</sup>。

现代的读者听到对斯拉夫派的这种指责，说他们的历史观接近于唯物主义，当然是会感到奇怪的。我们这个时代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称做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不可能提出这种指责的。但是赫尔岑对这种唯物主义却全然不知道，而且他在我们所考察的他的发展时期，还是修养很差的。赫尔岑没有预

① 《赫尔岑全集》，第1卷，第140—141页1180。

② 同上书，第2卷，第91页1181。

707 感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創立是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理論成就之一。他以为“在唯物主义中超过霍布斯，就沒有地方可走，除非投向怀疑論”<sup>①</sup>。当然，他不能把霍布斯的《利維坦》看做是解释社会发展历史进程的令人滿意的嘗試<sup>1183</sup>。十八世紀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观点，也不能使他感到滿意。霍尔巴赫常說，一国人民的历史命运有时在許多世紀里决定于某一暴君的头脑中的某一原子的某一运动。这类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是非常接近于完全的怀疑論的。它等于坚决承认历史过程的科学解释是不可能的。赫尔岑是对的，他說，从这种观点看来，“整个世界史，都似乎是个人杜撰和偶然性的奇怪交織的事业”，它是“病态的、反常的現象”。而他，作为黑格尔的学生，想把历史了解为正是“人类趋向于解放和自我認識、趋向于自觉的事业的运动”。他写道：“思維史是自然史的繼續，因为无论是人类或是自然，离开历史的发展都是不能理解的。这两种历史的区别在于，自然什么也不記得，对于它，往事是沒有的，而人則有自己的一切往事，因此人不仅表现为部分，而且表现为类。历史把自然同邏輯联系起来，如果没有历史，它們就是互相分开的”<sup>②</sup>。这就是說，他也力图从辯证的观点去观察历史。在这里，作为黑格尔左派，他使辯证法成为革命运动的精神杠杆。他說：“黑格尔哲学是革命的代数学，它不同寻常地使人得到解放，并彻底打破基督教的世界，打破过时的傳說的世界”<sup>③</sup>。

这說得非常好，非常鮮明。可惜，在这一对真理的非常好、非

<sup>①</sup> 《赫尔岑全集》，第2卷，第292頁1182。休謨的怀疑論，在赫尔岑那里被描写为把唯物主义 *reductio ad absurdum* [达到荒謬程度]。实际上他是后退一步，从唯物主义倒退到唯心主义。在我們这个时代，就可以把某种彻底的哲学学說算作馬赫的学說而言，休謨哲学部分地在馬赫的学說中复活了。

<sup>②</sup> 《赫尔岑全集》，第2卷，第82頁1154。

<sup>③</sup> 同上书，第7卷，第128頁1185。

常鮮明的表达中，只包含真理的一部分。黑格尔哲学是革命的代数学，因为它“不同寻常地使人得到”解放。是这样的。但这里說的是什麼解放呢？是人的思想解放。所以，黑格尔哲学是革命的代数学，因为它不同寻常地促进革命思想的形成。但是从黑格尔的观点看来（在这里赫尔岑談的是他的方法），观念远远不是历史运动的主要动力：“密納娃的猫头鷹只在黄昏时才飞翔”。我們在前面看到，赫尔岑談到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时，贊成这位伟大的德国唯心主义者訴諸概念的邏輯运动，把它作为唯一的“动因”。黑格尔在自己的历史哲学中，也仍然是訴諸概念的邏輯运动，把它作为最高主宰。試問，赫尔岑在解释历史过程这一点上是否贊成这样做呢？对这一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我同意，否定地回答这一問題，是必需有保留条件的，但是我終究看不出有給予肯定回答的可能性。

708

在这里的必要保留条件有如下述。赫尔岑坚持黑格尔对思維和存在的关系的观点，就是說，在任何哲学的基本問題上仍然是唯心主义者，因此他就不能不在自己的历史哲学中也成为“絕對”唯心主义者。这里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在《自然研究通信》中，他警告讀者說：“不管說自我認識的邏輯过程或是历史过程，在实质上反正是一样的。我們选择后者。严格的、鮮明的、自相協調的邏輯步驟，較不合乎我們的心意”<sup>①</sup>。在这里，他把自我認識的历史过程理解为哲学的历史发展。因此，在他看来，無論是闡述自我認識的邏輯过程，即闡述邏輯，或者是描述和說明哲学思想的历史运动，反正都是一样的。从黑格尔的观点看来，这是无可爭辯的，因为在黑格尔那里，哲学的发展，同任何其他发展一样，归根到底决定

① 《赫尔岑全集》，第2卷，第83頁1186。

于绝对理念的逻辑发展。赫尔岑在说出这种从黑格尔观点看来是无可争辩的思想时，他是忠实黑格尔派，是绝对唯心主义的信徒。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在另一个地方，他不满意黑格尔把自然和历史看作应用逻辑的观点。就是说，赫尔岑感觉到了赖以能说“反正是一样的”的那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的确，在他的历史论断中，他很少诉诸作为最深刻的“动因”的“概念的逻辑运动”；而出现在得最多的是在德国黑格尔左派之间流行的那种观点：历史的进程决定于人类思想发展的进程。这一观点也就使得赫尔岑把辩证法理解为革命的代数学。

709 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历史观点使赫尔岑感到吃惊，但在这种场合下他们却同他十分接近。霍尔巴赫关于能够长期决定人类历史进程的球形原子的议论是一个极端的见解，而法国唯物主义是很少走到这种极端的见解的。这派人多半是断言“C'est l'opinion qui gouverne le monde”——意见支配世界。这就是后来包括赫尔岑在内的黑格尔左派所走向的那种历史唯心主义。如果我们把它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比较一下，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特点是远不如后者深刻。黑格尔很喜欢重复阿那克萨哥拉的话：“νοῦς [理性]支配世界”。但是他补充说，在天体的运动中也有理性，但是天体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他那里，合理性的概念是同规律性的概念相等的。当他谈到人类的历史运动时，他清楚地意识到，“意见”的发展远远不是人类历史运动的最深刻的原因。在他那里，这种意识反映为指靠概念的逻辑运动（这里是为了重复赫尔岑所使用的黑格尔的表达方法）。当然，指靠概念的逻辑运动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它只是说用“意见”来作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往往是这样做的：他指靠概念的运动（或者，反正一样，指靠绝对理念的发展），似乎又感觉到这种空洞的

“动因”软弱无力，于是出乎意外地又转向现实的社会关系，从其中寻找对某一历史现象的答案。例如，对于古希腊的衰落，他发表了許多关于世界精神的发展的高論，以后又突然转向經濟，宣称拉栖德蒙<sup>①</sup>是由于财产不平等而衰落的<sup>1187</sup>。这样，在他的《历史哲学》中，违反他的意志，出現了一些同他在自己的一般哲学議論中喜欢重复的东西直接对立的意見。他常說：唯心主义表明自己是唯物主义的真理。而在他的《历史哲学》中，相反地，唯物主义却是唯心主义的真理，或者說（如果我们想表达得更确切些），在唯心主义表明自己是简单的“空話”的地方，只有唯物主义才能說明某些东西<sup>②</sup>。黑格尔这样相当經常地转向經濟，不仅給《历史哲学》，而且也給（这是非常出色的）他的美学，带来唯物主义因素。集合在黑格尔学派左翼的作家們，包括赫尔岑在內，他們的历史观点的主要缺点正在于，把自己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意見”的发展上，这些作家沒有看出黑格尔的这些唯物主义墮落的巨大成果，因而在历史上作为純粹的唯心主义者而出現。这无疑是在理論方面后退一步。但是黑格尔的一切左派信徒，除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外，都是容許这一点的<sup>③</sup>。誠然，在他們中間最有才能的人的“理論良心”

710

① 拉栖德蒙(Lacedaemon)——即斯巴达。——譯者

② 关于这一点，請參看我的《对我們的批判者的批判》文集中的《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一文1188。

③ 德国的所謂哲学社会主义的最著名的代表之一莫泽斯·赫斯，受到了费尔巴哈的极强烈的影响，可是他責备费尔巴哈抱着絕對唯物主义的观点（參看1845年《Deutsches Bürgerbuch》中的他的文章《Beachtenswerthe Schriften für die neuesten Bestrebungen》（1845年《德意志文獻》中的《对于最新傾向的值得注意的著作》）。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和典型的：哲学社会主义依靠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但是又摒弃他的唯物主义，因为它在唯物主义中沒有为自己的空想主义傾向找到所期望的理論根据。也由于这一原因，我国主观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等人）摒弃了唯物主义，現在馬赫主义者（卢那察尔斯基和波格丹諾夫）又摒弃唯物主义。一切根据这一原因而摒弃唯物主义的人，都发现了唯物主义沒有給个人的自我活动留下应有的地盘。

的深处,对这种世界的不合理性,已有或多或少的模糊认识。我们会看到,这种认识后来是怎样使赫尔岑感到痛苦的。但是这种认识在他那里从来没有达到完全明确的程度,而他所经受的无法消除的和深刻的理论痛苦也正在于此。

## 八

说赫尔岑把“意见”的发展看做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这可以从他的日记中摘出很多话来证明,也可以从他的《自然研究通信》以及《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和《科学中的佛教》等文章中摘出很多话来证明。按照自己的习惯,我只限于摘引一些在我看来是最有说服力的段落。

他关于古代东方说道:“东方人不理解自己的尊严,因此,他或者成为驯服的奴隶;或者成为肆虐的暴君”<sup>①</sup>。未必用得着说明,只有站在唯心主义观点上,才看不出这种“因此”在科学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关于日耳曼人,他是这样议论的:“日耳曼人一出现就具有这样一种性格,要更彻底地从一切直接的东西,从基础,从前代人,甚至从家庭解放出来;个性,这就是他带进世界的观念,并且他阐释尽了自己的思想的全部丰富内容,他似乎完成着自己的使命,作为对未来的遗嘱而留下了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sup>②</sup>……在日耳曼人那里,他们带进世界的观念一开始就是明确的”<sup>③</sup>。

最后,还有一个更加卓越的、在俄国社会运动史上起了同样作用的思想。用赫尔岑的话来说,“人类历史是自然历史的继

① 《赫尔岑全集》,第2卷,第96页1189。

② [人权宣言……]

③ 《赫尔岑全集》,第1卷,第175页1190。

續”<sup>①</sup>，但是“在自然中，观念是有形体地、无意识地存在着，服从于必然的规律和未被自由理性所扬弃的模糊的倾向”<sup>②</sup>，而在历史中则开始有意识；“哪里开始有意识，哪里就开始有精神的自由；每一个人随自己的意去完成使命，在事件上留下自己个人的印记”<sup>③</sup>。

如果黑格尔哲学像赫尔岑所說的是革命的代数学，那末，赫尔岑的关于在历史上“随自己的意”而行动的个人自由的思想，就可以称为应用于实际行动哲学的历史唯心主义的代数学，或者称为空想主义的代数学。在这里改变一个术语，你就会得到彼·拉·拉甫罗夫的《历史信札》的主要思想，他教导說，历史是由“随自己的意”改造文化的批判地思维着的个人所创造的。成为这一空想主义的代数学公式的基础的理论错误，我們已經在其另一种表现形式中知道了。讀者也許还记得，赫尔岑在反駁唯物主义的認識論时证明說，理智的活动是 *actus purus*<sup>④</sup>，因此，經驗刺激意識的活动，而不决定这一刺激的后果。费尔巴哈駁斥这一观点（当然，不是赫尔岑首先讲出这一观点），指出了自然現象不以人类理智为轉移的規律性。但对于历史也完全应当指出这一点。如果自然这本书不是一个一个字母杂乱无章地拼凑在一起，那末，社会生活这本书也和这种拼凑毫无共同之点。如果我們把自然中有区别的东西加以区别，把有联系的东西加以联系，那末，要知道在社会生活中我們也不能随意确定事件的相互联系。如果我們研究自然，使事物作为原因和結果而一个从属于另一个，只是因为它們的真正的、实际的相互联系就是如此，那末，要知道也只是因为这样，我們才

712

① 《赫尔岑全集》，第1卷，第380頁1191。

② 同上书，第377頁1192。

③ 同上书，第380頁。着重号是原著就有的1193。

④ （純粹的活动）

有权利说到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既然如此，那末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随自己的意去完成使命”就只能在这样一种限度内，即他的“精神上的自由工作”是以社会发展的有规律的进程为依据的，并且是表现这个进程的。赫尔岑赞扬黑格尔，说他使人从物质的规定中解放出来而得到充分的发展<sup>1194</sup>，换句话说，就是在黑格尔看来，人愈不发展，人就愈加依赖于自然。这一赞扬见于他的1844年4月14日的日记，谈到自由地“完成使命”的个人的那篇文章（《科学中的佛教》）则注明写于1843年3月23日，即完成的时间比日记还早十二个月。完全可以认为，这种赞扬与文章里所分析的地方不是没有联系的。大概，赫尔岑所以在日记中赞同黑格尔的思想，是因为黑格尔的思想，在他看来，是他自己关于自然规律性同精神自由的关系的思想的新证明。但是，把规律性和自由对立起来，一般说来并不符合黑格尔哲学的精神。黑格尔说：“Die Freiheit ist dies: nichts zu wollen, als sich”<sup>①</sup>（自由在于除了自己而外并不希望什么）。这是真正天才的定义；然而它丝毫不排除愿望的发生过程中的规律性。相反地，自由必定以它为前提，因为没有原因，愿望是不会产生的。谢林就曾指出，假使没有必然性（即规律性），也就不可能有自由<sup>②</sup>。最后，赫尔岑在这里似乎忽略了，规律性概念并不限于是自然现象的规律性概念，因为还有历史过程的规律性。但是他犯了这种错误（或者可以这样说，他在这里容许了这种思想的含糊），正是因为他同整个黑格尔学派左翼<sup>③</sup>所持的历史唯心主义，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观念的发展上，亦即集

① 《黑格尔全集》，第12卷，第98页1195。

② 这几乎是他的最天才的思想1196。

③ 我已经在上面指出，在这种场合，我是不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算在内的。把他们算在内是错误的，因为他们的观点远远超出了黑格尔左派的范围，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自己常常把自己同黑格尔左派对立起来。



中在社会人的自觉活动上，而这种自觉活动则表现为不服从于必然规律的自由活动。在这方面，只有科学的分析才能消除这种抽象，由于这种抽象，人意识到自己是原因，而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结果<sup>①</sup>。 713

赫尔岑在《科学中的佛教》一文的结尾说：“奥古斯丁在古代世界的废墟上宣告了人类要去建立的关于全能的主的崇高思想，并在远方指出了庄重的安息的星期六。这是历史哲学的诗意的宗教的原则；它显然包含在基督教之中，但是人们长久地不了解它；不到一个世纪以前，人类思考并在实际上开始解释自己的生活，看清楚它不是白白发展的，它的经历有着深刻的和统率一切的意义。它以这个成年人的问题指明，培养正在结束<sup>②</sup>。科学着手回答它；科学一说出答案，人们就需要离开科学的出路——这是成年的第二个标志。但是为了用自己的手把门打开，科学应当充分地完成自己的使命；只要有一个坚固点仍是不可驯服的自我认识，外表的东西就将对抗……人类从科学宫殿的大门走出来，骄傲地昂着头，为 *omnia sua secum portans*<sup>③</sup> 这一意识所鼓舞，去创造神的意志”<sup>④</sup>。

这一切对于当时的赫尔岑是极其典型的，而且这一切完全符合历史唯心主义的精神。我当然不打算提起在基督教中是否含有

① 无怪乎谢林在其上述著作中说，不<sub>自</sub>觉也就是与自由相反的必然性1197。

② 即人类的培育。赫尔岑在其文章中稍前一些引用了莱辛这一用语。

③ [带着自己的一切]

④ 《赫尔岑全集》，第1卷，第382—383页1198。赫尔岑在这里所用的“自我认识”这一术语，使得我们想起布鲁诺·鲍威尔所喜爱的说法 *Selbstbewusstsein* (自我意识)。而且再一次证明，赫尔岑是熟习鲍威尔的著作的。鲍威尔不同于费尔巴哈的地方也在于，他在费尔巴哈转到唯物主义基础上时，仍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不过，在历史领域，费尔巴哈仍是个唯心主义者。

714 尘世間的历史哲学的某种原則，很明显，赫尔岑在肯定这一点时，为他在第一次流放期間对神秘主义的热中付出了代价。但是看看，按照他的意見，人类的成年开始于什么时候？恰恰开始于以不可动摇的信心重复說“意見支配世界”的十八世紀。科学替成年的人类弄清了它本身的經歷的意义。当从这方面看一切都很清楚的时候，“外表的东西的对抗就将被战胜，于是人类就驕傲地着手在地上建立上帝的王国”。这是具有最极端的表現的历史唯心主义，因为以后社会的全部发展在这里完全被认为是用知識来征服不自觉的“坚固点”，“全能的上帝”的計劃将由科学人士制定出来。十八世紀的启蒙学者正是这样看的；他們只是表述得有点不同，赫尔岑的图式赋予科学的那种作用，在他們那里是属于哲学的。然而应当記住，赫尔岑所理解的科学正是哲学，当然不是十八世紀所热中的那种哲学，但終究是哲学<sup>①</sup>。

应该由科学去征服的“坚固点”，这就是人类从其幼年和未成年时期所继承下来的各种各样的偏見。这种“点”越少，就越容易創立“全能的上帝”。有时十八世紀启蒙学者认为，他們的哲学的解放誠条，如果在刚刚走上欧洲文明道路的“新国家”里实现，所費的功夫会少得多。赫尔岑是同意他們的意見的。在日記（1844年10月29日）中，他因而斥責我国长子继承財產<sup>1199</sup>，說这种办法会丧失“我們比欧洲有利的东西，边沁在写信給登基的亚历山大一世时談到了这些优点，說他比什么（别的。——格·普·）君王更容易頒布周到的法律，因为没有羅馬封建的偏見来妨碍他”<sup>②</sup>。

以前赫尔岑也說过这种我們比欧洲“有利”的观点，而維護这

<sup>①</sup> 我补充一句，既然四十年代的德国哲学唯心主义也抱着这种唯心主义观点，那就可以推想，赫尔岑談到用科学建立“全能的上帝”，与其說是受到十八世紀法国启蒙学者的影响，不如說是受到他当时的德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

<sup>②</sup> 《赫尔岑全集》，第1卷，第276頁1200。

种观点的还有悲观論者恰达也夫，以后在我国直到尼·康·米海洛夫斯基还保留着这种观点。

历史唯心主义一般說来大大夸大了个人、特别是握有政治权力的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但是当談到沒有“罗馬封建偏見”，因而被认为是（如我們刚刚看到的）更便于統治者的自觉作用的“新国家”时，这种作用在他們的观念中一定簡直是大得无限的。我們也在赫尔岑那里看到这一点。“叶卡特林娜、保罗和亚历山大的病态和性格，是理解俄国近代史的关键”，——他在日記（1844年3月5日）中这样說道<sup>①</sup>。現在，甚至最少傾向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俄国历史学家，也未必会同意这种看法。

## 九

成年的和开化的人类将怎样建立“全能的上帝”呢？赫尔岑在自己的文章中拒絕回答这一問題。

他說：“究竟如何，那是未来的事情。我們能够預知未来，因为我們就是以未来的三段論法作为根据的那些前提，不过只是一般地、抽象地預知而已”<sup>②</sup>。但是在文章中，甚至也沒有一般地、抽象地指出，他究竟“預知”未来的什么。“当時間到来时，事件的閃电定会冲破烏云，燒毀障碍，而未来会像帕拉斯<sup>③</sup>一样一生长米就是全副武装的”<sup>④</sup>，——这就是赫尔岑决心要說的一切。这也是可以理

① 《赫尔岑全集》，第1卷，第180頁1201。这是比果戈里的思想（在他的关于中世紀的讲稿中），即“整个中世紀的历史是僧侶的历史”1202，更唯心得多的观点。果戈里所理解的僧侶，终究不是个别的人，而是整个制度。

② 《赫尔岑全集》，第1卷，第383頁1203。

③ 帕拉斯(Pallas)——是希腊神話中的巨人之一。——譯者

④ 參見赫尔岑：《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商务印书館1962年版，第100—101頁。——譯者

解的，因为当时的书报检查机关并不温和。在日记中他讲得直率得多，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同情社会主义的。他热心地研究黑格尔和黑格尔左派，也同样热心地注视着社会主义著作。他接触社会主义著作甚至先于他接触哲学著作，他还在读大学的时期就已热中于圣西门。但是在写日记的时候(1842—1844年)，他读得更多的是傅立叶主义者的著作，特别是孔西得朗、路易勃朗和蒲鲁东的著作。1843年2月，他这样表述了未来社会改革的总任务：“公共管理财产和资本，劳动组合的生活，组织工作和补偿(当然是指工作报酬。——格·普·)，以及按另外的原则规定的所有权。不完全消灭个人所有制，而这种对社会的管理赋予国家以一般指导权”<sup>①</sup>。这个纲领接近于圣西门学生的著作中所表达的圣西门主义；但是赫尔岑在那里也指出，“傅立叶当然是最深刻地阐明了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sup>②</sup>。可是，这完全没有证明他无条件地热中于傅立叶主义。在日记的另一处我们看到，“没有任何疑问，圣西门主义者和傅立叶主义者说出了极伟大的预言，但是有些不足的地方”<sup>③</sup>。傅立叶主义的“极端的平淡”使他采取批评的态度，而在圣西门主义中，用他的话说，则是学生毁灭了先生。显然，赫尔岑说这一点时，指的是安凡丹及其最亲近的同志的古怪行动<sup>1207</sup>。然而我的任务在这里只是阐述和批判赫尔岑的哲学观点，而不是阐述和批判他的社会主义观点。因此，我只能限于指出在四十年代赫尔岑继续抱着空想社会主义观点，于是直接转过来估计一下黑格尔对于他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态度所发生的影响。

在《自然研究通信》中，他出乎意外地而且是极其突出地使他

① 《赫尔岑全集》，第1卷，第83页1204。

② 同上1205。

③ 同上书，第187页。着重号是原著就有的1206。

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同新柏拉图主义者接近起来：“在新柏拉图主义者那里，几乎同现在的梦想家—社会主义者那里一样，冒出了伟大的词：调和、更新……但它们依然是抽象的、不便于理解的……新柏拉图主义是为学者们的，是为少数人的”<sup>①</sup>。我们首先且从其中所包含的赞扬方面来分析一下这种比较。

社会主义者(大概是为了对付书报检查机关而被称做梦想家)说出了伟大的词：“革新”和“调和”。赫尔岑在其他地方也不止一次地重复了这种对社会主义者的赞扬。这表明，他把他们的事业首先看做是调和的事业。就这一点说他是正确的，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这样看待自己的事业的。他们像怕火一样害怕阶级斗争，而且他们的纲领是指望在各种不同的社会阶级之间奠定和平<sup>②</sup>。赫尔岑最后对西欧失望的原因之一是，1848—1849年的事件不是和平解决社会问题，而是法国即当时最先进的国家里(至少是欧洲大陆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流血斗争<sup>③</sup>，而这从历史唯心主义者看来也是毫不奇怪的。如果“全能的上帝”的创立现在之所以推迟，只是由于科学暂时还没有阐明一切“坚固点”，如果成年的人类只是期待着这一理论事业的完成，以便庄严地从事社会改革的实际事业，那末很明显，后一事业中的首倡和领导作用就应该属于那些为科学之光照得最明亮的阶级或阶层。人民群众，甚至是西欧的人民群众，在赫尔岑看来，几乎完全不能理解科学的结论。他在自己的日记中指出：“直到现在，同人民讲话只能通过圣经”<sup>④</sup>。这在他那里不是表现为短暂的情绪，而是表现为牢固的信念。1847

① 《赫尔岑全集》，第2卷，第180页1208。

② 例外是有的，但它们完全不能说明当时空想社会主义的特征1209。

③ 要更详细地了解这一点，请看《现代世界》去年11月号我的文章《亚·伊·赫尔岑和农奴制》1210。

④ 1844年3月24日；《赫尔岑全集》，第1卷，第187页1211。

年来到巴黎后，他深信法国资产阶级，甚至以它的知识分子为代表，也没有打算着手进行社会改革，于是他开始思考：如果无产阶级不得不单独从事这种改革，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关于这一点，他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资产阶级的希望只有一个，就是群众的愚昧。希望是很大的，但是他们会比他们所设想的更迅速地造成仇恨和嫉妒，复仇和长期的痛苦。也许群众长期地不会了解怎样使自己摆脱贫苦，但是他们一定会懂得，用什么来把不公平的权利夺取过来，其目的不是为了享受这种权利，而是为了粉碎这种权利，不是为了使自己发财致富，而是为了使其他人沦为乞丐”<sup>①</sup>。

这样去看阶级斗争的心理及其可能的结局，除了力求调和以外，不会有别的什么。但是有各种各样的调和。调和并不总是排除斗争；相反地，调和常常以斗争为前提，把它作为必要的条件。对赫尔岑有巨大影响的黑格尔逻辑学，除了该一概念的彼此矛盾的因素的不调和的相互斗争以外，不知道有使它们调和（在更高的统一中调和）的其他方法。黑格尔本人善于把阶级斗争看做是“活生生的原则”（“Princip der Lebendigkeit”）的表现，这个原则引起社会觉醒，也靠它来滋养<sup>②</sup>。因此，赫尔岑跟在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之后摒弃阶级斗争，也就背叛了自己老师的辩证方法。显然，他并没有发觉自己的不彻底。但是不彻底是存在的，并使他受到报复，给赫尔岑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带来怀疑论因素，在他心里引起不满之感。

718

赫尔岑相信社会主义。而同一个赫尔岑又在自己的日记里写

① 《法国和意大利来信》，——《赫尔岑全集》，第4卷，第192页1212。

② 参看他的关于中世纪城市的内部斗争的深刻意见，《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历史哲学讲演录》），甘斯版，第393—394页1213。

下例如这样的自供：“我讀 L. Blanc<sup>①</sup> 第四卷。路德維希·菲力浦及其政府对待貝里斯卡公爵夫人是多么卑鄙可耻……一般地說，讀这一时期的历史时的心情是忧郁的，一切都是那样渺小庸俗……当然，也有伟大的行为和伟大的性格出現，但这是例外。例如七月革命初期的书商和印刷厂主鮑特，Cloitre de St.—Mery<sup>②</sup> 历史中的个别場面，去卖戏报的 Rodde<sup>③</sup>，民主主义的騎士卡列尔，意大利人邦罗蒂，烧炭党的老头子，馬志尼的伟大神圣的个性和火热的天性，……但他們的努力毫无益处。这又在一切事物上投下怀疑論的恐惧”（1843年12月21日）<sup>④</sup>。这正是我在上面所暗示的那种不滿，不滿的来源正是我已經指出的：經过黑格尔的熏陶的人，一定要向社会主义思想提出比赫尔岑上述議論中所显露出来的更加深刻的要求。

## 十

在《自然研究通信》中我們可以讀到：“科学的事业是使一切存在的东西上升到思想。思維力求了解、掌握外在对象，而且一开始就否认那个使对象成为思想的外在的、另外的、相反的东西，也就是否认对象的直接性，对它进行概括，把它当做普遍的东西；思維力图把它理解成那样。去理解一个对象，这就是去揭示它的内容的必然性，证明它的存在和它的发展”<sup>⑤</sup>。

在日記中相隔不远又說道：“因为证明只在于揭示对象的必

---

① (路易·勃朗)，即他的《Histoire de dix ans》（《十年史》）第4卷。

② (圣瑪利修道院)

③ 罗得。 譯者

④ 《赫尔岑全集》，第1卷，第155—156頁1214。

⑤ 同上书，第2卷，第77頁1215。

然性”。

719 赫尔岑在这里也是作为一个唯心主义者下论断的。但是在这里，他的唯心主义不是表现为相信意见支配世界。相反地，我们在这里所谈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如前所述，是与这一信念不相容的。如果证明对象就是揭示它的必然性，那末“证明”社会主义就是把社会主义理解为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把它理解为这样的产物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否意味着去指明它与我們自己的意願、同情和反感相符合呢？不是的！我們自己的意願、同情和反感，在实际上可能只属于一小撮对事变进程沒有任何重大影响的人。赫尔岑很理解这一点。有一次他写道：“我們的状况是沒有出路的，因为它是虛妄的，因为历史邏輯指明，我們处在人民需要之外，而且我們的事业是絕望的痛苦”<sup>①</sup>。如果历史邏輯指明，社会主义也是在西欧人民需要之外，那会怎样呢？很明显，那时西欧社会主义者的命运也就只是絕望的痛苦。当赫尔岑在自己的日記中承认西欧的革命家和社会主義者的自我牺牲的努力在他看来是无益的时候，无疑地，他是接近于对事情的这种看法的<sup>②</sup>。但是不容置疑，事实上这种观点一定会“在一切事物上投下怀疑主义的恐惧”。为了一劳永逸地赶走这种恐惧，就必须揭露这种观点在理論上是毫无根据的。但是怎样呢？要这样做只有一条道路，这我在

① 1843年4月21日《日記》——《赫尔岑全集》，第1卷，第98頁1216。

② 值得詳細地說一說。赫尔岑摒弃階級斗争，在当时完全不是反对革命的行动方式。这是由于极为流行的唯心主义观点而产生的，按照那种观点，伟大的革命运动不是两个階級的相互斗争，而是自由同专制、正义同非正义、真理同謬誤等等的斗争。直到他逝世以前，赫尔岑都是深切地同情伟大的法国革命的。显然，他始終沒有看清法国革命的階級性质，尽管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家就已很聪明地弄清楚这点，例如梯叶里就是这样，赫尔岑甚至有一篇专门的文章（《赫尔岑全集》日内瓦版第2卷中的《关于墨罗温时代的故事》）又谈他的一部著作1217。



上面已經指出了。赫尔岑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够完全說服自己社会主义不是在西欧人民的需要之外,即要是他能够揭示社会“改革”的客观必然性的話。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在这里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必須抛弃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赫尔岑抱着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断言:“我們能够預知未来,因为我們就是以未来的三段論法作为根据的那些前提”。假使抛弃这种观点,他就应当說:“我們能够預知未来,因为我們看見它的前提已經存在于目前的现实中”。这样,对他來說,全部問題就归結为分析这一现实,以便发现这些客观前提。但是这就会使他对未来社会改革綱領的态度发生根本的变化。作为历史唯心主义者,他认为可以想出这种改革計劃:“公共管理财产和資本,劳动組合的生活”等等。他对个人自由、国家法权等等的主观看法,是評价这一計劃的标准。如果抛弃历史唯心主义,那就会立即看出这种标准是完全不能滿意的。那时,就不得不去分析这种所有制产生的历史条件,以及使得这种所有制又逐漸地“处于人民需要之外”的那些新的社会現象。而赫尔岑对于他的社会主义綱領的其他各条,也就不得不这样作。当他研究思維的“代数学”的时候,他自己就說到了这一点(誠然他自己沒有意識到)。他写道:“不言自明,关于对象的思想不是思維者純粹个人的财产;不是他把思想注入现实,思想只是被他所意識;思想作为潜在的理性先存在于对象的直接存在中”<sup>①</sup>。要从思維的“代数学”轉向社会秩序的算术,只要知道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綱領所应当滿足的必要的和足够的条件就够了,因为綱領的出現不是作为这个或那个社会改革家——圣西門、傅立叶、比埃尔、勒魯、卡貝或蒲魯东的“个人财产”,而是处在“对象的直接存在”中、社会

720

① 《赫尔岑全集》,第2卷,第78頁1218。

关系的一定性质及其发展的一定方向中的“潜在的理性”的暴露。真的，假使赫尔岑的纲领满足了这个条件，他就会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这也是真的：只要辩证方法发生根本的转化，就是说，只要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让位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辩证方法就能够成功地运用于研究社会发展的有规律的进程。

721 当时，那些经受到大大提高他们的思想严格性的辩证法的影响的人们，以及一般地具有深刻理论兴趣的人们，所面临着的是直接着手解决由于资料缺乏而为他们所不能解决的极其重要的任务。这一悲剧的苦恼丝毫不因它业已在理论领域内开始而有所减弱；优秀的“四十年代人物”已善于把最深刻的理论问题同社会生活最迫切的问题联系起来。

那些为了别林斯基对黑格尔的“哲学帽子”一时表现软弱而摇头责备他的人，多半怀着这样一种安慰自己的信念：至少赫尔岑很容易地对付了这顶帽子的“敌对力量”。这一安慰自己的信念是根本错误的；但是应当承认，赫尔岑自己部分地，尽管是不由自主地，促进了这一信念的形成。

## 十一

他在《往事与回忆》中说：“造成最大害处的、德国保守主义者力图借以使哲学同德国政治制度调和的一句哲学词句‘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成为充足理由律和逻辑与事实相一致的原则的另一种说法。黑格尔这句被胡乱理解的话在哲学上的遭遇，就像基督徒吉伦特党人保罗的‘权力无不来自上帝’这句话某个时候的遭遇一样。但是如果一切权力来自上帝，如果现存的社会制度为理性所证明，那末，反对它的斗争（只要这种斗争存在）也就证明是正

确的。从形式上看来,这两个箴言都是純粹的同語反复”<sup>①</sup>。

我們的卓越的作者在这里表現得有些粗心,也可能是他犯了邏輯錯誤。在实际上,从任何权力都来自上帝还不能作出結論說,反对某一权力的任何斗争也来自上帝。对于社会制度來說也是这样。但是对赫尔岑的議論必須从更广泛的意义上來理解,就是說,如果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那末,同任何一种权力和任何一种社会制度进行的任何一种斗争也是合理的。这样來理解,他的議論当然是正确的。那些根据“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句话而维护一切存在的事物的合理性的人,实际上是錯誤地理解了黑格尔。在他那里,现实的东西这一概念,远远不能为存在的東西这一概念所包括。但是赫尔岑对它也理解得不正确,他把黑格尔的論点称为“充足理由律的另一种說法”<sup>1220</sup>。这个規律比起这个論点來,其內容是无比地貧乏。一切存在的東西有自己的充足理由,但不是任何理由都“充足”到使得由之而存在的現象是现实的。“旧制度”在法国一直存在到革命以前。不言而喻,它在比如說 1789 年 4 月的存在是有充足理由的。但是那时它已經不是现实的,它成了“虛幻的”,因为它已經过时了。那时反对它的社会运动才是现实的,因为这个运动表現了当时法国的最深刻的社会需要<sup>②</sup>。按照黑格尔的意見,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在自己发展过程中,自己会产生出那些終于会摧毀它的并使新制度在它的廢墟上出現的力量。只有否定这一制度的東西才是现实的,因而也是合理的,它依靠这些力量,或者更确切地說,它是这些力量的不自觉的历史行动的自觉表現。別林斯基了解黑格尔哲学后,以其天才的敏感感觉到了这一

722

① 《赫尔岑全集》,第 7 卷,第 126 頁 1219。

② 所以黑格尔怀着真实的热情談到法国大革命<sup>1221</sup>。再补充一句:充足理由律是一回事,邏輯和事实一致又是一回事。

点。他的“同现实调和”，只是意味着他否认任何不依靠于社会发展的有规律的进程的否定。如果说他摒弃了“抽象的理想”，那只是因为他不善于“发展否定的观念”，就是说，未能找到这种观念的客观基础。在这方面，比起把黑格尔关于一切现实事物的合理性的学说同“充足理由律”等量齐观的赫尔岑来，别林斯基对黑格尔的这一学说的看法要深刻得多。

常常有这种情况，一个错误导致另一个错误。赫尔岑只要宣称伟大思想家的“哲学词句”是没有无因之果这一旧思想的新说法，就能把《经济矛盾的体系》的作者同黑格尔相提并论。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指出，蒲鲁东的方法同黑格尔的方法毫无共同之处。没有丝毫的必要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但是读者应该记住这一点。蒲鲁东是作为一个十足的唯心主义者发议论的；社会改革家的任务被他归结为保存现有的生产方式的好的方面，而去掉其坏的方面。他也不怀疑；经济发展进程有自己的内部的（“内在的”，黑格尔会这样说，而且马克思就是这样说的）逻辑，这种逻辑决定着它所创立的社会制度的坏的方面和好的方面；一种社会改造纲领，只有当这一客观逻辑保证其实现的时候，才不是空想的。蒲鲁东重复了一切彻底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拥护者所犯的错误<sup>①</sup>。如我们

723

我要再一次说，从上述一切应当得出结论说，在《往事与回忆》

<sup>①</sup> 有趣的是，给他阐述黑格尔哲学的是德国空想主义者卡尔·格律恩和俄国空想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

中，赫尔岑对黑格尔方法的理解，不及别林斯基在其与俄国现实痛苦地调和时代的理解那样深刻。这一情形通常也就感动了那些只是风闻“叶戈尔·费多里奇的哲学帽子”<sup>1222</sup>的先生们。这一情形也使他们有一个合意的理由，以为“帽子”对于赫尔岑并无有害的影响。但是假使我努力证明他在比人们所设想的小得多的程度上值得这样赞扬，那我对于《自然研究通信》的作者就会是不公平的。我希望，我已经部分地做到了这一点。但是，问题还有一个方面，这一方面我一直几乎只是作出暗示，现在应当加以充分的分析。

在本文一开头我就说，赫尔岑对蒲鲁东和黑格尔所作的不适当的对比，表明他对自己的哲学老师的理解所没有超过的界限。现在应当补充说，以前他曾有过超越这个界限的非常有意义的尝试，而且这一哲学尝试（一般地说，没有取得成功）在他的社会观点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这个在四十年代前半期不很明显的痕迹，在四十年代下半期，在二月革命失败的印象下写成的著作中，就明显起来了。

在富有理论内容的《科学中的佛教》一文中，赫尔岑引用了黑格尔的“思想非常深刻的”话：“理解实际存在的东西，这是哲学的任务，因为实际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sup>①</sup>。黑格尔的这句话表达出我们所熟知的关于一切现实的东西的合理性的思想。但是在这里，赫尔岑还没有像他后来在《往事与回忆》中所做的那样，把这一思想同充足理由律等同起来。相反地，在这里，他是从历史过程的内部规律性这一完全正确的意义上来解释它的，就是说，是从别林斯基在三十年代末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来解释它的。当然，在这种场合，在赫尔岑和别林斯基之间是有区别的（这在上面已经指

724

① 《赫尔岑全集》，第1卷，第364页1223。

出)，这就是他们从这一思想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前者从它推断出（至少暂时地）进步意向的必然胜利，而后者则把这些意向当做纯粹主观的东西加以摒弃（诚然也只是暂时地）。但是我已經告誡讀者，在赫尔岑着手研究黑格尔哲学的时候，从辯证的（因而也是进步的）意义去了解它，比从保守主义的“绝对”意义去了解它容易得多。可是赫尔岑的气质使他对由該一学說得出的实际結論，比对它的基本理論前提更感兴趣。毫无疑问，別林斯基比赫尔岑更能称得上“哲学的組織”。我要順便指出，正是由于这一情况，“狂暴的維薩里昂”在实际結論上那样一貫到底，甚至使絕非胆怯的赫尔岑也不得不把他叫做幻想家和“极端的人”。对理論的深刻的兴趣，不見得是能够保证“实践理性”的彻底性的一切条件中最重要的条件。但是不管怎样，这是事实，赫尔岑并不是永远都把关于现实的东西的合理性的学說和充足理由律等同起来的。他倾向于作这类的等同，只有当他研究哲学而使他退入过去的領域中去的时候，只是在他和黑格尔之間有了1848—1849年的一連串震撼世界的事件的时候，这些事件长久地使他丧失了进行理論研究所必需的精神上的平靜。如果他沒有經歷这些可怕的时代，他多半是会記得黑格尔的遺言的，那时他（由于意外地使他同紀念鮑罗金諾战役一文<sup>1224</sup>的作者接近的优点）就会开始怀疑社会主义，把它当做沒有客观基础的理想，就是說，那时他自己就会摒弃抽象的理想。

## 十二

把这一点表达得最清楚的是《来自彼岸》一书的《雷雨之前》这一章。这一章发表于1847年12月31日，就是說，它的内容怎么也不能用革命失敗所造成的失望来解释。的确，在这一章里充滿着很严重的失望情緒，但完全不是赫尔岑的傳記作者們所喜欢散

播的那种失望情緒。只要稍为注意一下，就可以深信这一点。

文章采取的形式，是两个俄国人的对话，两个人同样对西欧发展的迫切問題感兴趣，但是对当时空想社会主义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却持不同的态度。一个表达作者本人情緒的談話者說：“沒有理由以为新世界将按照我們的計劃去建立……”<sup>①</sup> 725

換句話說：历史发展的合乎規律的进程，並沒有向我們提供任何保证，担保社会主义理想在将来的实现。現在請回想起《自然研究通信》的作者的这一論断，即“证明只在于揭示对象的内部必然性”，那末你們就会說出，赫尔岑还在1847年底是怎样看西欧的先进理想的。不会有两种意見，因为如果没有理由以为新世界将按照我們的計劃去建立，那就是說，我們看不見它的内部必然性，而看不見对象的内部必然性，我們也就不能够证明它。这样，社会主义就是一种沒有社会生活的客观邏輯作依据的、沒有得到证明的主观的东西。这是貫穿在《雷雨之前》全章的“主旨”，它表明雷雨对赫尔岑的影响通常被何等錯誤地理解了。我們的作者通过他的口說話的那个談話者坚持地重复說：“我們的文明是现代生活的灿烂之光；究竟誰会牺牲自己的发展？这对实现我們的理想究竟有什么关系，未来要演出我們想出的綱領的必然性又在哪儿？”<sup>②</sup>

說社会主义沒有“被证明”是“必然的”未来，是社会发展的結果；认为社会主义者是把自已的思想“注入”现实，而不是在现实中发现它，——这对于一个尝到了辯证法果实的味道的人，就等于承认社会主义理想在理論上不能成立。而承认它在理論上不能成立，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它的失望。我所引用的《来自彼岸》的

① 《赫尔岑全集》，第5卷，第25頁。着重号是我加的。 一格·普·1225。

② 同上书，第26頁1226。

那一章，充滿着这种失望的证据。代表赫尔岑的談話者把自己的同道者的处境与大革命时代活动家的处境加以比較，提出了例如这样的意見：“作为一切往事的見证人，我們不可能抱有我們的先驅者的希望。我們既較深入地研究了革命問題，現在我們所要求的就比他們所要求的更多更广，而他們的要求又同以前的不一样。一方面，我們看到思想的邏輯一貫性，思想的成功；另一方面，我們又看到思想对于默默无声的世界完全无能为力，这个世界无法抓住向它所表述的救世思想，是因为这种思想表达得不对，或者是因为它只有理論的、书本的意义，例如从来没有超出有教养人士的小圈子的羅馬哲学就是那样”<sup>①</sup>。

爭論的另一个参加者提出了这样一个問題：“究竟哪一个是对的，是历史地而又自觉地发展和形成起来的理論思想呢，还是否弃这一思想的現代世界的事实呢？”代表赫尔岑的談話者对此作了非常典型的回答：“两者都一样对。这全部混乱来自生活有其与純理性的辯证法不一致的胚胎学”<sup>②</sup>。

这就把我們引进了問題的理論中心。在这里，赫尔岑所理解的純理性的辯证法，就是主观思想的邏輯，在他看来，这种邏輯同社会生活的胚胎学处于不可調和的矛盾中。全部混乱就由此而来。但是在什么意义上主观思想是正确的呢？很明显，它只有在它的結論同它本身的前提相一致的意义上，亦即在它的形式上的一貫的意义上才是正确的。在这里根本談不上它之正确是由于它同社会发展的合乎規律的进程相一致，因为赫尔岑断然地声称，在社会生活的胚胎学和純理性即社会主义思想之間，有着一条鴻沟。这就是說，从《自然研究通信》所引用的黑格尔辯证法观点看来，主观

① 《赫尔岑全集》，第5卷，第29—30頁1227。

② 同上书，第30頁1228。



思想是不正确的。也正是这一辩证法引起了赫尔岑对西欧社会主义的失望。在《法国和意大利来信》(1847年9月15日第四封来信)中,赫尔岑这样地说明当时社会主义学派的状况:

“建立新的经济结构的尝试一个接一个地问世,并在习惯、成见、实际的遗俗、幻想的传说的钢铁堡垒上碰得粉碎。这些尝试本身充满了共同福利的希望,充满了热爱和信心,充满了道德和忠诚,但是不知道怎样架起一座从普遍性通往现实生活、从愿望通往应用的桥梁”<sup>①</sup>。

这一切也就要求用发现社会主义的客观必然性的方法来“证明”社会主义。这个在当时那样厉害地使赫尔岑苦恼的要求本身的存在,就说明他后来把充足理由律和关于现实的东西的合理性的学说等同起来,是多么没有根据。既然存在着社会主义思想,很明显,这就已经有充足理由了(《雷雨之前》中的另一谈话参加者甚至直接指出了这一点)。但不幸的是,这一充足理由对于架起一座“从普遍性通往现实生活、从愿望通往应用”的桥梁来说是不充足的。据说,头几篇《法国和意大利来信》在当时先进的俄国人士中造成了沉重的印象<sup>1230</sup>。某些自由主义的俄国社会思想史家对这一点解释说,赫尔岑在这些信里攻击了法国资产阶级宪法……而这在俄国专制君主制范围内出版的先进杂志的篇幅上是不适宜的。但这种解释未必令人满意。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能满足于这种解释的。还必须记住,当时先进的俄国人士十分热中于空想社会主义,赫尔岑对它的失望,必然要像冷水浇头一样,影响他的很多读者。例如赫尔岑写道:“除了有名的资产阶级,大家都不满意法国的现状,甚至资产阶级也怕向前看。不满意什么,有许多人知道,

727

<sup>①</sup> 《赫尔岑全集》,第4卷,第189页1229。

而用什么去纠正和怎样去纠正,则几乎谁也不知道;甚至社会主义者,有远大理想的人、勉强能看到将来的人都不知道”<sup>①</sup>。欢欣若狂地阅读“彼得·理查”(Pierre Leroux)<sup>②</sup>1232 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人,能够期待于他的并不是这样的报道。

但是我们把这放在一边。历史唯心主义断言意见支配世界,也就等于说意识决定存在。而一个人断言“证明”一个对象就是发现它的客观必然性,断言思想不应当“被注入”现实,而应当在现实中发现它,也就等于说,相反地,思维是由存在决定的。我们已经知道,赫尔岑在理论哲学上满足于谢林和黑格尔所提出的对思维和存在关系的唯心主义的解决。我们也已看到,赫尔岑在自己的历史哲学中,像德国黑格尔左派一样,坚持历史唯心主义。现在我们看到,历史唯心主义完全不能完成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理想的任务,而且赫尔岑痛苦地感觉到社会主义理想不能成立。现在我要做的只是再稍加补充。

728

### 十三

第一、1848—1849年的事件,并没有造成赫尔岑对西欧失望,而只是加深了这种失望,带来了许多在赫尔岑看来是无法反驳的证据,证明社会主义思想是与社会生活的胚胎学相矛盾的。在俄国和在国外被人理解得很差的《来自彼岸》一书,是一个人的哀号,这个人十分害怕地完全相信,这个矛盾是无法克服的。

第二、赫尔岑在这种情况下所致力、在他之前别林斯基企图通过与现实调和来加以解决的任务,俄国的先进人物在以后的时

① 《赫尔岑全集》,第4卷,第182页1231。

② 比埃尔·勒鲁。当时俄国的知识分子称比埃尔·勒鲁为彼得·理查,见书后注。——译者

期仍然在爭取加以解决。这个任务像斯芬克斯<sup>①</sup>一样站在他們面前，說：“解答我的問題，否則我要吞吃掉你的社会主义”。

第三、赫尔岑既痛切地感觉到历史唯心主义在闡明人类历史上思維和存在的关系問題上是站不住脚的，他就自然地、虽然也不是完全自觉地轉向了历史唯物主义。他相信：村社的俄国将实现个人主义的西方所制定的社会主义理想，在他看来这是解决西欧思想所不能解决的那个任务的一种特殊的尝试，因为俄国的村社在他的半斯拉夫主义理論中起着他所热心去建筑的那座“从普遍性通往现实生活、从願望通往应用的桥梁”的作用。他訴諸村社是一半承认不是思維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思維。这种一半承认是很卓越的，因为它出自一个曾經站在历史唯心主义基础上的人，而且对于原是黑格尔学生的赫尔岑也是非常突出的。这再一次显示了黑格尔辯证法对四十年代先进俄国人物的有益影响<sup>②</sup>。但是一半承认終究是一半承认，所以它导致了而且只能导致对有决定性的問題的空想主义的解决。

第四、赫尔岑往后的文章赋予政論以广大的地位，它們已經不再涉及《自然研究通信》以及在很大程度上《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和《科学中的佛教》所研究的哲学的“头等問題”。所以在那些文章里，只有很少的資料可用来判断赫尔岑哲学观点发展的以后的过程。《北极星》杂志第八期刊载的一篇富于机智的文章《Aphorismata<sup>③</sup>》。关于克鲁博夫医生的精神病学理論。尸体解剖員兼副教

729

① 据希腊传说，斯芬克斯(Sphinx)是獅身女首的怪物。它曾坐于道旁，向行人出謎語，行人回答不出，即被吞吃掉。——譯者

② 赫尔岑的半斯拉夫主义理論，尽管有很多錯誤，但是在理論方面終究比赫尔岑以前坚持的那种关于人类进步过程的抽象的唯心主义观点要高出很多，这种唯心主义观点后来在我国，在“文化是由批判的思想改造成的”这一拉甫罗夫的“公式”中复活了1233。

③ (箴言)

授吉特·列維阿方斯基的著作》<sup>1234</sup>，在这方面几乎是最具特征的。这一哲学小品之所以有意思，就在于其中发議論的是“prosector et anatomiae professor adj.”<sup>①</sup>即自然科学家，也在于这一为自然科学家舍弗而写的小品，不仅他很喜欢，而且另一个自然科学家卡尔·伏格特也很喜欢。可以认为，在写这篇小品的时候，亦即在六十年代前半期，赫尔岑已经不满足于黑格尔和謝林对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唯心主义的回答。那时大概他已经很熟悉并完全赞同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但是《吉特·列維阿方斯基的箴言》给我们提供了根据可以推想，赫尔岑是以马克思称之为狭义的自然科学的那种唯物主义来解释这个观点的，至少有些时候是这样来解释的。突出的是，在《来自彼岸》一书的上述那一章（《雷雨之前》）里，即在他那样悲伤地表现出对历史唯心主义的失望的那一著作里，赫尔岑已经显露出对这种唯物主义的爱好。这就是很有教益的片断：

“每个时代、每一代人、每一种生活都有其完备性，在道路上发展着新的要求、考验、新的手段，一些能力靠牺牲另一些能力而完善起来，最后，脑的物质本身改善着……你笑什么？……是的，是的，大脑皮质改善着。一切自然的东西对于我们都成为问题，使我们这些唯心主义者感到惊奇，正如有个时候骑士们对于农民也想获得人的权利这一点感到惊奇一样。当歌德在意大利的时候，他把古代公牛的颞骨和我们时代公牛的颞骨加以比较，发现现代公牛的颞骨要薄些，而大脑半球的容器要大些；很明显，古代公牛比现代公牛强壮些，而现代公牛在温和地受人支配的脑子方面发展了。为什么你认为人比公牛更少发展能力呢？这一族类的成长不是目

<sup>①</sup> [尸体解剖员兼解剖学副教授]

的,如你所认为的那样,而是世代綿延存在的属性”<sup>①</sup>。

头脑物质的改善是促成进步的条件之一。这当然是純粹的唯物主义信念。但是改善了的大脑皮质是怎样促成进步的呢?看来,它应当促使人們对于自己的相互关系具有更正确的观点,从而也就促进社会制度的完善。所以,它直接导致“支配世界”的“意見”本身的改善。这样一来,唯物主义立即就轉化为唯心主义。这也正是“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点之所在。这也說明,或多或少坚持历史唯心主义的人,往往很容易同这类唯物主义和解<sup>②</sup>。当“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一下子使一个不再满足于唯心主义論断的人回到历史唯心主义的时候,这个人就必然感到自己处于束手无策的状况<sup>③</sup>。大概,赫尔岑在写《吉特·列維阿方斯基的箴言》那个时候,正是感觉到自己处于这种状况。在这一机智的哲学小

① 《赫尔岑全集》,第5卷,第36—37頁1235。

② 我在《卑尔尼雪夫斯基》1236一书中已經指出,我們这位著名启蒙运动者,一般地說,倾向于历史唯心主义,往往在自己的历史論断中,成为“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忠实信徒。在那里我也指出,他是费尔巴哈的忠实学生。在这里我要补充一句:费尔巴哈的德国信徒在历史哲学上也是唯心主义者,他們有时也沒有摒弃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在《Feuerbach und die Socialisten》(《费尔巴哈和社会主义者》)这一有趣的文章中,卡尔·格律恩順便证明說,現在哲学不仅应当代替宗教,而且应当完全变为实践的科学,它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改造社会关系。可是他耽心人們会不理解他,以为現在可以輕視“人类学和生理学”。因此他有保留地說,哲学枯树的这两个綠枝,应当列入那个成为“社会化的、联合化的科学”的实践科学(Wissenschaft der Vergesellschaftung, der Vereinigung, 着重号是原著就有的)(參看《Deutsches Bürgerbuch》für 1845, hrg. von H. Puttman, Darmstadt (卜特曼出版的1845年《德国年鉴》,达姆斯丹特版,第66頁))。科学社会主义主要依靠經济学。在俄国空想社会主义中,包括米海洛夫斯基在內,可以看到依靠生理学的尝试。

③ 大家知道,有时指出了“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局限性的费尔巴哈本人,有时似乎也准备满足于“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在前面引证过的論摩萊肖特《关于食物的学說》一书的文章中,他断然地肯定“Der Mensch ist, was er isst (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这是十足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吉特·列維阿方斯基本人也絲毫沒有反对这种唯物主义。

731 品中有着非常多的苦恼。“历史的力量和光荣不在于智慧，也不在于幸福，像古老的歌曲所唱的那样，却在于癫狂”，——这就是有学识的尸体解剖专家兼副教授的基本箴言。“誰为着荣耀女神而建造了辉煌的庙宇，建筑起整片的大理石和斑岩之林？誰取得了世世代代人都引以为荣的一切胜利？誰为站在死人堆上的、凶残而且滿身鮮血的战士戴上桂冠？誰教人民放弃木犁而拿起利劍，使他們从土地的耕耘者变成死亡的播种者、职业的杀人犯、亚述和普魯士賴以存在的胜利者和征服者？（我已习惯于书报检查处的检查，所以对可爱的祖国我总是保持緘默）……誰？……难道是理性嗎？……”<sup>①</sup>。不用說，根据吉特·列維阿夫斯基的意見，問題不在于理性，而在于癫狂。在这里不由自主地想起赫尔岑从前有个时候对于斯拉夫主义者的历史观点所提出的批評：“这里有着疯狂的傾向”。

人們有时把赫尔岑叫做俄国的伏尔泰。只有在这样一种意义上这才是正确的：赫尔岑，像伏尔泰一样，是很机智的。赫尔岑对当时那些老是存在而无法解决的問題的态度，很少像費尔內的長老对待十八世紀极重要的任务的态度。一般地說，經受过黑格尔的深刻影响的人，不能滿足于伏尔泰的思維方式。更正确地說，赫尔岑在某些著作中，例如《克魯博夫医生的札記》和《吉特·列維阿夫斯基的箴言》中，像《愚蠢頌》的作者鹿特丹的伊拉施姆。但是鹿特丹的伊拉施姆譏笑人类的历史迷离比赫尔岑容易得多，因为赫尔岑并不力图在地上建立“全能的主”。《箴言》的作者赫尔岑的机智的笑声，是滿含泪水的真正机智的笑声。

赫尔岑曾經責备斯拉夫主义者“是怀疑主义和唯物主义”，因

<sup>①</sup> 《赫尔岑全集》，第10卷，第415頁1237。

为他們不善于把历史看做“人类的解放运动”。現在他自己，通过吉特·列維阿夫斯基之口，坚决地摒弃对历史过程的这类观点。

解剖学副教授但願守护和安慰人类的癡狂今后也伴随着人类，直到地质的灾变把人类消灭为止。他說：“并願在癡狂的凱旋行列前面，也像以前一样，时而光耀夺目，时而隱藏云間，时而圓滿，时而亏缺的理性的明星，让它像月亮那样，無論地球轉得多快，总与它处于同样的距离中”<sup>①</sup>。

这是有些奇怪的，我們的尸体解剖专家的“理性的明星”从哪里来的呢？赫尔岑自己說，卡尔·伏格特“指責列維阿夫斯基主张隱蔽的自然神論，根据是：他把自己的上帝藏在灯籠里，而且那灯籠是根本不存在的”，同时还开玩笑地要求列維阿夫斯基写文章答复。伏格特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赫尔岑怕他的玩笑叫讀者煩膩，所以他沒有去同吉特爭論。这很可惜！如果知道他究竟拿“灯籠”反駁吉特什么，那是会很有趣的。在我看来，永远同地球保持同样距离的“理智的明星”，就是那些沒有桥梁通向地上现实的抽象理想的象征。讀者記得，赫尔岑还在《雷雨之前》，即在1847年，就已指出这一现实同这些理想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參看前面）。現在我們看到，这个矛盾，在1867年，即在二十年以后还依然使他苦惱。它所引起的深刻怀疑，从他在西欧的自由基地上开始社会活动直到結束活动，都沒有离开他（如像一首名歌中的善良的青年人的恶运一样）。它在他的某些最优秀的著作中深深地打下了自己的印記。順便指出，这些著作因而也就为許多資產階級超人和普通的自由主义庸人所喜欢，因为在那些著作里可以听到对社会主义抱怀疑态度的曲調。但是時間一到，社会主义史家終会弄清这

<sup>①</sup> 《赫尔岑全集》，第10卷，第415—416頁1238。

一痛苦的怀疑的真实含意。他们会把我们的卓越的作者置于一个最显著的地位，而与那些十九世纪的前半期的作者并列，这些作者全心全意地同情社会主义，或多或少明确地意识到社会主义的空想基础的不稳固，并试图把它置于巩固的科学基础上（这些尝试依然是不成功的，但终究是极其卓越的）<sup>①</sup>。

733

## 十四

四十年代先进的俄国人不能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俄国经济的落后，以及他们不十分熟悉西欧的经济。但是这些人已经意识到空想社会主义之不能令人满意，这证明他们是有卓越的才能的。当然，在这里黑格尔学说具有极重大的意义，他们极其幸运地受到了它的锻炼。很多德国社会主义者也受到了黑格尔的有益的影响；然而在他們中間只有馬克思和恩格斯懂得，怎样才能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一切热中于社会主义的其余的黑格尔主义者（以及費尔巴哈主义者），则完全满足于社会主义的空想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充分的权利，可以把我们的別林斯基和赫尔岑看做是远比格律恩、赫斯、泽米希、弗·施米特和其他德国的哲学社会主义者更有才能的人。

費希特常说，一个人是怎样，他的哲学就是怎样。他的这句话

---

<sup>①</sup> 赫尔岑的理论悲剧，在于他感到历史唯心主义没有根据，而又不能成为历史唯物主义者。这是十分明显和非常有教育意义的。现在恰好是说明应当怎样理解他的“实在论”这一术语的时候了。在他那里，唯物主义被称为极端的“实在论”。因此很明显，不带“极端的”这一形容词的“实在论”一词，在他的《自然研究通信》中，指的是介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不十分确定的立场。但是，如前所述，赫尔岑攻击唯心主义时，他所指的其实是主观唯心主义。绝对唯心主义以其对思维和存在的二律背反的解决，继续使他得到满足。那些竟然能够既称赞赫尔岑倾向于“实在论”而同时又谴责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的人，是不理解这一点的。



完全适用于赫尔岑。他的哲学是一个长于活动的人的哲学。根据他的日记来考察阅读伟大哲学家的著作对他造成的印象是有意义的。他在确定他们的理论功绩时并不总是没有错误的，也许太粗率，然而他总是毫无错误地和详细地指出，什么是可以称做是他们理论的能动的方面。我们以斯宾诺莎为例。日记中对他的评论，并不说明赫尔岑能够弄清斯宾诺莎主义的这样一个方面，即费尔巴哈曾因之称斯宾诺莎为“近代自由思想家和唯物主义者的摩西”的那个方面。但是在赫尔岑那里看到关于《伦理学》作者所说的以下一段话，就不可能不感到很大的满意：“我不谈他的整个学说，我要指出何等的天才闪光从他那里迸发出来，例如，Homo liber de nulla re minus quam de morte cogitat et eius sapientia non mortis, sed vitae meditatio est……”(自由的人最少想到死，而他的聪明在于所思索的不是死，而是生)<sup>①</sup>。现在我国的宗教探索者，如想死远比想生为多的梅列日柯夫斯基先生之流，未必能发现斯宾诺莎的这一思想是天才的。但是问题也在于，他们之中没有一个能适用 homo liber<sup>②</sup>的称号，费希特是对的：一个人是怎样，他的哲学也就是怎样。

多年以后，赫尔岑在1864年的《钟声》中，刊载了一系列的文章，其标题是《致反对者的信》，里面有对尤·费·萨马林在文字上和口头上责难他的答复<sup>1240</sup>。喜欢咀嚼旧的神学论据的梅列日柯夫斯基先生之流的反面的“探索者”，也是不喜欢这些答复的。赫尔岑顺便写道：“例如，你会发现：不相信未来生命的人维护现在的生命是很不彻底的。在我看来，也只有他才能重视自己和别人的暂时的生命；他知道，对于现存的人，比这个生命更好的东西是不会有，

① 《赫尔岑全集》，第1卷，第136—137页1239。

② 〔自由的人〕

所以他同情每个人去保存自己。从神学的观点看，死根本不是不幸；信宗教的人需要‘不杀人’的诫条，以便他们不去把人从有罪之身拯救出来；死其实是加惠于人，加速他的永恒的生命。杀人之罪完全不在于禁绝肉欲的行为，而在于把患者随意提到最高一级”<sup>①</sup>。

这在许多方面都有意义的一段话，恐怕它的最大意义在于，按其内容来说，它接近于费尔巴哈关于“唯心主义或唯灵论”与崇奉政治自由互不相容（自然是在思想一贯的头脑中）的论断。费尔巴哈说：“唯灵论者满足于精神自由……对于唯灵论者，政治自由是政治领域内的唯物主义。属于真正的自由的，是物质的、肉体的自由……唯灵论者则满足于思想上的自由”。赫尔岑大概正好没有读到费尔巴哈的这一论断，因为这一论断只是在这位德国唯物主义者死后才刊载于卡尔·格律恩所出版的他的学术《遗著》中的<sup>②</sup>。但是费尔巴哈在这里所说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他整个的（最后的）思想方式一致的，赫尔岑反对萨马林时所提出的论据接近于这种思想，再一次证明《钟声》的出版者是很熟悉《未来哲学原理》的作者的。毫无疑问，费尔巴哈会承认赫尔岑的下述想法是完全正确的：相信死后存在的人，没有理由要过于热烈地维护他当前的尘世生活。

735 往后还有一段非常典型的话，可以作为有利于上述论断的新论据，就是赫尔岑的道德学说，包含着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式的理论的全部真理。这段话相当长，但是读者当然不会埋怨我，说我没有引用同赫尔岑的直接谈话来使他们得到满足。

---

① 参看《致反对者的第一封信》，1864年11月15日《钟声》，转载于《钟声》文集，1887年日内瓦版《赫尔岑选集》1241，前面有《莫斯科通报》的现任编辑古洪米洛夫的序言。

② 《费尔巴哈全集》，第2卷，第328页1242。

篤信宗教的尤·費·薩馬林天真地問赫尔岑，他想用什么道德懲罰來代替肉體懲罰，以及監獄、流放等等是不是肉體懲罰。赫尔岑回答說，他不是切尔卡斯基公爵，他不認為需要想出兒童的或老年人的、世俗的或僧侶的刑杖，以及與它們對等的東西<sup>1243</sup>。據他看，薩馬林很像這樣一個人，這個人間，力圖消滅霍亂的人想用什么去代替霍亂。按照他的正確的意見，這種問題是無法解決的。

他說：“刑杖和監獄，法庭對制品的搶劫和犯人的強迫勞動，這一切都是肉體懲罰，而且只能用另一種社會制度來代替。

唯物主義者歐文既不尋找犯罪者，也不尋找懲罰，也不尋找介於鐐銬和鞭撻之間的东西，而是想怎樣找到不會誘使人們犯罪的生活條件。他從教育着手；被兒童不受懲處所吓壞了的虔信主義者關閉了他的學校。

傅立叶試圖把那處於放肆的同時又是窘迫的狀態而造成一切犯罪沖動和傾向的激情本身，導向為社會謀福利——人們從其中看到可笑的一面……

許多國家沒有肉體懲罰而存在着，而我們這裡還在進行辯論：要不要責打？如果責打，又用什么責打？如果不責打，是帶上鎖鏈還是關進囚籠？……什麼好些，是刑杖還是囚籠？……

你從那把‘原諒一切’、‘原諒一切’作為專業的宗教觀點來看會說，‘消滅懲罰是不可能的’。也許是那樣；但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把懲罰應當當做真理，而不應當如实地當做可悲的必要性，當做不幸的後果。用不着忙碌於罪責本身，它們定會被找到的。只要還有法官的職業，只要還有社會復仇的血腥法典和群眾的中世紀式的愚昧，法院的外科醫生、劊子手就不會沒有工作而死去”<sup>①</sup>。

① 引自《鐘聲》，第517頁1244。

这一切真是妙极了。看来，赫尔岑是很熟悉与他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对于惩罚问题的见解的。而且他显然不会相信，如果人们对他說，在不远的将来整个文明世界会鼓掌欢迎某个像哥伦布那样的预言家，这个预言家給这些思想穿上神秘的外衣，再加上会736 消灭其全部内在美的保守的装璜，然后宣布这些思想是他的伟大的发现。他会以为，向他預告这类预言家的出现的人，不是譏笑他，譏笑自己的听众，就是誹謗文明世界……1245

我們再进一步看。我已經說过，赫尔岑犯了錯誤，他承认黑格尔关于思想和存在統一的学說是正确的。但是也很难不承认，他非常兴奋地引证黑格尔关于死刑的见解是完全正确的。在这个见解中，什么使我們惊奇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赫尔岑引证了黑格尔的一大段德語原文。我把其中最精彩的部分翻譯过来。“我們目击一个无力自卫的人，他被捆着，被众多的卫兵簇拥着，被卑鄙的劊子手助手伴随着，被向他呼吁并念着禱告的牧师們伴随着，罪人把注意力集中在禱告上，以平息难过时刻的感受。被优势数量的人，同时是武装的人处死的无力自卫的人的景况所造成的令人厌弃的印象，沒有在观众中引起憤怒，只是因为法律的判决对他們是神圣的。虽然劊子手是为司法服务的，但是这种情况終究不能消灭一种印象，在这种印象的影响下，人們认为这种人的职业或称号是卑鄙可耻的，他們能够沉着地当众杀死无力自卫的人，他們执行自己职务，就像盲目的工具或野兽一样，因为以前曾經是把犯人交給野兽去撕咬的”<sup>①</sup>。

下面是赫尔岑从同一个黑格尔那里引来的另一段話（我又把它翻譯了过来）。“誰过于輕視有限的东西，誰就永远达不到什么現

<sup>①</sup> 《赫尔岑全集》，第1卷，第60--61頁1246。

实的东西，始终处于抽象之中，沉溺于自身之中 (Encycl., t. I, § 92)”<sup>①</sup>。这值得写整篇的论文，为了教训那些资产阶级的超人，早就是写出这种论文的时候了，这些超人现在怎样也不能容忍当代伟大解放运动中的“有限的”(被他们称为市民的)因素。

最后，还有引自黑格尔于 1818 年对自己的听众所作的一篇著名讲演的一段话：“对待生活的勇敢态度，对精神力量的信仰，是研究哲学的第一个条件；人应当尊重自己并自视为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宇宙的隐蔽的本质，没有力量可以抵抗求知的勇气；它必然会向勇毅的求知者揭开它的秘密，而将它的财富公开给他，让他享受”<sup>②</sup>。当你看到某些四十年代的人摘引黑格尔的这些话时，你就会开始懂得“叶戈尔·费多里奇的哲学帽子”对于他们有何等崇高有益的影响，他们有权攻击这顶哲学帽子，因为他们也善于深深地重视它，而我们的“主观的”无知者只是由于自己在哲学上的肤浅而讥笑它。 737

1845年1月8日，赫尔岑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惩罚，在发达的国家中是完全荒谬的事情，在将来人们会对此感到惊奇，即政府怎样会去同每一恶行比赛，并对恶行作出恶行所作出的那种卑鄙行为，区别只在于恶行是或多或少为环境所迫，而政府这样做则毫无必要。死刑，这是绝对的罪行，是罪行的诗篇。但是哪里有真正不易的尺度来衡量什么对人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呢？它存在于历史上发展着的人的概念本身中，在于人借以成长起来的历史契机和环境中。一切发展着人的纯种的和个体的意义的东西是好的；如果一般人的东西完全吞没个体的、现象的东西，那就是坏的；如果肉体完全压倒精神，那就是坏的，但是不能因此而给予惩罚 (sci-

① 《哲学全书》，第1卷，第92节，《赫尔岑全集》，第1卷，第213页1247。

② 《赫尔岑全集》，第1卷，第209页1248。

licet<sup>①</sup>是在发达的国家中)；这样的人将遭到鄙视，而正面的立法会使这些反面人物不能像疯子，像傻瓜，像动物那样造成危害”<sup>②</sup>。这些话是在黑格尔，当然也是在社会主义著作家的明显影响下写成的。不难看出，这些话包含着在勿以暴力抵抗恶的所谓托尔斯泰学说中可以找到的全部精华。在黑格尔和社会主义者的影响下，赫尔岑否弃作为纠正社会习俗的手段的暴力，然而在这里完全不牵涉到把暴力作为排除妨碍社会关系以及社会道德的改善的障碍的手段问题。知道我的文章《赫尔岑和农奴制》的读者，也许会记得少年赫尔岑同自己的法国教师蒲晓的谈话<sup>1250</sup>。光是根据赫尔岑如何转述他的这一谈话来判断，就可以有把握地肯定，他是理解正面解决上述问题的伟大历史意义的。

---

① [显然]

② 《赫尔岑全集》，第1卷，第261页1249。

---

---

## 在尼斯城赫尔岑墓前的演說<sup>1251</sup>

738

1912年4月7日

先生們！

海涅說，文學史是一間廣大的停尸室，我們每一個人都走去尋找他所珍重的死人。他繼續說，“當我在那裏眾多的無關重要的尸体之間看到面貌高尚的萊辛或海德的時候，在我的胸裏，心就劇烈地跳動起來”<sup>1252</sup>。

現在，在紀念赫尔岑誕生一百周年的時候，整個自由思想的和愛好自由的俄羅斯，——而且你們看到，不只是俄羅斯——正走向門上寫着“俄國社會思想史”的停尸室；當它在那裏看到我們的偉大作家的高尚形象的時候，在它的胸裏，心當然也劇烈地跳動起來了。

愛好自由的和自由思想的俄羅斯，在許多方面是非常感激赫尔岑的。陀思妥也夫斯基曾把他稱為 *gentilhomme russe et citoyen du monde*<sup>①1253</sup>。陀思妥也夫斯基在這一稱呼里放進不少諷刺的成分。但是赫尔岑完全不應該受到這種諷刺，我準備同意以下這一點：一個自由思想的人，可能部分地意識到自己屬於俄羅斯貴族是有罪的。要知道，正是這種俄羅斯貴族造成了彼得大帝以後的我們的彼得堡的歷史，那時男皇不太多，而更多的是女皇，那段

---

① [俄羅斯貴族和世界公民]

739

历史同淫室里的流血的悲喜剧有可悲的相似；要知道，正是这种俄罗斯贵族看到自己不得不解放自己的农奴，用一点份地奖赏他们长期的服役，而他们在这块份地上只能贫穷、困苦、挨饿、退化；最后，正是这种俄罗斯贵族，在俄罗斯，像在被征服的国家里一样，直到现在还在支配一切。我重复一遍：属于这样一个荣耀的等级，也许会感到自己是有罪的，但是也应当指出那些大大减轻这种罪过的情况：一个人不能按照自己的选择，生而为贵族、小市民或农民。而且问题也不在于他生来是什么人，问题在于他做的是什麼，他在一生的自觉的时代行为怎样。这是真理：一个属于某种特权等级的人，比一个属于非特权等级的人更难于站在正确的观点上；但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也就更光荣。赫尔岑是否做到了这一点，这个问题由他的全部生活作了回答。他在农民解放事业中的作用表明，他是站在被剥削者一边的，而不是站在剥削者一边的。陀思妥也夫斯基以为，赫尔岑由于脱离俄罗斯人民而成了 *citoyen du monde*（世界公民）。但是赫尔岑从来既没有脱离人民，也没有脱离俄罗斯。谁脱离自己的人民，谁就不会重视人民的利益。而赫尔岑是热烈地重视俄罗斯人民的利益的。他写到自己的时候没有撒谎，他从童年起就无限热爱自己的乡村。他彻头彻尾是俄罗斯人。但是对祖国的爱，在他那里没有停留在愚昧的动物本能的程度上，大家知道，这种本能有时能够兽性式地表现出来；他把对祖国的爱提升为自觉的人的眷恋。正是随着这种对祖国的爱在他那里上升到这种程度，他成了全世界的公民。他是如何理解对祖国的自觉的爱，可从他对 1863 年波兰起义的态度看出来。你们大家知道：人们把他称为卖国贼；人们责备他，说他给波兰起义者以道义支持，污辱了本国人民的感情；不久前崇拜他的人，极大多数都离开了他。他因此极其痛苦，但仍继续坚持自己的立场。从他的笔下出现了一系



列的文章：《Vivat Polonia》，《Mater Dolorosa》，《Resurrexit》<sup>1254</sup>，等等，这些文章充滿着对波兰的殘暴鎮压者的极大憤慨。他不相信那些說全体俄罗斯人民都贊成鎮压者的“爱国”故事。他在自己的《钟声》中揚声說道：“不，不，不，从民族家庭中根除整个民族的可詛咒的事业，决不是我們全民的俄罗斯的事业！”俄罗斯人民，在当时其实就是农民，按赫尔岑的說法，正忙于自己的解放和自己的土地制度的問題，沒有時間关心对波兰的鎮压。但是，假使俄罗斯人民在实际上也要求鎮压波兰的話，假使俄罗斯人民也传染上了高級等級的警察瘟疫的話，那时，赫尔岑也还是要同情波兰的起义者的。他写道：“我們不是对祖国的爱的奴隶，正如我們决不是任何奴隶一样”。自由人不能承认对那个迫使他参加违背自己良心的事情的本国边疆的依从性。他就是这样說的。

740

这是真真寶貴的話。現在，只要一談到对犹太人的殘酷而可耻的暴行，或者是对芬兰宪法的破坏，或者是禁止乌克兰儿童学习小俄罗斯語言，或者是一般地对构成我国居民的任何什么民族、任何什么部落进行任何什么压迫，我們每个人都要尽可能經常地回想起他的这些寶貴的話！

人們关于赫尔岑說过：他准备把老早就并且意識到自己是罗斯的土地交給波兰。但是，第一、当着警察官僚的俄罗斯扼住波兰的咽喉，把膝部压着它的胸膛，准备把它卡死的时候，难道掀起关于未来的波斯波利特河的疆界的爭論是合适的嗎？第二、赫尔岑在这个問題上的观点，是民族自治、民族自由自決的观点。他問道：“为什么我們不能彼此自願、彼此平等地同波兰，同乌克兰，同芬兰一起生活呢？为什么我們要把这一切人掌握在农奴制下面？我們在哪方面比他們好呢？”現在，这是整个先进人类的观点，这是工人国际的观点。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赫尔岑是世界的公民。也正是由于他是这样的世界公民，就不应该譏笑他，而应该欢迎他。

当斯拉夫派分子伊·謝·阿克薩柯夫在自己的机关报上重复流传着的对赫尔岑的卑鄙誹謗，劝他悔悟的时候<sup>1255</sup>，赫尔岑回答说：

“不，伊万·謝尔盖也維奇，如果我们回来，那么回来的我们不是淫蕩的公子，不是垂头丧气的、头发斑白的抹大拉<sup>①</sup>之流，而是自由的人，他们要求的不是辯护，不是原諒，而是承认他们一生的事业”<sup>1256</sup>。

他有充分的道德权利写下这些驕傲的話。而且現在我們大家在他誕生一百周年回忆他的时候，不是用辯护、寬恕、原諒的話，而是用包含有充分地、无条件地承认他的一生的話去紀念他。

743 諸位！赫尔岑沒有被准許回到祖国。而且假使他甚至活到了今天，也許，現在他也不得不顛沛流离，过着放逐生活。糾正許多世紀的事情是不容易的。但是我們并不灰心丧气。他有一次在《钟声》上說，“俄罗斯的生命是經久不衰的！”他在这里也說得完全正确，的确是經久不衰的！普利什凱維奇們和克魯平斯基們，格尔莫根們和拉斯普庭們，是把它消灭不了的！俄罗斯不顾一切地前进着。它还没有掙脫自己的軛。这个軛还在深深地伤害着它的双肩。但是現在，自由的思想终于深入人民，这种情形在赫尔岑时代是还没有的。在1863年，当他勇敢地起来保卫波兰的时候，有多少人同情他呢？只有很少几个人。人民事实上沒有想到波兰。这

① 抹大拉，即抹大拉的馬利亚。原是《新約》《馬可福音》第十六章及《路加福音》第八章的人物：一个过去淫蕩的女人，被耶穌治好了病，赶走了“七个魔鬼”，因此成了耶穌的忠实信徒，亦即后来西欧文艺作品中常用的“懺悔的馬利亚”。赫尔岑曾用“头发斑白的抹大拉”来諷刺有自由主义傾向、上书沙皇的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此处赫尔岑可能即指屠格涅夫等人而言。——譯者

是最好的情况。在最坏的情况下，俄罗斯人民的愚昧的孩子也准备喊叫：“镇压它！揍波兰人！”而现在呢？顺便提一下，1905年的宣布十一月罢工，就是因为政府在波兰实行戒严。俄国无产阶级借此证明了自己善于自觉地对待波兰人民的命运。“但是反革命战胜了要求各民族自由自决的无产阶级”，——人们这样向我說。我要問，“能够长久嗎？”黑格尔就說过，有这样的时期，世界历史精神——我們用现在的語言說，就是历史运动——隐藏在地下，像田鼠一样地在那里挖掘，破坏着现存制度的基础。美妙的时刻一到来，过时的制度就会崩溃，那时我們大家都会看到田鼠工作得多么好，那时我們大家都会像哈姆雷特对着他父亲的影子那样向它叫喊：“老田鼠，你掘得好啊！”<sup>①</sup>請你們相信，俄罗斯田鼠挖得很不坏。最后，我們現在不是孤立的。在六十年代初，西欧各族人民还只是开始摆脱1848—1849年暴风雨事件以后所遭受的虛弱。而現在甚至波斯人都要求自由，現在甚至长期蟄伏不动的中国也动起来了，并且宣布成立共和国。关于西欧那就更不用說了。工人国际在这里已成长为强大的军队。軍事力量镇压了波兰。工人国际是軍国主义不可調和的敌人。1848年德国革命家歌唱道：

Gegen Demokraten

Helfen nur Soldaten!<sup>②</sup>

可惜，出現了这样的情况：士兵帮助反对民主主义者。但是現在我們可以唱道：

Gegen Soldaten

---

① 原出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五場。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結尾时曾引用此語。參見本书第454頁。——譯者

② 〔反对民主主义者  
只有士兵前来帮助！〕

## Helfen Sozialdemokraten!①

744

先进国家的工人运动现在正成为国际和平的最可靠的保证。

一般地说,我们这个时代对自由的事业非常有利,因为这个时代一天天大大地增加着最后胜利的机会。假使赫尔岑现在还活着,他当然是不会对西欧失望的。

对西欧的失望,使他遭受很多痛苦。但是就在这种失望之后,他也没有丧失对俄罗斯的信心。今天使我们对我们多苦多难的国家的美好未来的信心复活起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离开他的坟墓,朝气蓬勃地重复他的朝气蓬勃的言辞:“俄罗斯的生命是经久不衰的!”而且意识到自己在道义上必须像我们永志不忘的赫尔岑在当时那样成为一个世界公民! 1257

---

① [反对士兵  
社会民主党人会前来帮助!]

#### 四、〔書 評〕



---

---

## 彼·雅·恰达也夫<sup>1258</sup>

747

米·格尔申臧：彼·雅·恰达也夫的生平和思想。圣彼得堡，1908年。

这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它所提供的甚至比预期的还要多；在这本书中不仅有彼·雅·恰达也夫的生平和“思想”的概述，而且在附录中还有他的《哲学书信》、《狂人的辩护》、给亚·伊·屠格涅夫的三封信、给西尔库尔的信，以及《给无名氏的信》<sup>1259</sup>。而这一切，总起来说，——连同米·格尔申臧先生的概述和附录——对彼·雅·恰达也夫的卓越的个性解释得很清楚。凡是对俄国社会思想史的发展感到兴趣的人，都应当读一下格尔申臧先生的这本书。

但是读这本有条理的书并不是说在一切问题上都同该书的观点一致。至于我们，那末我们对彼·雅·恰达也夫的思想的评价，在很多方面同格尔申臧先生所作的评价值是有分歧的。而我们想在这里说明的，也正是我们同格尔申臧先生分歧的地方。

米·格尔申臧先生说，由于种种原因，恰达也夫的名字成了传奇式的人物：“由于他坚决斥责我们的先进知识分子所最珍贵的一切，——他们的独特的实证思潮和政治革命化，——他已被作为我们解放运动中最光荣的活动家之一列入俄国自由主义的亡人名册”（第 III 页）。这种“误会”还在彼·雅·恰达也夫活着的时候就已开始，按照格尔申臧先生的说法，他太过虚荣，不肯拒绝不应得的荣誉，而同时又十分聪明，他理解这种荣誉的价值。实际上恰达

也夫不是政治家，而是一个神秘主义者。这是格尔申臧先生在自己的书中得出的结论。

748 但是假如是这样，那末被我们的作者所破坏了的传奇又是怎样发生的和靠什么来维持的呢？格尔申臧先生称之为惊人的误会怎么能够这样长久地存在的呢？

格尔申臧先生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在我们看来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他说：“这里表现了关于比政治更大的一一即关于永恒真理、关于内部自由的模糊的猜测，对于内部自由说来，外部自由即政治自由固然只是一块踏板，但却是如此天然地必需，正像空气对于生命一样。没有什么口号比号召：sursum corda<sup>1260</sup>更为解放的了（甚至从政治上说）。在这方面恰达也夫曾反复地谈到精神的崇高任务，他创造了人类曾经想达到的最深刻的历史概括之一，因此他是值得后代纪念的”（第 III—IV 页）。

现在我们来研究这一点。第一，什么是“独特的实证思潮”？这是不是一种没有任何宗教成分的思潮呢？假如是这样，那末应当说，例如，十二月党人中有很多人是完全不属于这种思潮的。但是难道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说，把这些十二月党人归入我们的解放运动的活动家之列是错误的吗？其次，是否我们的解放运动的所有活动家都具有“政治革命化”的特点呢？不，当然不是所有的人！他们中间有些人曾有过政治自由的愿望，但同时却没有“革命化”，在他们中间也确实有一些人非常倾向于“革命化”，但却同“政治”无关<sup>1261</sup>。因此，在这里，格尔申臧先生所下的定义是太过狭隘了，也就是说，是不正确的。我们再往下说，“sursum corda”这句口号用俄国读者比较熟悉的古代斯拉夫语言来表达就是“依玛木<sup>①</sup>

① 依玛木(Imam)是伊斯兰教教长的称号。——译者



內心的痛苦”！于是我們要問：这一口号真的“甚至在政治上”也有解放性质嗎？在我們看来是沒有的。格尔申臧先生所指出的口号，关于其中可能包括“甚至政治上的”内容这一点，是非常不明确的。全部問題在于，人們有着什么样的“內心的痛苦”。人可以有“內心的痛苦”，可以是政治自由和任何其他自由的坚定的反对者。格尔申臧先生也許会說，这样的人其实还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sursum corda*”。但是問題也正在这里，我們这些沒有任何超自然秉賦的普通人，是不可能确实地認識这一点的。那些“永恒的真理”（格尔申臧先生所提到的“真理”就是属于这一类的真理）一般說来是很有問題的“真理”。而且“喋喋不休地談論精神的崇高任务”，这也还不“值得后代人来紀念”。这里需要某种別的东西。而无论怎样恰达也夫對我們的解放运动（除了他对神秘主义的迷恋之外）是有其他更重大得多的功績的。例如，既然赫尔岑直到他的生命終結时<sup>1262</sup>，还对恰达也夫抱有很大的同情，那末所以有这种情况，当然不是由于恰达也夫是一个神秘主义者。

749

格尔申臧先生在描写了恰达也夫的第一封信即唯一享有盛名的《哲学书信》对赫尔岑所产生的印象后說：“显然，作者的情緒和讀者的情緒是相吻合的，而讀者甚至沒有疑心到，作者的情緒是以与他自己完全不同的另外的原因为前提的。赫尔岑說：‘这是在黑夜里发出的枪声’<sup>1263</sup>，是的，但是赫尔岑并沒查問是誰对誰射击，立刻就决定是同盟者，并且是对着共同的敌人射击的。而所謂共同也仅仅是情緒，痛苦和责备”（第142頁）。

那末，情緒究竟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呢？如果是这样，那末作者使讀者所产生的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須知常常有这样的事：当作者的情緒同讀者的情緒相符合时，讀者是同情作者的。因此在这里沒有任何“惊人的誤会”。不錯，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和讀者所

固有的情緒，按格尔申臧先生的說法，他們每个人都是由完全不同的原因引起的。但是事情是这样嗎？格尔申臧先生在这里沒有弄錯嗎？在我們看来，这是非常錯誤的。实际上，我們所关心的情緒不是什麼別的原因所引起的，而是由于对当时俄国现实的否定态度所引起的。而这种态度是恰达也夫和赫尔岑都同样地固有的。正因为这样，赫尔岑对恰达也夫的同情不是“瞬息間的”，而是永恒的。与格尔申臧先生的意見相反，他們两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他們每个人都在尽自己的力量和能力来“射击他”。而当有一个人作了准确的射击时，另一个人不能不感到高兴，不能不为他鼓掌。赫尔岑讀完《哲学书信》以后，也正是这样做的。在这上面，“惊人的誤会”又在哪里呢？

当赫尔岑后来亲自同恰达也夫認識<sup>1264</sup>以后，他自然看到，他是同一个神秘主义者打交道。但是这并不妨碍他认为自己在有关当时我們的现实問題上与他是志同道合的。其他和恰达也夫同时参加解放运动的人对恰达也夫的态度大概也是这样：尽管他有神秘主义，他們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他是自己陣营当中的一个人。

750 格尔申臧先生在自己的书中的另一个地方說：“恰达也夫在他的生命的最后十五年中的信向我們表明，他整个献身于同斯拉夫派的斗争，他什么时候都談論斯拉夫派，有理由談，完全沒有理由也談，用各种語气談，从悲剧起談到玩笑止。他不是写信給謝林嗎，——他的傲慢的言談有时变成对这种“思想危机”的哀訴，对这种俄国民族主义者的“有害学說”的哀訴。关于舍維辽夫的俄国文学史綱，他給西尔庫尔写了一封长信，用銳敏机智的諷刺把斯拉夫派学說的全部荒謬性作了解剖，就像一个医科大学生解剖手的肌肉組織一样。沒有必要在这里引证这些信：信中沒有什麼重要的新东西；恰达也夫为民族的自我欺騙而忧伤，他嘲笑斯拉夫派的倒

退的空想，以及他們对待西欧的輕視态度等等……然而他的攻击的主要目标不是斯拉夫派的历史錯誤，也不是他們的反动的热望，使他最害怕的是他們使社会陷入其中的那种民族自滿的气氛。他在俄国所热爱的只是它的未来，即它的可能的进步，因而当他看到这种根本敌視任何进步运动和歪曲民族特性的精神上的滿足时，不能不感到痛苦。在他看来，思想界的这种情緒是一个势必使俄国民族失去整个未来的致命的病症，因而他不倦地注視着它的表現，注視着它对整个社会和个别社会成員的有害作用”（第 176—177 頁）。

格尔申臧先生您还要說什么呢？要知道您自己已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您是不对的，就是說，在恰达也夫和当时的进步人士之間有很多共同的观点。根据您自己的說法恰达也夫是一个坚定的西欧派和进步分子。这就足够了。

說恰达也夫是西欧派这还不够。应当再补充一点，那就是他在自己的第一封《哲学书信》中，差不多成了我們的可悲的現实和我們的暗淡的历史在我們的西欧派中所引起的那种可怕的痛苦的最鮮明的表現者。他的第一封《哲学书信》从某一点上說是具有高度艺术性的作品，它的意义直到目前还没有作出全部的評价。关于这封书信可以毫不夸大地說，它是花了心血写成的。无疑地，作者的神秘主义观点，或者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更确切地說，他的神学观点，在这封信中也可以感觉得到。产生我們的暗淡的过去和我們的同样暗淡的現在的主要原因，在恰达也夫看来是由于基督教

751

从拜占庭传入我国这一事实。他說，“我們服从我們的恶劣的命运而去求助于可怜的、为一切人所鄙弃的拜占庭，以便維護那种应当成为我国教育基础的道德規章。由于一个虛荣心重者（即福季主教。——格·普·）的意

志，这个民族大家庭刚刚脱离了全世界的兄弟般的团结，从而我们接受了被人类的激情所歪曲了的思想。在欧洲，当时所有的人都被生动的统一原则所鼓舞。一切都是从这个原则出发，而一切又都归结于它……与这个神奇的原则无关的我们成了征服的牺牲者”<sup>1265</sup>。

我们的解放运动中的多数活动家拒绝承认宗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但是从这里得出什么结论呢？在紧接着刚被引证的那几行，再次提醒了这些大多数人，他们的观点同恰达也夫的观点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的确，《书信》继续说：“当我们推翻了异族的压迫时，只是由于我们脱离共同家庭才使我们没能利用这时在我们的西方兄弟那里所产生的思想，我们陷入了愈来愈残酷的奴役，而这种奴役又是被我们获得解放这一事实所神圣化了的”<sup>1266</sup>。斯拉夫派是永远不会同意把莫斯科露斯统治制度称为比蒙古人的压迫更加残酷的奴役的。当时的西欧派在读《哲学书信》的时候，不能〔不〕看到它的作者在当时已成为俄国知识分子所急需解决的问题上，即如何看待俄国与西欧的关系的问题上同自己是志同道合的。《书信》肯定地回答了这一当前问题：我们脱离了西欧，这是我们一切最痛苦的遭遇的根源。恰达也夫抱怨说：“整个世界都已重新缔造了，而我们这里却什么也没有建立起来；我们仍和从前一样，关在自己的用木头和稻草做成的破旧小屋里毫无作为。一句话，不管我们怎样，人类的新命运在实现着”<sup>1267</sup>。任何一个西欧派，不管他对宗教在人类文化发展中的作用的看法怎样，都应当承认这一点是正确的。大家知道一个法国上流社会的太太关于爱尔维修的书“De l'Esprit”<sup>①</sup>所说的话。这位太太说，

①〔精神论〕

爱尔維修在这本书中“a dit le secret de tout le monde”<sup>①</sup>。上流社会的太太对于这位著名的唯物主义者的书一点也不了解。但是关于第一封《哲学书信》则可以完全有权利而且絲毫不会誤解地說，恰达也夫在这封《书信》中大声地、明确地和具有高度艺术性地“說出了所有西欧派的秘密”<sup>1268</sup>。恰达也夫是西欧派的总的代表者，是西欧派的抒情詩人。所以他也就引起了他們对他的一般的同情，而斯拉夫派則把他的《书信》看作是某种罪大恶极的东西。无怪乎雅孜科夫后来对他表示惋惜：

752

可敬的祖先的不肖的儿子  
把异邦的一切引为驕傲的奴隶！  
你輕視并出卖自己的一切，  
而你还不感到悲伤……<sup>1269</sup>

关于雅孜科夫的这几行严厉的詩句，格尔申臧先生写道：“有人曾經写过，热爱祖国是一件最好的事情，但是还有某种更为高尚的东西，这就是热爱真理。很容易理解，指責写这句话的人該是多么荒謬”（第147頁）。在我們看来这种意見也不是完全恰当的。在这种情况下完全不能把热爱祖国同热爱真理对立起来。不能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书信》——也如恰达也夫的所有一般西欧主义一样——充滿了对祖国的最明显和最热烈的爱。《书信》是由这样一个人写的，关于这个人，完全可以拿涅克拉索夫的話来描述：

看見了，是一个有眼睛的人  
而且为了祖国而生病<sup>1270</sup>。

恰达也夫在他的《狂人的辯护》中这样說明他对祖国的态度：“請相信我，我比你們当中任何人都更爱自己的国家，更希望为它

① (“发现了全世界所知道的秘密”)

增光，更能珍视我的民族的高尚品质；但是那也是正确的，即鼓舞着我的爱国主义情感的不完全像那种东西：它的喊声破坏了我的宁静的存在，而且把我的已靠在十字架脚下的船只重新投入人类烦恼的海洋。我没有学会闭着眼睛，低着头，闭着嘴来热爱自己的祖国。我认为，一个人只有在清楚地认识自己祖国的时候，对它才是有益的；我想，盲目地热爱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我们首先应当感谢真正的祖国。我热爱我的祖国，犹如彼得大帝教我爱它一样”<sup>1271</sup>。由此可见，热爱真理并不能同恰达也夫的热爱祖国对立起来，而应当把它看作是确定和指导这种热爱的因素；至于说到“我热爱我的祖国，犹如彼得大帝教我爱它一样”这句话，那末它使人不禁想起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他在《果戈里时期俄国文学概观》中说：俄国人应当做像彼得大帝那样的爱国者<sup>1272</sup>。从这种对待彼得大帝的态度已经可以看出，在恰达也夫的社会观点中有许多同我们的西欧派的最先进的观点相接近的地方。最后，格尔申臧先生本人也引用维亚泽姆斯基公爵的公正的评语：“恰达也夫的信就其实质上说，无非是对卡拉姆津从原本描下的俄国的否定”<sup>1273</sup>，也就是说，——格尔申臧先生解释说，——“对以烏瓦洛夫的三个原则为基础的”<sup>1274</sup>（第 143 页）俄国的否定。既然如此，我们的作者自己的“惊人的误会”又从哪里来的呢？这简直不可理解！

我们一分钟也不忘记，恰达也夫也在同一封《书信》中表示出对十二月党人的政治意图的否定态度。按照他的说法，这种意图是“使我们后退半世纪的一个巨大的不幸”<sup>1275</sup>。然而对它的这种看法只是证明，他不是一个人政治革命家。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在我们的解放运动的参加者中间，政治革命家是不多的；就是说，恰达也夫对上述意图的态度——正如他对 1830 年革命运动的态度一样——还不能证实格尔申臧先生的思想。此外，应当记住，恰达

也夫在自己的第一封书信中是作为俄国西欧派的抒情诗人出现的，而关于诗人，福士考洛正确地說，甚至当他们教人们忍耐的时候，他们也是在刺戟内心的创伤，因为他们使内心大为震动<sup>1276</sup>。恰达也夫在痛斥“政治的革命作风”的时候，在一定的意义上說是“教人们忍耐”。但是甚至在“教人们忍耐”的时候，他也大大地震动了企图为自己的国家爭取較好未来的人们的心。而他们仍旧把他看作是自己的同志，而且恰达也夫本人也未必只是“由于虛荣心”才沒有试图使他们放弃这个打算。

恰达也夫所受的惩罚好像成了坚持《哲学书信》中所表达的那种对俄国的看法的新論据。赫尔岑在某处——好像是在《往事与回忆》中——說过，当然，即使在西方也存在过专制主义，但是在那里誰也沒有想过去鞭撻斯宾諾莎或者把萊辛送去充軍<sup>1277</sup>。在我国一定是会这样做的。在我国如果可能的話还会做得更好；在我国竟把敢于激烈地反对官方对俄国的看法的人宣布为瘋子。而这一残酷的侮辱竟使恰达也夫成了西欧派思想的殉难者。他是我們的——思想的——解放运动的牺牲者，因此，他的名字自然就被載入如格尔申臧先生所称呼的我們的亡人名簿中。

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sup>①</sup> 現在如果可以把一个宣揚神秘主义的人列入解放运动的参加者中間，这确实只是一种誤会。現時神秘主义者，甚至真誠地同情自由和准备为它而进行“积极活动”的人，給自由事业带来的害处要比好处大得多。目前，真正的，即是說，彻底的，即是說，不动摇的为进步服务的人，首先应当把所有陈旧的世界观的残余从自己的世界观中清除出去；否則他的观念上的不清楚一定会把他导致行动上的不彻底性。而在恰达也夫

754

① 語見《新約》《馬太福音》，第6章第34行。——譯者

的时代，——当时我们的“社会”的分化，因此也就是在我们的社会思想领域中的分化距离它现在所达到的程度还很远<sup>1278</sup>——生活还不要求先进的人们在思想上达到这样严格的彻底性，因此当时甚至像恰达也夫这样的神秘主义者也能够为解放运动服务。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說实在的：在恰达也夫的世界观中，主要特点并不是神秘主义，而正是对他周围现实的很高的要求。在格尔申臧先生說来則是另一回事，但是，这同一位格尔申臧先生在自己的很有意思的书中还提供一些材料，表明他，格尔申臧先生是极端錯誤的。

实际上，恰达也夫的“转变”是什么时候实现的呢？据格尔申臧先生所报导的消息，“大約在 1820 年”（第 34 頁）。很好。而在这以前恰达也夫的观点是怎样的呢？格尔申臧先生說，在这以前“他的世界观的中心点是社会的利益”，“他认为一个爱国者唯一值得付出力量的就是十二月党人看作是自己的义务的事情”（第 17 頁）。在同一頁里，格尔申臧先生从恰达也夫给自己的兄弟的信中引证一个片断，表明实际情况正是这样。在这一片断中談到西班牙的革命；恰达也夫写道（1820 年 5 月 25 日）：“还有一件重大的新聞——这件新聞传遍了全世界：西班牙革命结束了；国王被迫在 1812 年的宪法法令上签了字。整个的民族起义了，三个月来革命在彻底地进行——而且沒有流一滴血，沒有屠杀，沒有震惊，沒有过火的现象，一般說来，沒有任何足以羞辱这一极好的事业的东西，关于这点你又能說什么呢？这就是經過实践证实了的革命事业中的惊人的論证！”<sup>1279</sup>只有全心全意地同情革命运动的人才能这样写。現在請問：究竟是什么使恰达也夫走向神秘主义的呢？对于这一問題，格尔申臧先生回答得很不明确，而且也未必有任何可能对这一問題作出明确的回答。所知道的只是，恰达也夫在“轉



变”以后，不知由于誰的劝告，讀了施梯林的著作，而且这些著作“使他产生了严重的精神危机”(第34頁)<sup>1280</sup>。但是这一点是值得提出的。格尔申臧先生說：“在这两年来……从退职到出国，恰达也夫感到自己完全是一个病人……恰达也夫显然是遭受着天生的极端神經质的易怒性的痛苦，而在疾病和精神痛苦(由于退职和其他大概純粹是精神上的原因)的影响下，这种多疑和情緒上的不稳定在他身上发展起来，使他成了真正的殉难者”(第35頁)。在1823年11月从伦敦寄給他的兄弟的信中恰达也夫这样說明自己的病状：“我的神經的易感性——我說这一点时脸也紅了——把任何思想变成感觉，以至达到这样的程度，我每次以笑，以哭或者以手势来代替說話”<sup>1281</sup>。在另一封信(1824年4月)里他写道：“我承认，——虽然我知道，你是不很相信坦白的，——我的想像的神經质使我常常欺騙自己的感觉，而且开始可笑地为自己的状态而哭泣”(同頁)<sup>1282</sup>。格尔申臧先生从恰达也夫的日記中所引的一些摘录，产生了一种极端痛苦的印象；似乎这是一个心理上陷于完全失常状态的人的事(見第39—43頁)。恰达也夫的这种状态延續了很長的时间。甚至在从国外回来以后他仍然是“一个孤独的、抑郁的、孤僻的人”，“瘋狂和頹废”在威胁着他(第60頁)。按照格尔申臧先生根据但·达威多夫的证言的說法，恰达也夫后来向斯特罗加諾夫伯爵承认，他是在狂病发作的时候写他的《哲学书信》的，“他在狂病突发的时候试图自杀过”(第60頁)。当然，我們是 cum grano salis<sup>①</sup>看待这一证言的，但我們毕竟不能不考虑到它；同其他資料比較，它使我們深信，恰达也夫之所以迷恋于神秘主义是神經病的結果，可能部分是机体素质引起的，而主要是由于从他周围

① (有保留地)

756 的环境所感受到的痛苦的印象引起的。在說到环境时，我們所指的不仅是我們俄国的现实，这种现实后来使年輕的赫尔岑不得不在自己的《日記》中自問：“我們为什么觉醒？”<sup>1283</sup>“不，在恰达也夫在国外旅行的那个时候，西欧爱好自由的人們也并不是生活得很美滿的，因为这是法国大革命的风暴平息以后西欧的反动势力最猖獗的时期。肯內說，十九世紀初期所有伟大的意大利作家都充滿了悲观主义。但須知这不仅是在一个意大利；不妨回想一下拜伦。的确，在西欧爱好自由的人們，一般說来是不容易受神秘主义影响的；在那里神秘主义主要是反动派的所有物。但是这一点可以这样来解释，由于西欧的社会关系有很大的发展，在那里經常可以看到有思想的人們的社会志向同他們的世界观的理論基础之間适应得多。誰忽視这种情况，他就永远不会懂得，例如，目前在我們的“馬克思主义者”当中(哼！哼！)为什么会有相当多的人迷恋于康德主义，經驗一元論和其它哲学体系，而这些哲学体系都或多或少地表現着西欧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或者說或多或少保守主义的，您爱怎么說都行，——情緒。但是关于这点在这里不宜广泛論述。事实是这样，恰达也夫当时即使在西欧也不能給自己的有病的灵魂找到可靠的安慰。但他不能不寻找安慰；他越是竭力寻找安慰，他对神秘主义就越是无法防御。可惜，神秘主义对于他正像直到現在烧酒对于許許多多“俄国”人一样是借以解愁的一种手段。但是烧酒并不消除引起酗酒者的精神痛苦的原因。同样，神秘主义也不能使恰达也夫得到那种只有在社会活动中才能找到的滿足。正因为这样，所以神秘主义不能滿足恰达也夫参加社会活动的願望，这种願望使他的神秘主义具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色采。

社会利益常常甚至在恰达也夫的宗教議論中也占有首要地位。恰达也夫在自己的第一封《哲学书信》中說：“在基督教世界里

一切都应当促进——而且实际上也在促进——地球上建立完善的制度；否则上帝所说的他在本世纪完结以前将留在自己的教堂里这句话就不能得到证实”<sup>1284</sup>。没有比这更能说明恰达也夫的神秘主义了。把这种神秘主义和哪怕是托尔斯泰伯爵的宗教世界观加以比较，你也会看到，对宗教的迷恋本身还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情绪。恰达也夫的神秘主义认为关心“地球上建立完善的制度”是正当的，而托尔斯泰的宗教则确信“天堂在你们的内心”，因而违背自己时代的一切社会意图。但须知托尔斯泰也是“内心有痛苦”的。恰达也夫的神秘主义完全不像托尔斯泰的信仰上帝。关于这一点我们希望把恰达也夫的神秘主义称作社会的神秘主义的格尔申臧先生也不要否认。我们觉得，更正确些是把它叫做由于把理性引入周围生活的意图没有得到满足的神秘主义。

757

但是假使这种神秘主义是这样，那末很明显，《哲学书信》的作者不仅可以而且应当被算作我们的解放运动的活动家。

好像格尔申臧先生本人最后也承认了这一点；但是第一，他承认这一点是带有一些不可容忍的保留条件的；第二，他没有觉察到，这是同他的如下想法根本矛盾的，即他认为我们的解放运动的活动家们只是由于极大的误会才把恰达也夫看作是自己人。他说：“从二十年代初恰达也夫的思想所采取的方向来说，社会利益对于他当然应当退居次要地位；但是这些利益还不能完全熄灭。恰达也夫的整个精神是在亚历山大时代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在他成年以前所吸取的汁液正是抚育了十二月十四日的活动家们的汁液。他这一代的人们，他的朋友和同年懂得了一种热情，他们有一个切身的目的就是社会生活，而且我们看到，恰达也夫在彼得堡生活的这一时期也是这样的<sup>1285</sup>。他的毕生都是这样，他所作的一切都抱定一个目标：不为个人而为社会。即使在他整个地献给对

宗教的寻求的时候,他也没有失去公民感,这是使他在国外同致力于解放运动的典型人物尼·伊·屠格涅夫长期以来共同生活的保证(第61页)。妙极了!但是须知,假使一个人,不管他是做什么的,而他始终关心到社会,那末难道可以说,社会利益对他来说已退居次要地位了吗?根据正确的判断,这样说是不对的。但是格尔申臧先生自己可以说不提供丝毫申辩的理论,却急忙报道一个解决这个最具有确定性意义的争论问题的事实。事实就是这样。斯维尔别也夫说,当恰达也夫在国外旅行时,即在最强烈地迷恋神秘主义的时候遇到他时,曾这样评论我国当时的情况:“他在自己的尖锐的狂妄言论中毫不隐讳地对我們过去和现在的一切表示极度的轻视,而对未来则感到完全绝望。他称阿拉克切也夫为恶汉,称最高权力机关、军事机关和民政机关为受贿者,称贵族为卑贱的奴才,称僧侣为不学无术的人,称所有其余的人为僵硬的、卑躬屈节的人”<sup>1286</sup>(第61页)。一个把社会利益放在次要地位的人是不会这样说的。不会的,在这里,甚至通过另一个人的传达,我们也听到一个首先关心社会问题的人的热烈的感情。这正是在《哲学书信》中为自己找到了出路的那种感情,这种感情使这封书信很像一个革命者的严厉的揭发性的宣传”<sup>①</sup>。

① 摘自文集《由防御到进攻》的注释。——可惜,这种感情没有使恰达也夫永远同勇敢精神协同一致地行动。在给阿·索·奥尔洛夫伯爵的信中他最可耻地而且甚至没有足够的表面理由就同赫尔岑断绝了关系,因为赫尔岑是在自己的小册子《Du développement des idées révolutionnaire en Russie》〔《论俄国的革命思想的发展》〕中(1855年)1287称赞了他。恰达也夫使奥尔洛夫相信,“当厚颜无耻的逃亡者(原文如此)最卑鄙地歪曲真理”、把“自己的感情”硬加在他身上,并且拿“自己本身的耻辱”来侮辱他的名字的时候,他恰达也夫不能对此漠不关心(此信见米·日哈列夫编的:《彼得·雅柯夫列维奇·恰达也夫》,《欧洲通报》1871年,9月,第50页)1288。在1851年也是这个恰达也夫给住在国外的那同一个赫尔岑写了一封很友好的信,可是同一年他又写了一封这种令人吃惊的信1289。当米·日哈列夫责备恰达也夫使用“不应有的齷齪话”时,他反驳说:“Mon cher, on tient à sa peau”(“我亲爱的,任何人都珍惜自己的名誉”)(同上书,第51页)。可怜的辩解!

格尔申臧先生自問，“現在是不是对俄国公众提起恰达也夫的时候呢？”并回答說：“我认为正是时候，而且比任何时候都更适宜”。从自己这方面說，我們以为，現在确实不妨对讀者大众提及恰达也夫。但是关于这位格尔申臧先生对問題所提出的一些看法，我們认为是极不成功的。他写道：“他（即恰达也夫。——格·普·）以自己的思想的总和对我们說，各民族的政治生活力求达到自己的暫时的和物质的目的，实际上只是局部地实现永恒的道德观念，即是說，任何一种社会事业就其实质說，都不比信教者的热烈的禱告更少宗教性。他向我们談到社会生活：請进去罢，上帝就在这里；但是他补充說：請記住，上帝就在这里，你們要为他服务”（第IV頁）。这些看法证明格尔申臧先生的令人感动的宗教性，而不是证明他对于宗教的“因素”在人类历史中所起的作用有清楚的理解。現在提到恰达也夫所以有好处，不是因为似乎是“上帝就在这里”等等，而是因为，我們現在正經歷着一个某些被夸大了的社会期望遭到破灭的时期，而这样的时期总是十分有利于神秘主义的传播的。而且有某种根据可以认为，神秘主义情緒現在正在俄国知識分子中間强烈传播着<sup>1290</sup>，难怪我們的“时髦爭論的爱好者”开始——虽

7.59

說現在还帶着十分天真的样子——想出一些新的宗教，更正确些說，也就是重溫旧的宗教（見安·卢那察尔斯基这位預言家在《教育》中的宗教启示）<sup>1291</sup>。恰达也夫的例子是好的，因为它表明神秘主义完全不能作为解决現在还没有被生活所解决的社会任务的手段。从这方面說，恰达也夫的生平和“思想”是特別有教益的。可惜的只是，这一方面在格尔申臧先生的书中沒有得到充分的闡明。

讓我們自己試試闡明这点吧。

恰达也夫的第一封《哲学书信》关于俄国历史的命运問題完全浸透了悲观主义。他在那里問道：“我們的哲人，我們的思想家在

哪里呢？誰在什么时候曾为我们思考过，誰现在还在思考呢？須知当我们站立在世界的两个主要部分——东方和西方——之間，用一个肘子依靠着中国，另一个肘子依靠着德国的时候，我們应当把精神本性的两大原則：想像和理性同自己結合起来，而且把整个地球的历史溶合在我們的文明中。但上帝給我們規定的作用不是这样。不但如此，上帝似乎完全沒有关心我們的命运。它使我們失去对人类理性的有益作用，然后对我們完全放任不管，对我們的事情不作任何干涉，不願意我們学到什么。历史的經驗对我們來說是不存在的，一世一代地过去，而对我們毫无益处。瞧一瞧我們，可以說，人类的一般規律对我們說来已經消失了。我們在世界是孤独的，我們什么也沒有給予世界，什么也沒有教会它；我們沒有給大量的人类思想加进任何一个思想，我們絲毫沒有促进人类理性的进步；而进步所給予我們的一切，我們都歪曲了”<sup>1292</sup>。

在悲观主义方面沒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无怪乎恰达也夫得出这样的結論：“在我們的血液中有某种敌視任何真正的进步的东西。我們过去和現在都只是为了使世世代代获得某种重要的教訓而生活，后代一定能够理解它；現在我們，無論如何在精神的世界秩序方面是一个空白点”<sup>1293</sup>。不管这一結論是多么令人不快，但是假如在神秘主义的影响下社会的利益实际上在恰达也夫那里退居于次要地位，那他就会屈服于不願“关心”我們命运的上帝的意旨。在天主教中找到安慰的加加林，对于俄国未来的命运未必想得很多。但是問題就在于，在恰达也夫那里社会的利益繼續占居首要地位，所以他不能容忍上帝对我們“漠不关心”。于是他又重新在思想上回到我們的过去，最后，他从其中並沒有找到他許諾給我們的十分可喜的未来的那种特点。而且——說来奇怪！——这一特点原来是俄国的孤立性，这种孤立性从前在恰达也夫看来

是我们的历史毫无结果的主要原因，是那种所谓上天不认为需要考虑我国的思想的最令人信服的论据。

恰达也夫对俄国未来的新看法第一次在雅斯特烈布挫夫的《论适合于当代儿童的、为最有教养的阶级规定的科学体系》一书中表达出来。这本书在1833年出了第二版，恰达也夫本人说，书中论述俄国的可能的未来的那几页是在他的口授下写成的。格尔申臧先生这样转述这几页的内容：

“作为所有先辈集体劳动成果的文化，每一个外来人都可以无代价地得到。因此后来出现的民族是幸运的：它继承人类所积累的一切财富；他不要劳动和痛苦就获得了物质繁荣的手段，以及智慧和精神发展的手段，而这些都是以无数的错误和牺牲作为代价取得的，甚至过去时期的错误本身对它都可以成为有益的教训。俄国的情况是这样：它在许多方面同欧洲比较起来是年轻的，正像北美一样，可以无代价地承继欧洲文化的财富……但是在俄国所得到的遗产中，真理和错误是混合一起的。不能毫无选择地接受它；应当把莠草同真正好的东西区分开来，而只利用好的东西。我们的爱国主义的希望的主要根据也就在于此：俄国的最大的好处不仅在于它能取得外人劳动的成果，而且在于它能充分自由地进行选择，没有任何东西来妨碍它，它可以接受好的，扔掉坏的。有着丰富的过去的民族则没有这种自由，因为民族的过去的的生活深刻地影响着它的整个的存在”（第150—151页）。

恰达也夫在1832年给亚·伊·屠格涅夫的信中就表明了这种精神。他在信中写道：“不久就会过去，而我相信，伟大的思想一旦赶上我们，就要在我们这里为它在人类中的实现和体现找到比任何地方都适合的土壤，因为它既不会遇到根深蒂固的偏见，也不会遇到陈旧的习惯和同它对立的顽固的成规”<sup>1294</sup>。

最后,在 1837 年写成的《狂人的辩护》也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这种思想。不过,在那里恰达也夫比较确定地表示他对俄国期待着什么。他在那里补充说:“我有一种深刻的信念,我们担负着解决社会制度的大部分问题的责任,我们要完成在旧社会中产生的大部分思想,我们要回答人类所研究的最重要问题”<sup>1295</sup>。

假使读者还记得不久前我们的民粹派和主观主义者关于俄国的可能的经济方面的未来的那些议论,那末他会看出,在这里面很少新的东西;同样地确信俄国有“选择的充分自由”;同样地认为“选择的充分自由”是我们落后的结果;最后,同样地引证彼得大帝,仿佛他以自己为例给我们表明了,我们实际上有这种选择的自由。这样我们就得出某种完全意外的东西,恰达也夫原来是我们的民粹主义和我们的主观主义的鼻祖。格尔申臧先生也这样说:“恰达也夫的思想是通过赫尔岑渗进民粹主义,通过索洛维约夫渗进现代的基督教社会运动的。关于直接的抄袭,无论在这里或在那里都谈不上,但从继承性说来,这两个运动无论如何都是溯源于恰达也夫的学说”(第 170 页)。

但是假如是这样,那末“上帝的精神在人类历史中所起的内在作用的观念”(第 144 页)(按照格尔申臧先生的说法,这是恰达也夫学说的中心)与此又有什么相干呢?要知道无论是在赫尔岑那里,或是在民粹派那里,无论是在米海洛夫斯基和他的同志们那里,从来没有存在过这样的观念,然而他们却同恰达也夫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问题完全不在于“上帝精神的内在作用的观念”,而在于恰达也夫与完全不同意他的神秘主义思想的许多俄国“知识分子”所共同的其他某种东西,这难道不明显吗? 其他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这不过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方式,他们不与自己周围的现实妥协,力图根本地改造这一现实……可是他们还完全不理解,这



一现实的发展有它自己的客观逻辑，它不仅不以知识分子的主观逻辑为转移，而且归根到底甚至决定着这一主观逻辑的要求，及这种要求的优点和缺点。

恰达也夫对于俄国的可能的未来的新观点是借助于一切空想的改革派所固有的那些思维方法制订出来的。空想的改革派通常都是从那种默认的假定出发，即认为每个一定的国家本身在每个一定的时间内自觉地确定今后自己发展的进程。谁认为只是唯心史观的变种（按照这种观点就是“意见支配着世界”）的这一论点是正确的，谁就会极其自然地得出结论说，任何一个落后国家完全有可能利用比较先进的国家的“教训”和多少避免先进国家内部发展中的坎坷的不平道路，可以用几个强有力的跳跃进入到最令人羡慕的未来。可是须知这种想法也就等于认为某一国家的孤立性和一般地说它的落后性是它的未来进步的最可靠的规律①。

762

① 摘自文集《由防御到进攻》的注释。——然而这里须要附带说明一下。恰达也夫是作为第一封《哲学书信》的作者而不是作为《犯人的辩护》的作者，也不是作为对于写成论文《我们时代的儿童适用的科学体系》的雅斯特烈布挫夫比较有强烈影响的思想家等等，在俄国社会思想史中占有其地位的。深知恰达也夫的米·日哈列夫断定，恰达也夫在自己的《辩护》中作了一些让步，这些让步“从他自己的观点看来是不应当作而且他自己并不相信它的正确性的”（同上书，第37页）。关于恰达也夫和雅斯特烈布挫夫的关系，他没有说什么。关于这种关系格尔申臧先生谈得很多（见他的书的第149页及以下各页）。格尔申臧先生指出，“当后来因《哲学书信》而对恰达也夫掀起了一场风暴时，他为了替自己辩护，把雅斯特烈布挫夫的书寄给了斯特罗加诺夫”，请他读一读他所指出的在他口授之下所写的那几页。但是恰达也夫和雅斯特烈布挫夫的关系还是阐述得很不好。给斯特罗加诺夫的信1296可能是在恐惧的影响之下（日哈列夫证明，恰达也夫那时是很惊慌失措的）不正确地描繪了这种关系。而且在这封指出我国孤立状态的好处的信中，恰达也夫现在仿佛看到了“我们今后成就的基础”，我们一定要把这封信同恰达也夫1836年10月15日给索·诺·美舍尔斯卡娅公爵夫人的信1297对照一下（给斯特罗加诺夫的信注明是同年的11月8日）。恰达也夫给美舍尔斯卡娅写信已经是在《哲学书信》出版的时候，但也还是在他遭受灾难以前。而且可注意的是，在这里面一点也没有谈到恰达也夫对于我国的看法的任何变化。格尔申臧先生对于这

763 法国的圣西门主义者早就认为，法国能够利用为“新的哲学”所解释的即为那些圣西门主义者的学说所解释的英国的经验，而避免英国的资本主义。后来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开始使德国相信，它在这方面完全不需要效法“西方国家”。我们的民粹派和主观主义者在谈论这一问题时比所有其他人的声音都更响亮，谈得更长久和更顽强<sup>②</sup>。不言而喻，支持这一基本论点的次要的极不重要的论据是随着提出这一论据的国家的相应的经济和政治特点而改变的。但是这一基本论点就其本质来说是完全不变的，只不过是把那种也是恰达也夫所得出的一般的历史-哲学思想译成政治经济学的语言。恰达也夫得出这一思想，只是和当时的俄国政论家们比较，才是表现出独创性的。这种思想在西欧也未必有誰认为是新东西。

但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恰达也夫提出自己的这一思想，是同斯拉夫派很接近的（至少在形式方面，即在自己的历史-哲学思

---

一点是应当很注意的。同样地恰达也夫在给伊·德·雅库什金的信中，在描写由于他的《哲学书信》出版而引起的事件时，关于自己看法的改变一句话也没有谈到（见《欧洲通报》，1874年，第7期《恰达也夫未发表的手稿》一文）1298。在1842年5月20日给谢林的信中，恰达也夫嘲笑斯拉夫派的“倒退的空想”，按照这一空想，我们“在预告人类的进程时，自己已经实现了傲慢的理论”，即西欧本身的社会主义的理论1299。在1845年1月15日给西尔库尔伯爵的信中他重复那些同样的嘲笑1300。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还需要修正格尔申臧先生所已得出的那一结论，并根据这一结论在我们的论文中作进一步的议论。新的研究表明，也许恰达也夫永远没有认真保持关于“我国的孤立状态的好处”的思想1301。我们补充说，假使现在我们怀疑地谈论这一问题，并且让未来的研究家去最后解决它，那么首先——在格尔申臧先生的书出版以前——我们也追随着赫尔岑而认为，恰达也夫对俄国的看法永远是同斯拉夫派和民粹派对它的看法直接地完全矛盾的。而我们在出版物上也发表了这样的思想1302。

② 为了公正起见，我们补充说，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曾屡次说到，“谁要有老太太给做祷告，他就会生活得好”，他想以此来说明，“有可能利用先进经验的落后民族是好的”。

想的方法方面是这样)对于斯拉夫派学說他是这样的不喜欢,正如我們所知道的,以至于他在自己生命的后期充滿了对这种学說的斗争。当斯拉夫派贊揚我們的“拯救的静止”时,他們的議論是同恰达也夫的議論完全一样的。不仅如此,应当承认,在恰达也夫的希望中比斯拉夫派的議論,有着更多的空想成分,不管斯拉夫派的議論有时多么奇异。

問題在于,斯拉夫派已經多少模糊地意識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是彼此联系着的,而这种联系不能由知識分子随意破坏。恰达也夫完全像后来的民粹派和主观主义者一样,在考虑俄国的未来时,沒有注意到这种联系的存在,或者是忘記了这件事。正因为如此,斯拉夫派对西欧主义(当它出现在恰达也夫、民粹派和主观主义者的空想中时)的批評往往是完全正确的。

764

伊·謝·阿克薩柯夫把民粹派和自由派混淆起来,他写道,在我們的自由主义的报刊中“人民只依靠自己的一个方面,即依靠經濟方面来生存……至于他們的存在的其它一切方面……不是为他們所仇恨,就是为他們所厌恶和輕視”<sup>①</sup>。事情确实是这样或者几乎是这样。我們的西欧派——当他們保持我們刚才所指出的空想观点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自己的議論中任意抓住人民生活的个别方面,天真地断言,这一不知何种原因为他所喜爱的方面可以摆脱其他方面的影响而走向“正常发展”的道路。全部困难只在于要为先进的知識分子想出好的行动綱領。当伊·謝·阿克薩柯夫断定“西欧輸入的某些学說同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的見解的相似之处”——(他指的一方面是俄国的村社,另一方面是“公社”和“法伦斯泰”)只是純粹外表的相似<sup>1304</sup>的时候,他是对的。最后,当他向

① 見《阿克薩柯夫全集》,第2卷,第621頁1303。

我們的“自由派”指出他們所喜愛的我們的人民生活的經濟方面亦即常談的土地村社同我們的政治制度是有机地联系着的时候，他也是对的。他这样論述是离开了空想的領域，而当时我們的民粹派和“主观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无论如何也是不能离开这一領域的。

斯拉夫派比西欧派更早地感觉到必須向我們的社会发展的內在的、客观的邏輯提出申訴。但是这一申訴把他們带到了至少是斯拉夫主义的最初导师所完全没有企图进入的地方。

1862年8月，伊·謝·阿克薩柯夫在自己的《日报》中写道：“我們希望一切直接促进我們的物质福利的东西都成为立法上所关心和追求的主要对象（如果不是唯一对象的話），同时給予思想和智能以活动的广闊場所”。

765 在这一綱領中，对“給予思想和智能以活动的广闊場所”的希望只不过是空想。至于說到它的經濟方面，那末伊·謝·阿克薩柯夫的理想，可以說是第二天的现实。斯拉夫派的政論家把对物质福利的关心主要是理解为发展铁路网，为工业开辟新市場，保护关税等等。我們的斯拉夫派自己提出这样的綱領的时候，推动了俄国走上資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亦即“腐朽的”西欧比我們早得多进入的道路，这条道路不能不导致否定斯拉夫派所如此珍視的我們的“独特性”。也是这位阿克薩柯夫写道，把一个民族弄得荒无人烟，于是那时候西欧主义在我国将有自己的意义了。但是資本主义正是这样做的。它破坏了我們的旧的独特性，从而为西欧的流派在我国的出現准备了土壤，而这些流派为了自己的生存已經不需要空想主义了。伊·謝·阿克薩柯夫认为，西欧的社会主义是西欧历史的邏輯的結論。按照他的意見，社会主义在西欧就是在自己家里；社会主义者是整个現代文明的产儿，而“在亚洲他們是

没有什么可做的”<sup>①</sup>。这也是勿用置疑的。既然俄国在经济方面仍然是“亚洲”，所以一些空想主义者就可以考虑在俄国实现西欧的先进理想。但是伊·谢·阿克萨柯夫所提出的纲领排除了“亚洲”，并从而摧毁了斯拉夫主义所立足的基础。

我们内部发展的历史是一种多么恶毒的讽刺！斯拉夫主义为完全没有空想的西欧主义的胜利扫清了基地，提出了一种使我们在经济方面和“腐朽的”西欧相接近的纲领！

当恰达也夫和斯拉夫派论战的时候，诚然要达到这一点还是极其遥远的事情。斯拉夫主义还完全没有为资本主义的倾向所感染，而各色西欧主义还是双脚站在空想的基地上。只有别林斯基做了一种尝试：对我们的现实的起源和特性制定出科学的观点；只有别林斯基意识到，对“丑恶的俄国现实”的否定应当以它自己内部发展的逻辑为根据。但是他的尝试由于缺乏正确解决这一异常重要问题<sup>②</sup>的资料而注定失败。然而我们认为在这里指出生活的上述讽刺是有益的，因为这样可以提醒，这种生活很少理会：我们的某些知识分子的某些集团希望“自由选择”。生活有着自己的客观逻辑。而“知识分子”集团的主观逻辑如果对客观逻辑的结论（有时是讽刺的）的影响一般说来是极端微弱的话，那末恰达也夫的观点中的某种因素（用格尔申威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上帝就在这里”）对它的影响就完全等于零。神秘主义是恰达也夫的麻醉剂，它部分地减轻了他的精神痛苦，减轻了一——暂时地！——他的为俄国知识分子所如此熟悉的在同社会罪恶作斗争中的无望这种精神

766

① 1883年3月15日的《露斯报》。我们引用的论文重印在《阿克萨柯夫全集》第2卷中1305。

② 关于这点，参见我们的论文集《二十年来》里面的我们的论文《别林斯基与合理的现实》（《普列汉诺夫全集》，第10卷）1306。

病的症状。但是他对于能够导致消除罪恶的那一道路，沒有投射出任何一綫光芒。而且也沒有能力这样做！就其本质來說，他只能使这一道路的发现变得困难，因为着了它的迷的极有才干的人的注意被吸引到同他們应当注意的那个方向直接矛盾的方向去了。西欧主义在我国不是在神秘主义的标志之下，而是在唯物主义的标志之下将要得胜——*malgré tout*①部分地已經取得胜利！

最后，对格尔申臧先生还有一点小小的意見。他把赫尔岑的《自然研究通信》<sup>1307</sup>看作是唯物主义的著作(第187頁)，这是极其錯誤的，正如很久以前貝平所犯过的錯誤一样。*Loin de là!*②为了使格尔申臧先生相信事情确实是这样，我們劝他找赫尔岑全集国外版第2卷——这一卷刊有《自然研究通信》——来讀一讀其中的第259, 260, 282和292頁<sup>1308</sup>；他将会看出，赫尔岑在写——是照黑格尔的方式写的！——上述《书信》的时候，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同时格尔申臧先生通过別的方法，如讀一下刊印在同一版第1卷的赫尔岑的《日記》也可以相信这一点。从《日記》中可以看出，在1844年，当着手写这些信的时候，赫尔岑还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間搖摆，而且更接近于前者，而不是接近于后者。关于自然，他在那里是这样說的：“观念在自然界是有形地无意識地存在的，它服从必然性的規律，服从曖昧的不能自由理解的意向”(第377頁)。且让格尔申臧先生自己来判断，这是不是唯物主义吧③<sup>1309</sup>。

最后，是我們更好地認識我們的卓越人物的思想方式和思想发展史的时候了。

① (不顾一切地)

② (远不是这样)

③ 由于自己的观点不清楚，赫尔岑在《自然研究通信》中对思維和存在的关系說得极其不清楚，他的这种不清楚使人不禁想起約瑟夫·狄慈根，在狄慈根的哲学中，对于这一問題缺乏清楚的理解。

## 評米·格尔申臧的 《青年俄罗斯史》

《青年俄罗斯史》。1908年莫斯科版。

格尔申臧先生說：“每一个俄国人都应当知道俄国社会思想史”，沒有比这更为正确的了。而且我們不能不感謝米·格尔申臧先生，因为他热心地研究这一历史。可惜的只是，米·格尔申臧先生所持的观点往往极大地妨碍他探討他所研究的現象的內在联系。

他的观点对他有害到什么程度，从他在《米·費·奥尔洛夫》<sup>①</sup> 概述中对亚·尼·拉也夫斯基个人的評價便可以看出。格尔申臧先生不喜欢亚·尼·拉也夫斯基。这是为什么呢？他說：“当然，拉也夫斯基是很聰明的”（第40頁）。但是在米·格尔申臧先生看来，他有一个不可饒恕的缺陷：他沒有能力感受“世界上非理性的东西的力和美”，而这种情况就使他的巨大的智慧不能带来什么成果，如果他对待“非理性的东西”采取另一种态度，这种成果本来是可以达到的。米·格尔申臧先生写道：“但是，智慧如果缺少感受世界上非理性的东西的力和美的能力，那就是平凡而貧乏

① 米·格尔申臧先生的这本书是由几篇概要組成的：1)《米·費·奥尔洛夫》；2)《弗·謝·別切林》；3)《尼·弗·斯坦凱維奇》；4)《季·尼·格蘭諾夫斯基》；5)《伊·巴·加波荷夫》；6)《尼·普·奧格辽夫》。

的智慧,而拉也夫斯基的智慧,严格地说来正是这样的智慧。人类精神的最高领域对他来说是关闭着的(第41页)。我们的作者引用维杰里的话来作证明,维杰里就拉也夫斯基对普希金的态度说道:“诗歌对于他是格格不入的,他把这种均匀的和温柔的感情看作是一种可笑的狂妄行为”(同上)。尽管对维杰里的这一引证使我感到非常奇怪(未必能够把维杰里看作是在“诗歌”和“温柔的感情”方面的内行的评判人),然而我愿意设想,拉也夫斯基的诗的感情是不很发达的。而我自然愿意承认,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但是这一无可争辩的大缺点并不像米·格尔申臧先生所想象的那样大大地损害了事业。例如,我们也是从这位米·格尔申臧先生那里知道下面这一异常有趣的事实(这是他从洛勒尔的札记中摘录下来的)。在对12月14日的案件进行侦查时,尼古拉对亚历山大·拉也夫斯基说:“我知道,您是不属于秘密会社的;但是,既然在那里有亲属和熟人,那您就是知道了一切,而您没有告诉政府;您的宣誓在哪里呢?”对于这一点,亚·拉也夫斯基勇敢地回答说:“皇上!荣誉比宣誓更珍贵,人损坏了荣誉便不能生存,而没有宣誓,他还可以过得去”<sup>1310</sup>(第49页)。我敢于设想,“人类精神的最高领域”对于一个能有这种感觉的人不是完全关闭着的。但是,也许米·格尔申臧先生会反驳我说,荣誉是不够“温柔的”感情。那我提醒他关于亚·拉也夫斯基在波尔塔瓦的布尔退斯卡庄园生活的情形,他是由于对沃龙楚娃伯爵夫人的关系而奉圣旨从敖德萨放逐到那里的。他在那里住了三年。米·格尔申臧先生对我们说:“在这期间,霍乱降临到了布尔退斯卡,而他尽一切可能来减轻灾难,他不惜付出劳力而且一点也不为自己着想”(第74页)。关于这件事,正如我们仍然从这位米·格尔申臧先生那里知道的,亚·拉也夫斯基的一个熟人指出过,虽然普希金称他为恶魔<sup>1311</sup>,但是



布尔退斯卡的农奴却称他为天使(同上)。关于这一点我們的作者是怎样想的呢?他所想的就是这样:“他(亚·拉也夫斯基。——格·善·)当时所表现的自我牺牲精神,可能与其說是由于他的利他主义,不如說由于他的一定的性格决定的”(同上)。究竟是怎样的“性格”呢?显而易见,是自我牺牲、利他主义方面的性格。但是既然如此,那末我实在不知道,这里的差别究竟在哪里。我所要說的就是这一点。在一个划分为阶级的社会里,对于评价任何一个“上等”阶级出身的人的道德“性格”的最好最可靠的标准,可以而且应当是他对那些“下等”阶级出身的人的态度,特别是对那些直接从属于他的,或者在某种情况下,甚至成为他的“受洗礼的财产”<sup>1312</sup>的态度。当这一类的“财产”称自己的所有者为“天使”时——当然,假使这里沒有虛假的話,不过我們在这种場合下是不能这样設想的——那末对于这个人,“人类精神的最高領域”是完全敞开的。这是显而易見的,而正因为这样,很明显,米·格尔申臧先生是在自己駁斥自己,正如他在关于恰达也夫的书中所常有的情形一样<sup>1313</sup>。在米·格尔申臧先生那里,事实是經常同他得出的結論頑強地作对的。在这里錯誤的正是他的观点,錯誤的正是他的对于籠罩在某种极像神秘主义的濃霧中的“非理性的东西”的特殊偏好。而很糟的是,他保持这种奇怪的观点:他是一个有才能的讲述者。

我之所以談到这一点,是因为我們現在一般說来开始同“非理性的东西”的关系很不正常。让米·格尔申臧先生这位研究俄国社会思想史的人了解下面这一点是有好处的:在我們这里現在是在“非理性的东西”的旗帜下进行許多这种理論配方的著述工作,它完全不是为了帮助讀者达到“人类精神的最高領域”,正相反!——是为了帮助他們同这种“領域”背道而馳。“非理性的东

西”——这是我們的某些知識分子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所走的一条迂迴的道路。这一历史使命就是：由于感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同現代最先进的因而无疑是最高的意向不一致的本能，制定出現代俄国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sup>①</sup>。好一个讲述者格尔申臧先生，每次当他不得不运用概念时，当他有机会讲述这种或那种一般的思想时，就暴露出这样一个很大的弱点。且看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

他說：“从 1830 年年中起掌握着莫斯科青年最优秀部分的运动，不是理想的局部揭示之一（今后我們的一切社会运动主要是政治运动，都是那种理想的揭示）。它的伟大的特点在于它把整个理想，更确切地說，不是把它的某种附属品，而是把它的最本质的东西当作自己的对象。这些青年們梦想的不是局部地改善道德的或政治的特性，而是一般地恢复人身中的他的神的本性。他們用自己的德国导师的話說：理性統治着宇宙，只有理性才能使人达到自我意識，因此，人的最高义务就在于遵循着像宇宙一样的規律自觉地生活。根据同时代人（安年柯夫）的公正的說法，在这些意图中給人类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第 207 頁）。很好！但是什么叫做“人的神的本性”呢？人就是人，如果我宣布他的本性是神的，那末这不是帮助我理解它的本性，而是使我更难于理解他的本性。其次，假如理性統治着宇宙，假如这种理性使人达到自我意識，那末对宇宙的理解是人的“理性”（虽說不是“理智”）所完全能够达到的，而不論是在自然界或在社会生活中，对于“非理性的东西”都是沒有地位的。

770

由于格尔申臧先生的緣故，我們已經知道，一个人失去了“对

<sup>①</sup> 摘自文集《由防御到进攻》的注释。这是 1908 年春写的。而在次年格尔申臧先生以刊登在臭名远揚的《路标》上的自己的論文《創作的自我意識》表明了，他本人准备积极参加制定上述思想体系。我的話是有根据的。

世界上非理性的東西的力和美”的感覺能力，是不能深入到人類精神的最高領域的。可見，即使對於三十年代的莫斯科的有思想的青年，這種最高領域仍然是不能達到的。但是，另一方面，從同一個米·格爾申臧先生的話中無疑可以得出結論說：這些青年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深入到這些領域。怎樣來理解這一點呢？在這裡怎樣能夠自圓其說呢？我不知道，而且，到目前為止，我想就連格爾申臧先生也是不知道的。

還有一個例子。格爾申臧先生在談到赫爾岑和奧格遼夫在1843年—1846年醉心於自然科學時說：“歸根到底，他們研究得更多的還是社會生活，因而也就是歷史，於是他們兩人同時意識到，歷史應當以人類學為基礎，而人類學應當以生理學為基礎，生理學又應當以化學為基礎；在1845年初，奧格遼夫對赫爾岑說到奧古斯特·孔德在巴黎開的人類學課程以及波特金和弗羅洛夫關於自然科學的研究時，得意地指出，到處都對人類學，即對關於具體的人的科學發生興趣。這確實是擺脫了任何的偏見，——不論是唯靈主義的，或者是唯物主義的。他們找到了脫離邏輯和自然界的兩重性的出路：物質——是向下的抽象概念，正如邏輯是向上的抽象概念一樣；在具體的現實中本來就沒有前者，也沒有後者，而有的是過程”（第226頁）。這又是極不清楚的，甚至可以說，這簡直是不正確的。

實際上赫爾岑和奧格遼夫的發展是從黑格爾到費爾巴哈的發展，也即從唯心主義到唯物主義的發展，這和布爾加柯夫先生是相反的，正如大家知道的後者是從歷史唯物主義發展到奧普汀沙漠<sup>1314</sup>①。說他們始終沒有意識到自己發展的這一方向，這是完全

① 奧普汀沙漠(Оптина пустынь)——據傳說是俄國十四世紀時為一夥強盜的頭目所建立的一個無管轄區，居住着男女僧侶，其中有著名的修道院。——譯者

正确的。同样完全正确的是：他们处在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的这一发展过程中，他们有时搞不清自己的哲学观念，不能使它们具有相当的严整性，因此可以认为，在他们自己和别人看来无论是离开唯心主义（这一术语在这里比格尔申臧先生所使用的术语：唯灵主义适当些）或是离开唯物主义都同样的远。但须知这完全不是出路，不过寻找这样的出路是没有能力的。实际上，在具体现实中既没有逻辑，也没有物质，而只有它们的相互作用，只有过程，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正像白天一样的明白，A和B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以A和B的存在为前提的。既然我们承认了它们的这种相互作用，那末我们也就从而承认了它们的存在。这就是说，我们已经没有任何权利断言，它们“本来就没有”。完全相反：从我们自己的话得出的结论是：它们本来就有。此外，既然我们承认了“逻辑”和“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就替自己封闭了二元论的任何出路，按照二元论，人是由灵魂和躯体所组成，而且在他的这些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一元论完全不是如格尔申臧先生所寻求的那样。唯心主义的一元论把物质（“物体”）看作是“精神的异在”；唯物主义的一元论认为思想是物质的特性（当伏尔泰说：“我是躯体，于是我在思想”时，这位自然神论者发表了完全唯物主义的思想）。可以倾向于唯心主义；可以倾向于唯物主义。但是在它们之间加以选择是必要的，因为第三种主义是沒有的！

现在哲学方面的一知半解者常常重复地说：物体是抽象概念，这是什么意思呢？任何一个概念都是抽象概念，假使我有关于物质的概念，那末物质，作为我的概念，无疑地也是抽象概念。但是问题完全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在我的“我”的范围以外是否有什么和这一“抽象概念”相符合的东西。任何一个哲学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它对这一问题所作的回答。可是格尔申臧先生完全忘记这一点，

只是反复地說：物质是抽象概念；邏輯是抽象概念。空話！空話！空話！

“每一个俄国人应当知道俄国的社会思想史”。格尔申臧先生說出这一思想，也就說出了最无可爭辯的真理。但是連他也不怀疑，我們現时的俄国人执行上述职责是如何的困难。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我国是俄国社会思想的一切潮流集散的焦点。对于这一时代的理解是絕對必要的。而为了理解它，同样絕對必要的是了解对当时有思想的俄国人发生过最大影响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和費尔巴哈的体系。而在我国沒有比現在更不知道黑格尔和費尔巴哈的了。由此得出什么呢？这是很明显的。俄国社会思想史对最主要的、最深刻的潮流是不了解的。而这种情况大概将要长久存在，因为在我們写作的兄弟們那里完全看不出有好好研究黑格尔和費尔巴哈的意向。我們的俄国社会思想史家满足于重复关于这些思想家的流行的意見和陈詞濫調。由此也可以得出結論說，虽然他們当中某些人是有才能的，但他們直到現在還沒能进入到如像烏斯宾斯基的教堂执事所說的“筋脉”<sup>1315</sup>。

如我已經說过的，米·格尔申臧先生属于我国社会思想史領域中有才能的研究者之列。載入他的《青年俄罗斯》中的某些叙述让人讀起来兴致勃勃，特别是关于《弗·謝·別切林》的叙述，讀起来使人爱不释手。当然，这一叙述在讀者中引起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对象具有高度的戏剧性。但是米·格尔申臧先生所特有的生动的、引人入胜的叙述也有不少的作用。然而，显而易见，我們的作者从来沒有进入到我們的社会生活史的“筋脉”。他在哲学部分是无能为力的！說来很可笑，但也不用諱言：格尔申臧先生竟把彼·司徒卢威先生列入俄国的“思想家”之列。这表明他对思想家一般說是研究得多么差。而且只因为他一般地对思想家

研究得很差，他才能写出我在前面所引证过的那些字句，说什么吸引三十年代莫斯科青年对哲学的兴趣，不是把某种对理想的轻视，而是把“它的实体本身”作为自己的对象。赫尔岑早已很好地懂得了——而且在赫尔岑关于俄国革命思想发展的小册子<sup>1316</sup>中已很好地说明了——有思想的青年在当时之所以对哲学发生兴趣，是由于想找寻那些能帮助他们应付周围丑恶现实的方法。从这一——唯一正确的——观点出发也就可以理解我们以后的全部思想运动和意向了。但是在格尔申臧先生看来，这种观点似乎是不够崇高的。他宁愿解释为“理想的实体”，“人的神的本性”和诸如此类的一些模糊的说法（“理想的实体”——这是“非理性的”，但只是在格尔申臧先生所喜欢的意义上说）。在这些模糊的语句中很容易忽略事情的“实体本身”，并且我准备打赌，假使格尔申臧先生什么时候想要研究别林斯基而且希望了解他同斯拉夫派的争论的“实体”，那末他这样做是不能达到“实体”的。

然而我仍然说：读吧，读米·格尔申臧先生的《青年俄罗斯史》吧！它对理解我们的思想发展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事实材料。至于说到我们的发展，那末米·格尔申臧先生是三倍地正确的：“每一个俄国人都应当知道俄国社会思想史”，虽然被各种各样时髦的“非理性”弄糊涂了的现在的俄国“知识分子”要实现这一职责是困难的——呵，是何等的困难！真是，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容易些<sup>①</sup>。然而我们总应当尽力而为！

<sup>①</sup> 此语出自《新约》《马太福音》，第19章第24行及《路加福音》，第18章第25行。——译者

---

## 評米·格尔申臧的 《历史札記》

《历史札記(关于俄国社会)》。

1910年莫斯科版<sup>1317</sup>。

这本书是由从前发表在《欧洲通报》(1908年)和《俄国思想》(1909年)杂志以及轰动一时的《路标》文集<sup>1318</sup>中的論文搜集成的。其中一些論文这里作了修改和补充。整个地說，它是一本值得认真注意的著作。

米·格尔申臧先生属于这样的作家，他們現在非常热衷于做一件事，那就是使我們的相当一部分“多少先进的”知識分子所特有的观点适应于我們的多少觉悟的資产阶级的現在状况。当然，这种状况不能认为是占統治地位的；在我国占統治地位的仍然是死抱住自己的无限权力不放的官僚們。但是資产阶级远远地被推到了，更确切些說，被形势推到了統治的方向，而每个人都感觉到，只要我們的祖国不是注定地成为一个完全停滞的国家，那末資产阶级还将更进一步地，同那越来越充滿資产阶级精神的貴族进行勾結，起来制止官僚的統治。但是人們知道，在任何一个哪怕是不大文明的国家里，統治阶级应当有自己的思想家。米·格尔申臧先生所属的那一群作家很清楚地懂得这一点，而且急如星火地准备扮演俄国資产阶级思想家的角色。固然，这一群人不是从昨天才开始研究这一角色的。对于这一角色的准备早在我們的某些——共

774 实是很多——馬克思主义者“批評馬克思”的时候就已开始了。还在那时候,只要是“有眼可見”的人都会很好地看出,在这以前——当然不是很久——我們的醉心于馬克思学說的一部分知識分子在当时所經歷的思想上的突变具有資产阶级的性质<sup>1319</sup>。但是当时还不是时候!当时可能只是一种“梦想”,这种梦想現在在那些准备充当資产阶级思想家的絕大多数入看来是完全“沒有意义的”<sup>1320</sup>。因此,虽然这些候选人在当时也力图“倒退”(“倒退到拉薩尔”,“倒退到康德”等等),但是他們当中未必有誰預見到,后来的事变使他們“倒退”到多么惊人的地步。如果从前他們当中有些人可以号召我們“倒退到拉薩尔”,那末現在他們不得不請有教养的俄国人倒退到斯拉夫派去。然而,大家知道,由拉薩尔到斯拉夫派——比方說,到阿·斯霍米亚科夫,伊·瓦·基列也夫斯基,尤·費·薩馬林——这是一段巨大的距离。不言而喻,要走完这段巨大的距离,不急如星火是不行的。

米·格尔申臧先生也正是号召我們倒退到斯拉夫派去。但是,当然,誰认为米·格尔申臧先生为了号召我們倒退到斯拉夫派去而竭力复活斯拉夫派学說,那是极其錯誤的。不是的,整个說来,这一学說对于我們的时代太陈旧了,而米·格尔申臧先生是一个太現代化的人,他不会戴上斯拉夫派的帽子。他从斯拉夫派那里借用的不是他們的实际綱領,不是他們的俄国历史哲学,不是他們的对正教的忠实,而是他說的他們的学說的核心(第139頁)。他說:

“在从別林斯基起到今天为止的我們的自由主义知識分子看来,斯拉夫派具有两个特点:狂热地忠实于正教和政治上狹隘的保守主义。然而这两个特点在斯拉夫派中是偶然的,因为正教不是从它的带有邏輯必然性的形而上学得出来的,而他的政治上的保守



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斗争的激烈性，由按照黑格尔的說法，連  $2 \times 2 = 4$  在敌人口中也变成不正确的、不道德的那种情緒所决定的。斯拉夫派本身思想中存在多少保守主义，只根据它竭力保卫传统的道德合法性而反对抽象的智慧侵犯的程度而定（第139頁，着重号是米·格尔申臧先生加的）。

你們看到：米·格尔申臧先生不贊許“政治上狹隘的保守主义”，但同时他又承认抽象的智慧所侵犯的“传统的道德合法性”。这很好，这正是我們的資產階級現在所需要的：不要太向右（官僚和黑帮在那里）但也不要太左（完全否认传统的道德合法性的“目无法紀的人”在那里）。人們知道，在我們的資產階級的成員中，不仅有正教的信仰者。所以斯拉夫派对于正教的特殊的忠实性現在是陈旧了，因而格尔申臧先生毫不动摇地拒絕了它。同样，人們也知道，我們的資產階級在还没有获得新的政治权以前，将不能成为完全的統治階級。所以格尔申臧先生也同样坚决地否定斯拉夫派的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一般地說他是不喜欢极端的。他在自己的《历史札記》中所辯护的是旧的东西，但却永远是新的 *juste milieu* “中庸之道”，模稜两可。我們的社會思想的未来历史家当然不会不注意下面这种情况：現在在我們这里，那些及时地或不及时地传播自己对“小市民”的仇恨的人，特別向往“中庸之道”。但是这是順便說說而已。这里我要指出的是，在存在着我們的知識分子所特有的“传统”的时候，捍卫中庸之道是一件极其困难和麻煩的事情。无怪乎格尔申臧先生使自己的讀者相信，“我們的政論作品的历史，从別林斯基以后开始，在生活見解方面，情况是非常可悲的”（第168頁）。为了替“中庸之道”辯护，我們不得不拖出形而上学的重炮。那些批評馬克思的人，即号召我們“倒退到康德”和一般地“从馬克思主义倒退到唯心主义”去的人已經模糊地感觉到了这一

点。但是康德和西欧的唯心主义者仍然是不十分可靠的。于是謝·布尔加柯夫先生就“自觉地回到儿童时代的信仰,即信仰釘在十字架上的上帝和他的福音,把它看作是关于人类和人的生命的完全的最崇高的和最深刻的真理”(見他的論文:《知識分子和宗教》,《俄国思想》1908年,3月),而格尔申臧先生回想起了斯拉夫派,甚至回想起了果戈里的《与友人书簡选》。

按照格尔申臧先生的意見,斯拉夫派和西欧派之間的著名爭論的全部实质就在于,当斯拉夫派的綱領宣称“个性的內在的安排”的时候,西欧派的綱領却归結为“社会形式的改善”(第137頁,着重号是格尔申臧先生加的)。

篇幅不允許我們长談我們的作者所提供的这两个綱領的特色。我們不得不只說一点点。格尔申臧先生深信,思想正常的人沒有宗教是不行的。他所以重視斯拉夫派,是因为他們早就表示过类似的信念。“个性的內在安排”应当正是在宗教的标志之下进行:“每一个人的任务归結为,正确地安排他自己的精神,就是說,彻底地意識到自己的作为宇宙的或宗教的使命的道德义务并集中自己的全部精力使它付諸实现;人的社会使命就在于,个人帮助别人安排他們的精神并和其他人一起来促进这一般生活的这种安排,在这种生活下面,这一基本的个人的目的能够很容易地为社会的所有成員所达到”(第135—136頁)。按照格尔申臧先生的話,由此得出的結論是,有宗教思想的人完全不否认社会活动和社会改革的意义:“但是他严格地使社会服从个性,而且使社会或政治制度的改善取决于个人的精神完善的任务”(第136頁)。在“信仰坚定的西欧派或理性主义者”看来情况就完全不同。

“他在世界上沒有看見任何的合理性,因为在他看来,支配世界的唯一規律是机械的因果关系的規律,而且他把人类的历史生

活也隶属于这一規律。他相信严格地服从因果規律的人类的邏輯意識是无限制地发展的。可見,他认为占第一位的,在个性中是意識,在历史中是作为个人意識的某种因果制約成就的总和的社会制度。由此产生这一綱領的所有細節。个性的精神世界完全被放在一边,作为无条件地从屬的領域;不論是在自己內部或者在別的方面对它直接影响都是沒有任何意义的,而且也是沒有可能的,因为它是按照因果关系的铁的規律建立起来的;人的全部精神生活是外在条件的机械的产物。因此,要把生活提到更高的阶段只能采取一个办法,就是改变个性在其中生存的社会条件,也即邏輯理性所指使的这种社会改造。这就是說,社会活动被认为是人的唯一合法的責任,完全不必注意安排自己的精神,同时被宣告为这一活动的对象的,仍然不是社会生活的精神領域,而是它的自觉地确定了的形式”(第 136—137 頁)。

这种宗教世界观同理性主义世界观的对立也是米·格尔申臧先生的书的主要思想。任何一个稍稍明白事理的人都会看出,这种对立完全沒有任何重大的根据。实际上,只要讀一下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說《怎么办?》(这里面包含有六十年代最先进的和最彻底的“西欧派”的道德的完整規范)就可以看出,米·格尔申臧先生是如何不成功地大肆誹謗“西欧派”,說他們完全不注意安排自己的精神。这部小說的人物——当然也就是它的正面的典型——不仅沒有忽視有关安排自己的精神的問題,即个人道德的問題,而且相反地,是以最大的注意来研究它們。像罗普霍夫,吉尔沙諾夫和薇拉·巴芙洛夫娜这些典型人物对于这一类問題比他們同时代的西欧先进人物要关心得多。我們更不用說拉赫美托夫类型的人物了。

其次,米·格尔申臧先生似乎并不缺少某种哲学修养。所以

在他那里非常奇怪地遇到这样的思想：假使人的精神世界是“按照因果关系的铁的规律建立起来的”，那末这种或那种倾向对它的“影响”就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可能。须知“影响”本身可能服从于这一铁的规律。而且不服从这一规律的这种影响是可能的和可以想象的嗎？对于这一问题所有古典的德国哲学——請讀者注意，是唯心主义的，完全不是唯物主义的哲学——都是坚决地否定的。但是，格尔申臧先生显然对于这一问题肯定的。这种差别是从那里产生的呢？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們在这一走馬看花的短評中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我們只限于指出一个无可爭辯的历史事实：复辟时代——即急急忙忙地使法国知識分子的观点适应于因革命而发生变化的法国资产阶级的地位的时代——的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在解决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问题上同格尔申臧先生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在肯定的意义方面是很相似的。从社会学家的观点看来再沒有比这种类似更有意思的了。

最后，需要对现代社会思想发展史丧失任何概念，才能設想，“西欧派”（理性主义者也一样）之所以“在历史中”把社会制度提到第一位，是因为他們錯誤地完全不注意关于安排自己的和別人的精神的问题。第一，格尔申臧先生自己是与此相矛盾的，因为他断言西欧派把社会制度看作“某种个人意識的因果制約成就的总和”；须知“个人意識”也是属于“精神”領域的，如果我們沒有弄錯的話。第二，“西欧派”不仅过去而且現在仍然把“社会制度”看作  
778 “某种因果制約成就的总和”……不仅“个人意識”，而且道德也是如此。馬克思——他是十九世紀所有“西欧派”和理性主义者当中最有天才的——在同布魯諾·鮑威尔爭論时就已写道：“既然从唯物主义这詞的意义上來說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說，人的自由不在于有逃避某种行为的消极能力，而在于有表現自己的个性的积极的

可能性，那就应当不因为个别人的犯罪行为懲罰他們而应当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根源并在社会中給予每个人的活动以自由的場所。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須使环境成为无愧于人的环境”<sup>1321</sup>。俄国的西欧派和理性主义者，例如車尔尼雪夫斯基<sup>1322</sup>，杜勃罗留波夫和他們的同志們也都发表了同样的意見。但是格尔申臧先生装出一点也不知道这一点的样子。現在他必須唱关于我們的“西欧派和理性主义者”的“粗暴的”唯物主义的陈調。

根据以上所說的一切，再要指出下面的情况几乎是沒有用处的，即当格尔申臧先生从自己的观点出发，給“每个个别人的任务”即人的社会使命下定义时，他的思想由于极端含糊不清而变得沒有內容：“彻底地意識到自己的道德义务”和“集中自己的全部精神力量使它付諸实行”，当然，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不单是斯拉夫陣营的人；同样，正如我們剛才所看到的，沒有什么东西能妨碍“西欧派”正是为了“安排精神”而改造社会制度。可見，“斯拉夫派”和“西欧派”之間的全部差別是：前者从宗教的观点看自己的活动，后者則从理性的观点看自己的活动。完全看不出为什么我們应当要前者的观点而不要后者的观点。且慢。在另一个地方这是看得較清楚的。米·格尔申臧先生在这本书第 144 頁上发表了下面这一完全未被证实的論点：世界上沒有比宗教思想更为革命的力量。然后他又意味深长地补充說：“如我前面所說的，虽然宗教思想傾向于謹慎地对待传统，珍視传统中群众精神体验的合乎規律的总结，并且实质上沒有重視外部的改造，但是它必然要成为現存政治制度的反对者，因为这一制度直接地束縛个性的精神自由”。

779

这也就是 des Pudels Kern<sup>1323</sup>，格尔申臧先生的“宗教”思想是同現存政治制度相对立的，但同时它也謹慎地对待传统——当然是主要的！——“实质上不重視外部变化”。这样的“思想”不会像

社会主义那样胡鬧。一句話，这正是現在的資產階級所需要的思想。这是 *juste milieu*，中庸之道，模稜兩可的思想。而人們却把这种思想放在素油中，两眼望天，正在把它奉獻給我們<sup>1324</sup>。

## 評瓦·雅·博古查爾斯基的 《亞·伊·赫爾岑》一書<sup>1325</sup>

《亞歷山大·伊萬諾維奇·赫爾岑》。

亞歷山大·伊萬諾維奇·赫爾岑小組出版。

1912年聖彼得堡版。

不久前為紀念亞·伊·赫爾岑誕生<sup>1326</sup>一百周年而引起了對赫爾岑的研究，但根據這位卓越人物在俄國社會思想史和俄國社會發展史中所起的作用來說，這種研究比預期的要少一些。而且就是已經出版的東西也遠不能令人滿意。例如博古查爾斯基先生的著作（其名稱我已寫出）是完全失敗的。凡是想靠博古查爾斯基先生的結論和指引來了解赫爾岑的人，都是會上當的——應當坦白地說出這一點！形象是在他的腦子裡編造的，很少像真正的赫爾岑。

例如，博古查爾斯基先生說：

“有些作家把赫爾岑接受聖西門學說這一事實，看作他的世界觀已經完全確定，認為露斯已經出現了一個社會主義學說的信仰者，當然是它的發展的空想階段的信仰者，然而卻是一個社會主義者。這是完全不正確的”（第32—33頁）。

實際上這正好相反，是完全正確的。我們試回憶一下赫爾岑本人關於這點是怎樣說的。

在《往事與回憶》中他回憶說：“聖西門主義成了我們的信念的

781 基础而且在本质上是“不变的”<sup>①</sup>。

这很像“某些作家”关于他所說的、而博古查尔斯基先生宣布为完全不正确的东西。

在另一地方也是这位亚·伊·赫尔岑写道：“我不是从昨天起成为社会主义者的。三十年前我就已最崇高地被尼古拉·巴夫洛維奇<sup>②</sup>确定了社会主义者的称呼——*cela commence à compter*<sup>③</sup>。在二十年后，关于这一点我在一封您所知道的信中提醒过他的儿子<sup>④</sup>，又隔十年，现在我告诉您，我绝对看不出文明世界有摆脱死胡同的出路，除了老年人的昏迷不醒或社会变革以外，——突发的或逐渐进行的，从人民的生活中生长起来的，或者是由理論的思想帶給它的，——都是一样”<sup>⑤</sup>。

这又完全像“某些作家”关于赫尔岑所讲的，而且也是博古查尔斯基先生所不喜欢的东西。这是怎么回事呢？也许连亚·伊·赫尔岑自己也属于传播关于赫尔岑的“完全不正确的”消息的“某些作家”之列吧？这里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常常有这种情况，一般人，尤其是作家們，关于自己的思想发展的过程得出完全不正确的意見或者关于这种发展过程故意地說谎。但是博古查尔斯基先生当然不会疑心赫尔岑說谎。这就是說，只能設想，他把对自己的精神历史的完全不正确的看法硬加在赫尔岑身上。根据是什么呢？請听罢。

① 《赫尔岑全集》，日内瓦版，第6卷，第197頁1327。

② 指沙皇尼古拉一世。——譯者

③ 〔而这也意味着某种东西〕

④ 指亚历山大二世。这封信刊登于1855年《北极星》第1卷上。

⑤ 《給反对者的信》(即給尤·費·薩馬林的信——格·普·)。第一封信(1864年11月15日)。見《钟声》，《赫尔岑論文选》，列·吉雷米罗夫主編和出版，第513頁1328。



“赫爾岑不僅在開始而且在整個三十年代都是在熱烈地探索着的赫爾岑，而不是最後地停留在某種東西上的赫爾岑。這不僅不是輕視他，相反地，是更加抬高他，使他的本來就很深奧的靈魂更為加深”（第 33 頁）。這就是博古查爾斯基先生的斷語所憑藉的全部根據。再往下幾行，就是用另外的一些話來重復同一的論據，然後博古查爾斯基先生則突然請讀者“回到赫爾岑的外表生活的事件”（同頁）。這樣，他的整個的論據便歸結為，假如赫爾岑在三十年代期間不是社會主義者——即使是“發展的空想階段”，——而單只是“熱烈地探索着的赫爾岑”，那末他就會博得博古查爾斯基先生的好評。這一點，你們可以看出，並不是完全令人信服的。

且慢，我們的作者在自己的書中的第 37 頁，還提出一個論據。那里談的是赫爾岑在被捕以前他和後來成為他的妻子的娜·亞·札哈林娜的會見。熱烈的青年憤怒地對着少女說到奧格遼夫的被捕，而少女則竭力把他的思想轉移到上帝方面。博古查爾斯基先生在引證這一談話時說：“這就是全部的談話，假如赫爾岑在那時候<sup>1329</sup>已經是像人們常常描繪他的那樣（對博古查爾斯基先生應當說，像他自己所描繪的那樣。——格·普·），這種談話未必會在‘聖西門主義者’的靈魂中留下強烈的痕迹。然而當時情況正是這樣。原因在什麼地方呢？原因正是：赫爾岑在這時候是一個還遠沒有形成成熟見解的人。他的身上有許多東西在沸騰澎湃，但卻很少最後穩固確定下來”。

782

奇怪！同娜·亞·札哈林娜的談話之所以在赫爾岑的靈魂中留下強烈的痕迹，只是因為當時在他身上很少穩固確定下來的東西。假使他是聖西門主義者，那末痕迹會微弱得多。為什麼呢？難道關於上帝的談話不能對一個聖西門主義者產生印象嗎？博古查爾斯基先生是否知道，一般說來所有的聖西門主義者都是信仰

宗教的，而且其中有很多甚至达到了宗教狂的程度呢？此外，同娜·亚·札哈林娜的谈话必然对赫尔岑产生有力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她提醒过他必须作自我牺牲，并且补充说，应当善于违反苛求的群众一时的兴奋情绪。一个等待着逮捕，而且除逮捕之外，还等待着来自近亲的不同年龄的“善良的”老头子和老太太方面的一系列攻击的青年，是不会忘记这种谈话的。他们攻击说：“叫父母伤悲，断送自己的前程”，如此等等。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青年的圣西门主义者在类似的情况下会比那种“很少最后稳固确定下来的”青年人的感受要少一些。谁不知道，例如，法国的圣西门主义者的感受是多么强烈？值得注意的是，正是那些有着最“稳固确定下来”的观念的人具有最大的感受力。

一句话，博古查尔斯基先生企图推翻赫尔岑关于自己的精神发展进程的说法的正确性，应当认为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再说。大家知道，赫尔岑在他的生活中的各个时期以及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诵读福音书使他的心灵感到平和。关于这一点我们的作者说，“基督教的本质”（读者请注意这一点）对于普希金、托尔斯泰和陀斯妥也夫斯基都有过巨大的影响。他甚至从普希金的一首诗中引证了片断，那首诗写道：什么时候和为什么“诗人在神圣的恐惧中谛听六翼天使的竖琴”。在这一片断之后的便是博古查尔斯基先生的如下看法：“类似的东西也在俄国最伟大的评论家的心灵中出现过；赫尔岑后来不仅彻底离开了任何的‘教条’，而且离开了从前的信仰的实质，但是他却从中带走了某种东西，而且带到了‘彼岸’，带走的不是理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带走的是，‘他毕生所奉行的那一东西’”（第39—40页）。

这是令人感动的。但是不完全清楚。赫尔岑“后来”离开了从前信仰的实质。博古查尔斯基先生是这样说的。而这是正确的。

但這是什麼樣的信仰呢？顯然是基督教的信仰。在基督教的實質和它的本質之間有什麼差別呢？還是顯而易見，沒有任何差別，都是一樣的東西。而假使這是一樣的東西，那末結果是，甚至在赫爾岑離開了“基督教的本質”以後，這種本質仍然影響了他，正像有個時候影響了普希金，後來又影響了陀斯妥也夫斯基和托爾斯泰即影響了這樣一些沒有離開它的作家一樣。

這是奇怪的。

大受感動的博古查爾斯基先生竟沒有覺察到這種奇怪性，這也是奇怪的。更奇怪的是，赫爾岑“後來”——在他流放諾夫哥羅德的時候——懷着喜悅的心情讀了費爾巴哈的名著《基督教的本質》，於是他也屬於那些把極其確定的觀念同“基督教的本質”這個詞聯繫起來的人之列了。費爾巴哈說，基督教的本質是心的本質。基督教徒把屬於他自己的心的那些特性加之于自己的上帝。他把它們異化，把它們轉移到虛構的實體上。但是為了能夠作到這樣的轉移，人的理性應當睡覺。費爾巴哈補充說，“睡眠是打開宗教的秘密的鑰匙”。在理解了自己對“基督教的本質”的這種態度以後，赫爾岑“後來”，即當他的理性蘇醒以後，自然不會處在它的影響之下。完全相反，他是消極地對待它。他寫信給薩馬林說：“我們很現實地站立在我們的很現實的基地上；基地通常是在腳下的；在您的頭上有另一個基地；您比我們富有，但是可能，因此地球上的物體在您看來是相反的”<sup>①</sup>。把地球上的物體描繪為相反的樣子，這是任何一種宗教其中也包括基督教的本質。赫爾岑既然不承認人的頭上存在着“另一個”基地，因而也就不能接受“基督教的本質”對他的影響。而在這一點上他不像普希金、陀斯妥也夫斯

① 《鐘聲》論文集，第518頁1330。

基、托尔斯泰和其他信教的作家，他同他們是有区别的。这就更加有必要指出，现在一股神秘的气流通过我們的文学，把大量极端有害的混乱思想带到讀者的头脑中；证据是我們今天有很多的“宗教寻求”。在反动的时代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善良而軟弱的人們在失去脚下的现实基地的时候，便竭力相信在他們的头上存在着“另一个”基地，以此来安慰自己。博古查尔斯基先生应当清楚地說明，赫尔岑誦讀福音书所得到的調和的印象，是和神秘的六翼天使的豎琴的神秘的声音在普希金的灵魂里所引起的“神圣的恐惧”毫无共同之点的。正如我們所极端遺憾地看到的，他并沒履行这一真正的和清醒的讲述者的职责，而是恰恰相反。

由于篇幅所限，我不能指出博古查尔斯基先生的所有的非常多的极其可悲的差錯。我不得不只談不多的几个例子。除刚才引证的以外，我还加上一个远非不重要的例子。

博古查尔斯基先生写道，当赫尔岑住在尼斯的时候，他曾頑强地研究过如下的問題：将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客观保证在哪里。这种研究使他得出的結論是：对于西欧說来，社会主义制度在西欧也許可能建立，也許不可能建立。但是無論在这种情况下或在另一种情况下，欧洲都不会不再是市民社会的。正如博古查尔斯基先生所确信的，这是赫尔岑的中心思想。他认为欧洲的工人是将来的市民。博古查尔斯基先生深思地問道：“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赫尔岑认为‘社会主义’思想有两个問題：一个是归結为生产工具社会化的經濟問題，另一个是精神問題，照这个詞的最高意义來說也就是自由个性問題”（第 118—119 頁）。

按照自己的习惯，博古查尔斯基先生也沒有用什么东西来证实自己的这种“意味着”的說法，这就是說，这一“意味着”毫无根据。讓我們对这一点稍为分析一下。我們再听一听赫尔岑自己

的話。

他說：“關於歐洲的將來的問題，我不認為已經徹底解決了。但是……我應當說，不論是近的或者是好的出路我都看不到。……我不能預料沒有可怖的流血鬥爭市民社會會接近沒落和舊的國家制度會得到革新”<sup>①</sup>。

“這意味着什麼呢？”——我反過來要問。看來事情是這樣，赫爾岑不認為市民社會的勝利無論如何都是有保證的。完全不是！他認為市民社會可能會沒落。但是他認為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流血鬥爭是這種沒落的必要條件，但他覺得這一條件太費力而且還是太遙遠的事。因此，——但只是因此——他也就說，在市民社會占統治地位的現代局勢下，他看不出有任何近的和好的出路。這完全不是深思的和深受感動的博古查爾斯基先生在其中發現了的那種東西。

785

而這裡還有未被博古查爾斯基先生所發現的幾行：“我們的問題是這樣地擺着的：它們能夠沒有暴力震動而用一般的社会——國家措施來解決”<sup>②</sup>。

而這“意味着什麼呢？”赫爾岑對俄國的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他對下面問題的堅定信念的：我們俄國的問題能夠沒有“震動”而得到解決；“震動”太過吓壞了他這樣一個在空想的社會主義學校中受到培養的人。這就是這所意味着的東西。而這是一個新的證明，它表明眾所共知的赫爾岑對西歐的失望是完全沒有被博古查爾斯基先生之類的我們現代的自由派哲人所理解的。

按照赫爾岑的意見，假如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取得的流血的勝利會導致市民社會沒落，那末很明顯，博古查爾斯基先生所賦予

① 《赫爾岑全集》，第10卷，第285頁。首重號是赫爾岑加的1331。

② 同上書，第292頁1332。

它的二元論，——一方面是經濟問題，另一方面是人的自由問題——在實際中是不存在的，而假使曾經存在過，那末也完全不是在我所考察的他的書中所提出的那些邏輯前提下。赫爾岑感覺到了當時社會主義者所期望的空想的基礎不能令人滿意，他為社會主義尋找了科學的基礎。他自己的思想方式在這方面是過渡的。在這裏可以看出赫爾岑的動搖。既然他仍然是社會主義者——空想家，那末他實際上是能夠像博古查爾斯基先生一樣把經濟問題同人的自由問題分割開來的。然而，既然他接近了科學社會主義觀點，——而他接近這種觀點的時候，正好在為將來實現社會主義找到了客觀保證的時候，——所以這種把兩個不可分割的問題分割開來，對他說來不論在邏輯上或在心理上都是不可能的。那時候他已變成一元論者，其中包括在社會主義方面。而這對他說來是極為容易的，因為他最初是經過了一元論者黑格爾的極好的教育，以後又經過了一元論者費爾巴哈的很好的教育。但是博古查爾斯基先生絲毫不承認這一點——因為他不知道也不願意知道。

786 最後，——談一件很可笑的事。博古查爾斯基先生沒有找到足夠有力的話來頌揚亞·伊·赫爾岑，而他，從赫爾岑值得大大贊揚這一意義上說來，當然是對的；但是赫爾岑是俄國民粹主義的創始人。這一點是同時對民粹主義採取完全否定態度的博古查爾斯基先生所承認的。他在自己的一本著作《十九世紀七十和八十年代政治鬥爭論叢》（莫斯科，1912年）中，鄙視民粹主義為純粹“知識分子的”和絕對脫離生活的運動。博古查爾斯基先生在上述這本書中說，“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得罪人的和幻想的，是浪漫主義的和空想的，它在自己的革命主義中一定會把自己化為烏有，如果不是俄國統治階層習慣於害怕國內出現了種種簌簌之聲的話”（第2

頁)。假使相信博古查爾斯基先生，那麼就會以為他所極高度贊揚的赫爾岑卻是一個異常可憐的運動的思想家。怎能不驚嘆：“可憐的赫爾岑！”幸而博古查爾斯基先生對革命的民粹主義的評價是完全不正確的，他把它看得甚至比他同時代的俄國自由主義還要低得多。可見“可憐的”一詞不應當用在赫爾岑身上，而正應當用在博古查爾斯基先生身上。





---

---

## 注 释

本版中方括弧内的外文译文、标题等等，都不是出于普列汉诺夫的手笔。

- 1 1890—1892 年間，普列汉诺夫以論文形式发表了他的著作《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这些論文刊載在四期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杂志上，这家杂志起先在伦敦出版，而后来則在日内瓦出版。收入本卷的是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第 1 期(1890 年)上的第一篇論文，主要闡明車尔尼雪夫斯基的世界观。

在这部著作发表前不久，由于車尔尼雪夫斯基的逝世，考茨基建議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合作，为狄茨出版社出版的《国际丛书》写一本論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小册子。普列汉诺夫在答复时建議为《Neue Zeit》(《新时代》)翻譯他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上的著作。經過略加刪节后，这一著作就刊登在《Neue Zeit》，第 8 年，1890 年第 8 期第 353—376 頁和第 9 期第 404—442 頁上。在这以后不久，考茨基建議普列汉诺夫以德文出版論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收入将于 1892 年在《社会民主党人》上发表完毕的作品。普列汉诺夫表示同意后，便为該书德文版写了一篇專門的导言(在俄文手稿中，它被称为“第一章”)，对五十一—六十年代的俄国政治和經濟状况作了概括的評述，还对德国讀者所不了解的某些論点做了一些补充的說明和發揮。德文版的标题为《N. G. Tschernischewsky. Eine literar-historische Studie》(《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文学的和历史的研究》)，于 1894 年由斯图加特的狄茨出版社出版，該书是发表在四期《社会民主党人》上的那些論文的譯文和部分的闡述。該书的发表引起了恩格斯的兴趣，他在 1894 年 5 月 21 日写信給普列汉诺夫說：“預先感謝您寄来您的車尔尼雪夫斯基一书，我迫

不及待地等待着它”（《马克思、恩格斯和俄国政治活动家的通信集》，1951年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327页）。

在普列汉诺夫全集第5卷中，这篇导言是从1894年德文版译出的，而普列汉诺夫纪念馆则保存着这篇导言的俄文原稿，因此在普列汉诺夫全集中这篇导言是经过两道翻译的。并且普列汉诺夫全集的编者一点也没有谈到对德文版的增补，也没有发表这些材料。其实不仅在德文版中有这些增补，而且在普列汉诺夫的档案里还保存着这些增补的俄文稿。在普列汉诺夫逝世后发表于《普列汉诺夫的遗著》第1集第86—114页的这两篇手稿，都收入了本书。

在全集中发表的这篇导言的译文，和普列汉诺夫的手稿有相当大的出入。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克里切夫斯基的德译不够确切。考茨基在写信给普列汉诺夫谈到这个译本时关于这一点补充说：“可是，不论译文比原文低劣多少，德文版终究是对我们文学的一个宝贵的贡献”（载《“劳动解放”社》，第5集，第212页）。至于说到增补，那末无论在德文版中，或是在俄文稿中，它们都是和加以补充的个别地方自然地连接着的，然而增补的结尾虽与德文版的后文相衔接，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却不能与发表于《社会民主党人》的俄文原文相衔接。因此，我们就不能把增补插入论文中，而只能在文后把它们单独发表。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书德文版导言和增补，是普列汉诺夫在1892—1893年间写成的。在稍早的时候，普列汉诺夫还为波兰的社会主义杂志《号角》写过一篇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这篇文章根据一部分保存下来的手稿发表于《普列汉诺夫的遗著》第1集第114—127页。普列汉诺夫在答复这家杂志给他的信（这封信没有保存在档案里）时写道：“这正是我目前所从事的工作。我已经……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杂志写了一篇关于我们这位伟大启蒙运动者的长文。它正被译成德文，以供《Neue Zeit》杂志（你们当然知道这家杂志）刊用”（同上书，第241页）。从这篇文章的手稿中可以看出，波兰人对两个问题感兴趣：（1）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俄国社会主义史上的意义，（2）他对波兰问题的态度。这篇文章就是论述这两个问题的，它有很大一部分重复了本卷发表的、刊载在《社会民主党人》第1期上的那篇论文。

1897年，普列汉诺夫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上的论车尔尼雪夫斯基

的文章，由巴卡洛夫译成了保加利亚文，并且在瓦尔那出版了单行本。

保存在档案里的另一篇学术论文的手稿写得较晚，它大概是1899年普列汉诺夫为纪念车尔尼雪夫斯基逝世十周年而写的。这篇学术论文，或更正确地說，学术论文提纲，在他逝世后发表于《普列汉诺夫的遗著》第6集第186—196页，其中包括对《社会民主党人》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的扼要的叙述以及引自这篇文章的引文和摘录。这篇学术论文所发挥的思想和上述第一篇文章所发挥的思想是相同的。也许可以指出，在评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唯物主义的提法上有某些不同。他在文章里說：“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唯物主义，在他的‘人本主义’观点中要比在他的历史观点中更明显得多”。而他在学术论文中則說：“他的唯物主义更多地表现在他的人本主义观点和美学观点中”（同上书，第190页）。

1908年，普列汉诺夫重新研究他所喜爱的题目，这一次是写长篇著作《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1909年）（参阅本卷第910—912页的注218）。

在本卷中，1890年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第1期上的论文，是根据与该文保存下来的部分手稿核对过的原文排印的；1894年该书德文版的导言和增补是按普列汉诺夫的原稿排印的。

编辑部通常遵照按时间先后排列材料的原則，但也认为在发表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时作某些不按时间先后的排列是适宜的。写于1894年的德文版导言，排在1890年《社会民主党人》上发表的论文之前，因为这篇导言对这位伟大的作家和革命家进行文学社会活动时的社会政治局势作了概括的评述，所以自然应当放在阐明他的世界观的论文之前，正如在德文版中导言放在论文之前一样。

在发表普列汉诺夫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篇著作和其他著作时，普列汉诺夫根据《同时代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著作第一版所引用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著作的引文，通常都按普列汉诺夫的手稿和他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的生前版本排印。引自车尔尼雪夫斯基著作的引文中的笔误和错字，在本文中都无保留地加以纠正了。本版刊载的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中摘自车尔尼雪夫斯基著作的引文，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十五卷本）（1939—1953年出版）之间的出入，大多数在注释中没有说明，但是在指出后面这种版本的引文出处以前标明“参阅”的字样。当普列汉诺夫

- 根据車尔尼雪夫斯基著作的旧版本所做的引文不能确切表达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論点和意見的原意，而新版本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又已經加以更正时，更正的引文放在三角括号〈 〉里。——第1頁。
- 2 安·帕·扎勃洛茨基—捷夏托夫斯基的札記《論俄国的农奴制状况》，发表在他的长篇著作《基謝辽夫伯爵及其时代》（1882年圣彼得堡版，第4卷）一书的附录中。——第8頁。
  - 3 根据国民教育大臣希林斯基—希赫馬托夫的報告，1850年在大学中取消了哲学課，邏輯学和心理学方面的課程則由神学教授担任（《国民教育部決議集》，第2卷第2部，1864年圣彼得堡版，第1043頁）。——第11頁。
  - 4 这里指的是1864年1月1日签署的“省县地方自治机构条例”。——第12頁。
  - 5 屠格涅夫的信是寄給NN轉交赫尔岑的，信中談到把关于召集全俄縉紳會議的信呈交亚历山大二世（參閱《卡維林和屠格涅夫致赫尔岑的信》，1892年日内瓦版，第153頁）。——第14頁。
  - 6 參閱博馬舍：《狂欢的一日，或費加罗的婚姻》，第5幕第3景（參閱博馬舍：《費加罗的婚姻》，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144頁）。——第17頁。
  - 7 阿克雪里罗得的《Das politische Erwachen der russischen Arbeiter und ihre Maifeier von 1891. Zum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feiertag》（《俄国工人的政治觉醒和他們的1891年的五一节。論国际劳动节》）一文，发表于《Neue Zeit》（《新时代》）杂志，第10年，第2卷，1892年，第28—30頁。——第17頁。
  - 8 引自普希金的詩《致俄国的誹謗者》。——第18頁。
  - 9 往下在三角括号里的原文引自普列汉諾夫为恩格斯的《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一书所写的第二条注释（參閱本选集，第1卷，中文版，第507—509頁）。他在手稿中沒有写上这几頁，但向譯者克里切夫斯基指明要把这几頁包括在本文內。——第19頁。

- 10 普列汉諾夫在《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一文(參閱本選集第1卷,第470—501頁)中,詳細地談到這一點。——第20頁。
- 11 这是別林斯基在1841年3月1日給波特金的信中的一个用語(參閱《別林斯基書信選》,第2卷,蘇聯國家文學書籍出版社1955年版,第141頁)。——第21頁。
- 12 七十年代的革命民粹派就持有这样的观点,如“拉甫罗夫派”认为,农民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应该很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因此他们从事于社会主义的和平宣传,而“暴动派—巴枯宁派”则认为,只有随后轉为人民起义的农民暴动的組織,才能引起社会主义革命。——第21頁。
- 13 这里指的是“民意党”和俄国布朗基主义者特卡乔夫的信徒們。——第22頁。
- 14 德国的哈克斯特豪森男爵在俄国作了一次旅行,他在1870年以俄文出版的《俄国国民生活内部关系,特别是农村机构的研究》一书中,贊揚了村社,把它看成是巩固农奴制的手段。馬克思、恩格斯和車尔尼雪夫斯基都尖銳地批判过哈克斯特豪森的反动結論。——第22頁。
- 15 參閱馬克思:《費尔巴哈論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頁)。——第22頁。
- 16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79頁。——第23頁。
- 17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的第一个俄譯本出版于1864年,但在这以前,人們在俄国从庫托尔迦教授的讲課(1860年)和发表在《讀書文庫》和1861—1862年的《时代》杂志上的論文中,已經知道了达尔文的思想(參閱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的参考书目提要,1937年俄文版,第573頁)。——第23頁。
- 18 这位年老貴妇是娜塔莉婭·基里洛夫娜·扎格列日斯卡婭(參閱普希金:《同娜·基·扎格列日斯卡婭的談話》,載《普希金全集》,第12卷,蘇聯科學院出版社1949年版,第174頁)。——第24頁。

- 19 参阅《卓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4卷，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49年版，第456页。根据这个版本，引文的结尾是这样的：“……虽然到那时候几乎所有与我们同时生活的人都已经被遗忘，人们还会怀着感激的心情回想起我们”。——第25页。
- 20 参阅以下报刊对卓尔尼雪夫斯基逝世的反应：《欧洲通报》，1889年第11期第467—468页；《俄国财富》，1889年11月号第191—196页；《历史通报》，1889年12月号第644—651页；《俄国往事》，1889年11月号第499—502页；《北方通报》，1889年第11期，加上新闻黑框的不打页码的扉页。  
在《俄罗斯思想》上根本没有登新闻。——第25页。
- 21 戒尺(Ферула)——可作严厉的监督、监视解。——第26页。
- 22 这里指的是“劳动解放”社在国外出版的不定期杂志《社会民主党人》第1期。——第27页。
- 23 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只有一部在国外出版的卓尔尼雪夫斯基全集，即全集第一版，爱尔皮丁公司出版，第1—5卷，维维1868—1870年。它虽然称为“全集”，实际上却远没有包括卓尔尼雪夫斯基的全部著作。这个版本的第2卷，在国外也受到了迫害。全部印出的书都被禁止发售，在1870年取消了这个禁令以后，一部分印好的书加上新的封面出版了。1879年出版了第5卷的第二版，它收入了有关农民问题的文章。——第27页。
- 24 参阅《卓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三联书店版，第321页。——第29页。
- 25 卓尔尼雪夫斯基的传记材料包含在《对卓尔尼雪夫斯基的审判》一文中，这篇文章作为导言刊载在1876年爱尔皮丁在日内瓦出版的《莱辛，他的时代、生平和活动》和《怎么办？》第二版这两部书中。在这两部书中，这篇作为导言的文章占V—XXVIII页。——第29页。
- 26 卓尔尼雪夫斯基生于1828年7月12日(新历24日)。——第30页。
- 27 卓尔尼雪夫斯基的妻子奥里珈·索克拉托夫娜·瓦西里也娃并不是具

- 平的姊姊。車尔尼雪夫斯基本人是貝平的亲戚，他是貝平的表兄。——第30頁。
- 28 引自《沙皇尼基塔和他的四十个女儿》一詩（《普希金全集》，十卷本，第2卷，1956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版，第138—139頁）。正确的原文是：“虔誠的傲慢的傻瓜，过于死板的书报检查”。——第31頁。
- 29 参閱《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三联书店版，第322頁。——第31頁。
- 30 参閱同上书，第324頁。——第32頁。
- 31 普列汉諾夫指的是四十年代由别林斯基的朋友和同志組成的一个不大的团体，其中有赫尔岑、奥格辽夫、涅克拉索夫等人。——第32頁。
- 32 参閱《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1951年苏联国家文学书籍出版社版，第118頁。——第33頁。
- 33 在这里普列汉諾夫低估了先进的俄国文学对青年时代的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有益影响。赫尔岑、别林斯基、四十年代的进步杂志——《祖国紀事》和《同时代人》——是車尔尼雪夫斯基汲取他的知識和观点的最初泉源。他的《日記》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是他在一个地方直接談到《祖国紀事》杂志时說：“……我是从这个泉源受到教育的”。——第33頁。
- 34 “有思想的实在論者”——是指六十年代人、皮薩列夫的信徒，他們把自然科学和现实生活的研究同思辨的唯心主义哲学的研究对立起来。“有思想的实在論者”是皮薩列夫提出的術語。——第33頁。
- 35 参閱《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7卷，1950年苏联国家文学书籍出版社版，第771—772頁。——第35頁。
- 36 参閱《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233頁。——第35頁。
- 37 参閱恩格斯关于卢梭辯证地思維所說的那段話（恩格斯：《反杜林論》，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43—144頁）。——第36頁。
- 38 这几段話是普列汉諾夫从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一文中引来的（参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31—132頁）。——第37頁。

- 39 普列汉诺夫在这里不是引用原文，而是转述莫里哀的喜剧《屈打成医》和《上门的医生》中的冒牌医生所说的类似的话的大意。——第 39 页。
- 40 参阅黑格尔：《法哲学》，（参阅《法哲学原理》，1961 年商务印书馆版序言第 14 页）。——第 40 页。
- 41 这里是暗示莫里哀喜剧中的茹尔丹，这个人物没有料想到有散文语言的存在（参阅莫里哀：《醉心贵族的小市民》——《莫里哀喜剧集》，1953 年苏联“艺术”出版社版，第 415 页）。——第 40 页。
- 42 普列汉诺夫把十七——十八世纪的著名意大利哲学家乔巴蒂斯特·维科叫做“天才的意大利人”。这句引文他曾在其他文章中引用过，并且指出了作者的名字（参阅本选集，第 1 卷，中文版，第 489 页和第 720 页）。——第 42 页。
- 43 恩格斯关于摩尔根写道：“须知，摩尔根在美国那里按照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已由马克思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参阅《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版，第 169 页）。——第 45 页。
- 44 普列汉诺夫的这个论断，表现出他对于俄国科学对世界文化的作用和意义有些估计不足。苏联学者的一些著作证明：俄国学者，从罗蒙诺索夫开始，在世界科学史上占有卓越的地位。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对其他民族、特别是斯拉夫国家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起过作用。天才的俄国作家和诗人，也在国际文学界占有光荣的地位。——第 45 页。
- 45 普列汉诺夫对爱尔维修的道德学说的分析，请参阅他的《唯物主义史论丛》（本选集，第 2 卷，中文版，第 87 页以下）。——第 47 页。
- 46 引自《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一文（载《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 284 页）。——第 47 页。
- 47 参阅《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9 卷，1949 年苏联国家文学书籍出版社版，第 516 页。——第 49 页。
- 48 参阅《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 213 页。——第



50 頁。

49 參閱同上書，第 213—214 頁。——第 51 頁。

50 參閱同上書，第 379—380 頁。原文與普列漢諾夫的引文略有出入，原文是：“這個學派的作家乃是廣義的經紀人或商人等級——銀行家，批發商，工廠主……——的意圖的代表者……在這門科學中就出現了另一個學派，巴布斯特先生把它稱為……空想主義者派別”。——第 52 頁。

51 參閱同上書，第 387—388 頁。——第 53 頁。

52 參閱同上書，第 391 頁。——第 53 頁。

53 古羅馬奴隸主民主派的代表格拉古兄弟，為了實行有利於農民的土地法而對大地主貴族進行了鬥爭。——第 54 頁。

54 隶农制——羅馬帝國的農村居民（隶农）依賴於大地主的一種形式。隶农——小土地租佃人——的地位介乎自由民和奴隸之間。隶农制的產生，是由奴隸制經濟的危機所引起的，因為奴隸制經濟已經由於奴隸勞動的生產率低微而不再能帶來收益了。——第 55 頁。

55 洛貝爾圖斯的這本書於 1880—1887 年開出版於雅羅斯拉夫里。參閱第 1 分冊《佃奴、佃农和隶农》。——第 55 頁。

56 佃奴(adscripticii)——被迫負擔賦役的羅馬和拜占廷的農民，按其地位來說最接近於奴隸。——第 55 頁。

57 參閱《車爾尼雪夫斯基選集》，下卷，三聯書店版，第 383 頁。——第 57 頁。

58 參閱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版，第 168 頁。——第 58 頁。

59 參閱《車爾尼雪夫斯基選集》，下卷，三聯書店版，第 381 頁。——第 58 頁。

60 同上書，第 383 頁。——第 58 頁。

- 61 参阅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54页)。马克思在这里谈的是所谓“法的历史学派”(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法学中的反动派别)的代表人物。这个学派为一切现存状况辩护,无论是农奴制或奴隶制,根据只有一个,即任何一种成为习惯的制度都是合法的。——第59页。
- 62 在最近的版本上,这些话以后是:“而不致被任何次要的情况弄得混乱不清”。——第60页。
- 63 参阅《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9卷,第59—60、61页。——第60页。
- 64 在这里,普列汉诺夫在评价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经济学研究方面,是和马克思有分歧的,因为马克思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经济学著作作了很高的评价。马克思在1871年1月21日给迈耶尔的信中写道,他专门研究俄语,是为了阅读弗莱罗夫斯基的书以及“熟悉一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卓越的)经济学著作”(《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196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79—280页)。根据赫尔曼·洛帕廷的回忆,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地对他说:“在所有的现代经济学家中,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唯一真正具有独创见解的思想家……他的著作充满了独创见解、力量和深刻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和俄国政治活动家的通信集》,1951年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187—188页,脚注)。——第60页。
- 65 参阅恩格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第133页)。——第62页。
- 66 引自歌德的《Vanitas! Vanitatum vanitas!》(《空虚! 空虚!》)一诗。这首诗的俄译文刊载于歌德的《选集》上(1950年苏联国家文学书籍出版社版,第50页),译文不很确切。普列汉诺夫所引用的第二行诗,在那里是没有的。——第62页。
- 67 参阅《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127页。——第62页。
- 68 这里指的是三十年代莫斯科的哲学和文学小组,这个小组在俄国社会思想史上是以斯坦凯维奇小组闻名的。斯坦凯维奇是这个小组的领导人,

- 但是别林斯基在其中起了极大的作用。这个小组的特征是热衷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斯坦凯维奇小组对俄国哲学的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从辩证唯心主义到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的哲学唯物主义的过渡阶段。——第 62 頁。
- 69 参閱《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三联书店版,第 421 頁。——第 63 頁。
- 70 雅典人与波斯人之間的馬拉松之戰(公元前 490 年),是以雅典人的胜利告終的,这次胜利預先决定了第二次希波战争有利于希腊的結局,从而促进了雅典民主制的繁荣。——第 63 頁。
- 71 参閱《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三联书店版,第 422 頁。——第 63 頁。
- 72 参閱《車尔尼雪夫斯基美学論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 126、128 頁。——第 64 頁。
- 73 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原文是:“现实中美的缺陷”。——第 66 頁。
- 74 所有这些定义都是普列汉諾夫从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学位论文《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参閱《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三联书店版,第 100—102 頁)中引来的。——第 66 頁。
- 75 参閱《黑格尔全集》,第 13 卷,1940 年俄文版,第 39 頁。——第 67 頁。
- 76 参閱《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三联书店版,第 7、8 頁。——第 69 頁。
- 77 参閱黑格尔:《美学讲演录》。(参閱《美学》第 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 210—211 頁)。——第 70 頁。
- 78 别林斯基論欧仁·苏的小說《巴黎的秘密》的文章,可参閱《别林斯基全集》,第 8 卷,1955 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版,第 167—186 頁。——第 70 頁。
- 79 参閱《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5 卷,第 216 頁。——第 73 頁。

- 80 法国皇太子——路易十四的继承人——的教师，根据国王的命令，为了便于自己学生阅读，任意歪曲古典作家的作品，从其中删去了一切“猥亵的”地方。由此便产生了“为了法国皇太子”这句话。——第73页。
- 81 这里指的是七十年代革命民粹派的各个不同派别在思想和政治上的分歧。参阅注12。——第74页。
- 82 1848年6月间，在法国爆发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第一次伟大的国内战争”（《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76页）。这是巴黎无产阶级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是在“民主的社会共和国万岁！”、“打倒人对人的剥削！”的口号下进行的。6月23日开始的起义，以6月26日对工人的残酷镇压告终，这次镇压被人叫做“六月大屠杀”。——第74页。
- 83 参阅《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7卷，第98—99页。——第75页。
- 84 参阅《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十五卷本），第4卷，1948年苏联国家文学书籍出版社版，第313页。引自《Studien……（俄国国民生活内部关系、特别是农村机构的研究。奥古斯特·哈克斯特豪森男爵著）》一文。——第76页。
- 85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6卷，1953年苏联国家文学书籍出版社版，第659—660页。——第76页。
- 86 以上两段引文都引自同一篇文章，载同上书，第661—662页。——第77页。
- 87 《怎么办？》这部小说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于1862—1863年间在彼得保罗要塞中写成的。在他的十五卷本全集中，这部小说收入第11卷中（参阅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中译本）。——第78页。
- 88 在这里，普列汉诺夫过于夸大了拉萨尔的作用。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拉萨尔在组织生产协社方面的活动写道：“‘全部劳动的社会主义组织’不是从社会的革命改造的过程中，却是从给生产协社的‘国家帮助’中‘产生出来’，而这些生产协社又是由国家而不是由工人‘成立起来’的……这真不愧为拉萨尔的幻想”

(参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9頁)。

列宁写道:“在德國,半世紀以前工人还是跟着自由派舒尔采—德里奇走的,并且还受拉薩尔和施韦澤的‘民族自由主义的’(同时是“君主制普魯士式的”)机会主义动搖的支配……”(《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65頁)。——第79頁。

- 89 外国文学栏的这篇文章没有收入最近的《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79頁。
- 90 参閱《同时代人》,1861年5月号,第2栏,第4頁。——第80頁。
- 91 这里普列汉諾夫指的是自由主义民粹派,特别是写过許多著作来頌揚俄国家手工业和劳动組合的伏龙佐夫(伏·伏·)。——第81頁。
- 92 这里所引的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話,是和他对資产階級国家的階級性的看法相联系的。他认为資产階級国家总是为了“統治的阶层或集团”的利益而行动。他在《七月的君主制》一文中写道:“經驗证明,普选制把政权交給了蒙昧主义者和反动派”(《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7卷,第97頁)。車尔尼雪夫斯基对普选制的否定的評价,应该理解为对过高估計这种制度的一种警告。但他本人也认为可能利用这种制度来对劳动者进行政治教育。——第81頁。
- 93 参閱《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231頁。——第82頁。
- 94 参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76—477頁。——第83頁。
- 95 馬克思的《哲学的貧困》已收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卷。——第83頁。
- 96 拉薩尔的这本书的全名是:《巴师夏—舒尔采·德里奇先生,經濟学的尤利安,或資本和劳动》(参閱《拉薩尔全集》,第3卷,1925年“圓环”出版社版,第33—201頁)。——第84頁。
- 97 普列汉諾夫这里指的是自由主义民粹派,其中最重要的是米海洛夫斯

基,他当时在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中间颇有声望。民粹派接受了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俄国村社土地占有制的错误观点,而抛弃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革命民主主义,他们不正确地自以为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继承者”。——第 85 页。

- 98 阿利斯托夫在《阿法纳西·普罗科菲耶维奇·夏波夫》一书(1883年出版于彼得堡)中,这样描述夏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会见:“……整整一个晚上,他们在对俄国历史生活和各族人民现时状况的根本观点方面展开了热烈的争论;直到分别的时候,夏波夫才知道他究竟和谁进行了这场长时间的、认真的争论”(第 91 页)。——第 86 页。
- 99 别林斯基卒于 1848 年。——第 87 页。
- 100 参阅注 23。——第 88 页。
- 101 参阅《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5 卷,第 502 页。——第 89 页。
- 102 参阅《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 87—90 页。——第 91 页。
- 103 《序幕的序幕》这部小说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西伯利亚写成的,比写小说《怎么办?》要晚得多。这部小说是他在 1867—1871 年间在监狱中写的。他常在同一起监禁的同志们的谈话中,向他们讲述、即席写作或朗诵其中的一些片断。列宁关于这部小说写道:“正是要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天才,才能在当时,在农民改革刚进行的时候(那时它甚至在西方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说明)这样清楚地懂得这个改革的基本的资产阶级的性质”(《列宁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版,第 259 页)。——第 91 页。
- 104 除了在这部小说中作为主人公伏尔庚来描写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以外,几乎小说中所有的人物都影射着活人。车尔尼雪夫斯基借列维茨基的名字描写了杜勃罗留波夫,借索柯洛夫斯基的名字描写了波兰革命家西吉兹蒙特·谢拉科夫斯基,借恰普林伯爵的名字描写了著名的农奴主、大臣和刽子手穆拉维约夫,通过里雅桑采夫的形象描写了那个时代的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者卡维林,通过隆维洛夫的形象描写

- 了国务活动家米留金。——第 92 頁。
- 105 参閱《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13 卷，第 187—188 頁。——第 92 頁。
- 106 在最近的版本中印作“首倡者”。——第 93 頁。
- 107 参閱《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13 卷，第 106 頁。——第 93 頁。
- 108 对这种矛盾的解释是：写《序幕的序幕》这部小說的时候比写論贖买的文章要晚得多。——第 93 頁。
- 109 車尔尼雪夫斯基相信农民起义是有可能的，他的全部活动的目的就在于为这种起义作准备。他所写的传单《农民的同情者向地主老爷治下的农民致敬书》，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关于这点可参閱注 176。——第 93 頁。
- 110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13 卷，第 197 頁。車尔尼雪夫斯基反对斯拉夫主义者把人民作諂媚式的渲染，他并不掩飾也不美化人民群众在农奴制的沉重压迫下所养成的缺点。同时，他也指出：“……俄国庄稼汉在聪明、灵巧、活泼和思想的敏捷上决不比任何人差”（《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7 卷，第 876 頁）。車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墨守成規只能使人沉淪在日常瑣事之中”，同时他相信在革命时代不会留下墨守成規的痕迹，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人民群众会起来对現存社会制度进行忘我的斗争。——第 94 頁。
- 111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7 卷，第 858—859 頁。——第 95 頁。
- 112 参閱同上书，第 877 頁。——第 96 頁。
- 113 人民群众对农奴主所实行的 1861 年的农民改革的不滿，促进了知識分子中間的革命情緒的增长。除了車尔尼雪夫斯基的传单和赫尔岑的《钟声》杂志所发出的号召以外，还出现了个别革命团体所出版的許多地下刊物和传单。其中如传单《告青年一代》、出版过三期的革命刊物《大俄罗斯人》和传单《青年俄罗斯》。在当时的秘密革命組織中，最重要的是成立于 1862 年的“土地与自由”社，車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

- 同志都积极地参加了这个组织。——第 96 页。
- 114 几乎席卷全俄的群众性的农民骚动，是对掠夺性的、不彻底的 1861 年改革的答复。在 1861 年的农民起义中，最光辉和最重要的一次是延续整整一个月之久的喀山省别兹德纳村的起义；这次起义被武装力量残酷地镇压下去了。——第 96 页。
- 115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遍及全欧的革命浪潮，打击了沙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在 1848—1849 年革命后所实行的镇压解放运动的反动政策。然而亚历山大二世政府却使用一切手段来镇压欧洲革命运动，直至武装干涉某些国家中发生的国内斗争。——第 96 页。
- 116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5 卷，第 156—174 页。——第 97 页。
- 117 在这篇文章中，車尔尼雪夫斯基抨击了屠格涅夫的小说《罗亭》、赫尔岑的中篇小说《谁的罪过？》和涅克拉索夫的长诗《薩莎》中的所谓“多余的人”类型的主人公。——第 97 页。
- 118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5 卷，第 168—169 页。——第 98 页。
- 119 同上书，第 160 页。——第 98 页。
- 120 同上书，第 8 卷，第 634 页。——第 99 页。
- 121 同上书，第 636 页。在《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8 卷中，这个思想被表述得略有不同。在普列汉诺夫所引证的《同时代人》杂志上说，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者希望“真正的宪政政体在他们那里自行建立起来”。在文章的手稿上也是这样写的（关于这点，可参阅《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8 卷，第 690 页的注释）。——第 99 页。
- 122 拉薩尔在这篇文章中说道：“存在于每一个社会中的现实的力量对比，是决定该社会的一切法律和一切法律制度的经常起作用的力量……”（参阅《拉薩尔选集》，1920 年苏联国家出版社版，第 115 页）。——第 100 页。
- 123 北美的北方诸州和奴隶主的南方诸州之间的内战持续了四年（1861—



- 1865年),终于以北方的胜利告终。——第100頁。
- 124 参閱《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8卷,第643頁。——第101頁。
- 125 参閱同上书,第13卷,第195頁。——第101頁。
- 126 参閱同上书,第196頁。——第102頁。
- 127 同上书,第5卷,第357頁。——第102頁。
- 128 《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参閱三联书店版,第336--337頁。——第102頁。
- 129 同上书,第252頁。——第103頁。
- 130 参閱《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4卷,第722—723頁。——第103頁。
- 131 《經濟指南》——1857—1861年間在彼得堡由維尔納茨基編輯出版的月刊。——第103頁。
- 132 《沒有地址的信》載《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417—447頁。——第104頁。
- 133 参閱《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三联书店版,第422頁。——第105頁。
- 134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7卷,第932頁。——第106頁。
- 135 同上书,第767頁。——第107頁。
- 136 《經濟活动和立法》一文載于《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129—182頁。——第108頁。
- 137 讲坛社会主义者(源自“кафедра”(讲坛)一詞)——鼓吹資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論并引誘无产階級放弃革命斗争的一些資产階級教授。八十一—九十年代德国的一批讲坛社会主义者为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准备了基础。——第109頁。
- 138 参閱《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123頁。車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非常謙逊的人,他解釋屠格涅夫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是因为“杜

- 勃罗留波夫(比他, 車尔尼雪夫斯基)更聪明些, 他对事物的看法更明确和更坚定”。——第 109 頁。
- 139 这里指的是赫尔岑的《多余的人和胆汁质的人》一文, 載于 1860 年 10 月 15 日《钟声》第 83 期, 第 689—692 頁(參閱雷姆克編輯的《赫尔岑著作和书信全集》, 第 10 卷, 1919 年彼得堡版, 第 413—427 頁)。——第 109 頁。
- 140 在 1859—1863 年間出版的《哨声》的发起人和主要撰稿人是杜勃罗留波夫, 他在那里写的文章大部分用康拉德·李利英希瓦格尔这个笔名。——第 110 頁。
- 141 卡特柯夫是反动的《俄罗斯通报》的出版人, 阿尔勃提尼和杜德希金是《祖国紀事》的撰稿人。——第 110 頁。
- 142 參閱《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 第 7 卷, 第 719 頁。——第 111 頁。
- 143 參閱同上书, 第 765 頁。——第 112 頁。
- 144 《日报》——1862—1865 年間由伊·謝·阿克薩柯夫在莫斯科出版的斯拉夫主义的周刊。——第 112 頁。
- 145 《人民的糊塗》一文載于《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 第 7 卷, 第 828—848 頁。——第 112 頁。
- 146 參閱《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 上卷, 三联书店版, 第 244 頁。——第 113 頁。
- 147 莫斯科的斯拉夫主义团体是在三十年代末成立的。参加者有斯拉夫派的一些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伊·瓦·基列也夫斯基、彼·瓦·基列也夫斯基、尤·費·薩馬林、伊·謝·阿克薩柯夫、康·謝·阿克薩柯夫、亚·伊·柯舍列夫等人。——第 113 頁。
- 148 引自《日报》第 1 期发表的綱領性文章。——第 115 頁。
- 149 所有的引文都引自《人民的糊塗》一文(參閱《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 第 7 卷, 第 837、838 頁)。——第 115 頁。
- 150 參閱《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10 卷中的这篇文章(第 125—135

- 頁)。——第 116 頁。
- 151 《基礎》——1861—1862 年間在彼得堡出版的烏克蘭文的社会政治月刊。《同時代人》支持了《基礎》在發展烏克蘭人民文化方面的許多要求，同時也不止一次地批評了这家杂志的自由主义。車尔尼雪夫斯基論《基礎》第 1 期的文章載于《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7 卷，第 934—948 頁。——第 116 頁。
- 152 參閱同上書，第 779—780 頁。——第 117 頁。
- 153 同上書，第 8 卷，第 538 頁。——第 117 頁。
- 154 同上書，第 7 卷，第 780 頁。——第 118 頁。
- 155 車尔尼雪夫斯基确实和波兰革命家、《同時代人》的工作人員謝拉科夫斯基非常接近，謝拉科夫斯基在彼得堡組織了一个主要由波兰人——俄国軍隊軍官們組成的地下革命小組。在同一年，謝拉科夫斯基小組在組織上加入了奧格列茲柯領導的彼得堡的波兰秘密团体，奧格列茲柯是車尔尼雪夫斯基另一个同道者和他所信托的人。由于这种联系，車尔尼雪夫斯基对許多波兰革命家——未来的波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的 1863 年起义的領導者唐姆布洛夫斯基、盖依頓萊赫、茲維日多夫斯基等人，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接近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波兰革命家在沙皇統治下的波兰建立了一个革命軍事組織，后来这个組織参加了六十年代的秘密組織“土地与自由”社。——第 119 頁。
- 156 普列汉諾夫引证的那篇文章，沒有收入《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在《同時代人》杂志上，这篇文章沒有署名，刊載在論巴布斯特和达尔的文章(这些文章已收入《全集》第七卷)之后。——第 119 頁。
- 157 所有的引文都引自《同時代人》上的同一篇文章，第 442、444 和 446 頁。——第 120 頁。
- 158 在手稿上是：“沙皇的自由”。——第 121 頁。
- 159 參閱《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7 卷，第 827 頁。——第 122 頁。
- 160 犹滴是聖經里的女英雄，根据傳說，她在尼布甲尼撒的軍隊围攻凡蒂

- 路依要塞的时候拯救了犹太民族,砍掉了为她的美色迷惑的统帅奥洛芬的头。——第 122 頁。
- 161 参閱《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7 卷,第 923 頁。——第 122 頁。
- 162 参閱同上书,第 10 卷,第 138 頁。——第 123 頁。
- 163 同上书,第 167 頁。——第 123 頁。
- 164 1861 年秋,由于沙皇政府頒布了反动的大学条例,在一些大学城市里发生了大規模的“学潮”。——第 123 頁。
- 165 参閱《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10 卷,第 170、172、173 頁。——第 124 頁。
- 166 两处引文都引自同一篇文章,第 169 頁。——第 125 頁。
- 167 同上书,第 175 頁。——第 125 頁。
- 168 普列汉诺夫分析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政治經济学观点的文章不止一篇,而有三篇,它們发表在日内瓦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第 2、3、4 期上(参閱《普列汉诺夫全集》,第 6 卷)。——第 126 頁。
- 169 混合主义是折衷主义的变种,它把不同种类的、互相矛盾的观点結合在一起。——第 126 頁。
- 170 在手稿上是:“不加批判地”。——第 126 頁。
- 171 車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的态度,不是为他辯护的,而是帶有批判性的。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中着重地指出了这点,馬克思写道:“一个沒有精神的折衷派发生了。約翰·穆勒是最著名的代表。这正是資产階級政治經济学破产的宣告。关于此事,俄国的大学者,批評家,車尔尼雪夫斯基曾在他所著的《政治經济学綱要(仿穆勒)》中,說得很明白”(参閱《資本論》,第 1 卷,1963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XVI—XVII 頁)。——第 126 頁。
- 172 告发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匿名告密信,刊载于雷姆克的《对米哈伊洛夫、皮薩列夫和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政治訴訟》一书,圣彼得堡 1907 年版,

- 第 202—203 頁。——第 128 頁。
- 173 实际上不是維托希金，而是維托希尼柯夫（參閱人名索引）。——第 128 頁。
- 174 參閱雷姆克編輯的《赫爾岑著作和書信全集》，第 18 卷，1920 年彼得堡版，第 4 頁。對 1865 年所寫的一篇文章的注釋。——第 128 頁。
- 175 根據尼·瓦·舍爾古諾夫的回忆，後來成為叛徒的柯斯托馬羅夫曾經告訴他在莫斯科有秘密的印刷所，《同時代人》的活動家曾決定利用它來印刷傳單（參閱《過去的聲音》，1918 年版第 4—6 期，第 65—68 頁）。——第 129 頁。
- 176 關於車爾尼雪夫斯基直接參加建立秘密革命組織的問題，還沒有得到充分的研究，雖然有不少材料有利於作出肯定的結論。蘇聯學者在自己的著作中證明，車爾尼雪夫斯基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的革命形勢的條件下，把具有革命情緒的知識分子、軍官和大學生的代表集合在自己和《同時代人》編輯部周圍，這樣就建立了俄國革命民主主義陣營的領導核心。他在思想上鼓舞了和領導了各個革命小組和團體的鬥爭，加強了它們的活動，其結果就是“土地與自由”這個組織（1862—1864 年）的成立。在車爾尼雪夫斯基領導下，《同時代人》、《軍事文集》在書報檢查的條件下進行了革命宣傳，組織了“象棋俱樂部”，團結了許多具有革命情緒的進步作家（參閱涅契基娜的《革命形勢年代中的車爾尼雪夫斯基》一文，載《歷史論叢》，1941 年第 10 期，第 3—39 頁）。——第 129 頁。
- 177 參閱《車爾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14 卷，第 456 頁。——第 130 頁。
- 178 《怎麼辦？》這部小說是車爾尼雪夫斯基在 1863 年 4 月完成的，而不是在 1864 年完成的。——第 130 頁。
- 179 引自涅克拉索夫的《叶列莫施卡之歌》一詩。——第 131 頁。
- 180 喬治·桑的小說《盧克萊茨亞·弗洛里安妮》的俄譯本出版於 1847 年。——第 132 頁。

- 181 罗普霍夫和吉尔沙诺夫都是小说《怎么办?》中的主人公。——第 132 頁。
- 182 这是格利鲍耶陀夫的喜剧《聪明误》中恰茨基的话。——第 133 頁。
- 183 参阅本文的题词和对题词的注释。——第 134 頁。
- 184 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由布塔舍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在 1845—1849 年间于彼得堡建立的俄国先进知识分子小组的成员。在小组里经常讨论有关解放农民、推翻专制制度、组织共和国和革命斗争方法等等的计划。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小组的革命核心的思想体系,是在十二月党人、别林斯基、赫尔岑的思想影响下,以及在傅立叶和其他西欧思想家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进步思想影响下形成的。——第 135 頁。
- 185 《土地的权力》是格列勃·乌斯宾斯基的一本短篇小说集的标题。——第 136 頁。
- 186 皮萨列夫:《哲学和社会政治论文选集》, 1949 年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 第 640—695 頁。——第 137 頁。
- 187 安东诺维奇在这篇文章中把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评为对青年一代的诋毁和诽谤(参阅《安东诺维奇论文选》, 1938 年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 第 141—202 頁)。  
在手稿中没有这条脚注。——第 137 頁。
- 188 刚刚诞生的革命者的典型,是指七十年代的革命民粹派,他们“到民间去”,脱离了自已的环境、家庭,抛弃了舒适的生活。——第 139 頁。
- 189 准许卓尔尼雪夫斯基由维留依斯克迁往阿斯特拉罕的指令是在 1883 年 7 月 15 日签署的。他在同年 10 月 27 日抵达了阿斯特拉罕。——第 139 頁。
- 190 不同的革命小组和个人不时有过营救卓尔尼雪夫斯基的计划。这一类最大胆的尝试是同伊波立特·米希金和赫尔曼·洛帕廷的名字分不开的。两次尝试都没有成功。——第 139 頁。
- 191 这里指的是卓尔尼雪夫斯基在 1888 年发表于《俄罗斯思想》第 9 期上

的《生存竞争有益论的来源》一文（載《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737—772頁）。在这篇文章中，車尔尼雪夫斯基是作为种变說、即进化的发展观念的拥护者出現的，但他批評了达尔文把剽窃自馬尔薩斯的反动政治經济学論著的生存竞争理論搬到生物界。

在这一点上，車尔尼雪夫斯基是和恩格斯接近的，恩格斯于1875年11月12—17日写信給拉甫罗夫說：“在达尔文学說中，我所贊同的是发展論，我认为达尔文的論证方法（生存竞争，自然选择）只不过是刚刚发现的事实初步的、暫时的、不完善的表現”（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和俄国政治活动家的通信集》，1951年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212頁）。

后来在1909年，普列汉諾夫本人也抛弃了他对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这篇文章的极端否定的评价（參閱本卷，第277頁以下）。——第140頁。

- 192 參閱《車尔尼雪夫斯基》一文，載于雷姆克編《赫尔岑著作和书信全集》，第17卷，第260—261頁。——第140頁。
- 193 这里和以后的三角括号内的文字，都是《社会民主党人》第1期上普列汉諾夫的文章的、未加增补以前的原文。——第141頁。
- 194 “新人”是車尔尼雪夫斯基的用語，它指的是他的小說《怎么办？》中的主人公那种类型的人物，如罗普霍夫、吉尔沙諾夫、拉赫美托夫、薇拉·巴夫洛芙娜。——第142頁。
- 195 參閱本卷注138。——第143頁。
- 196 參閱本卷注139。——第143頁。
- 197 俄文为 *персифлировать*，意即嘲笑、嘲弄。——第143頁。
- 198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78頁，以及《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196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58頁。——第143頁。
- 199 參閱《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233頁。——第144頁。

- 200 《色诺芬全集》（五卷集），第2卷，《苏格拉底回忆录》，1887年圣彼得堡版，第67页。——第145页。
- 201 赫尔岑的《三年之后》一文就是以这句感叹的话开始和结束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858年2月15日的《钟声》上（参阅雷姆克编《赫尔岑著作和书信全集》，第9卷，第126—128页）。——第146页。
- 202 赫尔岑在得到有关1861年改革的最初消息以后，还不知道它的掠夺的本质，因此为农民解放举行了庆祝会。在这次庆祝会的请帖中说道：“伦敦的自由俄国印刷所和《钟声》的出版人在四月十日晚庆祝农民解放的开始……每一个俄国人，不论他属于哪个党派，只要他同情伟大的事业，便将受到兄弟般的招待”（雷姆克编《赫尔岑著作和书信全集》，第11卷，第65页）。在宴会上，赫尔岑提议为俄国、为它的繁荣昌盛而干杯，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同上书，第66页注释）。——第146页。
- 203 普列汉诺夫指的是国外版《卓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5卷（参阅注23）。——第146页。
- 204 参阅《卓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4卷，第313页。在普列汉诺夫的手稿上“农民”误写为“地主”。——第147页。
- 205 这里指的是卓尔尼雪夫斯基的《对反对村社占有制的哲学偏见的批判》一文（《卓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86—128页）。——第147页。
- 206 参阅《卓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三联书店版，第421页。——第148页。
- 207 卓尔尼雪夫斯基在《对反对村社占有制的哲学偏见的批判》一文的序言中表述了这些思想（参阅《卓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91页）。——第149页。
- 208 《告青年一代》这份传单揭露了农民改革的掠夺性质，并且号召人们举行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起义。这份传单于1861年9月在俄国散发。它的作者是六十年代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著名代表著作家尼·瓦·舍



- 尔古諾夫和革命詩人米·拉·米哈伊洛夫。这份传单是应米·拉·米哈伊洛夫的要求而在伦敦的赫尔岑的自由印刷所印刷的。赫尔岑虽然印了这份传单,然而对它却不表同情。他在1868年12月1日的《钟声》第14—15期上写道:“我們曾懇請他(米哈伊洛夫)不要印他的传单”(參閱雷姆克編《赫尔岑著作和书信全集》,第21卷,第206頁)。这份传单刊载于雷姆克的《十八世紀六十年代俄国的政治审判案》,1923年苏联国家出版社版,第62—80頁,以及舍尔古諾夫的《回忆录》,1923年苏联国家出版社版,第287—302頁。——第150頁。
- 209 《告軍官书》这份传单注明的日期是1862年3月,它号召軍官“不要按照等級,而要按照信念”来結成政党。它刊载在雷姆克的上书第548—550頁上。——第150頁。
- 210 《青年俄罗斯》这份传单是在1862年5月中旬印出的,并且在彼得堡、莫斯科和各个省份广泛散发。它的作者是革命民主主义者扎依契涅夫斯基,他当时已經在莫斯科被捕了。这份传单刊载在雷姆克的上书第508—518頁上。——第150頁。
- 211 引自赫尔岑的《新聞記者和恐怖主义者》(參閱雷姆克編《赫尔岑著作和书信全集》,第15卷,第375頁)。——第150頁。
- 212 參閱舍尔古諾夫:《回忆录》,第137頁。——第150頁。
- 213 《俄國言論》是1859—1866年間在彼得堡出版的月刊。从1860年起,它的編輯者是布拉高斯維特洛夫,他吸收了扎依采夫、舍尔古諾夫和夏波夫等人参加該杂志作为工作人員。从1861年起,皮薩列夫是决定这份杂志面貌的最著名的政論家和批評家。——第151頁。
- 214 參閱雷姆克的《十八世紀六十年代俄国的政治审判案》一书中所載米哈伊洛夫对审讯的回答(該书第87—107頁)。——第151頁。
- 215 呈請辞职的教授有卡維林、斯巴索維奇、貝平、斯塔修列維奇、烏金。同时大学校长普列特涅夫也离开了大学(參閱舍尔古諾夫:《回忆录》,第132頁,以及第220頁的边注)。——第152頁。
- 216 參閱舍尔古諾夫的《回忆录》一书中关于这次示威游行的描述(該书第

131頁)。——第152頁。

217 参閱注88。——第155頁。

218 在1908年，显然为了迎接将在1909年到来的車尔尼雪夫斯基逝世二十周年，普列汉諾夫又再度着手写作論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同1890—1892年間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上的著作和1894年的該书德文版相比，普列汉諾夫大大地扩大和补充了他的新著《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在1909年的版本中，他增加了在頗大程度上是重新写过的序言、导言和构成該书第一部的篇幅很大的一篇《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历史和文学观点》。第二部包括两篇：《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政治观点》和《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政治經济学观点》。第一篇是新写的，第二篇則是《社会民主党人》上的四篇文章的重版，只作了不大的修改。

1908年12月，这部著作被交給“野玫瑰”出版社<sup>①</sup>付印。从保存下来的、他同出版社之間的通信中可以看出，校样准时地送給了普列汉諾夫进行校对。原来預定在1909年春天出书，但是由于营业方面的考虑，这家出版社直到1909年10月才出书，那时正当車尔尼雪夫斯基逝世二十周年。出版社在1909年10月14日的信中通知普列汉諾夫說：“您的著作已經出版……虽然它一共还只发售了三天，但我們已經清楚地知道它取得了异常的成功。人們迫不及待地等待它，并且以很大的兴趣来迎接它”（普列汉諾夫紀念館档案）。

大概，同样由于营业方面的考虑，这家出版社在該书的封面上印的日期是1910年，想必是希望这会使人們在更長時間內认为該书是“新书”、“沒有过时的书”。这个情况造成了在有关普列汉諾夫的著作中頗为流行的一个錯誤，即仿佛該书是在1910年出版的。

1909年版《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一书的导言，特别是它的第一部，同《社会民主党人》第1期上的論文有很大的出入。在这篇导言中，普列汉諾夫談到車尔尼雪夫斯基的世界观的发展。导言的后半部

<sup>①</sup> “野玫瑰”出版社是1906至1918年間由资产階級开办的一家商业性的企业。除了唯心主义的各派代表人物的哲学著作以外，它也出版了馬克思、普列汉諾夫和其他一些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

在很大程度上是刊載在《社会民主党人》第1期上的論文的重版，沒有作任何修改或者只作了不大的文字方面的修改，但有些地方是改写过的。該书中新写的有关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历史、文学和政治观点的那些部分，以及对旧文的修改，都明显地表明普列汉諾夫的社会政治观点的变化，表明他从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立場倒退到孟什維主义的立場。本卷只收入了該书1909年版的第1部。这是由于我們考虑到，叙述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历史和文学观点的这一部分是符合于这部选集的选材范围的。《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观点》一文，收入《普列汉諾夫哲学著作选集》的下一卷、即第五卷。

列宁曾仔細地讀过“野玫瑰”出版社出版的普列汉諾夫的《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一书，并且把它的原文同《社会民主党人》上的論文加以比較，注意到了普列汉諾夫对車尔尼雪夫斯基的看法的重大变化。列宁对普列汉諾夫的著作的批語发表在列宁文集第25卷第206—244頁上（見《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65—626頁。——譯者）。1911年4月1日发表了列宁的《“农民改革”和无产階級农民革命》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对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活动和世界观作了評价。这篇文章是列宁在閱讀普列汉諾夫的著作时所作的評語的发展。列宁在強調車尔尼雪夫斯基的革命性及其对自由主义的无情批判时写道：“……車尔尼雪夫斯基不仅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同时还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善于用革命的精神去影响他那个时代的全部政治事件，通过书报检查机关的重重障碍宣传农民革命的思想，宣传推翻一切旧权力的群众斗争的思想”（《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05頁）。

在档案中保存有繕写員所抄写的該书全部手稿，上面有普列汉諾夫所作的許多修改。“野玫瑰”出版的原文与这部手稿的原文略有不同，作了某些文字方面的修改。大概，这些修改和两四处增补的文句是普列汉諾夫在校对时加进去的。在本版中，該书原文是按照“野玫瑰”的版本排印的，并且核对过手稿。对手稿和“野玫瑰”出版的原文的修正，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在注释中作了說明。其中导言中引自1890年的文章的所有篇頁，都与《社会民主党人》第1期上的原文核对过。普列汉諾夫引自車尔尼雪夫斯基著作的引文，都与他所使用的版本

(1906年米·尼·车尔尼雪夫斯基編輯的版本)和最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十五卷本全集,苏联国家文学书籍出版社,1939—1953年莫斯科版)核对过;在引文与最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的原文有出入时,在注释中的版本出处前面注明“参閱”字样。——第156頁。

- 219 参閱《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5卷,第152—153頁。——第159頁。
- 220 杜霍夫尼柯夫的《尼古拉·加甫利洛維奇·車尔尼雪夫斯基,他在薩拉托夫的生活》一文发表于《俄国往事》1890年第9期,第531—564頁。——第159頁。
- 221 在杜霍夫尼柯夫的文章中(《俄国往事》1890年第9期,第536—539頁)引证了切斯諾柯夫的口述。——第159頁。
- 222 参閱《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3卷,第195頁。——第160頁。
- 223 参閱同上书,第196頁。——第161頁。
- 224 参閱《杜勃罗留波夫的传记材料》一文(《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18頁)。——第162頁。
- 225 同上。——第162頁。
- 226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17頁。——第164頁。
- 227 《人类知識的性质》一文收入《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720—736頁。——第165頁。
- 228 引自車尔尼雪夫斯基写于1845年的中学作文《感官是否会欺騙我們?》。教員的批語写道:“极好”(参閱《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6卷,第375頁)。——第166頁。
- 229 参閱《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卷,第562頁。——第166頁。
- 230 参閱同上书。引文和里雅茨基的引文略有出入:代替“为人类服务”这几个字的是“为人类謀福利”;“对于他説来”这几个字是完全沒有的;

代替“就是”这两个字的是“他”。——第 167 頁。

**231** 参閱《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16 卷，第 382、383 頁。——第 167 頁。

**232** 为伊巴捷夫編年史而試作的辞典可参閱《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16 卷，第 400—466 頁。——第 168 頁。

**233** 关于吉尔費尔丁格和奈依基尔赫的著作的书評，收入《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2 卷第 196—203 頁和第 204—209 頁。在这两篇文章的附注中說，这一期《祖国紀事》在 1853 年 7 月 1 日取得了书报检查机关的批准，并且說这两篇书評是“車尔尼雪夫斯基为《祖国紀事》写的第一批作品，是他在‘大型刊物’上的处女作”（《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2 卷，第 837 頁）。

在《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的生平和活动年表》（1953 年苏联国家文学书籍出版社版）中，把这两篇书評放在 1853 年 7 月 1 日的項目下，并且簡介說：“車尔尼雪夫斯基在俄国期刊上的活动是以这两篇书評开始的”（第 86 頁）。——第 168 頁。

**234** 参閱《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2 卷，第 345 頁。在发表于 1854 年《祖国紀事》第 6 期的这篇关于斯塔爾切夫斯基的《日用百科辞典》第 7 卷的书評的附注中，編輯部对普列汉諾夫所引证的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話作了这样的說明：“这里所提到的《祖国紀事》上的未署名的书評，不是車尔尼雪夫斯基写的……‘我們曾經认为……’、‘我們仍坚持我們过去的意見……’等語，虽然把这篇书評和以前的书評联系在一起，但并不能证明两篇书評的作者是同一个人”（第 846 頁）。

在关于《日用辞典》第 3 卷（出版晚于該书第 7 卷）的书評中，車尔尼雪夫斯基又一次提到 1847 年的书評，但关于它的說法已經有所不同：“……我們的杂志发表了关于《日用辞典》第 1 卷的評論（1847 年《祖国紀事》，第 8 期）以后，发现有許多报刊轉載了这篇評論……”（第 2 卷，第 358 頁）。——第 168 頁。

**235** 在《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的生平和活动年表》中，1847 和 1848 年項下沒有提到这些事情。只是不止一次地談到他閱讀《Journal des Débates》。——第 169 頁。

- 236 論《馮維辛的〈旅长〉》的文章是車尔尼雪夫斯基在1850年5月写成的。在全集中，这篇文章收入第2卷附录，以两种文稿发表，載于第792—815頁。——第170頁。
- 237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2卷，第793頁。——第171頁。
- 238 《杜勃罗留波夫全集》(三卷集)，第2卷，1952年苏联国家文学书籍出版社版，第316—398頁。——第171頁。
- 239 參閱《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2卷，第796—797頁。——第172頁。
- 240 參閱同上书，第10卷，第118頁。——第173頁。
- 241 參閱同上书，第2卷，第800—801頁。——第174頁。
- 242 同上书，第4卷，第5—221頁。——第174頁。
- 243 同上书，第2卷，第811頁。——第174頁。
- 244 參閱《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三联书店版，第135頁。——第175頁。
- 245 車尔尼雪夫斯基第一次提到他閱讀費尔巴哈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质》是在1849年2月25日，当时他在大学三年級(參閱《日記》，載《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卷，第248頁)。——第175頁。
- 246 《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1—15頁。——第176頁。
- 247 參閱同上书，上卷，第322頁。——第177頁。
- 248 參閱同上书，第324頁。——第177頁。
- 249 这里指的是“野玫瑰”出版社于1909年出版的《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一书的序言。——第179頁。
- 250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3卷，第245頁。——第180頁。
- 251 參閱《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卷，第483—484頁。——第181頁。
- 252 參閱同上书，第13卷，第243—244頁。——第182頁。

- 253 同上书,第1卷,第548頁。——第183頁。
- 254 同上书,第13卷,第244頁。——第183頁。
- 255 这个时期車尔尼雪夫斯基的书信和《日記》中的言論,是和前面引自《序幕》的引文相矛盾的,也是和普列汉諾夫的这个論断相矛盾的。例如,他在1852年对他的未婚妻說:“我有这样一种想法:我应当时时刻刻等待着宪兵出現,把我押送到彼得堡,关进要塞……我在这里所做的事情很有被判苦役的危險……”(《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卷,第418頁)。
- 他早在1850年1月20日的《日記》中关于飞跃和革命动荡写道:“……和平的、平靜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就让我发生瘡變罢,——我知道,如果沒有瘡變,历史就永远不会前进一步……认为人类能够笔直地和平穩地前进,这是愚蠢的,迄今为止还从来没有这样的事”(《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卷,第357頁)。——第183頁。
- 256 这是諷刺檢察官日利霍夫斯基的演說的諷刺詩中的詩句。日利霍夫斯基大致就是这样描述在第193号审判案中出庭的革命民粹主义者的。这首诗发表于《紅色档案》杂志,1929年第3(34)期,第229—230頁。——第184頁。
- 257 参閱《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卷,第492頁。——第184頁。
- 258 这个沒有認清的字是:“要求”。——第184頁。
- 259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卷,第494頁。——第185頁。
- 260 参閱同上书,同上頁。——第185頁。
- 261 同上书,第484頁。——第186頁。
- 262 参閱同上书,第14卷,第242頁。——第187頁。
- 263 同上书,第297—298頁。——第187頁。
- 264 同上书,第5卷,第502頁。——第190頁。
- 265 同上书,第13卷,第103頁。——第191頁。

- 266 同上书,第 239 頁。——第 191 頁。
- 267 参閱同上书,第 5 卷,第 357 頁。——第 192 頁。
- 268 参閱《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三联书店版,第 336—337 頁。——第 192 頁。
- 269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10 卷,第 123 頁。——第 195 頁。
- 270 卡維林和赫尔岑的友誼关系,是 1862 年卡維林在柏林发表《貴族和农民的解放》这部笔记以后破裂的。在这部笔记中,卡維林发展了他的十分温和的自由主义观点(参閱《卡維林給屠格涅夫和赫尔岑的书信集》,1892 年日内瓦版,第 49 頁及以下)。——第 196 頁。
- 271 参閱《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7 卷,第 719 頁。——第 197 頁。
- 272 参閱同上书,第 765 頁。——第 198 頁。
- 273 現在,《农民的同情者向地主老爷治下的农民致敬书》出于車尔尼雪夫斯基手笔的事实,已經毫無疑問了。普列汉諾夫以及雷姆克,都还没有确实的材料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份传单已收入《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的最近版本(《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7 卷,第 517—524 頁)。——第 198 頁。
- 274 在 1861 年出版秘密小报《大俄罗斯人》的“委员会”的人員尚未确切地查明。人們推測,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車尔尼雪夫斯基的信徒弗拉基米尔·奥勃罗切夫和尼古拉·奥勃罗切夫,其中前者是《同时代人》的工作人员。研究者沒有提到車尔尼雪夫斯基参与写作这些小报,这些小报都沒有收入十五卷本的《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199 頁。
- 275 参閱《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7 卷,第 779—780 頁。——第 200 頁。
- 276 参閱同上书,第 8 卷,第 538 頁。——第 200 頁。
- 277 同上书,第 7 卷,第 780 頁。——第 201 頁。
- 278 参閱注 156。——第 202 頁。



- 279 《柯罗迪柯全集》(十卷本),第8卷,1955年苏联国家文学书籍出版社版,第62页。——第205页。
- 280 1885年,車尔尼雪夫斯基写成了《人类知识的性质》一文,以“安德列也夫”的笔名发表在3月6日和7日的《俄罗斯通报》第63期和第64期上。1888年,他写成了《生存竞争有益论的来源》一文,发表于《俄罗斯思想》第9期(两篇文章均收入《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207页。
- 281 体现了卢梭的世界观的基本原则的小说《朱丽或新爱洛绮思》,是卢梭在四十九岁时写的。葛德文的著名小说《卡列勃·威廉斯》是他在三十八岁时写的。——第207页。
- 282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4卷,第501页。——第208页。
- 283 参阅伏尔泰:《哲学小说集》,1953年苏联国家文学书籍出版社版(按此书中所收的伏尔泰的哲学小说《查第格》、《小大人》、《老实人》、《天真汉》等,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译本,请参看。——译者)。——第209页。
- 284 参阅《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卷,第528—529、533页。——第210页。
- 285 普列汉诺夫在1890年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上的著作《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中说道:“每一个优秀的俄国革命者都有大量的拉赫美托夫作风”(参阅本卷,第138页)。在新的版本上,“新人”和“六十和七十年代社会主义者”代替了“革命者”这个词。列宁指出了这种修改,他在页边作了这样的批语:
- “注意参看《社会民主党人》第1期”和“——‘革命者’,《社会民主党人》(第1期第173页)”。
- 对“优秀的六十和七十年代我国的社会主义者”一语,列宁在页边批道:“俄国革命者”;而对“不少的”这个词批道:“大量的”(《社会民主党人》第1期第174页)。
- 参阅《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78、579页。——第214页。

- 286 参閱《柯罗連柯全集》，第 8 卷，第 64 頁。——第 214 頁。
- 287 参閱同上书，第 65 頁。——第 215 頁。
- 288 在手稿上是：“第一部分”。——第 217 頁。
- 289 在“野玫瑰”的版本上誤作“1899 年”。——第 217 頁。
- 290 在手稿上是：“車尔尼雪夫斯基本人的証詞”。——第 217 頁。
- 291 参閱《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7 卷，第 771 頁。——第 217 頁。
- 292 同上书，第 771—772 頁。——第 218 頁。
- 293 即普列汉諾夫的《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理論》一文（参閱《普列汉諾夫全集》，第 6 卷，第 245—289 頁，以及本选集第 5 卷）。——第 218 頁。
- 294 如車尔尼雪夫斯基本人在《日記》中的記載所证明的，他是在 1849 年 2 月讀到費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質》一书的。例如，車尔尼雪夫斯基在 1849 年 3 月 4 日回忆 2 月 25 日那一天的事情时写道：“七点钟到汉内柯夫那儿去，他給了我一本 Feuerbach's Das Wesen des Christenthums（費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当我拿了这本书回家的时候，我曾經考虑过，当我讀过这本书时我会得到什么結果……”（《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1 卷，第 248 頁）。——第 219 頁。
- 295 参閱《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三联书店版，第 135 頁。——第 219 頁。
- 296 同上书，第 135—136 頁。——第 220 頁。
- 297 朗格的《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 und Kritik seiner Bedeutung in der Gegenwart》（《唯物主义史及其在現代的意义的批判》）发表于 1865 年。这本书企图从新康德主义立場来批判唯物主义的主要代表們。——第 220 頁。
- 298 参閱《費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版，第 184 頁。——第 220 頁。

- 299 参閱同上书,第 479 頁。——第 221 頁。
- 300 参閱同上书,第 205 頁。——第 222 頁。
- 301 参閱《普列汉諾夫全集》,第 6 卷,第 245—289 頁,以及本选集,第 3 卷,中文版,第 134—158 頁。——第 223 頁。
- 302 《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 294 頁。——第 223 頁。
- 303 同上书,第 295 頁。——第 224 頁。
- 304 参閱本选集,第 3 卷,中文版,第 143—144 頁。——第 225 頁。
- 305 普列汉諾夫所用的簡短的公式不能完全确切地說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观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本特征是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間动搖不定,但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他“不怀疑外部世界的实在性”(《列宁全集》,第 38 卷,人民出版社版,第 418 頁)。列宁还指出,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唯心主义的批判,是对“一般唯心主义”的批判(同上书,第 313 頁)。——第 225 頁。
- 306 这里說的是庸俗的唯物主义,其代表人物是毕希納、伏格特、摩萊蕭特等人。——第 228 頁。
- 307 《費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参閱三联书店版,第 195 頁。——第 228 頁。
- 308 参閱本选集,第 3 卷,中文版,第 142 頁。——第 229 頁。
- 309 在手稿上写作:“……我們只限于提出这样一个意見”。——第 230 頁。
- 310 車尔尼雪夫斯基所列举的訓練动物的事例,在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說中得到了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解釋。巴甫洛夫指出,在这种情况下談論动物的智力发展是没有根据的。动物的智力活动帶有原始的性质,在它們的行为中并不占有首要地位,并且沒有在它們的經驗中固定下来。本能和习性始終是动物适应周围环境的主要形式。——第 230 頁。
- 311 参閱本卷注 191。——第 232 頁。

- 312 《新社会观》一书是革命前出版过俄译本的欧文的唯一著作，该书俄译本改名为《人的性格的形成》(欧文此书有 1958 年三联书店译本，书名为《新社会观。关于性格培养的几篇论文》。——译者)。——第 234 页。
- 313 参阅《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版，第 250 页。——第 238 页。
- 314 列宁在对普列汉诺夫的这部书的批注中给“它(这里指的是感觉和思维的能力。——俄文版编者)和生物有机体的所谓物理的质之间的距离是无限大的”这句话划上着重线，并在页边上写道：“不是无限的(虽然我们还不知道这个“限度”)”(《列宁全集》，第 38 卷，人民出版社版，第 582 页)。——第 240 页。
- 315 缺证论法——一种逻辑上的错误，这种错误就是从本身需要证明的理由中引伸出证明来。——第 241 页。
- 316 在原稿上写作：“一些不明确的地方”。——第 241 页。
- 317 参阅《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 238—239 页。——第 243 页。
- 318 列宁在对普列汉诺夫的这部书的批注中反对这句话，他在页边上写道：“不是逻辑的错误，而是认识论的错误”(《列宁全集》，第 38 卷，人民出版社版，第 585 页)。——第 245 页。
- 319 这里指的是英国著名生物学家和生理学家、达尔文的信徒乔治·约翰·罗门斯(普列汉诺夫把英文姓名 Romanes 音译成罗门尼斯，而不是音译成罗门斯)的著作《Animal intelligence》(《动物的智慧》)。——第 245 页。
- 320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7 卷，第 725 页。——第 246 页。
- 321 С. Г. ——西尔韦斯特尔·果戈茨基，俄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他编过一部四卷本《哲学辞典》(1857—1873 年)。——第 247 页。
- 322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7 卷，第 769—770 页。——第 247 页。
- 323 萨古特是受罗马保护的一个古西班牙商业城市。公元前 219 年，萨古

- 特城对迦太基的统帅汉尼拔的进攻部队进行了八个月英勇的保卫战。根据罗马史家亚庇安的陈述，在决战的时候，薩古特人宁願全体手执武器而战死，而不願投降。“他們的妻子从城墙上看到自己丈夫战死，有一些人就从屋頂上纵身跃下，另一些人自縊，而某些人則先杀死自己的孩子，然后以劍自刎。”对薩古特的进攻成为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导火綫。——第 248 頁。
- 324** 根据传说，公元前六世紀在罗马曾发生一場流血的悲剧，并成为驅逐塔克文尼皇族的起因。皇帝的儿子塞克斯特·塔克文尼冒充客人进入了罗马的貴妇、柯拉金的妻子卢克萊茨亚的屋子；他利用了她的丈夫和父亲都出外作战的机会，在夜間手执利劍潛入她的臥室玷污了她。受到凌辱的卢克萊茨亚叫还丈夫和父亲，告訴他們事情的經過，然后拔出藏在衣服底下的短刀，刺入了自己的心房。——第 248 頁。
- 325** 《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 284 頁。——第 249 頁。
- 326** 參閱本选集，第 2 卷，中文版，第 30—213 頁。——第 250 頁。
- 327**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4 卷，第 288 頁。——第 251 頁。
- 328** 在普列汉諾夫的原稿上写作：“与其說接近于达尔文”。——第 251 頁。
- 329** 在原稿上写作：“然而由于他的邏輯前提的某种錯誤，所以他只是非常独特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第 253 頁。
- 330** 在原稿上写作：“……在著名的小說里”。——第 253 頁。
- 331** 參閱車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上册，1953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 252 頁。——第 254 頁。
- 332** 參閱同上书，第 233 頁。——第 254 頁。
- 333** 參閱同上书，第 235 頁。——第 255 頁。
- 334** 參閱同上书，第 316 頁。——第 255 頁。
- 335**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4 卷，第 699 頁。——第 256 頁。
- 336** 參閱車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上册，1953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

- 294 頁。——第 256 頁。
- 337 參閱同上書，第 434 頁。——第 257 頁。
- 338 《車爾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4 卷，第 279 頁。——第 257 頁。
- 339 參閱車爾尼雪夫斯基：《怎麼辦？》上冊，1953 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版，第 192 頁。——第 258 頁。
- 340 參閱同上書，第 400 頁。——第 258 頁。
- 341 在原稿上寫作：“……我們經不起誘惑，不禁要部分地轉述其中的一段話”。——第 259 頁。
- 342 參閱車爾尼雪夫斯基：《怎麼辦？》上冊，1953 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版，第 173—174 頁。——第 260 頁。
- 343 在原稿上寫作：“在他的從許多方面說來非常出色的論萊辛的著作中”……——第 260 頁。
- 344 《車爾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4 卷，第 190 頁。——第 260 頁。
- 345 同上書，第 3 卷，第 138 頁。——第 260 頁。
- 346 《車爾尼雪夫斯基選集》，上卷，三聯書店版，第 415 頁。——第 261 頁。
- 347 同上書，第 115 頁。——第 262 頁。
- 348 原文如此。——第 262 頁。
- 349 在原稿上寫作：“……直到目前為止，應該承認是完全正確的”。——第 262 頁。
- 350 參閱《車爾尼雪夫斯基選集》，上卷，三聯書店版，第 419 頁。——第 263 頁。
- 351 恩格斯：《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版，第 357—366 頁）。——第 263 頁。
- 352 參閱《車爾尼雪夫斯基選集》，上卷，三聯書店版，第 421 頁。——第 264 頁。

- 353 参閱《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載本选集，第1卷，中文版，第470—501頁。——第265頁。
- 354 原稿上写作：“……但毕竟沒有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它的主要优点”。——第266頁。
- 355 原稿上写作：“……馬克思”。——第266頁。
- 356 引自歌德的詩 «Vanitas! Vanitatum vanitas!» («空虛! 空虛!»)。参閱本卷注66。——第267頁。
- 357 参閱《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127頁。——第267頁。
- 358 这一段直到最末一句“……社会科学的唯一可能的基础”为止，是原稿上所沒有的，大概是普列汉諾夫在校閱清样时加进去的。——第267頁。
- 359 参閱車尔尼雪夫斯基：《美学論文选》，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143頁。——第267頁。
- 360 在原稿上第六章的标题是《人类知識的性质》。——第268頁。
- 361 在原稿上这句话到这里就結束了。——第268頁。
- 362 参閱《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三联书店版，第133—141頁。——第268頁。
- 363 同上书，下卷，第213—214頁。——第272頁。
- 364 参閱同上书，第593頁。——第272頁。
- 365 参閱同上书，上卷，第140頁。

列宁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第四章第一节的补充，专门分析了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这个在列宁看来是非常卓越的論断。列宁在这一节的补充中指出了“車尔尼雪夫斯基是从哪一边批判康德主义的”（《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80·382頁）。——第273頁。

- 366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10 卷，第 731 頁。——第 274 頁。
- 367 同上。——第 275 頁。
- 368 黑格尔：《哲学全书》，第 1 部（黑格尔：《小逻辑》，三联书店版，第 188、189 頁）。——第 276 頁。
- 369 《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 585—628 頁。——第 277 頁。
- 370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7 卷，第 239 頁（附注）。——第 277 頁。
- 371 关于車尔尼雪夫斯基对达尔文的态度，可参閱注 191。——第 277 頁。
- 372 参閱《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 585 頁。——第 278 頁。
- 373 参閱同上书，第 623 頁。——第 279 頁。
- 374 参閱同上书，第 611—612 頁。——第 279 頁。
- 375 参閱同上书，第 624 頁。——第 280 頁。
- 376 参閱同上书，第 628 頁。——第 280 頁。
- 377 参閱同上书，第 593 頁。——第 280 頁。
- 378 参閱同上书，第 620 頁。——第 281 頁。
- 379 原稿上是：“正因为沒有那篇备考”。——第 281 頁。
- 380 参閱本选集，第 3 卷，中文版，注 137。——第 281 頁。
- 381 参閱达尔文：《物种起源》，第三章“生存斗争”（参閱 1955 年，科学出版社版，第 50 頁。譯者按，达尔文的这段話普列汉诺夫是从法譯本轉譯的，与原文有些出入）。——第 283 頁。
- 382 这里指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利用达尔文所犯的馬尔薩斯主义錯誤的反动资产阶级社会学流派。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本质在于：把自然規律，其中包括在动物界和植物界的一定范围内起作用的所謂生存竞争規律，搬到社会現象的領域中去。——第 284 頁。



- 383 恩格斯：《反杜林論》，三联书店版，第 78 頁。——第 285 頁。
- 384 达尔文：《人类原始及类择》，第二十一章：“概述和結論”（參閱达尔文《人类原始及类择》，第九分册，1957 年商务印书館版，第 50 頁）。——第 285 頁。
- 385 曼初斯特学派或自由貿易学派，是 19 世紀前半期的資產階級經濟思想派別。曼初斯特学派贊成自由貿易，主張國家不干涉經濟生活，這表明他們追求資本主義企業經營的自由和力求加強對工人的剝削。——第 285 頁。
- 386 參閱車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1953 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版，第 307 頁。——第 286 頁。
- 387 參閱《現代哲學家的兩種類型》一文，載於《安東諾維奇哲學選集》，1945 年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版，第 18—19 頁。——第 287 頁。
- 388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7 卷，第 760 頁。——第 288 頁。
- 389 “明達的讀者”是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說《怎么办？》中使用過許多次的諷刺性的別號，它指的是具有偽善、庸俗、頭腦遲鈍、過分地自以為深思遠慮的特徵的反動讀者。——第 288 頁。
- 390 參閱《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7 卷，第 761 頁。——第 288 頁。
- 391 同上書，第 3 卷，第 357 頁。——第 289 頁。
- 392 這裡指的是基佐的《歐洲文明史》和《法國文明史》兩書。——第 290 頁。
- 393 原稿上沒有“似乎”這兩個字。——第 290 頁。
- 394 參閱本選集，第 1 卷，中文版，第 580—593 頁。——第 290 頁。
- 395 原稿上是：“……表同情的話”。——第 292 頁。
- 396 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原文是：“一切可能的”。——第 292 頁。
- 397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2 卷，第 736 頁。——第 292 頁。

- 398 参閱馬克思：《雇佣劳动与資本》（《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1961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86頁）。——第293頁。
- 399 原稿上是：“大概”。——第293頁。
- 400 参閱《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2卷，第572—573頁。——第294頁。
- 401 同上书，第573、736頁。——第295頁。
- 402 参閱《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378—379頁。——第296頁。
- 403 参閱同上书，第379—380頁。——第297頁。
- 404 参閱同上书，第381頁。——第297頁。
- 405 参閱同上书，第380頁。——第298頁。
- 406 参閱同上书，第380—381頁。——第298頁。
- 407 同上书，第9卷，第516頁。——第299頁。
- 408 同上书，第4卷，第236—237頁。——第300頁。
- 409 同上书，第243頁。——第301頁。
- 410 同上书，第244頁。——第301頁。
- 411 参閱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00頁）。——第302頁。
- 412 参閱同上。——第302頁。
- 413 参閱《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387—388頁。——第304頁。
- 414 这里說的是羅馬历史学家老普林尼的一句有名的話（出自《自然史》第18卷，第7章），这句话評述了公元一世紀羅馬帝国危机时期意大利的大地产的增长。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資本和劳动》一文（《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317頁）中，引证了普林尼的話。——

- 第 305 頁。
- 415 这里是暗示米海洛夫斯基在《什么是进步?》一文中提出的“进步公式”。参閱注 1042。——第 305 頁。
- 416 原稿上漏了“还”字。——第 306 頁。
- 417 参閱《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 391 頁。——第 306 頁。
- 418 原稿上沒有引证洛貝尔图斯和彼得魯雪夫斯基的話，大概是普列汉諾夫在校样上补充进去的。——第 307 頁。
- 419 参閱《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 389—390 頁。——第 308 頁。
- 420 参閱同上书，第 391 頁。——第 308 頁。
- 421 参閱同上书，第 402 頁。——第 309 頁。
- 422 只有“野玫瑰”出版社的版本上才有这个附注，原稿上沒有这个附注。——第 310 頁。
- 423 参閱《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 410—411 頁。——第 310 頁。
- 424 原稿上写作：“……这些論断毕竟是以完全正确的思想为基础的，虽然这个思想显然远沒有經過赫尔岑充分周密考虑过……”。——第 312 頁。
- 425 原稿上写作：“……显然在他那里沒有达到十分明显的地步”。下一句話：“也远沒有彻底深思熟虑过”，是“野玫瑰”出版社的版本中补充进去的。这句话的脚注也是原稿上沒有的。——第 312 頁。
- 426 参閱《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 402—403 頁。——第 313 頁。
- 427 席勒，《胜利者的凱旋》《席勒选集》，1954 年苏联国家文学书籍出版社版，第 38 頁。——第 313 頁。

- 428 原稿上写作：“在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描写中……是……”。——第 314 頁。
- 429 参閱《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 405 頁。——第 314 頁。
- 430 参閱同上书，第 407 頁。——第 314 頁。
- 431 参閱本卷第 277 頁及以下。——第 315 頁。
- 432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7 卷，第 475—480 頁。——第 315 頁。
- 433 原稿上写作：“……认真的分析”。——第 315 頁。
- 434 参閱《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7 卷，第 476 頁。——第 316 頁。
- 435 同上书，第 477 頁。——第 316 頁。
- 436 同上书，第 478 頁。——第 317 頁。
- 437 同上。——第 318 頁。
- 438 馬克思：《評基佐〈英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版，第 247—253 頁）。——第 322 頁。
- 439 参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版，第 250—251 頁。——第 323 頁。
- 440 参閱馬克思：《資本論》，第 1 卷，1963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71 頁。——第 323 頁。
- 441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7 卷，第 429—440 頁。——第 324 頁。
- 442 穴居人（源自希腊文 *τρωγλοδυτήε*，即居住在洞穴或山洞中的人）——在古代泛指处于低級文化发展阶段、还不会建筑住屋的民族。  
列斯特里干納人——希腊神話中凶殘的巨人。在荷馬的史詩《奧德賽》中，奧德賽在自己漫游时险遭列斯特里干納人的毒手。——第 325 頁。
- 443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7 卷，第 429—430 頁。——第 325 頁。
- 444 同上书，第 430 頁。——第 325 頁。

- 445 同上书,第 433 頁。——第 327 頁。
- 446 原稿上是:“……注定会使”。——第 327 頁。
- 447 原稿上是:“……在这儿不应该忘掉”。——第 328 頁。
- 448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4 卷,第 70—71 頁。——第 333 頁。
- 449 参閱本选集,第 2 卷,中文版,第 336—375 頁。——第 334 頁。
- 450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10 卷,第 910 頁。——第 336 頁。
- 451 同上书,第 911 頁。——第 337 頁。
- 452 同上书,第 915—916 頁。——第 337 頁。
- 453 参閱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規章》(《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 1 卷,1958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363 頁)。——第 338 頁。
- 454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10 卷,第 917 頁。——第 338 頁。
- 455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10 卷,第 919 頁。——第 339 頁。
- 456 同上书,第 879 頁。——第 340 頁。
- 457 馬克思:《費尔巴哈論綱》(参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版,第 3 頁)。——第 341 頁。
- 458 列宁在对普列汉諾夫的著作的評論中,着重指出了以下这句话:“車尔尼雪夫斯基也象自己的老师一样,几乎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人类的‘理論’活动上……”——并在頁边批道:“普列汉諾夫所著《車尔尼雪夫斯基》一书的缺点也是这样”(《列宁全集》,第 38 卷,人民出版社版,第 595 頁)。——第 341 頁。
- 459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10 卷,第 962 頁。——第 342 頁。
- 460 同上书,第 970 頁。——第 342 頁。
- 461 同上书,第 962 頁及以下。——第 343 頁。
- 462 原稿上写作:“……基础”。——第 343 頁。

- 463 参阅达尔文：《人类由来及类择》，第2章；《人类自较低等形式发达之方式》（参阅达尔文著《人类原始及类择》，第一分册，1957年商务印书馆版，第82页）。——第343页。
- 464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924—925页。——第343页。
- 465 同上书，第924页。——第344页。
- 466 同上。——第344页。
- 467 原稿上没有这个边注。——第345页。
- 468 参阅《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288页。——第346页。
- 469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4卷，第5页。——第343页。
- 470 同上书，第6—7页。——第349页。
- 471 同上书，第7页。——第349页。
- 472 参阅《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三联书店版，第402页附注。——第350页。
- 473 参阅車尔尼雪夫斯基：《美学论文选》，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128页。——第352页。
- 474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4卷，第9页。——第353页。
- 475 参阅車尔尼雪夫斯基：《美学论文选》，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127页。——第353页。
- 476 参阅同上书，第132页。——第353页。
- 477 参阅同上书，第134页。——第354页。
- 478 参阅同上书，第135页。——第354页。
- 479 参阅同上书，第130页。——第356页。
- 480 原稿上没有“完全”这两个字。——第358页。

- 481 參閱《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第 457—458 頁。——第 360 頁。
- 482 參閱同上书，第 6 頁。——第 360 頁。
- 483 參閱同上书，第 102 頁。——第 361 頁。
- 484 《普列汉諾夫全集》，第 10 卷，第 178 頁及以下。——第 361 頁。
- 485 《再論原始民族的艺术》一文是《沒有地址的信》中的第三封信（參閱《普列汉諾夫全集》，第 14 卷，第 53—73 頁）。——第 362 頁。
- 486 《普列汉諾夫全集》，第 6 卷，第 245—289 頁，以及本选集第 5 卷。——第 363 頁。
- 487 參閱《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三联书店版，第 7—8 頁。——第 365 頁。
- 488 原稿上是：“……我們看到人們不同的文学观点和不同的美学概念”。——第 366 頁。
- 489 引自茹柯夫斯基的叙事詩《阿丽娜与阿尔辛》。第一行詩稍微作了修改。茹柯夫斯基的原文是：“活泼的容顏看起来是可爱的……”（《茹柯夫斯基全集》，1954 年苏联国家文学书籍出版社版，第 134 頁）。——第 366 頁。
- 490 參閱《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三联书店版，第 8 頁。——第 366 頁。
- 491 黑格尔：《美学讲演录》，第 1 卷（參閱黑格尔：《美学》，第 1 卷，1959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 210—211 頁），第 2 卷（《黑格尔全集》，第 13 卷，俄文版，第 158—161 頁）。——第 367 頁。
- 492 參閱車尔尼雪夫斯基：《美学論文选》，1958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 140—141 頁。——第 368 頁。
- 493 參閱同上书，第 140 頁。——第 368 頁。
- 494 參閱同上书，第 144 頁。——第 369 頁。
- 495 參閱同上书，第 144—145 頁。——第 372 頁。

- 496 参閱歌德:《威廉·迈斯脫的求学时代》(《歌德全集》,第7卷,1935年苏联国家文学书籍出版社版)。——第373頁。
- 497 参閱車尔尼雪夫斯基:《美学論文选》,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151頁。——第373頁。
- 498 “野玫瑰”出版社的版本中漏掉了“成就”这两个字,这显然是錯誤的。——第374頁。
- 499 普列汉諾夫:《車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理論》(《普列汉諾夫全集》,第6卷,第245頁;又,参閱本选集第5卷)。——第374頁。
- 500 《別林斯基全集》,第11卷,第576頁。——第375頁。
- 501 同上。——第375頁。
- 502 同上书,第8卷,1955年俄文版,第82頁。——第377頁。
- 503 同上书,第10卷,1956年俄文版,第7—50頁。——第377頁。
- 504 同上书,第7頁。在原稿的脚注中有引自別林斯基著作的引文,我們沒有采用这段引文。——第377頁。
- 505 参閱《別林斯基选集》,第2卷,1952年中文版,第399—400頁。——第378頁。
- 506 参閱《別林斯基全集》,第23頁。——第378頁。
- 507 参閱《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三联书店版,第445—446頁。——第379頁。
- 508 参閱同上书,第446頁。——第379頁。
- 509 参閱同上书,第448頁。——第380頁。
- 510 参閱普列汉諾夫:《別林斯基的文学观点》(《普列汉諾夫全集》,第10卷,第303—304頁;又,参閱本选集第5卷)。——第383頁。
- 511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4卷,第506—507頁。——第385頁。
- 512 同上书,第5卷,第168—169頁。——第386頁。



- 513 同上书,第160頁。——第387頁。
- 514 同上书,第168頁。——第388頁。
- 515 同上书,第172頁。——第389頁。
- 516 同上书,第171頁。——第389頁。
- 517 同上书,第173頁。——第389頁。
- 518 參閱同上书,第174頁。——第390頁。
- 519 原稿上写作:“然而当产生了这样的問題,即在什么限度內……”。——第390頁。
- 520 參閱《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7卷,第858—859頁。——第393頁。
- 521 同上书,第859頁。——第393頁。
- 522 同上书,第862頁。——第394頁。
- 523 同上书,第875頁。在最近一版《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中,根据手稿校正如下:“法国农民博得了全世界的名声,〔因为他們的迟鈍的力量把最近时期法国出現的追求美好事物的意图的一切萌芽都扼杀了〕”。——第394頁。
- 524 同上书,第875頁。——第394頁。
- 525 同上。——第395頁。
- 526 原稿上写作:“不同意”。——第397頁。
- 527 參閱《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7卷,第876—877頁。——第398頁。
- 528 同上书,第863頁。——第398頁。
- 529 不久之前查明,米·尼·車尔尼雪夫斯基把《普列謝也夫的詩》一文收入他父亲的全集是錯誤的。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米哈伊洛夫。它也錯誤地收入了最近一版的《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关于这一点可參閱查哈尔金的《关于革命詩人米哈伊洛夫的新材料》一文(《苏联科学院通报。文学和語言之部》,第12卷,第5册,1953年莫斯科版,第

- 434—435 頁)。——第 399 頁。
- 530 參閱《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7 卷，第 960 頁。——第 399 頁。
- 531 普列謝也夫：《前进！莫恐惧，莫迟疑……》，《詩集》，“苏联作家”出版社，1950 年列宁格勒版，第 26 頁。——第 400 頁。
- 532 皮薩列夫：《普希金和別林斯基》，《皮薩列夫文集（四卷集）》，第 3 卷，1956 年苏联国家文学书籍出版社版，第 364 頁。——第 401 頁。
- 533 同上书，第 366 頁。——第 401 頁。
- 534 同上书，第 420 頁。——第 402 頁。
- 535 原稿上是：“……只进行斗争”。——第 404 頁。
- 536 參閱皮薩列夫：《普希金和別林斯基》，《皮薩列夫文集（四卷集）》，第 3 卷，第 377—378 頁。——第 405 頁。
- 537 參閱《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7 卷，第 863 頁。——第 405 頁。
- 538 《皮薩列夫文集（四卷集）》，第 1 卷，第 110 頁。——第 406 頁。
- 539 參閱《皮薩列夫文集（四卷集）》，第 3 卷，第 368—369 頁。——第 408 頁。
- 540 同上书，第 370—371 頁。——第 408 頁。
- 541 同上书，第 2 卷，第 359 頁。——第 412 頁。
- 542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2 卷，第 239—240 頁。——第 414 頁。
- 543 同上书，第 240 頁。——第 414 頁。
- 544 同上书，第 3 卷，第 422—423 頁。——第 415 頁。
- 545 同上书，第 425—426 頁。——第 416 頁。
- 546 參閱同上书，第 429 頁。——第 417 頁。
- 547 同上书，第 431 頁。——第 417 頁。
- 548 參閱同上书，第 10 卷，第 508—510 頁及以下。——第 418 頁。

- 549 《卓尔尼雪夫斯基在西伯利亚》一文，是普列汉诺夫論卓尔尼雪夫斯基的一系列著作中的最后一篇。該文写于1912年，是直接为了卓尔尼雪夫斯基寄自苦役所和維留依斯克流放所的书信的出版而写的，这些书信在1912年由里雅茨基和卓尔尼雪夫斯基的儿子米哈伊尔·尼古拉也維奇第一次发表。普列汉诺夫在收到該书第一卷后，于1912年5月30日写信給里雅茨基說：“感謝您寄給我《卓尔尼雪夫斯基在西伯利亚》一书。这本书使人产生真正极其强烈的印象。”（普列汉诺夫紀念館档案）。普列汉诺夫的文章是在卓尔尼雪夫斯基的动人的书信所产生的生动印象下写成的，它以新的特色描繪出卓尔尼雪夫斯基的精神面貌。这篇文章发表于《同时代人》杂志1913年第3期第213—229頁。在《普列汉诺夫全集》中，它收入第6卷。本版根据的是《同时代人》的原文。在普列汉诺夫紀念館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这篇文章的手稿。——第419頁。
- 550 1866年8月，卓尔尼雪夫斯基的妻子奧里珈·索克拉托夫娜带着小儿子米海依尔到卡达依去看他。她和他在一起共住了四天，因为他自己劝她尽早离去。显然这是由于他为她的命运担忧，因为这时有人有营救卓尔尼雪夫斯基的計劃，而第三厅认为她有参与这些計劃的嫌疑（參閱許尔金：《卓尔尼雪夫斯基的生平和創作概論》，1956年苏联国家文学书籍出版社版，第145頁）。——第420頁。
- 551 由于为奧里珈·索克拉托夫娜的命运担忧，卓尔尼雪夫斯基还請求她改嫁“任何哪一个高尚的人”。这是用假結婚和改姓的办法来使她免受警察迫害的一种方法。——第420頁。
- 552 貝平写信給卓尔尼雪夫斯基說：“……我过去和現在尽我的力量为奧·索和孩子们做了一切；——我只是为你而伤心，因为你竟能听到一些消息而感到不安，因为你不再相信我。如果你在这里的話，我們只要作五分钟的談話，就能使你在这方面安心了……难道我和我們大家还需要使你相信，現在我們敬爱你，而且永远会敬爱你嗎？……单是这一点，单是想到你，我們就不可能对奧·索采取另一种不应当采取的态度……我已經过了不少令人煩惱的日子——为自己、为你和你的家人——我不打算数一数这些日子并由此来证明我的话”（貝平的

- 信, 参阅《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西伯利亚。与亲人的通信》, 第 1 册, 1912 年圣彼得堡版, 第 110—118 頁)。——第 421 頁。
- 553 以上所有的引文都引自 1875 年 3 月 8 日給貝平的信(参阅《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 第 14 卷, 第 588—595 頁)。——第 422 頁。
- 554 引自 1875 年 3 月 28 日給貝平的信(参阅同上书, 第 600 頁)。——第 422 頁。
- 555 参阅同上书, 第 594 頁。——第 422 頁。
- 556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 第 14 卷, 第 603 頁。——第 423 頁。
- 557 参阅同上书, 第 688 頁。在車尔尼雪夫斯基給奧里珈·索克拉托夫娜的信中經常重复这样的劝她相信的話。——第 423 頁。
- 558 以上所有的引文都引自 1872 年 5 月 17 日給奧·索·車尔尼雪夫斯卡娅的信。参阅《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 第 14 卷, 第 517—519 頁。——第 424 頁。
- 559 《涅克拉索夫著作和书信全集》, 第 3 卷, 1949 年苏联国家文学书籍出版社版, 第 39—40 頁(譯文參見涅克拉索夫:《俄罗斯女人》, 1957 年新文艺出版社版, 第 39 頁)。——第 425 頁。
- 560 見前引的 1875 年 3 月 28 日的信(参阅《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 第 14 卷, 第 601 頁)。——第 425 頁。
- 561 这两句引文均見《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 第 15 卷, 第 81, 82 頁。——第 425 頁。
- 562 普列汉诺夫在 1888 年底給斯杰普涅克—克拉夫欽斯基的信中, 曾向他建議合写一部书, 在这部书中他們将叙述“……从諾維柯夫和拉吉舍夫(先用几句话提一下克里扎尼契和波沙希科夫)开始的”俄国文学的殉教者列传。他接着写道:“我們〔将〕叙述叶卡特林娜二世的虚伪的自由主义, 叙述保罗皇帝的书报检查机关的暴戾, 叙述普希金和萊蒙托夫的流放, 叙述屠格涅夫为了一篇贊揚果戈里文章而遭逮捕, 叙述格利波也多夫的流放, 叙述波列扎也夫被罰当兵, 叙述柯斯托馬

罗夫、舍夫琴柯、陀思妥也夫斯基、米哈伊洛夫、車尔尼雪夫斯基所受到的迫害，叙述别林斯基只因为死亡才免于关进‘杜别里特的住宅’（杜别里特是宪兵团长。——譯者）”（《普列汉諾夫遺著》，第6卷，1938年苏联社会經济出版社版，第388頁）。——第426頁。

563 普列汉諾夫指的是1909年“野玫瑰”出版社出版的他的《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一书。——第426頁。

564 参閱《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73頁。——第427頁。

565 参閱同上书，第449—450頁。——第428頁。

566 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許多书信里都回到关于达尔文的問題上来。他尖銳地批判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論，同时也承认“达尔文当然是个天才的人物”（《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4卷，第540頁），并为“达尔文的渊博的学問和性格的高尚說公道話”（《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5卷，第687頁）。

他对自己的儿子亚历山大的問題：“难道他是达尔文主义的反对者嗎？”，作了这样的回答：“問題在于：我是一个老年人了。我是根据18世紀的书籍、而主要是根据拉馬克来形成我关于植物史和动物史的思想方式的。在我看来，达尔文主义就其正确的方面來說也不是新发现。然而，达尔文是根据居維叶的著作进行学习的，他并不知道拉馬克（这是一个謙虛的人，他本人也意識到这点），而对科学來說不幸的是，他从馬尔薩斯那里得到了促使他去思索开始在他头脑中模糊地出現的真理的推动力……馬尔薩斯主义的骯髒的东西也就混进了达尔文学說……”（同上书，第14卷，第643頁）。——第429頁。

567 普列汉諾夫指的是所謂“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徒們。参閱本卷注382。——第429頁。

568 参閱《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448頁。——第430頁。

569 参閱同上书，第459—460頁。——第430頁。

- 570 普列汉诺夫指的是斯切克洛夫在《卓尔尼雪夫斯基的生平和活动(1828—1889年)》一书(出版于1909年)中所发挥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卓尔尼雪夫斯基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而且按其历史观点来说接近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普列汉诺夫在关于斯切克洛夫的这部著作的书评中批评了这些论点,这篇书评以《再论卓尔尼雪夫斯基》为题发表于1910年的《现代世界》四月号(《普列汉诺夫全集》,第6卷,第346—370页)。——第431页。
- 571 寄给卓尔尼雪夫斯基的书籍中间有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些书籍的清单发表在他的1872年9月30日的信的注释中(参阅《卓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4卷,第843—844页)。——第431页。
- 572 《卓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5卷,第34、35页。——第433页。
- 573 这里指的是安东诺夫的《尼·加·卓尔尼雪夫斯基。社会哲学的研究》一书,莫斯科1910年版。在题为《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论卓尔尼雪夫斯基学说》的第七章第五节中,安东诺夫写道:“贝尔托夫先生的批评是建立在……这样粗鲁的错误之上的,中学低年级生犯了这样的错误就只能得一分”(该书,第252页)。——第433页。
- 574 《卓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5卷,第70页。——第434页。
- 575 参阅《卓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479页。——第435页。
- 576 参阅同上书,第470页。——第435页。
- 577 参阅同上书,第470—471页。——第436页。
- 578 参阅同上书,第467页。——第436页。
- 579 卓尔尼雪夫斯基在同一封信中谈到自然科学家卡尔·恩斯特·贝尔的定律(参阅同上书,第467—468页)。——第436页。
- 580 参阅同上书,第469页。——第437页。
- 581 普列汉诺夫在这里叙述的是卓尔尼雪夫斯基从流放归来后为俄译本韦伯世界史所写的一篇附录中所发挥的思想。这篇附录的标题是:

《产生进步的诸因素的一般性质》(參閱《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907—928頁)。——第437頁。

582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4卷，第644—645頁。——第438頁。

583 參閱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62頁)。——第439頁。

584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5卷，第87—88頁。——第440頁。

585 在写于1917年的《涅克拉索夫的安葬》一文中，普列汉諾夫詳細地叙述了拿着手枪和“社会主义者敬献”的花圈走向墓地的土地自由党人的示威游行。比起普希金来，涅克拉索夫这位民間疾苦的歌手对这些革命青年更亲近些，普列汉諾夫也是这些革命青年之中的一个，他在墓地上发表了演說。普列汉諾夫写道：“我在开始演說时指出，涅克拉索夫沒有局限于歌颂歌舞女神的腿，而把民間的主题引进了自己的詩歌。含意是十分明显的。我同样也說到普希金。不言而喻，我对待普希金是完全不对的……但是我們当时的心情就是这样”(參閱《普列汉諾夫遺著》，第6卷，第237頁)。

參閱陀思妥也夫斯基的《一个作家的日記》中关于这段情节的回忆(《陀思妥也夫斯基全集》，第12卷，1929年苏联国家出版社版，第348—349頁)。——第440頁。

586 論文《別林斯基与合理的现实》<sup>①</sup>是普列汉諾夫在1897年写的。在存稿中保留了H. A. 盖尔德1897年5月30日給普列汉諾夫的一封信，她說論文已誊写好，即将寄出(給《新語》杂志)。論文用“H. 卡明斯基”的笔名发表于公开刊物《新語》杂志上(1897年，第10期，第2部，第1—28頁；第11期，第2部，第1—22頁)，作为連載論文《俄国

① 在普列汉諾夫紀念館文稿保管所里保存着他关于別林斯基所写的文章的不完全的亲笔稿、預备資料、初稿、草稿，其中大部分已发表于論文集《格·瓦·普列汉諾夫遺著》第6卷(1938年莫斯科版)。在預备資料中有：根据巴甫連柯夫的四卷集(1876年圣彼得堡版)对別林斯基著作所做的分析批評；对A. H. 貝平的《別林斯基，他的生活和通信集》(1876年圣彼得堡版)一书的分析批評；对A. П. 伏伦斯基的《俄国的批評家》(1896年版)，对皮薩列夫的論文《普希金和別林斯基》(《皮薩列夫全集》第5卷，1894年圣彼得堡版)的分析批評以及眉批、提綱等等。

批評的命运》的第二篇論文。后来，它在論文集《二十年来》中重印了三版（1905, 1906, 1908年），經普列汉諾夫作了一些不重要的文体上的修改。它也被收进格·瓦·普列汉諾夫的論文集《文学与批評》，“新莫斯科”出版社 1922 年版；也被收进《維·格·別林斯基》，国家出版社 1923 年莫斯科—彼得堡版。

本书所引論文是根据全集（第10卷，第 201—252 頁）原文排印的；全集原文同普列汉諾夫在世时最后出版的版本：别尔托夫（格·瓦·普列汉諾夫）《二十年来》論文集（1908 年圣彼得堡版，第 164—213 頁），以及保存在普列汉諾夫紀念館档案中的 1897 年亲笔草稿（它是論文的不完全的原文）核对过。——第 443 頁。

- 587 《拜伦选集》，苏联国家文学书籍出版社，1953 年莫斯科版，第 388 頁。  
——第 443 頁。
- 588 《屠格涅夫全集》（十二卷本），第 10 卷，苏联国家文学书籍出版社，1956 年莫斯科版，第 280 頁。——第 443 頁。
- 589 阿·里·伏伦斯基：《俄国的批評家。文学特写》，1896 年圣彼得堡版。普列汉諾夫在一篇专文中批評过这本书（見《普列汉諾夫全集》，第10卷，第165—197頁）。——第 443 頁。
- 590 參閱別林斯基四卷集，弗·巴育連柯夫出版社，1896 年圣彼得堡版；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論文載于第 4 卷，第 I—XLVI 頁。所引的一段見第 XXXI 頁。——第 446 頁。
- 591 參閱拜伦：《曼弗雷德》，新文艺出版社版，第75頁。——第 449 頁。
- 592 參閱《圣西門选集》，上卷，1962 年商务印书館版，第 103 頁（脚注）。——第 452 頁。
- 593 謝林：《先驗的唯心主义体系》，苏联国家社会經济书籍出版社，1936 年列宁格勒版，見第 344 頁等頁。——第 452 頁。
- 594 參閱弗·恩格斯：《反杜林論》，1962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22 頁。——第 453 頁。
- 595 參閱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1959 年商务印书館版，第513—



- 514 頁。——第 454 頁。
- 596 阿·伊·赫尔岑,《往事与回忆》(見十三卷本全集,第 9 卷,1956 年苏联科学院版,第 23 頁)。在这里和下面,普列汉諾夫显然是为了避免检查,把赫尔岑的話“革命的代数学”,改成“进步的公式”。——第 454 頁。
- 597 参閱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1957 年三联书店版,第 107 頁。——第 455 頁。
- 598 在《普列汉諾夫全集》中和在论文集《二十年来》(1908 年)中漏掉了“不是”一詞。这个地方的原稿沒有保存。——第 455 頁。
- 599 “绝对”这个詞是根据原稿恢复的。——第 456 頁。
- 600 原稿是:“为卢格所指出的一些缺点”。——第 457 頁。
- 601 見黑格尔全集,第 7 卷,苏联国家社会經济书籍出版社,1934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 5—19 頁。——第 458 頁。
- 602 圣西門:关于万有引力的論著(参閱《圣西門选集》,上卷,1962 年商务印书館版,第 153 頁)。——第 458 頁。
- 603 在草稿中为“司法的”。——第 458 頁。
- 604 所引的話是德米特里·加里宁即維·格·別林斯基的同名“戏剧小說”中的主人公說的(見《別林斯基全集》,第 1 卷,1953 年苏联科学院版,第 498—499 頁)。——第 461 頁。
- 605 在說到在这一时期对別林斯基所起的影响时,当然不应仅仅以席勒为限。法国启蒙主义的思想,拉吉舍夫和十二月党人的反对农奴制度的革命思想也清楚地表現在戏剧小說《德米特里·加里宁》中(見 M. 波里亚科夫,《別林斯基在莫斯科》,“莫斯科工人”,1948 年版,第 56 頁及以下各頁;B. C. 涅恰也娃,《維·格·別林斯基》,1949 年苏联科学院版,第 16—18 章;《伟大的俄国思想家維·格·別林斯基》,论文集,З. В. 斯米尔諾娃主編,1948 年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 56—65 頁;《俄国文学史》第 7 卷,1955 年苏联科学院版,第 39—40 頁)。

——第 461 頁。

- 606 見維·格·別林斯基 1839 年 9 月 29 日—10 月 8 日給 H. B. 斯坦凱維奇的信(《別林斯基全集》, 第 11 卷, 1956 年苏联科学院版, 第 385 頁)。——第 461 頁。
- 607 《別林斯基全集》, 第 11 卷, 第 385—386 頁。——第 461 頁。
- 608 見亞·伊·赫爾岑, 論俄國革命思想的发展(十三卷本全集, 第 7 卷, 1956 年苏联科学院版。譯自法文本, 見第 214—215 頁)。——第 462 頁。
- 609 亞·尼·貝平从納杰日丁那里所引的一段是从“我們的創作”几个字开始的。——第 462 頁。
- 610 亞·尼·貝平:《別林斯基, 他的生平和通信》, 第 1—2 卷, 1876 年圣彼得堡版。——第 462 頁。
- 611 《別林斯基选集》, 第 1 卷, 1963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版, 第 122 頁。——第 463 頁。
- 612 米·巴·是米哈伊尔·巴枯宁。巴枯宁一家所住的农村是“普里亚摩兴諾”。——第 463 頁。
- 613 見別林斯基 1838 年 8 月 14 日給巴枯宁的信(《別林斯基全集》, 第 11 卷, 第 271 頁)。——第 463 頁。
- 614 見別林斯基 1837 年 8 月 16 日給米·亞·巴枯宁的信(同上书, 第 175 頁)。——第 463 頁。
- 615 見別林斯基 1838 年 10 月 12 日給米·亞·巴枯宁的信(同上书, 第 320 頁)。——第 464 頁。
- 616 見維·格·別林斯基 1837 年 8 月 16 日給米·亞·巴枯宁的信(同上书, 第 175 頁)。——第 464 頁。
- 617 別林斯基 1838 年 6 月 20 日給米·亞·巴枯宁的信(同上书, 第 245 頁)。——第 465 頁。

- 618 伊·謝·屠格涅夫,《文学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回忆》,第2章。《回忆别林斯基》(《文集》,第10卷,1956年版,第280頁)(見注588)。——第465頁。
- 619 《弗·費·奧多也夫斯基公爵的文件摘录》,見《俄国文献》第1册,1874年版,第339頁。——第466頁。
- 620 这是引自詩集《致拉扎尔》中的亨·海涅写的詩《丢掉自己的譬喻罢……》里的一节。——第466頁。
- 621 引号是根据原稿恢复的。——第467頁。
- 622 华格納是歌德的《浮士德》中的人物。——第467頁。
- 623 摘自給德·彼·伊万諾夫的信(《别林斯基全集》,第11卷,第147—148頁)。——第468頁。
- 624 同上书,第148頁。——第468頁。
- 625 同上。——第468頁。
- 626 《别林斯基全集》,第11卷,第151—152頁。——第469頁。
- 627 同上书,第148頁。——第469頁。
- 628 同上。——第469頁。
- 629 同上书,第149頁。——第469頁。
- 630 《别林斯基全集》,第11卷,第151頁。——第470頁。
- 631 指米·亞·巴枯宁。——第470頁。
- 632 别林斯基1839年9月29日—10月8日給尼·弗·斯坦凱維奇的信(《别林斯基全集》,第11卷,第386—387頁)。——第471頁。
- 633 别林斯基用的是“独特的”。——第471頁。
- 634 别林斯基1838年10月10日給米·亞·巴枯宁的信(《别林斯基全集》,第11卷,第282—283頁)。——第472頁。
- 635 同上书,第284頁。——第472頁。

- 636 別林斯基是說“我仔細看这些彈簧, 这些手段”。——第 472 頁。
- 637 《別林斯基全集》, 第 11 卷, 第 284 頁。——第 472 頁。
- 638 同上書, 第 11 卷, 第 292 頁。普列汉諾夫在这段引文中把“本能的”錯誤地写成“理智的”。——第 473 頁。
- 639 指的是維·格·別林斯基的書評《鮑羅金諾戰役概論 (1812 年的回忆)》。〈俄國軍官的信〉的作者費·格林卡的著作。1839 年莫斯科版。——第 473 頁。
- 640 見《別林斯基全集》, 第 3 卷, 1953 年版, 第 328 頁。——第 473 頁。
- 641 見同上書, 第 332—333 頁。——第 474 頁。
- 642 无所謂內, 无所謂外, 內即是外, 外即是內。(見 *Goethe's Werke, Berlin, Ausgabe Gustav Hempel, th. 2, S. 230*) (見《歌德全集》, 第 2 卷, 柏林古斯塔夫·亨柏爾版, 第 230 頁)——第 474 頁。
- 643 《鮑羅金諾戰役概論》(見《別林斯基全集》, 第 3 卷, 第 340 頁)。——第 475 頁。
- 644 維·格·別林斯基, 《門采爾, 歌德的批評者》(見同上書, 第 414 頁)。——第 475 頁。
- 645 維·格·別林斯基, 《〈聰明誤〉。格里鮑耶多夫作品, 第二版》(同上書, 第 438 頁)。——第 475 頁。
- 646 維·格·別林斯基, 《門采爾, 歌德的批評者》(同上書, 第 395 頁)。——第 476 頁。
- 647 摘自對《米什勒作品: 截至法國革命止的法國簡史》的書評(見同上書, 第 2 卷, 第 470 頁)。——第 476 頁。
- 648 在原稿中是“在說出自己的妥協思想時……”。——第 477 頁。
- 649 指的是季·尼·格蘭諾夫斯基 1840 年 7 月 20 日給亞·米·涅維羅夫的一封信, 這封信說: 巴枯寧第一個起來反對別林斯基關於鮑羅金諾戰役的論文, 以後他却慫恿別林斯基寫這些論文(見《季·尼·格蘭諾夫斯基和他的通信集》第 1 卷, 1897 年莫斯科版, 第 108 頁)。——第

477 頁。

- 650 見《別林斯基全集》，第3卷，第327頁。——第479頁。
- 651 引自別林斯基1840年2月26日給米·亞·巴枯寧的信（《別林斯基全集》，第11卷，第486頁）。——第482頁。
- 652 同上，第426頁。——第482頁。
- 653 這是對於別林斯基1839年9月29日—10月8日給尼·弗·斯坦凱維奇的信的不正確的引證（《別林斯基全集》，第11卷，第386—387頁）（按這段話原信是這樣的：“夏天他（指巴枯寧）翻閱了黑格爾的宗教哲學和法哲學。給我們打開了新的世界。力量就是權利，權利也就是力量，——不，我們是以怎樣的感情聽到這些話的，這是非筆墨能描寫的——這是一種解放。我理解了王國崩潰的思想，征服者的完結，我理解了沒有野蠻的物質力量，沒有刺刀和劍的統治，沒有專橫，沒有偶然性，——而我对人类的苦痛的监护也就結束了，我的祖國的意义对我也就以新的形式呈現出來了”。——譯者）。——第483頁。
- 654 引自維·格·別林斯基1841年3月1日給瓦·彼·波特金的一封信（《別林斯基全集》，第12卷，1956年蘇聯科學院版，第22—23頁）。——第484頁。
- 655 《別林斯基全集》，第12卷，第22頁。——第486頁。
- 656 1908年版沒有這句話。——第487頁。
- 657 引自1840年12月30日——1841年1月22日給瓦·彼·波特金的信（《別林斯基全集》，第12卷，第13頁）——第487頁。
- 658 在普列漢諾夫全集中和文集《二十年來》中，在這裡錯誤地印着“幻想的”。見《別林斯基全集》，第12卷，第51頁。——第487頁。
- 659 引自1841年6月27—28日給瓦·彼·波特金的信（《別林斯基全集》，第12卷，第51—52頁）。——第487頁。
- 660 同上，第66頁。——第487頁。
- 661 引自1840年12月10—11日給瓦·彼·波特金的信（《別林斯基全集》，

- 第 11 卷, 第 576 頁)。——第 488 頁。
- 662 同上。——第 488 頁。
- 663 別林斯基在 1841 年初就 U. U. 果里科夫著作和其他論述彼得大帝的著作的第二版所写的論彼得大帝的第一和第二篇論文, 見《別林斯基全集》, 第 5 卷, 1954 年版, 第 91—152 頁。——第 488 頁。
- 664 亞·尼田科的《論批評的演說……》。論文第 1, 2, 3 篇 (見《別林斯基全集》, 第 6 卷, 第 267—334 頁)。——第 489 頁。
- 665 見本卷注 1126。——第 489 頁。
- 666 引自 1847 年 2 月 17 日給瓦·彼·波特金的信 (《別林斯基全集》, 第 12 卷, 第 329 頁)。——第 490 頁。
- 667 普列汉諾夫說“赫爾岑沒有學好辯證法”是錯誤的。關於赫爾岑對辯證法的理解, 特別是他對“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這一公式的解釋, 以及他對蒲魯東的態度, 見本卷注 1221 和注 1051。——第 491 頁。
- 668 見《赫爾岑全集》(三十卷本), 第 9 卷, 1956 年版, 第 22 頁。——第 491 頁。
- 669 以前各版都錯誤地印為“отменить”(“廢除”)。——第 492 頁。
- 670 《新語》雜誌(1897 年第 7 期) 在彼·別·司徒盧威以筆名 Novus 發表的論文《雜談。II. 齊契林先生和他對過去的回顧》中, 引用了瓦·彼·波特金的言論, 見第 50 頁及以下各頁。——第 494 頁。
- 671 見《聖西門選集》, 下卷, 1962 年商務印書館版, 第 75—168 頁。——第 494 頁。
- 672 阿列克西斯·得·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主義》頭兩卷於 1835—1840 年出版。——第 495 頁。
- 673 見《別林斯基全集》, 第 8 卷, 1955 年蘇聯科學院出版社版, 第 392—393 頁。——第 495 頁。
- 674 康·德米·卡維林, 《回憶維·格·別林斯基》(1874) (見《卡維林全

集》，第3卷，1899年圣彼得堡版，第1081--1098頁）。普列汉諾夫所引证的地方在措詞上稍有不同，見第1091頁。也見《同时代人回忆中的别林斯基》，1948年苏联国家文学书籍出版社版，第91頁。——第496頁。

675 《别林斯基全集》，第10卷，1956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版，第21頁。——第497頁。

676 同上。——第497頁。

677 同上书，第21—22頁。——第497頁。

678 《别林斯基全集》，第12卷，第350頁。——第498頁。

679 普列汉諾夫把上面所引的别林斯基的意見，看作实质上是斯拉夫派的，主观主义的，——这一评价，尽管附有保留，也是不正确的，这正和他的下列这一論断一样是不正确的，这一論断說：这位批評家对俄国将来的看法似乎是根据“对于俄国村社历史发展的完全錯誤理解”的。

在别林斯基的这些意見中，反映了他对俄国，对俄国人民的热爱，对它的美好未来的信心。别林斯基真实的爱国主义是和他的革命民主主义联系着的，而且和斯拉夫派的“假爱国主义”完全相反。普列汉諾夫本人不止一次地強調指出别林斯基对斯拉夫派的不可調和的仇恨。然而他没有指出在别林斯基企图結束专制农奴制度和信任俄国民族、俄国人的优秀品质的发展这两者之間的联系是十分自然的。别林斯基同俄国农民村社的理想化毫无共同之处。例如，别林斯基在《回答莫斯科人》这篇論文中写道：“正如斯拉夫派先生們所說的那样，这种村社完全不只是一些斯拉夫部落所特有的，而是所有宗法制状态的部落和民族甚至野蛮人都有过的……”。把村社看成氏族关系的殘余，使人无法指望它成为新的較好的社会制度的萌芽。——第498頁。

680 1844年3月5日《日記》中的記事（見《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2卷，第339頁）。——第498頁。

681 《日記》，1843年4月21日記事（見同上书，第278頁）。——第499頁。

682 見《别林斯基全集》，第12卷，第49及第67頁。«анакореты»（“隐士”）应当是«анакарсисы»（“阿那卡西斯”）。帝王出身的西徐亚人

阿那卡西斯在梭伦时代周游希腊回国以后,企图在西徐亚实行希腊的宗教仪式,因此而被人杀害。——第 499 頁。

683 别林斯基在 1839 年 11 月 22 日給瓦·彼·波特金的信中写道:“……在我看来, *Jenseits* (彼岸), 神秘主义以及对于半富有的性格和半墮落的人成为出路的一切东西, 都不是出路”(《别林斯基全集》, 第 11 卷, 第 416 頁)。——第 499 頁。

684 《别林斯基全集》, 第 10 卷, 第 19 頁。——第 499 頁。

685 同上, 第 18 頁。——第 500 頁。

686 同上, 第 23 頁。——第 500 頁。

687 同上, 第 20 頁。——第 500 頁。

688 尼·弗·丹尼尔逊的笔名。——第 500 頁。

689 这里說的是米·亚·巴枯宁。——第 501 頁。

690 《别林斯基全集》, 第 12 卷, 第 468 頁。——第 501 頁。

691 普列汉诺夫的这一引证是不确切的。他在这里所說的那封信是别林斯基在 1847 年 2 月 6 日写給波特金的。别林斯基写道:“我对李特雷所以欢喜欲狂, 是因为他既不属于……《*Journal des Débats*》(《討論报》)和《*Revue des Deux Mondes*》(《两个世界評論》) 卑劣的人和聪明的偷儿, 也不……属于社会主义者……”。后来别林斯基在批評路易·勃朗的《十年史》(由于他对伏尔泰的态度)时, 坚决提出了否定的意見。别林斯基在 1848 年 2 月 15 (27) 日写給安年柯夫的信中也用同样的精神談到了路易·勃朗。普列汉诺夫在他关于别林斯基的著作中不止一次地提到了别林斯基的这些言論(見《維·格·別林斯基。……演說》, 《維薩里昂·格里哥里也維奇·別林斯基》, 本卷第 535—537 頁, 第 568—571 頁)。普列汉诺夫在他关于别林斯基所写的演說稿中說:“对于社会主义的不滿。李特雷于 1847 年 2 月 6 日写給波特金的信。空想社会主义的缺点……”(《普列汉诺夫遺著》, 第 6 集, 1938 年版, 第 134 頁)。

普列汉诺夫所說的别林斯基的“不滿”当然不是对一般社会主义



的不满,却正如普列汉诺夫所正确解释的那样,是对空想主义,对空想社会主义者理想的抽象性,对他们缺乏历史观点等等的不满。并且别林斯基首先指的是路易·勃朗型的改良主义者,亦即如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别林斯基在国外旅行时在巴黎所遇到的那些“各种学派的社会主义者”。——第502页。

692 引自1840年6月30日写给瓦·彼·波特金的信(见《别林斯基全集》,第11卷,第528页)。——第503页。

693 指的是《维·格·别林斯基的文学思想》这篇论文(见《普列汉诺夫全集》,第10卷,第253—304页),它将载入本选集第5卷。——第504页。

694 演说用这个标题由“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协会”出版社作为单行本小册子在1899年2月出版的。小册子出版的月份是根据格·瓦·普列汉诺夫和巴·波·阿克雪里罗得的通信集来判断的。同年,演说曾刊于《工人》杂志(1899年,第5—6期,第104—143页)并译成保加利亚文。

本版是根据《普列汉诺夫全集》(第10卷,第317—349页)的原文排印的,并与日内瓦的第一版和保存于普列汉诺夫纪念馆的手稿库中的作者亲笔的草稿(演说的不完全的原文)核对过。

在《普列汉诺夫遗著》第6集(苏联国家社会经济书籍出版社,1938年莫斯科版),发表了初稿的片断,演说开头部分的异文和提纲。——第505页。

695 引自1843年3月8日写给A.A.,H.A.和T.A.巴枯宁的信(见《别林斯基全集》,第12卷,1956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版,第141页)。——第505页。

696 参阅《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196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版,第76—77页。——第506页。

697 引自1842年12月9—10日写给波特金的信(《别林斯基全集》,第12卷,第124页)。——第506页。

698 引自1842年3月31日写给波特金的信(同上书,第88页)。——第507页。

- 699 見伊·伊·帕納也夫,《回忆別林斯基》(伊·伊·帕納也夫,《文学回忆录》,1950年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版,第302頁)。——第507頁。
- 700 見亞·伊·赫爾岑,《往事与回忆》,第4部,第25章(三十卷本《全集》,第9卷,1956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版,第31頁)。——第508頁。
- 701 帕納也夫說,布尔加林在初次見過別林斯基以后問他:“这就是写信从莫斯科要来追捕我們的一只猛犬嗎?……”  
我把这句话告诉了別林斯基。这使他很高兴……”(伊·伊·帕納也夫,《文学回忆录》,第293頁)。
- 別林斯基在1839年11月22日写給波特金的一封信中也提到这件事(《全集》,第11卷,第420頁)。后来,別林斯基为了評論舍維辽夫的《学究》而写的小册子是用笔名“彼得·猛犬”署名的,而且在写給波特金的一些信里有时也是这样自称的。——第508頁。
- 702 这是引自M.A.德米特里也夫为反对別林斯基而写的一首诗《給一个无名的批評家》(刊于《莫斯科人》1842年第10期,第281—284頁)。在1865年出版的德米特里也夫的诗集单行本里,这一节略有改动。——第508頁。
- 703 見《別林斯基全集》,第1卷,第426頁。——第508頁。
- 704 見同上书,第12卷,第69—70頁。——第509頁。
- 705 參閱《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1958年三联书店版,第321頁。——第510頁。
- 706 見《俄国财富》,1898年,第3期,第165頁。——第510頁。
- 707 見同上书,第152頁。——第511頁。
- 708 見亞·伊·赫爾岑,《日記》,1842年,11月14日,(三十卷本《全集》,第2卷,1954年版,第242頁)。——第512頁。
- 709 別林斯基在写給赫爾岑的信里說:“我天性上是犹太人,而且我不能和非利士人在一个桌上吃飯……格蘭諾夫斯基想知道,我讀过他在《莫斯科人》杂志上发表的論文沒有。沒有,我将不來讀它;請对他說,我既不喜欢在不体面的場所看見朋友們,也不喜欢約他們在那里会晤”

- (引自亞·尼·貝平,《別林斯基,他的生活和通信》,1908年聖彼得堡第2版,第481頁)。在《別林斯基全集》(第12卷第589頁)里這封信被認為是遺失了的,它的日期大約是1844年5月4日。赫爾岑的1844年5月17日的《日記》中也提到這封信(見《赫爾岑全集》(三十卷本),第2卷,第354頁)。——第512頁。
- 710** 所引用的關於赫爾岑和格蘭諾夫斯基的意見取自1843年2月6日寫給瓦·彼·波特金的信(《別林斯基全集》,第12卷,第130和132頁。Модерация(中庸)出自法文的 *Modération*(溫和)。——第512頁。
- 711** 見康·德·卡維林,《回憶別林斯基》(《卡維林全集》,第3卷,1899年,聖彼得堡版,第1097—1098頁)。——第512頁。
- 712** 格蘭諾夫斯基在給別林斯基的信中寫道:“儘管我們關於羅(伯斯比爾)有不同的意見,但是幾乎在其余一切方面我都是同意你的”(見亞·尼·貝平,《別林斯基,他的生活和通信》,1908年聖彼得堡版,第410頁)。——第513頁。
- 713** 引自1841年9月8日給瓦·彼·波特金的信(見《別林斯基全集》,第12卷,第66頁)。——第513頁。
- 714** 在手稿中是:“指這個地方”。——第513頁。
- 715** 見《俄國財富》,1898年,第3期,第182頁。——第514頁。
- 716** 引自1841年6月27—28日給瓦·彼·波特金的信(見《別林斯基全集》,第12卷,第52頁)。——第514頁。
- 717** 引自薩爾梯柯夫、謝德林的作品《在國外》(見《全集》,第14卷,1936年蘇聯國家文學書籍出版社版,第161頁)。謝德林用這幾句話說明了他在四十年代的少年心情。——第514頁。
- 718** 見《俄國財富》,1898年,第3期,第183頁。——第514頁。
- 719** 以上引自別林斯基關於歐仁·蘇的小說《巴黎的秘密》所寫的文章,見《別林斯基全集》,第8卷,1955年蘇聯科學院出版社版,第171,171—172,173頁。——第516頁。

- 720 在手稿中并不是“不剥削别人的劳动的”而是“不侵犯别人的利益的”。——第 517 頁。
- 721 在手稿中下面(句的末尾)是：“……‘人类’的事业由于捍卫剥削者的利益会得到好处”。——第 517 頁。
- 722 見《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 9 卷,第 29 頁。——第 518 頁。
- 723 在亚·尼·貝平的《别林斯基,他的生平和通信》,1908 年圣彼得堡第 2 版,第 569 頁,引证了这段插曲。关于这件事,别的許多資料也提到过(見伊·伊·帕納也夫的《文学回忆录》第 433 頁注)。由于这件事又发现了别林斯基臨終前写給米·馬·波波夫的最后的一封信(《全集》,第 12 卷,第 469 頁)。——第 518 頁。
- 724 見伊·伊·帕納也夫,《文学回忆录》,第 314—315 頁。——第 519 頁。
- 725 見亚·尼·貝平,《别林斯基,他的生平和通信》,1908 年版,第 571 頁。——第 519 頁。
- 726 見《赫尔岑全集》, (三十卷本),第 9 卷,第 32 頁。——第 520 頁。
- 727 同上书,第 33—34 頁。——第 521 頁。
- 728 我們从普列汉诺夫死后才发表的他关于别林斯基所作的演說提綱中引用了这一段的异文:“但正因为这一犯罪行为,我們才热爱‘非常激烈的維薩里昂’;正因为这个,我們对他怀有一种比儿子的爱更为高尚和純洁的那种感情,我們不仅在实质上而且在形式上也是国事犯,我們这些流亡者們,保存着对自己人民的信仰并且坚信俄国最后能达到别林斯基所說到的那种文明”(見《普列汉诺夫遺著》,第 6 集,第 131 頁)。——第 521 頁。
- 729 第三厅厅长杜列里特对于死亡把别林斯基从宪兵手中夺走以后表示遺憾,他說:“我們本来会使他尝尝长期被监禁在獄中的痛苦的”(見《俄国文学史》,第 8 卷,1955 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版,第 56 頁)。——第 521 頁。
- 730 引自涅克拉索夫的《猎熊》(見《涅克拉索夫全集和书信》,第 2 卷,1948 年苏联国家文学书籍出版社版,第 279 頁。——第 522 頁。

- 731 見亞·伊·赫爾岑，《往事與回憶》，第4冊（三十卷本《全集》，第9卷，第38頁）。——第522頁。
- 732 見《赫爾岑全集》（三十卷本），第7卷，1956年蘇聯科學院出版社版，第214頁，這是普列漢諾夫從法文版翻譯的，同第7卷的譯文不同。——第523頁。
- 733 別林斯基在1839年9月29日—10月8日寫給斯坦凱維奇的信中說：“他〔席勒〕的《唐-卡爾洛斯》……把我投進抽象的英雄主義中，除了英雄主義我輕視一切，仇恨一切……而在英雄主義中，儘管自己有不自然的和緊張的狂喜，卻很好地意識到自己等於零”（《別林斯基全集》，第11卷，1956年蘇聯科學院出版社版，第385頁）。——第523頁。
- 734 手稿中是“思想家們”。——第526頁。
- 735 見《往事與回憶》，第4冊（《赫爾岑全集》三十卷本），第9卷，第23頁）。——第527頁。
- 736 在手稿中不是“抽象的”英雄主義，而是“否定”。——第528頁。
- 737 在手稿中是：“對思想生活的一切現象和對一切社會關係”。——第528頁。
- 738 《赫爾岑全集》（三十卷本），第9卷，第22頁。——第529頁。
- 739 引自1841年3月1日寫給瓦·彼·波特金的信（見《別林斯基全集》，第12卷，第22—23頁）。——第530頁。
- 740 引自1840年12月10—11日寫給瓦·彼·波特金的信（同上書，第11卷，第576頁）。——第530頁。
- 741 見《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1卷，三聯書店版，第470—501頁。——第531頁。
- 742 在手稿中：“但是這一唯物主義在說明社會—歷史過程方面，是沒有經過深入研究的”。——第531頁。
- 743 參閱注682。——第532頁。
- 744 引自1841年6月27—28日寫給瓦·彼·波特金的信（見《別林斯基

- 全集》，第12卷，第49頁）。——第532頁。
- 745 引自1841年9月8日写給瓦·彼·波特金的信（同上书，第67頁）。——第532頁。
- 746 普列汉诺夫指的是在九十年代在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的民粹派之間的爭論。——第532頁。
- 747 引自1841年9月8日写給瓦·彼·波特金的信（見《別林斯基全集》，第12卷，第68頁）。別林斯基所引的是摘自普希金的詩《在世間的，可悲的和无边际的草原上……》（最初的标题是《三道泉水》）。据涅克拉索夫說，这是別林斯基所喜爱的一首詩（參見《文学遗产》，第49—50卷，1946年版，第169頁）。——第533頁。
- 748 1842年9月11日《日記》中的記事（見《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2卷，第226—227頁）。——第533頁。
- 749 1843年4月10日的記事（同上书，第276頁）。——第534頁。
- 750 引自1842年12月9—10日写給瓦·彼·波特金的信（見《別林斯基全集》，第12卷，第122—123頁）。——第535頁。
- 751 見《別林斯基全集》，第12卷，第323頁。——第536頁。
- 752 同上书，第467頁。——第536頁。
- 753 同上书，第467—468頁。“有信仰的朋友”是米·亚·巴枯宁。——第537頁。
- 754 維·米雅柯金是在刊登于1897年，第11期，第2部分，第112頁的論文《关于老活动家的話》中引用了別林斯基写給安年柯夫的信里的这段話的。关于这件事他写道：“据別林斯基的看法，是个人而不是群众在創造历史”。从而米雅柯金沒有任何根据地把別林斯基对于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的看法和“主观主义社会学家”的看法等同起来了。——第538頁。
- 755 論文《彼得堡和莫斯科》載入《別林斯基全集》，第8卷，第385—413頁。

— 第 538 頁。

**756** 引自 1847 年 12 月 1—10 日寫給巴·瓦·安年柯夫的信（《別林斯基全集》，第 12 卷，第 440—441 頁）。——第 539 頁。

**757** 塔·格·舍夫琴柯是因為秘密的“克里洛—米福吉也夫協會”案件而在 1847 年 4 月被捕并被押送充軍的，同時禁止他寫作和繪畫。別林斯基對舍夫琴柯作尖銳而不公正的批評，是因為他不了解情況（見同上書，第 440 頁）。——第 539 頁。

**758** 引自 1848 年 2 月 15 日寫給巴·瓦·安年柯夫的信（同上書，第 468 頁）。——第 540 頁。

**759** 在刊登於 1911 年《我們的道路》雜誌第 18 期上的《維·格·別林斯基誕生百年紀念》一文中，普列漢諾夫寫道，別林斯基“……興高采烈地歡迎無產階級反對資本主義壓迫的鬥爭的開始。他把他有時稱之為人民的無產階級看做是法國最先進的階級”。後來普列漢諾夫從別林斯基關於歐仁·蘇的小說《巴黎的秘密》所寫的論文中引用了下面的一段話：“在人民中間教育已經迅速地發展起來，——我們的批評家說，——而人民已經有了自己的詩人，他們給人民指出了未來，同人民共患難，而且不論在衣服和生活方式方面都不脫離人民。人民力量還薄弱，但是只有他保存着民族生活的火焰和在‘有教養的社會’階層中已經熄滅的信仰的生氣勃勃的熱情”（見《普列漢諾夫遺著》，第 6 集，1938 年蘇聯國家社會經濟書籍出版社版，第 144—145 頁）。

至於說到“俄國的農奴”，那末正如弗·伊·列寧所指出的，農民反對農奴制的鬥爭是別林斯基革命—民主思想的主要源泉（見《列寧全集》，第 16 卷，人民出版社版，第 122 頁，第 20 卷，第 240—241 頁）。——第 541 頁。

**760** 恩格斯的著作《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的結尾語（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 2 卷，1958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400 頁）。——第 541 頁。

**761** 見本卷注 1283。——第 541 頁。

- 762** 这里是在所有版本中反复出现的错误。不是“新希腊的阿那卡西斯”而应当是“新西徐亚人的阿那卡西斯”。见本卷第 532 页别林斯基写给波特金的信的引文。——第 541 页。
- 763** 这是引自对费·格林卡的《鲍罗金诺战役概论》(1812 年回忆)一书的书评(见《别林斯基全集》，第 3 卷，1953 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版，第 355—356 页)。——第 542 页。
- 764** 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 5 卷中普列汉诺夫的论文《维·格·别林斯基的文学思想》。——第 542 页。
- 765** 在普列汉诺夫的手稿库中保存着几封信，其中提到《维萨里昂·格里哥里也维奇·别林斯基》一文。从德·尼·奥夫夏尼柯-库利柯夫斯基 1908 年 8 月 29 日写给 P. M. 普列汉诺娃的信和 P. M. 普列汉诺娃从“世界”出版社所收到的信(1909 年 3 月 8 日写的)得出以下结论，论文在这时期以前已经写好，而且，看来，手稿很快就被寄到出版社。论文的校样寄给了普列汉诺夫(1909 年 3 月 10 日菲特尔曼写给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信)。后来，普列汉诺夫为自己的论文编成了一个书目。1909 年 6 月 2 日他给“世界”出版社的信说：“应你们的请求，送上我的关于别林斯基的论文的书目。假使你们认为它太大，那末请编辑部斟酌，把它节删”。在普列汉诺夫纪念馆的手稿库里有这一书目的亲笔手稿，它经过一些修改后和论文一样被刊登于《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同一卷中(见《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第 2 卷，“世界”出版社，1909 年莫斯科版，第 227—269 页)。对《维·格·别林斯基》一部分的书目见第 414—415 页。论文是根据《普列汉诺夫全集》(第 23 卷第 121—167 页)排印的，并同在手稿库中不知谁所写的手稿(上面还有格·尼·普列汉诺夫所作的修改和补充)核对过，而且也和以上所指出的作者在世时出版的版本核对过。——第 543 页。
- 766** 普列汉诺夫在这篇论文的标题和正文中把别林斯基出生的那年错误地写成了 1810 年。有关确定维·格·别林斯基的出生年月(1811 年 5 月 30 日)问题请参阅 B. C. 涅恰耶娃的《维·格·别林斯基》，1949 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版，第 45—47 页。——第 543 页。



- 767 見《同时代人回忆中的别林斯基》，国家文学书籍出版社，1948年莫斯科版，第19頁。——第544頁。
- 768 《弗·費·奧多也夫斯基公爵文件摘录》（見《俄罗斯文庫》，第1冊，1874年版，第341頁）。——第544頁。
- 769 《別林斯基全集》，第1卷，1953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版，第499頁。——第545頁。
- 770 引自1833年5月21日給母亲(M. И. 別林斯卡婭)的信《別林斯基全集》，第11卷，第94—95頁。——第545頁。
- 771 最近的調查表明了，在斯坦凱維奇小組以前，对于别林斯基的思想发展史起过很大作用的是他参加所謂“十一号文学协会”的时期。关于这点，和斯坦凱維奇小組，請参閱M. 波里亚柯夫的《別林斯基在莫斯科》，1948年“莫斯科工人”出版社版；B. C. 涅恰耶娃的《維·格·別林斯基》，1954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版；《伟大的俄国思想家維·格·別林斯基》，斯密尔諾娃主編的論文集，1948年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545頁。
- 772 引自1840年12月30日—1841年1月22日写給瓦·彼·波特金的信（《別林斯基全集》，第12卷，1956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版，第11頁）。——第546頁。
- 773 亞·尼·貝平：《別林斯基，他的生平 and 通信》，1908年圣彼得堡版，第448頁。——第547頁。
- 774 見《同时代人回忆中的别林斯基》，1948年苏联国家文学书籍出版社版，第349頁。——第548頁。
- 775 《俄罗斯文庫》，第1冊，1874年版，第339頁。——第549頁。
- 776 参閱黑格尔：《法哲学原理》，1961年商务印书館版，序言第11頁。——第550頁。
- 777 見《黑格尔全集》，第5卷，1937年莫斯科俄文版，第652頁。——第551頁。

- 778 参阅黑格尔:《法哲学原理》, 1961年商务印书馆版, 序言第13页。——第552页。
- 779 引自1839年9月29日—10月8日写给尼·弗·斯坦凯维奇的信(见《别林斯基全集》, 第11卷, 1956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版, 第385页)。——第553页。
- 780 同上。——第553页。
- 781 《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 第9卷, 第38页。——第553页。
- 782 这是1838年8月13—15日写给米·亚·巴枯宁的信的不准确的引文(见《别林斯基全集》, 第11卷, 1956年版, 第271页)。——第554页。
- 783 引自1837年8月16日写给米·亚·巴枯宁的信(同上书, 第175页)。——第554页。
- 784 引自1838年6月20—21日写给米·亚·巴枯宁的信(见同上书, 第245页)。——第555页。
- 785 引自1837年8月7日写给德·彼·伊万诺夫的信(同上书, 第147页)。——第556页。
- 786 同上, 第148页。——第556页。
- 787 在手稿上没有这个注。——第556页。
- 788 《别林斯基全集》, 第11卷, 第151页。——第557页。
- 789 这是1839年9月29日—10月8日写给尼·弗·斯坦凯维奇的信的不准确的引文(《别林斯基全集》, 第11卷, 第386—387页)。——第557页。
- 790 在手稿上是:“巨大的精神意义”。——第558页。
- 791 《别林斯基全集》, 第3卷, 第328页。——第558页。
- 792 同上书, 第332—333页。——第559页。

- 793 在手稿上是：“……不是因为人们正是要有这些而不要有别的制度”。——第560页。
- 794 《别林斯基全集》，第3卷，第340页。——第560页。
- 795 同上书，第414页。——第561页。
- 796 引自1840年2月26日写给米·亚·巴枯宁的信（见《别林斯基全集》第11卷，第486页）。——第562页。
- 797 在手稿中是：“表现出来了”。——第562页。
- 798 引自1839年12月9日—1840年2月10日写给瓦·彼·波特金的信（见《别林斯基全集》，第11卷，第426页）。——第562页。
- 799 引自1840年6月13日写给瓦·彼·波特金的信（同上书，第529页）。——第563页。
- 800 见《别林斯基全集》，第11卷，第529页。——第563页。
- 801 引自1840年10月4日写给瓦·彼·波特金的信（同上书，第556页）。——第563页。
- 802 引自1840年12月10—11日写给瓦·彼·波特金的信（见同上书，第576页）。——第564页。
- 803 引自1840年12月30日—1841年1月22日写给波特金的信（见同上书，第12卷，第13页）。——第564页。
- 804 引自1841年6月27—28日写给瓦·彼·波特金的信（同上书，第52页）。——第565页。
- 805 引自1841年9月8日写给瓦·彼·波特金的信（同上书，第67页）。——第565页。
- 806 同上书，第68页。——第565页。
- 807 《别林斯基全集》，第12卷，第68页。——第566页。
- 808 引自1842年12月9—10日写给瓦·彼·波特金的信（同上书，第123

- 頁)。——第 566 頁。
- 809 見契·維特林斯基(瓦·叶·契施辛),《季·尼·格蘭諾夫斯基和他的时代, 历史概要》, 1905 年第 2 版, 第 262—277 頁。——第 566 頁。
- 810 引自 1847 年 3 月 8 日写給波特金的信(《別林斯基全集》, 第 12 卷, 第 350 頁)。——第 567 頁。
- 811 《別林斯基全集》, 第 10 卷, 第 21—22 頁。——第 567 頁。
- 812 同上书, 第 19 頁。——第 568 頁。
- 813 同上书, 第 18 頁。——第 568 頁。
- 814 同上书, 第 23 頁。——第 568 頁。
- 815 同上书, 第 20 頁。——第 568 頁。
- 816 普列汉诺夫关于別林斯基对空想社会主义者态度的评价見本书《別林斯基和合理的现实》一文的注, 即注 691。——第 569 頁。
- 817 《別林斯基全集》, 第 12 卷, 第 467 頁。——第 569 頁。
- 818 同上书, 第 467—468 頁。——第 570 頁。
- 819 《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 第 2 卷, 1954 年版, 第 354 頁。——第 570 頁。
- 820 在手稿中不是这句话, 而是: “別林斯基把人民当作资产阶级的消极工具的这一看法也是不对的”。普列汉诺夫的这一論断不正确: 因为正如別林斯基的論文《巴黎的秘密……》, 1847—1848 年的书信及其他著作所证明的, 他对于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并没有这种看法。——第 570 頁。
- 821 見本卷注 759。——第 570 頁。
- 822 在手稿中是: “人民, 即工人阶级”。——第 571 頁。
- 823 引自 1840 年 6 月 13 日写給瓦·彼·波特金的信(《別林斯基全集》,

- 第 11 卷, 第 528 頁)。——第 571 頁。
- 824 德·維涅維齊諾夫《詩集》, 1940 年“蘇維埃作家”出版社版, 第 141 頁。——第 572 頁。
- 825 同上書, 第 138 頁。——第 572 頁。
- 826 參閱《別林斯基選集》, 第 1 卷, 1963 年上海文藝出版社版, 第 26 頁。——第 573 頁。
- 827 參閱同上書, 第 10—11 頁。——第 573 頁。
- 828 參閱同上書, 第 122 頁。——第 573 頁。
- 829 參閱同上書, 第 187 頁。——第 574 頁。
- 830 參閱同上書, 第 23 頁。——第 574 頁。
- 831 參閱同上書, 第 156 頁。——第 574 頁。
- 832 參閱同上書, 第 157 頁。——第 575 頁。
- 833 參閱同上書, 第 322 頁。——第 575 頁。
- 834 參閱同上書, 第 326 頁。——第 576 頁。
- 835 同上書, 第 2 卷, 第 560 頁。——第 577 頁。
- 836 同上書, 第 561 頁。——第 577 頁。
- 837 同上書, 第 3 卷, 第 509 頁。——第 579 頁。
- 838 同上書, 第 2 卷, 第 470 頁。——第 579 頁。
- 839 參閱黑格爾:《歷史哲學》, 1963 年商務印書館版, 第 493 頁。——第 579 頁。
- 840 在手稿上不是“自己的活動”而是:“從與黑格爾決裂開始的自己生命的最後時期”。——第 580 頁。
- 841 參閱《別林斯基選集》, 第 2 卷, 1953 年時代出版社版, 第 420 頁。——第 580 頁。

- 842 《别林斯基全集》，第6卷，第582—583頁。——第580頁。
- 843 同上书，第586頁。——第581頁。
- 844 在手稿中沒有“不是指这个詞的轉义，而是本义”这句话。——第581頁。
- 845 参閱《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196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版，第76—77頁。——第581頁。
- 846 《别林斯基全集》，第6卷，第694頁。——第582頁。
- 847 同上书，第3卷，第355—356頁。——第583頁。
- 848 同上书，第6卷，第585頁。——第584頁。
- 849 再往下面，在手稿中刪去了說明别林斯基对果戈里的态度的一段，“别林斯基始終都同样喜爱”果戈里的作品。——第585頁。
- 850 参閱《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1953年时代出版社版，第418頁。——第586頁。
- 851 参閱同上书，第419頁。——第586頁。
- 852 同上书，第7卷，第345頁。——第586頁。
- 853 普列汉诺夫說，别林斯基反对純艺术派的拥护者們的理由是“說服力不强的”这一結論并不正确。虽然别林斯基沒有像馬克思主义所作的那样，对“純艺术”理論的拥护者們的思想給予具体的历史分析，但是他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现实主义美学的立場所作的尖銳而深刻的有論据的批判給了“純粹艺术”的拥护者們以有力的打击。别林斯基（在《1847年俄国文学一瞥》等論文中）发表的言論是針對“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論的，这些言論在为先进的，有思想性的艺术而进行的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且直到現在还保持着它的意义。——第587頁。
- 854 《别林斯基全集》，第10卷，第26—27頁。——第589頁。
- 855 手稿上沒有这一脚注。——第589頁。
- 856 《别林斯基全集》，第7卷，第502頁。——第590頁。
- 857 同上书，第10卷，第294頁。——第590頁。

- 858 手稿上沒有这一段。——第 591 頁。
- 859 手稿上沒有这一段。——第 592 頁。
- 860 在手稿上是：“这一悲剧的第四幕是从同唯心主义决裂和轉变到唯物主义的观点开始的。”——第 592 頁。
- 861 参閱《別林斯基选集》，第 2 卷，1953 年时代出版社版，第 308 頁。——第 592 頁。
- 862 引自帕納也夫的《文学回忆录》（見《同时代人回忆中的別林斯基》，1948 年版，第 152 頁）。——第 594 頁。
- 863 《赫爾岑全集》（三十卷本），第 9 卷，第 34 頁。——第 594 頁。
- 864 《杜勃羅留波夫全集》（六卷本），第 2 卷，1935 年版，第 470 頁。——第 595 頁。
- 865 这篇論文最初刊載于《現代世界》，1910 年，第 5 期，第 182—208 頁，第 6 期，第 123—147 頁。本版把《普列汉諾夫全集》（第 23 卷，第 168—222 頁）的原文同这个杂志发表的論文核对过。看来，这篇論文是在 1910 年初或 1909 年末写成的。在普列汉諾夫的紀念館里，除了 H. 約旦斯基在 1910 年 3 月 16 日写給普列汉諾夫的信里所說：“我們等待您关于別林斯基所写的那篇文章”这句话以外既沒有发现手稿也沒有发现可以說明写成这篇論文的經過的任何材料。——第 596 頁。
- 866 見本卷注 766。——第 596 頁。
- 867 亞·尼·貝平：《別林斯基，他的生平和通信》，1908 年圣彼得堡第 2 版，第 427 頁。——第 598 頁。
- 868 見《別林斯基全集》，第 12 卷，1956 年版，第 128 頁。《祖·紀·》即《祖國紀事》杂志。——第 599 頁。
- 869 同上书，第 6 卷，1955 年版，第 471 頁。——第 600 頁。
- 870 同上书，第 582—585 頁。——第 600 頁。
- 871 同上书，第 11 卷，第 556 頁。——第 600 頁。

- 872 《别林斯基全集》，第12卷，1955年版，第22页。——第601页。
- 873 引自1840年12月10—11日写给瓦·彼·波特金的信（《别林斯基全集》，第11卷，第576页）。——第601页。
- 874 见黑格尔：《小逻辑》，1954年三联书店版。——第601页。
- 875 《别林斯基全集》，第12卷，第114页。——第603页。
- 876 同上书，第6卷，第472—473和第488页。——第604页。
- 877 引自1840年12月30日—1841年1月22日写给瓦·彼·波特金的信（《别林斯基全集》，第12卷，第7页）。——第604页。
- 878 同上书，第6卷，第582—583页。——第604页。
- 879 同上书，第585页。同普列汉诺夫所据以引证的那一版本有出入。在新版中：“哥特式建筑是不美观和畸形的体现”。——第605页。
- 880 《维·格·别林斯基》一文见本卷第543—595页；论文《别林斯基的文学观点》将载入本选集第5卷。——第608页。
- 881 见《别林斯基全集》，第5卷，1954年版，第289—450页。——第608页。
- 882 同上书，第329页。——第609页。
- 883 同上书，第330页。——第609页。
- 884 同上书，第345页。——第610页。
- 885 同上书，第346页。——第611页。
- 886 同上。——第611页。
- 887 同上书，第346—347页。——第612页。
- 888 论文《别林斯基与合理的现实》见本卷第443—504页。——第614页。
- 889 见《别林斯基全集》，第6卷，第477页。——第614页。
- 890 见《普列汉诺夫全集》，第6卷。——第615页。
- 891 引自1846年7月4日写给亚·伊·赫尔岑的信（《别林斯基全集》，第



12 卷,第 296—297 頁)。——第 617 頁。

892 引自 1846 年 9 月 6 日写給亞·伊·赫尔岑的信(同上书,第 316 頁)。——第 617 頁。

893 《別林斯基全集》,第 5 卷,第 329 頁。——第 619 頁。

894 同上书,第 346 頁。——第 619 頁。

895 同上书,第 329 頁。——第 619 頁。

896 同上。——第 619 頁。

897 普列汉諾夫沒有发表过这样标题的論文。显然,所准备的材料是用来写下列論文的:《米·彼·波果丁和階級斗争》,《伊·瓦·基列也夫斯基》,《論 H. A. 别尔甲也夫著〈阿·斯·霍米亚科夫〉一书》,各文刊载于 1911—1912 年《現代世界》杂志(这些論文已收入《普列汉諾夫全集》,第 23 卷,第 43—117 頁)。——第 622 頁。

898 見《別林斯基全集》,第 5 卷,第 328 頁。——第 623 頁。

899 同上。——第 623 頁。

900 同上。——第 623 頁。

901 引自《1840 年的俄国文学》(《別林斯基全集》,第 4 卷,第 418 頁)。——第 624 頁。

902 《別林斯基全集》,第 6 卷,第 274 頁。——第 624 頁。

903 同上书,第 12 卷,第 350 頁。——第 625 頁。

904 見本卷注 679。——第 626 頁。

905 見《德尼斯·伊万諾維奇·馮維辛的著作、书信和譯文选》。彼·亞·叶弗列莫夫主編。1866 年圣彼得堡版。——第 626 頁。

906 《別林斯基全集》,第 5 卷,第 399 頁。——第 627 頁。

907 同上书,第 330 頁。——第 628 頁。

908 同上书,第 10 卷,第 31 頁。——第 628 頁。

- 909 同上书,第32頁。——第629頁。
- 910 同上书,第8卷,第172頁。——第630頁。
- 911 同上书,第173頁。——第630頁。
- 912 同上。——第630頁。
- 913 参閱《別林斯基选集》,第2卷,1954年时代出版社版,第159頁。——第631頁。
- 914 参閱同上。——第631頁。
- 915 参閱同上书,第162頁。——第631頁。
- 916 引自1848年2月15日写給巴·瓦·安年柯夫的信(《別林斯基全集》,第12卷,1956年版,第468頁。——第632頁。
- 917 引自1847年12月1—10日写給巴·瓦·安年柯夫的信(同上书,第440—441頁)。普列汉诺夫在这里把这封信的发信年代錯誤地写成1848年。——第632頁。
- 918 《別林斯基全集》,第10卷,第18頁。——第634頁。
- 919 同上书,第19頁。——第634頁。
- 920 同上。——第634頁。
- 921 同上书,第8卷,第444頁。——第635頁。
- 922 見同上书,第10卷,第20頁。——第635頁。
- 923 見同上书,第21—22頁。——第635頁。
- 924 如果以为別林斯基把知識分子看成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那是錯誤的。表現农民的利益和意图的別林斯基的革命民主主义使他正确地推測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普列汉诺夫本人不止一次地引用和珍視別林斯基这个俄国革命者对于人民的内在力量及其发展的信心和言論。例如,在說到法国劳动群众时,別林斯基断定:“人民是儿童,但是这个儿童却在成长,大有成为充滿力量和理智的男子汉的希

- 望……他还軟弱，但是只有他保持着民族生活的火焰和信念的生气勃勃的热情，这种热情在‘上流’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却已經熄灭了”（《別林斯基全集》，第8卷，1955年版，第173頁）。——第636頁。
- 925 《別林斯基全集》，第5卷，第118頁。——第637頁。
- 926 这一名言的来源是柏拉图对话集《斐东》中的一段話：“跟着我吧，少想苏格拉底，而要多想真理”。亚里士多德在《尼科馬赫的伦理学》中宣称：“虽然我爱柏拉图和真理，然而神圣的义务命令我宁可选择真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1908年圣彼得堡版，第7頁）。“柏拉图是我的朋友，但是真理更可爱”这句话从十七世紀以来即以拉丁語在规范語言中流行。——第637頁。
- 927 《別林斯基全集》，第5卷，第118頁。——第637頁。
- 928 同上书，第118—119頁。——第638頁。
- 929 同上书，第12卷，第73頁。——第638頁。
- 930 同上书，第8卷，第81—82頁。——第639頁。
- 931 《杜勃罗留波夫全集》（六卷本），第2卷，1935年苏联国家文学书籍出版社版，第139頁。——第639頁。
- 932 《別林斯基全集》，第8卷，第83頁。——第640頁。
- 933 《杜勃罗留波夫全集》（六卷本），第2卷，第138—139頁。——第640頁。
- 934 《別林斯基全集》，第5卷，第140頁。——第641頁。
- 935 同上书，第345頁。——第641頁。
- 936 同上书，第7卷，第501頁。——第643頁。
- 937 普列汉諾夫說，別林斯基在晚年“与其說是一位辩证論者，远不如說是一位启蒙运动者”，这是不对的。普列汉諾夫自己对于这一問題也有另一种看法。普列汉諾夫在他写的一篇論文里說，俄国的革命的思想家們遺留給我們“一些……应用辩证法解决俄国社会生活中最重要問

- 題的嘗試”(本选集,第1卷,中文版,第186頁)。在論文《維·格·別林斯基誕生一百周年》中普列汉諾夫写道,历史唯物主义的拥护者們“把我們伟大的批評家看作是首先开始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某些基本原理来研究文学史的作家之一。这是一个巨大的功績”(《普列汉諾夫遺著》,第6集,1938年苏联国家社会經济書籍出版社版,第143頁)。——第643頁。
- 938** 見本卷第543—595頁。——第644頁。
- 939** 見巴·瓦·安年柯夫,《文学回忆录》,Academia,1928年列宁格勒版,第431頁。——第644頁。
- 940** 見《別林斯基书信集》,叶·亚·里雅茨基編輯和注释,第2卷,1914年圣彼得堡版,第418頁。——第645頁。
- 941** 同上书,第420頁。——第645頁。
- 942** 同上书,第418頁。——第646頁。
- 943** 《別林斯基全集》,第6卷,第587頁。——第646頁。
- 944** 同上书,第588頁。——第646頁。
- 945**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版,第205頁。——第646頁。
- 946** 《別林斯基全集》,第8卷,1955年版,第318頁。——第647頁。
- 947** 同上书,第502頁。——第647頁。
- 948** 同上书,第5卷,第638頁。——第648頁。
- 949** 初稿写于1842年,第二稿(基本的)写于1844年(同上书,第850頁注)。——第648頁。
- 950** 参閱《別林斯基选集》,第2卷,196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版,第384頁。——第649頁。
- 951** 《別林斯基全集》,第6卷,第268頁。——第650頁。

- 952 參閱《別林斯基選集》，第2卷，1953年時代出版社版，第65頁。——第650頁。
- 953 參閱同上書，第66頁。——第650頁。
- 954 《別林斯基全集》，第10卷，第23頁。——第651頁。
- 955 參閱《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第1卷，三聯書店版，第108頁。——第651頁。
- 956 見同上書。——第652頁。
- 957 見同上書，第174頁（《未來哲學原理》，第43節）。——第652頁。
- 958 參閱《別林斯基選集》，第2卷，1953年時代出版社版，第421頁。——第653頁。
- 959 參閱同上書，第439頁。——第654頁。
- 960 《卓爾尼雪夫斯基選集》，上卷，1958年三聯書店版，第445—446頁。——第654頁。
- 961 參閱《別林斯基選集》，第2卷，1954年時代出版社版，第429頁。——第655頁。
- 962 見巴·瓦·安年柯夫：《文學回憶錄》，Academia，1928年列寧格勒版，第271—272頁。——第657頁。
- 963 同上書，第409頁。——第657頁。
- 964 契·維特林斯基（瓦斯·叶·契施辛）《季·尼·格蘭諾夫斯基和他的時代》，1905年聖彼得堡第2版。——第658頁。
- 965 《別林斯基全集》，第12卷，第123頁。——第658頁。
- 966 亞·尼·貝平：《別林斯基，他的生平和通信》，1908年聖彼得堡第2版，第415頁。——第658頁。
- 967 引自1841年9月8日給瓦·彼·波特金的信（見《別林斯基全集》，第12卷，第66頁）。在原文中這封信被錯誤地當作1842年寫的。——

第 658 頁。

968 同上书,第 69 頁。——第 659 頁。

969 科留潘諾夫:《亚历山大·伊万諾維奇·柯舍列夫传》,第 2 卷,1892 年莫斯科版。——第 660 頁。

970 这篇論文写于 1911 年,它是由普列汉諾夫 1911 年春天所作的几篇关于赫尔岑的讲演組成的。从保存着的讲演稿提綱(《普列汉諾夫遺著》,第 6 集,1938 年苏联国家社会經济书籍出版社版,第 37—49 頁)以及論文初稿的片断(同上书,第 29—37 頁)可以看出普列汉諾夫最初預定为《歐洲通报》杂志写論文的几个主要阶段。在普列汉諾夫紀念館的档案庫中,保存着該杂志編輯克·克·亚尔森尼耶夫写给普列汉諾夫的信,信中表示有意刊登《亚·伊·赫尔岑和农奴制》一文(見《普列汉諾夫遺著》,第 6 集,第 26 頁)。

然而,由于一些不能确切知道的原因,普列汉諾夫将論文交給了《現代世界》杂志,这篇論文也就在該杂志的 1911 年 11 月和 12 月号刊登出来。

普列汉諾夫把《現代世界》11月号寄給亚·馬·高尔基,他在 1911 年 12 月 21 日写信給高尔基說:“……請允許我这方面也<sup>①</sup>寄給您的論赫尔岑一文的开头。結尾将在《現代世界》12 月号登出。您从那里面可以看出,我对社会心理学問題很感兴趣。請不要拒絕写信告訴我,您在我所說出的一些見解中是否发现有正确的东西。您的意見对我将有很大的意义……”(《普列汉諾夫遺著》,第 6 集,第 399 頁)。

普列汉諾夫的論文发表在亚·伊·赫尔岑誕生一百周年紀念前不久。照弗·伊·列宁的話來說,“全俄国的自由派都在紀念”赫尔岑,可是又小心翼翼地迴避严重的社会主义問題,費尽心机地掩盖革命家赫尔岑与自由主义者的不同之处”(《列宁全集》,第 18 卷,1959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9 頁)。

普列汉諾夫出来为赫尔岑辯护。他的論文《赫尔岑和农奴制》在

① [在这以前不久,高尔基曾把自己的小說《馬特維·克日米亚金》寄給了普列汉諾夫。]

揭露所謂“赫尔岑-自由主义者”的虛伪性方面作了很多貢獻。普列汉諾夫写道：“現在，当在我們的文献中（不仅是合法的，而且部分地是秘密的）开始极其輕視地批評‘地下’活动家的时候，为了历史的真实起見，不妨提醒一下，我們的文学界的‘地下工作’的最初的发起人之一就是卓越的赫尔岑”（《普列汉諾夫遺著》，第6集，第30頁）。

格·瓦·普列汉諾夫在世的时候，他的論文沒有再版过；它被收入《全集》第23卷；本版是根据《現代世界》杂志1911年第11和第12期原文刊印的。——第663頁。

- 971 見《亞·伊·赫尔岑著作和书信全集》，米·康·雷姆克主編，第11卷，1919年布拉格版，第46頁。——第663頁。
- 972 关于說明沙皇书报检查机关对《死灵魂》的态度的“众所周知的情景”，尼·瓦·果戈里曾在1866年第一次发表的1842年1月7日給普列特涅夫的信中叙述过（見《果戈里全集》，第12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2年莫斯科版。1842—1845年的书信，第28—29頁）。——第664頁。
- 973 《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8卷，1956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版，第33頁。——第664頁。
- 974 同上书，第61頁。——第665頁。
- 975 同上书，第64頁。1860年在伦敦出版了尼·普·奥格辽夫編輯的雷列也夫的《沉思》，普希金的詩《短劍》1856年曾刊載于《北极星》，有尼·普·奥格辽夫写的序言。雷列也夫的《沉思》以及普希金的詩《短劍》和《自由頌》，1861年被收入赫尔岑和奥格辽夫在伦敦出版的《十九世紀俄国秘密文学》选集中。——第665頁。
- 976 同上书，第64頁。——第666頁。
- 977 原文Сюбжонктив，是法文中的假定式，用以表明希望的和可能的行为。——第666頁。
- 978 《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8卷，第65頁。——第666頁。
- 979 同上书，第47頁。——第669頁。

- 980 見《同时代人回忆中的赫尔岑》，苏联国家文学书籍出版社，1956年莫斯科版，第77頁。——第671頁。
- 981 《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8卷，第41頁。——第671頁。
- 982 同上。——第671頁。
- 983 同上。——第671頁。
- 984 同上书，第45頁。——第672頁。
- 985 同上书，第46頁。——第673頁。
- 986 同上书，第41頁。——第673頁。
- 987 同上书，第2卷，1954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版，第213頁。——第675頁。
- 988 同上书，第8卷，第79頁。——第675頁。
- 989 參閱《萊蒙托夫詩选》，1951年时代出版社版，第261頁。——第676頁。
- 990 《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8卷，第81頁。——第677頁。
- 991 同上书，第80頁。——第677頁。
- 992 同上书，第117頁。——第678頁。
- 993 同上书，第109頁。——第678頁。
- 994 亚·伊·赫尔岑：《論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三十卷本《全集》，第8卷，1956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版。——第679頁。
- 995 普列汉诺夫在这里对于斯坦凱維奇的和赫尔岑的小組沒有作出完全正确的評價。斯坦凱維奇小組也关心政治問題，如赫尔岑所說的，它的特点是“远远地离开官方的俄国”。但是它的許多参加者的政治情緒，就其性质說是启蒙性的，比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占統治地位的赫尔岑小組的情緒要溫和些。至于說到哲学的、理論的問題，那末它們在这两个小組的参加者的观点中都占有很大的地位。——第679頁。



- 996 《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9卷,1956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版,第17頁。——第679頁。
- 997 同上书,第8卷,1956年版,第162頁。——第680頁。
- 998 見《普列汉諾夫全集》,第23卷,第435頁。——第681頁。
- 999 見同上书,第45--101頁。——第683頁。
- 1000 尼·普·奥格辽夫的論文的确切名称是:《关于共同問題的私人信件》(見《奥格辽夫社会—政治和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2年莫斯科版,第688—751頁)。——第684頁。
- 1001 所引的赫尔岑被捕的日期不确切:亚·伊·赫尔岑是在1834年7月20日深夜被捕的。——第684頁。
- 1002 《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9卷,1956年版,第63頁。——第684頁。
- 1003 同上书,第8卷,第378頁。——第685頁。
- 1004 同上书,第271頁。——第686頁。
- 1005 同上书,第266頁。——第686頁。
- 1006 同上书,第267頁。——第687頁。
- 1007 同上书,第265頁。——第687頁。
- 1008 同上书,第9卷,第79頁。——第688頁。
- 1009 同上书,第86頁。——第688頁。
- 1010 同上书,第90頁。——第689頁。
- 1011 見《普列汉諾夫全集》,第23卷,第425頁。——第690頁。
- 1012 見《同时代人回忆中的赫尔岑》,第155頁。——第690頁。
- 1013 《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4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5年莫斯科版,第16頁。——第691頁。

- 1014 同上书,第17頁。——第692頁。
- 1015 同上书,第6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5年莫斯科版,第297頁。  
——第693頁。
- 1016 《别林斯基全集》,第10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6年莫斯科版,第325頁。——第693頁。
- 1017 《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2卷,第309頁。——第693頁。
- 1018 同上书,第328頁。——第694頁。
- 1019 同上书,第6卷,第12頁。——第694頁。
- 1020 同上书,第16—17頁。——第694頁。
- 1021 同上书,第2卷,第363頁。——第695頁。
- 1022 同上书,第349頁。——第696頁。
- 1023 同上书,第214頁。——第697頁。
- 1024 同上书,第278頁。——第697頁。
- 1025 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改正是正确的。《日記》的原文是用“提高”一詞。——第697頁。
- 1026 《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2卷,第339頁。——第697頁。
- 1027 同上书,第302頁。——第697頁。
- 1028 見《普列汉诺夫全集》,第23卷,第414—445頁。——第698頁。
- 1029 《赫尔岑著作和书信全集》,第18卷,1920年布拉格版,第137頁。——第701頁。
- 1030 指的日期不确切。亚·伊·赫尔岑是1855年2月27日发表这篇演說的。——第702頁。
- 1031 《赫尔岑著作和书信全集》,第8卷,第145頁。——第703頁。
- 1032 同上书,第7卷,第249頁。——第703頁。

- 1033 《奥格辽夫社会—政治和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1952年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111頁。——第705頁。
- 1034 《赫尔岑著作和书信全集》，第8卷，第287頁。——第705頁。
- 1035 同上。——第706頁。
- 1036 同上书，第9卷，第33頁。——第706頁。
- 1037 引证的奥格辽夫的一组论文——《俄罗斯问题》中的第一篇——曾刊登在1856年《北极星》的第二期。普列汉诺夫对原文的引用不完全确切（见《奥格辽夫社会—政治和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1952年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108頁）。——第706頁。
- 1038 《别林斯基全集》，第12卷，1956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版，第468頁。——第707頁。
- 1039 《赫尔岑著作和书信全集》，第8卷，第488頁。——第708頁。
- 1040 普列汉诺夫不可能知道在苏维埃时期发表的说明赫尔岑和奥格辽夫的秘密革命活动的文件和材料，他們的直接参加准备和建立“土地和自由”組織以及参加准备六十年代俄国的人民起义。

1920年米·康·雷姆克在《赫尔岑著作和书信全集》第16卷中发表了附有亚·伊·赫尔岑的附注的尼·普·奥格辽夫的札记摘录（第93—95頁）和亚·亚·斯列普捷夫关于赫尔岑和奥格辽夫在建立“土地和自由”中的作用，以及关于他們同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战友的密切关系的回忆（第72—92頁）。

1923年出版了米·康·雷姆克著的《六十年代俄国的政治案件》（根据档案材料）一书，国家出版社，1923年莫斯科—布拉格版，在这本书的第三部分（《車尔尼雪夫斯基案件》）中发表了赫尔岑和奥格辽夫給尼·尼·奥布鲁切夫和尼·亚·謝尔诺-索洛维也維奇的信，这些信是作为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案件的物证（第188—191頁；第180—182頁）附录的。

对于这一问题的科学研究有着很大的意义的是发表在《文学遗产》中的材料，如《咨文》（《文学遗产》，第41—42卷，苏联科学院出版

社, 1941年莫斯科版, 第92—98頁)以及在所謂布拉格和索菲亚的收集品中發現的秘密文件、书信等等(《文学遗产》, 第61卷, 苏联科学院出版社, 1953年莫斯科版, 第494—522頁; 第62卷, 1955年版, 第560—570頁, 第625—699頁; 第63卷, 1956年版, 第171—227頁等)等。M. B. 涅奇金娜在《文学遗产》第61卷中发表的論文闡述了这些材料。

所有这些包含着有关“土地和自由”、革命流亡者同俄国的秘密联系等的新材料, 使苏維埃的研究家們(M. B. 涅奇金娜等)能够表明, 赫尔岑和車尔尼雪夫斯基曾經在一个革命民主主义陣营中进行反对专制农奴制度的斗争, 他們之間的分歧主要是有关策略的問題。車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是比赫尔岑和奥格辽夫更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 而他們曾經对赫尔岑后退到自由主义給予过批評。——第709頁。

- 1041 《赫尔岑著作和书信全集》, 第19卷, 第127—128頁。——第709頁。
- 1042 在尼·康·米海洛夫斯基 1869年在《进步是什么?》这一著作中第一次提出的“进步的公式”, 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唯心主义的主观主义的理論。“公式”归結为: 历史的发展应当从一定的理想(“发展了的个性”就是这种理想)的观点来评价; 归根到底, 在历史进程的方向和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这一“发达的个性”, 即知識分子。——第710頁。
- 1043 《赫尔岑著作和书信全集》, 米·康·雷姆克編輯, 第8卷, 第485—497頁。——第711頁。
- 1044 同上书, 第17卷, 第373—374頁。——第711頁。
- 1045 《奥格辽夫社会—政治和哲学著作选集》, 第1卷, 第409頁。——第711頁。
- 1046 《赫尔岑著作和书信全集》, 米·康·雷姆克編輯, 第11卷, 第231頁。——第712頁。
- 1047 普列汉诺夫的引文不确切。在《給我們的人》一文中刊印着: “社会與

論（我們在它激烈之前应当暫時保持緘默）在 1854 年之初完全不是那樣”（《赫爾岑著作和書信全集》，米·康·雷姆克編輯，第 8 卷，第 221—222 頁）。——第 712 頁。

1048 見《米哈伊爾，謝明諾維奇，舍普金札記書信。同時代人論米·謝·舍普金》，“藝術”出版社，1952 年莫斯科版，第 280 頁。——第 714 頁。

1049 《赫爾岑著作和書信全集》，第 8 卷，第 161—162 頁。——第 714 頁。

1050 赫爾岑在僑居國外初期確實同蒲魯東合作過，同意他的某些見解，在 1849 年對蒲魯東的刊物《La voix du peuple》（《人民之聲》。——譯者）的繼續出版曾提供了保證。在這一刊物中登出了赫爾岑的許多論文，其中有他的《來自彼岸》一書中的一章。以後赫爾岑對蒲魯東的思想越來越持否定的態度，對他的混亂的和在許多方面都保守的觀點給以嚴肅的批評。例如，還在五十年代初赫爾岑就指出“這一巨大天才的陰暗方面”，而在 1858 年嚴厲地斥責蒲魯東《論教會中的正義和革命》一書的神秘主義精神。赫爾岑寫道：“蒲魯東替社會主義作了天主敎式的祈禱，以此來結束自己的書”。同時稱蒲魯東是法蘭西的民族主義者（《赫爾岑全集》（三十卷本），第 10 卷，1956 年蘇聯科學院出版社版，第 201 頁）。

六十年代初赫爾岑和蒲魯東之間在關於對波蘭的關係問題的分歧表現得特別厲害。蒲魯東在這問題上是附和赫爾岑的公開的敵人即最極端的俄國反動派的。——第 715 頁。

1051 《赫爾岑全集》（三十卷本），第 10 卷，1956 年版，第 188 頁。——第 715 頁。

1052 《康·德米·卡維林和伊萬·謝·屠格涅夫給亞·伊·赫爾岑的信》，1892 年日內瓦版，第 5 頁。——第 716 頁。

1053 阿·米·翁科夫斯基，也和其他“特維爾的自由主義者”一樣，是代表企圖把自己的經濟轉移到資本主義經濟軌道上的非黑土地帶工業省份地主們的利益的。為了說明阿·米·翁科夫斯基的觀點，他在 1860

- 年从短期流放地写给亚历山大二世的一封信也是很有意思的（见米·雷姆克，《“六十年代”解放运动概述》，1908年圣彼得堡版，第450—455页）。——第717页。
- 1054 1856年3月30日亚历山大二世在莫斯科的贵族代表们前面发表了演说，宣称改革的必要。这一演说的特点是它的极端矛盾性，因为在它里面沙皇说到不愿意解放农民：“在流传着谣言，说我想给农民以自由。这是不公正的，——沙皇说……——但是不幸，在农民和他们的地主之间存在着敌对的感情……我深信，我们迟早应当走这条道路……因此，从上面发生要比从下面发生好得多”（见《过去的声音》，1916年版，第5—8期，第393页）。——第717页。
- 1055 《赫尔岑著作和书信全集》，第9卷，1919年布拉格版，第1页。——第717页。
- 1056 同上。——第718页。
- 1057 1857年11月20日亚历山大二世给维尔那的总督纳兹莫夫谕旨，允许立陶宛各省（维尔那、科瓦和格罗得诺）着手起草《关于整顿和改善地主的农民的生活》的草案。如在谕旨中所表示的，政府关于农民问题的正式纲领，规定农民得到个人自由以后在经济上仍然完全依赖地主。改革的准备工作完全掌握在贵族手里。然而给纳兹莫夫的谕旨的发表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因为公开提出废除农奴制问题使得围绕着预定的改革的思想-政治斗争活跃起来了。——第718页。
- 1058 见《赫尔岑著作和书信全集》，第9卷，1919年版，第126页。——第719页。
- 1059 P. Ч. (俄国人) 是尼·普·奥格辽夫写文章用的笔名，为的是不暴露自己参加赫尔岑的出版物。1858年，奥格辽夫为亚历山大二世的“解放”宣言所欺骗；1858年2月他第一次在发表于《钟声》的论文上用了自己的全名；在给赫尔岑的信中他对此作了如下的说明：“从亚历山大二世成为伟大的俄国事业——解放农民的首领时起，我因用笔名来隐瞒他而感到痛苦……我请你用我的名字刊登我的诗和散文，用它来代

- 替P.Ч.这两个字母,这两个字母之所以要持秘密是由于对政权不信任。尼·奥格辽夫”(見《钟声》,第9期,1858年2月15日,第68頁)(同时見注第1076)。——第719頁。
- 1060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5卷,1950年苏联国家文学书籍出版社版,第70頁。——第719頁。
- 1061 《赫尔岑著作和书信全集》,第10卷,1919年版,第194頁。——第720頁。
- 1062 同上书,第11卷,1919年版,第59頁。——第721頁。
- 1063 同上书,第15卷,1920年版,第374,376頁。  
引自《新聞記者和恐怖分子》一文,載于《钟声》,第141期(1862年8月15日)。——第721頁。
- 1064 同上书,第18卷,1920年版,第96頁。——第722頁。
- 1065 《奥格辽夫社会—政治和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108頁。——第723頁。
- 1066 同上书,第275頁。——第723頁。
- 1067 同上。——第723頁。
- 1068 同上书,第1卷,第277頁。——第724頁。
- 1069 “不知名的作者”是十二月党人尼·伊·屠格涅夫。——第724頁。
- 1070 俄国的历史学家,反动的官方民族的拥护者米·彼·波果丁在自己的有关露斯第十—十三世紀的历史的著作中,坚持了反动的俄国国家起源于諾尔曼人理論,按照这一理論,俄国国家的形成仿佛归之于瓦兰人的才干。——第725頁。
- 1071 《奥格辽夫社会—政治和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305頁。——第725頁。
- 1072 同上书,第306頁。——第726頁。

- 1073 行会捐稅或行会稅是一項向商人征取的特別稅。1863年以前在俄国按照商人資本的數額將商人划分为三种行会。——第728頁。
- 1074 《奧格辽夫社会—政治和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341頁。——第729頁。
- 1075 同上书，第329頁。——第729頁。
- 1076 如注1059所指出的，在1858年2月以前尼·普·奧格辽夫在《钟声》上用的笔名是P(俄罗斯的)和Ч(人)。同时在《钟声》上有几封从俄国来的信也签上“俄罗斯人”这一笔名。现在很多研究家认为“俄罗斯人”这个笔名在当时情况下是車尔尼雪夫斯基或某个他的亲密的战友。——第729頁。
- 1077 《赫尔岑著作和书信全集》，第10卷，第236—237頁。——第731頁。
- 1078 同上书，第11卷，1919年版，第59頁。——第732頁。
- 1079 《奧格辽夫社会—政治和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468—526頁。——第732頁。
- 1080 刊登在《钟声》第102期(1861年7月1日)的論文《人民需要什么?》同时也出版了单頁。这篇論文是由奧格辽夫在尼·亚·謝尔諾—索洛維也維奇、奧布魯奇也夫、斯列普錯夫的密切参加下写成的，他們都是后来在俄国发生的秘密革命組織“土地和自由”社(1862—1864年)的成員。論文《人民需要什么?》后来被当作綱領性文件在“土地和自由”社的成員中散布。見《赫尔岑著作和书信全集》，米·康·雷姆克編輯，第16卷，第73頁(注)，及《奧格辽夫社会—政治和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843頁(契尔尼亚克的注)。——第732頁。
- 1081 尼·普·奧格辽夫，同上书，第528頁。——第732頁。
- 1082 同上书，第531頁。——第733頁。
- 1083 《奧格辽夫社会—政治和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533—534頁。——第734頁。



- 1084 同上书,第 618 頁。——第 735 頁。
- 1085 同上书,第 627 頁。——第 735 頁。
- 1086 伊·謝·屠格涅夫在 1862 年 12 月 3 日給赫尔岑的信中写道:“自从奥格辽夫在《钟声》領头的时候起,《钟声》的讀者越来越少了。”这句话在俄国成了英国的所謂 truism (令人厌烦的真理)。这是可以理解的:在俄国讀《钟声》的公众还談不上社会主义,他們需要的是那种純粹政治鼓动的批評,你离开了它,就等于折断自己的劍。“刊登了……奥格辽夫的社会主义論文的《钟声》,——已經不是像俄国所已理解和喜爱的那种赫尔岑式的、从前的《钟声》”(《廣·德·卡維林和伊·謝·屠格涅夫給亞·伊·赫尔岑的信》,1892 年日內瓦版,第 176 頁)。——第 735 頁。
- 1087 《奥格辽夫社会—政治和哲学著作选集》,第 1 卷,第 569 頁。——第 737 頁。
- 1088 見本卷注 1030。——第 739 頁。
- 1089 赫尔岑和波兰的国外侨民的民主部分有密切的联系而且和它的某些最著名的代表有友好的关系。在准备 1863 年波兰起义的时期,赫尔岑和波兰的革命組織的代表进行过商談,商談的結果确定了俄国的和波兰的革命者之間的友誼合作。
- 弗·伊·列宁对赫尔岑在 1863 年波兰起义时所采取的立場給予了很高的評价,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当所有俄国的自由派狐群狗党由于赫尔岑为波兰辯护而紛紛离开他时,当整个‘上流社会’弃絕了《钟声》时,赫尔岑並沒有张皇失措。他仍然捍卫波兰的自由,痛斥亚历山大二世手下的鎮压者、劊子手、絞刑手。赫尔岑挽救了俄国民主派的名誉”(《列宁全集》,1959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8 卷,第 14 頁)。
- 同时参見别里亚也夫斯卡婭的《亞·伊·赫尔岑和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波兰民族解放运动》,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54 年莫斯科版。——第 740 頁。
- 1090 見《赫尔岑著作和书信全集》,第 15 卷,第 183 頁。——第 740 頁。

- 1091 在斯拉夫派基列也夫斯基兄弟的母亲阿·彼·叶拉金娜的家里,有过有名的四十年代的文学沙龙。在那里不止一次发生过亚·伊·赫尔岑和斯拉夫派的领袖阿·斯·霍米亚科夫之间的争论,“这些争论主要涉及德国哲学的构造,精神和基础”(见《同时代人回忆中的赫尔岑》,1956年苏联国家文学书籍出版社版,第137页)。赫尔岑本人在《往事与回忆》中叙述过这些争论。见第4部,第30章。——第741页。
- 1092 《赫尔岑著作和书信全集》,第17卷,第3—4页。——第743页。
- 1093 同上书,第4页。——第743页。
- 1094 《奥格辽夫社会—政治和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676—677页。——第744页。
- 1095 参阅《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196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版,第34页。——第745页。
- 1096 《奥格辽夫社会—政治和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671页。——第745页。
- 1097 《赫尔岑著作和书信全集》,米·康·雷姆克编辑,第11卷,第258—261页。——第745页。
- 1098 同上书,第260页。——第746页。
- 1099 在“土地和自由”这一俄国的地下革命组织产生和活动中(六十年代初),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起过很大的作用。关于这点见涅奇金娜在《文学遗产》(第61卷,1953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版,第459—522页)中的论文和报告;亚·伊·林科夫的《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在“土地和自由”社的创立和活动中的作用》,《历史问题》杂志,第3期,1954年,第114—130页。——第746页。
- 1100 《赫尔岑著作和书信全集》,米·康·雷姆克编辑,第16卷,第108页。——第746页。
- 1101 同上书,第14卷,第428页。——第747页。

- 1102 作为《钟声》附頁的《总謂御》是从 1862 年到 1864 年出版的。根据赫尔岑和奥格辽夫的意見，这一附頁应当成为革命的机关刊物，預定以代表人民的广大讀者为对象。然而《总謂御》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推广。尼·普·奥格辽夫和維·伊·克尔西叶夫錯誤地认为，被沙皇政府所迫害的旧教徒是容易接受革命鼓动的人物，于是預定这一刊物以旧教徒和教派分子为对象。赫尔岑和奥格辽夫在自己的秘密革命組織“土地和自由”的活动草案中，希望旧教徒、教派分子等等能和“土地和自由”一起反对沙皇制度。——第 747 頁。
- 1103 《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 2 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版，第 345 頁。——第 748 頁。
- 1104 《赫尔岑著作和书信全集》，米·康·雷姆克編輯，第 16 卷，第 232 頁。——第 749 頁。
- 1105 同上。——第 749 頁。
- 1106 《奥格辽夫社会—政治和哲学著作选集》，第 1 卷，第 547 頁。——第 750 頁。
- 1107 見本卷注 1122。——第 751 頁。
- 1108 見《普列汉諾夫全集》，第 23 卷，第 414—445 頁。——第 751 頁。
- 1109 拉薩隆尼是意大利和某些其他国家的失掉階級性的、流氓无产階級分子。——第 752 頁。
- 1110 普列汉諾夫指的是維·格·別林斯基在 1848 年 2 月 15 日給安年柯夫的信中所发表的思想，本論文第 11 节已經引证过，見本卷注 1038。——第 752 頁。
- 1111 《赫尔岑著作和书信全集》，米·康·雷姆克編輯，第 16 卷，第 523 頁。——第 753 頁。
- 1112 《奥格辽夫著作选集》（两卷集），第 1 卷，詩歌，困家文学书籍出版社，1956 年莫斯科版，第 380—381 頁。——第 754 頁。
- 1113 尼·普·奥格辽夫在俄国革命运动和俄国社会思想发展中的真正作

用，他在建立俄国地下革命组织中的积极作用，在发表了以前不知道的文件和材料以后，特别是在发表了所谓布拉格收藏品（《文学遗产》，第 41—42 卷，1941 年莫斯科版，和第 61 卷，1953 年莫斯科版，见姆·维·涅奇金娜的论文和通告，第 459—523 页）以后得到了充分阐明。这些材料是普列汉诺夫所不知道的，所以他对于尼·普·奥格辽夫在俄国革命运动中的作用估计不足。关于奥格辽夫的历史作用和他的世界观，见塔拉坎诺夫在《奥格辽夫社会—政治和哲学著作选集》一书中所写的序言《尼·普·奥格辽夫的世界观》，第 5—64 页；米·维·雅柯夫列夫，《奥格辽夫的世界观》，1957 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版。——第 754 页。

**1114** 见《奥格辽夫社会—政治和哲学著作选集》，第 1 卷，第 700 页。——第 755 页。

**1115** 赫尔岑和“青年外国侨民”的相互关系的特点，见雅·艾尔斯贝格的书《赫尔岑生活和创作》，国家文学书籍出版社，1956 年莫斯科版，第 502—516 页，《文学遗产》中的科兹明的报告，第 61 卷，1953 年莫斯科版（第 271—278 页）。——第 755 页。

**1116** 《奥格辽夫社会—政治和哲学著作选集》，第 1 卷，第 715 页。——第 757 页。

**1117** 本文是在 1912 年为纪念赫尔岑诞生一百周年而写的，最初刊登于《现代世界》杂志 1912 年第 3 号，第 223—247 页和第 4 号，第 145—177 页。

在普列汉诺夫的文稿库中保存了普列汉诺夫有关本文的笔记和草稿，它们刊载于《普列汉诺夫遗著》第 6 集，国家社会经济书籍出版社，1938 年莫斯科版，第 83—87 页。在那里，第 90—103 页，刊载了普列汉诺夫在赫尔岑文集的页边和封面上的批注。普列汉诺夫生前本文没有重印过。在《普列汉诺夫全集》中被收入第 23 卷；本版是按《现代世界》杂志的原文排印的。——第 759 页。

**1118** 说赫尔岑在青年时代没有研究哲学，这是普列汉诺夫搞错了。其所以错是由于他不知道赫尔岑的这些早期哲学著作，如《关于人在自然中

的地位》，《哥白尼太阳系解說》等（見《赫爾岑全集》（三十卷本），第1卷，1954年蘇聯科學院出版社版，第13—25, 36—51頁）。這些著作最初發表在1915年米·康·雷姆克編輯的《赫爾岑著作和書信全集》，第1卷。——第759頁。

1119 見本卷第443—504頁。——第759頁。

1120 《赫爾岑全集》（三十卷本），第9卷，1956年蘇聯科學院出版社版，第22頁。——第759頁。

1121 同上書，第23頁。——第760頁。

1122 普列漢諾夫聲稱赫爾岑對辯證法的理解沒有超過蒲魯東，這是不正確的。普列漢諾夫本人的評價也與此相矛盾，他認為《自然研究通信》這一著作的特點是赫爾岑在其中揭開了自然現象的辯證性質（例如，見本卷第790頁）。——第760頁。

1123 《赫爾岑全集》（三十卷本），第2卷，1954年蘇聯科學院出版社版，第349頁。——第760頁。

1124 同上書，第381頁。——第761頁。

1125 普列漢諾夫斷言，赫爾岑在1844年4月持着唯心主義觀點是不符合實際的。這裡普列漢諾夫對赫爾岑的哲學進化過程提出了錯誤的評價，誇大了赫爾岑在其中使用唯心主義術語（雖然，整個來說赫爾岑已是唯物主義者）的那些原理的作用。

對於《自然研究通信》（其中第一封信赫爾岑是於1844年7月動手寫的，這和《日記》上的記錄是符合的）的分析證明，赫爾岑在1844年用唯物主義觀點解決了哲學中的基本問題。——第761頁。

1126 《赫爾岑全集》（三十卷本），第2卷，第350頁。可惜，普列漢諾夫在這裡中斷了引文，對赫爾岑的下列這段話沒有作出正確的解釋，即赫爾岑說，黑格爾對理解自然的生活作出了第一次嘗試，但除了概念的邏輯運動外，沒有引進任何起作用的原因（動因）。

照赫爾岑的意思，黑格爾的功績在於他不像被許多實際材料所壓死的許多學者常有的那樣陷於繁瑣、混亂，他因為不知道經驗主義所

- 經歷的困难,所以能够理解自然在其辩证的发展中是統一的;并且,黑格尔所以避免了这些困难,是因为他“除了概念的邏輯运动外,沒有引进任何动因”。因此,照赫尔岑的意見,黑格尔的功績完全不在于他的唯心主义,而在于辩证法。的确,赫尔岑这里认为只有借助于純粹思維才能形成辩证方法,他的錯誤就在于此,但他并不作为唯心主义者发表思想。相反,正在中断了引文的下列句子中,赫尔岑贊許地評論黑格尔从“抽象环境”中走出来:“黑格尔本人不可能……不断地坚持在太稀薄的抽象的环境中,并且现实是活生生地以全部热情用观念、幻想和詩的形象来加以发掘的(黑格尔在这点上值得大加贊揚),但他坚信发展的普遍性”(《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2卷,第350頁)。——第762頁。
- 1127 往下所引证的筆記載于《日記》中6月29日。——第762頁。
- 1128 威廉·約尔丹的文章載于1844年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杂志《Wiegands Vierteljahrs schrift》(《維干德季刊》)第1号,标题是《哲学和一般科学,哲学的一般批判》。——第762頁。
- 1129 見《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2卷,第361頁。——第763頁。
- 1130 同上。——第763頁。
- 1131 同上书,第372頁。——第764頁。
- 1132 赫尔岑讀了黑格尔的学生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卡尔·罗森克兰茨的书《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s Leben》(《黑格尔传》)(柏林1844年版)。——第764頁。
- 1133 《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2卷,第376—377頁。——第764頁。
- 1134 同上书,第3卷,1954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版,第120頁。——第765頁。
- 1135 同上。——第765頁。
- 1136 同上书,第97頁。——第765頁。
- 1137 同上书,第120頁。——第766頁。

- 1138 同上书,第 296 頁。——第 767 頁。
- 1139 同上书,第 197 頁。——第 767 頁。
- 1140 同上书,第 301 頁。——第 767 頁。
- 1141 同上书,第 302—303 頁。——第 768 頁。
- 1142 同上书,第 314—315 頁。——第 769 頁。
- 1143 參閱《費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1959 年三联书店版,第 114 頁。——第 769 頁。
- 1144 《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 3 卷,第 121 頁。——第 770 頁。
- 1145 同上书,第 9 卷,第 27 頁。据流传到我們手里的古希腊小說《伊索传》的記載,寓言作家伊索是住在薩摩斯島上的哲学家薩伏的奴隶。赫尔岑所說:“我們是自由人,而不是薩伏的奴隶”的意思是,我們擺脫了强迫我們必需使用的伊索寓言式的語言。赫尔岑在《法国和意大利来信》的一組信件中第五封信的末尾也使用了相似的說法,那里給这一組信件中的最初几封信以这样的評語:“其中許多地方充滿了玩笑和胡言乱語,憤怒,不得不充滿心灵的苦痛,我們那么習慣的,就像薩伏的奴隶伊索所習慣的寓言那样的諷刺”(《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 5 卷,第 88 頁)。——第 771 頁。
- 1146 參閱《費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1959 年三联书店版,第 253 頁。——第 772 頁。
- 1147 《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 3 卷,第 297 頁。——第 772 頁。
- 1148 正文的出处錯了,應該是:Feuerbach's Werke. II, S.322—323(《費尔巴哈全集》,第 2 卷,第 322—323 頁)(見費尔巴哈,《对〈哲学原理〉的批評意見》。參閱《費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版,第 253 頁)。——第 773 頁。
- 1149 关于这点,見普列汉諾夫的文章《再論唯物主义》,載本选集,第 2 卷,中文版第 497 頁及以下。——第 775 頁。

- 1150 《关于食物的学說,雅·摩莱肖特的通俗解說》,1863年在圣彼得堡第一次用俄文出版。不久还出了两个版本:1865年莫斯科版,1868年圣彼得堡版。——第775頁。
- 1151 引自費尔巴哈对摩莱肖特《关于食物的学說》一书的笔记。——第775頁。
- 1152 普列汉诺夫援引的是費尔巴哈为其《全集》第一版所写的序言。——第776頁。
- 1153 赫尔岑和格兰诺夫斯基于1846年在理論上的分歧首先是因为格兰诺夫斯基在这时强烈地倾向唯心主义,这与以唯物主义世界观为基础的《自然研究通信》相矛盾。此外,赫尔岑和格兰诺夫斯基的严重分歧还在于后者的温和的政治立場。格兰诺夫斯基不同于赫尔岑的是他从来不是革命者,不致力于斗争;他始终是启蒙运动者,不能提高到革命民主主义。但是格兰诺夫斯基是专制制度的反对者,政治自由的拥护者。他所一直保持的对四十年代先进理想的忠誠,使他能維持和赫尔岑的友誼,并且互相通信直到他逝世。——第776頁。
- 1154 見本卷第217—223頁和《普列汉诺夫全集》,第6卷,第256—263頁。——第777頁。
- 1155 伯尔辛涅夫——屠格涅夫的小說《前夜》中的主人公。杜勃罗留波夫在《真正的日子何时来临?》一文中,引证了伯尔辛涅夫的一些話以后,写道:“大部分伯尔辛涅夫的議論都是这种空虚的浪漫主义式的。但在其中有一个地方提到他关于費尔巴哈的議論:听他談論費尔巴哈是很有趣的!……”  
所以,伯尔辛涅夫是一个非常好的俄国貴族,他以义务的原則教育出来,然后就致力于淵博的学問和哲学……”(《杜勃罗留波夫文集》(三卷本),第3卷,1952年苏联国家文学书籍出版社版,第46頁)。——第777頁。
- 1156 赫尔岑在第二次流放回来后不久就开始加强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促使他这项研究的原因之一是和别林斯基的爭論,后者由于不正确地



解释黑格尔而处于“与现实调和”的时期。車尔尼雪夫斯基在《俄国文学果戈里时期概观》中针对赫尔岑写道：“和别林斯基及其朋友争论的人……看到，只有用黑格尔本人的武器才能战胜黑格尔，因而他们致力于对这一思想家的深刻研究。他们用完全成熟的智力、用由于对独立思考及充满各种各样冲突的丰富的生活经验的习惯而磨炼出来的洞察力，用生活和严格的科学所赋予的坚定信念的造詣，来对黑格尔进行研究”（参阅《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1958年三联书店版，第434页）。——第779页。

- 1157 《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9卷，第18页。——第779页。
- 1158 同上书，第19页。——第779页。
- 1159 同上书，第2卷，第223—224页。——第780页。
- 1160 同上书，第3卷，第189页。——第781页。
- 1161 参阅赫尔岑：《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1962年商务印书馆版，第91—92页。——第781页。
- 1162 《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3卷，第189页。——第782页。
- 1163 参阅赫尔岑：《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1962年商务印书馆版，第69—70页。——第782页。
- 1164 《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9卷，第21页。——第782页。
- 1165 后来著名的斯拉夫主义者尤·費·薩馬林(1819—1876)在四十年代，即普遍酷爱德国哲学的时期，企图使哲学和宗教结合起来。他断言：“正教教会脱离了黑格尔哲学就不可能存在”。——第784页。
- 1166 参阅《費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版，第118页。——第784页。
- 1167 《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3卷，第156页。——第784页。
- 1168 同上。——第785页。
- 1169 同上书，第172页。——第785页。

- 1170 同上书,第 157—158 頁。——第 786 頁。
- 1171 同上书,第 2 卷,第 404 頁。——第 786 頁。
- 1172 恩格斯:《反杜林論》,1962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20 頁及以下。——第 786 頁。
- 1173 《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 3 卷,第 158—159 頁。——第 786 頁。
- 1174 同上书,第 108 頁。——第 787 頁。
- 1175 同上书,第 18—19 頁附注。——第 787 頁。
- 1176 参閱恩格斯:《反杜林論》,1962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21 頁。——第 787 頁。
- 1177 《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 3 卷,第 96 頁。——第 788 頁。
- 1178 威·奥斯特瓦尔德,德国自然科学家,列宁曾說他是“……伟大的化学家和渺小的哲学家”。奥斯特瓦尔德的主要科学著作专讲电解理論,关于色彩的学說以及其他物理化学問題。奥斯特瓦尔德还是反动的馬赫主义“唯能”論的作者,这一理論的基础是企图想像沒有物质的运动。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一书中揭露了这一理論的唯心主义实质。
- 海克尔是德国达尔文主义的卓越的捍卫者和普及工作者,对自然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和宣传促进甚多,同时拒絕“唯物主义者”的称号并稱自己的世界观为一元論。——第 788 頁。
- 1179 在所有各版上都印着:伊·瓦·基列也夫斯基。实际上赫尔岑是記下了和彼·瓦·基列也夫斯基談話的印象(見《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 2 卷,第 309 頁)。——第 789 頁。
- 1180 同上书,第 310 頁。——第 789 頁。
- 1181 同上书,第 3 卷,第 135 頁。——第 789 頁。
- 1182 同上书,第 309 頁。——第 790 頁。
- 1183 根据霍布斯的学說,国家是由于人們相互調和和協議的結果而产生

的，而人們在此以前則处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国家的绝对的和无条件的权力代替了人与人之间的无限自私与仇恨。国家对人具有无限的权利，它奴役每一个人并凌驾于他们之上。所以霍布斯把国家比作圣经中传说的怪物利维坦。霍布斯的闡述国家和社会制度问题的主要著作之一即由此得名，——《利维坦或教会和公民国家的物质，形式和权力》，1651年出版(有中文译本)。——第790頁。

- 1184 赫尔岑：《自然研究通信》，第二封信(三十卷本《全集》，第3卷，第128—129頁)。——第790頁。
- 1185 《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9卷，第23頁。——第790頁。
- 1186 同上书，第3卷，第129頁。——第791頁。
- 1187 見黑格尔：《历史哲学》，1963年商务印书馆版，第308頁。——第793頁。
- 1188 見本选集，第1卷，中文版，第422—450頁。——第793頁。
- 1189 《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3卷，第142頁。——第794頁。
- 1190 同上书，第2卷，第336頁。——第794頁。
- 1191 同上书，第3卷，第85頁。——第795頁。
- 1192 同上书，第84頁。——第795頁。
- 1193 同上书，第86頁。——第795頁。
- 1194 同上书，第2卷，第349頁。——第796頁。
- 1195 引自黑格尔的《宗教哲学》。——第796頁。
- 1196 謝林：《先驗唯心主义体系》，苏联国家社会经济书籍出版社，1936年列宁格勒版，第355頁。——第796頁。
- 1197 同上书，第344頁。——第797頁。
- 1198 《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3卷，第87頁。——第797頁。

- 1199 长子继承财产——不经转卖并且是根据长子继承制度分产转让(即转让给留下遗产人的长子)的不动产。在俄国贵族经过沙皇政府的同意可以把自己的巨大财产变成所谓世袭财产。世袭财产按长子继承权转让,不能分产,也不能征收,等等。——第 798 页。
- 1200 普列汉诺夫所引用的赫尔岑的《日记》笔记不是写于 1844 年而是 1845 年(见《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 2 卷,第 413 页)。——第 798 页。
- 1201 《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 2 卷,第 340 页。——第 799 页。
- 1202 尼·瓦·果戈里的中世纪史的讲演材料是他任彼得堡大学通史教研室副教授时所讲的。见《果戈里全集》,第 9 卷,1952 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版,第 94—144 页。——第 799 页。
- 1203 亚·伊·赫尔岑:《科学中的华而不实的作风》。第四篇文章。参阅 1962 年商务印书馆版,第 100 页。——第 799 页。
- 1204 亚·伊·赫尔岑,日记,1843 年 2 月 18 日笔记。三十卷本《全集》,第 2 卷,第 266 页。——第 800 页。
- 1205 同上书,第 266—267 页。——第 800 页。
- 1206 同上书,第 2 卷,第 345 页。——第 800 页。
- 1207 圣西门的学生和信徒安凡丹和巴札尔被宣布为由圣西门派所组成的宗教团体的“最高之父”。安凡丹成为这派的神甫,主持婚礼的宗教仪式,进行洗礼,安葬等。——第 800 页。
- 1208 《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 3 卷,第 204 页。——第 801 页。
- 1209 这些例外是指巴贝夫的信徒及其同道者,特别是“平等派密谋”的参加者。关于这一点见普列汉诺夫的《十九世纪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等文章,本选集,第 3 卷,中文版,第 641—643, 667 页。——第 801 页。
- 1210 见本卷第 698—702 页。——第 801 页。
- 1211 《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 2 卷,第 345 页。——第 801 页。

- 1212 同上书,第5卷,第64頁。——第802頁。
- 1213 黑格尔:《历史哲学》,1963年商务印书馆版,第433-434頁。——第802頁。
- 1214 《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2卷,第321頁。  
    赫尔岑是指在路易·勃朗的书中曾詳細描写的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法国的下列事件。  
    1830年7月27日,在七月資產階級革命初期,反对查理十世政府的《Temps》〔《时代》〕报的出版者之一让·雅·鲍特沒有服从政府委員关于封閉报纸的命令。正如路·勃朗所写的,他和委員的辯論,“当着大量观众拖延了几个小时,获得了真正的历史意义,从而向人民指出了不屈服的典范”。
- 1832年6月在巴黎爆发了共和派的起义。起义者被赶到圣-梅利修道院旁边的死胡同里,在那里,他們曾进行英勇的自卫。
- 1833年,小資產階級民主报纸《Le bon sens》〔《常識》〕的編者罗得在回答政府沒收反对立場的小册子时声明,他将亲自到广场去分发这个小册子。他在指定的時間实现了自己的意图,群众当着警察的面用热烈的呼声向他致敬,警察不敢干涉。——第803頁。
- 1215 《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3卷,第124頁。——第803頁。
- 1216 同上书,第2卷,第278頁。——第804頁。
- 1217 《关于墨罗温时代的故事》收入《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2卷,第7-32頁。——第804頁。
- 1218 《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3卷,第125頁。——第805頁。
- 1219 同上书,第9卷,第22頁。——第807頁。
- 1220 普列汉諾夫断言,赫尔岑在1854年所写的《往事与回忆》的一章中,对“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一命題的理解不够深刻,但他对这一事实也沒有給以应有的注意(虽然有关这件事的細节他都提到了),即早在1842-1843年写就的《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一文中,赫尔岑就已基本上正确地理解这一命題了。赫尔岑反对科学中的佛教徒,他們

“宣传与現代生活中的一切黑暗面調和，他們称一切偶然的、經常的、过去的，总之，一切在街上将遇到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因此，具有被承认的权利，他們就是这样理解伟大的思想，‘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3卷，第77頁）。

所以，赫尔岑已接近于理解这一点，即只有必然的东西才是“现实的”。——第807頁。

- 1221 很明显，普列汉诺夫是指黑格尔关于法国革命的以下意見：“……这是旭日升起，一切有思想的人都庆祝这个时代。同时崇高的、感人的情感占了优势，世界充滿了热情……”（黑格尔：《历史哲学》，参閱1963年商务印书館版，第493頁）。——第807頁。
- 1222 “叶戈尔·費多里奇”是指黑格尔。别林斯基这样称呼黑格尔。——第809頁。
- 1223 参閱赫尔岑：《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1962年商务印书館版，第84頁。——第809頁。
- 1224 《波罗金諾战役》一文是别林斯基于1839年写的，这篇文章說明了他与现实的“調和”。——第810頁。
- 1225 《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6卷，第25頁。——第811頁。
- 1226 同上书，第26—27頁。——第811頁。
- 1227 同上书，第29頁。——第812頁。
- 1228 同上。——第812頁。
- 1229 同上书，第5卷，第62頁。——第813頁。
- 1230 普列汉诺夫关于《法国意大利来信》在先进的俄国人士中造成“沉重的印象”的意見，是不完全准确的。《法国意大利来信》由三个单元組成。最初的四封信刊登于1847年的《同时代人》上，标题是《Avenue Marigny 来信》（《馬利尼大街来信》），他們組成第一个单元。在俄国社会思想史上，它們起了巨大的作用。它們促使一方面是資产階級—貴族自由主义另一方面是和空想社会主义溶合在一起的革命民

主义两者之間划清了界限。别林斯基及其同道者成为赫尔岑的坚决拥护者。当时曾是赫尔岑的朋友,但却是自由资产阶级情緒的表达者的瓦·彼·波特金,Е. Ф. 柯尔施以及其他的“西欧派”,极端敌視赫尔岑关于建立自己的西欧资产阶级統治的批評意見。赫尔岑在回答具有自由主义情緒的人的批評意見时,在1847年12月31日的信上声称:“……应该坦白地說,我感到自己具有这样的独立性,甚至你們的意見……也不能动摇我,我承认这些信具有某些价值”(《亚·伊·赫尔岑的新資料》。苏联列宁公共图书馆丛刊,1927年莫斯科版,第40頁)。——第813頁。

- 1231 《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5卷,第57頁。——第814頁。
- 1232 著名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观点的拥护者比埃尔·勒魯(1797—1871)的名字在俄国革命知識分子中很受欢迎。赫尔岑和别林斯基也曾經在他的崇拜者之列,他們称他为“彼得·理查”。后来,当勒魯創立了自己的所謂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社会学說时,赫尔岑对他采取极端否定的态度。——第814頁。
- 1233 从拉甫罗夫在《历史信札》中所阐述的主观-社会学理論的观点看来,“文化”和“文明”的概念是有差别的。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社会生活形式和心理因素的总和。文明是在思想影响下所产生的文化形式的进步的交替。个人是思想的代表者。而“进步的任务”,如在第6封信中阐述的,在于“文化应该用思想来改造”(《彼·拉·拉甫罗夫社会政治問題选集》(八卷本),第1卷,1934年莫斯科版,第245頁)。——第815頁。
- 1234 《赫尔岑著作和书信全集》,米·康·雷姆克編輯,第21卷,1923年莫斯科—彼得堡版,第215—224頁。——第816頁。
- 1235 《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6卷,第34—35頁。——第817頁。
- 1236 見本卷第289—347頁。——第817頁。
- 1237 《赫尔岑著作和书信全集》,第21卷,第223頁。——第818頁。
- 1238 同上。——第819頁。

- 1239 《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2卷,第306—307頁。——第821頁。
- 1240 斯拉夫主义者尤·費·薩馬林在給赫尔岑的信中曾責备他,說他把年輕一代引入歧途,加他以宣传唯物主义、无神論和革命观点的罪过。赫尔岑在六十年代以前,在自己的出版物中曾同像伊·阿克薩柯夫和尤·薩馬林这样一些斯拉夫主义者合作,后来,在斯拉夫主义者公开站在政府方面的时期,就有彻底和他們决裂的必要。而在1864年,当薩馬林和赫尔岑在国外相遇和在会面时发生爭論之后,就暴露了他們在思想上和理論上的完全分歧,赫尔岑曾向薩馬林发出《致反对者的信》,其中坚决地捍卫了唯物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第821頁。
- 1241 《赫尔岑著作和书信全集》,米·康·雷姆克編輯,第17卷,第375頁。——第822頁。
- 1242 見 L. Feuerbach, Briefwechsel und Nachlass. 1850—1872. Dargestellt von K. Grün. Bd. II. Leipzig u. Heidelberg 1874, S. 328. (《費尔巴哈书信和遺著》(1850—1872),卡·格律恩編,第2卷,1874年萊比錫和海得堡版,第328頁)——第822頁。
- 1243 接近斯拉夫主义者的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弗·亞·切尔卡斯基公爵(1824—1878)在一篇和1861年准备农民改革有关的文章中建議在农民解放以后也为地主保留体罰鞭答十八下的权利。文章引起了当时进步輿論的强烈反对。——第823頁。
- 1244 《赫尔岑著作和书信全集》,第17卷,第376頁。——第823頁。
- 1245 这里暗示引起赫尔岑和托尔斯泰对犯罪和懲罰观点的比較的思想,在普列汉諾夫的《托尔斯泰和赫尔岑》这个讲演中得到充分的發揮(見《普列汉諾夫遺著》,第6集,第2—20頁)。——第824頁。
- 1246 見《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2卷,第247頁。——第824頁。
- 1247 見同上书,第365頁。——第825頁。
- 1248 同上书,第362頁。——第825頁。
- 1249 同上书,第401—402頁。日記是写于1845年1月6日,而不是像在



文章內和《赫尔岑全集》日内瓦版所指出的写于1月8日。——第826頁。

1250 見本卷第666頁。——第826頁。

1251 为紀念赫尔岑誕生一百周年普列汉諾夫在他的墓前发表了演說。演說稿登載在以俄文和法文出版于巴黎的《未来》(L'avenir)杂志的俄文部分(№27, 1912年4月21日)。在《普列汉諾夫全集》中演說稿編入第23卷,第453—457頁。在普列汉諾夫的存稿庫中保存了这篇演說的全部墨迹,本卷就是根据它来刊印的。——第827頁。

1252 海涅的这几句話是普列汉諾夫从他的著作《浪漫主义学派》中引出的(見《海涅全集》(十二卷本),第7卷,Academia, 1936年版,第171頁)。——第827頁。

1253 陀思妥也夫斯基在《作家日記(1873年)》第2章《旧人》,中这样称呼赫尔岑(見《陀思妥也夫斯基全集》,第19卷,“启蒙”出版社,彼得堡版,沒有出版年份,第157頁)。——第827頁。

1254 論文《Vivat Polonia!》和《Mater dolorosa》刊載在米·康·雷姆克主編的《赫尔岑著作和书信全集》第11卷,論文《Resurrexit》刊載在第16卷。——第829頁。

1255 刊登在阿克薩柯夫的机关刊物《莫斯科》1867年第58期的伊·謝·阿克薩柯夫的信,被赫尔岑本人在他1867年3月10日給阿克薩柯夫的信的Post-Scriptum(跋)和在他《答伊·謝·阿克薩柯夫》的公开信中引用过(見下注)。

在指摘赫尔岑援助波兰起义的时候,阿克薩柯夫写道:“此事且让赫尔岑先生在俄国面前懺悔罢。他不能不理解,对于他在俄国面前懺悔他的罪行是不可能調和的”。

而我們願意认为,对于他还可能有精神的恢复,因为我們对于他的誠实和他的錯誤的坦白还没有放弃过信心”(見《赫尔岑著作和书信全集》,第19卷,1922年彼得堡版,第269頁)。——第830頁。

1256 普列汉諾夫的引文摘自《答伊·謝·阿克薩柯夫》(同上书,第287頁)。

在这一注明 1867 年 4 月 6 日和刊登在 5 月 1 日第 240 号的《钟声》上的回答中，赫尔岑写道：“我用不着什么懺悔，难道，是因为詞句有些不溫和和严厉，完全相反，我号召人懺悔，我等待着懺悔的人。我們号召人坦白，号召人的良心觉醒……”。

在我的心灵上对俄国有什么罪过呢？

从少年时代起我就把我的生命和整个青春献給它，为它尽我所能地工作，二十年来我在异国繼續了同一的工作”（同上书，第 278—279 頁）。——第 830 頁。

- 1257 我們要引证普列汉诺夫关于赫尔岑的演說之一的开头一段，这段話保存在普列汉诺夫的文稿庫中，死后才发表：

“我被派定在你們的記憶中复活亚·伊·赫尔岑的形象的任务。我对你們不隱瞞，我是因此而感到荣幸的。但是同时我請你們考虑到，解决这光荣的任务是很困难的。赫尔岑活得不长久：他生于 1812 年，而在 1870 年 1 月他就去世了。这是不长久的，至少从西欧的观点看是如此。但是当你看一下他的不长久的生命时，就会不禁想起路易·費尔巴哈的漂亮的兩行詩：

**Kurz ist das Leben fürwahr: doch kurz, wie das Dichtung kurz ist,**

**Welches ew'gen Gehalt birgt in die flüchtige Form,**

即是說，生命短促，但是这种短，如像兩行短詩的短一样，在自己里面却含有永恒的内容。只有对于像赫尔岑这样的人可以应用費尔巴哈的这一思想”（見《普列汉诺夫遺著》，第 6 集，第 65—66 頁）。——第 832 頁。

- 1258 本卷发表的对资产阶级的俄国文化史家，文学家和政論家米·奥·格尔申臧的书的三篇評論，是普列汉诺夫针对第一次俄国革命失敗以后反动时期反革命意識形态而写的論文。格尔申臧的政治立場特別清楚地表現在 1909 年莫斯科出版的《路标》文集的論文中。被列宁称为“自由主义叛变的百科全书”的整个这部文集，标志着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知識分子同俄国革命思想的传统完全决裂，污蔑俄国的解放运动，号召人們去为反动势力服务。格尔申臧的宗教-神秘主义的哲学观

点是和这一叛徒的政治立場密切联系着的。

普列汉諾夫批判了格尔申臧的思想观点。在評論他的著作的时候，普列汉諾夫一方面认为強調格尔申臧在著作中对大量事实材料的利用的重要性是有益的，另一方面指出俄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向神秘主义轉变的整个有害性和反动性。

这里发表的普列汉諾夫的論文最初刊载在《現代世界》杂志：《恰达也夫》——刊载在1908年第1期，第176—198頁；《米·格尔申臧的〈青年俄罗斯史〉，1908年莫斯科版》——刊载在同一年第5期，第2部，第109—114頁；《米·格尔申臧：〈历史札記(关于俄国社会)〉，1910年莫斯科版》——刊载在1910年第4期，第2部，第140—144頁。头两篇論文在1910年重印在普列汉諾夫的文集《由防禦到进攻》中，重印时普列汉諾夫作了不多的文字上的修改。在文稿庫中保存着《历史札記》这一論文的手稿以及与它有关的意見。在全集中书评刊登在第23卷。

头两篇論文是根据《由防禦到进攻》文集的原文刊印的。和杂志的論文或多或少有重大出入的地方，在注中都加以說明。最后一篇书评——评《历史札記》一书——是根据經過和原稿复核后的杂志論文刊印的。和原稿不同的地方，在注中加以說明，同时刊出了保存在文稿庫中的普列汉諾夫对格尔申臧这本书的未发表的意見。——第835頁。

- 1259** 这几篇东西刊在格尔申臧于1913—1914年編的《彼·雅·恰达也夫的著作和书信》两卷集中。其中《哲学书信》I—IV，法文的刊在第1卷第74—142頁，譯文刊在第2卷第106—176頁，第一封信也有另一种譯文，刊在第3—20頁；《狂人的辯护》，法文的刊在第1卷第219—234頁，譯文刊在第2卷第215—231頁；給亞·伊·屠格涅夫的两封信刊在第1卷第208—217頁；給西尔庫爾的信，法文的刊在第1卷第268—275頁，譯文刊在第2卷第257—264頁；給无名氏的信，法文的刊在第1卷第276—278頁，譯文刊在第2卷第265—267頁。

格尔申臧发表的恰达也夫的《哲学书信》总共四封。属于这一組的其他的信在苏維埃时代公布在《文学遺產》(第22—24卷，1935年

- 版,第18—62頁)。除了恰达也夫的这些新的直到那时人们还不知道的信以外,还发表了沙霍夫斯基对早先为人所知的信的原文所作的重大修改。——第835頁。
- 1260 “Sursum corda”——字面上的意义:“我們当誠心禱告”。是《耶利米哀歌》中的一句話(《聖經》上先知耶利米对于耶路撒冷废墟的哀歌之一),开头是“我們当誠心向天上的上帝举手禱告!”(見《旧約》《耶利米哀歌》第3章第41行。——譯者)——第836頁。
- 1261 普列汉诺夫指的是七十年代的革命民粹主义的各种流派。——第836頁。
- 1262 “直到他的生命終結时”一語在《現代世界》中是沒有的。——第837頁。
- 1263 《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9卷,1956年版,第139頁。——第837頁。
- 1264 赫尔岑三十年代中期在莫斯科十二月党人米·費·奥尔洛夫的家中認識恰达也夫。——第838頁。
- 1265 見《恰达也夫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1914年莫斯科版,第118頁。——第840頁。
- 1266 同上。——第840頁。
- 1267 同上书,第119頁。——第840頁。
- 1268 在《現代世界》上是:“表达了西歐派陣营所有的人或多或少强烈地感觉到和或多或少清楚地意識到了的东西”。——第841頁。
- 1269 摘自《寄恰达也夫》一詩(見《尼·米·雅孜科夫詩集》,1948年“苏維埃作家”出版社版,第276頁)。——第841頁。
- 1270 摘自《祖父》一詩(《尼·亚·涅克拉索夫著作和书信全集》,第3卷,1949年苏联国家文学书籍出版社版,第15頁)。——第841頁。
- 1271 見《恰达也夫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226頁。——第842頁。

- 1272 見《車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1958年三联书店版，第321頁。——第842頁。
- 1273 見給国民教育部部长謝尔盖·謝明諾維奇·烏瓦洛夫伯爵的信的草稿(附亚·謝·普希金的意見)《彼·安·維亞澤姆斯基公爵全集》，第2卷，1879年圣彼得堡版，第221頁。——第842頁。
- 1274 这里說的是“官方民族性”思想意識的三个“原則”：“正教，专制，民族性”。这些反动的原則是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之初由沙皇的国民教育部部长烏瓦洛夫作为教育青年学生的綱領而表述和提出的。——第842頁。
- 1275 見《恰达也夫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117頁。——第842頁。
- 1276 在普列汉諾夫的一本筆記本中摘录了同样的話，并附了如下的引文出处：“見格尔文努斯的《十九世紀史》，第1卷，第324頁”(格尔文努斯(Gervinus, Georg Gottfried 1805—1871)是德国資產階級历史家，政治活动家和文学史家，著有《維也納會議后十九世紀史》、《德国詩史》等书。——譯者)。——第843頁。
- 1277 普列汉諾夫指的是《往事与回忆》中他凭記憶引証出的如下一段話：“……不論是斯賓諾莎或者萊辛都沒有被投入暗室或被处罰站牆角；对于这样的人有时是迫害和杀害，但是不会用小事情来侮辱他們；把他們送到断头台，但是不送到悔过院”(《赫爾岑全集》(三十卷本)，第10卷，1956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版，第195頁)。——第843頁。
- 1278 在《現代世界》上：“那时候是如此可怕地狹窄，而实际行动的領域部分地或是完全地不容許有思想的人进入。”——第844頁。
- 1279 引自3月(不是5月)25日給米·亚·恰达也夫的信(見《恰达也夫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53頁)。——第844頁。
- 1280 这些資料格尔申威取自恰达也夫的日記(日記的原稿保存在莫斯科苏联国立列宁圖書館中)。——第845頁。
- 1281 見《恰达也夫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65頁。——第845頁。
- 1282 4月1日的信(同上书，第70頁)。——第845頁。

- 1283 赫尔岑读了《死魂灵》的片断以后在 1843 年 4 月 10 日的《日记》中所作的記事說：“……露斯是这样活生生地呈现在我的面前，当代的問題是这样不正常地重复了，因之我准备着哭泣。睡眠是长久的，沉重的。我們为什么早醒——睡觉罢，像周围所有的人一样。——够了！”（《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 2 卷，1954 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版，第 276 頁）——第 846 頁。
- 1284 見《恰达也夫著作和书信集》，第 2 卷，第 119 頁。——第 847 頁。
- 1285 恰达也夫二十年代初住在彼得堡的时候，接近了十二月党人，特别是伊·德·雅庫什金，并且加入了十二月党人的秘密团体“幸福联盟”。普希金的浸透着革命热情的有名的詩《寄恰达也夫》，和他的生活的这一时期有关。1825 年十二月党人暴动的时候，恰达也夫正在国外。——第 847 頁。
- 1286 見《德米特利·尼古拉也維奇·斯維尔别也夫（1799—1826）的笔记》第 2 卷，1899 年莫斯科版，第 237 頁。——第 848 頁。
- 1287 見《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 7 卷，1956 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版，第 133—263 頁。赫尔岑的著作《論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第一次用德文以杂志論文的形式出版，同年另行出版法文本。在这本书中赫尔岑用三頁光輝的篇幅来論述恰达也夫和他的第一封《哲学书信》，他虽然不贊成恰达也夫的神秘主义，却认为这封信的問世是一个巨大的事件。“那是号召，是觉醒的信号；书信把 12 月 14 日以后的冻冰打碎了。最后来了一个心灵充滿了悲伤的人；他找到了惊人的語句，以使用送殯的辞令，用压抑的沉靜心情，說出十年来积在有教养的俄国人心中的全部痛苦”（第 221 頁）。——第 848 頁。
- 1288 見《恰达也夫著作和书信集》，第 1 卷，第 299 頁。——第 848 頁。
- 1289 恰达也夫 1851 年 7 月 26 日写信給赫尔岑說：“我听說，您在想念着我和爱我。感謝您。我常常也在想您，同时精神上 and 思想上很遺憾，世界的事变可能把我們同您永远分开……为了众所周知的几行，我感謝您……”（同上书，第 299 頁）。——第 848 頁。

- 1290 在《现代世界》上是：“开始传播起来”。——第 849 页。
- 1291 指安·瓦·卢那察尔斯基在 1908—1911 那几年以《宗教与社会主义》为标题出版单行本的论文，第 1—2 部。——第 849 页。
- 1292 《恰达也夫著作和书信集》，第 2 卷，第 116—117 页。——第 850 页。
- 1293 同上书，第 117 页。——第 850 页。
- 1294 1832 年 4 月 20 日给亚·伊·屠格涅夫的信没有载入《恰达也夫著作和书信集》中。见所评论的格尔申臧的书第 298 页的引证。——第 851 页。
- 1295 见《恰达也夫著作和书信集》，第 2 卷，第 227 页。——第 852 页。
- 1296 同上书，第 1 卷，第 194—196 页。——第 853 页。
- 1297 同上书，第 192—193 页。在这封信里恰达也夫写道：“有人说，有很大的叫嚷声；我对这一点丝毫也不惊异……不管怎样，假使我所说的是真话，它将存在下去；假使不是，它就用不着存在下去”。——第 853 页。
- 1298 在 1837 年 10 月 19 日给伊·德·雅库什金的信中恰达也夫说：“顺便地说，我希望它（《哲学书信》）对于那些能合法获得它的人将不完全是没有结果的，因为，如果我沒有错的话，在它里面含有适合于他们个人理解的东西”（同上书，第 206 页）。——第 854 页。
- 1299 在给谢林的信（同上书，第 2 卷，第 239—241 页）中，恰达也夫把斯拉夫派关于俄国的“独特性”以及它和西方的对立，“关于我们在世界的使命，关于我们的未来的命运”等等的幻想，称作“稀奇古怪”。——第 854 页。
- 1300 在给西尔库尔的信中恰达也夫挖苦斯拉夫派，他写道：“……请你们别太惊异，如果日内你们将突然知道，在你们还陷于中世纪的黑暗中的那个时代，我们已大踏步地顺着各种各样的进步的道路前进……”接着说：“……某种致命的情况阻止了我们通过许多世纪的空间胜利行进……西欧思想的侵入……所以我们应当向后转……假使你们在儿

- 年以后訪問我們，你們將有充分的机会欣賞我們后退的发展的果实……”(同上书，第247—248頁)。——第854頁。
- 1301 不論是普列汉諾夫所引证的恰达也夫的信或是普列汉諾夫所不知道的发表在《文学遗产》中的《哲学书信》，都駁斥格尔申臧的概念。恰达也夫不能贊同斯拉夫派人的意見，不会认为俄国的农奴制的落后是它进步的保证。在第二封《哲学书信》中他强烈地攻击农奴制和正教会，正教会“……沒有提高母性的声音来反对民族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使用可恶的暴力”(《文学遗产》，第22—24卷，第23頁)。——第854頁。
- 1302 見普列汉諾夫1895年写成的論文《悲观主义乃是經濟现实的反映》(《全集》，第10卷，第135—162頁)。——第854頁。
- 1303 引自1882年9月18日的《露斯报》，第38期，第3頁。——第855頁。
- 1304 見1862年12月1日《日报》的論文《論六十年代文学中的伪人民性》(《阿克薩柯夫全集》，第2卷，1891年圣彼得堡版，第84頁)。——第855頁。
- 1305 見《阿克薩柯夫全集》，第2卷，1891年圣彼得堡版，第698—699頁。——第857頁。
- 1306 見收入本卷中的該論文。——第857頁。
- 1307 《自然研究通信》載入《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3卷。——第858頁。
- 1308 引文的頁碼是指1876年的日内瓦版。在新版中見第3卷原文，第265—266, 301, 308—309頁。——第858頁。
- 1309 关于普列汉諾夫对于《自然研究通信》的这个评价錯誤，見本卷注1125。——第858頁。
- 1310 見《十二月党人尼·伊·洛勒尔的札記》，1931年苏联国家社会經濟书籍出版社版，第202頁。——第860頁。
- 1311 普希金1823年写成的有名的詩《魔鬼》通常被认为是指亚历山大·拉也夫斯基的。然而普希金1825年以第三人称写道：“关于《魔鬼》一詩，



- 我以为批評家錯了。許多人都有同样的意見，有些人甚至指出了普希金好像在自己的奇怪的詩中想要描繪的人。我以为他們是不正确的，至少我在《魔鬼》中看出另一个更为道德的目的”（見《普希金全集》，第7卷，1949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版，第36—37頁）。——第860頁。
- 1312** “受洗礼的财产”是赫尔岑的用語，他指的是农奴农民。这个詞是他的一篇論农奴制的論文所用的标题。——第861頁。
- 1313** 米·格尔申臧的书《恰达也夫》出版于1908年（見本卷普列汉諾夫的书評）。——第861頁。
- 1314** 普列汉諾夫指的是前“合法馬克思主义者”布尔加柯夫的轉变为宗教反动分子。后来，布尔加柯夫成为白俄时，当了神甫。——第863頁。
- 1315** 格列勃·烏斯宾斯基的短篇小說《无可救药的人》（收在《新的时代，新的关怀》丛书中）中，教堂执事在和自己的酗酒作斗争时，請求医生給他那种“能入根底、入筋脉”的药剂。——第865頁。
- 1316** 赫尔岑这一篇为外国人写的文章載入三十卷本全集第7卷。——第866頁。
- 1317** 格尔申臧的《历史札記》一书所涉及的是对斯拉夫派的意識形态的分析以及他們与所謂西欧派的爭論。——第867頁。
- 1318** 《路标》（見本卷注1259）——第867頁。
- 1319** 指的是九十年代后半期的“合法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别尔甲也夫、布尔加柯夫及其他等人。——第868頁。
- 1320** “沒有意义的梦想”这是尼古拉二世的話，1895年1月17日他在向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的代表发表演說时以此語回答他們对宪法的期望。——第868頁。
- 1321** 引自馬克思的《神圣家族》第六章（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67頁）。——第873頁。
- 1322** 車尔尼雪夫斯基的类似言論參見本卷第46—47頁。——第873頁。
- 1323** 从龙犬变化出来的靡非斯托第一次出現时浮士德喊道：“瞧，这不就是

- 龙犬的原形!”(这是一句双关语,意为:这就是要点之所在。歌德《浮士德》的原文是“Das ist des Pudels Kern”。Pudel 本意为“龙犬”,但 Pudels Kern 为一成語,意为“要点”。——譯者)——第 873 頁。
- 1324 我們用保存在普列汉諾夫的文稿庫中他的有关这篇論文的筆記补充这一篇文章:
- “对格尔申臧的书的評論。
- 对于社会科学說来,全部問題在于,人們的意志和感觉是否是人們自己运动的直接动力,或者这一直接动力必須通过某一种原因作中介。恩格斯:意志的内容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意志正是指向那一方而而不是指向另一方向呢?
- 我們:应当把社会条件理解为人們在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归根到底人們的意志和感觉取决于它——这一社会发展的直接原因”。——第 874 頁。
- 1325 普列汉諾夫对博古查尔斯基的书的評論发表在《現代世界》杂志 1912 年第 6 期,第 327—331 頁的《书刊評介栏》。在《普列汉諾夫全集》中这篇評論文載在第 23 卷。它基本上是根据《現代世界》的文字刊印的。——第 875 頁。
- 1326 普列汉諾夫錯誤地写成:“亚·伊·赫尔岑逝世”。——第 875 頁。
- 1327 《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 8 卷,1956 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版,第 162 頁。——第 876 頁。
- 1328 《赫尔岑著作和书信全集》,米·康·雷姆克編輯,第 17 卷,1922 年彼得堡版,第 372 頁。——第 876 頁。
- 1329 着重号是普列汉諾夫加的。——第 877 頁。
- 1330 《赫尔岑著作和书信全集》,米·康·雷姆克編輯,第 17 卷,第 377 頁。——第 879 頁。
- 1331 引自論文《旧題目新內容》(見《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 12 卷,1957 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版,第 426 頁)。——第 881 頁。
- 1332 引自論文《旧題目新內容》(同上书,第 432 頁)。——第 881 頁。

## 人名索引

### 三 画

- 门采尔, 沃尔弗干格 (Менцель, Вольфганг, 1798—1873年) —— 德国批评家和作家。—— 418—419, 443, 515, 558。
- 门德尔森, 摩西 (Мендельсон, Моисей, 1729—1786年) ——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启蒙时代的社会活动家。—— 265。
- 大卫, 雅克·路易 (Давид, Жак Луи, 1748—1825年) —— 著名的法国古典派画家。—— 350。
- 万-奥斯塔德, 阿德累安 (Ван Остаде, Адриан, 1610—1685年) —— 荷兰画家和雕刻家。—— 379。
- 马尔林斯基, 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罗维奇·别斯屠热夫的笔名) (Марлинс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естужев), 1797—1837年) —— 俄国十二月党人作家。—— 362。
- 马尔海奈凯, 菲利浦·康拉德 (Маргейнеке, Филипп Конрад, 1780—1846年) —— 德国新教神学家和基督教史学家, 右派黑格尔主义者。—— 698。
- 马尔萨斯, 托马斯·罗伯特 (Мальтус, Томас Роберт, 1766—1834年) —— 英国反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199, 280—281, 286, 408。
- 马尔蒙, 奥古斯特·弗雷德里克·路易, 德 (Мармон, Огюст Фредерик Луиде, 1774—1852年) —— 拿破仑军队的元帅, 1814年改投波旁王朝。—— 327。
- 马志尼·朱泽培 (Маццини (Мадзини), Джузеппе, 1805—1872年) —— 意大利民主主义者, 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活动家。—— 718。
- 马克思, 卡尔 (Маркс, Карл, 1818—1883年) —— 64, 67—68, 86—87, 98—99, 109, 116, 119—121, 170, 212, 244—245, 269—270, 275—276, 287, 293, 298, 301, 317—319, 322, 324, 326, 328, 330, 333, 367, 407, 482, 495, 516, 559, 567, 576, 582, 600, 672, 701, 703, 710, 712, 720, 729, 733, 773—775, 778。
- 马斯洛夫 (Маслов) —— 赫尔岑-奥格辽夫大学生小组的参加者。—— 611。
- 马赫, 恩斯特 (Мах, Эрнст, 1838—1916年) —— 奥地利物理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 276, 705, 707。

\* 阿拉伯字所标页码系原文页码, 亦即本书页边所印页码。—— 译者

## 四 画

卜肯多尔夫, 亚历山大·赫里斯托弗罗维奇(Бенкендорф, Александр Христофорович, 1783—1844年)——宪兵司令和第三厅厅长, 尼古拉一世时期的反动活动家之一。——616, 621。

文格洛夫, 谢明·阿法那西耶维奇(Венгеров, Семен Афанасьевич, 1855—1920年)——俄国文学史家和书志学专家。——472, 474—477, 543。

巴·(Б.)——见“巴枯宁, 米·亚·”条。

巴尔苏柯夫, 尼古拉·普拉东诺维奇(Барсуков, Николай Платонович, 1838—1906年)——俄国资产阶级古文献学家, 俄国书志学家和历史学家。——559。

巴丘什柯夫, 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Батюшков, Константин Николаевич, 1787—1855年)——俄国诗人。——562。

巴札罗夫, 弗(Базаров В., 1874年生)——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鲁德涅夫(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Руднев)的笔名。社会民主党员, 马赫主义者, 后来成为孟什维克。——246, 701。

巴师夏, 弗雷德里克(Бастиа, Фредерик, 1801—1850年)——法国的庸俗经济学家。——120, 140。

巴甫连柯夫, 弗洛伦基·费多罗维奇(Павленков, Флорентий Федорович, 1839—1900年)——俄国进步的书籍出版者。——419。

巴拉丁斯基, 叶甫盖尼·阿布拉莫维奇(Баратынский, Евгений Абрамович, 1800—1844年)——俄国诗人。

——546, 549, 558。

巴枯宁,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年)——俄国社会活动家, 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家, 由于反对马克思的第一国际总委员会, 1872年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开除出国际。——433, 439, 444, 473, 492, 500, 510, 549, 564, 628, 669—670, 672, 722。

巴蒂, 沙尔(Баттё, шарль, 1713—1780年)——法国艺术理论家, 哲学家和教育家。——356。

巴塞克, 瓦季姆·瓦西里也维奇(Пасек, Вадим Васильевич, 1808—1842年)——人种志学者和作家, 赫尔岑的朋友和同志, 赫尔岑大学生小组的参加者。——611。

扎戈斯金, 米哈伊尔·尼古拉也维奇(Загоскин, 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1789—1852年)——俄国作家。——526。

扎勃洛茨基-捷夏托夫斯基, 安得列依·帕尔费诺维奇(Заблочкин-Десятовский, Андрей Парфенович, 1807—1881年)——政论家, 曾参加草拟1861年2月19日法令。——54。

尤什凯维奇, 巴维尔·索洛莫诺维奇(Юшкевич, Павел Соломонович, 1873年生)——孟什维克, 马赫主义者, 许多哲学著作的翻译者。——246, 277。

尤尔凯维奇, 巴姆费尔·达尼洛维奇(Юркевич, Памфил Данилович, 1827—1874年)——基辅神学院和莫斯科大学的教授, 唯心主义哲学家。——246—249, 253—256, 264。

- 尤利安·奥斯都普尼克 (Юлиан Отступник)——罗马皇帝(361—363年), 企图恢复多神教。 646。
- 车尔尼雪夫斯卡娅, 奥里珈·索克拉托夫娜 (娘家姓瓦西里也娃) (Чернышевская, Ольга Сократовна (Васильева), 1833—1918年)——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妻子。——70, 159, 201, 203, 220, 398—403。
- 车尔尼雪夫斯基, 尼古拉·加甫利洛维奇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1828—1889年) 47, 58, 70—78, 86—95, 97—104, 106—112, 114—217, 219—232, 235—326, 328—352, 354—357, 359—361, 363—370, 372—374, 376—387, 389, 391—414, 471—472, 496, 501, 538—539, 541, 568, 579—580, 590, 637, 646, 648, 677, 696, 730, 752, 753, 777—778。
- 车尔尼雪夫斯基, 加甫利尔·伊万诺维奇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Гавриил Иванович, 1795—1861年)——大司祭,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父亲。——74, 186—187, 205。
- 车尔尼雪夫斯基, 亚历山大·尼古拉也维奇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1854—1915年)——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子。——399, 402, 409。
- 车尔尼雪夫斯基, 米哈伊尔·尼古拉也维奇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1858—1924年)——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儿子, 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的出版者。——220, 398, 590。
- 切尔卡斯基,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Черкасский, 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24—1878年)——俄国自由主义派社会活动家, 接近斯拉夫主义者。——594, 735。
- 切斯诺柯夫, 瓦西里·德米特利也维奇 (Чесноков, Василий Дмитриевич)——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幼年时的朋友, 车尔尼雪夫斯基回忆录的作者。——184。
- 孔西得朗, 维克多 (Консидоран, Виктор, 1808—1893年)——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傅立叶的学生和拥护者。——458—459, 631, 715。
- 孔德, 奥古斯特 (Конт, Огюст, 1798—1857年)——法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实证主义的创始人之一。——122, 228, 404—405, 454, 484, 503, 614, 770。
- 韦伯, 格奥尔格 (Вебер, Георг, 1808—1888年)——德国历史学家, 他的主要著作, 12卷本《通史》由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译成俄文。——167, 222, 272, 328, 332, 338。
- 贝尔, 卡尔·马克西莫维奇 (Бер (Бер), Карл Максимович, 1792—1876年)——俄国科学院院士, 学者, 自然科学家, 胚胎学的创始人。——292, 325—326, 411—412。
- 贝平, 亚历山大·尼古拉也维奇 (Пыпин, 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1833—1904年)——俄国自由派文学史家,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表兄弟。——74, 129, 182—183, 222, 398—400, 402, 409, 413—414, 432, 434, 451, 453—455, 460, 464, 473—474, 487—490, 501, 533, 544—547, 553—554, 567, 572, 577, 580, 593, 766。
- 贝平娜, 尤利雅·彼得罗夫娜 (Пыпина,

- Юлия Петровна, 1837—1897年)  
——亚·尼·貝平的妻子。——183。
- 贝克莱, 乔治 (Берклей (Беркли),  
Джордж, 1684—1753年) ——英国  
主教, 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705。
- 贝里斯卡·瑪丽·卡洛琳 (Беррийская  
Мария Каролина, 1798—1870年)  
——公爵夫人。——718。
- 比留科夫, 巴維尔·伊万諾維奇 (Бирю-  
ков, Павел Иванович, 1860—1931  
年) ——列·尼·托尔斯泰傳記的作  
者, 拥护托尔斯泰宗教学說的人。——  
395。
- 日哈列夫, 米哈伊尔·伊万諾維奇  
(Жихарев, 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生  
于1820年) ——恰达也夫的表侄和他  
的傳記的作者。——753, 762。
- 丹尼尔逊, 尼古拉·弗兰泽維奇 (笔名尼  
古拉-逊) (Даниельсон, Николай  
Францевич (Николай-он), 1844—  
1918年) ——俄国文学家, 十九世紀  
八十至九十年代民粹派思想家之一。  
——463。
- 牛頓, 伊薩克 (Ньютон, Исаак, 1642—  
1727年) ——75, 169, 197, 704。
- 烏斯賓斯基, 尼古拉·瓦西里也維奇  
(Успен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37—1889年) ——俄国作家。——  
129—130, 375—380, 386, 393。
- 烏斯賓斯基, 格列勃·伊万諾維奇 (Ус-  
пенский, Глеб Иванович, 1843—  
1902年) ——俄国作家, 民主主义者。  
——117, 174, 771。

## 五 画

汉內科夫, 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維奇  
(Хань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Влади́ми-

рович, 1825—1853年) ——俄国解放  
运动的参加者, 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  
——574。

汉尼拔 (Аннибал (Ганнибал), 約公  
元前 247—183年) ——迦太基統帥。  
——255。

边沁, 耶利米 (Бентам, Иеремия, 1748  
—1832年) ——英国資產階級法學  
家, 道德學家, 功利主义的宣揚者。  
——91, 714。

让斯也夫, 格里哥里·阿維多維奇  
(Джаншиев, Григорий Аветович,  
1851—1900年) ——政論家, 六十年  
代改革的热心拥护者和贊揚者。——  
644。

艾尔皮丁, 米哈伊尔·康斯坦丁諾維奇  
(Элпидин, Михаил Константино-  
вич, 1835—1908年) ——六十年代革  
命运动的参加者, 后来成为暗探局的  
間諜。——72。

艾卡茨豪遜, 卡尔 (Эккартсгаузен,  
Карл, 1752—1803年) ——德国作家,  
以神智学的著作知名于俄国。——  
188。

尼古拉一世 (Николай I) ——俄国沙皇  
(1825—1855年) ——47, 50, 53—56,  
58, 62, 74, 177, 493—494, 638, 641,  
763, 781。

尼古拉-逊 (Николай-он) ——見“丹尼  
尔逊, 尼·弗·” (Даниельсон Н. Ф.)  
条。

尼古拉泽, 尼古·雅柯夫列維奇 (Нико-  
ладзе, Нико Яковлевич, 1843—  
1928年) ——格魯吉亞革命民主主义  
者, 政論家和文学批評家。——648。

尼·-逊 (Н.-он) ——見“丹尼尔逊, 尼·  
弗·”条。

- 尼基田科, 亚历山大·瓦西里也維奇 (Никитенко,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1805—1877年)——俄国自由主义派文学活动家, 批評家, 书刊检查員。—454, 566, 585。
- 瓦尔特·司各脫 (Вальтер Скотт)——見“司各脫·瓦尔特”条。
- 瓦西里也娃, 奧里伽·索克拉托夫娜 (Васильева, Ольга Соκραтовна)——見“車尔尼雪夫斯卡娅·奧·索”条。
- 瓦西里契柯夫, 亚历山大·伊拉里奧諾維奇 (Васильчи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Илларионович, 1818—1881年)——貴族的地方自治会的活动家, 經濟学家和政論家。—409。
- 瓦連廷諾夫, 尼 (Валентинов, Н. 1879年生)——尼古拉·弗拉基斯拉沃維奇·沃尔斯基 (Николай Владиславович Вольский) 的笔名。孟什維克, 馬赫主义者。—277。
- 瓦特克, 威廉 (Ватке, Вильгельм, 1806—1882年)——德国哲学家, 神学家。—698。
- 布尔仁, 尤貝尔 (Буржен, Юбер, 1874年生)——法国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历史学家, 社会主义思想史方面若干著作的作者。—300。
- 布尔加林, 法捷依·維涅迪克托維奇 (Булгарин, Фаддей Венедиктович, 1789—1859年)——俄国反动作家和新聞記者, 警察特务和告密人。—212, 469。
- 布尔加柯夫, 謝尔盖·尼古拉也維奇 (Булгаков, 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71—1927年)——俄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路标》文集的撰稿者, 后来为教师, 白俄流亡分子。—770, 775。
- 布尔加柯夫, 雅柯夫·伊万諾維奇 (Булгаков, Яков Иванович, 1743—1809年)——俄国外交家, 文学翻譯家。—568。
- 布克尔, 亨利·托馬斯 (Бокль, Генри Томас, 1821—1862年)——英国自由資產階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实证論者。—93, 387, 391。
- 布拉切克, 斯切潘·阿尼西莫維奇 (Бурчак, Степан Анисимович, 1800—1876年)——极端反动的作家, 造船二程师。—560。
- 布朗基, 路易·奧古斯特 (Бланки, Луи Огюст, 1805—1881年)——法国革命家, 空想共产主义者。—301。
- 布鲁丢斯, 馬克·尤尼烏斯 (Брут, Марк Юний, 公元前85—42年)——阴谋反对尤利烏斯·凱撒的领导者之一。—650。
- 加加林, 伊万·謝尔盖也維奇公爵 (Гагарин, 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1814—1882年)——三十年代文学小组的参加者, 后改信天主教, 并参加耶稣会。—759。
- 加拉荷夫, 伊万·巴甫洛維奇 (Галахов, Иван Павлович, 1809—1849年)——俄国学者, 接近赫尔岑-奧格辽夫小组。—767。
- 加莱尔, 阿尔芒 (Каррель, Арман, 1800—1836年)——法国資產階級共和政体的拥护者; 反对波旁王朝的《民族》报的领导人之一。—718。
- 圣西門, 昂利·克勞德 (Сен-Симон, Анри Клод, 1760—1825年)——109, 301, 423, 429, 458—459, 475, 484—485, 503, 613—616, 642, 648,

- 715, 720。
- 圣-西尔, 顾维翁 (Сен-Сир (Сэн-Сир), Гувюион, 1764—1830年) ——法国国务活动家, 拿破仑军队的元帅。——327。
- 圣希黎 (Сент-Илер) ——见“乔弗洛埃·圣希黎”条。
- 圣茹斯特, 路易·安都昂 (Сен-Жюст, Луи Антуан, 1767—1794年)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 雅各宾党的领导人之一, 公安委员会的委员。——105。
- 圣博甫, 沙尔·奥古斯丹 (Сент-Бёв, Шарль Огюстен, 1804—1869年) ——法国文学家和诗人。——527。
- 司各脱·瓦尔特 (Скотт, Вальтер, 1771—1832年) ——英国浪漫派作家。——534。
- 司徒卢威, 彼得·别隆加尔道维奇 (Струве, Петр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1870—1944年)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政论家和新康德主义哲学家, 九十年代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者”, 后来是立宪民主党人, 白俄流亡分子。——246, 772。
- 弗罗洛夫, 尼古拉·格里哥里也维奇 (Фролов, Никола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1812—1855年) ——俄国新闻记者, 地理学家。——770。
- 弗罗曼滕, 欧仁 (Фромантэн, Эжен, 1820—1876年) ——法国画家和作家。——358。
- 札哈林娜, 娜塔莉亚·亚历山大罗夫娜 (Захарьина, Наталь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1817—1852年) ——亚·伊·赫尔岑的妻子。——617, 781—782。
- 甘恩, 伊万·阿列克谢也维奇 (Ган, Иван Алексеевич) ——《薩拉托夫省小市民阶层目前的日常生活》一书的作者。——138。
- 卡貝, 埃蒂耶納 (Кабэ, Этьен, 1788—1856年) ——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 《伊加利亚旅行记》的作者。——475, 720。
- 卡拉切夫, 尼古拉·瓦西里也维奇 (Калачев, 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19—1885年) ——俄国历史和法律文献的出版者和编辑。——293。
- 卡拉姆津,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 (Карамзин, 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1766—1826年) ——俄国作家和历史学家。——342, 470, 562, 753。
- 卡拉科佐夫, 彼得·尼基佛罗维奇 (Каракозов, Петр Никифорович) 薩拉托夫的牧师。——189, 197。
- 卡拉科佐夫, 德米特利·弗拉基米罗维奇 (Каракозов, Дмитр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1840—1866年) ——“伊舒欽”小组的成员, 1866年謀刺亚历山大二世未遂。——166。
- 卡特科夫, 米哈伊尔·尼基佛罗维奇 (Катков, Михаил Никифорович, 1818—1887年) ——俄国政论家, 由自由主义转变到反动的帝制阵营。——71, 143, 246, 439, 500。
- 卡維林, 康士坦丁·德米特利也维奇 (Кавелин, Константин Дмитриевич, 1818—1885年) ——俄国历史学家和法学家, 自由主义者。——212—213, 460, 473—474, 518, 615, 643, 662, 669。
- 卡普尼斯特, 瓦西里·瓦西里也维奇 (Капнист, 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757—1823年) ——俄国剧作家和诗



人。 527。

叶弗列莫夫, 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 (Ефремов, Пет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30—1907年)——藏书家, 俄国古典作家出版物的书志学家和编辑。——568。

叶卡特林娜二世 (Екатерина II)——俄国女皇 (1762—1796年)——49—50, 579, 714。

叶拉金娜, 阿夫多基雅·彼得罗夫娜 (Елагина, Авдотья Петровна, 1789—1877年)——伊·瓦·和彼·瓦·基列也夫斯基的母亲, 在她家里曾有著名的30—40年代的文学沙龙。——664。

卢克泰茨亚 (Лукреция, 公元前六世纪)——据传说, 是一个著名的罗马妇女, 因被太子塞克斯特·塔克文尼所污而自杀。——88, 256—257。

卢那察尔斯基, 安纳托里·瓦西里也维奇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А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75—1933年)——政治活动家, 艺术理论家和学者, 在反动时代为马赫主义的拥护者和寻神派, 后来是布尔什维克,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部人民委员。——246, 695, 710, 759。

卢格, 阿尔诺德 (Руге, Арнольд, 1802—1880年)——德国激进的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主义者, 同马克思一起出版了《德法年鉴》杂志; 六十年代归附俾斯麦。——109, 428, 485, 547, 698。

卢梭, 让·雅克 (Руссо, Жан Жак, 1712—1778年)——法国启蒙主义者, 民主主义者, 小资产阶级思想家。——79, 91, 222, 491, 519—520。

皮萨列夫, 德米特利·伊万诺维奇 (Писарев, Дмитрий Иванович, 1840

—1868年)——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 唯物主义者。——164—166, 228, 342, 346, 348, 350, 361, 364, 383—392, 576—577。

失明的瓦西里二世 (Василий II Темный, 1415—1462年)——1425年起为莫斯科的大公。——164, 179, 227。

## 六 画

安凡丹, 巴特米·普罗斯比尔 (Анфантен, Бартеlemi Проспер, 1796—1864年)——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圣西门的信徒。——716。

安东诺夫·М. (Антонов М. 死于二十世纪初)——批评家, 关于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书和一系列文章的作者。——408。

安东诺维奇, 马克西姆·阿列克谢也维奇 (Антонович, Максим Алексеевич, 1835—1918年)——《现代人》的撰稿者, 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164, 209, 288。

安年柯夫, 巴维尔·瓦西里也维奇 (Анненков, Павел Васильевич, 1812—1887年)——俄国批评家和回忆录作者, 自由主义者。——379, 464, 491—493, 519, 582, 592—594, 617, 621, 635, 769。

米·巴·(М. Б.)——见“巴枯宁, 米·亚·”条。

米什勒, 茹尔 (Мишле, Жюль, 1798—1874年)——法国小资产阶级历史学家。——631。

米希勒, 卡尔·路德维希 (Михелет, Карл Людвиг, 1801—1893年)——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黑格尔主义者, 柏林大学的教授。——698。

- 米拉波, 奥诺雷·加布里埃尔·利开提 (Мирабо, Оноре Габриель Рикетти, 1749—1791年)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456。
- 米哈伊洛夫, 亚历山大·德米特利也维奇 (Михайл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Дмитриевич, 1855—1884年) ——俄国革命家, 民粹主义者。——675。
- 米哈伊洛夫, 米哈伊尔·拉里奥诺维奇 (Михайлов, Михаил Ларионович, 1829—1865年) ——俄国诗人和政论家, 民主主义革命家。——176, 209。
- 米涅, 弗朗斯瓦·奥古斯特·玛丽 (Минье, Франсуа Огюст Мари, 1796—1884年) ——法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学家。——458, 557。
- 米留金, 德米特利·阿列克谢也维奇 (Милютин, Дмитр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1816—1912年) ——著名的俄国军事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56。
- 米海洛夫斯基, 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42—1904年) ——俄国社会学家和政论家, 自由主义民粹派的首领。——229, 242, 266, 287, 301, 391, 419—420, 446, 463, 574, 638, 648, 710, 714, 730, 761。
- 米勒, 让·弗朗斯瓦 (Милье, Жан Франсуа, 1642—1679年) ——法国血统的风景画家, 生于安特卫普, 居于巴黎, 其画模仿法国古典画家普森 (Poussin, Nicolas, 1594—1665年)。——358。
- 米雅柯金, 维涅迪克特·亚历山大罗维奇 (Мякотин, Венедикт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67年生) ——俄国历史学家, 政论家, 自由民粹主义者, 后来是白俄流亡分子。——493, 495。
- 达尔文, 查理·罗伯特 (Дарвин, Чарльз Роберт, 1809—1882年) ——著名的英国生物学家, 进化论的创始人。——68, 167, 241—242, 253, 279—287, 335, 391, 404—405。
- 达威多夫, 但尼斯·瓦西里也维奇 (Давыдов, Денис Васильевич, 1784—1839年) ——1812年卫国战争时期的游击队员, 著名的诗人。——755。
- 齐托维奇, 彼得·巴甫洛维奇 (Цитович, Петр Павлович, 1843—1913年) ——法学家、教授, 革命民主主义的反对者。——204。
- 宇伯威格, 弗里德里希 (Ибервег, Фридрих, 1826—1871年) ——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心理学家, 《哲学简史》的作者。——237。
- 迁果波尔斯基, 路德维希·瓦列利昂诺维奇 (Тенгоборский, Людвиг Валерианович, 1793—1857年) ——经济学家, 统计学家和俄国国务活动家。——112—113, 649。
- 迈耶尔, 爱德华 (Мейер, Эдуард, 1855—1930年) ——德国资产阶级古代世界史学家, 反动的社会循环发展论的拥护者。——305。
- 亚历山大一世 (Александр I) ——俄国皇帝 (1801—1825年) ——152, 481, 564, 714。
- 亚历山大二世 (Александр II) ——俄国皇帝 (1855—1881年) ——47, 53, 56—58, 69, 166, 171, 176, 220, 634, 642, 644—646, 648—649, 656—657。

- 亚历山大三世 (Александр III)——俄国皇帝(1881—1894年)——47。
- 亚里士托克逊 (Аристоксен, 公元前354年—?)——古希腊音乐理论家, 亚里士多德的学生。——237。
- 亚里士多德 (Аристотель, 公元前384—322年)——103, 159, 235—237, 254, 266, 271, 342—344, 346, 355—357, 359, 605。
- 列·丹捷克, 费利克斯·亚历山大 (Ле Дантек, Феликс Александр, 1869—1917年)——法国生物学家。——234。
- 列布莱, 阿尔丰斯 (Лебле, Альфонс)——《唯物主义和唯灵主义》一书的作者。——237。
- 列昂节夫, 巴维尔·米哈伊洛维奇 (Леонтьев, Павел Михайлович, 1822—1874年)——俄国古典语言学教授, 考古学家, 文化领域中反动的专制政治思想家。——294。
- 列维托夫,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Левит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35—1877年)——俄国民派作家。——472。
- 西尔库尔, 阿道夫 (Сиркур, Адольф)——法国政论家, 与恰达也夫通信的人。——747, 762。
- 西叶斯, 埃曼纽尔·约瑟夫 (Сийес (Сийес), Эмманюэль Жозеф, 1748—1836年)——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449, 510。
- 西吉兹蒙特王朝 (Сигизмунды)——波兰的王朝 (1506—1632年)。——150, 218。
- 西·果·(С. Г.)——见“果戈茨基”条。
- 西蒙, 茹尔 (Симон, Жюль, 1814—1896年)——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唯心主义者。——274。
- 托尔斯泰, 列甫·尼古拉也维奇 (Толстой,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1828—1910年)——204, 347—348, 360, 392, 394—396, 414, 737, 756—757, 782—783。
- 托克维尔, 阿列克西斯 (Токвиль, Алексис, 1805—1859年)——法国历史学家和自由资产阶级倾向的政论家。——458—459。
- 托洛昌诺夫 (Толочанов)——赫尔岑的亲戚的农奴医生, 他是自修成功的。——606—607。
- 吉尔费尔丁格, 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 (Гильфердинг, Александр Феоорович, 1831—1872年)——俄国斯拉夫学家, 历史学家和俄国民间壮士歌的搜集家。——190—191。
- 吉霍米罗夫, 列甫·亚历山大罗维奇 (Тихомиров, Лев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52—1923年)——“民意”党的领导者之一, 后来是叛徒和保皇党。——734, 781。
- 老普林尼, 凯尤斯·塞孔都斯 (Плиний Старший, Гай Секунд, 23—79年)——罗马学者和作家。——357。
- 毕希纳, 路德维希 (Бюхнер, Людвиг, 1824—1899年)——德国生理学家, 庸俗唯物主义者。——68, 78, 230, 234, 387。
- 伊万诺夫,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 (Иванов,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1849—1927年)——音乐评论家和作曲家。——603。
- 伊万诺夫-拉佐姆尼克 (Иванов-Разумник), 拉佐姆尼克·瓦西里也维奇·伊万诺夫 (Разумник Васильевич

Иванов) 的笔名(生于 1878 年)——小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倾向的文学研究家和历史学家。——378, 638。

伊万诺夫, 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维奇(Иванов, Вячеслав Иванович, 1866—1935 年)——象征主义的诗人和理论家, 彼得堡宗教哲学团体的成员。——246。

伊万诺夫, 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Иванов, Дмитрий Петрович, 1812—1880 至 1889 年)——别林斯基的亲属, 关于他的回忆录的作者。——498。

伊斯坎德尔(Искандер)——见“赫尔岑, 亚·伊·”条。

伊壁鸠鲁(Эпикур, 公元前 341—270 年)——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250, 688。

乔弗洛埃, 圣希黎·埃蒂耶纳(Жоффуа Сент-Илер, Этьен, 1772—1844 年)——法国进步的进化论学者, 查·达尔文的先驱者之一。——242, 282。

乔治·桑(Жорж Санд, 1804—1876 年)——阿美罗里·杜德芳(Авроры Дюдеван)的笔名。著名的法国女作家。——160—161, 195, 197, 224, 475, 493, 533, 588。

伏尔泰, 弗朗斯瓦·玛丽·阿鲁埃(Вольтер, Франсуа Мари Аруэ, 1694—1778 年)——法国启蒙主义哲学家, 百科全书派之一。——224, 337, 420—421, 444, 485, 491, 519—520, 527—528, 731, 771。

伏伦斯基, 阿基姆·里沃维奇(笔名弗列克塞拉)(Вольнский, Аким Львович (Флексера), 1863—1926 年)——反动的艺术家和评论家, 颓废派分子和“为艺术而艺术”论的宣传者。

236—237, 246—249, 253—255, 264, 417—418, 420, 444, 450—451。

伏格特, 卡尔(Фогт (Фохт), Карл, 1817—1895 年)——德国自然科学家, 庸俗唯物主义者。——68, 78, 230, 234, 387, 390, 729, 732。

华莱士, 阿弗里德·罗素(Уоллес, Альфред Рассел, 1823—1913 年)——英国自然科学家, 达尔文主义者。——285。

色诺芬(Ксенофонт, 约公元前 430—355 年或 354 年)——古希腊历史学家。——171。

休谟, 大卫(Юм, Давид, 1711—1776 年)——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不可知论者。——404—405, 707。

## 七 画

沃尔弗, 克里斯提安(Вольф, Христиан, 1679—1754 年)——德国学者和唯心主义哲学家。——680。

沃尔斯基(Вольский)——见“瓦连廷诺夫”条。

沃龙楚娃, 伊丽沙白·克萨维尔也夫娜(Воронцова, Елизавета Ксавьерьевна, 1792—1880 年)——新俄罗斯总督的妻子。——769。

沙列尔, 尤利乌斯(Шаллер, Юлиус, 1810—1868 年)——德国黑格尔派哲学家。——698。

沙秦,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Сатин, 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1814—1873 年)——诗人和翻译家, 赫尔岑大学生小组的参加者。——611。

库托尔迦, 米哈伊尔·谢明诺维奇(Куторга, Михаил Семенович, 1809—1886 年)——俄国古希腊历史

- 学家,彼得堡和莫斯科大学教授。— 294。
- 库雪列夫-别兹博罗德科,格里哥里·亚历山大罗维奇 (Кушелев-Безбородко, Григо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死于1876年)——作家,《俄国言论》杂志的出版人。——176。
- 库德里亚夫策夫,彼得·尼古拉也维奇 (Кудрявцев, Пе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1816—1858年)——俄国历史学家和作家,季·尼·格朗诺夫斯基的学生和朋友。——577。
- 庇护九世 (Пий IX)——罗马教皇(1846—1878年)——520。
- 李卜克内西,威廉 (Либкнехт, Вильгельм, 1826—190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之一。——122。
- 李比希,尤斯图斯 (Либих, Юстус, 1803—1873年)——德国大化学家。——75, 197。
- 李西普 (Лизипп (Лисипп) 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雕刻家。——357。
- 李特雷,爱米尔 (Литтра, Эмиль, 1801—1881年)——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237, 454, 465, 491。
- 李维,梯特 (Ливий, Тит, 公元前59年至公元前17年)——罗马历史学家。——96。
- 李嘉图,大卫 (Рихардо, Давид, 1772—1823年)——英国学者,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85, 97, 156, 199。
- 杜马,让·巴蒂斯特·安德烈 (Дюма, Жан Батист Андре, 1800—1884年)——法国化学家。——703。
- 杜别里特,列昂节·瓦西里也维奇 (Дубельт, Леонт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792—1862年)——第三厅厅长和宪兵团团长。——478, 480, 540。
- 杜林,欧根 (Дюринг, Евгений, 1833—1921年)——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对他作了批评。——286, 703。
- 杜勃罗留波夫,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 (Добролюбо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36—1861年)——76, 123, 142, 167, 169—170, 186, 192—194, 200—201, 203, 206, 209, 369—370, 383, 387—388, 392—393, 471, 496, 501, 541, 578—579, 696, 778。
- 杜德希金,斯切潘·谢明诺维奇 (Дудышкин, Степан Семенович, 1820—1866年)——新闻记者和自由派文学批评家。——74, 78, 143—144, 214, 230, 254。
- 杜霍夫尼柯夫,弗列贡特·瓦西里也维奇 (Духовников, Флегонт Васильевич, 死于1897年)——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的作者。——184。
- 苏尔特,尼古拉·让 (Сульт, Никола Жан, 1769—1851年)——法国国务活动家,拿破仑军队的元帅。——327。
- 苏,欧仁 (Сю, Эжен, 1804—1857年)——法国作家,宣扬自由主义和博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曾加以批判。——108, 475, 491, 570。
- 苏格拉底 (Сократ, 公元前469—399年)——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257—258, 266, 320, 351, 361, 426, 430, 442—443。
- 苏玛罗柯夫,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 (Сумаро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Петрович,

- 1717—1777年)——俄国作家, 贵族古典主义的代表。——527。
- 克里茨基, 瓦西里, 彼得和米哈伊尔 (Критские, Василий, Пётр и Михаил), 兄弟——十二月党人 (1827年) 拥护者的秘密结社的成员。——574。
- 克利福德, 威廉 (Клиффорд, Уильям, 1845—1889年)——英国数学家, 在哲学上是主观唯心主义者。——276。
- 克拉耶夫斯基, 安得列依·亚历山大罗维奇 (Краевский, Андр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0—1889年)——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派政论家, 《祖国纪事》的主编兼发刊者。——74, 191。
- 克特契尔, 尼古拉·赫里斯托佛罗维奇 (Кетчер, Николай Христофорович, 约1806—1886年)——医生和诗人、翻译家, 赫尔岑小组的参加者, 后来成为自由主义者。——611。
- 克雷洛夫, 伊万·安得列也维奇 (Крылов, Иван Андреевич, 1769—1844年)——著名的俄国寓言作家。——562。
- 克鲁平斯基, 巴维尔·尼古拉也维奇 (Круленский, 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1863年生)——第二、三、四届国家杜马的成员, 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反动分子。——743。
- 别切林, 弗拉基米尔·谢尔盖也维奇 (Печерин, Владимир Сергеевич, 1807—1885年)——俄国作家, 莫斯科大学的教授, 后变成天主教徒和神秘主义者。——767, 772。
- 别尔曼, 雅柯夫·亚历山大罗维奇 (Берман, Я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68—1933年)——社会民主党人, 马赫主义者, 后来成为苏联学者, 法学教授。——246, 277。
- 别林斯基, 维萨里昂·格里哥里也维奇 (Белинский, 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1811—1848年)——62, 69, 73—74, 76—77, 98, 102—103, 108—109, 123, 129, 135—136, 142, 148, 169, 181, 194—195, 206, 210, 212, 225, 265, 269—271, 340—341, 346—348, 350, 356, 361—364, 366—368, 383—386, 388—390, 417—420, 422, 431—482, 486—503, 505—594, 609, 615, 623—625, 635, 664—665, 667, 673, 679, 696—699, 721—724, 728, 733, 765, 772, 774—775。
- 里亚斯科夫斯基, 瓦列利·尼古拉也维奇 (Лясковский, Вале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关于斯拉夫主义者伊瓦和彼·瓦·基列也夫斯基以及阿·斯·霍米亚科夫一书的作者。——600。
- 里雅茨基, 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 (Ляцкий, Евген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生于1868年)——文学研究家和批评家。——181—182, 185, 188, 191, 398。
- 但丁·阿利格埃里 (Данте, Алигьери, 1265—1321年)——著名的意大利诗人。——340。
- 狄开亚赫 (Дикеарх, 约生于公元前350年)——古希腊消遣派哲学家, 亚里士多德的学生。——237。
- 狄慈根, 约瑟夫 (Дитцен, Иосиф, 1828—1888年)——德国工人, 社会民主党党员、哲学家、辩证唯物主义的拥护者。——766。
- 狄德罗, 德尼 (Дидро, Дени, 1713—1784年)——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

- 百科全书派的創始人。… 235, 253, 406, 485。
- 希尔德布兰德, 布鲁诺 (Гильдебранд, Бруно, 1812—1878年)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政治经济学中所谓历史学派的代表。… 113。
- 希林斯基-希赫马托夫, 普拉东·亚历山大罗维奇 (Ширинский-Шихматов, Плато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790—1853年) ——1850年起任国民教育大臣, 作家。… 56。
- 邦纳罗蒂, 菲力浦 (Буонарроти, Филипп, 1761—1837年) ——法国革命家, 空想共产主义者, 巴贝夫的战友, “平等派密谋”的参加者。— 718。
- 伽利略, 伽利莱奥 (Галилей, Галилео, 1564—1642年) ——著名的意大利物理学家。… 75, 197。
- 伽桑狄, 比埃尔 (Гассенди, Пьер, 1592—1655年) ——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 254。
- 纳杰日丁,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Надеждин,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04—1856年) ——俄国文学批评家, 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 123, 135—136, 206, 210, 341, 417—418, 432, 501, 522。
- 纳兹莫夫,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 (Назимов, 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1802—1874年) ——沙皇俄国的国务活动家, 1855—1863年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省的总督。— 645。
- 犹滴 (Юдифь) ——圣经里的女英雄, 据传说她拯救了犹太民族, 砍掉了统帅奥洛芬的头。… 152。

## 八 画

- 波瓦洛, 尼古拉 (Буало, Никола́, 1636—1711年) ——法国古典主义诗人和理论家。— 356—358。
- 波列伏依, 尼古拉·阿列克谢也维奇 (Полевой,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1796—1846年) ——俄国作家和历史学家, 资产阶级流派的新聞記者。… 123, 206, 501, 528。
- 波里比 (Полибий 約公元前 201—120年) ——古希腊的历史学家。— 97。
- 波奥丁,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 (Погодин, Михаил Петрович, 1800—1875年) ——俄国反动的历史学家和政论家, 贵族帝制的理论家。— 136, 210, 559—560, 615, 641, 650。
- 波波夫, 米哈伊尔·马克西莫维奇 (Попов, Михаил Максимович, 1801—1872年) ——别林斯基的中学教师, 从三十年代起是第三厅的官员。— 478, 498, 500。
- 波旁 (Бурбоны) ——1589—1792年, 1814—1815年, 1815—1830年统治法国的王朝。— 484, 614。
- 波格丹诺夫 (馬林诺夫斯基 (Малиновский) 的笔名),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 (Богдан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73—1928年) ——社会民主党人, 修正主义者, 哲学上的馬赫主义者。— 277, 695, 710。
- 波格丹诺维奇, 伊波里特·费多罗维奇 (Богданович, Ипполит Федорович, 1743—1803年) ——俄国诗人。— 527, 562。
- 波特金, 瓦西里·彼得罗维奇 (Боткин, Василий Петрович, 1811—1869年)

- 俄国自由主义政論家，批評家。  
— 299, 448, 452, 458—459, 461, 465, 469—474, 488, 490—491, 500, 514—515, 517—518, 546—549, 567, 577, 583, 593, 770。
- 泽米希，弗里德里希·海尔曼 (Земмиг, Фридрих Герман, 1820—1897年) —— 德国作家，“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 733。
- 泽勒尔，爱德华 (Целлер, Эдуард, 1814—1908年) ——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和哲学史家。—— 237。
- 法拉第，迈克尔 (Фарадей (Фарадей), Майкл, 1791—1867年) —— 英国物理学家，电磁場学說的創始者。—— 75, 197。
- 坡力克利特 (Поликлет, 公元前五世紀) —— 古希腊大雕刻家和艺术理論家。—— 351。
- 拉也夫斯基，弗拉基米尔·費多謝也維奇 (Раевский, Владимир Федосеевич, 1795—1872年) —— 俄国詩人，十二月党人，兩方协会的成員。—— 574。
- 拉也夫斯基，亚历山大·尼古拉也維奇 (Раевс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1795—1868年) —— 尼·尼·拉也夫斯基將軍的儿子，普希金的亲近的朋友。—— 767, 768。
- 拉馬克，让·巴蒂斯特·比埃尔·安都昂 (Ламарк, Жан Батист Пьер Антуан, 1744—1829年) —— 法国自然科学家。 242, 282—283。
- 拉方登，让·德· (Лафонтен, Жан де, 1621—1695年) —— 法国作家，著名寓言的作者。 562。
- 拉辛，让 (Расин, Жан, 1639—1699年) —— 著名的法国剧作家。—— 359—360。
- 拉辛，斯切潘·季莫費也維奇 (Расин, Степан Тимофеевич, 死于1671年) —— 顿河区哥薩克人，十七世紀后半期俄国最伟大的反封建的人民起义的領袖。—— 50, 185。
- 拉甫罗夫，彼得·拉甫罗維奇 (笔名米尔托夫) (Лавров, Петр Лаврович (Миртов), 1823—1900年) —— 革命的民粹主义思想家，社会学中主观主义学派的代表，《历史信札》的作者。—— 200, 229—230, 246, 265, 287—289, 711, 728。
- 拉美特利，茹利安·奥弗雷 (Ламеттри, Жюльен Офре, 1709—1751年) —— 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論者。—— 235, 253, 283, 694。
- 拉薩尔，斐迪南 (Лассаль, Фердинанд, 1825—1864年) —— 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反馬克思主义流派的代表。—— 115—116, 120, 122, 134, 179—180, 324, 482, 697, 774。
- 拉斐尔·桑蒂 (Рафаэль Санти, 1483—1520年) —— 著名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和建筑家。—— 364。
- 拉斯普庭，格里哥里·叶菲莫維奇 (Распутин, Григорий Ефимович, 1872—1916年) —— 在尼古拉二世宫廷中具有巨大影响的騙子手。—— 743。
- 拉赫秦，阿列克塞·庫茲米奇 (Ляхтин, Алексей Кузьмич, 1808—1838年) —— 三十年代亚·伊·蘇尔岑大学生小組的参加者。—— 611。
- 杰夫列特-吉尔杰也夫 (Девлет-Килдеев) —— 維亚特省烏尔茹姆县的醫



- 察局长，在赫尔岑的《往事与回忆》中曾提到。——618。
- 欧文，罗伯特 (Оуэн, Роберт, 1771—1858年)——68, 109, 224, 244, 301, 321, 337, 735。
- 欧里庇得 (Эврипид (Еврипид), 约公元前480—406年)——古希腊剧作家。——359。
- 欧靡帕斯 (Эвмпос, 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画家。——357。
- 阿尔勃提尼, 尼古拉·维谦提也维奇 (Альбертини, Николай Викентьевич, 1826—1890年)——政论家, 《祖国纪事》的撰稿者。——143。
- 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 (Алек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俄国沙皇 (1645—1676年)。——574。
- 阿那卡西斯 (Анахарсис 公元前六世纪)——西徐亚国王的儿子。——488, 496。
- 阿那克萨哥拉 (Анаксагор, 约公元前500—428年)——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709。
- 阿芬那留斯, 理查 (Авенариус, Рихард, 1843—1896年)——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276。
- 阿里欧斯托, 洛多维科 (Ариосто, Лодовико, 1474—1533年)——文艺复兴时代后期的意大利诗人, 长诗《狂暴的罗兰得》的作者。——197, 340。
- 阿克雪里罗得, 巴维尔·波利索维奇 (Аксельрод, Павел Борисович, 1850—1928年)——“劳动解放社”的成员, 后来是孟什维克。——61。
- 阿克萨柯夫, 伊万·谢尔盖也维奇 (Аксаков, 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1823—1886年)——俄国作家和政论家, 斯拉夫主义者。——144, 146, 213, 495, 560, 640, 740, 764—765。
- 阿克萨柯夫, 康斯坦丁·谢尔盖也维奇 (Аксаков, Константин Сергеевич, 1817—1860年)——政论家, 历史学家和作家, 斯拉夫主义者。——564, 612。
- 阿利斯托夫, 尼古拉·雅柯夫列维奇 (Аристов, Николай Яковлевич, 1834—1882年)——俄国历史学家, 夏波夫的拥护者。——121。
- 阿拉克切也夫, 阿列克塞·安得列也维奇 (Аракчеев, Алексей Андреевич, 1769—1834年)——保罗一世和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国防部长, 极端反动分子。——610, 757。
- 阿勃列西莫夫, 亚历山大·奥尼塞莫维奇 (Аблесим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Онисимович, 1742—1783年)——俄国作家, 寓言和喜歌剧的作者。——393。
- 奈, 米歇尔 (Ней, Мишель, 1769—1815年)——法国的元帅, 拿破仑第一的著名战友。——327。
- 奈依基尔赫, 伊万·雅柯夫列维奇 (Нейкирх, Иван Яковлевич, 1803—1870年)——语文学家, 基辅大学希腊语文学教授。——190—191。
- 弥拉特, 约翰 (Мюрат, Иоазим, 1771—1815年)——法国元帅, 1810—1815年为那不勒斯国王。——327。
- 陀思妥也夫斯基, 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е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821—1881年)——414, 474, 738, 782—783。
- 英诺森三世 (Иннокентий III)——罗马教皇 (1198—1216年), 企图使罗马的政治领导权凌驾于整个欧洲国家。——313。

- 居维叶, 若尔日 (Кювье, Жорж, 1769—1832年) — 法国的自然科学家, 所谓“灾变论”的创始人。——75, 197, 275, 311, 503。
- 孟德斯鸠, 沙尔·路易 (Монтескье, Шарль Луи, 1689—1755年) —— 法国启蒙学者, 社会学家和政治活动家。——91, 274, 302, 306。
- 罗门尼斯, 乔治·约翰 (Романес (Роменс), Джордж Джон, 1848—1894年) —— 英国自然科学家, 达尔文主义者。——253。
- 罗伯斯比尔, 马克西米利安 (Робеспьер, Максимилиан, 1758—1794年) ——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 小资产阶级革命家, 雅各宾党专政政府的首脑。——474—475, 479。
- 罗姆, 沙尔·日里伯尔 (Ромм, Шарль Жильбер, 1750—1795年) ——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 雅各宾党人, 庇护学术和文艺的著名财主 А. С. 斯特罗加诺夫的儿子们的教师。——69。
- 罗得 (Род (Rodde)) —— 1832—1839年出版的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报纸《常识》的编者。——718。
- 罗雪尔, 威廉·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 (Рошер, Вильгельм Георг Фридрих, 1817—1894年) —— 德国反动的经济学家, 政治经济学中所谓历史学派的创始人。——92, 97—98, 103, 296—297, 304。
- 罗斯托夫策夫, 雅柯夫·伊万诺维奇 (Ростовцев, Яков Иванович, 1803—1860年) —— 沙皇俄国的国务活动家, 参加了1861年“农民改革”的准备工作。——655。
- 罗森克兰茨, 卡尔 (Розенкранц, Карл, 1805—1879年) —— 德国哲学家, 黑格尔主义者和文学史家。——698。
- 罗蒙诺索夫, 米哈伊尔·瓦西里也维奇 (Ломоносов, 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1711—1765年) —— 470, 562。
- 果戈里, 尼古拉·瓦西里也维奇 (Гоголь, 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09—1852年) —— 62, 73, 129, 340—343, 346, 363, 376, 468, 494, 524, 537, 539, 572, 597, 622—623, 626, 715, 775。
- 果戈茨基, 西尔韦斯特尔·西尔韦斯特罗维奇 (Гогоцкий, Сильвестр Сильвестрович, 1813—1889年) —— 俄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哲学辞典》的编者。——254。
- 果洛赫瓦斯托夫, 德米特利·巴甫洛维奇 (Голохвастов, Дмитрий Павлович, 1796—1849年) —— 莫斯科学区督学的助手, 把维·格·别林斯基开除出大学的倡议人。——598。
- 叔本华, 阿尔都尔 (Шопенгауэр, Артур, 1788—1860年) —— 德国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230。
- 帕宁, 维克多·尼基提奇 (Панин, Виктор Никитич, 1801—1874年) —— 俄国反动的国务活动家, 废除农奴制筹备委员会的成员。——655—656。
- 帕纳也夫, 伊万·伊万诺维奇 (Панаев,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1812—1862年) —— 俄国作家和新闻记者; 1847年起是《同时代人》杂志的编辑和出版者之一。——122, 168, 206, 469, 478, 514, 539—540。
- 岡查罗夫, 伊万·亚历山大罗维奇 (Гончаров, Ив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2—1891年) —— 著名的俄国作

家。——605。

肯内·埃德加 (Кинь, Эдгар, 1803—1875年)——法国小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756。

舍夫琴柯, 塔拉斯·格里哥里也维奇 (Шевченко, Тарас Григорьевич, 1814—1861年)——乌克兰革命作家, 农奴出身。——494, 572。

舍尔古诺夫, 尼古拉·瓦西里也维奇 (Шелгунов, 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24—1891年)——俄国著名的政论家, 革命民主主义者。——175。

舍弗, 摩里茨 (Шифф, Морц, 1823—1896年)——德国生理学家。——729。

舍维辽夫, 斯切潘·彼得罗维奇 (Шевырев, Степан Петрович, 1806—1864年)——俄国反动的政论家和批评家。——123, 136, 206, 210, 491, 519。

舍普金, 米哈伊尔·谢明诺维奇 (Щепкин, Михаил Семенович, 1788—1863年)——俄国著名演员, 民主主义者, 戏剧艺术中现实主义的著名代表。——641。

朋齐·彼拉多 (Понтий Пилат)——公元26—36年任罗马驻犹太省总监(总督); 根据福音书的传说, 耶稣基督是在他的统治时期被处死的。——421。

彼洛夫斯基, 列甫·阿列克谢也维奇 (Перовский, Лев Алексеевич, 1792—1856年)——沙皇俄国的国务活动家, 内务部长。——640—641。

彼得一世 (Петр I)——俄国沙皇 (1682—1721年), 全俄罗斯的皇帝 (1721—1725年)——49—50, 53, 75, 198, 432, 438, 453, 463—465, 492—494, 518,

520, 523, 562, 566—569, 572, 574—575, 579, 644, 646, 667, 738, 761。

彼得二世 (Петр II)——俄国皇帝 (1761—1762年)——647。

彼得鲁雪夫斯基, 德米特利·莫伊谢也维奇 (Петрушевский, Дмитрий Моисеевич, 1863—1942年)——俄国历史学家, 中世纪史专家。——305, 315。

彼斯节里, 巴维尔·伊万诺维奇 (Пестель, Павел Иванович, 1793—1826年)——十二月党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和思想家。——599。

## 九 画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 卡尔·约翰 (Родбертус-Ягцов, Карл Иоганн, 1805—1875年)——庸俗经济学家反动的普鲁士容克地主的理论家。——95, 156, 305。

洛克, 约翰 (Локк, Джон, 1632—1704年)——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91, 254, 274, 404—405。

洛勒尔,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Лорер,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795—1873年)——十二月党人, 关于十二月党人回忆录的作者。——767。

恰达也夫, 彼得·雅柯夫列维奇 (Чаадаев, Петр Яковлевич, 1794—1856年)——俄国社会活动家, 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 在哲学上是唯心主义者。——432, 462, 479, 526, 540, 568, 627, 714, 747—766。

施米特, 康拉德 (Шмидт, Конрад, 1863—1932年)——德国经济学家和新康德主义哲学家, 修正主义者。——694。

施洛塞尔, 弗里德里希·克利斯托夫

- (Шлоссер, Фридрих Кристоф, 1776—1861年)——德国历史学家,自由主义者。——156。
- 施特劳斯,大卫·弗里德里希(Штраус, Давид Фридрих, 1808—1874年)——德国哲学家,政论家,青年黑格尔派,后来是民族自由主义者。——482, 583。
- 施梯林,约翰·亨利希(Штиллинг, Иоганн Генрих, 1740—1817年)——德国作家,神秘主义者。——755。
- 施蒂纳,麦克斯(Штирнер, Макс),卡斯巴尔·施米特(Каспар Шмидт)的笔名(1806—1856年)——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78, 230, 698。
- 美舍尔斯卡娅,索菲娅·谢尔盖也夫娜(Мещерская, Софья Сергеевна, 1775—1848年)——女作家和女翻译家。——762。
- 洪堡尔特,亚历山大(Гумбольдт, Александр, 1769—1859年)——德国学者,自然科学家和旅行家。——75, 197。
-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Фейербах, Людвиг, 1804—1872年)——68, 78—79, 86—87, 99, 101, 120, 170, 180, 196—197, 229—239, 243—245, 247—248, 250, 266—267, 270, 273, 276, 283, 287, 290, 298—299, 317, 321—322, 325, 333, 336, 352, 363, 365—368, 384—385, 387, 403—407, 409, 482, 488, 495, 535—536, 538—539, 544, 567, 580, 582—585, 588—590, 672, 685, 687, 689—692, 694, 701—702, 710—711, 713, 729—730, 733—734, 770, 783, 785。
- 费多罗夫,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Федоров, Константин Михайлович)——车尔尼雪夫斯基晚年在萨拉托夫时的秘书,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书的作者。——184, 190, 196, 221—222。
- 费忌(Фидий, 公元前五世纪初,约公元前432—431年)——古希腊大雕刻家。——351。
- 费希特,约翰·哥特利勃(Фихте, Иоганн Готлиб, 1762—1814年)——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77, 91, 274—275, 404—405, 433, 437, 439, 507—509, 517, 525—526, 543, 687, 689, 733。
- 费特(宪欣),阿法纳西·阿法纳西也维奇(Фет (Шеншин) Афанасий Афанасьевич, 1820—1892年)——俄国诗人。——472。
- 勃兰贝乌斯(Брамбеус)——见“信科夫斯基”条。
- 勃朗,路易(Блан, Луи, 1811—1882年)——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小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后来堕落到与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180, 301, 458, 475, 491, 519, 715, 718。
- 柯列斯尼柯夫,瓦西里·巴甫洛维奇(Колесников, 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1804—1862年)——十二月党人,奥连堡小组的参加者,著名的《回忆录》的作者。——574。
- 柯里佐夫,阿列克塞·瓦西里也维奇(Кольцов, Алекс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09—1842年)——卓越的俄国诗人。——490, 517, 531。
- 柯舍列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Коселев,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06

- 1883年) 俄国贵族政论家, 斯拉夫主义者。——594, 600。
- 柯罗连柯, 弗拉基米尔·加拉克季奥诺维奇 (Короленко, Владимир Галактионович, 1853—1921年) ——卓越的俄国作家和社会活动家。——220—221, 228—229。
- 柯拉金, 柳茨·塔克文尼 (Коллагин, Люций Тарквиний, 公元前六世纪) 罗马人, 卢克莱茨亚的丈夫。——89, 256。
- 柯斯托马罗夫,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Костомаров,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17—1885年) ——历史学家和作家, 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思想家之一。——409。
- 柯斯托马罗夫, 符谢沃洛德·德米特利也维奇 (Костомаров, Всеволод Дмитриевич, 1839—60年代末) 作家和翻译家, 在车尔尼雪夫斯基诉讼案件中以诋毁性和叛变性的口供著名。——158。
- 兹拉托弗拉茨基, 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 (Златоврат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45—1911年) ——俄国民粹派作家。——375。
- 柏拉图 (Платон, 公元前427—347年) ——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266, 343—346, 350—351, 355—357, 376。
- 柏格森, 昂利 (Бергсон, Анри, 1859—1941年) 法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 直觉主义的创始人。——276。
- 茹科夫斯基, 瓦西里·安得列也维奇 (Жуковский, Василий Андреевич, 1783—1852年) 卓越的俄国诗人。——562。
- 茹诺, 安多什 (Жюно, Андош, 1771—1818年) ——拿破仑军队的将军。——327。
- 契施辛, 瓦西里·叶夫格拉弗维奇 (Чешихин, Василий Евграфович), 笔名契施辛-维特林斯基 (Чешихин-Ветринский, 1866—1923年) ——俄国自由主义文学史家。——213, 307—308, 517, 592, 594, 608, 617, 669—672。
- 查理十世 (Карл X) ——法国国王 (1824—1830年), 为革命所推翻。——111, 648。
- 威德尔, 卡尔 (Вердер, Карл, 1806—1893年) ——德国哲学家, 黑格尔主义者和诗人。——698。
- 哈克斯特豪森, 奥古斯特 (Гакстгаузен, Август, 1792—1866年) 普鲁士官僚, 叙述普鲁士和俄国的土地关系的一些著作的作者。——67, 112, 172。
- 科尔夫,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Корф,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793—1869年) ——炮兵元帅。——53。
- 科尔夫, 莫迭斯特·安得列也维奇 (Корф, Модест Андреевич, 1800—1876年) ——尼古拉俄国的国务活动家, 《尼古拉一世皇帝的登基》一书的作者。——152, 634。
- 科尔尼洛夫, 亚历山大·阿列克谢也维奇 (Корнил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еевич, 1801—1856年) 维亚特省省长, 赫尔岑的《往事与回忆》中曾提到他。——618。
- 科本, 彼得·伊万诺维奇 (Кёппен, Петр Иванович, 1793—1864年) 俄国统计学家, 地理学家和民族志学者。——649。

科特利亚列夫斯基, 涅斯托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Котляревский, Несто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63—1925年) ——俄国自由资产阶级派的文学史家。——608, 610。

约尔丹, 威廉 (Иордан, Вильгельм, 1819—1904年) ——德国资产阶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454, 682, 685, 693, 698。

约德尔, 弗里德里希 (Йодль, Фридрих, 1849—1914年) ——布拉格和维也纳的哲学教授, 实证主义者。——404。

拜尔霍费尔, 卡尔·泰奥多尔 (Байергоффер (Байрхоффер), Карл Теодор, 1812—1888年) ——德国哲学家, 右派黑格尔主义者。——700。

拜伦, 乔治·诺埃尔·戈登 (Байрон, Джордж Ноэл Гордон, 1788—1824年) ——英国浪漫派诗人。——359—360, 417, 420, 422, 435, 529, 583, 756。

保罗一世 (Павел I) ——俄国皇帝 (1796—1801年) ——619, 714。

## 十 画

高乃依, 比埃尔 (Корнель, Пьер 1606—1684年) ——剧作家, 法国古典悲剧的奠基人之一。——197, 360。

海克尔, 恩斯特 (Геккель, Эрнст, 1834—1919年) ——德国自然科学家, 达尔文主义者, 自然历史唯物主义的代  
表。——705。

海涅, 亨利希 (Гейне, Генрих, 1797—1856年) ——738。

海德, 约翰·哥特弗利德 (Гердер, Иоганн Готфрид, 1744—1803年) ——德国作家和启蒙运动哲学家。——738。

涅克拉索夫, 尼古拉·阿列克谢也维奇

(Некрасо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1821—1878年) ——122, 131, 168, 191, 206, 402, 413—414, 474, 480, 502, 752。

涅杰连诺夫, 亚历山大·伊里奇 (Незлен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Ильич, 1845—1896年) ——俄国文学史家。——573。

涅费多夫, 菲力浦·第奥米多维奇 (Нефедов, Филипп Диомидович, 1839—1902年) ——俄国作家, 民粹主义者。——472。

涅维罗夫, 亚努阿里·米哈伊洛维奇 (Неверов, Януа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1810—1893年) ——教育家, 教育论文和回忆录的作者。——418。

席勒, 约翰·弗里德里希 (Шиллер, Иоганн Фридрих, 1759—1805年) ——196, 310, 340, 343—344, 351, 359—360, 362, 369—370, 431, 506, 515, 524, 530—531, 547, 549。

诺维柯夫,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Новиков,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744—1818年) ——卓越的俄国启蒙运动者, 社会活动家, 作家。——573。

诺维茨基, 奥列斯特·马尔柯维奇 (Новицкий, Орест Маркович, 1806—1884年) ——基辅大学的哲学教授, 唯心主义者。——319。

诺斯科夫, 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 (Носков, Михаил Павлович) ——赫尔岑-奥格辽夫大学生小组的参加者。——611。

荷马 (Гомер) ——传说中是古希腊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319, 359, 378。

莎士比亚, 威廉 (Шекспир, Вильям,

- 1564—1616年)——197, 320, 322—323, 359—360, 389, 534。
- 热马诺夫, 谢明·雅柯夫列维奇 (Же-  
манов, Семен Яковлевич, 1836—  
1903年)——六十年代的革命者, 政  
治侨民。——72。
- 莱布尼茨, 哥特弗利德·威廉 (Лейбниц,  
Готфрид Вильгельм, 1646—1716  
年)——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75, 197, 408, 685, 704。
- 莱辛, 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 (Лес-  
синг, Готхольд Эфраим, 1729—1781  
年)——著名的德国启蒙运动者, 批评  
家, 政论家, 剧作家。——62, 195,  
222, 265—266, 288, 326, 340, 343, 356  
—357, 359—360, 430, 533, 713, 738,  
753。
- 莱蒙托夫, 米哈伊尔·尤里也维奇  
(Лермонтов, Михаил Юрьевич,  
1814—1841年)——394, 414, 608—  
610。
- 莱赫里, 玛丽亚·卡斯帕罗夫娜 (Рей-  
хель, Мария Каспаровна, 1823—  
1916年)——赫尔岑的孩子們的女教  
师, 他的好朋友。——605。
- 格尔贝尔, 尼古拉·瓦西里也维奇  
(Гербель, 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27—1883年)——俄国诗人, 翻译  
家, 欧洲古典作家著作的出版者。——  
369。
- 格尔申斌, 米哈伊尔·奥西波维奇  
(Гершензон, Михаил Осипович,  
1869—1925年)——文学研究家和政  
论家, 神秘唯心主义者, 叛变性的《路  
标》文集的撰稿者。——747—750, 752  
—755, 757—762, 766—779。
- 格尔莫根 (格奥尔基·叶弗列莫维奇·  
多尔加涅夫) (Гермоген (Георгий  
Ефремович Долганев), 1858—1918  
年)——主教, 极端的黑帮分子。——  
743。
- 格兰诺夫斯基, 季莫费·尼古拉也维奇  
(Грановский, Тимофей Никола-  
евич, 1813—1855年)——俄国进步的  
学者, 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290—293, 317, 325—326, 418, 420,  
444, 460, 473—474, 505, 517, 592—  
594, 612, 664, 695, 767。
- 格列奇,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Греч,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787—1867  
年)——俄国反动的新闻记者和作家。  
——212。
- 格列姆, 约翰·威廉·路德维希 (Глейм,  
Иоганн-Вильгельм Людвиг, 1719  
—1803年)——德国诗人。——265。
- 格里果罗维奇, 德米特利·瓦西里也维  
奇 (Григорович, Дмитрий Васи-  
льевич, 1822—1899年)——卓越的  
俄国作家。——129, 376—377, 474。
- 格拉古兄弟 (Гракхи), 即提比利乌斯  
(Тиберий, 公元前163—132年)和凯  
尤斯 (Гай, 公元前153—121年)——  
古代罗马的政治活动家, 奴隶主民主  
派的代表。——94, 105, 305。
- 格林卡,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 (Глин-  
ка, 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1804—1857  
年)——著名的俄国作曲家。——603。
- 格林卡, 费多尔·尼古拉也维奇 (Глин-  
ка, Федор Николаевич, 1786—1880  
年)——俄国诗人和作家, 《鲍罗金诺  
战役概论》的作者。——361, 453, 487,  
515, 547。
- 格林, 雅科布 (Гримм, Якоб, 1735—  
1863年)和威廉 (Вильгельм, 1736—

1859年), 兄弟——德国語文学学者, 德国文化史家和語言史家。——294。

格律恩, 卡尔 (Грюн, Карл, 1817—1887年) ——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論家, “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拥护者, 曾出版費尔巴哈的遺著。——234, 584, 694, 722, 730, 733—734。

索尔达欽科夫, 柯兹馬·捷林吉也維奇 (Солдатенков, Козьма Терентьевич, 1818—1901年) ——著名的莫斯科出版者。——472。

索尼埃, 沙尔·让 (Сонье, Шарль Жан) ——有关写生画的一系列論文的作者。——358。

索洛維約夫, 弗拉基米尔·謝尔盖也維奇 (Соловьев, Владимир Сергеевич, 1853—1900年) ——俄国反动哲学家, 神秘主义者。——289, 761。

索薇兰 (Шовелан) ——和伏尔泰通信的人。——420。

索福克勒斯 (Софокл, 約公元前497—406年) ——古希腊大剧作家。——106, 359, 527。

莫里哀 (蒲克林), 让·巴蒂斯特 (Мольер (Поклен), Жан Батист, 1622—1673年) ——著名的法国喜剧作家。——196。

夏波夫, 阿法納西·普罗科菲耶維奇 (Щапов, Афанасий Прокофьевич, 1830—1876年) ——俄国进步的社会活动家, 历史学家。——121—122。

瑙莫夫, 阿列克塞·阿瓦庫莫維奇 (Наумов, Алексей Аввакумович, 1840—1895年) ——俄国画家。——478, 540。

泰涅尔, 小戴維 (Теньер, Давид Младший, 1610—1690年) ——法兰德艺术家。——379。

泰納, 伊波利特 (Тэн, Ипполит, 1828—1893年) ——法国文学研究家, 艺术理論家, 哲学家和历史学家。——551—552。

配第, 威廉 (Пэтти (Петти), Уильям, 1623—1687年) ——英国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經濟学的奠基人。——85。

埃斯庫罗斯 (Эсхил, 公元前525—456年) ——古希腊詩人, 著名的悲剧作家。——527。

恩格尔逊, 弗拉基米尔·阿利斯托維奇 (Энгельсон, Владимир Аристович, 1821—1857年) ——俄国政論家, 和彼得拉舍夫斯基派有联系, 政治侨民。——670。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Энгельс, Фридрих, 1820—1895年) ——64, 67—69, 79, 86—87, 97—98, 101, 109, 116, 119—121, 170, 267, 270, 276, 286—287, 298, 301, 317—319, 322, 324, 326, 425, 482, 495—496, 516, 576, 582, 600, 672, 686, 693—695, 697, 701, 703—705, 710, 712, 720, 733。

爱尔維修, 克劳德·阿德里安 (Гельвеций, Клод Адриан, 1715—1771年) ——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 百科全书派之一。——88, 267, 335, 483, 694, 751。

爱赫特尔迈尔, 泰奥多尔 (Эхтермейер, Теодор, 1805—1844年) ——青年黑格尔派。——547。

翁科夫斯基, 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維奇 (Унковский, Алек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1828—1893年) ——俄国地主, 自由主义者, 农奴解放草案的起草者。——644。



拿破侖第一 (拿破侖·波拿巴) (Наполеон I (Наполеон Бонапарт))——法国皇帝 (1804—1814 年和 1815 年)——275, 296, 327。

拿破侖第三 (路易·拿破侖·波拿巴) (Наполеон III (Луи Наполеон Бонапарт))——法国皇帝 (1852—1870 年)。—50, 117, 648。

倍倍尔, 奥古斯特 (Бebel, Август, 1840—1913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领袖之一。——122。

留基伯 (Левкиппи, 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 古希腊罗马原子学说的奠基者。——406。

特伦修斯, 普卜利乌斯 (Теренций, Публий, 约公元前 185—159 年)——罗马喜剧作家。——358。

特鲁别茨卡娅, 叶卡特林娜·伊万诺娃 (Трубецкая, Екатерина Ивановна, 死于 1854 年)——十二月党人腓尔盖·彼得罗维奇·特鲁别茨科伊的妻子, 后来随他一起到西伯利亚去。——402。

特鲁别茨科伊, 叶甫盖尼·尼古拉也维奇 (Трубецкой, Евген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63—1920 年)——俄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他企图使哲学和宗教相接近。——246。

## 十 一 画

密尔顿, 约翰 (Мильтон, Джон, 1608—1674 年)——英国诗人和政论家, 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91, 274。

密茨开维奇, 亚当 (Микевич, Адам, 1798—1855 年)——著名的波兰诗人, 革命家。——624。

鹿特丹的伊拉斯姆 (Эразм Роттердамский, 1466—1536 年)——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者, 讽刺作品《愚蠢颂》的作者。——731。

朗恩·让 (Ланн, Жан, 1769—1809 年)——法国的元帅, 拿破侖军队的统帅。——327。

朗格, 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 (Ланге, Фридрих Альберт, 1828—1875 年)——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 新康德主义者。——232—233。

康捷米尔, 安乔赫·德米特利也维奇 (Кантемир, Антиох Дмитриевич, 1708—1744 年)——俄国讽刺作家, 启蒙哲学家, 外交家。——501, 527。

康德, 伊曼努尔 (Кант, Иммануил, 1724—1804 年)——91, 259—260, 270, 274, 276, 344, 351, 392, 404—405, 689, 692, 774—775。

菲利浦二世 (Филипп II)——西班牙国王 (1556—1598 年)——450—451, 487。

菲利浦逊, 格里哥里·伊万诺维奇 (Филиппсон, Григорий Иванович, 1809—1883 年)——沙皇将官, 1861—1862 年是彼得堡学区的督学。——57, 177。

菲洛索佛夫, 德米特利·弗拉基米罗维奇 (Философов, Дмитр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1872 年生)——颓废派批评家和政论家, 神秘主义者, 白俄流亡分子。——246。

捷尔沙文, 加甫利尔·罗曼诺维奇 (Державин, Гаврила Романович, 1743—1816 年)——俄国诗人。——383, 529, 532, 546, 550, 562, 583。

梯叶里, 奥古斯丹 (Тьерри, Огюстен, 1795—1856 年)——法国历史学家,

- 自由资产阶级的思想家。——316, 557, 614, 719。
- 基尔沙·丹尼洛夫 (Кирша Данилов) ——十八世纪后半叶记录下来的俄国英雄叙事诗第一个汇集的假定的编纂者。——562。
- 基列也夫斯基, 伊万·瓦西里也维奇 (Киреевский, Иван Васильевич, 1806—1856年) ——俄国政论家, 斯拉夫主义者, 哲学家, 神秘主义者。——560—561, 563—564, 594, 600, 621, 641, 774。
- 基列也夫斯基, 彼得·瓦西里也维奇 (Киреевский, Петр Васильевич, 1808—1856年) ——斯拉夫主义者, 俄国民间创作的搜集家。——559—560, 564, 600, 621, 706。
- 基佐, 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 (Гизо, Франсуа Пьер Гийом, 1787—1874年) ——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务活动家。——93—95, 291, 294, 303, 309—314, 316—319, 329, 338, 458, 557。
- 基里亚柯夫 (Кирьяков) ——平庸的将军, 1854年塞瓦斯托波尔防御战的参加者。——53。
- 梭伦 (Солон, 约公元前638—559年) ——雅典的立法者, 被列为“七贤人”。——320。
- 梅列日柯夫斯基, 德米特利·谢尔盖也维奇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Дмит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 1865—1941年) ——俄国反动的颓废派作家。——733—734。
- 梅林, 弗兰茨 (Меринг, Франц, 1846—1919年) ——德国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 理论家, 马克思主义者。——356。
- 琉玻撒克的斯特拉敦 (Стратон из Лампсака, 死于约公元前270年) ——亚里士多德的学生, 逍遥派的著名代表。——237。
- 培根, 弗兰西斯 (Бэкон, Фрэнсис, 1561—1628年) ——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75, 197, 254。
- 屠克玛达, 托马斯 (Торквемада, Томас, 1420—1498年) ——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大活动家, 制定了法典和宗教裁判所的程序。——281, 285。
- 屠格涅夫,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Тургенев,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789—1871年) ——十二月党人, 进步的学者, 经济学家。——757。
- 屠格涅夫, 伊万·谢尔盖也维奇 (Тургенев, 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1818—1883年) ——俄国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著名小说作家。——59, 61, 129, 131, 142, 169, 212—213, 364, 370, 372—373, 376—377, 417—418, 420, 435, 444, 466, 474, 500—502, 638, 662—663, 669。
- 屠格涅夫,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Тургенев,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785—1845年) ——国务活动家和学者, 档案专家。——747, 760。
- 勒特歇尔, 亨利希·泰奥多尔 (Ретшер, Генрих Теодор, 1803—1871年) ——德国艺术理论家。——526。
- 勒鲁, 比埃尔 (Леру, Пьер, 1797—1871年) ——法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 空想社会主义者, 基督教社会主义者。——720, 727。
- 维干德, 奥托 (Виганд, Отто, 1795—1870年) ——德国的出版者和书商。——454, 698。

维尔納茨基, 伊万·瓦西里也維奇 (Вернадский, Иван Васильевич, 1821—1884年) ——俄国資產階級經濟學家。——136, 210。

維托希尼柯夫, 巴維爾·亚历山大羅維奇 (Ветошников, Паве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赫爾岑認識的人, 在國境綫上連同他的信件一起被捕。——157。

維亞澤姆斯基, 彼得·安得列也維奇 (Вяземский, Петр Андреевич, 1792—1878年) ——俄国詩人, 批評家和新聞記者。——753。

維杰里, 菲力浦·菲里波維奇 (Вигель, Филипп Филиппович, 1786—1856年) ——官僚, 保皇黨, 著名《回忆录》(或《見聞录》)的作者。——767。

維特林斯基 (Ветринский) ——見“契施辛”條。

維涅維齊諾夫, 德米特利·弗拉基米羅維奇 (Веневитинов, Дмитр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1805—1827年) ——俄国詩人, “愛智派”哲學小組的積極參加者。——522。

笛卡兒, 勒奈 (Декарт, Рене, 1596—1650年) ——法國數學家和唯理論哲學家。——75, 197, 267, 688。

## 十二画

謝切諾夫, 伊万·米哈伊洛維奇 (Сеченов, Иван Михайлович, 1829—1905年) ——俄国自然科學家, 俄国生理學派的奠基人。——286。

謝爾巴托夫, 格里哥里·阿列克謝也維奇 (Щербатов, Григор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1819—1881年) ——五十年代彼得堡學區的督學。——176—177。

謝爾諾-索洛維也維奇, 尼古拉·亚历山大羅維奇 (Серно-Соловьевич,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34—1866年) ——革命民主主義者, 六十年代秘密革命團體“土地與自由協會”的組織者之一。——157。

謝林, 弗里德里希·威廉 (Шеллинг, Фридрих Вильгельм, 1775—1854年) ——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77, 91, 103, 230, 242, 247, 255, 274, 417—418, 424, 503, 522, 543—544, 681, 686—687, 689—691, 712—713, 727, 729, 750, 762。

謝拉科夫斯基, 西吉茲蒙特 (Сераковский, Зигмунт, 1827—1863年) ——波蘭的革命民主主義者, 1863年立陶宛起義的領導者。——149, 219。

謝美夫斯基, 瓦西里·伊万諾維奇 (Семевский, 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1848—1916年) ——俄国歷史學家, 俄国歷史編纂學家中民粹派的代表。——640。

謝德林 (Щедрин) ——見“薩爾梯柯夫”條。

普加喬夫, 叶梅連·伊万諾維奇 (Пугачев, Емельян Иванович, 約1742—1775年) ——十八世紀俄国最大的一次反封建農民起義的領袖。——50。

普盧塔克 (Плутарх, 約46—126年) ——古希臘的作家, 道德學家, 卓越的希臘和羅馬的活動家們的傳記的作者。——97。

普列謝也夫, 阿列克塞·尼古拉也維奇 (Плещеев, 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25—1893年) ——俄国詩人。——381—382。

普利什凱維奇, 弗拉基米爾·米特羅范

- 諾維奇 (Пуришкевич, Владимир Митрофанович, 1870—1920年)——保皇党, 黑帮組織的奠基人。——743。
- 普利斯特列, 約瑟夫 (Пристли, Джозеф, 1733—1804年)——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 著名的化学家。——249, 251。
- 普希金, 亚历山大·謝尔盖也維奇 (Пушкин,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1799—1837年)——69, 75, 103, 340—343, 346, 349, 383, 392, 414, 459, 496, 515, 534—535, 537, 556, 562, 576—577, 580, 599, 603, 608, 767—768, 782—784。
- 普罗托波波夫, 伊万·叶甫多基莫維奇 (Протопопов, Иван Евдокимович)——1826年起为亚·伊·赫尔岑的家庭教师。——599。
- 普罗塔索夫, 米哈伊尔·謝明諾維奇 (Протасов, Михаил Семенович)——执事, 卓尔尼雪夫斯基家庭的熟人。——189。
- 普嘉廷, 叶夫普米·瓦西里也維奇 (Путятин, Евфим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03—1883年)——1861年是国民教育大臣, 实行反动政策, 海軍科学考察团的参加者。——57, 176—177。
- 馮特, 威廉·麦克斯 (Вундт, Вильгельм Макс, 1832—1920年)——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实验心理学的創始人之一。——351。
- 馮維辛, 德尼斯·伊万諾維奇 (Фонвизин, Денис Иванович, 1744—1792年)——著名的俄国諷刺喜劇作家。——192, 195, 526—527, 562, 567—568。
- 博馬舍, 比埃尔·奧古斯丹·卡隆 (Бомарше, Пьер Огюстен Карон, 1732—1799年)——法国著名的劇作家和諷刺作家。——61。
- 博古查尔斯基, 瓦西里·雅柯夫列維奇 (眞姓雅柯夫列夫) (Богучарский, Василий Яковлевич (Яковлев), 1861—1915年)——自由资产階級政治活动家和民粹运动历史学家。——780—786。
- 博博雷金, 彼得·德米特利也維奇 (Боборыкин, Петр Дмитриевич, 1836—1921年)——俄国作家。——603—604。
- 斯切克洛夫, 尤里·米哈伊洛維奇 (Стеклов, Ю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1873—1942年)——文学家, 关于卓尔尼雪夫斯基一书的作者。——407, 559。
- 斯卡比切夫斯基,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維奇 (Скабичевс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838—1910年)——俄国自由派文学批評家和文学史家。——346—348, 350, 378—379, 387, 391, 393, 396—397。
- 斯列兹涅夫斯基, 伊兹馬伊尔·伊万諾維奇 (Срезневский, Измаил Иванович, 1812—1880年)——著名的斯拉夫語言学家。——190, 196。
- 斯伯兰斯基,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維奇 (Сперанский,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1772—1839年)——俄国国务和政治活动家, 曾草拟旨在巩固专制政体的溫和的改革草案。——152。
- 斯坦凱維奇, 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維奇 (Станкевич Никола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1813—1840年)——俄国启蒙运动者, 三十年代莫斯科哲学界的领导人。——102, 417—418, 420, 439, 444,

- 457, 473, 499, 500, 505, 509, 767。  
 斯柯別列夫, 伊万·尼基提奇 (Скобелев, Иван Никитич, 1778—1849年) ——俄国將軍和軍事作家, 1839年起任波得羅巴甫洛要塞的司令。——477。  
 斯特罗也夫, 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維奇 (Строев, Владими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812—1862年) ——新聞記者和翻譯家。——570。  
 斯特罗加諾夫, 謝尔盖·格里哥里也維奇 (Строганов, Серге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1794—1882年) ——俄国国务活动家和考古学家, 將軍, 參謀。——755, 762。  
 斯特拉重夫, 尼古拉·尼古拉也維奇 (Страхов,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28—1896年) ——俄国政論家, 批評家, 唯心主义哲学家, 翻譯家。——233。  
 斯宾諾莎, 巴魯赫 (別涅狄克特) (Спиноза, Барух (Бенедикт), 1632—1677年) ——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235—236, 267, 360, 404, 622, 733, 753。  
 斯宾塞·赫伯特 (Спенсер, Герберт, 1820—1903年) ——英国資產階級实证論哲学家, 社会学中所謂有机論學派的代表。——351, 391, 404—405。  
 斯涅基辽夫, 伊万·米哈伊洛維奇 (Снегирев, Иван Михайлович, 1793—1868年) ——莫斯科大学的教授和书刊检查員, 俄国古代文献的搜集家。——597。  
 斯密, 亚当 (Смит, Адам, 1723—1790年) ——英国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学家。——85, 92, 97, 199, 296—297。  
 斯塔爾切夫斯基, 阿德尔貝特·維謙吉也維奇 (Старчевский, Адальберт Викентьевич, 1818—1901年) ——新聞記者, 精通欧洲和東方語言, 許多参考书和字典的作者。——190。  
 斯塔爾-霍爾施坦, 安娜·路易莎·杰爾門娜·德 (Сталь-Гольштейн, Анна Луиза Жермена де, 1766—1817年) ——法国女作家。——421。  
 斯塔修列維奇, 米哈伊尔·馬特維也維奇 (Стасюлевич, Михаил Матвеевич, 1826—1911年) ——資產階級政論家和历史学家。——309。  
 斯塔赫維奇, 謝尔盖·格里哥里也維奇 (Стахович, Серге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1843—1918年) ——革命民粹主义者, 1864年被判处服苦役。——215—216。  
 斯維爾別也夫, 德米特利·尼古拉也維奇 (Свербеев, Дмит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799—1876年) ——知識淵博的俄国貴族之一, 著名回忆录的作者。——757。  
 斯維德利盖洛 (Свидригайло (Швигригайла)) ——立陶宛的大公 (1430—1432年) ——150, 218。  
 塔兰杰, 阿尔弗勒德 (Таланье, Альфред, 1822—1890年) ——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 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642。  
 塔克文尼·塞克斯特 (Тарквиний Секст, 公元前六世紀) ——傳說是古羅馬最末一个(第七个)皇帝 ——傲慢的塔克文尼的儿子, 曾污辱卢克萊芙亚。——88, 256。  
 塔索, 托尔克瓦托 (Тассо, Торквато, 1544—1596年) ——文艺复兴时期意

- 大利的大诗人。——340。
- 雅庫什金, 伊万·德米特利也維奇 (Якушкин, Иван Дмитриевич, 1793—1857年)——十二月党人北方协会的成員, 唯物主义哲学家。——762。
- 雅孜科夫, 尼古拉·米哈伊洛維奇 (Языков, 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1803—1846年)——俄国诗人。——752。
- 雅柯夫列夫, 伊万·阿列克謝也維奇 (Яковлев, Иван Алексеевич, 1767—1846年)——亚·伊·赫尔岑的父亲。——598, 605, 617。
- 雅科温科, 瓦伦亭·伊万諾維奇 (Яковенко, Валентин Иванович, 1859年生)——文学家, 地方自治局統計家, 进步的出版家。——705。
- 雅斯特烈布挫夫, 伊万·伊万諾維奇 (Ястребов,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1776—1817年)——俄国作家, 科学院院士。——760, 762。
- 森柯夫斯基, 奥西普·伊万諾維奇 (笔名男爵布朗貝烏斯) (Сенковский, Осип Иванович (Брамбеус), 1800—1858年)——俄国历史学家, 反动的作家和新聞記者。——123, 136, 206, 210, 469。
- 贺雷西, 弗拉克·昆图斯 (Гораций, Флакк Квинт, 紀元前65—8年)——罗马诗人。——356, 580。
- 凱里, 亨利 (Кэри, Генри, 1793—1879年)——美国经济学家, 保护关税論者, 資本主义的辯护者。——152。
- 黑格尔,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Гегель, Георг Вильгельм Фридрих, 1770—1831年)——62—64, 67—68, 77—78, 82, 86, 91, 99, 101—103, 106, 108, 122, 137—139, 170, 173—174, 196, 230—231, 233, 242, 247, 266—269, 271, 275, 278—279, 283, 286, 298, 311, 319, 347, 355, 360—363, 366—367, 383, 404—405, 417—418, 424—431, 437, 439, 443—445, 448—458, 474, 482, 484—489, 495, 500, 502—506, 508—510, 513—515, 518, 521—522, 526, 528, 530, 533, 535—538, 543—545, 547—549, 557—558, 561—562, 566—567, 574, 580—582, 584—590, 621, 672, 680—682, 685—687, 689—691, 693, 697—705, 707—712, 716, 718, 720—724, 726—729, 731, 737, 743, 766, 770, 771, 774, 785。
- 舒瓦洛夫, 彼得·安得列也維奇 (Шувалов, Петр Андреевич, 1827—1889年)——反动的国务活动家, 农民改革的反对者, 宪兵司令。——166。
- 舒尔采-德里奇, 海尔曼 (Шульце-Делич, Герман, 1808—1883年)——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工人中組織合作社以使他們离开革命斗争。——116, 120, 180。
- 舒蒂, 罗伯特 (Соути, Роберт, 1774—1843年)——英国诗人。——369。
- 傅立叶, 沙尔 (Фурье, Шарль, 1772—1837年)——109, 163, 224—225, 227, 298, 300—301, 321, 475, 720, 735。
- 萨馬林, 尤利·費多羅維奇 (Самарин, Юрий Федорович, 1819—1876年)——俄国政論家, 斯拉夫主义者。——494, 701, 734—735, 774, 781, 783。
- 萨尔梯柯夫 (薩尔梯柯夫-謝德林)·米哈伊尔·叶夫格拉弗維奇 (Салтыков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Михаил Евграфович, 1826—1889年)——著名的俄国諷刺作家。——136, 212, 258,

- 475, 622。
- 萨伏(Ксанф)——神話傳說中的人物，哲学家，他的奴隶据說是寓言作家伊索。——691。
- 萨伊，让·巴蒂斯特(Сэй(Сей), Жан Батист, 1767—1832年)——法国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經濟学的創始者。——298。
- 萨克莱，威廉·麦克反斯(Теккерей, Уильям Мейкпис, 1811—1863年)——卓越的英国现实主义作家。——343。
- 萨宗諾夫，尼古拉·伊万諾維奇(Сазонов,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15—1862年)——赫尔岑—奥格辽夫大学生小組的参加者，后来是侨民，政論家。——611, 633。
- 萨維奇，阿列克塞·尼古拉也維奇(Савич, 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10—1883年)——赫尔岑—奥格辽夫大学生小組的参加者，后来是卓越的天文学家。——611。
- ### 十三画
- 雷列也夫，康德拉季·費多罗維奇(Рылеев, Кондратий Фёдорович, 1795—1826年)——俄国詩人，十二月党人运动的领导者之一。——599, 608。
- 雷姆克，米哈伊尔·康斯坦丁諾維奇(Лемке, Михаил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72—1923年)——俄国文学史家和革命运动史学，有价值的历史文献的搜集家，亚·伊·赫尔岑全集的主編。——191, 198—199, 215, 220, 222, 229, 337。
- 葛德文，威廉(Годвин, Уильям, 1756—1836年)——英国小资产阶级作家，政論家和文学史家，无政府主义者。——222。
- 路易十五(Людовик XV)——法国国王(1715—1774年)。——328, 569—570。
- 路易十六(Людовик XVI)——法国国王(1774—1792年)，被国民議會判处死刑。——328, 484, 599—600。
- 路易十八(Людовик XVIII)——法国国王(1814—1824年)。——111。
- 路易·保尔(Луи, Поль, 1872年生)——法国进步的历史学家，法国工人运动史的著者。——613。
- 路易斯，乔治·亨利(Льюис, Джордж Генри, 1817—1878年)——英国实证論哲学家和达尔文主义生理学家。——387。
- 路德維希-菲力浦(Лудвиг-Филипп(Людовик-Филипп))——法国国王(1830—1848年)。——718。
- 奥什洛，比埃尔·弗朗斯瓦·沙尔(Ожеро, Пьер Франсуа Шарль, 1757—1816年)——法国元帅，拿破侖第一的战友。——327。
- 奥夫夏尼柯-庫利柯夫斯基，德米特利·尼古拉也維奇(Овсянко-Куликовский, Дмит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53—1920年)——俄国文学研究家和語言学家。——552, 613, 628。
- 奥尔丁斯基，波利斯·伊万諾維奇(Ордынский, Борис Иванович, 1823—1861年)——羅馬語文科学教授，亚里士多德的論文《诗学》的翻譯者和注释者。——103, 342。
- 奥尔洛夫，米哈伊尔·費多罗維奇(Орлов Михаил Фёдорович, 1788—1842年)——少将，拿破侖战役的参加者，

- 十二月党人。——767。
- 奥尔洛夫, 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Орлов, Алексей Федорович, 1786—1861年) — 军事和国务活动家, 外交家, 宪兵司令, 十二月党人米·费·奥尔洛夫的哥哥。 758。
- 奥尔格尔德(阿里吉尔达斯)(Ольгерд(Альгирдас)) — 立陶宛大公(1345—1377年)。— 150, 218。
- 奥古斯丁·奥略里(Августин, Аврелий, 354—430年) — 基督教神学家和神秘主义哲学家。 713。
- 奥多也夫斯基, 弗拉基米尔·费多罗维奇(Одоевский, Владимир Федорович, 1804—1869年) — 俄国作家和音乐学家。——499, 502, 584。
- 奥多也夫斯基,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Одоевс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02—1839年) — 俄国十二月党人, 诗人。— 639。
- 奥托, 路易莎(Отто, Луиза, 1819—1895年) — 德国女作家, “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698。
- 奥格辽夫, 尼古拉·普拉东诺维奇(Огарев, Николай Платонович, 1813—1877年) — 俄国贵族革命家, 政论家, 诗人, 赫尔岑的战友。——307, 610, 612, 616—617, 633—637, 639—640, 645—646, 648—651, 653—655, 657, 659—663, 665—672, 675—678, 691, 767, 770, 781。
- 奥捷罗夫, 弗拉基斯拉夫·亚历山大罗维奇(Озеров, Владислав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769—1816年) — 俄国作家, 剧作家。——562。
- 奥斯特瓦尔德, 威廉·弗里德里希(Оствальд, Вильгельм Фридрих, 1853—1932年) — 著名的德国物理化学家, 唯心主义哲学家。——705。
- 奥斯特罗夫斯基, 亚历山大·尼古拉也维奇(Островс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1823—1886年) — 俄国大剧作家。——393。
- 奥斯塔德(Остаде) — 见“万·奥斯塔德”条。
- 奥瑞尔, 伊本-阿尔-哈达伯(Омар, ибн-аль-Хаттаб) — 阿拉伯的哈利发(634—644年)。——443。
- 蒲晓(Бушо) — 亚·伊·赫尔岑幼年时期的教师, 在《往事与回忆》中提到他。——599, 608, 737。
- 蒲鲁东, 比埃尔·约瑟夫(Прудон, Пьер Жозеф, 1809—1865年) — 法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69, 118—119, 170, 455, 642—643, 648, 672, 680, 715, 720, 722—723。

#### 十四画

- 福士考洛, 尼科洛·乌果(Фосколо, Николо Уго, 1778—1827年) — 意大利诗人和作家, 意大利民族解放斗争的参加者。——753。
- 福季(Фотий, 1792—1838年) — 修士大司祭, 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时反动计划的草拟者。——751。
- 歌德, 约翰·沃尔弗干格(Гете, Иоганн Вольфганг, 1749—1832年) — 160, 196—197, 224, 343, 359—360, 428, 442, 531, 549, 729。
- 赫尔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Герцен,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12—1870年) 59, 69, 142, 145, 157—158, 161, 167, 169, 172, 175, 196, 208



- 209, 212—213, 225, 307—309, 418, 420, 426, 432, 444, 454—457, 461—462, 469, 473—474, 477, 479, 481, 485—486, 489—490, 500, 504, 506, 514, 517, 521, 540, 568, 597—601, 603—613, 615—650, 652, 654—685, 687—699, 701—741, 743—744, 758, 761—762, 766, 770, 772, 780—786。
- 赫拉克利特 (爱非斯地方的) (Гераклит, Эфесский, 約公元前 530—470 年) …… 古希腊的辩证論者。—120, 699, 703—704。
- 赫拉斯科夫, 米哈伊尔·馬特維也維奇 (Херасков, Михаил Матвеевич, 1733—1807 年)——俄国作家。—527。
- 赫洛平, 瓦西里·瓦西里也維奇 (Хлопин, 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諾夫戈罗德省公署的顧問, 在赫尔岑的《往事与回忆》中曾提到过。—620。
- 赫斯, 莫泽斯 (Гесс, Мозес, 1812—1875 年) …… 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論家, “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710, 733。
- 慕辛-普希金 (Мусин-Пушкин)——諾夫哥罗德的地主, 在赫尔岑的《往事与回忆》中曾提到。—620。

### 十五画

- 摩尔根, 路易斯·亨利 (Морган, Льюис Генри, 1818—1881 年)——美国学者, 人种学家, 原始社会研究者。—86。
- 摩莱肖特, 雅科布 (Мольтшотт, Якоб, 1822—1893 年) …… 资产阶级生理学家, 庸俗唯物主义者。—68, 78, 230, 234, 387, 694, 730。
- 德米特利也夫, 伊万·伊万諾維奇 (Дми-

- триев,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1760—1837 年)——俄国詩人。—562。
- 德拉哥馬諾夫, 米哈伊尔·彼得羅維奇 (Драгоманов, Михаил Петрович, 1841—1895 年) …… 乌克兰民族自由主义的代表, 政論家和民族志学者。—213。
- 德勒克吕兹, 埃蒂耶納·让 (Делеклюз, Этьен Жан, 1781—1863 年)——法国大卫派画家和艺术理論家。—350。
- 德謨克利特 (Демокрит, 約公元前 460—370 年)——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250, 406。
- 德魯任宁, 亚历山大·瓦西里也維奇 (Дружинин,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1824—1864 年)——俄国自由派的批評家, “为艺术而艺术”理論的宣传者, 小說家, 通俗小說《波連卡·薩克斯》的作者。—225。

### 十六画

- 霍尔巴赫, 保尔·昂利 (Гольбах, Поль Анри, 1723—1789 年)——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79—81, 251, 262, 404—405, 688, 694, 707, 709。
- 霍布斯, 托馬斯 (Гоббс, Томас, 1588—1679 年)——英国唯物主义者。—91, 274, 454, 706—707。
- 霍米亚科夫, 阿列克塞·斯切潘諾維奇 (Хомяков, Алексей Степанович, 1804—1860 年) …… 作家, 斯拉夫主义的著名活动家。—560, 563—564, 594, 639, 664, 694, 774。
- 穆拉維約夫, 米哈伊尔·尼古拉也維奇 (Муравьев, 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1796—1866 年)——沙皇俄国的国务

活动家, 农奴制拥护者, 1863 年波兰起义的刽子手。—— 166。

穆勒, 约翰·斯图亚特 (Милль, Джон Стюарт, 1806—1873 年) —— 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 实证论者, 逻辑学家和经济学家。—— 99—100, 155—156, 199, 240, 404—405, 408。

鲍威尔, 布鲁诺 (Бауер, Бруно, 1809—1882 年) —— 德国哲学家, 青年黑格尔派。—— 78, 229—230, 482, 583, 698, 701, 713, 778。

鲍特, 让·雅克 (Бот (Бол), Жан Жак, 1792—1862 年) —— 法国政论家, 1830 年反对波旁王朝的《时代》报的出版者。—— 718。

### 十八回

魏谢洛夫斯基, 阿列克塞·尼古拉也维奇 (Веселовский, 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43—1918 年) —— 俄国文学史家, 自由主义者。—— 622。